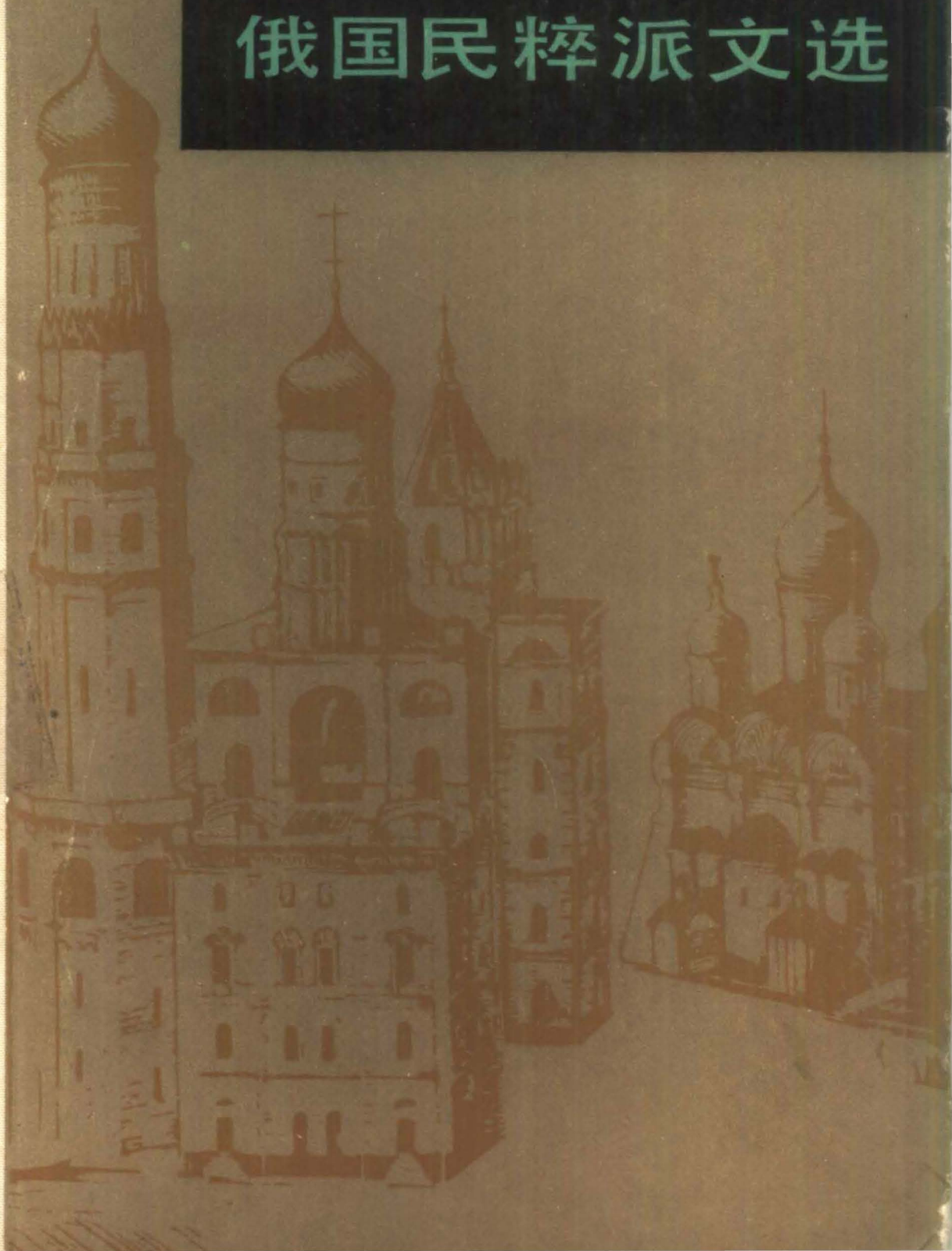


俄国民粹派文选



俄国民粹派文选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钱月华

俄国民粹派文选

Eguo Mincuipai Wenxuan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2.75印张 785,000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书号 3001·1887 定价 4.55元

前 言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在俄国出现的一个带有浓厚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是俄国长期经济落后、农民小生产者占优势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特有的产物。

民粹主义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时期，曾在俄国历史上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根据列宁的分析，民粹主义可以分成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革命的民粹主义即旧民粹主义，它在六十、七十年代的俄国思想史上居于统治地位。到了八十、九十年代，民粹主义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自由民粹主义占了上风，它与自由派合流，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严重障碍。

民粹派的基本理论思想就是把俄国的村社制度理想化，肯定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这种理论并非民粹派的独创，它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期。这一理论最早是由俄国伟大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

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是一次极不彻底的改革。根据沙皇政府颁布的新法令，农民虽然有了人身的自由，但他们在经济上却根本没有解放，农奴制的残余依然保留着。农民们所遭受的压迫有增无已。与此同时，随着农奴制的改革，资本主义在俄国也迅速发展起来。这样一来，大批大批的农民走向破产，沦为无产者，遭受封建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批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青年知识分子冲上俄国的政治斗

争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力图通过发动农民来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从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民粹派的名称也正是由此而来的。民粹派的政治要求恰恰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未来的学说中找到了现成的理论根据。所以民粹派把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并不是偶然的，尽管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是民粹派。

用列宁的话来说，民粹派的基本理论观点概括起来就是：“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鼓舞他们、唤起数十人数百人去同政府作英勇斗争的东西。”^①

从反对农奴制残余和沙皇专制制度以及解除人民痛苦的主观愿望来看，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但是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抱住俄国遗留下来的落后的村社经济不放，把村社和农民自治美化成一条不同于欧洲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他们看不到在俄国的现实生活中，与其说人民是受资本主义发达之苦，不如说是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所以他们不加分析地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衰落、倒退和祸害，对俄国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他们对真正代表着世界未来的工人阶级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不是把工人阶级当作创造真正人类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力量，而是视为俄国“历史的不幸”以至“祸害”。他们不懂得，“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②民粹派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因为他们的基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2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

本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和反动的。

民粹派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派别。七十年代民粹派各派的代表人物是拉甫罗夫、巴枯宁和特卡乔夫。虽然他们在基本理论上是一致的，但在革命的策略问题上则有很大的分歧。

拉甫罗夫派认为，俄国人民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革命的时刻什么时候到来，还无法预言”，革命者的当务之急就是到农村去宣传，使农民作好起义的准备。所以人们通常把这一派称为“宣传派”或“准备”派。

特卡乔夫与拉甫罗夫截然不同，他对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充满了极度恐惧和不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会推迟革命以至永远不能实现，因此现在应当立即实行暴动。现在必须立即“敲起警钟”，毫不拖延地实行变革，“任何犹豫不决、任何拖延耽搁都是犯罪！”他认为，“准备革命——这根本不是革命家的事”，“革命家不是准备革命，而是干革命”。

号称“暴动派”的巴枯宁派在立即实行暴动这一点上同特卡乔夫派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俄国农民的革命情绪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所以他号召青年到农村去立即组织起义。但在如何暴动和暴动的归宿问题上他们却有原则的分歧。巴枯宁着眼于农民，而且反对建立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他认为，农民始终是反对国家这个最大的祸害的，因此，立刻消灭国家是“社会革命”的基本的和首要的任务。与巴枯宁不同，特卡乔夫是一个布朗基主义者，在他看来，革命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情，只有靠少数知识分子采取密谋的办法才能夺取政权，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民粹主义行动上的多次失败。民粹派内部开始分化瓦解。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以米哈伊洛夫斯基、尤沙柯夫、沃龙佐夫和丹尼尔逊为主要代表的自由民粹派占了

上风。

这个时期的民粹派已经失去了“到民间去”的热情，他们并没有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实中吸取必要的教训，相反，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同政府的斗争上，把个人恐怖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斗争手段。这就不能不使他们更加脱离人民，招致反动当局更加疯狂的镇压，使无数热情的革命青年死于沙皇政府的屠刀，最后使革命归于失败。

列宁在革命活动的初期就同民粹主义进行了斗争，并撰写了重要的历史性专著，全面地批判了民粹派的哲学观点、经济思想和政治纲领。列宁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给予民粹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如上所述，民粹主义在俄国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同欧洲早期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是在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今天，研究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及其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收集了俄国民粹派各个时期各个派别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和一些纲领性的文献，编译了这本书，供有关研究工作者和读者参阅。

参加本书编选和译校工作的有：宋洪训、纪涛、杨穆、王家华、谢梅馨、李吟波。

参加部分文章翻译的有：蔡毅、吴育群、单继达、刘环宇、王忠琪、林静、王承时、靳慰然、冯加、李毓榛、杜奉真、樊立堂、周延实。

目 录

致青年一代	(1)
青年俄罗斯	(20)
村社	阿·普·夏波夫(31)
致劳工朋友们	德·弗·卡拉科佐夫(41)
农民问题(摘录)	格·扎·叶利谢也夫(44)
我们的纲领	米·亚·巴枯宁 尼·伊·茹柯夫斯基(45)
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	米·亚·巴枯宁(47)
历史信札(摘录)	彼·拉·拉甫罗夫(53)
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摘录)	恩·弗列罗夫斯基(151)
社会科学入门(摘录)	恩·弗列罗夫斯基(181)
富豪制及其基础	格·扎·叶利谢也夫(184)
论马克思一书俄文版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222)
工业家代表大会上的俄国工人问题(摘录)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233)
致俄罗斯人民(摘录)	亚·瓦·多尔古申(243)
致知识分子	亚·瓦·多尔古申(257)
革命宣传纲领	彼·阿·克鲁泡特金(260)
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摘录)	彼·阿·克鲁泡特金(263)
前进,我们的纲领!(摘录)	彼·拉·拉甫罗夫(285)
俄国人民的账(摘录)	彼·拉·拉甫罗夫(294)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补充(一)

- 米·亚·巴枯宁(303)
- 农民改革(摘录) 格·扎·叶利谢也夫(325)
- 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 彼·尼·特卡乔夫(337)
- 敲起警钟! 彼·尼·特卡乔夫(373)
- 能实际达到的近期革命目标应当是什么?(摘录)
..... 彼·尼·特卡乔夫(377)
- 为什么我们要办报(《工作者报》) (382)
- 赋税在增加,工作却没有!(摘录) (387)
- 革命与国家 彼·尼·特卡乔夫(394)
- 人民与革命 彼·尼·特卡乔夫(407)
- 近年来俄国经济开发成就概述(摘录) (415)
- 《开端报》 (429)
- 我们在农村中的任务(摘录) 雅·瓦·斯捷法诺维奇(434)
- “土地和自由”社纲领 (439)
- 《土地和自由》杂志纲领 谢·米·克拉夫钦斯基(446)
- 《土地和自由》论未来制度的理想(摘录) (452)
- 人民园地上的新苗 (455)
- 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
..... 格·瓦·普列汉诺夫(487)
- “土地平分”社宣言 格·瓦·普列汉诺夫(499)
- 土地平分 格·瓦·普列汉诺夫(501)
- 《民意报》的任务 (510)
-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纲领 (519)
- 致卡尔·马克思 (524)
- 政治革命和经济问题 阿·多罗申柯(525)
- 民意党工人党员纲领 (532)

给《土地平分》杂志编辑部的信	格·瓦·普列汉诺夫(541)
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	(544)
人民党纲领	(549)
民粹派基本提纲	(553)
略论俄国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知识分子的任务	阿列克谢也夫(561)
试论民粹派纲领	(588)
俄国农业生产的形式(摘录)	谢·尼·尤沙柯夫(610)
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摘录)	瓦·巴·沃龙佐夫(650)
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摘录)	尼·弗·丹尼尔逊(717)
英雄和群氓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813)
再论英雄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906)
再论群氓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946)
民意党恐怖派纲领	亚·伊·乌里杨诺夫(1009)
“民意党人”传单 1895 年第 3 号	(1016)
“民意党人”传单 1895 年第 4 号	(1020)
作者简介	(1029)

致青年一代^①

1861年9月于圣彼得堡印刷，未经书报检查机关检查。^②

待到生死存亡的时刻，
我是否会玷污公民的称号，
去效仿那娇嫩、堕落的斯拉夫人？
不，我不能耽于情欲，
不能在可耻的花天酒地中虚度年华，
不能忍气吞声，
听任那专制制度的压榨。
那些尚未看准命运的青年，
不想了解时代的使命，
不准备为被压迫者的自由，
去投入未来的斗争。
他们对苦难深重的祖国冷若冰霜，
不考虑他们日后的耻辱，
还有那后世子孙的合理谴责。

① 这一传单反映了六十年代初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经济纲领，同时也包含着一些民粹派的思想内容，如主张反对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企图防止改革后的俄国转向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否认国内产生无产阶级的必然性，认为俄国的经济发展可能走上独特的道路，强调农民村社的特殊性，指望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等。——编者注

② 传单是在伦敦赫尔岑的印刷所里印刷而后秘密运到彼得堡的，作者是尼·瓦·舍尔古诺夫和米·拉·米哈伊洛夫。——编者注

但当人民奋起寻求自由的权利时，
如果看到他们仍在寻欢作乐，
如果发现他们根本不象布鲁图^①和李哀各^②，
他们就将后悔莫及。

雷列耶夫

当自由宣言^③已准备好，只待发布的时候，俄国政府首先胆怯了；它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害怕了：要是全俄国都一轰而起怎么办？要是人民到冬宫去怎么办？于是他们便决定在大斋期间宣告给予人民自由，把谢肉节期间的粗俗表演暂时挪到远离皇宫的地方去，挪到皇家草坪上去。人心难测啊！呵！俄罗斯人民真不可理解！政府不是以为它能使自己的人民幸福吗？哪里听说过幸福的人去打碎玻璃，见人就打？如果政府害怕人民，这就是说，它有害怕人民的原因。的确，原因是有的。首先，国君欺骗了人民的期望：他给予人民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人民所想象的自由，不是人民需要的自由。其次，他窃取了人民的欢乐，在斋期而不是在2月19日发布宣言。第三，国君组织了制订和审查〈法令〉的委员会，这就表明他完全藐视全体人民，藐视俄国社会中最优秀的即最有教养的、最正直和最有才能的人——人民派；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最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问题是由国君和地主们解决的。在人民当中，谁都没有参加工作的份，报界人士不敢说一个不字——沙皇

① 布鲁图(公元前85—42年)——古罗马政治家，与卡西乌谋刺恺撒，旨在恢复共和政体。——编者注

② 李哀各(1785—1823)——1820—182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1820年在军队中领导反对斐迪南七世专制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发展成为革命。他曾被选为革命议会的主席。革命被法国武装干涉者镇压下去后，李哀各被处死刑。1820年为向他致敬而作的颂歌，于1931年被定为西班牙共和国国歌。——编者注

③ 沙皇宣言是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2月19日谢肉节签署的。政府因害怕人民在节日期间群众骚动，将宣言改在3月5日发布。——编者注

给予了人民自由，象施舍一样，象扔给狂吠的狗一块无肉的骨头以暂时安抚它并拯救自己的小腿肚一样。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也不应使政府得到谅解。不是人民为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人民而存在。因此，一个政府如果不了解人民、不知道人民的疾苦和要求，如果认为自己是地主、是完全为自己的私利行事的，最后，如果它藐视它所治理的人民，那么这样的政府显然不配为人民的政府。罗曼诺夫家族大概忘记了，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选举出来的，^① 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比某些波兰和瑞典的王子更有能力管理俄罗斯。所以说，如果他们辜负了人民的期望，那就让他们滚开！我们不需要侮辱我们的政权；我们不需要妨碍国家思想、民事和经济发展的政权；我们不需要以骄奢淫逸和自私自利作为自己的口号的政权。

我们需要的不是沙皇，不是皇帝，不是君主，不是掩盖着世袭的无能的银鼠长袍；我们要把了解生活和人民的人世间的凡人选举出来作为自己的首脑。我们需要的不是在乌斯宾斯基大教堂举行过涂油礼^②的皇帝，而是按自己的职务领取薪金的推举出来的首长。

农民的解放和最近四年表明，新政府就其现有的成员而言，就其享有的权利而言，是绝对不行的。还是那些迟钝的卑劣的显贵包围着沙皇；还是那些盗窃国库者阿德列尔别尔格和穆拉维约夫之流盘踞政府的高位，政府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俄罗斯；在它看来社会舆论是不存在的，就象它认为不存在俄国社会一样，就象地主认为不存在农民的舆论一样。我们的政府只知道自己，只做于自己

① 指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选举。——编者注

② 用油涂抹前额以表示降福的宗教仪式。——编者注

有利的事情。请给我们指出满意政府的人来吧！是搜刮民财致富的阿德列尔别尔格们和穆拉维约夫们吗？是六千万人为之受苦受难的十个人吗？而这就是政府，这就是皇帝的政权！

我们不知道俄国哪一个阶层没有受过皇帝的政权的凌辱。所有的人都遭受过凌辱。最近一次凌辱正是发生在皇帝的政权以为它做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它为俄国伟大的未来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的时候。我们并不否定二月十九日发表的宣言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的重要性并不是政府所看到的那种重要性。解放农民是第一步，不是走向俄国的伟大未来，便是导致俄国的不幸，不是走向政治和经济的昌盛，便是产生经济和政治上的无产阶级。选择通向这一或那一可能性的道路取决于我们自己。解放的时刻是伟大的，因为它播下了对政府普遍不满的第一颗种子。我们利用这一点来提醒俄罗斯注意它目前的状况。我们要提醒它，象坦波夫有一个庄园的农民们对待自己的德国总管那样对待我们的政府的时机到来了。当自由宣言向农民们宣读以后，他们给大车套上马，恭敬地请自己的总管坐上大车，把他们送出庄园，同样恭敬地请他们滚蛋。农民们对德国人说：“我们非常感谢你的管理，但是现在我们再也不需要它了；上帝保佑，你走吧，你愿去哪里就去哪里，但别再回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的政府大概没有猜想到，它结束了地主的权力，也削弱了自己的皇帝的政权。皇帝只是因为有了地主才有力量，叶卡特林娜二世很懂得这一点，她称自己为第一个女地主。地主们完结了，皇朝也就完结了——它已没有基础，只剩下了没有实质的名义，没有内容的形式。

在俄国全部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一次专制制度去帮助人民。沙皇说：“我要让农民们自由”。千千万万地主们便俯首称是，表示十分愿意服从皇上的意志。但这是垂死的专制制度的回光返

照。它就此完结了。它在俄国再也无事可做了，已不能再期待它做什么了。各阶层已开始明白，在此之前他们起着多么可怜的作用；解放的农民们已想到自己的绝境；他们表示不满了。到处都是不满的人，大家期待着某种事情……皇帝的俄国在瓦解。

如果亚历山大二世不明白这一点，不想自愿对人民作出让步，那对他就更坏。普遍的不满还是可以安抚的，但是，如果沙皇不作出让步，如果爆发总的起义，不满的人们将更坚定，他们将提出极端的要求。政府应考虑到这一点，防止灾祸的时机还没有过去，但不能再迟延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记住，我们是在和一个不可靠的政府打交道，这个政府以暂时的让步来安抚我们，从一时的私利出发破坏全国的整个未来，——对于那十个卑鄙的家伙说来，六千万人的幸福算不了什么。

年青的一代！请不要忘了这一点。

不要忘记，我们主要寄希望于你们，我们认为只有你们才是能够为整个国家的幸福牺牲个人利益的人。我们寄希望于你们，因为我们认为你们是最能拯救俄罗斯的人，你们是俄国的真正力量，你们是人民的领路人，你们应当向人民和军队解释皇帝政权对我们所作的一切坏事，你们应该向人民指明，这里没有任何涂油式，上帝是在普遍幸福的事业中，在善良的人们的事业中被人们所认识的，哪里没有善，那里就有恶的力量——黑暗的恶魔在作怪，而这个恶魔就是一直存在至今的俄国皇帝的政权。

你们应该向人民说明，关怀他们的人，希望他们占有土地、希望他们不要永远依附于地主的人是存在的；希望减少他们的苛捐杂税、希望在法庭上确立正义、希望他们摆脱多余的保姆和监护人的的人是存在的。

也不要忘了士兵。要向他们解释，他们有同情者，这些人想

要缩短士兵们的服役期限，发给他们更多薪饷，使他们不受鞭挞。

要把这一切向人民和士兵解释清楚，但是不要忘了补充说，一切障碍来自沙皇和他的大臣们，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利的。

最近我们这里产生了许多未老先衰的人，从德国的书里获得理论经验的可怜的经济学家。这些先生不懂得，经济主义使我们精神贫乏，经济主义只能教会我们数钱，使我们分开，把我们推向狭隘的个人主义。他们不明白，不是思想跟着利益走，而是利益跟着思想走。我们从物质企求开始，能获得福利吗？——片面的经济科学不会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相反，我们抛开了金钱的打算，力求获得自由，恢复自己的权利，就能争取到幸福，有了幸福，自然也就能有福利，即我们如此想要得到的东西——金钱。

不幸，我们这里产生的这些立宪的和经济的倾向正在导致保守主义；它们使人僵化；导致阶级分化，产生特权阶级。它们要把俄国变成英国，用英国的成熟性喂饱我们。但是难道俄国按其地理位置，按其自然财富，按其土壤条件，按其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与英国有任何共同之处吗？难道英国人在俄国土地上能成为他们在自己的岛上形成的那种人吗？我们已经当够了法国人和德国人的猴子，难道我们还要当英国人的猴子吗？不，我们不要英国的经济成熟性，俄国人的胃消化不了它。

不，不，我们要走的是另一条路，

我们不背十字架……

让欧洲去背吧。谁能断言，我们应该走欧洲的道路。走萨克森或英国或法国的道路？谁能为俄国的前途负责？谁能说他比六千万人更聪明，比全国居民更聪明？谁能说他知道俄国需要什么，他能引导俄国走向幸福？有哪一种科学能教会他这一点，对他说过他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呢？至少，我们不知道有这么一种科学；我

们只知道，格涅斯特、巴师夏、莫尔、劳·罗雪尔^①之流正在发掘粪堆，想把前几个世纪的破烂变成未来时代的法则。让这一法则作他们的法则吧，我们则要为自己寻找另外一种法则。

我们为不相信的人举出如下例子。有那么一个中国，它的近邻不知道还有比它更文明的国家。中国的罗雪尔和莫尔之流断言，中国的生活据以发展的、中国的文明据以形成的法则是一切民族都应据以发展的法则。邻居们相信了思想深刻的学者们，没有看到过比中国的生活和文明更高的生活和文明，便拼命往中国钻。但是突然发现，还有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存在着中国人所不知道的企求。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企求都是胡闹，只有中国的文明和中国人的政治信念才是真理吗？有一种人，他只见过欧洲，只见过德意志的各王国及其国王、公爵和亲王，或只见过法国及其拿破仑，当他得知美国的制度完全是另一种制度后，他当然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俄国就不能建立甚至连美国都不知道的新制度呢？我们不仅能够，而且我们应当建立另一种制度。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些欧洲人完全不知道的因素。德国人硬说，我们将建立起象欧洲已建立起的那种制度。这是谬论。如果我们给自己套上欧洲的机构和欧洲的经济制度的绞索，我们确能建立起欧洲的制度来，但是，如果我们发展存在于人民之中的那些因素，我们就能建立另外一种制度。

欧洲是在古代世界的废墟上形成的；一千年以前欧洲就有君主制度，那时欧洲就有了强有力的土地所有者和软弱无力的无土地的奴隶；那时欧洲就已开始有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从而出现了无产阶级，并引起了社会主义的产生。

欧洲企图摆脱自己的困境，但享有特权的人们太强大了，古老

^① 这些人都反对西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编者注

的传统在人民和那里的市民阶层中太牢固了，而社会理论又是如此模糊不清，在组织方面如此无力，以致 1848 年必然导致失败。我们的西欧主义者^① 和我们的蹩脚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却因这次失败而害怕了。

请想一想，罗雪尔对解决农民解放问题做得多么轻而易举。^② 从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题不可能按别的方式解决。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满意沙皇的仁慈，不满那会使德国人狂喜的恩典？人民不满，是因为他们不能想象自己没有私有的土地，他们不能想象自己可以置身于农民村社之外。他们需要权利的平等和占有土地的平等；他们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这样的制度的合理性，按照这种制度三千万农民有自己的私有土地，而其他二千三百万农民耕作他人的、属于几万个地主的土地。欧洲至今还保留着封建制度的残余，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曾有过封建制度；我国的贵族，我国的地主不是欧洲的贵族；我国的贵族和地主的权力是非法产生的，是来自于人民，是皇帝的权力人为地建立起来的，从叶卡特林娜时代以来这种权力大大地增加了；它应该归还人民，随着皇帝的权力的消失必将归还人民。

1848 年的失败如果说能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只能证明一点，即这次尝试对于欧洲是失败的，但并不能说明在我们这里、在俄国不可能建立其他的制度。难道欧洲的经济条件和土地条件与我们的相同吗？难道他们有农民村社吗？他们可能存在农民村社吗？难道他们的每一个农民和每一个公民能成为土地所有者吗？不。而我们则能。我们有这么多土地，够我们用几万年。

① 指四十年代与斯拉夫派作斗争的一个文学团体。当时亚·伊·赫尔岑也属于这一团体。——编者注

② 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论证了普鲁士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其条件是继续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由地主支配。——编者注

我们是迟到的民族，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我们不曾有过欧洲式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于我们是教训。我们不要欧洲的无产阶级、贵族、国家原则和皇帝权力。

我们的人民至今还过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参与政府的事务，也不了解这些事务，而我们的人民是正确的。政府同样不了解人民，而人民也无暇顾及政治游戏。然而，俄国的思想成熟了，我们研究了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并不妙，我们明白，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当代欧洲的可怜命运。

我们象新的移民：我们没有要砸烂的东西。不要去动我们人民的田地，让它保持原来的样子吧，但是我们要拔掉那些毒草，这些毒草的种子是同德国的经济主义和国家思想一起被风吹到我国来的。我们不需要我们的教授——政府及罗雪尔和格涅斯特的各种追随者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宣扬的那种形式的经济主义或国家思想。

欧洲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我们的社会企求，这就是说，欧洲不能在经济问题上做我们的老师。谁也没有象我们俄罗斯人这样在否定方面走得这么远。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政治的经历，我们没有被任何传统束缚住，我们站在未开垦的土地上，一点也没有被德国的花园和小树林所迷惑，我们不是要按照德国的方法、按照外国的口味来划分田地，而是要趁人口还不那么稠密的时候象古时那样划分土地，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就是我们不象西欧那样害怕未来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勇敢地迎接革命的原因；我们甚至希望革命来临。我们相信自己的新生力量；我们相信，我们的使命是向历史中增添新的因素，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不是步欧洲的后尘。没有信心就不能得救，而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是坚强的。

如果为了实现我们的要求——为了在人民中分配土地必须杀掉十万个地主，那我们也毫不手软。这并不那么可怕。请回忆一下，在波兰战争和匈牙利战争中我们损失了多少人。为了什么？为了尼古拉的胡闹，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使国家蒙受了耻辱。请回忆一下，为克里木战争我们付出了三十万人的代价，战争毁灭了整个边区，使我们负了巨大的债，难道我们害怕战争了吗？没有，虽然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国家的优秀力量。难道我国的贵族是国家的最好的生产力吗？不是。他们一贯敌视人民，正是他们是社会的渣滓，一切同情沙皇政权的人、奴颜婢膝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压迫人民的人、自私自利的人、有害于俄国的人都和他们聚集到一起去了。贵族向来是我国十分保守的分子。但是有人可能对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来自贵族，优秀的人物出自这一阶层。第一，这不完全真实。那么罗蒙诺索夫、科尔佐夫、别林斯基呢？第二，出身于贵族的优秀人物立即脱离了贵族阶层，转到了被压迫人民方面。在解决农民解放问题当中，贵族，特别是其中所谓的旧贵族，再次表明了俄国能从他们那里期待什么。我们再次看到并完全相信，这是一伙种植场主^①，这是俄国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俄国的精神力量即使是来自这一源泉，他们也不属于，而且也不可能属于贵族之列；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阶层，自己的圈子，政府不承认他们，他们与政府和贵族为敌，与人民友好。一切人民的东西，一切内在力量强大的东西，一切在精神上为国增光的东西都不是贵族的，不是政府的。任何只要能够分清黑白的人都不会去归附政府，不会去加入特权阶层，不会利用自己的贵族出身和贵族称号去压迫人民，去达到自己的狭隘的自私目的。我们的

① 传单中以此称呼俄国的地主，即以农奴的奴役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产所有者。
——编者注

时代已不是那个时代了。现代的正直的俄罗斯人不可能成为政府的朋友。他是人民的朋友。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事，一切剥削人民的事都是政府干的，一切支持政府的人，一切不是力求实现普遍权利平等、而是力求享受特权、获得特殊地位的人都是贵族及其一伙。这是人民的敌人，俄国的敌人。他们没有什么可怜悯的，就象整理菜园时毒草没有什么可怜悯的一样。

这个养尊处优、独自享受一切利益、靠别人的双手劳动过活的特权阶层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们有什么才能、他们有什么权力占据特殊的地位？让我们所有的部长、所有枢密官、国务会议的全体成员都在同一天突然死去吧。愿所有的省长、司长、总主教、大主教——一句话，让一切现在供职的贵族都同他们一起去死掉吧。俄国因此会失掉什么呢？什么也不会失掉。过一小时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部长、新的枢密官、新的国务会议，又会出现新的省长、司长、总主教和大主教，国家管理的轮子照样转动，俄国不会有任何变化。

让所有寄生的达官贵人、大公和公主、所有外表显赫的侍从武官、宫廷女官、宫廷高级女官——所有宫廷人员都和它们同时死掉好了。自然，这一损失，和损失所有部长一样，从一般人的观点来看，会使还活着的亲属非常伤心，但也仅此而已。立即会有更多的会做同样事情的人去填补死者的位置，过一小时，外表同样显赫的侍从武官和宫廷女官又会挤满宫廷，如果国王想在晚上举行一个舞会，他未必能看出人们脸上有什么变化。新的侍从武官和以前的侍从武官一样，以毫不逊色的技艺跳着舞，新的宫廷女官的脖子同样迷人，她们的笑容同样诱人，他们的谈话和他们的前任一样空泛，总之，看不出有任何改变。

让所有我们的旧贵族，所有出身显贵的、所有无所事事的地主都同部长和宫廷女官一起死掉好了。哪怕再让它们死掉十万，俄国也不会感觉到这一损失。过一小时沙皇就能造出新的地主、新

的伯爵和公爵来。谁不能去做这种人呢？所以，突然损失政府认为有用和必不可少的那十万人，不仅不会为害俄国，相反，只能给人民带来好处，使人民不必再供养那些寄生虫。

但是情况在变化。部长和他们的同僚都安然无恙，枢密院和国务会议也是如此，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无所事事的世袭贵族，宫廷女官和侍从武官跳着舞，宫中的低级侍从和高级侍从在沙皇的御案旁侍候着——总之，一切情况都和现在一样，俄国无用的居民都安然无恙，但有思想的贵族正在死去，文学家、诗人、学者、艺术家、工厂主正在死去，这些人生产着有益于国家的东西，以最必需的东西供应国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人民的天才和才能，他们是民族的骄傲和光荣。那时俄国将会怎么样呢？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补偿它所遭受的损失呢？无论宫廷女官、或枢密官、总主教、大主教、国务会议成员和侍从武官都不能成为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工厂主。遭受如此可怕的灾难、失去全部精神力量的国家会怎么样呢？世袭贵族、部长、宫廷女官、大主教和侍从武官将怎么办呢？沙皇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和他们一起迁移到彼得堡郊区的一块单独的地方去种马铃薯。的确，也许这也是不必要的。

真是怪事，包围着沙皇的这些头号庸人，这一伙贵族，有利于他们的保守主义的代表认为，不能让人民自作主张，必须有保姆照看他们。

可怜的思想家们，即令你们是最坚决的思想家，可是你们不愿给人民自由，因为就你们自己来说，你们看到的只能有一种地位——奴隶地位。但谁给你们权力把自己的笨拙和冷酷栽在全体人民头上？谁对你们说过，因为你们是奴才，所以一切人都应该是奴才？因为你们没有自己的意志，所以任何人都不应有自己的意志吗？因为你们愚蠢，所以一切人都应该愚蠢吗？你们说，人民还不成熟。但什么是成熟？难道懂得穿大一点的靴子舒适，用穿着

小一点的靴子换大一点的靴子还需要什么成熟吗？难道为了分清执法不阿和贪赃枉法还需要什么成熟吗？难道想呼吸新鲜空气，想吃、喝、思考，以及想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思想这样的事也需要什么成熟吗？也许你们认为这一切不是人的本质需要？也许你们认为我们的农民对这一切都是没有知觉的？也许你们认为需要教会人民逐渐适应公正和正义？也许你们想逐步制止人民遭到的掠夺和破产？也许你们认为，如果从农民那里每年拿走一头多余的牛，那就不应该突然停止抢劫，而应该每年减少一份——先减少一头母牛，然后少拿一头小牛、公绵羊、母绵羊、母鸡、小鸡、鸡蛋——甚至在这件事情上也要用逐渐过渡的办法来引导农民，就象给予农民自由一样？其实，这是荒谬的！最后，可能有人问我们，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谈到政权的智力不足，但谁不知道这一点呢？这对我们来说更坏。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当局的智力贫乏和精神空虚，我们忍受着。

谁喜欢这个政权，就让他带着羁绊，谁已经觉醒，已成熟到足以理解人的尊严，谁还有一点起码的公民的勇气、公民的胆略，就让他扔掉自己身上的锁链，让他投靠寻求自由的人们，让自由的人的数目越来越增长，让他们越来越紧密地相互依靠，最后，让他们去要求改变现存的制度。

我们就是要寄希望于这些自由的人——他们是理解我们的。

我们要求什么？

我们要求管理我们的政权是明智的政权，是了解国家的需要、为人民的利益办事的政权。为了使它能成为这样的政权，它必须是从我们当中来——由我们选举和限制。

我们需要言论自由，也就是要消灭一切书报检查机构。我们要发展已部分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的自治原则。如果农民有了这个权力，如果他们从自己人中选出村长和乡长，如果赋予村社民事法

庭和警察惩治的权力，那么为什么俄国的其他居民不能享受这些选举和自治的权力呢？也许其他的居民不太懂得自己的需要和国家的需要？也许他们比农民更缺乏理智？不，我们的政府是不会说这种话的。政府给了农民自由，因为它害怕农民的斧头，但是谁也从来没有怕过我们。现在我们更强大，我们要大力发展人民自治的原则。我们的农民村社是基本的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合起来就是俄罗斯。各地都应实行同一个原则。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要使俄国的全体公民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不让特权阶层存在，要根据才能和教育程度授予从事高级活动的权利，而不是根据出身，要按照选举的原则任命社会职务。我们不要贵族阶级和有爵位的人。我们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在国家的负担、赋税和义务方面人人平等。

我们要求国家征收的税款不被任意挥霍，不被贪污盗窃，政府应向人民作出有关向人民征收税款的报告。我们要求公开的和口诉的法庭，废除皇家的警察——公开的和秘密的，取消肉刑。

我们要求，土地不应属于个人，而应属于国家，每一个村社有自己的份地，不再存在地主，不能象出售土豆和白菜那样出售土地，每一个公民不管他是谁，都能成为农民村社的成员，即，加入现有的村社，或几个公民组成新的村社。我们要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以及经过较长时期后重新分配的办法。政府当局不应干涉这一问题。如果村社土地所有制的思想是错误的，那就让它自行消亡好了，那是由于它本身站不住脚，而不是因为受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

我们要求把俄国欧洲部分九百万亩空闲土地（代役租条款）交给二月十九日宣言使之沦为乞丐的地主的家奴。

我们要取消被解放农民的过渡状态；我们要求立即实行用赎

买的办法来收回个人的私有土地。如果政府不能承担这一工作，那就让国内各阶层来做。这是和平的途径，当然，我们希望事情不要弄到暴力的变革。但是，如果这样不行，那我们不仅不拒绝暴力变革，而且我们乐于唤起革命来帮助人民。如果说拿破仑第一出于虚荣心当年屠杀了八百万人，那么消灭几百人又算得了什么，何况这一牺牲可以换得人民的幸福！但是不会达到这一数字的。只要对那些不肯自愿让步的人做出一个榜样来，其他人也就同意了。但是，现制度的拥护者会说，这是暴力。那么你们把二千万自由的人变成农奴叫做什么？也许可以叫做最新的穆拉维约夫式的劫掠？难道这不比抢劫人民更坏吗？我们不想实行这种抢劫，我们只要求把权利完全归还给那些被剥夺了这些权利的人。

我们要求彻底消灭农奴制的残余，消灭农奴制所发展起来的土地占有上的不平等；我们要使国家焕然一新。我们要消灭市民阶层^①——叶卡特林娜二世想出来的这个不成功的俄国的资产阶级。他们算是什么 tiers-état^②！他们和所有其他农民一样，也是农民，不过没有土地，过着快要饿死的穷苦日子。必须分给他们土地。

我们要缩减用于毫无用处的庞大军队的开支。我们在军队上耗费达一亿以上，还有落在人民身上的军用实物负担，差不多也有那么多钱（九千万）。放下犁和离开工作台的劳动力的损失又该有多少？为了供养什么也不干的军队，劳动人民该增加多少自己的工作？征集到军队里去的都是最优秀的人，这些人变成了对国家终生毫无用处的人。服了二十五年兵役，退伍的士兵变成了不能干农活的人，因为他们被迫脱离了农活。他们或者沦为乞丐，象塞

① 小市民作为一个阶层是按叶卡特林娜二世当政时 1775 年宣言和 1785 年市政条例确立的。——编者注

② 法文：第三等级。——编者注

瓦斯托波尔战争中的残废英雄一样，或者去当警卫、看门人、马车夫。我们要近卫军干什么？为了保卫冬宫和沙皇的皇室，近卫军是太多了。近卫军是什么东西？军人贵族！有人说无论近卫军或军队都是公民，是平等的，整个军人阶层的义务是相同的，因此不存在特权，这纯属胡说。

我们要使军队和近卫军的军官们了解自己的真正使命，使他们明白，他们不是执行皇帝政权的古怪念头的沙皇军队，而是人民的警卫队，他们服役不是要去压迫弱者，而是要保卫弱者，反对强者的凌辱和剥削弱者的劳动和时间的政权。俄国军队在此之前所起的作用是不值得称赞的。它劈死过波兰人，砍死过匈牙利人，它参加了俄国历代皇帝的一切暴行。对它来说，不存在祖国的土地，不存在祖国的人民。它的偶像是沙皇，它虔诚地执行沙皇的意志；沙皇要它屠杀自己的人民，它就照办，它是俄国的刽子手和狱卒。士兵被他所不理解的宣誓蒙蔽了，这可以原谅士兵，因为他不理解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军官先生，你们能用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呢？你们是经过学习的，你们比普通的士兵更有教养，你们懂得誓言的意思，你们应该知道，征召你们入伍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要去压迫它。你们说，当你们不得不去打匈牙利人时，你们的心里非常痛苦，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去打呢！你们不愿意同奥地利人友好。为什么你们又同他们友好？我们看到一些白发苍苍的哥萨克，他们至今还象孩子一样在号啕大哭，诉说着普拉捷尔伯爵夫人事件——尼古拉这个恶棍想出来的可耻的死刑。现在给了人民一半自由，但是却又不把事情解释清楚，人民不满意，于是你们就被派去枪杀和痛打手无寸铁的人，而你们，英勇的俄罗斯军队，便向手无寸铁的人射击。这就是我们的军队的用途。这是军队的耻辱！是该结束这一可耻的角色的时候了，该想想为祖国服务了，不要再去保卫沙皇了。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军队不要去当皇帝的近

卫军，而要去当人民的卫兵。在被压迫人民起义的时刻，当国家要求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军队不要忘记，它是当局的玩具，是政权的盲目的可耻工具，不要忘记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且站到人民方面来，而不要站在共同的敌人方面。难道你们以为，去反对法国人和英国人，就象在最近那次战争中一样，比说一句：不，我们不愿去反对自己人，我们不去，危险要小吗？赶你们去送死，你们就去了，而这里你们本来只要说一声“不”，就可以了，可是你们却不敢！谁也没有指责过俄国的军官和士兵缺乏军人的勇敢精神，但是谁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公民的勇敢精神。

如果你们没有勇气说个“不”字，那就请你们走开，但是把命令你们向自己人放的第一枪，对准命令你们这样做的人射击，人民就会为此而感激你们。

我们希望士兵的服役期限不要太长，太长就会扼杀士兵的一切公民才能和全部人的力量，使他们退伍后成为毫无用处的人。我们要使士兵自愿地去服役，使服役对他有利，服役期定为三至五年，使士兵不完全脱离自己的家园，他只是离家一段时间，期满后仍回到自己的家里去，退役后仍然是一个农民，和当兵以前一样，使他能领到薪饷，不仅够他日用，而且能寄一些钱回家，而不是从家里挖走最后一个铜板。让我们的军队成为民兵；让每一个省建立自己的民兵。和平时期士兵没有必要千里迢迢背井离乡。

我们要求减少一切行政费用，废除象国有财产部、宫廷部、皇室地产管理局等这样一些为害人民的行政机构。人民有村长和乡长，最后，还有健全的理智，这是政府自己也相信的。有了这些，为什么还要各种厅长、局长、州长和议员呢？宫廷要整整一个部干什么呢？家庭账房和出纳——宫廷需要的也就足够了。这一切负担对人民来说是太重了，要知道，是人民而不是别人支付这一切费用。

我们要求减少皇室的费用。为什么某大公要用一百三十匹马，而不比他差而且比他更 useful 的人却只用一对马就足够了？为什么宫廷每年要花五千万卢布，而不用这笔钱的十分之一培养一批最有知识、对国家真正有用的人？农奴制完蛋了，贵族和一切地主阶级的派头——家奴、宫殿和庄园也应和它一起完蛋。

我们要求从囚室中释放一切政治犯，把政治犯从流放地放回来；我们要使所有政治流亡者回到祖国来。

最后，我们要求彻底改革基本法。例如：“俄罗斯皇帝是权力无限的独裁君主。服从他的最高权力不仅出于惶恐，而且是良心的驱使，是上帝的命令”。这是对上帝和良心多么大的诬蔑！只能让中国人和土耳其人相信这一套，但就是他们也未必相信这种无稽之谈。把这种信仰强加给拥有九百万不承认沙皇的教派分子的人民是很奇怪的。然而整部法典都贯穿着这一思想——到处都是对政权的虔诚和各阶层的不平等。显而易见，我们要改变基本法和修改一切其他法律。

但是我们去向谁指出这一纲领呢？谁来执行这个纲领呢？我们有哪些人懂得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人的权利并能提出自己的要求呢？贵族吗？不，我们不能相信贵族，他们已经表现了自己的软弱，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利益，不善于利用形势。当国王对他们说：“我要你们放弃自己对农民的权力”，那他们就应该回答：“皇上，我们同意，但是您也应该放弃自己的绝对权力；您限制我们，我们也要限制您。”这样才象话，这样贵族手里就会有一部宪法。可是贵族胆怯了，他们缺乏一致的意见，所以现在还轮不到他们。

俄国的希望在于由各阶层的年轻一代组成的人民党；其次是一切被压迫者，一切背负俄国专横的十字架重担的人，——小官吏，即那些工厂办公室中的不幸者，他们过着穷困的生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上司的个人摆布；还有那些处于同样境地的军队，以及

1861年2月19日为之开辟了通向欧洲无产阶级的宽广道路的二千三百万解放了的人民。

我们再次向一切珍视俄国幸福的人们呼吁，再次向年青的一代呼吁。别再昏睡了，别再讲空话了，别再偷偷地骂政府或重复那些有关形形色色的穆拉维约夫分子的骗局的传说了。别再挖苦自由主义者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是谁在异想天开地说政府会自行做某种必要的事情？你们从何证明政府能够而且希望为俄国做某种有益的事情？你们的希望从何而来？俄国过去的历史也许你们还嫌不够？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一种叛卖性的起麻痹作用的感情，不要把自己的高尚意愿寄托在所谓俄国部长和俄国政府那帮坏蛋身上。莫非你们没有看到，这个愚蠢的政权在嘲笑你们？你们私下把穆拉维约夫叫做三匹马的驿车，称他为盗窃国家财产者；国外的报刊公布了他的勾当，而他就在这时攫取了二万二千俄亩俄国最好的土地。不，对这些先生是没有什么客气可讲的，现在是叫他们完蛋的时候了，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一分钟也不要错过。

要同人民和士兵多多交谈，向他们解释我们要求做到的一切，达到这一切是不难的，我们有千百万人，而恶棍们只有几百人。遵照人民的意见把所有这些不配统治我们的世上的强者从台上拉下来，向人民解释政权的全部非法性和腐败性，要教士兵和人民懂得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将军被打破的鼻子里流出的血和农民鼻子里流出的血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能说服十个人，我们的事业在一年之内就能推进很远。但这还不够，你们自己要准备扮演你们必须扮演的角色，要让这种想法成熟起来，组织志同道合者小组，增加新战士的数目，增加小组的数目，寻找能够并准备去做一切事情的领导人，十二月十四日殉难者^①的幽灵会

^① 指被处决的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参加者。——编者注

引导他们和你们去干伟大的事业！如果需要，就为拯救祖国而光荣牺牲！要知道，在房间里死或在战场上死，都不是那么轻松的！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83—98页。

青年俄罗斯^①

“谁也不会是完人，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不可代替的现实；大门对每一个人都敞开着。有人要说话，就让他说去，人们会听他的；信念折磨着他的心灵，就让他宣扬吧。人们不象自然力那样驯服，但是我们经常联系的是当代的群众，群众不是孤立的，同样，我们也离不开总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同一些先前的影响，有共同性的东西联系着。这样你们可以明白人们和人民的前途取决于谁了吧？”

“取决于谁呢？”

“到底取决于谁呢？……可以这样说，取决于我们和你们。既然如此，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呢？”

亚·赫尔岑（罗伯特·欧文）

俄罗斯正进入自己历史的革命时期。只要观察一下各阶层的

① 这份传单是俄国革命者彼·格·扎伊奇涅夫斯基在狱中写的，于1862年5月中印发，署名为“中央委员会”。传单反映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最左的革命观点。

——编者注

生活,就可以看到,现在社会分为两部分人,这两部分人的利益截然不同,因而是互相敌对的。

从下面可以听到人民在低声地抱怨。人民在遭受压迫和掠夺,任何人只要手里有一点权力,就可以压迫他们,掠夺他们,官吏和地主掠夺他们,把本来是属于他们的土地再卖给他们,沙皇也在掠夺他们,把直接税和间接税增加了一倍多,把搜刮来的钱不是用于国家,而是用于补贴宫廷中骄奢淫逸的生活,用于置办宫廷女官——情妇的妆奁,用于赏赐侍候他的奴仆,用于防范人民的军队。

沙皇依靠几十万把刺刀,割去了大部分人民(官家农民)世代相传的土地,打着国家需要的幌子,拿被掠夺的贫苦农民开心,把成千上万俄亩土地赏给以战胜手无寸铁的农民群众的业绩而使俄国武器增光的将军,赏给全部功劳在于无情掠夺人民的官吏,赏给那些善于端菜、斟酒、舞姿优美和曲意奉承的人!

被所有的人压制、被所有的人侮辱的人就是人民派。

站在他们头上的是一小撮心满意足的幸运者。他们有的是地主,这些人自己或他们的祖先因过去当奴仆有功而获得有居民的地产;有的是女皇以前的情夫的后裔,这些情夫在退休时都获得了慷慨的赏赐;有的是用抢劫和欺骗的办法捞取资本的商人;有的是搜刮民财的官吏——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些有财产的人,他们的财产有的来自祖传,有的来自他们本人的巧取豪夺。这一小撮人的头子就是沙皇。沙皇离开这一小撮人或这一小撮人离开沙皇,就都不能生存。沙皇一垮台,这一小撮人也就完蛋。现在这一小撮人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他们因为被剥夺了无偿占有农民劳动的权利而咒骂皇上,要求立宪,但是请不要怕;这一小撮人和沙皇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结合的环节就是财产。这一小撮人明白,一切人民革命运动矛头所向都是反对财产的,因此在起义的时刻他们

都会站在自己的天然代表——沙皇周围。这就是保皇派。

在这两派之间从来就有争论，争论几乎总是以不利于人民的结局告终。但是，失败以后不久，人民派就又行动起来了。它今天还受压制，被鞭打，明天就会同位辛一起争取普遍的平等和俄罗斯共和国，同普加乔夫一起消灭官吏，给农民分配土地。它将杀掉压迫人的地主，象三十年代东部各省发生过的那样，它将同尊敬的安东·彼得罗夫^①一起来反对整个保皇派。

在现代的经济制度下，掌握资本的少数人是其他人的命运的支配者，只要存在这种制度，两派之间的对抗就不可能停止，除这种混乱状态和两派之间的对抗外，还有扼杀现代人的优秀才能的难以忍受的社会压迫。

在现代的社会制度下，一切都是虚伪和荒唐的，宗教迫使人们相信不存在的东西即相信臆想出来的上帝，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其任何依据都经不起肤浅的批评，贸易这种有组织的强盗行为被合法化，工人经常工作到筋疲力尽，而由此获得利益的却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妇女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与牲畜处于同等地位，可是这种状况却被认为是合理的。

这种难堪的、可怕的状况毁灭着当代的人们，人们为了与之斗争付出了最优秀力量，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革命，流血的和百折不挠的革命，这种革命应当对当代社会的全部基础毫无例外地进行彻底改造，并且要消灭现制度的拥护者。

我们并不害怕这种革命，虽然我们不知道将会血流成河，将会有无辜的牺牲，我们预见到这一切，但还是欢迎革命来临，我们准备献出自己的头颅，只要期待已久的革命早日来临！

^① 1861年4月，喀山省许多县为了回答所谓的农民改革，在安东·彼得罗夫领导下爆发了农民起义。——编者注

人民群众也本能地理解革命的必要性，我们人数不多的真正先进的人们也了解这一点……革命的先驱正是从这些人当中一个接着一个涌现出来，他们号召人民起来进行神圣的起义，惩罚自己的压迫者，审判保皇派。枪杀对2月19日的荒谬法令^①不理解的人，把认为当前的形势毫无希望的人送到矿区做苦工，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把在教堂里为受害者祈祷的人流放到边远的省份去，成批地被拉去服苦役。保皇派就是以这些手段来回答他们的！

保皇派！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制止革命、吓住革命派吗？也许你们至今还不明白，流放、逮捕、枪杀、把农民鞭打致死，这一切只会对你们造成危害，加强对你们的仇恨，使革命派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于你们从革命派中夺走的每一个成员，你们都要以自己的头颅作为代价。我们只是向你们发出警告，保皇派的成员们，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谈到你们拥戴的首长，没有谈到罗曼诺夫家族，——同他们的账另算！他们对人民所受的苦难、长期的专制、不理解当代的需要将付出血的代价。整个罗曼诺夫皇室将拿自己的头颅来赎罪！

多多地流放吧！多多地处决吧！激起并加强舆论的愤慨吧，迫使革命派时时刻刻为自己的生命担心吧，不过要记住，你们将以此加速革命的来临，现在压迫越重，将来复仇便越无情。

现在一切都在促进革命：波兰和立陶宛的骚动，财政危机，赋税的增加，1863年春天农民问题最后解决时农民将看到他们受了沙皇和贵族们的欺骗，还有，谣传将发生新的战争，人们在谈论，皇上已在向近卫军祝贺战争胜利。战争一开始，就要求征集新兵，借

^① 1861年2月19日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颁布后，发生了大规模枪杀农民的事件。
——编者注

债，俄国就会弄到破产的地步。这时就会爆发起义，只要一个小小的理由就足以引起起义！但是情况可能会这样：农民不是立即在几个省内起义，而是个别村庄举行起义，军队来不及归附我们，革命派来不及商量，不够集中，不能用总暴动、只能用个别的爆发来宣告自己的存在，保皇派将把这些个别的爆发镇压下去，革命事业又得停顿好几年。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4月7日中央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开始出版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应向公众阐明它为之斗争的原则，同时成为革命派在俄国的组织者。杂志将刊载中央委员会会议报告，提出问题让各个省的委员会讨论，向公众宣布革命派对于每一个重大事件的意见。中央委员会之所以要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原因还在于没有一本杂志向社会阐明过革命的纲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看两本机关刊物：《钟声》和《大俄罗斯人》。

亚·伊·赫尔岑是一个对社会发展有过巨大影响的政论家，曾给俄国带来了巨大利益，我们深深地尊敬他，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钟声》不仅不能充分表达，甚至也不能反映革命党的意见。

从1849年起赫尔岑开始走向反动：他被1848年革命的失败吓破了胆，对暴力变革失去了一切信心。米兰两三次失败的起义，他亲眼看到的法国一些共和派人物的流放和牺牲，以及奥尔西尼的被处决，彻底扑灭了她的革命热情，于是他便开始出版带有自由主义（不外如此）纲领色彩的杂志。

《钟声》虽然作为第一个自由刊物而受到俄国全体思想界的热烈欢迎，但很快就成为真正革命的人们不能理解的谜。哪里还有对俄国当代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分析，哪里还谈得到实行新社会借以建立的原则！

又过了一年，从《钟声》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来说，它已完全成为主张立宪的杂志了。它对青年的吸引力减少了，如果说还有人读它，那是因为借赫尔岑以前的声望，赫尔岑曾经欢迎过革命，责备过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的不彻底性，责备过他们本来有可能但却没有把专政夺取到自己手里，没有把法国引向流血改革的道路以便使工人取得胜利。

最后，他指望亚历山大或皇室的某个人能带来幸福，他对一封说该敲响警钟、号召人民起义而不应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信作了近视的回答。他完全不了解俄国当代的情况，他希望和平的变革，他放弃流血的行动，放弃极端的措施，而要做成点事是非采取极端的措施不可的，所有这一切使赫尔岑的杂志在共和派的眼里完全失去了威信。

但是可能有人反驳我们，说错误的是我们，而不是赫尔岑，说他放弃暴力变革是由于他熟悉西方的历史，是因为他相信每一次革命总是产生自己的拿破仑。

我们的回答是，即使赫尔岑本人也不赞成这种意见，有些革命以失败告终是由于革命的领导人不彻底。我们研究了西方的历史，我们的研究没有白费，我们将做得更彻底，不仅要赛过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家，而且要赛过1792年的那些伟大的恐怖主义者。如果我们看到，为了推翻现存制度必须比九十年代雅各宾派所流的血多一倍，我们也不会害怕。

去年7月俄国出现了《大俄罗斯人》^①

尽管《大俄罗斯人》的意见有错误和~~错~~之处，尽管它的意见

① 《大俄罗斯人》是1861年夏、秋出现的一种篇幅为四页的机密铅印传单。它反映了先进自由主义贵族的利益，主张妥善解决农奴问题、解放波兰和制订宪法。该传单最后一张即第四张号召进行革命，消灭官僚制度，但不触动罗曼诺夫王朝。——编者注

和我们的意见截然相反，我们还是应该对它的编辑部表示敬意，因为他们说出了对现存制度的抗议。《大俄罗斯人》的成功是巨大的，首先应当看到这一点。我们有一批自由派人士，即许许多多地主，他们力图同政府作对，但同时却连革命的影子都害怕，怕革命吞没他们，还有一小撮没有才华的文人，这些人已陈腐到被送进了档案馆，而在尼古拉时代他们曾被认为是进步分子，《大俄罗斯人》满足了这些人的愿望，最好不过地符合了他们的愿望，但它终究不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党。人们阅读它，谈论它，如此而已。它认为皇上不敢下令枪杀集会的人民，以为发表一些天真的贺词就能拯救俄国，革命者对此只能一笑置之。

至于其他一些国外的杂志，那根本不值一提。我们不明白，象布柳美尔和多尔哥鲁科夫公爵这种人为什么要离开俄国跑到国外去。他们自然可以走他们自己的路，与《俄罗斯通报》^①和《北方邮报》^②沆瀣一气，但他们的原则引起了所有正直之士的鄙视。

最近出现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传单（我们出版的一切小册子都将署名“中央革命委员会”），也不值得多谈：没有一定的原则，空洞、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效果的自由主义高谈阔论，这就是这些传单的特点。

鉴于在任何机关报上都找不到充分表达革命纲领的东西，我们现在刊载据以建立新社会的原则，在以后各期上我们将努力更详尽地逐条发挥。

我们要求把现在的专制统治改变成为各省的共和国联邦，同时全部政权应该转到全国民议会和省议会手里。我们不知道俄国

① 此报是由自由派米·尼·卡特柯夫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辑出版的双周刊，在改革前反映自由派的观点，改革后反映反动贵族的观点。——编者注

② 此报由彼得堡内务部出版（1862—1868）。——编者注

该分成几个州，哪个省该归到哪个州，这个问题应当由人民自己来决定。

每一个州应由若干农民村社组成，村社全体成员享有同等权利。

每一个人都应加入某一村社；按照米尔的决定，他名下应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但是他可以不要这些土地，或把它出租。他也有不在村社里居住和从事某种他愿意干的手艺的充分自由，不过他必须缴纳村社规定的赋税。

拨给村社每一个成员的土地不是归他终身使用，只能让他使用一定年限，期满后米尔重新分配土地。村社成员的其他财产在他们生前是不受侵犯的，但死后将成为村社的财产。

我们要求，一切司法机构都由人民自己选举；我们要求，村社有权审理自己成员的一切有关案件。

我们要求，除了在首都举行的由俄国各地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外，在每一个州的主要城市还应举行州议会，州议会只能由州的代表组成。国民议会解决一切对外政策问题，审理各州之间的争执，通过法律，监督决议的执行，任命州的行政长官，规定赋税总额。州议会解决的只涉及该州的事务，州议会只能在州的首府举行。

我们要求正确地分配赋税，希望赋税的重担不要落在社会的穷人身上，而应落在富人身上。为此我们要求国民议会规定赋税的总额，只分配给各州。州议会分配给村社，由村社在全体大会上决定哪个社员应纳多少税，特别要注意到每一个社员的境况，总而言之，要实行累进税制。

我们要求建立社会工厂，工厂的管理者应该是从社会中选拨出来的人，他们在满一定期限后必须向社会报告，我们要求设立社会商店，商店里的商品应按真正的价格，而不是按商人为了自己发

财而任意规定的价格出售。

我们要求对儿童实行社会教育，要求由社会供养他们，直到他们学业结束。我们还要求由社会供养病人和老人，总之，供养所有不能自食其力的人。

我们要求完全解放妇女，赋予她们以男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我们要求消灭极其不道德的、在两性完全平等的情况下不可思议的婚姻现象，因而也要求消灭妨碍个人发展的家庭，不消灭这种家庭就不可能消灭遗产。

我们要求消灭腐化堕落的主要渊藪——男女修道院，以及国内各地的流浪汉、寄生虫、无所事事的人们会聚的那些地方，这些人乐于吃白食，同时愿意在酗酒和腐化堕落的生活了此一生。应该剥夺这些处所以及所有教堂的财产，归国家所有，用以支付内债和外债。

我们要求大幅度地增加军队的薪饷，减少士兵的服役期限。我们要求根据可能解散军队，代之以国民近卫军。

我们要求让宣布自己不愿留在俄国的波兰和立陶宛两地完全独立。

我们要求使所有的州有可能按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毫无疑问，我们知道，我们纲领中关于各州联邦这样的原则不可能立即付诸实施。我们甚至坚信，如果情况发展得顺利，将要领导政府的革命派就应保持现在的集中（这里无疑是指政治的集中，而不是行政管理的集中），以便在最快的时间内借助于这种集中贯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原则。革命派应当把专政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国民议会的选举应在政府的影响下举行，政府应立即注意，不能让现制度的拥护者（如果他们还活着）进入政府。革命政府不干预选举会导致什么结果，1848年

的法国国民议会便是证明，它毁灭了共和国，把法国引导到必须选举路易·波拿巴为皇帝的道路。

现在我们已阐明了自己的纲领，有人会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依靠谁，我们要联合的那些人是什么人，谁站在我们方面。

我们寄希望于人民；人民将同我们站在一起，特别是旧教徒，要知道他们有几百万人。

受压制的、被掠夺的农民将同我们一起争取自己的权利，农民将决定事情的结局，但是起先导作用的不是农民，而是军队和我们的青年。

我们寄希望于军队，寄希望于军官们，他们悔恨他们曾经杀害过自己的波兰兄弟和农民兄弟，绝对服从皇上的一切命令，悔恨他们过去和现在所扮演的这种可鄙角色，宫廷的专横使他们愤慨。军队将会想起九月的命令，将会认清，如果他们执行这一命令，会使自己处于什么地位，同时也会想起1825年自己的光荣行动^①，想起蒙难的英雄们得到的不朽光荣。

但是我们主要寄希望于青年。我们在本期杂志的最后向青年发出呼吁，因为青年具有俄国一切最优秀的品质，一切生气勃勃的东西，具有站到运动方面来的一切条件，准备为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精神。

青年们，要记住，人民的领导人应该从你们中间产生，你们应该起来领导运动，革命党指望着你们！准备进行光荣的活动吧，注意，别让自己措手不及！准备好，为此你们要经常集会，建立小组，组织秘密社团，中央革命委员会将努力同这些小组和社团保持联系，要多多地议论政治，弄清楚当代社会的情况，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功，你们可以邀请真正革命的人、你们能够完全信赖的人参加你

① 指十二月党人起义。——编者注

们的集会。

很快我们就要举起未来的伟大旗帜，红色的旗帜，高呼“俄罗斯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前进，到冬宫去消灭住在那里的人，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情况可能会这样：最后只把皇族，即只把那一、二百人消灭掉，但也可能会这样——这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整个保皇派象一个人一样起来保卫皇上，因为这里关系到保皇派本身的生死存亡问题。

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对自己、对自己的力量，对人民给予我们的同情、对俄罗斯这个担负着率先实现伟大社会主义事业使命的国家的辉煌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将齐声高呼：“拿起斧头来！”——那时就……那时就往保皇派身上打，不要怜悯他们，就象现在他们不怜悯我们一样，如果这帮坏蛋敢于到广场上去，那就在广场上打，堵在屋子里打，在城市的小胡同里打，在首都的大街上打，在乡村里打！

记住，那时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

但是在每次战斗中获得新的胜利时不要忘记高呼：“俄罗斯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

如果起义不成功，如果我们不得不为了给人以人权这一大胆尝试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将毫不颤抖、无所畏惧地走上断头台，把头搁在砍头架上或伸进绞索套里，再次高呼这句伟大的口号：“俄罗斯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99—107页。

村 社^①

阿·普·夏波夫

伟大的农民问题打破了休眠状态的无为主义，打破了我们的单调、消沉的生活。思想已经激发起来转向政治工作。我们已经面向我们自我发展的基础，面向人民。对人数众多的外省居民——农民的生活习惯的改造，打破了外省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停滞状态，而这种停滞状态在外省生活中是颇为严重的。要求行动的共同愿望沸腾起来了，或者至少到处都有这种表现。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时，我们可以看到，到处事情都做得实在太少，到处更多的是空话、毫无用处的理论。总之事情多半做得不对头。这是因为我们不善于接近人民，不善于在人民生活的清泉中研究生活的合理要求和愿望，并且按照这些永远正确的要求和愿望，而不是按照我们随心所欲地臆造的理论和空想来开展我们的活动。我们应当少醉心于脱离俄国人民的需要和特点的外国权威所提出的理论，而是首先要运用文学的一切力量，来使俄国人民自己的实际的健全思维、善良的意志和强大的力量主动发挥和自我表露出来。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四千万农村居民和至少四百万城市居民是不会接受我们的理论的。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由自己决定的。此外，俄国人民的生活本身是顽强的、固执的和与众不同的。只要积极地争取提供自决和自我发展的自由，人民生活本身就能根据它的本性、它的天然力量和天赋，以及根据外部的自然地理条件，定

① 本文最初载于《世纪》杂志 1862 年第 1—6 期。——编者注

出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方式和原则。要积极地争取使人民生活本身通过全体人民之口说出它自身的需要。在俄国人民的生活中和本性中有着丰富的、良好的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基础和种子，它们只期望得到自由地自我表现和自由地自我发展的机会。俄国人民的特点之一，就是切合实际地直接在日常生活中、在村社和米尔^①中形成处世秘诀和村社居民自我发展的共同原则。而作为人民事业的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村社的事业，米尔的事业，整个地成为人民切身的事业，而不应当成为抽象的理论事业。文学和科学是紧密相连的，和大学也是紧密相连的。但是迄今大学为俄国人民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大学的伟大功绩就是培养了所谓的平民知识阶级，即少数受教育的人。到目前为止，大学的主要功绩纯粹在科学方面，大学占优势的方面是学术：就象现在许多大学教授所说的那样，是研究和教授科学。然而，人民的生活越来越需要教育的指导帮助，要求科学对人民实际生活的现实问题作出现实的回答。根据俄国人智慧的实际能力和现实情况，迫切需要把科学的结论应用于生活的需要。俄国大学的第一位创始人罗蒙诺索夫，这位人民的自学成名的天才，可以说生动地体现了俄国人民的严谨态度、鉴别能力和天生的健全思维，他给俄国人民指出的正是这条实际的、现实的、由人民来发展和运用科学的道路。大学是人民机体的头脑、智慧，应当为人民制订出人民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的一切基本原则。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学自己还没有充分自由的内部的自我发展，并且成了官方的、同外界隔绝的、脱离人民生活的集团，而不是各地人民的最高学府。大部分教授是官吏，而不是社会教育活动家。很少有象格拉诺夫斯基、库德里亚夫策夫、迈耶尔……那样高尚的、受人爱戴的人物。难怪在他们以后人民直到现在仍然以不信任的目光来看待那些从事抽象理论的德

① 村社是土地占有的一种形式，米尔是农民自治的一种组织。——编者注

国式的学者和教授，在人民中间甚至编出了一些有关这些学者的特别幽默的笑话。再说我们的大学集团不仅脱离人民，与民众隔绝，而且遗憾的是，各大学之间也互不联系。教授和学生之间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也没有密切的、有机的内部联系。于是就产生了学生和教授之间的集团内部斗争，随之而来的通常是不愉快的、令人忧心的事件。但是荣誉却属于我们的大学生：在他们的身上永不熄灭地闪耀着俄国未来的神圣高尚的火花，最近则发现，有人积极致力于把大学的教育思想灌输到民间去。星期日学校可以说大都是培养大学生的苗圃，大学的改造是他们热切地、真诚地渴求自由教育的结果。我们期待在俄国的土地上有更多的大学出现，期待它们为人民各阶级自由地开放，使之成为满足全民共同需要——教育和科学——的学府。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学很快会具有真正人民的意义，确实成为人民机体的头脑和智慧。

古老的、不朽的、永恒的农民米尔，即整个俄国米尔的支柱是我们自我发展的本原和初型。在远古的自由民自治时代，我们的人民象勇士般地共同努力，在地方人民协商和人民管理的村社的人民的的基础上，自己建立了地方人民会议米尔。在这个自治的时代，人民受到了米尔精神的教育：米尔精神接近人民的本性，渗透到了人民的整个日常生活中，成为全体人民自我发展的切身的、创造性的原则和创造性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米尔如此富有生命力和永恒的原因。自由民的、米尔人民会议制的地方自治的根源和基础——米尔，经过我国历史上的风暴时代，依然存在，完整无损。城市议会连同彼得大帝的市议会议事规程，以及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市政条例，破坏了城市米尔，从而把城市变成了行会和行政管理机关。但是，自由民的地方人民会议制的、由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米尔的根源，在强大的农民米尔和村社中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人民象保护神圣的事物一样千方百计地保护米尔的基础不受风暴的摧

残。分裂派教徒的学说认为，当米尔陷入困境和反基督者的恐怖重新传到米尔、搅乱米尔的时候，被分裂的人民村社为了用米尔的人民原则的精神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巩固米尔，把米尔的和谐一致提到宗教制裁的高度。而农民世代代不仅是在自己的自古以来就有的全部根本制度和生活方式方面，而且也在所有个人的、细小的生活习俗、谚语和歌曲方面神圣地维护米尔。同米尔格格不入的、异己的因素虽然也侵入了这些个人的生活习俗，但是并没有挤垮米尔。即使在这种因素下，米尔仍然是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原则的内部天然合法的民权保护者。例如，在一首婚礼歌中唱道：

新婚的公爵乘车行进

.....

带上珠宝，带上服饰，

遵照上帝的旨意，

遵照沙皇的法典，

遵照老爷的命令，

遵照米尔的决定。

在自己的谚语中，在我们普通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秘诀这部法典中，我们的人民也刻划和表现了自己历来对米尔的高度的社会法律观念。谚语说：“米尔不受任何人的审判”，“米尔只受上帝审判”，“米尔裁决，石头炸裂”，“身在米尔，死也值得”，等等。

村米尔作为人民喜爱的、古老的天然根源——俄国土地上自由民的人民会议米尔的幼芽，对于我们来说，乃是自然历史遗留的人民的本原，或者是全俄国的地方自治米尔的新的自由民自治和自我发展的起点。无怪乎历史把米尔的原则一直保持到我们的时代。无怪乎我们新的地方自治结构也是从村米尔开始的。人民自己逐步地、自然而然地组织建立了地方人民会议米尔，同样，新的

地方自治米尔也能够从村米尔开始，按照它的初型组织起来。人民会议制的地方自治米尔的自由民自治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按这个顺序逐步完成的。在同一块土地或水域，由于地理开发和村社生活的条件，通过自由民的地方自治，自然而然地、不靠任何命令而并列形成了两种原始的米尔，即城市米尔和农村米尔，亦即城市和乡村。这就是：在荒野的浓密的森林里开辟出一块耕地，它便逐渐发展成为村。从这里分出去或合并进来新的小村庄、新的农村、新的村落、居民点等等，所有这些一起组成县或原始乡村州，因此在文书中有例如某某村和县的写法。这种单独的村及其每一个小村庄、每一个农村组成特殊的小米尔，同样，整个村同整个县，同整个州组成一个完整的州米尔。因此在文书中提到的“同全州一起”、“同全米尔一起”的字眼是同一涵义。从原始的最古老的村或没有公国的军事战略防卫线的小村和在自由民地方自治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通过商业和手工业逐步发展形成了镇或工商业城市，于是便形成镇或城市米尔。因此城市公社也和农村公社一样，称作米尔。例如，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叙述一次人民会议结束后谈到诺夫哥罗德的情况时说：“……全米尔的人都兴高采烈”（米尔即指诺夫哥罗德米尔）。在混乱时代的文书中，在各省的文告中，所有的城市也都称为米尔：一个城市的居民请求另一个城市的居民向全米尔宣读他们的文告。在1860年《莫斯科历史学会讲座》第三册刊载的十七世纪舒亚市的文书中，舒亚市称为米尔，并使用了这样的措词：“致舒亚人、城镇居民和全米尔的文件，舒亚地方自治官署向米尔颁发。”甚至到了城市公社的米尔组织开始瓦解的时期，即十七世纪的下半叶，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自己也把莫斯科称为米尔，当他乘车进入莫斯科时便询问米尔的状况。一首古老的歌曲，把莫斯科人民称为米尔，

当把公爵送上高高的木架

指出他的地方，
他向救世主的圣像祈祷，
他向四面八方鞠躬致敬：
啊！请饶恕我，米尔，上帝的子民，
为我的罪孽，
为我深重的罪孽祈祷。

村及其县、小村庄和农村组成村米尔或州米尔，它们有自己的米尔会议，同样，城市也组成米尔，也有自己的民众会议或米尔会议，选举杜马和人民会议。这就是第一轮的米尔的地方自治机构。其次，由同一块土地和水域联结的同一地区的州米尔和城市米尔，由于形成了联合开发的关系，自然就组成了一个地方，即一个地方自治省米尔，在文书中有时称为地方，有时称为米尔。例如，在混乱时代的许多省的文告中，把城市和县里的人们或村镇和州里的人们统称为米尔、米尔的人；文告发至整个米尔，发至城市和县或镇里的人们和农民，以及地方的全体人们，文告中把所有这些人统称米尔、米尔的人。城市和县或镇和州米尔的地方的人们，在重要时刻聚在一起举行省米尔会议，混乱时代的文书中把这种会议称为地方自治代表会议。在这种省人民会议期间，在王位空缺期间，各省米尔互相函告，通常向城市和县或村镇的人们或州里的农民建议，一起认真考虑由整个地方发给全米尔荣誉状，一起宣布撤销自己的地方自治代表会议。省米尔也就是地方和省地方自治代表会议也就是米尔代表会议组成第二轮的整个地方自治机构，即整个俄国地方自治米尔。最后，所有的省公社或——按照文书中的措词——地方共同组成全俄国，即一个完整的全国米尔……由所有的省米尔会议或地方自治代表会议组成总的地方自治米尔会议或代表大会、缙绅会议，按照1613年的会议决定的说法，缙绅会议由所有的城市会议、全国代表会议组成。缙绅会议不是奉命举行的。

在莫斯科中央集权时期，当时由于召开俄罗斯全国会议，连省人民会议的钟都运往莫斯科了，缙绅会议可以说是由集中起来的碎片、胚胎，根据过去地方自治人民会议、人民代表会议生活的原则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在俄罗斯全国会议时代，缙绅会议自然地体现为全国代表会议的形式，体现为由过去人民自己建立的分散的地方自治会议、人民会议、米尔会议和米尔代表会议组成的全俄缙绅会议。缙绅会议的基础、原则是由人民自己，由人民过去的地方自治人民会议的、人民代表会议的全部生活建立起来的；缙绅会议的习惯来自人民精神本身的需要，是人民地方自治结构的整个性质的自然结果，1613年的缙绅会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们的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会议是在王位空缺时为了由人民自己来选举沙皇而自然地形成的，是全国人民自己召集、各城市集合到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和各省地方自治代表会议联席会议（如文书中所说的那样）一致协商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全国人民自己集会和由于全国人民的这种集会的结果而自然地组成了缙绅会议，缙绅会议就是符合人民的精神的。因此，难怪普通农民波索什科夫这位自修成名的学者曾经思考过人民协商的问题。难怪人民分裂派直到不久前还抱怨临时会议的失败。^①这一切都表明，地方自治代表会议、缙绅会议是人民精神的需要，是人民喜爱的习惯。

这就是米尔的地方自治结构的原则，这就是米尔人民自治的一套体系。米尔从最小的范围——内部独立的和自身完善的农村米尔开始，通过村社的自然生活的联系，使之同内部同样独立和自身完善的城市米尔联结起来，并通过联合所有的城市米尔，使农村米尔和城市米尔按土地和水域连结成独立的地方自治省米尔，从

^① 在分裂派的人民会议上讨论了必须召开更广泛的分裂派会议的问题，当时这种会议很少召开。——编者注

而自然而然地发展、扩大成为俄国全体人民的地方自治米尔。米尔会议也是从小范围——从无数内部自治和自决的农村米尔和城市米尔会议开始，把农村和城市米尔会议在其省地方自治米尔的范围内召集、联合在一起，成为自主的、自治的省会议或省地方自治代表会议，最后从后者即省地方自治代表会议选出的全体代表中召集或发展为全民地方自治会议或代表会议。虽然旧的俄国米尔地方自治结构、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的形式是粗糙的、不完备的和不可靠的，就象农村米尔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形式是粗糙的和低水平的一样，但是它们的原则是合理的，它们的胚胎是最自然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就象农村米尔本性的原则富有生命力一样。如果我们俄国人喜爱我们人民所喜爱的、为人民的长期生活经验所尊崇的和证明行之有效的，由人民代代相传象保护神圣的事物一样地保护起来的米尔原则和米尔会议以及人民协商、米尔自治、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的原则，如果我们喜爱人民所喜爱的米尔，就象从前全国喜爱米尔的管理机构一样，那么农村米尔及其米尔会议、米尔人民代表会议就会在我们面前复兴起来，并召唤我们所有的人回到米尔的接近和联合。

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米尔的联合、接近与和解的精神，只需要米尔的会议和协商的精神，只需要米尔的主动精神和米尔的连环保精神……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不要用空谈和杂志文章来表示我们对庄稼汉、对伟大的农民问题的同情，不要毫无结果的、经院式的探索根据和关于联合会的各种形式的抽象议论，我们作为城市的居民，应当齐心协力地去寻求真正的、切实的米尔之间的联合，学习农村米尔的实践的社会原则，掌握和发展、加强、完善农民米尔的会议和协商精神以及米尔的齐心协力的村社主动精神。虽然米尔在目前还是粗糙的、不文明的，但这有什么要紧？因为它在机体力量和精神力量两方面都是健壮有力的。米尔的社会原则是

富有生命力的和有利于发展的。我们被等级的偏见和仇恨弄得四分五裂，我们被抽象的理论弄得互不团结，我们互相惧怕，怀疑对方口是心非，我们处于军人、官吏、高级阶层、文艺学术等等的闭塞的圈子里，在身体和精神道德方面都是干瘪瘦削、虚弱无力的，我们正在变成小说里的可笑的典型，因此我们需要米尔、米尔的社会生活、米尔社会主义的清新的而又生气勃勃的和解的精神。我们需要农民米尔的严谨态度、组合精神和米尔的智慧——我们的联合会在组织安排方面和公文处理方面的智慧和能力。贵族精神本身应当顺应农村米尔精神，甚至同农村米尔精神融合在一起，而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何况我们这里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贵族政治，农村米尔的因素总是比贵族的基础占优势。贵族政治在英国历史地发展起来了，然而却和乡土精神结合在一起了。莱翁斯·德·拉韦尔恩说：“乡土精神是政治实体的真正重心，是渗透到整个社会和预防社会遭受任何动乱的基础；毫无疑问，这种精神对贵族政治是有利的，但它并不成为贵族政治本身；贵族政治的统治可以没有这种精神，而乡土精神也可以没有贵族政治而存在。英国贵族政治同乡土精神结合而产生了力量，法国贵族政治由于脱离这种精神而变得软弱无力。”商人和小市民从城市米尔瓦解之时起便失去了米尔的联合精神。波索什科夫就曾抱怨说，商人们中间没有任何联合。最近我们常常有机会听到，商人和小市民自己也抱怨他们之间缺少全体一致的精神。这一切都促使商人和小市民更要用米尔的团结精神、米尔的会议和协商精神来教育自己，他们自己大部分也来自农村米尔，并且按其文化程度、风俗习惯和工商业联系来说，一般也是一个最接近农民的阶层。简言之，米尔的和解中间人应当不仅使地主，而且也使所有的市民——官吏、学者、文学家、商人、小市民等等都同农民米尔和解。农村米尔和米尔会议的总的原则也应当促使我们这些城市居民去寻求米尔的会议和协商精

神,这种精神将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还有,我们特别需要学习农民米尔的开诚布公和连环保,以便使我们之中没有或至少很少有坏人,心口不一、两面三刀和卑鄙无耻的人,使俄国人民不致受到象谢巴爾斯基先生所曾指出过的那种自古以来就爱告密的指责。

我们只有把米尔、米尔的会议和协商的原则,米尔的连环保、米尔的公社进取精神的原则贯彻到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去,贯彻到自己的风俗习惯中去,才能有任何全体一致的、坚决的社会主动精神,才能有任何有益的社会会议和社会舆论。我们就将能容易地、清楚地互相了解,就象庄稼汉在米尔会议上,在自己人中间只要互相看一眼便能互相了解,在自己人中间商量一下就“万事大吉了”一样。只有有了米尔的全体一致的精神、米尔的会议精神 and 主动精神,我们的整个米尔、所有的劳动组合或所有的团体才能一鼓作气、齐心协力、勇敢而又坚定地实际从事我们已经设想的事情,不是流于空谈,而是起来身体力行。远在俄罗斯人民的幼年时代,在粗糙的人民会议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米尔的会议精神、米尔的积极主动精神、坚定性和进取精神。例如,编年史在谈到诺夫哥罗德人时经常说:“人民会议的钟声响了,快奋起前进……”。是的,我们要借助米尔的会议精神、协商精神和主动精神,在自己身上重新激起和发挥那种坚毅的、积极的、生气勃勃的爱的精神、和睦和联合的精神,在王位空缺的混乱时期,我们的祖先们就是依靠米尔,全体一致地、坚定地、精力充沛地聚集在一起,举行米尔会议,举行省地方自治代表会议:贵族、商客或商人、镇和州米尔的人、农民都在一起,整个地方都认真考虑和解决地方自治的问题。我们重新需要这种米尔的爱的精神、和睦和联合的精神,当年俄国地方上的人就是以这种精神友好地、频繁地书信往还,集会于莫斯科,组成缙绅会议……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新的米尔会议、缙绅代表会议,需要这种新的伟大的缙绅会议……

我们的粗糙的、不文明的、然而强有力的、正在开始自我发展的农村米尔所灌输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原则。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莫斯科版
第108—116页。

致劳工朋友们^①

德·弗·卡拉科佐夫

弟兄们！一个想法长久地折磨着我，使我不能平静。为什么我所热爱的、支撑着整个俄罗斯的普通的俄国人民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不停息的繁重劳动、他们流的血汗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为什么他们一辈子都白白地劳动？为什么在我们世世代代的劳动者——普通的人民：农民、工人和其他手工业者——的近旁，在豪华的高楼大厦里住着的却是无所事事的寄生虫贵族、官吏和其他富人——他们靠普通人民养活，他们损人利己，吸吮着庄稼人的血？我想，普通的俄国人民怎么能容忍有这样的世道？在我们俄罗斯母亲的国家里，几乎要一千个贫穷工人才能养活十个花天酒地的寄生虫富人。最后，我们的沙皇们为什么观望，要知道，人民让他们当沙皇，就是为了要他们消灭祸害，关怀全体俄国

① 这份传单是由作者本人于1866年在彼得堡散发的。卡拉科佐夫所依据的杀死沙皇的思想和在消灭封建君主制度后希望人民过幸福生活的想法，后来为一部分革命的民粹派（特别是民意党人）所接受。卡拉科佐夫参加的伊舒京小组，主张不仅要维护农民的利益，而且也要维护城市工人的利益。——编者注

人民、俄国劳工的福利，而不是去关怀那些寄生虫富人的福利。我想知道，聪明人对这些是怎么想的，我开始读各种各样的书，我读过的许多书都谈到人民在古代是怎样生活的。弟兄们，于是我才知道了，沙皇是我们一切祸害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沙皇设置官吏，是为了更便于他掠夺人民，通过他们来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而为了使人民不敢反抗这些搜刮人民的人，沙皇还组织了常备军。沙皇为了让这些官吏为其竭尽犬马之劳，不惜搜刮庄稼人的钱财，千方百计满足这些恶棍的要求。把他们称为贵族、地主，统统分给他们土地。而在此以前是这些土地的主人的农民，却被送去受官吏和地主的奴役。这一伙可恶的地主很快就发展起来，他们把全俄国的土地都夺到了自己的手中。于是在我们俄国开始了农奴制。沙皇、官吏和地主开始靠庄稼人的劳动过活。沙皇、官吏和地主成了一家，他们互相包庇，就象俗话说的“狼狈为奸”，他们合伙吸吮庄稼人的血。弟兄们，你们想一想，动一动脑筋，就会看到，沙皇是最大的地主，他绝不会向庄稼人伸出援助的手，因为他自己就是普通人民的最大的敌人。当今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第一个自由诏书时，朋友们，我不相信这是沙皇诚心诚意地要给普通人民做好事。当狼要剥羊的皮吃羊的肉的时候，狼何必要去满足羊的要求呢。而当这个自由来自沙皇的时候，我就看到我是正确的。自由就是这样的：从地主的领地上割下最小的一块土地，为此农民还要付大笔的钱，庄稼人本来就已经贫穷不堪，那里能弄到这些钱去赎回自古以来就是他们耕种的土地呢？当时农民还不相信沙皇会这样狡猾地欺骗他们；农民们想这是地主对他们隐瞒了真正的自由，他们开始拒绝接受这种自由，而且不听从地主，他们不相信那些也是来自地主的和解中间人。沙皇听到以后，便派自己的将军率领军队去惩罚不听话的农民，这些将军便吊死和枪杀农民。庄稼人顺从了，被迫接受了这个自由，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更苦了。我自己到

过俄罗斯母亲的各个地方，看到了庄稼人的十分不幸的生活。由于没有向公家缴纳赎金，由于拖欠税款，农民的最后一匹马、最后一头牛都被夺走了，牲口被拍卖掉，庄稼人用劳动挣来的钱填满了沙皇的腰包。可能，很快就要把庄稼人身上的最后一件破衣服都剥走了。我感到忧愁、痛苦，我的可爱的人民就这样地一步步接近死亡，于是我决定消灭沙皇这个恶棍，为我可爱的人民捐躯。我一定要实现我的意图，我要为这样的思想而献身：我的死一定要有益于我的亲爱的朋友们——俄国的庄稼人。如果不能实现，那么我还是相信会有人走上我这条道路的。要是我不成功，他们必定会成功。我的死将成为他们的榜样，并鼓舞他们前进。要让俄国人民知道，他们头号的强大敌人是谁，不管他是亚历山大二世还是亚历山大三世等等，反正都是一样。人民对付了自己的头号敌人以后，其他不大的敌人——地主、达官贵人和其他有钱人就都会害怕起来，因为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到那时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土地将不再属于无所事事的寄生虫，而将属于劳工自己的劳动组合和团体。资本将不再被沙皇、地主和沙皇的官吏们挥霍浪费掉，而将属于这些劳工的劳动组合。劳动组合将使这些资本进行有益的周转，并且将在组合的所有劳动者之间平均地分配收入。只要有了金钱，俄国人民就能够在没有沙皇的情况下自己管理自己。大家都将过富裕的生活，嫉妒将不再存在，因为用不着嫉妒，大家都是平等的，俄国的劳动人民将开始过幸福而又正当的生活，他们为自己劳动，而不是为了满足俄国沙皇、皇室官员、地主和其他靠庄稼人劳动得来的小钱过活的寄生虫的贪得无厌的要求劳动。这就是我要对劳工朋友们说的最后几句话。让每一个拿到这张传单的人，把它转抄给自己的熟人去看，再让他们转给别人。让劳工们知道写这张传单的人考虑的是他们的幸福，他们自己也要关心争取自己的幸福，把整个俄国从强盗和恶棍的手中解救出来，这除了依

靠自己以外不能指望别人。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117—119页。

农民问题^①(摘录)

格·扎·叶利谢也夫

……农奴制度曾是我们一切发展的障碍。它使我们寸步难行。它断送了我们众多的杰出人物，也毁掉了我们许多良好的机构。农奴制度摧残社会生活的一切正常表现，或者使这些表现受到歪曲并失去活力。但凡不奴颜婢膝，不卑躬屈节，而决心公开为社会福利事业呼吁的正直的爱国主义思想，它都一概加以压制。总之，在农奴制度下，任何前进运动对于我们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不久前，当我们刚刚摆脱这一制度的压迫时，我们就为解脱过去的危险而满怀喜悦的心情，以至一时没有来得及去研究这一伟大事业所体现的原则。然而在我们中间对于伟大事业的未来的巩固性甚至可能出现怀疑的阴影。同农民改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有当前各种良好的开端——城市自治、地方自治、公开审判、新闻自由，等等。同农民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我们对于未来的一切美好期望。怀疑我国农民改革的未来巩固性，或者甚至怀疑它在未来真正

① 这篇文章是作者对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农民改革一书所写的评论，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1868年第3期上。——编者注

性质上发生变化的可能性，都意味着承认自己遭到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破产……

……我们大家知道，解放农民的事业，在我国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同时也是俄罗斯贵族的事情。根据政府的请求，俄罗斯贵族一致同意并竭诚愿意农民用一定限额的赎金购买份地归他们所有。从俄罗斯贵族方面说，这是一种自由的、高尚的、爱国主义的牺牲。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莫斯科版第123页。

我们的纲领^①

米·亚·巴枯宁 尼·伊·茹柯夫斯基

我们主张人民的彻底的精神解放、社会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

一、精神解放。因为没有精神解放，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既不可能是彻底的，也不可能是巩固的。信仰上帝、信仰灵魂不灭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论证）一方面已成为专制制度、各种特权和剥削人民的必然支柱和辩解理由；另一方面把人民这个实体分裂为互相矛盾的两种倾向，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使人民丧失为争取自己的天然权利、为完美地建立自由幸福

^① 这篇文章发表在1868年9月1日日内瓦出版的《人民事业》杂志第1期上，发表时未署名。——编者注

的生活所必需的精力，从而使人民精神涣散。

因此显而易见，我们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拥护者。

二、人民的社会经济解放。因为没有人民的社会经济解放，任何自由只不过是令人厌恶的、无聊的谎言。人民的经济生活任何时候都是基石，它本身包含着对人民政治状况的真实说明。世界上迄今存在的所有政治组织和民事组织，都建立在下列主要的原则基础即既成的事实、财产继承权、家庭中的父权与夫权以及对上述各项原则的宗教解释上，而这一切综合在一起构成国家的本质。从事粗活的和愚昧无知的多数人对于所谓有教养的剥削他人的少数人的奴隶般服从，过去是而且也必定是整个国家制度的必然结果。没有建立在经济特权基础上的政治特权和法律特权，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放，我们主张：

(一)废除财产继承权。

(二)妇女无论在政治方面或社会经济方面均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因此，我们主张废除同继承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的和世俗的家庭法和婚姻制。

(三)随着婚姻制的废除而产生儿童的教育问题。儿童从母亲确定怀孕时起直至他们成年时为止的抚养，所有儿童的教育，即人人平等享受的、从低级阶段起至专业的高级科学发展阶段止的以及旨在培养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材的工业教育和智力教育，主要都应是自由社会照管的事宜。

现在，我们提出以下两条根本的原则作为经济真理的基础：

土地只应归于以自己的双手从事耕种的人们——农业村社成员所有。资本和劳动工具只应归工作者——工人联合会所有。

三、未来的整个政治组织不应是任何别的，而只应是农业组合和工厂作坊组合(联合会)的自由工人的自由联盟。

为了人民得到政治解放，我们主张首先彻底地摧毁国家，废除一切国家制度，包括它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军事官僚的和非军事官僚的、法律的、学术的、财政经济的设施。

我们主张现今受帝国压迫的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有权按照自己的本能、需要和意志实行最充分的自治，即凡愿成为俄国人民的一员的，均可自下而上地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幸福的社会，并同欧洲以至全世界的这类社会建立友好的联邦关系。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120—121页。

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①

米·亚·巴枯宁

你们重新站起来了。埋葬你们的企图失败了。所以，年轻的、非阶层的一代人反对国家、破坏一切的精神不是从青年人的轻率和虚荣心迸发出来的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热情的表现。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整个情绪之中。

如果你们的革命情绪仅仅是一种皮肤病，那么仁慈的政府用

^① 这是巴枯宁于1869年写的一张传单，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号召，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颇有影响。——编者注

来医治你们的英雄手段早就该奏效了。你们早就会是健康的了。就是说，在你们放弃一切思想和人所具有的一切人性之后，你们就会置身于一大批充当国家官吏的高贵牲口之下，自己也会变成靠我们祖国养活并且断送我们民族的那种牲口。你们就会有权利自称是泛俄罗斯爱国者。有教养、非阶层的俄国青年尽管是青年，却已经经历了许多狂风暴雨。他们血气方刚，却已饱经风霜。在我们的时代，也就是在沙皇尼古拉率直的、比较天真的专制制度的幸福时代，我们曾经必须度过二十多个年头，才体验到你们在最近八九年当中所体验到的东西的一半。

自从1862年波兰起义时期和以后的烈火被扑灭以及紧接着卡拉科佐夫也遭到失败以后直到今天，仁慈的沙皇亚历山大为了完成对你们的政治教育似乎不惜一切。在祖国的全部文学、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农场主和自由派的怂恿下，沙皇亚历山大使用了鞭子和棍棒、刑具和绞架、大批监禁和大批流放，并且让成千上万最优秀的人物牺牲在饥饿之下，力图以此来考验你们的力量、你们的顽强意志和你们对于自己所进行的人民事业的信念。你们经受了这个考验，所以你们是强者。你们的许许多多伙伴倒下了，然而，每倒下一个人，就有十个新的战士、十个反对国家的人成长起来，所以这个可恶的国家的末日快到了。

你们的信念和力量从何而来呢？你们的确是不信上帝的，那么你们的信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们对实现个人的目的的确是不抱任何希望的，那么你们的力量又从何而来呢？不求虚荣，不讲豪言壮语而甘愿毁灭自己，你们的这种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摧垮我们的敌人的精神、使他们的血在血管里凝固的那种狂暴得要消灭一切而又冷静得出奇的热情的源泉在哪里呢？奴颜婢膝的文学在你们面前目瞪口呆，它一点也不理解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们是阿谀逢迎者、告密者、侦探、盗窃私人或盗窃政府

的贼，又是强盗或者“不怀好意的”无赖，趋炎附势的报刊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屠杀农民和波兰人的刽子手，如果你们毁灭成千上万的人——这种文学就会了解你们，如果你们表示你们是“高贵的”，它就会替你们辩护，保护你们并且证明你们是正确的。在我们的拜占庭—斯拉夫世界里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并且这绝对不会同我们国家的体面和我们国家的道德发生抵触，因而也不会违背我们的泛俄罗斯爱国主义。

如果你们是怀抱理想的青年，仅仅在理论上梦想着科学和人性、自由和权利——这种文学在这一点上也是理解你们的。我们祖国文学的劳苦功高、久经考验的宿将在他们当年也读过书，激动过，梦想过，也当过大学生，热情地醉心于理想，献身于英勇的行动。但是他们从世界的现实这个最肮脏的深渊里获得的生活经验却使他们堕落了。他们仍然感伤地回忆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一定会谅解你们年轻人的任何幻想，因为他们深信，在同样的现实的影响下你们不久也会把自己培养成决不更坏的堕落者。

但是，你们既不想偷盗，又不想沉溺于幻想，你们鄙视泛俄罗斯的现实世界，几乎象鄙视理想的书本世界一样，而这个书本世界对于纯洁的灵魂来说，至今是一个躲避肮脏政治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们祖国的文学感到吃惊，正因为如此，它不能理解你们在朝哪个方向努力，你们想要什么。

在这种窘迫的处境下，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新闻记者先生们声称，你们当前的运动是波兰人的地下阴谋。人们想不出比这更卑鄙、更愚蠢的说法了。因为挑动一个残酷的刽子手对被虐待的牺牲者的愤怒，这是一桩只有在我们斯拉夫国家才可能发生的极可耻的罪过。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卑鄙的事吗？也不会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因为人们必须成为绝顶的白痴，才会看不见在绝大多数波兰爱国者的纲领和我们的青年、俄国人民事业的代表者和捍卫者

的纲领之间的那条鸿沟。

在多数波兰鼓动者，尤其是那个波兰贵族天主教党（我们的新闻界把对俄国青年的主要影响归罪于它）和我们之间只有一种共同的感情和目标——对泛俄罗斯国家的憎恨和要求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尽快地摧毁这个国家的坚定意志。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再向前走一步，我们之间就横着一道鸿沟：我们希望最终消灭俄国和国外的任何国家，他们都梦想重建波兰国家。

任何国家，不管其形式是多么自由或多么民主，必定象一块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人民身上，所以波兰国家的拥护者所渴望的不是好的东西。他们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今后只能推翻、而不会建立国家。他们这种与人民为敌的梦想注定要使自己的祖国再一次遭到毁灭。如果他们能够复兴波兰国家（也许是靠外国的帮助，当然不是靠人民的帮助），这个国家必然建立在贵族阶级，或者换句话说，建立在继承地产的制度的基础上，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就会既成为我们的敌人，又成为本国人民的压迫者。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就要以普遍自由和全体人民的生活的名义向他们开战。不过，在那以前我们还是朋友和战友，因为他们的事业也就是我们的事业——推翻泛俄罗斯国家。

受到国家奴役的俄罗斯的和非俄罗斯的各族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莫过于泛俄罗斯国家。

但不幸的是，波兰爱国者同我们的斯拉夫新闻界一样不理解我们的运动的意义。因此，他们不信任我们的运动，而它对他们的影响过去是并且始终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真的理应受到泛俄罗斯爱国者的那种诽谤，那么这对波兰爱国者和我们来说并没有坏处。如果我们至少在这场酝酿中的普遍的斯拉夫悲剧的第一幕一致行动，这也不会有坏处。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在后来的三幕中作为敌人而分手并且彼此当作敌人来对待，又在第五幕中恰如

其分地最终取得和解。

不，不是波兰人的阴谋的影响，而是另外一种影响，一种巨大的力量引导着俄国青年，这就是人民的力量。斯切潘·拉辛的时代快要到了……现在的仁慈的政府同仁慈的罗曼诺夫即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政府惊人地相似。尽管历史地说他是仁慈的，但是为了沙皇的财富、贵族和吃人的官僚的利益，他象目前在位的沙皇一样残忍地屠杀和剥削人民，从而维护泛俄罗斯国家的名誉。那时象现在一样，备受折磨、虐待、濒于饿死的人民从村庄跑进森林。现在和当时一样，农民的俄国、无产者的俄国整个处于动乱之中，它越来越觉察到沙皇的欺骗，它现在不再指望从上面得到新的、真正的自由，而是指望从下面，也就是在斯切潘·拉辛给它指引的道路上取得这种自由……是的，在人民的俄国和官方的俄国之间，一场新的流血冲突、一场新的生死搏斗正在公开准备着，而且已经临近了。

这一次谁将赢得胜利呢？毫无疑问是人民。斯切潘·拉辛是一位英雄，但是那时他是孤独地处在一切人之中，又凌驾于一切人之上，他的巨大的个人力量毕竟不可能抵抗集中的、有组织的力量，因为在他单独领导的人民当中没有建立一个组织的任何迹象。所以一切都必然随着他失败了。现在不同了。固然不会有把人民的整个生活同人民的力量结合于一身的人民英雄斯切潘·拉辛，但是将会有一支无名的、非阶层的青年大军来代替他，他们现在就已与人民同甘共苦，一个共同思想和目标已经把他们同人民结合起来。这些青年同人民相结合，这是人民胜利的保证。

俄国的知识青年已经把人民的灵魂化为己有，他们想要的不是自己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正因为如此，他们是那样坚定，那样毫不留情，那样不可调和。这一次站在他们身后的不是单枪匹马的斯切潘·拉辛，而是集体的、因而也是不可战胜的斯切潘·拉

辛。这就是俄国青年们现在的、还是和平的运动的真正意义，因此尽管这些运动表面上看来很不重要，却使我们所有的上层人物、官方文学界和当政的官僚集团感到震惊。

所以，你们这些年青人，赶快抛弃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吧，人们现在把你们从那些学校开除出去，并且在那些学校里人们总是力图使你们脱离人民。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在人民那里学习如何为他们服务，如何最出色地进行人民的事业……必须记住，朋友们，知识青年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他们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但是，为了获得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必须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人民。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人们想以科学的名义把你们束缚起来，使你们失去力量。同这个世界相联系，作为这个世界的表现的这种科学注定要灭亡。但是今后在人民胜利以后，在解放了的人民的生活当中，无疑会产生一种生气勃勃的、新的科学来代替它。

这就是西方最优秀的人物的信念，在那里同在俄国一样，建立在宗教、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文明基础上的、建立在家族继承权基础上的旧的国家显然在崩溃，并且注定要让位于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世界。如果有人说欧洲的一切都在沉睡，那是欺骗你们。恰恰相反，一切都在觉醒。那些既听不到、也看不见快要到来的社会风暴的无可怀疑的预兆的人们，一定是真正的瞎子和聋子。

在准备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欧洲和美洲的工人世界不分国界彼此携起手来，并且以共同胜利的名义召唤你们，召唤你们这些俄国的非阶层的青年、你们这些革命的工作者同他们结成牢固的同盟。

1869年于日内瓦

译自巴枯宁《社会政治通信集》1977年
柏林德文版第344--349页。

历史信札^①(摘录)

彼·拉·拉甫罗夫

初版序言

把过去发表在《星期周报》上的一些书信全部收集到一起，并以新的形式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对本版作一点说明。

在我开始寄送这些书信的时候，对于杂志编辑部是否会把信中所作的对问题的一系列探讨刊登出来，根本没有信心。由于远离首都，我无法观察事态的进程，并且无从判断，我的这些书信究竟引起了读者多大的兴趣。期刊当然总是希望有人阅读的。在连载这些书信的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地考虑过，或许我该就此住手了。只是在全部书信刊载之后，我才确信，这些书信对于杂志的读者来说，可以构成一个具有某种联系的整体。此外，我清楚地知道，杂志的读者往往缺乏耐心去观察较为抽象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如果这种发展过程的开端刊载在一期杂志上，而经过几期连载，到结束时离开端已相隔整整一年。所有这一切使我不能完全顾及这

① 《历史信札》最初陆续发表在叶·伊·康拉第主编的《星期周报》(1868年第1—47期和1869年第6、11、14期)上。作者当时在流放地，不能用真名发表，因此是用彼·米尔托夫的笔名发表的。1870年9月经作者修订后以单行本出版。——编者注

些探讨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只能赋予每封信以更为完整的形式。因此,对问题的一系列探讨也就可能缺乏联系,缺乏完整性。加之写作过程时常中辍,经过一定时间再回到某一思想上来,思想本身也就显得极不连贯。因此,在修订这些书信时,为了使读者便于掌握全貌,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指出书信之间的联系,对某些探讨之间的从属关系做些说明,对某几点做些发挥,个别地方做些改动。目前出版的《历史信札》和它最初发表时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这些纯属形式上的改动。我仅希望,由于加强了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对基本思想进行了说明,信札的这种新的形式将会使我的这部著作受到读者的更多注意。

我本来想在这本书中做一些较为实质性的修改,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批评界对我毫无帮助。无论在厚本的杂志里,还是在每天的报纸上,无论在内容严肃的历史性杂志里,还是在各派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杂志中,至少就我所看到的这些出版物而言,我还没有遇到过什么评论、驳斥、纠正或指摘,能促使我去思考:哪里应该说得更明确些,哪里需要进一步发挥;是否在某处我遗漏了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否在另一处我把虚幻的现象当成了重要的东西等等。也许我的这些书信没能引起读者和批评家们的足够的兴趣;也许批评家们认为其中所论述的思想过于浅薄,不值得予以注意;最后,也可能正好是我所需要的那些报刊没能到我的手上。无论如何,在这方面,除了考虑一些我所听到的片断的、个人的意见以外,我只好自行其是。这些意见特别集中在一个缺点上:抽象、枯燥、晦涩……遗憾的是这个缺点部分地在于研究对象本身。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在我的叙述方法中也确实存在这个缺点。这次出版时,我竭力改正这个缺点,加上了一些例子。但是我并不打算重写新的论文,只想把原来的著作加以改善而献给读者。同时,我觉得援引过多的例子会有损于思想发展的连贯性。所以,整个思想仍然

原封未动,只不过在某些地方表述得比过去更明确罢了。

我不想改动我的著作的总的标题,然而我认为无需保留我原来使用的书信体裁的某些形式。

我完全不知道,我的这些书信,《星期周报》的读者们究竟读了多少,或许根本没有读过。也许批评界至今仍然认为对它不屑一顾。我在最后一封信中说过,我自己也意识到这部著作存在着许多缺点,特别是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来说更其如此。我奉献给读者的,只能是尽我所有,尽我所能。

1869年于卡德尼科夫

第四封信进步的代价

在漫长的生存过程中,人类造就了一些天才人物,历史学家骄傲地称他们为人类的代表,英雄豪杰。为了使这些英雄豪杰能够发挥作用,甚至单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出现于以其为荣的社会之中,就需要培育出为数不多的这样一批人,他们自觉地竭力在自己身上培养人类的美德,追求渊博的知识,锻炼明睿的思想,造就坚强的性格,渴望建立一个更加适合于他们的社会制度。为了使这样一批为数不多的人能够培育出来,就必须从时刻为自己生存而斗争的多数人当中,分出不必为生活的重负而操劳的少数人。为了使那些为起码的生活资料、为容身之所和蔽体之衣而斗争的多数人能够从自身分出这些人民的精华、文明的优秀代表,就必须使多数人能够生存下来,而这决不象初看起来那样轻而易举的事。

在最初为了生存而和自己的同类——动物进行的斗争中,人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他没有象其他动物那样具备强有力的进攻和防御的天然工具,而其他动物正是依仗这类工具,在同各种敌人的斗争中生存下来的,因此,在凭体格进行的斗争中,更为强大的

动物往往把人吃掉。人缺乏爬、跳、飞、游等器官，因而不易逃脱危险，而其他较为弱小的动物却可能由于具备这些器官而得以幸存。人必须学会一切，适应一切，否则他就不能生存。据某些著作家的意见，人的幼儿平均在自己生命的五分之一时间内，对双亲是无可奈何的负担，而对其他动物来说，这个时间则不会超过二十分之一。即使假定在原始人类当中，这种数字上的差别比较小，但对于人来说毕竟是不利的。可见，人类能在动物界生存下来一般说是极其困难的。

有一种逐渐发展的器官能够使人在斗争中取胜，替代其他动物的长处并超越后者。这就是思维器官。或许在产生能够比那些敌人更好地思维的个别幸运者之前，在产生能够想出保卫自己生存手段的个体之前，已有大量的、数不胜数的双足个体在和自己的敌人——兽类——的无望搏斗中归于灭亡。他们保存了自己，以其余部分的死亡为代价，而这个最初的、天然的双足个体中的特殊阶层则创造了人类。继承下来的能力或摹仿能力，把这些原始天才人物的发明转交给处于最有利环境的为数不多的人。人类的生存巩固下来了。

如果说在过去，人与人之间，也和人与其他动物之间一样，为了夺取食物或将对方吃掉而进行斗争，那么现在，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则只限于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在这里，斗争双方是比较势均力敌的，因此，斗争也必然会更激烈、更持久。无论在身体的灵巧方面，在使用进攻及防御武器方面，还是在模仿最初那批老师——兽类——方面的任何改进，或是某个个体获致成功的任何发明，都引起了许多个体的死亡。被弃置不顾的幼儿死亡了，怀孕的或刚刚分娩的母亲死亡了；较弱小的、不够灵巧、不够机敏、不太谨慎、模仿能力较差的也死亡了。有的幼儿，由于身体结实，可以比其他幼儿更早地不需要照看，或者由于幸运的环境可以更久地

得到照看而生存下来了；在体格和思维方面最有才能的生存下来了，具有同等才能中的幸运儿也生存下来了。他吃得较好；他睡得安稳；他知道的东西较多，他有时间更好地思考自己的行动。这些幸运者是人类当中能以所有同伴们的毁灭为代价而使自身生存下来的第二个特殊阶层。个体为了共同防御或共同劳动而结成巩固的联合体，这对于人类的精神发展来说，可能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从自己的动物状态中带来了最初的、最古老的家庭，这种家庭团聚在长久哺育自己婴儿的母亲周围。人类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以猛兽和某些猿类为榜样，也熟悉了另一种社会生活，即为了防御或进攻而暂时组合起来。在原始的母系家庭的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分布极广的纯人类的联合体——母系氏族。在争取生存的艰苦斗争中，人创造出这种密切联合的形式，它以共同事业为基础，并使个体利益从属于自己。当代许多学者研究的共同成果向我们表明，几乎普遍存在的、纯人类的共同生活的最古老形式是一种具有共同的妻子、共同的儿女、共同的财产、彼此紧密联系的原始人群。这就是最初的人与人之间的牢固的联系，一种建立在自发地起支配作用的习俗基础上的联系，而在这种联系中，人为了未来逐渐掌握一系列经过考虑的行动的能力，即有计划地生活的能力。这是人的最初的经验，它使人懂得，当他加入某个联合体时，他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就会得到很大好处；为此，个体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然而却从中获得大大增强了的力量，获得联合体所有成员共同经验和共同思维的成果以及许多世代的传统。后来，由这个基本的人类联合体又形成了家长制氏族、父权制家庭、各种形态的家庭联合，发展成部落和民族。在同这样的氏族联合体作斗争时，所有较为弱小的集团都遭到必然的灭亡，或者也结合成某种联合体。在这些团结起来的力量面前，那些没有及时想到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仿效这种发明的个体，根本

无法保卫自己，因而归于灭亡。斗争双方越是具有更大的力量，原始人群的经济需求越大或是储存的物品越多，从而他们彼此之间对可以满足需求的贫乏物资的争夺越是不可调和，那么，氏族联合体之间的毁灭性的斗争也就必然越加激烈。以多数人被消灭为代价，人类换来了文化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而通过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换来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爱好的习俗以及知识和信仰的传统。

后来，社会生活的形态更趋复杂，出现了公社的、氏族的、家族的、部落的以及个人的所有制形式，形成了等级的、阶级的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奴隶制度，氏族、部落、民族之间的斗争也不断延续下来了。当仅仅是为了生存而进行斗争的时候，被击败的敌人总是被残忍地消灭掉，然而，别人的生命能给自己生活的舒适带来好处的最初经验是不可能白白丢掉的。想增加自己享乐的愿望促使人们考虑：有时不把战败者杀掉，是否更有利呢？如果战胜者只从事于培养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灵巧，而把为获取生活必需品所进行的劳动转加在他人身上，是否更有利呢？那些想到了这种现实主义原则的史前时期人类的天才人物，在人类中奠定了尊重别人生命和个人尊严的基础。他们也因此不自觉地给自己以及后代提出了发展体魄和智力，发展文化和科学的任务，并且以此为道德的理想境界。他们使自己和后代有了闲暇，以求得不断的进步。他们在人类中间创造了进步，正如他们的天才而幸运的前辈在兽类中间创造了人类，在人的个体同处于半动物状态的集团的斗争中创造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家族，创造了未来进步的可能性一样。可是，这种少数人的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多数人被剥夺了达到体魄和思想灵巧的可能性，而这种灵巧则是文明的代表们的优越之处。一方面，少数人在自己身上发展了脑力和肌肉，并在军事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穿插着空闲和休息的暂时活动中，肌肉系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多数人则注定要

为别人的利益不停地从事单调的、使人疲倦的和平劳动，他们没有闲暇去进行思维工作，在灵巧方面也不如自己的统治者，因此一直没有能力使用自己的巨大力量去为自己争取发展和过真正人的生活权利。

由于认识到文化和科学作为一种力量、一种享受的重大意义，自然就产生了垄断这种力量和享受的愿望。直接的强制、社会的组织、法律的制裁、宗教的恐吓、从襁褓时代起就被灌输的传统习俗，把那些高贵的、有学识的、发展良好的少数人同其他所有的人分离开来。以所有这些其他人为了生存而不停地工作和斗争为代价，少数人就有可能为自己挑选更美好的妇女，生下更优秀的后代，给后代以更好的供养和教育；就有可能把时间用于观察、思考、判断，而不必为食物、住所和最简单的生活条件操心；就有可能去探求真理，分辨正误，摸索技术上的改进，寻求更好的社会制度；就有可能在自己身上不断发展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随时准备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幸福，决心宣扬真理，实现正义。

对真理和正义的宣传，当时是由一些具有坚强信念和良好理解力的人传播给范围不大的、把获得学识当作乐趣的人。这种宣传把这些人当中接受能力最强的拥护者组织起来，同时在那些生活上有保障的少数人中信奉宗教的人也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来。通过暴力或协商，关于真理和正义的学说逐渐被纳入法律和习俗。就象有教养的人出于内心的需要力求实现正义和传播真理一样，善于思考的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觉得最好把一部分生活用品分给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扩大有知识的人的范围。我已经说过，文明的巩固有赖于对这种扩大的必要性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发展得很慢，精细的盘算经常使得分给别人的物品尽量地少，并且尽可能限制别人接触知识的范围。由于不愿思考，结果把时代的这些新的要求，看成是某种和社会制度敌对的东西，看成是某种犯

罪的和罪恶的东西，因此，知识垄断者中的多数人千方百计地反对这种进步。他们把自己的知识紧紧地禁锢在传统的理论之中，禁锢在权威性的教义之中，把这些知识同神秘的传说，同超自然的启示混为一谈，从而力图把自己的知识变为不容许进一步批评的东西。后来，当知识变成为世俗的，不再能用神圣的神秘性来防护自己的垄断者时，就出现了一帮御用学者，他们头戴闪闪的官珠，手执博士、教授、院士的赫赫证书。这些人也同样竭力使自己摆脱进一步的思维活动，尽力把自己一帮人隔绝起来，排挤并扼杀那些无比勇敢地亮出了科学批判旗帜的新生力量。垄断者们力图把御用科学变成象过去神圣科学那样一种习俗和传统的事业。被公认的知识经常成为批判的对象，成为科学进步的敌人。这种进步的弱点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人类尊严和各种正义的不良看法。由此产生了文明的长期的不稳定，由此造成了文明的经常趋于停滞；最后，也使得人类的进步极其微小，尽管为了在几千年的过程中产生出几个伟大人物，为了极少数人的进步付出了几十亿人生命的代价，使世代代的人们血流成河，历尽千辛万苦，进行无穷无尽的劳动。

为了使几个思想家能够在自己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几个规模不大的培养教育家的学校，人类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这些教育家至今也未给人类带来多大好处。如果计算一下当代有教养的少数人的数目，计算一下过去在为他们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估计一下世代代的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发展而进行的劳动的价值；同时，如果计算一下丧失了多少人的生命，以及现在多少过着人的生活的人平均耗费的劳动的价值，——如果做到这一切，那么我们的同时代人一想到为了他们的发展花费了多少血汗和劳动的代价时，很可能大吃一惊。使他们能够心安理得的是这种

计算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应该吃惊的还不是为少数人的进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是为它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而做出的事情却如此之少。如果少数人更早地、更加努力地注意在自己周围传播文化和思想领域中所获得的学识，则丧失的生命和劳动的数量未必会如此巨大；我们每个人平均分摊的份额就会少些，并且也不会一代一代地增加到如此巨大的程度。我们对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无能为力，因此，每个通达事理的人都应该听命于这些规律，平心静气地研究它们，并尽可能地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利用它们。我们对于历史也无能为力，过去的一切只给我们提供有时可供我们作为将来借鉴的事实。对于父辈的过错，我们应负的责任只是在于我们继续这些过错、利用这些过错而不设法去消除其后果。我们只是对于将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影响力，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是构成未来真理与正义的全部内容的材料。每一代人对于后代应负的责任仅仅在于他们能够做什么和没有做什么。因此，面对后人的评判，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进步这个响亮字眼的过程中，有多少灾祸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祖先给了我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以享受这种进步的成果的可能性，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毫无必要地加重并延续了那些从未享受过进步好处的多数人的苦难和辛劳？在什么情况下，在我们后代的心目中，我们也要对这些灾祸负责？

生存斗争的规律在动物界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在人们没有认识到互相团结的意义，没有产生对真理和正义的要求以前，这一规律在原始人类当中也起作用，我们对此没有丝毫理由加以谴责。由于在人们只知相互残杀，而没有达到以剥削代替杀戮以前，这种认识难以产生，所以我们只能把在人的个体、组合、氏族、部落以及民族之间不断斗争的整个漫长时代看作是动物界的现实。

很难想象,在最初,知识的积累,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思想的发展,不是一个在处境特别优越的个别人当中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样一些人当中,他们靠别人而有闲暇,得到更好的饮食和受教育的条件,而别人则以越来越繁重的劳动,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或巨大苦难为代价,给他们提供闲暇、饮食和受教育的机会。为了学习,必须先有教师。多数人只有靠较有教养的少数人对他们的影响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在人类中,要么是根本没有任何发展,要么是多数人先负起最幸运的少数人的重担,为他们劳动,为了他们而受难和牺牲。这看来也是一个自然规律。有鉴于此,我们只好或者说,我们完全不想要以如此代价换来的发展;或者把这也看作是人类学的现实。可是,我在前一封信的开头已经把全面发展包括在进步的公式本身之中,因此,如果根本拒绝发展,就将陷入前后矛盾。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人类为了自己的发展,曾必须以非常高昂的代价来建立师范学校,来培养较有教养的少数人,以便使科学和各方面的生活实践,使思维和技术,在这些中心积累起来,然后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人当中。

在进步过程中必不可免的、自然的灾祸仅限于上述这些,而超出这些规律的范围,就要由世代的人,尤其是文明的少数人来负责了。历史上,除了直接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之外,在对于人的生活权利多少有了明确认识的时代所流的全部鲜血,都是罪恶的结果,要由流了这些鲜血的那一代人负责。任何文明的少数人,由于他们不愿成为最广义上的文明化的人,而要对他们同代和后代人的一切苦难负责,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只去充当文明的代表者和保存者的角色,而是担负起文明的推动者的角色,他们本来是能够消除这些苦难的。

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评价迄今的历史画面,那我们可能就会承认,即使排除为争取生存而斗争的辩解,人类的世代代都是

血流成河的，同时，几乎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那些以文明自傲的少数人，为了传播这种文明都做得甚少。少数个人关心过在人类中扩大知识的范围；更少的人关心过树立健康的思想，寻求最合理的社会形态；而在文明的少数人中，力图把这些合理形态加以实现的，就更是寥寥无几了。有许多辉煌的文明，由于不善于把自己的存在同更多的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而归于消亡。在所有文明社会中，享有文化利益的人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去考虑没有享受并且不可能享受文明的那些人，更不去考虑为了获得生活和思想的利益曾经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然而经常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文明的各个阶段上，认为这个阶段就是社会发展的极限，因而愤怒地反对对该阶段持任何批判态度，反对把文明的利益扩展给更多的人，减轻那些没有享受文明的大多数人的劳动和苦难，使思想具有更多的真理，使社会形态更为公正。这些鼓吹停滞的人们非常害怕一种思想，即全部历史是确定不移地追求更好事物的 steeple chase（越障赛跑），在这里，谁落后了，谁马上就会脱离历史活动家的行列，消失在无名的观望者的人群之中，作为一个野蛮的、微不足道的人死去。不善于进行这种赛跑的人想说服别人停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平静为乐趣，似乎如果他还想做一个人的话，这样做也是可能的。这些鼓吹停滞的人们极少有可能给社会进步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他们却往往能够延缓这一进步，并且加重多数人的苦难。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为现代文明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有必不可免的灾祸，而且还有大量的完全不必要的灾祸。对于这些灾祸，文明的少数人的先辈们是要负责的，部分是由于漠不关心，部分是由于直接对抗传播文明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去消除以往的那些灾祸。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多数人已经死去，他们没有减轻自己身上的劳动。现代的文明的少数人正在享受着他们的劳

动和苦难。更有甚者，他们还享受着自己同时代的许多人的劳动和苦难，并且影响到加重他们子孙后代的劳动和苦难。由于这后一种情况，我们对后代承担了或将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历史地研究已经完成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将导致这样一个实际问题：现在这一代人有什么办法来减轻自己的责任？假如具有不同教养程度的活着的人都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了不在后人面前对人类新的苦难负责，我们应该做什么？即使他们都清楚地懂得自己该做的事，那么，答案当然也会是各不相同的。

象自己的祖先在人类生活初期进行过斗争那样，那些每天为了自身生存而斗争的多数人中的某个成员会对自己这样说：尽你所知，尽你所能去斗争吧；捍卫你自己和你所依恋的那些人的生存权利吧！这是你的父辈所曾遵循的准则；你的境遇不比他们好，这也是你唯一可以遵循的准则。

这些多数人中更为不幸的人（文明在他身上虽唤起了对人的尊严的意识，然而也仅限于此）会对自己这样说：尽你所知，尽你所能去斗争吧；捍卫你自己和别人的尊严吧；如果需要，就为它去死！

文明的少数人中的某个成员（他只是希望增加自己的享受并巩固自己的享受地位，不过他更多地是想在生活舒适方面，而不是在思想方面去寻求享受）会对自己这样说：只有在团结合作或多或少起支配作用的社会里，你才能得到享受；你要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反对那些与团结合作不相协调的东西；当你刚一意识到当代社会的不协调是一种社会病态，你自己就会因这种不协调而感到痛苦；努力去改善多数人的处境来减轻你自己的痛苦吧；你为此目的而牺牲的一些眼前利益，在你意识到你已使社会病态，这种给你自己也带来痛苦的病态有所减轻时，将会得到补偿。你要去研究自己的实际利益；去减轻自己周围和自己本身的痛苦，这对你是最有益

处的。

少数人当中的一小部分成员(他把自身的发展,探求真理和实现正义当作自己的享受)会对自己说:我所享受的每一种生活舒适,我有闲暇去获得或形成的每一个思想,都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苦难或劳动换来的。过去的事,我无法去纠正;我所得到的教养无论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我也无法拒绝;这种教养正是促使我去从事活动的理想。只有软弱无力和没有学识的人,才会被肩负的责任所压倒,而跑到菲瓦达^①或是坟墓中去躲避灾祸。灾祸应该尽可能去消除,而这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做到。灾祸应该偿还。如果我用自己的学识去减少当前和未来的灾祸,我就能解除自己对于因这些学识而付出的血的代价的责任。如果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就有义务做到这一点;这个义务对我是非常轻松的,因为它正好和构成我所享受的东西相吻合;探索并传播更多的真理,弄清什么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并竭力去实现这种制度,这样,我就增加了自己的享受,同时,也就为现在和未来的饱经苦难的多数人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因此,我只是遵循这样一条准则:按照一个有教养的人给自己提出来的理想去生活!

如果所有的人都明白事理的话,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但是糟糕的恰恰在于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懂得这个道理。遵循上述准则的只有第一类人中的一部分,以及其他类中的一些不多的人。为了自身生存而斗争的另一部分人捍卫自己不够坚决;不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不会做,而是由于决心不大,由于消极。第二类人中的多数,为了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而丧失尊严,自惭形秽,结果仍然不能摆脱自己的处境。第三类人中的多数不懂得自己的实际利益,因循守旧,不会哪怕在很小的程度上抵制给每

① 上埃及的一个沙漠地带,第一批基督教徒曾在那里过禁欲生活。——编者注

个人,因而也给他们自己带来痛苦的社会病态,也就是说,在力求避免苦难的同时,他们不会去减少由于社会的不协调而给自己造成的苦难。最后一类人的多数则或者把真理和正义当成偶像,或者局限于头脑中的,而不是生活中的真理和正义,或者不愿看到,多么微不足道的少数人在享受文明进步的利益。

为这个进步付出的代价在不断增长……

第五封信 个人的作用

在我上面两封信的结尾都得出同一个结论。如果社会摧残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它就会面临停滞的危险。如果社会文明变成纯粹是为数不多的少数人的财富,那么这种文明无论怎样都将面临消亡。因此,无论人类的进步是多么微小,但已经取得的进步完全是靠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取得的;没有他们,肯定不会有进步;没有这些人传播进步的愿望,进步也是极不稳固的。由于这些人通常都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看作是有学识的人,由于正是为了他们这些人的学识,付出了我在上封信中讲到的那些巨大的代价,因此,正是这些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偿还进步的代价。这种偿还,象我们已经讲过的,在于尽可能把生活上的福利、智力上和精神上的发展传给大多数人,把科学观点和正义纳入社会形态之中。

我们来谈谈这些作为人类进步唯一工具的个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社会进步不会象莠草那样自然成长。它不会象纤毛虫在腐败的液体中繁殖那样,由空气中浮动的胚胎繁衍起来。它不会作为某些神秘思想的结果而突然出现在人类当中,关于这些神秘思想,四十年前就有过许多议论,而现在也仍有不少人在谈论。它的因由确实是思想,但不是神秘地存在于人类中的

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于个人的头脑中，并在其中发展，然后从个人的头脑传到其他一些个人的头脑；它随着这些个人在智力上和精神上的成长，而在质量上发展起来，随着这些个人数量的增加，而在数量上发展起来；而当这些个人意识到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并且决心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它就变为一种社会力量；当充满这种思想的个人把它纳入社会形态中的时候，它便取得胜利。

如果一个人仅仅谈论自己是如何热爱进步，而不愿以批判的态度思考一下怎样去实现进步，那他实际上就是从来不希望进步，甚至根本不可能真心希望进步。如果一个人认识了进步的条件，然而却袖手坐待，以冀自行实现，自己则不去花费力气，那他就是进步的最坏的敌人，是进步道路上最可憎的障碍。应该向所有那些埋怨岁月的蹉跎、世人的渺小、社会的停滞和反动的人提一个问题：你们自己，你们这些盲中之明者，弱中之强者，你们为促进进步做了些什么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会诿过于力量薄弱、缺乏才干、无用武之地、敌对的情况、敌对的环境、敌对的人等等。他们说，“我们算什么活动家呀！教也没把我们教好，给杂志写篇文章也写不出来，老天也没赋予我们预言家的辩才，同时，职位卑微，有时还根本捞不到，祖先也没留下财产，而挣的钱只够混个半饱。假如既有财产，职位又高，又有才干，那我们就会大显身手。”

我不讲那些一辈子都为生计而挣扎的人。我在上一封信里谈到过这些人，他们不应受到任何非难。如果进步与他们毫不相干，使他们得不到任何发展，那么他们只不过是进步的牺牲品。如果智力的发展触及了他们，如果对美好事物的意识在他们胸中点燃了对谎言和罪恶的怒火，而环境却压制了这种意识的任何表现，并使他们的生活局限于为谋生而操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保持了人的尊严，那么他们以自己的榜样，以自己的生存，仍不失

为进步的最坚毅的活动家。在这些没有做出辉煌业绩的、人类的平凡的英雄面前，就历史意义来说，那些最伟大的历史活动家也显得黯然失色。如果没有前者，后者也就永远不能实现自己的任何一项创举。正当那些出众的英雄们为争取美好的事物进行斗争，并且常常在斗争中牺牲的时候，平凡的英雄们，尽管条件不利，却在社会中保持着人类尊严的传统，维护着对美好事物的意识；而当一百个伟大活动家中有一个得以实现自己的想法时，他会忽然发现，在自己周围有一批坚强的、在劳动中经受了锻炼、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的人高兴地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在任何伟大的历史时刻，正是由这些平凡的英雄构成了改革的基础。他们在自己身上保存着未来的全部可能性。如果社会上没有这些人，任何历史进步就会马上中止。这种社会如果继续生存下去的话，在精神方面就会和其他社会性动物的生存毫无差别。

然而，这些坚毅的活动家仅仅包含着进步的可能性。由于十分简单的原因，实现进步的任务永远不属于也不可能属于他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刚一着手去实现进步，就会饿死或者丧失自己的人的尊严，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将从进步活动者的行列中消失。实现进步的任务属于那些摆脱了谋生重荷的人，这些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都能在人类中实现进步。

是的，任何一个。请别再说什么缺乏才干，缺乏知识。为此既不需要特殊的才干，也不需要渊博的知识。如果你们的才干和知识足以批判地对待现存事物，认识进步的需要，那你们的才干和知识就足以把这种批判和这种认识加以实现。只是不要放过生活确实为此提供的任何一个机会。即使你们的活动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所有物质都是由无限微小的粒子构成的，最巨大的力量也是由无限微小的动力集成的。由于你们的活动而带来的益处，无论你们自己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做出正确的估价；它取决于成百上

千的各种情况，取决于难以预见的大量巧合。最美好的意愿往往导致极恶劣的结果，正如乍看上去极不重要的行动可以发展成无可估量的后果一样。然而，我们能够不无根据地预期，如果我们给与一系列行动以同一趋向，我们得到的结果将不会与此趋向完全相反，尽管只有当某些行动恰好遇到合适条件时，才会显现出这一趋向的明显效果。也许，我们看不到这些效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尽力去做，效果是一定会有的。耕耘过土地、播撒过种子的农夫知道，许多种子会死去，同时，他也决不能使田地免受践踏，免除歉收，免受夜出活动的猛兽的侵扰，但是即使在歉收之后，他仍然又会将一把种子撒到地里，期待着未来的收获。如果每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经常地积极追求美好的事物，那么无论他的活动范围如何窄小，无论他的生活领域如何狭隘，他仍将是一个能起作用的进步推动者，他将能偿还为了他的发展所付出的那一份巨大代价。

难道真的存在什么微不足道的和十分重要的活动领域吗？在哪些领域里，人们有权垄断进步性呢？莫不是文学家？莫不是艺术家、科学家？

请看这位进步派文学家，他以华丽的词藻论述社会的福利，而同时却更加巧妙地剥削自己的同伴，或者说，他通过自己，使他似乎为之服务的思想遭受敌人的凌辱。更不要说各种各样的“忧郁的一帮”，对他们来说，文学是最丑恶地糟蹋思想、糟蹋人类尊严的工具，是造成停滞和社会腐化的工具。

请看这位进步派艺术家，他歌颂言论自由，虽然他全然不拒绝参加书报检查机关；他在自己的艺术工作室之外，从来不想一下坏事和好事有何区别。更不要说所有那些人——他们简直是数不胜数——他们顺着小小的诗歌的、音乐的、绘画的、雕刻的、建筑的创作阶梯往上爬，以求得到养老金、勋章、高官、宅邸。

请看这位进步的教授，他准备根据情况把自己的渊博学识变成随便某个学派的武库。还有多少麻木不仁的，只知提出论据和进行实验的人类仪器，他们一辈子只是观察化学代换和分解，观察细胞的繁殖和肌肉的收缩，只知研究希腊词语的变格和变位，研究梵文和波斯古经中的语音间断，考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伊万雷帝时代器皿的特征；他们从来不想一下，他们的智慧和知识是以多少代人的苦难为代价换来的一种力量，是他们理应偿还其代价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负有义务，提出论据和进行实验可以把一个科学家引导到他所处的时代的人类美德的顶点，同样也可以把一个人降低到蜘蛛那样的水平。

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学，都不能解救不道德的冷淡主义。它们本身不包含也不制约进步。它们只是为进步提供工具。它们为进步积蓄力量。但是，只有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或科学家，当他尽一切可能把自己获得的能力用来传播和加强自己时代的文明，和丑恶进行斗争，并把自己的艺术理想、科学真理、哲学观念和政论意图体现在和时代共命运的作品之中，体现在和自己力量大小完全一致的活动之中，才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谁做得较少，谁出于私心而半途停止，谁为了女祭司的美丽头像，为了观察纤毛虫的乐趣，为了和文学对手进行妄自尊大的争论，而忘掉了大量的应该加以反对的丑恶和愚昧，那他可以随便当个什么东西，优雅的艺术家的呀，出色的科学家呀，卓越的政论家呀，然而，他却自己把自己从历史进步的自觉活动中勾掉了。从道德意义上看，做为一个人，他比一个无才华的、但一生都不倦地向同样无才华的读者反复申述要同丑恶和愚昧作斗争的陈词滥调的小作家更为低下；比一个一知半解的、但始终热情帮助无知的孩子们去理解那些似懂非懂知识的教师更为低下。这些人做到了自己会做和能做的一切；从他们身上不可能再要求更多的东西。如果在几百个读者当中，有

一两个聪明些的、感受能力强些的人，他们能把从小作家那里明白的道理运用于生活之中，那么这就是进步。如果教师的热情哪怕在为数不多的学生中燃起了认真思考的渴望，自修的渴望，追求知识和从事劳动的渴望，那么这也是进步。我不再去说，比起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在自己身上保存着未来进步全部可能性的、进步事业的平凡活动家来，这里提到的先生们——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艺术才华，有多么渊博的学识，在政论界有多高的声望——更是低下得无可比拟。

可能有人会说，我对待艺术和科学的态度是不公允的。一个连艺术家都不能理解的美好作品，终归会增加人类不断增长的财富，且不论艺术的其它作用，人从庸俗状态转到真理和正义领域，大都只能通过这些美好的事物。它能引起注意，增强感受能力，因而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工具，而不管鼓舞艺术家的是什么思想。同样，知识领域的任何一个新的事实，无论它对于当代各种实际问题来说是多么细小，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增加人类思维的财富。只要对自然界的所有物质都按其本来面目进行分类并加以研究，人就有可能从对人类的福利，从对多数人的利害的角度来对这些物质加以分类并进行研究。今天，一个昆虫学家可能由于在他的搜集品中增添了二、三个过去未曾发现的小甲虫而感到高兴，而过些时候一看，对这些小甲虫中的某一只所进行的研究，会给技师一种新的方法来降低有益于健康的食品的价钱，因而也部分地增加了多数人的生活福利。后来，另一只小甲虫则成了某个科学家探索动物形态和功能发展规律的出发点，这些规律也是人类从动物状态发展起来，并且由这种状态必不可免地把许多不幸的经历带到自己历史中的规律，这些规律向人表明，只有为了自己的发展进行斗争，人才能在自己身上除了不可避免的动物性因素之外，培养出能够使他成为进步活动者的另一种因素。今天，一个语言学家兴高

采烈地提出一种古代语言动词变位的特点；明天，这种特点可能把迄今互不相关的几种语言联系起来；后天，通过这种联系可能会弄清许多史前时期的神话；而那时你再看，出现了探究这些神话对基督教义影响的可能性，少数人更加了解了多数人的思想体系，从而更好地找到不断发展进步活动的途径。艺术和科学的产物是进步的工具，这与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情绪和意愿毫不相干，甚至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只要艺术作品是真正艺术的，只要科学家的发现是真正科学的，那它们就是属于进步的。

我并不是想说，艺术和科学不是进步的工具，艺术作品和科学发现作为事实不为进步服务。然而，无可争辩的是地下蕴藏的金属和蚕吐出的丝也是进步的工具，对进步来说也是事实。单纯追求艺术、从来不想一想艺术对人有什么影响的艺术家可以具有巨大的美学力量。他的作品优美；他的影响很大，甚至极其有益。然而，他的力量，就其精神价值来说，肯定不会超过那个把自然铜矿分布于各地，把铁矿置于沼泽和湖泊之中的巨大力量；而关于金属对于人类文明的益处，任何人都不会争辩。美学力量本身根本不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只是在受了优美作品的鼓舞而更接近幸福的人的头脑中，在受了艺术家的作品的影响而变得更为完好、更有感受力、更有教养、更坚强、更积极的人的身上，才成为一种精神的、文明的、进步的力量，而这是不以艺术家为转移的，就同金属只是在那个想出了用它制造第一件有用工具的人的头脑中才变成为文明的力量一样。艺术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与任何一种完全没有人道意义的，强大的物理的或有机的过程完全一样。无论是声音，还是血液循环，都能成为思想、善良愿望、办事决心的来源，然而它并不就是思想、善良和决心。为了使艺术家本人成为文明的力量，他应该自己把人道主义纳入作品之中；他应该在自己身上培育出进步的源泉和实现进步的决心；他应该着手进行充满进步思想的工

作；那时，在创作过程中，他将会毫不勉强地成为一个自觉的历史活动家，因为透过他所追求的美好理想，对真理和正义的要求将对他永远闪耀着光芒。他将不会忘记反对丑恶的斗争，这一斗争对每个人都是必须的，而对于他，他的禀赋越丰厚，也就越加如此。

关于科学家也可以这样说。知识的积累本身丝毫不比蜂房里蜂蜡的积累具有更大的精神意义。但是蜂蜡在养蜂人手中，在技师手中则成为文明的工具。他们非常感激蜜蜂，非常爱护它们；他们知道，没有蜜蜂，就没有蜂蜡。然而，蜜蜂毕竟不是人，不能把蜜蜂称作文明的活动家，蜜蜂由于自身的需要而分泌蜂蜡，这只是进步的材料。收集甲虫的昆虫学家和研究动词变位法的语言学家，如果他们做这些事只是出于自己观赏甲虫搜集或通晓动词变位的乐趣，那他们丝毫不低于——不过也不高于——分泌一团蜂蜡的蜜蜂。如果这团蜂蜡落到技师手上，技师把它变成蜡制药膏，或者落到化学家手上，化学家利用它发现了新的概括性的规律，那么，这团蜂蜡就成了文明的材料；如果它在日光下无益地消融了，那蜜蜂的劳动对进步来说也就白费了。可是，这两种情况都与蜜蜂毫不相干；它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把食物转化为一团蜂蜡，把这团蜂蜡按动物习性放进蜂房，然后就飞去寻找新的食物。与此相似，知识领域的事实变成文明的工具，只能通过两条途径。首先，在那个把事实用于技术或概括性思维的人的头脑中；其次，在这样一些人的头脑中，他得出了科学事实，但不是出于把这个事实当作一团新的蜂蜡加以观赏的乐趣，而是抱着事先预定的目的，把事实作为一种为了某种技术上的应用或进行某种科学或哲学概括的材料。科学和艺术是强大的进步工具，但是我在这封信的开头已经说过，进步只能通过个人实现，只有个人才能成为进步的推动力；而在这方面，艺术家和科学家，作为个人，不管他们多么有才干，有学识，却可能同谁都不会要求具有精神性的无意识的金属或动物一样，不

仅不是进步的有力的推动者，甚至可能完全置身于进步运动之外。另外一些真正的人，可能他们的才干和学识都差些，却能够赋予由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劳动者积累起来的材料以人道意义，不过他们是以自己的观点去赋予这些劳动成果以人道意义的。他们将把这些劳动成果纳入历史进步之中。

我有意地把科学和艺术作为文明最有力的因素加以论述，为的是表明，这些领域本身并不构成进步的过程；无论是才干，还是学识，它们自身还不能把人变成进步的推动者，而才干和学识较差的人，如果他竭尽全力，却能做得更多。我再重复一遍：任何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并决心实现自己思想的人，都可以成为进步的活动家。

第六封信 文化和思想

假设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意识到自己是人类进步的可能的或必然的活动家，试问，为了自己这个认识，为了成为真正的进步的工具，他应该怎样去做呢？

当然他首先应该批判地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学识，对待自己的能力。对于自己学识不足的领域，他应该进行研究或弃之不顾。对于自己力不胜任的事情，在没有积攒足以完成此事的力量以前，最好不去触及它们。这并不是说，因此整个一个活动领域，某个人就不能涉足其间；而是说，当一个人面向某一领域时，他应该明确地提出并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以我所具备的学识和能力，我究竟能在这个领域做些什么？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能合理地给自己提出切合实际的任务。

然而，当个人开始接触某一领域时，他会遇到一些彼此似乎相反的论点。熟悉路易·勃朗关于个人主义和社会性或博爱的著名

观点的读者，可能由于看到我所赋予的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而怀疑这些书信的作者倾向于这位名噪一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所赋予的那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我将不来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字面上的问题。

路易·勃朗说(见《法国革命史》，1847年版第1、9—10页)，“个人主义认为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它使人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权利，而不去想到自己的义务，使人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主张自行其是，而不要任何政府。”接着他又说：个人主义“通过无政府主义导致压制”。关于“博爱”，我们从路易·勃朗那里可以找到的与其说是确定的概念，不如说是响亮的词句，不过在给此原则所规定的“人的事业就是按照上帝所创造的人体的式样，去组织未来的社会”这一意图中可以看出，在博爱原则支配下，个人被勃朗视为社会的一种从属因素，如同个别的无意识的人体器官从属于有意识的我这个个人一样。个人主义，按照路易·勃朗的理解，企图把公共的利益从属于个体的个人私利，如同社会性倾向于以社会的利益吞噬具有自己特点的个人一样。然而个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把社会的利益从属于个人的利益，即他把社会和自己看作是同等现实的，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竞争的两个因素。同样，只有在设想社会不是通过个人，而是通过别的什么东西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社会吞噬个人的情况。然而，这两者都是幻觉。离开个人，社会就不包含任何现实的东西。被清楚地意识到的个人利益，要求个人努力去实现公共的利益，社会的目标只有通过个人才能达到。因此，真正的社会理论所要求的，不是使社会因素从属于个人因素，也不是社会吞噬个人，而是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融合起来。个人应该充分理解，社会的利益也就是他的利益，他应该使自己致力于把真理和正义纳入社会形态之中，因为这

不是什么抽象的愿望，而是他的最符合心意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处在这种高度上的个人主义，会使公共利益在个人努力的推动下得以实现，而公共利益也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社会性将使个人目的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而个人目的也不可能其他环境中实现。

所以，个人的切身任务，如果他是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然而，也许可以设想，进步的这两方面的条件能够各自单独地实现。可以把个人的发展同个人将真理和正义体现在社会形态中这二者从思想上独立开来，同时，也产生不同的思想家会以不同的方式去解决的任务。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是否应该主要致力于自我修养，不顾其周围的社会形态，而以个人完善作为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是在社会形态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限度内去参加社会生活？还是他应该使自己主要致力于从现存的社会形态中为现在和将来培育出尽可能良好的成果，尽管他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形态是极不令人满意的，他的活动也是极其微小的？

这两种做法，如果各自走向极端，都会导致对个人及其活动的曲解。在树立自己的精神理想时，个人永远不能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全部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因此，个人的理想始终将是也应该是远远高于历史现实的，这样在多数情况下，个人也就似乎有理由脱离社会活动。个人越是有学识，越是完善，他就越是不得不这样做，越是不得不带着狂然的嘲讽神态袖手旁观一切都按常规进行，也就是让具有较低精神水平的人去任意处置。这样的自我完善将等于是社会的冷淡主义。其实，这对其自身也将是矛盾的。当个人能够哪怕是部分地救治社会恶事，而他竟然对此漠然置之，这样的人除了似是而非的思想力量，以及烦琐哲学的、毫无用途的、脱离一切现实的一堆响亮的准则或神秘主义的自我提高以外，

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培养出更多的东西。况且如果这个人所生活的环境，能够使他发展到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那么，这种环境就还不是坏到不可救药的；在这种环境中可以成长起第二个、第三个人，只要使他们具有同样的条件，就是说，只要在这个环境中消除那些最束缚人的、令人窒息的形态。在这种环境中，可能出现更好的事物，而如果个人看不到这点，那就说明他没有使自己获得充分的学识，只不过是觉得自己有学识罢了。

然而，如果完全去适应现存的社会形态，就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转向完全把自己从属于这些形态。如果满足于自己活动的越来越少的效果，最终可能会满足于完全没有效果。结果，社会活动家就会降低到登圈的松鼠或是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发表激昂演说的雄辩家那样极不令人称羨的水平。如果把要求在自己的活动中不降低到这样的水平之下的个人品德抛在一边，那么个人不仅不能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而且会使自己没有能力去判断，他给社会带来的究竟是利益还是危害，他生活在社会上作为是一个生产者，还是作为一个寄生者。

上述两方面的要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个人只有通过现实的批判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对现实世界，即对自然界的批判，向人表明自己和别人活动的不可逾越的范围，表明那些若加反对必将陷于荒谬的必然规律。对现实的过去，即对历史的批判，使人充分认识他和其他所有同时代人立足于其上的必然基础，一个容许实行变革的基础，不过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按其本来面目去认识这个基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使人学会把对进步具有独立意愿的人与靠别人思想生活和拥护反动的人区分开来，使人学会区分主要的恶事和次要的恶事，区分今天的问题和可以留待明天解决的问题。对现实的我的批判，可以使人估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并且既不自我贬低也不妄自尊大地确定自己的活动。然而，所有这

些批判不是别的，正是个人自身的发展。同时，如果个人不是最迫切地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疾苦，如果他的批判不仅仅是从事有益活动的发端的话，这些批判就成为不可能或者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只有在自我发展的情况下，在经常检查自己，检查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知识、自己的信念以及自己捍卫这些信念的才能和决心的情况下，社会活动才具有人的意义。能力在活动中受到锻炼并且不断增长；生活的经验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知识不断增加，信念在斗争中逐渐变得牢固，捍卫信念的能力不断增长。意识到自己应该参加社会事业，这已经是引起发展的崇高的开始。个人只有在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下，才能正常地发展，同样，只有在参加社会活动的个人自我发展的情况下，才会有有益的社会活动。

正是这点规定了一个界限，如果个人不愿有损于自己品德的话，在参加社会生活时，他就不能超越这个界限。凡是还有可能提高社会利益的水平并使之欣欣向荣的地方，凡是还有希望把人性纳入生活机制之中，唤起思想，巩固信念，激起对日常丑恶现象的憎恨和厌恶的地方，——凡是在这样的地方，个人就可以而且应该站到社会进步活动家的行列当中。然而，如果他意识到，在他的周围，庸夫俗子们已织成单独的个人无力撕破的帷幕；如果一个人为了事业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那些人却根本不考虑社会的需要而寄生于社会；如果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和卑躬曲节压抑了官吏们对于国家利益的任何考虑；如果在操练和检阅中，由于一致的步调和整齐的队列，军人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一个公民；如果社会的集团，除去个人的仇恨、个人的交谊和极其琐细的利益以外，对其他一切都置若罔闻；如果丑恶现象在社会上有增无已，而懦夫鄙徒对之熟视无睹或屈膝逢迎，——那么，一个理智的、有觉悟的，但无能为力的活动家就只好躲开这个渊藪……如果可能的话。为了制

止哪怕是极小量的社会的丑恶，他的力量也是不够的，(不过)他至少可以不把自己的力量用来承袭或增加丑恶。在社会的愚钝之中，他必将加入我在前一封信中提到过的那些平凡的进步传统保存者的行列。也许会有一天他将有可能参加社会生活。如果这一天永不到来，那他就把真理和正义的传统转交给下一代，这个传统对他来说只不过停留在他未能或不善于将它实现意识领域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单是他没有向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屈服，没有变成丑恶现象的工具这一点，就已经是某种功绩了。另一个具有更好的理解力、更坚强的毅力、更大的能力的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会成为一个积极的活动家，也许会进行斗争，即使不能取胜，至少也可以给别人做出斗争的榜样。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即使在同一时代，同样环境中成长起来，有时也会有人构成例外，他们有本领避开普遍存在的丑恶，对它们持批判态度，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一尘不染。

但是，一旦出现了活动的可能性，一旦在社会中有了斗争和生活的因素，有学识的人就没有权利逃避这个斗争。尽管在泥泞的洼地中找寻道路是多么令人厌烦，可是仍然需要去寻找。尽管在千百个半开化的拥挤的人群中，从一百个人当中发现一、二个能够接受生活召唤的人是多么使人劳累，不过还是必须去发现。可以预料，挫折会是很多的。甚至那些看来能够接受新鲜思想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也往往屈服于懦弱和猥琐的动机，而去追求一块肥肉，或是沉溺于响亮的词句而牺牲事业。许多人落伍了，许多人溜掉了，还有更多的人，有时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由于个人之间的争吵，而放下了旗帜。先进思想以及为了先进思想必须进行坚决斗争的鼓吹者们，当他们在激烈的现实环境中看到了这些思想之后，反而对那些在字面上显得如此美妙、如此温良、如此无害的东西害怕起来，背弃自己的过去，与过去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与过

去的追随者分道扬镳，变成滑稽可笑的、孤独的、爱发牢骚的人，变成平淡的、怯懦的、微不足道的人。也会有因个人利益而背叛自己过去的赤裸裸的厚颜无耻之徒。斗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会起变化，有时，进步保卫者的队伍似乎越来越壮大，越来越不可战胜，但是，可能忽然会发现，这不过是假象，只要击溃二、三个先进的活动家，就足以使那些进步的假卫士们躲藏到各个角落里，背叛或者抛弃旗帜。所有这些，当然都非常令人憎恶，令人愤慨，然而，倘若进步的斗士只是凯旋，那他们的事业也就过于容易了。为了斗争的成功，终究只能在现时历史进程所赋予每个人的环境中进行活动。人们只能用这样的武器即在这个环境中，对目前面临的这种战斗最适用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只有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人，才有权退到一边。如果谁感到或认为自己有能力，当他有某种可能去扩大活动范围的时候，他在道义上就没有权利把自己的能力消耗在细小的个人活动范围内。有学识的人，随着自己学识的增长，应该更多地偿还人类为了他的学识所付出的代价，因此，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选择只有他才能从事的广阔的社会活动范围。

由此产生了使自己弄清下列问题的必要性：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哪些因素是行动的基础，而哪些因素是活动的工具？哪里是多少有些光彩，而实际上已经死亡了的形态，哪里是活生生的力量？

需求决定着有机界的各种发展过程，决定着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它是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也是解释任何历史现象的必然的出发点。凡是意志起作用的地方，在其作用的基础里就存在着需求，因此，历史现象的一切因素都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各种需求。需求是人群所共有的事实，不过，由于不同的个体有着各种不同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结果，需求所引起的欲望也是各不相同的。这里，可以指出两类不

同的需求。

第一类需求是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所共有的，它引起无意识的或微意识的反射活动，引起适应环境的简单技能，发展动物的各种本能，而在人类社会里则引起我们称之为习惯的所有那些行为，所有那些在人的生活中属于传统的东西，所有那些人们只是机械地去做东西。人在这样做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或是很少考虑，为什么他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对于这些做法，他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我习惯这样做”，或是“就该这样做；过去都是这样做的，通常都这样做”等等。我已经说过，这一类生理的和习惯的需求，使各种动物互相接近，在这方面，人和其他脊椎动物或非脊椎动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在非脊椎动物中也有表现这类需求的最令人吃惊的例证，比如在蚂蚁和蜜蜂的社会以及其他与它们相近的动物中。这些需求是社会生活中最牢固的，甚至可以说是最自然主义的因素。它造成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那些经济的和统计学的不变规律，以及国家的自然条件与其文明的相互制约。它引起最初的技术，从而也形成最初的知识；在它的影响下，如同其他动物一样，发生了人们最初的互相接近。渊源于此的社会生活已经是文化的生活，于是，离开需求就难以想象的人，如果离开任何文化，也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了。与昆虫和脊椎动物的其他某些同类一样，人属于文明的动物之列。

随着最初的个性化爱好的出现，第二类更复杂、更多样、不很普遍的需求也进入有机界。这类需求只是以某种程度上的固定形式，在高等脊椎动物中(鸟类和哺乳类)出现的；即使在这些动物中，也仅仅是在某些科、某些属、某些种类的生物中才完全形成，这类需求显现于看来是任意的选择之中，在各种各样的由喜好或厌恶引起的激情之中，这些激情不可能简化为对变化无常的爱好的共同需求，这些爱好，在完全相似的情况下，可以从完全的冷漠态

度转为不可遏制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则可以使个体忘记保全自己,压倒其他一切需求,有时引起完全是疯狂的举动,有时是处心积虑的狡猾行为,在人身上则表现为英雄主义或犯罪行为。这第二类激情上的需求在个人的隐秘生涯中起着广泛的作用,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个人生命的短促使得个人即使处于极有影响的地位,也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留下自己激情的显著痕迹,何况激情因人而异,变化无常,在同时并存的许多个人的各种激情中,这些影响大都互相抵销了。

生理的和习惯的需求可能会把任何文化变为永远不断重复的蜂房或蚁垤的形态。激情上的需求可能会引起个人的悲剧,然而却不能创造历史。历史只有在思维活动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历史还取决于一种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只有在人身上,只有在世世代代的苦难培养了卓越学识的、为数不多的个人集团当中,才能产生。这就是进步的、历史的需求,发展的需求。

最初的技术和最初的利益考虑就已经表现为思维活动,不同社会的文化随着社会思想的发展而变得多种多样。在思维活动的影响下,需求不断增多,爱好不断变化;各种考虑引起一系列排斥直接爱好的相应行动;以激情和热情形式出现的爱好本身,变成了为最好地满足激情而进行的活动的来源。最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思维的批判不是针对直接爱好的满足,而是针对爱好本身。于是,思想便将各种爱好进行比较,把它们按思维批判所具备的优点加以分类。另一方面,思想本身则变成心爱的目的,唤起激情;设法满足这种为了取得思想成果的激情变成一种新的、纯属人类的、最高尚的需求。使思想作为引人入胜的目的,作为未知的真理,作为一种希求的精神财富而日臻完善的过程本身,则变成个人发展的需求。在不断进行批判的情况下,面对作为一般目的的发展,所有的需求和爱好分为好的爱好和坏的爱好的、高尚的需求

和低级的需求，并具有各不相同的前景。产生了不计得失的对真理和正义的需求；创立了科学和艺术的原理。产生了给自己提出生活理想，并且通过精神生活使之体现出来的需求。人逐渐变得能够抵御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需求，完全醉心于思想、观念、生活目的、甚至幻想，为此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而且往往甚至连想也不想去批判它。一旦思维活动在文化的基础上以科学、艺术、精神方面的要求来制约社会生活，文化就转变为文明，人类历史也随之开始。

某一代人的思维活动的成果，并不仅仅是在思想范围内传给下一代的。它们可以转化为生活习惯，转化为社会传统。对于以这种形式获得这些成果的人来说，起源如何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人类来说，最深刻的思想，如果是习惯性地或按照传统不断重复的话，那它比起海狸和蜜蜂的习惯性动作对于所有的海狸和蜜蜂来，并不是更为高级的现象。第一把斧头、第一个烧制陶罐的发明，是原始技术思想的巨大成果，然而，现代人类使用斧头和陶器，就象鸟类结巢那样自然。第一批新教徒避开五光十色的、富丽堂皇的天主教教堂，聚集在自己的传教士周围，在明确意识到的思想的影响下进行活动；而他们今天的大部分后代走进这个教堂去做礼拜，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正是到这类教堂去听同样的布道，正如同鹈雀从迁飞归来时，仍旧落在去年它曾落过的屋顶上一样。甚至在人类思想更高级的领域，也是重复着同样的现象：今天的教师和今天的学生重复着阿基米德关于平衡和杠杆定律的思想、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思想、普鲁斯特关于化学定比定律的思想、亚当·斯密关于供求规律的思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是依据教育传统，就是说，过去这样教，现在也这样教，并且应该这样教，而不是由于从实际出发的、独立的智力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在现阶段必然把人引向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正好得出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答

案。应该设想，海狸把树木放倒，剥去树皮，流运树木并构筑巢穴，这也是由于类似的教育和技术的传统。一般说来，以习惯和传统形式出现的父辈文明的一部分，不过是其后代生活中的动物性文化的因素，对这第二发展阶段的习惯文化，新的一代的思维应该批判地加以研究，以便使社会不致陷于停滞，以便从继承下来的习惯和传统中，识别出那些能够提供在追求真理、美好和正义的道路上进一步开展思维活动可能性的习惯和传统，而把其余那些陈腐的东西抛弃，以便创立一种因思维活动而生气勃勃的，作为新的文化体系的新的文明。

在人类的每一个世代中都重复着这种情况。每一代都从自然界和历史得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习惯和传统的需求和爱好的总和。每一代都以继承下来的社会设施、手工工艺以及陈陈相因的技术来满足这些日常生活的需求和爱好。所有这一切构成这一代的文化，或人类生活中的动物性因素。但是，在从任何一种文明继承下来的习惯中，都包含有批判的习惯，而正是它引起历史的人道因素，引起发展的需求和由这种需求导致的思维活动。对科学的批判可以使世界观包含更多的真理；对道德的批判可以在生活中更广泛地运用科学和正义；对艺术的批判可以更完善地掌握真理和正义，使生活更加和谐，使文化更富于人的优雅。在社会中，在多大程度上文化因素占优势，而思维活动受压制，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蚂蚁和黄蜂的组织，尽管它的文化多么灿烂；这不过是需求和爱好在程度和形式上的差别而已。在社会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强有力的思维活动和对自己文化的批判态度，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更为人道，更独立于低等动物，即使由思维活动，由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所引起的斗争造成了可悲的情景，采用了社会革命或思想革命的武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只有通过暂时的骚动和混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取得对大多数人未来安定和秩序

的更好保证，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当特拉季布尔^①率领雅典逃亡者返回雅典去发动祖国暴动，起来推翻三十个霸主的寡头政治时，他无疑掀起了骚动和混乱。当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和十八世纪的现实主义者发动了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时，他们在学校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在思想界造成了惊人的混乱。当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脱离宗主国时，这显然是一场暴乱。当加里波第率领他的千人红衫志愿军来到西西里岛沿岸时，根本看不到对秩序有丝毫的敬意。当达尔文推翻了物种不变的偶像时，他打乱了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分类，破坏了它们的基础。然而，为了雅典的自由，为了欧洲的新科学，为了北美共和国的政治思想，为了推翻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族，为了对有机界发展的辉煌的总结，付出某些混乱和骚动的代价是值得的。

社会的文化是历史为思维活动提供的媒介物，它必然制约着思维活动在现时代的可能性，其必然性与任何时候自然界的不变规律给思维活动造成的限制一样。思维是使社会文化具有人的美德的唯一活动者。受文化制约的思维的历史，与在思维影响下不断变化的文化的历史相互联系，这就是文明的全部历史。只有那些能够在相互作用中阐明文化和思维历史的事件，才能写进人类的合乎情理的历史中。

需求和爱好由自然界提供或由文化产生，并引起社会形态的出现。把真理和正义纳入社会形态之中，这是思维的任务。自然界赋予社会形态的东西，思维无法加以改变，只需注意就是了。思维不能剥夺人对食物和空气的需求，不能消灭性欲，不能不让小孩和大人一起生存，不能把自己的传播过程改变得使个人不再是它的

^① 雅典的统帅，于公元前411年把雅典从三十个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编者注

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一切由文化带进社会形态的东西，则都应该受到思维的批判。在进行思维活动时，文化应该作为一种历史上产生的媒介物，而不是作为一种不变的规律来加以考虑。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不同时代的文化，那就不难发现，文化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如何地变化不定的。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某种文化统治时代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提供了一个任何人都只能在其中进行活动的环境，任何人都没有可能把自己活动的环境改变成另一个样子。天然的需求和爱好，在思维批判的作用下，应该产生出包含为现有文化状况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真理和正义的社会形态。

这样，我们就面临一项进步的任务：文化应该由思维来加以改造。我们面前就出现一个唯一的、现实的进步活动者：衡量了自己的能力并且确定了自己所能承担的事业的个人。思维只有在个人身上才是现实的。文化只有在社会形态中才是现实的。因此，相对并存的只是具有自己的能力与自己的要求的个人和社会形态。

第七封信 个人和社会形态

假定个人解决了一个极重要的切身问题：他衡量了自己的能力并且确定了自己的事业。

在他面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形态。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即这些形态，就其本质与广度来说，符合于某个个人关于真理和正义的信念。于是，他会怡然自得；他可以在这些形态中进行活动，不必与之斗争，也不会受其压制。他怡然自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谈不上把自己算作进步的活动家。他作为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并不比那些没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有更大的益处。他们都只能在进步的浪潮中随波逐流。他只是对发生的一切理解得比别人更好些罢了。

然而，这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哪里会有一切社会形态都非常适当地满足科学性和正义性要求这样的事呢？如果个人在自己周围看到的都是良善，都是幸福，都是理智，那他可以确信，他对很多事物都没有以批判的态度加以深思熟虑，由于疏忽或由于天生的精神上的近视他对许多事物都没有看清。他缺乏决心或缺乏能力去做一个完全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

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以不可遏制的热情去寻求的不是观赏现存良善的乐趣，而是去寻找良善告终、丑恶开始的界限，这种丑恶是和进步相对抗的力量，或者是庸俗下流和因循守旧。让所有那些没能在自己身上造就个性的人去欣赏美好的人是如何美好，社会生活的各个幽静的角落是如何幽静，生活中欢乐的酒宴是如何欢乐吧。对于这些人，不是作为个性的人，事情就该如此：对他们来说，独立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但是，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则在美好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深处不断搜寻，以便找到在何处这个人不再美好，把这个人的缺点和优点统一起来而予以评价。对某个人满可以指出他的弱点，并且希望他自己能够看到、理解并改正它们。对另一个疲惫的、完全灰心的人，可以给以鼓励，使他往后有新的勇气更快地前进。对第三个迷失了方向的人，可以引导他重新从事原先的活动。对第四个人，当他不能从自己身上拔除那些消耗了他一部分精力的弱点，但把其余的全部精力都用来促进进步时，可以为了他的工作而对其弱点加以宽恕。从第五个人身上可以坚决撕下假面具，并揭露其庸俗或对抗进步的面目。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进行研究，而且正是研究人身上的丑恶，研究他除了有能力，还有什么弱点，更多地是研究他的鄙俗的方面，而不是他那些明显的优点。

同样，批判的思维只能在生活的幽静角落和安谧的隐居之地休息片刻。温顺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优裕的生活和显赫的地位，

无疵的工作和无瑕的良心，渊博的学识和学者的声望，艺术家的公认的才华和作品的优厚的报酬，——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幸福，然而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套结构。在这绚丽多彩的外壳里，在这永不停息的忙碌中，人可能不象一个人，而象一个会推理的蚂蚁那样度过一生，只会一年年、一代代地产生生儿育女的父母、挥霍钱财的资本家、移交事务的官吏、书写论文的学者和满足人们美感的艺术家。

只有当批判以其坚定不移的要求开始破坏生活小天地的恬静和昏昏噩噩的状态时，人造蚁垤才能变为人类社会。忠实的夫妇们，你们果真是真诚地、按照人的方式、自觉地彼此相爱吗？你们果真是不仅仅生儿育女，而且还培养他们吗？幸运的卫士，你真挣得了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地位吗？忠诚的官吏，你可曾真的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劳动？著作众多的学者，你可曾真的推动了科学前进？艺术家，你可曾真的创作了富有现代诗意的作品？所有这些你们乔装打扮生活其中的形态，你们当作圣殿把自己隐蔽起来的形态，你们赖以生并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使之完善的形态，——这些形态本身以及经过你们改造后，果真包含着合理的人道内容吗？为了真理和正义，这些形态果真不应该是另一个样子吗？真的不应该反对它们并使之新生吗？它们果真不是使你们屈服于因循守旧、害怕思维、崇拜狭隘个人主义的偶像吗？果真不应该推倒这些偶像，而代之以真正神圣的东西吗？

然而，在这里，我感到反对意见会从各方面纷至沓来。怎么！个人！单独的、微不足道的、软弱无力的个人居然想批判地对待由各族人民的历史、由人类的历史形成的社会形态！个人居然认为自己有权利并且有能力把社会上其他人们认为神圣的东西当作偶像来打倒！这是犯罪的，因为在大众面前，个人是无权的。这是有害的，因为对社会形态感到满意的大众的安宁要比把社会形态

当作丑恶而加以否定的个人的痛苦更重要。这是无意义的，因为造成当前社会形态的几代人的总和要比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更聪明。这是狂妄的，因为在社会及其历史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让我们逐条地来分析一下这些反对意见。

首先，谈谈权利。要么是没有进步，要么是进步就是把虚伪与非正义的意识体现到社会形态之中。我认为真理和正义应该具有另外一些形态，而不应是现有的这些形态，我在现存事物中指出虚伪和非正义，并且想去反对这些被认识到的虚伪和非正义。哪里有否定我有权这样做的权利？是在活着的个人当中吗？那就让他们向我证明我错了；让他们同我辩论；让他们同我斗争；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不否认这个权利；不过我也有权向他们证明他们错了，我也有权同他们辩论和斗争。是在整个社会当中吗？然而，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我这个现实的有生命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抽象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权利；而按实际内容来看，它分解为并不比我具有更多权利的个人。是在历史当中吗？然而，历史的全部实际内容仍然在于个人的活动。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死去，而对于我这个活人，死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另一些人还活着，但他们的权利和我一样多。总之，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我为真理和正义进行斗争的权利，如果不是由于从我的活动中可能会产生什么害处，由于面对社会的历史的理智而不相信我自己的理智，由于面对有组织的社会的巨大力量而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原因，我自己剥夺了自己这个权利。在第一点上，个人已经获胜；还剩下三点。

如果我向社会指出它的形态中的虚伪和非正义，并且努力去实现真理和正义，由此会产生什么害处呢？如果我讲了，但是没有人听；如果我做了，但是毫无成效；那么，受痛苦的只是我。如果有人听从我，社会安排得有了更多的真理和正义，那么，这将不是

害处，而是益处，因为社会形态中的真理和正义是个人最大欢乐的条件，是把欢乐推广到最大数量的个人中去的条件。当然，如果一部分人听从我，拥护我，而另一部分人反对我，那就会引起斗争，会暂时搅乱所有享受到社会制度好处的事物的平静。一些人将会感到不高兴，因为在他们心中现在经常会出现一种意识，即他们是由于不公正的社会形态才得到欢乐的。另一些人将会感到不高兴，因为他们将会受到他们敌人的搅扰，而更多地将会受到担心他们的幸福即将消逝的恐惧心理的搅扰。我不否认，这对于所有享受目前文明好处的人来说，是一种不愉快的境遇。然而，能够把这些说成是绝对有害的吗？恐怕未必。在前一封信中我已经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有时从给既经形成的生活带来的某些混乱中，可以产生出多么有益的结果。我在第三封信和第四封信中已经讲过，截至目前为止，只有为数极少的少数人享受着进步的好处；为了少数人的发展，付出了数不胜数的代价；只有努力在社会中传播真理，体现更多的正义，才能偿还这个代价。果真如此，那么，为实现真理和正义的斗争就不仅没有什么害处，而且是使目前文明巩固起来的唯一途径。在一切时代，多数人都遭受苦难，因此，在人类中，苦难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只是应该力求使苦难尽可能不要对历史无益，可是，有什么苦难能比那些导致实现真理和正义的苦难更为有益的呢？首先，如果享受目前文明好处的幸运者只以某些痛苦来偿还这种享受的话，那他们连一小部分为了他们而遭受苦难的几百万先辈们所付出的代价也偿还不了。其次，如果计算害处的话，那就不应忘记，历史不会在现存的一代终结，在这一代之后还有后代，由某一行动造成的害处的绝对数量，要由这个行动给整个未来造成祸害增长的总数来衡量。如果我得以做到把更多的真理和正义体现在社会形态之中，那么对于以后许多代的人来说，他们将能享受到带给生活的一部分好处，因而祸害的数量将会减少。如

果我不这样做，他们的苦难将会增加，而在当代社会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享受当代社会制度好处的少数人当中，痛苦会少一些。但实际上，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社会上真理和正义越少，某些人的苦难就越大，另一些人的品德也就越低下。这样，一方面，肯定会给多少代人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对现时的一代人的好处则是可疑的，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解决问题？烦恼究竟是怎么回事？假使一些人弄清了，昨天对他们来说还是真理的形态，实际上并不是真理，一个有学识的人不应该以它为满足。难道认识错误的烦恼是坏事？假使人造蚁垤向着人类社会迈进了一步。难道使人人化是坏事？

因此，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益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所讲的是真正的真理和正义，并且斗争有成功的希望。只有当我怀疑我对真理和正义的观点，或是确信自己没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信念时，我才承认斗争的害处，并因此而剥夺自己斗争的权利。——一个人已经赢了两点；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让我们来看看，在多大程度上个人反对社会形态的斗争可以被认为是无意义的。

批判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智力的个人，充实了自己在某个领域的知识，把自己的思想集中于这个领域，并且得出了一定的信念。这个信念结果却同历史形成的形态不一致。于是就有人向这个人说：屈服吧，因为民族的精神、人类的经验、历史的理智都反对你。对个人来说，有没有充分的理由在这些论据的基础上放弃自己的信念，把它看成是无意义的呢？

什么是民族精神？是身体特点使生活在某种环境影响下的许多代人具有必然的民族的自然基础吗？在这许多代人中，历史上曾生存过的、为数不多的少数人为他们创立了文化，这种文化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扩展到人民的不同阶层，成为人民各式

各样的习惯，各式各样的传统。时而出现在一些可能对少数人产生影响、并通过他们对多数人产生影响的个人。这些个人把新的思想纳入原有的文化形态之中，或者为了另一种文化而变更某些文化形态，有时在新思想的基础上实行这些变更。在历史上的每个时刻，在自己的生活中，人民都是三种因素的产物：自然必需的因素，历史习惯的因素，个人思考的因素。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构成民族精神。其中只有受身体和气候所制约的东西是必然的。其余一切则是在一些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下不断变化的习惯。如果个人很少进行思考，很少采取行动，那么，在许多代人的漫长岁月中，习惯也不会改变；文化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文明越来越陷于停滞；民族精神越来越具有固定的形态，几乎可以被描绘成与动物的习性一样。如果个人是积极活动的，他们的思想不局限在少数人狭小的圈子里，而是力求深入到多数人当中，那么习惯就不致定形；文化在少数人中很快就发生变化，并慢慢地传播给大多数人；文明至多会有不稳固的危险，却不会僵化。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民族精神是极其困难的，而多数谈论民族精神的作家们会彼此互不了解。社会上，在自然必需的共同基础上，文化在少数人中迅速变化、在多数人慢慢传播的结果，必然会存在几种历史的、习惯的文化层。作家们就依据自己的学识，把民族精神归结到某一个他最喜爱的文化层，并把某个标准时代看作是人民的真正历史。

请问一下法国人：体现了真正民族精神的标准法兰西在哪里？在所有合法的、选举的、强力攫取的君主政体倾覆之后，在霸权专制可耻地垮台之后，在经历被淹没在血泊中或被它的官方庇护人出卖了的共和政体的无数经验之后，在文学中、在社会上、在目前的独裁议院里，你们可以找到所有党派的代表，他们将会证明，真正的法兰西以及它的民族精神，正是体现在他们拥护其传统的

那个时期的历史中。某个人会举出古代政体和路易十四，还有他的虔诚的天主教以及他的拉辛们和鲍哇洛们；另一个人会举出一七八九年的它的《人权宣言》；第三个人会举出罗伯斯比尔或巴贝夫，第四个人会举出小军士^①；第五个人会举出路易·菲力浦统治下的轰动一时的议会制时代；第六个人会举出在第二帝国庇护下的“安宁、富足、光荣”的时代而不以为耻；还会有人愿意回到圣·路易和宗教裁判所的时代。所有这些人都会提出理由说，这就是体现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精神的时代。

请问一下我们的同胞：真正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在哪里？有人举出伊万雷帝统治下的莫斯科，以及《百章决议》和《治家格言》；有人举出诺夫哥罗德的召集市民会议的大钟；有人举出弗拉基米尔的可爱的红太阳，神奇的斯维亚托戈尔^②；不然就会列举彼得大帝、叶卡特林娜二世、斯彼兰斯基和他的改革。有人提到1854年，有人提到1861年，有人提到1863年，甚至有人提到1889年。^③他们所有人都将争辩，所有人都想证明，真正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正是在这儿被嗅到，被识破，在神话、风尚、指令或言论中体现出来。他们当中谁是正确的呢？俄罗斯民族精神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的呢？是在史前时期的斯拉夫人习俗的基础上吗？是在拜占庭文化层的基础上吗？或许是在彼得大帝文明和官僚制度的基础上？或许这种精神，在保存自己面貌的同时能够不断吸取并且一定会不断吸取新的因素？——如果有人不这样想，那么，既然意见纷纭，就请允许别人这样想，并且按照这个信念去行动。请允许别人认为，民族精神比公牛或猎狗这些动物在某种程度上

① 指拿破仑，因他个子矮小，最初当过军士。——编者注

② 俄国民间壮士歌中的英雄，具有非凡的力气。——编者注

③ 1854年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开始失败；1861年农奴解放；1863年波兰起义；1889年颁布了关于地方长官的法令，加强了贵族在农村中的地位。——编者注

具有更广泛的可能性去消化新的因素。在对民族精神，或者更确切些说，在对该民族最富有真理和正义的东西，存在着数不胜数的各种不同理解的情况下，请允许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说出并实现自己关于真理和正义的见解，希望这个见解能够作为一个因素被吸收到民族精神中去，如同过去大批的力量被吸收进去一样。为什么《治家格言》的作者比我有更大的权利来表现民族精神呢？为什么一纸命令能把新的、活生生的因素纳入民族精神，而别的东西却不能呢？

能够对此做出判断的只有对历史的批判，对民族精神的批判，对真理的批判，对正义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只有通过个人进行，也只有通过个人才能进行。正是为了民族精神，不过不是动物式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人类的、不断发展的民族精神，个人应该对它进行批判，应该分辨其中哪些东西是自然必需的，当前的各种文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不能变更的，在这些因素中又有哪些东西是应该从更确切的真理和更广泛的正义的观点出发加以改造的。某一时代的民族精神，就是这个时代那些了解人民的历史并且愿意使人民的现在具有尽可能多的真理和正义的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的精神。同样，人类的经验也无非是这些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和强烈愿望的个人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

至于历史的理智，如果这种理智超出下面的公式，即：多数人总是屈服于必然性，少数人总是追求享受，为数不多的个人则想理解并实现真理和正义，那么理智只不过是一些空话，空想家的幻想，吓唬胆小鬼的东西。清楚地了解过去并且强烈追求真理的个人，按其本质来说，才是真正人类经验的理所当然的鉴别者，才是真正历史理智的理所当然的解释者。

因此，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对过去有清楚的了解，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那他就不能也不该因历史形成的社会形态而放弃

自己得出的信念，因为理智、利益、权利在他这方面。他只应该为了即将来临的斗争衡量自己的能力，不白白地消耗自己的能力，并尽可能地增加它们；应该估计可能达到的目标，好好考虑自己的行动，然后下定决心。这样，只剩下最后一点了。

个人反对被习惯、传统、法律、社会组织、体力、道德光环防护起来的社会形态的斗争，据说是狂妄的。个人反对一群紧密团结的人，而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也和这个单独的、进行斗争的个人一样有力量，这个个人能够做出什么来呢？

然而，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呢？谁推动它的呢？是一些单独的、进行斗争的个人。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他们形成了并且肯定会形成一种力量。可见，第四点要求作出更为复杂的答案。在社会形态面前，个人确实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个人反对社会形态的斗争，只有在个人不能形成一种力量的时候，才是狂妄的。历史证明，这是可能的，甚至这是历史上实现进步的唯一途径。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并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力量单薄的个人是怎样变成社会力量的？

第八封信 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

“单人不成伍”，——一个古老的谚语这样说。带着对社会形态的批判，怀着把正义体现在社会形态中的愿望，个人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个体，面对社会确实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样的个人却成了一种力量，成了社会的推动者，创造了历史。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如果所说的这个活动家是一个真正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那他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他对社会形态的批判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比别人更清楚、更深刻地理解

这些形态的缺点，懂得现时在这些形态中缺乏正义。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有许许多多的个人会在这些形态的重压下受难和怨恨、辗转不安和逐渐死亡。只是他们这些缺乏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不理解为什么这对他们是如此不好。可是，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了，那他们是能够理解的，并且那些能够理解的人，可以和首先讲出这个思想的人理解得一样好，甚至理解得更好，因为他们或许在饱经忧患之后，对这个思想的正确性的认识，要比它的第一个宣告者更充分、更全面得多。所以，为了不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反对社会形态斗争的发难者只是应该把自己的思想讲得使别人能明白：如果思想是正确的，他就不会孤立。他在那些思想最敏锐、最富有接受能力的人中间，会有许多同志，志同道合者。他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分散的，彼此互不相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压迫他们的恶事面前是孤单的、无能为力的；当他们懂得为什么他们会受恶事压迫的道理时，他们可能变得更加不幸。然而，他们所在皆是，而且思想越正确、越公正，他们的人数也就越多。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一种还没有表现为行动的力量，然而，这已经是一种力量。

为了使力量的作用显示出来，需要榜样。为了使个人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应该让他知道，存在着另一个人，这个人不仅了解自己是如何地痛苦和为什么如此痛苦，而且还为反对这些恶事而进行活动。需要的不仅仅是言论，需要的是行动。需要坚毅的、热情的人，他们敢于冒一切风险，准备牺牲一切。需要殉道者，他们的传奇故事要远远超出他们真正的品德和他们实际的功绩。人们把他们并不具备的毅力加在他们身上。人们借他们之口讲出他们的后代才能达到的最美好的思想，最美好的情感。他们在群众面前将成为不可企及的、难以想象的理想人物。可是，他们的传奇故事将以斗争所需要的坚毅精神鼓舞成千上万的人。从未讲过的话将被不断地重复。起初似懂非懂，后来理解得越来越好，一种从未

鼓舞过奇异的、理想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作为似乎是这个人物的启示，体现在后代的事业中。牺牲者的多寡是无关紧要的。传奇故事总是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增多。而社会形态的保守分子，正如历史证明的那样，总是以可嘉的自我牺牲精神迫使足够数量的被毁灭的斗士向普通老百姓叩拜，结果就使某种社会形态的反对派可能制订出一长串蒙难英雄的名单。在斗争的这个阶段，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已经有了真正的力量，不过还不是一种协调一致的力量。这种力量大部分都白白地消耗在一些最先引起注意的无谓琐事上。人们由于丑事的出现而死亡，而丑事的实质却原封未动。苦难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增加，因为随着斗争的加剧，敌人也更加凶狠了。在斗士自身中间开始出现分歧、瓦解，因为他们越是激烈地斗争，他们彼此也就越加歧视。尽管活动家们付出了全部精力，做出了一切牺牲，效果仍然不大。力量表现出来了，不过被白白浪费掉了。然而，这已经是一种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力量。

为了使力量不致白白浪费掉，应该把它们组织起来。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和具有强烈愿望的个人，应当不仅希望斗争，而且希望胜利；为此就必须不仅知道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知道能够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斗争是严肃的，那么，在反对陈腐的社会形态的斗士中，就不会都是一些为了自己的苦难，而且只是听了别人的言论和靠了别人的思想才了解这种苦难而进行斗争的个人。在斗士中间，还会有对整个情况都批判地加以考虑的个人。这些人势必要彼此寻求，他们势必要联合起来，以使这种刚产生的历史力量中的不协调因素成为协调一致。于是，力量组织起来了；它的作用可以集中到某一点，集中到某一个目的；现在它的问题纯粹是属于技术方面的：耗费最少的力量去完成最多的工作。无意识地受苦和幻想的时期过去了；英勇的活动家和狂热的蒙难者的时期，不计成效地耗费力量和无谓牺牲的时期过去了。一个安详的、自觉的工作者，

有计划的冲击，周密的思考和始终不渝的、坚持不懈的活动的时期开始了。

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苦难在个体中引起思想；思想被表述出来和传播开来；苦难变成为自觉的；到处都有更为坚强的个人冲杀出来；苦行者出现了；他们的牺牲增强了毅力；他们的毅力加强了斗争；所有这一切，就象任何自然现象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按照必然的顺序发生。没有一个时代不是在较大或较小的规模上发生这样的现象，而有时，这种现象可以达到极其广泛的传播程度。然而，在所有那些为了真理和正义而同陈腐形态作斗争的党派中，获胜者却寥寥无几。其余的灭亡了、瓦解了或者僵化了；当新的时代引起了新的冲突，组织了新的党派，而原有那些党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时，它们也就消失了。这些党派未能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它们自然而然地通过了前两个阶段之后，不善于为自己开创第三个阶段，因为第三个阶段不会自行创立。对于第三个阶段，必须周密地考虑它的每个细节：原因和后果，目的和手段。对第三个阶段应该渴求，坚定地渴求，尽管个人会遇到无数的烦恼，尽管要进行使人疲劳的、单调枯燥的工作，而这种工作在多数情况下又是不显眼的、不被重视的。对第三个阶段应该做好准备，全力加以保持和维护，坚忍不拔地承受一切挫折，利用每个机会，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件事。这是一个经过周密思考的阶段，一个人工创建的阶段，也是一个最好能尽快度过的阶段，因为在整个这个阶段中，各个党派在极大程度上都会遭到威胁着一切生命的危险，我们在讲到文明的进步时，曾提到过这些危险：由于联系不巩固而瓦解的危险；由于片面的意图造成停滞而陷于僵化的危险。在这个阶段，这些危险对于党派之所以最为严重，正是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政党才具有有机体的生命力；所有不同种类的器官都被用来从事一种活动。瓦解和僵化只能威胁有机体

的生存。在此以前，个人曾听从各种爱好的支配，而爱好是牢固的，因为它们直接从各种情况中产生。现在，个人必须听从思想的支配，而思想只有在它极其明确时，才是牢固的，然而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爱好却又总是妨碍思想的明确。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阶段的主要困难究竟在哪里？因为只有战胜这些困难，个人才能在争取真理和正义的斗争中成为社会上真正有机的力量。

为了组成一个政党而必须聚集起来的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由于他们比别人更有能力和更有毅力，就已经具有更为鲜明的个性。他们培养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难于赞成别人的观点和受别人观点的支配。他们培养了独立活动的精神，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难于强迫自己不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进行活动。他们比其他人更善于在社会的因循守旧的环境中，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因此，他们最适宜于单独进行活动。然而，正是这些独立思考、独立活动、习惯于精神上独处的人，现在必须聚集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思想，共同行动，组成某种强大的、统一的，然而是以集体力量而强大、以思想一致而统一的整体；而他们的个性，他们所备加爱护使其免受因循守旧的影响的个性，他们如此习惯、如此珍视的个性，则必须消失于共同的思想潮流之中，消失于共同的行动计划之中。他们创建了一个有机体，而自己则在这个有机体中降到某个器官的地位。他们是自愿如此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颇为难堪的。在这些具有坚强毅力的人中间，经常存在着发生分裂、产生分歧的危险。不过，现在与前一阶段相比，分歧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那时，个人的行动占优势，处于以榜样和个人毅力进行宣传的时期，把精力消耗在什么上，这不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有毅力，只要有能使之具有崇高声望、能以其名义和榜样去鼓舞人们投入新的事业的英雄人物就行。两个把力量消耗在相互间无谓斗争的敌人，可能象伏尔泰和卢梭那样，并

排立于先贤祠中。但是现在，瓦解就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放弃共同事业的胜利，放弃政党的未来。于是，独立的个人，怀着放弃一部分自己熟悉的观点和一部分自己习惯的活动的坚强意愿，聚集在一起，只要自己那些最亲切、最深刻的信念能够在将来获得胜利。他们思想的全部力量又都用来批判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活动，甚至不是为了弄清，这样做是否真的合乎正义和真理，而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做是否真的同我的愿望、我的信念的实质如此密不可分，以致如果我不愿有损于自己的品德，如果我不想牺牲我所珍爱的一切，我就不能放弃这部分观点和活动；即使事情关系到我的思想能否获胜，我也不能放弃，因为，否则的话，只会是我的思想在名义上的胜利，而在此名义下则隐藏着如此庸俗的东西，如此被歪曲了的东西，以致我在其中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只有完全弄清，退让到什么地方为止，对事业的背叛在哪里开始，为了这个共同事业而聚集起来的个人，才能组成坚强有力的政党。如果他们持有决不放弃任何东西的想法，那他们就根本没有必要聚集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事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很乐意把别人变为自己这套思想的工具，这套思想是在他自身形成的，具有完整的形式以及在信念和习惯方面一切实质性的和偶然性的因素。可是，这种为了彼此把对方变为精神奴隶的聚集不是组织政党，而是企图把一切变为实现某一个人的动机和目的的机械。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见解中分清实质性的和习惯性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抱着为了实质性见解的利益，抛弃那些哪怕是非常可贵的习惯性见解的决心参加联盟；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看成共同机体的一个器官；他不是无生命的工具，不是无思想的机械，然而仍旧只是一个器官；它有自己的结构，自己的机能，然而它从属于统一的整体。这是有机体生存的条件，并且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是一致行动的条件，取得胜利的条件。

但是，如果说分歧是毁灭性的，如果说在习惯方面的让步是必要的，如果说个人应该服从共同的事业，那么，在实质方面的让步也同样是毁灭性的；活动家同样必须始终是具有思想的个人，而不变成别人思想的机器。谁在自己信念的实质方面做了让步，谁就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信念。他为之服务的不是他理解了的、经过思考的、自己向往的事业，而是毫无意义的空话，空洞的言词。当然，没有牢固的联盟，没有一致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当然，任何一个斗士都希望胜利。但是，胜利本身不能成为善于思考的人的目的。应该使胜利具有某种内在的意义。重要的不是谁胜利了，重要的是什么胜利了。重要的是获得胜利的思想。而如果思想由于让步而失去了自己的全部内容，那么，政党就失去了意义，政党就没有什么事业可言，争论就只关系到谁占优势。那样的话，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人组成的政党，就会同它所反对的社会制度的因循守旧分子毫无区别。在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字样，过去曾经标志真理和正义，而现在则无所标志。他们还会千百次地重复这些响亮的词句。那些把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生命都纳入这些词句的青年还会信任他们。但这些青年将会不再信任自己的领导者，将会抛弃自己的旗帜。叛逆者将会蹂躏昨日的圣物。反动派将会嘲笑被举旗的人自己玷污了的旗帜。伟大的、不朽的词句将期待新的人还它以原意，将它实现。为胜利而作出一切牺牲的旧政党也许不会取胜，而很可能会在自己无谓的停滞中陷于僵化。

因此，为了胜利，必须组织政党；不过，为了使政党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体，器官受整体支配和器官自身的生命力是同样必要的。政党由具有思想和信念的、坚毅的盟员组成；他们清楚地懂得，他们为何聚集在一起，他们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信念；他们下定决心，为了这些信念的胜利而全力以赴。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

他们才有希望避免威胁他们的两种危险：不瓦解，也不陷于停滞。

我们假定这些条件都已具备。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和强烈愿望的个人联合起来了，并且组成了政党。但是，从这类组织赖以产生的条件本身已经十分清楚，完全合乎政党组织者必备条件的人，即使在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当中，也将是极为稀少的。然而他们，第一，在这些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当中有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那些虽然没有达到批判思维的高度，但饱受那种正是组织政党所要消除的社会混乱的苦难的群众当中有必然的同盟者。

先来谈谈第一类人。如上所述，这是一些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一些知识分子，不过在这里，他们还缺少成为强大政党组织者的某种东西。其中有些人，尽管有着非常健全的思想，却想不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胜利，因此停留在前一阶段单枪匹马的英勇斗士的观点上。另一些人虽然想到了这点，但没有决心为了共同事业而牺牲个人的自尊和他们所习惯的活动方式。第三种人不善于区分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相反，第四种人，出于对胜利的热切愿望，却准备完全屈从，牺牲本质的东西，变成机械的工具，并且指责那些不能这样做的人。还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人。很清楚，组织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政党的人，在人数甚少情况下，首先应该利用一切分散在自己周围并且能够参加组织的人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里，重要的与其说是数量，不如说是参加者的作用，是他们的独立思想和坚强意志。特别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成为独立的、坚毅的中心的人把新的有机体的生命力不断传向四方。因此，特别重要的是那些还没有参加运动的前三种人。应该向第一种人说明事业的实际意义；向第三种人讲清事业的理论实质；而对第二种人，就应该把他们吸收到事业中来。他们所有的人在将来都可能

成为极为有益的活动家；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可能的同盟者，如果从共同利益出发，就应该这样去看待他们。对于已经加入了组织和以后可能加入组织的分子，正在组织的政党就应该从这个观点出发去进行活动。

但是，社会的政党不是关在书斋里的学者的党。它以具体的方式为真理和正义而进行斗争。它注意的是社会上存在的某种恶事。如果这真是恶事，那么，很多人会因此而遭受苦难，这些人感到这种恶事的重压，但是既不懂得造成恶事的原因，也不懂得同它做斗争的方法。这些人就是我在前面讲到的那些决定着进步可能性的平凡的英雄们。这些人就是组织政党的现实基础。政党能够组织起来，确是因为它知道存在着大量的个人，他们一定会愿意接受它提出的要求，一定会向它伸出双手，因为他们就是由于它所反对的恶事而受苦的。很可能，这些受苦的群众，美好未来的平凡的维护者们，不能马上认清自己的拥护者，对这些人怀有戒心，不能认识到，在已经形成的批判思维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的斗争，正是他们自己在模糊的趋向和信仰的基础上本能地要求进行的斗争。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政党毕竟将由于同这些社会力量的联合而组织起来，这种联合迟早必然会实现。起初没有被认清、没有被理解的、为争取美好未来而斗争的拥护者们，在自己的一切言论和一切行动中，必须时刻注意到这些不仅是可能的同盟者，而且是必然的同盟者。

这样，政党组织起来了。它的核心是为数不多的经过锻炼的、深思熟虑的、具有坚强毅力的和把批判思维与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的人。在他们周围，是受过较少锻炼的知识分子。而政党的现实基础则在必然的同盟者之中，在那些遭受正是组织政党所要反对的恶事的苦难的社会集团中。在个人见解中已经形成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决定着党内行动的自由，也决定着党外

活动可以容忍的限度。无论成员们在被公认为非本质的各点上有多大分歧，他们仍然是它的有用的或未来必然的盟员。党的所有成员，正式的或可能的，都受党的保护。每个参加党的机体的善于思考的人，都不仅是现在已经属于本党的人的当然辩护人，而且是明天可能入党的人的当然辩护人。辩护人不应歪曲被辩护人的事实，他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确实为了被辩护人的利益说话，而闭口不谈一切可能损害他的东西。这样做并不是撒谎，因为敌对的政党也有自己的辩护人，他们不会也不应宽容自己的敌人。明显地歪曲真相的辩护人，只会以此危害自己的旗帜，损害自己作为一个明智而真诚的辩护人的声望。但是如果辩护人给敌人提供有力的论据，那他就根本不是辩护人。党的成员之间的相互辩护，这是政党的最有力的联系，是对敌人最有效的对抗；对于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来说，这也是吸引还没有入党的人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正如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目的构成党的内在力量一样，相互辩护乃是党的外在力量。

在非本质性问题的界限以外，党的成员就不再有行动的自由，党对党外的人就不再予以容忍。党的成员中有谁超越了这个界限，他就不再是它的成员，而是它的敌人。党外的个人中有谁在实质性问题同党有分歧，他也是党的敌人。党经常集中也必须集中自己组织的一切力量，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来反对这些敌人，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斗争，集中打击敌人。每个党员都是自己正式的和可能的成员的当然辩护人；同样，他也是对于一切公认的敌人的当然检察官。这里也同样要求不歪曲真相，因为这决不是一个真诚的检察官应做的事。需要注意敌人的真正的过失，并且将一切指控的情节公之于众。辩护人要做的事，就是为被告人申辩。正如辩护人的明显偏袒的申辩会起到与他的愿望相反的作用一样，过于琐碎的控告同样会在细心的公众眼中对被告人有利，而有损

于原告人的声望。然而，把敌人的错误轻易放过，给他们提供隐瞒自己过失的手段，这与党员的任务也是不相容的。细心地、始终不渝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这是政党的生命力的表现，正如思想的统一是这种生命力的基础，而党的成员之间的相互辩护是党的联系一样。

社会力量就是这样壮大起来的，它从起初孤立的、力量单薄的个人过渡到其他个人的赞助，然后，在没有组成一个政党使斗争具有一定方向和统一性以前，又过渡到这些人尚不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当然在这里，这个政党会与其他政党相遇，能否取胜的问题就成为一个人数和措施的问题。哪里有更多的力量？哪里有更聪明的、理解能力更好的、更坚毅的、更灵巧的个人？哪个政党组织得更好？哪个政党能够更好地利用各种机会，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人并战胜敌人？在这里，已经是在组织起来的力量之间进行斗争，历史的兴趣已集中在它们旗帜上写着的各项原则。

读者会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些我们早都知道。

如果这些你们都知道，那很好。在历史上根本找不到什么轶事奇闻，不过历史可以弄清，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如何。个人反对社会形态的斗争和社会上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如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组织一样古老。我只希望读者注意到这样一些关于力量单薄的个人同社会形态的巨大力量进行斗争的条件，关于对文化习惯与传统进行思维工作的条件，关于进步的政党取得胜利的条件，关于文明要得到生气勃勃发展的条件的老生常谈而已。如果个人在自身培养了批判思维的能力，他就从而获得了成为进步活动家的权利，获得了同陈腐的社会形态进行斗争的权利。这种斗争是有益的、理智的。不过个人仍然仅仅是可能的进步活动家。只有当他们能够进行斗争，能够从微不足道的个体变为集体的力量并代表一种思想时，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进步活动家。为

此只有一条道路，无可辩驳的历史见证将指明这条道路。

第九封信 社会各党派的旗帜

在上面几封信里，我陈述了我对下列各点的意见，即一切社会进步必然依赖个人的活动；只有他们才能使文明得到巩固并使之免于停滞；他们有权利并且有可能批判地对待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态；争取新事物反对旧事物，争取新生事物反对陈腐事物的斗争，必然导致在各种思想旗帜下的各种党派的建立，必然导致这些党派为了实现各自的思想而发生冲突。

但是，在各个党派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判明：谁是为过时的、陈腐的事物而斗争，谁在维护生气勃勃的、新生的事物？看起来问题可能很奇怪，因为在实际上，看来非常容易区分，人们宣传的是两年、三年、四年前，二十年前，一百年前流行的思想，还是在前一时期会加以嘲讽、对之恐惧或感到憎恶的最新的思想。最新的、最时髦的思想，权威性的杂志上的最新论文，受人爱戴的宣传家的最新言论，——这就是生气勃勃的、新生的东西。一个政党，不管是自觉地还是被迫地，如果它的拥护者越来越少，那它就是一个反动的政党。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所有最迟钝的、一贯盲从的人都遵循这个方法；所有那些毫无信念、具有惊人的看风使舵本领的夸夸其谈者都遵循这个方法。成功的可能性，参加某个政党的人在社会盛筵上分尝一杯羹的可能性，——这就是他们称之为渴望前进、追随时代的東西。如果他们是对的，那进步这个词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历史就会成为类似气象图表那样的东西，表上可以标出雨天、晴天，刮西南风还是东北风，不过要想从上面弄清比统计数字表格更多的东西，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写我现在写的这些书信，因为我对社会气象

学,和对自然气象学一样,根本不感兴趣。只有在极少情况下,在极少的国家里,阴雨和干旱才是一种普遍的、一贯的现象。我们生活在气候多变的地带,根据昨天和前天的风向,预言明天的风向,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苦于气候的多变,然而弄不清原因。如果你们愿意并且有可能的话,那就请准备好套鞋和雨伞,准备好厚实的衣服和门窗紧闭的房屋,但是你们未必会去研究今天下的这场雨和上星期四下的那场雨有什么联系。从我们知识的现状来看,无论在自然气象学方面,还是在政治气象学方面,这样做都会是一种劳而无功的工作。科学不过是为那些最易遭到危险的人设置气象站,只不过在几小时之前向他们预报暴风雨即将来临。

遗憾的是,我不能设想用上面所讲的那种简便的方法来区分进步分子和反动分子。在第三封信的开头,我提出了进步的各种要求,为了前后一致,我应该假定这些要求也决定着各党派之间的区别。被战败的政党可能是进步的政党。十年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写成的但很少为人知晓的书籍,可能比杂志上的最新文章包含更多的生动的历史原理。昨天时髦的东西,可能比今天时髦的东西更能被未来的思想最敏锐的人使之焕发出光彩。是的,你可以相信,我认为我们1861年的杂志,比1867年以至1890年的杂志更好。我觉得康德胜过谢林,伏尔泰胜过库辛,我认为卢契亚奴斯要比卡特科夫^①具有更多的生气勃勃的进步因素。这肯定会引起某些自诩为始终站在最时髦的潮流水平上的进步人士的愤慨。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把“潮流游戏”视为儿童嬉戏的终生稳重的活动家们的轻蔑嘲笑。这也可能使那些〈治家格言〉和拜占庭的头脑迟钝的崇拜者感到高兴,他们会以为,这样一来,连他们也可以算作是真正的

^① 卡特科夫,米·尼·(Катков, 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1818—1887)是俄国维护专制制度的政论家。——编者注

进步分子了。就让所有这些人去愤慨、去嘲笑、去高兴吧。

假定进步正是在于个人的发展，在于把真理和正义体现在社会形态之中，那么，要解决上面提出的关于进步的和反动的政党的特点这个问题，就要困难得多，因为外部的独特的标志，对它们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呜呼！事情确实如此。在人类文明的词汇中，没有这样一个词可以绝对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写在进步派的旗帜上或者写在反动派的旗帜上。在多数情况下被最优秀的善于思考的人看作是最能使社会富有生机的源泉的最伟大的思想，在历史的某些时期，曾被一些阻碍人类发展的党派作为吸收党员的诱饵。最反动的东西，在某些时代，则成了进步的工具。

为了弄清这一点，让我们分别研究一下那些可以称之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一般原则的思想和那些与社会生活的个别形态相适应的思想。这两种思想，以不同的组合形式，一般就是进行斗争的各党派的旗帜，无论这些党派实质上追求的是寸利不让的自私的目的，还是这些党派确实相信它们的拥护者，而且只有它们的拥护者才是绝对真理和正义的代表。这两类思想同样既可以成为发展的源泉，也可以变为停滞的工具；这两类思想在实际当中轮流地既作前者，又作后者，不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对这两类思想来说是各不相同的。

至于说到一般原则，如发展、自由、理智等等，它们遭到上述命运，就是因为由于本身含义的广泛性，它们对多数人来说，始终是极其含糊不清的，可以被一些人毫无固定含义地反复使用，同时也可以成为另一些人达到极其卑微的、反动目的的工具。

发展这个词，可以在宿命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仅被当作一种存在的事实，而且是一种要求在理智上予以承认，在精神上加以崇拜的合理原则。对于历史过程的拜物教徒来说，社会毒瘤的病态细胞，同社会肌肉和神经的健康细胞一

样，也是人类发展的因素。然而，对于那些认为历史具有人道意义的人来说，事实并非如此：他懂得，无论病态的细胞，还是健康的细胞，同样都是已往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可是，只有健康的细胞才决定着发展，而病态的细胞则是破坏和死亡的因素。第一种发展（如果在这里已经使用了这个词）应该在目前和将来尽可能地加以反对。第二种发展（实际上只有它才在历史上有权得到这个名称）应该加以促进。

毫无意义地使用自由这个词，已经为每个多少深入地思考历史的人所熟知，以致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强者有折磨弱者的自由，贫者有饿死的自由，父母有摧残儿童体力的、智力的和精神的能力的自由，是人所共知的这一原则的格式。——为了理智，人们沉溺于对必然事物的直观，而否定对既成事实的批判，认为现存的即是合理的，而否定对社会形态的批判。把正义与法制混为一谈，即使是“德拉古法”也罢。把真理当成是无法理解的、只能呆板重复的神秘的信条。把美德看成是为了最坏的个人而牺牲最好的个人，为了虚幻的幸福而牺牲现实的幸福；不是反对恶，而是勿抗恶。认为尽到责任是干间谍活动，是采取野蛮行为，是狡猾的教会中学生对同志的告密；是对玛基大人、亚玛力人和亚摩利人的残杀；^①是违背向异教徒许下的诺言，是焚毁宗教裁判所，是巴托罗缪之夜的大屠杀。人生的圣洁被看作是对个人发展的否定，是对现实真理和人类正义的否定，是苦行僧的毫无怨言的自我折磨，是遁世者的兽性状态，是神的侍者的狂热，是对不可思议的事物的信奉，是对不信教的或信异教的人的迫害。总而言之，人的一切最坏的、最野蛮的、反社会的、最不体面的、反人性的方面，都可以在发展、自由、理智、美德、责任、圣洁的假面具下找到自己的庇

^① 据圣经传说，神亲自吩咐古代犹太人将这些入杀死。——编者注

护所。只有批判，经常的、确定不移的批判，才能使个人免于被响亮的言词引到与他的愿望、本能和全部天性毫不相容的营垒中去。一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常见的招牌，所以，两个本质上对立的、互相斗争的政党，可以宣称自己是同一伟大原则的保卫者，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所有的教派分子，都把自己称为真正的信徒，而把其他教会称作偶像崇拜者。所有的哲学家都断定，对于事物的正确的、合理的理解，只能在他们的体系中才能找到。无论是恺撒，还是伽图，似乎都曾维护罗马的利益。无论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制度的反对者，都曾要求正义。具有思维能力的人们不得不竭力探索：在哪个政党那里，伟大的词句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要求自由（如同法国僧侣们那样），会不会仅仅是要求压迫别人的权利？呼吁正义（如同农奴主、奴隶主和资本家那样），会不会仅仅是甚至在已经认识到它的不道德的情况下，仍想把历史的不道德的事实合法化？

由于一般原则具有过于广泛的含义而可能被用作互相敌对的党派的旗帜，这种情形似乎对于个别的社会形态并不存在。家庭、法律、民族、国家、教会、科学协会、经济学会、艺术学会，都有着不难理解的、一定的任务，因此，不难判断，某一形态究竟是发展、进步的起源，还是衰亡、反动的因素。遗憾的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不过这里的原因，与有时把伟大的一般原则变成响亮词句的原因却根本不同。一般原则，正是由于含义广泛，因此，只有清楚地认识到它们所指的实际内容时，才获得一定的意义。而个别的社会形态，正是由于其个别性，本身并不是进步的，也不是反动的，所有这些形态，都包含着对于个人产生进步影响的可能性，如同所有这些形态也都可能成为个人在其发展道路上最沉重的障碍一样。其中每一个形态的历史意义取决于这个形态在一定时代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的综合，以及该时代一切社会形态的综合。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必然在一定时期内把某种形态作为进步工具推到第一位，

同时,在这个时期,只有在其他所有的形态都受这个主导形态支配的条件下,社会才能发展。然而,条件是不不断变化的:昨天占优势的、基本的要求,今天则可能变成仅仅是个人和社会许许多多要求中的一个。昨天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社会联合形态,今天可能要求具有同等地位,而明天则要求占优势;于是社会就必须过渡到新的条件的综合,如果它还想保持进步的话。昨天占优势的形态,昨天的进步分子有充分根据为其优势而进行斗争的形态,今天却必须让出首位,而那些还要去维护它的人,则将成为反动分子……新的条件的综合,同样也将存在于一定的时期,以后又必然被更新的综合所代替。谁如果象崇拜偶像那样地崇拜社会形态的暂时综合,那他就必然要冒成为反动势力拥护者的危险,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综合能够一劳永逸地满足进步的各种要求。对于具有思维能力的人来说,社会形态只不过是一件不结实的历史衣衫,它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获得自己的意义仅仅是因为这些形态在当前的综合中适应着现时代的各种要求,也就是说,适应着个人的自由发展,适应着个人之间最合乎正义的关系,使个人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得到文明的好处,使这些得到的好处更加稳固并消除停滞的危险。

奠定了氏族和家庭联合体基础的人们之间的亲族关系,看来不止一次地改变了自己的进步意义。很难对于灵长类动物生活过的社会形态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灵长类动物是人类的远祖,甚至就是原始人类,考古学家从地壳的第三纪中,与其说是观察到,不如说是猜测到他们的遗迹。不过,这种动物式的社会形态,比起聚集在母亲周围的氏族联合体来,肯定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现代的社会胚胎学家,以越来越大的可靠性,把氏族联合体作为第一个纯人类的联合体,重现于我们的想象中(关于这点,我在前面第四封信中已经谈到)。这种母系氏族几乎到处都让位给家长制氏族,以后又让位给在家长制氏族基础上形成的父权制家庭。这两种形态

之间的斗争,在其进步意义方面,对我们已经是完全模糊不清了。也许,甚至很可能,家长制氏族和父权制家庭对于母系氏族的胜利,是利己原则对于社会原则的胜利,这是由于人类集团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保障,争取生存的斗争有所减弱,因而使利己的欲望有可能更易于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可是,也许处境优越并有较多闲暇的少数人的个人批判能力,只有通过族长和世袭贵族占有特殊地位的家长制形态,才能培育起来。也许对于人类来说,确实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即家长制是联合体基本的发展基础,在族长对其后代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各代人之间存在着最紧密的等级制联系的情况下,能以最好的方式使人类在经济、政治、宗教以及一部分科学方面的要求得到满足。不过,我们先把父系习俗是否比母系习俗更为进步这个现在很难解决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先用氏族联系这个名词来概括其共同事业与联合体内部的亲族关系密不可分的原始结合体的一切形态;在这里,这个概念也适用于有共同妻子和共同儿女的母系氏族;也适用于闪族人习俗为我们保存下来的、古希腊罗马的法制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了的父权制家庭;也适用于具有一妻多夫习俗的各种过渡形态;也适用于在人类某些地方保存下来的其他的比较特殊的形态。在所有这些形态中,氏族联合体,作为为了共同防御而把人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建立牢固联系的第一个联合体,曾是主要的进步基础。习俗的专制主义、对异族人的憎恨、琐细的家世方面的骄傲、对死去的祖先的迷信、部族之间的敌视,——这些肯定在当时就是这个基础造成的结果,并且带来了许多苦难。但是比较起来,这种形态毕竟或者可以使社会遭受较少的苦难,或者至少可以制约未来进行比较广泛的思维工作的唯一可能性,从而能够在为争取真理和正义而进行的思维工作的影响下减轻后代人的苦难。无论如何应该肯定,氏族制度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无论由于氏族的报复引起部族之间多么残酷的屠杀,但

是在这种屠杀中死亡的个人，可能终归比在个人没有氏族联系保护的情况下要少。无论习俗对某些个体如何沉重，无论后来族长如何肆无忌惮地剥削自己部族成员的劳动和生活，但是，为氏族习俗或族长权力所维系的部族的一致活动，比起这些人分散活动，可以使部族中有更多的人免除饥饿和各种危险。无论这些集团的人对待异族人是如何惨无人道，把他们变为奴隶，把他们杀死或吃掉，可是在氏族联合体中，人毕竟逐渐考虑到，他不仅应该捍卫自身的以及与自己亲近的人的生命、幸福和尊严，而且应该去捍卫别人的生命、幸福和尊严，这些人与他有着思想上的联系，就是说，他们与他具有同等的权利和同样的义务，为他们造福就体现着他的品德，对他们的侮辱也就是对他自己的侮辱。

一旦法律开始保障个人，氏族的血腥复仇就变成极其有害的社会偏见，并且从进步因素转化为反动因素。一旦自由的经济联合比氏族的和公社的联合体给个人带来更大的保障和更多的利益，维护氏族的经济原则就开始具有反动的性质。一旦人开始意识到，任何人的尊严与他自己的尊严都是互相关连的，对任何人的侮辱就是对他自己的侮辱，那么，只能同族系的人之间进行联系的想法，就变成文明道路上的障碍。

在人类生活的另一个时代，法律变成了居主导地位的原则，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进步的因素。它保障弱者的生活免遭强者的蹂躏。它巩固了契约，使公社获得了自由地和广泛地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它是教育人们认识他们在道义上的平等地位，认识人的尊严超越于出身、财产，以及其他一切偶然情况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然而，法律并非任何时候都是进步的因素。我将在另一封信中分析随着社会上的法律的形式化因素的加强而必然会不断发展的停滞的趋向；现在我只限于指出这个问题。法律总是字面上的东西；社会生活在其不断的有机发展中，必然会发展成为比立法者所能预见

的多得无可比拟的各种范畴，并且会很快地超越甚至最尽责的立法者据以拟定法律条文的各种条件。谁如果能把全部多样化的现实生活硬塞进法典的固定条文中，他就不会是一个进步活动家。谁如果面对新的历史需求而维护陈旧的法律，他就是——一个反动分子。当然，几乎所有组织得比较完善的社会都包含着废除陈旧法律的可能性。但是，有时政府或少数有权势者的私利却要维持为社会意识的所有正常愿望所摒弃的法律的形式上的存在。如果不是1870年的严酷战争破坏了拿破仑第二帝国的一切原则的话，这个帝国可能还会长久地作为合法形式继续统治法国；然而这个帝国的真正拥护者是如此稀少，以至在9月4日它竟找不到任何一个保卫者，尽管取代它的政府，无论在政治方面、智力方面或道义方面，都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在类似的情况下，字面上的东西会依然载在法典上，有时甚至可以找到利益攸关的坚决的保卫者；不过，真理、生活、进步都与之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起诉检察官的要求，从法律观点看是如何正确，但真理是在那些不顾法律的明显依据而宣告无罪的陪审员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车碾犯人的刽子手，还是把拷问刑具环列于犯人周围的警察行为是多么合法，但进步是在把蒙难者从刽子手的手中夺出来的、把可耻的刑具加以摧毁的无权的人们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元老院关于恺撒·奥古斯都·多米齐安是上帝以及在他的塑像前要奉献祭品的法令，有多少正确的法律根据，无论盖斯列尔^①让人们向他的礼帽鞠躬致敬的要求是多么正确，但历史未必不站在那个宣称“不，多米齐安不是上帝，不应该给他的塑像奉献祭品”的衣衫褴褛的宣讲者方面；历史未必不站在那个不但不向盖斯列尔的礼帽致敬，而且给了他致命一击的、半传奇式的射手方面。

① 残暴的总督，传说被射手威廉·退尔击毙。——编者注

在最后几任恺撒和最初几个蛮族国王统治的时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占优势的意义，一切社会原则都受它的支配。当一方面罗马国库，另一方面蛮族掠夺夺去了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时，当不管是古代法还是新的社会需求都还不足以保障个人时，主教为了精神上起粘合作用的威望，成了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他的关心是片面的，然而，这毕竟是对灾难深重的黎民百姓的关心。他的审判是不公允的，然而，这毕竟是向正义的某种接近。他甚至有时可以公开谴责任何人都未曾指摘过的皇帝的野蛮行为。他能以地狱遭劫和神侍惩罚的恐吓，尽管只是有时，制止任何人都无法制止的蛮族的狂暴兽行。无论卡西雅们和贝涅基克特们^①的法规如何野蛮，但在当时条件下，只有它们才能提供保存知识传统，也就是识字和起码文化传统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个时代，这对西欧来说是进步的积极因素。不过很快这种关于主教和僧侣的社会意义的观念，在西方就变成了反动的因素。最粗率的财产继承法庭，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也比宗教法庭更为公正。在与天主教的主教干涉社会事务的弊端对比之下，封建主义、集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成文法的一切弊端都显得微不足道。作为教阶制要素的教会的独立性，在与国家对比之下，变成了反动分子的思想。神学家对其他研究部门的统治，变成了对发展危害最大的障碍。只有教阶制的组织不是成为社会的主导者，而是作为争取其他主导原则，争取民族性，争取在低等种族中传播高等种族文化等等的斗争的参加者，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它才是进步的推动者。

我们再举一个我在第五封信中提到过的例子。科学在自己获得胜利的过程中，无疑是一种进步因素；然而在一定情况下，当社会现有的全部力量都必须用来解决各种迫切的实际问题时，当社

^① 卡西雅是罗马法学派的首领，贝涅基克特是那不勒斯附近寺院的奠基人，他的法规奠定了天主教僧团的基础。——编者注

会上任何一个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的成员都是社会的敌人时，当任何人以骄狂的态度蔑视政论家之间轰动一时的论战，蔑视群众政治集会上的喧闹争论，蔑视各党派之间的流血冲突，而他无权认为自己是进步活动家时，科学协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时候，如果科学协会理解自己的人道意义，那它就会使自己的著作具有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倾向，或者说，它的成员就会把自己关于纤毛虫新形态的研究，关于克洛维外衣式样的研究，关于克勒特语动词变位法的研究摆在次要位置，而把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用来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几何学新领域的开拓者蒙日就会整天在作坊中度日，啃干面包，给工人书写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创立了化学科学的贝多莱和富尔克鲁就会献身于硝石的采掘和对农人出身的矿工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比较语言学的首创者威廉·洪波尔特就会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用于普鲁士的复兴。天文学家阿拉哥就会坐在共和国立宪者的议席上。细胞病理学的奠基者微耳和就会在议会中击败俾斯麦。但是，科学协会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它可以以自己研究室中的超世的平静而自豪，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周围的人对群众的苦难漠不关心，而去尊重官方的status quo^①，或者它至少可以认为，参加轰动一时的迫切问题的讨论会有失自己的身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著作的全部科学价值也不能使它逃脱历史的必然宣判；为了科学——当然是被理解得十分糟糕的科学——而宣传对于迫切的现实问题的冷淡主义并且逃避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协会，将是一种反动因素，而不是进步因素。

我们暂且只限于谈论这些例子。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一点：发展的因素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无条件地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社会

① 拉丁文：现状。——编者注

形态的,然而每一种社会形态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中,都可以成为多少具有影响作用的进步工具。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维护某一种社会形态,必然会宣扬反动因素,因为同一种社会形态,或者甚至同一种社会形态的综合,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居于主导地位,并给人类带来利益。历史的正确进程必然使各种形态轮流占居统治地位,使一种形态让位给另一种形态。

究竟怎样在历史的当前时刻弄清,哪里是进步?哪个政党代表进步?在所有的旗帜上往往都写着伟大的字眼。所有的党派往往都宣传那些在一定条件下过去和将来都是进步推动力的各项原则。这个也很好,那个也不错。然而,究竟如何选择呢?

没有知识的、不善思维的、迷信别人权威的人,无法正确无误地进行选择。任何一个字眼本身都没有代表进步的特权;进步是不能塞进任何一个形态框框里的。要在词句背后探究它的内容。要研究某个时代和某种社会形态的条件。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加深自己的信念。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只有自己的理解力、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决心才能把人变为具有个性的人,而除了具有个性的人,就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进步的形态,也根本没有进步。重要的不是旗帜,不是旗帜上写着的字样。重要的是旗手的思想。

第十三封信 “国家”^①

虽然在各项伟大的社会原则中,不能说有哪一项原则在被人

^① 以下的两封信本应作重大修改。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可以在我的《未来社会中的国家因素》一文中找到与此有关的许多东西,这篇文章刊登于1875年在伦敦不定期出版的《前进!》文集第4卷第1期(唯一的一期)。关于这个问题,我打算放在第2卷第2篇的最后一章《近代思想史试论》中来谈。这里讲的几乎完全是我在不同的地方讲得最透彻而在俄国实行书刊检查的条件下不得不用各种形式来加以掩饰的恩惠(1891年)。——拉甫罗夫注

们理想化的同时未被滥用过,但就其被滥用和理想化的程度而言,近来未必有哪一项原则能与国家原则相比。当然,这是有其逻辑上的原因的。这项原则曾经是推翻封建专制、反抗天主教的神权旨意、反对统治者个人独裁欲望的极为有力的工具。新欧洲的进步政党在反对这些意图的历次斗争中,曾毫不迟疑地把这个原则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国家原则派、法学家们同欧洲的君主结成联盟,帮助他们打败封建主和教权派。斗争是在残暴的势力之间展开的,但是为了国家原则,理想化的做法却美化了路易十一、天主教徒斐迪南^①、伊万雷帝等君主的活动,使他们的活动赢得了明智的和谋求公共幸福的荣誉。到十七世纪末,路易十四和斯图亚特王朝已经对其他势力占了优势,这时进步的政党便提出“国家就是公共幸福”的口号来对抗“朕即国家”的口号,并且展开了维护法制反对暴政的斗争。不过这里产生了我曾经提到过的那种现象。“国家”这个词灵活性相当大,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一些人把国家理解为加强政府的意思,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是对政府的限制,让社会尽可能广泛地参与政治事务。一些人强调要扩大国家的规模及其对外的影响;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实行高明的行政管理、全国划一的法律和划一的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国家各个部分的机械联系高于一切;还有一些人则一再证明,只有由明确意识到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起的各个生气勃勃的、完全独立的中心之间的那种有机联系,才是国家。这样,有必要进行辩论的倒不是拥护国家或者是反对国家,而是要弄清楚真正的国家到底是什么。关于国家是主要的社会原则这一点,似乎是无可

^① 天主教徒斐迪南(Fernando el Católico 1452—1516),加斯梯里亚国王(1474—1504年)和执政者(1507—1516年),阿腊贡国王,称斐迪南二世(1479—1516年)。

争辩的。除了僵死的封建主和教权主义者以外，所有的人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而国家原则对中世纪原则所取得的胜利，对个人专横所赢得的胜利，人们是记忆犹新的。这样，保守分子和进步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秩序派和革命派，实践家和哲学家便走到一起来了，他们都承认国家是一种在权力上不能与其他权力相提并论的最高原则，它是一种最高的权力，它容许某些限制，但这与其说是出于承认其他权力，不如说是出于人道。大约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对国家的神化已达到了顶峰，德国唯心主义最后的一个伟大的代表黑格尔，同时也是一个最公开地阐明这种神化的思想家。

然而历史在前进，阐明国家的真正含义的评论界尽了自己的责任。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一些新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同政治格格不入的，但却比政治更深刻得多地决定着公共的幸福或苦难，而交易所对政治事务的影响则把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引导到实践中来。唯心主义者忽略的民族原则宣布自己有权监督外交家们关于领土边界的决定，它的声明往往相当有效，以致连国家原则也不得不服从这一新的（实际上是很陈旧的）原则。结果发现，原来严重地威胁当代社会制度的与其说是政治变革，不如说是社会变革；各个政党交融混杂，它们的作用在各个经济阶级的对抗面前变得黯然失色。况且在国家理论家中，单单一个保守党就给它帮了倒忙，这个党证明国家实际上并不是理智和深思熟虑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的文明现象。当然，他们想藉此赋予国家以额外的稳定性，但在实际上却破坏了它的唯心主义的意义：人正在竭力领悟和改造一切必然的、纯粹自然的东西。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把国家的自然现象也改造成为高级的产物，以便使人类理智的份量超过国家中的自然物质的份量？

这一切使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不以加倍的批判态度来对待

不久前还是崇拜倍至的原则，揭示出对它的虚假的理想化，并代之以真正的理想化，即弄清国家的最简单形式的自然基础，指出这个原则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为进步过程所接受，怎样才能适应个性发展和使真理和正义具体化为社会形式的条件。

只要人们还抱着经济的、道德的和思想的宗旨(每个人可以自由地改变或甚至放弃这些宗旨,而不必担心任何强制)生活在一起,人们就始终处于不受一切法律和政治约束的社会联系之中。人们一经加入一项为缔约各方都必须遵守的契约时,他们的社会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生活阶段。如果监督履行契约的强制力量属于没有参加契约的人们,社会就只受法律的约束。当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责成社会成员履行契约的权力时,社会就会成为政治社会。而当社会把只有参加契约的成员才必须遵守的契约,变成那些从来没有对契约表示过赞同或者仅仅由于害怕反对契约会对个人不利而才表示赞同的人也必须遵守的契约,政治社会就会成为国家。学术团体、合法商业合作社和秘密政治组织就是最初的三种形式的例证。

由此可见,国家就象使一些人服从于不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的那种暴力一样地历史悠久。由于社会上总是有大量的人因智力发展、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缺陷而需要别的更聪明、更有知识和能力的人来为他们选择生活条件,所以国家制度就在最初的氏族以前的人类集团和氏族的人类集团中,在最初的流动部落中扎下了根,而且至今仍完全不以被称之为社会的政治机关为限。凡是在一个人无异议地服从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条件的地方,他就得服从国家原则。

上述情况可以解释清楚我在第十二封信的开头提到的关于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当然,国家的强制性原则完全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这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年代,甚至我们往古代追溯得越远,这一原则就被应用得越广泛。起初,它表现为一些人对另一些

人的肉体统治，继而过渡到经济依附，最后通过理想化的途径变成道德力量。

但是，在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契约的因素，它使国家区别于一些人对个人的简单服从。一个家庭的成年人和有利的家长统治着年幼的孩子和软弱的妇女，这不是根据强制性的国家原则，而是根据个人所占的优势。同样，先知能控制住信徒，是因为有个人的影响。当家庭中成年的成员可以不服从家长，但能帮助家长控制其他人的时候，当教派中的先知左右不但有执行者而且还有助手的时候，在家庭和教派中也就出现了国家的因素。一般地说，当一群人为了理解正确的或理解不正确的自身利益而自愿支持由个人、机关、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作出的某些决定所产生的义务，而这种义务也扩展到其他自愿不参加这个联盟的人的时候，国家便产生了。因此，契约的原则在这里便同强制性的原则结合在一起了，其特点是缔约的人比较少，而强制性扩展到的人则比较多。

当然，契约原则的扩展从本质上改变了契约。契约的全部道德和法律的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在于一个诚实的人有义务履行他经过深思熟虑而接受的条款。但是在这里，实际上缔约的是一些人，而契约拟制却扩展到其他一些人。契约是由一个人代表其他一些人缔结的，而这些人对所缔结的契约一无所知，但是却负有履行契约的义务，这就违反了最起码的正义的要求，因而也是与进步的概念背道而驰的。一个法学家会怎样来看待一项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是由几个人起草、批准和变成要由成百、上千乃至几百万人必须予以遵守的契约（可是谁也没有授权这几个人去签订这样的契约）呢？是否能够承认由一代人缔结的而在以后许多代人还没有想到用暴力来撕毁它或用鲜血来淹没它时就要后代人必须予以遵守的契约是正义的呢？当然，在这一类契约里是没有正

义的，它们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或者从契约中得益的相当大多数的人，这些人靠自己的组织或自己的多数而用暴力强迫一切对它们不满的人服从国家契约。要么退出国家，要么履行国家契约——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每个臣民面临的抉择。

如果不满这项契约的人数不多，那么这种抉择只能使他们痛切地感到，他们不得不在他们所憎恨的法律的桎梏下受罪，或者去体验牺牲最起码的舒适生活的乐趣，体验因为不执行或反对这些法律而去坐牢、流放和被判处死刑的乐趣。最后，不满的人还可以侨居国外。只要这批不满的人是一盘散沙，他们就将永远遭受压制。这种压制的时间延续得越长，同时法律秩序越混乱，这种环境就越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感到沮丧，使他们丧失清楚的理解力、刚毅的性格、信仰和为信仰而斗争的能力以及社会团结的意识。

但是，随着不满分子形成日益壮大的社会力量和组织起来，他们已经变得不可忽视，连国家制度本身也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有两类。如果不满分子分布在全国各地，或密集在主要的中心，那么国家就会面临通过改革或革命来改变其根本法的危险。如果不满分子集中在国家的某一部分地区，那么国家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联系都是不巩固的，其所以不巩固，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是一种虚拟的而不是实际的契约，因为国家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必须服从国家契约，但从来没有向他们征求过关于契约的意见，他们也从来没有对契约表示过同意，他们服从契约仅仅是出于无能为力，出于毅力不足或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力量。

随着参加国家契约的人数的增加，国家契约便变得越来越巩固，因为，第一、其中不妥之处能很快被人发现，可以更合乎实际地进行讨论，并且通过改良而不必通过革命就能很容易地予以消除；第二、有更多的人承认国家的法律是自己必须履行的契约；它的

反对者则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宁愿服从于它。显然，理想的国家制度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成员都把法律看成是全体自觉接受的相互间的契约，这个契约的改变要征得缔约人的一致同意，它只对那些同意这个契约的人才具有强制性，这是因为他们既然赞成这个契约，他们就不得不为违约而受罚。

但是读者会立即发现，从国家原则的实质本身得出的理想正在竭力否定该原则本身。国家不同于其他社会形式的地方正在于国家的契约是由较少数人所通过并被他们作为大多数人必须遵守的契约而保持下来的。国家联系的两个来源——强制的自然因素和契约的人为因素——相互冲突起来，因为后者为了正义而力求减少强制性。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进步应当表现为缩小社会生活中的国家原则。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政治进步表现为两种趋向。第一、为了建立自己的专门机构，国家因素正在从当前的社会要求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形式中分离出来。第二、强迫多数人服从国家契约的人越来越少，而国家的虚拟契约却变得更实在了，国家的联系在巩固，但与此同时，它却直接接近社会的联系。这两种趋向可以叫做进步的趋向，因为前者是指国家的理论真实，后者是指把正义纳入国家形式。然而这两种趋向在其实现过程中都要使人类生活中的国家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

当夫权、父权和家长权在比较文明的社会里几乎失去了全部强制力时，当经济义务由于得不到履行而交由与此无关的人审理时，当司法同教会和行政分离时，——法律的强制就由人的分量不特别大的那部分活动来承担了。有许许多多的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也几乎没有感觉到国家因素的压力。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的作用在思想家的理论中起了变化。家庭的理想变成了相爱者的自由结合，变成了长辈对晚辈的理性教育。主宰一切的和偏执的教会理想，被

个人信仰自由的要求和信徒们为了信仰的实际任务而自由联合的要求所代替了。经济联合的理想变成了对自由的、团结一致的社会的憧憬，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社会的寄生虫，竞争已经消失而被代之以普遍的合作，人人为公共幸福和共同发展而劳动，同时，劳动变得丰富多采，并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它不仅不再是沉重的负担和使智力衰亡的因素，而且本身就包含着乐趣和发展的因素；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按照他个人的需要从团结一致的社会中得到他生存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工作，因为任何人都意识到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发展。

这样一来，起初扩展到家庭，扩展到奴隶主同奴隶、地主同农奴、私有者同无产者的经济联系以及扩展到各种形式的法庭——财产继承的、教会的、官僚的等等形式的法庭的强制因素，也就逐渐在这些方面失去效力。诚然，文明的习惯还在支撑着家庭中的专横霸道；资本仍在统治着无产者；不可撤任的选定法官和独立陪审员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还在听从行政当局的指示；这些“社会良心”的代表人物往往不过是阶层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而已。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的仅仅是个人滥用权力的行为，这一情况在那种只有最有修养的寥寥无几的少数人受到思想原则的指导，而大多数人却是在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影响下进行活动的社会里是难以避免的。另外，我们看到了阶级斗争的结果，由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带有自觉性，所以斗争就越来越尖锐；这里的祸害只有随着斗争本身的停止才有可能消除，祸害的出现已经不取决于个别场合的强制因素，而只取决当前社会中一个阶级迫使另一个阶级处于不利地位的这种状况。为了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承认和正在通过自然的途径力求得到完满地实现的理想，现在和将来都要进行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因素的斗争。这些理想的一部分

在当前的制度下是为了个人的自由竞争而得以实现的，完全不依这项原则的其他结果为转移。理想的另一部分一定要在普遍合作代替这种竞争的时候才会得到实现，许多思想家认为，可以指望社会上的强制因素的最后痕迹到那时将会消失。

但是，社会形式的理想对强制因素的容忍程度越低，它对自由的要求越强烈，它就越应受到保护，以防个人偶然滥用权力的行为。即使认为在所有这些领域里进行合乎道德和理智活动的人不容许自己去实行强制，那也应该记住在第十封信中所说的话，即合乎道德的、理智的活动仅仅是人类活动的种类之一，除此以外，人还会在肉欲、陈规旧习或感情冲动的影·响下，不由自主地进行活动。可以指望，人类的进步将会减少用于这类活动的行动的份量，但是只要这类活动还存在，只要人的智力和道德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就需要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损害。这种保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制的性质，因而也就包含有国家的因素。当然，即使在这里这种因素也在力求使自己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它毕竟还存在着，一直到进步把人的爱好和习惯大大改变为止。为了消除个人和行政当局的专横，社会力求把国家机关完全变成没有个性的法律的执行机构，并把国家的作用限制在监督不实行强制、保护弱者不受强者强制的方面。人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作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作为一个经济企业的参加者，都要竭力限制他所服从的那个国家制度，这种限制只能通过不受任何国家利益左右的、法官所解释和运用的那个法律的没有个性的形式来进行。

在这里，最初要求把国家职能同其他方面分开的社会政治原则的进步过程正在逐渐结束。社会一切领域服从政权的虚·假的理想化正在被自由联合的原则所破坏。国家的真正理想化要求它主持正义，保护弱者、维护公正的契约、阻止不诚实的行为，把国家在这方面的职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它在将来随着人们本身的进

步而自然而然地不断缩小。在这方面进步的障碍与其说是事物本身，不如说是旧的社会习惯。障碍多半是由于被强迫服从国家契约的人减少得不够迅速。

这第二种政治趋向遇到了无比巨大的障碍；然而它是和第一个趋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理想的先前的一切发展，同国家的保护作用一样，都是依靠这样一个假定，即法律符合社会的切身需要。但这是这项伟大原则的虚假的理想化的形式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律本身并不包含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原因，但是它更倾向于使社会戴上文明形式的枷锁并使社会停滞不前。只有在其他的补充原则中，即在利他主义的激情中，在被正确理解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中，以及在道德的信念中才包含有发展立法的可能性。法律是可以由人们来发展的，但它自己不能发展。正义要求法律在其产生、存在和废除的过程中越来越失去强制性的因素。这是通过扩大社会参加立法来实现的。随着立法向社会和社会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的过渡，法律本身也在提供修改法律的手段。使社会道德完全败坏的政府形式（其权力仅仅受到习俗的约束）正在变为等级警察国家（在这种国家里一部分居民根据法律对事业的进程施加影响）的种种形式；然后就要负担法治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只有阶级斗争的经济条件才为群众限制这种影响）的各种任务。国家联盟越来越接近于社会联盟。国家越来越带有缔结自由契约和自由修改这一契约的人们的联盟的性质。国家契约的强制性正在减少，并且力求继续减少。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国家的理想正在变成关于这样一种联盟的观念，在这种联盟里，只有那些有条件和有可能讨论契约，可以自由地讨论和承认契约，也可以为了拒绝承担契约的一切后果而同样自由地拒绝履行契约的人，才服从契约。

但是，这种理想是否有可能实现呢？社会上朝着这一方向发

展的一般的大的进步运动是否有可能存在呢？在这条道路上难道就不存在不可克服的自然的或历史的障碍吗？当我们把各个文明民族的现状同前面提出的那些理想相比较的时候，当我们发现那些理想距离它们的实现是多么遥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是使个人能在不侵犯别人自由的情况下捍卫和享受自己的自由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传播知识和发展性格在人类中间是如此地无足轻重，以致除了要多数人必须服从少数人所规定的条文以外，不能期望从当前的制度中得到任何别的东西。国家还处处使我们感到它是由一大批从降生时起就服从现行法典的人组成的，如果他们声明不赞同从未征得他们同意过的政治形式，他们就会被宣布为罪犯或变节分子。在这一大批人中间，有极少数人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以致能够详细地指出，在那些使大批人都受到限制的形式中，究竟什么东西是最要不得的，为了在不削弱国家联系的条件下来用改良的办法来改善社会的状况，究竟用什么来代替这些东西为好。在这些政治知识分子中，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做到通过立法来实现自己的观点，或者试图做到这一点。然而这少数人的工作在历史上有了反映。已经进入这样的历史而又继续保持着象在我国的那种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的古老形式的国家是越来越少了。在最先进的国家里，控制国家契约的政府是通过由服从法律的群众选举受到信任的代表的办法组成的，选民的人数则在尽可能地增加。参加修订契约的权利越来越扩大：贵族容许平民政治上的平等；第三等级同贵族和僧侣都混合在一起；议会改革法案放宽了资格；成年男子的选举权总的来说已成为法定的权利；出现了妇女政治权利的维护者。但是不管选举权如何广泛，不管北美合众国的政治制度同亚洲的汗国或俄罗斯帝国的制度之间的差别如何大，在这两种极端的形式中，正如在所有

的中间形式中一样，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相当多的人都得服从他们所没有讨论过的或宣布自己对之不表赞同的法律契约或阶级统治。国家在任何地方对于本国领土上的大部分居民来说都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

这最后一句话正是体现了国家契约对个人的约束。一个人出生在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某块领土的一部分，因为时间多少已经久远的一些事件，把人们居住的整个土地都划分成了一块块的政治领土。一个人只要出生在这里，他就要服从这里的法律，虽然这些法律他并没有参与讨论，没有接受，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永远不可能参与讨论。然而这些法律却压迫他，妨碍他的发展，反对他的真诚的信仰，并把他抛入不满者的行列之中。抛弃祖国是一种痛苦的决定，这种决定有时甚至是无法接受的，无论如何也是很难接受的。违背信念的服从是对人的尊严的损害。出路只有一个——这就是同一切可能的约束及其对人的可悲后果进行斗争，加入改良政党或革命政党的行列。我已经谈到了当前正在形成的一些政党必然要走的道路问题。不过现在我们应当注意另一种情况，即国内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存在为国家机体造成的威胁，以及这一斗争通常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混乱。由于在国土上存在着不满的人，因此国家不得不拿出无可比拟的力量来维护法律，以免遭到他们的破坏，保持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这就使社会力量离开生产活动和发展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活动，而转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按照进步的要求本应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活动。这就加剧了社会上的愤怒情绪，加深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因而成为健康的社会合作的经常的障碍。在这里，保守派的会议能使一个被提名担任司法职务的很有能力的优秀法律家落选，因为他对最好的管理形式持另一种看法；在那里，自由派的编辑部不会收买一个宣布自己是保守派的人的小说；在那里，一个植物学教授

要被撤换，因为他对经济问题的观点在大臣看来是有危险的，在这里，一个狂妄的人被判处死刑，他的朋友也可能被枪毙。一个国家的领土越辽阔，那么由于存在这种不满的原因，不满的人也就可能越多；对他们进行监视也就越困难；化费在维护那种本来应该仅仅属于保卫者的任务的方面力量，即化费社会的非生产过程方面的力量也就越大。可是加强这类措施的做法通常却会使不满情绪更变本加厉，而社会制度的稳固性也就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社会制度被经常的不信任和麻烦的疾病所损害，这种麻烦的发作是由一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引起的。即使事情尚未发展到暴动的地步，社会机体的一切正常的生理活动也会出现反常，社会道德败坏，社会团结化为乌有。

但是，在那些领土辽阔的国家里，如果法律引起的不满不是个人的而是地方性的，如果法律在一部分地区多少是一种被自愿承认的契约，但在另一部分地区却引起了居民的敌视，那么国家就会面临无比巨大的危险。政治领土的界线在全部历史进程中很少是在居民的明确需要的影响下划分的。但是即使在政治领土的界线根据该时代的明确需要确定的情况下，也还不能保证领土各部分之间的合理的联系将永远是巩固的和合理的。居民在某个时代的需要还不等于他们在一切时代的需要，社会在发展中会象为那些能使原先没有理由独立的地区获得独立的各种不同利益奠定基础一样，来巩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分立主义会把模糊不清的动机当作非常明智的论据。但它却始终是削弱社会的因素。削弱在这里决不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控制着十万平方英里的国家中心，正面临领土缩小二万平方英里、收入减少几百万法郎的危险。美洲殖民地的分离并没有削弱英国，就象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独立大概也不会特别削弱英国一样。分立主义之所以削弱社会，是因为它是社会内部纠纷和不信任的因素；它引起一部分公民对共同

事业的冷淡；使另一部分公民花费（大部分是非生产性的花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来维护国家的统一，而这些财力和人力正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如果分立的尝试归于失败，那么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记忆里疑虑和敌对情绪仍会长期存在下去。即使分离实现了，也仍然需要时间来使遗留的敌对情绪平静下来，使不久以前不由自主的盟友、昨天的仇敌变为和睦的邻邦、全人类事业方面的同志、有明确目标的自愿的盟友关系。只是第一次法国革命的震荡和它所提出的广泛的政治理想，才消除了布列塔尼和法国南部对占优势的巴黎的恶感。对十八世纪的斗争的记忆，在约翰牛^①和乔纳森老弟^②之间还没有消失，尽管他们现在相互那么亲昵。里士满^③周围基地上的树叶还要多次变青，多次枯黄，一直到美国佬和土人的后裔完全感到自己又重新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时为止。^④所以，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在它们中间产生分立主义的倾向要比分离本身更加危险。在经济条件的差别、政权中心和落后地区政治作用的差别、人们的政治活动和政党的政治活动范围的差别随时都会引起不满的国家里，防止这种倾向便成为进步的目的。暴力可以掩盖和暂时推迟危险的发生，但对国家来说，这种危险会随着国内采取的暴力措施的增加而增加。第一、公民之间互相激

① 对英国人的戏称，表示固执。——编者注

② 美国人的绰号。——编者注

③ 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主要城市，美国内战时期南方人的中心。——编者注

④ 只有社会主义信仰的共同性及其国际任务才能清除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传统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由于在十八世纪末野蛮地瓜分波兰而给波兰人、俄国人和德国人留下来的。对犹太人的不公正的法律，在一些集团中引起了对俄罗斯帝国政治制度的敌意，这些集团实际上无论就传统或者它们的经济利益来说都不会为政治反对派提供根据，而在这类法律已经废除的国家里，回忆自己在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就会引起不信任而招致“排犹运动”的愤怒的浪潮，我们在自己周围看到的这种浪潮就是当代社会反动的一种症状（1891年）。——拉甫罗夫注

怒的情绪正在增长,这也就是分立主义的最大的祸害;第二、暴力措施正在损害人的尊严,使习惯于这些措施的社会得不到任何发展。但是,社会上激怒情绪的加剧和公民尊严受到损害,是一种大大削弱国家和使国家在对邻国的关系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现象,而国家同分立主义的斗争所能着眼的却仅仅是从外部来巩固国家。

事实上,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各个历史阶段,那么就可以发现,国家的大小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牢固的联系,仅仅从对外关系的观点来看才是特别重要的。在小国里和象在大国里一样,也会有社会经济的繁荣,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个人权利的扩大和人们相互之间比较公正的关系。即使我们设想世界是由各个专制的村社组成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上述各方面的进步的程度会降低,因为广泛的经济的、学术的和诸如此类的事业是可以通过各村社之间专门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结成的联盟来实现的。

然而对外关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有着巩固的政权组织的国家,在同物质力量即使优于自己的国家联盟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只要文明程度的差别不太大的话(就象波斯人和希腊人斗争中的情况那样),在战争中和在外交上会占很大的优势。在保守准备斗争的秘密和努力追求外交目的方面,一个国家要比几个专制国家的联盟要方便得多。且更不必说,几个国家的联盟可能是不巩固的和虚假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小国可能很容易地被大国压倒,可能成为大国掠夺的牺牲品,或者可能处于不得不追随大国政策的地位,这样一来,所谓的专制国家就仅仅是一个名义而已。不管怎么说,国家的对外关系将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出小国和大国的问题。国家越小,它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越薄弱,它的地理条件使它受到邻国掠夺的可能性越大,它的独立所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因而,这个国家的社会的内部发展就越不巩固;它就越不得不把更多

的力量耗费在非生产性的、应付可能遇到的外来危险上，这笔庞大的费用也就越沉重地落在该国居民的身上。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虚假的理想化把国家的任何扩大都看作是加强，而把国家的任何缩小都看作是衰落。当然，有时国家的某一部分的分离会使国家削弱，但只有在这一部分是国家躯体的一个真正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却被邻国掠夺去的情况下才是如此，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贪婪地掠夺走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当然，对于遭受掠夺的国家来说，这种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沉重的，但还不能单从这个国家实际上被削弱这一点来看，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将在长时期内把渴望收复失地和报仇雪恨作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头等大事。然而掠夺的事实对于进行这种掠夺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则更为可悲。瓜分波兰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几次瓜分对欧洲列强所造成的道德败坏的影响至今都还没有结束。现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及其顽强的分立主义倾向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分立主义倾向根深蒂固的地区，常常会由于它们的脱离而使国家得到加强，而不是使国家走向衰落。然而，由于这部分领土的分立主义倾向在这一地区究竟有多深很难确定，由于在这方面发生错误是很自然的事，以及由于往往会发生分立主义倾向符合一个居民阶级的利益而违背另一个阶级的利益的情况，因此，在发生问题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同本国一些地区的分立主义进行斗争和社会不得不在这一斗争中耗费巨大的力量而有时却毫无用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别的想要进行掠夺的强国还存在着，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自甘软弱。但是各国相互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掠夺性质。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无法避免的后果。由于历史大国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对这个事实必须加以考虑，而当世界地图仍将只代表几个大国时，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发展，所有的社会很自然地都将力求联合成为强大的

国家躯体；而当一个国家已经联合起来时，它就会很自然地力求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完整。

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二者取其一的抉择。国家越小，从而在对外斗争中越软弱，使它丧失独立的外来危险也就越大；它只有在这方面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才能捍卫自己的独立。但与此同时，它的各个地区的利益的差别、国家各中心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政治影响的差别在增长，不满在增长，因而被分立主义削弱的国家在遭受巨大的内部危险。

国家制度的进步当然在于致力解决这种抉择，即逐渐消除这种抉择所显示出来的两个不利的方面。这只有在国家尽可能少限制国内的人的自由和使各个小的居民中心能有尽可能广泛的政治生活的情况下保持自己对外的作用时，才能在理论上做到这一点。

在北美合众国已经作了尝试——这是迄今为止在历史上最广泛的一次尝试——，这就是把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统一体联合起来，这个统一体能扩大到所需要的任何规模，拥有尽可能充分独立的主要中心。但是北美合众国在这方面是一个由一些极大的单位组成的联邦，这些单位不允许居民普遍参与州政治生活的那些最重要的职能，因此不能保证州的全体居民都认为自己是真正赞同国家契约即州的宪法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样清楚的是，联邦的中央宪法还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成分，这些成分后来可能转给地方中心，而整个联邦并不失去它作为一个国家单位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时期提出了政治联邦制的纲领，各个小的中心的自治比重很大，但是斗争的条件没有允许这个纲领发展到即使能称之为政治实验的程度。

由此可见，前面提到的抉择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得到解决，但是只要把国家生活的两个方面即内部方面和外部方面更严格地分开，就可能得到解决。如果通过建立更完善的联邦制的形式，这一

点也许是可以实现的，条件是要按照北美合众国的计划稳固地确定共同的领土，或者要有为了一定的目标而组成的临时的自由联邦，这在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未来制度下是较有可能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生活的外部方面——即一个国家在世界国家体系中作为单独的力量，——仍然属于统一领土的中央政权，它可能有扩大这一领土的自然的愿望，但是当历史在将来把国家之间的关系掠夺性变得越来越小，使它们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没有可能的时候，这种职能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国家生活的内部方面——即对于个别地区和个人多少带有限制和可能引起最强烈的不满的方面，——一定会越来越全面地转移到最小的中心去，因为这些中心容许几乎所有的成年人真正参加政治活动。各种各样的地方的需要和地方的文化一定会在当地制度的差别上反映出来，同时，受一个地方政治制度条件限制的公民可以转到在政治上享有同样充分权利的、但更适合他本人生活理想的另一个地方中心去。在这种情况下，领土的辽阔不仅不会使一个公民感到受限制，反而会使他感到方便，因为由于领土辽阔的关系，一个公民越来越有可能找到符合本人愿望的地方中心；同时，他仍保持这样的认识，即他的生活的政治条件虽然为其他条件所代替，但他依然忠于自己共同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只能负责维护那些对整个领土通行的法律，构成这些法律的不是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条件，也不是地方的要求或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有关全人类真理和全人类正义的不变的科学结论，也就是前几封信中指出的那些进步的条件及其直接的共同结果。这些法律的科学性和全人类性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使这些法律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依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为转移。这些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性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即必须保护整个社会的进步条件，使之不为个人的爱好所左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约束力会从国家的法律越来越转变

为个人的信念，因而也将越来越失去自己的强制性，也就是说，国家制度有别于其他政治联系的特点将越来越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法律强制性的态度就会完全不同于一切历史时期提供给我们东西。不太文明的人总是比较容易适应文明，不太用脑思考的人就较少感受到现行制度缺陷的痛苦。而最文明的人和思考得最多的人对法律的强制性也就感受最深。在刚刚分析过的那种社会制度下，善于思考的人将很少在国家制度方面遇到困难，因为远迁的可能性使他们能够在不抛弃政治祖国的情况下生活在他们所选择的文明环境中，而全国性法律的科学性则可以使他们不必致力于改变政治条件，而致力于谋求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切身利益。这样一来，人类生活中的国家因素，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就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而力求减少到最低限度。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减少将会降低国家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而个人觉悟的提高和各种社会形式的真理和正义的实现则会减少来自国家总中心的对内强制性。由于地方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它同地方文化的一致性，以及由于个人有选择最适宜的政治制度而不必离开祖国的充分可能性，因此那部分可能会转到局部的小中心的国家职能也就会失去自己的强制性。这样一来，地方中心就会力求把自己变成自由的社会联盟，国家则会力求把自己的存在和统一建立在理智的约束力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历史形成的强制的基础上。国家契约一方面会成为人们的自由契约，另一方面会成为科学的成果。国家的联系差不多会完全转变为自由社会的联系。但是连国家制度的这种形式，也只能被看作是向各小中心和集团的更完善和更自由的联邦过渡的一种形式，现代社会主义在将来所要实现的就是这种联邦。

读者会说：“但是这一切在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当前的国家都在互相戒备着，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武装，并用法律和惩罚严格地

维护自己的完整。国家契约对于从来没有被问过是否同意这项契约的臣民来说是必须遵守的，在这里服从也是靠对惩罚的恐惧来维持的。科学仍然停留在讲台或书本上，并没有变为法典。”

当然，现在的国家就其目前存在的形式来看，本身就包含着远远超过明显地追求进步倾向的以往历史的痕迹。还有许多人拥护对国家机构的虚伪的理想化。希望国家成为一种本身力求不断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保护因素的真正理想，不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而且认识到的人也寥寥无几。我们不能责备现在，因为它是过去的必然结果。但在现在里面有进步的可能性，而对国家来说只有进步这一条道路可走。一切懂得进步和愿意为进步服务的人，都应借助于改革或借助于革命而努力使现在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如果这条道路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进步就是不可想象的，而政治历史也将成为社会病态的历史。

为了政治进步而提出降低社会中的国家因素的要求，会不会使其他读者感到是直接的矛盾呢？他会不会感到，如果为了整个进步要求而削弱社会中的这种因素，那不就等于一个进步的政党自己解除自己对敌斗争的最好武器吗？

关于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不断减少社会中的国家因素的想法不是什么新的思想。其实，老费希特早在他 1813 年出版的著作^①中就提出了这个思想，从那时起，这个思想曾不止一次地被阐述过。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把消除国家因素作为自己学说的基础，甚至在同进步的强大的敌人顽强斗争的时代也都否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不过这是难于使人赞同的。削弱国家因素当然要靠减少

^①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1813 年出版了他的《国家论》和《论国家或论原始国家同理性王国的关系》两部著作。——编者注

以国家力量来保卫弱者、保护思想自由等等的必要性才行。只要还存在着受法律保护的资本垄断者，只要大多数人甚至连起码的发展资金都还没有，国家力量就是那些为争取进步或促使倒退而斗争的政党力图掌握的必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只能把它当作是进行这一斗争的工具，会尽一切努力来掌握必要的工具，并用它来促进进步，镇压反动党派，但在使用这一工具的时候，争取进步的战士必须记住，它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要求进步的活动家格外谨慎地对待它。在斗争中关心强化所使用的工具是完全自然的事，不过从国家政权的实质来看，国家政权的强化在某种具体场合只要稍一超出正当防卫的限度，这种强化就可能为社会进步带来危害。国家政权的强化总是同加强社会生活中具有约束力的强制因素一致的，总是要压制个性发展和批评自由的。这就是国家手段为进步活动造成的主要困难。这就是那些在条件不具备的社会里颁布进步法令的著名改革家造成失败和带来危害的原因。在争取进步的斗争中，要在每个具体场合确定使用国家力量的程度是困难的，但是看来还不如这样假定，即这些力量只有消极地加以使用，也就是用于消除现有的文化形式造成的束缚社会自由发展的障碍时才是有益的。不过，这是一个争论极大的问题。只要国家联盟在争取进步或促使倒退的斗争中仍然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就有权把它当作工具来保护弱者，伸张真理和正义，给人们提供发展体、智、德的手段，向大多数人提供走上进步道路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方便条件；为思想家提供阐述自己思想的手段，为社会提供评价其思想的可能性，使各种社会形式增加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会阻止它们僵化，使它们成为可以改变的形式，这种改变将有利于扩大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这不仅对当代的这种国家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对个人在文明环境中所遇到的一切社会形式（如象在第八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来说也

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国家因素的辅助下，为了科学地实现人类对其他社会形式的需要而进行工作时，进步的活动家应当记住，国家组织的形式本身不符合任何特殊的现实需要；因而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进步活动的目的，在所有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一种手段，因此必须按照其他指导性的目的来变化。在生命的机能极端紊乱的情况下，可能有必要用效力最大的药物来治疗。随着病人情况的好转，药量必须减少。医生知道只有当他的患者拥有足够良好的卫生条件时，患者才会健康起来，而医疗手段也就完全不必要了。

难道人类社会竟会把永久性的政治医疗而不是把符合社会学的卫生规则的健康生活当作自己的目的吗？

第十四封信 国家的自然边界

在上一封信中我谈了社会的政治进步问题，得出了这种进步就在于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国家因素的结论。我必须指出，当代的社会制度在这条进步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很远，强迫领土上的一部分居民服从未经他们自己讨论过的生活条件的这种国家因素，是当代社会的共同规则。这种情况由于下列原因而使人们受到更大的压抑：各个国家单位都为了能在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保障而力求扩大，随着各个国家单位的扩大，它们不断夺取在居民的经济和道德需要方面越来越不相同的地区。当然，个人是没有力量来反对那个把他们居住的地方夺去变为自己的领土并使他们承担臣民义务的国家的。但是，为了保障个人能够避免这类经常不断的偶然事件，思想家们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能指明国家扩大的自然界限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够确定下来，那就可以为每一个国家科学地确定它的存在的合法性或非合法性，它所进行的征服战争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一句话，可以科学地确定一套

把地球表面划分为领土的理想办法。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领土发展的十分明确的目标，而在偏离这一目标时它就会懂得去嘱咐后代进行艰苦的斗争，这种斗争毕竟将以国家在某个时候恢复自己原来的自然边界而告结束。这种想法也许会把许多流血冲突和人们的许多痛苦从人类的历史上消除掉，因为应当这样假定：掌握着人民命运的某些领导人也许会明白过来，为了实际上同事态的自然潮流背道而驰的事情去流血和耗费资金该是多么荒诞无稽。

但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多少合理一些的原则连一个也都还没有提出来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自然边界无非是打算对某一小块地盘进行掠夺的一个幌子而已。如果仔细看一下历史上有名的形形色色的获得者的活动，那么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所追求的边界实际上仍然是自然边界，但却完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然边界。他们遵循的是一条使一个人向他的野蛮的小兄弟们看齐的非常简单的原则：能拿就拿；在这种情况下实力的自然边界也就决定了国家的自然边界。世界国家一向是这些获得者的理想。不论政府的形式，还是征服者的种族和他们的文明程度，在这里都毫无差别。塔梅尔兰^①、路易十四、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拿破仑第一、罗马共和国、威尼斯的贵族政体、北美的民主制度全都一样。

如果我们大洋彼岸的朋友们使自己的政治纲领仅仅局限于新大陆，那也无非是一种暂时的耻辱，因为，第一、控制美洲大陆的计划已经足够庞大，可以使下几代人找到不少要做的事情；第二、一个包罗整个美洲大陆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统治世界所有的国家；因此，它们的独立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最后，第三、假如第一个纲领得以实现，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妨碍制定第二个更为广泛的纲

^① 塔梅尔兰(帖木儿)(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编者注

领呢？

迄今为止在确定各国自然边界方面所提出的各项原则中，只有两项原则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战略边界和民族边界。

如果各国之间的本质关系就是斗争的话，那么对每个国家来说，把它最能保证不受侵犯的界线，也就是它能以最少的费用来保卫自己的领土不受侵犯的界线作为自然的边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有在国家准备进行防御并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防御，而且防御者的力量不太次于进攻者的力量时，这种界线才是适宜的；换句话说，只有当国家的防御能力即使在没有战略边界线的情况下也可能很强大时，战略边界线才是好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上述条件，那么战略边界在任何时候都无济于事。宽阔的江河和浩瀚的海洋，如同高山峻岭、万里长城以及不值一提的四角城堡一样，都很少能阻挡住智勇双全的统帅。对于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强大的国家来说，到处都是名副其实的战略边界，在政治上遭到削弱的时候，这种边界只能在地图上存在。

最近时期民族原则对历史事变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在第十一封信里曾谈到过个人同这个原则的关系以及一个民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成为进步的基础。但是在那里不便于对那种使问题复杂化的情况即民族冲突的情况进行分析。如果不注意国家原则，要分析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民族冲突或者表现为国家之间冲突的形式，或者表现为一个国家内部为维护国家完整和争取分立的斗争的形式。虽然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战争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之间是经常发生的，就象在属于同一个民族的各个社会之间经常发生的一样，但是最近有许多人认为，在防止未来的战争和内讪方面，被用以确定国家的自然边界的民族原则是一种最可能的手段。在这一方面这个原则表现出双重倾向：第一个倾向是积极的倾向——使同一个民族的人们联合成为一个国家；第二个倾

向是消极的倾向——使人们脱离由异族组成的国家整体。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民族原则的两个方面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进步的。

第一个方面可以概括如下：使所有通过语言、传统和生活方式而由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人们都来履行同一个国家契约，这是自然的和公正的。——完全可以理解，对于那些在政治、经济和精神要求方面很不相同的人，也可能存在文化上的联系。操同一种语言的两个集团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环境。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可能有共同的工商业中心，而生活方式相同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工商业中心。对于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来说，保卫自己的生存和防止邻国掠夺的利益，可能要求更加集中的管理和给政权以最高的特权，而这个民族的另一部分人由于所处的地形特点而具有不受外来侵袭的保障，因此无需这样的集中，而可能力求把国家契约的强制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用一项国家契约把这些形形色色的集团联合起来的过程中，究竟有什么可以被认为是进步的呢？

某块领土的一部分居民出于他们的特殊利益和需要而制订的政治条文，要由该领土的另一部分居民予以履行，而他们同前一部分居民只不过是由统一的语言和其他的一些文化特点联系在一起的，难道能说这是一种进步吗？无论是对个别人的真正需求的了解，或者是对他们之间最真实的关系的了解，都不能从这种用一项带强制性的契约人为地把很少有共同之处的人们联合在一起的做法中得到好处；在这种联合中很少能看到正义的精神被注入社会形式中去。这种联合给国土上的居民带来的只有相互的敌视，即分立主义倾向的根源，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根源要比国家解体本身更来得危险。它把国家变成一个越来越抽象的整体，而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单位，在一个国家联合时越来越把靠行政组织和武力支持的契约的强制性提到重要的地位，而不是把利益的一

致性和文化习惯以及思想方面的问题的一致性提到重要的地位。因此，一个民族的各个社会联合为一个国家丝毫也不能保证促进社会的进步，一个民族分布得越广——因而，由这个民族所组成的国家的领土越大，那么就越是可能；国家契约对居民的约束将会更加厉害并将成为社会进步的更大的障碍。

但是仍然有理由认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联合与其说是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不如说是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我在前几封信里谈过，在对社会的某一原则理想化的基础上，靠这个原则培植了享受这种理想化好处的少数人，并且由于社会的稳固，少数人就负有把这些好处普及到多数人的责任。虽然这是道义上的责任，并且包括少数人本身的利益要求，但是正如历史上人们知道的那样，这样的任务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实现的。相反，曾经享受过这种文明的福利的少数人出于存心不良的利己主义，却想自己独占文明的大部分好处，而留给大多数人的只是文明的重担。国家组织通常成为并且也能够成为实现这种意图的最得力的工具。垄断文明的少数人企图靠国家组织来巩固自己的文明的利益，镇压任何想要改变社会正常秩序的尝试，而这种改变的目的就是要把个人之间的公正的关系带进社会。但是由社会的苦难所引起的这种尝试是由个人进行的。出现了旧法律和旧政体的反对者。改革家们进行了宣传。成立了现行制度的反对派政党，这些政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朝气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唯一道路。因此，社会进步要求使个人有可能试图对现行的社会制度持批判态度，宣传自己的思想，把志同道合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和建立能为争取更正确地理解和更公正地实现社会任务而斗争的政党。否则合法改革的要求就会转而准备进行革命。反对派会变成暴动者；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会变成革命者。当然，这种争取社会进步的个人斗争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宣传或鼓动（包括口头的

或文字的),所用的语言就是其制度受到个人批判的和人们为了自己的改革或革命的目的而必须对之施加影响的那个社会的语言。然而,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独享文明利益的国家组织所要特别打击的正是这些人。所以,如果所有操这种语言的人都住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内,那么个人要对该领土上的居民施加影响就很困难了;批评的思想变得薄弱了;改良政党和革命政党的建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试图把社会推上更进步的道路的人大部分都在斗争中牺牲了,社会的进步缓慢下来了。相反,当几个独立的国家使用同一种语言时,那么它们之间不仅在政治势力范围内,而且一般也在思想领域内很快就产生了竞争。那些由于怀有批判意图而使自己在一个国家遭受和可能遭受迫害的人,可以在另一个国家找到避难所。他们的思想在自由中得到了加强。两个国家的文化条件的共同性使语言和思想容易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而不管存在什么样的障碍。进步的政党加强了,社会中实行进步改革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

历史上有许多例子都证实了这一情况。希腊世界由于分成了一些独立的中心,因此这不仅在自由共和国时代,而且甚至在专制的狄亚多希^①时代,都促进了希腊思想的发展。罗马国家的统一压制了批判思想的发展。欧洲的封建世界,尽管它的文明还处在野蛮状态,它的文化极端贫乏,但却为讽刺文学和论战文学奠定了基础,在宗教裁判所和草菅人命、无视人的自由的统治者独断专行的恐怖时代,这种文学的勇敢精神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对旧法兰西的批判在波旁王朝时期之所以成为可能和有权威,只是因为路易

^① 狄亚多希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各将领。他们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为争夺政权彼此进行残酷的厮杀。在这场战斗的过程中(公元前四世纪末至三世纪初),亚历山大的君主国分裂为许多单独的国家。这些将领就在分立的各国登上王位。——编者注

十四或路易十五都无法阻止法国文学在他们的国家边界以外的操法语的居民中间存在。如果德国的大学不是分散在那些象古代的狄亚多希一样尽管自己喜欢专制制度、而在思想领域却进行竞争的各个独立的邦里，德国的哲学思想未必就能得到如此光辉的发展和对自己的对象有如此独立的见解。甚至就古代的罗斯来说也可以发现，罗斯北部对罗斯南部的优势和后来莫斯科对罗斯的优势，在独立自主的民权丧失的情况下，是随着思想研究的削弱而向前发展的。在莫斯科罗斯，批判就只能通过斯切潘·拉辛起义和分裂运动的形式才得以表现出来。

由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各民族分散成一些独立的国家，要比操某种语言的整个民族联合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之下更能促进加入该民族的各个社会的进步。正因为如此，进步政党对在自己的政治祖国边界以外的、但和自己操同一种语言的各个领土的独立，要比对把这些领土纳入一个国家的做法更应该关心。当然，具有健全思维能力的法国进步党人在第二帝国时代本应看到，使比利时和日内瓦保持独立要比它们加入拿破仑帝国要有利得多。在不存在这种独立领土的地方，进步政党则应尽量关心这些独立领土的形成，因为它们对于个人的自由批判、传播独立思想和加强进步政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总而言之，划分领土的民族原则的积极面不应被认为是进步的，一个谋求国家自然边界的民族如果把这种谋求看成是一种进步，把所有操这个民族的语言的人都纳入自然边界之内，那是极其错误的。

民族原则的消极面具有更大的意义。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别在多数情况下决定经济、政治和思想需要方面的差别的程度，足以使国家的统一在这种条件下成为极端困难的事。在各个不同的民族联合为一个国家时，把这些民族维系在一起的契约多半对一个民族有利而对另一个民族实行约束，并引起它们相互的敌视。冲

突的结局要么是最强大的民族吞并弱小的民族，逐渐抹掉它的民族特点；要么是国家的统一越来越趋向于变成几个独立国家组成的联邦。在这种情况下，最弱小的民族为了全力保住自己的生存，便力图组成一个特殊的国家，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因为否则它们就会受到灭亡的威胁。争取自身生存的斗争是完全合法的斗争，而渴望保持国家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完全自然的事。同样，由于各大国之间的斗争，就象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国家政权努力保持国家整体的统一也是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自然倾向便发生了冲突，但是关于正义和进步的问题却同哪一个问题都没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社会党派的种种旗号一样，无论是为了实现民族原则的分立主义也好，或者是力图保持国家统一的努力也好，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是进步的现象，而在另一种的情况下却可能是倒退的现象。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各种情况的总和，而不是取决于其中某个个别的情况。

每个民族在其历史的某个时代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思想家同情的权利，要看它在自己的文明形式中谋求实现真理和正义的程度。当各民族在国家统一或分立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时，凡是对思想领域的问题持批判态度和积极谋求真正实现更正义的事业的民族，都希望为了进步而赢得胜利。一个民族如果要求依靠数量上占优势的粗暴力量，依靠同科学批判格格不入的传统，依靠早已过时的历史时代，依靠在某个时候曾以契约的形式保护过掠夺者的权益的条文，那就会在各民族的历史冲突过程中自己给自己签署判决书。历史有别于其他自然过程的正是在于历史的现象并不重复，过去的事情给它留下的只是回忆而已。如果为了过去可以改造现在，那么这样的改造就会无休无止，因为在半个世纪的过去的背后，是一个世纪的过去，接着又是两个世纪的过去，等等，等等，各有各的传奇式的冲突和希望，各有各的英雄和恶棍。过去的已

经过去了，它不可能成为现在的裁判。现在的裁判是那个在现在的真理和正义的理想(即在现在的思想家头脑里存在的那种形式的理想)中尚未得到实现的未来。

思想家面临的不能改变的自然规律，是一切事物的基础，任何最美好、最符合真理和正义的事物的愿望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思想家面临的物质、思想和道德力量在现在的实际分配，是一种由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分配，为了新的理想也不能不承认它，因为它已经实现了。思想家面临的是历史在他周围和在他自身形成的真理和正义的理想。在这些理想中蕴藏着未来的动力，这些动力的作用则受到不能改变的自然规律和历史事实的现有基础的限制。为了这些理想，也仅仅是为了这些理想，可以宣布现在的力量分配是正确的。其他任何权利在当前的历史法庭面前都不可能得到承认。一个民族想要在对自己不利的条件下通过争取生存的斗争来保住自己，就必须宣布自己是未来的美好要求的代表，而不是指靠不可挽回的过去。一个民族想要居于其他民族之上，就必须抛弃所有那些用陈腐的原则来禁锢各族人民生活的东西；必须在思想领域里尽可能严格地进行批判，在生活领域里尽可能更好地施行正义。不这样做，各民族的国家发展便没有牢固的基础。如果它们把过去的幽灵作为自己的旗帜，那么不管人们怎样英勇，不管弱者反抗强者的殊死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总是怎样赢得旁观者的同情，它们的生存也将始终是不稳固的和空虚的。如果一个民族把自己同毫无生命的僵死的原则束缚在一起，那么无论广阔的领土或庞大的物质财富都不会使它在各民族中享有巩固的统治地位，因为它的思想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的最美好的愿望将是无法实现的，它将不得不在思想和道德方面听命于比它软弱得多的那些民族。只有在真理和正义之中才蕴藏着各民族的力量。

因此，在为争取国家统一或分立的斗争中，这些因素中的那个

被写在一个完全放弃了过去的幽灵并给思想领域带来批判、为生活领域带来正义的民族的旗帜上的因素，就是权利的代表。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不包含实际内容，那么它就成为一个偶像，对它奉献牺牲是毫无意义的和不道德的。只有正在发展中的个人才能赋予概念以实际内容。只要把真理和正义的要求注入国家的概念之中，人就把偏见的偶像变成最高社会理想的不可分割的成分，为了这个理想，任何牺牲都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在国家尽管远远地、但正在逐渐接近理想的要求的地方，民族的分立作为一个无法实现的问题正在消除。北美合众国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整个世界的移民已经是第二代了，有的在第一代就成了美国人。在有史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面前，在规定种族权利平等（这种权利平等是被专门用来反对维护奴隶制的）的法令面前，南部诸州的分立派是无权显示自己的。另一方面，欧洲和南美的许多分立主义要求却经常拥有自己当然的权利，因为其完整性受到分立派奋起反对的那些国家，远不容许在思想领域中进行自由批判和在社会形式中实现正义。在这里，分立派在分立时所追求的国家理想越进步，权利就越倾向他们。而在国家统一的维护者和分立派都由于意见不同和由于过去的幽灵而争论不休，因而很少把现时代的理想列入自己的要求的那些地方，那里不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人的愿望而进行斗争，那里思想家由于舍不得费力气和流血而退缩不前。那里只有历史传奇剧的爱好者贪婪地注视着角斗士的流血斗争，注视着呼喊种种口号的过去时代的骑士的狂热的自我牺牲。荷马诗人将永远歌颂阿基里斯和赫克脱，但是为争夺美丽的海伦而进行的斗争对亚里士多德能有什么意义呢？

当一个民族满怀真理和正义的要求、决心同过去决裂和为进步服务时，它就有权坚决从约束它的意愿的国家的统一体中分离出去；或者如果它已经获得了国家的优势，它就有权采取最有力的

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政治组织(连同处于低级文明阶段的邻国一起)的稳固性和物质力量。进步的民族有权从不大进步的国家分离出来。进步的民族有权镇压不大进步的、历史上同自己有国家契约联系的民族的分立要求。但是这后一种抽象的权利任何时候都没有实际运用过,因为一个进步的民族不应当同一部分领土上的全体居民的分立主义进行斗争,而同这部分领土上的居民的一个阶级进行斗争则另当别论。例如,美国北部诸州反对的不是南部诸州的全体居民,而是极力维护自己对多数人的统治的少数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如下的场合斗争才是正当的,即捍卫国家完整的民族确实在注意改善大多数受压迫者的状况,而且要比力求分立的民族能给他们真正带来更高的社会原则。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个新形式的上面已经研究过的问题:如果国家原则在其进步发展中应该降到最低限度,那么进步政党是否应当根本避开国际政治问题而完全转向社会活动的其他方面呢?由于已经说过,历史条件是可能进行任何活动的基础,因此就应当从这些条件中去寻求问题的答案。由于最进步的政党还只占人类的少数,并且由于最进步的民族面临邻国暴力掠夺的危险,所以它们必须准备斗争,必须捍卫进步,使进步具有更多的物质力量。这样一来,进步政党在一段时间里不仅有义务通过批判来捍卫自己的思想和通过说服来实现这些思想,而且还有义务利用现有的国家组织来同领导其他国家的敌对政党进行斗争。

当然,这仅仅是由国家关系中存在着的那种掠夺和由政治战的危险所引起的暂时的义务。我们看到,政治进步在于把社会中的国家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在于消除政治契约对赞同该契约的人的任何强制性。由于这种进步会把分立主义倾向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各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借口和一些民族以国家统一

为名而压制另一些民族的借口也就会随之消失。与此同时，关于国家自然边界的问题也将失去它的意义。经济、文化或科学的暂时利益应当使社会相互接近，并确定具有一定宗旨的联邦的临时版图。这个宗旨改变、扩大和缩小联邦的边界，这个边界始终是自然的边界。至于说到最高的统一，那么正如我们在上一封信中所谈到的那样，它必须由全人类的科学巩固下来，而对于科学来说自然边界在任何地图上都是划不出来的。

应当追求的可能的前途就是这样，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不过对于过去的事，读者当然很清楚，事情并非如此。国家内部的强制性原则和国与国之间的掠夺关系占了优势。这种状况给少数在智慧和毅力方面出类拔萃的人造成了最大的困难，这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很清楚，过去的先进人物的智慧和毅力最经常和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政治问题上。当强制力量掌握在那些同引起强制的问题本身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手里时，自然就会发生滥用强制力量的情况。而这种滥用则很可能导致出现反对派、成立政党，引起各种力量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历史的最引人注目的一面就是国家斗争的历史。制定国家契约的权利实际上将属于谁呢？个人和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契约的制定、反对它的不妥之处和要求对它进行修改呢？谁会毫无异议地遵守国家契约呢？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是人们为争夺王位、争夺高官显爵或大臣职位而斗争的近因；是各政党在报刊上、在议会里、在大庭广众中和在论战场所进行斗争的近因；是各民族为争取独立或征服别的民族而斗争的近因；是各国为争取优势而斗争的近因；是优秀人物为争取政治进步而斗争的近因。

但这是历史的最显而易见的一面，是它的戏剧性的外表，是它的五光十色的服装。善于思考的历史学家的兴趣是要在这外表下面寻找更本质的东西。最富于戏剧性的时代有时只证明在不大重

要的问题上的力量消耗。最富有才干的人有时竟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花在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上。活动的胜利和成就还不能说明个人作为人的崇高的意义。历史上事实的前景应当同这些事实对人类进步的意义相一致。那种扩大起来对进步有着极为重要作用的因素，即使在它刚被察觉出来的时候也可能是有意义的。而那种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应当失去它的意义的因素，是没有多大权利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中的国家因素逐渐减少到最低限度；因而对于想要在人类历史中进行某种探索的人来说，政治历史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在各个国家每一次发生外部冲突时，就象在它们每一次发生内部动荡时一样，历史学家应当首先问一问自己：是什么样的非国家因素在这次冲突中、在这次动荡中起了作用？应当要求每个有影响的活动家总结一下：他在缩小强制性的国家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做了些什么？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止了非国家因素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的扩大和瓦解、广泛的征服措施、流血的战斗、外交计谋、行政命令正在获得新的意义，但已经完全不象在从前的历史学家心目中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了。这些现象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的气象过程。猛烈的飓风、地震、瘟疫，特别是美丽的北极光、孪生和畸形婴儿的不寻常的降生，都是一些同上面指出的过程具有完全同样意义的事实。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事实的重要性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事实的结果或事实的原因。事实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对它的精心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到身心两方面的基本现象的新的普遍规律，或者为了在未来造成事实的有益的分配或消除有害的分配。是什么样的需要和思想造成这种或那种政治现象呢？这种或那种政治现象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新的需要的出现和旧的需要的改变呢？它在多大程度上动摇或巩固了原先的文化呢？

它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呢？这是涉及每个政治现象的重大的历史问题。接着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根据这一现象来研究人的心理过程、人的思想的灵活性、人对个人发展和正义的企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根据这一现象来研究社会文化对人的心理生活的影响？解决第一类问题就会指出政治事件本身的历史意义。解决第二类问题就会说明这些事件作为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资料的重要性。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然科学高级部分的任务或文明历史的任务将会使政治历史具有意义。

译自拉甫罗夫《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选》1965年莫斯科版
第2卷第16—18、75—144、190—229页。

俄国工人阶级状况^①(摘录)

恩·弗列罗夫斯基

一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俄国的土地上，听天由命、凑凑合合地活着，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在这块土地上俄罗斯人民群众生活得怎么样，他们的境况怎么样，他们有什么要求？这种轻率的态度给他们造成了许多苦难。汹涌而起的僭称为王的浪潮几乎淹没了俄国，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暴动折磨过它，但所有这一切对我们的祖先并未产生些微重大的影响。他们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了丰富的智慧和恰当的分寸，但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如此轻率，这就更

① 恩·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初版于1869年，对竭力发动农民起义的民粹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编者注

加令人惊讶了。他们不仅在一切危急的形势中保持了独立，而且完全或部分地征服了所有的邻国，使之臣服于自己，或许可以预言，他们自己会被邻国所征服。在本世纪的下半叶我们已看得很清楚，不充分注意我们的内部事务可能对于我们是致命的危险，会使我们丧失我们最引以为骄傲的东西——我们的对外政治力量。欧洲列强很快在财富和实力方面超过了我们，五十年代我们和他们较量过了，我们看到，他们的灵巧的双手和技术知识使他们比我们具有何等巨大的优势。现在我们刚刚醒悟过来，刚刚想到仔细观察一下我国工人的状况。工人状况是令人可怕的。当然，这一事实有其纯属历史的根源，不能责备我们。拿一个人的父亲和祖父所做的事去责难这个人，无疑是不公允的，责备他败坏了他的祖先创建的家业，这是对他进行十分轻率的指责。即使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毅力去正视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象可怜的胆小鬼，眯缝着眼睛，挥挥双手，竭力掩盖和粉饰实情，那么人们也可以据此而公正地责备我们畏缩。当然，纠正其他人搞糟的事业是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但是如果这件事不幸落到了我们头上，那么我们最好是理直气壮地接受自己的命运，不要回避，而要无畏地睁大眼睛走自己的路。一俟我们有了足够的勇气决心去做这件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希望并未消失，我们不仅能纠正我们的事业，而且能起伟大的历史作用；要知道英国已超过了西班牙，而西班牙在十五世纪时曾不可一世，比利牛斯山脉拱卫着它，阻挡敌人的入侵，它能够控制地中海和大西洋，占有美洲最富饶的部分，在许多方面有更多的机会在世界生活中占居现在英国所占居的地位。如果我们确有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希望起这种伟大而光荣的作用，那么我们不应忘记，只有在自己的心灵中培育更完美的感情、建立更完善的世界观的民族，才能居于文明之巅，引导人类前进……

当我考虑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时，当我看到我们跟着欧洲

文明亦步亦趋时,当我想到把我国与波斯相比较,想到波斯曾和我们一样伟大,但由于它和我们一样跟着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亦步亦趋而溃灭时,我看到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实现前人从未着手实现的伟大思想。不应有任何怀疑,如果全世界都看到,我们社会的最高阶层和最低阶层走向同一个目的,在一条道路上寻求自己的幸福,如果全世界通过我们的生活获得明显的证据,证明社会各阶级的不协调不是天然的必然性,而是世界文明的人工产物,那么不仅我们的斯拉夫邻国,而且全世界都会好奇地注视我们。如果我们能用如此坚固的混凝土把我们社会的一切部分结合起来,我们的力量该有多么巨大……

首先我们应该确信,在我国,人民的幸福直接取决于它的社会地位,那些竭力把人民的贫穷归咎于他们无所事事、酗酒等等的人,是在使公众陷于绝大的错误。从我国各种工人阶级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幸福是直接和份地的大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徭役的多少成正比的,不仅这种对比,而且我国境内实施的一切办法无疑都能证明上述真理。我们的哥萨克比国家农民富有,国家农民比皇族领地农民富有,皇族领地农民又比临时义务农民^①富有。在同一个阶级之内,财富也是和份地的大小及其富饶程度相适应的。如果我们把新俄罗斯^②的哥萨克同顿河哥萨克、黑海沿岸哥萨克和乌拉尔哥萨克作一比较,把伏尔加河沿岸萨拉托夫省和阿斯特拉罕省的各哥萨克村镇作一比较,把富饶土地上的国家农民和贫瘠土地上的国家农民作一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我国的德国移民处于比我国农民更有利的地位时,他们却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证明,在同样条件下他们保障自己幸福的方式一点也

(1) 指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法令颁布后对地主仍负有义务的农民。——编者注

(2) 新俄罗斯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时对欧俄南部黑海北岸和亚速海沿岸一带地区的总称。——编者注

不比我国农民的方式优越；只有使移民摆脱了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移民区才会开始繁荣起来，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就能使人推测，如果俄罗斯人获得这么好的优越条件，他们的生活就会幸福得多。在比萨拉比亚省，保加利亚的移民享有接近于当地移民的优越条件，他们过着几乎同样的幸福生活；在栽培果树方面他们甚至远远超过当地的移民。有一些哥萨克村镇比保加利亚人和移民都更富裕。只有对于游牧的或半游牧的、不定居的或半不定居的异族才能说，民族对于他们的生活有重大的影响；而在我国境内定居的一向务农的所有民族中，你看不到这种情况，这些极不相同的民族的贫困和富足完全是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相适应的……

死亡率的统计表明，各民族的死亡率没有什么不同，甚至移民中间的死亡率一点也不比生活条件相同的俄罗斯人的死亡率更低，但是同一统计却显示出各社会集团的死亡率大不相同，从享有优惠的农民起至负担最重的农民止，死亡率经常在增长，甚至和负担的程度直接成正比。

从我国工人的地位所作出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完全推翻了西欧学者们认为无偿地帮助工人们改善生活是有害的办法这一观点。俄罗斯是工人们享有优惠和特权地位的国家。经验表明，一切特权、一切优惠、一切无偿的帮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产生增进生活福利的直接结果。在国外人们认为那些德国人不可能由于获得无偿的帮助而富裕起来，但他们所以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正是要完全归功于这种无偿的帮助。各地无偿地分发土地具有特别良好的效果。以往的例子十分明显地表明，不管分发的土地有多少，总是会带来好处的。不过，反对无偿帮助的人们的论据经常被他们的整个行动方式所推翻，——他们是怎么干的呢？他们建造房子，以较低的价格出租或出售给工人们，他们向工人们按较低的利息提供贷款，按较有利的价格出售商品，最后，他们还提供无息

贷款，给予无偿的援助。照他们的话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做了好事。无论低利贷款或廉价的房子都是无偿的援助，他们的全部思想只不过是做买卖。这里问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给，而在于应该不应该让给一个戈比或三个戈比。他们认为只能让给人民一个戈比，但是不那么吝啬的人可能会认为，不妨让给他们三个戈比。不过我们都知道发给金钱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的一些例子，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把这些钱发给人们是为了达到不能达到的目的的时候。例如，在西伯利亚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得不发钱给移民来经营农业，而钱是发放给那些从未耕种过土地、从未收割过庄稼、完全不会经营农业的人们的。这些人往往靠领到的钱过日子，花光后便去当工人，以便学会那种认为在奋发图强下他们能够胜任的行当。如果外国拥护这种无偿帮助的人们反对这样使用金钱，那么他们是对的。如果我们不是从斤斤计较的小商贩观点，而是从稍高一点的人道的观点来看这件事，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人民的贫困是无穷无尽的，有学问的人的使命就是要用一切办法给以帮助。在他的面前始终有两条路，走这两条路，他的活动就会是有效的，就会是必要的。一条道路是借助于社会舆论，在社会成员内进行活动，以改善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另一条道路是个别的局部的活动，他凭借自己个人的钱财去消除个别人的困难处境，引导他们走上顺利的道路。

至于一般的措施，我们当然首先应该注意对待土地的态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农民表现出的分寸得当和感情健康比西欧的农民要强得多。他们懂得西欧农民永远也不懂的伟大真理。他们明白，首先要关心不使任何一个农民丧失自己的产业。经营自己的产业不是闹着玩的事，必须从小就适应和习惯于这种事情。西欧的农村无产者不可能很快做到这一点，也许永远也做不到，在西欧的土地上我们又能看到罗马的大地产。西欧的政治经济学徒

然地宣扬什么生产效率最高的土地就是耕者手中的土地，按照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原则土地永远也不会达到高产的目的。小土地所有者将永远是骑在自己兄弟脖子上享有特权的工人。村社土地所有制至少能在村社内部工人之间合理地分配土地。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他为充分经营家业所必需的地块；会拨给他草场、林地、大麻田以及一切土地，只要不损害别的工人，能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小土地所有者获得土地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在父辈那里应有尽有；如果他是独子，他就会幸运，如果有三个儿子，他就只能随便分点什么。小土地所有者为此流了不知多少眼泪；农民得到了一块土地，但没有经营家业所必需的一切，他就会乐于用他那一部分土地去换取他所必需的东西，不过他很少能遇到这种机会。在重新分配土地时，农民们不仅能够给予每一个人全部必要的土地，而且能给以最大的方便。在土地很多的村社里，远地可以不分配随它荒芜，近地则重新分配；在重新分配时有时只分最好的土地，有时也分配林地，这是为了防止私砍树木。如果西欧由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村社能这样重新分配自己的土地，那么它就可以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了，在小土地所有者中只能听到抱怨的声音，他们埋怨不能增大自己的产业，但不幸的是他们永远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需要有重新分配土地的习惯，适应重新分配土地的能力，以及从未重新分配过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根本不可能具有的品质和方法。然而我们有些俏皮而机灵的作家把这种分配土地的正确办法当作村社土地所有制的过错，说什么这是分散了土地，根据周密思考和按照制度进行的分配似乎与命运偶然地把土地分散成小块是一回事，这样有的人得到他根本不需要的土地，仅仅因为他是某一个农民的表侄，有的人得不到他所必需的土地，只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亲戚。他们这样理解事情，便喋喋不休地说什么村社土地所有制不巩固。如果村社土地所有制真是不巩

固，难道在我们村社的土地上种植大麻能具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吗？我们的这种产品甚至在国外贸易中都享有盛名，只不过最近在我们农民被弄得极端贫困、他们的畜牧业大大缩小的情况下，美国人才开始占了我们的上风。在我国，大麻的种植之所以普遍，是因为农民特别关心为大麻田施肥；他们有时把自己的全部厩肥都施到大麻田里，精心管理这块土地，他们从未想到过，有谁会在这块土地上欺凌他们，夺走他们这块土地。施肥充足的大麻田的收成能比贫瘠土地多三倍，如果种植大麻要担某种风险，那么谁也不会去种植了。不仅在地多人少的地区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大麻，而且在人烟稠密、土地贫瘠的地区也大量种植大麻，在这种地区，一小块施肥充足、土壤改良的土地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很高的价钱。在村社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能获得最好收成的证据是很多的，很有说服力的，群众在这方面怎么会被迷惑，真是令人惊讶。种植大麻以后可以种瓜。种瓜业在我们所有高产的省里，甚至在那些一平方米里亚^①有一千五百个居民以上的省里都得到了推广。例如，在每平方米里亚有二千八百三十一个居民的哈尔科夫县就有瓜田。瓜田的收入比大田多得多，一俄亩瓜田的年租金常常超过土地的趸卖价格。为一俄亩瓜的支付的租金有时相当于彼得堡近郊播种快熟马铃薯的一俄亩土地，而在彼得堡马铃薯可以卖很高的价钱。如果村社土地所有制不能为各种作物提供必需的稳定条件和必要保证，种瓜业能在村社的土地上推广吗？至于村社土地上广为种植各种蔬菜，可以说也是这样。烟草要求特别精心的照管——一俄亩烟草提供的收入高达二百卢布。在村社的土地上种植烟草比地主土地上的情况要好得多；我们的大地主是不会精打细算的农业主，他们完全象不会精打细算的企业主和工厂主一样。

^① 旧俄时一米里亚等于七俄里，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公里。——编者注

他们习惯于靠地租过活，只会白白地糟蹋落在他们手里的土地和劳动的生产力。在农业中，他们总是醉心于采取只有在人烟稠密得多和居民富裕得多或气候条件良好的地方才有利的耕作方法。这些妄自尊大的老爷坐在地租钱口袋上，高高在上地看待一切，但他们也需要极为重要的高度生产率。如果他们种植烟草，那么他们一定要努力栽培高级品种的烟草，他们花了很大的代价，只获得很少的收成，而且收得的烟草也并不好，销不出去。靠自己的劳动过活的农民不能种植这种不适宜的作物，他要是这么干就该饿死了；但是国家从向地主缴纳的高额的代役租中得到的好处就在于地主的土地因种植不当而变得没有生产效能。种一俄亩白菜可得二百五十卢布，甚至种一俄亩葱也能得二百卢布。生产这些产品的土地和种植其他蔬菜的土地一样，要求精心管理，而在村社的土地上栽培用来出售的蔬菜，甚至在那些土壤最不肥沃，施肥充足、耕作精细的地价很高的地区也都是极普通的事。至于满足自己需要的菜园，那么大家都知道，它们到处都是农民的家产，如果农民没有菜园或没有好好地经营菜园，那就不是村社土地所有制的过错了。甚至那种要求长期占用土地的作物也没有遇到来自村社所有制的任何障碍。果树无疑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作物。在只有果园才能获利的地方（包括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居民最为土地而发愁的地方，在拿出一小块土地都很诱人的地方，村社的土地上都种植果树。在库尔斯克省，果园业非常发达，以致该省完全占居了俄国北部和中部的市场。就人口密度而言，超过该省的只有莫斯科省和波多尔斯克省，然而这些地方村社的土地上都出产水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村社所有的土地有各种不同的土壤，从最肥沃的土壤起至最贫瘠的土壤止。特别是在伏尔加河上游那一半流域，这种情况最为常见。这些土地不仅十分公平地分配给村社社员，而且是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耕作的。农民们非常清楚，为了获得满意的收成，

每一块土地需要多少肥料：有的土地一俄亩施厩肥达八千普特，有的土地一俄亩只施两普特厩肥，有的土地上则完全不施肥。在这些地方农民们非常重视厩肥；为了增加厩肥的数量，他们费了很大气力。这些贫瘠土地上的农民有时到十五俄里外或更远的地方去弄厩肥，运到自己的地里。他们取得厩肥极为困难，如果他们耽心别人会夺走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那么他们不仅不会为每俄亩土地运八千普特厩肥，甚至连一车也不会运。在沙地和最贫瘠的土地上，农民们还采用一种方法：从邻近的沼泽地运来沃土，铺在沙土上以提高地力。为了证明私有制的巨大好处，人们援引这样一个事实：在人口稠密的多山国家里，小土地所有者把山谷里的土运到不毛的山上，以便种植果树；在我国人口极为稀疏的地区，可以说村社土地更是如此，农民们把沼泽里的污泥运来，把村社的沙地甚至不只变成果园，而且变成肥沃的粮田。也许人人知道，在我国没有森林的地区农民在村社的土地上栽种了数千俄亩树林。在村社的土地上栽种并保护森林是难是易，从下述的事实可以看出。在我国，人们往往认为农民滥伐森林，因而对他们百般指责，然而，甚至地主们都在官方出版物中承认，森林在村社制度的影响下是最容易保护的。为此只要村社禁止砍伐树木就行……

就鼓励劳动和守规矩而论，村社土地所有制具有私有制的一切优点；但是这种制度是非常灵活的，它把土地几乎完全交给耕者经营，使所有农民群众都有自己经营的习惯，独自经营还是共同经营，视劳动的成效而定；在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村社生活和劳动组合生活的萌芽，而西欧的无产者完全失去了村社生活和劳动组合生活的习惯，这是他们的极大损失。除了这一个巨大优点外还有另一个同样也很重要直接由此而产生的优点，即土地只能占有到为耕种成功所必需的程度。牧场的占有不如耕地的占有牢固，耕地的占有又不如大麻田和菜园的占有牢固，而大麻田的占有又不如

果园和房基地的占有牢固。这种牢固程度直接与农业的现实要求相适应，随这些要求的改变而改变。在这里不仅全村社对事情的看法起作用，个别庄稼人的私人看法也起作用；如果个别庄稼人想按照自己的打算单独建立自己的家业，如果他建立自己的家业而完全不妨碍公共事务，他是不会受到村社阻挠的。在我国，这种单独的经营和占用空地的情况并不少见。可见，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农民可以单独经营自己的经济，他只要请求村社分配给他一份土地，村社就会拨给他单独的地块，这是常有的事。说句公道话，这种制度具有很大优点，同时又具有灵活性，如果由于某些情况在分配份地时实在无法避免得罪某个庄稼人，那就给他补偿金钱。如果该地区的条件允许，可以准许农民自由耕种土地，按照耕作土地的收入分配赋税负担。这种办法带有许久以前遗留下来的痕迹。例如，在科斯特罗马省的顺根斯克村社中啤酒花地是按照人头平均分配的，而在莫斯科、尼科尔斯克耶及其他地方的村社中每个业主可以尽量种植啤酒花。啤酒花地已早就登记在册和分成称为“戈比地”的地块，并按此来分配赋税负担。这种赋税额现在已远不是戈比了，在各个不同的村社中为“戈比地”缴纳十二至二十八个戈比，甚至更多。要了解村社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相比较具有多大意义，只要把我们的村社所有制的历史与独院小地主^①所有制的历史作一对比就行了。独院小地主的小块土地是继承下来的。很快这些土地就以最不正确的方法进行了分配；有的人得到的土地十倍于另一个人，有的人则什么也得不到，而完全成为无产者。许多诉讼案件都发生在独院小地主之间，使他们彻底破产；最后以至无法分清他们的地界。拥有合理分配的村社土地的俄罗斯

^① 俄国农奴制时代低级官吏后裔出身的小地主，土地不多，可有农奴，并与农民同样负担赋税。——编者注

农民完全不习惯这种混乱的状况，这种混乱状况使独院小地主也忍无可忍。正是这种混乱状况经常存在于西欧的小土地所有者中间，他们把它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抵押和再抵押的土地、在诉讼中判不清的土地或由于缺乏符合经济要求的设施而毫无用处的土地，是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共同灾难，这种灾难还有一条巨大的尾巴——农村无产者。我们知识阶级的聪明人尽想说些不吉祥的话为我们的农民招来这种灾难。正确地经营经济在独院小地主的土地上最后变得完全不可能了。他们在绝望之余抛弃了自己的土地，放弃自己占有土地的农奴制权利，合伙要求把他们的土地划归村社所有。因此，在农民临解放之前，许多地方独院小地主的土地已有一半归村社所有。众所周知，即使外国移民也很快就明白了村社土地所有制的优越性，并要求在他们中间实行这种制度。有时他们被从故乡带来的观念弄糊涂了，离开了均等地分配土地的正确分配原则，借口是各种各样的，例如，说这是为了给予每一个农民以他所能耕种的土地，为了使土地不致分割成太小的地块。在这种情况下后果是极为可悲的，他们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使得无产阶级遭受苦难，生活在使他们实在无法生存的条件之下。在塔夫利达^①移民地就存在这种悲惨的景象，在这里尽管土地极多，但产生了无产阶级。

农民作了一切努力，用正确和最好的办法在他们中间分配劳动工具即土地。他们发展起来的设施是如此完善，以致我们的知识阶级都不能理解，正如我们的贵族不明白在他的工业企业里农民获得成就的秘密和在目不识丁的商人发财致富的地方他们却遭到破产一样。只会以人为的办法去发展自己的人为需要的人永远不能理解劳动者在实践中取得的智慧。当农民走不下去时，他就

^① 克里木半岛的旧称。——编者注

结束自己的任务。他已在村社内部正确地分配了自己的土地，他只须在各个村社之间正确地分配土地就行了。对于这种分配，毫无疑问，他是完全胜任的，他培养了为此所需要的一切品质。当个别村社出现缺少土地的情况时，村社的成员们很容易就在他们之间商量好和安排妥迁居事宜。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另一部分人愿意迁走，有时甚至违背上司的旨意自愿到上千俄里以外的地方去。同样，在土地充裕的地方，村社准许移民到自己的土地上来，不加阻拦。西欧的小土地所有者对于这种好心一定会感到奇怪，也许还会认为这是野蛮，然而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摒弃过分贪婪的最好学校。农民要是排挤别人，以获取不是靠自己劳动创造的、因而认为不是完全属于他的东西，他就始终感到问心有愧。我知道有些村社拥有养鱼的湖，但他们不敢禁止任何人捕捉不是由他们双手养活的鱼。他们把树枝扔在湖底，使人们不能用会使鱼类灭绝的工具捕鱼，因而对任何人捕鱼都不加禁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村社成员想在村社的土地上办养蜂场会遇到什么阻碍。有些地方在森林和沼泽地采集苔藓、蘑菇、浆果和其他森林产品能使农民家庭得到很多补贴，甚至在这些地方，这种营生也和村社土地上打猎一样很少受到排挤。俄罗斯农民对于禁令是非常厌恶的，这种厌恶的感情很难加以克服，而且很少克服得了。不管这种厌恶的感情多么使人不舒服，但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特性，它比那种靠禁令和排挤来获利的习性有益于人类一千倍。

农民很难在他们中间发扬这些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特性，他们也很难维持这些特性；贫困的命运常常使他们道德败坏，经常使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而且要使他们的劳动生活获得成效需要做相当多的工作。仔细分析起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劳动要有成效，就需要做更加多得多的事情。农民只有通过经常的锻炼才能养成这些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农民群

众锻炼得习惯于村社土地所有制，如果村社土地所有制只是村社中少数特选人物的财产，象西欧无产者之间的协会一样，那么这种制度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发展。只有广大农民群众得到训练才能产生应有的结果；我们的农民已获得了美国人、英国人以及每一个理解到小土地所有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农民只能为之望洋兴叹的东西。农民们竭力通过均分土地在他们之间实现公正，而掌握各个农民村社之间土地分配的上层却从来不遵循这类原则，从来没有想达到这些目的。他们经常依据的是偏见、偏执的观念或海外学说，他们处理事情经常象处理他人的事务而不是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他们在份地和赋税负担方面都尽量弄得极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劳动的条件上没有任何根据，纯粹是由外部造成的，现在必须尽可能彻底纠正这种糟糕透顶的状况。在纠正的时候不仅必须与业已确立的关系方面的自然障碍，而且必须与知识界人士的无数偏见作斗争。起初我们的知识界受到前一世纪欧洲的偏见的影晌，力图制造特权状态，而在农民阶层中制造特权状态到了这种地步，以致土地分配采取了最不正确最不经济的方法。一百年前谁也没有说过，土地是劳动的工具，为了社会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尽可能正确地在劳动者之间分配土地。那时人们说：土地连同农民是供养国家、贵族和军队的收入来源，因此，农民和工人应该从土地上只获得必需供养这些人和支付地租的收成。土地固定归国家、领主、地主、哥萨克和异族军人所有。农民越是为知识界所重视，被看作特权阶层，也就越富有；没有特权的农民的主人越显赫，这种农民便越富有。独院小地主、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同享有特权的人们和军人一样，收入最多。其次是皇族领地的农民，再其次是国家农民，然后是豪富贵族的代役租农民，最后是一般地主的农民。在这些种类的农民中间又根据这同样的顺序分为许多类别。由于所有这些观点没有任何明确和合理的依据，因此只能导致混

乱。不知为什么顿河哥萨克军享有特殊的偏爱。我们是欧洲各民族中最不尚武的民族，我们把自己想象为天生是对外征服的人，大概是因为我们觉得赋税太轻，国家义务太少吧！我们把哥萨克特别是顿河哥萨克看作是本民族的军人组织，由于这种想法我们牺牲了俄国最好的地区之一，牺牲了千百万人的幸福。顿河哥萨克军的土地有十三万五千平方俄里，有一千二百四十万零九千俄亩耕地和草场，共有九十四万九千六百八十二个居民，如果其中不算二十八万二千二百八十八个和俄国其他地区一样靠小块土地过活的临时义务农民，那么它的人数还要少得多。库尔斯克省、莫斯科省、波尔塔瓦省和图拉省只有十二万九千平方俄里土地，共有一千零四十七万一千俄亩耕地和草场，却生活着六百四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人，比顿河地区几乎多六倍。邻近几省中有些居民迁移到西伯利亚去，而顿河哥萨克军地区有些地方的人口比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大部分县要稀少，甚至比大汗国和野蛮的吉尔吉斯人的地区稀少。我们把土地看作国家和少数特等幸运者的收入来源，而不是看作国家繁荣昌盛的源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仅是土地以最不正确的方法在农民之间进行分配，而且在那些土地最多的地区农民常常得不到土地。

甚至在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之间，土地也是以最不正确的方法分配的，所有正确分配土地的法令都没有执行，这造成了诉讼案件。有些乡里，巴什基尔每人依然只有不到九俄亩的土地，而其他人则有六十多俄亩。国家农民之间的土地分配完全取决于国家产业部的各种毫不相干的想法，这种分配极不正确：俄国北部尽管居民最稀少，农民却苦于缺少土地。沃洛格达省七个北部县份，四十六万二千六百四十四个国家农民只有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一俄亩份地，而梁赞省四十五万八千一百五十二个国家农民在六十年代却拥有独占土地七十九万八千二百一十二俄亩，还有十七万

四千五百六十四俄亩插花地和有争议的土地，共九十七万二千七百七十六俄亩。沃洛格达省北方各县的农民拥有的土地很少，几乎只有梁赞省的五分之一，因此他们要求移民，而国家在这里却占有三千三百万俄亩土地，可是在梁赞省国家总共只占有一百万俄亩。这种状况在森林主管部门的官吏们看来可能是很有利的，但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则是无益的，从人民福利的观点来看甚至是极端有害的。大片土地在收入来源的借口下作为林区掌握在国家手里。这些林木常常占据广阔的土地，它们很适于作为耕地或草地，但不宜于培育哪怕是作劈柴用的树木。而且，大部分北方的林木都是只能作劈柴用的小树，毫无用处。有用的国有森林不是被企业主不合理地砍伐和破坏，便是毫无收益地闲置起来，甚至在可以带来收入的地方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国有森林只会产生许多滥伐森林的牺牲，这些牺牲占我国全部犯罪者的四分之一以上；同时，国家的森林还使国家丧失许多土地，这些土地本来是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的，但它们对林业却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在国家农民之间不正确地分配土地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各省，而且存在于一个省和一个县以内；有的村庄每人平均只有半俄亩土地，而另外有的村庄每人份地竟如此之多，甚至都不需要重新分配。可经营土地的分配更不正确。有的村庄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森林资源，而有的村庄却连树枝都没有，连一个可怜的灌木林或一百棵树都没有。有的村庄拥有一个鱼产丰富的湖泊，而有的村庄则除了贫瘠的土地以外什么也没有，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作补偿。所有这一切都是国有土地的主管部门造成的，这个部门是唯一还多少关心更正确地在农民之间分配土地的机构。国家产业部夸耀说，它接受了三万份有关分配土地的呈文。地主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情况更坏，甚至没有任何办法加以比较。国家农民一般占有的土地比较多。例如，在梁赞省，四十五万

八千个国家农民拥有九十七万二千俄亩土地，而七十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六个地主农民则仅有九十七万五千五百五十六俄亩。另外，这些土地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尤其不正确。地主最好的土地划归庄园，甚至拥有最好土地的最大地主还有数千名劳役农民。甚至最大的地主大部分也只是把较坏的土地以代役形式租给农民。另外也还有农民分得了大片森林和肥沃土地。在二等的、中等的和贫穷的地主的土地上拨给农民的份地几乎总是最坏的土地；这些份地都是完全不长庄稼的沙地或满是小石子的土质更坏、只会毁损庄稼的土地，还有沼泽地、远地、插花地和有争执的地。地主们还往往以给予农民很多份地而自傲，他们要人们相信，他们的农民每人有七至十二俄亩土地，但一经查对，原来这些土地都是不毛之地。农民由于没有其他土地还是进行了播种，糟塌了自己最后的种子。地主的耕地都在庄园周围，都在一个地方，都是最好的土地，而农民的耕地却都远离村子，分散在插花份地之间，农民在耕种时往往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这些土地是有争执的，对方不容许他耕作，对他进行威胁或者在夜间偷偷地去毁掉他的庄稼。这种两个或几个地主之间有争执的地块往往分给农民。分得这种土地的几个村庄的农民在一起商定，对只会被他们的地主造成混乱和争执的地方加以整顿。地段按照农业用地划分为耕地、草地等等，然后耕地和草地按照土壤划分，这样划分出的地块再按照村庄的数目来划分，然后各村再按抽签结果获得地块。这一切都是由各个村子派出的几个代表办理的。在这之后每一个村社再把分给这个村社的地段按照自己的情况分配给农民。当农民这样进行整顿以后，有所觊觎的地主又会出现在舞台上，阻止已开动的机器运转，使已经变肥沃的土地又变成不毛之地。甚至令人奇怪的是，地主在实施法令的情况下是怎样从这些坏地中找到更坏的土地作为份地分给农民的，这引起农民们普遍的抱怨，他们得到的土地又

少又坏。地主们甚至把农民们不能耕作但还要缴纳地租的有争执的土地也变为份地。

农民们心平气和而简单纯朴地协调了自己的关系，甚至在土地所有权有争执的困难条件下找到了使土地肥沃起来的可能性，而很大一部分知识阶级的人却只想着分地。只想着从村社占有的土地中挖去尽可能多的土地。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吸农民的血，吸我们所有人的血，吸俄罗斯人民的血。解放后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同时又是最严重的危险。我们大家，全体俄罗斯人民，将落入一小撮人手里，他们将任意压制我们，随心所欲地饿死我们。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共有宜耕地八百四十九万七千俄亩，其中地主占有六百一十六万八千零三十七俄亩，即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上。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三十三个省中，村社土地所有制居主导地位，在三亿三千六百七十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俄亩宜耕地中，地主占有五千七百九十三万五千俄亩，即只占百分之十七。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地主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而我们这里的地主只占有六分之一。这种情况当然是极为有利的。地主不能够奴役俄罗斯人民，他们不能任意规定价格，不能迫使我们按照他们规定的价钱购买他们的产品，我们将有足够的资财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要和国家的需要，我们不会被迫把我们的血汗用于供养那一伙富有的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我们的祖辈为我们确立了村社土地所有制，确定了农民占有土地和地主占有土地的这种比例，他们是无知识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不是愚蠢的人。地主占有和农民占有土地的这种比例说明为什么是我们统治着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而不是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贵族统治着我们。这个原因逃不出西欧国务活动家们的敏锐观察力，卡富尔不无理由地说，我们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对西欧的群众来说很富于诱惑力，它对西欧各国的威胁胜过我们的军队。但是我们却象乞求沙皇的青蛙一

样,对这种自由的生活和独立的国家赋烦了,我们想体验一下,在异族统治下生活是什么滋味,于是我们急于造成这样一种状况:说不定可能让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德国人来支配我们,而不是我们支配他们。除地主外,我们还造就了其他大土地占有者,我们造就他们时是如此坚毅,以致现在在村社占有的三亿三千六百七十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俄亩土地中,国家农民、领地农民和原来的农奴只占有七千一百零四万三千二百俄亩,而大土地占有者却拥有二亿六千五百七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俄亩,现在在我国大土地占有者已占有全部宜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九。农民的土地总共只占五分之一。非地主出身的大土地占有者就其占有的土地数量而言已可与地主相比(前者占有土地五千二百五十万俄亩,地主占有五千八百万俄亩)。这里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不仅正在毁灭现在,而且为将来的俄国准备着无穷的灾难。大土地占有者增加得最多的不是地少人多的地区,而是地多人少的地区。如果把每一平方米里亚土地的居民不到一千人的十三个省从上述三十三个省中分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省有宜耕地二亿四千四百八十二万八千二百俄亩,即占三十三个省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二。在这个数目中属于农民的一共是三千四百六十九万六千俄亩,即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四,不到七分之一。在这些地多人少的地区除国有的土地外,属于其他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共九千四百一十六万六千二百俄亩,即大土地占有者占有的土地的数量和农民占有的土地数量是一与二点七一之比。在俄国其他二十个省里我们看到有九千一百九十六万零九百六十俄亩土地。其中属于农民的有三千六百三十四万七千二百俄亩,即占百分之三十九以上,几乎是地多人少地区的两倍多(二点七九倍以上)……这种现象极为重要,它向我们直接表明问题的实质。它最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证明,在俄国,大土地占有者的增加不是取决于农业的经济条件,而是取决于上

层阶级在社会政治上的追求。如果大土地占有者的增加取决于必需改善耕种技术和劳动组织，如果土地转移到上层阶级手里是因为他们能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那么大土地占有者不是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而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增加起来。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稠密，合理经营农业的意义就越大。人们常常说，大土地占有者象有知识的人和聪明人一样，比劳动农民更善于合理经营农业。这一结论是很体面和诱人的，但不幸的是它被实践彻底推翻了。大土地占有者确实较有知识，但是，一方面，他们不会合理经营农业，因为他们太富有了，太漫不经心了，或者根本不关心土地，或者沉缅于理论上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另一方面，合理经营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剥削，而不是要提高劳动的效率。因此他们只有一个办法，通过政治阴谋来独占土地，以便靠社会和他人的劳动而生活。人口越是稠密，合理使用土地的要求越是强烈，我们社会反对这些政治阴谋的斗争也就越激烈，因此，在地少人多的省份大土地占有者所攫取到的土地比地多人少的省份要少。然而，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牺牲了后世子孙的利益。为了向读者说明俄国从大土地占有制可以获得什么利益，我以奥波奇卡县为例，这里每一平方米里亚土地居住着一千零四十个人，这就是说，超过我们认为的俄国地多人少地区的居民最高数额；在这个县里有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八俄亩土地属于农民，二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俄亩属于大土地占有者。可见，几乎有一半的土地属于农民，然而还是要指出，这个地区比较地说非常需要土地。大土地占有者究竟是怎样使用自己的土地的呢？农民在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八俄亩土地中耕种九万零二十三俄亩，即百分之四十四，而大土地占有者在二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俄亩土地中耕作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五俄亩，即百分之十一——不到前者的九分之二。村社土地所有制兼有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的一切优点，它完全不需要任何其他土

地关系。我们在上面看到，土地是如何在村社成员之间分配的。仅仅这种分配就有极大的好处。在没有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地方，雇农大量增加。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有五千九百八十五个分得土地的移民和六千二百七十二个无地的移民，可是在移民地平均每人有七点七俄亩土地。在比萨拉比亚省有六千九百九十二个分得土地的德国移民和五千六百三十七个无地的移民，可是这里平均每人有十俄亩半土地。一无所有或只有一个庭院的农村无产者也分布在西部边区和高加索。甚至在农民村社不是占用自己土地，而是占用他人土地的地方，村社土地所有制也有极大的好处，因为村社土地所有制能使租地的农民摆脱爱尔兰佃农那种可伶的处境。在村社土地所有制下比例只能由习惯和法律来决定。众所周知，在爱尔兰，在习惯而不是大土地所有者的专横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地方，便没有造成纷扰不休的灾难。在西部边区和高加索，大土地所有者夺取了那些没有履行自己义务的农民的土地。这种夺取对他来说是最为有利的，因为这样立刻就可以结束合法的或习惯的租佃，而开始象爱尔兰式的专横跋扈。在村社土地所有制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没有交足代役租的时候村社可以酌情把一块土地租给土地所有者三年，以补偿他从这块土地可以收取的代役租。夺走村社的土地是很困难的。有人认为，村社土地所有制会成为扩大种植和改善经营的障碍，这表明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村社土地所有制。我们的村社根本不是只使用自己的土地，大多数村社都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租出去。精明而熟悉农业的人可以从村社得到一块土地，来加以改善或合理经营，这比从地主和大土地所有者那里得到土地要容易得多，条件也有利得多。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同村社打交道比同地主打交道要痛快得多，因为村社不苛求，不小气，这里佃农的地位要稳固得多。我就知道有些地块租给一个人好几十年，没有任何条件，没有发生过些微不愉快的事。至

于高级形式的劳动，在农业组合中的共同劳动，那么村社土地所有制为此当然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对于有知识能劳动的人来说，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比使他的知识和劳动屈从于傲慢的寄生虫的私有制好得无可比拟的活动场所。私有制压制知识和劳动，它怎么能促进农业呢？村社土地所有制使知识有用武之地，因此它比私有制更能大大地提高劳动效率。

西方的经济生活现象向我们表明，只有当土地为完全靠自己双手的耕者占有时，才能对土地采取唯一正常的态度。无论在我国或西方，我们看到，大土地占有者最不善于有效地耕种土地。其次就要数自己劳动和有雇工的承租人和中等土地占有者。我们看到，我们的租地农民比大土地占有者往往更善于获得收入。在西方，甚至在象英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里，大土地占有者不仅经常把自己的土地出租，因为他们自己不会从土地上获取收入，而且常常由于自己的干预而使生产变得更不经济。各种小算盘和偏见使他们去做那些毫无道理的事情。有一个勋爵，吝啬成性，他禁止工人住在他的土地上，以免替他们这些穷人纳税，因此工人们每天必须从几俄里外跑来上工；这样当然减低了劳动效率，增加了工资开支。大土地占有者都喜欢干预耕作土地的方法，在我国，他们自己不会耕种，可是还要强迫承租人接受他们的荒唐规则，他们以为他们的规则是合理的。在比利时和英国，土地所有者十分厌恶承租人，以至出现这样的建议：严禁土地所有者干预承租人支配土地，强迫承租人接受他们的种植方法。可是要颁行这种法律会使土地所有者丧失他们最基本的权利——支配自己土地的权利，就是因为这一点，这一法律未能问世，虽然要使农业获致成效，非常需要这一法律。大土地所有制没有象在意大利一部分地区和西班牙那样使国家完全破产，这种情况只能存在于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异常稠密的人口是由于对工商

业异常有利的条件造成的，即拥有大量的铁和煤、可利用的漫长海岸线等等，因此国家靠国外市场为生，要求大量输入外国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仅庄稼人，而且承租人和土地所有者都靠土地为生，那么，一切土地都能提供租金，生产就能够顺利进行。但是结果还是劳动人民要为自己产品中最宝贵的产品即土地的产品向土地所有者额外多付几亿卢布，当然，由于付出了这一笔钱，就减少了向土地投资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减少了土地的生产率。如果一俄亩土地的产品卖一百卢布，供养土地耕种者只用去其中的三十五个卢布，那么就有六十五个卢布可用于改进耕作，增加这块土地的产量，这样它的产品可以增加两倍。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从这六十五个卢布中要拿出三十个卢布付租金，拿出十五个卢布供养承租人，那么剩下用以改良土地的就只有二十个卢布了——它的产量当然要少得多。在没有象英国这样一些优越性的国家里，大土地所有制不仅毁灭国家的生产率，而且使土地耕种者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在我国，地主为了从业主的庄园获得收入，必须野蛮地迫使工人从事非人的劳动，这种劳动消耗人民的体力甚至比农奴劳动还要多，而付给他们的生活费却微不足道。这种情况完全不是暂时的，也根本不是例外。这种情况是长期的，必然的。一切大土地所有制和中土地所有制都毫无例外地会产生不经济地进行生产的现象，会使这些土地上的工人处于贫困的境地。为了证实这一点，不需要援引众所周知的爱尔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例子，因为在这些地方，农村无产者的贫困和农业无利可图的经济状况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在哪里，农业工人都是所有工人中最穷苦的，他们的工资比工厂工人或手工业者要低得多，他们的生活更坏；尽管劳动很便宜，可是大土地所有者和中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产量到处都比不靠雇佣劳动耕作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产量要低，这一事实是人所共知的，所以甚至被写进了

经济手册。在法国，尽管向许多港口运进粮食，据今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不仅大土地所有制，而且中土地所有制都不能有效地从事生产，都需要优惠和扶持，这并不是第一次，情况经常是这样。情况令人满意的只有小土地所有制，尽管它有许多不利条件，如有时土地分割成小块等等。小块土地的价格到处都比大块土地和中等地块高。对于尽管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价格较低但经营得并不成功的经济生产能说什么呢？它自己否定了自己。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两个人要靠只能保障一个人的收入来源生活，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当然必定导致两个人都会挨饿，而社会得以极高的价钱购买他们的产品。只要全部土地还是私有的对象，大土地所有制和中土地所有制就得存在；只有普遍推行了无地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①，才能产生最有利的经济形势，只有到那时才能合理地、最合乎有利经营条件地分配土地。

这就是我们应力求达到的目的。我们来把我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与西欧文明的方式比较一下吧。收代役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比小土地所有制更无利可图的形式。我们不交代役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几乎完全没有土地。几乎全部土地无例外地都属于大土地所有者；然而，拿普鲁士来说，有些地方全部土地中只有八分之一，有些地方六分之一是在大土地所有者手里，而我们这里甚至收代役租的份地有时也只占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有时占五分之一，有时占很小很小一部分。解放后我们称为土地私有者的那些人所处的经济状况比收代役租的经济状况更困难。只有经过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他们才能摆脱这种状况。这些土地私有者的份地现在已经微不足道，这些份地能给予他们的只有他们所需生活费用的一半，半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份地将会变得很少，这些

^① 无地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指把土地无偿地（不交任何现金地租和实物地租）交给农民村社。——编者注

土地私有者从自己土地上只能得到极少的收入，必须主要靠其他的劳动维持生活；他们的境况与欧洲的不幸的小土地私有者阶级相仿，而欧洲小土地私有者阶级的境况被认为比无产者更贫穷。即使我们沿着以前所走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努力通过西欧现在所走的道路逐渐改善我们的社会状况，我们还认为，我们要比人家差一些。但是难道西方的文明会停止不前吗？西方文明及其私有制度现在就已比我们以及我们更完善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形式走得更远得多了。在未来半个世纪之内，当我们也把我们十分之一的土地交给小私有者的时候，西方文明将几乎已消灭大土地所有制和中土地所有制。我们甚至还没有正确理解村社形式的意义，就想把私有制和村社原则荒谬地混合起来，这样只能导致最悲惨的结果。起初我们造成一切特权状况，以最不平等的方式在各村社之间分配土地，现在则想让各个村社在自己内部任意建立村社土地所有制或私有制。当然，对于分得土地多的村社来说，通过私有制来巩固自己的份地是有利的，但这种意图只会导致进一步不平等的分配土地。我们应用了西方文明的观点，但不能理解这些观点的内容和意义，因此我们达到的结果与我们所想达到的正好相反。西方文明一贯竭力从附属的大土地所有制转向独立的小土地所有制，为此做了比较多的事情，而在我们的脑子里却一切都混乱了——又是在亚洲居主导地位的从亚洲引进的土地国有的观点和村社担保的观点，又是西方的私有制观点，又是我国人民的村社土地所有制观点；我们没有想由此建立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弄得乱七八糟，转来转去兜圈子，常常向后倒退，还以为是在前进。情况确实是可悲的，没有给我们的理智力量带来什么光荣，却辱没了我们人民的自豪感。只有当我们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认识到减少自己的福利就能增进共同的幸福，从而也增进他们自己的幸福的时候，我们才能光荣地摆脱这种处境；只有当他们过非常好的生活，

而不是过那种可怜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出路。在可怜的生活下只能产生最谬误的概念。这种例子我们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农民刚一解放，我们就立即产生了一种看法，即土地所有者现在对生活在他们土地上的农民的幸福已不负道义责任。如果我有权使另一个人处于这样的地位，即他变得幸福或不幸决定于我的活动和我的要求，而我却使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别人的不幸，——然后就说，我有权使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不幸，难道我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吗！过着道德高尚的生活的地主是不会这样议论的。他会懂得，如果他能在什么地方最顺利地繁荣生活，那就是在他土地的耕作者中间；他很快就会明白，这种目的会使他的生活比满足趣味的生活更幸福得多。为了关心自己的农民，他就会给他们改善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资金。他将会懂得，在人的生活中除了物质的需要外，精神的需要也起着极大的作用。如果他认识到，在最单纯地有节制地满足他的其他一切需要的情况下道德高尚的生活能使他感到幸福，他就会想到使他土地上的农民也过道德高尚的生活，他和他们一起共同努力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为什么英国工人，不管他出现在哪里，甚至在最北的地方，也总是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生活更体面，生活的环境更好呢？这是因为任何一国的工人的自尊心都没有象英国工人那样强。他尊重自己，并且懂得，只有热爱劳动，工作机灵，具有一个自由人所应有的感情，才能保持这种自尊心。这样的地主一旦明白，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会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多么强烈的影响，他就会努力唤醒农民的自尊心，以极其尊敬的态度对待农民。任何以尊敬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工人的人都能看到，这种态度会使他多么幸福，激起他多么积极的、和你们看齐的愿望。由这种愿望可以产生受教育的要求。要明白工人完全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能够过道德高尚的生活，只要考虑下述情况就够了：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早晨他有三十六小

时的空闲时间；如果他只用其中六个小时来认真阅读，他一年内就能读一万五千页；这对于科学生活和道德高尚的生活已完全足够了。地主至少能使正在成长的一代成为这样的人。如果工厂主也能象地主一样论断，如果他也过道德高尚的生活，努力使自己的工人们也过道德高尚的生活，保障他们的福利，在他们之间普及教育，那么他在十年之内就能使工人们完全胜任管理工厂的工作。如果知识阶级的舆论对追求道德高尚生活的意愿表示尊重，给予发展趣味和人为需要的趋向以应有的重视，那么这种舆论就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做到它现在的活动方式需要一百年才能做到的事情。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人们就已开始谈论解放奴隶，从那时起已过了一千五百多年，可是美国现在还有几百万奴隶。这种缓慢的进程完全是由现代文明的思潮造成的，现代文明迫使有学问的人不到道德高尚的生活中去寻求幸福，而到发展趣味和创造人为的需要中去寻求幸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经历的过程不只是长时期的，而且是病态的。社会中有学问的那一部分人不仅不大乐意在人民群众中发展教育和福利，而且害怕这样会加强人民，会导致人们认为这样就减少了自己的福利。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将紧张起来，可能象西欧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甚至转变为公开的决裂。

如果我们不改变方向，那么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呢？根据过去的资料判断，我们的发展过程将不仅是病态的，而且是痉挛性的。在近二百年期间，甚至在那些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应当沿着什么道路前进的地方，我们也常常向后倒退。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庄稼人的福利，必须保证他们有地可耕，但是人为的需要如此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以满足人为的需要，必须要求农民为土地付出很高价钱，使得农民自己都准备放弃土地。二百年以前农民为自己

播种的土地有时比现在在肥沃得多的土壤上播种的多三倍。解放以后，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也许是从来没有过、甚至在十八世纪初也都没有过的事情。许多大土地所有者在1861年以后从三分之一土地上所得到的代役租比他们以前从全部土地上所得到的代役租还要多。在梁赞省，解放前五分之二的农民占用地主的全部土地，向他们交纳代役租，而现在他们只得到为农民规定的很有限的份地。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亚历山大罗夫县有一百七十四万一千八百九十六俄亩土地，临时义务农民只有各种土地二万六千四百一十七俄亩，而临时义务农民则有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三人。包括庄园居住地在内，甚至每人平均不到一俄亩地。地主有多少土地，可以从安置国家农民的国有土地共有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一俄亩这一情况来判断。委员会中的地主们把农民的实际份地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因此甚至使得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地主土地也只有不大一部分成为份地。在苏梅县，每平方公里差不多有二千三百人，只有三分之一的地主土地成为份地，而在伊久姆县，每平方公里有一千三百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地主土地成为份地。将近三分之一的地主土地成为份地的省不仅有萨拉托夫这样一些省，而且有梁赞这样的省，在这些省里大部分县平均一平方公里有两千多人。在土地很多的哈尔科夫省，分给国家农民的份地比临时义务农民多两倍。然而决不能说，分给国家农民的份地是很慷慨的。在乌斯其塞索耳斯克县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八十四俄亩土地，分给国家农民的份地只有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二俄亩，每人不到半俄亩，为了这一点点份地国家农民除了缴纳代役租和赋税外，还在1866年带马和不带马地出工一万八千零五十六个，交付三万零一百六十二卢布十个半戈比，即每个成年人平均交两个卢布。但是如果农民失去更多的土地，那么不仅他们，而且连我们都将成为乞丐，因为地主使粮食生产变得十分昂

贵，从而从我们手里夺走最后一块面包。我们都将成为我们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纳贡者，将为了获得粮食而向他们交纳他们想要的一切，很快我们就将象农民一样弄到拿起讨饭袋的地步。难道我们的土地所有者想把自己的同胞置于这种境地吗？毋庸置疑，高尚的感情不会容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在我们中间占的比重；例如，在喀山省，土地所有者共有六百九十三人，居民有一百六十万零七千一百二十二；在科斯特罗马省土地所有者有一千八百零二人，居民有一百零七万三千九百七十一人，尽管科斯特罗马省是地主土地最多的省份之一。在科斯特罗马省知识阶级有三万三千人。我们往往认为地主占俄国有学问的人的多数，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们在有学问的人中是极少的少数。毋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高尚的感情不会容许地主们为了满足非真正的需要即人为的需要而迫使我们所有的人受苦；只有当他们下功夫改良了土地从而使土地的产量比土地掌握在个别农民手中更高时，他们才能靠他们出售粮食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他们不会做出提高粮价或使工人破产的损害公益的事。在他们开始过道德高尚的生活之前，当然，他们是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尚的目的的；相反，人为的需要将使他们经常想到用自己的权力，从而产生不合乎社会幸福的现象。例如，社会幸福要求土地耕作者增加牲畜并扩大耕地。因此很清楚，出售牲畜和农民的种子以支付代役租，会使土地的产量减少，必将对我们所有的人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如果土地掌握在农民手中，那么出售牲畜和种子将产生有害的后果，因为土地会不提供产品；如果土地卖给靠雇佣劳动耕作的人，出售牲畜和种子也将对我们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这样会使生产费用昂贵。为了共同的利益，牲畜和种子应该视为神圣的，不管为了什么目的都应视为不能与土地分开的；如果有那么几千个地主为了满足自己的人为需要而这样来损害我们几千万人，并由此而妨碍满

足我们根本的需要，那么，他们就是做坏事……假定说，国库不能使那些由于各种情况不破产便交不起代役租的人免交，因为国库不可能确定每个人的钱财，而把这事交给村社，但地主们为了自己多余的需要就使农民由于出售牲畜和种子而破产，这是很奇怪的。

在知识界现时的风尚、感情和生活观点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指望会迅速而有效地解决那些要求知识界个人进行反面活动即为此只要不捞取或少捞取东西就可以了的任务，那么，我们怎么能期待在满足那些需要进行正面活动的人民的根本需要方面有所成就呢。我们应当使人民摆脱为寻找工作而奔走之苦，这种痛苦无论对外出的工人或留下的家属都是一种打击：为此我们应当使他能就地工作；我们应当使不毛之地的工人摆脱那种靠远方运来的原料和生产率很低的手工劳动，摆脱那种把可怜的产品有时运到需要从数千里外运来原料的地方去的劳动；我们应当使他从事机械化的完善的生产，这种生产很自然地集中在一个地方，因为一个工厂足以供应整个地区；我们应当解救各工业省份的工人，他们从批发商那里得到定货，往往象工厂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样以不利的条件出售自己的产品；我们应当经常阻止工人们集中在那种他们不可能找到充分的保障的地方，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迁移到富饶的地方去，我们应该建立经常性的能很好地工作的机构，以便正确地帮助所有家庭负担很重的工人，特别是寡妇和鳏夫，因为工资总是维持在低水平上，使得这种家庭的孩子不可避免地要受苦。任务是数不胜数的，所有这些任务都要求为社会幸福作出真诚的努力和牺牲，而在知识界目前的情绪下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要获得稍稍令人满意的结果甚至是无法想象的。然而这是最重要的起点，接着还有许多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任务，完全是其他范围的任务；例如，经济的利益在一个国家里要比智力劳动的利益

小得多，但是在我们这里现在经济占据重要得多的地位；社会极其重视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智力劳动者如果想成为有益的人，就必须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服务，并忍受傲慢的态度。在我们看来，现在甚至这种情况也很难改变，即使完全改变了，也还远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制度。智力劳动现在所得到的报酬虽比经济活动少得多，但这种报酬是如此之高，以致它对人民中智力活动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种报酬与物质劳动的报酬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所有从事智力劳动的父亲都让儿子走这条路，于是产生了祖传的知识分子，正如祖传的有产阶级一样；人们不是在能起最有益作用的地方工作，而是到能找到最大物质利益的地方去工作。管理工业、商业、农业，从事行政工作、政治、医学、教育、宗教事务的不是那些最有能力和最爱好这些工作的人，而是那些作为有产阶级和智力活动家的子女而继承这些工作的人。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出身于从事物质劳动家庭的人很难挤到有产阶级和智力活动家的行列中去，同样，这两种人的孩子们也很难挤到普通工人的行列中去；为此他们会在自己人和周围的人们中间遇到许多障碍。然而，为了使一个人的工作获致最大的成果，在选择工作时必须完全只依据自己的才能和爱好，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当物质劳动、智力劳动和经济活动获得的报酬相同，过同一水平生活的时候才有可能，到那时报酬的差别将取决于工作的成就，而不是决定于工作的种类。我要问读者，能指望我们很快就能做到这一点吗，当然，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快些，但是我们还将经历相当长的时期，才能等到这样的时刻。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要树立起坚定的信念，只有走这一条路我们才能获得普遍的幸福，如果我们走这一条路，那么，富人和知识分子也将和那些现在贫困的人们一样增加自己的幸福。然后，当完全明白这一信念后，就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社会科学入门^①(摘录)

恩·弗列罗夫斯基

自说明动物界生存竞争的达尔文学说问世以来，人类的发展就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因为这一学说激发了力求进步的人们的智慧，所以一切妄图阻挡人类进步的人都对它进行攻击，宣布它是不道德的学说，等等。这使社会进步的敌人失去了一种机会，即从达尔文学说中得出论据，来证明力量起支配作用是正确的，并建立类似几十年前瑞士人加列尔建立的那种社会生活理论。但是，谁要是因为人类遇到了这种幸运的机遇而醉心于乐观主义的幻想，他就大错特错了。加列尔的学说已被遗忘，但人们对他依然怀有好感。现在有人完全按照这种精神来应用达尔文学说，毫无疑问，这类观点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危害并在文明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就象马尔萨斯和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学说为文明造成了错误一样。如果说马尔萨斯和斯密所创立的思潮是虚伪的和危害的，而由于早已深入社会的崇拜财富的思想而被公认为大学者，那么，同样善于准确地猜透知识界的隐秘愿望、看透其隐秘愿望的隐秘源泉就在于

① 七十年代初革命民粹派请求瓦·瓦·别尔维(发表作品时曾用恩·弗列罗夫斯基的笔名)写一本从理论上论证当代革命运动思想的书。恩·弗列罗夫斯基应允了这一请求，写了《社会科学入门》一书。该书于1871年出版，分两部分。这里刊载的是该书中说明作者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态度的片断。——编者注

崇拜力量的教师，无疑可以获得比斯密和马尔萨斯更大的荣誉；崇拜力量要比崇拜财富在人类中更加根深蒂固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反对这些感情所产生的个别思想，甚至反对广泛的享有巨大声誉的制度，是毫无益处的，因为你在多大程度上消灭旧思想旧制度，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出现新思想新制度，而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不会有什么结果。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社会主义者与经济主义者^①的斗争。社会主义者不仅没有消灭经济主义者，而且他们表明，他们本身就有产生斯密和马尔萨斯学说的错误的那些感情，这些感情对他们的思想方法发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他们之中有些人不仅背弃自己的信念，而且经常很象对国王持反对立场的保皇党分子，又象确信必须实行专政的红色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感情与他们所表达的思想倾向很不协调，使彼此失去活力。只反对表现而不顾这些表现所由产生的根源的斗争，特别是当这一斗争转到实际活动的领域中去时，斗士们就感到十分厌倦了；他们斗得越多，他们面临的障碍也就越多；这使他们丧失勇敢精神和社会同情。如果说工人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能产生很大的实际结果，那么有产阶级的一切努力就不会妨碍社会同情事实上集中在工人们身上，正如特权阶级不能抗拒十八世纪的思想一样，但不幸的是，社会看到的是艰难而耗尽工人精力的斗争，结果是，工人们完全没有能力激起社会的同情。群众的保卫者击溃一个又一个因循守旧的观点，创造一种又一种的思想，但是被击溃的思想依旧顽固地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岿然不动。大部分被击溃的这些思想只要戴上某种伟大生活准则的假面具，就可以在这面具的掩盖下安然无恙地兴盛起来。在私有制的假面具下至今不仅隐藏着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而且隐藏着奴隶主、世袭官职的享有者、吮吸人

^① 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编者注

民血汗的僧侣和形形色色的垄断者。完全被击溃和被消灭的思想为新的思想所代替，而群众的保卫者遇到了新的障碍，没有迈出对社会来说明显前进的一步。先进思想的斗士们所处的无望的境地正把他们推上最可怜的道路——空洞计划和无论如何都要保卫的原则的道路。制定计划根本不是学者和思想家的事，只有当思想和感情已产生并在社会中站稳脚跟，计划才是合适的，计划不应由那些创造思想的人们来制定，而应由实际工作的人们、负有使社会赖以生存的形式与社会的思想和感情协调起来的使命的人们来制定。在形式的背后应该有一种坚固的力量，否则形式就毫无用处。当形式赤裸裸地、毫不夸张地呈现在社会面前时，我们才能根据社会克服一切障碍、尽力追求形式这一情况，才能知道这种力量的存在。然而，十九世纪在科学上好作空洞计划的人们，象以前的空想家或可怜的政治阴谋家一样，为了使他们发明的形式令人心醉而硬给这种形式加上不仅这些形式而且任何形式都不可能具有的性质，例如具有为一切人创造富裕而豪华的生活和完美的幸福这种性质。美国或瑞士的赋税和徭役制度比起存在着特权阶级、一切直接税和间接税都集中在贫苦居民身上，再加上兵役和供军队宿营的义务这种制度更具有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不要求宣扬完美的幸福，宣扬并不能给予的幸福，因为理智和感情对此已经有了准备，这种思想不需要任何夸张，它是我们社会中最没有文化的成员也都能理解的，一旦计划需要夸张，那么计划就毫无用处。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种信念，即唯一正确的方法是进行反对根源本身的斗争，而不是进行反对根源所产生的那些表现的斗争。谁能削弱那些产生一切虚伪的当代社会和政治观点即崇拜财富和力量的感情，谁在社会政治方面所作的成就就会比所有反对表现的斗士大得多。这些斗士往往不仅具有这些表现所由产生的感情，而且常常以自己的宣传和行动促使这些感情更深地扎根于人

们的心中。他们在进行宣传反对沉溺于奢华和人为需要的上层阶级的同时，自己却迷恋于这种奢华生活和这些人为了的需要，并把它当作人民的幸福理想。这样的理想对人民来说是达不到的，这样的理想只能使人民在艰苦的斗争中推举出来的、以艰巨的努力加以支持的领导人立即学会被他们所推翻的先辈们的方式。认为喝得烂醉如泥是自己最大幸福的人是温良的蹩脚宣传者。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189—191页。

富豪制及其基础^①

(评《论亚当·斯密创立的国民经济理论的基础》，
赫·勒斯勒博士著，1868年爱尔兰根版。)

格·扎·叶利谢也夫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说，“当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时候，国家就在其中履行产科医生的职责”^②，分娩是否顺利、婴儿是否会成为死婴、畸形或终生残废，都取决于产科医生的

① 本文于1872年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第2期“外国著作”栏上，是作为对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代表赫·勒斯勒论亚当·斯密一书的书评。文章说明了民粹派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和民粹派提出的同资本主义对立的俄国改革后的社会制度。叶利谢也夫期望当时的俄国的国家制度摆脱“资本主义生产的错误道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英国，叶利谢也夫利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材料，特别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的例证。——编者注

② 《资本论》中没有这样的话。叶利谢也夫在这里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只是提到社会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痛苦。叶利谢也夫把社会的作用改成了国家的作用。——编者注

技术和操劳。

当前的俄国社会正处在这种妊娠末期和临产的状态。俄国全部生产力遭受的压迫随着农奴制的消灭而消灭了。在生产力面前出现了一条广泛的、别具一格的独立发展的道路，其前程将一天比一天远大。摆脱了封建压迫的欧洲各国的社会，通常都走上了大工业的道路；自然经济被货币经济取代了；在各种不同的手工业部门和生产部门，手工操作被机器生产取代了；各个工业部门的小生产被工厂生产，也就是大规模的生产取代了；农业和工业迅速地掌握化学和物理方面的一切新发现，采用科学发明的新工具，力图到处都应用蒸汽力和机器的效能。一些大企业为了自己的营业而需要拥有私人资本所无力负担的成千上亿的费用，于是就成立了各种各样的股份公司，如铁路、轮船、工业、银行、保险等等公司。总之，资本变成了每个工业社会的最强大的动力和杠杆。

但是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贪得无厌的；它的基本的、重要的意图之一就是使自己不断地、无止境地增殖。只有实在法的力量才能遏止和限制它的这种意图，此外任何道德的或社会文化的目的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要有利可图，哪怕寸草不生。管它这样那样的企业和行为方式在遥远的未来，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一位作家写道：“资本害怕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

明。”

资本在变成工业社会的主要动力和杠杆的同时，力图消灭阻碍它增殖的一切东西，并把能保证它无限增长的一切手段夺取到手。资本靠它本身、靠自己的力量是连一个戈比也增加不了的。资本是死的财富；它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苏生和增殖。应当用什么样的尺码来确定资本在劳动所获得的利润中的份额，这一点无论科学或实在法直到现在都还不能确定；由于观点不同，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很不一样。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说^①，扣除劳动价值的补偿即支付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部分以外，剩下的就是资本的份额；按照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说，这一工资的最大限额是由工人的需要决定的，这种需要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人的发展程度不同和境况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工资的最低限额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这个规律可以把工资降低到使工人处于半饥饿的境地。由于资本的利润同劳动价值成反比，因此很自然，为了资本的利益，就要用一切办法把工资降到尽可能最低的限度。要使工人的需要和习惯保持某种舒适的水平，要使工人尽量少依附于资本，从而使工资或多或少更接近于它的平均量，这里主要的当然就是工人对他的劳动材料的所有权。只要农民还固守着他的一小块土地，只要手工业者还掌握着进行工作所必需的工具和材料，资本家只有付出大体正常的工资才能找到工人。但是工人的所有权对资本还有另一种危害；它支持小工业生产，因而从资本的手里夺走了消费者。

所以，凡是工业具有巨大规模和资本主义生产大发展的地方，资本都在开始对工人的所有权进行残酷的斗争，凡是政府对经济

^① 这里指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编者注

事业的潮流持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①的原则,使它^②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喜欢说的那种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发展的地方,资本就逐渐取得完全的胜利。最后,形成了资本所希望的劳动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用一位经济学学者的话来说,“出现了两个不同品种的商品的主人: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希望通过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加属于他们的财富的数量,另一方面是自由的劳动者,即自己的劳动力的卖主,因而也是劳动的卖主,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也就是,一、他们本人不直属于生产条件,就是说,他们不是奴隶,不是农奴,等等;二、生产条件也不属于他们,就是说,他们不是拥有自己的经济的农民,等等,一句话,他们是完完全全自由的。”^③这种市场“是资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它的出现是胜利的标志,它证明工人同生产条件分离的缓慢的、但却相当顽强的过程已经圆满结束了,分散在无数人民群众中的生产资料逐渐集中的过程,许多人的小小财产变为少数人的巨大财产的过程,或者说对人民群众拥有的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的剥夺过程,——这个对人民群众的可怕的严酷的剥夺过程终于完成了。这个过程包括许多最严重的暴力措施;它是通过最残酷无情的野蛮行为和在最无耻、最肮脏和最丑恶的意图的影响下进行的。”

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过程不管怎样的丑恶,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却大都顺利完成了。在封建关系消灭以后,几乎到处都出现了

① 法文:行动自由。这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法国经济学家的口号,意思是要求工商业有充分的自由以对抗当时占优势的封建限制和阻力。——编者注

② 使它(经济事业的潮流)有可能自由发展。——《祖国纪事》编辑部注

③ 叶利谢也夫说的经济学学者是指马克思。作者在这里转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劳动力商品的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9—192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生产统治的时代。在所有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工人同生产条件分离，也就是使他们丧失土地，剥夺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把这一切都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但是这个过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英格兰进行得那么彻底。因此，为了弄清楚不受政府干预和调节而单纯由资本控制的自由工业是怎样发展的，研究一下这个过程在英格兰所取得的结果对我们来说不但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有教益的。

在英格兰早就不存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农民了，也就是说，那里没有那种拥有份地和自己的产业的农业工人。早从十六世纪起贵族们就已开始关心使耕地和牧场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可敬的托利党人和慈善事业家伊登爵士说：“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要有二、三英亩甚至四英亩耕地才有一英亩牧场。在十六世纪中叶，变成三英亩牧场对二英亩耕地，后来是二英亩牧场对一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三英亩牧场对一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为了达到确立耕地对草地这个适当的比例的目的——为什么需要这种适当的比例，读者会在下面看到——，贵族们先是剥夺农民的公有地，然后又剥夺他们的庄园地，在自己的领地上为农业工人修建专门的房屋，按一定的租金租给工人。但最后发现连这样做也并不合算了。农业工人的劳动既不能使他本人，也不能使他的家庭生活得到可靠的保障。如果生病或没有活干，工人及其家庭就需要教区立即救济，这样一来教区的济贫税便增加了。因此英国的贵族地主越来越竭力设法把从前留在他们领地上的工人打发走。原先建造的工人住房得不到任何修缮，屋子很快便不能住人了，于是工人全家就只好四处流落。被这样赶出大领地的工人，或者在附近的小城镇，或者在小领地寻找栖身之所，而投机家们在这些地方购买土地并故意为这类住户建造了一些最矮小的房屋来高价出租。这些住房离工人的工作地点有三、

四英里远。但在英格兰东部，甚至连这样雇佣工人的办法也被认为是合算的，而认为利用流动的帮伙（或者如科柳潘诺夫先生所说的无地的自由人协会）耕种土地来得更合算。这种耕种土地的办法称为帮伙制。通常一个有四百至一千英亩（一英亩等于八百八十九平方俄丈）土地的领地保持定居工人，仅仅是为了要他们从事日常的费力的活或养马的活。平均每一百英亩土地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一个租地农场主对调查工人生活的调查委员会说：“我的租地占地三百二十多英亩，全种粮食。没有一间房子。有一个工人住在我家。我有四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做。”这样的活有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

每个帮伙通常由十至四十或五十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十三至十八岁）和男女儿童（六至十三岁）。带领这个帮伙的是它的首领——帮头。他通常是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骗子、富农、流浪汉、酒鬼，但是很精明强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的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雇主的指挥下干活。帮头从主人那里领到包工活，他的收入要看他有多大本领在最短时间里从他带的那伙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帮头往往后来都变成了拥有五百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或房产主，通常他们的收入略多于普通农业工人。帮头从一个庄园转到另一个庄园，这样他就能使他的帮伙在一年中干七八个月的活。他给工人家庭的活要比租地农场主给的活可靠和有利得多，因为租地农场主很少雇用孩子。在一些有工人居住的小地方，他的势力是很大的，以致不经过他的介绍许多小地主雇不到孩子工作。替租地农场主雇用孩子成了帮头在帮伙工作之外的一项副业。

这种帮伙种地制的害处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的劳动，他们每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长途跋涉五六英里，有时

甚至七英里，最后，帮伙内部道德败坏。帮头通常备有一根长棍子，但不能说他随便使用棍子；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相反，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竭力用下流放荡的态度把他们笼络在身边。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打情骂俏，极端伤风败俗的下流无耻，使帮伙兴奋鼓舞。帮头多半在酒馆里倾囊畅饮，回去时走在行列的前头，左右各有傣悍的女人搀扶着，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唱着下流可笑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同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厮混而怀孕的现象在这里是屡见不鲜的。为帮伙开放的小村庄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①，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女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

整个英格兰东部几乎都使用帮伙耕地，而且采用这种帮伙耕地制度的现象正在日益扩大。在租地农场主和大地主看来，再没有更有利的办法能把工人人数保持在远远少于所需要的水平，同时又拥有一批现成的后备工人来完成紧迫的工作，这些工人拿的是最便宜的工资，并且使主人有可能不雇用工资高的成年工人。爱好地租的大地主如此喜欢这种制度，以致其中有一位对调查委员会说，这种制度除了名称不好听以外，其他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不叫帮伙而把它叫做青年工农业合作自立协会，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被资本主义生产剥夺了土地和住房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

英格兰工人的悲惨状况，从争取废除谷物法的斗争时期起就开始透露了。在这个时期，一方面，从事反对保护关税活动的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谷物法很少给谷物的真正生产者带来好处。另

^①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淫乱罪恶之城，见圣经《创世记》。——编者注

一方面，工业资本家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生产的非难和告密，希望揭穿这些土地贵族的行为，指出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的游惰贵族是在怎样可耻地撒谎，出于对工厂立法的嫉妒而假装同情工厂工人。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两贼相争，好人得利。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社会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以最无耻的方式悄悄地掠夺工人，把别人的绝大部分劳动变为无所事事者的私有财产，这两个派别的激烈斗争就暴露了事情的真相。工厂主自己出钱配备了特派员，把他们派到农业地区调查农业工人的状况。从调查中发现，最高的工资扣除房租外摊到全家每一个成年人身上的钱每周不到二先令，多半是每周工资不超过一先令，或者一先令稍多一点，在某些情况下少到十一便士，甚至少到七便士。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促进了英格兰农业的发展。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的新方法，人工种植饲料，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机器等等，总之就是实行集约化的耕作方法——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农业的收入，据权威人士证明，由于采用机器，经营费用减少了一半。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减少工人的人数……因此可以期望，*post tot discrimina rerum*^① 工人的命运将会迅速改变，他们终于会陶醉在尽可能幸福的环境中。

但是政治经济学教授罗杰斯在他的经典性的著作《英国的农业史和价值史》(1866年牛津版)中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农业工人，不要说同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工人相比，就是同1770年到1780年的工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工人)“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朱利安·汉特

① 拉丁文：在国家政权作出了那么多的决定之后。——编者注

医生在他的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卓越的报告中说：“……工人的生活费用限于只够活命的最低限度。”工人的工资和生活资料一点也不取决于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的多少。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房主一听说工人挣得多一些就提高房租，而租地农场主“由于工人的妻子找到工作”就降低工人的工资。“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进一步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

1863年医务调查委员会调查农业工人的营养状况后发现，大部分英格兰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康瓦尔、戴文、索美塞特、多尔塞特、威尔兹、斯泰福、牛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所有纯农业区的工人就处于这种状况。

汉特医生调查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他调查过五千三百七十五座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多年来我国农业工人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他们现在比过去几个世纪更难找到栖身之所，特别是适合他们需要的栖身之所了。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地滋长了，目前农业工人的居住情况简直糟糕透了。工人在这方面毫无保障，除非那些靠他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或有无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农场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

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边建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象样的住宅了；法律也没有给工人保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象雨露和阳光一样不可缺少……济贫法使工人的状况变得更加困难了……”。接着西蒙医生在谈了济贫法如何促使拆除工人小屋的情况以后继续写道：“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收容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是这个‘附近’有时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三英里或四英里远。这样，工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六英里或八英里的路，而这好象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的城市住宅的一切坏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挤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由于当地的酒店老板或小店主就是建筑投机家，所以住在这些小屋里的农业工人的状况就更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工人除了租地农场主外，又有了第二个主人。他必须既是这个主人的房客，又是这个主人的顾客。他还得按主人规定的价格在主人的小铺里购买自己的一份茶叶、糖、面粉、肥皂、蜡烛和啤酒。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使居住在他们的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是非常简陋的。有些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工人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关于英国工人困苦境遇的详细情况，读者可以从不久以前出版的前奥地利大臣舍弗莱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我们在上面引用的事实就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引来的。我们仅仅谈到了农业工人的状况，

因为工厂无产阶级的状况大家多半都是知道的。

下层阶级一向是一个国家的人口的主要部分，如果这一部分人的境况如此可悲，那么老实说，这个国家绝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生活幸福的国家。公正地说，这个国家只应叫做破产的国家，或者叫做不巩固的和朝不保夕的国家，因为它和所有那些依靠使人民群众破产的原则来维持其福利的古代和近代的专制国家和自由国家的不巩固和朝不保夕是一样的。但是不妨把占优势的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的教科书、学术论文、学术研究著作和所有的统计资料普查一下，谁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对英国福利状况的即使是小小的一点怀疑呢？相反，它不是到处给人以错觉，似乎它是工业和一切进步发展的榜样吗？我们有多少不高明的经济学家，是那种只希望尽快消灭我国的农业村社、剥夺农民土地、建立大地产等等的“英国原则的预言家”呢？一个没有洞察力的人只看到英国橱窗的一面，就为它的辉煌的外表惊叹不止，那他就不仅很难怀疑自己，甚至也很难相信其他的无可怀疑的证明：这种辉煌的外表会掩盖着骇人听闻的人民破产的灾难。事实上，不论我们注意人类劳动和活动的哪一些部门，英国在各个国家中几乎处处都是首屈一指的模范国家。在英国有什么不欣欣向荣的呢？各类工厂、各种工业、农业、商业、科学、艺术——全都十分出色。与此同时，国家的财富正在难于置信地迅速增加。英国最近的一份国情调查报告的执笔者兴奋地说：“不管国内人口如何迅速地增加，它还是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穆勒说，英国的资本多到如此地步，以致利润率在英国维持在最低的限度，如果一部分资本不经常从国内流出去，或者甚至不从完全非生产的目的出发白白地把它消灭，从而为国内剩下的资本腾出地方，那么资本的增殖就会很快停顿下来。引起商业危机的投机，按照穆勒的说法，正是由于资本接近自己的静止不动状态的边缘而造成的。投机或者把大量资本白白地消灭掉，

或者把它交给外国人，这可以造成利润率的暂时提高和为新的积累腾出地盘。按照穆勒的说法，在英国只根据这一点政府就可以大胆地把通过借款的办法拿到的大量金钱用于某种正义事业或慈善事业的伟大目的，例如用于实行移民或国民教育的广泛计划，它完全有把握地认为，这样的开支既不会剥夺任何一个工人的工作，也不会使第二年少产一英尺布和一蒲式耳小麦。

既然资本多到如此程度，又有什么东西能妨碍把过剩的资本用于公共福利呢？不到外国去为资本寻找出路，或者不通过投机使资本离开静止不动状态的边缘，而是把过剩的资本用于在英国如此薄弱的人民教育的广泛计划，用于移民事业——通过迁居外国使人口变得更适应国内的生产，这样做是不是更好一些呢？我们之所以提到后一种情况，是因为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和一般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说法，人民群众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人口过分增长而造成的，要消灭这种祸害，只有实行认真的教育，切实改善工人的福利，并通过这一点来使工人养成过舒适生活的习惯，等等。

是什么在妨碍英国的优秀人物去实现这些美好的目标，并把英国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呢？

建立在资本统治基础上的议会主义导致有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当夺取政权以后，资本的自私自利性就会变成政府的政策基础，而不论这种政策披着什么样的自由主义的设施和法律的外衣。曾经是我国科学院院士的一位德国卓越的经济学家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议会不管怎样经常地审议关于工人状况的问题，它从来也没有从真正的角度，即把工人作为人的角度来讨论过。保护工人的发言人通常滔滔不绝地使人深表同情地诉说和十分动人地形容工人的困苦遭遇，但是严格地说，这还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有些灾祸不管我们把它们说得怎样可怕，都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祸害，因此在严肃地讨论严肃的事物时，类似的诉说至少是不恰当的。喜欢

为现存的一切辩护的人，通常就这种诉说回答发言人说，祸害还不象他形容的那么严重，的确，在有些行业中工人的生活是困苦的，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但是一般地说，如果行业的情况不是不景气的话，英国工人吃的面包就会比德国短工吃的面包好，并且甚至偶尔还可以有啤酒喝。讨论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提出下面的问题。劳动是否能按其实际价值得到报酬？工资是否符合工人在产品上所付出的劳动？企业主是否滥用他们的资本和地位所赋予他们的势力，他们是否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来彼此进行竞争和工业斗争？国家是否关心使国民收入尽可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对损害法律的势力是否太宽大？看来如此普通的问题是忽略了，那么，是谁忽略了？是英国议会的议员们，他们所注意的，是地租的每一次人为的提高，例如在谷物法上所表现出的那样，他们现在指出这类措施的不公正，是因为这种措施会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不当而损害资本家的利益。”

在任何被有产阶级控制的政府里，这种豺狼式的法庭是免不了的。而且没有一种人类的力量能够在这种制度业已确立和巩固的地方把这种制度予以摧毁。王权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力做任何有利于下层阶级的事情，而且连它自己也成了议会中的资本家手里的身不由己的工具。革命本身象法国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每一次革命以后，资本变得比以前更有光彩了，获得了更大的势力，而整个喜剧也就以路易-拿破仑取代路易-菲力浦、梯也尔取代路易-拿破仑等等而收场。象穆勒这样一些当代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虽然也能够发现这种制度是不公正的，但与此同时，发展进程本身却又往往使他们必须承认这种制度是不可避免的，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并且认为人类的努力在这里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除非事物本身的力量，或者确切些说上帝的力量，也许能够做一点什么，而这也除非是在遥远的将来。在穆勒的想

象中，世界各国的资本总有一天会多得象英国现在的情况一样。英国资本到那时将不再能在别的国家找到安身之地，只好呆在家里，进入静止不动的状态。到那个时候，似乎工人也将明智起来，以致不再过多地繁殖后代（然而有趣的是要弄清楚：当有产阶级故意使工人处于愚昧和贫困状态的时候，工人的明智从何而来呢？），新的一代的人数将正好维持在补偿旧的一代所必需的数目上。除此以外，立法将设法使财产分配得更好（如果立法的权力象现在这样掌握在资本的手里，能出现别的立法吗？）。它将促进财产平等，以便使之符合每个人的合理要求（这在现在是一种奢侈吗？），使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归己，而不管这些成果有多少。到那时（为什么不是现在？）它还可以规定容许一个人通过接受馈赠或遗产所能得到的限量，这个限量将足以保障俭朴的独立生活。当所有这一切都实现的时候，人们所向往的人间天堂就会来临。穆勒是这样来描写这个天堂的：“工人领取很不错的工资，过着富裕的生活；除了一个人在一生中挣得的和积蓄的财产以外，没有更庞大的财产，但却要比现在多得多（这还不算多！），人们将摆脱掉最笨重的劳动，不再为各种机械的琐事操心，在体力和精神上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投身于生活的美好的方面，并为那些处在不那么有利于文雅发展状况的等级的文雅（？！）发展作出榜样。”有什么能比这位最人道的英国经济学家所描绘的人类幸福的图画更朴素的呢！要知道，如果把人类社会设想得比这里所描绘的低一个等级，那么这将会是一个不幸的社会。因此，穆勒所勾画的理想几乎超不出人们称之为社会灾难的范围。然而就是连这种朴素的理想，按照穆勒所提出的条件，也许还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也许要经过几千年才能实现。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下，连要想说明这种在遥远的未来实现的事情的必要资料的影子也找不到。从社会现状的角度来看，这种理想是一种纯粹不能实现的空想！同

时,如果在最遥远的未来,在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等待着人类社会的仅仅是穆勒所描写的那种幸福,那么是否值得为文明和进步而奔忙?人们离开社会重新回到森林和荒野,并学会象他们的祖先那样四脚着地走路(根据达尔文的研究结果),是否更好些?在森林和荒野中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虽然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但毕竟还有广阔的天地、自由的意志和清新的空气,而不是象穆勒所说的那样,过着“大部分人类为了某些工厂主及其同伙的发财致富而在目前过着的那种沉重的囚徒式的生活”。但是我们认为,未来等待着人类的是好得多的命运,穆勒之所以把未来看得那么令人失望,是因为他是透过被资本弄得畸形的英国社会生活和这种生活的更畸形的世界观的棱镜来看待未来的。有两个鬼折磨着所有的英国经济学家。其中的一个——人口的过分增长——被认为是恶鬼,另一个——资本——被认为是善鬼。这个鬼正在同前一个鬼不断进行斗争,减轻它的危害或使它的危害不起作用,一句话,使社会避免彻底毁灭,否则社会就难免会毁灭掉。这里不应当忘记,英国经济学家所理解的资本,不是那种按一定的份额在居民群众中大体上平均分配的资本,而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所有这些份额的集结,此外,资本不仅是一次完成的对群众的财产和劳动的剥夺,而且也是经常剥夺群众的财产和劳动的一种力量。在后一种意义上所理解的资本怎样才能成为对付人口过分增长的工具,我们要想在英国经济学家的学说中寻找什么解释是徒劳的。相反,按照他们关于对付过分增长的措施的看法,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说,群众的普遍的良好教育和或多或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群众的某种舒适的生活,可能就是对付过分增长的最好的措施,但是无论提高群众的福利也好,或者他们的教育也好,恰恰都是同资本势不两立的。可以更确切地说,资本不是对付过分增长的手段,而是对教育和在群众中

提倡明智的节制的一种阻力。也许可以认为，资本尽管不是对付过分增长的根本办法，但却是对付它的一种很好的治标办法。至少，集中的资本可以举办小资本所不能举办的大企业，它对集约耕种土地、采矿等等和大规模举办工业都是必需的，最后，在少数人手里保存储金要比它们分散在群众中要来得快和可靠。但是现在大企业和大生产所需要的大资本，也许可以很容易地被联合的小资本所取代。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在现在，当还没有养成根据联合的原则举办事业的习惯和灵活性的时候，这种取代对事业本身来说会是有利的。例如，毫无疑问，大地产的土地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象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耕种得那么好，当然，这些小土地所有者拥有他们的土地所需要的资本，而不是象我国农民那样既无牲口、又无肥料和良好的工具。因此，由这样的所有者组成的农业联合就会对土地进行集约耕作，并且能比大资本通过雇佣劳动的办法获得更多的产品。也许，关于其他大企业也应当这样说，在这些大企业里，雇佣劳动可能被根据联合的原则参加企业的所有者的劳动所取代。目前的股份公司有相当大一部分资本家把微不足道的资本股份投到他们完全陌生的企业里，他们仅仅在这些股份的范围里承担企业的责任，因此实际上几乎不参加企业的任何活动，这些股份公司与其说是实际的联合，不如说是对联合原则的不成功的模仿。毫无疑问，如果资本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是以小股分散在众人手里，股份公司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也就是由熟悉业务、直接参加或接近于参加公司的人们来组成了；那时股份公司的费用和利润、公司的稳定性和事业的成就就会完全不同。至于说到储金，那么很难设想大资本会比小资本能更好地保存和更有效地利用它们。首先我们应当指出这里谈的是生产期间的储金。一个企业家不管他具有多么大的工业才能，但总会有一个界限，超越了这个界限，他的个人的监督和活动就会成为不可能或者仅仅停

留在表面上。如果企业的规模超越了这个界限，非生产费用就会变得难以计数，既不能予以排除，又不能使它接受任何监督。当然，即使如此，大资本也仍然会得到大量的利润，但是这种利润却影响到商品的质量和使工人挨饿，然而如果白白消耗的一切得到精打细算的利用的话，利润就不会减少，同时商品的质量会更好，给工人的报酬也更充分些。这种情况在小资本的生产中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小资本生产处于主人的直接监督之下，主人的眼睛观察着一切。其次，如果注意到个人的非生产消耗，那么这种消耗在任何一个不富裕的资本家那里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他是靠事业为生的，在这一事业中倾注了他的心血和快乐，所以他为事业节省每一分钱。大资本家通常很快都变成了不劳而获的人。他们习惯于主要不是靠自己的劳动和活动为生，而是一方面靠掠夺别人的劳动和财富，另一方面靠幸运的行情这个新工业世界的黄金矿为生。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行情当然不仅包括市场的行情，而且也包括那些无形的行情，这些行情支配着市场和交易所的行情，使它们产生某种波动，给它们指出某种方向。如果计算一下消耗在与生产无关的支配行情方面的千百万数不清的金钱，然后再计算一下通过这些金钱而掠夺来的另一笔千百万数不清的金钱，那就会对潜力无穷的劳动生产率感到惊叹，它毕竟能够做到使世界不因饥饿而灭亡。在这里，读者不妨回想一下上一个世纪的英国“南洋公司”和目前的“流动信用”。由于前者的诈骗而给英国人民造成的损失估计有五亿英镑，也就是说超过了当时在全欧流通的硬币总量的四倍。

在研究各种政治经济学说的时候，绝不能忘记，一个人很难摆脱他在其中生活、出生和受教育的那个社会形式，因为不管这个人怎样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在他的祖国形成的那种社会关系、社会的世界观基础和贯穿于社会制度的精神，对他来

说永远是比较亲切的。法国人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关系，德国人也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关系，英国人也是这样，如此等等。因此，一切政治经济理论和一切社会理论，都总是带有民族的烙印。但是，经济学说的民族烙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英国表现得那么明显和突出。亚当·斯密在所谓伟大的法国思想运动时期和在这些思想的有力影响下写了关于国民财富的伟大著作。在他动笔写作以前，他在巴黎住过三年，同上述运动的各派主要代表经常来往，并且确实掌握了这个运动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却反映得如此温和而又小心谨慎，以致丝毫不妨碍英国这座中世纪大厦仍然保持着它过去的全部光彩和尊严；亚当·斯密的民主主义仅仅显著地表现在否定国家政权这一点上，国家政权被归结为一套警察保卫设施，但是，由于现存关系在这里仍然在起作用，工人仍被看成仅仅是经济过程中的普通工具，所以有产阶层或统治阶层不仅不会因此而受到触动，他们的地位反而更高了，于是，斯密的民主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同贵族政治思想巧合了。这种同现存关系和睦相处的学说是不会遇到阻力的。的确，只有托利党人还多少热中于过去的传统；辉格党人很快就看出了亚当·斯密的学说替日久天长变得锈迹斑斑的中世纪贵族结构镀的那层金的妙处。亚当·斯密的天才学生和继承者——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就象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是新世界奴隶制的两个可靠的支柱，他们把从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得出的符合英国现存关系的极端结论，抬到了科学原理的高度。按照李嘉图的学说，进步和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人类社会存在的目的本身，都是由社会每年所获得的纯收入的量决定的。他说：“对于一个拥有二万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二千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不低于二千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一百个工人还是雇一千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一万镑还是卖二万镑，都是一样的。一个民

族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民族的实际纯收入不变，不管这个民族的人口现在有一千万还是有一千二百万，在将来有一千万还是有一千二百万，都是无关紧要的。”关于这一点，西斯蒙第曾经非常巧妙而又公正地指出，如果英国国王一个人就能借助于机器的转动而获得纯收入的话，那么按照李嘉图的学说的含义，英国这个民族就根本用不着存在了；似乎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收入甚至是最理想的。而当李嘉图以资本的形式为新世界树立起金牛犊（人类社会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对这个金牛犊的全心全意的服务）时，马尔萨斯则宣告说，人们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人口增长同自然界和社会的当前发展水平所提供的生活资料不成比例而造成的，至于希望工作的人没有工作做，穷人死于愚昧、饥饿、疾病和种种贫困，那不是任何人的过错，他们的死对社会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他们是被大自然本身注定死亡的。马尔萨斯说：“一个进入已被别人占据的世界的人，没有分享现有生活资料的丝毫权利（1）。他在世界上完全是多余的，在大自然的盛宴上没有他的餐具。它——大自然本身——命令他走开，并且立即亲自强制执行这一判决。”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那时开始，人口的过分增长和对资本的过分赞扬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这台木偶喜剧赖以转动的两根主要发条。人口的过分增长和资本在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就象罪孽和赎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过分增长就是罪孽，资本就是赎罪，赎罪的作用是使人们摆脱罪孽的灾难，使他们慢慢变得高尚起来，最后把他们引进穆勒所描绘的那个天堂。

资本主义生产在英国造成的那些灾难，现在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因此在我们的时代，一国的国民财富和该国人民的破产几乎可以被看成是同一个概念。一个国家的工业越发展，那里的工人阶级就越贫困。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在英国贫民所占的比例是六比一，荷兰和比利时是七比一，瑞士是十八比一，德国是二十比一，

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是二十五比一，西班牙是三十比一，土耳其是四十比一。

骤然看来也许会感到奇怪，欧洲这些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怎么会走上一条对它们的发展来说是毁灭的道路呢？但是更应当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它们仍在继续坚持走这条道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认真、公开地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尽管其中许多国家的群众经常提出这种要求，甚至为此发生骚动。许多人把文明的欧洲对它既经采取的制度所持的这种保守态度，视为无可辩驳的证明，认为这种制度虽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是最好的制度，任何一个走上广泛的工业发展道路的新国家，一定要走欧洲所走的同一条道路，当前文明的灾难阶段不仅是整个人类，而且也是每一个民族发展过程的绝对不可避免的现象。

为了回答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回顾过去。

所有的欧洲国家几乎都同时摆脱了封建压迫；在摧毁社会的封建制度方面，业已得到加强的君主政权和它所建立的所谓警察国家起了主要作用，摆脱了封建压迫的欧洲社会就处在这种警察国家的保护之下。警察国家也叫做幸福国家，就其思想来说是一种最美好的国家。众人和个人的福利和幸福是它的唯一的目的，君主有责任成为臣民之父。国家千方百计为臣民谋求幸福。如果臣民不理解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和不愿意接受这种幸福，国家就有责任采取强制手段来迫使他们接受。国家在臣民中进行传播幸福的活动，一方面禁止他们做被认为有碍他们幸福的一切事情，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做被认为对他们有益的一切事情。摆脱了封建压迫以后，个人又陷于另一种压迫之下，也许这种压迫不那么沉重，但却更难忍受和更令人愤慨。警察机关保护和警戒个人和社会的全部生活，干预一切日常生活琐事，注视最无害的风俗和习惯等等。在一切小事上国家显得很伟大，在对付弱者方面国家显得很

有力量,但在那些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真正需要它帮助的地方,国家却表现得最软弱无力。旧的特权照旧通行无阻;没有个人在法庭和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一切使警察国家的统治受到人们憎恶的程度并不亚于封建国家的统治。从那时起人民的仇恨就集中在警察机关身上了。社会受尽了封建统治和警察统治下缺乏自由所带来的不可想象的无比沉重的灾难,最后认识到,只有个人得到完全自由才可以有社会的福利,为了争得这种自由,社会必须拿出全部力量。首先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而产生了所谓的重农学派。这一学派的学说的实质在于,社会中的一切应当服从“le gouvernement de la nature”^①。在当时,“自然的统治”就是指让事物听其自然,使它不受国家政权任何人为的控制。重农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古尔内曾对一些大臣说过,他们能为社会福利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做,让社会听其自然地发展:“Laisser faire, laisser aller”^②。

魁奈回答王太子提出的如果他魁奈当了国王将做些什么的问题时说:“不做什么。”一言以蔽之,关于社会摆脱政府压迫的思想是一种时代的思想。它贯穿于整个伟大的法国社会思想运动中,它也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观点的基础。所以他的在内容上完全符合他当时的社会要求和愿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著作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它成了当时新的福音书。亚当·斯密的著作发挥了两个主要的思想: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而也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二、只有当劳动是完全自由的时候,只有当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自己关心自身利益的时候,劳动才会有成效。任何一个人自己比别人更清楚地懂得,对他来说self interest^③——这就是斯密学说的要求——更有好处。这样就否定了

① 法文:自然的统治。——编者注

② 法文:听之任之。——编者注

③ 英文:自身利益。——编者注

任何警察保护和对经济事务的干预。

我们不难理解这一学说的片面性。伟大的法国社会思想运动在思想上是为了每个个人的道德自尊而发生的。在个人道德自尊的概念中包含有两个观念：一、关于个人同所有其他的个人平等的观念，即个人同所有其他个人有同样的权利使自己的精神和肉体要求得到应有的发展和满足，并享受对这种发展和满足所必需的福利，或者也可以说在总的幸福中得到相应的一份；二、关于个人自由的观念，即个人同所有其他个人有同样的权利成为完全独立的人，成为自己本身的目的，不陷入不由自主地为别人的利益服务的状态。十八世纪由于它以前发生的情况而只明确了一点：上述两个方面的后一个方面。它把单纯的个人自由看成是对付一切祸害的灵丹妙药，建立在个人完全自由的原则基础上的社会是它唯一的理想。那时很难预见到不平等的状况会在自由的牢固基础上发展起来。作为第三等级的人民是一个没有任何区别的群众整体，他们同心协力地进行反对特权等级的斗争，要求人人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但是一旦实现了理想、争得了自由以后，便在从前没有区别的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互相对立的分子——这就是有产分子和无产分子。前者依靠已有的条件立即出人头地，成为统治的特权阶级，后者则处于从属的地位。资产阶级诞生了，在这之前还是单一的人民分裂成了两个部分——有产者和无产者，人人都意识和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是情况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两个分裂的部分彼此仇视的地步。只是到了后来，资产阶级发展了自己的本能并使人人都充分感觉到了这种本能，资产阶级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以路易-菲力浦为代表的国王，和它一起进行统治，创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在1848年可耻地诱骗人民并在七月起义时血腥地镇压了人民——，只是在这时人们才清楚地看到了横亘在资产阶级和工人等级之间

的鸿沟。

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经历了所有的发展阶段，这已不是一粒种子，其成份只能靠少数人通过化学分析来加以研究，其未来形式只能根据猜测和想象来加以判断，——这已经是一棵花繁叶茂、硕果累累和香气四溢的发育齐全的植物了。现在，资产阶级从它的全部意图和本能、它的全部活动到它的全部目的和后果，都已被人们作了仔细详尽的研究。资产阶级到处造成的一片荒凉，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但是一个国家既然为工业发展开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道路，它就很难放弃这条道路。它必须在自己内部进行一番彻底的折腾，自己在自己内部发动一场最可怕的革命来建立另一种秩序。凡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得到发展的地方，国家都不掌握土地。土地全在私人手中；而且有不受限制的产权作为依据，这样一来，国家既无权剥夺这些土地，也无权确立一种最好不仅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且也为公共福利服务的土地使用方式。其他一切财产也都有这种不容国家侵犯的产权作为依据。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建立这样一种性质的生产和许多这样一些形式的事业和企业，并且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使居民的能力和活动适应这些形式，以致如果实行另一种经济制度，那就不仅会摧毁难以计数的资本，而且干脆会为国民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带来危险，因为群众缺乏独立经营的习惯，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机械地习惯于在大工厂里从事某种生产的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除此以外，他们甚至没有做任何工作的本领。穆勒在原则上认为小土地所有制比大土地所有制好，并且希望到处都有农民——土地私有者，但当问题牵涉到把这个原则付诸实践的时候，他又发现对英国以及按类似英国方式发展工业的其他国家不便于实行这种原则。他说：“人民一旦接受了大规模生产——工业生产或农业生产都一样——的制度，就未必会放弃

这种制度。”但是如果国家不能在短时间里突然改变业已巩固的现行经济制度，那就不能否认，国家可以逐渐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通过立法来废除旧的经济形式，并为新的经济结构和形式的发展准备条件，如果国家仍保持它原有的力量的话。但是，对于那些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来说，这里遇到了新的障碍。在这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政权全部转到了有产阶级手里，或者说资本的手里，为了有产阶级的利益，使群众处在被压迫的、愚昧无知的状态，群众要求改善自己状况的任何意图都被看成是想要革命的征兆。

我们应当感谢上帝，因为俄国目前还没有处于如此可悲的境地。^① 广阔无垠的土地在这里仍然掌握在国家手里，同时罗马的所有制观念在社会上还没有深入到如此程度，以致国家如果不触动所有者的基本权利，就不能给私有财产指出符合公共福利的用途；新的经济结构和形式还处在萌芽状态，因此合理地调节经济事业和指出它的方向，其结果不是消灭现有的资本，而是保护现有的资本免于非生产的利用和投机倒把，使国民经济在可靠的、合理的基础上得到正确的发展；最后，我国没有一个能够阻碍国家采取谋求公共福利行动的合法的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

如果我们的国家产科医生不善于预先防止新生的俄国社会走上资本主义生产的邪路，而是在国内为目前正在折磨欧洲的灾难，也就是资本的统治、有产阶级的夺取政权和阶级斗争奠定基础的话，对他们就更不可饶恕了。

可是滑到这条道路的斜坡已经有了。当新社会诞生的时候，当它走上大工业发展道路的时候，在它内部通常会建立起极其庞

^① 作者通过上面对西欧的叙述来同废除了农奴制的俄国的状况进行对比。——编者注

大的企业，汇集起无数资本；与此同时富豪的基本阶层、资产阶级的最初的核心也在开始产生。什么是富豪呢？富豪在起初并不是单独的社会阶级，它从社会的所有阶层集合自己的成员；凡是具有贪婪才干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阶层：是贵族也好，是官吏、商人等等也好，都加入进来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掠夺资本；最主要的努力集中于使国家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他们以造福人民、发展人民的福利为借口，向政府提出要在陆地上和海上开办最大的企业（他们非常详细地计算了这些企业建成后将会给祖国带来的成千上亿的收入），并请求为企业提供垄断权或保障，或至少容许开办这种企业，筹集开办企业所需的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接着他们就滥用这笔资金，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让轻信的股票泡在失败了的企业里，然后他们又向政府申请创办更大的新企业。德国经济学家马洛对富豪制作了很中肯的评论。他说，既不应把富豪分子同放债人混为一谈，也不应把他们同从事生产的企业主混为一谈。放债人不追求不正当的收入，他满足于从自己的资本得来的普通利息；企业主——无论大小——则把自己的资本用于生产事业；富豪分子的特征就在于他把手里的资本变成不正当的、非生产的投机手段。一个富豪分子可以根据需要把自己装扮成各种各样的人：什么爱国者啊，爱民者啊，科学艺术的爱好者啊，道德家啊，现实主义者啊，等等，其实他除了利益以外什么都不爱，为了得到利益他可以不择手段，相反地，他认为走最有利可图的弯路要比走直路来得好。富豪分子是国家自由主义形式的崇拜者，因为在这里有获取的充分自由，但是对于任何其他形式，只要这种形式答应保护他获取的自由，他也会乐于接受。“富豪制的特征之一就是厌恶一切社会改革家。它通常竭力把这些人说成是空想家、破坏者、文明的敌人、社会带病毒的排泄物，并且认为为了反对这些怪物而采取的任何暴力都是正当的，说什么‘为了拯救文明，应当牺牲自

由本身’。它在自由主义国家里是保守的，在专制国家里是革命的；它在专制国家里借口保卫王权而力图使王权从属于自己。它在这种场合处事非常讲究分寸，同时很善于既欺骗人民，又欺骗王权：它使前者相信，它是在国王跟前为人民的权利奔走，它使后者相信，它是在保卫王权而反对人民的攻击。富豪制根据需要采取各种不同的称呼，但是最喜欢称自己是温和派和秩序派。它之所以称自己是温和派，是因为它不是为全体人民的政治权利，而是只为人民中最神通广大的那一部分人，也就是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奔走，它之所以称自己是秩序派，是因为它并不把自己通过最讨人喜欢的和只为它本身带来好处的自由主义方式发动的那种间接的革命当作革命，但是它会象反对革命那样武装起来反对旨在反对这种秩序的一切。它口口声声都离不开关于所有权、家庭、宗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时髦词句。但是这里所谓的所有权就是指获取的自由权，这种权利使它有可能侵占别人的财产，而不让别人有可能触动它的财产。所谓家庭就是指一种用来传授遗产的制度，而所谓宗教就是指一种用来制服那些在今世为它劳动而对在来世给予酬劳的许诺表示不满的人的警察手段。”

因此，照马洛的评论看来，富豪制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爱好自由主义的国家形式，或至少是爱好自由获取的原则。如果我们拿这个特征来想象八年至十年以前的情形，那我们就会看出在推行自由主义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从前在社会上和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可以遇见一些人对新思想咬牙切齿，抱怨旧秩序，对未来的收入的不稳定和菲薄感到不安。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人人都喜欢新秩序，觉得一切都使人心满意足。可是生活费用却比十年前几乎高出了两倍；纸卢布抵不上金属卢布五分之四的价值已有好几年了，并且看来根本没有希望恢复自己的票面价值。“有人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一提。只要给企业主的自由多一些，

一切就都会好起来。”我们在十年中修建了一万俄里铁路，也就是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化了五亿卢布；建立各种股份公司大概也花了这么多亿。国债和各种公司的担保方面的利息，正在吞没我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庞大预算。同时新铁路的租让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新的股份公司几乎每天都在出现。但是仍然可以听到有人抱怨政府在限制企业主的自由。不久以前我们在一个地方看到一篇表示同情的简讯，说去年在奥地利开设了一百五十家私人银行，在我国却只有十三家，而之所以开设得少是因为政府用种种手续(?)在加以限制的缘故。后来还有一篇同样表示同情的简讯报道说，巴西从不超过五千万卢布的预算中拨给本国邮船航运业的津贴是一百九十七万八千卢布，也就是说比俄国多十五万卢布。后一篇简讯所使用的手法本身就很引人注目，因为竟然拿巴西作为俄国仿效的榜样，这未免太令人难堪了！为了体面起见，哪怕拿德国或英国、法国甚至土耳其作为例子也好。但问题是，根据所报道的事实可以得出的结论完全不象这篇简讯所告诉人们的那样。大家知道，巴西边疆的大部分地区都和海洋毗连。因此在这里发展航运业不但是对外联系，而且也是国内联系的需要。巴西为此提供许多担保又有什么奇怪呢？根据巴西的例子，本来可以建议俄国不妨在提供陆路交通担保方面大方一些，但是既然它对这种交通远不是那么大方，那就最好建议它不要为了给各种公司提供担保而白白花钱，而应在提高农民的福利方面多想点办法。为此在颁发建立各种公司的许可证时要尽可能慎重，因为这些公司不仅具有垄断性质，而且实质上也有限制工业发展的性质，它们大都在为我国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资本投机事业服务，使资本脱离生产用途，其次，要尽可能把用在提供担保方面的钱用于农民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合理发展上。

我们之所以对一篇小小的简讯谈了这么多，是因为它带有纯

粹富豪制的性质。当然，我们既不想把这种性质强加于登载该简讯的报纸，也不想把它强加于该简讯的那位不知名的作者，但是，这篇简讯反映了当前的社会趋势。这里顺便指出，在社会上可以感觉到的那种自由主义倾向中，我们的整个报刊界也都变成了自由主义的。读者会记得，十年以前并不是这样的。那时有拥护农奴制的报刊，有完全保守的、温和的和极端的报刊。也许那时的报刊还没有十分明确的纲领，但是，它们的根本意图是瞒不住的。在已经完全定型的社会里也是这样，存在着各种党派的即保守派的、温和派的和极端派的报刊，这些报刊已经有了极为明确的纲领。现在我们这里的著作界是清一色的。无论哪一种报纸或杂志显然都或多或少地代表着民主的原则，都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可是，与民主的观点并列，甚至在民主的观点的掩盖下，往往有意无意地实现着富豪的意图。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明确的、被严格遵守的纲领。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过渡时期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并且是我们最大的不幸，因为著作界本来应当是细心观察和暴露富豪制的表现及其黑暗进程的一支唯一自由和光明的力量，可是它却变成了富豪制的喉舌。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来。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商界和一些股份公司在财政大臣先生就任十周年纪念日之际献给他的贺词中，祝贺者认为大臣的主要功绩之一是他把俄国财政状况确立在尽量扩大唯一有效的私人活动上面了。扩大私人活动的确是一桩非常有效的事业，并且从下述角度来看对俄国来说也会是很需要的，即农民是俄国的主要的纳税力量。自从2月19日的法令颁布之时起农民虽然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但在事实上仍然被束缚着手脚，其原因在于：(一)连环保、身份证制度、新兵征募；(二)苛捐杂税；(三)缺乏应有的村社组织，许多地方的村社由于这个原因而在目前就已处于人口过分增长的危险境地。平均按缴人头税的人数计算，每个农民赖以糊口的土地最多只有四

俄亩，因此，扩大农民阶层的活动范围，并在这同时保持国家的主要支付力量，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是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时起的最迫切的、刻不容缓的问题。当时为了研究上述问题的某个方面还确实建立了一个税务委员会^①。如果税务委员会加紧自己的工作 and 赶在八年前搞出结果来，我国农民现在的状况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是委员会工作了十年之久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应当怎样开始的工作又怎样结束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交给肩负税务重担的地方自治机关来研究。显然，祝贺者说的不是扩大农民活动的问题，而仍然是扩大建立各种股份公司和股份银行方面的私人活动问题，正如祝贺者在他们的贺词中接着解释的那样。既然关于扩大私人活动的好处问题转到了这样的基点上来了，那么这种活动的成效也就成为很有争议的对象了。诚然，公司给俄国带来了好处，这就是它们给俄国带来了许多外国资本，但是它们也吸收了许多国内资本，在象俄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取自日常生产和用于象铁路这种业已变成固定资本的有益事业的每一个卢布，对于国内的生产能力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其次，只有在完全弄清楚无数外国资本和俄国资本是用于什么地方和怎样被利用的时候，才能评价公司的好处。而这却不是很快就能办到的事。铁路是很有用的东西，但是如果每一条铁路修的地方不当，也就是修建在后来营运时连成本也收不回来的地方，那对于国家来说无疑都是资本的损失和经济的破坏。各国都曾出现过建立铁路、银行等等的公司热，但它到处都造成了极大的亏空和损失。有一些国家，资本多得很，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以致不管国内资本如何流失，即使是通过搞投机流失的，也都不会为它们造成任何损

^① 税务委员会是沙皇政府为了修订税收制度而于1858年建立的一个委员会。
——编者注

害，但是它们却经受不住这一方面的亏空和损失。至于我们的情况会怎样，后果将会作出说明。现在我们只能提出的是某些铁路在目前就已入不敷出，而在今后也没有改善的希望。最后，既然现在就已经有不少股份公司破产和倒闭，那么为了正确地、公平地评价在建立公司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私人活动起见，最好是让那些祝贺者想一想，股份公司经营失败和倒闭所造成的破产和亏损究竟会落到谁的头上。再说，谁来负担提供给各公司的担保和其他特许权，例如轮船公司和贸易公司享受的一些很重要的特许权的费用呢？我们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贬低财政大臣先生的功绩。这些功绩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它们的最好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就是最高当局的信任。我们想指出的是贺词的性质，它带有社会上占优势的思潮的烙印。我们只是从我们手头现有的近日报纸上引用了一些事实，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许还可以提出多得不可胜数的事实来。富豪分子和富豪趋势在我国社会里无疑是存在的，而且是够多的。Caveant consules!①。

各种各样富豪分子最稳固的可靠支柱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

不管富豪分子是否想使农民同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分离，或简单地说，使农民丧失土地，反正他们是在开始证明村社劳动的强制性，认为有必要通过劳动自由的形式来解散村社和把村社的地块变为可以按私有原则自由转让的土地。不管他们是否打算白白地使用别人的劳动，反正他们已在开始大声叫嚷，不仅反对工人的任何罢工，而且也反对由政府来调整正常的工资、工时数等等，要求雇主同受雇人自由协议的完全自由，说什么根据供求规律自由协议会自然而然地确定双方都不吃亏的真正的价格。不管富豪分子是否在着手建立为了纯粹投机的目的而有权运用庞大资本的

① 拉丁文，需要警惕。——编者注

公司，反正他们已在开始谈论唯一有效的私人活动和给予私人活动以创业和活动的完全自由的必要性问题了。以这种自由的名义而出来建立公司的，只能是有产阶级。一句话，一切东西都在以自由的名义出现。*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的原则，或者说，任何人都关心自身利益（只要他想要和能够做到）而谁也不关心别人利益的原则，是富豪制最喜爱的原则，*praestabilita harmonia*^①，它应当安排最好的世界；这个原则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富豪制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致的。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异的现象。按其内容来说，它是一门具有纯粹实践意义的科学。自从世界上出现了人的时候起，人就开始劳动，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创造资本，换句话说，支配那些由政治经济学所从事研究的生产力，因而他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要比需要其他任何科学的指导来得早。其他具有同样实践意义的科学，例如法律科学，在古代就有了，而政治经济学的出现还仅仅是十八世纪的事情。当然，政治经济上的探讨在古代和近代就已经有了，但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亚当·斯密以前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由亚当·斯密创造的，而且这个创造同或多或少遥远的过去没有任何关系。它是根据存在于十八世纪的各种关系和思想而被创造出来的，它完全是十八世纪的产物，它从亚当·斯密的头脑里产生出来时，是完全成熟和武装齐全的，就象密奈尔瓦从丘必特的头脑里产生出来时的情形一样。但在后来，政治经济学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仍停留在它最初的那个状态。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偏离亚当·斯密的某些见解和论点的地方。相反，我们将其著作列入本文标题的那位作者说，“很难指责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千篇一律的；这里

① 拉丁文：极妙的和谐。——编者注

的矛盾很多,而且又最多种多样,甚至远远超出那种应当解决最重要的、具有直接实践意义的问题的科学所可能遇到的矛盾。但是,总的来说,所有这些矛盾并没有露到表面上来,亚当·斯密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受到触动,仍然保持着它最终形成的那个样式。亚当·斯密所准备的基础和划定的范围也仍然保持着,人们继续按照原先的那种方式在对它进行研究,尽管存在着种种偏离的倾向。原则背离的情况出现得很少,而且对亚当·斯密的学说的统治地位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突然以完整的形式在一定的時候的这种突然出现,使得人们作出这样的设想,即在这以前曾经有过某种暂时的应当从它的内容本身去寻找的原理。可是如果认真地衡量一下,就会由此引起人们这样的担心:在我们面前是不是有一个丧失了充分发展的真正力量的科学遗骸在代替科学,因为活的灵魂早已离开了”。

不能不承认,后一种意见十分准确地打中了目标。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初一批奠基人不仅是学理主义者,而且也是生活的斗士。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站在社会运动的漩涡之中,他们为了获得击败对手的武器而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所以他们的著作不系统,不完整,充满了矛盾和片面性,但是它们却带有时代的生活烙印。自由主义经济学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被当作议会会议解决各种问题的准则。但是后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变成了学理主义者和学究们的财富,割断了同生活的全部活的关系。科学资料的形式上的系统化、名词术语的制定、*de omnibus et quibusdam*^① 的大大小小的争论——其实往往是关于最基本的科学概念的争论,但最后却总是以毫无结果而告终,因为还没有出现那种会带给科学以符合生活提出的新要求的新观点的思想

① 拉丁文:什么都说,又等于什么都不说。——编者注

家，——这就是当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特点。幸亏人口的过分增长的恐怖使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培育者有所振作，并迫使他们出于关心更好的命运而设法使资本免受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资本保护下的人类幸福生活的诸如此类的敌人的非难和攻击，如果不是这样，自由主义经济学也许早就会变成死气沉沉的烦琐议论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按照它的模式建立的社会中拥有传统的荣誉和影响。在一切科学中和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遗留下来的学说，即使它已经过时和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但在没有出现新的伟大的思想家和还没有适合当前时代发展的新学说来代替它以前，它就仍然继续作为生活中的准则和继续发挥作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权威在我国比在任何地方都更牢固，因为在我国科学仍然是可以被用来掩饰各种劣等货的魔法。而愿意认真探索和对它进行思考的人越少，它得到的尊敬和荣誉就越多，因此往往会听到和看到有人象引证科学的最新成果一样来引证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原理，其实甚至连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比较温和的信徒也已早就在否定和怀疑这些原理的正确性了。因此对我们来说，了解一下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反对者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很有好处的，特别是有些反对者不是来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是来自保守主义者，甚至是来自那些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尽管他们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身看成是从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依据的各项原理中得出的直接结论。我们提到的这篇现在正向读者介绍的著作的作者，就属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种反对者之列。

毫无疑问，关于国民经济的科学是属于那种在最广泛的和最直接的意义上的所谓社会科学的，因为它研究的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在社会上和自己的同类生活在一起的人。因此，国民经济的规律也就应当是社会的规律。当然，可以为某个生活在孤立状态的

人,为某个生活在荒岛上的鲁滨逊想象出某些经济规则,而这些规则按其内在本质来说不可能不同于社会经济规律,因为孤立生活的人象在社会里生活的人一样也是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超脱自己的职能。然而,社会里的人所从事的人类经济的规律,不仅应当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而且这些规律的内容也应当带有另一种性质,因为这些规律是由人们共同生活的事实决定的,因此尽管它们同孤立的经济的规律有着同样的来源,但是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却是不相同的。

人们的共同生活,或者说社会也是一样,有其存在的一定目的,这种目的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和谐的活动才能达到。正是这一点决定社会结构的一定程度,而社会活动的一定方向、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的和谐等等则是由社会结构来决定和保证的,换句话说,社会的规律是以社会结构为前提的。社会规律是这样一种规则,它在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根据道德上的理由来确定人们之间的某种必须遵循的关系。我们说在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是因为每一种社会规律都不外是使自然规律适应人类的目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自然规律可以同时又是社会规律。

普通意义和直接意义上的自然规律,是指事物的自然属性或自然力量的必然的、永久确立的关系、原因和行为的自然关系而说的;例如,由于自然规律的原因,我不能直接通过被一堵墙挡住的道路;由于自然规律的原因,活的有机体如果得不到必要的营养就会坏死,雪在阳光下就会融化,庄稼成熟会带走土壤的养份,物体受热就会膨胀,等等。所有这些情况都表现了一定原因的必然后果。所有这些和诸如此类的规律不包含任何对人的意志起精神决定作用的东西。这是事物的一种自然状态,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能力去对付它。只要有可能,他就有权排除它,摆脱它,使之变成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等等。甚至在自然规律看起来是作为直

接决定人的意志的东西出现的一些情况下，实际上对于意志的决定因素是另外一些最高的动机。例如，在严格的意义上不能说人之所以要吃饭是因为不吃饭就会死；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人利用这种物理规律完全是为了相反的目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服从这个物理规律，他就具有按照这个规律行动的最高的动机。同样，在人的精神本质中也有某些自然的意愿，这些意愿和纯粹的物理规律一样都是必然的。例如，父母对子女的爱、对异性的爱慕、对活动和取得优良成绩的自然愿望等等就是这样。但是谁也不会断定这种爱慕不受人的意志的影响。

一切自然规律，或者确切些说，一切自然状态，当它们进入人的活动领域时，就会受到人的意志施加给它们的影响。在人的生活领域里，意志的力量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不可能存在自然力量的专横盲目的统治。如果社会上一个人死于饥饿，那么造成他死亡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如果洪水使耕地变成荒野，如果土壤由于长期耕种而变得贫瘠，如果浮冰撞毁桥梁和堤坝，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过错不在于自然规律，而在于社会规律。不言而喻，大自然的力量在它固定不变的活动中始终是不可触犯的，它产生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行为，但是，为什么恰恰是这种力量而不是另一种力量，是这种原因而不是另一种原因显示自己的某种行为，这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只要事物的自然状态或自然规律还局限在它们本身的领域里，人就不能对它们的行为负责；但是，它们一旦进入人的关系的领域，它们就要被置于社会规律的统治之下；从这时起，它们的盲目的统治就要停止并开始为人的目的服务。在人的生活领域里，自然关系或自然规律变成了个人活动的工具，人对它们产生的行为负责。在人的意志的影响下，自然不仅在量的方面，而且也在质的方面获得人的性格。一些国家通过人的意志的活动和努力而使本国的植物等发生了改变。实际上正如我们已

经说过的，每一种社会规律都不外是自然关系遵照人的目的而发生的一定的变化或适应，因而社会规律从它的整体来看可以说是人对自然规律的统治。

因此，有人说人的经济活动必须取决于自然规律和只能遵循自然规律，这话听起来是使人感到奇怪的。如果我们假定人们的经济生活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就应当抛弃经济工作，因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规律在这里是不可能服从道德的目的的。既然用自然规律来解释和论证经济状态和经济行为，这就显然把人的意志和人的责任从人的经济领域中排除了。但是不能不承认这类理论是完全不道德的，就象不能不承认一个人把自己的孩子饿死，然后用他的肉体不能永久存在的规律来解释他的死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一样。毫无疑问，有关经济事业的自然规律是存在的，就象有关人的一切的自然规律是存在的一样，但它们是属于纯粹的和应用的自然科学领域，即化学、物理、工艺学、农业科学等领域的，——一句话，是属于同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那种科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阐述经济的自然规律，而是阐述符合社会目的的人的经济活动的规律。

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把自然规律当作经济规律，而且还把它们看成人的活动的准则。这就把国民经济学说引进了自然规律和自然法的领域。亚当·斯密所奠定的理论的特点恰恰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种经济自然法，自然规律在其中被摆在社会规律的位置并被当成人类活动的必须遵循的准则。自由主义经济学还企图根据这一点来说明自己的规律的不变性和普遍性。不变性和普遍性的确是真正的自然规律而不是社会规律的本质特征，因为社会规律的起源应归功于人类社会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里的需要。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只局限于经济力量的纯自然行为。它对于那个唯一能够赋予自然行为以人的性格的社会规律则毫不注意，只有

极少数的情况是例外。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这样形成的：由于自然规律的原因，人们有种种需要，因此就不应当使这种需要的满足受任何限制；由于自然规律的原因，分工越发展，获得的产品就越多，因此就不应当使分工受任何限制。不过，亚当·斯密在这里也表现了他的不彻底性：他不是从自然规律中，不是从个人的不同的自然趋向中，而是从变化最快的文化需要中得出分工的必要性的结论，而对如何根据社会和人的最高的文化目的来限制分工，则只字不提，相反，却只注意那些纯技术的，也就是自然的分工行为；其次，由于自然规律的原因，自由竞争使经济力量处于最紧张和活动的状态，因而自由竞争就是经济规律；婚姻是自由同居的文化制度，但是婚姻应当适应经济力量的自然活动（马尔萨斯）；价格根据供求关系的自然规律形成，因而供求的自然关系就是价格规律。

自由主义经济学按照这个处方制定国民经济的规律。因此它所包含的不是那种可以由生活在社会里的和希望按照人的职能进行活动的人们所能遵循的社会规律的体系，而是那种目的在于获得财富的自然欲望的抽象体系。人作为有道德的和社会的个人，完全处在这个范畴之外；他的任务仅仅在于赋予这些在运动中自由发展的抽象的自然欲望以人的名义。实际上资本是在代替人行使经济的职能；然而资本本身是一种没有生命、没有内容的抽象力量，它有一个固定的意图，这就是增加生产，并且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法律的规定。的确，最近有人在说，这样发现的经济规律还不是可以直接运用的最终规律，要是以为人们应当按照这些规律办事，那甚至是荒谬的，但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有了这种方法，就可以创立国民经济的科学，至少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假设的、接近于符合实际的理论。然而是这样的吗？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否会把自己的规律仅仅当作假设的规律呢？相反，它是在把自己的规律

称为不变的、“铁”的自然规律，而且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通常总是自豪地指出这一点。这样一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就被当作最终的真理并被立即付诸实现，这是显而易见的。

亚当·斯密既然从自己的经济规律的体系中抹去了人的个性，自然也就不能容许社会思想进入这个体系了。对他来说，社会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并有着本身任务的独立整体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彼此单独生活的、彼此完全平等的个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抽象地起作用的因素的总和。这些个人之间的利益是由支配经济的自然规律的机械行动来协调的，其实这些自然规律并不是什么文明的社会规律，而是私人经济领域中的技术过程的抽象概念。社会经济具有受社会文化目的所制约的有机的和历史的规定性，亚当·斯密的理论根本不了解这种社会经济；在他的理论中起作用的因素，就是唯一受利润和消费趋势所驱使的个人。国民经济的名称在这种理论里实际上是一句空话，这种理论毫不注意人民的文化要求。

如果在国民经济中一方面把自然欲望当成经济活动的准则，而另一方面又把生产的技术过程当成经济活动的准则，那就不能不对社会的道德产生腐化影响。如果亚当·斯密在道德方面也象在经济方面那样搬弄自然规律体系的话，那么所有的人就会立刻看清这种理论与实际生活要求的矛盾。假定婚姻生活的基础仅仅是性欲的自由统治，这种基础就会给婚姻生活带来致命的打击。在经济生活中，这种学说的毒素在种种合理形式的掩盖下渗透得相当慢。但是这些学说早就已经在生活中发生作用，以致如今在这里谁都不会怀疑它们败坏道德的影响了。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125—159页。

论马克思一书俄文版^①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

近日来俄文翻译书籍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成就。有一本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圣彼得堡尼·彼·波利亚科夫版)出版了。我们很少如此满意地读到一本新出的书。外文书籍俄译本的出版者在多数情况下总是根据令人十分难以理解的考虑行事。似乎我们在金钱和智力方面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财主。在挑选供翻译的著作方面经常做得很糟糕。在这里我们指的完全不是翻译著作的方针。这是每个出版者个人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你喜欢德·梅斯特尔,那就请翻译和出版好了,你喜欢蒲鲁东,那就也请翻译和出版好了。问题在于,翻译和出版的大量书籍价值十分可疑。例如有人想要出版梯也尔关于所有制的书,于是就出版了,然而这只不过是某一特定时刻的抨击性作品,这个时刻与俄译本出版的时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有人想要出版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于是就出版了。在比较丰富的文献中挑出马基雅弗利的著作来翻译是适合的,因为这位作家在思想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然而它的意义是纯历史性的,对于我们这些不大知道和不大理解的人来说,它

① 本文刊登在1872年《祖国纪事》杂志第4期。《资本论》俄文版(格·洛帕廷与尼·丹尼尔逊合译)出版于1872年4月。从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对马克思此书表示了肯定的态度。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七十年代尚未发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自己的主观社会学方法是不相容的。——编者注

不是一种需要，而完全是奢侈，何况在为数不多的需要马基雅弗利著作的人中，大多数人无疑是能够用某一种外语阅读它的。

马克思的著作完全不是这样。它出版得正是时候。尽管这次只不过是一则出版消息，然而我们还是想要谈几句，为什么它出版得正是时候。我们这样做也还因为，这是一个适当的机会来回答我们听到的对于我们的杂志进行的某些批评和责难。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唾弃”自由，^①而自由在我们这儿，可以说还只不过处于胚胎时期；你们鄙视工业，而我们还没有工业，正应当全力以赴地去创建它；你们批判达尔文、康德、西方的科学和哲学，而我们却还一无所有。说实在的，在你们的唾弃中间，也许有某些真理，但不是我们所说的真理。就算自由已经吹到了欧洲吧，但它并没有吹到我们这儿，因为我们还没有见过它；就算发展工业使欧洲产生了无产阶级吧，但我们并没有任何这类现象；就算对达尔文主义的热情在西方采取了一种令人惋惜的方式吧，但是要知道我们好不容易才能读到一点达尔文的书籍。你们不是使自己的工作适合我们的需要和兴趣，而是适合西方的需要和兴趣。你们使之威信扫地的东西，就算在西欧应当受到某些不信任，而在我们这里相反地却需要特别细心的照料。如果连欧洲也不能使你们满意，那么你们在俄国能做些什么呢？你们应该蔑视它。你们的地盘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欧洲，在这里你们只能和风车作战，起着妨碍的作用。

读者，有人就是用这样残酷的字眼来攻击我们，我们被说成是多余的、不需要的人，甚至是有害的人，不是警察局所说的，而是最

^① 弗·伊·列宁在评价米哈伊洛夫斯基这一时期的立场时曾经指出，七十年代有过俄国农民社会主义，它“因为自由本身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而‘唾弃’自由，曾同那些拼命抹杀俄国生活中的对抗性的‘高头大脑的自由主义者’作过斗争，梦想过农民革命”。（《列宁选集》第1卷第46页。）——编者注

广义上的有害的人。对我们工作的这种评价使人感到尤为惋惜的是，它不是来自明显敌对的阵营。对我们说这种话的人，在对待恶习、贿赂、古典主义、书刊检查、乡间土路、迷信、行政当局对司法部门的干涉、阶层的闭塞——一句话，在对待温和的自由主义萌芽方面，和我们几乎是一致的。这样一些自由派的人们，进步的人们向我们宣称，我们的地盘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欧洲。明显的敌对阵营的人也直接向我们说，就是到天边也没有我们可呆的地方。显然，自由派人们的判决在实质上更残酷，更能使我们感到痛心。

然而，我们之所以丝毫没有感到痛心，那也仅仅是因为我们认为，上述判决是完全不公正的，要把我们驱逐到欧洲去是完全不合法的。我们坚信，我们所做的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地盘是在俄国，遗憾的只是，我们不能在十分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我们的事业。我们坚信，我们不仅向读者提出了对事物的适当的观点，而且我们是在适当的时间，显然也是在适当的地方这样做的。显然，在这里不需要谈论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因为我们和读者们谈到过各种不同的题目，并且尽我们的力量和可能运用过各种论证来充实我们的观点。今后也仍将这样做，因此，在这里专门来捍卫我们的意见的正确性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上面所提到的我们的批评者也并不否认，在我们的“唾弃”之中其实也有某些正确的成份。他们只不过说，这种“唾弃”现在在俄国并不适合，就是说，这可能只不过是闲谈罢了。

我们是什么人，是“斯拉夫主义者”还是“西欧主义者”，是“进步分子”还是“守旧分子”？这个问题在报刊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向

① “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是四十年代著作界的流派，“进步分子”和“守旧分子”是六十年代著作界的流派。“斯拉夫主义者”和“守旧分子”坚持要保存俄国现有的封建农奴关系，“西欧主义者”和“进步分子”则坚持俄国应该转向新的社会关系。属于“西欧主义者”的有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属于“进步分子”的只有自由主义者。——编者注

我们提出来过，而斯特拉霍夫先生甚至对此挥挥手说，鬼才搞得清楚，他们究竟是什么人。至于说到“西欧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那么使人惊奇的是，不知是什么奇迹使得这种称呼还经常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使用。从四十年代这些称呼出现时起，欧洲已经经历了法国的三次革命、1851年、拿破仑第三、德国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西班牙的一系列革命等等、等等。我们所经历的事也不少，且不说欧洲一些重大事件对我们有这样那样的影响，我们也经历了克里木战争、“十年改革”的始末、解放农民、波兰的暴动等等、等等。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的旧纲领即使在过去多少由于自己的不明确和脱离实际生活而处于明显的孤立状态，难道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它还能保持完整无缺吗？当然不能。而且我们也看到，真正的斯拉夫主义者和真正的西欧主义者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的。在四十年代我们很自然地把欧洲生活看成某种单纯的、完全值得惊奇或是厌恶和憎恨的现象。在当时连欧洲自己也并不很清楚地了解，在它的文明的内部隐藏着多么巨大的争论。在1848年，法兰西身上以及后来几乎是整个欧洲身上流血的伤疤把事情弄清楚了。它也使我们的清楚了一些事情。我们不可能不看到，西方并不完全一样，因此西欧主义者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知道，当时确实这样弄清楚了一些事情。另一方面，随着我们自己生活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事物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确实发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也就没有可能存在纯粹的斯拉夫主义。毫无疑问，现在狭隘的爱国主义，在斯拉夫世界中建立俄罗斯霸权以及用斯拉夫人的原则反对拉丁语系和日耳曼人的原则的幻想都有可能存在。但是完整的斯拉夫主义的世界观是不可能有的。只可能有一些包含斯拉夫主义精神的专门纲领，例如斯拉夫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不仅在我们中间不可能有完全的融合与统一，就是在每一个这种专门纲领中也隐藏着同强烈倾向西欧主义

这一现象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想起了达尼列夫斯基先生登载在《曙光》杂志上的《欧洲与俄国》这组文章中的一个可笑的论断。达尼列夫斯基先生想要赞扬俄国式的长袍、灯笼裤和斜领衬衣。在四十年代，斯拉夫主义者在这点上真是直言不讳，他们把整个民族精神的意义，特别是红衬衣的意义说得天花乱坠，把俄式服装捧得至高无上。斯拉夫主义者认为必须穿灯笼裤和斜领衬衣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们具有俄式服装的特征。达尼列夫斯基先生却完全不是这样议论的。他甚至认为西班牙式短上衣可以与俄式衬衣相媲美，而燕尾服和常礼服之所以被他否定，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是具有俄罗斯人民特性的产物，而是因为它们不够漂亮。他认为，为一个穿着燕尾服的英雄雕塑的像会是十分可笑的，外衣应该或是完全敞开，就象俄国人那样，或是完全紧身，象西班牙式上衣那样，等等。很明显，完全不需要成为斯拉夫主义者就可以得出这种想法，任何一个欧洲的裁缝都可以积极有效地参与这种思考，俄罗斯人民的特性与此毫无关系。在这里俄罗斯人民的特性从属于一些其他的、无论是俄国的还是西欧的生活现象都同样受其管辖的范畴。

全部问题就在于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公开或秘密地求救于某些最高范畴。既然人们对于“从维弗列耶姆城^①能得出什么好处呢？”这样一句话又加上关于美观、长处、便利、威严的考虑，并且允许拿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来进行比较，这样他们也就已经从维弗列耶姆城接受了一些东西。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都是如此。让我们想一下关于村社的争论吧，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这场争论把西欧主义者截然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其中的一个阵营，在所有其他方面与斯拉夫主义是敌对的，而在农民村社问

① 维弗列耶姆是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的原为迦南人、后为犹太人的城市，现名伯利恒。按照新约的传统说法，耶稣基督诞生于此。——编者注

题上却比西欧主义者的另一阵营要更加接近于斯拉夫主义。这是一种明显的迹象,说明已经从俄国的生活中产生了某些最高范畴,从这些范畴的角度,就可以公正地对待欧洲和俄国。从这里和那里都可以取舍某些东西。人们过去和现在都经常说,西欧主义者——村社的拥护者——是透过某些西方理论的棱镜来看待村社的,在说这种话时还摆出检察官和起诉者的姿态。但是这里有什么可以指控的呢?如果某种西方理论会导致人们确信俄国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也有很大的长处,那么即使从纯粹的斯拉夫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也只能证明,在西方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既然我们已被卷进欧洲的生活之中,哪怕是我和这种生活建立了疏远的关系,那么没有一个斯拉夫主义者能够保证,他会全靠人民的精神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他的活动与任何欧洲的思想都没有关系。我们正在准备庆祝伟大的实干家沙皇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上述情况可以使这位沙皇的灵魂安息了。

但是,伟大的实干家沙皇知道,在他的时代西欧实验室的什么产品应当运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是否十分清楚地了解,在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呢?如果我们了解,那么不管我们如何“唾弃”彼得大帝所珍视的欧洲文明,我们也是在继续他的事业。在一百五十年当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在我们和欧洲的生活里已经改变和增添了许多东西,所以在我们的任务和彼得大帝的任务之间不可能也不应该象在数学上那样划等号。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继续彼得大帝的工作并不意味着要象他在十八世纪上半叶那样对待俄国和西欧。否则就是意味着损害彼得大帝和不懂得历史。

现在,当我们在俱乐部和会议上听到关于彼得大帝的演讲,关于他的生活的故事和奇闻时,当我们平常准备纪念他时,就会使我们回忆起一件与纪念这位俄国所尊崇的人有关的趣事。1770年,在切什梅战役^①胜利后,总主教普拉东有一次在彼得-保罗大教堂

传教。在传教中他突然从高台上走下来，走到彼得大帝的陵墓旁高喊着：“起来，彼得大帝，看看你的发明吧！”这个演说家的把戏使所有的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只有一个好心肠的哥萨克拉祖莫夫斯基用他的乌克兰方言说：“干吗要把他叫起来——他要是起来的话，那我们大家都要倒霉了。”如果大帝的幽灵为了看他的发明，在他诞辰二百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出现的话，那会怎么样呢？我们是会倒霉呢还是会受到伟大幽灵的夸奖呢？我们想，既不会是这样，也不会是那样。我们想，伟大的幽灵只是会举起他那古典式的棍棒，期望我们走完为了最后确定自己的前途还得走的那几步路，但是，棍棒总归会举起来，总归会作好准备。

的确，我们距离最后确定前途总共只剩下了几步路。这几步路将决定我们的生活走迄今为止西欧生活所走过的那条灿烂辉煌。但又阴沉昏暗而血迹斑斑的道路呢，还是我们将要创造出与当前在西方占优势的社会力量多少有所不同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某种结合呢？但是无论从斯拉夫主义者的观点出发还是从西欧主义者的观点出发都根本不能对此作出抉择，因为这些观点本身就是行不通的。既然西欧主义者确信，在西方既有刺又有玫瑰，既有光明又有阴暗，他就已经不是西欧主义者了。既然斯拉夫主义者比如说用与俄罗斯人民精神原则毫无共同之处的铁路代替了疾驰的俄罗斯三套马车，他就已经不是斯拉夫主义者了。西欧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不管愿不愿意，都只能等待铁路在俄国人民生活中即将引起的那些附带的和直接的变化。如果在这里他们努力想要影响这些变化的方向，那么当然不是从斯拉夫主义或是西欧主义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上面所提到的由历史上全体人类参加创造，其

(1) 1768—1774年俄土战争时期，俄国舰队与土耳其海军曾于1770年在爱琴海的切什梅海湾作战，俄军大胜。这次战役就被称为切什梅战役。——编者注

中也包括由我们参加创造的最高范畴的观点出发了。因此我们应该首先对自己的思想和理想进行总结，而不该去理睬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取消了的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项目，对于同这些项目有关的关于进步和落后的概念也应如此看待。对进行这样的总结感到不好的只有那些文学上的不倒翁（一种非常有趣的玩具，不管你怎么把它推倒，它总是能够站起来）。而事情本身无疑会取得胜利，因为它将变得简单明了。例如，现在有一种纲领，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斯拉夫主义经济纲领。它现在被阐述得毫无生气、水平很差、没有经受很长的考验，但是在某种条件下它会有很好的前途。这个前途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保留俄国的村社，保护俄国的工业，意思是保护俄国的厂主。俄国一词在这里是一种把两种不一致的成份结合在一起的水泥——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相信，只要你抛弃那种已经没有意义的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对俄国生活现象的态度，并且用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用全人类的原则来判断这些生活现象，我们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很快就会显示出来。水泥是假的，在俄国的利益当中俄国工厂主和俄国人民的利益是分离的，于是事情就会弄清楚。

这样一来，我们“唾弃”西方科学、自由和工业的做法的合理性，这就可以理解了。然而，我们要指出，我们从未唾弃过科学、自由和工业本身，我们一直极为尊重所有这些事物。在这方面我们和一切所谓的俄国自由派报刊是一致的。分歧仅仅在于，我们比其他人更愿意指出欧洲文明最新成就方面的污点，在最新成就的污点和前一时期成就的污点之间我们更愿意指出前者。有人正是在这点上对我们进行了指责，他们另外还指责我们对于我们最近的改革采取否定的态度，指责我们唾弃它们。如果认为这种唾弃所表达的意思仍然不是否定基本的改革，而是指出在实际实施上的那些污点的话，那我们接受这两种指责。不仅如此，在这种唾弃

之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raison d'être^①。

感谢彼得大帝，科学、自由和工业通往俄国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他担负起了这项繁重的工作，这是一项与他的巨大的天才完全相称的工作，他完成得极其出色。无论我们的黑暗崇拜者如何诡诈，全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的胜利在我们这里是有保证的，取得胜利仅仅是时间问题，自然，希望时间尽可能缩短。在希望尽可能缩短时间方面我们是不会对谁让步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愈接近文明胜利之日，在我们这里文明就愈是可能采取它在欧洲所采取的形式，顺便说一下，它已经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形式。当农奴制还牢固存在时，自然应该集中力量来废除它。如果农奴制已经动摇了，问题的重心就转移了：这时的问题就不是解放农民，而是在解放他们的同时给他们以土地。如果农奴制已经崩溃了，那么也就很自然地要指出这一崩溃的阴暗面，但这些指责不是针对崩溃这一事实本身，而是针对与它同时存在的那些条件。当科学的哲学思想在美丽的远方向我们闪耀光芒时，很自然的，我们只是把它召唤到自己的身边，别无他求。但是随着它向我们靠近，那就不可能只限于一种普通的召唤了。达尔文离我们愈近，我们对达尔文主义的道德结论和社会学结论的反抗就愈加必要，因为这些结论的科学性和无地农民的自由一样少得可怜。当我们的工业由于农奴制和其他的情况而简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时，自然人们希望的主要是发展工业。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逐渐退到次要地位，而首要问题则是工业关系在我们这里所能采取的形式^②。过去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早了，而再迟一些才要求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晚了。

① 法文：道理、意义。——编者注

② 即资本主义工业或非资本主义工业。——编者注

总之，我们不是在和风车、幻影作战。我们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做适当的事情，我们感到悲哀的仅仅是，我们不能做得更勇敢。我们的地盘在俄国。我们不仅不轻视俄国，而且从它的过去，以至它的现在都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东西，抓住它们就可以防止欧洲文明中那些不正确的方面。我们不仅对本皇朝的主要改革没有怀疑，虽然我们“唾弃”它；相反，我们认为，尽管有那些暂时的、多少持续一段时间的、经常使人惋惜的停顿，这些改革还是把我们推进到足以对我们产生新的危险的地步。这是一种只会对那些多少有高度文明的人民造成威胁的危险。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和可能来为俄国服务，使它不致遭受滥用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滥用自由和经济发展的危险。这样的滥用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自由和经济发展。我们仅仅要破坏那些给俄国造成危险的事物的名声。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等一等吧。什么话！在我们面前有着用血泪写在史册上的一些事例，我们应该等待吗？难道我们应该等待村社解体，以便说还应该保存村社吗？应该等待所有的国有土地和工厂都转入到私人手中，集中到小私有者手中，以便说俄国工厂主的利益不是俄国人民的利益吗？应该加强错误的思想方针，以便说它是错误的吗？应该发展雇农阶级，以便说饿死的自由不是自由吗？当然，我们的罪过不在于我们没有等待。相反，我们的罪过在于我们“唾弃”得不够。看来这是没有罪过的罪过……

我们为能向读者推荐马克思的这样的著作而感到格外高兴。它的出版很适时，其原因就象我们认为我们的活动很适时一样。它是对学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详细批判，同时也是一部经过深入细致研究的英国经济发展史。马克思是德国人，但是他并没有期望自己的同胞提高或降低到英国的水平（读者在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就会知道其原因）。他选择了英国来进行研究，是因为在英国，他所研究的对象，即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最少由

于受到外来的影响而模糊不清。我们相信，这本著作对于俄国读者来说将是非常有益的。马克思在自己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①大家知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者，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领袖，是对欧洲文明不满意的人之一。首先，正是由于他的不满，他对于我们来说比起所有那些通过翻译介绍过来的心满意足的加尔尼叶和莫利纳里^②等人要有意意思得多。其次，他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学者。第三，作为西方的一位革命人士，他对我们社会的安宁不可能造成任何破坏。他所与之进行斗争的思想和利益在我们这里是太微弱了，不可能由于它们的动摇而产生任何危险。但是这些思想和利益却也已经有了力量，已经足以使我们考虑它们今后发展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说，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得再及时也没有了。俄国社会十分感谢波利亚科夫先生出版了这本书。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160—168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编者注

② 加尔尼叶和莫利纳里都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编者注

工业家代表大会上的俄国 工人问题^①(摘录)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

第一次全俄工厂主、企业家和关心本国工业的人士代表大会用了两次会议来讨论改善我国工人状况的办法。这太少了(总共只有十七次会议)。但是,如果代表大会能起码象样地讨论一下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对于大会拿这么少的时间来讨论似乎也还可以容忍。遗憾的是,完全不能这样说。主席杰拉沃斯先生在宣布开会时曾经声称,满意地解决关于工人状况的问题是完全有保证的,首先,这是因为事情本身重要,其次,工人的状况和工业家的利益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我们的工业家具有西方工业家可惜并不经常具有的那种特点,即愿意从他们所积累的财富中分出一些余额来给他们的小伙伴们”。有了这样堂而皇之的保证之后,主席认为有必要指出,一切“抽象的、不具体的问题”都应当从讨论中取消。杰拉沃斯先生继续说:“我希望我们的工人不是一个需要进行治疗的病人,不需要医生们在他的床头展开无休止的辩论,来探讨病症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病人机体各部分的影响等等。必须认为,参加当前这场辩论的人们对于我国工人的日常生

① 本文最初刊载在《祖国纪事》1872年第8期文学与杂志述评栏上。工业家代表大会指的是1870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俄工厂主、企业家和关心本国工业的人士代表大会。大会的记录和速记稿于1872年出版。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工人问题偷换成农民问题,他认为俄国工人也就是农民。——编者注

活是非常熟悉的，因此，我们只要从合乎实际和适于应用的程度的观点来讨论他们提出的措施就行了”。根据这样的原则是很难期望有良好结果的。杰拉沃斯先生所拟定的计划就某一点来说是可贵的。它排除了两种研究，首先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一切科学的、理论的或者看来是“抽象的、不具体的”论断，因为经济发展规律能从工人的状况中反映出来；其次是对于工人日常生活中某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所进行的一切具体的、论述性的、历史的研究。而去掉了无疑对于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有相当密切关系的这两个内容丰富的方面，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就只有“合乎实际和适于应用的程度”的观点了。如果对相应的“抽象的、不具体的问题”所作的研究完全解释清楚了所谈到的“事情”，那么这种观点无疑是可尊重的。但是处在杰拉沃斯先生所希望的孤立状态中的这种观点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一些温和善良的纯科学界人士，例如弗列坚先生，有写政论和办公务的灵活机智人士，如斯卡尔科夫斯基先生，还有阅历很深的人士，如司罗米亚特尼科夫先生，他曾说“俄罗斯外省商人所受的教育不够，我（司罗米亚特尼科夫先生）也属于这一类人”；有“不尚空谈”，但坚信“商业能造成国家的力量和财富”的人士。如果认为只有合乎实践的程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话，那么，当然，司罗米亚特尼科夫先生的意见应该是最可贵的了。确实，司罗米亚特尼科夫先生所有的意见都是非常合乎实际的。例如，当弗列坚先生证明，童工劳动的报酬没有任何定额，无论是工人的供求情况，无论是工人的开销和工资，无论是所谓的工资的自然界限在这里都没有影响时，司罗米亚特尼科夫先生站在斯卡尔科夫斯基先生一边反驳道：“……工资不是任意确定的，而是和工人共同商定的，他收入多少是按他劳动和工作情况来决定的”。这当然是合乎实际的，但未免太简单了，简单得也许根本不值得聚会到一起来听取这类经济观点。然而这种观点却

大家都听到了。当弗列坚先生在“抽象的、不具体的”问题上多占去听众一些时间的时候，主席说，由于时间很少，是否可以将发言者在讲坛上的时间限制为十五分钟。由于这一点，当会议结束时，大家对于主席在引导辩论时的“公正和堪称楷模的耐心”，表示了感谢。在这种情况下，辩论的成效极少，是毫不奇怪的。还有一种情况使之变本加厉了。杰拉沃斯先生关于参与辩论的人都十分熟悉俄国工人状况的看法完全没有得到证实。结果，大会通过了以下两项决议：鉴于当前非常缺少有关俄国工人生活的资料，大会希望：1. 在学者和专家们的参加下，政府着手进行一系列的研究，以考察工人阶层当前在精神、智力和物质方面的状况；2. 政府研究这个问题是为了通过普及所谓经济组合和工业组合来尽可能地改善俄国工人的生活，并颁布这类组合的一般章程。

然而，我们认为，大会关于改善工人阶层状况的决议内容贫乏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缺乏十分熟悉俄国工人状况的人，也不是象杰拉沃斯先生经常推托的那样在于缺少时间。不能说，在大会上没有十分了解工人状况问题的人士。例如，有个沙皮罗先生，大家知道，他非常熟悉俄国北方工人的生活，但是他几乎没有参加辩论。有个管理东布罗瓦工厂的霍罗舍夫斯基先生，还有其他一些工厂管理人，另有人数实际上不多的过去和现在的工厂主，例如司罗米亚特尼科夫先生等等。这些人至少不可能不了解一定地区和一定工业部门的工人生活。这就是说，问题不在这儿。至于说到时间不够，那么显然，这不是主要的问题。试问，为什么拟定大会计划的由俄国技术协会和工商业促进协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对于可能是大会讨论的最重要问题所给的时间却这样少呢？我们认为，大会决议之所以质量很差，部分原因当然是在于时间不够，但是它还有更深的根源，它有着和时间不够的原因完全是一样的原因。我们认为，只要仔细听取一下杰拉沃斯先生的闭幕词，就不难

发现这个原因。

在大会第六组的决议案表决之前，主席希望对于刚才结束的辩论表示一下“自己主观的看法”。这个主观的看法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是很有特点的。杰拉沃斯先生说了以下的话：“据我所了解，我们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使两派活动家互相接近，一派是科学家和理论家，另一派是纯实践活动家。为了讨论某些旨在使我们的工业能够正常发展和得到巩固、并提高我们工人的精神和物质水平的措施，必须使这两派人互相接近起来。因此，如果一派活动家没有任何其他用心，而是出于真诚坦率和为了共同事业而工作的坚定愿望向另一派人伸出支援之手，那么，看到在加强上述两派人关系的情况下沉重的负担仅仅落到一派人身上，这一派人由于没有准备去理解那些新的、尚未经过考验的工人劳动组织的理论，而难免要改变已经被半个世纪的实践确立了的秩序，这是极其奇怪的和不自然的。要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内容又是如此广泛，要解决它就要求既从理论方面，又从实践方面预先进行全面深刻的研究。就在今天我们还听到有人说，当前即使在一些各方面都比我们先进，而且从来都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和知识渊博的工业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国家里，问题也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如果设想我们的会议能够在两三次会议上就能研究出一些积极的材料，以便我们能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呈请对这些问题采取各种根本的、决定性的措施，尤其是呈请专制政权对我们当前为了追求同样的目的想要与之订立同盟的那一派活动家的事业采取坚决的、惩罚性行动的措施，那恐怕是太轻率了。”

我们很难受地摘录了莫斯科技术学校校长的这些辞藻华丽、语气温和的长句。脑子里不由得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杰拉沃斯先生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些话？为什么他如此拐弯抹角，希望在“两派活动家”中间顺利地挤过去？为什么他要在人数很少而又对大

会十分冷淡的俄国工厂主面前如此贬低科学、“科学家和理论家”呢？而且当“两派活动家伸出手来互相支援”时，在他们下面的工人又起什么作用呢？如果我们把杰拉沃斯先生堆砌的辞藻分析一下，那就可以得出以下的意思。我们科学界希望和你们工厂主和工业家们在一起来顺便讨论一下工人的状况。但是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已经听到了许多种被认为是需要而又可能减少你们的利润的理论。你们不要害怕，我们不会提出这类问题。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用心，而是真诚坦率地建议和你们结成联盟。这就是第一次全俄工业家代表大会第六组主席所说的话。这个发言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俄国工业家的特点是经常愿意牺牲一些余额(?)来帮助他们的小伙伴们”这种恭维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有关工人状况问题的狭隘提法，也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整个辩论的过程。科学界知道，为了工人的利益就需要对“另一派活动家”的事业给以有力的影响。科学界尽管知道这点，但是仍然保持沉默，因为害怕打搅工厂主的心绪安宁。而且科学界也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知道需要什么，但是我们保持沉默，因为不想搅乱“另一派活动家”的内心世界。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白的，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工人的状况不可能有多大意思。如果杰拉沃斯先生对这些讨论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它似乎是正确的——，那么进行讨论的先生们就该经常受到某种“别有用心”的影响，虽然这种别有用心含义仅仅是可不要怀疑我们别有用心和不够诚恳。由于这一点，发言人的注意力就完全不能集中到根据议程所应该集中的地方。例如，拿所谈的童工问题来说。毫不困难就可以证明，为了童工本身的福利就不应该允许他们进工厂。斯卡尔科夫斯基先生关于童工是一种辅助的诡辩只能引起必需采取某些坚决措施的考虑。无论如何问题涉及到了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但是发言者经常面临着要得罪、侮辱和惊扰“另一派活动家”的危险。由于必须诚恳地支持

和工厂主的联盟，而限制童工对工厂主不合算，于是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便迟迟得不到解决……这样一来实践的观点即要在当前改善工人的状况而又不去改善的观点取得了胜利。

但是杰拉沃斯先生辞藻华丽的演说之所以使人感到兴趣不仅仅因为它是揭穿工业家代表大会在工人问题上进行辩论的神秘的线索。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几乎贯穿于所有有关俄国现状的流行观点之中的一场重要争论。虽然在大会上极其频繁地提到，我们的工业家、我们的工人、我们的科学界都与外国截然不同，但是实际上关于工人问题的辩论都是按纯粹的外国调子进行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想要以此说明，大会第六组会议是西欧类似会议的翻版。在那里这类会议当然安排得完善得多，也周密得多。我们谈的只是关于调子，关于辩论的方向。杰拉沃斯先生则推托说，就是在各方面比我们先进的国家里，工人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于是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更可以，甚至更应该推迟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各方面比我们先进的国家没有解决自己的工人问题，这是完全自然的。但是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完全效法它们。在那里大工业家是巨大的社会力量，无论在其数量、教育水平方面，还是在资本雄厚方面都是强有力的。在那里，圆满地解决工人问题确实等于一场革命，将会触动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整个社会制度，使得重要的、影响大的、大量的利害关系发生动摇。因此在杰拉沃斯先生发言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雕琢辞藻的谨慎，那种 *zirlich-manierlich*^① 在那里至少还可以得到解释，然而在我们这里呢？为了什么我们要把事情搞得似乎我们的资本家在俄国人民的大海在各方面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滴水，或者似乎我们的工人和西欧的无产

① 德文，装腔作势。——编者注

者没有任何区别呢？大会发言人中只有一个人即古宾先生本来想至少把问题的一个方面置于应有的角度上来考察。古宾先生说：“‘工人’这个词在我们这里不能象在国外那样来理解它的含义。我们没有或者很少有那种在工厂里成长起来的工人。我们的工人是一年在制呢厂工作，而第二年又到制糖厂工作等等，即使他们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也有大部分人从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得到物质帮助。因此，不能把我国的工人和比利时、法国以及英国的工人同样看待，在那些国家里他们是没有土地的无产者。我国的工人构不成单独的工人阶层。相反，他们既是小市民又是农民，既住在县镇里又住在城市里。”遗憾的是，他指出这一点显然只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但却是次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在工厂里开办学校做得不够。其实古宾先生所指出的人所共知的十分重要的事实应该作为关于俄国工人问题的一切辩论的基础。

……在欧洲，工人问题是一个革命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它要求把劳动条件转交到工人手中，并要求没收当前私有者的财产。在俄国，工人问题是一个保守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它仅仅要求在工人手中保留劳动条件，保障当前私有者的财产。就在我们彼得堡一带，也就是在最为英国化的地区之一，在到处是工厂、公园和别墅的地方，有许多村庄，居民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烧的是自己的木柴，吃的是自己的面包，穿的是用自己养的羊身上的羊毛制作的呢上衣或皮袄。只要你向他们保证他们能可靠地拥有自己的这一切，俄国的工人问题便解决了。如果正确理解了可靠保证的意义，就能为了这个目标而贡献一切。有人会说：不能永久地停留在犁和三圃制的经济状态，不能停留在用十分落后的办法来制作上衣和皮袄的状态。但是，要摆脱这种困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得到持实践观点的人赞同的、非常简单和方便的办法：只要提高税率，解散村社，大概也就够了，工业就会象英国那样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

起来。但是它会吞噬工人，剥夺工人的。还有另一种方法，当然要困难得多，但是问题解决得容易并不意味着正确。另一种办法是发展那些已经存在，但仍处于极端粗糙的原始状态的劳动和所有制关系。很清楚，要达到这个目的，国家不进行广泛的干预是不可能的，而干预的第一个步骤应该是从立法上来巩固土地村社。我们的人民嗅得出来危险是从什么地方向他迫近的。在《彼得堡新闻》第197期中刊载了关于库皮扬斯克县（哈尔科夫省）混乱状况的一篇有趣的报道。这种可悲的混乱——上述报导中提到了“五车树条”^①——在我们这儿是很普通的。我的任务不是去叙述它，我只是引用农民们说的以下一些话：“只要我们一拿到土地证书^②，如果村社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我们马上就可以卖掉一部分土地，而在我们这里，穷人和懒汉总会有的。老爷和商人们会用烧酒和金钱怂恿我们把一部分土地卖给他们，而且还要好地。卖地的钱会落入公家手中，而给我们几个戈比来安慰一下，然后我们每年就要用三个到五个卢布去租用卖掉的土地。当土地属于国家时，我还不至于饿死，不管我发生了什么事，地总还留在我手里，当我们赎回了地，它就会落到有钱人手里。我死后，土地要是归村社，等孩子们长大了就能得到土地；如果把土地赎买了并且分了，那么等到孩子们长大成人时，土地就象房子和其他的财产一样已经成为监护人和乡政府赖以生活的手段，我们的孩子们只好到处去讨饭。”有个自由党人认为，出卖部分土地、赎地和分地都取决于他们的自愿，那些理智很健全的农民对此回答说：“只要你给予我们权利，那么就会在小酒馆里很容易得到我们的自愿……某人（名字和

① 沙皇政权在镇压农民骚动时常使用鞭刑。——编者注

② 土地证书是一种发给联合为村社的国家农民的文件，上面注明了划归他们所有的土地以及应交的赋税。拥有土地证书的村社可以将土地出售或将某些地段分给自己的成员。当时农民曾拒绝接受土地证书。——编者注

父名)现在要让我们喝酒,要收买乡和村的长官,要买走我们最好的土地,而我们就会只留下一点宅旁园地和不宜耕种的土地了。”

当然,巩固村社仅仅是政府干预的第一个必要的步骤,但这是极其重要的、决定人民命运的一步……村社的土地所有制和英国式的大工业是不可能长期并存的。其中必定有一个要让路。所以,看来卡维林先生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他认为村社是俄国人民的帕拉斯女神像^①。在神像上写着:现在胜利了。有人会说:村社束缚个人自由。这是一个陈旧的无稽之谈。究竟什么是自由、独立和主动精神呢?对于实践家来说,这是铺满了玫瑰花的通向无底深渊的道路。对于理论家来说,这是不受点儿伤就不能走到的目标。当然,这种观点不能容忍漂亮的空话,不能容忍时时高呼自由万岁和诅咒规章制度的作法。根据它的字典,杀死儿童只不过是杀死儿童而已,而不是什么劳动的自由,无产阶级只不过是无产阶级而已,而不是什么选择职业的自由。那些无地的雇工是只能听任那种自发的,也就是不可理解和不道德的劳动供求法则的任意摆布,难道他们是自由的吗?在我们这里不仅仅斯卡尔科夫斯基先生,还有司罗米亚特尼科夫先生也在谈论关于“劳动的自由”。在欧洲这个调子已经开始被抛弃了,最有权威的自由派分子现在常常谈的是政府以某种形式进行干预。在经济上平常只有私有主才能发挥个人的主动精神。因而最令人可怕的首要就是把财产和劳动分离的那种社会制度。恰恰是它使得人民不可能有个人主动精神、独立和自由。这就是工业家代表大会在讨论俄国工人问题时应该持有的观点,如果代表大会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它愿意这样做的话……无论如何科学界人士是能够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却宁愿“没有其他用心,真诚坦率地”越过人民向“另一派活动家”伸

^① 在古希腊,帕拉斯女神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者。——编者注

出支援之手。他们宁愿把俄国生活中最保守的问题变成一个“吓人的东西”。他们经常对无知的群众随声附和，并且只会尽力使那些本来就已经弄得够模糊了的问题变得更加模糊，其实这些问题本身是十分清楚的。这是令人感到忧虑的……能期望从何处得到光明呢？很明显，事物发展的进程，由于没有得到科学之光的指引，将古老的欧洲引向了灾难。我们则刚刚开始生活在科学已经具有某些真理和权威的时代。而科学就要起滑头来了……狐狸尾巴和狼嘴——这就是第一次全俄工厂主、企业家和关心本国工业人士代表大会上两派活动家的标志。

工业家代表大会的发言人之一，那个卡伊戈多罗夫先生向大会建议“从我们这些人中选举或者创立一个促进我国工人智力、精神和物质发展的新协会，如同现有的我国工商业促进协会一样”。综上所述，读者可以，*a priori*^①得出结论，这个建议不会得到特别的支持。的确，从记录和速记中甚至看不出，卡伊戈多罗夫先生的建议引起过任何讨论，因为根本就没有提到它。其实促进工人智力、精神和物质上的发展的协会，比起一些报纸所吹嘘的工商业促进协会来说，在我们这里更加有理由存在。希望卡伊戈多罗夫先生的想法不要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了这种专门协会，我们的工人问题便能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工业家代表大会会议上就不会占次要位置，不会成为一个使神经衰弱的老妇人望而生畏的“吓人的东西”。协会的目的应该是：1. 深入研究与工人生活有关的理论问题。2. 全面调查我国工人的状况。3. 建议政府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工业部门根据工人的一般状况以及他们生活特点的需要，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4. 协会随着资金的增加或许能够给予那些再度组织起来的劳动组合和储蓄贷款银行等等以支持。据说，

① 拉丁文：先验地。——编者注

工商业促进协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问题，甚至对许多问题已经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收集了许多有益的资料。没有理由设想，促进工人精神和物质发展的协会所起的积极和有益的作用会要小些。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169—177页。

致俄罗斯人民^①（摘录）

亚·瓦·多尔古申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马太福音》第7章）^②

兄弟们！我们之中谁不时而想起，世界上正在发生某种不大好的事情，人们仿佛不是过着那种应当过的生活，难道就不能安排得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使那种折磨人和令人到死都不能松一口气的贫困不再存在，这种生活很不好，永远处于半饥饿状

① 这份传单写于1873年。多尔古申派小组是“到民间去”的革命民粹派的小组之一。——编者注

② 多尔古申派进行革命宣传时利用基督教的教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致俄罗斯人民》这份传单就是从基督教福音书的格言开始的，以便在后面证明俄国现实和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矛盾。多尔古申派在利用基督教福音书来论证自己的原则时，同时揭露了自私自利的神甫这样一些教会的神职人员。——编者注

态，吃不饱肚子，交不完的税……这真是咄咄怪事，简直莫名其妙……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以前我们有过地主，而农民对他们来说就好象是干活的牲口。这些地主肆意压迫人民……想起来简直令人害怕！……而农民却无处控告他们，农民既不敢也不可能，因为皇上的法律就这样规定，农奴控告他们地主的状子不予受理。^①一切都维护地主，一切都有规矩！惩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送去当兵，嘲弄和侮辱他——这些无法无天的人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而人们却不敢反抗……有什么办法呢？！……全部力量都在地主方面，沙皇站在他们一边，因此他们随心所欲地调遣军队，经常派兵去镇压农民……不过，这都算不了什么，人民毕竟比所有的贵族及其军队加在一起还来得强大，如果他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起来反抗不公正和压迫，那就无法抵挡；贵族就会象胆小的兔子一样四散逃窜。是的！人民比所有的人都来得强大，的确是这样。不过问题在于，人民被压迫得太厉害了，以致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可以起来反抗地主和沙皇；人们经常对人民说，他们应当服从当局，一切权力都是上帝赐予的。这些恶毒的、撒谎的人！他们要对这些欺骗负责。受尽折磨的父亲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孩子，要他们服从自己的主人，感到惊恐的孩子们便发了誓，并且努力终生遵守自己的誓言。所以这种荒谬的、违反上帝意志的制度是靠恐怖、吓人和粗暴的行为来维持的：

备受压迫的庄稼人，
在土皇帝的鞭子下默不作声，
官吏肆无忌惮地掠夺他们，

^① 还在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期农奴就被剥夺了控告自己主人的权利。——编者注

他们在劳动中度过一生，
自己却没有留下分文……

人民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掠夺……地主掠夺他们，沙皇和国库也掠夺他们。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国库要钱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战争以后，这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唉，代价太高了，在这场战争以后，国库完全空虚了。到哪里去弄钱呢？……人民也因为这场战争破了产……也许大家都还记得，那时募集过多少钱啊，赋税也增加了那么多……所以，从人民手中再也搜刮不到什么了。国库怎么办？……准备破产。真糟糕！人们盘算，如果农民成为自由的人，他们就会富裕一些，挣钱多一些，而现在他们是农奴，是不自由的人，在棍棒下干活，因此现在他们生产的東西很少，但就连这点东西也都被地主抢去了，要是给他们自由，让他们为自己干活……啊！那时他们就能生产出十倍的东西来，因而就会变得更富裕；当他们变得更富裕的时候，就能从他们身上攫取更多的东西；那时就可以增加赋税和提高酒税、盐税以及其他的税……瞧，他们就是这么盘算的，因此，这仍然不是要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不公正，不是要消灭奴役，不是的！对于这一点那时和现在一样很少有人操心。他们想使人民的境况稍许好一些，以便从人民身上攫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算盘，但就是这个算盘也打错了。地主一听到这件事，就到处大喊大叫起来：“要把农民从我们手里夺去，那怎么行！无缘无故地让我们破产，难道这是公平的！而且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我们的父辈、祖父辈和曾祖辈向来都占有农民，而现在却突然要解放他们……”。于是一个一个都走了……他们把这一切都禀告了沙皇，要知道沙皇身边有许多贵族。他们和沙皇商量了好久，沙皇一切都听他们的，他向来是听他们的，他们是沙皇的常设顾问，所以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的贵族制度，我们所有的长官都是贵族。可是庄稼人的事和贵族有什么相

干？他所要的就是让庄稼人处在他的管辖下，象奴隶一样地服从他。正因为这样，贵族—地主才劝告沙皇解放农民时不要给他们土地，并让沙皇相信，这样做会很好的！这些人真有良心！……但是没有这么办，因为这样来解放农民对国库有什么好处呢！……而地主却还是想方设法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没完没了地恳求沙皇，就象小铺子的掌柜一样地恳求，他们说，要是给就算了，要是不给，就再减掉一点。最后，他们在赎金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兄弟们，看见了吗？公正的做法应当怎么样？……应当解放农民，分给他们足够的土地，起初，当他们成家立业置备一切必需品的时候，应当帮助他们，——就是这些，再没有别的了。要是这样，他们就真正成为自由人了，可是现在他们哪有什么自由？贫瘠的份地，很高的地租，到处受欺凌，如此而已……难道这就是自由？够了！这仍然是受奴役，而且比以前更厉害……沙皇和贵族就是这样安排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没有忘了自己，可就是不想着人民；真的，想人民干什么，人民自己会关心自己的……确实是这样，兄弟们！谁也不会比自己更好地关心自己，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还是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随便议论我们的事情吧。

就这样，解放了农民，现在至少地主已不能象以前那样侮辱人民和喝他们的血了；但是，即使现在农民在各方面也还是不自由的。问题就在于：从前农民是属于地主老爷的，地主老爷可以任意支配他们。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富人，另一个人没有饭吃，——那会怎么样呢？那时富人就对穷人说：“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我就能使你免于饿肚子的危险；你要是不愿意，我能找到别人，你不同意，别人会同意我的条件，因为饥饿是无情的！”兄弟们，你们是怎么想的？我们认为，这个穷人仍然和农奴一样，同过去属于地主老爷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1861年给予农民的那种自由并没有使农民摆脱最主要的东西——贫困和愚昧，因为哪里有贫困和

愚昧，那里就有奴役，那里富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穷人，那里任何官吏都可以抢劫穷人，不亚于拦路的强盗，不论你到哪里，到处都充满凶狠、妒忌、仇恨和种种不公正。真是可怕！……只有当人们处于平等的地位，当一个人不能随便欺负别人，当没有那种迫使人服从不公正的制度的难堪的贫困，当人们都沐浴着文化和科学的光辉时，人们才能自由。在我们俄国什么东西可以成为神圣的事呢？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平等：贵族不承担任何义务，农民却因承担一切而受苦；为贵族开办最好的学校，而农民却受不到任何教育，也没有一个半文盲的退伍士兵或教堂下级职员来教他们认几个字；让贵族受教育，却使农民处于愚昧无知的黑暗中。农民所干的活百倍于贵族，但是他们却穷得无法和贵族相比，因为他们担负着极其繁重的苛捐杂税，由于这些苛捐杂税，俄国人民才穷困不堪，而贵族们一窍不通，却掌管一切，过着快乐的生活。他们勾结官府，把最好的土地和林地攫为己有，而把最坏的给予农民；他们每个人平均得到六百七十三俄亩土地，而农民每人只得到三俄亩半土地。贵族自己不担负任何义务，而把负担都加在农民身上；他们巧妙地把自己的事办得妥妥贴贴，还以为做得很对。但是，兄弟们，你们要知道，这里没有公正，对于人民来说，这里只有罪恶的引诱，引诱富人去粗暴地压迫穷人，引诱强者欺凌弱者……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暴力统治之下，但是总有一天要从这种暴力下解放出来。我们不会永远过穷苦的生活，不会永远看着人家靠我们的劳动发财致富，任凭人家凌辱我们。是我们摆脱贫穷和愚昧的时候了，因为如果一个人贫穷和无知，他就会变得胆怯，什么都怕，什么人都能支配他；无止境的贫困往往使人去犯罪；当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有时他心中充满愤恨，他就想自杀；他心里感到痛苦时，他就竭力借酒浇愁，愿意在醉后忘却一切。要不然他就在所有比他强一些的人面前卑躬屈膝，去当奴隶，人家

命令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而强者也就嘲弄他，强迫他做工，想方设法侮辱他，他只要稍稍提到他也是人，就说他造反，依法把他关进监狱，或者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们说，不要造反，要是叫你绝对服从，你就绝对服从，不要反抗……一切罪恶都是贫穷和无知造成的，人也变得不成人样了……瞧，贫穷把人弄成什么样子了。但是，他不应当成为这样的人，他不是为了成为这样的人而生的。世界上所有动物中没有比人更高级的动物了。他生来就是主宰一切的，赋予他智慧是为了使他懂得和珍惜人的尊严，善于尊重自己和别人的尊严。懂得和尊重自己和别人的尊严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个人不应当容许自己在任何人面前卑躬屈膝，也不容许侮辱别人；不应当欺负任何人，也不受别人欺负；不应当做任何为害他人或使他人受苦的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应当对他自己和对别人都是善良的，有益的。因为侮辱别人也就是侮辱自己；欺负别人也就是欺负自己。谚语说：“乌鸦不啄乌鸦的眼睛”——这就是说连鸟类都能分辨出自己的弟兄。我们人比鸟类不知要优秀和聪明多少倍？！我们想起了福音书中的话：“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法律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

但是，我们这里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事呢？这还用说吗，本来是众所周知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千百万穷人，而富裕的人只有那么数千人；我们的农民被苛捐杂税压得直不起腰来，可是却什么东西都得不到，得不到福利，也得不到教育，他们只知道交租纳税，交出去的东西就象投进了无底洞，杳无音讯。是呀！农民交租纳税，而贵族和沙皇却掌管一切，他们除了自己以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反正他们是挥霍别人的钱财，管它花在什么地方，反正都一样。只有用沉重的劳动和血汗挣得每一个戈比的人才会精打细算，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

人就毫无顾忌，挥金如土。我们的贵族——地主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劳动，挣得一块面包是什么意思……别人永远为他们干活，他们永远不劳而获，他们早就习惯于损人利己。因此他们不从事任何劳动，也不会公正地评价别人的劳动；他们习惯于过奢侈的生活，而奢侈使人身体虚弱，娇生惯养，一个人由于沉溺于这种生活而忘记了自己的亲人，忘记了正义，忘记了上帝……这些人连对自己都不能也不会关心，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总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人们为了他们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洒了多少血汗和泪水，受尽欺凌，——就是在这样一些人的手里掌握着管理一切事务的权力，进行审讯和惩治的权力。兄弟们，你们在想什么！醒醒吧！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有什么公正，只有对穷人和愚昧无知者的压迫！……真的，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欺骗和压迫自己的亲人！……政府向人民漫无节制地征收苛捐杂税，能拿什么就拿什么，——钱、财物和人（虽然福音书中耶稣基督说过不应当这么做，见《马太福音》第 17、24、26 章）。官吏们能抢什么就抢什么。财主们惨无人道地掠夺工人，只要能够发更大的财，他们便不择手段，克扣、少给份量、少给尺寸、罚款、给穷人吃无法下咽的面包、重利盘剥（虽然圣经上说应当这样做，见第 2 诫律^① 第 23 章）。甚至连牧师这样一些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也忘了羞耻，不肯白念祈祷经文……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大多数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受不到任何教育，只有一小撮人享受世界上的一切福利。这一小撮人妄自尊大，把大多数人叫作粗野的乡下佬，自称为高尚而有学问的人。但是，就算这些高尚的人不妄自尊大，不在我们穷人面前趾高气扬，我们也多少知道他们一些底细。我们知道，他们早就丧失了自己

^① 指旧约摩西五书中的第五书《申命记》。——编者注

的人的尊严，他们随时随地都要侮辱、欺负和压迫别人；他们的心已变得冷酷无情，对一切真正善良和公正的事物都置若罔闻，满脑子都是不可遏止的贪欲。我们想起了耶稣基督说到的那种人：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缝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①……”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蠅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象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马太福音》第 23 章）

让有耳朵的人听听我们的救世主基督所说的话吧！

^① 即老师。——编者注

所以，兄弟们，你们可以看到，在现在的制度下没有公正，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只有粗野的暴力和奴役，人们生活着，却忘掉了基督的圣训：“兄弟们，要彼此相爱”，而是相反地象野兽一样互不关心，经常互相伤害。

我们，你们的兄弟，向你们，被压迫的人们呼吁，为了永恒的正义我们号召你们，起来反对这些不适合世界上最高级、最优秀的造物——人的不公正的制度。起来，兄弟们！你们的起义将是正义的，如果你们齐心协力奋起反抗，勇敢地捍卫自己的神圣的正义的事业，不向任何人作任何让步，那么幸福将是你们的。

你们受欺凌，被侮辱，被迫过着极端贫困和愚昧无知的生活，可是现在是你们挺起腰杆和自由呼吁的时候了。看吧！呼出的这股强劲的气息将使我们的敌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象蜡在火中融化一样……当蔚蓝色的大海汹涌澎湃的时候，高傲的舰船就会倾覆，它们的巨大的桅杆将破裂成碎片……

你们，信奉东正教的人民，也应该这样。只要你们起来，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话，你们的压迫者就将在你们面前发抖，低声下气地乞求饶恕……当你们取得了胜利以后，你们要这样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使压迫者不再能生育繁殖，当不再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时候，你们就会完全幸福了……

但是，兄弟们，你们要知道，现在的制度对一些人是有利的，他们将牢牢地抓住它不放，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护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使你们处于愚昧无知、贫穷落后的状态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这便于他们这些无法无天的人掠夺和压迫你们。他们害怕你们一旦摆脱贫穷和愚昧无知，他们的王国就会完蛋。他们知道，到那时他们必将逃脱不了惩罚。因为猫是知道自己偷吃了谁家的肉的。当你们为自己要求更美好的命运时，那些坏人、恶棍就开始向你们喊叫，说你们是造反者，要把你们斩尽杀绝……事情就是这

样……而且永远是这样；请想一想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第10章）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宣传仁爱、博爱和自由，他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而人民的压迫者却认为他是造反者，把他抓了起来，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也宣传他的教义，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或被驱逐，或被投入监狱，或被处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公开宣讲，人们生活得很不好，人间不应当存在贫穷、愚昧、无知、嫉妒和仇恨……是啊，他们那时所说的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一样，他们的事业也和我们现在的事业一样！……我们要勇敢地说，我们不是造反者，我们不想造反，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生活幸福，我们要使每一个人都能知道，他是自由的人，不压迫任何人，也不受人压迫，我们严格遵守基督的圣训：“兄弟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不想危害任何人，如果那些残酷地迫害我们的人不把我们逼到这种地步，我们是不希望流血的。我们将坚决捍卫我们的神圣事业——把人民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

但是，首先应当商量好，取得一致的意见，要同心协力地行动，而不能各行其是。应当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意图，使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事业是什么，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不是无缘无故地从事我们的事业的。

总之，我们要求，第一、取消地租。我们不愿意缴纳地租，因为我们认为地租是不公正的。迫使我们贱买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父辈、祖辈、曾祖辈都曾耕种过这些土地。当我们

还是地主的农奴时，我们就耕种过这些土地，后来地主没有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同地主分开了。土地仍由我们耕种。为什么还要缴纳地租？！按理说，地主应该偿还我们，因为当我们属于他们的时候，我们一直白白地为他们劳动。而现在却相反，他们还强迫我们缴纳地租！这是完全不行的。除此以外，再加上我们赎买贫瘠的土地，或缴纳总数高于赎买土地的价格的地租——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那么缴纳地租是毫无道理的。还有一点：土地天生就是为了大家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的一份，什么都不用缴纳；如果为此而需要缴纳地租，那就是说，某些人强行把土地占为己有，并强迫别人购买他们的土地。我们要问：这是公正的吗？这不是暴力行为吗？不是抢劫吗？难道人们的需要是不同的吗？不！我们知道，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天生就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首先是人人都有生存、自由、幸福的权利。大地是我们的养育者，我们大家都享有使用土地的同样权利。——就是基于这些理由，我们不愿意缴纳地租。

我们的第二个要求和第一点类似：我们不愿意耕种小块份地和贫瘠的坏地，因为这样的土地不能很好地养活我们。既然我们祖国有足够的良田供大家耕种，有什么必要耕种这样的坏地呢！为什么还要去流浪呢！因此我们要求普遍勘查并重新分配农民的、地主的和國家的所有土地，把它们公平地分配给大家，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土地。

第三、我们要求取消现在每年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它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义务兵役制其害无穷！问题主要在于它把人毁了，因为脱离一切劳动。服役十五年，真是开玩笑！事情很清楚，在这个时间里，一个人丧失了劳动的习惯，不再习惯于农村生活，当他返回家园时，不是经常酗酒便是到处游荡。在他服役期间，他的家庭也变穷而衰败了，所以结

局是不好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大家都知道，这样是不行的，——因此，需要采取其他办法，首先必须完全取消这种义务，使之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普遍的军事训练；开办这样的学校，使青年人都能在那里学习各种军事技能。这样就用不着离乡背井，在外当兵受苦了……在这些学校里，人人都能学会军事，一旦有事，都能保卫自己和祖国；那时只要发出号召，就能集合起一支军队来，战士们从他们自己的弟兄们中间选出军官和需要的人来，这些受人爱戴的领袖就能率领自由的战士们去进行战斗……

实行这种制度就用不着象现在这样花费这么多钱来供养军队。要知道目前这一项开支就将近两亿银卢布！难道还要保留这种制度吗！……不！我们要求取消义务兵役制，代之以在学校里进行自由的军事训练，只有在战争时期才集合军队。

第四、我们要求开办优良的学校。虽然有人说我们庄稼汉不懂得文化和科学的益处，这只是蠢人们的胡言乱语，连他们自己也不知胡说了些什么。不，我们很懂得一个有知识的人可以顶两个文盲；我们也懂得，如果一个人不是徘徊于愚昧无知的黑暗中，而是沐浴着文化和科学的光辉，那就要好得多。这一切我们都明白，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政府竟没有注意这样重要的事情？现在用于军队的开支是两亿银卢布，而用于学校的开支总共才八百万！显然，对军队的关心和重视要大得多。这是很奇怪的，我们不明白，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我们只知道学习是头等大事，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因此我们要求，对民众的学校必须予以重视；要以最好的方式来办学校；学校里的教师应当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具备一切良好的学习条件；使我们的孩子不至于白白地上学，而能学会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亲人和祖国所必需的一切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光明，

没有知识就得受奴役！

我们听说，就是现在世界上也还有许多这样的书，这些书谈到我们的制度和比我们的制度更好的其他制度；谈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事情，我们大概就会把它们消灭的。可是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却没有想到这一切。如果人们把这一切向我们解释楚清，如果我们自己能读这种谈论公正的书，那就好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学问，以致寸步难行：一个官吏对你讲得天花乱坠，引用各种法律，而你却莫名其妙地站着；等到你醒悟过来时，他已经把你骗够了，可还在支吾搪塞。就是这样！这怎么行呢？人没有知识就这么糟糕！……

第五、我们要求取消居民证。

大家都知道，由于居民证发生了多少不愉快的事，在这上面花费了多少金钱和时间。现行制度的确需要居民证，因为这给国库带来收入，国库只要有收入，即使千百万人遭殃，国库也毫不在乎……，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有人交不起租税，就用它来逼他。有人要去外地谋生，就对他说，“不行，你先付了居民证的钱再走”，他什么都还没有挣到，就已向他榨取了。因此，居民证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压迫，但愿不要再有居民证了，但愿每一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

最后，这是我们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我们不愿意让人们任意搜刮我们，想把钱花在哪里就花在哪里。怎么？我们把自己用沉重的劳动挣得的一部分钱交给国库，却不知道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倒好象我们是阔佬，不管这些钱是用来办好事还是白白地浪费掉，对我们来说好象都是无所谓的。不！我们不能这样轻易地出钱，我们的钱不是白白地得来的，要知道，我们不是贵族，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得到我们的同意以后才能开支，并向人民作最详细的报告。

他们狠狠地把我们掠夺，
使我们都沦为乞丐，
全是我们用农民的血汗，
把生身的土地浇灌！

我们不愿意一切事务都由贵族掌管，我们不需要官吏，我们知道，他们一点也不关心我们的疾苦，只想靠剥削我们发财致富。我们希望人民能够通过自己选出来的人进行管理；政府不要象现在这样光由贵族组成，而要由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人组成，人民将对他们实行监督，要求他们报告工作，必要时则撤换他们。这样的政府将只做有利于人民的事，如果它想做什么为害人民的事，人民将立即制止它，撤换它。

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而现在的政府只能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因为它横征暴敛，使人民贫困到极点，毫不关心他们的疾苦。它常常抢走农民的最后一匹马，最后一头牛，不给他们留下一块面包和一粒盐，因为政府甚至征收盐税，由于盐要征税，盐就变得如此之贵，以致要买都买不起，可是盐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什么制度？

如果我们所有这些要求都能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可以保证，就不会有目前存在的这种岂有此理的制度。不会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也不会有无知、愚昧、贫困的人，而我们大家都将十分幸福，都将象大地的主宰——人应有的方式那样地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事业。善良的人们，请你们评判一下，这里有没有任何非法的或不公正的东西。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正义的，现在我们所要考虑的是我们采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不管你怎样想，有一种办法是非采取不可的，需要大家协商一致和同心协力，而不能各行其是。取得一致意

见看来倒并不困难，因为我们大家都过着同样的生活，都受同样的苦难。当我们大家都取得一致了，就会变得如此强大，以致不会有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但是怎样达到普遍的一致呢？可以这么办：如果一个团体意见一致了，就让它派出自己的代表到另一个团体去，说服它采取一致的行动；如果它表示同意，那么就由这两个团体都派代表到第三个团体去，这样继续下去，联合的团体就会越来越多，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

愿苦难深重的俄罗斯，
象一个人一样奋起。
我们要永远解放自己，
使大家都得到生身的土地！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20—230页。

致知识分子^①

亚·瓦·多尔古申

你们知识分子都非常了解目前极不正常的世道，所以我们号召并吁请你们到民间去，以唤起人民为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制度而进行反抗。谁只要能够，谁就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人民的

① 这是号召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一份传单。——编者注

解放事业，而且不必考虑，不论作出什么牺牲对他来说都不会代价太高。那么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呢？是在我们那些被表面现象迷惑的青年急于要去的那种地方自治机关吗？！^①

可是，地方自治是无权的，它是由专制暴君一手拼凑起来并时刻控制着的一种骗人的形式，专制暴君从来不懂什么叫人民的福利。或者你们想要研究劳动组合的结构吧^②，但要知道这是旧皮袋里装新酒。因为劳动组合必须以团结一致的原则为前提，而你们却想把它塞到粗暴的个人利己主义占绝对统治的地方去。如果你们要使新的植物扎根成长，那就先把土壤准备好。

不妨回忆一下罗契得尔劳动组合^③！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的原则一旦处在与它格格不入的慈善事业的老环境里，它是怎样变质的？但是慈善事业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难道你们不想当一个模范家长，从事教育孩子的工作，好把他们造就成具有崭新世界观的人？或者你们要谋求所谓的个人独立？……但是无论在前一种或者后一种情况下，你们将终生是剥削者和寄生虫。难道这种难堪的念头不使你们感到痛苦！……是的，你们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象当一名创造美好新生活的人民宣传员那样有益于人类。请回忆一下蒲鲁东的话：意志和信念一向被宣称为自然和人类的最伟大的力量；既然我们怀有对我们的事业

① 地方自治机关是在实施所谓的农民改革的同时建立的。根据1864年的沙皇政府条例，地方自治机关是地方的管理机构，实际上却是为了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建立的。多尔古申派对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自由主义者的活动持否定态度。——编者注

② 组织各种各样的劳动组合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曾广为流行。多尔古申派则提出了首先组织人民起义的任务，而后再过渡到组织各种经济形式的劳动组合。——编者注

③ “罗契得尔劳动组合”是1844年英国罗契得尔城纺织工人建立的一种消费合作社（“公正的罗契得尔创始人合作社”）。革命的多尔古申派拒绝把合作社恩赐用于自己的宣传目的。当时俄国农村中还没有消费合作社。——编者注

的正义性、对我们的原则的正确性、对我们的理论的永恒性的信念，——难道我们还缺乏意志吗？有朝一日难道我们不会成为在自己的信仰方面坚信不疑和毫不动摇、在自己的事业方面坚定不移和贯彻始终的新人吗？我们将会证明，我们的心是真摯的，我们的信念是热诚的，我们的模范行动必将改变大地的面貌。不要以为俄国人民不会理解你们和粗暴地推开你们，如果有时人们这样说，那也是根据这样的事实而说的，这些事实证明不善于采取行动，对事业往往缺乏赤胆忠心。谁不知道一个俄国人是多么喜欢同情，他是多么善于器重那种为他的痛苦而感到苦恼的人，——只要他一发现这种同情的话。但是，如果他发现对他说的不过是些空话，他就会公正地表示愤慨，并报以鄙视的态度……但愿珍惜真理的人们，把实现真理作为自己切身需要的人们到民间去，既不怕迫害，也不怕死亡。

我们的口号是自由和平等，
朋友们，快拿起武器前进！
把人民公敌——沙皇贵族和王公，
统统消灭干净！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31—232页。

革命宣传纲领^①

彼·阿·克鲁泡特金

尽管政府日益加紧迫害，尽管进行新的逮捕和颁布新的镇压的法律条文，到民间去的青年人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我们的反抗的青年从完全没有社会基础的军事阴谋(1825年)^②转到私下议论社会主义的共和政体，然后转到和一部分关心变革的人进行肤浅的交往，最后转到同这些人建立比较直接、比较经常的联系，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现在应当指望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然后迅速地从小民当中产生鼓动员，最后就举行武装暴动。但是，由于到民间去的队伍日益壮大，因此革命者就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作好准备，作好周密的安排和掌握熟练的本领。至于说到作好准备的问题，那么我们不知道还有比《特权阶层出身的革命家》一文的作者^③提出的经验更好的经验了。只有良好的愿望、只有毅力、智慧和坚韧精神等等，这对革命者来说还非常不够，除此之外，还必须更进一步地熟悉人民，清楚地了解他们的要求、观点和思想方法。愿意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人还不是一个革命者，他还必须作好准备。

① 这个纲领是在彼·阿·克鲁泡特金加入了彼得堡柴可夫斯基小组以后起草的。纲领试图规定“到民间去”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任务及其行为准则。从内容看，纲领起草时考虑到了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的初步经验。——编者注

② 克鲁泡特金把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看成同社会、同人民没有联系的纯粹的军事阴谋。——编者注

③ 指彼·拉·拉甫罗夫。该文刊载在1874年出版的《前进》杂志第2期上。这里提到了这篇文章，由此可见，《革命宣传纲领》的写作不会早于1874年。——编者注

准备工作应当包括读书，读那些有助于广泛了解人民的需要、当代的和过去的生活方式的缺点等等的书，以及读那些训练思维能力的书；还应当包括学习某种技艺和亲自（初期阶段）全面地熟悉人民的生活。在这个时期，为了不致白白地就擒，革命者应当缄口不言，只应当仔细观察、倾听……只有在他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就绪时才应当开始动口宣传。无论隐藏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多大困难，但在初期，沉默寡言总比信口开河好。在第二阶段，革命者应当彻底放下自己的贵族架子，永远变成一个农民、一个工场工人或工厂工人，去从事宣传活动。同时，据西欧的实践证明，宣传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才能奏效。不开通的农民或工人听不懂有关社会主义、平等、团结的社会思想，甚至连他的同行的贫困和苦难，只要同他自己的遭遇不完全相同，也不能触动他的心（特别在初期）。例外的现象姑且不谈，你们用波尔塔瓦或土拉等什么省的农民关于小块份地的议论是一步也推动不了工人的。革命者只有把当地的利益提到第一位，才能指望获得成功。在西方，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鼓动员都站在当地煤矿、当地泥瓦工人联合会、当地装订工人联合会等工作人员的前列，主要（只在某种程度上用一般的理论来充实自己的宣传）追求的正是这些当地的局部的利益。由此可见，永远留在民间的革命者应当住在当地的某个地方，并参加当地的某种行业。在没有别的谋生手段时，也许他本人甚至因此会在其博爱的愿望之外增加一种个人利益的强大推动力。

“这是普遍的问题。此外，我想提两三点小意见。在同老百姓多次谈话以后使我相信，触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极端脱离实际的。凡是说没有上帝、灵魂不是不灭等等的人，对农民来说是可怕的，至少也是不受欢迎的。如果农民中有人喜欢这样的人物，那么其他人就会吓唬他是在同坏人打交道。革命者不仅应当在经济方面完全和永远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而且在其他一切文化方面，即在

衣着方面(红衬衫等等使农民感到刺眼,因为他们只是每逢节日才这样打扮)、在家庭习惯和宗教信仰方面,他也应当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例如,他应当到不仅有农村妇女、也有庄稼汉去的教堂里走走;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应当戒斋,这是连庄稼汉也到处遵守的习惯。此外,触犯沙皇是不切实际的。应当千方百计回避这个问题,要把一切苦难都归于政府和老爷们,这是全俄罗斯每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只有在谈话过程中突然出现了这种必要,即或者是替他解围(因而是间接地予以颂扬),或者是把他列入人民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涉及沙皇;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仍然是很有好处的。

这样不提沙皇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只要政府和老爷们一倒台,沙皇自己也就……他就会被……”。^①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33—235页。

^① 克鲁泡特金建议不要批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删去的地方大概可以读作这样:“把沙皇列入人民的敌人这一类”,……“沙皇自己也就会倒台。他就会被推翻。”——编者注

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①（摘录）

彼·阿·克鲁泡特金

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

我认为应该。

第一、因为我们可以理想中表达我们的希望、要求和目的，而不管实际的限制，不管我们将要实现这些希望、要求和目的的程度，而这种实现的程度将完全取决于外部原因。

第二、因为在理想中可以表现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沾染了旧的偏见和倾向。如果生活的某些方面在我们看来是如此神圣不可侵犯，以致我们在分析理想时都不敢触动它们，那么在实际消灭一切生活特征时，我们的勇气又能有多大呢？换言之，虽然理性的勇气并不是实践的勇气的保证，但理性的思想恐惧症也许是衡量实践的思想恐惧症的尺度。

至于谈到确定理想，我们当然只是指确定这种理想的四、五个大的特点。其余的就要在生活中确定不移地实现这些基本原则。因

① 这篇札记是彼·阿·克鲁泡特金为柴可夫斯基派小组写的。当时克鲁泡特金在其信念上已很接近于无政府主义，这反映在他对于未来国家问题的观点中。柴可夫斯基派在这一时期完全赞同彼·拉·拉甫罗夫的思想。因此他们拒绝把克鲁泡特金的札记作为自己的纲领。这里刊载的是札记的第一部分。——编者注

此它不是现在要讨论的对象。实现基本原则的形式不能用科学的办法来确定，这只能采取多次的实际讨论的办法，这种讨论应在临实现时和实现期间就地在村社、在劳动组合内进行，而不是在目前即事情正在萌芽时进行。

所谓理想，我们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进步不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上，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上。

毫无疑问，在色彩极其不同的各种社会主义者之间，如果就他们的理想的一般形式而言，他们的理想是颇为一致的。他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实现的社会生活是相当类似的，他们的理想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在于理想的根本差异，不如说是在于一些人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就能实现的理想上，另一些人则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前者认为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理想上。

实际上，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力求争取个人和社会的不同条件尽可能地完全平等。

他们都希望实现这样一种制度：使每一个人都有与其他人同样的机会甚至更多的机会去挣得自己的财产；使每一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利使用任何劳动所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和原料；使每一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劳动为自己挣得生活资料；使社会中有益工作的分配做到不可能形成终身从事特权劳动、尤其是世袭特权劳动的阶级，即不能使有的人只从事比较轻松、不那么艰苦和持久的、但又有权获得与其他人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福利的劳动；使每一个人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有同等的机会受到如今只有少数人才能受到的理论教育；使个人和其他人形成这样的关系：这些关系能使人们享受最大的福利，同时给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带来最小的限制。

总之，所有这些原则简单地来说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者力求

达到如下的平等：

劳动权力的平等；

劳动的平等(劳动义务的平等)；

教育方式的平等；

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平等，但要使个性有最大限度的发展余地；

无害于社会的才能的平等。

绝大多数的、几乎所有的当代社会主义者的纲领都是如此。甚至那些看来是在宣扬完全另一种理想的人，例如那些在宣扬最终的理想是国家共产主义或职位等级制度等等的人，归根到底，他们的希望是一样的；如果说他们要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少数统治者或推选出来的老人手中，从而牺牲，比方说，个人的特点，那么这绝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个人的特点，或认为个人的特点是有害的，而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有一种能使所有四种形式的平等都在同等程度上得到实现的制度，因此他们便牺牲其中一种形式来使其他几种形式得以实现。同时，这些社会主义学者的任何一个灵活的追随者都不认为任何社会形式都是一成不变而不进一步发展的。

现在我们来分别研究一下上述各种不同的平等的形式和条件，看看这些形式和条件相互联系如何，为了使每一种理想巩固下来，多么需要共同实现这些条件和形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中的每一种理想，有一些实际措施，现在看来是有益的，我们将特别加以研究。

平等的第一个条件本身就很明确，不大可能成为争论的对象。

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有可能以自己的劳动为自己挣得生活资料，不因此而受到任何人、任何个人或一伙人或劳动组合的奴役，

显然，他在制造出对社会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之前必须有可能随时得到他想用以翻地的铁锹，他想用以纺线或织布的棉花、粮食、衣服和得以住宿的房子和进行劳动的场所。显然，如果说从前生产非常简单，不需要大量积累自己前期的劳动产品，如果说任何人只要用他家中现有的劳动工具就能劳动，就能对他从大自然无偿地取得的原料进行加工，就能生产出交换价值，那么现在，为了制造生产工具和采集原料就首先必须有大量的劳动产品的积累，这一点正表明了社会的进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是任何个人或个别集团所能完成的。因此，很清楚，最好个人在着手劳动时，不要把自己变成奴隶，不要把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气和独立性让给其他个人，不管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否则这些人就可以任意决定这一部分劳动应有的数量，因此必须使劳动工具（工具、机器和工厂）、生产原料的地方（土地）、早先储存的原料、原料的储存和运输手段（交通、仓库等）、劳动时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储备、食物和房子）避免掌握在个别人手里。

所以，我们是要在我们希望实现的未来制度中否定一切私有财产，一切股份公司、劳动组合等等的财产。

先前的一些著作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除了把全部社会资本交给国家，即交给代表社会利益和管理一切有关全社会事务的强大组织以外，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国家这个强有力的组织应该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有可能获得他所需要的劳动工具等等，它有权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他们制造出来的产品。

但正因为如此，这些学说的信徒们的美梦未能在那些本应实现这些美梦的人中找到足够的拥护者。在这些学说的理想中只实现了生活的一个方面——经济方面。那些习惯于具体思考的人很明白，不管虚构出什么样的条件来使这种政府表达大多数人的想

法,不管政府的成员如何反复无常和易于变动,但是那个由个别人组成的小圈子永远都是一个与社会脱节的政权,这个政权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让社会放弃自己的权力,而社会却在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干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集团的事务,这个政府的行动范围越广,政府就越不能表达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

因此无论群众或许多思想家都早已明白,把社会生活的这种极其重要的基础转交给任何一个被推选出来的政府手里,即使不是社会的自杀行为,至少也是造成极不方便的根源。

这种认识很自然就转变为这样一种认识:先前历代人以某种方式积累起来的全部资本应当成为所有人、全社会的财产,社会本身应该成为它的全权支配者。

最准确、最直接表达这一理想的形式是:

承认全部现有资本(不论是否已经投入使用的)是发生社会变革的那个地域单位(集团、地区、国家)的全体成员的财产。

承认投入使用的全部社会资本(耕地、森林、开采的矿藏、工厂、现有的或正在建筑的铁路、住房等等)应交给那些对资本付出过劳动的人们使用(一定期限)。

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各个劳动集团所处的不利条件均等,这些措施通过这些集团相互协商的办法在各个不同的小地域单位(城市、省)内实行,但并不排除今后再分配的可能性,以便使它们的公认的必要劳动数量均等。

这种情况与现在的情况的巨大差别显然在于:现在有一小撮人占有他人的劳动,有权肆意耗费他人的劳动以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这就是说,他们是以所有人的劳动为这一小撮人所需要的生产或行为作代价。这种罪恶应当消除。

但是,人们已不止一次地说过,这种制度即我们所指的这种理想有另一个缺点。有人说,多数人的需要并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需

要，社会总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取得进步的，即某些偶然遇到了特别有利条件的少数人，比其他所有人更开化，发现并向世界宣告了新的、只有某些有学识的人才能领会的真理。根据下述原因，我们怀疑社会进步的进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永远应当如此，而且甚至在这方面唯一可能的进步进程就是如此，即使这种情况极为罕见，甚至完全是例外，那我们当然也应该想一想，我们在理想中提出的劳动评价会不会扼杀这一线进步的希望？

不过，很明白，所有这样议论的人都是从现在的情况出发的，是在现时的社会里，在现时令人窒息的作坊环境下，在耗尽力气的力所不及的劳动条件下，在为了有一个住处和一块面包而必须从事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长时间机器劳动的情况下来想象理想的劳动评价的。但是，显然，我们所说的那种劳动评价只有在社会实行了平等的第一个条件所说的那种改造后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社会里，没有相当长的空闲时间是不能想象的。如果某些经济学家也说，把社会中不劳动的那部分人的现在的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给社会全体成员，大概只能使每个成员的平均工资提高五个苏^①（八个戈比），那么这些经济学家又会提出无法实现的条件，即想出一套现在社会在保持现在的生产条件和形式的情况下无法实现的分配方法。现在当然甚至还无法确定，社会每一个成员必须劳动多少时间才能生产出使社会全体成员过相当于现在中等阶级下层所过的那种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但是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现在每一个工人平均养活除自己以外的三个人（在德国和法国），在法国差不多养活四个人，其中只有一人是工人家庭的成员，其余二人，差不多三人是他们家庭中吃闲饭的人，那么在类似的情况下，工人们在组织得很好的社会里只要养活一人，至多二人，即连同他

^① 苏是法国五生丁辅币，1947年停止流通。——编者注

本人养活二至三人，而不是四至五人；他的劳动时间可减少一半，即一天不是劳动十一小时，而是五小时半，——一星期共三十三小时，同时一点也不减少自己的福利。其次，考虑到主要由社会混乱（军队、战争、监狱、法庭和诉讼等等）引起的所有非生产性开支；再其次，考虑到有多少劳动花费在生产那些不是用在增加人民生产力的东西上，我们当然可以明白，在安排得公正的社会里能有多么多的空闲时间用来满足甚至中等的贵族老爷现在都不敢想象的那种合理的舒适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欧文是多么接近真理，他断言，对于某种合理的舒适生活来说，社会全体成员只劳动三小时就足够了。

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容许少数人的进步影响）我们认为，某些人会有充分的可能性来提出一切进步的思想，个别人可以提出这些进步思想，使之传播开来，用它来发明使人类更容易满足其需要的一切机械工具，用它来发明并完善促使人进一步发展的一切享受。这个由有机会从小就获得现在只有极少数幸运者才能获得教育的成员所构成的社会的基础教育程度，这个社会认识一切美好事物及消除现有的障碍的能力……对社会有益的美好事物和对社会有害的不良事物……的可能性^①最后，现在所有无事可做的群众拥向手工艺、科学和艺术创作领域——这些就是未来社会不仅不会小于现在的进步，而且将大于现在的进步十倍、百倍的保证。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老条件是平等的必要的和最直接的条件。但是同时我们认为达到这一部分平等理想的彻底的步骤是：

“承认只有某个集团、集团联盟的大多数人承认是社会必需的物品，才具有社会交换价值。”

以上所说的一切也使我们相信，这样安排有益的工作是可行

^① 原文脱漏。——编者注

的，在实践上是合理的，在这种安排下不存在……^①只从事特权劳动如智力劳动、管理工厂、村社等某些事务的个人。

毫无疑问，人们的这种阶级的存在是不平等的表现，是完全不应该的。疑问和异议只能在这种意义上存在：（1）这种阶级的存在对于社会本身的进一步发展是必要的，（2）许多人认为，出于劳动分工的必要性。我们在上面说过，用社会劳动来生产只对少数人有利或必需的东西，我们既不认为是公正的，也不认为是有益的。我们还说过，为了生产这些东西，利用完成了满足社会必要需求所必需的劳动以后所剩下的空闲时间就足够了，各种长短不同的空闲时间，加上基础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能把空闲时间用于一切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的职业的人数的增加，以及社会舆论力量的加强，这就是防止社会文化和文明停滞的保证。

现在我们继续说下去。我们说，在某个集团的人认为是必需的职业中有一些可能是所谓特权性的。起初，任何村社都需要有小学教员、医生、会计，过了一些时候又需要教授、学者、技师，也许还需要财政家等等。试问，这对于村社本身是否不利呢？这样一来，让小学教员在七、八个小时之内只从事对孩子们的教育工作，而每一个社会成员则要把这些时间用于公共事业，而不能用于任何其他工作，或者必须同时每天或轮流执行其他职务，例如，干粗活，为小学劈木柴（必要时还要擦洗地板，生炉子，扫校院……^②），制作教具等等，试问，这对村社本身是否有利呢？教授在需要他的村社里，在规定的七、八个小时内，是否只应该从事讲课，或同时还应该在作坊里同钳工、技师一起制作物理仪器，在大学的大楼里打扫垃圾等等呢？我们认为，是的，他应该干一些粗活。在形成只从

① 原文脱漏。——编者注

② 原文脱漏。——编者注

事干净活的贵族阶级的同时又形成从事粗活的贵族阶级，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的，因此全部问题只在于，个别人不象现在这样专业化的这种分工对社会要有利得多。达尔文搬运垃圾，在人们看来是荒唐的，这只是因为人们不能摆脱从现代社会得来的全部概念，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为了造就象达尔文那样的在智力发展中超越当时社会整整一个世纪的人，需要在许多年中选择非常有利的特殊的条件，其次，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当然，没有证明），如果达尔文和……^①在1859年没有提出自然选择的假设，则人类还将长期不知道这一假设，他们认为现在不仅没有1859年提出这一假设的社会条件，甚至没有在更早的时候提出这一假设的社会条件。最后，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个别人产生超越社会群众即使不是数千年至少也是数百年的观点是人类进步的唯一的或最有利的进程。然而，所有这些观点和概念都是极其错误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最初阶段完全有必要：

承认享有特权工种的阶级是不需要的，换言之：

承认社会全体成员有从事最好的体力劳动的义务，同时承认每一个人有选择这些工作的充分自由，只要你能证明可以胜任所选择的这种职业。平等的这两个条件的实现，并把这两个条件在现实生活中贯彻，要通过实现第四个条件来加以保证，这个条件就是教育的平等，不只是在教育方面平等的可能性，而且是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当然，我们否认社会的最有益的进步运动是通过那些受教育比社会中其他人多得多的少数人的发展来完成的，我们绝不希望用社会的经费来培养这少数人；因此我们既不需要大学，也不需要学院，因为大学和学院都是用社会经费来维持的，除非社会每一个

^① 原稿模糊不清，脱漏一个人名。——编者注

成员无例外地都能进入大学或学院。如果个别人想把自己的空闲时间用于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智力,要设立高等学校、学术团体、音乐学院等等,就让他们用自己空闲时间的产品去开设,让他们在空闲时间去上大学,社会其他成员可以把这些时间花在应办的事务或娱乐上,但社会不愿插手那些人们用自己的努力达到的平等条件,因此社会不应分给这些机构以丝毫的社会劳动。

我们不愿意教育本身竭力把人从童年起就分为被管理者和管理者,前者主要熟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粗活,而后者则主要熟悉管理的方法和所谓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因此我们不需要大学,大学造就医生,而这个行业的大多数劳动者却注定只能执行守门人、助理护士或医士的职务;大学培养律师,而大多数人却只能充当录事;大学培养教授,而有人却当守门人;大学造就阁员、学者、技师,而多数人却充当干粗活的工人。

在重温蒲鲁东的说法时,我们说:如果海军学校不是载着受过理论教育的平等的水兵的军舰本身,那它就是培养指挥水兵的军官的,而不是培养水兵的;技术学校不是工厂本身,不是学校—工场,那它就是培养专家和管理人的,而不是培养工人的,等等。我们不需要这些特权机构,我们不需要为少数人建立的大学、技术学校和海军学院;我们需要医院、工厂、化学企业、船只、生产作坊和工人学校,工人学校一旦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便将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超过现有的大学和学院的水平。学校在消除一切无益知识的无用负担、发明出快速的教学方法(快速教学法只有在迫切需要它时才会出现;美国在某种程度就是一个证明),培养出健康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既能从事进一步的智力劳动,也能从事进一步的体力劳动。

每一个年龄的学生应有多少小时进行生产劳动(不是象现在技术和实科学学校里那样在生产中游玩),多少小时进行理论学习,

应该学习到多少岁，——这得由每个村社、每个区独立地去决定，当然，这种决定不是偶然间立刻就能作出的，而是要有合理的原则作根据。

最后，我们应该扼要地谈谈义务教育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向都有不少的争论。我们认为，全部争论的根源在于反对这种义务教育的人所针对的一向都是现代国家及其全部特征。但是显然，我们所谈的并不是现时社会及其当今国家的义务教育，而是未来的社会以及将执行有益的、(或说得更准确些，可能是有益的)如今由国家执行的那些职能的机关。

因此，我们当然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里，由社会本身决定的一定限度以内的教育将是而且应该是义务的。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为了实现平等理想的这第四个方面，就必须：

“承认必须关闭一切大学、学院和其他高等学校，用社会资金普遍开设学校—工场，这种学校—工场很快就能包括现在大学的教学，当然，一定能发展到现在大学的水平，并且能超过它们。”

在政治平等的第五点上，在所有社会学派之间要达到意见一致总是很困难的，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的科学代表们甚至认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能借助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借助于能建立、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干预人们私生活一切琐事的强大政府，否则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法国和德国的著作家们特别赞同这些观点。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许多群众以及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很自然地离开了其他正确的共产主义原则。

但是，所有这一切显然是纯粹误解的结果。共产主义摆脱了非常吓人的全能政府的观念，在变相的有限形式下，以集体主义的名义迅速地在西欧传播开来。

另一方面，本世纪许多优秀的思想家力图通过写作的办法来

确定需要创造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从制度上保证个人以最大的行动和发展自由,把各种限制减少到最低程度。然而,很清楚,目前这些思想家只是想定出一些政治关系,他们未能达到任何实际的结果。但是随着问题转移到经济关系的领域,问题的解决就简单得多。

国家思想的保卫者们所拟定的最理想的形式是具有村社特点的联邦共和国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每一个地区可以独立解决尽可能多的事务,同时享有尽可能多的地区的独立性,就象一个州一样;我们可以在北美合众国看到这种形式。在欧洲,某些法律交付全体人民、所有公民表决,被认为是这种形式的必要补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瑞士的某些州和整个瑞士联邦,为了表决改变联邦法典的法律举行全民投票。最后,认为进一步改善这种形式的办法是把所有法律都交给人民表决,只给予政府以颁布法律的权力。

在这里列举这些形式的不适当,这些形式所造成的对自由的种种破坏,以及这些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多数人的意志和愿望的无能,是不适宜的,这种批评已作过多次了,只说这一点就够了,即这种批评的全部结论不是从对各种可能性的逻辑分析中得出的,而是从对现实的现象即现在正发生的现象的批评中得出的。最后,无需多说,全部这种分析得出了下列原理:

除了从经济不平等所产生的一切政府所具有的性质和特性外,所有上述的形式导致:

“区、州和联盟的中央政府不是大多数居民意志的表现;政府不断地加强,发展到夺取州、区、村社的权力;力量大的个别人可以把大权夺到手中,并破坏多数人希望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虽然是暂时的;

“这种制度建立起极其复杂的、需要长期的实践才能了解其结

构的国家机器，结果导致产生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专门从事国家管理，利用所获得的经验，开始为自己的私利而愚弄其他人；

“最后，法律和决议之间的界线甚至不能以近似的准确性来划分，因此，由于不可能每天召集全体人民来投票，便只好把一大部分权力交给区或州的中央政府。”

这一批评导致蒲鲁东的否定一切政府即主张无人负责状态（无政府状态）。

为了解决所提出的观点之间的问题，我们不想作非常广泛的讨论，只谈谈国家思想的最根本的东西。

一切政府所共有的特征是公社、区、州、国家的成员丧失了决定自己事务的部分权力，这一权力交给了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大体上可以确定组成地方政府的这些人能够决定哪些事情；还有一个同样也是根本的特征是，赋予这一批人的不只是决定某一个人的私事的权力，而且是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决定所有事情的权力，只不过规定了他们能够决定这些事情的范。围。一切政府共有的另一个特征同样也是基本的特征是，这一批人或不是由这批人选出便是由国家、州或公社中全体人民选出的为数更少的人被授予执行全体会议或民选政府的决议的权力。为此建立了重重执行机关，这些机关必须服从公社、区或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命令。为了方便，公社的执行权力机关服从区的执行权力机关，后者又服从国家的执行权力机关。一切政府的实质大体上就是如此。区别只在于，有的地方村社活动的范围大一些，而在其他的地方更多的事情交给区或中央政府；在一些地方这些权力机关全部或部分是由选举产生的，在其他地方这些权力机关则凌驾于人民之上，等等。

这种制度所产生的不当之处是尽人皆知的，因此没有详细研究的必要。但是这里更重要的不是这些不当之处是大还是小，而

是这些不当之处包藏在机关的最基本思想中，包藏在这种思想的本质中，因此，只要机关的本质继续存在，任何措施诸如限制、监督等等都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当之处，而从机关的本质中我们知道，不管哪一批人受委托解决某些往往在性质上受到限制的事情，他们总是竭力扩大这些事情的范围和他们在这些事情中的权力。这些人越是聪明，越是精力充沛，越是积极，他们企图攫取没有委托给他们的事情的愿望便越是强烈。

这些人越是精力充沛，越是积极，越是善良，社会上其他人便越是习惯于不监督他们的行为，不检查他们的活动。因此，偶然进入政府的不正派但有才能的人也就更容易唆使这批人的活动去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

众所周知，最困难的事情是把某种普遍的原则运用到事务中去。这种原则越新，在个别运用这一原则时越是没有充分认识它，便越是容易作出能完全破坏原则本身的偏差。同时，在应该为某些人解决问题的当选人中间，不得不要求他们只能按照普遍的原则，在原则上而不是在所有细节上去解决问题。总之，解决问题最需要的是各种不同的智慧气质的帮助，而人们把解决的最困难部分交给了个别人。

区、州或国家的每个中央政权应该由数量不大的人们组成，这些单位越大，当选人为多数人所熟悉的可能性便越小，因此，选出可靠的称职的人的保证也就越小。

最后，按照现在的样式建立的一切政府，在它的下属中应该有一支能执行它的决定的力量。但是很清楚，如果政府的决定每次都被大多数权利平等的公民所承认，那就根本不需要这种力量。如果个别人或集团在执行全体人的意志时有小小的个别偏差，那么这些个人或集团或被停职，或被迫补偿这种偏差所造成的损失，而不需要任何强制。一切政府在公务中之所以要有强制，只是因为

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政府越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政府在命令中使用的强制就越少（例如，合众国只有四万军队）。

所有这些议论又回到了一切中央政权的害处上来。但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个没有这种中央政权、没有政府的国家，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样的社会职能才需要这种政府？

我们不妨设想一批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和牲畜等的村社。

我们试设想，按照某个国家全体居民的共同意见，这些村社不算是占有土地的所有者，只是使用这些土地。假定在一个村社里出了一个寄生虫，他躲避工作，想不劳而获。现在他得不到钱，没有钱他就不能生活。以后他也将得不到钱，即得不到他每天干完自己一份必要劳动的工时凭证，而没有这个，他也将不能生活。

假定说，他开始抢劫，等等。现在他被押送到警察局局长那里去，等等。于是村社的自理法庭自己或通过选出的人来处置他。

总之，很清楚（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什么争论），在所有自己的内部事务中，村社也和现在一样，不建立政府自己就会而且也能够处理。

但是，假定有一个村社夺取另一个村社的土地，把自己的牲口赶到它的草场上去放牧或耕种它的耕地等等。现在由于这件事产生了要在各种政府法庭上解决的整个案子。没有这些法庭会怎么样呢？第一、任何农民村社……^①

现在我们转到我们纲领的最困难、同时又是最重要的问题上来，即在实现我们的理想方面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问题上来。

我们已经说过，按照我们的信念，实现这一理想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同时我们并不以第一次革命就能完全实现理想的希

① 原文脱漏。——编者注

望自慰：我们甚至相信，为了实现我们所描绘的平等，还需要许多年，许多局部的爆破，也许甚至需要许多总体爆破。但是我们也相信，从最初的革命起群众的要求提得越充分、越低，这些要求表达得越清楚、越现实，从第一步起妨碍社会制度实现的文化形式消灭得越多，现在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赖以维持的那些力量和关系破坏得越多，那么，往后的变革就越和平，人们关系的大改善也就一个接一个地越快。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力量用之于加速这种爆破，阐明绝大多数人模糊的不明确的希望和要求，及时利用那种能使爆破获得最好结局的形势，最后，通过爆破来实现明确表达的要求，即实现我们在前面列举的那些要求。

所以，我们应当采取我们认为能最好地达到这些目标的一切措施。

同时，如果说过去在确定我们的理想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走逻辑的道路，那么在这里我们的主要支柱将是经验的道路。谈到理想，我们可以从群众的共同要求和希望出发，引出那种能最好地满足这些要求（当然，与我国人民的观点的性质不矛盾）的社会方式来，这种社会方式要能表达全体群众经常固有的正义观念。在这里，我们已不能只满足于我们人民的共同的希望和要求；我们应当估计到大量个人的概念、思想方式、关系、行为等等，要事先预见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它们。

其次，在各民族群众的共同要求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因此西欧工人们所表达出来的要求和希望也为我国的工人所赞同。但是在革命实践的各种问题上，西欧的例子应该极为小心地加以引用，因为在每一个具体场合要衡量决定这种或那种结果的全部生活条件是极为困难的。

但是我们纲领的整个第二部分的一个总的特点也是由这些想法决定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理想现在已最后确定，如果我们认

为我们理想的基本原则已固定不变，如果只有当我们看到我们理想的某一方面在实践上已完全不可能实现时，我们才作任何个别的让步，而且我们还认为这种让步是被迫的并且是临时的，那么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实际准备措施的纲领应当不仅决定于由总的理想产生的目的性，而且决定于我们所活动的环境的全部生活条件，即一系列观察得来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认为我们纲领的这一部分是不可改变的，相反，我们准备对它作任何改变，只要生活告诉我们，某一行动方式能更直接、更好地达到所提出的目的。

然而，有几个基本论点是我们认为可能而且必须在我们的全部实际准备工作中坚持不变的。这就是反对革命组织中那些与理想直接矛盾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行动方式，这些关系和方式本来是为了实现理想而存在的。

所以，我们无条件地否定在革命组织中实行个人服从、许多人受一个人或几个人奴役，同一组织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平等，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互相欺骗和使用暴力。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认为，在我们同资本和政权的代表人物的全部关系中，所有这些手段是完全可以容许的甚至是必要的，我们正是用这些手段来进行斗争的。

为了阐明我们设想的组织的性质，我们还要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首先我们深信，如果人民没有革命的需要，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少数几个人，不管他们多么有力量和有才能，如果人民自己没有认识到他们除了起义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他们不满意的境地的时候，那就不可能发动人民的起义。因此，一切革命政党要做的事情不是发动起义，而是为未来起义的胜利作准备，即把各种不满的分子联合起来，帮助分散的个人或集团了解其他集团的要求和行动，帮助他们明确地确定不满的真正原因，撕下敌

人的任何伪装，最后，协助他们共同认清近期的实际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

因此，首先，俄国人民中是否有不满的分子，是否存在一切革命宣传和革命组织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情绪？

我们可以大胆地回答，有的。

所有我们个人的观察，所有我们了解到的情况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我们的农民和工厂工人中间存在着暗中的不满，这种不满和人民群众的不断破产同时增长着，这种不满在农民解放后最初一个时期比现在要弱得多，人民依然希望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使地主在土地、赋税和徭役方面与农民处于平等地位，本来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平等的这种希望正在逐渐破灭，某些地方对沙皇的崇拜已经动摇，早先人们经常谈论的这种崇拜极不稳固，特别是在青年农民中，很容易地让位于另外一种态度，认为沙皇在他周围的贵族中将变得无能为力的这种信念在不断地加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人民有朝一日忍无可忍时，起来无情地消灭这些贵族，而沙皇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力量的称号，农民的这种不满不只是在某一个地方表现出来，而是在所有各地程度不同地强烈地表现出来，只有那些对农民从来不抱亲近态度的人才否认这种不满，相反，所有那些不管用什么方式对农民和工厂工人抱亲近态度的人都承认这种不满，最后，就是这些人的观察导致准备冒险，这种准备冒险的情绪甚至比乐观主义者所能想象的还要强烈，最后，经常不断发生的地方骚动也会证实这一点。经济方面的关系就是如此。至于国家方面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对政府的一切改革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到处仇恨那些代表国家利益的人，而且这种仇恨随着国家苛捐杂税的增加而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分歧，贵族之中穷奢极欲生活的发展，贵族中难以想象的贪婪和腐化的巨大发展，以及随之而

来的创造力、才能和清醒思想的衰退，残忍和疯狂追逐暴利等等，等等，这一切证明，贵族不打算及时作出必要的让步，不会用让步来满足人民。

最后，欧洲军事掠夺因素的发展，常备军的疯狂扩充，欧洲大战的不可避免，证明国家力量的发展不可避免，国家力量的这种发展必将使欧洲许多国家（从最贫穷的国家起）陷于完全的破产，使人民进一步贫困。

总之，我们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一切使人确信，现在着手组织革命党是完全合乎时宜的，这个党的工作将因它能到处得到协助而易于开展。

为了评述的方便，这个党的任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活动，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同时进行的，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是传播自己的观点和扩大自己的志同道合者的人数，另一方面是和他们联合成为一个共同的组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分别来研究这两方面的活动。

首先，我们活动的方向应该对准哪里，我们应当主要在哪里传播自己的观点并寻求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是在青年学生和一般贵族中间呢还是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我们认为这个回答是我们的实践纲领中的基本原则：一定要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我们应当在这里传播自己的观点，我们应当在这里寻觅同志，他们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传播这些观点，我们应当和这些同志结成一个友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我们不想同知识界和主要是青年学生中断一切联系，但是，我们绝不认为青年在上述方面能担当不可缺少的教育者的角色，我们将只同这样一些小组或人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些人初次与我们相识时就能使我们相信或几乎完全相信他们今后会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展开活动。对于全体知识青年群众，我们只

准备做一件事：推荐图书，如果非要我们协助不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余力，还可以采办一些直接有助于阐明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目的的书籍，以事实来表明社会改革的全部必要性和把正在觉醒的人民群众团结、组织起来的必要性。

这些结论我们是通过经验，通过生活本身得出的，但是我們也可以用若干一般性的想法来证实这些结论。两者我们都将加以说明。

首先，起义必将发生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之中。只有这样，起义才能指望胜利。但是为了取得社会改革的胜利，在起义者之中有那么一帮强有力的齐心协力地行动的人并非是不必要的，这些人把各个地方联系起来，协调行动方法，明确地规定如何表达人民的要求，如何避开各种圈套，怎样巩固自己的胜利。显然，这样的党不应当站在人民之外，而应当站在人民之中，不应当只传播个别人的反对意见，而应当更清楚地更充分地表达人民的要求；总之，很清楚，这样的党不能是与农民和工人格格不入的一小群人的组织，而应该是农民和城市工人最觉悟和最坚决的力量的中心。站在人民之外的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贵族的政党，不管它如何被愿意人民幸福的希望所激励，不管它表达人民的要求表达得多么好，将必然注定要灭亡，当起义的人民用自己最初的行动揭示出贵族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深渊时，它就将与所有其他政党一起灭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十分公正的惩罚，因为这个党早先没有在人民中做到不以最高领导人，而是以平等的同志的身分出现。只有那些善于以自己的先前生活，以自己先前的全部行为方式赢得农民和工人的信任的人，才能使农民和工人听从自己的意见，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那些出身于农民阶级的活动家，那些完全献身于人民事业的人，他们是一些不是以心血来潮时表现出来的英雄行为，而是以自己全部先前的日常生活来证明自己忠于人民事业的人，另外还

有一些是在生活中抛弃了一切贵族阶级的色彩的人，这些人现在同农民和城市工人建立了以个人友谊和信任联结起来的紧密关系。最后，如果说我们已认识到有必要团结正在觉醒的人民力量，那么我们完全不明白怎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唯一可能的原则是在农民和工人中间按这样的方式生活，这种方式向周围的人直接证明，所谓的信念不是单纯的高谈阔论，而是毕生的事业。

促使我们把我们的活动转移到农民和城市工人中去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样……

……综上所述，我们对一切政党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然而，我们还要就此说几句话。

首先是我们对国际的态度。是否加入国际，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事实上加入，我们认为现在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在农民和工人中间还没有称得上强大的组织。我们之间的任何关系都不是事业上的关系，而只是个人的关系，但这样的关系未必值得去谈论它。因此，是否加入国际的问题还是以后的事。我们能说的只能是：由于我国人民的思维逻辑、认识方式和要求同西欧工人有巨大的差别，由于语言不同，最后，由于我国经济孤立，我们不认为在最后的将来我们的关系能象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变得密切和活跃起来。无可争辩的是，在最近的将来西方的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在我国人民中间将有所反响，西欧国际主义者的一切巨大胜利将为我国人民所同情和关注，并将为我们带来鼓舞；同样，也很有可能，国际的决议也会在我们这里得到讨论，不仅知识青年们，而且各工人小组都将讨论它。但是这一切还不足以构成一个政党各部分之间应有的那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未必能很快建立起来。

因此我们只限于发表声明，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在原则上我们完全同意国际的联邦主义者支部的观点，我们反对国际另一支

部的国家原则。^①

至于我们俄国在国外的各个党派，我们同国际的联邦主义者支部的俄国代表们在原则上是意见一致的，但我们决不介入我国各党派的纷争，因为这些纷争带有个人的性质，因为我们居住在这里，不可能确切地了解这些争论的性质。关于他们的定期刊物，我们应该说，其中任何一种定期刊物我们都不承认是我们党的机关刊物。

尽管我们非常尊重我们俄国侨民的某些代表和他们在国际中的活动，^②但是我们不准备同他们中的任何人在组织上结成紧密的联盟，因为我们不认为有使这种联盟成为现实联盟的任何可能性。我们打算在这里独立发展，不受国外各党派的任何领导，因为我们认为，侨民永远不可能准确地表达本国人民的需要，至多也只能最一般地表达本国人民的需要，因为这里所必需的条件就是要生活在俄国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最后，完全联合起来的必要条件是不不断的紧密的联系，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36—256页。

① 克鲁泡特金是巴枯宁的拥护者，因此他是卡·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反对者。——编者注

② 克鲁泡特金拒绝同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成员发生任何联系，虽然他并不否定他们的活动。——编者注

前进，我们的纲领！^①（摘录）

彼·拉·拉甫罗夫

在国外着手出版俄文刊物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刊物面临的一切障碍和它将引起的一切成见。俄国政府最近颁布的一些命令加强了对俄文刊物的限制，这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某种便利，我们不能不对这种帮助表示感激，但是我们的困难还是不少的。

很可能，读者会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事业，这个刊物能说些什么新鲜的和有意义的东西呢？这里再也不可能遇到不可代替的天才赫尔岑了。阐明一般问题有外国的书籍；阐明俄国问题需要密切注视俄国的生活，需要清楚地了解俄国需要什么，能为它做些什么。国外的俄文刊物在谈论西欧问题时能说出某种与各种外文刊物重复了一百次、更充分更清楚地阐明的思想有所不同的东西吗？在这份刊物上是否能象在俄国出版的杂志应该和能够做到的那样，不仅分析俄国的问题，而且了解俄国的问题呢？如果国外的刊物主要依靠的是在俄国所不存在的言论自由，那它会不会专门使用激烈的言辞、胡闹、谩骂来对待俄罗斯帝国境内人们只能用含蓄的词句提到的人和事呢？它会不会号召青年们去作新的无谓的牺牲呢？它会不会以力求达到不能实现的目的的意向去鼓动人

① 这个纲领曾发表在1873年苏黎世出版的不定期杂志《前进》第1期上。虽然拉甫罗夫号召所有俄国革命者联合起来，但是他在国家问题上的主张是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也是反对布朗基主义者的。纲领充分反映出必须通过宣传来进行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拉甫罗夫主义思想。——编者注

心呢？它会不会是一本封面漂亮而内容贫乏的东西呢？

我们以我们的纲领来回答这些担心和问题，我们不想离开我们的纲领。

确切的事实就是我们打算依据的基础。无保留的批评就是我们打算使用的工具。为了劳动的利益而同一切形式的垄断作斗争就是我们提出的社会目的。俄国生活的事实将在俄国生活的主要中心加以收集，将由有可能亲眼目睹俄国生活过程的人来加以说明。国外生活的事实只在或者涉及俄国社会的发展，或者涉及反对一切形式的垄断的斗争，即涉及我们认为是当代政论家的直接职责的斗争的程度上，才列入我们的纲领。无论国外生活的事实还是一般问题都将由对这些事实和问题进行过认真研究的人来分析。读者在新刊物中看到的将不是空话，不是对个人的攻击，而是对当代社会制度基础的批判。个人是环境的构成者；一个皇帝可能比另一个稍好一点或稍坏一点；一个大臣的行为对国家的危害可能比另一个稍大一些，不能不指出这种或那种行为方式的致命影响，但是实质上有害的不是个人，而是他们的不负责任，是使他们必然采取这种或那种行为方式的特殊地位；在另外一种社会制度下他们就可能是无害的或甚至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坚决拒绝在我们的刊物上登载对个人的谩骂，或与我们认为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无关的私人生活中的事情。如果某个人的活动是有害的，那么它只应按其危害社会的程度受到公开的谴责；如果这个有害的个人在私生活中是正直可亲的，或者是卑鄙无耻的，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对社会的害处，因而也不能改变他罪行的程度。我们评论的不是私生活，而是社会的事业；不是个人，而是社会的活动家。我们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原则，是社会制度的不公正。

对读者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了解我们力图达到的目的，不是从一般公式上，而是从这些目的与当代生活所关切的各种问题的

具体关系上去了解。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谈谈某些详情细节。

对我们来说，目前存在着两个全人类的目的，两种斗争，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参加，不管他是站在进步方面还是站在反动方面；对这两种斗争不能袖手旁观，对这两种斗争的态度决定着对所有其他次要问题的态度；一切希望参加人类发展的个人、政党、民族，都应念念不忘这两种斗争。首先，这是现实的世界观反对神学的世界观的斗争，是被明确认识了的人类需要反对一切神学的偶像、反对形而上学的偶像、理论的偶像和道德的偶像的斗争；简言之，是科学反对宗教的斗争。其次，这是劳动反对游手好闲地享受生活福利的斗争，是完全的个人平等反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垄断的斗争，是工人反对剥削他们的那个阶级的斗争，是自由联合反对必须遵循的国家制度的斗争，简言之，是争取实现最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斗争。

在这两个当代的历史任务中，第一个任务的解决已被推得很远了，因此，这一任务对俄国来说意义已经不大，在我们这里，对宗教问题感兴趣的只是那些未必读过我们刊物的人。所以，我们将只是偶尔涉及科学在它和宗教传说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或偶尔提到欧洲超自然主义者政党的微弱的挣扎，这些超自然主义者本身早已丧失了可能获胜的信心。争取实现最公正的社会制度的第二个斗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许多人还完全不认识这一斗争的意义。许多人否认在理论上正确提出这种斗争的可能性，正如他们否认这一斗争能取得良好结局的可能性一样。这一斗争刚刚进入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斗争的基础已非常现实，斗争的参加者已能明确地认清谁是他们的同志，谁是他们的敌人。一切反动势力都在为了维护古老的保守传说和新的假自由主义的合法性而反对实现最公正的制度。争取最公正的制度的斗争到处都引起流血牺牲和深重的苦难。这一斗争要求一切同情者给予最

坚决的支持。支持这一斗争无疑是我们刊物的主要目的……

……社会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美好未来的唯一可能。我们认为实现这种未来的唯一手段，就是大多数工人自由联合成同盟，就是组织这样的同盟来采取共同的强大行动，使这个组织获得胜利，并在现在的工业合法国家和等级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当前实现美好未来的可能使用的工具对俄国和欧洲来说是不同的，在欧洲，颇为重要的意见分歧使各党派为此而互相对立，而这些党派都是真诚地希望达到同一个共同目的的，对此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怀疑。在对执行纲领的方法存在不同观点的情况下，纲领本身已在原则上确定了。它在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发表过，这几次代表大会都表达了欧洲工人无产阶级的共同意愿；它在具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机关报和小册子中发表过，这些意见在许多方面是有分歧的，但在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同现行的合法工业制度作斗争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它是我们俄国活动家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提出的一切要求的基础；凡是真正想建立最好的社会制度的人都会而且应该赞同这个纲领；我们也赞同这个纲领。对于那些认为俄国农村工人应当与西欧工厂工人走不同的道路来改造俄国社会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主要强调必须为欧洲和美洲的工人阶层建立强大的中央机关、强调工人参加当前政治斗争的重要性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特别坚决保卫小集团的独立性、主张工人的政治纲领与现代所有的其他政治纲领应截然不同的人来说，这个纲领的原则都是同样重要的，所有这些观点在为了使工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获得完全的统治而要求采取共同行动(或多或少是集中的、联合的行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决心采取共同行动以反对依靠军队、警察、片面的法律和国家组织的巨大力量的共同敌人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不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些争论的问题上的个人观点如何，我

们不能决定把这一点作为我们刊物的特殊旗帜。我们的旗帜是共同的目的，而不是个人的手段。我们邀请一切希望工人在对敌斗争中获胜的人们跟我们一起来弄清楚这些争论的问题，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观点不仅坚决消除对持反对意见的人的个人攻击——为了共同的目的和共同对敌，这种攻击连想都不应该想，而且坚决消除因不同意作者的实现美好未来所应采取的手段观点而怀疑某一个党不真诚。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每个集团在自己纲领的细节上都可能有欠缺。但只有同敌人结盟才能被认为是对我们大家同现今合法工业社会进行的斗争的背叛，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对方的迷误是真诚的，正象我们觉得那是达到共同目的的真正手段一样。我们将互相弄清楚我们的分歧点，但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敌人也是共同的。我们要共同行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此。我们要记住，只有通过某种途径组织起共同的工人运动，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目前还没有共同斗争的其他方法，而这种方法是可能的，有力的，将能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单独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是不可思议的，不适宜的。力图争取美好未来的个人应该明确地认识到，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达到他的目的。

在我们看来，政治问题是服从于社会问题的，特别是服从于经济问题的。既然存在着国家，它就是与工人运动敌对的，所有的国家最后一定会解体，让位于新的社会制度，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最广泛的个人自由将不会妨碍平等的个人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团结一致和广泛合作。但这是遥远的未来，是应该经常记住的一种社会理想，但是不要以今天或明天就能实现这一理想的希望欺骗自己……

……对于俄国人来说，就我们时代的共同任务所指出的意义而言，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就是农民以及

村社土地所有制。在村社共同耕作土地和村社共同享用土地的产品这个意义上发展我们的村社，把米尔大会变成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因素，把私有财产吸收到村社的财产中去，让农民受教育，使农民懂得自己的社会需要，农民要是不能受教育，不了解自己的社会需要，就永远也不会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不管这些权利多么广泛，即使在最成功的变革的情况下，也无法摆脱少数人的剥削，——这一切就是俄国人的特殊目的，一切希望祖国进步的俄国人都应该促使这些目的实现。

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这些目的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想出来的各种道路中，哪些道路是不与这个目的抵触的呢？哪些道路具有导致无结果的空谈事业而不是真正地认真地决心献身于事业的危险？哪些道路具有以另一些也许稍好的但与俄国人民的需要格格不入的形式代替旧形式的危险？哪些道路只具有胜利的微弱可能性？指望成功地解决问题的更大可能性在哪里？

当然，即使在这里，不同的观点对这类问题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要使〈前进〉成为沟通一切色彩的俄国激进社会主义思想的机关报，因为没有其他的俄国国外机关报，任何色彩的俄国反对派都无法发表意见。但是在俄国国内形成政治思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如果对我们认为有害的或极为可疑的派别和色彩采取这样的态度，可能会被认为是冷淡主义，是在对每一个俄国人都最直接、最重要的问题上缺乏坚定的纲领，因此我们不得不只容许在我们的刊物上登载这样一些激进社会主义的意见，这些意见同答应我们参加撰稿的大多数撰稿人和通讯员的意见是最接近的。如果其他色彩的文章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并不拒绝刊载这些文章，但是我们将加上论战性的注解和一般的反对意见，这些注解和反对意见将经常提醒读者注意集合在〈前进〉周围的大多数人所赞同的在俄国能够实现向好的方面变革的方法。

我们摆在首位的原则是：俄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不只是为了达到人民幸福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人民，而是要通过人民来完成。我们认为，当代的俄国活动家应当抛弃陈旧的意见，即认为可以把少数文化较高的人所想出来的革命思想强加给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家用成功的突然一击来推翻中央政府，并由自己来取而代之，通过立法的途径建立新的制度，把这种制度恩赐给没有文化的群众。我们不要这种新的强制性的政权来接替旧政权，不管新政权的来历是什么。我们决心促其实现的俄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应该体现大多数人的需要，即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和理解的需要。在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低和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直接向他们提出我们的要求。我们向他们呼吁，向俄国少数开明的人呼吁，他们明白，未来是属于人民的，剥削制度应该终止，不管怎样，都应该终止，他们只有要么站到人民的行列中来，要么拒绝进行他们能够进行的一切进步活动。这一小部分开明的人肩负的责任，不是为了施恩于大多数人而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人民，而是要向人民讲清楚他们的真正需要，满足这些需要的最好办法，人民中蕴藏着的力量，这个力量还没有被他们认识，因此他们不能把它用于镇压敌人并为自己争得更好的境遇。希望人民幸福的人应该力争的不是靠用成功的革命取得政权并引导人民去达到只有领导人才明确的目标，而是使人民自觉地提出目标，使他们自觉地努力达到这些目标，而当社会变革的时刻来临时，自己至多只能当一名实现这些社会要求的执行者。

在进行人民运动的时候，任何地方文明阶级的处境都没有象在我们祖国这样困难，在我们祖国阶级的划分不只取决于个人财富的多少，而且还决定于文化生活的一切细节，生活环境的全部实情，一系列的日常生活习惯，这些东西最引人注目，最难于摆脱，最妨碍那些向社会提出同一个未来理想的人们彼此接近。老的贵族

阶级和官吏们的可恶传说沉重地压在俄国一切过着文明阶级生活的人的身上；这种传说使人民不相信他们的话，不相信他们的行动，必须作许多个人的努力来消除这种不信任，使人民承认那种只是在文化习惯的小事上与他们不同的人是自己人。

正是这个接近人民的困难造成了各种观点的分歧，在准备实现俄国美好未来的变革而进行的社会活动中采取哪些方式最切合实际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不管这些观点怎么样，我们认为下列各点是很重要的，是不变的：

只有严格地加强自我锻炼，才能造成在人民中进行有益活动的可能性。

只有使人民相信你个人，才能创造从事这种活动的必要条件。

只有向人民讲清楚他们的需要，使人民准备好去进行独立的自觉的活动以达到他们所明确理解的目的，才能认为自己是现时准备实现俄国美好未来的事业的真正有益的参加者。

只有当历史事件的潮流指出了变革的时刻，指出了俄国人民已对此作好准备的时候，才能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去实现这一变革……

在人民革命已成为必然、历史事件的潮流和政府的行动已引起人民革命的时候，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好准备，——这就是我们活动的最近目标，我们认为，一切希望俄国幸福的人，一切真诚地忠于我们在上面提出的人民纲领的人都必须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我们有些读者，甚至真诚的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变革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真的只有通过不能不是痛苦的流血的人民爆发才能期待俄国的美好未来吗？难道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要让出自己无限的专制权力的皇帝政府，不愿把自己的专制权力让给真正的俄国人民，而宁愿把它交给空谈立宪的、实际上总

是没有能耐的利己主义者、贪财的剥削者吗？难道俄国的统治阶层没有从欧洲的例子中领会到，议会制度是解决不了社会任务的，强加给人民的政府结构不管如何狡猾，是既不能医治经济创伤，也不能平息到处都在发生的社会仇恨的吗？难道他们不愿同以往全部辉煌的历史都不能使他们与之分开的人民融合起来，从而防止流血的社会革命吗？难道不能指望通过和平让步和自我牺牲，俄国将达到美好社会前途的目的并实现为此提出的纲领吗？

我们愿意相信这些读者的天真愿望；愿意寄希望于这种幻想的前途；但铁的历史教训证明，当局和统治阶层从来没有作出过这种忘我的功绩。如果我们看到了哪怕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企图，那么我们也会乐于宣扬和解和忘掉过去。可是现在……我们只好象对待美好的幻想一样来对待这种假设，只好向同情我们的人说些不好听的话。

或许，为了争取俄国的美好未来，革命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对革命合适的时刻什么时候到来，谁也无法预言，但是俄国的国家职能越是集中在一个地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革命的时刻就会来得越突然。为了迎接这一时刻，需要增长见识、积累生活经验、锻炼自己的坚强性格。让俄国人民作好革命的准备，向他们讲明他们的真正的需要，他们的永恒的权利，他们的艰难的义务，他们的强大的力量。最后，一旦革命的时刻到来，就同人民一起去夺取这些权利，去履行这些义务，去发展这支力量。前进，不管你们要付出多大代价，不管人民要付出多大代价。不管这个未来的代价是什么，它一定能够争取到。

我们解决俄国内部问题的纲领就是如此。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57—264页。

俄国人民的账^①(摘录)

彼·拉·拉甫罗夫

……我们要着重谈谈农民的境况，因为农民的解放是现王朝最辉煌的一页，如果专制政府能够真正关怀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福利，那么它在许多事情上都可以为此而得到谅解。为了使读者不致责难我们为了进行革命宣传而歪曲资料，我们在这里将不引用我们从俄国各地听到的道听途说，而是引用俄国国内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上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引用的是那些能严格为自己所报导的一切虚伪消息负责的刊物。我们甚至不援引本王朝最初几年的消息，那时尼古拉统治的痕迹还很鲜明，农奴制状态造成的创伤还没有愈合，那时还可以期待，政府的“有效”措施将很快把这个政府如此“关心”的人民的的生活予以提高。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几年俄国农民生活将怎么样吧，这几年政府已有充分的时间表明，它以自己的无限权力能为人民做些什么，它想为人民做些什么。

让事实，赤裸裸的事实，冷酷的事实来说话吧；让无情的数字来说话吧。但是，俄国的读者们，好好想想这些赤裸裸的事实吧！俄罗斯人民，好好想想这些无情的数字吧！

1873年2月19日的一本专门杂志写道：“俄国的死亡率在不

① 本文曾发表在《前进》杂志1873年第1期上，对于说明七十年代初俄国的经济状况和拉甫罗夫本人的革命立场是很重要的。文章作者号召进行人民革命，消灭封建君主制度、贵族地主和东正教教会。发表时未署名。——编者注

断增长，疾病在逐年加剧，流行病和牲畜的疫病交替发生……在我国，霍乱还没有消灭，伤寒几乎成了和寒热病一样的常见病；梅毒在人民中蔓延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说已变成了常见病……俄国的死亡率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早已占第一位……我们不仅有一些城市，而且有一些乡村，例如雷斯科沃，由于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居民的增加只能靠外来的居民……在我们的文明城市喀山，死亡率达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百分比：五十二比一百，这种百分比只有在阿尔及利亚和东印度才能看到，即使在那些地方……也只是在驻扎在那里的欧洲军队中。”

在今年2月的一本极为温和的杂志里，一篇评论的作者小心翼翼地写道：“总的看来，我们的农民所处的经济状况不比三十年或四十年前更好（下面的事实表明是更坏）。他们的住房普遍没有改善。绝大多数人和以前一样，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住在没有烟囱的小房子里，全家人挤在一块狭小的地方，在被烟熏得漆黑的四堵墙壁之间，全家穿着光面皮袄睡在高板床和长凳上，这里还养着小牲口和家禽。在许多地方，根本没有澡堂，人们很少洗热水浴。换内衣，甚至偶尔换一次，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经常掺有谷糠和杂草的面包，没有肉的菜汤和酸牛奶就是日常的食物。农民的牲口和家禽的数量大大减少……牲口减少得如此之多，以致使在俄国旅行的多少了解俄国农民以前情况的旅客大为吃惊。最后，农民的身体状况、健康、力气、肌肉的发达、寿命与其说增强了，不如说降低了。”作者对此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由于群众负担的赋税繁重”。1871年7月1日的同一本温和的杂志上一位严肃的作者写道：“在普斯科夫省霍尔姆县，三分之一的居民死于生活资料不足，在切尔尼哥夫省的两个县里，土地赎金和地租与土地的质量相比是如此之高，以致农民完全破产了！……在斯摩棱斯克省……人民正在饿死。”1873年2月28日萨马拉的几家报纸写

道，在两个县里——尼古拉也夫斯克县和布祖卢克县——饿殍遍地，农民们未必能活到4月。“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黑麦面粉论斤出售，很大一部分牲口倒毙。“在我们萨马拉，乞丐越来越多，找活干的人只要一块面包。”五岁以下孩子的死亡率在城市达到百分之五十九点七八，在农村达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七二，在移民地达到百分之七十八点八八。萨马拉省的平均寿命，男人是十五岁五个月，女人是十五岁二个月。——据1873年1月12日另一家报纸报道，莫斯科省1871年死的人数比1867年多二万七千六百九十二人。——1月22日卡利亚津的报纸写道，人口在减少，儿童的死亡率在逐年增高，人民的体力在不断减弱，农民过了四十岁，农妇过了三十岁，看起来就已经象老态龙钟的老人，在农村，死亡的人数开始超过出生的人数。在记者看来，这一切是由于“我国的农民所共同具有的原因……不管你怎样使劲耕作土地……一俄亩沃地也养活不了一家人，还必须租用荒地，购买木柴和种地所必需的一切，因此需要竭力寻找外快。与其说这些外快是用于维持生活，不如说这些外快有三分之二是用于缴纳赋税，最近一年赋税已增加到毫无道理的程度。”——一家专门性的学术杂志在1870年12月出的一本小册子中表明，从1861年到1869年九年之内，传染上梅毒、住在民事部门医院的病人数目从三万七千人增加到八万九千人，即增加了一倍多。我们还没有谈农村的情况，统计农村染上梅毒的人数是不可能的。

今年3月哈尔科夫省库皮扬斯克县有人写道，“两年的歉收把农民的储备都完全消耗光了，牲口大批倒毙把他们的经济破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许多农民都成了乞丐……农户破产，达到家徒四壁的地步。”今后还可能遇到新的歉收，“如果这一预言实现，那么库皮扬斯克县将呈现出一幅可怕的饥饿景象”。——据1872年12月的消息，莫斯科省兹韦尼哥罗德县的“农民们穷到难以恢复的

地步……然而今年征税特别严厉。”——在奥洛涅茨省维捷哥尔斯克县(最富)，人民拿不出三万七千一百〇二卢布用来购买足够的食物。——在乌发省缅捷林斯克县，1873年4月份居民被饥饿逼得铤而走险，抢了粮店。——从税捐审查委员会所得到的官方消息可以看出，在普斯科夫省大部分地区，农民根本无力负担加在他们身上的税捐。“据官方文件说，科斯特罗马省、下新城省和奔萨省的农民也是处于这种状况，而且不是由于歉收或其他偶然的原因，而是因为不能从土地和手工业获得足够的收入。在诺夫哥罗德省，欠缴的税款已达到无法偿还的程度。”——在萨马拉省布祖卢克县，据官方消息，今年“农民不仅什么都没有剩下，而且还有负债”，农民为了准时缴纳赋税不得不减少购买粮食的款项。那里农民生活费用的水准每天不超过十戈比。在斯塔夫罗波尔县，每人平均一年为十卢布八十七戈比，即每天三戈比。我们从中援引这些材料的那本杂志就此写道：“到我们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去看看吧，到处你都能发现同样的情况，到处你都能看到，我们的纳税阶级的生活费保持在每人每天三至十戈比之间。”但是有些地方的水平比这还低。

在普斯科夫省奥波奇卡县，据1871年的报道，每人每年用于粮食的钱是八卢布六十一戈比，即每天不到二点四戈比。“饥饿、寒冷、肮脏、烟雾、寒热病，几乎是所有奥波奇卡农民的生活伴侣。这里人们普遍食用带壳的粮食，因此在农民的思想里纯粮的概念已被排除了。”其原因还是“剥夺了农民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从土地上收获的产品的租税，土地不足”，其次是“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其他地方性的原因。——在喀山县卡尔梅舍夫乡，数字更为可观。一个成年人(十六至六十岁)必须缴纳一又四分之三的人头税，并且要养活四口人。从土地上得到的最高收入除去各种税捐外是每人九卢布二十五戈比(每天不到三戈比)，最低收入是一

年五十一戈比；平均收入是一年五卢布十四戈比，即一天一点五戈比。——这看来象神话——似乎不象俄国沙皇一解放者的关心人民的政权统治下所发生的事情。

在政府的“有效改革”和“不懈关怀”过了十八年之后，农民家里的情况是很不妙的，但是如果同铁路上没有良心的人民的剥削者打上交道，情况则更坏。这里我们有一些新的例子，足以说明万能的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的人民免受少数人的压迫，它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做到这一点。——据1872年底的消息，在洛佐沃—塞瓦斯托波尔铁路，在一个承包商那里四个月内二千二百工人死了一百六十人，其他的工人大都因病不能出工。在其他承包商那里，情况也并不比这好些，不仅站在没膝的污泥中干活的挖土工如此，木匠也如此，一个承包商下属的二十五个木匠中死了四人，先后有二十人住小医院。在小医院里病人被乱扔在地板上，没有床铺，长期得不到药物治疗，在医院里面和外面一样让风吹。据最近消息（1873年2月），这条铁路上六千名工人中死了四百人，其他的工人几乎都先后生过伤寒和寒热病。记者写道：“其原因部分是由于铁路通过的地方是沼泽地，气候潮湿，部分是由于对工人劳动的过分剥削和饮食太坏。”有一批人共八百人处在惊慌恐惧中，健康受到损害，于是他们要求结账，但是没有办到，结果未经结账就回了家。承包商一杀人犯提出了控诉，于是“好心的政府”立即出来干预：“靠行乞度日好不容易回到家乡的工人们被戴上镣铐押送回来”。结果损失很少。至于承包商经常不断欺骗、克扣、掠夺政府所关心的这些农民的情形就更不必说了。据1873年2月的报道材料，“就承包商结账时欺骗工人的情况而言，在所有铁路中兹纳缅卡—尼古拉也夫铁路最为突出”。工人们“卖掉了自己最后一件衣服，沿途乞讨”，回到斯摩棱斯克省的家里，“没有钱，没有衣服……许多工人生平第一次不得不挂上讨饭袋，同家里其他人一起去讨

饭”。

但政府也在从自己方面去促进俄国农民的破产。我们看到，在兹韦尼哥罗德县正是现在还特别严厉地向农民征税，而农民本身就已经完全破产了。据 1873 年 1 月 13 日的报道，在斯塔夫罗波尔省和库班州，“数十万”乌克兰农民到无人耕种的国家土地上去寻找栖身的地方，“到处流浪，无家可归，靠打零工勉强过活，等待着官长们的帮助”。但是“在最近五年……所有最好的国有土地都已分给了军人和民政官吏，这些人往往在得到地界证件之前就把赏赐给他们的地段卖给了买主，虽然有为数不多的无人耕种的国有土地还没有分光，本来可以在这些土地上建立新的农民定居点，但去年这些土地已被划分成地段，指定分给了个人”。这种划为“赏赐地段”的土地在库班一个州就有七万五千多俄亩，而农民却在到处流浪和挨饿。目前（1873 年 5 月）掠夺城镇土地来赏赐“将军和军官”的作法已引起了波尔塔瓦镇的直接反抗。军队包围了这个镇。该镇的代表被捕入狱。“在库班州其他一些城镇，由于同样的原因居民们正在酝酿学波尔塔瓦人的榜样。”

1870 年在维捷哥尔斯克县，有两个农民由于欠地方自治局十九卢布二十五戈比的债，他们的白垩熔炼厂被拍卖，使他们完全破了产，地方自治局得到了三千戈比的好处。——1872 年年底的情况将长期留在莫吉廖夫省人民的记忆中。这年年底以“向居民进军”加紧催索欠款而出名。警察查抄了无力偿还欠款的人的财产。农民们从 9 月份起就在变卖一切能够变卖的东西。现在该由富农们来拿走这些东西了。警察“不仅拍卖了农民经济必不可少的役畜，而且拍卖了必要的家私什物，此外，他们还进行逮捕，有时鞭打。”在奥尔沙县，新的县警察局长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然而，农民们却一文不名；劳动力的价钱男人每天十五至二十戈比，女人每天十二至十五戈比。总之，如 2 月底所

报道的，经过这次大破坏，如今在莫吉廖夫省已感觉到一切都极端缺乏。但是人民的苦难跟长官们有什么相干？沙皇—解放者的政府从莫吉廖夫省忍饥挨饿的农民的血汗中获得了一百五十万卢布。不能不祝贺这一胜利。

在以关心人民著称的权力无限的沙皇—解放者统治十八年以后，俄国农民的体力状况和经济状况就是如此。死亡率增高到可怕的程度，一代人的退化，长期的饥饿，资本家和富农的长期剥削，还不清的债务，人民不可避免的破产，凶恶的统治者野蛮地勒索最后一文钱，亚历山大二世关心人民的结果就是如此……

彼得堡的皇帝时代和莫斯科的沙皇时代一样，不管个人的命运怎样改变宝座上的皇帝，除罪恶外是什么也不会给予人民的，俄国人民不是已到了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了吗？改善人民境况的唯一方法是消灭那不好事、尽干坏事的政权，消灭那欺骗人民、而且不能不欺骗人民的所有希望的王朝，消灭那言而无信、而且不能不言而无信的王朝，俄国人民不是已经到了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了吗？

俄国人民是该同罗曼诺夫王朝清算二百六十年前就结下的那笔账的时候了。

但是俄国人民应该依靠谁呢？

难道依靠贵族吗？他们拜倒在专制的沙皇和皇帝的脚下，把一切据为己有，使农奴制每下愈况，攫取了所有官职和肥缺，把人民勒索得一文不名，并在马上抽打他们，把他们的妻子女儿拖到自己的内室，把不顺从的人发配到西伯利亚。难道能依靠这些贵族吗？他们只是在甚至专制王朝都已相信必须结束农奴无权状态时才想到必须解放农民。难道能指望贵族阶级吗？他们甚至现在还占据着一切官职，勾结着俄国人民的一切刽子手，对人民进行穷凶极恶的剥削。

不能，俄国人民不能指望最老的敌人。人民很好地记得他们的账，非常清楚这一笔账。这笔账已经结束了。

也许可以指靠东正教的僧侣吧？僧侣在俄罗斯存在的一千年中一直掌握着人民的教育，一千年以后把教育权交给了从弗拉基米尔时代起就一直是愚昧无知的世俗学校，能不能指靠这些人呢？僧侣们在俄国农奴无权状态不断强化期间，在向福音书的上帝祈祷时，从来没有为了实现基督教的博爱而决心消灭那些杀害人民的刽子手，从来没有为了维护基督教的纯洁而谴责贵族的腐化堕落，能依靠这些人吗？难道能依靠那些为比朗、阿拉克切也夫和穆拉维约夫祝福的人吗？难道能指靠那些民间故事嘲笑的对象、笃信宗教的神秘主义者厌恶的对象、一切有思想的俄国人鄙视的对象吗？

不，拜占庭东正教木乃伊式的代表们在俄国人的账上从来不是一支力量。他们是政权的寄生虫，就象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一样，当俄国人民能够穿上干净漂亮的衬衣时，他们就将被洗刷掉。

在著名的乌瓦罗夫三位一体理论^①的三个术语中，专制制度和东正教已经受到了历史的谴责，逻辑的谴责。

只剩下第三个术语——人民性。

这已不是仇恨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的那种人民性，它是权利平等的个人团结一致的整体；是生活，俄国幸福的唯一源泉；是一切希望兄弟们幸福和发展、希望为自己的祖国起人道作用的有思想的俄国人的团结一致。

这种人民性还保留着。

^① 乌瓦罗夫的三位一体理论是国民教育大臣谢·谢·乌瓦罗夫于1833年归纳出来的沙皇制度的政治原则：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人民性应理解为保卫农奴制，保卫贵族地主统治农民的权力，压迫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各族人民。——编者注

俄国人民同皇帝的官吏们、封建贵族和寄生的僧侣们的账必须清算；在俄国社会的未来制度中没有那些刽子手和食客、狼和水蛭等阶层的地位；只有同统一的俄国人民结合起来，只有同各自治村社和自由联盟的人民联合起来，未来的俄国文明人才能在道德上生存下来，一切明白这些道理的人都应该加强这种人民团结。

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性是未来俄国唯一的可靠力量。俄国人民要创造美好的未来就得依靠自己，而且只能依靠自己。

我们一定要同罗曼诺夫王朝把账算清楚。我们一定要同他们的贪婪的奴才和社会的寄生虫把账算清楚。对俄国人民来说，这笔账是沉重的。

俄国人民对自己的账是会算清楚的。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65—271页。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一书的补充（一）^①

米·亚·巴枯宁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我们所说的人民的理想，同资产阶级的学者、半学者不顾人民死活当作一种消遣而制定的、作为未来社会结构的必要条件恩赐给愚昧无知的群众的种种政治社会模式、公式和理论，是毫无共同之点的。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些理论，即使其中最优秀的部分在我们看来也无非是普罗克鲁斯提斯床^②，而要容纳浩瀚无际、广阔无边的人民生活，却是过于狭窄了。

科学，甚至最合理、最精深的科学也不可能预测未来的社会生活形式。科学所能确定的，仅仅是从对现存社会的严厉批判中逻辑地得出的否定条件。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学通过上述批判，提出了对于私人的继承权的否定，从而提出了作为未来社会制度必要条件的集体所有制的抽象的也可以说是否定的原理。同样地，社会经济学也提出了对国家和国家制度思想本身的否定，也就是

① 本文是1873年苏黎世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附录。巴枯宁的《补充（一）》和拉甫罗夫的《我们的纲领》当时在革命青年中很受欢迎，被看作是行动的纲领。——编者注

② 据古希腊神话，强盗普罗克鲁斯提斯设置了一张床，强迫过路的人躺在他的床上，比床长的就砍掉他的脚，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编者注

说，否定以任何一种荒谬的权力（如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或知识学术的权力）的名义自上而下地管理社会，从而提出了对立的、因而也是否定的原理——无政府状态，即构成村社的一切个人和单位都可以独立自主地自由组织起来，他们之间的自由联合自下而上都不是按照哪一个即便是选举出来的长官的命令行事，也不是按照哪一种学术理论的指示行事，而完全是生活本身所显示出来的各种需要自然发展的结果。

所以说，任何一位学者甚至不可能为自己确定，人民在社会革命的未来日子里将如何并且应当如何生活。这首先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现状，其次取决于它们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和越来越起强烈作用的意愿，而不是取决于领导和来自上面的解释以及在革命前夕臆想出来的任何一种理论。

我们知道，现在在俄国已经普遍形成一种所谓人民教师的趋势。他们认为，应当首先开导人民，只有当人民被开导好了，并且懂得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才能发动他们起来造反。这里立即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教导人民什么东西呢？是你们自己还不懂得又不可能懂得因而你们自己首先应当向人民请教的东西吗？

在这种趋势中，或者在这种远非新型的政党中，必须把以下两类人加以区别。

人数最多的这一类人，就是空论者、骗子手，其中大部分人还是吹牛大王。他们不拒绝现存社会给予享有特权的少数富人所享受的任何荣华富贵，同时，他们追求或维护真正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人的声望，如果不是过于不便的话，甚至还追求革命者的声望。这样的先生在俄国太多了。他们开办人民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当然也从事妇女问题的研究，他们大吹大擂自己是科学的卫士、实证主义者，而现在则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具有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肯作出任何牺牲，把个人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同时渴求在一切方面被誉为先进人物。

这类人，不论他们的人数多么众多，同他们对话是徒劳无益的。在革命前，只应当揭露他们，羞辱他们；而在革命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们是一定会自行垮台的。

另外还有一类人，即正直的、忠诚的青年人，他们近来卷入到这一趋势中去，似乎是由于他们感到在当前形势下做其他事情已别无出路而绝望的缘故。我们不能把他们描述得更贴切，以免引起警察的注意；但是他们当中只要有人读到我的这篇文章，就一定会明白。我们的话都是直接对他们讲的。

我们正要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打算教导人民什么呢？他们要向人民讲授合理的科学吗？我们知道，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了解，只要有人把科学一带到人民的学校中去，政府就会来制止他们；他们也了解，我国人民现在正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地，完全顾不得科学。为了使理论能在人民中间普及，应当改变人民的现状，首先，应当从根本上改造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从天天而且几乎是人人忍饥挨饿的苦难中摆脱出来。

正直的人们用什么办法才能改变人民的经济生活呢？他们手中没有任何权力，就是国家政权本身（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尽量加以说明）也无力改变人民的经济状况；国家政权唯一能够为人民做得到的一点就是它的废除，它的消亡，因为它的存在不符合人民的福利，而人民的福利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创造。

人民之友能够做些什么呢？就是唤醒人民参加独立的运动和行动，而首先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那种趋势的善良的卫士们正是这样说的）给人民指出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和方法。

道路和方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纯粹革命的，期望直接组织全民的暴动；而另一种是比较和平的，是用比较缓慢地却是彻底地改

变人民经济生活的办法来解放人民。如果真心诚意地采用第二种方法，自然就要排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那种关于储蓄的庸俗说教，道理很简单，因为所有干粗活的工人，特别是我国干粗活的工人是根本无钱可储蓄的。

要把我国人民推上这一条缓慢的、然而却是彻底的经济改造的道路，正直的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他们是不是在农村开办社会学讲座呢？首先，那慈父般警觉的政府是决不会允许的；其次，农民什么都不懂，还会嘲笑教授；还有最后一点，社会学本身乃是未来的科学，而目前，这门科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比已经作出肯定答案的问题多得无可比拟，更不用说我国的贫苦农夫实在没有空闲时间来研究它，对于他们能够起作用的只有通过实践，而决不是依靠理论。

这种实践的含义是什么呢？这种实践的主要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的目标，是不是以现代社会学的精神把我国广大的农民群众引上独立的经济改造的道路呢？这种实践不可能指别的什么，而是指建立工人劳动组合和合作社：信贷的、消费的和生产的，主要是生产的。它比其他组织更加直接地接近于目标，即接近于把劳动从资产阶级的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

然而，在目前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条件下，这种解放是否可能呢？科学，依据事实即依据近二十年来各国积累的一系列经验，已经断然地告诉我们：不可能。拉萨尔（我们远不是他的追随者）在他的小册子里以最光辉的和通俗易懂的论述，证明了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现代的经济学家，尽管是资产阶级的但治学严谨的并非有意揭露合作制度虚弱的现代经济学家同他的意见是一致的（虽然人们已把这种制度看成为能够防避社会革命的雷霆的避雷针）。

国际曾经多次地，在若干年内经常地提出合作社的问题，并且

根据许许多多的论据，得出了经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讨论并经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批准的以下结论。

各种类型的合作制无疑是未来生产的合理的和公平的形式。但是，为了使它达到自己的目标——解放全体劳动群众，并充分地奖励他们和满足他们的要求，必须把各种形式的土地和资本变成集体财产。在没有实现这一点以前，合作社多半会被大资本、大地产的有力竞争所挤垮，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比如某个或多或少闭关自守的生产合作社能够经受住这种竞争，这种成功的结果只能是在贫困的无产阶级群众中产生集体幸运者的新的特权阶级。因此，在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合作制是不能解放工人群众的，不过它有一种好处，就是在目前也能教导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独立地管理自己的事情。

然而，尽管承认这一好处是不容置疑的，合作运动起初迅速地推动了我们，可是最近在欧洲它的势头却大大减弱了，原因非常简单，工人群众既然认为，当前靠这种好处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他们就不认为需要依靠它来获得自己的实际的教育。只要他们对于能否达到目标已经失去信心，那么，对于为达到目标的各种办法，不管是行得通的还是行不通的，他们全不在意，因为就连做有益的体操，他们也是没有功夫的。

在西方是真实的，在东方就不可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合作运动会在俄国具有较大的规模。目前，合作制在俄国比在西方更不可能。在合作制真正成功的地方，其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是个人的首创精神、坚韧性和勇敢，但西方的个性解放比起我们俄国来要开通得多，在俄国，至今游牧运动还占着统治地位。此外，西方的外部条件，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以及受教育的程度，对于组织和发展合作社，都比俄国要有利得多，尽管如此，西方的合作运动已经衰退，那它又怎能在俄国落户呢？

有人说，俄国民族运动的游牧性有利于合作运动的发展。进步的因素表现为工作组织、生产和产品的不断完善，缺乏这些因素，反对正在进行竞争的资本的斗争（没有这种资本，斗争就已经是极不平衡了）就会根本不可能。进步因素是同屈从于墨守陈规的游牧活动不相容的。因此，合作运动在俄国只能在很小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小极小的范围内才能繁荣，而它目前对于占压倒优势的资本和占更大的压倒优势的政府来说只达到微乎其微、几乎感觉不到的程度。

有些青年人以自由派的辞藻宽慰自己，用学理主义的毫无生气的、毫无意义的空话，总之，用米尔托夫、凯德罗夫式^①学者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利己主义，这做得未免太认真，太虔诚了。而另一方面，为了不致因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羞愧，因看不到别的出路而投身于所谓的合作运动，却又过分活跃、热情有余。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倒是可以理解的。这至少为青年人提供了同劳动者接触的办法和机会，使青年人作为劳动者的一员加入他们的行列，熟悉他们，并尽可能地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把他们联合起来。这样做，总比什么事都不干要令人欣慰和有益得多。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反对合作运动的尝试，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对合作运动作进步尝试的青年人，决不应当拿他们所能够达到的成果来欺骗自己。这些成果在大城市、工厂区和工厂工人中间可能是很显著的，而在农民中间就会显得非常微不足道，就象砂粒消失在荒漠中、水滴溶和在大海里一样……

然而，认为现在在俄国除了搞合作制的措施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我们断

^① 指彼·拉·拉甫罗夫，拉甫罗夫曾用过米尔托夫、凯德罗夫的笔名。——编者注

然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在俄国人民中间，极其广泛地存在着这样两种重要的因素，我们把它看作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人民陷于极度的贫困，遭受典型的奴役。无数的苦难已经使他们忍无可忍，他们怀着深沉而热切的期望，这已经引起了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两次爆炸性事件：斯切潘·拉辛暴动和普加乔夫暴动，迄今为止，还以一系列局部的连绵不断的农民暴动形式表现出来。

那么什么是人民胜利地完成革命的障碍呢？是否缺乏能够领悟人民革命，给它以明确目标的普遍的人民理想呢？否则，正如我们上面说的，就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全体人民的起义，从而也就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不过，认为俄国人民尚未探讨出这种理想，这种说法未必是正确的。

假如这种理想尚未产生，假如这种理想至少就其主要特点来看在人民的意识中尚未形成，那么就不应当对俄国的革命寄予任何希望，因为这种理想只能来自人民生活的深处，它是人民所经受的历史上的种种考验，即期望、苦难、抗议、斗争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人民的现实要求和希望的生动的、人人都能理解的、通俗易懂的表述。

自然，如果人民本身还没有探讨出这种理想，那么，任何人也不可能赐予它。总之，应当指出，无论对谁，无论是对个人、对社会、对人民，都不能赐予它不只是萌芽状态甚至于某一发展阶段上并不存在于它自身的东西。就拿个人来说：如果一个人不存在作为活的本能和作为能够最早表现出这种本能的或多或少明确观念的思维能力，那么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你同这个人都是讲不清楚的，而主要是不可能使他明白。且看对自己的命运感到称心如意的资本家吧，你是否指望有朝一日向他讲明白无产者应当享有个人充分发展的权利，应当有平等地分享社会生活的一切欢乐、满足

和福利的权利，或者说向他证实社会革命的规律和争取解放的必要性呢？不能，如果你不是疯子，你甚至连试都不用试，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可以相信，即使这个资本家生就又善良、又智慧、又高尚、又宽宏大量、又爱好正义——你瞧，我作了那么多的让步，不过世界上这样的资本家可少有呀！——即使他很有教养甚至可以说学识渊博，也终究不能理解你，也不会成为一个社会革命家。为什么他不会成为社会革命家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生活不会在他身上产生那些符合于你的社会革命思想的本能意向。反过来说，即使这些意向在资本家身上处于萌芽状态或者甚至表现为最荒诞的观念，那么无论他的社会地位怎样使他感到快活，他的自尊心怎样得到满足，他也是不可能悠然自得的！

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比方说有个教养极差、荒诞不经的人，如果你在他身上真正发现了符合社会革命思想的本能和真诚的虽然是朦胧的意向，不论现在他的想法怎样粗野，你也不必担心，只消认真地对待他，爱护他，那你一定会发现他是多么广泛而又热情地领会你的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领会他自己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外乎是他自身的本能的一种明确的、完备的逻辑表述，所以，你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给他，你没有带给他任何新的东西，只不过是向他讲明了在你们相遇以前他自己身上早就存在着的東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任何人都不能赐予谁以任何东西。

如果说在对个人的关系上这样说是对的，那么在对整个人民的关系上这样说也是对的。只有糊涂虫或者不可救药的空论者，才会认为可以赐予人民什么东西，赐予它某种物质福利或者新的精神上的或道义上的内容，赐予它新的真理，并且随意地给它的生活指出新的方向，或者象已故的恰达也夫在三十六年前谈到俄国人民时所说的那样，可以象在一张白纸上写字一样，随便写什么都行。

迄今为止，在最伟大的天才人物中，很少有真正为人民做些什么事情的，人民的天才人物都是非常贵族化的，他们迄今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有助于剥削者少数的形成、巩固和发财致富；贫困的人民群众被人抛弃，受人欺压，他们必须付出无穷无尽的渺茫而又毫无成果的努力，穿过苦难深重的道路，才能走向自由和光明。最伟大的天才人物没有也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崭新的内容，他们本身也是由社会产生的，他们无非是把许多世纪以来的工作加以继承和发展，为社会生活运动本身所不断地更新和扩大的那种内容带来了一些新的形式。

可是我还要再重述一遍，最享有盛名的天才人物，迄今为止对于人民即对于千百万做粗活的无产阶级什么也没有做或者做得很少。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发展、人民的进步只属于人民自身。这种进步的实现，自然不是通过书本教育，而是通过经验和思想的自然积累，代代相传下来，其内容必然日益广泛、深化、完善，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自然，这种自然积累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经过数不尽的严酷而痛苦的历史考验，最后才使当代的，可以说是各个国家至少是所有欧洲国家的人民群众觉悟到，对于享有特权的阶级和现时的国家，对于一切政治变革都不能指望什么，他们只有自身努力奋斗，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得到解放。这一点确定了人民群众身上现存的和正在发生作用的普遍理想。

在俄国人民的观念中是否存在着这种理想呢？毫无疑问，是存在着的，而为了确定这种理想的主要特征，甚至不必过远地回溯我国人民思想的历史发展。

第一个主要特征，这就是全民的信念，即：土地，全部土地属于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它、以自己的劳动使它富饶的人民。而第二个主要特征就是，土地的使用权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村社，即把土地暂时分配给个人的米尔；第三个特征同上述前两个特征是同

样重要的，这就是准绝对的自治，村社的自治和由此而引起的村社对国家的强烈敌对关系。

· 这三个主要特征构成了俄国人民理想的基础。这些特征就其本质来说，完全符合当前拉丁语各国无产阶级的理想，这些国家较之日耳曼语各国更加接近于社会革命。但是，俄国人民的理想已被另外三个特征蒙上了阴影，这三个特征歪曲了这一理想的性质，使它的实现遭到了极大困难，拖延了时日，因此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为反对这些特征而斗争，而进行这场斗争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它已存在于人民之中。

这三个暗淡无光的特征是：(1)宗法制；(2)个人完全听从米尔的安排；(3)对沙皇的信仰。

还可以作为第四个特征补充一点，即基督教、东正教国教或其他宗教信仰。不过我们认为，在我们俄国这个问题远不象在西欧的不仅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甚至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显得那么重要。自然，社会革命家们对这一问题并不忽视，他们利用一切场合，以便当众向万军之主^①及其在人间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法律的、警察的和资产阶级经济的代表人物讲明杀人的真理。可是他们并不把宗教问题放在首位，他们确信，伴随着愚昧而自然产生的人民的宗教信仰，其根源不在于这种愚昧，而在于他们的贫困，在于他们天天遭受的物质上的苦难和闻所未闻的种种压迫；宗教观念和寓言，这种荒诞不经的倾向，并非是理论上的现象，而是实践上的现象，与其说是理智上的迷惑，不如说是生活本身、意志和热情对于不堪忍受的生活苦难的反抗；教堂对于人民起着一种天国里的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某种天堂一样，因为不论是在教堂或者酒馆里，人民可以把自己所受的饥饿、压迫和屈

① 古代犹太教中上帝耶和华的称呼之一。——编者注

辱忘却片刻，他们可以有时在狂热的信仰中，有时在烧酒中竭力安慰对自己日常苦难的记忆。一次比一次更加陶醉。

社会革命家们都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相信，人民的宗教信仰，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破除，而绝不是那些所谓的自由思想家们的抽象的、学究式的说教所能破除的。这些自由思想家先生们从头到脚都是资产者，他们在方法上、习惯上、生活上而且即使当他们自称是实证论者或者把自己描绘成唯物论者的时候，他们都是不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他们以为，生活来源于思想，似乎是某种预先存在的思想的实现，由此他们断定，思想，自然是他们的贫乏的思想，应当来支配生活。相反地，他们并不理解，思想来源于生活，为了改变思想，首先应当变革生活。只要把广阔的人类生活给予人民，他们思想的深刻合理性就会使你感到惊讶。

那些自命为自由思想家的空论成癖的人们，还有另外一种理由，在做实际事情以前先要进行反宗教的理论宣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蹩脚的革命家，而且简直就是徒务虚名的利己主义者和胆小鬼。加之，就其地位来说，他们都属于有教养的阶级，都非常珍视安逸舒适、温文尔雅以及充斥着这些阶级的生活中的精神上的虚荣的乐趣。他们知道，人民革命就其本质和目标来说是粗野的，不可能是温良的，不会不去摧毁他们美好地生活在其中的资产阶级世界，因此他们决不愿由于忠诚地为革命事业服务而招来极大的不便，同样，对于自由主义倾向较小的和不大勇敢的、然而毕竟是很值得珍视的庇护者、崇拜者以及在教育方面、日常交往方面和在清高雅致、物质享受上情趣相投的朋友和同志，也不愿去惹起他们对自己的愤懑。他们简直是不愿意和害怕这种革命，因为这种革命将使他们声望扫地，使他们骤然间失去眼前地位的一切好处。

可是，他们是不愿承认这一点的，他们一定需要以自己的激进

主义使资产阶级世界感到震惊，并且吸引革命青年，如有可能也吸引人民跟着他们走。那该怎么办呢？应当使资产阶级世界感到震惊，但不应当把它激怒；应当吸引革命青年，而同时又要避免落入革命的困境。为此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们假革命的愤怒全都集中来反对上帝。他们相信，上帝并不存在，所以也就不怕上帝发火。长官，从沙皇到最下级的警察在内的一切长官，则是另一回事！从银行家、犹太包税者直到小小的富农商人和地主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的愤怒是表达得非常精巧的。

由于持有上述见解，他们向上帝无情地宣战，以最激进的方式否定各种表现和各种形态的宗教，声嘶力竭地攻击神学、形而上学是无稽之谈，自然，他们还以装在自己衣袋里的和用自己冗长的作品加以评注的科学的的名义来攻击人民的各种信仰，与此同时，又以特别的柔情蜜意对待当今世界的一切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假如他们迫于逻辑或舆论的压力而容许自己否定上述各种力量，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又总是那么彬彬有礼，那么温文尔雅，只有脾气极端粗暴的人才会对他们发火，他们必然给自己留下后路，并指望得到纠正。这种指望和相信上述力量的本事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认为，我们的执政的“上议院”迟早会成为人民解放的机关（参见不定期杂志《前进》最近的即第三个纲领，该杂志近期内将在苏黎世出版）。

现在且不谈这些江湖骗子，来谈谈我们自己的问题吧！

无论任何时候，以任何借口，为着任何一种目的，都不应该欺骗人民。欺骗人民不仅是犯罪行为，而且对于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也是有害的。说它有害是因为，任何一种欺骗就其实质来说都是目光短浅的、渺小的、狭隘的，它隐瞒不了真象，必然要露出马脚，并且终久要被揭穿，因此，对于革命青年它是一种最虚伪的、不由自主的、任意妄为的反人民的倾向。一个人只有当他以整个身

心坚持自己的真理，并且依照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来指导自己言行的时候，他才是强有力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他应该如何要求自己的言行。他可能遭到牺牲，但他决不会玷污自己，并使自己的事业蒙受耻辱。如果我们企求用说谎的办法解放人民，那么我们势必陷入迷途，背弃自己的目标，如果说我们能对人民起到一点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就把人民引上歧途，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行动就会有损于反动派。

因此，由于我们是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是一切宗教信仰的敌人，是唯物论者，因此每当我们同人民谈论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向人民充分地讲清楚我们是无宗教信仰的，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对宗教是采取敌视态度的。对于人民在这方面提出的一切问题，我们都应该诚实地给予回答，如果需要，即能预期达到一定成果的时候，应当力求解释明白，并证实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不过我们不当自己去寻找作这类谈话的机会。我们不当在人民中间把宗教问题提到我们宣传的首位。我们深信，这样做等于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叛。

人民，不是空论者，也不是哲学家。他们既没有闲暇也没有习惯同时研究许多问题。当他们迷恋于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忘记其他一切事情。因此，我们的直接责任是把主要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也就是把与人的解放事业维系最甚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然而，这个问题是人民的现状本身，人民的整个生活本身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经济—政治的，从社会革命的意义说是经济的，而从摧毁国家的意义上说则是政治的。去研究人民的宗教问题，就等于诱使人民离开真正的事业，就等于背叛人民的事业。

人民事业唯一的一点，在于实现人民的理想，这种理想有可能在人民当中自行纠正，而具有更好的、更直接和更迅速地通向目标的方向。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三点使俄国人民的理想蒙上阴影的

不幸特征。现在我们要指出，后两点，即个人完全听从米尔的安排和对沙皇的神化，作为自然的结果，都是来源于第一个特征，即来源于宗法制度，因此宗法制度是一种主要的历史的祸害，然而不幸得很，也完全是人民的祸害，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反对它。

这种祸害糟蹋了俄国的全部生活，使它具有迟钝呆滞、卑污不堪、极端虚伪、假仁假义、奴颜婢膝的特点，令人不堪容忍。夫权制、父权制、长子权的专制主义，把从法律—经济原则上说已经不道德的家庭，搞成了冠冕堂皇的暴力、胡作非为、卑鄙下流、贪淫好色的学校。“一口变成白色的棺材”，这就是对俄国的家庭所下的最确切的定义。一个善良的有家室的俄国人，如果他是个真正善良而又优柔寡断的人，那他简直就是一头好心肠的、天真无邪的、唯命是从的猪，那他就是一个不明事理、无所企求、做起事来漫不经心并且仿佛故意同时又行善又作恶的人。他的行为往往很少受到一定目标的约束，而是看形势、凭兴致，主要是看周围的环境。他已经习惯于在家庭中俯首听命，因而在社会上也就照样望风行事，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他生来就是充当奴隶，但决不是去当暴君。就这方面说，他尚缺乏气魄。因此，他自己不会去折磨人，但他必然去支持长官所要折磨的那些有罪的或无辜的不幸的人。在他看来，长官表现为三重神圣的形象：父亲、米尔和沙皇。

如果他是个脾气倔强、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人，那么他同时既是奴隶又是暴君；对于地位比他低下的人，他就是胡作非为的暴君，他就作威作福。而米尔和沙皇，则是他的老爷。如果他是一家之长，那他就是家里主宰一切的暴君，而他却又是米尔的仆人、沙皇的奴隶。

村社，这就是他的米尔。村社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他的家庭、家族的自然扩大，因此，在那里就象在家里一样，居统治地位的

同样是宗法制的原则、可憎的专制主义、可卑的俯首听命，因此，也同样存在着根本性的非正义，对任何个人权利的一概否定。米尔的决定，不论是什么样的决定，就是法律。俄国的农夫惊讶地叹息说：“谁敢反对米尔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身居米尔之外的或者更确切些说居于米尔之上的沙皇以及一切官吏和贵族以外，在俄国人民中间就有敢于反对米尔的人，他就是盗贼。这就是为什么盗窃抢劫在俄国构成了重要的历史现象，俄国最早的暴动者、最早的革命家普加乔夫和斯切潘·拉辛就是盗贼。

在米尔里，只有长老和族长才有发言权。未婚的或已婚而未分家的青年，必须遵守规矩，服从命令。而居于村社和所有村社之上的是沙皇，他是众人的长老、族长，全俄的国父。因此，他的权力是无限的。

每个村社都是闭关自守的整体，因此构成了俄国主要不幸中的不幸，任何一个村社既没有需要甚至也没有感到需要同别的村社建立任何独立的、有机的联系。村社与村社之间的联系，只通过皇帝，通过他的最高的国家权力。

我们说，这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很明显，这种分散状态削弱了人民的力量，并且使通常都是局部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暴动不可避免地注定要遭到失败，从而巩固专制政权的胜利。所以，革命青年的主要职责之一，应当是通过一切可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在分散的村社之间建立积极的暴动的联系。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不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历史向我们表明，在黑暗的岁月里，例如在伪季米特里内讧期间，在斯切潘·拉辛和普加乔夫领导革命的时期，以及诺夫哥罗德城暴动、尼古拉大帝登基初期，有许多村社曾渴望通过自身的运动建立起这种解救的联系。

村社的数目多得不可胜数，它们共同的沙皇慈父高高在上，仅仅低于上帝之下，这是为了便于他亲自主宰天下人。既然上帝为

了统治世界而需要设立无数的天国之官和神的职称，诸如六翼天使、司智天使、天使长、六翼小天使、双翼小天使，那么沙皇缺少各种官吏的辅佐更是不行的。他需要一整套军事、民政、司法、警察的行政机构。这样，在沙皇与人民之间、沙皇与村社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军事的、警察的、官僚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严格集权的国家。

因此，一个想象中的沙皇是人民的慈父，人民的崇拜者，人民的造福者，他高而又高地、几乎伫立在天国之上，而真正的沙皇却是鞭子沙皇、窃贼沙皇，沙皇就是国家的危害者，占居着国家的位置。由此可见，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我们的人民把想象中的、实际上不存在的沙皇加以神化，同时又敌视现实的、体现在国家之中的沙皇。

我们的人民对国家是深恶痛绝的，对于它的代表，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都是敌视的。不久前，他们的仇恨还是分别对准贵族和官吏，有时候似乎对前者的痛恨更甚于对后者，虽然实际上他们对两者的痛恨程度都一样。但自废除农奴制以来，贵族已经明显地破产了、衰落了，变为原先形态的特权公职阶层，人民也就象对一切官吏阶层那样憎恨它。未必需要证明，对贵族的这种憎恨是多么理所当然！

国家彻底地摧毁了原先由于宗法制的原则而已经解体的俄国村社。在国家的压迫之下，村社本身的选举已经成为一种骗局，而人民临时选举出来的人员：村社社长、村长、甲长、乡长，一方面变成了政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变成了富农的被收买的奴仆。在这种条件下，剩下的最后一点点正义、真理、纯朴的仁爱，必然从村社中消失。村社则由于国家名目繁多的赋税而破产，由于大小官吏的胡作非为而被彻底压垮。抢劫对于个别人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唯一的出路，而对于全体人民来说则成为总暴动、

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智慧的无产阶级，俄国正直的、忠诚的、忠实于社会革命的青年能够做些什么呢？他们应当毫不迟疑地到民间去，因为现在无论在哪里，尤其是在俄罗斯，在人民之外，在千千万万的工人群众之外，既没有活力，也没有事业，也没有未来。那么怎样到民间去，又去干什么呢？

当前，在我们这里，在涅恰也夫的事业不幸失败以后，这方面的意见看来是有很大分歧的。不过，从总的混乱的思想中，可以区分出两种主要的相互对立的思潮。一种思潮是较为温和的，具有作准备的性质；另一种思潮是主张搞暴动，渴望直接组织人民的武装。

第一种思潮的捍卫者们不相信有进行这种革命的实际可能性。但因为他们不愿而且也不可能对人民的苦难泰然地袖手旁观，于是他们决定到民间去，兄弟般地同人民一起分担苦难，同时去开导人民，不但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以自己的生动榜样，去开导人民并进行准备工作。他们到工厂工人中去，平等地同他们在一起做工，努力在他们中间传播团结交往的精神……

另外一些人则竭力想建立农村移民区，在移民区，除了已为我们的农民所熟知的土地共同使用以外，他们还宣传并实行尚不为农民所熟悉的、然而在经济上十分必要的原则，即集体耕种土地和根据最严格的、不是法律的而是人道的正义平等地分配产品或产品价值的原则，也就是说要求能力强、身体好的人多干活，而能力差和身体弱的人少干活，报酬则不是按工作量进行分配，而是按每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

他们相信，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示范吸引农民，而主要是通过组织集体劳动所能获得的各种好处吸引农民。卡贝曾经抱着同样的信念，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带着他的伊加利亚人到美国去了。

他在那里建立了“新的伊加利亚”^①，但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应当指出，美国的土壤毕竟比俄国的土壤更有利于这种试验的成功。在美国，居统治地位的是最充分的自由，而在我们这个幸福之邦的俄罗斯，居统治地位的则是沙皇。

然而，我们的准备派和温和的开导派并不把希望局限在这一方面。他们渴望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基础上来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反对成为我们俄国奴役制基础的可恶的宗法制。这意味着，他们想要清除我们社会的主要祸害，从而直接地修正人民的理想，并在人民中间传播关于正义、自由、争取解放的手段的真实概念。

上述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非常善良和崇高的，但是未必能行得通。即使哪个地方获得了成功，那也是沧海一粟，这一粟，对于教育、发动和解放我们的人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许多经费、很多生气勃勃的力量，而取得的成果则是微不足道的。

那些给自己描绘了这种蓝图并真诚期望付诸实现的人，他们这么做，毫无疑问，是闭眼不看我们俄国现实中的一切丑恶东西。可以预言，他们一开始这么做就会大失所望，因为除了很少甚至极少的偶然机会以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将会迈不开步伐前进，他们会动弹不得。

如果他们看不到任何前景，就让他们去试试吧，但是也应让他们知道，这样做对于解放和拯救我国贫穷的受苦人——人民是不够的，而且太不够了。

另一条道路就是战斗的暴动的道路。我们相信，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指望得救。

我国人民显然需要帮助。人民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简直到

^① 卡贝是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写《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是当时极受欢迎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编者注

了任何乡村都不用去发动的程度。虽然任何一次暴动，不论成功与否，总是有益处的，但单是局部爆发的怒潮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把所有农村都发动起来。斯切潘·拉辛和普加乔夫指导下的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已经向我们证实，这是可能的。这些运动向我们表明，在我国人民的意识中蕴藏着真正的理想，人民渴望实现这种理想，而从人民运动的失败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一理想中存在着过去和现在都妨碍我们取得成功的根本性缺点。

我们指出了这些缺点，说明了我们的信念，我国革命青年的直接责任就在于反对这些缺点，尽一切努力克服人民意识中的这些缺点，而为了证明这种斗争是可能的，我们已经表明，人民早已开始进行这种斗争了。

如今，反对宗法制的斗争几乎遍及各村各族，而村社、米尔已经完全变成了仇恨人民的国家政权和官吏专横的工具，以至于反对后两者的暴动同时也就成为反对村社的、米尔的专制制度的暴动。

对沙皇的神化仍然保留着，我们认为，这是极其令人厌恶的。最近十年或十二年来，由于仁慈的亚历山大皇帝实行了英明的、爱民的政策，这种神化在人民的意识中已经减弱了。贵族—地主—农奴主已不复存在，而他们曾是把人民仇恨的雷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的避雷针。如今还有贵族或者商人—土地所有者、大富农，而主要是还有官吏，这是沙皇的天使或天使长。但是，官吏是执行沙皇的意志的。不论我国的农夫由于对沙皇历来无限虔信而受到折磨，但他们毕竟已经开始幡然醒悟。怎么能不醒悟呢！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从俄国的各个角落派遣自己的请愿代表向沙皇请愿，而所有人从沙皇口中听到的只是一个回答：“你们没有别的自由！”

不！不管你们怎样认为，俄国的农夫虽然愚昧无知，但并非糊

涂虫。只有天下最大的糊涂虫，才会在经历那么多令人痛心的事实和遭受那么多苦难之后，还不懂得再也没有比沙皇更加凶狠的敌人了。应当运用一切可行的办法和通过人民日常生活中充满着悲惨遭遇，向农夫们讲明白，使他们感觉到这一点。要向他们指明，一切官吏、地主、神父、富农的猖獗、抢劫、掠夺，其源盖出于沙皇的政权，都以它为靠山，都由于它才能得逞。总而言之，应当向俄国的农夫们表明，他们那么疾恶如仇的国家就是沙皇本身，无非就是沙皇。这就是革命宣传的直接的和当前的主要责任。

但这样做是不够的。使俄国的普遍人民起义处于瘫痪状态、迄今发动不起来的主要不足之处，就是村社的闭关自守状态，农民地方米的闭塞和分散状态。无论如何应当打破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在这些米尔之间进行革命思想、意志和事业的实际交流。应当使各村各乡，有可能的话使各省的优秀农民同俄国农民米尔中的先进分子、天赋的革命家之间建立联系，凡有可能的地方在工厂工人和农民之间也建立起这种切实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私人性质的联系。当然，要使每个村、每个乡的优秀或先进的农民了解所有其他村、乡、省的同样优秀的或先进的农民，是应当格外谨慎从事的。

首先应当使农民中的这些先进人物信服，并且通过他们即使不能使全体人民信服，至少也要使人民当中相当多数的最积极的那部分人信服，对于全体人民，对于整个俄国所有的村、乡和省以至于俄国以外，存在着共同的苦难，因此也就有着共同的事业。应当使他们信服，人民有着不可摧毁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能征服的。而如果说这种力量至今还不能解放人民，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只有当它汇拢起来并且同时在全国各地实行一致行动的时候，才能强大起来，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力量并没有汇拢到一起。为了把这种力量汇拢起来，便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计划

和一个共同的全民解放的宗旨，把各个村、乡、省都联系起来，组织起来。为了要在我国人民当中培育一种真正团结一致的情操和意识，便需要创办一种人民的报纸，无论是铅印的、石印的、手抄的、口头的报纸都行，有了这样的报纸，就能把此起彼伏的一切局部性的人民暴动、农民暴动和工人暴动，以及西欧无产阶级掀起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迅速传遍到俄国的四面八方，传遍到省、乡、村的各个角落；要使我国的农民和工厂工人不致于感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相反要使他们了解到，在他们的身后，有个处于同样压迫下而且为此怀着同样的意志和热情向往解放的天地广阔和人数众多的世界，正在酝酿着粗工群众的一场总暴动。

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革命宣传的任务，这就是革命宣传的唯一事业。这一事业应当以什么方式由我国的青年来完成，是不便于通过印刷品加以阐述的。

我们只讲一点：俄国人民只有当我国的知识青年同他们共同生活、同甘共苦、担负起共同的事业并在殊死的暴动中携手并进的时候，才会承认这样的青年是自己的青年。应当使青年们在今后规模大大小小的人民骚乱和暴动中，不是充当旁观者，而是成为干练有为的、随时随地勇于承受牺牲的先进分子。应当使青年们严格按照经过深思熟虑的既定计划行事，并在这方面以严格的纪律约束自己的行动，以便造成一种同心同德的局面，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国的知识青年要自己教育自己，同时教育人民不仅要进行殊死的反抗，而且要进行英勇的进击。

最后我们还要补充一句：我们称之为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和现在在我们这里可以说简直处于绝望的、不可实现的社会革命现状中的这个阶级，如果它不愿因碌碌无为地死去而感到羞愧，那么它应当加强社会革命事业的意识与热情，应当肩负起人民革命的准备者即组织者的重任。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别的出路。当然，他

们可以因自己所受的教育而在人民的抢劫者、剥削者、压迫者这个拥挤不堪和不欢迎人的行列里找到一个较为称心如意的差事。不过，首先是，那样的肥缺已经越来越少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捞到它。大部分人则只会留下变节的耻辱，只会在贫困中潦倒，在卑鄙无耻中死去。我们仅向那些不愿和不会丧失气节的人呼吁。

他们应当永远同俄国人民的剥削者、害人虫、敌人的那个世界断绝一切联系，同时，把自己看作是仅仅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宝贵资本，看作是必须用于人民的宣传、逐渐唤醒和组织全民起义的资本。

译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文集》1964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38—55页。

农民改革^①(摘录)

格·扎·叶利谢也夫

农民改革的经济基础及由此 产生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农民土地过分分散不仅可以看作是民族衰落的原因，而且首先可以看作是民族衰落的征兆。农民阶层是全民族的根本；上层阶级象树枝、树叶、花朵一样，可能从下面根子上死亡和复活。但是，如果根子腐烂了，那么整棵树就完了，就只能付之一炬。”

罗雪尔^②

我们认为，凡是认真考虑过我国内部发展历史的人都不会怀疑，直至农民改革为止的这部历史与欧洲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很少有相似之处。从留利克起至现今的王朝为止，我国内部发展的道路始终是自己的、与欧洲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的国家是在与欧洲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条件和形式下形成的。最初在我们的生活中确立的文明原则与欧洲的文明原则是迥然不同的，即使最初起源相同，但到了我们这里，也就具有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性质，

① 这篇文章曾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 1874 年第 1 期上。该文描述了自由民粹派对 1861 年改革的不满。刊载时作了删节。——编者注

② 引自威·罗雪尔《关于国民经济的科学》1869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第 144 节第 492 页。——编者注

例如基督教就是如此。最后，我们既没有继承原先受古代欧洲文化熏陶的居民的地域，也没有继承这些居民本身，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我们只与发展水平一般比我们低得多的游牧民族或亚洲人有过关系，我们只征服并占领过他们的土地，我们的血液只与他们的血液混合在一起。所以，在我们发展的胚胎和天性中与欧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没有那种使我们向往欧洲的东西。我们的确同欧洲从来不曾有过紧密的关系。相反，我们的历史越往后发展，我们离欧洲便越远，更确切地说，同它越疏远。由于这种疏远，长期以来我们没有采用过欧洲的文化成果，也没有利用过欧洲的智力成果，一次也没有参加大大促进欧洲社会发展的历次伟大的运动，如十字军远征、宗教改革运动等等。

在我们自己的内部发展中，从十三世纪起历史进程采取了与欧洲完全相反的方向。在欧洲，随着中世纪的到来，日耳曼人带到欧洲生活中去的个人因素成为历史运动的基础，变成欧洲发展的主要领导力量。在我们的历史中，个人的因素从来没有登上过舞台。我们国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氏族对个人的压迫，同时还存在更沉重的国家对个人的压迫。自蒙古人入侵后，莫斯科公国的大公们就实行专政，以便与蒙古人进行斗争。越往后，这种专政就变得越无限制。它践踏一切：个人和社会的历史权利，人民和文化的发展，个人因素的一切自由行为和反抗。个人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国家的因素完全吞灭了个人的因素。后来，国家财政紊乱引起的农奴村社的压迫又与这种国家的压迫结合起来，随着国家需要的增加，农奴村社中的个体越来越巩固，最后，完全变成私有制。所以我国农奴制一开始就和欧洲截然不同。在欧洲，农奴制是消灭国家政权后产生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是对个人实行强制的产物；在我国则从来不曾有过无政府状态，国家政权向来是稳固和强有力的，农奴制是国家政权本身的一种体制。在欧洲，农奴制是篡夺

最高权力来维持的，土地所有者夺得了最高权力，历史肯定了他们的最高权力，以后出现的最高当局又为争夺最高权力而与之进行斗争，在我国，土地所有者从未拥有过主权，农奴制是赏赐给他们的权利，但只保持在最高当局许可的范围内，只要最高当局还需要它，就一直保持下去。

由于我们的农奴制与欧洲的农奴制在起源和性质上有着这些差异，我国农奴制问题的解决与后者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很清楚的。虽然我国和欧洲几乎是同时解决农奴制问题的，甚至我国的解决是后者引起的，但实质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动。在欧洲，农奴制的消灭是个人自由发展的结果，因为个人要求适合它自由发展的新的社会形式，同时，农奴制的消灭是世代历史过程演变的结果，因为历史过程摄取了旧的封建制度的内容后，创造出与这种制度不相容的新的因素和生活条件，以致旧制度的继续存在成为不可能，而我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农奴制是最高当局为了财政的目的建立起来的，也是为最高当局因农民贫困化造成的财政困难所消灭的，因而称之为改善农民生活。在欧洲，在消灭农奴制的同时开始建立以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新国家；我国在农奴制消灭以后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情况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们消灭了农奴制，说实在的，只不过做了与消灭专卖一样的事情，即纠正了以往历届政府在我们生活中建立了一些毫无理由建立的制度的错误；消灭专卖在我国没有引起任何变化，同样，消灭农奴制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变化。农奴制消灭后我们还是处于农奴制消灭前的状况。特权阶级的政治权利依然如故，至于普通人民，他们解放后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丧失多少这些权利，但是实际上由于自己的无知，很少能享受这些权利；此外，由于照顾这种无知，在直接的行政管理中他们被置于出身贵族的专门官吏的监护下，这些官吏对他们的一切事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他们在直接的

行政管理中甚至没有恢复农奴制建立前即伊凡雷帝统治时享有的那种独立。同样他们也未能恢复他们在伊凡雷帝时所有过的个人自由，因为他们虽然摆脱了农奴制，即摆脱了地主的一切直接权力，但仍然因拥有自己的份地而被固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离开作为份地分给他们的土地，直至不再缴纳应付的赎金为止，缴纳赎金将继续近五十年。缴纳赎金本身当然并不是我们的赎买的特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从农奴制解放出来的农民也曾经这样必须缴纳多年的赎金。但是区别在于：那里土地作价低于土地的实际价值，因此获得份地的人一点也不受自己份地的束缚；如果他认为保持份地于己无利，他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其他人和土地所有者本人会欣然接受他那应缴纳赎金的土地。在一个自由土地不足的国家内以低于通常价格的价格供给农民土地不仅不会成为农民的负担，而且是真正的恩赐。在我国则相反，作为份地给予农民的土地作价常常比土地的实际价值高两倍到三倍，甚至现在，即农民条例颁布了十二年以后仍然如此。每年为份地支付的赎金占清偿这一虚构价格的总数的百分之六，在大部分地区这种赎金比自由土地的现有租价高得多。在这些地区，由于我们有许多自由的土地，自然，永远也不会有人愿意每年付出高额赎金去买下或使用农民的份地。在其他土地肥沃的地区，土地的赎买价格，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比现在土地的价值低得多，同村的农民或无地的农民中当然会有许多人愿意购买那些希望放弃自己份地的人的土地；在这些地区地主们也很乐意买进这些土地。但是在这些地区农民从小就习惯于只靠耕作土地为生，他们舍不得抛弃农业，因而不管怎样也舍不得离开分给他们的份地，除非迁移到别的更好的土地上去。只有当政府为愿意迁居的农民开放国有土地时，这里的农民才会放弃分给他的份地。但是在赎买土地这件事没有完全结束以前，政府是不会为农民提供这种方便的。如果允许农民这样迁移，那么

所有不满足于分得的份地的农民都会愿意迁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解放的农民看来也都是不满足于自己分得的份地的。因此现在所采取的赎买制度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就必然会垮台。正因为如此，政府在采取这一制度后，必然要暂时限制农民迁移的权利，政府也确实这样做了，它禁止农民在解放后头九年中抛弃他们分得的份地，在这个期限结束以后，又为农民迁移到其他地方去设置了一些实质上使农民的迁居几乎完全不可能的条件。正是按照2月19日的法令希望迁居的农民应当：（1）归还他分得的份地；（2）履行自己的兵役义务；（3）缴纳至第二年1月1日为止的他本人和他家庭的人头税和捐税，并清偿一切不容争辩的私人罚款和债务；（4）未涉讼；（5）获得父母的同意；（6）保证供养留在原居留地的孩子以及不能工作的家庭其他成员；（7）偿清赎金的全部尾欠；（8）获得乡公所的迁居许可；（9）交验移居地的接受证明；（10）在离移居地不超过十五俄里的地方购置土地，规定数量等于两个人的份地，这是2月19日法令为该地区规定的最高限额。但是，即使农民履行了所有这些条件，刁难也还是没有完结。由于政府目前不准许移居，因此有权批准迁居的人在批准迁居时必定遵循特殊的指示按照各地不同的条件办理。

所以，这种赎买制度是与解放的原则背道而驰的。赎买制度不是减轻和加速了农民解放的过程，而是使之更困难和混乱，造成了新的奴役形式，当然，这种形式不能与原有的农奴制相比，但与鲍里斯·戈都诺夫时代留传下来的最初农民依附于土地（glebae adscriptus^①）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那时农民尽管没有丧失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因而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国家成员，但是他不能抛弃划归他的地块，必须向土地所有者缴纳一定的地租，现在也是如

① 拉丁文：土地注册。——编者注

此,农民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以后,获得了戈都诺夫时代农民所有的那些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农民在差不多整整五十年内将被固定在自己的份地上,在此期间必须每年缴纳份地估定价值的百分之六,而估定的价值是不符合它的实际产量的,完全是虚构的。

农民一时固定在土地上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还未能造成任何特别有害的后果。在我国这样以农为主的国家里,城市生活甚至到现在还很不发展,城市手工业还比较少,农民就其实际情况和世代相传的习惯而言,他自己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土地。土地是农民主要的、往往是唯一的养育者。农民占居的一小块土地养育了他的祖辈和父辈,也养育着他。农民习惯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不仅没有抛弃世代习惯的地方的愿望,相反,他最愿意的是居住并死在祖辈和父辈生息和死亡的地方。因此,赎买制度使农民依附于自己的份地这一情况本身并不妨碍我国农民的日常营生,与他们自己的习惯和愿望并不矛盾,而且由于使他们牢固地依附于永久居住的地方,还使他们获得了临时迁移和临时定居的充分自由,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从事各种行业的充分自由。由于农民依附土地与分给农民份地的特殊方法结合在一起,本身并不束缚人的农民依附土地的情况却具有了束缚人的性质。

……大部分解放农民获得的土地数量比他们在农奴制时期所使用的土地少得多,虽然他们摆脱了以前剥夺了他一半甚至更多时间的劳役。他们现在能为自己耕作比以前多两倍的土地。这样一方面使劳动力增加了一倍,同时使生产工具比以前减少了一半多,这就造成了我们份地制度的内部矛盾,如果这种份地制度不是靠把解放的劳动力重新暂时固定在份地上这种办法来支持的话,这种矛盾就会立即把我们的赎买办法破坏无遗。所以,使农民固定在份地上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采取了完全不适合我国条件的不妥当的份地制度的后果,而且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在别的份地

制度下农民被固定在份地上也可能采取与现在一样的形式，但没有固定的性质。

……我们有许多人不去深入考虑事情的实质，却兴高采烈地谈论什么我们给所有的农民都分了土地，而不象欧洲那样让解放农民中的许多人失去土地；同时往往不管有理无理，不分青红皂白地责骂欧洲，说它在解放自己的农民时没有分给他们份地或没有给所有的人份地，把它的一切弊端都归咎于这一情况。这些人忘记了，我国所处的条件是：既然我们决心解放农民，我们就不能用别的办法，只能同时给以土地。我们假设，俄国按照根本不分给解放农民以土地的某些欧洲国家的榜样来解放农民，只给他们个人的自由，给以欧洲式的自由，即有权去任何地方的充分自由。现在我们还可以设想，任何一个解放农民都不愿意就土地问题与原来的地主达成任何协议，不愿按最低的价钱买他们的土地。这么一来，会怎么样呢？你们以为国家会容忍两千万农民没有土地、变成在俄国流浪的无产者吗？如果容忍的话，国家靠什么收入维持呢？国家用什么来完成自己的预算呢？让谁住到那些无数的土地上去呢？如果说在解放农民时曾产生过这样的问题：连同土地一起解放他们呢还是不给他们土地，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那么这只是因为考虑到不要由于解放农民而使地主破产，不要使他们失去经营家业所必需的本钱，不要使他们失去劳动力，因此才拟议把农民暂时固定在他们居住的地点，让农民负担向地主缴纳庄园贡赋的义务。只是在这样的拟议下给予农民份地才成为问题。如果没有这种拟议，农民获得了充分的个人自由，政府就必须立即把农民安顿在国有土地上，毫无疑问，一定会使农民过得比现在更殷实富裕，虽然政府只花费了它现在用于赎买的款项的一半或甚至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分给农民土地是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为了补充我们对农民改革的经济后果所作的概述，我们

对于地主经济的状况只须说几句话就够了。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把以前农奴制的份地当作正常的份地，后来又规定最低限度的份地，其主要原因是想尽可能维持所有土地最少的地主庄园经济，使它们即使不能繁荣，至少也能在自由雇工的条件下维持下去。这一目的达到了吗？可惜，没有。俄国当前农业情况调查委员会^①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所有专家一致证明，大部分小地主庄园不是早已破产，便是奄奄一息，朝不保夕。坦波夫省的土地所有者彼得罗沃-索洛沃沃说：“拥有一百俄亩以下土地的小地主经济正处于破产的境地，因为没有改善经营的资金；小地主们卖掉自己的地产，自己到私人家中去当差或到政府中去供职。”古季姆-列夫科维奇先生谈到基辅省的情况时证明：“小地主们都变穷了，我认识几个地主，他们几乎可以称为中等地主，现在没有任何生活资料，不得不去当总管。”麦格林先生谈到顿河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行政区的情况时说：“土地不多的地主们的状况变坏了，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破产了。在我们这个地区，由于劳动力昂贵和近年来经常歉收，小经济无法生存。”舍列美齐也夫先生指出，奥廖尔省和土拉省地主经济的状况一般说来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小地主的庄园例外，这些庄园由于缺乏资金无法改善经营。”

从小地主的庄园转向一般地主的庄园，我们发现，农民改革对于大部分庄园的影响，就象对小庄园的影响一样，也是很不好的。在农民改革之前我们几乎任何地方都没有靠合理的农业经营方式建立起来的地主经济。所有地主经济都是靠农奴劳动来经营的，都满足于这种农奴劳动所提供的产量。因此在农奴制度下土地的估价完全是按人头定的。地产几乎不管土地生产率如何，而按照

^① 俄国农业和农业生产率情况调查委员会于1872年成立，主席为彼·瓦卢耶夫。——编者注

居住在这里的农奴人数来估价。实际上，农奴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把天然不一样的土地拉平了，消除了土地的自然生产率的差异，从而抹杀了土地的实际价值。当然，农奴的劳动不管在哪里都是不付报酬的，尽管农奴劳动到处都很差，但到处都生产出剩余产品。在土地富饶的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和农产品缺乏销路，剩余产品是如此之多，以致农产品的价格被压到最低限度。人们记得，在农民改革以前波尔塔瓦省的粮食价格每普特不高于八戈比，而且还没有买主。在土地质量中等和下等的地区，没有这么多的农产品，但是对农产品的需求却一直很大，因而价格从来没有降到如此之低，特别是在邻近首都的各省更是这样。此外，地主可以从自己农奴外出打零工中获得大笔的收入。因此，一直到农民改革为止，土地天然肥沃程度的差别对我国地主来说不是很容易感觉得出来的，而且是谁都不重视的，所以邻近首都的地产，虽然地处土壤质量中等甚至下等的省份，也比土壤肥沃但远离首都的地产优越。农民改革消灭了农奴劳动，同时也会消灭这种虚假的价值，这种虚假的价值是农奴劳动给土地贫瘠地区的地产造成的。土地的肥沃程度成了土地价值的基础。铁路更大大提高了土壤肥沃地区土地的价值，为它们开辟了竞争的市场。改革以后，这些地区的土地价格便开始迅速上涨，越往后，上涨得越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毫无疑问，往后还将继续上涨，特别是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在土地价格日益增涨的同时，由于佃农制越来越发展，土地的租价可以说时时刻刻地在上涨，甚至与土地价格的上涨都不成比例。因此，土地肥沃和人口稠密的省份的地主们虽然在改革前没有正确的经营方法，但现在只要他们愿意，就完全可能经营得法；他们可以不经营任何农业，靠高额地租生活，就象以前靠农奴劳动过快乐生活一样。土地质量中等或下等的省份的地主在农民改革以后却处于完全另一种境地。为了利用自由雇佣劳动来顺利地经营农业，在市

场上与土地肥沃的地区竞争，不仅必须拥有大量资金，而且必须具有良好的农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此外，还要具有善于办事的能力和耐心。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地主那里以前没有什么积累。看来，资金倒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土地贫瘠地区的地主把份地以高价卖给农民，他们得到的价钱即使现在也还高出实际价格两三倍，在有些地方甚至高出九倍。所以，那些拥有许多农奴的地主是会有经营农业的足够的资金的。但是他们缺乏经营农业所必需的品德。因此，根据专家们在委员会中一致提供的证明，在土地贫瘠的地区只有很少的地主从事农业。而农民们在谈起这些为数不多的地主时说，“胡闹一阵，然后就放弃。”显然，土地贫瘠地区的地主没有从农民改革中发财，而且，什么时候能发财，也是个疑问。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未来：人口将会增长，土地将会变得稀少，土地价格将会上涨，随着土地价格的提高，地租也会提高——总之，北方也会出现现在南方人口稠密省份迅速发展的那种佃农制。但是北方的地主有希望在遥远的未来有朝一日得到这种好处吗？

大概，在我们这里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这种情况不会长久，二月十九日法令颁布后，经过四十九年，当全部赎金都清偿的时候，农民就能获得迁居的充分自由。我们认为，政府不仅那时不能在坏的份地上继续维持农奴劳动，就是现在也是如此，现在也是在勉强承受这一负担。从1861年到1871年十年中共积累了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三千四百四十四卢布赎金欠款，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由于农民普遍地越来越贫困，国家即使放弃一部分赎金而让农民现在就分批迁出那些因份地不够而农民白费劳动的地区，那也比一定要继续征收赎金、把农民拴在那些地块上要有利得多，因为显然，农民在这些地块上生产不出什么东西来，而只会在经济上一天天越来越破产，道德越来越败坏。而且可以大胆地说，在土地肥

沃的地区，国家如果采取这种办法，是不会损失一戈比赎金的。在这些地区，到处都能找到许多人乐于接受移民留下来的地块，承担缴纳这些地块赎金的义务。政府只需指明：（1）它准许从哪些地方迁出？（2）多大的规模？（3）迁移到哪里？其次，这种迁移是提前准许的、不是作为一般措施，而是为自愿迁移者采取的例外措施的自由迁移，这种迁移要靠移民自费进行。土地贫瘠的地区则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很少能找到人们愿意接受移民留下的份地，原因是与土地的实际价格、土地的现行卖价相比，赎金太高。然而即使在这里，有些地方还是能找到愿要土地的人。农业当前状况调查委员会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至少有些专家证明，就是在土地贫瘠的地区，在外面购买土地的人也能够把自己的带有各种义务的份地转让给村社，但有时要由自己找补一定数量的附加款。先不谈这些个别的意见，我们应当重复地说，不管现在事情怎么办，赎买结束后国家将不可能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就是说，不可能把农民固定在一小块土地上，甚至固定在某些较广阔的地方，例如象在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各省那样。国家应该准许农民在国家土地上完全自由地迁移，这不仅是由于遵循原则，而且是由于人民有普遍破产和国家自己破产的危险。

……在所有国家里，土地制度是多少世纪建立起来的；与此相应，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和国家机构也是经过多少世纪形成的。要使某一个国家引入外来的土地制度，这个国家必须从上到下开始破坏，进行内部革命，使自己在数十年内，也许是数百年内处于不断惊恐、骚乱和动荡的状态；其次，因为土地制度是英国的弱点，这在欧洲对谁也不是秘密。英国农业所达到的高度是以整个民族遭受无数经济灾难和社会灾难为代价的。一方面，英国的贸易很久以前在许多外国市场上的垄断或优势促进了工业的广泛发展，另一方面，有充分的个人自由，个人有权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内与

资本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这就减轻了这些灾难，否则，英国的土地制度也许维持不了许多年，因为英国的土地制度只不过是一小撮土地占有者对全民财产的掠夺。英国的土地制度可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中找到某些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但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代表，如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把英国以前的小土地所有者即农民消失看作是国家最大的罪恶。但是有的思想，在其他文明国家里是早已解决、早已归档的问题，而在我们这里现在还是问题，还能找到拥护者。在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学习过或进过政治经济学的土地占有者可以找到千百个，但只要把权力给予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这些人就会不加考虑地准备在俄国采用英国的土地制度。不善于使其他国家过去的榜样和经验适合于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不善于合情合理地模仿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不幸的所在。由于这种种无能，我们未能使其他国家解决农民问题的范例和经验适合于我国的关系和条件，因此我们的巨大的链条出了毛病，它致命地

一头打中了地主，
一头打中了农民。^①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178—187页。

^① 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涅克拉索夫全集》第3卷1953年莫斯科版第86页。——编者注

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①

(致《前进》杂志编辑的一封信)

彼·尼·特卡乔夫

本人的一点说明

去年年底，当时我还在流放中，就接到一些匿名的和署名的信，劝我离开流放地到国外去，并邀请我参加当时刚出版的“俄国激进革命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杂志的工作。当时我已知道，这个刊物掌握在谁的手里；我知道它的第一个纲领（流传的石印稿）在我们所有的正直的青年小组中，激起了一片愤慨，而它的第二个纲领虽然给人的印象较好，但也很少有人对它完全满意。我也知道，第一期杂志在最激进的青年中间遭到了异常的冷遇，其中的某些文章（如《知识与革命》）引起了他们毫不客气的强烈反对。有鉴于此，我开始为这个新生的机关刊物的前途担忧。我担心这个刊物不能象它本来所希望和应该做到的那样，成为阐述和表达我们年青的激进革命党的真正要求的喉舌；我还担心这个刊物不但不能使这个党团结起来，反而只会在党内播下新的不和的种子，引起新的分裂，这样一来，它对革命事业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虽然我并不认为杂志的宣传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它仍不失为革命斗

^① 这封信最初于1874年4月（伦敦）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小册子的出版标志着特卡乔夫同拉甫罗夫最终决裂。——编者注

争的手段之一，我们不能忽视它，但也不应该为它化费过多的革命力量。

当这种手段运用不好时，尤其不能忽视它。因为在这种手段运用不当时所造成的危害，远比在运用得当时可能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在后一种情况下，它能做到的无非是：促使一些青年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向他们阐明进行这种活动的途径和方法，在社会上启发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意识。但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不仅会使这种不满意识减弱，会使青年人脱离实际的革命活动等，而且还会给革命党带来纷争，使青年人养成崇尚空谈的陋习，这是一种革命的手淫，恕我这样称呼它。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感到我有责任应邀离开流放地，直接参加《前进》杂志编辑部的工作。

当然，我远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我参加杂志的工作，可以对杂志主管人的广博的科学知识和文学才能有所增补。我知道，主管编辑部的人在数学、哲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是他对于我们的青年所经常思考和为之激动的实际问题和切肤利益却懂得甚少。

从年龄来说，他是另一代人，是四十年代、父辈一代的人；对于“儿辈”一代，对于在农奴制改革前夕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在六十年代初如此轰动地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的年青一代，他不了解，要说他有了解，可以说也只是理论上的、根据书本和传闻得来的。他本人与他们素无交往，从未与他们共过患难。他总是置身于他们之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他的活动的总方向太脱离实际，与当时我国社会的情绪，特别是与我国青年的情绪很不协调；部分是由于他在我国各文学派别中所处的地位。由于某种奇怪的巧合，他总是靠近那些显然具有反动色彩的，为青年们所憎恨和厌恶的杂志的营垒一边；他的学术专著刊登在政府的官方刊物上，他的哲学和史学论文与阿利别尔京的“宠儿”，不久前成为

突击刽子手的格罗梅卡宪兵们的警察式的造谣中伤和其他各种最顽固不化的反动剥削者集团的代表、克拉耶夫斯基老头的党羽们的恶毒诽谤性言论刊登在一起。一些最受青年们爱戴的作家，我国激进杂志界的代表，把他当作敌对派别的人来对待，认为他是一个“落伍者”，用反动分子这个在当时来说可怕的译名来咒骂他。因此，青年们自然就要避开他，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说是明显敌对的话，那么至少也是极为冷淡和不友好的。

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当政府的压迫看来（这是就当时来看，现在我们就以为如此了）已达到极点的时候，当沾满了殉难者卡拉科佐夫的鲜血的沙皇刽子手们毫无廉耻地大发警察狂的时候，——只是在这种反动派疯狂肆虐的灾难时期，在古罗马野蛮的神农节式的肆无忌惮的专制时期，〈前进〉杂志现时的这位编辑与青年们之间的那种冷淡和不友好的关系才开始有所改变。

他成了“受难者”之一，他成了顽驴似的反动势力的一个受害者，青年们对此是感到满意的。

因此，青年们愿意原谅他过去的一切，忘掉这一切。他们开始对他有了一定的信任，但这时他本人已离开了他们。他被流放了，接着就侨居国外，然后突然成了自称是“激进革命青年”的代表的“俄国革命机关刊物”的领导人。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有可能了解这些青年呢？没有任何这样的机会。

我认为这个新诞生的机关刊物最初几期之所以不完全成功，正是由于对青年缺乏实际了解的缘故。我觉得，一个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从未搞过革命工作的人，不可能成为革命政党的忠实代表，这就是为什么他领导的杂志的言论不能与这个党的总方针协调一致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与这个党（至少是它的某些派别）之间很快就产生争执和处于冷淡的，甚至是敌对的关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党内某些人在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当面指

责他背叛和变节，有些人甚至怀疑他与第三厅有联系的原因。

我的解释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是在当时我认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所以我想，任何一个正直的人，任何一个认识到利用杂志进行革命宣传的好处，而他又没有任何别的更重要的工作可做的人，只要他能够填补编辑部对我国革命青年缺乏了解的缺陷，那么他就会也应该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因而也有责任担负起这项工作。

在我整个的写作生涯中，我经常与我们的青年，与我们的“儿辈”一代交往。我自己就是属于这一代的人，我与他们共同感受他们的喜悦和过错，怀着与他们一样的信仰和希望，经历过与他们相同的幻想和失望，而凶恶的反动派给予他们的每一次打击，几乎都会或者直接地，或者通过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间接地影响到我。从中学时代起，除了青年同伴外，我从不与其他的人来往，这些青年时而为大学生的集会所吸引，时而进行神秘的秘密活动，时而去开办星期日业余学校和阅览室，时而去筹办劳动组合和公社，时而又搞民众教育，宣传接近人民的思想，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秘密活动，只要彼得保罗要塞牢房的厚墙不把我与他们分隔开，我总是与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他们中间；十年来我与他们共同生活，同甘共苦，我怎么能不了解他们呢？我觉得，如果说我在哪方面有些知识的话，那么只有在这方面我还有点经验。

我愿意向《前进》杂志发起人提供的正是这方面的经验，我也正想以此为他的效劳。

在苏黎世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的建议也被接受了。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我与编辑之间的关系和我对杂志的事务和方针所应有的过问和监督的权利，用某种正式的契约确定下来。但是，我与编辑部越接近，就越察觉到，在关于青年的革命活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我与编辑部的意见不一致，我们对青年本身

的看法和对俄国的革命杂志应担负什么任务的见解也有分歧。

同时,在了解了杂志的组织情况后,我发现它是以一长制的原则为基础的,只有一个人是杂志事务的绝对主宰者,只有他一个人才有决定权,杂志的所有其他参加者最多只能提些意见,这使我大为惊讶。这种组织原则一般地说是不公正的,而对一个匿名的杂志来说,简直是岂有此理。对一个匿名的杂志来说,它的方针应该由所有经常参加杂志工作的人平等地共同来负责。这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集体的责任;负同等的责任自然就要求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不仅从理论上来说,我不能容忍一长制的原则,从纯粹实践的观点出发,我尤其不能容忍这个原则。要知道这将意味着把一项与每个革命者都密切相关的事业——一项其成败与所有青年都有利害关系的事业,完全交给一个人去管,而且根据这个人过去的表现,人们很难象对一个革命者那样信任他。如果涉及到的事情是关于出版什么百科全书之类的问题,说句公道话,我完全承认他具有这方面的才智和学识,我也就不会反对他的一长制了。但是,现在涉及的是出版革命杂志的问题,所以我就要非常坚决地起来反对他。我绝对不承认他在解决实际的革命问题、判断我国青年的真正需要和愿望、阐明他们的纲领等方面的权威,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完全超出他通常的智力活动范围,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也超出他的生活经验范围。

不言而喻,我与编辑部的关系应该予以改变:首先我希望把这种关系明确下来。

为此我写了一封便函,陈述了我对俄国革命杂志的纲领应该满足哪些总要求的看法。在我们就这个问题口头交换意见时,我预期的目的达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明确了。

原来,我们在一些极重要的条款上有分歧意见;但是,我曾想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共事的，只要我们对杂志都能担负同样的责任和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将杂志社的组织原则加以改变。我完全不想从纯粹个人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并尽可能照顾到可敬的编辑先生的自尊心，我只是为了公正合理，纯粹从原则上的考虑出发，要求在处理一切有刊物的稿件和经济问题上，给予每个支持本杂志的固定撰稿人以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我提出的这些要求，是我参加杂志工作的绝对必须的条件。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对杂志的方针在许多方面是不同意的，但是我对它既不能施加任何重大的影响，又不能进行任何的修改和变动，难道我能为这样的方针承担责任吗？一个自命为代表我们整个激进革命党的机关刊物的大权却由这样一个人独揽，他过去从不属于这个党，也不了解这个党，如果说他了解，那也只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难道我能支持这样一个机关刊物吗？

编辑部拒绝接受我的条件，我拒绝跟它合作共事，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到此算是完全而彻底地结束了。但是，除了这个私人问题以外，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依我看来这个问题对我们所有革命青年来说极为重要，它与杂志编辑部的革命纲领中的一些基本条款有密切关系。这就是关于俄国革命杂志的宗旨和任务问题，也就是整个革命宣传的宗旨和任务问题。我与编辑部的所有谈话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现在我这封信里所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因此，我认为可以接受我此地的一些朋友的建议，公布这封信。我想这封信一方面可以阐明我们的革命纲领的要点，另一方面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最激进的革命青年小组对《前进》杂志的态度，它将向该杂志的拥护者表明，我们对《前进》杂志之所以持冷淡和不满态度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封信也将向他们表明，他们别想无中生有地用什么俄国青年的无知和

轻率，某些敌对党派的阴谋和诡计等这类主观想象的东西，来解释这个问题。

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

—

我拒绝与你们的杂志合作，因为您拒绝我在选登文章方面，在掌握杂志的总方针上与您有同等的决定权。^①假如您和您的支持者基于这个事实，把我与您分手的原因归结为我的自尊心作祟，归结为我想争权夺位的问题，那我是很痛心的。可敬的先生，在共同的事业上，在事关我所珍视的俄国革命党的利益问题上，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遵循个人的动机行事，我过去一贯也将永远为这个党，为我们的这个共同事业——俄国的革命事业，牺牲我的个人利益。我不愿意甚至您来曲解我的行为，怀疑我的动机。因此，我对我们之间的数次谈话感到还不够满足，决定给您写这封信。您在仔细地读完这封信，并且公正地考虑我提出的理由以后，必将深信，我的行动正是每一个以革命党的利益为重的正直的人所应该采取的。

假如我完全同意你们杂志的观点的话，或者我象您现在的同事们那样，对您个人抱有无限信任的话，假如我认为您是俄国革命思想界的真正代表的话，那么我就决不会提出，一长制原则是不公正的这个问题了。我会为了事业的实际利益，心甘情愿地放弃这条原则；我会留在您那儿工作；我会献出我的全部知识和才能，听凭您的使用，并且我也决不会想到去争各种权利。

^① 我这里只谈我自己，因为您的其他合作者拒绝接受我为他们、也为我自己所要求的这些权利。——彼·特卡乔夫注

但是，您自己明白，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个六十年代的其他青年，对您都不可能抱有这种信任。我们大家都了解，您在参加革命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您的前半生曾为俄国政府效劳，曾从它那里得到俸禄；您一向不参与“政治”，甚至在理论上也从研究任何与社会革命直接有关的问题。您始终置身于我们所有的革命小组之外，过着一种，用您自己的话说，“幽居书斋的思想家”式的生活，而且这位思想家始终不是遨游在虚无缥缈的抽象哲学世界里，就是在数理和史学方面作一些被官方认为没有问题的插叙。

经常占据您的思想的不是数学公式，便是形而上学，要不就是对历史作哲学的观察，您的思想与当前的实际问题格格不入。

在我国自由派的“蜜月”时期，当整个社会都被社会问题所吸引，所有人的脉搏都激烈跳动的时候，甚至连哲学家斯特拉霍夫也变成了政治家^①的时候，而您，只有您一个人，却心安理得地谈论着哲学的任务。正当所有正直而年青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我国激进刊物的代表们周围的时候，您却在克拉耶夫斯基^②营垒里服务，站到了象征因循守旧的旗帜之下。

由于您的上述经历，您就不能也不应该指望我们对您抱有绝对信任。您现在的声明与您过去的全部经历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矛盾。假如您一向是个“随风转舵的人”，那就又当别论，但是，要知道您是一个具有十分明确而坚定的信念的人。您怎么会发生这种令人惊讶的大转变的呢？您是怎么突然由一个安分守己的哲学家，由一个守旧的《祖国纪事》杂志的忠实撰稿人，变成一个红色革命

^① 指尼·尼·斯特拉霍夫(1828—1896)关于波兰起义问题的文章《致命的问题》(《时代》杂志1863年第4期)成为政府查封《时代》杂志的起因。——编者注

^② 安·阿·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俄国的出版者和杂志编辑。——编者注。

家，一个自称为“激进革命党”的机关刊物的编辑的呢？这种突然的转变总是有些令人生疑。

我并不是怀疑您的真诚，也不是不相信您的转变的真实性（世界上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但是，请恕我直言，我不相信，也不能相信这种转变是持久的。我感到，一个人要放弃他原来的梦寐以求的理想和根深蒂固的积习，决不能象丢弃一件破烂衣服那么容易。它们迟早将会重新冒出来，冲洗掉外来强迫输入的新信念。一贯习惯于在某种思潮的影响下工作的人，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一下子就转而信仰另一种与原先相对立的思潮。那个旧我必然会不由自主地在新我中表现出来。难道它没有在您为您的杂志所写的第一个纲领中表现出来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难道会写出那样的东西来吗？难道他会借用合法主义来解释革命的可能性吗？

诚然，当您刚一发现人们对您的创作付诸一笑的时候，您就很快放弃了它；您又写了另一个纲领（听说甚至还有第三个），但是，在您的关于新信条的论述中，通过革命的辞藻表达出来的却远不是革命的内容。还有，您匆匆忙忙地改变您的革命信条这件事本身，不正好证明您的革命信念是动摇不定和反复无常的吗？请您说句良心话，我怎么能够并且有什么权利相信您呢？

不错，您在好几次谈话中都竭力使我相信，您个人的意见是不会对您主编的杂志的观点有重大影响的，您还说，虽然按照您个人的看法，您仍然坚持第一个纲领中的观点，但这丝毫不妨碍您作为革命的机关刊物的编辑，在杂志上宣传最激进最革命的思想。这样一来，从您自己的话来看，您不是把自己描画得有几分象两面人了吗？他的第一张面孔是哲学家、渐进主义者、信仰进步的自由主义者，而第二张面孔则是红色革命家、“激进革命党”机关刊物的编辑。然而，有谁能向我担保，将来有一天，第一张面孔不会把第二张面孔吞噬掉，哲学家不会堵住革命家的嘴巴，强迫后者随着他的

笛声跳舞呢？恰恰相反，根据头两期《前进》杂志来判断，我觉得这种哲学吞噬革命的情况已是既成事实了。

其实，只要深入推考一下你们的杂志所散布的主张的实质，您自己也会深信，这些主张可以使您所希望的一切都获得成功，但只是不会导致革命的胜利。

对于这一点，您难道还需要什么证明吗？我看您对此早就毫不怀疑了，正因为如此，您才散布这些主张的。请不要以为这是指责您虚伪。不，您完全是真诚地不相信革命，并且也真诚地不希望它成功。同样，当您阐述革命的必要性，坚决表示希望它一定胜利等等的时候，您也完全是真诚的。您只是滥用辞藻而已。您和你们的杂志所谓的革命，其实完全不是革命，至少不是我们革命党所向往的革命，也不是我们青年应该准备为之献身的革命。

二

你们的杂志所说的革命是什么意思呢？是以废除现存制度和消灭历史上形成的、压迫和奴役人民的经济生活条件为宗旨的人民运动。这太一般化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呢？它是一种自觉的、理智的运动，它的产生是由于对非人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根本缺陷有清楚的认识，而它的指导方针是基于对开展运动的手段和它的最终目的有清晰而正确的理解。按照你们的意见，只有当全体人民，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都具有上述这样的认识和理解的时候，真正的人民革命才能实现。您把一切其他方式的革命都称作人为地“将革命思想强加给人民”的革命（见第一期杂志，《我们的纲领》）。你们的纲领宣称：“我们决心促其实现的俄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应该体现大多数人的需要，即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和理解的需·要。”（同上）

可见，您认为革命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大多数人自己所认

识和理解的需要。但是，难道这种革命是暴力革命吗？当大多数人认识和理解自己的需要，并且懂得用以满足这些需要的途径和手段的时候，难道那时他们还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进行革命吗？请您相信，那时候他们将会不流一滴血，非常和平地、温文地、而主要是逐渐地做到这一点的。要知道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突然就认识和理解到所有需要的。所以，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一下子去着手实现所有这些需要，开始他们总是认识到一种需要并去满足这种需要，然后是第二种、第三种等等，最后，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最后一种需要时，他们甚至已无须与任何人作斗争，也谈不上使用暴力了。

因此，您所说的革命无非是一条空想的和平进步的道路。您把进步说成革命，以此来自欺欺人。难道这不是偷天换日的骗人把戏吗！

难道您真的不明白，革命（就其通常的意义来说）与和平进步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少数人进行的，而后者则是多数人进行的。因此革命的兴起常常是迅猛的、剧烈的、无秩序的，总是急风暴雨式的，带着自发运动的性质，而和平进步的实现总是温和的、缓慢的、从容不迫的，象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庄严而隆重的”。只有当少数人不愿再等待多数人而自己去认识自己的需要，并且下决心把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强加于多数人的时候，只有当少数人促使一直埋藏在人民心中的对自己境遇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的时候，暴力革命才能发生。

出现这种爆发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某种什么明确的理解和认识等等，而只不过是由于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和怨恨的情绪，由于不堪忍受的压迫；因此，当这种爆发发生的时候，少数人只要努力使这种爆发具有一种自觉的理性，将它引向一定的目标，使它的朴素的感情基础具有理想的原则就行了。真正的革命人民是一股狂

暴的自发力量，他们会破坏和消灭在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他们的行动总是本能的和不自觉的。而您所谓的革命人民则是一种文明人，他们完全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境况，他们的行动总是自觉的、合理的，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有清醒的估计，明确了解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懂得自己的真正需要和自己的权利，他们是有原则、有思想的人。

但是，究竟在哪儿见到过文明人进行革命的呢？啊，没有！文明人总是宁愿平稳的和平进步的道路、不流血的抗议的道路、外交式的妥协的道路和改良的道路，而不愿暴力的道路、流血的道路、掠夺和杀人的道路。

因此，我再重复一遍，当“大多数人”达到“明确理解和认识”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暴力的、流血的革命已将是不可思议的事了，那时将开始一个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新时代，拉萨尔曾经幻想过这样的时代，他的思想是现时西欧工人运动的理论依据，也是国际的德国纲领的基础。

资产者和哲学家、刽子手和剥削者看到，这样的时代的到来是非常遥远的将来的事，他们无需特别惶恐不安。当听到“不流血的革命”时，他们也不会吓得毛骨悚然，只会狡黠地微笑和赞许地点头。他们知道，这种“轻微的灾祸”不会在他们的生前来临，也不会他们的儿辈一代、孙辈一代到来，甚至不会在他们的曾孙一代出现，而当“大多数人认识和理解自己的需要”时，也许太阳早已熄灭了，地球已成为一个永远黑暗和寒冷的王国，一个没有生命的王国。

对于您所谓的那种革命，即以“大多数人明确认识和理解自己的需要”为条件的革命，甚至一听到“革命”这个词就魂飞魄散的我国的第三厅也决不会感到害怕的。相反，宣传这种革命思想正是对他们直接有利的。这种宣传可以帮助他们把青年人的思想搞糊

涂，因为它把真正的革命说成是把人民自己还没有认识和感受到的思想，人为地强加于人民，说成是一种独断专横的行为，说成是一种朝生暮死、昙花一现的现象，因而也就是一件有害的事；因为它使青年们相信，人民事业的胜利，一切现存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都取决于人民对自己的权利和需要的认识程度，也就是说取决于人民在智力和道德上的发展程度，这种宣传可以使青年们不知不觉地误认为，似乎教育人民，向人民阐明他们的需要等等——这一切并不是在为和平进步的成功作准备，而是在为真正的革命胜利作准备。

三

你们的杂志所进行的正是这样的宣传；它正在竭力使青年们树立上述这种信念，也就是说，你们的杂志正在既非所料，大概亦非所愿地为第三厅的利益和目的效劳。您用不着出来否认您赋予革命一词的这种潜在含义；您也用不着出来争辩，似乎您从未在你们的杂志上维护过和平改革的道路、不流血的进步的道路。我知道，你们的杂志永远也不敢公开鼓吹您的这种思想；但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思想却始终潜在于你们的杂志之中；它使杂志具有某种色彩、某种倾向；它形成了杂志的精神。我知道，您虽然始终革命不离口，但您的内心却并不相信革命。

是的，您并不相信流血革命有实现的可能！不然的话，您就不可能使它受制于不可能实现流血革命的那种条件（大多数人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权利和需要）。不然的话，您就不可能把下述论点作为不可改变的基本条款之一，写入你们杂志的纲领：“只有当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指出变革的时刻，指出俄国人民已对此作好准备的时候，才能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去实现这一变革。”（见第1期杂志第14页，〈我们的纲领〉）究竟谁“才能认为自己有

权……”等等呢？是您吗？但决不是我们。

难道您真的不明白，一个革命者永远认为而且应该认为自己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举行起义；他与庸俗哲学家的区别，就在于他不是等待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指出变革的时刻，而是自己选择这个时刻，就在于他承认人民随时都准备起来革命。

不，这一点您是明白的，正因为如此，您才把您的这个论点列入纲领的基本条款中去。您想借此让人们明白，不能把您与那些真正的革命者，那些革命的实践家混为一谈；让人们明白，虽然您也谈论革命，但与真正革命者所追求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您所谓的革命完全是一种特殊的革命，它在现阶段对谁也没有任何危险，只有在遥远的将来，“当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指出变革的时刻”的时候，当人民对革命已作好准备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人民已理解和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需要的时候，这种革命才可能发生。

您对我国革命青年的态度，您向他们提出的建议，还有您关于革命杂志的任务的见解，都说明您不相信革命有实现的可能（这是指真正的革命，不是指您用来代替不好听的字眼“和平进步”的那种虚幻的革命）。

谁不相信当前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谁就是不相信人民，谁就是不相信人民随时都准备起来革命；谁就必定会到人民之外去寻求某些能够教育人民去实现变革的力量和成分。您是在我们的知识青年中间寻求这种力量。您认为，这些青年应该到民间去并“向人民讲清楚他们的需要，使人民准备好去进行独立的自觉的活动以达到他们所明确理解的目的”（第14页）。您竭力要人们相信，只有遵照您的建议去做，青年人“才能认为自己是现时准备实现俄国美好未来的事业的真正有益的参加者”（同上）。

这样一来，您就把不是以向人民“解释和教育”他们为目的的一切其他革命活动都认为是无益的。当然，您有您的道理。是的，

我们青年人所倾心的一切其他革命活动：宣传鼓动、游行示威、密谋活动等等——这一切活动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激起您所谓的“人为的革命。”（第16页）而您想要的是自然的革命，它要求事先进进行“解释”和“教育”，按照“历史事件的进程”指出的时刻开始。假如舒瓦洛夫伯爵读了你们的杂志，^①他一定会对您把革命巧妙地分为“人为的”和“自然的”革命而感谢您。

假如您真能使青年们相信人为的革命是徒劳无益的，而自然的革命才是必要的。那么第三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对它来说，只有人为的革命的·活动家才是可怕的，它只跟他们作斗争，只有他们才给它带来最大的麻烦和苦恼。而您的“自然的革命”大概不会使它感到有什么特别的不安，因为它大概正象您不相信“人为的”革命有发生的可能一样，也根本不相信您的这种革命有发生的可能。并且您向青年进一步所提出的劝告也一定会使第三厅相信，“自然的革命的活动家”不会让它太讨厌，使它相信他们是一些可靠而忍让的人，习惯于“勤奋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经常用“大量丰富的知识”来充实自己的头脑的人。这种政治上没有问题的献身者难道会有什么危害吗？

你们说：“只有严格地加强自我锻炼，才能造成在人民中进行有益活动的可能性（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又说：“只有使人民相信你个人（否则又怎么样？），才能创造从事这种活动的必要条件。”

你们认为这两条原则是标志你们的革命信念的不变要素（第

^① 但是，从青年们因阅读《前进》杂志而横遭他的迫害这一情况来判断，可以认为他本人没有读这份杂志。或者他也传染上了哲学症？啊，伯爵呀，一个宪兵将军竟也空谈起哲学来，竟也为哲学的幻影所苦惱，难道不有失体面吗？毫无疑问，宪兵可以利用这种哲学来为自己服务，但是相信这种哲学的乌托邦，在这种哲学制造出来的某种“自然的革命”的幻影面前发抖，——这实在是失体面了。——彼·特卡乔夫注

16页)。然后你们的杂志在《知识与革命》(见第1期杂志)和《特权阶层出身的革命者》(见第2期杂志)两篇文章中,详细地解释了“严格地加强自我锻炼”和“使人民相信你个人”这两条原则究竟应该包括些什么内容。

这两篇文章的总的意思和结论是:青年们,如果你们想要成为革命者(意思是作为“解释者”和“培育者”)的话,那么首先就要学习:“用正确的方法培养自己的批判思维能力”(见第1期杂志第225页),“要专门学会某一门科学”(第229页),“用大量切实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见第2期杂志第148页),“在体力上和精神上进行自我锻炼和自我教育,以便能精神振作地经受一切艰苦的考验,在任何磨难下都不会屈膝。”(同上)这就是你们的杂志认为当前应该向青年们提出的及时而合适的劝告。尊敬的先生,在我们个别谈话时,我已多次向您谈过我对这类劝告的看法。而现在,当我再一次地涉及到这类劝告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得不再三地表示我对这些劝告的极大愤慨。

怎么能这样呢!当人民的苦难日益深重的时候,当专横暴虐的锁链在人民的备受折磨和痛苦的身上锁得越来越深的时候,当专制制度的绞索在我们的脖子上套得越来越紧的时候,而您却说:“等一等吧,忍耐一下吧,现在不要投入战斗,首先要学习,要重新进行自我教育。”

上帝啊!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吗?等待吧,学习吧,重新教育吧!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等待?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把时间浪费在重新教育上?要知道,我们把革命的时间每拖延一小时,每耽误一分钟,不但人民要付出成千上万人牺牲的代价,而且还会减少革命胜利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最强大的敌人是我国政府,它拥有军队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中间力量能够在人民运动一旦

兴起时长久地阻挡和遏制这个运动的发展。

我国的土地所有者阶层,就其本身来说是分散的、弱小的,无论按数量还是按经济地位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国的第三等级一半以上是由无产者,即赤贫者构成的,只有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开始变成象西欧那样的真正的资产者。

但是,决不能指望这些对我们有利的社会条件能长久存在,我们在经济上的发展虽然是平静的、缓慢的,但毕竟还是有所前进。而这种发展也象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一样,服从于同样的规律,遵循着同样的方向。

现在村社已开始解体,政府正在竭尽全力来彻底地破坏它,并使它破产;农民中间正在形成富农阶级,农民和地主的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自由转让土地所有权所遇到的阻力正在日益减少,土地信贷的扩大,货币业务的发展日益变得重要。地主不得不实行农业制度的改善。而农业的进步通常是与当地工厂工业和城市生活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因此,在我国当前已经为下述两个阶级的形成具备了一切条件: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保守的农民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阶级,另一方面是一个由金融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等组成的资产阶级。随着这些阶级的形成和巩固,人民的处境必将日益恶化,暴力革命成功的希望将越来越渺茫。

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等待。正因为这样,我们断定说,俄国迫切需要革命,而且恰恰是在目前需要革命;我们不允许任何耽误、任何延宕。如果现在不干,那就要等很久才能干,也许永远也干不成!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十年、二十年后,则将变得对我们非常不利。您懂得这一点吗?您明白我们迫不及待的真正原因吗?

四

尊敬的先生，我想您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您不能理解是因为您没有那种能够构成我们的力量的信念。您不相信革命，您不相信人民，您不相信他们可以不经预先的教育，就能进行革命。您同样也不相信我们革命青年；您不相信他们已具备进行革命活动的能力。您之所以对这两方面缺乏信心都是由于同一个原因：总是把革命的概念与和平进步的概念混为一谈。您以为，似乎在革命开始以前，它总是应该作好知识方面的准备，似乎知识是革命的前奏。

您认为我国人民完全没有知识，所以您说，人民还没有作好革命的准备。您看到我们青年的知识不够丰富，因此您就认为，他们对从事革命活动还准备不足，您劝他们先学习，然后去教育人民。当然，从您内心深藏的隐秘的观点来说——这种观点您永远也不敢公开说出来，但您和你们的杂志也从未放弃它——，即从和平进步的观点来说，您是对的，是百分之百地正确的，每一个希望促进和平进步的人都应该学习、学习和学习，应该积累和传播知识；知识——这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来说，它根本不是必要的条件。知识可以推动进步，但它决不能促成革命。

革命是由革命者来进行的，而革命者是由当时他们周围环境的社会条件造就出来的。一切受到专横暴虐的压迫的人民，遭到剥削者的痛苦折磨的人民，注定世代代被迫以自己的血汗供养一小撮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的人民，被经济奴役的锁链捆住手脚的人民，——一切这样的人民（而各国人民都处于这样的境地），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的促使，都是革命者，他们随时都能够革命，他们始终愿意革命，他们随时准备投入革命。而如果实

际上他们还没有革命，如果实际上他们还象驴一样忍受着苦难的命运……那只是因为他们内在的一切主动精神受到了压抑，他们还没有勇气来打破他们的常规；但是如果有某种外力的推动、突然的冲击使他们越出常规，那么他们就会飓风般地起来，他们就会进行革命。

我国青年学生的情况也完全与此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有利于培养他们的革命情绪。我们的青年是革命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无产者的子弟，或者是与无产者相去不远的人们的子弟。养育他们成人的，或是靠自力艰苦谋生的贫民，或是靠国家施舍而生活的人们；我们的青年处处都感到自己经济上软弱无力，感到自己仰人鼻息的地位。青年们对自己这种软弱无力、毫无保障和仰人鼻息的地位的认识常常使他们产生不满、愤恨和反抗的情绪。

诚然，在这些人的处境中也存在着另一些社会条件，它们会使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丧失作用；因为这些社会条件使剥削他人的劳动成为可能，所以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安于生活现状；它们会消除不满，抑制反抗；它们会使那种变得鼠目寸光、因循守旧并甘受奴役的狭隘的卑鄙的个人主义在人们中间发展起来。但是青年们尚未受到上述第二种社会条件的恶劣影响，尚未陷入庸俗的日常生活中去，尚未被任何的合法的掠夺和剥削的方式所吸引。这些青年对未来除了生活毫无保障和从属地位外，看不到任何出路，过去的生活所带给他们的只有关于贫困和从属地位给人造成的种种屈辱和痛苦的凄凉的回忆。只要这些青年开始自觉地思考，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不可避免地想到革命的必要，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者。他们把革命看成是能使他们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这种困境是当前我国社会生

活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给他们造成的。^①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革命党几乎全部是由学生青年组成的，正因为这样，无论第三厅的任何迫害，任何诡计，无论任何戈利岑们、穆拉维约夫们、舒瓦洛夫们和列瓦晓夫们，无论监狱，无论牢房，无论流放，无论苦役，无论绞刑，无论枪决——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不能磨灭他们的革命意志，消除这个所谓“一切祸害的根源”。

沙皇的爪牙们对青年们所实行的那种疯狂野蛮的镇压和迫害是枉费心机，他们用尽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对青年们所进行的威胁、恐吓或甚至腐蚀都是枉费心机，他们动员社会舆论来反对青年，污蔑、诋毁青年，也是枉费心机，总之，无论是他们的威胁，无论是他们的恩施，无论是他们的惩罚，无论是他们的迫害，无论是

① 尊敬的先生，由于您不了解青年，既不懂他们的要求，也不懂他们的理想，您与他们在情感上格格不入，——可能对您来说，我所说的这些意见似乎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如果这样，那就请允许我引用一位我们当代青年的典型代表的话吧。从中您可以看到“说明我的理论上的抽象推论”的具体证明。

“我们是什么人？从客观需要本身来说，我们究竟应该要什么？”这就是涅恰也夫在《村社》杂志第1期上所提出的问题，下面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是在贫困和饥饿线上挣扎的父亲们的孩子，是被折磨得愚钝和痴呆的母亲们的孩子。”

“我们在泥泞和愚昧中成长，在受欺凌和屈辱中成长，自幼就受那些在现存制度下过着幸福生活的形形色色的恶棍们的鄙视和压迫。”

“对我们来说，家庭不过是苦役的大门，我们的人生最美好的少年时代是在与饥饿和贫困作斗争中度过的，我们的充满着爱恋和热情的青春年华是在为挣一块面包的苦难奔波中消逝的。”

“我们的过去充满着痛苦和灾难，而在未来等待着我们的仍将是一系列同样的屈辱、欺凌、饥饿的白天和不眠的夜晚，最后还有那法庭、监狱、牢房、苦役或者绞刑架。”

“我们处于不堪忍受的痛苦境地，无论如何我们要摆脱这种困境。”

“这就是我们渴望实现的心愿、我们朝夕思慕的目标就是要改变社会关系的现存制度的原因。”

“我们能要的唯一有人民革命。”

“我们要革命，并定将实现革命。”（参见《村社》杂志第1期第3页。）——彼·特卡乔夫注

他们的诽谤——一切都枉费心机，什么也不能制服青年。每年有几十个、几百个青年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搏斗中英勇牺牲，但是这些倒下去的斗士的岗位立即就有新的战士来接替，斗争在继续，几乎没有间歇，也没有停顿。

这正象童话中的那条千头蛇一样：你砍掉它一个脑袋，在砍掉的地方马上就会长出另一个脑袋来！而在沙皇的所有武库里，现在还没有一种武器，可以用来杀死这条千头蛇。因为，为了把它杀死，就需要改变我们学生青年出身的那个阶层的社会条件，就需要重建我国社会生活的整个大厦，这也就是说，专制国家首先应该消灭自己本身。我们革命青年的这种不灭性（当然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也可以说是不朽性正是构成他们的力量的一个主要因素。他们对自己的革命使命的信念就是建立在对这种力量的认识的基础上的。而这种信念鼓舞和激励着青年人，给他们勇气坚持去同他们的凶恶的敌人勇敢地进行力量悬殊的斗争，增强他们的毅力，鼓励他们去建立英勇的功勋，使他们成为英雄。

尊敬的先生，您应当承认，信念对青年人是必需的，没有信念，他们就会变成冷漠的空谈家，信念是他们成功的可靠保证和必要条件。如果您同意这一点，那么您也应当同意它的反面的论点。您应当同意，任何一个竭力想扼杀和毁灭这种信念的人，企图暗中破坏这种信念的基础的人都是有害于革命党的，他们使革命青年的士气沮丧，使青年失去革命的活力，这样的人就是革命的敌人！

难道不是这样吗？

五

然而，尊敬的先生，您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您自己没有鼓舞我们的那种信念，您还要剥夺青年们的这种信念。你们的杂志写

道：“我们确信，俄国青年的典型完全不是革命的，如果从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真诚而热情的争取人民解放的斗士，那么这些斗士也只是沧海一粟，是偶然的例外……”。（见第2期杂志第128页，〈特权阶层出身的革命者〉）按照你们的杂志的看法，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也是您本人的看法，我国青年的典型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一切志向、一切理想都围绕着个人幸福的问题，他们完全浸透了狭隘的个人主义，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不是破坏现存的制度，而是相反，支持和维护现存的制度，原因是这个制度似乎对他们青年人是有利的；按照你们的看法，他们道德上已经堕落，他们的特点是“典型的思想肤浅和感情浅薄”，他们不学无术、举止轻浮等等。您拼凑了整整一份对青年的控诉书，它甚至比阿韦纳里乌斯、斯捷勃尼茨基、皮谢姆斯基和克列斯托夫斯基之流，在第三厅的授意下，从过去到现在所写的任何控诉书还要严厉和尖锐。

当然，我决没有这样的意思，似乎您与这些先生们的主导动机是完全一样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不是的，这些卖身投靠的文人诽谤青年，是为了使青年在社会舆论中名誉扫地；您揭露青年是为了使他们丧失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对自己的革命使命的信念。这些卖身投靠的文人想要使社会厌弃革命青年，而您却想引诱青年放弃他们的革命活动。

这就是您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文人之间的根本区别；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肯定地说，从革命党的利害关系来说，您的激进的革命宣传远比我们的文坛密探们的警察式的反动宣传危害更大。他们的卑劣诽谤不会对我们的青年产生任何消极影响，不能削弱和涣散我们的革命队伍。

而您的揭露却能起到这种作用。这是因为它能破坏大多数青年人对自己的直接进行实际革命活动的能力的信心。您在青年和

他们的这种能力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这堵高墙，用您的话来说，叫做“严格地加强自我锻炼”；只有那些有足够的力量爬过这堵高墙的人，只有那些有足够的耐性、时间和能力顺利通过你们设计的教育考验的人（见第2期杂志第148页，〈特权阶层出身的革命者〉），只有这样的幸运儿才能从事对人民有益的活动。其余的人则都是无用的不劳而食的人，在革命党的队伍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没有进革命圣餐的餐具，不让他们用圣盘进圣餐，这种圣盘，用已故的杜勃罗留波夫的话来说，不应该越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自己不把它推开”。①

可能您会说，那些不愿意经受或者经受不住您的教育考验的人，是他们自己推开了圣盘。啊，不是的，尊敬的先生，不是他们自己推开圣盘，他们贪婪地向它伸出了双手；但为什么您不给圣盘，却塞给他们另一种餐具呢？它无论在外形上还是内容上都一点儿也不惹人喜爱。

当然，从您的观点来看，您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也并不是指责您，只是想把您的宣传的实际后果告诉您，指出它可能给您的革命党的利益所造成的危害。

以上我分析了这种宣传对革命青年所造成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它有四个方面的危害。它之所以是有害的，首先是因为您把青年的认识搞糊涂了，您用和平进步的思想偷换了革命的思想；您自称是革命思想的捍卫者。而实际上您

① 尊敬的先生，我并没有忘记，在您同我的几次个别谈话中，在这个问题上，您对我作了非常重要的让步。您同意我的下述意见：不应该拒绝任何人参加革命活动，无论谁，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而且应该从事革命活动。

多蒙您的好意。但是，很抱歉，在当时我就不相信您的让步是真诚的，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这种让步与我在本文前面所引用的那个条款直接相矛盾，而您认为那是你们纲领中的“不可改变的基本条款”之一。

捍卫的却是和平进步的思想，并且当您攻击所谓人为地煽起革命的企图时，您却因此在我们青年的眼里破坏了整个革命的威信。

其次，它之所以有害，是因为您给青年所指出的那条为革命活动作准备的唯一有益的道路，实际上完全不是唯一的，而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去，青年们离开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暴力革命的目标，与其说是越来越近，不如说是越来越远，他们的努力将不是为了现时革命的胜利，而是为了未来的和平进步的胜利。

第三，您的宣传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不是鼓励和激发青年人直接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而是引诱他们脱离这种革命活动，它向革命者宣传的主要不是这种革命活动的必要性、迫切的必要性，而是“为这种革命活动加强严格锻炼”的必要性。同时您的关于“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劝告，既不符合我们革命青年的社会境况，也不适合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情绪，而且与人民的苦难所赋予每个革命者的神圣责任大相径庭。

第四，它之所以有害，还因为它动摇了青年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对自己直接从事革命活动的能力的信心，对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革命这件事本身的信心。

六

杂志对青年和革命党的态度，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杂志方针的基本性质，决定杂志对一切革命刊物的宣传任务的看法。但是，杂志对于我们革命党的全部利害不仅仅体现在上述这些方面。

我们革命党的机关刊物肩负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它应该激励党积极开展活动，向党阐明开展活动的方式，发挥和捍卫党的纲领，促进党的团结和加强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它应该成为党所

掌握的、与现存制度进行斗争的实际工具和开展革命鼓动的手段。

尊敬的先生，我已向您指出，你们的杂志不符合第一项任务的要求；由于它提出了一些非常特殊的革命活动方式，并把一切其他的方式（如直接的民众鼓动的方式，密谋的方式）都当作无益的甚至有害的方式加以排斥，^①因此它使党陷于分裂，瓦解了党的现有力量，歪曲了党的纲领；它在党内动摇了大家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对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革命这件事的信心；由于它竭力使党相信，人民对革命还缺乏足够的准备等等，因此它就使党减少了甚至丧失了直接去进行暴力革命的热情。

那么，你们的杂志是否至少还符合第二项任务的要求呢？它是否已成为进行实际的革命鼓动的手段呢？

尊敬的先生，您还记得吧，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我们争论得最为激烈，时间也最久。通过这些争论，您和你们的杂志对当前革命宣传任务的观点表露得十分清楚和明确了。您和您的同事们，

^① 在我们个别交谈时，对这个问题您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就是认为，要实现革命，只靠向人民阐明他们的权利和需要是不够的，只靠宣传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直接的鼓动（即直接号召人民进行暴动，直接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政变的密谋。但是，您的这个让步，象一切被迫的让步一样，是不彻底的。是的，虽然您同意我们共同承认进行密谋和民众鼓动的好处和必要性，但您仍然坚信，这两种手段——作为能直接激发革命的手段，——只有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去实现这一变革”（这是你们纲领中的主要条款）的时候，才能实际应用。而我还是用你们的话来说，“只有当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指出革命的时刻，指出俄国人民已作好革命准备的时候”（参见第1期杂志第14页），我们才能有这种权利。在这种指出的时刻到来以前，在人民尚未作好革命准备以前，即当“他们自己还没有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和需要之前”，您认为只有一种方式——即到民间去，只有一种活动——即向人民宣传合理的社会思想——才是可取的和有益的。您把一切其他的方式和活动都看作是，或者从你们的纲领的观点出发，至少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人为地煽起革命的企图，而你们说，这种企图，“在那些明白各种社会大动荡给大多数最贫困的人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的人看来，未必是正确的……”（参见第1期杂志第16页）。——彼·特卡乔夫注

您的知心朋友们，直截了当地向我宣称，“赫尔岑式”的鼓动（即实际的革命鼓动）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不是需要向社会进行鼓动，而是需要向它阐明合理的唯理论的经济思想。

您在自己的纲领中说：“对我们来说（即对你们来说），在当前有两个全人类的目标，两种斗争，一切有思想的人，无论他们是站在进步的一边还是反动的一边，都应当参加这两种斗争……第一是现实的宇宙观反对神学的宇宙观的斗争……第二是劳动反对游手好闲地享受生活福利的斗争，充分的个人平等反对各种形式的垄断的斗争……简单地说，就是争取实现最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斗争”（见第3页）。是的，任何一个人，不仅是有思想的人，而且是正直的人，无论他是站在反动的一边，还是站在进步的一边，当然都应该参加这两种斗争，因为这是一场进步与反动之间的斗争。

请注意，尊敬的先生，这里说的是反动与进步之间的斗争，根本不是反动与革命之间的斗争。因此，一切人，无论是和平进步的朋友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进步的敌人，还是反对和平进步和主张急风暴雨式的进步的人，都应该参加这场斗争。

可见，您举的是这种斗争的旗帜，您也只能举这种斗争的旗帜，您所进行的是争取一般进步的斗争，而不是争取实现革命的斗争。用这面进步的大旗来掩盖各种渐进主义者的形形色色的市侩哲学的谰言，是最容易和最方便不过的；各种色彩的进步派别，从资产阶级自由派到社会革命党人，都可以集合到这面旗帜下来。这样的旗帜对我们不适用；我们需要的是能十分准确、清楚和明确地表达我们的非常准确的、清楚的和明确的愿望和理想——即俄国革命党的愿望和理想的旗帜。因此你们的旗帜不是这个党的旗帜。

尊敬的先生，我并不否认，在这面旗帜下也可以为俄国革命做些有益的工作；但这面旗帜丝毫也不能保证，集合在它周围的战士

都能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工作。他们可以在毫不违背这个旗帜的情况下，做出反对暴力革命，损害革命党的实际利益的事来。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将如何进行他们的斗争。

尊敬的先生，与这个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有两种方法、两种方式（我这里所讲的当然只是指文字的、笔墨的斗争，用笔杆子和书本进行的斗争）。可以在进行斗争时，揭发作为这种制度的基础的一般原则，即经济原则的荒谬、不合理和不公正。也可以在进行斗争时，着重反对那些体现这些原则的具体形式——如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等等形式。换句话说，攻击的重点可以放在一般原则上，也可以放在这些原则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上。从一般原则的观点出发的斗争，多半可以称为学术的、哲学的斗争；从具体后果的观点出发的斗争，总是多半具有实际的、鼓动的性质。

在进行第一种斗争时，经常要遇到抽象原则的问题，要把一些个别的事实抽象成原则，使这些事实失去个别的形态，失去它们生动的具体性。第二种斗争则相反，它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些个别的、单个的现象上，而并不去探求它们的深远原因，只是力图把它们的一切丑恶面貌，完全真实地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由此，那些希望设法影响其同时代人的思想和意识的人比较喜欢第一种斗争方式；而那些企图设法影响其同时代人的实践活动的人，则更愿意选择第二种斗争方式。^①一些人发展具有批判

^① 或许您会对我说，任何能够对一个人的思想和意识产生影响的事物，都会对他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使一个人确信某些理性的道德原则，还并不意味着使他在举止和行动上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使一个人确信一个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借以建立的基本原则的不合理和不公正，也并不意味着使他变成一个革命者。只有极少数的人是“遵照原则”生活的，大多数人的实践活动并不完全受他们的理论世界观的直接制约，甚至往往有这种情形，前者与后者之间发生直接的矛盾。当然，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但是这是事实，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生活在活人当中，而不是生活在

倾向的思想，另一些人则使人产生感性印象。随着这些感性印象——尽管有时是很微小的和瞬息即逝的感性印象——的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对现存制度的总的不满情绪，逐渐产生了要从这个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总的愿望，这种不满情绪和要求解放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比对这个制度的根本缺陷的十分清楚和明确的认识，对斗争具有更强大的推动力。

由于这两种斗争方式的性质不同，就产生了战士们对他们周围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实的不同态度。哲学家战士们，即理论家们只注意那些与现存制度的一般经济原则有密切关系的事实，特别注意那些最明显最突出地反映这些一般原则的事实。鼓动家战士们、即实践家们则相反，他们特别重视那些最刺眼的事实，那些在该社会阶层中所最常见的、使其受痛苦最深的事实，那些表面上最粗暴最丑恶的令人震惊的事实。同时他们毫不关注这些事实与一般原则有什么联系。他们在选择事实时，也仅仅考虑他们活动范围内的人们情况和需要。例如，当他们在工人中间进行活动时，他们就把雇主的剥削和掠夺的事实提到首要的地位，而当他们在有文化的资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时，他们就把压迫他们的政治上专横的事实提到首位，如此等等。

阁下，我觉得，对于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具体要求的评定，我可以到此为止了。继续进行对比大概已无必要，因为最主要的区别已经充分解释清楚了。现在我请问您，您同俄国现存的制度所进行的是哪一种斗争呢？您和你们的杂志认为哪一种斗争是当前最有益和最需要的呢？是第一种斗争，即哲学的斗争，

自己幻想的无形幽灵中间，都不敢否认这个事实。尊敬的先生，我知道哲学家们往往忽视这种事实，他们由于偏爱自己一向研究的学科，常常把知识对人类事业发展的作用，看得比它实际上所能起的作用要大得多。而对哲学家来说，这是很不好的。——彼·特卡乔夫注

还是第二种斗争，即鼓动的斗争呢？

上面我所引用的你们的话，你们的纲领，你们已出版的几本杂志的内容，贯穿在其中的主要精神——所有这一切使我有充分根据来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们的杂志是鼓动斗争的坚决反对者，它只承认一种斗争——即哲学的斗争，从一般原则的观点出发的斗争。你们在自己的纲领中（见第6页）说，对你们来说，社会问题，即作为历史性的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一般经济原则，是首要的问题，因此，你们杂志将特别注意与这些原则有最密切最直接的联系的事实，那些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事实；至于那些只能间接地体现经济原则的事实，你们将不予以多大关注，把它们放到次要的地位。

政治问题，即那个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压抑的政治问题，专制制度的疯狂肆虐，残暴的政府的令人气愤的专横跋扈，我们的普遍的毫无法制，我们的可耻的奴隶制度——这一切对你们来说都是次要的问题。你们太忙于观察罪恶的根源了，以致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但是，罪恶的根源在俄国和在整个西欧都是相同的，只是在西欧，由于经济生活发展的程度更高，它们就以更激烈更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对其他生活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也更为显而易见。

因此，为了更好地说明一般经济原则的虚伪性和不公正，到欧洲去寻找事例要比在俄国寻找更适用得多。要说明这类问题，欧洲的生活能够提供的材料，比我们的生活所能提供的材料，如果不是更丰富的话，那也至少是更为完善的。您懂得这一点，所以你们的杂志对西欧工人运动的注意，要比对俄国国内生活的注意更为密切；在你们的杂志上，有关全欧问题所占的篇幅与专门有关俄国问题所占的篇幅相比，如果不是更多的话，那也至少是同样多的。

尊敬的先生，这决不是纯粹偶然的，这是你们杂志所持的基本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如果你们想要在不改变这种观点的情况下，改变你们杂志的内容，如果你们注意俄国多于欧洲，注意俄国的工人多于例如英国的、德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那么你们的行为才是非常不合逻辑、不切实际和不适当的。

请您不要以为我所说的这些话是对你们杂志的指责。不是的，我丝毫也不否定科学斗争的好处，不否定传播和阐明合理的社会思想的好处，不否定科学地批判那些构成历史上形成的人类共同生活方式基础的原则的好处；我只想指出，虽然这种“传播和阐明”和这种“批判”本身都是好事，但从我们革命党的真正需要和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好处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还可能有坏处。

对于这一点，您当然很难理解。由于您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有发生革命的可能，由于您把革命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推迟到它，即暴力革命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渺茫的未来，所以您就认为，现在应该逐渐地静悄悄地进行革命的准备，要既不急躁，也不激动地进行，要具有真正哲学家式的冷静和坚忍不拔的耐性；因此，在通向革命的一切道路中，您选择的不是最短的道路，而是一条最舒服的道路。至于这条舒服的道路是最长的，沿着这条道路走，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目的，您就不管了。这也并没有使您担忧，那有什么要紧呢！您今后的时间多得很！您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认为需要等待“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指出革命的时刻”，需要等到“知识之光和对自己的权利和需要的认识”冲破人民的无知这堵不能穿透的厚墙。那么好吧，您等待吧，去发您的空洞议论吧！

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

尊敬的先生，在我们的血管里，革命者的血管里，流的不是市侩哲学家身上的血。当我们想到——而我们日日夜夜所想的都是

这些，——我们祖国的可耻的无法制、她的那些凶残的暴君们、残暴的刽子手们，想到他们使我们祖国遭受的苦难、羞耻和屈辱，当我们望着这个人民殉难的峨尔峨他^①时，——而我们不能闭眼不看这种情景，当我们看到眼前这个不幸的人民，他满身鲜血，头戴荆冠，被钉在奴隶的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保持合乎哲学家身分的冷静。

我们不想谈论那些导致人民被钉上十字架的深远原因，我们也不愿象对强盗那样地对他说：“拯救别人的人，你救救自己吧，从十字架上挣脱出来吧！”我们不想等待，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殉难者“认识到和明确地理解到”，为什么吊在十字架上不舒服，为什么荆棘会刺痛人，钉住他的手脚的钉子是用什么做成的，为什么它们会给他带来如此深重的苦难。不，我们只是要不顾一切地、尽快地推倒十字架，把受难者从它上面解救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革命党认为自己主要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不是一般地为遥远的将来的革命进行准备，而是要在当前尽可能快的时间内实现革命的原因。革命党的机关刊物就应该是宣传这种思想的刊物；除此以外，它还应该成为直接促进暴力革命的尽速到来的一种实际手段。换句话说，它应当关注的主要问题不是对现制度的根本缺陷作理论上的阐述和哲学上的解释，而是要激发人们对它的憎恶和仇恨，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积聚和散布对它的不满情绪，对它的憎恨和强烈的变革愿望。

因此，虽然革命党并不是不要理论的、学术的斗争，但它要求把实际的鼓动斗争放在首位。它这样要求，不仅是由于革命的刻不容缓的迫切性，而且还出于其他一些并非不重要的考虑。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少数知识分子的弱点，主要不在于他们对作为我们生

① 基督遇难之地，在耶路撒冷附近。——编者注

活的基本原则的一般经济原则的不合理性缺乏明确的认识，而在于他们缺乏能推动他们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的有力的感情上的动因。因此，发展这种动因（这正是革命鼓动的一个主要任务），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充实革命的干部队伍是极为必要的。

至于谈到我们的大多数所谓受过教育的人，由于理智上的动因对他们完全起不了作用，所以直接去影响他们的感情上的动因是最为有效的。由于他们在智力上的极端幼稚和无知，他们还达不到能够认识罪恶根源的水平，还没有那种对他们周围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

您让这些知识贫乏、智力上不成熟的人去看清楚一切罪恶的最深远最根本的原因，只会得到一个结果：您让他们去容忍直接压迫他们的罪恶，使他们丧失唯一能推动他们去斗争的动力，却没有用任何别的动力去填补。把现实中的压迫他们的丑恶事实从它的具体实际中抽象出来，升华为纯粹的思想，分解成若干最简单的基本因素，概括成一些一般的原则，这些事实对他们来说，已丧失了激励作用。他们开始对它们漠不关心，他们说：“这有什么可焦急的：这些丑恶的现象不过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根本原因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丑恶现象的存在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有那么些傻瓜却为此而愤慨。”

他们不会成为这样的傻瓜；他们将努力达到哲学上的斯多葛主义，这种哲学派别心安理得地拜倒在既存的事实面前，只是因为这种事实是在它之前产生的一系列事实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他们不会超过这个高度。他们对周围现象的一般原则的不公正和虚伪性的理解和认识，不可能对他们产生那么有力的影响，以致促使他们为了思想而起来反对这些现象，推动他们去与这些原则本身进行斗争。

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理解和认识还不够；要做到这一点，还

需要养成某种习惯，即经常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自己的思想的习惯，使自己的实际活动服从理论世界观的习惯，始终在各方面主要遵循理智的动因的习惯。但是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的只有那些在智力发展和道德修养上都达到很高水平的人，而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只有我们的所谓受过教育的特权阶层中间的极少数人。

尊敬的先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面说过并且还要再次重复说，您的哲学战争，你们的杂志所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学术的宣传——这种战争，这种宣传从革命党的利益的观点来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关于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说了。我已尽力明白和准确地表明了我的看法，除了那些不愿意理解我的人以外，谁都会明白我的意思。而我不认为，也不愿意这样想，尊敬的先生，正是您会不愿意理解我。

七

在我谈了上述的一切之后，我觉得我有某些根据可以断言，从俄国革命党的迫切利益的观点来看，党的革命宣传的任务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对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特权阶层的人以及对人民，革命宣传的目的最主要是起鼓动作用。它应当在社会上激发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和憎恨的情绪，应当把人们的注意力，主要是吸引到那些最能引起和激化这种情绪的事实上来。在选择这些事实时，它应该考虑的主要不是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现制度的一般原则，而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使这个或那个阶层的人们遭受实际的可以感觉到的苦难。

2. 对革命青年，对自己的党，革命宣传的目的主要是起组织的作用。它应该使他们相信，直接的实际革命活动是绝对必须的，它应当向他们解释清楚，这种活动获得成功的主要条件是把他们

的革命力量严密地组织起来，把一切个人的单独的尝试合成一个总的有纪律的协调一致的整体行动。我们的革命实践已创造了不少革命活动的方式，政变密谋，民众宣传（即你们的杂志所说的“提高人民对他们的权利和需要的认识”），直接的民众鼓动（即直接鼓动人民起来暴动）。现在不是争论这些活动中哪种活动更有效、哪种方式更合适的时候。

对于尽快地实现人民革命来说，所有这三种方式都同样是合适的，所有这三种活动都同样是必须的。^①让每个人自己选择他觉得最喜欢的方式，选择他最能胜任的活动；如果谁感到他能同时从事这三方面的活动，那就让他去干吧。这样对他更好。而谁感到这样不行，那他的革命活动就应当限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用不着勉强自己，也不用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预先的自我提高和重新教育等等上面……

现在哪有功夫来长时间地打点行装，哪有时间无休止地作启程准备，——就让每个人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快上路吧。做什么？这已不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了。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谁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谁会怎么干就怎么干。

^① 要证明这个论点的绝对正确，并不很难，这三种革命活动中的任何一种，就其单独来说，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能导致人民革命的尽快实现。只有同时采用这三种方式，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实际上，尊敬的先生，如果按照您的劝告，我们的活动只限于去提高人民的认识，提高他们对自己的权利和需要的认识，那么我们就永远也盼不到革命的到来。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活动只限于直接鼓动进行暴动，那么，虽然我们会有极大的可能使暴动取得成功，但是一旦暴动起来以后，它是否会取得某些可靠的成果，它是否能不被很快地镇压下去，它是否能发展成一场真正的革命，对于这一切我们没有任何的保证。

最后，如果我们的活动仅限于进行政变密谋，那么，虽然借助于这种手段实现政变是非常容易和方便的，但是这种变革只是政府性质的，而不是人民性质的；它没有深入到人民生活深处，它不能唤起和发动社会的下层人民，它只能在社会的表面上引起轰动，简言之，这完全不是人民革命。——彼·特卡乔夫注

在合理地组织起来以后，任何个人的尝试，任何单独的努力，都不会是徒劳的。因此，关于组织起来的问题是向我们的革命青年进行革命宣传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极端重要，所以革命宣传就不能过多地注意那些只与将来有关的，而与当前的实际革命活动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但却可能给我们那些革命青年小组带来纷争和不和的问题。

我这里指的是在革命完成了它的破坏性的使命以后，在将来建立一个尽可能美好的制度问题和实现这个制度的手段问题。目前我们应当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现在上来；我们没有时间也顾不上去展望将来，观赏它的美景，借以消遣。

我们只知道，无论将来是什么样子，它总不会比现在更坏。当一个人正要被掐死时，占据他脑子的唯一想法就是，希望尽快地从扼杀他的凶手那里挣脱出来；至于他以后要干什么，要穿什么衣服，要吃什么东西等等——这一切他是不会去想的。我们现在正处于同样的境地：我们正要被掐死；从掐住我们脖子的强盗的手里挣脱出来——这就是我们应当集中精力来对付的唯一的迫切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有关将来的问题就变得不大引人注目了，退居到次要地位了。我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完全不顾这些问题，这样说也是荒谬的。

但是我们不应夸大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以致使它们变成分隔现在的革命党的一个壁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一切使我们分离的东西，一切使我们产生不和和争吵的东西——这都会加强我们的共同敌人的力量，使我们的革命活动削弱和瘫痪。革命党是一个行动的党，而不是一个空谈的党，因此在它的旗帜上只能写上这样的誓言：与政府进行斗争，与现存制度进行斗争，斗争到最后一滴血，斗争到最后一息。

只有这个旗帜才能团结我们的党，而不分裂我们的党，因此，

也只有这个旗帜才符合我们党的实际的、真正的利益。

八

尊敬的先生，这就是我对革命宣传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应当是什么样的看法，当然我这里只能概括地讲，不能详细地谈，这就是革命宣传要发挥有效作用所应该举起的旗帜。

不知您现在是否已经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在你们的杂志社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而要力求取得一个独立编辑的权利的原因？我希望您现在不要再拿什么个人的动机、自尊心、虚荣心等等来解释我的行动。但是我所希望的还不只是这一点。如果纯粹由于个人的问题，我是决不会在您百忙中那么久地来打扰您，浪费您那么多的精力的。

我给您写这封信，除了纯粹的个人目的以外，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我想向你们解释清楚，在我们一些最激进最坚定的革命小组中的那些多半可以称为行动派的小组的迫切需要、愿望和要求。我想向你们说明，他们对你们的杂志之所以持审慎和冷淡态度的真正原因，你们常常爱用仿佛是敌视你们的党派的某些阴谋来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我能够哪怕部分地达到这个目的，我就不会因为占用您这么多的宝贵时间而责备自己；我斗胆地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您也是不会责备我的。但是对于下述情况，您就可能责怪我，我预先请您大度包涵，由于我在这封信中所谈到的问题，对于阐明我们的革命纲领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以，虽然我非常愿意，但还是常常不能保持冷静和沉着，不能保持哲学家的那种镇静态度，这一点您在类似的场合大概是能够做到的。由于这个缘故，我有时对你们杂志的方针的抨击就过分尖锐。请您不要因此严厉责怪我，对于我认为不仅无益而且甚至有害的一切事物，对于我认为与俄国革

命党的利益不仅不符合而且甚至相违背的一切事物，我不能漠不关心，不能无动于衷。

最后，我向您，不是作为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而是作为个人表示：恳请接受我对您的友好情谊，我是永远愿意为您效劳的。

彼得·特卡乔夫

译自《特卡乔夫选集》1976年
莫斯科版第2卷第7—42页。

敲起警钟！^①

彼·尼·特卡乔夫

当警钟在火灾的反光中响起的时候，人人都离开自己的屋子，匆忙奔向火灾现场去抢救别人的财产和生命；人类利益一致的抽象的思想，在这里表现出它的全部现实的力量和朴素的性质。人人都觉得，只有抢救出别人的财产，才能同时抢救出自己的财产。私人的仇恨，日常琐屑的争执——全都由于共同的危险而被置之度外。仇敌们站在一起，共同行动。一个人身上的渺小的、肮脏的一切都退居次要地位，他的最高尚、最优美的动机则突出出来。因此，只有无耻的胆小鬼，只有软弱的利己主义者才会对警钟的响声无动于衷。

因此，警钟敲响的时刻通常总是人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尽

① 这是在日内瓦出版的《警钟》杂志1875年第1期的社论。——编者注

管这是人民遭受最大的灾祸的时刻。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这样的时刻。

敲起警钟的时候到了！瞧吧！“经济进步”的火焰已经燃烧到我国人民生活的根基了。在它的影响下，我国村社生活的旧形式正在遭到破坏，“村社原则”本身正在遭到毁灭，这个原则本来应当成为我们大家都梦寐以求的未来社会制度的基石。

在旧形式行将化为灰烬的废墟上，新的形式——资产阶级生活的形式正在诞生，富农阶级和剥削行为正在发展，个人主义、经济无政府状态、冷酷无情而又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原则正在统治一切。

每天给我们带来新的敌人，制造和我们敌对的新的社会因素。

火焰也正在一步一步地烧向我国的国家形式。现在这些形式是死气沉沉的，没有生命力的。经济进步将唤起它们的生命，激发它们的新精神，赋予它们以目前它们所没有的力量和稳固性。

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虚构，是一个在人民生活中没有任何根基的神话。它受到大家的憎恨，它引起所有的人乃至自己的奴仆们的隐忍的痛恨以及奴隶的恐惧同仆役的蔑视混合在一起的感情。人们害怕它，因为它有物质力量；但是既然它正在丧失这种力量，——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起来保卫它。

但在明天，它的今天的全部敌人都会起来保卫它，明天它将代表他们的利益，富农阶级和剥削行为的利益，私有财产的利益，工商业的利益，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利益。

今天它是绝顶荒谬的和荒谬绝顶的。

明天它会成为立宪温和的和审慎理智的。

要赶快啊！

敲起警钟！敲起警钟！

今天我们是一股力量。

你们看到，国家由于失去了控制我们的一切希望，因此号召资产阶级社会 and 知识界来帮助自己。

但是，很可惜！它的盟友拒绝为它服务，至少是拒绝白白地为它服务；他们通过自己的政论家的嘴对它说：“我们自己也恨你，如果你要我们为你服务，那就让我们分享你的一切权利；否则我们宁愿跟着革命的空想家走。

他们是空想家，——我们不怕他们。只要我们对付得了你，我们就对付得了他们！”

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他们的知识分子除极少数外（这种例外被认为是耻辱和卑鄙），——都坚决支持我们。

在专制的、粗暴的、野蛮的专横压迫下痛苦已极、备受屈辱、被掠夺一空、赤贫如洗和被完全剥夺了一切人权的人民，正在倾听我们，同情我们，如果不是由于他们在周围的生活条件影响下历史地养成的奴隶习惯，如果不是由于对“最高当局”丧魂落魄的恐惧，他们就会公开地起来反抗自己的剥削者和掠夺者。

今天我们的敌人是软弱的、不团结的、分散的。反对我们的只有政府及其官吏和士兵。但是这些官吏和士兵只不过是一些麻木不仁的机器，一小撮独裁者手里的没有理性的、盲目的和毫无知觉的工具。你们要消灭他们，你们面临的不是有纪律有组织的生气勃勃的敌军，而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无头死尸。因此今天对我们来说唯一有力量的和危险的敌人就只有这一小撮独裁者。

但是我们的整个社会也是敌视这一小撮独裁者的；不管社会的组成部分多么不同，它早已由于现存秩序和对人身安全缺乏信心而感到苦恼不堪；胡作非为和盲目专横正在使最能忍耐的人失去耐性。

不管你们到哪里,你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同一句话:“不,不能这样长此下去了!应当结束它了!再没有忍耐下去的力量了!”

这就是今天。

但明天又会怎样呢?……

你们不要过于指望敌人的愚蠢。

要利用时机。这样的时机在历史上不是经常有的。错过时机,就意味着自动长期推迟,也许是永远推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你们不要再拖延了!

敲起警钟! 敲起警钟!

你们总是说**准备, 准备**,这已经够了!

准备革命——这根本不是革命家的事。^①它正在由剥削者、资本家、地主、神甫、警察、官吏、保守派、自由派、进步党人等等准备着。

革命家只应当以一定的方式配合利用那些业已成熟的、现成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由历史造成的,是由人民的经济生活培育的,这些因素由于“反动派”的迟钝、政府及其宪兵和军队的无知,最后,由于“世界进步”园丁的辛劳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科学而正在壮大和发展起来。

革命家不是准备革命,而是干革命。

干革命吧!赶快干革命吧!任何犹豫不决、任何拖延耽搁都是犯罪!

敲起警钟! 敲起警钟!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86—288页。

① 特卡乔夫激烈反对《前进》杂志的纲领,把拉甫罗夫派叫做反动派革命家。——编者注

能实际达到的近期革命目标 应当是什么？^①（摘录）

彼·尼·特卡乔夫

我们承认无政府状态（或者确切些说，承认这个词通常所指的那种状态），但只是把它作为一种遥远的未来的美好“理想”。然而我们断言，无政府状态一词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一未来的理想，因为它指出的只是这一理想的一个方面，即未来的社会制度的一个非本质的方面。

无政府状态就是无政权状态。但是无政权状态无非是更加根本的、更加深刻的原因——平等所引起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后果之一。

政权不是象无政府主义者断言的那样，是现存的社会灾难的原因，而只是它的必然结果。

一切社会灾难，一切社会欺诈，完全是由人们的不平等——体力、智力、经济、政治以及种种其他的不平等造成的。

因此，当政权还存在着的时候，人类关系的不平等不论在什么范围里还会继续存在。如果不预先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确立绝对的平等，无政府状态就是不可能的，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它在实际上不可能了）。因此，未来社会的最本质的、最突出的特点就应当不是用无政府状态一词，而是用平等一词予以表达。平

① 本文曾刊载在《警钟》杂志第1期上，发表时未署名。——编者注

等必须以无政府状态为前提，无政府状态则必须以自由为前提；但是，平等、无政府状态、自由——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同一个概念，一个词即博爱这个词结合在一起的。哪里有博爱，哪里就有平等；哪里有平等，哪里也就有无政府状态，哪里也就有自由。

由此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如果不先确立博爱和平等，就不可能确立无政府状态。

但是，为了确立博爱和平等，首先就应当改变现有的社会生活条件，消灭一切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平等、仇恨、嫉妒和竞争的设施，并给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与此相反的因素的设施奠定基础；其次应当改变人的本性，对他进行再教育。当然，这一伟大的任务只能由懂得它的意义和真诚地希望解决它的人，也就是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发达的少数人来实现。这少数人由于自己在智力和道德方面的较高的发展水平而始终拥有和理应拥有在智力和道德方面管辖大多数人的权力。

因此，革命家——这少数人，体现了社会优秀的智力和道德力量的革命家，——只要始终是革命家，就必须拥有而且不能不拥有权力。

这个权力在革命前具有纯粹道德的，可以说是精神的性质，因此它在一一切都建立在粗暴的物质力量的基础上、一切都听命于贪得无厌、自私自利、掠夺成性的利己主义打算的那种制度进行斗争时是完全软弱无力的。革命家懂得这一点并力图通过暴力变革把自己的智力和道德力量变为物质力量。在这种力量变化中也就包含着一切真正的革命的主要本质。孤立于物质力量之外的智力只能创造所谓的和平的进步。另一方面，不受智力领导和不遵守智力纪律的对现存制度的任何攻击只能引起混乱的风潮——无意义、无目的的和归根到底总是反动的运动。

但是由于在当前的社会里，特别是在俄国，物质力量是集中在

国家政权手里的，因此真正的革命——道德力量真正变为物质力量——只有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才能完成，这就是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换句话说，革命的最近的、直接的目标应当不是别的，而只能是掌握政权和把当前的保守的国家变成革命的国家。

否认这一条件的不可争辩性，否认任何革命的这一最近的目标，就意味着或者是不懂得革命的本质，或者是有意识地力图阻止革命的实现。

而我们所谓的国外的革命报刊^①却始终一贯地带着自己的反革命观点进行活动，断言革命家不要为了把国家政权即物质力量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奔走，而要为了破坏这种政权、为了在实现变革以后仍然象他们在革命前即象他们在目前那样处于软弱无力和手无寸铁的那种地位而奔走。

这些报刊不希望真正的革命。它们向往的或者是和平的进步，或者是无秩序的、混乱的因而也是无目的的骚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的理想不超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并且按其本质来说无疑是保守的，因为它们的无政府状态的说教是完全适合它们自己的。

的确，到底什么是没有事先实现博爱和平等思想的无政府状态呢？这就是人和人的凶恶的斗争，这就是互相矛盾的利益的一团混乱，这就是个人主义的统治，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的王国，一言以蔽之，这正是那种给所谓的和平的进步提供内容的东西，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的东西。

因此，革命的近期目标应当是夺取政权，是建立革命的国家。但是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必要条件还不是革命。这只是革命的前

^① “国外的革命报刊”不仅是指彼·拉甫罗夫的杂志，而且也指巴枯宁主义者的刊物。——编者注

奏。革命是由革命的国家来实现的，这个革命的国家一方面同社会上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并消灭他们，废除妨碍确立平等和博爱的一切设施，另一方面则建立有利于它们的发展的设施。

由此可见，革命的国家的活动应当是双重的，革命破坏活动和革命建设活动。

前一项活动的本质是斗争，因而也就是暴力。只有在把集中、严格的纪律、速度、坚定性和行动一致这样一些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斗争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任何让步，任何动摇，任何妥协、缺乏统一领导、斗争力量分散，都会削弱它们的精力，麻痹它们的活动，使斗争丧失胜利的一切机会。

革命建设活动虽然也应当和破坏活动携手并进，但是它按照自己的基本性质来说应当依靠同它相反的原则。如果前一项活动主要是依靠物质力量，那么后一项活动主要是依靠道德力量，前一项活动首先指的是速度和行动一致，后一项活动首先指的是正在发生的转变的稳固性和便于推行。前一项活动由暴力来实现，后一项活动由信念来实现；一项活动的ultimo ratio^①是胜利，另一项活动的ultimo ratio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智慧。

革命的国家这两种职能应当加以严格区分，虽然它在同社会上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斗争具有百折不挠的特点，但是它的立宪活动却相反，应当具有伸缩性、善于适应人民需要和人民发展的当前水平的特点。为了不脱离这个水平，不陷入空想，为了赋予改革以生命力，它应当用人民代表制即人民杜马的机构来围绕自己，并且用自己的意志来批准它们的改革活动。同时它应当不断努力扩大人民的发展，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这里在它面前展

① 拉丁文：最后的论据。——编者注

开了进行宣传——我们的资产阶级假革命家所梦想的那种宣传——的广阔的活动天地。

与此同时我们承认，社会革命没有宣传就不能实现，就不能存在下去。但是我们断言，与它相反，只有当物质力量，只有当政权掌握在革命政党手里的时候，宣传才会发生作用和符合目的，也才会带来预期的效果。

由此可见，不是它应当先于暴力变革，而相反，暴力变革应当先于它而发生。

巩固自己的政权以后，革命的国家将依靠人民杜马和广泛利用宣传，通过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司法关系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而实现社会革命，这些改革的一般特点是：一、逐渐把建立在暂时的私有土地的原则基础上的当前的农民村社改造成为建立在共同使用生产工具和共同劳动的原则基础上的公社；二、逐渐剥夺私人占有的生产工具并把它们转归共同使用；三、逐渐实行这样一些社会设施，这些设施会消除产品交换过程中必需有中介的必要性，并且把交换原则本身——资产阶级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来有往的公正原则，变为兄弟友爱和团结的原则；四、通过以爱情、平等、博爱的精神对所有人进行一视同仁的完整的社会义务教育制，来逐渐消除人们在体力、智力和精神方面的不平等；五、逐渐消灭建立在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子女受奴役和男子自私专横的原则基础上的现存的家庭；六、发展社会自治并逐渐削弱和废除国家政权的中央职能。

照我们看来，革命的国家的活动纲领的最一般的特点应当是这样的。详尽的叙述在这里不是地方。但是我们的杂志认为自己的任务之一是进一步发挥和阐明这个纲领。我们认为，这种发挥和阐明在当前是极其必要的。

革命家的事业不是以暴力变革结束，而是相反，以暴力变革开

始。夺取政权以后，他们应当善于保持它和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为此他们应当首先有一个鲜明的、周密的、严格的、明确的、贯彻始终的纲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纲领，他们就将摸索着行动，陷入不断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并将由于自己的不能始终如一而毁掉自己。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89—293页。

为什么我们要办报（《工作者报》）^①

俄国出版的各种报纸和书籍很多。每天都有大量的报纸和书籍从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发送到俄国的四面八方。

书报究竟说些什么呢！？它们是为谁而出版的呢？

在俄国，也象在其他国家一样，人们被划分成两个等级：地主、商人和官吏是依靠他人劳动过活的等级，农民和城市工作者是劳动者等级。

地主、商人和官吏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而农民和城市工作

① 这篇声明载于无政府主义者1875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作者报》创刊号。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巴·阿克雪里罗得、尼·茹柯夫斯基、德·克列维兹、捷·拉墨、瓦·切尔克佐夫、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尼·莫罗佐夫、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米·巴枯宁。报纸共出十四号：最后一号为第14—15号，出版时间是1876年1—2月。后来，经过大约两年的中断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又出版《村社》杂志。——编者注

者却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俄国有句谚语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人民想出这句谚语，就道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饱腹者和饥饿者之间是不可能相好的，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饱腹者坐享富贵，饥饿者死路一条。

谁的手中掌握了财富，谁也就能掌管各种事务。

土地、工厂、矿山、作坊、铁路、船舶，总而言之，一切人民的财富都操在饱腹者手里，他们还掌握了全部的权力，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官职均由他们担任。

沙皇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是俄国土地上的头号大地主。

一切法令由沙皇颁布，而监督沙皇法令执行的是他的大臣们，一个大臣掌管税收；另一个掌管司法；第三个掌管军事；第四个掌管教育；第五个掌管警察；第六个掌管交通；第七个掌管邮电；第八个掌管同各国首脑之间的关系。每个大臣都有他们自己的下属：税收官、法官、将军及其他各级军官、检察长、省长、警察局长、工程师、邮政局长，等等不胜枚举。

沙皇、大臣们和所有的官吏组成为政府。大臣和官吏全是地主老爷或商人出身。而主宰一切的就是沙皇——头号大地主。

可见，一切法令是为维护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一大帮官吏是执行这些法令的，而执行地主的法令便意味着剥夺工作者，使他们战战兢兢，唯命是从，违者一律毫不留情地予以惩治。

其他一切国家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皇帝要想打仗，便宣战，老百姓就象牛羊一般被赶到屠宰场任人宰割；而皇帝要想媾和，就缔结和约。

我们俄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简单：沙皇亲自向所有的大臣们下达圣旨，大臣们秉承旨意去办，人民遵照执行。在其他国家，甚至象德国或者意大利，皇帝之下设有杜马，那里称为议院。议院的议员

们都是财主老爷和商人派来的人，在某些国家里，所有成年人都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表面上看来，似乎这种情况要比我国好些，实际上却同样糟糕透顶。当选的大人先生们向皇帝进谏，谈论战争，议订赋税，但他们都是想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结果，当选的大人先生们的一切空谈对于人民没有丝毫益处。

所有这一切总起来就是所谓的政治。国内镇压人民，也就是实行对内政策，依靠战争蹂躏、破坏和掠夺邻国，也就是实行对外政策。

俄国出版的一切报纸，都是为饱食者办事的，都是为着沙皇、地主、商人、官吏们出版的。这些报纸谈的都是沙皇下达什么圣旨，哪里在进行战争，交易所里商人进行着哪些交易，至于工人的需要则片言只字也不提。所以，工人并不去读那些老爷们的报纸，他们知道，饥饿者有自己的事业。

工人们应当好好想一想：喂得脑满肠肥的人为什么和怎样能够把人民的财富占为己有；应当想一想他们自己怎样才能从穷困的处境中摆脱出来。为什么俄国竟然连一家致力于这一事业的报纸也没有呢？难道整个俄国就没有人珍视劳动人民的事业吗？这不可能，那样的人是有的，不过，沙皇、地主和商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在俄国有为工人说话的出版物。

饱腹者是不愿让饥饿者思考他们自身的事业的；饱腹者是不愿让饥饿者相互商量他们自身的事业的。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不容许俄国哪怕有一张报纸为受压榨的工人说话的缘故。显然，猫知道它偷吃的是谁家的肉，——饱食者知道，如果饥饿者真要奋起从事自己的事业，那他们就会大难临头。

现在，人人都会明白，我们为谁而出报。我们愿尽自己的力量和可能向俄国工人介绍其他国家工人的生活状况及其所进行的事业；我们还愿介绍其他国家的工作者怎样看待他们自己的痛苦处

境，并且想通过哪些手段从中摆脱出来。我们的报纸是为着俄国的工作者而报道的，所以定名为《工作者报》。

大家知道，俄国的工作者有农村的和城市的区别，在农村的是农民，在城市的就是所有的工人。

俄国的幅员那么辽阔广大，俄国的工作者们是很难相互了解彼此的需要的；每一个工作者所了解的，只是他所在的一个角落，他所在的一个村庄、一个县，至多也就是一个省罢了，而沙皇所管辖的总共有七十六个省，十五个区和六个直辖市行政区。工作者遍布全俄各地，居住分散。这样，由于不了解全国，由于往往彼此之间不了解，便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工作者们有事不能共商，不能坚决地相互声援，不仅在一个劳动组合是这样，在一个村庄或城市，在全国都是这样。既然大家有着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敌人，就应当携起手来，同心同德，起来自卫，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如果彼此隔绝，村社与村社互不了解，农民对自己的城市工人兄弟的苦难状况没有任何体会，那怎能同心同德呢？怎能串通联系呢？怎能做一番事业呢？那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喂得脑满肠肥的大人先生们，如果说他们之间经常存在意见分歧的话，那也不过是在琐事上的意见分歧，而在政治上，他们却是相互支持的；他们著书立说，他们手中有报纸，通过报纸报道，他们就能一目了然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什么地方买卖的行情怎样，哪里雇佣工作者的工钱是多少。

同样，工人也应了解自己的事业。

工人的事业是什么呢？

农村中被地主剥夺一空的工作者即农民应考虑，怎样才能从老爷的压榨下解放出来，并把历代沙皇赐给侍从们的全部土地归于村社。现在的沙皇只把很少一部分土地还给了农民，并强令他们付出赎金。要知道，是他们从农民手里夺走了土地，而却要农民

为自己的财产给这些强盗们付出赎金，这就等于有人从另一个人那里抢走了譬如说一顶帽子，然后再把那顶帽子卖给他。

别人要干这种事，就会被带到警察局，受到惩治，而政府却什么骗人的勾当都干得出来，沙皇则俨然以“解放者”自居。事情很明白，农民并没有由于沙皇的旨意而减轻负担，他们渴望把全部土地从地主那里夺回来归己，任何赎金也不付，并且象驱逐盗贼一样把地主从农村驱逐出去。让他们都趁早滚开吧！让他们都去干活吧，不然，他们就会饿死。

城市里的工人也有他们的地主和贵族老爷，不论是打骂或者盘剥都是同农村的地主一模一样。

城里人是在作坊、工厂里做工，作坊主、工厂主、承包主都跟地主一样。

城市工厂里的工作者一无所有，他们成天为主人做工，挣的工钱极少，主人大发横财，而工人却连肚子也填不饱。他们怎么办呢？事情很简单。工厂主怎样把工厂开办起来的呢？是他们自己建造起来的吗？不是。一切作坊、工厂都是靠工人的钱开办的。在那里，做工的都是由于缺少土地而离乡背井的农民子女。所以，应当象农民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回交归村社那样，工人也应该把作坊、工厂夺回来交归工人劳动组合，而请地主、厂主们全都趁早滚开，让他们都去干活，因为谁也不愿再养活这帮寄生虫了。

这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城市工作者所向往的。

无论种田人也好，城市的工作者也好，应当说，有着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愿望。然而，光有一致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得有智慧，首先应当相互了解，村社与村社之间有事要相商，全体农民和城市工人之间有事要相商，否则，饥饿者将一事无成，否则，饱食者还要依靠剥削他们的劳动继续大发横财。

在西方，在德国、英国、法国，工作者们是明白这一事业的。他

们那里有许多只为工人办事的报纸。它们报道的，是何处的工人生活得怎样，何方的工人应当做什么。《工作者报》也将报道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在俄国一定会有许多人向我们提供有关农民和城市工人的各种消息，我们的报纸可能会使俄国的工人互相接近，互相商量如何来实现全体俄国工作者的意志。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94—297页。

赋税在增加，工作却没有！^①（摘录）

去年，奥伦堡、乌拉尔、萨马拉和萨拉托夫省的人民遭受了饥荒，顿河流域、赫尔松省和敖德萨一带的人民遭受了饥荒，卡卢加省和喀山省的人民也遭受了饥荒。

艰难而又饥饿的一年已经熬过去了，新的一年到来了，它将带给人们什么呢？

那些只看到自己鼻子底下东西的容易轻信的人，大概会祈祷说：“谢天谢地，艰难的一年、饥饿的一年总算熬过来了！但愿新年好！但愿新年幸福！”

新的一年确实来到了，它确实带来了幸福。这幸福是带给了谁呢？这是带给了那些在去年度过了幸福的一年、快乐的一年的人们。

① 本文原载在《工作者报》1875年2月第2号上。——编者注

去年，沙皇、贵族老爷、商人纵情地吃喝玩乐。对于他们来说，过去的一年是快乐的一年、幸福的一年，他们将以狂宴和纵饮迎接新的一年。饱食者们都知道，今年这一年对于他们仍然是幸福的一年、快乐的一年。

可是，对于工作者来说，去年一年却是饥饿的一年。

新的一年将是怎样呢？

从阿穆尔河到普鲁士和奥地利，从黑海到白海，俄国的农民到处遭到破产。村村的农夫过的是吃不饱的生活，城市工人的日子更糟。

对于工人来说，今年仍然是一个艰苦的年头啊！

掌管国库的财政大臣向沙皇呈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今年的支出将达五亿五千六百一十万零五千一百一十卢布，而收入应是五亿五千九百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九十三卢布；因此，1875年的收入应当比支出多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七百八十三卢布。同时，为使核算准确无误，财政大臣需要在下列项目下筹集多出的那部分：

1. 人头税、土地税的收入将增加二千一百五十万零七千八百二十一卢布。

2. 代役租的各项收入将增加十万零七千三百六十六卢布。

3. 印花税和手续费的收入将增加一百六十八万九千卢布。

4. 酒税收入将增加七百零八万六千八百卢布。

农夫要从去年荒年的歉收中恢复元气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况且他们还要更多地向沙皇和饱食者们交纳税赋，还需要拿出更多的钱供他们过寄生虫的生活。

财政大臣呈交报告后，沙皇立即作了批示：“照办”。

那就是要照办了！

怎么可能不照办呢？劳动者受到压制而又不能同心协力，而散沙一般是不能反对沙皇的意志的。还不是沙皇需要什么，农夫就得向他进贡什么。沙皇和一切饱食者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为了更好地维持秩序，他们设立了专门的县警察局，如果它还无济于事，还有二百万军队，要反对这种力量，不串联商量是不行的。

俄国应交纳人头税的农民将近一千八百五十万人，平均每人应交纳二卢布五十戈比至六卢布。应交纳赎金的农民有四百一十八万五千人，须交二千六百六十二万六千卢布，合每人应交六卢布三十五戈比。一个农民一俄亩土地的赎金应交纳一卢布二十六戈比至二卢布四十七戈比。

对于那些不好好施肥便颗粒不收而又无肥可施的土地，农民往往也得交纳赎金。

我们且拿土地少而又需施肥的基辅省为例，每块农民份地为一个农民提供的收入是四十四卢布，而家庭吃穿用的开支要四十七卢布，显然，生活是无法维持的。除了其他的贡赋以外，农民对每块份地还要缴纳七卢布的赎金。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外出另谋生计。中等年景时，俄国各个草原省份的庄稼人，在缴纳贡赋以后，手头几乎一无所剩。年成不好时，农民得把好年景时购置的牲畜卖掉。由此可见，农民缴纳了贡赋，却没有从收入中得到一点好处，他们纯粹是为了纳贡而干活。除此以外，农民为了获得在地主的土地上放牧牲畜的权利还要缴款，他们还得买木料、燃料，农民还担负着省的、县的各种苛捐杂税，乡的、村社的各种开支和实物贡赋，等等。

结果，1875 年仅从农民身上搜刮来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就比上年多了二千一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二十一卢布。

沙皇的大臣的上书，经过沙皇签署后，即作为书面命令发送给各个省长，省长则将其下达给县警察局长，于是，县警察局长、区警察局长会同地方自治局如同猛兽一般扑向劳动者。

杜霍夫乡(莫斯科省)，欠税累计达四万五千卢布；查波诺尔乡——一万八千六百卢布。县警察局长一到来，就动员各个乡公所倾巢出动查抄农民的牲畜和其他财物。欠税征收了，但农民破了产；杜霍夫乡的欠税剩下二万二千卢布；查波诺尔乡的欠税为八千卢布。各村的耕畜全被查抄一空。在顿河州的顿涅茨地区，去年闹了饥荒，今年，小俄罗斯的农夫仍然吃不饱肚子，他们对于今年的收成很担心，因为一月份就开始解冻了，但是现在这里又开始征收欠税了。县警察局长挨着村子查抄农民的粮食和牲畜：一俄石小麦只给作价三卢布，甚至把价钱压得更低，而原价值七十至八十卢布的两头牛，只作价三十卢布。

他们抢走了农民的耕畜，叫农民简直无法翻地、耙地、运输和打场。失去了耕畜，农民也就无法靠拉脚挣得的一点零钱贴补家用了。而拉脚对于这些地方的农民，则是勉强摆脱灾难的唯一手段。

牲畜卖掉了，过去积欠的税款交上了。

顿涅茨地区的农民没有了耕畜，也没有了粮食，房舍倒塌了，农民及其一家人衣衫褴褛，他们天天只有靠打短工糊口度日。

顿涅茨州的其他地区，去年也闹了饥荒，农民就象畏惧雷殛一样畏惧催缴欠税的人，他们成群结伙围着村里富豪的房子，想借点钱，只要地主、商人和所有的富豪中有人拿出二十或二十五卢布，借给两、三个月，他们就愿出高得惊人的利息甘受盘剥。

关于立即征收伊尔库茨克省的全部欠缴税款的命令，下达到了伊尔库茨克。这里的地方自治局，如同别的地方一样，便忙得不可开交。官吏们在哥萨克骑兵的护送下赶赴农村；和沙皇的官吏们一起下到农村来的还有犹太人。犹太人把农民出售的一切东西——牛、马以及他们的各种破烂东西都买走了。在一些村庄里，只是由于村里的富豪，农民财物的价格才提高的，要不然犹太人便会非常便宜地把伊尔库茨克省农民的几乎全部牲畜买光。有的村庄，农民减价出售财物时，由于某种原因富豪没有出现，一切东西就非常便宜地卖光了。

在萨马拉省，去年饿死了很多饥民，欠税在大量增加，经过去年的饥荒以后，如今人民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布祖卢克县、布古利马县、尼古拉也夫县的各个乡，都在征收欠税。农民的粮食是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的，黑麦—普特为二十五至三十戈比，别罗土尔卡小麦——七十至八十戈比，灰兔—普特为五十至六十戈比。商人把农民的粮食买到手以后，便运到萨马拉。庄稼汉们，你们看看吧，富农究竟怎样把你们的财物给运走的！你们看一看，也寻思寻思怎样对付富农吧！

凡是地方自治局没有派人来，农民牲畜没有卖光的地方，那一定是光临了凶恶的、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非常可憎的一位不速之客——在牲畜中流行了瘟疫。

在波尔塔瓦省米尔格勒县，由于瘟疫流行，有大量牲畜死亡。在十月间，从德米特罗夫斯克的集市开始，牲畜瘟疫不断蔓延；从一个县波及到另一个县，直至蔓延到了全省。

在波多尔斯克省，牛瘟使耕牛成群死亡，灾情严重的有达什柯维茨乡、马罗柯维茨乡和柯马罗夫乡。

在基辅省，直到第二年牛瘟依然猖獗。

瘟疫一过，这些省的官吏们就下去征收欠税，因为没有牲畜了，他们便查抄农民最后剩下的一点粮食……

在首先成为俄国首都的莫斯科，有的劳动者冻死了，十二月的严寒是可怕的，每到清晨警察都要到处收检冻死者的尸体。

人们饥肠辘辘，衣不蔽体，怎么能够不冻死啊！

莫斯科是个害死人的地方，老百姓说，他们是死于沙皇的恩赐呀！

今年，在克里木，果园所有者失去了葡萄酒买主；通常，到了冬天工人成帮地从沿海的城市来到克里木挣外水，而今，却在黑海沿岸到处流浪，要想为自己找到工作是徒劳的，那里也没有工作啊！

今年，城市工人的日子也是难熬的。形形色色的老板千方百计地压榨他们，简直不把他们当人使唤！

譬如，莫斯科车尔内舍巷有一家雅柯夫·伊万诺夫理发店。这位店主人伊万诺夫因为某件事同他店里的伙计伊果尔吵了架，就拿起锤子狠狠打他的头，把头颅骨都打破了。这个伙计被送进了医院，也就算了事了！

在基辅省基吉林县，麦德维道夫卡镇的有些农民，在地主冯都克列伊家当雇农，因为在期满以前就不干活了，雇工头和中间人便下令毒打他们。农民向法院提出了起诉。其中有个叫拉扎尔·萨雷卡的在起诉时痛哭起来。法官问他为什么他和他的同伙在期满以前就不干了。雇农萨雷卡回答说，他们决定不给地主冯都克列伊干活，是因为地主给他们吃得太坏了。当时，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小块掺了糠的象土块一样黑的面包拿给法官看。

法官老爷未作任何处理。据说，这件事以后，又有两个农民因为同样原因遭到拷打。

在比萨拉比亚省萨罗斯县，有个叫安尼奇柯夫的官吏，把一个给他家当厨娘的多罗费也娃从兹古里查村押到尼柯烈什塔村的村长家，他给这个女佣带上了铁镣，铁镣的一端套在她的脖子上并且上了锁，另一端就握在安尼奇柯夫的手里。村长不在家，安尼奇柯夫就把多罗费也娃摔倒在地上，拿挂在窗户上的锁，把她锁在埋进地里的长凳腿上……

困苦难熬的一年开始了，对于俄国的工作者来说，它不是第一个困苦难熬的年头，也不是最后一个困苦难熬的年头。对于工作者来说，它是漫长的、没有尽期的。

去年是饥荒的一年，今年，沙皇和喂得脑满肠肥的人已经合计好了，显然要把人民引上彻底的破产。

他们是会这么干的！

饥饿是个坏向导，它把人引上穷困，而穷困离盗贼相距也就不远了。

在闹饥荒的过去一年中，逃荒到西伯利亚的男女饥民有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三人，今年，将会更多。饥寒交迫的人逐年在增加，流放的人也越来越多。

没有面包，是因为土地被割给了地主；没有面包，是因为工厂和作坊操在商人兼富农手里，农民和城市工人往往无工可做，只有沦为乞丐，靠乞讨度日……

这就是沙皇、地主、商人、神甫统治人民的规法。他们通过鞭笞、枪杀、树条抽打、掠夺和暴力，迫使俄国的工作者就范。他们现在走鸿运啦，可恶的沙皇败类，掠夺吧，过你们的纸醉金迷的日子

吧,不过,你们别忘了,既然有了一个马林诺夫斯基^①,那就会有千百个这样的人。

当俄国的工作者一起模仿自己亲爱的被流放的同志钳工马林诺夫斯基的榜样时,当俄国的工作者奋起反对沙皇和一切掠夺者时,整个俄罗斯帝国就一定会灭亡,而在它的土地上一定会出现劳动人民的自由的村社和劳动组台。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98—303页。

革命与国家^②

彼·尼·特卡乔夫

我们的纲领,正象我们所预料的,引起了我们一批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青年的猛烈攻击和反对,尽管他们,说实在的,还很不理解不知道为什么受到他们喜爱的“无政府主义”一词的真实含义。他们似乎认为,我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的全部世界观是相反的,我们和他们之间有着一条鸿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不错,我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世界观是互相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也只是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充满着谎言、伪善、完全的不合逻辑和

① 马·普·马林诺夫斯基是个钳工,1875年1月被沙皇法院判处七年苦役。——编者注

② 本文曾发表在《警钟》杂志1876年第2—3期(1—2月号)上,没有署名。——编者注

幼稚的唯心主义。是的，我们和他们之间是有着一条鸿沟，但是，只要他们从自己的世界观中抛弃一切不合逻辑的论断和荒谬的空想，这道鸿沟就将自然消失。

我们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只要分析一下我们那些自称的“反对派”（这是他们自称的，尽管我们并不这样看）对我们的纲领表示的意见就行了。当然，我们要谈的只是一些主要的，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最重要的不同意见。

他们首先指责我们对人民采取高傲态度。他们说：“也许你们是想为人民进行革命，但是却撇开了人民。你们想让有思想的、有知识的少数人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人民，想把人民钉在你们的抽象理论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一句话，你们所竭力追求的不是人民的革命，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贵族老爷的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因此，为了进行你们的革命就必须拥有充分权力的国家，即必须有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认为是现时社会罪恶的主要原因之一的东西。”

看来，矛盾是极大的，但是，你只要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些矛盾，对比一下我们所说的和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话，你马上就会确信，产生这些矛盾的基础只是误会，由于两种不理解所造成的误会。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不懂得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懂得，他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说：革命应该由多少有知识的，有革命思想的少数人来实现。而你们，我们的虚构的反对派，你们在说些什么？你们是不是说，革命应该由多数人来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等待革命的到来，一直等到人民的多数达到现在仅仅是少数人所达到的智力与精神发展的水平呢？

不，你们是不敢这样说的！甚至《前进》杂志的编辑，甚至这个永远跟着共鸣的空谈主义者，甚至这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他身

上，“老亚当”经常胜过“新人”的人，在经过从这边到那边的多次摇摆之后，最终也只有郑重地承认，革命是少数人进行的，^①要等待人民的多数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那是荒谬的。

不是，一千个不是！你们象我们一样，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你们象我们一样，确信这个少数能够而且应该进行革命。

你们和我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你们断言，似乎你们所指望的少数和我们所指望的少数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似乎你们的少数是来自人民，而我们的少数则来自特权阶层。

① 见《前进》杂志第21期《答俄国立宪党人》一文。《前进》杂志的编辑在自己的纲领中曾经断言，“当人民还没有意识到进行革命的必要，还不清楚它的目的和任务时，就应该暂缓进行革命”，在他的论战性小册子《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中，他坚持同样的思想，但在《答俄国立宪党人》一文中作者郑重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在全部历史中从未发生过一次完全自觉的运动。只有一些较小的团体和个别的人，也就是少数人才能完全认识到革命的目的和方法。”他接着说：“这少数人依靠在旧制度下遭受苦难、因而对旧制度充满仇恨的多数人打出自己的旗帜”，尽管这多数人既未认识到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和条件，也没有打算从根本上去消除这些条件；少数人依靠这些没有觉悟的多数人去“和旧制度进行斗争”，换句话说，去进行革命。作者认为，这是历史上经常发生而且也是必然发生的现象。此外，他认为，想依靠宣传来使人民明确认识到进行革命的必要，认识到它的任务和方法，这是一种空想。

真是难以想象，人们的信念多么容易变化无常！就在不久以前，同是这份《前进》杂志的编辑曾嘲笑过《革命宣传在俄国的任务》这一小册子的作者，因为他发表了这样一种想法，似乎革命总是由少数人来进行，少数人不能等到多数人具有觉悟和认识等等，多数人无论何时也不可能达到这一点，——这纯粹是作者的空想！不久以前《前进》杂志的编辑还哀求青年们“当人民没有作好准备时，不要号召他们起义”（见该编辑所写的《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一文，第21页）。不久以前他还断言，“我们（即少数革命者）不能除掉人民的历史的大十字架”（简单地说，即我们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他们必须打垮那些高喊要用自己侏儒般的力量去折断人民这个上帝身上的十字架的少数革命者，那些‘可怜虫勇士’”。

而现在突然又变了，没有这些“可怜虫勇士”人民无论何时也没有能力“除掉自己的历史的十字架”。好在人民当时并没有听从这位编辑的意见，没有向执政者恳切请求让他们立刻行动起来，去马上粉碎上面所说的那些有害的可怜虫，——彼·特卡乔夫注

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们讲过这类话呢?怎么,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会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还未来得及忏悔的贵族”身上,寄托在你们这些堕落、衰老、庸俗和卑躬屈节的贵族的病态和萎靡的子孙后代身上!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你们是正直的、真诚的人,能够专心于一切高尚的事业,你们是好人的,但是……你们非常容易反复无常和意志薄弱,另外,你们过分喜欢跟着叫嚷。不会是由你们娇嫩的、贵族的双手去打开人民身上的锁链,不会是由你们去组成肩负革命重担的少数人的核心。你们不过是他们的一部分;在他们当中你们这个“特权阶层”所占居的位置和其他非特权阶层——小市民阶层、农民、所谓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阶层所占居的位置完全一样。

你们究竟有什么权利断言,似乎由这少数人进行的革命不是人民的革命,而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你们是否懂得,什么叫做自上而下进行革命?这就是为了代表上层的,多少是社会特权阶层的利益的理想,也就是为了就其本质来说始终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反人民的理想来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这些理想可能在某些方面是符合纯粹人民的理想的。社会上层就利用了这些一致的方面。他们特别卖力地强调这一点;他们蓄意夸大这一点的作用,而人民,由于不了解资产阶级理想的真实含义,只看到它与自己利益相协调的那些方面,因而就站到它的旗帜之下,完全听任剥削者支配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身躯和自己的血液。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支持,以人民作为掩护,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进行一些强制性的改革,而在掌握了政权以后,就实现自己的理想,改变当前的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使之适应自己的利益。既然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受他们剥削的人民的利益总是有着而且一定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由此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他们的革命中,从自上而下的革命中,人民任何时候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相反,

倒总是要损失一些东西。

因此，自上而下革命的反人民性质完全不在于少数人把政权夺取到手，并借助于这个政权来调整社会关系，而完全在于少数人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理想，这些人的经济利益是与人民的经济利益相矛盾的。

但是，难道我们所说的少数人和照我们看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应该把政权夺取到手的少数人是资产阶级的少数人吗？难道他们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吗？难道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吗？

你们自己知道，不是，一千个不是。不用说这少数人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所谓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即出身于社会上被剥削的、贫困的、受压迫阶级的人；就拿那些出身于特权贵族阶层的革命者来说吧，难道能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革命者吗？确实，在他们中间有资产者，但是，他们被称作革命者仅仅是出于误会，仅仅是由于在我们这里一切不被政府赞同的活动都被叫做革命活动。有人用未经人民教育部同意的课本给农村的孩子上文化课，他就是个革命者；有人给农民讲未经审查的故事，向他们介绍经济学的主要学说，他就是危险的鼓动者，如果他想要散发一些通俗地阐述当前国家管理机构和现行的赋税制度的书籍，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疯狂的造反者，就是流放到西伯利亚，也太便宜了。教育人民就是准备革命，创办钳工、木工、打铁和其他的作坊，给属于特权阶层的人开设食品小店，这等于是在挖现存制度神圣基础的墙角。一句话，你只要一口痰吐的不是地方，马上就会被认为是革命者、造反者、鼓动者。

既然对于革命和革命者具有这样的概念，那么，一些完全无辜的和本来是反对革命的行为会被列入革命行为的范畴，而一些追求纯粹资产阶级理想的人，一些主张“历史进步”和“人民教育”的

仁人志士就被认为是革命者,这就毫不奇怪了。

自然,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这些“由于误会而造成的革命者”。我们要说的仅仅是一些实际的革命者,是那些把自己完全献给解放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为了纯粹人民的(即符合人民真正需求的)理想而斗争的人,是把革命视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的人,是绝不与现存制度妥协并且根本否定这一制度的人。

这些革命者为了理想而牺牲一切,牺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生命,这些革命者把自己的幸福和人民的幸福等量齐观,难道你们会说他们是人民的骗子,伪善的资产者吗?甚至于御前办公厅第三处,甚至于帕连以及日哈列夫和斯列兹金^①都不敢这样诽谤他们!

你们害怕什么!你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这少数人——他们部分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部分由于自己的理想而无限忠于人民的利益,——在把政权夺取到手以后,突然会变为人民的暴君呢?

你们说:任何权力都会把人毁掉。你们究竟根据什么得出这样一个奇特的论断呢?根据历史上的事例吗?你们从何得知,在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人们,在夺取政权以前要比他们在夺取政权以后好呢?读一读他们的传记,你们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国民公会委员,有充分权力决定法兰西命运的罗伯斯比尔和不知名的地方律师罗伯斯比尔,这是同一个人。权力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气质、理想和志向,甚至于他的家庭习惯。丹东和伟大法国革命中所有比较突出的活动家也可以说都是如此。想一想克伦威尔,想一想华盛顿,难道可以说,是权力把他们毁掉了吗?难道英国的独裁者克伦威尔比起实干家克伦威尔有什么更坏的地方吗?难道美

^① 帕连是当时的司法大臣,日哈列夫是检察长,斯列兹金是宪兵将军。——编者注

利坚共和国总统华盛顿和质朴的地主华盛顿比起来要更恶劣，更贪权吗？

最后，难道是皇袍使得拿破仑和恺撒腐化的吗？难道过去，当他们还作为一个普通人时，他们曾经表现过什么英勇精神、非常崇高的理想、非常高尚的志向吗？

多么遗憾，你们对你们那么喜欢引证的历史了解得那么肤浅。如果你们对它更熟悉一点，你们也可能会知道，权力从来没有毁掉正直和善良的人，但不幸的是，权力几乎经常被掌握在不正直的利己主义者、腐化的资产者手里；因此在你们看来，权力似乎具有这样一种神秘的性质，会把人变为不正直的、腐化的利己主义者。你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尽管是十分普通的逻辑性错误：你们认为，事情发生 *post hoc*（在此之后）和 *cum hoc*（与此同时），所以 *Propter hoc*（事情发生的原因在此）。

你们问：为什么一些正直和善良的人在取得权力以后，从来没有为实现人民社会主义理想做过任何事情呢？很简单，这是由于这些人的理想完全不同，他们从未隐瞒这一点，他们从未欺骗任何人，也从未假装成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权力与此毫无关系，它对他们的思想没有起过任何微小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点，你们不妨反复读一读克伦威尔、丹东、罗伯斯比尔以及其他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活动家的自传。

其实，所有你们的反对意见都建立在这样一种虚构的假设上面，即似乎任何权力都一定会毁掉人，所有这些反驳不只是无关紧要的，而且简直是荒谬绝伦的。问题并不在于，权力会不会毁掉人，^① 问题在于，如何能够不要权力而实现社会革命。

^① 《警钟》第1期上刊登的《谁是我们的朋友和谁是我们的敌人》一文的作者指出，如果我们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取得权力之后，变成象法国墨洛温王朝执政者那样道德败坏，那么由于他们的地位，他们不可能阻止人民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彼·特卡乔夫注

既然你们承认，革命应该由少数人进行，这样你们也就是承认，革命应该靠权力进行。少数人只有掌握权力，才能强制多数——他们古板、保守、还没有进步到认识革命的必要，没有搞清革命的目的和任务——按照自己真正的要求，按照最美好、最合理的社会生活的理想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少数人如果失去了权力，它也就会失去任何势力。没有能力和不开通的、自顾自的多数人将在新形式下恢复旧秩序。它也许能从全部罪恶中除掉一些局部的、个别的、使它特别受害的罪恶，但是它却无力消除产生罪恶的根源。为了消除这种根源，就需要了解它，需要在眼前就有与当前的历史制度毫无共同之处的未来社会制度的现成理想。任何人也不敢否定这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值得进行革命吗？你们到底因为什么而战斗呢？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呢？

难道说你们打碎囚禁人民的监狱的大门，仅仅是为了然后在监狱门坎旁边抛弃人民，抛弃失去了光明的、由于监狱饮食恶劣而羸弱不堪、由于戴着奴隶的枷锁而软弱无力的人民吗？难道当人民最需要你们帮助和支持的时刻，你们竟冷酷无情地把他们推开吗？难道你们决心对这些筋疲力尽、受尽折磨、血迹斑斑的受难者说：“现在你们自由了，按照你们对生活的理解去生活吧，你们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生活就是监狱里的生活，他们的双脚早已不习惯于走路，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跨出监狱的门坎。他们将怎么办，他们将到哪儿去呢？他们只能回到自己的墓穴去。你们想要的是这个吗？

不，你们当然要为进行革命的少数人保留领导多数人的权利，因为多数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用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取代被毁坏的、革命前的社会关系；你们不想让这少数人下台，不想让他们在把人民从压迫它的桎梏下、从当前经济和政治的剥削下解放出来

以后立即消失；你们赞成它不仅应该积极地参加毁灭旧事物的活动，而且应当积极参加创造新事物的活动。很好，但是要知道他们参加的程度将取决于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它所享有的影响和威信的程度。而这种影响和威信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完完全全由力量来决定。为了获得影响，为了享有威信，少数人应该具有力量。力量愈大，影响和威信也就愈大。这是显而易见和无可辩驳的，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

你们不能不同意这一点。

既然你们是有道理的，那么就不要再玩弄辞藻了。任何力量都是权力，尽管任何权力并不都是力量。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如果说少数人为了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应该具有力量，那就意味着，他们应该掌握权力。同样明显的是，这个力量即权力愈强大，少数人就能更迅速和更容易地实现他们为之而奋斗的那些理想。

权力的强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关于这一点，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家，意见都是一致的。他们一致肯定，权力的巩固和强大取决于它的组织的完善。而任何组织的完善一方面取决于它各个职能的统一和集中，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些职能尽可能细致的划分。

这样组织起来的权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换句话说，国家政权是组织起来的权力即最巩固而强大的权力的最高形式。

为什么你们这样害怕国家这个词呢？害怕名称——这是幼稚的特征。它的本质你们是承认的，因为你们承认，少数人应该具有力量即权力。而国家仅仅是权力最完善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承认国家就是根据你们自己的理论前提在逻辑上必然得出的结论。你们怎么能够避开这一点，而又不致于明显地不合逻辑，不致于最粗暴地辱没一个健全人的理智呢？

也许你们会说，你们所主张的权力不是物质的权力，而可以说

是精神的权力，即由道义上的权威所造成的权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你们不是道地的口是心非，就是过分的天真幼稚。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为了改造当前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改造这种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靠人们的一切习惯、本能和好意维持下来的关系，仅仅道义上的权威就够了吗？单是精神的权力就够了吗？难道你们认为，信念的力量比墨守成规的力量更起作用吗？

同时，任何精神的权力总是力求并且必须力求成为物质的权力；不仅如此，没有后者甚至是不可想象的。谁具有人的灵魂，他也就具有人的肉体。这是很明显的，就象任何一项几何学原理一样。

这样一来，你们要把一个鬼赶出大门，而他却爬进了窗户。但是你们赶出门的鬼（国家政权）是为害较轻的，而爬进窗户的鬼却是真正可怕的。国家政权只是要使人们表现在外面的活动服从于自己。而你们所想要的权力（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则不仅要使人们的行为，而且要使他们内心的信仰，他们最深藏、最隐秘的感情，他们的智慧、意志和心灵都要服从于自己。这个绝对专制独裁的权力是真正可怕的。这是教会的权力，这是耶稣会会员借以在美洲建立自己的神奇的神奇的公社的权力。

难道你们所向往的是这样一种权力，难道你们想授予少数的是这样一种权力吗？如果是这样，你们有什么权利来责备我们对人民采取高傲态度呢？要知道你们对待他们更坏，更高傲，你们对待他们就象那些笃信宗教的耶稣教神甫对待美洲的野蛮人一样。

你们的彻底性，你们的逻辑性到哪儿去了呢？即使为了稍微挽救它一下，你们也需要在拒绝国家政权的同时，也拒绝精神的权力，也就是说，你们应该在你们的旗帜上写上臭名远扬的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和市侩道德的原则；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 —— 然后再庄严宁静地观望革命之后的混乱。

对于你们来说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在革命的第二天你们就应该在以下两种情况中选择其一：或者是无所事事，处于凄凉的孤独状态，或者是取得权威、力量，也就是权力，也就是你们现在坚决拒绝的东西。只有掌握权力，你们才能够有所作为；否则就注定要处于可悲和可耻的无所作为的状况。

你们中间还有些人想要在完全不存在权力的状态和国家政权之间找到某种调和的术语，某种折衷的东西。他们大致是这样推论的：革命以后，现在这个机械地联合起来的国家将会解体为一些单位；每个单位，即每个村庄、村社、城市将要独立地管理自己的事务，根据相互的协议来安排它们自己的关系。少数革命者将分散在所有这些小团体内，努力将权力（精神的或是物质的）夺取过来，这样来经常领导他们的活动，把这些活动引导到实现更加符合于人民要求的理想的轨道上。

这样一来，权力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分散了；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权力中心，而是成千上万个中心。

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从这种妥协当中赢得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它的基本原则将受到破坏，而且会破坏得非常厉害：将会建立多头政治以取代无政权状态，而多头政治由于生活的不可避免的逻辑，自然而然会产生统一的联邦国家。

革命事业又赢得了什么呢？那就更少了。权力愈分离、愈分散、愈不集中，它也就愈保守。这是国家科学的起码常识。分散的权力经常受到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方势力、地方习俗的压制，受到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的压制。因此分散的权力非常有利于保持当前的 *status quo*，但是它完全不适合于任何改革的革命活动。革命的国家应该力求统一地方的利益，把统一的领导原则带到因循

守旧的实践活动中去。而且权力分散在根本上与任何整齐划一，局部服从整体，个别服从全局是势不两立的；不管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它总会是而且应该是反对革命的。

而这样的反革命工具居然要用来实现社会革命！如果是密探或者第三处的官吏们提出来的，倒也罢了，但是不，这却是革命者自己提出来的！这简直是过分的天真，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简直是令人气愤的愚昧！

少数革命者分散到各个独立行动的村社和城市以后，不管他愿意与否，几乎不知不觉地就会服从地方的势力，也就是服从于多数人，这多数人从头到脚都浸透了因循守旧的传统，他们对古代本能地非常尊敬，他们经常回顾过去，从中寻找对当前有指导作用理想和模式。

可以想象，如果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要取决于地方的单独愿望，取决于因循守旧的多数人的专横跋扈，那么它的速度和成就究竟会怎么样！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将会以极慢的速度前进，将会由于徒劳地想要调和新与旧而经常陷于混乱，将会经常地离开社会改革的笔直的、合理的道路，转到历史传统的方向去。某些最重要的人民生活问题，例如家庭关系问题，大概是不会受到触动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就会特别顽固地保护这种关系，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能以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来改变它们，那就是进行改革的权力要摆脱一切地方势力，摆脱一切历史传统；只有缺乏任何合乎实际的思想的人才会否定这个明显的真理。因此，我们的反对派无政府主义者会否定这个真理，这是不奇怪的。但奇怪的是：这些先生们建议实现社会革命思想要走与其说会导致确立新事物，不如说会导致恢复旧事物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走，我们将不会接近，而会不断地离开我们的理想），可是他们却指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纲领里使用逐渐地这个词。这个指责使我们实在感到

意外。他们这些真正是渐进的渐进主义的代表，他们这些想要使革命政权屈服于历史传统和地方利益的压制的人，怎么竟因为我们公开宣称，要从历史上形成的社会中根除个人所有制的传统、根除交换原则、重新建立家庭关系、重新教育人，竟因为我们公开宣称，只有通过始终一贯和循序渐进的改革才能达到这一切而指责我们呢？

如果指责我们的只是一些盲目相信政府命令有神奇力量的人，一些天真地认为某种理论原理只要作为法令颁布执行就完全可以贯彻于实际生活之中的人，那么这种指责对我们来说还可以理解。但是指责我们的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无论来自什么政权的命令都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反对觉悟高的少数人对改造觉悟低的多数人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事业进行任何强制的干涉。

难道还能想象得出比这更不讲道理的人吗？……试试看吧，但是我怀疑能够想象得出来。

译自《特卡乔夫选集》1976年莫斯科
版第2卷第141—153页。

人民与革命^①

彼·尼·特卡乔夫

上一次我们谈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的人民能够从可能的革命力量转变为实际的革命力量，从可能的革命者转变为现实的革命者^②。现在出现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当前人民的这种实际革命力量究竟能有多大呢？我们是否有理由对它寄以太大的希望与期待？这种人民自己给自己提供的革命力量是否能够实现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

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就会一方面确定人民可能和希望参加革命的程度，另一方面确定在这场革命中革命的少数人应起的作用。

不言而喻，在人民中革命分子愈少，人民的革命力量愈微弱，人民在实现“社会变革”事业中的作用就会愈小，革命的少数人所起的作用、所拥有的权力和势力就会愈大。相反地，人民中的革命分子愈多，人民参加革命的规模就会愈广泛。

这个真理是无可辩驳和显而易见的，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

一般来说，某一社会阶层的革命力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① 本文最初发表在《警钟》杂志 1876 年第 4 期（3 月号）上，发表时没有署名。
——编者注

② 指特卡乔夫《我们的理想》一文，发表于《警钟》杂志第 2—3 期（1—2 月号）。
——编者注

它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阶层的理想的性质，另一方面是这个阶层对它周围现实的态度。

这些理想可能是保守的（要是它力图保存全部或某些最主要的历史上已形成的当前社会生活方式的话），也可能是革命的（要是它力图消除、改造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它的态度可能是敌对的，也可能是和平的。

我国人民的社会理想究竟是怎样的呢？人民对他周围现实情况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人民的社会理想是自治的村社、个人服从米尔、土地的私人使用权，而决不是私人占有权、连环保，以及村社全体成员兄弟般的团结，总之，这是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①当然，产生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离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差得很远；共产主义孕育于其中，可以说孕育于种子、胚胎之中。这个种子可以发育成长，也可以凋零枯萎，——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经济生活将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如果它将朝着它现在正在发展的那个方向发展，——朝着资产阶级进步的方向发展，——那么，不容置疑，我们的村社（也就是我们人民的理想）将会遭遇到西欧村社的命运；它将要毁灭，就象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那样毁灭掉。但是，如果革命会及时筑起一道堤坝来防止资产阶级进步的汹涌浪潮，如果革命能挡住它的潮流，将它导致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么，无疑地，在很好的照管之下我们现在的村社将会逐渐地转变为村社一公社。

而现在，可以说，村社正站在两条道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上：一

^① 确实，在俄国的某些地区，村社土地所有制已不存在，然而，即使在这里，人民的理想也没有完全丧失其共产主义性质，即使在这里，在人们的意识中个人的我，个人的意志在米尔集体的概念面前也逐渐模糊和消失。——彼·特卡乔夫注

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王国，另一条则通向个人主义的王国；生活把村社推向哪里，它就会走向哪里。如果生活既不把它推向这一方，也不把它推向另一方，那么它就会永远停留在十字路口上。村社本身没有任何可以推动它前进或后退的东西；它的组成部分都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村社几乎没有丝毫变化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自行其是的村社还能够千百万年维持现状的原因。^①

社会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由它产生的理想也就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前者是保守的，如果在它内部没有任何促使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刺激因素，那么由它产生的理想也就会表现出完全相同的保守性质。

确实如此，我们人民的社会理想不会比他们的死板的生活方式走得更远。人民除了自己千百年来所尊崇的、习惯的土地占有方式，习以为常的宗法官场等级制度、个人对米尔的消极服从，除了自己的传统家庭关系等等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如果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么你将看到，他们不会给生活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他们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村社、自己的米尔和自己的家庭推广到那些现在由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影响而排斥上述生活方式的社会阶层里去，但是这样一来，也就限制了他们的改革的活动，在我们面前出现的还会是那个基础落后、僵化、思想一贯保守的古老农民米尔。

^① 的确，迈恩、马乌列尔、拉维尔等的研究完全证明了这一事实：这类村社是最保守和最稳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一。它能够适应可能发生的一切政治变革。例如，在爪哇岛、阿留申群岛，在俄利诺科河的印第安人那里、在阿富汗人那里，在瑞士的某些州，这种村社从远古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变化地生存下来。显然，村社本身没有任何促使进步、发展的刺激因素，它只能从外面获得这种因素。——彼·特卡乔夫注

总之，我们农民的积极的理想并不就是革命的；它们不能成为革命的理想。即使把这些理想最充分地、毫无阻碍地运用到生活之中，也不足以使我们接近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的胜利。

为了接近这个目的，为了准备共产主义的基础，我们应该给历史上形成的人民村社制度添加一些新的成分、新的因素，一些能使它失去稳定的平衡、离开它已经呆惯的地方并把它推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分和因素。但是我们要在人民的理想中去寻找有关这些新的成分、新的因素的观念是徒劳的；人民还不知道它们；人民对它们还很陌生；只是在革命的少数人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中才具有这些观念。正因为如此，这少数人的理想比人民的理想更加开阔，更加革命，在革命的时候前者就会胜过后者。人民没有能力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能够朝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向前进和发展的新世界；因此在建设这个新世界时，人民不能，也不会起到任何突出的、首要的作用。这种角色和这种作用仅仅属于革命的少数人。

但是，如果人民不起积极的革命力量的重要作用（这是从他们的积极理想的角度来看），那么，他们是否可能起消极的革命的破坏力量的作用呢？

我们的人民其实从来都是地主和当权者的敌人。地主和当权者都掠夺、剥削他们，榨取他们的脂膏……人民无论对于地主或是当权者都怀着深刻的仇恨……让这种仇恨能够自由地表现出来吧，人民的激情只要一迸发出来，就会消灭现在那些保护和维持现状的人，他们就会追回被夺去的土地，就会破坏在此之前压迫和钳制他们的米尔、他们的村社的一切事物，就会对自己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报复。但是他们只能到此为止。

我们的人民在破坏了敌对的、与自己所习惯了的社会生活方

式格格不入的各种机构，消灭了自己所有的直接的敌人，把他们的财产夺到手以后，由于感到比较自由、满足，生活比较有保障，就会恢复自己“最神圣的东西”即自己的“米尔”、自己的村社、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古老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将原封不动，他们喜爱它，珍视它，一点儿也不会去触动它。

因此，即使在破坏的事业中，我们人民的革命力量也只能起到相对的作用。革命的少数人依靠和利用它们，就能够消灭革命的直接敌人，排除阻碍社会具体实现革命理想的最初障碍。但是，革命的少数人不能就此心安理得。他应该把自己破坏性的革命活动带到农民生活的内部，他应该力求排除那些古老的、与共产主义进步背道而驰的生活方式，而代之以最适合于这种进步的要求的生活方式。

但是，正是为了在某些很难指望得到人民中多数的积极支持和协助的环境中，也有可能继续自己的破坏性革命活动，革命的少数人应该具有力量、权力和威信。而且这种力量愈大，这种权力愈巩固和有效，社会革命的思想也就愈能充分而全面地在生活中实现，愈加容易避免与人民中的保守分子发生冲突。

这样一来，可以确定，革命的少数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人民参加革命的情况可能是这样：革命的少数人在把人民从对最高政权感到害怕和恐惧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以后，就使得人民有可能表现自己的破坏性革命力量，就可以依靠这种力量，巧妙地运用它来消灭革命的直接敌人，就能够破坏保护他们的堡垒，剥夺他们进行反抗的各种手段。然后，革命的大多数人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威信，就能给人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一些新的、进步的共产主义因素，使这种生活离开它古老的基础向前推进，使死板落后的生活方式充满生气。

革命的少数人在自己的改革活动中不应该指望人民的积极

支持。

人民在破坏了直接压迫他们的机构，消灭了暴虐的直接剥削者以后，他们的革命作用也就终止了。

既然一方面，革命理想的存在不会与人民切身的、现实的需求相矛盾，另一方面，少数人所进行的改革将渗透着也同样渗透在整个人民生活制度中的村社团结精神，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设想，人民会拒绝给予革命者以消极的支持。相反，革命者有充分的根据指望得到这种支持，因为他们的革命理想大体说来和人民的保守理想是相同的，只不过在某一方面发展得更为充分和全面而已。

因此，革命的少数在实现这种理想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的保守力量，就象过去曾经依靠他们的革命力量一样。

这样一来，革命的少数人，利用人民的破坏性的革命力量，就会消灭革命的敌人，依靠积极的人民理想的总的精神（也就是依靠人民的保守力量），就会为新的、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奠定基础。

这是一条总的公式，它说明了这两种通过共同行动就可以决定革命成功的因素的相对作用及其参加革命的情况。从我们对当前存在于人民中的实际革命力量的性质和大小作出的估计，就会必然地、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公式。

谁同意这样一个估计，谁也一定会同意我们的公式。我们认为人民的破坏性革命力量仅仅对于社会生活中处于农民内部生活范围之外、处于它的宗法村社关系范围之外的现象和因素才有意义，这种“内部生活”，这种“宗法村社”的关系对于农民来说就是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谁会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呢？我们认为历史上形成的人民生活方式的特点是极其稳定和呆板，因而人民的社会理想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特点，谁会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呢？同意这两个论点则意味着同意从其中得出的关于人民实际革命力量的

一般性质的结论。

既然承认这个结论，我们就应该彻底。我们不应该自我欺骗，口是心非；我们应该坦率，不要眯缝着眼睛忸忸怩怩，而要正视无情的现实。

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字典中永远删去什么人民的天才这一类庸俗的、无意义的空话，从反动的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空话。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对人民寄予过分的希望和期待。用不着说这种蠢话，好象“自顾自”的人民能够实现社会革命，能够最好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只有在革命的少数人将革命事业掌握在手，只有在他们能够经常地指导和领导人民的革命力量和保守力量的时候，人民才是社会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不应该隐瞒这一点。不应该害怕真理。只有懦夫才本能地要在他们自己所制造的偶像面前阿谀奉承和支吾搪塞。我们没有也不需要偶像。我们用不着在人民面前下跪，把他们高高地捧到宝座上去。相反，我们对待人民愈严格，我们愈坦率地说出我们对他们的意见，我们就愈能证明我们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对人民阿谀奉承的人是不会尊敬人民的。谁以伪善的办法来让人民相信他们好象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谁把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完全压到人民肩上，谁就不是爱人民，不是珍视他们的幸福。

依靠人民来解放人民，这也就是人民自助的理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力图靠这种夸夸其谈来隐瞒自己对人民的苦难和忧患所持的冷酷的利己态度。对这些苦难和忧患十分关切的人——正直的、忠诚的革命者，不仅应该懂得，而且应该感觉到这种理论的全部虚伪性。他们应该知道，人民自助的无稽之谈是人民的敌人发明的，其目的是使人民尽可能长久地处于当前这种软弱无力的状况。因此，凡承认和宣传这种无稽之谈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都是人民的剥削者和掠夺者的朋友和同盟者（自觉的或是不自觉

的)。

人民不能拯救自己，自顾自的人民不能按照现实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命运，不能实现社会革命的思想。这一点甚至连人民自助这种无稽之谈的捍卫者也是同意的，但同时他们却又虚伪地补充说，似乎人民仅仅是在当前不能为自己做出任何事情，可是在不久的将来，等到他们有了知识，变得更加聪明以后，这种无能为力状态就不复存在了。

这是谎言，是厚颜无耻的、令人气愤的谎言！只要人民仍然处在他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之下，无论是他们的理想、无论是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都不可能有所改变，所以，即使在将来，他们也将处于和现在同样软弱无力的状况。

因此，关于那些把任何希望都寄托于幻想的未来、为了这个未来要把革命事业延宕下去、宣扬什么必须等待和忍耐的人，我们应该认为：他们不是虚伪的骗子，人民的伪装的敌人，就是纯粹信仰奇迹的天真傻瓜。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自顾自的人民都不能实现社会革命。只有我们革命的少数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快地做到这一点！

译自《特卡乔夫选集》1976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163--170页。

近年来俄国经济开发 成就概述^①（摘录）

……实行改革后的最初一个时期，我们的改革者可以自豪地、扬扬得意地看待自己的工作。他们竭力追求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自由的无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发财致富的最必要因素已经造成。剩下的只是享受“改革的果实”了。

但是在新的道路上刚迈出了几步就发现，精心设置的“巧妙圈套”还有些不足之处。建立在“自由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缓慢。工厂工业发展迟缓，不无困难，而农业不但没有前进，甚至似乎倒退了。到处都可以听到对“工人”的抱怨；我们的“自由无产者”显然没有受节制。我们的“新人们”想据以建造西欧式壮丽大厦的那块基石实际上却是人民的。

如果我们的改革派先生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自己的创作，他们就能猜想出失败的原因。他们曾寄以厚望的那块基石不过是巧妙地想出来的、机灵地执行的妥协。但是不管布满基石的裂缝修补得多么巧妙，在妥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造宏伟的宫殿的。他们想模仿的西欧制度并不是建立在妥协上面的。公开的、肆无忌惮的掠夺、除拳头外无需寻找任何理由的暴力，这就是欧洲“新人们”建立自己最新历史的基础。这些“新人们”掏光了无产阶级工作者

^① 本文载于1877年在伦敦出版的《前进》杂志第5期。文章还有一个总标题，《改革的成果》，因为作者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总结改革后俄国经济的发展。——编者注

的口袋，然后在他们的口袋里塞满各种“权利”，只是用这样的方法才迫使“完全平等的”、“自由的”无产者把他们剩下的唯一财产——劳动力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使改革者先生们惊讶的是，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契约”在资本家手中是一种作用不大的武器。我们的无产者看来不是西欧资本家所对付的无产阶级。

在“改革”以及一切“保障”和“恩赐”的帮助下，我们的农民确实已沦落到了无产者的地位。但是农民只是从他们本身来看，从他们在自己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才是无产者。可以毫不牵强地说，农民的地位比西欧无产者的地位更坏。诚然，后者明天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但今天还是有保障的。他可以相信，他昨天挣得的钱毫无疑问已经在他手里，谁也别想从他手中夺走他的工钱，从他的嘴里抢走他挣来的面包皮。然而我们的农民却没有这种信心，因为可能明天区警察局局长就会“象强盗一样突然袭来”，把他们靠沉重劳动挣得的一切洗劫一空，把他们可怜的经济的支柱——最后一匹马，最后一头小牛都卖掉，甚至工人本人也由于贫农无产者还不清积欠的税款而沦为奴隶。

如果说改革使我们的农民更贫困了，使他们的地位变得比真正的无产者更绝望，更靠不住了，那么决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改革把农民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那种无产者。要使资产阶级昌盛起来，无产阶级还应当具备其他的品质。他们应该不只是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确是“自由的”；他们不应该受任何束缚，有任何牵连；他们应该具有根据市场需要轻易而迅速地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毫不困难地扩大和收缩的能力。无产阶级所提供的劳动力应当是真正的“商品”。而我们的农民虽然实际上是百分之一的“主人”，却仍然是“主人”。农民和土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感情上联系在一起，一整套警察和国家经济措施使农民和土地联系在一起，使之依附于土地。即使用“自由的”契约，公道

的“互相帮助”，以相等的“价值”平等交换的“买卖”契约，你都无法吸引农民去做工。他们将坚持在“天灾”或“为祖先的罪过而受的惩罚”的重压下维持生活；他们将在自己的“份地”上无望地翻耕土地，他们将节俭到最大的限度，把自己的需要降低到难以置信的最低限度，他们交不起欠税，地方当局为了催逼欠税砍伐了成片的白桦树林，但农民还是不去为老爷或富农干活，不愿卖身当奴隶。因此，为了吸引固执的农民去干活，为了使农民参加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就需要采取其他的手段，这种手段只能是暴力、欺骗、狡诈。可以大胆地说，如果西欧的“自由的”和“自愿的”雇佣契约是在历史上的掠夺和暴力所准备的基础上开始占统治地位的，那么在这里正好相反，在契约——根据自愿协议所签订的“赎卖契约”和“合同”——的基础上只能有一种雇佣方法，即掠夺和暴力。

不过，没有必要用可怕的话来吓人。掠夺、暴力、欺骗在这里根本不是各种刑法法典里规定的东西。掠夺、暴力、欺骗就其性质而言，就社会和当局对它们的态度而言，甚至就其名称而言，是另一种东西。富农阶级，平常的、古老的、民族的、俄国的富农阶级是现代的、普遍通用的奴役俄国工人的工具。我们俄国的富农阶级在我们这里代替了西欧的“自由契约”；这个富农阶级最近广泛而深入地普及到我们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俄国生活中的这一老祸根以新形式表现出当代十分独特的现象，人们对此还没有怎么注意，这是很奇怪的。的确，报纸记者和国内社会生活评论员常常提到乡村和城市的富农阶级，但他们都是偶尔、顺便谈到这个问题的，是与证实某次火灾或雹灾一起提到的。小说稍稍描写了俄国富农的典型，但小说在这方面落后于生活，它只限于描写较老的、已经过时的富农。这个缺陷必须加以弥补。因此我们打算在这里稍稍谈谈这个问题，主要是利用已经公布的材料，尽力哪怕概括地说明我们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富农类型，这种富农在我们的“企业主”看

来正在代替纯粹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当然，这里是专门谈农业中的富农。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富农与剥削行为一样，是旧的、古代俄罗斯的祸根。但是，在新老富农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以前的富农是志愿劫掠者，象游击队一样，凭自己的主动性活动，由自己担风险，没有什么章法，没有共同的团结；他们主要是由发了财的农民或中小商人发展而来的；社会的鄙视威胁着这些社会渣滓。现在这种“谬误”，这种偏见被克服了。实践一旦证明靠“自由的契约”把劳动力吸引到雇佣劳动中去是困难的，大多数农业企业主就立刻认识到必须研究富农阶级。几年前还厌恶杰鲁诺夫之流、不许他们越过接待室门楣的“高尚的”贵族，现在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第一个去拜访“亲爱的”杰鲁诺夫，并向他学习富农的经营方法。富农的经营方法现在已上升为一种体系。

我们现代的富农阶级的一整套办法的内容包括布置罗网，用这些罗网捕捉和捆住多多益善的邻近的农民。足够数量的劳动力一落进罗网，富农剩下的事就只有享受自己阴谋诡计的果实，强迫被征服的“劳动力”为自己干活，以任何西欧的资本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剥削他们。无论在捕捉的过程中，还是在进行剥削的时候，整个国家组织，整个社会经济制度都设法来帮助富农。

为了奴役劳动力，为了引诱他们落入精巧编织的罗网中，富农手中有许多办法。我们利用观察家的意见，尽力指出其中的若干办法。

国家和国库对工人的直接剥削为富农准备了活动余地，并给他们提供了以稳定的步伐走上第一段艰难道路的机会。我们顺便提一下彼得堡报纸的外省观察员……的说法：“早春……是（农民）没有钱、没有工作、有时甚至没有粮食的时候，是困难和饥饿的时候……8月份是缴纳上半年赋税的期限，我们很少有既不积欠税

款，又能如数交清今年税款的幸运省份……借钱交税近几年已成了我们农民生活中普通的正常现象。一个既不经商，又不实行富农经营方法的普通农民除纳税外几乎从不借债；只有他的马或牛死了，缺几个卢布再买一头‘小牲口’时才借债。后一种借债是少有的和偶然的事，而借钱纳税在许多地方却是经常不断的……不过，不要以为只有那些最贫穷的农民才借钱纳税，恰恰相反，只借钱缴纳春季税、不借债就能交清全部秋季税的农民就算是一个规矩的好纳税人，就被认为是一个较富裕的当家人。穷的是那些即使在秋季也没有能力自己缴纳税款的人。”观察员主要谈的是以现钱偿付利息的借款；关于其他的奴役形式他完全没有谈到，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来谈。按照观察员的意见，这种借贷的利息是很高的：年息是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很遗憾，必须承认，即使这么高的利息借债人也很少维持不变。通常利息要高得多。例如，从下新城省马卡里耶夫县的一个记者的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年利百分之四十八是不高的利率，百分之六十是正常的利率，百分之一百二十是稍高的利率，百分之二百四十是太高了，在少数情况下利率竟达到百分之三百”。提高利息的方法的创新和精巧有时达到很高的水平。例如，那个马卡里耶夫县的记者报道说，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强盗心肠的人“廉价大量买进生活必需品，象面粉、盐等，或者在农民困难的时候购买他们的产品，譬如买一百张蒲席花十六卢布，实际上却值二十卢布。他把蒲席借给想借钱的人，一百张作价二十二个卢布。立借据时规定全部借款的月息是百分之五。一般说来农民不可能立即将货物卖出去，可是他又迫切需要钱。农民还得去找那个高利贷者，后者一定买下他的蒲席，但一百张只花十五卢布了。有时这种买卖的规模很大，整个村社都是债务人。全县整整一半居民都受外来强盗的奴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毫无办法，因为这种人善于毁赃灭迹”。

驱使农民去做这种交易的不只是他自己的意志，甚至也不是贫困所压服了的意志。不，这里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制度。迫使农民去订立这类吃亏的借据的还有乡村当局，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执行上司的命令，只要不太延误缴纳欠款就行；这里起很大作用的还有同村人，特别是较殷实的同村人，他们怕在征收欠款时自己的财产会因存在连环保而遭受严重损失。据上面提到的那个观察员说，对那些没有别人的帮助不仅在春季而且在秋季也无法缴清税款的农民，乡村当局毫不客气：它“自行物色一个有钱的人，同他讲条件，而粗心大意的农民只要立个字据，说明向某人借了多少卢布缴纳税款，这个所谓的契约也就立即在乡公所里备了案”。这个作者说，在农村放高利贷的有富农、小贵族地主（而大贵族地主呢？），有时甚至还有农村的“神甫”——教区牧师。“由于这种剥削，大批的乡村贫穷了，大批的村庄破产了。”

显然，作者揭露的是小富农高利贷者，但是这一类人中也有大家伙，据两篇通讯中引证的在马卡里耶夫县一个居民证实，全县有一半人陷入一个强盗的罗网中。我们图拉省的一个记者向我们举了另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对周围农民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剥削。图拉省的富豪地主—富农马宁以各种不同的条件向周围的农民发放贷款，结果掌握在他手中的不是一个、两个县，而是占毗邻两个省很大一部分地区的整整十一个县。据记者说，马宁一年放出零星贷款十一万多卢布，因而他手里经常控制着将近一万农民，一万个农户。

马宁的富农活动的性质已从富农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了第二阶段。富农的第一阶段，即借款必须以现金按期如数偿还和付息，再加上国家直接的剥削，间接和直接的赋税，这是奴役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这里只不过准备了基础，这里采取的措施是使基础变

得令人更容易感到奴役剥削有成果。纯粹的奴役只是到富农发展的第二阶段才开始。富农的第二阶段是：农民已被掠夺一光，债台高筑，迫切需要新的借款，但已丧失了一切信用，于是不得不（当然不是强迫，而是“自愿”）订立契约，以做工来偿还他所借的钱或实物。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图拉省的“银行家”马宁只要求远地农民或他不需要其劳动的人以现金偿付利息；其他农民不是以现金，而是以做工来偿付利息。贷款几个月须付十二——十五个卢布。马宁在定协议时规定给自己干下列活计：农民有义务给他耕种一俄亩土地，即运送厩肥，翻耕土地，耙地，耙二、三遍，播种，耕地和耙地，收割，打捆，把这一俄亩土地的粮食运走。这整个程序至少需要十一个使马的劳动日和五到六个人工，按照当地价格，虽然是很低的价格，也值五到六个卢布。马宁在这些条件下发放了一万多卢布贷款，他得到的不是利息，而是大约八千个使马的劳动日和四千个人工。这个大概人人尊敬和爱戴的富农用这种办法就能每年“耕种”三百九十六俄亩土地和牧场，耕种光是靠利息，就是说全可以白捞，因为农民应当在几个月后把他贷出的一万卢布归还他。在图拉省并不只是马宁一人进行这种昧心交易；一切地主，一切商人——土地所有者都以极高的利息或以代耕出借粮食。通常一俄石粮食借用四、五个月，农民必须收割两俄亩庄稼，这种劳动按一般价格计算要值六到七个卢布，或完成价值相同的其他劳动。记者说：“所有从事农业的人都敏锐地等候着庄稼汉需要借债的时刻，这是他们强迫农民按照主人能获利的条件受雇去耕地的唯一时刻”。与图拉省毗连的奥廖尔省的情况也是如此。“秋天，农民刚一收割完，全部收获就立即拿去偿还旧债、赋税和欠款。每一个收取农民劳动所得的人都提出自己的要求，指着收获的庄稼，就象指着农民‘多余的’财产一样，根本不管农民整整一冬吃什么、用什么来养活全家。自然，在这样个别地消灭农民的财产后，第二天农民便不得不立即

按照任何条件去订立新的借款契约。农民去找‘恩人’，即邻近的富农，向他借粮，到下次收获前，用自己的劳动偿付异常高的利息”。“这里所有地主，所有承租人和总管都无例外地与农民订立这种有利可图的契约。雇主和工人关系中的这种掠夺形式在这里成了普遍采用的、大家都实行的方法。这里几乎完全不雇佣全年或半年的长工，几乎从不给短工付工钱，地主的大农场和老爷的庄园里所有劳动都是按这种办法进行的，就是说完全是由不需地主支付分文的白劳动的工人干的”。有时候“地主以契约规定他有权任意要求农民在某时某刻做某项工作，因此农民永远不得安心，不知明天是否会要他去给老爷干活，而更可能的是在他时间最宝贵的时候要去给地主干活。”

从各种通讯报道中摘录的这些引文所说的农业中的业主和工人的关系形式被认为是俄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主要形式。在波多尔斯克的报道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一事实的新的证明，此外，还可看到一种独特的形式，正如记者公正地指出的，这种形式近似古老的农奴制关系。一般地说，在我国的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富农是很不一样的，因地方的条件和当地的风俗习惯等不同而不同。在其他地方，如库尔斯克省和奥廖尔省，农民们非常乐意租种几俄亩大的地段。在这种情况下租种土地本身就是富农的收入来源，因为一俄亩土地租价高达十五、二十、甚至二十四卢布，即不仅大大超过纯收入，而且超过这块土地的平均总收入。显然，双方都不能设想准确地履行这种条件，大家都明白，这种高得出奇的租价一方面只是表明土地所有者企图使农民陷入无法还清的债务中，另一方面表明被贫困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准备服从威胁着他的奴役，因为他没有任何办法逃避这种奴役。在另外一些地方，紧挨农民庄园的、农户绝对必需的地段成了奴役的手段，有远见的地主在起草“证书”时就把这些土地划归自己，以便在废除农奴制以后仍能

靠这些土地支配农民的命运。在物质手段还不足以奴役农民的情况下，便采取其他手段，如通过听命于地主的农村当局压制倔强的农民，或者恐吓固执的农民，威胁说很可能发生不幸，那时不给予援助，让他们去为地主干活，等等。地方自治机关的长官和开明的慈善家有时由于愚蠢而助富农一臂之力，但经常是完全自觉地这样干的。例如，在俄国南方，人口稀少，地主不得不雇佣从中部各省偶然来到这里的工人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奴役的手段往往是不够的，倒霉的地主不得不经常屈从于对他们“不利的”纯雇佣劳动的条件。于是土地所有者便采取更高级的手段；他们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去争取调动无所事事的驻军来参加非军事的农村劳动，用这种办法来降低劳动力的价格。去年敖德萨地方自治局以“社会利益”代表的资格出来作土地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中介人；它建议农村中挨饿的农民通过它的帮助预雇给地主干夏季的活，从地方自治局的款项中预支一大笔定金；它预计“饥饿无情”，饥饿的农民一定会按低于正常价格的价格同意去劳动。但这件事失败了。在去年不成功的试验以后，由于我们的“无往而不胜”的军队现在正忙于其他事务，正在“大动干戈”，把不幸的土耳其人的肠子挑出来，使受压迫的保加利亚人从生活和财产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敖德萨的土地所有者在地方自治局的帮助下找到了新的办法。地方的“慈善家”打算建立一个“工作介绍所”，从远地招募工人，但这件事似乎也失败了，于是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便完全成了那些习惯于“靠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劳动生活”的懒惰而顽固的工人牺牲品。

以上我们所指出的土地所有者在他们的富农活动中所使用的方式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这里并未一一列举。当然，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列举和说明所有这些形式。况且材料也不足。的确，外省的记者们时常谈到高利贷剥削和富农剥削，谈到我们的征税制度

对这种剥削的影响；但他们通常只是顺便谈到这一切，谈得很简短，也不准确，而且往往并不明白他们所谈的现象。

例如，一个记者对富农和农村高利贷者在贷款给农民时索取的利息之高感到惊讶；他打算把资本吸收到“农村”来并设立储金互助会来帮助穷人。他的全部错误就在于他把这些贷款看作信贷交易。在更清楚地认识了富农以后发现，这里没有“信贷”可言。这里完全没有“经济上的延期付款”，也没有“资本的转移”。交易只具有信贷交易的表面形式，而它所要解决的任务与“信贷”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个人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一双长满茧子的手和一对牛或马”，而他欠的债却高达五百卢布，在这种情况下把债务看作是信贷交易是十分奇怪的。显然，“农村银行家”把五百卢布之多的钱贷给这个贫农时，并没有打算收回这些钱以及骇人听闻的利息。相反，如果“债务人”如期归还贷款和利息，那么他这个“债权人”就会认为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不得不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只有当债务人没有偿还能力，为了偿还债款和利息或为了得到新的贷款而被迫到他那里去工作时，债权人才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位外省的观察员说：“我们农村的银行家是不会象你们彼得堡的银行家那样破产的。”是的，是这样的，但这只是因为他们业务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收回贷款；否则他们早已破产了，因为大多数农民的债务都是不能指望收回的。农村银行家们所遵循的法则与一切借贷法则不同，只有当他们的皮包里积存着许多“不能指望收回债款的期票”时，他们才能生存，才能养肥。

刚才说明的土地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形式当然不能不对俄国农业的状况产生有害的影响。瓦卢耶夫^①委员会得出结论说，

^① 瓦卢耶夫(1814—1890)——伯爵，曾任俄国内务大臣(1861—1868)和大臣委员会主席(1877—1881)，君主主义者，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改革，捍卫保守贵族的利益。——编者注

俄国的农业正在衰落，这是很有根据的。该委员会还对衰落的原因发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尽管这些思想显然不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的。^① 综上所述，很清楚，在我国缺少能向土地所有者提供他们的经济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工人阶级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是不可能繁荣的；只有在独立的农民经济衰落的条件下，他们的经济才能繁荣。因此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要是看不到，那就奇怪了。——农民的经济、农民的耕作、农民的福利经常不断地受到损害。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吸引农民工人去干活。但是用这样招募工人的办法，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经济难道就能很好地经营吗？工人们干活时不乐意，漫不经心，他们仇视地主，把地主不是看作自己的阶级敌人，而是看作在工作之前就开始劫掠他们的私敌。他们知道，他们的劳动甚至不能为自己挣得一个戈比，因为他们是为早已用光的债款干活，他们热心地劳动也不可能得到什么。西方资本家手中掌握的增加劳动强度的手段就是雇主可以用工资来奖赏工人，这种手段在我们这里是完全没有的。但是对于成功地经营地主经济更大得多的障碍与其说在于工人，不如说是资本家。西欧的“资本”一点也不需要资本家发挥自己的作用；资本自己在执行使命，它除参加自己主人的一切生产外，都在自行积累。在我们这里则不然，资本家不得不以自己的活动去补充自己资本的力量。他经营的成功取决于他个人的毅力，取决于他招募工人大军的某些能力。由于我们俄国的习俗，由于众所周知的大多数俄国地主独立工作的能力差和缺乏毅力，这种情况特别有害。因此瓦卢耶

^① 在委员会讯问的人中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十分坦率的傻瓜，他们不客气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坦波夫省乌曼斯县有一个土地所有者就开门见山地胡说什么，地主经济中农业的不良状况是由于“分给农民土地”造成的，因此他那里的农民不愿去为地主干活，因为他们自己“有三又四分之一俄亩适用的黑土地”。“公正的”委员会不作任何更动就把这一回答写入了自己的报告。——作者注

夫委员会的报告中集中了地主老爷们的抱怨：如工人们懒惰，游手好闲，酗酒，他们不履行条件，玩忽职责，另一方面，地主“滥饮苦艾酒”，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缺乏知识和毅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联系起来归结为一点，即在农民经济并存的情况下经营地主经济是有困难的。只要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并存，它们两者就要互相损害，两者中哪种经济都没有力量去彻底压倒对方，哪种经济都不能摆脱不自然的状况。现制度的保卫者应该把自己的努力用于消灭至今一直保护着农民经济的地契，用于消灭伟大的虽已受到损害的农民占有土地的村社占有制原则。果然，我们看到，我们的贪得无厌的改革家们都把自己的贪婪的目光转到那里去了……

……总之，所有我们的企业主，由小到大、由富农到从事交易所生意的亲王，都需要一个东西。他们都需要自由的无产阶级，只要我们的农民反对剥夺他们财产的靠山，我们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度不消灭，自由无产阶级就建立不起来。瓦卢耶夫和奥尔洛夫-达威多夫公爵叫嚷道：“消灭村社的原则，使小地产顺利地转入大地所有者的手中，那时一切就会很好了。”我们的强盗们看到，那些人是正确的，只有走这最后一步以后才能真正改造俄国的生活，俄国的制度。

我们的改革家们定会看清这一结论，毫无疑问，他们将直接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现在的难以忍受的状况是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的。显然，我们正在接近那个时刻，危机已经不远了。俄国人民及其剥削者将会很快、非常快地采取最后的解决办法。

瓦卢耶夫委员会明确地证明了它想证明的东西，——不能停留在旧制度下，农业如不与人口的增长一起发展，便将衰落，无论农民的农业还是地主的农业都将衰落下去。如果对经济生活的其

他领域也任命这样的委员会，无疑它们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说，必须选择这一或那一种解决办法的时刻到来了，因为将近二十年的实践表明，姑息和补缀都是无济于事的。

摆脱现在困难的过渡状况的出路有两途。改革家们指望，他们仍将是局势的主人，他们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只等待着“大厦落成”的时刻。他们能够很有根据地推断，被贫困和不幸弄到绝望境地的人民将象绵羊一样驯服地放弃自己由于千年的奴役和压迫而保存下来的一切特权，人民将欣然投入他的假恩人为他布下的任何陷阱。消灭土地占有方面的村社原则将是这些假恩人用以停止土地所有者的悲惨生活和痛苦的最后挣扎的 coup de grace^①；但是他们的这一击也将停止我们的农民阶级的存在，并把农民—工人送到一个新世界去，这个世界起初在农民看来是很好的，因为恩人们用假花——高工资、不纳税、个人自由等等装饰它，但是很快就看清了，原来这个世界是无家可归、无处栖身、明天没有保障的无产阶级的世界。

我们的改革家们应当知道，走西欧进步道路的俄国任何进步运动都不可能实现这一宿愿，因此他们必将竭尽全力去越过这个门坎。现在他们不难明白，任何改革，诸如赋税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地方自治机关改革等等，在作出这一击以前，在战胜俄国的村社农民以前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改革必将是或仍将是他们宣告的那些“伟大”原则的赝品。只有在大厦“落成”后才能从人民身上卸下这个现在作为事件自然进程必然因素的赋税重压；只有在这以后，司法不公正才会消失，才可能实行对一切人都“公开的、迅速的和平等的”审判，因为只有到那时富人才不害怕公开，才不耽心在法庭面前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无产者平等；到那时工

① 法文，最后一击。——编者注

业将繁荣起来，沉睡的城市将到处是精力充沛的居民，高耸的工厂烟囱将比钟楼还高；那时田地将获得丰收，用自己的而不是订购来的机器收割；那时才可能出现合乎西欧精神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真正的“立宪”。我们的改革家们描述为摆脱目前困难处境的唯一出路的前景是诱人的。但是他们错了，错就错在把这当作唯一的出路。还有另外一条出路……

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时期，大生产是任何一个想留在文明民族的大家庭里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大生产可以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经营，也可以在联合的基础上经营。爱用他人劳动的人——改革家们——当然是要把俄国拉到第一条道路上去。但是，如果俄国人民自己未及时解决我们时代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贫困和压迫不能把人民压到完全糊里糊涂的地步，压到不能按自己的意志驾驭自己命运的地步，如果在每次局部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无力的爆发以后必然遭受的残酷惩罚不能恐吓人民，如果相反，人民能从自身找到为自己的利益自觉地团结斗争的因素，进行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剥削者的起义的因素，那么到那时，毫无疑问，伟大的历史的抉择就将用另一种方式作出。到那时历史的抉择将是普遍而彻底地消灭一切旧的义务，这些在劳动者肩上的义务是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现代的法利赛人^①至今还在以狡猾而又拙劣的诡辩为之辩护，他们的伪善和假仁假义的面具必将被撕下；那时将消灭一切深入人民头脑中的旧的偏见和谬误。千余年以来人民一直被那些出卖灵魂的新老著书立说者弄得愚钝不堪；最后，那时将消灭在过去黑暗的年代中备受关怀、珍爱、保护和支持的一切卑劣的和道德的东西……在更自然、更合理、更有益、更公正的基础

^① 古犹太的宗教政治派别，他们曾与早期基督教团体作过无情的斗争，因此在《新约》里被贬为伪善者。——编者注

上组织起新式的社会生活。

在不久的将来，在最近的将来，俄国人民将作出这一伟大的历史抉择，将对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给予坚决的回答。决战的时刻正日益临近。

“谁能在这一场力量悬殊的争论中站住脚呢？”

当然是那些对行动计划更深思熟虑的人，更好地准备战斗的人，更自觉地对斗争任务的人。

改革家们并没有打盹。他们看清了自己的目的。使用的手段是现成的，历史本身已为他们准备、完善、传授了这些手段。智力的萎靡和起腐蚀作用的利己主义在斗争的时刻可能消失，而代之以毅力和自我牺牲，正如历史的先例所表现的那样。

人民怎么样？他们是否在准备战斗？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72—285页。

《开 端 报》^①

现行的经济制度和由这种制度产生的政治制度，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剥削人民的劳动。这种剥削制度在现

① 《开端报》是由俄国革命民粹派于1878年在彼得堡地下出版的，它的主要任务是抨击沙皇俄国的各种社会现象，从“社会主义的原则观点”出发阐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实。编辑部认为各个派别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分歧，它期望俄国所有的革命者予以协助。报纸的编辑方针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编辑部的主要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该报的第1号于1878年3月出版，最后一号（第4号）于同年5月出版。——编者注

代国家里已经造成了一个人数极少的统治阶级，他们利用掠夺手的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使人民沦为悲惨的、不幸的奴隶，他们与古代奴隶和农奴所不同的，仅仅是他们现在被法律嘲弄地称为公民而已。诚然，统治阶级已经无权用鞭子和棍棒来抽打工人了，不过他们也不需要这些东西，因为鞭子和棍棒现在已经完全被饥饿和铁的供求规律所取代。铁的供求规律把工资压低到了勉强糊口的程度，而把工资和生产劳动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差额全都装进主人的腰包；总而言之，主人仍然象在奴隶制和农奴制时代一样，靠工人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和积累财富。国家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始终是由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的；历史证明，国家政权也是一成不变地坚持和维护它所赖以发展和巩固的那种经济制度的。象以往的奴隶制、封建制和农奴制是国家的制度一样，现在的国家也把支持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国家本身就是直接的剥削者，而且处处都在不同程度地坚持执行它的使命。总起来说，只有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才会把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福利的希望寄托于国家；而在俄国，在这个被奴役的人民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教会和法律都把剥削人民的制度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人民的反抗遭到刺刀和苦役的镇压、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人们被长期囚禁在监狱和要塞里受苦、言论自由被窒息、集会一概被法律定为犯罪行为的俄国，我们说，想要政府实行开明措施的一切期望，都只会引起极大的蔑视。因此，人民摆脱奴隶般的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社会革命意义上的暴力变革。现在，足以迅速消灭现存制度一切基础的革命力量还没有在人民中间积聚起来；然而，无容置疑的是，由于同社会结构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条件，人民现在正经历着革命力量积聚的过程，如同我们的地球行星在宇宙空间运行一样，是不可抗拒和永不停息的。根据革命运动的普遍规律，这个过程所具有的内容是：人民对现行制度日益不满，人民的

世界观的批判视野正在扩大,也就是说,更正确地认识现行制度的观点正在形成,关于现行制度的原则和合法性的错误观点和概念正在消失,最后,根据群众的需要和他们对自己利益的领会程度而提出积极要求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对于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对人民中间发生的运动漠不关心和脱离人民群众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在革命力量积聚的过程中(既然这种积聚确实正在进行,而且还远远没有完成),他就应当完全地、毫无条件地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因此,我们的活动不能超越积聚本身的自然过程,而应当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促使人民的不满情绪达到一触即发的革命状态,促使人民的批判达到否定现存社会的基础和促使人民的世界观达到认清社会变革的直接任务。群众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和对造成这一祸害的根本原因所持的批判观点,作为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在感情上、思想上的一种表达,都是相互密切联系和经常相互起作用的。在一定的情况下,上述两个方面都会引起反对现行制度的积极斗争,即为了相反的原则而进行的自我保全的斗争。在俄国人民处于无政府状态和他们同国家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情况下(这种联系会使政府有可能装设避雷针——虽然也许是以宪法的形式——来防止人民的风暴),这一在目前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暴动的斗争,在最近的将来至少也会以同样的规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一斗争在人民的生活中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现象,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决不能回避它,恰恰相反,应当弄清楚自己参加这一斗争的性质。当然,只有生活在人民中间,才能对每一个具体场合应当如何采取行动提出正确的办法;但是,我们毕竟认为,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新近取得的经验和对于人的本性的心理方面的即使是起码的了解,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社会主义者预先判断宣传鼓动在人民骚乱中起的一定作用。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暴力肆无忌惮地凌辱人的本性的可贵素质,践踏人格和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

这种情况下，当对暴力的可耻屈服有引起人的基本道德因素和社会因素瓦解的危险时，即使为了表示没有希望的抗议而进行最积极的鼓动，也仍然是每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神圣职责。暴力的另一种更为普遍的形式就是系统的暴力：经济剥削和国家剥削。暴力已经渗入现代人的身心，但人们有时把它忘掉了，就象他们在呼吸时不注意空气的存在一样。有时一个极小的口实就可以使人民的不满情绪爆发成为对剥削者的强有力的、积极的反抗。我们认为，在人民当中每一次出现的积极斗争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群众在当前所具有的高度敏感，乃是进行主要在于指出剥削的普遍原因和根本原因的宣传的有利条件。一般地说，这种斗争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但是，当各种情况有利地凑合在一起时，通过鼓动也是可能引起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鼓动是适当的和有益的——这多半是在通过斗争的成果可以预料到斗争的胜利的时候，因为除了极少的例外，失败会对群众产生消极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在斗争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情况下，鼓动作用的大小也同样应当主要取决于获得实际成果的可能性。我们说过，我们的革命活动还应在于使人民的世界观达到认清社会变革的直接任务的高度。这只有通过经常不断的社会主义宣传才能达到。俄国人民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而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也象其他民族一样还没有使自己习惯于国家思想和资产阶级本能；他们不顾被法律神圣化了的私有制的原则，要求共同分配土地，并且尽管遭受了长期野蛮的、农奴制的、国家的压迫，却向往广泛自由的生活；他们的以“土地和自由”这个对他们来说明白易懂的公式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适合人民接受能力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是达到我们的既定目标的一种强大工具；不过，这种宣传当然应该仅限于扩大和发展人民的世界观，而不是相反，把它局限于各种现实的要求，即人民的各种不同的经济

要求和社会要求方面，一句话，要有助于制定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象剥削制度本身一样是普遍性的，并且象无产阶级一样是国际性的；如果真正的社会革命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人类的、国际的事情，那么，用社会主义原则来阐明人民生活本身提出的人民革命运动的任务，就意味着把全人类的、国际的原则贯彻到运动中去，并且意味着把这个运动同其他民族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社会主义原则是一面国际主义的旗帜；长期的社会变革过程可能要到这些原则体现在社会制度上才告终结，它们象指路明星一样应当成为我们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一、应当由没有任何强制的中央政权、通过自由的公社的自由联合而组成的联邦来取代等级的国家；而把单独的公社和联邦联结起来的力量，只能存在于利益的共同和一致之中，这种共同和一致激励人们“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而活着；二、土地和生产工具是全体人民的财产；三、劳动者是自己劳动产品的唯一所有者；四、在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这种交换，是联邦和公社的职责；五、实行完全的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实行无条件的信仰、言论、学术研究和集会自由。最后，我们还要就组织小规模、抱有各种宗旨的人民团体的问题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这种组织有助于发扬团结精神和集体精神，为整个宣传鼓动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此外，由于在人民中经常不断地发生暴乱和骚动，作为核心的有组织的团体就能够为团结“暴动者”服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革命力量积聚的程度，也可能变成更广泛的、更革命的战斗的人民组织的因素。组织工作是一桩讲究艺术的、困难的事情；首先起来从事这件工作是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18—321页。

我们在农村中的任务^①(摘录)

雅·瓦·斯捷法诺维奇

……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关于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学说。就人民生活的这个范围来说,就人民日常生活的经济形式的范围来说,还应当着手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活动家的立足点的坚实可靠程度究竟怎样?

俄国的庄稼汉是特别的农民,所以人民的基本精神,人民的某种未来的素质也应当表现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上。我们知道,大俄罗斯的土地关系的形式就是村社。我们知道,村社的经济原则就是废除对土地所有的继承权。而继承权的废除,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公式。这就是我们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发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平等只能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的确,只有彻底废除继承的原则,劳动和劳动者的彻底解放才有可能;但是,对于最主要的生产手段——土地来说,继承的原则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在俄国人民生活中有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形式的一种良好的基础。这就是还没有引起我们主要注意的那个生机勃勃的基础,然而连站在社会主义者行列中的远处的人们,也都认为俄国庄稼汉的村社精神是任何一个西方民族所不具有的一种强有力的因素。

例如,哈克斯特豪森^②认为,村社感到迫切需要的和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就已感到迫切需要的,就是劳动的村社性和劳动产品的

^① 本文原载俄国《村社》杂志1878年第8—9期。——编者注

分配。另一个俄国村社研究者在结束他的著作时写了如下的结论：“……在我国农民当中，从他们的生活一开始就存在过而且现在仍然存在着一种非常完善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它同我国和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同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相反，人民的制度否定使所有制原则适用于土地这个非劳动产品的做法，认为土地是一定地区的全体公民的不可分割的财产。人民的制度是建立在互助互爱和共同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同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相对立的基础并可以称之为个人主义和利益竞争原则基础之上的，它规定全体成员在劳动和产品面前一律平等，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同时承认这是真正实现共同幸福的思想的唯一途径。这些原则是经受了长期经验教育的人民自觉的产物，尽管存在着各种可能的不利影响，甚至现在还在渗透到农民的整个经济生活制度中去，但是这些原则的巩固性是不容置疑的。村社对于各种可能的情况都具有非常好的适应能力，但却又在任何方面都不背离自己的基本原则。这种土地占有制度只有通过暴力的方法才能根除掉。”（索柯洛夫斯基：《俄国北方村社史概论》第182页）^②

虽然目前在小俄罗斯村社的土地所有制和小块土地所有制一起所占的比例不大，^④但它即使在这里也无疑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查波罗日哥萨克组织坚持了二百五十九年的原则，清楚地证明小

^② 奥·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于1847年在德国出版，并于1869年译成俄文。哈克斯特豪森表明他自己是村社制度的拥护者。民粹派曾利用他的这一著作来为农民村社制度辩护。——编者注

^③ 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巴·亚·索柯洛夫斯基在其《俄国北方村社史概论》（187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论证了这样一种民粹主义思想，即在俄国的农民中间，从他们生活的最初阶段直到改革前的时期，一直存在着一种和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索柯洛夫斯基在谈到农民村社时认为政府只有通过强制的办法才能废除这种制度。他主张保持和发展村社的土地所有制。——编者注

^④ 根据对叶卡特林娜、赫尔松、切尔尼哥夫、波尔塔瓦四省的十个调查统计资料，有四分之一的居民是村社社员（奥格辽夫《五年间》）。——斯捷法诺维奇注

俄罗斯人民是多么富有村社的精神。查波罗日人几乎没有农业，因此他们的村社精神表现在手工业方式上，特别是表现在哥萨克组织的政治制度上。查波罗日遭到破坏已经有一百年了(1775年)，这么长的时间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志趣。诚然，由于波兰和俄国两国利益挑起的小俄罗斯小贵族的无休止的内讧所引起的骚乱破坏，村社在乌克兰并没有站稳脚跟，虽然村社的外形东倒西歪，但是它的精神却在乌克兰人中间经久不灭。即使在目前，手工业劳动组合在小俄罗斯也仍然非常普遍(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雷洛夫，有成群的人结成流动割草队和船夫劳动组合)。波尔塔瓦省有个村甚至实行了农民集体耕种土地和集体分配谷物的做法。^①农民渴望从小块土地所有制过渡到村社土地所有制的情形，也是常有的。例如，奇吉林县有十二个乡要求不要“按户”而要“按人口”重新分配来解决土地占有的问题，在小俄罗斯到处都存在一种深入人心的主张，就是认为全部土地应当只属于耕种它的人即农民，而且应当“按人口”分配土地(在大俄罗斯是“土地平分”)。这就是得到文献证明并认可的人民的主张，在其他地方这种主张得到了详细的发挥。我曾经听说，农民规定地主只能保留庄园，而且庄园四周要有挖好了的沟(如在基辅省和波多尔斯科省)。乌克兰人在这方面的世界观是，既否定非劳动产品的所有制，又具有他们理想的村社性质。

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村社精神，表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形式方面。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制度相反，村社精神为所有的人人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提供平等的权利。米尔或格罗马达^②在讨

① 参见《基辅电讯报》。——斯捷法诺维奇注

② 格罗马达(Громада)是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不久产生的乌克兰的自由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1876年被沙皇政府下令取缔，实际上存在到本世纪初。

——编者注

论自己的需要时,历来是习惯于自己解决同它直接有关的事务的。如果我们能够努力观察人民生活的这个方面,那就会从中发现米尔的合理的看法和最公正的范例。人民只有在不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利益的事物上,和在对他们有直接危害的多数情况下,他们才会等待长官的命令。常常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合理地表现出来的农民自治清楚地说明,人民可以无须任何一个政权的干预而行事。公正的思想在所有的社会职能方面给米尔以指导,例如是否要在米尔的成员之间重分土地,或者审理夫妻之间的争讼(见哈克斯特豪森、叶菲缅科等人的著作)^①。俄罗斯和小俄罗斯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性格的基础就是这样。

如果分析一下我们在接触人民实际生活时所提出的东西,就会发现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还不能作为认定我们的革命目的是没有基础的说法的根据。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农民同地主老爷的关系究竟怎样,农民认为土地是上天的恩赐,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得到一份,农民把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的做法叫作暴力掠夺,并且期待着到处都能尽快结束这种不公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确信,人民对官吏的憎恨多么深,他们把各种苛捐杂税和兵役义务看成是最大的不公正。在小俄罗斯,我们发现人们把神甫和官吏同样看待,对他们充满极度的蔑视,就象蔑视讽刺基督教道德的漫画一样。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对国家和官方教会的憎恨吗?我们所有有机会同农民谈话的人,都能从他们的身上看到这种憎恨,并且发现他们在每一次同当局冲突时由于感到

^① 除了奥·哈克斯特豪森早先的著作以外,民粹派还通过农民生活研究者、民族志学者亚·雅·叶菲缅科和彼·萨·叶菲缅科的许多著作来证明自己的思想。这两位学者在七十年代发表的著作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俄罗斯居民民族志资料》(1877—1878年莫斯科版)、《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人民司法惯例汇编》(1869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版)、《小俄罗斯咒语集》(1874年莫斯科版)等等。——编者注

自己无能为力而竭力压抑着的那种感情。

因此，一方面，人们向我们明确地指出，人民中间的社会主义因素多少世纪来已经在他们的意识中固定下来，并且已经渗透到他们的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中；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对国家的憎恨，显然，这种憎恨是由于我们本能地理解到阻碍人民感到亲切的村社原则自由发展的国家制度的绝对镇压作用。

国家、大土地所有制和官吏是造成村社停滞的原因，是造成村社贫困和它的诸如米尔压制个人这样一些可悲的方面的原因。^①

总之，大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②都保持了按照自古以来作为它们的日常生活原则的精神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形式的健康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素质。物质上的缺乏保障和国家的压迫是在这方面发展迟缓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应当这样来表达真正的革命人民的要求：一、把全部私有土地变为目前存在的那种人民村社的所有制；二、米尔或格罗马达的独立性就在于执行全部社会职能，即废除国家。

这就是也将成为俄国一切革命者的当前任务的两项伟大的人民任务，如果他们愿意仔细体察自己的人民的生活条件的话。在我国，只有通过实现生根于人民中间的愿望和理想，只有通过自由的、不受任何压制的人民生活的向前奔流，才有可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当我们提出了俄国的社会革命任务

① 后一种情况是单纯由国家制度造成的：连环保和身份证制度重视的不是农民的个人独立，而是他们的纳税能力，因此不管是否愿意，米尔都要压制个人。必须消除一切外来的、强制的影响，必须废除国家，由个人确定自己同米尔的关系，确定自己的独立的愿望，而不致在村社精神和村社制度方面受到打击。——斯捷法诺维奇注

② 我们不知道加入俄罗斯国家的其他民族……——斯捷法诺维奇注

以后，除了同我们的人民并肩前进而外，我们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14—317页。

“土地和自由”社纲领^①

一、1876—1877年。“土地和自由”社的第一个纲领

我们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最近将来切实可行的，即当前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范围之内。按照我们的意见，可以把它们归纳为最主要的三点：

1. 将全部土地转交到农村劳动阶层手中（我们深信，俄国三分之二的人将在村社的基础上占有这些土地。）并进行平均分

① 这个纲领当时并未公布。它最初保存在《土地和自由》杂志的一位编辑尼·夏·莫罗佐夫的皮包里。后来皮包又转交给自由派报纸《评论报》秘书弗·拉·佐托夫保存。该纲领最初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土地和自由”社及民意党文献》一书。

在文献中发现的这个简短纲领制定于1876—1877年，即在“土地和自由”社实际成立之前。很可能，该纲领制定于“北方革命民粹派”形成时期，“北方革命民粹派”在1878年时自称为“土地和自由”社。纲领中没有明确表达出无政府主义思想。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被同样认为是准备革命的形式之一。“土地和自由”社的第二个纲领（1878年）中声明同情无政府主义，但附有不可能立即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保留意见。主要的经济要求同第一个纲领所表述的没有区别，但特别强调必须尽快地实现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编者注

配。

2. 根据地方的愿望将俄罗斯帝国分为几个部分。

3. 将全部社会职能转交到村社手中，即实行村社的完全自治。(不能把这个要求称为全民的要求，因为有一部分村社迫切要求这样做，但大部分村社在精神和智力的发展方面尚未达到这种程度。我们认为，每个村社联盟应该将一部分社会职能交给由联盟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组成的政府。我们的责任仅仅是力求使这部分职能尽可能地缩小。)

只有通过暴力变革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

按照我们的意见，准备和完成这种变革的手段是：(1)通过言论，主要是通过行动进行鼓动，目的在于组织革命力量和加强革命感情(如暴动、罢工，总之行动的途径同时也是组织革命力量的最好的途径)。(2)造成国家的混乱，这将使我们有希望依靠在最近将来鼓动所造成的组织力量而取得胜利。

二、1878年。“土地和自由”社的

第二个纲领

初 稿

在各种类型的西欧社会主义中，我们完全赞同联邦国际即无政府主义者，但认为在当前要完全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是不可能的。

由于我们一方面承认，党只有在它依据人民的要求行事，不违背历史制定的人民的经济和政治理想时才是有影响的和强大的，另一方面，俄国人民的本性是如此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以致如果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现在能够实现的话，就将为俄国的社会事业的进一步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活动应该依

据下列原则进行：

1. 人民的法律观念认为，把土地归为私有财产的制度是不公正的；按照人民的理解，“土地是属于上帝的”，每个农民有权拥有能用自己的劳动耕作的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我们应该要求将全部土地转交到农村劳动阶层手中并进行平均分配。

2. 现存的国家制度是与俄国人民在历史上证明他们向往村社的充分自治以及村社自由联合为乡、区和州等等的本性相抵触的。因此我们应该争取将全部社会职能转交到村社手中。即实行村社的完全自治。不能把这个要求称为全民的要求，因为有一部分村社迫切要求这样做，但大部分村社在精神和智力的发展方面尚未达到这种程度。我们认为，每个村社联盟可以自己决定，它将把哪些社会职能交给由联盟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组成的政府。我们的责任仅仅是力求使这部分职能尽可能地缩小。

3. 现时俄国境内有一些地区甚至民族，例如小俄罗斯、波兰、高加索等，它们苦于这样的联合，一有可能就准备分离出去，因此我们不应该阻挠根据地方的愿望将现有的俄罗斯帝国分为几个部分。

所以我认为，“土地和自由”作为多次人民运动的口号，作为向现时俄国政府的影响还未渗透的边区进行移民的组织原则，这个公式就是现在也最好地表达了人民对占有土地和安排社会生活的想法。由于我们认为，在现时条件下不可能使人民习惯于其他抽象的，也许是最好的理想，我们决定在我们的旗帜上写上历史地制定的公式，“土地和自由”。

不言而喻，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于俄国政府采取的保护制度，资产阶级文明的各种祸害得以愈益深入地渗透到人民生活之中，致使村社面临毁灭的危险，并在上述问题上多少歪曲了人民的世界观，因此这个公式只有通过暴力变革并且是尽可能迅速

的变革才能付诸实现。

在俄国，人民理想和国家要求之间的上述矛盾过去和现在都引起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运动，形成了带有宗教革命性质的教派和有时表现为俄国人民对现存制度进行积极反抗的一帮匪徒；但同握有五十万人以上军队的国家这个有组织的力量进行的斗争是太悬殊了，何况人民有很大部分是分散的，在他们周围有着各种权力机构，主要是经济机构，以至他们很难建立起广泛的人民组织去和政府机构进行对抗。

从上可以得出革命政党应该全神贯注的两项主要的总任务：

(1)帮助人民中那些已经懂得上述必要性的革命分子组织起来，使他们同现有的人民革命组织联合在一起；(2)削弱、动摇，也就是破坏国家力量，我们认为，没有这一点，即使是最广泛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起义计划也不能保证取得成功。

因此我们的具体任务如下：

(一)组织工作部分

1. 把在知识分子和同知识分子有直接接触的工人中间同意按上述纲领的精神进行活动的成熟的革命者严密地组织起来。

2. 同敌视政府的带有宗教革命性质的教派，例如逃窜派和拒交税款派、史敦达教派等等接近甚至联合起来。

3. 同不满情绪最尖锐的地区建立尽可能广泛和牢固的联系，并在这些地区的农民中建立可靠的居民点。

4. 把有时出现在各地的下游地方一帮流民式的匪徒吸引到我们方面来。

5. 同集中着大小工厂工人的各中心交往和建立联系。

从事上述后四项工作的人们的活动应该包含在各种形式的强调和概括了人民迫切要求的最广义的鼓动之中，从公开反抗地方

当局起，直至武装起义即暴动为止。当然，鼓动员在同工人和农民的个人交往中不能否定交流思想和进行宣传的重要性。

6. 在大学中心的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宣传鼓动，这些知识分子在初期是补充我们组织的主要人员；

7. 同自由派建立联系，使他们对我们有利；

8. 用文艺形式宣传我们的思想和进行鼓动，包括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和尽可能大量地散发有煽动性的传单。

(二)破坏工作部分

1. 在军队和主要是在军官中建立联系和成立组织；

2. 把在某些政府机关中供职的人员吸引到我们方面来。

3. 有计划地消灭政府中的首恶分子或突出人物。

4. 在清算之日，要大规模地推翻政府和消灭凡是支持或可能支持某种敌对制度的人。

定 稿

我们最终的政治和经济理想是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

但是，由于我们一方面承认，党只有在它依据人民的要求行事，不违背历史制定的人民的经济和政治理想时才是有影响的和强大的，另一方面，俄国人民的本性是如此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以致如果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现在能够实现的话，就将为俄国社会事业的进一步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最近将来切实可行的，即当前人民要求的范围之内。按照我们的意见，可以把它们归纳为最主要的四点：

1. 人民的法律观念认为，不从事耕作的人占有土地的制度是不合理的。按照人民的理解，“土地是属于上帝的”，每个农民有权拥有能用自己的劳动来耕作的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我们应该要

求将全部土地转交到农村劳动阶层手中并进行平均分配。(我们确信,俄国三分之二的人将在村社的基础上占有这些土地。)

2. 关于政治理想,我们认为,尽管俄国人民对于村社的内外关系未必有一致的明确的看法,但是他们渴望完全的米尔自治。我们的意见是,每个村社联盟可以自己决定,它将把哪些社会职能交给由联盟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组成的政府。我们的责任仅仅是力求使这部分职能尽可能地缩小。

3. 俄国人民在宗教方面是宽容异教的,而且可以说是向往信教自由的;因此我们应该争取最充分的信仰自由。

4. 现时俄罗斯帝国境内有一些地区甚至民族,例如小俄罗斯、波兰、高加索等,一有可能就准备分离出去。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根据地方的愿望促使将现有的俄罗斯帝国分为几个部分。

这样一来,我们认为,“土地和自由”作为多次人民运动的口号,作为向现时俄国政府的影响还未渗透的边区进行移民的组织原则,这个公式就是现在也最好地表达了人民对占有土地和安排社会生活的想法。由于我们认为,在现时条件下不可能使人民习惯于其他抽象的,也许是最美好的理想,我们决定在我们的旗帜上写上历史地制定的公式:“土地和自由”。

不言而喻,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文明的各种祸害愈益深入地渗透到人民生活之中(这是由于俄国政府采取保护制度并作出努力的缘故),致使村社面临毁灭的危险,并在上述问题上多少歪曲了人民的世界观,因此这个公式只有通过暴力变革并且是尽可能迅速的变革才能付诸实现。

在俄国,人民理想和政府要求之间的上述矛盾过去和现在都引起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人民运动,形成了带有宗教革命性质的教派和有时表现为俄国人民对现存制度进行积极反抗的一帮匪徒。但同拥有约五十万人军队的国家这个有组织的力量进行的斗

争是太悬殊了，何况人民有很大部分是分散的，在他们周围有着各种权力机构，主要是经济机构，以至他们很难建立起广泛的人民组织去和政府机构进行对抗。

从上可以得出俄国社会革命党应该全神贯注的两项主要的总任务：

1. 帮助人民中的不满分子组织起来，使他们同现有的人民革命组织联合在一起，依靠鼓动来加强这种不满。

2. 削弱、动摇，也就是破坏国家的力量，我们认为，没有这一点，即使是最广泛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起义计划也不能保证取得成功。

因此我们的具体任务如下：

(一) 组织工作部分

1. 把在知识分子和同知识分子有直接接触的工人中间同意接我们纲领的精神进行活动的成熟的革命者严密地组织起来。

2. 同敌视政府的带有宗教革命性质的教派，例如逃窜派和拒交税款派、史敦达教派等等接近甚至联合起来。

3. 同不满情绪最尖锐的地区建立尽可能广泛和牢固的联系，并在这些地区的农民中建立可靠的居民点和基地。

4. 把有时出现在各地的下游地方一帮流民式的匪徒吸引到我们方面来。

5. 同集中着大小工厂工人的各中心交往和建立联系。

从事上述工作的人们的活动应该包含在各种形式的强调和概括了人民迫切愿望的最广义的鼓动之中，从公开反抗地方当局起，直至武装起义即暴动为止。当然，鼓动员在同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同分裂派教徒）的个人交往中不能否定交流思想和进行宣传的重要性。

6. 在大学中心的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宣传鼓动,这些知识分子在初期是补充我们组织的主要人员和经费的部分来源。

7. 同自由派建立联系,使他们对我们有利益。

8. 用文艺形式宣传我们的思想和进行鼓动,包括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和尽可能大量地散发有煽动性的传单。

(二)破坏工作部分

1. 在军队和主要是在军官中建立联系和成立组织。

2. 把在某些政府机关中供职的人员吸引到我们方面来。

3. 有计划地消灭政府中的首恶分子或突出人物和支持某种敌对制度的任何人。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40—346页。

《土地和自由》杂志纲领^①

谢·米·克拉夫钦斯基

土地和自由! ——这就是多次从俄罗斯底层掀起威力强大的自发运动的两个富有魔力的字眼。这两个字眼几乎两次把俄罗斯国家推翻,并且至今仍深深激动着全俄罗斯和普通农民的心灵。

^① 革命民粹派的《开端报》停刊后,在该报的秘密印刷所里开始印行《土地和自由》杂志。该杂志第1期于1878年10月26日在彼得堡出版,1879年4月8日出版了最后一期(第5期)。此外,作为杂志的增刊还出版过登载革命新闻纪事的《土地和自由》小报。《小报》第1号于1879年3月12日出版,第6号于同年6月14日出版。本文阐述了《土地和自由》杂志的基本的纲领性的原则,刊登在该杂志第1期上。——编者注

土地和自由！——这就是我们那些忠于本国人民的精神和历史的先驱——六十年代的民粹派社会主义者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口号。

今天，我们也把这同样的两个字写在我们的旗帜上。

我们深信，只有那些在人民群众的头脑和愿望中扎根的文化形式，在历史上才有发展前途；我们不相信通过事先的工作就能在人民中间树立某种与过去全部历史在他们身上培植起来的理想完全不同的理想。我们认为，诸如此类的尝试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各个地方和各个民族的以往一切运动——从农民起义到巴黎公社——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任何革命运动，随着本身的不断扩展，必然使那些作为运动最早起因的革命因素得以发展、纯净和完善。

革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革命是由历史准备的。革命者一点也不能加以更改。他们只能是历史的工具、人民愿望的表达者。他们的作用仅仅在于为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而把人民组织起来，并发动人民为了实现这些愿望和要求而进行斗争，加速那个在一定时期内按照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发生的革命的进程。除了起这个作用之外，他们是微不足道的；而当他们起这个作用的时候，他们就是历史上强有力的因素之一。

因此，历史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造成的人民的理想，应当是一切真正革命的纲领的基础。

在各个时代，俄国人民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样的规模奋起斗争，提出的要求都是土地和自由。

他们要求土地成为耕者的共同财产；自由成为人人能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普遍权利。

夺取地主和贵族的土地，驱逐乃至有时全部消灭国家的官吏及其代表人物，建立“哥萨克社会”，即由选举的、负责的并可经常更换的人民意志的執行者所领导的自由的自治村社，——这就

是人民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布加乔夫、拉辛及其战友们始终不变的“纲领”。

毫无疑问，即使现在这也仍然是绝大多数俄国人民的纲领。

因此，我们民粹派革命家也接受这个纲领。

通过这个纲领，我们把土地问题提到第一位。至于工厂问题，我们则把它放在一边，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没收工厂没有必要，而是因为历史在西欧把工厂问题放在第一位，但在我国却根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代之以土地问题。可是为了土地而掀起的革命运动，势必会马上想到没收工厂和彻底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保留这种生产，革命运动就会自掘坟墓。城市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这样，即使它在开始时是不依农村为转移的，但在最初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农业社会主义的问题。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不准备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前解决那些涉及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个别的形式问题。这都是未来的问题。让我们把未来留待将来去解决吧。当前面临的是一项十分巨大的任务：实现人民革命，只有这个革命才能使人民头脑中已经形成的那些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发展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六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政党第一次把人·民·革·命的字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在七十年代，运动由小组活动发展成为普遍的、群众性的、遍及全国的运动，尽管它受到血腥的镇压，但仍一往无前，一年比一年更加波澜壮阔、更加气势磅礴。

现在我们正处在新的十年和旧的十年交替的时刻，正经历一个无论就革命活动的激烈程度或者就革命所具有的十分特殊的性质来说都显然是最重要的时代。

对当前的大量事实进行分析，阐明在我们人民革命政党内确定了什么样的方向，流露了什么样的愿望，——这就是本杂志第一

期的任务。

我们的力量怎样？处境怎样？获胜的把握怎样？

一股强大的地下力量正在从各地气势逼人地崛起。对一个战士来说，敌人的面孔不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吗？看吧，敌人的面孔变得多么难看，他们惊惶失措，走投无路，无所适从，不知怎样摆脱这股神秘莫测、捉摸不定、不可战胜的力量，因为一切人间的手段在它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为了给我们的敌人造成这种恐惧，就应当做出真正惊心动魄的事情来。

确实如此，在我们的眼前正出现一种真正非同寻常的、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的现象：少数几个勇敢的人^①宣布同万能的政府及其无比强大的军队决一死战；他们正在取得一个又一个浴血的胜利；他们在许多地方正在制服那种迄今还没有被任何力量制服的专横，他们正朝向更加辉煌、更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阔步前进。

一直生活在地下某处、不断毁坏着各种“根基”的一个“怪物”，如今忽然把自己的一只爪子不时地伸出地面，一个一个地掐死它所极度厌恶的那些败类。这个“怪物”每冒出地面一次，它在实现自己血腥的意图方面就表现得越来越勇猛、无情，而在隐匿自己的踪迹方面却显得越来越机灵、敏捷。

敌人恐惧万分。这种恐惧也传染给了旁观者。他想，要是这个“怪物”吃人肉吃馋了嘴，而跟前又找不到猎物，会把它那凶残的目光转移到旁观者的身上来吗？他似乎已经感到一双血红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一只爪子一下子伸了过来……

旁观者，请放心吧！

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智慧历来所能创造的一种普遍的、全人类幸福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对大家一视同仁，没有性别、年龄、宗

^① 指向沙皇政府宣布采取恐怖行动的民粹派革命家。——编者注

教信仰、民族、阶级和阶层之分！它召唤所有的人共享生活的盛宴，它使人人充分享受和平、自由和幸福！

那股把朝气蓬勃的、纯洁无私的一切吸引到社会主义者行列中来的不可驯服的、迷人的力量就表现在这里，也只能表现在这里。只有为全人类服务的信念才能激起这种炽烈的、纯宗教的狂热感情，这种感情鼓舞社会主义者，使他们成为不可克服的、不可战胜的人，因为压迫本身往往变成他们在世上的最大的幸福——殉难和自我牺牲的源泉。

市侩先生们！请相信，对我们来说人的个性的神圣程度并不亚于你们，你们出于贪图权势的、保皇的念头，为千百万人的无辜被杀拍手欢呼，并且为了不放过自己兽性享乐的点滴机会而牺牲数百万工人的生命。

如果我们求助于匕首，那就意味着的确没有别的办法能使别人尊重我们的神圣的人权。

一旦我们的自由和个性有了不受随意侵犯的保障，我们将无条件地停止目前被迫采用的私刑和自卫的制度。请承认我们的人权是属于我们的，这样，我们也将神圣地尊重你们的人权。我们决不停止我们的社会革命活动，也就是说决不停止把人从一切奴役、首先是从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但到那时候我们的敌人就是整个特权阶层。单独的个人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斗争的性质也将完全不同。

但是只要以专横（上自沙皇、下至岗警的单独的个人的专横，各种规模、各种差别、各种方式的专横，由专横来加以控制、加强或削弱的专横）为基础的现行制度仍继续发挥作用，这个单独的个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就是由社会主义体现其利益的人类的敌人。因此，我们将毫不留情地对这些个人作战。

这就是我们的行为的意义、目的和性质，我们的行为近来不但

在全俄国，而且也在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我们的活动中，这个事实如果不是最重要的，那也是最明显不过的。

现在就这些情况对我们的朋友和同志们说几句话。

我们无意鼓励和号召他们去继续业已开始的斗争，因为我们很清楚，对他们来说，鼓励和号召实在是多余的。相反，我们倒想告诫他们不要过分热中于这种斗争，因为目前已经有了表明出现有可能热中于这种斗争的征兆。

我们应当记住，我们不会用这种手段来取得工人群众的解放。恐怖手段同反对现行制度的基础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反对一个阶级只能靠阶级起来反对，摧毁一个制度只能靠人民自己动手。因此，我们的主要力量应当用于在人民当中进行工作。而恐怖分子充其量不过是一支保卫队而已，其作用就是保护这些工作人员免遭敌人的突然袭击。如果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用于同政府当局进行斗争，这就会意味着为追求偶然的、暂时的目标而放弃自己直接的、长远的目标。

从另一方面，从党的策略方面来看，我们的这种活动方针可能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现行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崩溃，这是无可置疑的。无需当一个预言家就可以对此作出预言。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崩溃而已。成为众矢之的的专制制度必将崩溃，让位于比较进步的立宪制度，这种制度象所有的宪法那样，将把地主、富农和工厂主这些特权阶层——一切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者，一句话，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提到首位。目前他们是分散的，因而是软弱无力的。至于宪法上的自由，不管它少得多么可怜，但至少还能使他们组成一个有力的政党，这个党的头一件事将是宣告对他们的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如果我们集中全力同政府进行斗争，无疑会大大加速它的垮台。但是如果我们在人民当中还没有任何基础，那么到时我们就

不可能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这将是皮洛士式的胜利，^①他在赫拉克利亚战役后说过：“如果再取得这样一次胜利，那就没有军队跟我回伊皮罗斯去了。”我们付出了浴血斗争和无疑是惨重牺牲的代价以后，我们的事业仍将一无所成。被击溃的但却无人追击的敌人将得到足够的时间来在自己的新阵地上构筑工事，而我们要夺下这些阵地，就不得不再次在敌人加强了炮火下发起无掩护的进攻，克服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

只有密切联系人民才能使我们有可能利用那种在制度更替时所出现的混乱局面，立即建立起强大的力量，从而不让我们的新的敌人象在西欧那样站稳脚跟，对人民敲骨吸髓。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22—326页。

《土地和自由》论未来 制度的理想^②（摘录）

……关于制定未来制度的理想，我们无需特别操心，因为在俄国人民的夙愿中，我们已经具备建设一个比现行制度要高尚得多

① 皮洛士(Pyrrhos, 公元前319—272), 伊皮罗斯国王, 反对罗马。公元前280年在赫拉克利亚、279年在奥斯库伦曾打败罗马人。最后一役虽然获胜, 但损失惨重, 耗尽全部力量。“皮洛士式的胜利”的说法就是这样来的。——编者注

② 关于未来制度的问题是在1879年2月8日的《土地和自由》杂志第5期上提出来的, 这一问题的提出想必同制定民粹党的纲领有关。文章很典型地反映了“农民社会主义”的原则, 这种“农民社会主义”局限于要求建立一个使俄国农民的现有的“社会主义”基础(土地村社、地方自治、村社自治)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制度。——编者注

的社会制度的坚实基础。农民的世界观对个人的保障不限于经济方面；在联合的哥萨克人中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完全的地方自治，宗教信仰和言论的自由，比在所谓有文化的阶层中所理解的要深刻和广泛得多，——这一切都是未来的农民制度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当然，这种制度不是人类发展的最高成就，不过我们也不是最后一批革命者——我们后继有人。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根本不允许我们去幻想最高的理想。

国家的可怕力量不仅以看得见的形式压迫人民；国家掠夺人民，把人民变成牛马，使人民饥寒交迫、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甚至对人民进行种族丑化；而且国家还迫使人民为了挣得一文钱和一块面包而绞尽脑汁，同时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和道德；国家还用剥夺土地、依附关系、各种官府衙门的无穷无尽的压迫以及军纪和校规等等把人民变成卑躬屈膝的奴才，国家腐蚀人民的手段层出不穷，一种比一种更为骇人听闻、厚颜无耻。当我们还在思考最高的发展和最终的理想的时候，人民恐怕会落到用任何办法也发动不起来的地步。不，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想，我们需要的是用最快的时间，不失时机地打碎这部可怕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虽说还不理想，但毕竟能保障人民继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微小的进步毕竟胜于巨大的退步。我们俄国人感到幸运的是，从现有的人民观念中就能够找到建立一个还不错的社会制度的一切因素，因此我们的全部任务仅仅在于实现这种社会制度，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投身于绵延不绝的人民斗争的行列中去，并尽力保证斗争在这一次获得胜利的结局。

只要把人民的巨大力量同国家的力量加以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如果人民能够系统地、有组织地进行斗争，那么斗争就不会发生困难。革命者的当前的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在人民中扩大自己的影响，让人民知道革命者不仅是为

人民的利益行动的一股力量，而且拥有用来保卫自己和人民的足够的手段。必须使革命的政党在农民心目中享有神话里的沙皇在农民中享有的那种地位，与此同时，必须使农民尽可能地振作起来，唤起他们进行反抗，使他们养成斗争和齐心协力行动的习惯，这不仅是事情本身的需要，而且还因为在这社会觉醒的时刻，农民特别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和批判。我们认为，宣传工作只有同这种实际的反抗同时并举，才会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当前的这项准备工作要求革命者在人民中间成为米尔的人，米尔的保护者，为农民的一切利益进行鼓动的人。农民希望把小块土地、森林、草场留给自己使用，他们希望摆脱丧尽天良的警察局长或巡警，希望缓期交纳租赋——凡此种种以及无数近乎琐碎、但却是农民真正迫切需要的利益，对一个革命者来说都应当被看作是切身有关的事。他必须永远站在第一线。这样他才能使人们了解自己，引导农民参加斗争的实践，并在他们当中确定最革命、反抗性最强的人物来。

但是一个在大大小小的和重要或不重要的问题上始终作为人民宣传员的革命者，是不应当过分拘泥的。他作为一个鼓动家，不单是因为他的当前的斗争目标是农民的各种微小的利益；他作为一个鼓动家，主要是因为革命是他希望尽可能最先实现的具体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者需要进行旗帜更鲜明的反抗活动。他在这方面应当象在其他各个方面一样，首先给人民作出榜样，表明可以做什么和怎样才能做到。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38—339页。

人民园地上的新苗^①

我们想谈一谈一种相当微妙的人物即来自民间而晋身于社会上层的人。我们想从两个方面来看这种人：从道德方面和他们的社会作用方面。我们说这是些相当微妙的人物，是因为我们在这些人身上找不到任何好的东西，而现在这几乎已成为著作界的罪恶，甚至几乎是叛逆！……不久以前，文坛的一条驴子踢了《祖国纪事》一下，责备它在评论兹拉托弗拉茨基那本书的短文中对人民表示悲观，其实这篇短文除对高利贷行为和一般金钱的腐化影响表示悲观外，并没有什么悲观的东西；而后来，当格列·乌斯宾斯基为自己最近几篇特写做了解释（《祖国纪事》1878年第11期）时，自由主义泥潭就完全象童话中说的那样激荡起来，

鸭子嘎嘎叫，

岸边啪啪响，

不料蓦地出现如是之多的人民卫士，真叫我们惊异，我国人民竟有这样多的朋友。那些忽视人民的人和认为人民有美好灵魂（这个灵魂当然只有在天堂才能得到奖赏）、同时又认为必须由有文化的牧人用绳子牵着人民走的人，甚至那些不大喜欢人民的人，现在也都厕身于人民之友的行列了。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而且，如

① 这篇文章刊我在《祖国纪事》杂志1879年第2期上，未署名。作者是谢·尼·克里文柯还是格·扎·叶利谢也夫，不能确定。列宁在他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这篇文章，认为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民粹主义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进步方面。——编者注

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是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的。我不准备详细回答这里出现的所有问题：如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友谊是否真诚，自命为人民之友的人是否象敌人，等等，但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几句话。

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乌斯宾斯基的某些意见，但是我不能不同情，不能不认为提出农村这个美人和文坛少年(或者更确切些说，不是少年，而是贵族老爷及其奴仆中间的老色鬼和年轻的商人)对待她的态度问题是十分及时的。问题是第一次提出的，也许提得有点离奇，但提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对农村唱小夜曲，“对她流连忘返”完全不等于爱她和尊敬她，正如指出她的缺陷，完全不等于敌视她。如果去问问这位住在农村却没有只看农村风景(环境是十分重要的)的乌斯宾基本人，他倾心于什么，他认为未来的寄托是什么，是农村呢，还是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那么毫无疑问他会回答：“是农村”。不谈人民生活的道德条件就等于不谈人民的贫穷；道德方面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但是，除此以外，道德方面与经济方面也有着因果的关系。也许你们认为乌斯宾斯基完全没有看到人民的贫困和人民的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吧？愤懑的先生们，我敢向你们保证，他了解这种相互关系，了解得比许多农村的崇拜者更为透彻，因为在这些崇拜者眼里，庄稼汉是抽象的纳尔苏修斯^①，农村是抽象的概念，或者是一切有见识讲实际的资产者在类似今天的这种时代里总要备有的一种自由主义身份证。不让一个最聪明、最正直的农村拥护者具有这种起码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全部问题在于对人民生活现象的看法，在于忠实于事实和概括。也许，有些人认为乌斯宾斯基是妒忌其他的农村崇拜者

① 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爱恋自己的影像的美少年。——编者注

吧？（现在什么蠢事都可能发生。）当捆住手脚的过路的老爷们向农村送秋波时，当新的和老的思想堕落的人令人厌恶地同农村调情时，他确实极为愤慨；但这并不是说，他妒忌别人，他不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爱农村，真正地、深深地爱农村。

那些把农村当做抽象的概念、把农村当做抽象的纳尔苏修斯的人，甚至没有好好想过，就说只须颂扬农村，只须肯定农村在出色地抵抗一切破坏性的影响。既然农村竟每天要为一个戈比而拚命，既然它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富农的欺骗、地主的压榨，既然它时常在乡公所受到鞭挞，难道这一切对农村的道德方面不会发生影响吗？如果农村看到富农的威力、铁路的专横和无法无天，看到那些除了捞钱以外没有其他功劳的人备受尊敬等等，难道这一切会不产生发横财的欲望，不会象其他人一样不择手段地力图发财致富吗？如果农村看到形形色色的承包人和企业家把手伸进地方自治局的钱柜，盗窃银行，掠夺国库，看到欺诈破产，纵火焚烧保了险的财产，等等，难道这一切会没有影响吗？既然卢布，这个资本主义的月亮，浮现在农村风景画的近景上，既然人们的目光、意向和心力都贯注在它上面，既然它成为生活的目的和衡量个人才能的尺度，难道可以掩盖这种事实而说农夫是根本不需要金钱的不重利的科西马^①吗？既然农村中显然存在着不和的趋向，既然富农如花盛开，而且力图奴役最弱的农民，使他们变成雇农，力图破坏村社，等等，试问，难道可以掩盖所有这些事实吗？！我们可以希望对这些事实做更详尽更周密的研究，我们可以用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人们因饥饿而盗窃，杀人，万不得已时甚至吃人）来解释这些事实，但要掩盖这些事实是根本不可能的。掩盖这些事实就等于

^① 科西马是耶稣基督的殉道者，行医、治病不取报酬，只劝人情奉基督。人们称他为不重利者。——编者注

维护 status quo，就等于维护臭名远扬的 laissez aller，而让可忧的现象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粉饰真相总是多余的。如果真相是可悲的，那么任何文艺白粉和胭脂都无法改变它的凶相，如果你想暂时转移社会的注意力，支吾搪塞，那么这只会有害于社会，因为社会将看不到威胁着它的灾祸，看不清自己的迷误，将只是依据潘格洛斯^①的智慧行事，以为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得美好起来。最后，真相一旦大白，社会的失望就会来得更快。要找到这种例子是不难的。几年前我们的著作界曾竭力美化美国，希望把资产阶级制度、资本主义的厚颜无耻、侵吞国家土地、工人问题等硬是包藏起来。当然，纸里包不住火，于是就发生了下述的情况：社会还不太习惯于独立思考和自觉活动，它象贵族女学生一样必需有一个崇拜的偶像，它认定美国就是这种偶像，后来它对个国家失望了，因此现在必须证明，倒霉的美国佬并非一切都糟到使我们可以鄙视他们的程度。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社会需要理想——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等等理想——主要是为了有了它们就可以不再去想别的什么东西；它寻求理想时不是象年轻人那样战战兢兢，而是象午睡那样宁静；它对理想失望时不感到精神痛苦，而是象幸福乡王子那样轻松。至少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他们本来不需要什么理想，因为他们脑满肠肥，对饱食终日十分满足。我们的社会只有欲望，只有愉快地消遣度日的要求，只有对某种高尚爱情和崇高事业的要求，这种爱情和事业是完全说不清楚的、表达不出来的，也许只有一点是表达得清楚的，它们无论如何不应妨碍它的饱食终日，而应该与之协调一致。今天它把庄稼汉看作理想，赞叹涅克拉索夫的诗篇，祝愿“那些为了基督而忍受一切的人，

^① 潘格洛斯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伏尔泰的名著《老实人》中的人物，是一个坚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至善至美，鼓吹“一切皆善”的学说的乐天主义者。——编者注

一对严峻的眼睛从不哭泣、一张默不作声的嘴从不抱怨、一双粗糙的手不停地工作的人们晚安”，等等，明天它又爱上大西洋彼岸的朋友们，后天又竭力追求斯拉夫兄弟们，而完全忘记了庄稼汉兄弟。它对一切人都怀有某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同时却又什么人都不爱。这是地地道道的贵族女学生，她长期住在高墙深院中，各种各样的爱情幻想使她感到烦恼，其实爱慕谁，是历史教师还是体操教师，是美术教师还是看门人，对她来说是无所谓的，实际上她最爱的是糖果，象庄稼汉那样吃饭她是根本不可能的。对贵族女学生我们可以原谅，有时我们甚至还惋惜她，因为她受的是这样的教育。但是如果社会对最重大的生活问题、对社会秩序和人民表现出这样一种态度，那就简直令人气愤了，因为这种态度证明思想和感情已彻底堕落。如果说历史给我们描绘了公众腐化堕落和道德沦丧的可怕图画，那么显然从来还没有过这样举止端庄、金玉其外、这样纯真无邪而同时又是极端的堕落。这种堕落完全是我们现代历史的产物，是在乡绅习气、贵族的温情、无知和懒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市民文化的产物。小市民把自己的科学、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自己的诡辩带到生活中来了。他们需要在讲台、文坛、法庭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把它们确立起来。他们首先是找不到这方面的十分合适的人材，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具有其他传统的人。这些人都是内行，他们的步伐不老练，动作不敏捷；他们竭力模仿西欧资产阶级，订购书籍，学习；他们时而惋惜过去，时而忧虑将来，因为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一种喊声，说小市民不过是厚颜无耻的宠臣，说他们的科学经不起批评，他们的道德准则毫无可取之处……然而，必须拯救自己。因为小市民不是请求人去做工，而是以饿死的威胁命令人去做工。不去吗，就会没有饭吃，就会在街头呼叫“布施布施我这退伍的军官吧！”否则就会活活饿死。于是工作开始了，吱吱声、轧轧声、叮当声不绝于耳，一片混乱嘈杂。工作紧急，刻不容缓。机

器终于运转了。各种吱吱声、尖叫声似已减少，一部分似乎已听惯了，只听见一个笨重东西在隆隆作响。然而这却令人更加胆寒，板子愈来愈弯，螺丝钉摇摇晃晃，眼前一切，转瞬即将灰飞烟灭。

胆小的人吓得屏息静气。不顾一切的人说：“那就更好”。资产阶级也说：“那就更好”，“我们要赶快向国外订购新机器，快些准备好国产的机器座子、木板和其他粗笨部件，快些聘请高明技师。”同时社会的道德在这一时期处于最丑恶的状态中。有些人开始爱好新的活动，不量力而行，有些人则日益落伍，悲观失望。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关怀人民；可是，按资产阶级的规矩，又事事都是为了人民，替人民着想；同时，每一个社会活动家和著作家都认为谈论如何造福人民是自己的天职。在这种情况下特别不令人羡慕的是所谓自由主义著作家的角色。他们实际上对人民并没有什么爱，却向人民卖弄风情；他们甚至不肯为人民牺牲一片小指甲，却热情洋溢地用夸张的词句谈论人民，说人民是被压迫的，是多苦多难的生活主人；它用尽了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练就了一种用诱惑人的删节号和含糊其辞的说法：“你的意思是说，我希望……只是我没有办法说！”实际上，至少在绝大多数场合，谁也没有说出来。然而含糊其辞产生了效果：许多人靠含糊其辞出了名，许多人捞到了资本，盖了五层楼房。这种以自由主义取媚于人民的倾向压倒了一切，取得了优势。在我们这个民主世纪，不仅苏沃林先生公开承认自己爱人民，说“我生平所爱的并至死不渝地爱着的就是人民，我自己就是来自民间的。”（《新时报》第1034号）（这什么也没有说明）甚至连《莫斯科新闻》不知怎的也另眼看待人民了，不知怎的竟然相信人民有健康的理智，谈论起人民的法庭，关心起——自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人民的福利事业来了。现在，象业已停刊的《新闻报》^①那样公开对人民不友好的报刊，连一个也找不到了。

^① 反动的农奴主贵族的机关报。——编者注

其实抱公开不友好的态度倒好些，因为这时敌人的原形毕露：可以看出他在哪方面是个笨蛋，在哪方面是个骗子。现在人人都是朋友，同时人人都是敌人，一切都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了。正如乌斯宾斯基所说，人民完全堕入使初涉旅途的人迷失方向的大雾中。从前他们看到社会上根本没有天理国法。现在别人却告诉他们说，他们已象地主一样自由，他们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人们在抬举他们，扶持他们。其实在这一切关怀之中贯串着无尽的虚情假意，这些关怀是由一条细而牢的线包缠起来的。当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来建立鼓励富农而使真正的贫农得不到贷款的信贷社。他们不谈必须实行为土地平分和村社(?)所妨碍的集约经营；人们不说人头税重，不建议施行所得税，绝口不谈间接税，不谈所得税在实行中通常变成依然是向贫农征税的事实；不说必须发放农贷，使农民按格外高昂的价格向地主赎买土地，如此等等。请注意各种报刊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是一般的赞美还是令人愤懑的冷淡和出色的逻辑跳舞：“可以不同意，但应该说实话。”最后，请注意我们的争论——其实再没有比我们的争论更和平的了，虽然有些人认为，我们的争论已达到了极端激烈的程度。几乎每一次争论的原因一般地或者只不过是误会，或者是关系到著作家自尊心的恩怨，有时则是钱财上的旧账；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是好心，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所以你有时甚至不知道你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真的吵架呢，还是只不过因体力过剩而要赛一赛精力。著作家的仇敌有别于私人的仇敌，著作家的自尊心不同于普通人的自尊心，敌对双方不知怎的却互相尊重、互相怜悯，等等。所有这些如此普遍的荒谬现象，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好吧，请谈谈吧，请谈谈内部的问题吧！？”——各家报纸互相纠缠不清，它们大概也知道，它们得到的回答将是它们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假定今天有某一家报纸用假嗓子喊出：“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其他报纸却只

是嘲笑这种独唱：“没有关系，你会生活下去的，我们知道！”你们也知道，明天报纸又将谈论不能忍受的精神郁闷，谈论不能忍受的公民苦难，而后天仍将大喊大叫地生活下去。这种情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断重复。滥用的话语已完全失去了效力。社会上也是这样，那里也有多得令人吃惊的人民的的朋友。对于那些极端的保守分子大家都纵声大笑，都在街上用手指指着他们。大概抵押人和酒保很快也要讲爱人民了。时代就是这样。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只要向上帝发誓，就完全可以叫大家相信，后来人们更相信真话，而现在人们则相信为人民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也成了滥用的对象，完全用坏了，所以现在谁谈论人民谈论得太多，他就会变得可疑……

情况如此混乱，谁的过错更大呢，是著作界还是社会？——这个问题很难断定，即使断定了也毫无益处。人们说，鱼从头部腐烂起，但我认为这种纯粹厨师式的观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从神经生理现象可以知道另一个事实，大脑是在内脏和机体的其他部分之后腐烂的，虽然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也不能认为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著作界和社会是彼此彼此。庸夫俗子们往往对著作家恶毒地说：“著作家先生们，教会我们吧，给我们看看实际的例子吧”，看来，他们完全忘记了，著作界已屡次切实地实现了自己的实话。恼羞成怒的著作界对社会说：“我和你是骨肉相连的，狂暴的人们”，这时它想象，它已作了一切牺牲，它想，它已援引了惊人的论据来为自己的妥协和精神萎靡辩解。无论著作界，无论社会彼此都很了解，彼此都听取对方的申斥，“哎，你这个强盗！”“哎，你这个坏蛋！”同时却心安理得地只顾吃自己的小鸡。有时它们象两个互相了解、互相看过对方的牌的赌棍。赌博虽在继续进行（因为打算赢第三者——真正的笨蛋），但利害关系已经不同了。所有这一切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就象在漆黑的房间里一样，朋友分辨

不出敌人，敌人互相拥抱，朋友们互相打耳光。所有这一切，一方面，产生了相互的小心和不信任，削弱了仇恨，另一方面，把友好的关系变成了冷淡的徒具形式的关系。最后，大家都习惯了既无强烈的爱也无深刻的恨这种情况。谁也不爱谁，谁也不爱什么，谁也不能信赖谁。你可以数出几百个不惜言辞来向你表达好感的人，可是当你穷困得快要饿死时，当你在敌人的打击下行将灭亡时，谁也不会动一动手指头来帮助你。无论从个别人的例子还是在大规模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然而当我们向农村献媚，对她流连顾盼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伸展蔓延；说得简单明白些，各种各样的奸诈之徒在不断混进生活之中，并按自己的方式改造生活。只要著作界还在争论农村问题，争论农夫是否心地善良，争论农夫有无知识，只要政论家还在连篇累牍地谈论村社问题和土地占有形式问题，只要税务委员会还在继续讨论税制改革，农村是会完全沉沦的。在谈到德国和其他中欧国家的赎买活动的恶劣结果时，瓦西里契柯夫公爵特别强调，它的原因是农民改革进程缓慢，土地的赎买落后于个人的解放并拖延了许多年，这当然只有利于领主阶层。他说：“这种长期拖延赎买土地的情况自然被在此期间拥有权力的那一方面利用了，在就人的权利、平等和博爱、社会联系以及诸如此类有益的原则进行哲学性讨论时，在政论家、百科全书派和国务活动家们撰写和修改人类解放的方案时，人类的一半已被另一半掠夺光了。”^① 人民的消极朋友不愿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总是形成两种势均力敌、相互对立的力量，而表面上好象没有参加斗争的消极力量只是为当时的优势力量服务的。这比在政治上保持武装中立还要坏，其所以坏，是因为这总是给强者以积极的帮助。无论消极朋友在感情上多么真挚，无论他在生活舞台上怎样谦逊温和，他仍然会使朋

^① 《土地占有制度和农业》第1卷第21页。——作者注

友受到损害。这样一来，很容易陷入那种说“我非常爱小鸡这种小东西，我爱它爱得要命，我之所以要吃它，是因为它味道好”这样话的人的境地。这还是小事，因为吃小鸡的都是高贵的绅士，他们简朴地就着鸡喝酒，有人喝杯啤酒，有人喝香槟酒，依自己的地位和嘴巴而定，但是再往前走一步，就能落入比拉特的境地，把真理钉在十字架上。对于那些比较纯正和真心爱人民的人，这种情况终究是讨厌得不能忍受的。他们听到这种絮絮不休、令人厌烦的爱的表白，觉得可耻和厌恶。这种表白年年重复，成天重复，在衙门里，在上流人的客厅里，在下等餐馆喝香槟酒的时候一再重复，但永远也不见诸行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终于对这一切杂拌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正因为如此，终于出现了一定的公民信条，对正直性的一定的断然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狭隘的，因此，喜欢黑暗中的自由天地而忘记黑暗的逻辑渊源的博爱的自由派，对他们就特别讨厌。不管这些信条在分别来看时实际上是多么狭隘，但对总的要求至少是无法反对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成为真正的朋友，或者变成公开的敌人！”我至少不能反对这一点，我所能说的只有一点：必须尽快研究清楚。这篇文章的主要对象——来自人民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从它开始来进行研究并就它得出某种肯定的一致意见，是特别合适和特别重要的。

目前我们经历着一个异常重要的历史过程，即第三等级形成的过程。在我们眼前，代表人物正被挑选出来，准备管理生活的社会力量正在组织起来。这一过程在欧洲开始得远比我国为早，它在许多国家内已经结束，在另一些国家中，这一过程则为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工人阶级的反抗所阻滞，然而就在这里，历史车轮也在年复一年地把这些残余碾碎而为新的制度铺平道路。这一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在贵族和平民之间日益形成一个由两种元素组成的新社会阶层，一种元素从上面沉下来，一种元素从下面升上去，二

者好象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样比重似的；这两种元素紧密地在一起混合着、化合着，经受着深刻的内部变化，并开始改变上层和下层，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这一过程本身极有意思，而对我们来说，它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这里产生一连串的问题：第三等级的统治是否是每个民族文明化命定的必经的阶段呢？不进行那些过分小心的庸人处处都觉得是冒险的活动，不听信那些把历史只是看做命定的秩序、因而认为第三等级的统治对一个国家就如生老病死对一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者的话，国家就不能一直由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吗？最后，难道不能减轻一下即将到来的制度的弊病，设法改变一下它的面貌或缩短它的统治时间吗？难道国家真是一种呆板的、身不由己的、软弱无力的东西而不能影响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吗？难道它真是一种天帝放出的陀螺，只按一定的路线转动，只转一定的时间，转一定的转数，或者是一种意志力非常有限的机体吗？难道操纵它的真是一种钢铁巨轮，任何敢于探寻使人类走向幸福的捷径的勇士都要被它压成齑粉吗？！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唯一令我们操心的是第三等级的组成过程，甚至可以说就是来自民间而晋身第三等级的人。这些人很重要，他们执行着异常重要的社会职能，资产阶级制度的强度直接以他们为转移。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确立了这种制度就离不了他们。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种人，或者虽有而人数不足，那就必须设法从人民中造就他们，必须在人民生活中创造条件以促进他们的形成和分出，最后，必须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成长，直到他们壮大为止。这里我们遇到最有毅力的、能利用一切情况和时机来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对历史命运的直接干涉。这些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工业进步（以手工工场的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以工厂的生产代替手工工场的生产，以更合理的耕作制代替旧的耕作制）的必然性，有一定人口密度和一定国际关系的国家没有

工业进步确实是不行的；一种是经济因素和思想发展所造成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分歧。机敏的人通常把国家生活中的这些绝对必需的变化，与自己、与一定的制度联系起来，但毫无疑问，这些人是被别人代替的，而且随时都会被别人代替的，只要别人比他们现在更聪明，更有毅力。在西欧，第三等级的历史是异常悠久的。它和城市的历史、十字军远征、贸易战争、工商业的历史、世界市场的产生、农奴制的消灭、人民丧失土地等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管宿命论者的学说怎样，我们当然不会把这历史全部重演，我国第三等级的开明代表也当然不会全部套用以往用过的那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一定会因时因地从中选择最合适最适当的手段。他们为了剥夺农民土地和造成工厂无产阶级，当然不会采用粗暴的武力或同样粗暴的清洗领地的手段，而会去消灭村社土地占有制，去造成农场主这一人数不多的富裕农民阶级，以及一般地去采用那些使经济上的弱者自行灭亡的手段。他们今天不会成立行会，但将建立信贷社、原料供应社、消费社和生产社，这些社虽然标榜为全体谋幸福，实则只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他们不会为组织财产继承法院而操心，但将为制定鼓励勤劳、戒酒、上学的法令而奔命，在这些法令范围内活跃的只有年轻的资产阶级，因为群众仍将照旧酗酒，愚昧无知，并为他人劳动。很久以前，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最初阶段，我们就已遇到过从民间分出来的人了，那时他们的社会作用就已显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城市与国王和骑士的斗争，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一斗争中，城市显然是依靠为逃避封建压迫和混乱而逃出城去的人民，没有人民，城市当然就不能保卫自己的市政独立；但是，在新的城市共和国中必须给这些人民以这样的地位：使他们不干预城市自治，至少要使他们尽可能少影响城市自治，能够管理他们，并从他们身上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一任务直接落到了来自民间的人的头上，他们接受了这一

任务，他们都是各种作坊的主人、行会师傅和帮工、小商贩等人，他们在自己周围集合了一群流浪汉，以自己的威望、自己的资本、有时以棍棒获得他们的敬仰，操纵他们，在城市管理中成为他们的代表。他们自己也依附于更大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以自己的信贷和影响支持他们，他们也依附于第三等级的学理主义者，这些学理主义者正在研究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权利，以城市的名义向国王提出要求；最后，他们还依附于城市管理中一般有权势的人物，这些人物也给予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支持。支持来自民间的人在各方面对他们都是有利的；通过来自民间的人，他们可以命令群众做一切需要做的事，人民的任何不满首先碰到他们，就象碰在堤坝上一样，撞得粉碎。这个阶级是资产阶级大军的前哨、散兵线和先锋队，可惜它的作用很少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注意。其实它的作用，我们再说一遍，是非常重要的。村社被破坏，农民被剥夺土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决不只是贵族和骑士，而且还有自己的兄弟，即仍然是来自民间的人，他们禀有行动机灵和阿谀逢迎的本领，深蒙贵族惠爱，以浑水摸鱼或明火执杖的方式掠得了若干资本，上层等级和立法机关都伸手援助他们。他们被称为人民中最勤劳、最能干、最清醒的分子。这甚至不是散兵线和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的主力军，是编成队伍的士兵，指挥他们的是由尉官、校官、各部队长官，以及由政论家、演说家和学者组成的总参谋部。没有这支军队，资产阶级就不能有所作为。难道为数不足三万的英国地主，没有农场主的帮助而能管得住几千万的饥民吗？！农场主，从政治意义上说是名副其实的战士，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实行剥夺的细胞。农场主是勋爵在炼金炉里用以搅拌的钳子和火钩子。勋爵付给农场主百分之十的报酬，或者更确切些说，他对农场主说，你付给我就这么多，其余你能榨取到的，都作为你自己的劳动报酬。勋爵不能也不会起农场主的作用。要能起到农场主的作用，如我们刚才所指

出的，勋爵太少了；为此他们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费用高昂的经营管理机构，如管理人员、助手、各种技术员、守卫人员等等，必须监督所有这些人，而这是需要知识、本事和警察技能的。此外，勋爵不象农场主那样熟悉人民，熟悉人民的风俗习惯以及人民的一般心理。许多勋爵，特别是高贵的、有教养的爵士夫人，大概是缺乏那种经常和这帮衣衫褴褛的下流东西打交道的耐心的，另一些人则在夺取人民的最后一个先令时，看到孩子们的痛苦，听到母亲们的哭声和父亲们的悲哀，甚至神经也难免要感到痛苦，慈悲心肠会油然而生。现在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甚至多少富裕一些的农场主也已不再直接同工人打交道，而把这件事交托给雇佣人员和工头。在工厂中，起农场主作用的是领班和帮工，他们得到很高的薪金，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技术较为高超，而且为的是要他们监督工人，要他们最后下工，要他们不让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或减少工时的要求，要使厂主能指着他们说：“看，我们对好好干活并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付给多么优厚的报酬”；在工厂中起同样作用的还有与厂主和厂方关系最密切的小店主，办事员，各种各样的监工，以及诸如此类血管中还流着工人的血而灵魂已整个为资本所盘踞的小吸血虫。当然，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在某种场合下，在局部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就是这些方面多半也是一致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末叶战胜了贵族，或者不如说是利用了人民的胜利，从人民中挑出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帮助掠夺而且自己也掠夺人民，把人民交给冒险分子支配。农民村社的土地非常便宜地出售了，后来把从贵族那里剥夺的土地归还贵族或偿还地价时，农民什么也没有得到，既没有得到土地，也没有得到金钱。当著作界向法国人民高唱颂歌的时候，当他们赞美人民伟大、宽宏和热爱自由的时候，当这些崇敬人民的袅袅香烟弥漫于法国全境的时候，资产阶级

这支猫却在一旁吃小鸡，而且把它几乎吃完了，给人民只剩下些骨头。大受赞美的民有土地实际上少得微不足道，甚至往往不足以缴纳捐税，而大部分土地（将近六分之五）掌握在大、中地产所有者手里，掌握在旧贵族和新市民阶层手中。但在这方面对我们特别有教益的还是德国，它也和我国一样较晚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因而它不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而当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运用了别国的经验。德国的骑士们没有立即走出世袭的城堡，没有立即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威胁和利诱；没有立即对发横财、投机生意和一般新秩序感兴趣（现在他们已非常出色地学会了所有这一切），可是他们有时间观察、考虑和更切实而牢靠地至少要象拟议中那样安排自己的地位。他们当然消灭了村社，但是他们宁愿保留一定数量的私有者农民，以便一旦需要时可以依靠，而没有象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那样使人民普遍失去土地。这些保留下来的农民的数目与全体居民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供剥削是完全够了，为了制止他们的不满是完全够了。他们只是把最贫穷的居民从领地上清除出去，只拆除他们的庭院，而留下富足的农民，对于这些农民，分配村社的土地是极为有利的。按户分配给他们的地段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被公认为独自占有的不可侵犯的财产，被定为骑士的限定继承权^①。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读者可以在瓦西里契柯夫公爵的《土地占有制与农业》一书中看到。这本书尽管有某些缺点，还是相当清晰地勾勒了德国农村中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所以我们将在这本书中引用两三段话。瓦西里契柯夫公爵说，德国农民的成分复杂，“农民按权利（自由农民、半自由农民、农奴和义务农民）、财产和份地面积（有畜力农民、畜力不够的农民和拥有各种不同地段的菜园主）分成不同的类别。同村人的这种分类在农民社会中引起了争吵，

^① 限定继承权是一种大地产中的继承制。在这种继承制度下，地产由长子继承使用，但无权零整抵押、分割和出让。——编者注

领主阶层便利用这种情况来废除村社，并依靠赋役农民和 *Spannfähige Bauern* (有马农民) 中上层农民的帮助和支持来安排自己的经济事务。”一方面，“贵族土地占有者认为废除村社对自己有直接利益，与其说是符合其经济利益，不如说是符合其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富裕的善理家业的农民全力支持领主阶层实行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对自己有直接利益。这样，站到一边的是国家和人民中的一切物质力量，汇合成为一个阶层的、由骑士阶层的传说和规矩联系起来的土地占有者以及分散的、从村社中分出来的个别农民，站到另一边的是人数众多、但无力的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阶级；显然，它们斗争的结局是可以预言的。”瓦西里契柯夫接着说：“按照权利和份地的面积划分为各种不同种类的农民还可以分为两个新的类别：比较富裕的殷实的当家人以及那些受到老爷的赏识、有可能赎回自己的份地的农民，虽然这种赎买要出高价并让自己土地的一部分；由这些农民便形成了现代的德国农民，这种农民完全是农民贵族，或者叫非贵族出身的小地产所有者等级。所有其他农民都经不起这种长年的危机，缺少贷款和补助金彻底要了他们的命；他们之中不多的人卖掉了自己的耕地，栖身于原属他们所有的庄园中，大部分人不可挽回地潦倒了，由当家人变成了壮工。这些结果是用两种主要办法达到的：（1）在调整土地所有制和解放农民期间支持世袭领地权力和财产继承法院，（2）拒绝给予贷款和政府的补助金，这种贷款和补助金只有当变革已经完成，大部分财产已经转到领主阶层的手中时才给予农民……最后，1849年颁布的半贵族、半小市民的宪法，把选举权只给了贵族和有产的小市民，一举切断了改善工人生活的一切合法道路。德国当时有许多人都在为解放纵情狂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无休止地纵情狂欢，他们把一切对改革表示怀疑和不满的人都看作反动势力的帮凶而予以诅咒。他们当中老实的人认为人民好像是脱

继之马,仍然可以关进马厩,重新负起跑驿站的任务(这决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但这里也有一些骗子,他们对人民阿谀奉承,而暗中进行相反的活动,他们对痴心热爱人民的呆子表示亲近,为的是这些人可以欺骗和利用。哎哟,这些痴心的呆子啊!一旦内争兴起,他们决不是每个人都有准备的,决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的。现在某些德国经济学家说,德国出众的地方是农民阶层组织得很好很稳定。瓦西里契柯夫公爵回答道:“这个阶层的成分确实稳定而严密,但它带有小圈子的性质,它的一般福利水平得以提高,完全是由于从他们之中抛弃了人民群众,四个人中抛弃了三个人。”例如,在普鲁士,经济学家们还能算出相当数目的农村等级,约八百五十万男人和女人(居民共二千三百万人),但是如果我们从这里除去雇工和称为小块土地所有者的整个农民阶级(这种农民阶级也必须算作雇工,因为其中大部分人是靠挣工钱,而不是靠种庄稼过活),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农村等级中真正的私有者只有:(1)骑士—地主,约一万二千人,(2)完全的农民业主,约三十六万人,如果把妻小也算在内,以一家四口人计,那么普鲁士整个土地所有者阶级等于一百四十八万八千人。”其他六百九十一万一千七百人都是贫农。富裕农民的经济的确经营得很好,就占有土地的数量和经营的方式而言与小贵族经济毫无差别,但是“各等级之间的争吵,私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哪儿也没有象在德国土地上那样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哪儿也没有如此根深蒂固……。”我们所援引的这位作者说,富裕农民阶层对贫困状况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逐渐和下层等级的贵族土地占有者融合起来,和他们一起共同享受农业的利益,他们热中于维持高物价和低工资的程度并不亚于骑士阶层,所以他们是保守党的先头部队,也许是比主力部队更强的队伍”,等等。

我们,主要是我国农民,现时也经历着这种第三等级的形成过

程。俄国在这方面落后于整个欧洲，甚至落后于贵族女校的同学，确切些说，落后于女校毕业的实习生——德国。在欧洲各处，城市是繁殖第三等级的主要温床和酵母。在我国则相反，城市等级向来是很少的。现在也还是很少。如果我们想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城市居民几乎占人口的一半，有些国家例如英国，城市居民甚至占人口的一半以上，而我国的城市居民只有大约八百万人，在这八百万人中只有百分之五十四是原来的城市等级，即商人和小市民（其他都是临时的城市居民——农民、贵族和军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和欧洲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人民土地占有制使居民固守在农村中。在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与人民的失去土地和工厂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业的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和充分的劳动供应。当欧洲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的时候，我国农民只要有力量就固守着土地。人民土地占有制是农民阵地上的主要战略据点和主要的制高点，小市民的首领们深知它的重要意义，所以才使出全副本领和全部力量来对付它。因此也就产生了对村社的种种攻击，也就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使耕作者与土地脱离关系的各种方案，以便合理经营农业，繁荣工业，争取民族的进步和光荣！由此也就出现了建立代表一切阶层的乡政权的方案，即建立德国式世袭政权和法庭的贖品的方案，也就出现了农民长子继承制的方案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案。争取到了保护关税率可是还不满足的工厂主经常反复说：“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否则我们的工厂就要完蛋！”地主也反复说：“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否则我们永远也建立不起集约经济，我们将永远落后于欧洲！”无论前者或后者所理解的廉价劳动力就是它最好比烂萝卜还贱，因为在我国，劳动力本来就比欧洲便宜得多；无论前者或后者显然都是以村社为重要论据。到现在为止，消灭村社的一切方案在我国似乎都命运不济；但是小

市民首领的毅力和时间在起着作用。我国现在的村社土地少，捐税负担重，村社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本来不多，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地力的衰减而显得更少了；捐税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手工业寥寥无几；本地可做的外水工作更是可数；农村中的生活如此困苦，以至整村整村的农民不得不抛下妻室儿女，远出谋生。这样，许多的县份都荒凉起来，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跑得不知去向。例如，我们在扬松的《统计研究的经验》中可以读到如下的字句：“在下新城省经营副业的县份，赋税与份地和外水工作相比是很重的，因此农民们整村整村地跑得不知去向，以前的村落都荒芜了，例如，哥尔巴托夫县舍烈美帖夫家族的领地上就是如此。”可是，这并不是全体农民逃跑的唯一例子；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这些艰难的生活条件的影响下，一方面，从农民中分出一个特殊的阶级，即年轻的资产阶级，他们力图从别人手中独立购买土地，力图从事其他的营生，如经商，放高利贷，组织由自己领导的工人劳动组合，接受各种包工合同和进行诸如此类的勾当。那些一心想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看见自己的计划破产并不甘休：他们时时刻刻向农民反复申言，说一切要怪村社、连环保、土地重分制和村社制度纵容了懒汉和酒鬼；他们为富足的农民举办信贷社，为给占有整片土地的人筹集小额农贷而操心；他们在城市中开办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其他各种学校，上这些学校的依然只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而大批儿童仍无处求学；他们用展览会、奖金和配种站出租的纯种公畜等等帮助富裕农民改良牲畜品种。这一切微小的努力聚积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对农村起着瓦解的影响，使农民日益分裂为两部分。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我国农民和德国农民一样按权利和财产分为不同的类别（国家农民，皇族农民，前地主农民——其中有得到全份份地的、半份份地的和四分之一份份地的——家奴），村社生活不是我国普遍的生活方式；在西南边

疆,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占有土地的情形,也就是说,看到有畜力的、无马的、种蔬菜的、当雇农的和当永久佃户的农民,其中一部分人有地一百俄亩以上,而另一部分人却寸土毫无;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土地制度则与德国的土地制度完全相同等等,——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那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在我国也是有基础的。我国年轻资产阶级的增长,的确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时计,它不仅在各犹太边区增长着,而且在俄国腹地增长着。要用数字来表示它的人数,目前还很困难,但只要注意到土地占有者人数的不断增长,商业执照数量的日益增加,乡村中控告富农土豪的案件愈来愈多等等迹象,就可想见资产阶级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了。当人们谈到农民购买土地的事实,并说明农民购买土地有的是作为个人财产,有的是作为村社财产的时候,几乎从不补充说,个人购买是普遍现象,而村社购买则是罕见少有的例外。在我国,土地大量地从一个阶层转到另一个阶层手里是撇开农民群众进行的:地主地产的主要购买者是商人以及个别的农民及小市民中发了财的人。关于土地占有者的人数,我们可以从瓦西里契柯夫的书中援引下列不无兴趣的资料,在第八次和第十次人口调查之间这一段时间内,贵族地主的数目从十万九千三百四十家减少到十万零二百四十七家,即减少了九千零九十三家(农奴的数目中减少了十六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个纳税人),这表明,领地阶层的衰落和地产的出售在农奴制时期就已开始了。其次,根据编辑委员会、国家产业部和皇室领地部 1861 年收集的资料,贵族地主的数目增加到十万零三千一百五十八家,即比 1858 年的人口调查略有增长,这可能是自然增长;然而,当不久前省长们为税务委员会收集所有土地占有者数目的资料时,所有土地占有者的数目突然增加到三十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九家(这只是四十一个省的情况),即增加了两倍多。当然,贵族不可能繁衍得这么快,所以可以认为,有二十一万多个土地占有

者¹是其他阶层的，其他阶层的土地占有者主要是小土地所有者，平均每人有地十九俄亩。这就是我国与小地产贵族紧相靠拢紧相结合的年轻农村资产阶级。不过它还远不是全部。“寄生虫”在俄国当然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它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含义，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压迫过同村人。过去的寄生虫与现在的相比，简直是宗法社会的人，这种人向来服从村社，而有时简直是懒汉，特别是不去追逐钱财。现在，寄生虫一词有了新的含义，在多数省份，它已成了总括性的概念，用得比较少，而常为别的词所代替，如富农、寄食者、商人、酒店老板、猫皮商、包工头、当铺掌柜等等。这里从一个词分出了几个词，其中一部分也不是新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全新的，甚至是农民生活中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首先表明对人民的剥削有了分工，其次表明掠夺已经大大扩展和专门化。几乎每个村镇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剥削者。我们可以从俄国各地报纸的报道中举出许多这方面的事实来，读者自己大概也记得不少。例如，〈俄罗斯真理报〉（1878年第54号）的记者从莫吉寥夫-波多尔斯克报道说，最近富农的剥削达到了造成真正的社会灾难的程度：“富农把农民盘剥得精光。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掌握在几个富农手中。农民们向他们借钱纳税，借贷粮食和其他生产所必需的物品，以劳动偿还债款。这样，富农便靠买和卖而发财致富，而农民却在买和卖中蒙受损失。富农在贷款给农民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农民如不履行这些条件就会完全破产，甚至丧失全部财产。富农总是协调一致地共同行动的，虽然常常在被剥削者面前装出互相争吵的样子，以便尽量掠夺他们。”从其他地方，从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所报道的也都是同样的或几乎是同样的情况。这里富农在征收税款时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牲口和粮食；那里收购钉子和布匹；第三个地方收购农民在河里和海里捕捞到的东西。如果商品事先还没有买到，他们便到大村镇的集市上去，合伙协调行动，以对付把产品

运来出售的农民。价钱是早已商定的。有时他们在村镇外边守候牺牲品。对每一次驶入的大车，他们抓阄儿收购或者轮流收购，轮不到收购的人则来帮忙，农民不管多么不顾困难，即使在集市上耽擱一个星期，也不会比他们商定收购他运来的东西的价钱多卖一个戈比。在他们中间，没有资本的小喽啰们通常依附于贷款给他们或委托他们代购货物的大商人；资本较雄厚的则独立经营，直接与大的商埠和港口发生联系，独自运去成车皮的货物，并亲自到那里采购本地需要的商品。无论你坐哪一线的火车，你一定会在三等车厢（偶尔在二等车厢）里遇到数以十计的这类为生意而奔波的人。这些人你一定认得出来，他们的装束特别，对人粗鲁无礼，看见哪一位太太请他们不要抽烟就发出刺耳的狂笑，或者是笑那些出外谋生的乡下佬，笑他们一点不懂生意经，笑他们穿草鞋，认为这是“没有教养”。这些人你从谈话中也能认出来。他们谈的总是“羊羔皮”、“植物油”、皮革、“香鱼”、糜子之类的东西。同时，你还可以听到他们厚颜无耻地叙述他们怎样骗人，怎样制造假货：怎样把“臭得难闻”的咸牛肉“卖给了工厂”，“只要一指点谁都会把废茶变成好茶”；“每包白糖掺水可以增重三磅，而顾客一点不会看出”等等。这一切谈得如此露骨、如此放肆，使你一看就明白这些人只是因为怕进监狱，才不偷小饭铺的汤匙，不扭走车站的瓦斯灯。这些人连最起码的道德都没有，他们的道德完全建筑在卢布上，用谚语来概括就是：商人是钓者，大鱼活着就是为了吃小鱼，有空子就钻，瞅准照管不严的东西，抓住可乘之机，不要怜恤弱者，得巴结时就巴结，能下手时就掐住亲人的喉咙。为了不致限于空口无凭的评述，我以为可以引用去年10月萨马拉省法院审理的纵火案件^①来说明这种评述。在这一案件中受审的是新人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一

① 参见《俄罗斯真理报》1878年第57号。——作者注

案件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因为它比任何描写都更清楚地说明这些人的活动和道德面貌。

案件的情况如下：在尼古拉也夫斯克县赫沃罗斯强卡村有一个萨马拉省尼古拉耶夫斯克城的小市民沃尔柯夫。他住在他父亲遗留给他的房子里。房子是木头的，已很旧，由过道分隔成为两半。前面一间曾经是一个小酒馆，沃尔柯夫自己住在后面一半。沃尔柯夫是单身汉，但是他热爱生活、喜欢聚会和舒适。在后一半房子旁边又添造了一间屋子，沃尔柯夫的好友、农民别洛夫同他的儿子和妻子乌里扬娜住在这里，据说，沃尔柯夫同乌里扬娜有暧昧关系，而别洛夫本人也知道。离赫沃罗斯强卡二俄里有一个小村庄格列米亚奇卡，村里有一个农民叫卢纳耶夫，是沃尔柯夫的左右手。1873年6月沃尔柯夫白天到邻近的利波夫卡村的神甫家去作客，在神甫家里和一个教师多勃龙拉沃夫一起一直坐到深夜。最后，当他们三人走出门时，看到远处火光冲天，教师对沃尔柯夫说，可能是他家的房子着了火，因为他以前曾几次说过，赫沃罗斯强卡的农民们要放火烧他的房子。沃尔柯夫策马飞驰回家。当他到家时，火已熄灭，房子已全部烧毁，什么也没抢救出来。在火灾前半年，沃尔柯夫在地方自治机关为他的房子保了一千卢布的险，得到了八百卢布的保险费。警察来了，进行了调查，沃尔柯夫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火灾的原因没弄清楚，一切都归结为天命，而后就忘却了。过了三年，1876年，沃尔柯夫向商人阿尔让诺夫买了一所旧木头房子，这所房子座落在乌格洛夫卡村，原先属于地主捷利亚科夫。沃尔柯夫用七百卢布买下了这所房子，分期付款，到1878年付清，并在地方自治机关保了四千卢布的险。这所房子已很旧，没有人住，门窗都钉死了。它象老爷的庄园一样，离村子相当远。房子四周覆盖着深深的雪。买房和保险后过了一个月，在圣诞节前两天的夜里，这所房子突然着了火，着火的原因不明，房子全部烧光。沃尔

柯夫得知这一灾祸后，巡视了火灾现场，然后就到省地方自治局去，要心安理得地领取四千卢布的保险费。地方自治局却没有立即慷慨解囊，派了技术员奥列赫诺维奇去进行调查。于是沃尔柯夫就去找阿尔让诺夫，请求帮助他获得全部保险费。阿尔让诺夫觉得这不太合适：第一，在沃尔柯夫向他买房子时，他在合同中提了一个条件，即房子用他阿尔让诺夫的名义去保险，可是沃尔柯夫去保险时用的是自己的名义；第二，他从保险单上得知，用七百卢布向他买去的房子却保了四千卢布的险，这在他看来是可疑的（也许还使他感到吃了亏）；最后，第三，当沃尔柯夫央求他设法使地方自治局相信，房子的确值这么多钱时，他甚至觉得这是危险的。阿尔让诺夫决定立即把这一切报告地方自治局。自治局提起了诉讼，案件落到了检察机关手里。副检察长扎沃德斯基和侦查特别重要案件的侦察员认真地审察了这一案件。对一切详情细节的仔细侦查使他们确信，赫沃罗斯强卡和乌格洛夫卡的这两所房子都是沃尔柯夫蓄意纵火烧掉的，目的是要获得保险费。一切都使检察员认为，尽管沃尔柯夫不在场，上述判断是确定无疑的，因为纵火也可能是其他人干的。赫沃罗斯强卡的居民不喜欢沃尔柯夫，竭力躲开他，甚至要使原先的县法院下令拆除沃尔柯夫的房子，因为他的房子建在公地上。沃尔柯夫成功地避过了这道命令的制裁，把房子转移到农民别洛夫名下。沃尔柯夫在赫沃罗斯强卡没有什么事情；他的房子很旧，谁也不愿购买，至多值二百五十卢布。在火灾之前不久，沃尔柯夫挖了一个很好的地窖，不仅把自己的箱子什物，而且甚至把乌里扬娜的家具什物都藏在里面，因此当房子着火时，一个农民从窗户跳进房间去想抢救点什么东西时，里面什么也没有。这天夜里农民卢纳耶夫来找沃尔柯夫，在他家里过夜等着他，其实卢纳耶夫最近在自己的格列米亚奇卡村见过他，他离开利波夫卡神甫后也必定路过该村。赫沃罗斯强卡的居

民中谁也没有任何必要去纵火，因为大家都知道，沃尔柯夫的房子是保了险的，他们如果去纵火就有为火灾而作出牺牲的危险。守夜人当时在街上，看到了火灾开始时火舌穿透屋顶的情景，没有发现任何人这时在街上走过他的房子。尽管先前就传说有人要放火烧沃尔柯夫的房子，但是他并不去查明失火的原因，并不为要求侦查而奔走（当然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乌格洛夫卡村的失火使检察官更有理由怀疑沃尔柯夫。1876年他的境况很不妙，向阿尔让诺夫购买房子时，他总共只有七十五卢布，答应在年底以前付一百二十五卢布的定金，其余的到1877年年底付清。房子已十分破旧，房子里只有十分之一的木头还能用。如果不是存心干昧心勾当，象沃尔柯夫这样讲究实惠的人是不会出这么高的价钱买这个废物的。在房子被买下并保了一大笔钱的险以后，就有几个人预言，要发生灾祸了，他会放火的，过了约两星期这一预言就实现了。此外，侦查证明，这一天农民别洛夫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到过尼古拉耶夫斯克，前前后后转来转去；跑来救火的人都注意到，有一道雪橇的辙印一直通到房子，毫无疑问，是他执行了沃尔柯夫拟定的纵火计划。房子里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而且出于无远见的小算盘甚至把门上的稍为新一点的有用的五金件都摘去了。这些证据加起来，使检查官有理由控告沃尔柯夫纵火；但是令人感兴趣的主要不是两次纵火事件的本身，而是法庭上揭发出来的善于钻营者的生活、活动和道德面貌。记者是这样报道的：“1873年事件发生时沃尔柯夫是赫沃罗斯强卡村里的一个普通酒店老板。这时正是萨马拉省的一个困难的时期：连年歉收，农民们缺衣少食。沃尔柯夫懂得，只要先在农村中呆一个时期，以后就不会是最后迁往城市的人。沃尔柯夫是卖酒的，而且借给农民们酒、粮食和钱。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熟悉关于‘立字据’的法律条文和各种手续，他很清楚地懂得，这些手续对于哄骗庄稼汉是极好的帮助。他借给农民们数目不大

的钱，要他们这些不识字的农民立下一张字据，他规定了很高的利息，讲定了巨额的违约金并写在字据上面。他很清楚地知道，农民中谁无力如期偿还，这个不幸的人就成为他的牺牲品。有时他不归还字据，而后根据字据追索欠款，有时他把利息和违约金增加到骇人听闻的数额。例如，他借给一个农民二十五卢布，要他写了一张借款三十五卢布的字据，这个数目后来增加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以致这个农民给了他十头公牛和最后一匹马，只求能同他算清账。这个农民连着两昼夜跪在沃尔柯夫脚下，抱着他的双膝，吻它，痛哭流涕，泪如雨下，恳求他的宽容……另一个农民借了他一百五十卢布，后来知道，违约金数达一千九百卢布。虽然沃尔柯夫掠夺了几个村庄，如赫沃罗斯强卡、格列米亚奇卡、斯文拿沼泽地、尼科利斯科耶，但是，受到他特别残暴的掠夺的是住着‘莫尔多瓦人’的利波夫卡村。沃尔柯夫自吹自擂地说：‘在利波夫卡，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我不会把你们的利波夫卡抬高到天上，也不会让它掉到地上来，它将在我的空中晃动。’由于欠他钱没还，他威胁说要在村子周围挖一条沟渠。事情竟然弄到这样的地步：地方调解法官这一次彻底拒绝按照沃尔柯夫的要求向农民追索欠款，为此弄到了参议院撤销原判的决议，农民们则在摆脱了沃尔柯夫以后，当他转到尼科利斯科耶村去的时候，请神甫来做了一次感谢上帝的谢恩祈祷。沃尔柯夫的行动经常是很神秘的。大家都知道，农民们非常喜欢寻根问底，他们习惯于追问：‘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了什么’，但是，关于沃尔柯夫‘任何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到哪里去，为了什么，甚至他的车夫也是含含糊糊地回答这种问题。’”至于周围的人们，那么“沃尔柯夫在周围的人们中间所遇到的只有赞成和支持，从来没有遇到任何反对。一位乡村教师由于贪酒常替他写无中生有的字据，他以后就根据这些字据掠夺人民，另一位教师和当地的神甫认为他是最值得尊敬的朋友，时常去拜访他，当然，

经常极为满意地在自己家里接待这位尊贵的客人。一直在乡公所供职的文书博哥莫洛夫给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写了一封信，信中答应他哄骗莫尔多瓦人。一位地方自治局保险代办员兼地方自治局委员替他的旧房子保了一千卢布的火险，其实这所房子最多能值二百五十卢布，另一个地方自治局保险代办员，前乡文书，甚至没去看一看房子，在得了十四卢布的车马费以后，便满足了沃尔柯夫的要求，为他那老朽的房子保了几千卢布的险。”

这就是萨马拉检察机关给我们描绘的农村风气，这就是萨马拉检察机关从生活堕落中，从这种堕落的可恶环境中以及从到处都是的专横中揪出来的新的社会活动家（完全是由于他的愚蠢和纵火败露而偶然揪出来的）。沃尔柯夫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典型。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沃尔柯夫，哪个地方都可以听到这类掠夺和奴役农民的事情，这类纵火的事情，这种纵火事件往往不是自己去干，而是假手于他人，一旦事情败露，去服苦役的是他人。当然，大部分事件被掩饰得毫无破绽，因为在我国，萨马拉地方自治局保险代办员和警察局长这种人比检察官扎沃德斯基一类人要多得多。据说，大部分的偷马贼，他们的首领不是那些在偷马时常常被忍无可忍的农民用棍棒打得头破血流的无家可归的贫民，而是沃尔柯夫之类的无赖、酒店老板、商人。然而农民怎样对待这种人呢？如果这种人象沃尔柯夫那样愚蠢、粗暴和小气，农民就不会喜欢他们，而会畏惧他们，怕他们陷害自己，而自己对他们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房子都保了险，他们既有骏马，门闩牢固，家有恶犬，与地方当局还有往来。但如果这些人比沃尔柯夫聪明、刁滑，如果他们给掠夺和奴役农民的行为披上漂亮的外衣，如果他们明明赚了卢布，同时却大叫大嚷地说少要一文钱，如果他们对遭了火灾的村子不惜送点烧酒或小米，那他们就能博得农民的敬仰、拥护和尊重，被农民奉为养活穷人的恩人，好象没有他们，穷人早已完蛋。农

民把他们看做聪明的人，甚至把子弟送到他们那里当学徒，认为孩子坐柜台是体面事，深信孩子将来定有出息。

读者，你们现在到城市去看看。这里你们会碰到人数更多、种类更庞杂的年轻资产阶级。凡是有了文化并认为自己宜于从事更高尚的活动的人，凡是认为自己比苦命的普通农民有更好的命运的人，最后，凡是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在农村安身的人，现在都渴望到城里来。这里你们会遇到店员、办事员、小商人、小贩、各种包工头（泥水匠的、木匠的、石匠的等等）、电车售票员、清道夫头、巡警、交易所经纪人、渡口把头、小饭铺和客栈掌柜、各种作坊的老板、工厂的领班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有明显特征的真正的年轻资产阶级。他们的道德准则在这里同样极其狭隘：一切活动建筑在剥削劳动的基础上，而毕生志向是取得资本或小额资本以愚蠢地度过一生。一般说来，他们没有任何受教育和从事智力活动的要求，或只是在极为罕见的、特殊的场合才有。让我们在上述各类人中任择一类来更仔细地看一看。就拿工厂、这些年长和年轻的工长和帮工来看一看吧。你也许听说过，一个普通工人一月可以得到二百卢布工资，或者在计件工作中一天能赚五个、六个、七个甚至更多的卢布。翻开工厂记录簿，你就能看到这些数字。当然，这样的幸运儿是不多的。其中有些人确实是本行业的能手，他们利用规定好的工作质量条件，的确靠有效的劳动挣钱很多，然而这些工资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因为他们或者用力过度，过了一个月就进医院，或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负债的境地和工厂生活的条件，即无法摆脱工厂周围的店铺老板、饭馆主人等等。但是这些幸运儿中的大多数人不是这样：虽然他们也很能干，但尤其会拍马奉承，会维护工厂秩序。他们当然都通晓本行，但他们大都是依靠那些幻想当上工长的帮工，而自己只起监督和领导的作用。他们总是反对提高工人们的工资。他们经常有一点小额资本，其中大部分以

每月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利息借给贫穷的同伴。如果工厂有独一无二的住宅或工人宿舍，他们便以便宜的租金租得房子，然后按每个房间住五至十人转租给工人们，向他们索取多十倍的租金。监视工人的告密者就是来自他们中间。这些人已经不是工人，不是人民，而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其他各类人的情况也都是如此。我知道许多人看到他们而心中高兴，把他们看做智慧、毅力和事业心的化身，认为他们是人民中最进步的分子，认为他们的产生是祖国文明化直接的和必经的步骤，而文明化的不平衡性将逐渐消灭下去。哦！我早就知道，我国已经造成了高等资产阶级，他们都出身于有教养的人，出身于商人，出身于那些或经不住 1861 年的危机而没落、或为时代精神所掌握的贵族；这一资产阶级构成第三等级的骨干，现在它所缺少的只是来自民间的分子，没有这些分子它就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它是喜欢他们的。我知道，许多簪缨世族的后代已从事酿酒业和卖酒业，承修铁路，担任股份银行的董事，甚至已在著作界安下身来，并唱着新的歌曲。我知道，著作界的歌曲有许多非常委婉动人，它们倾诉着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但我同样知道，端正的著作界的职责是暴露那种不是送给人民面包而是送给人民石头的企图。法国资产阶级也把自己和人民混同起来，总是以人民名义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总是欺骗人民。我们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潮流对人民的道德与物质生活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不久以前，《当代新闻》在考察改革以后在我国形成的新的经济阶级时，对它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穿着皮靴、对小警官卑躬屈膝的旧日富翁，摇身一变而成了象欧洲人一样放荡不羁、甚至傲慢无礼、有时还挂上头等勋章和高级官衔的大老板。仔细看看这些突然崛起的人物，你就会大吃一惊地发觉今天的这些显赫人士大多是昨天的酒店老板、包工头、店员等等。这些新人物活跃了城市生活，但没

有改善城市生活。他们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忙碌，使各种概念混乱不堪。周转的加速，对资本的需要，掀起了创办企业的热潮。这种热潮简直变成了狂热的赌博。出乎意外地造成的无数财富，使发财的欲望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在这方面，天晓得是从哪里和怎么冒出来的交易所和银行的大亨们，很象上个世纪在宫廷里成长起来的猎奇家，他们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最近时期的最鲜艳的花朵，大家熟悉的机伶的生意人的病态身軀正是在挖得很深的城市土壤中播种和成长起来的，这种生意人的全部信仰和整个行动方式都是建立在如下准则的基础上的：谁要是能拯救自己的灵魂，谁就去拯救自己的灵魂，谁要是能够溺死人，谁就去溺死人。除了自己的昧心交易外，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承认。他相信在交易所听到的信条：资本无祖国，他就象数典忘祖的人那样活动。他的地位使他不受任何约束，因为他没有任何地位。他是不定居的茨冈人，经常由一种境况变为另一种境况：他昨天是个短工，今天就成了没有金钱的百万富翁，明天又变成因偿还债务而发财的机伶的破产者，等等。

无疑地，这种人对人民的道德起了极有害的影响，如果不怀疑城市工人比农村劳动者更堕落，那自然不能怀疑这是因为城市工人更受这种人包围，呼吸着他们的空气，过着他们建立的生活。现在，当小市民的思想开始灌注到人民中间去，当人民中间产生出新的小生意人的时候，对人民的道德和物质生活的威胁增长得特别快，并变得很尖锐。据说，这些人精力充沛，但他们的精力只是用于剥削别人。据说，他们的智能出众，但他们的智能完全是特殊种类的智能，只限于实践范围的机警和敏锐，在这个范围内一切崇高的智能都将被窒息而断送。我再说一遍，他们没有任何受教育和自我修养的要求：对于“有学问的聪明人”，他们照样真心地加以嘲笑，就象嘲笑现在一只衣袋空着、另一只衣袋里什么也没有的昔日

贵族一样。如果他们也送孩子们去上学，那只是为了让他们学会算账和看懂提货单(进入中学和高等学校的百分比微乎其微，只有罕见的例外)；主要的学科是学会应付本行的工作，就象老鸨和老狼训练小鸨和小狼觅食那样。据说，这些人富于进取心，但他们的进取精神也是十分特别的。他们不是勇敢的航海家，也不是到北极地区去考察的探险家；他们不是勇敢和富于进取精神的东进的叶尔马克^①的义勇队员，而是在国内飞来飞去糟蹋人民田地的蝗虫。如果说俄国地主以野蛮著称，只要稍微把他刮一下就能认出他是鞑靼人，那么俄国的资产者是连刮也不需要刮的。如果说旧时的俄国商人建立了一个黑暗王国，那么现在它和新资产阶级一起必将创造一个魔鬼世界，使一切思想、一切人的感情归于毁灭。黑暗王国很小，其代表为沙皇绍姆堡-利珀或利珀-德特莫尔德^②之类的人；新资产阶级的王国则相反，将是广大的……一群一群的新掠夺者走向四方，在各地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地主庇护他们，看见他们就笑容满面，地方自治局人员发给他们巨额保险金，民众教师替他们写诬告状子，僧侣亲自造访，乡文书则帮助他们陷害莫尔多瓦人。然而应当怎样来反对这种人呢？对付他们，当然，你撰写不出任何特殊的刑法典，你也想不出任何特殊的教育学。不能用鄙视来影响他们吗？但是谁会鄙视他们呢？难道不是在别人鄙视他们之前他们就已鄙视别人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说服的办法和书刊言论来影响他们吗？但是著作的影响只能是缓慢的，只能是逐渐的，而在此之前他们将统治并蹂躏农村。斯宾塞在说明商界的极端不道德时认为，反对商界不道德的唯一办法在于改善社会

① 叶尔马克是哥萨克军首领，与俄国十六世纪时其他一些拓荒者在开拓西伯利亚方面起过很大作用。——编者注

② 绍姆堡-利珀和利珀-德特莫尔德是古代德国莱茵河流域的两个公国。——编者注

舆论,在于整个社会,包括商界的智力发展和道德发展;斯宾塞说这话的时候,当然,他没有想到,被剥削者的生命是短促的,而剥削者却正在发展,社会舆论的改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极为缓慢的。当然,这直接取决于期待和指望良好制度的程度,显然,他对良好制度的期待和希望并不比他对天堂的期待和希望更多。无论从正义方面考虑,或从道德和政治方面考虑,都不能寄希望于剥削者智力的发展和社会舆论的改善。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著作界的影响毫无作用,但它为此必须:第一、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使命,不要限于只培养富农,还要唤起社会舆论,第二、著作界应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更多的接近人民的机会。同样,我们也不认为培养和教育的影响毫无作用,但我们首先认为:(1)受教育的机会应当人人都有,而不应仅仅特殊人物有,不应把他们单独划开,变成富农;(2)国民学校不仅应为退职的教堂下级职员、官吏和各种酒徒打开大门,而且应为真正正直的和真诚地爱人民的人打开大门。教育必须是免费的,义务的。但这还不够,智力的发展,可惜如我们所看到的,往往还不能保证一个人摆脱兽性的贪欲和本能。因此,应当立即采取防护农村免受掠夺的措施,首先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村社,保护这种有助于克服人性的道德缺陷的共同生活方式。应当使村社获得永久的保障。但就是这样也还不够。村社在其目前经济条件下和沉重的捐税负担下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轻赋税,组织人民工业。

这就是整个端正的著作界应当同意并拥护的反对富农的办法。这些办法当然不是新的,但问题在于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而这一点还远不是每个人都信服的。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47—375页。

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 社会主义的任务^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认为进行社会变革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只要密谋策划，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然后向自己的臣民抛出一系列施恩的法令即可告成。同时还认为，人类“根据长官命令”能够认识任何真理并付诸实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限于革命者。这是由对社会现象的一种普遍观点产生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由某个或某些掌握“政权”人物的意志决定的。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可以举出不少这类可笑的立法者。他们幻想根据他们在办公室里炮制出来并经当局批准的种种方案去改造国家。这是社会学发展史上的神学阶段。在神学观点统治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一切自然现象都被解释为某个或某些神祇的旨意，在社会学方面，则认为社会发展的进程完全取决于立法当局的作用。

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对社会现象的更为正确的观点必然会排除上述社会更新的理论。而目前，只有少数革命者才持有这种较为正确的观点。

① 这篇文章（出于保密，发表时作者未署名）刊载在1879年1月15日出版的《土地和自由》杂志第3期上。本文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民粹派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倒退，把农民村社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相信在消灭专制制度之后俄国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编者注

当人们确信，历史是由人民和政府的共同作用创造的。并且人民的作用更大时，大多数革命者便不再幻想夺取政权了。他们懂得，当变革自下而上进行时，往往更为可靠。这样就出现了许多详尽备至的社会体系，并打算在群众中广为宣传，以便训练他们去实现革命者向往的社会变革。

马克思的一名最有才能的学生和普及者^①说：“大家知道，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社会主义著作家，制定了许许多多旨在造福于大多数民众的未来社会的合作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认为，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采取任何一种他们认为合适的劳动组合形式。”

鉴于这些观点反映了革命者旧公式的变化，即从“一切为了人民”演变为一切通过人民，因而它们是社会主义者观点上的一大进步。但即便如此，这些观点也并未赋予社会发展规律以应有的地位。上面我们援引的作者接着指出：“人们忘记了，社会制度的形式是既不能臆造出来，也不能使之倒退，正如不能直接从个体手工业超越手工业工场跳到工厂，或从工厂倒退到手工业工场一样。这一形式是由生活本身提供的。”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是对生活不予重视的。他们设想的社会形态被认为适用于任何社会，不管其经济发展的阶段如何。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改革幻想的限度。形而上学的实质就在于，宣传被认为是能够任意改变历史进程的。思想就是一切，生活是微不足道的。对于那些造成上述社会生活后果的社会变革的因素，社会主义者只是在不久前，才予以认真的注意。

洛贝尔图斯、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杜林都是社会主义积极发展时期的一批杰出代表。在《资本论》作者看来，社会主义是西

^①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的是俄国经济学家尼·伊·季别尔。——编者注

欧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自然产物。马克思向我们指出，是生活本身拟定国家的社会合作制的必要改革，是生产方式本身促使群众的意识接受社会主义学说；而这一学说：在缺乏必要的准备以前，不仅无法实现变革，而且也不能创立多少有所作为的政党。马克思还向我们指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什么范围内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方能奏效。他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①这样，马克思指出宣传的作用在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是有局限的。杜林在充分肯定个人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的作用的同时，还指出，个人的活动应具有“群众情绪的广泛基础”。

看来，似乎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只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好处。其实不然。马克思本人大概也未必料到，那些竭力维护现存制度的人们从他的学说中将得出何种结论。这里我们不妨谈谈我们的自由主义的政论家们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得出的那些结论。他们大叫大嚷：“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连异教徒马克思本人也未必给社会主义签发在我国的居住证吧。须知马克思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应由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而来；而西欧有过一个时期，阻止新生资本的发展就意味着倒转历史车轮；正因为如此，拉萨尔称德国的农民战争是反动的战争。俄国还不能称作是马克思所指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要求形成一个‘摆脱一切’、‘自由得象小鸟一般’的无产者阶级。而在我们这里，农民并没有失去土地；相反，我国的农民随着解放获得了土地，因而农民村社是阻止俄国无产阶级发展的最好的堡垒。俄国保险不会遭受社会主义的祸害！（信奉者多么怡然自得啊！）经济阶段更替的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编者注

律是一切社会的普遍规律，即便你们的理论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即便社会主义的宣传在西方可以认为是合理的，但在俄国，这种宣传就是照马克思的看法也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让我们把我们的论敌的未尽之言说完吧——，马克思的俄国信徒们的任务乃是鼓励本国工业的发展，背弃人民数百年来的习俗，使他们失去土地，然后心安理得地认为，这一切都出于社会主义在俄国发展的需要。

至于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这种两面把戏早就习以为常了。众所周知，他们历来就有两种尺码，对西方是一种，对俄国又是一种。他们一方面对西方人权的扩大深表同情，另一方面又为本国的沙俄警官权力的扩大大唱赞歌。我们的伏尔泰信徒们往往是最狂热的农奴制拥护者。如百科全书派的自由主义友人叶卡特林娜二世为了维持她的黑暗王国，牺牲了多少农奴的性命。杰尼斯·达威多夫在诗中早就颂扬了这种两面性：

瞧吧——我们的拉法夷特，
布鲁图，还有法勃里茨，
把农民同糖萝卜一起，
一古脑儿塞进了压榨机。①

不过，干出这种勾当的只能是象帝国时代的罗马占卜官，或亚历山大二世时自由派那样笃信自己所宣扬的信念的人。而对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言行一致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把农民塞进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现代化的压榨机是极不相称的。

请看，马克思的学说要求我们承担何等重大的责任，而这对确定我们纲领的出发点也将是十分有益的。

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

① 引自杰尼斯·达威多夫的诗《现代之歌》(1836年)，《杰·达威多夫诗集》1950年列宁格勒版第150页。——编者注

还是不能跳过自然的发展阶段。这就是说，当社会还未能探索到这一规律时，受这一规律所制约的经济阶段的更替，对该社会来说也不是必然的。

这里自然就产生一个问题，作为马克思考察对象的西欧社会究竟在什么时候便已探索到这一不可逆转的规律了呢？我们以为，这正是发生在西欧村社解体的时候。众所周知，早在同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村社已遭到破坏。取代每个公民都有权占有土地的村社原则的，开始是封建主义的原则，即土地权只能世袭；随后是资产阶级的原则，即凡有钱购买土地的人均可占有土地。

当村社的解体改变了人民中的土地关系的型式时，西欧社会经历了最为严重的危机。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西欧村社的解体，这一点现在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要确认的仅仅是私人占有取代村社原则这一事实。私人占有制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根据内在的必然性，借助于新生的资本、科学上的发明和发现，同时也就在不断地挖封建制度的墙角。

封建制度在其强大敌人的联合打击下确实覆灭了。但是不应忘记，“使这一运动具有活力，使这些发明获得生机的精神，是个性的精神，个人占有的精神……这一原则在政治上得到了体现，从而引起了社会震动、美国革命和法国政变”。（德雷别尔）由于这一原则完全进入西欧各国人民的生活，渗透到人们的一切相互关系之中，它自然也只能由它本身所包含的矛盾而导致灭亡；而这些矛盾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能充分地显露出来。私人占有制把大批的工人群众联合在工厂里，为他们创造了共同的利益，训练他们习惯于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社会化，总之，在人们中间培养那些自村社解体以来受到压制的社会习俗的同时，私人占有制也就给自己挖好了坟墓。这样，在大机器生产的地方，社会主义受到如此殷切的接待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可见，私人占有制体现得最充分

的资本主义的全部作用显然在于训练工人群众接受社会主义学说。而在以私人占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里，如果不存在工厂的劳动社会化，大工业并不为工人群众创造共同的利益，那么社会主义势必会大受冷遇。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但那时，社会主义仅仅是个别人的信仰，充其量不过建立了几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共产主义宗派而已。只是在目前，在生产技术本身要求人们进一步集体化的资本主义典型时期，社会主义才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因为单独一个人已无法占有并操作机器，工人如果不想永远依附于厂主，他们就应当共同占有机器。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西欧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社会习俗是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加以改变的，正如不能飞跃一样。它们的变化是通过极为细微的变化的逐渐积累而形成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明白资本主义在逐步联合工人群众中所起的作用。在西方，它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天然先驱者。不过，我们认为，如果西方的村社不是过早地解体的话，那么，那里的社会主义将完全是另一种发展进程。共同占有土地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有例如私人占有制所遭受的那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它本身不带有导致自身灭亡的因素。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原始公社原则的矛盾在于，它看不到任何超出自己范围的东西，它同一切其他的村社进行竞争。但我们反对这种说法，因为这与其说是原始公社的情况，毋宁说是氏族社会的情况。不必举很远的例子，就拿顿河哥萨克来说，他们的土地分属各个村社，但其成员同时又是整个哥萨克地区的成员，因此，社员可由一个村社转到另一个村社，并有权在其中分得份地。村社的这种土地和区域联盟制，凡在村社原则不受反对势力歪曲的国家里，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现时条件下，在某些个别的村社中还存在着这种土地的村社耕作制，即可证

明，村社耕作土地同样是可能的。这些事实为数极少，但只要有一个不是虚构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土地的村社所有制，正如它在原始公社实行的那样，丝毫不妨碍对土地进行集体耕作。这样，在原始公社的原则里，如目前俄国存在的这种村社里，我们看不到注定导致其灭亡的任何矛盾。

因此，只要我国大多数农民依然保持土地村社时，我们就不能认为我国已经走上这样一个规律的道路，根据这个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是它前进道路上的必经之站。相反地，这一规律的倾向只会降低我国人民的社会感情的水平，而它在西方则曾经是真正进步的现象。

读者也许会问：对同一形式的合作制的作用为什么有如此不同的评价呢？这是否正是你们指责自由主义者的东西呢？但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好是坏，而在于它所取代的是何种形式的合作制。如果它所取代的社会形态比它低下，那么社会就向前推进了；如果资本主义建立在一个更为公道的原则的基础上的社会里，那么社会就倒退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在我国又将如何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取代的是这样一种合作制，尽管这种合作制不同于资本主义，但却是建立在同一个私人占有的原则上的（我们指的是手工业工场），因此，大工业的“劳动社会化”十分有助于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习俗。至于在我国，资本主义排挤的却是土地村社，而这种合作制形式是建立在更为高级的原则之上的。因此，工厂里的任何“劳动社会化”都抵偿不了人民群众由于与自己的主要劳动工具——土地——的关系发生急剧变化而引起的社会感情、社会习俗的大大倒退。

一般说来，历史决不是某种千篇一律的机械的过程。据我们所知，卡尔·马克思本人也不是那种随心所欲地把人类放到“共同

规律”这张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的人。马克思在反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文时指出，繁殖的抽象规律只存在于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因此，在马尔萨斯看来，否认在人类繁殖问题上存在“抽象规律”，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极为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又承认这些规律，是极不合逻辑的。如果确切地加以表述，应该说，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它们是不同地交错组合的，另外，它们产生的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同样的引力定律在一种场合下产生行星的椭圆形轨道，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则产生慧星的抛物线轨道一样。

这样，对那种认为俄国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意见，我们看不出其根据何在。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在俄国宣传社会主义为时过早。相反，我们认为，正是现在，这种宣传比任何其他时候更为适时，只是宣传的出发点和实际任务与西方应有所不同。采取不同的革命手段的理由，表面看来似乎不值得特别加以重视；但我们认为，如果俄国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不同任务能及早弄清的话，许多失望可以避免，大量白白浪费的精力可以得到应有的补偿。

问题究竟何在呢？

在经济历史、现时社会关系形态极不相同的两个社会中，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不可能是等同的。如果我们不想回到三十年代的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在一个农业国，最为必需和可能的社会改革往往由土地占有制形式和农业技术来决定；而在一个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占优势的国家里，这种改革则由工业的形式和工业技术来决定。

不妨举例来说明我们的想法。比如说，有两个各有五十人组成的团体。假定其中一个由纺织厂工人组成，该厂的每一台车床都是整个蒸汽机的一部分。如果该厂工人不愿再为厂主干活，那

么，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除了集体占有这台机器外，别无它法可想。因此，社会革命党在该厂的宣传只能是，而且应当是，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集体占有劳动工具这一原则，因为生产技术能使工人的意识和性格为实行这种集体主义作好必要的准备。现在再说那另外五十人组成的村社。假设该村社实行的是粗放的土地耕作制。在这种耕作制下最普遍使用的农具是简陋的犁，大家知道，这种犁只要一个劳力就可操作自如了。如果该村社受到来自国家或邻近的大地主的经济剥削，那么革命者的迫切任务在于消除这些阻碍村社顺利进行和进一步发展的敌对影响；而有关集体劳动的宣传只有在用精耕细作代替粗放的耕作，用大农具代替原始犁，因而本身要求村社的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实行合作制时才能提上日程。一旦该村社看到必须使用比方说蒸汽犁时，那么这时宣传集体占有这种犁无疑将是成功的。“人类在认识自己行为的意义之前便行动起来了。”这种或那种形态的社会关系不是根据“社会契约”，而是根据经济需要确立起来的。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不在于他们设想种种绝对化的方案，而在于这些改革方案完全忽视了他们当时所处的合作制形式。

人类的真诚无私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为数极少的；因此他们应当更为审慎地着手从事实际活动；应当更为严格地遵循以下规则，即把自己的精力只用于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时候和地方。

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社会关系形态——土地及劳动工具的集体占有制，目前在西方尚未获得实际的运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存在这方面的一点迹象。因此，社会革命党的任务在于总结这些促使社会更新的因素，使之成为一个严整的体系，并在群众中加以宣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这样一种方式，对集体劳动的宣传，如同对集体占有的宣传一样，在生产技术中有着同样多的先例；甚至

前者比后者更多,因为群众正是,也只有从集体劳动这一事实本身才能接受集体占有这一思想。

而在我国,情况则不然。俄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产业工人充其量不到一百万,^①而在这微不足道的数字中,大部分就其情绪和地位来说,不过是农业劳动者。俄国的占优势的土地占有制不仅不需要加以宣传,而且构成了我国农民对待土地问题的最本质的特征,这种占有制对农民来说,是他们世代相传的遗训。

集体劳动在我国不仅是集体占有的先例,而且相反,它本身只能从后者获得发展。如读者所知,社会主义生产的这两个主要特

① 现引英国、法国、普鲁士的农业人口与工商业人口的比例数字如下:

类 别	英 国	普 鲁 士	法 国
农 业 人 口	7.3 %	17.6 %	13.7 %
商 业 人 口	3.6 %	1.9 %	4 %
工 业 人 口	22.7 %	9.1 %	10.6 %

俄国没有按职业分类的人口的精确统计,就城乡类别而言,其比例为:

工业类 10%

农 民 86%

下面是英国、普鲁士、法国有生产能力的人口就业情况的百分比:

类 别	英 国	普 鲁 士	法 国
农 业	17 %	48.7 %	37 %
商 业	8.3 %	6.8 %	11 %
工 业	52.5 %	25.6 %	28.4 %

(参阅扬松著《比较统计学》第93—105页)

这些数字表明,俄国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对俄国每一个实际工作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普列汉诺夫注

征的形成过程，在我国将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说“将是”，因为目前，据我们看来，宣传集体劳动的时刻尚未到来。之所以尚未到来，是因为在我国农民实行的那种原始耕作方法的情况下，集体劳动只能稍稍改变提高劳动效率的条件。只有在那些劳动成效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协调的、共同经营的作业场所，即各种各样的工场里，这种宣传才可能奏效。但在那里，我们本来就已经可以看到在俄国劳动力中全面实行的这种劳动组合原则，如果我国的工业劳动组合正日趋衰落，那么其主要原因在于富农的有害影响，而富农目前在我国的的存在，正如一个邇邇人身上的寄生虫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这里的主要精力也应当用来消除现代国家的腐化作用。而这种腐化作用的消除，只有通过彻底破坏国家，并使我国解放了的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才能实现。

简言之，西欧社会主义的要求之一，即集体占有制，在我国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而另一个要求，即集体劳动，在我国的农业技术中却没有基础。

因此，我们又自然而然地回到了我们人民革命阵线的泰斗们波洛特尼科夫、布拉文、拉辛、普加乔夫等人提出的那些实际任务。

我们又回到了“土地和自由”的口号。

因此，我们活动的重心将从宣传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转到创建一个战斗的人民革命组织，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人民革命的变革。

1873—1875年的实践使大多数尚未沾染空谈习气的革命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请看当时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梅什金^①于

^① 伊·尼·梅什金是民粹派革命家，因“一百九十三人案件”而受审讯。他在法庭上的演说对沙皇制度的整个体系作了严厉的批判。弗·伊·列宁曾特别强调梅什金革命活动的意义。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417页。——编者注

1877年11月5日在政府枢密院特别会议上的演说。他说：“我们的实际任务，应当是团结、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和革命趋势，把两支主要革命潮流汇合起来——一支是不久前产生的、表现出相当力量的知识分子队伍，另一支是更为深厚、更为广泛、永不枯竭的人民革命的潮流！”

在今后几期杂志上我们将说明，为了创建一个革命组织，从我国历史与当前现实来看，存在着哪些条件。而眼下，我们愿意预先指出一个可能产生的异议。有人会对我们说，基于目前的土地关系（这种关系非政府一朝一夕就能用行政命令加以破坏），很难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纲领。众所周知，政府开始倾向于实行地段的土地占有制；而一旦实行，俄国人民将探索到新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人民引向社会主义的村社。——不过，这也不尽然。实行何种形式的合作制，重要的是它对改变人民习俗所起的作用。不能期望村社一解体，人民的性格便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显而易见的无需证明的思想已为小俄罗斯人生活中的某些事例所证实。异族的波兰文化的影响早在几世纪以前就摧毁了他们的土地村社。同时，轰动一时的“奇吉林事件”^①的起因正是出于农民想实行土地村社占有制的愿望。这类事例固然不多，但它们表明，即便那里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只要人民群众仍然保持目前这种情绪，那么我们的纲领也就无须加以改变。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27—337页。

^① 1877年在基辅省奇吉林县，以雅·瓦·斯捷法诺维奇为首的民粹派组织了一次农民起义。为了取得成功曾利用一份伪造的沙皇诏书。诏书表明，仿佛沙皇许诺给农民以土地和自由，并号召农民起来反对阻碍实施沙皇旨意的贵族和官吏。起义没有组织成功。1879年对参与奇吉林事件的人进行了审讯。——编者注

“土地平分”社宣言^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

俄罗斯的农民们、市民们和全体劳动者！

你们已经听到，不久前在各教堂和各乡镇都宣读了沙皇的诏书，对农民将不实行也不可能实行任何土地的重分或追加份地。

农民们！从宣布给予你们自由之日起，十八年来，你们白白地期待着沙皇实行土地分配、减轻苛捐杂税和各种徭役。曾经有多少次你们向他派去请愿代表，恳求他改善你们苦难的命运，但都是枉然；沙皇从不听取你们请愿代表的要求，而只是命令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现在你们看到，沙皇不是站在你们一边，而是站在地主和官吏一边。只是在皇储身上还有些希望，他还没有被老爷和官吏们拉过去。因此，农民们，你们现在就要召开村民大会，并全体一致决定委派请愿代表携带下列决议去见皇储：

1. 把地主和官方的所有土地、牧场和森林在所有人当中平均进行分配，免除一切为此而缴纳的赎金或定期付款。
2. 自由地、免税地经营各种行业——盐业、渔业、采矿等等。
3. 减少各项赋税和徭役，并豁免旧有的欠缴税款。
4. 取消所有的县区警察和其他压迫者。
5. 取消身份证。

^① 这篇宣言是土地平分社的第二个正式文件，发表于1879年11月，是在民意党印刷所里印刷的。——编者注

6. 减少征兵人数和缩短服役期限。

7. 每个乡、县和省的机构都能自由地进行安排，并由经过选举、可以罢免的公职人员和平地管理自己的事务。

这就是我们的团体多年来要为全体劳动者所争取的利益和自由。但是我们的敌人很多，我们有许多人被长官赶去服苦役、被杀害在监狱里或者被处死刑。但是，尽管有这种种迫害，我们仍然决心为农民的“土地和自由”而斗争到最后一息。

农民们，参加到我们的团体里来，我们将共同去争取你们在决议中所要求的一切。你们要委派请愿代表把这些决议带到彼得堡去。

在沙皇未兑现这些要求之前，你们要拒绝宣誓，不承认他是沙皇，不缴纳任何赋税，不去服兵役，不让任何长官到你们那里去。

如果长官用暴力强迫你们，你们就一致起来反对他。不要听信那些来劝导你们的被收买的神甫。你们要村与村、乡与乡地进行串联，并同心协力地击退暴力。

译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文集》
1965年列宁格勒版第2卷第158—159页。

土地平分^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

人民的声音——神的声音

在千百万俄国农民群众中不断地出现、消失、又重新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流言、传说和期望。尽管这些流言表面上各不相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人民渴望从现实的、无法忍受的困境中寻求某种出路。但是，除了一种流言之外，任何流言都没有获得如此广泛的，可以说是遍及各地的传播，也没有那样地引起政府和知识界的注意，这就是似乎即将平分土地的流言。任何人不仅无法指出这种“谬论”的发明者，甚至也无法指出它的发源地。可能，散布这种流言的是人民当中那些“饱经风霜”的人，他们长期在人间漂泊，感受到的不是那种城市小市民的虚假的文明习惯，不是对“愚昧的乡下佬”的蔑视态度，而是对人民需求和人民苦难的深刻的本能的解释。这种流言传遍了整个俄罗斯农村……到处变成了有关“听从的时刻”即将到来的坚定信念等等。我们的人民并不关心他们所期待的土地改革究竟同谁的“神圣权利”、同何种“社会基础”发生矛盾，他们只是把对这种改革的期待当作缓和痛苦现实和指望美好未来的依据。按照他们的意见，现代俄罗斯国

① 这篇文章发表在《土地平分》杂志第1期上，被认为是纲领性的文件。《土地平分》杂志于1880年1月至1881年12月出版，共出五期。——编者注

内外生活中的一切事件都要从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出发去进行评价。谋刺皇帝，处决政治犯，限制哥萨克，进行东方的战争，准备人口调查，——尽管所有这些事实显然不能相提并论，人民却完全是从自己对平分土地的殷切期望的角度来对它们进行衡量的。他们在每一件事上都只看到能够证实自己希望的根据。人民对马科夫先生所颁布的、对沙皇的声誉几乎帮了倒忙的那个政府通告^①完全不予信任。“在我们的意志面前不止一次地这样宣读过、宣布过，但意志依然表现出来”——大概，这是马科夫先生没有料到的答复，在这种答复的特殊逻辑面前，看来会遭到破产的还不止是一项政府的声明。

这种坚定信念的影响甚至扩展到了纯商务关系的范围：大家知道，在某些地方，农民拒绝购买土地，不愿签订长期的租借契约。平分土地的流言对民心的影响，大概只有废除农奴制的流言才能与之相比。废除农奴制的流言几乎从这一制度在俄国诞生的那天起就在人民中传播开了，它成了逐年扩大和日益频繁的许多零星骚乱的缘由，最后，它使得政府相信，“最好还是自上而下地解放人民”，否则这种解放就要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

从本朝进行的“伟大的改革”至今还不到二十年，而人民，以群众所固有的不知感恩的本性，已经开始在谈论平分土地了，并且在谈论时带着一种执拗的信心，这种信心曾经迫使政府作出让步。谁也不能担保，假如政府这一回再让步的话，人民就不会再要求它作出新的让步，直至国家不断地限制和削弱自己，最后走向完全的自我否定；而由于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政府所希望的，所以无论谁也就不可能担保，人民将不得不运用“自下而上”的影响来满足自己的要求，这种影响的罗网是世界上一切政府和自由派都

^① 内务大臣列·伊·马科夫在一项特别通告中向农民们解释，他们不会得到任何新的份地。——编者注

会竭力加以避免的，就象靡非斯特斐勒司^①竭力回避十字架一样。至于说到我们民粹派革命家，那么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我们看来，俄国的全部历史无非是人民村社生活和国家一个人主义共同生活这两种绝然对立的原则之间进行殊死斗争的、充满悲剧的长篇叙述而已。就象拉辛和普加乔夫等人的暴动一样，在巨大的群众运动的时刻，这场象飓风一样血腥的和纷扰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而已。在伊万雷帝时代，人民曾经赎免了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如同他们曾经从诺尔曼人、可萨人以及后来的鞑靼人手中得到赎免一样，他们曾经分散移居到北方沿海和西伯利亚荒漠的草原边区和森林地带，在他们自己爱戴的“头目”的率领下结成了下游地区的一帮流民；也有的在荒僻的分裂派教徒的修道院里凭吊“古代对宗教的笃信”，但无论在什么地方，人民总是坚持同一种企求，为同一种社会生活的理想而斗争。

自由的村社的自理和自治；给予村社全体成员先是自由经营“用斧头、镰刀和犁所能对付”的土地的权利，然后随着人口的增加，供给每人以均等的地块，唯一的义务是参加“公共的翻耕和砍伐”，劳动是动产所有权的唯一来源；所有的人都有参加讨论公共问题的平等权利以及由人民的实际需要决定的把各村社自由联合成更大的单位（地方）——这就是人民如此珍重地保护的公共生活的基础和原则，这些基础和原则可以简短地表述为一个战斗口号“土地和自由”，而当人民长久以来的忍耐达到极限时，这些基础和原则就具有使从里海边的阿斯特拉罕到白海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群众情绪激动的魔术般的特性。国家从其存在的最初时刻起，就和这些原则有了矛盾。原是自由的村社要向国家政权的代表贡

① 靡非斯特斐勒司是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编者注

献“食邑”，这些政权的代表干预人民的生活并且剥夺村社以往解决自己内部问题的无容置疑的权利：为了人民所不理解的并与他们的利益毫不相干的目的而向村社征收各种赋税；攫取村社的土地并把它分给私人；将世袭领地和大庄园分给上层阶级并给予他们支配农民劳动的权利；使人民完全成为农奴并施以暴力、暴力、暴力，从“最平静的”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时代把人民强制地合并算起，到借助于军事判决把乡村变为城市并在“永志不忘”的尼古拉时代强迫推行种植土豆为止——这就是国家给人民带来的福利，这就是国家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一贯奉行的手法。一些官方的历史学家先生们徒劳地力图使我们相信，俄国人民不仅自愿地欢迎这些公爵，而且始终乐于服从国家制度。这种服从竟是如此地自愿，就同小俄罗斯人服从波兰人或印度人服从英国人一样。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存在着对人民生活的粗暴干涉，对人民生活的方式及其特点的不理解和忽视，对人民权利的践踏。现在也还不清楚，这三个民族中究竟哪一个民族反抗得更激烈，捍卫自己历来的生活方式的基础更坚定。直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斗争中一直是胜利者，但有谁能够预料这场斗争在将来一定会有取得成功的把握呢？直到现在为止，国家的胜利是彻底的和普遍的。它运用自身机构的铁箍把人民压制住了；它利用这个机构的优势，不仅成功地镇压了大大小小的人民运动，而且还压制了人民独立生活和思想的一切表现；它严厉地对待哥萨克，使土地村社完全变了样；迫使人民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有的财产——土地——偿付超出其本身价值的赎金；但是，当俄罗斯国家在庆祝自己存在的千年纪念日时，当它看来似乎毫不怀疑那种独立发展的人民生活将要彻底毁灭时，人民却以无比的镇定和毫不动摇的信心宣称，再也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他们宣称，最后沙皇本人也将会意识到这种不可能，并将亲自按照人民的宿愿来改造社会关系。任

何东西都不能象这个虽已被埋没但依然充满着力量并具有独立发展能力的人民的阴郁低沉的声音那样，使得胜利者扬扬得意的心情感到如此痛苦的败兴，并且更加明显地证明，到现在为止，国家制度的影响仍然只是表面的，它不会波及到群众思想和观点。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发出了警报，并且不顾官方过去作出的一切保证，即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只不过是“几个别有用心的人物”，他们在人民中没有任何基础和影响，而现在却宣称，必须把农民中流传的关于平分土地的议论完全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宣传。政府竟然认为社会主义者对于人民的意识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迄今为止连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不敢幻想的。这就是官方声明的逻辑。然而，我们也要公正地承认，在这类错误中，政府的责任比它初看起来要小一些。

不理解人民生活方式的特点和他们的法律观念，在俄国历史的一切事变中只知道宫廷政变的历史以及宫廷中大大小小倾轧事件的年鉴，甚至经常忘记自己亲自采取的一些“措施”的历史——这样的政府，当它怀着惊奇和恐惧的心情听到，农民对于进行完全的土地改革还抱着期望时，竟把它解释为社会革命党的影响，这就不足为奇了。它知道，人民不承认上层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人民不仅要求剥夺上层阶级的土地，而且要求建立完全另外的、从政府的观点说来是不合理的土地关系的形式，总之，它知道人民期待着社会革命，于是很自然就把这归咎于社会主义者。

稍微了解各个政党、特别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产生过程的读者，当然不需要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是把因果颠倒了。并不是因为在俄国出现了社会革命党，人民对土地以及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看法才同上层阶级的看法发生矛盾，他们才不同意国家法典核准的关于所有制的概念。相反地，如果没有上面提到的争论，如果这种争论在我国整个国内关系史上没有留下自己的痕迹，没有

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去，这个党就将失去任何存在的意义，就将永远是一种不知被什么人以及为了什么原因而移植到俄国土壤上来的异乡植物。我们党正是由于这场争论才产生的，党包含了我们的希望，我们把党看作是获得成功的保证，并且我们认为党是一个出发点，是我们在人民中进行革命工作的作战基地。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必要再来谈几句。

我们对我党实际任务的看法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科学的普遍原理以及俄国历史和当前现实的特殊条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的最新成就，因此我们认为在占有和劳动方面的集体主义的胜利是社会经济制度进步的基本点。我们知道，“自然界不会产生飞跃”这一说法，既能狭义地用于自然现象的范围，同样也能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我们记得，在这个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是由社会的以往的和当前的状况所严格决定的，一句话，是由该社会的全部动的和静的条件所决定的。但我们也同样确信，治标的办法不能根除社会的祸害，任何一个社会活动家都应该力求对社会进行最大限度的必要的和可能的改革，简单地说，每一个社会活动家都应该成为激进派。由于我们认为社会中的经济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不仅是一切政治生活现象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社会成员的智力和精神气质的根本原因，所以，按照我们的意见，激进主义首先应该是经济上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改革家主要应该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改善社会经济制度，而不必去考虑这场变革会和平地完成，还是会在来自与保存旧制度利益攸关的人们的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完成。

所有这些原理不是别的，而是现代社会学的结论，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必须遵循的。所有的改革家和革命家，所有的社会活动家，从释迦牟尼到卡·马克思，从“伟大的”莱喀古士^①到“渺

^① 传统中的公元前九至八世纪时古斯巴达立法者。——编者注

小的”梯也尔，或者包括总督古尔柯在内，不管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在实践中是遵循它还是与它相抵触，都注意到了这些原理。但是，只要我们一想到把这些原理运用于我们祖国的实践活动，只要我们一谈到俄国进步的特殊条件以代替社会发展的一般条件，我们就会由于这些原理的逻辑而成为民粹派革命家。只有在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中，我们才发现生产者对劳动工具发挥充分集体主义所需要的素质，只有维护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在农民群众中得到坚强的支持；当前在俄国有可能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在因果关系上对它来说值得重视的政治改革，就在于消除敌对的影响并为正确发展这些方式扫清道路。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最大限度的改革，我们首先必须致力于摧毁我国现存的国家制度。大多数人民象农奴一样在为国家服役。由于国家剥夺人民的土地而造成的缺地现象，构成了一定数量的离乡背井的雇农，工厂便从中招募“人手”。国家以沉重的苛捐杂税迫使农民不得不出外谋生来满足它的要求，也就是说迫使他们充当老板剥削的牺牲品。国家在农村中支持富农和高利贷资本主义，从而一步步地接近最危险的一种人民生活方式。以上我们竭力从历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家对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方式所持的敌对态度，下面我们要说明一下人民对国家现时的态度。如果读者同意我们的观点，即国家拥有的一切对于人民来说都将是不可挽回的丧失，它所存在的每一年都使人民遭受巨大的灾难、不幸和痛苦，它力图使人民接受一种同他们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从而使民心涣散，那么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摧毁国家机构应该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的原因。由于同国家的斗争只能在“土地和自由”的基础上进行，所以，从上述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认为，为了拉辛、普加乔夫等人曾经为之斗争的同样目的，我们必须进行鼓动，并得出被我们称之为革命民粹主义的结论。正如一个懂行的俄国农艺师，一定会根据不同

的人口、销售和耕作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的农艺学原理,适应俄国有利的经营土地的条件来运用这些原理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报纸称为《土地平分》的原因。这几个字意味着农民问题的解决,而其他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此。当然,这个解决仅仅涉及到上述问题的经济方面,但是,社会的经济关系是人类关系的其他一切范畴的基质。在谈到“土地平分”,即谈到土地时,显然人民忘记了“自由”,也就是忘记了与这个词历史地联系着的所有的社会改革,更有甚者,我们的人民显然认为,土地平分与现时国家的存在是可以调和的:他们期待沙皇来进行分配。

但是,无论人民目前对此是怎样考虑的,无论他们期待谁来实现自己的要求,经济性质的土地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方面的变革。在大规模的人民运动的著名口号中,自由和土地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力量和物质不可分割,结果和原因不可分割一样。让人民期待沙皇来进行土地革命吧,让他们相信他,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保卫者和辩护人吧。但是,人民心目中的沙皇和坐在俄国皇位上的沙皇彼此是不同的,就象罗马的护民官不同于东方的暴君,凯尤斯·格拉古^①不同于希尔·阿里^②一样,而我们确信,甚至在权威的旗帜下进行的普加乔夫运动也必然按照人民要求的逻辑导致对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皇权的完全否定。其次,虚构的东西早晚要在经验面前消失,人民一定会看到皇权的真实面貌。

社会革命党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即尽快地消灭这个虚构的

① 格拉古,凯尤斯(公元前153—121),古罗马的护民官,曾为农民利益而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编者注

② 希尔·阿里·汗,死于1870年,是1863—1879年阿富汗的统治者。——编者注

东西,同时向人民说明,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所期待的土地改革将会带来的一切必然后果。在推动人民同国家进行积极的斗争,在培养他们独立和主动的精神,在组织他们去进行斗争,利用每一个细小的机会来激起人民的不满,以及通过语言和事实的宣传,使人民具有正确的观点来看待当前存在的以及希望将来出现的社会关系时,社会革命党应该引导人民不要消极地等待从上面来进行“土地平分”,而要积极地下面提出“土地和自由”的要求。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以及它对人民的影响可能达到的界限也就在此,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的知识分子才能期待光荣的历史的未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知识分子才会找到跨越巨大深渊的桥梁。几乎从罗斯受洗礼时起,从那些对人民格格不入的、腐败的拜占庭的虚弱基础上产生的观点和概念深入到上层阶级时起,这道深渊就把知识分子和人民隔开了。

所有其他的行动方式,无论它们是何等的激进,无论它们向人民作过多少许诺,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反动的,因为所有这些方式不仅以保存国家为前提,而且也以行动上受国家的帮助为前提。不管国家如何适应人民的需求和利益,它给予人民的东西将始终是那样地少,如同作为现代国家基础(不仅是俄国,还有其他各国)的个人主义原则一样,如同这个原则低于群众的互助和团结的集体主义原则一样,而人民的生活却总是建立在或力图建立在互助和团结的原则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要求土地革命的人民的声,就好象是神的声音,它向我国知识分子指出了这场革命的真正的、天意的使命。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404—411页。

《民意报》的任务^①

推翻现存的国家制度，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这就是我们确定的社会革命政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当前俄国条件迫使我们提出来的。在谈论我们面临的个别的活动方式之前，我们还不得不谈一下这个一般性问题。

在我们俄国，历史缔造了两种主要的独立的力量，人民和国家组织。在我国，其他的社会集团至今只起很次要的作用。拿我国的贵族来说，他们是被政府硬拖到人间来的，尽管受到了全力的保护，但是，看来根本不能成为牢固的社会集团，他们存在了几乎一百年，现在已经惶惶不安、四分五裂了，一部分已经同国家组织融为一体，一部分同资产阶级融合在一起，另外一部分还不知道该往何处去。^② 被我国生活的各种条件推出来的资产阶级，自出世以来，一直处于政府的卵翼之下，毫无疑问，它是有更大的可能性继续存在下去的，如果俄国总的生活条件不发生变化，当然，资产阶级一定会迅速成为一支可畏的社会力量，不仅会使人民群众服从于它，而且会使国家本身服从于它。但这还是将来的问题。目前，我国的资产阶级仍然只不过是一群尚无法团结在一起的吸血鬼。资产阶级

① 《民意报》是在“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以后在1879年10月1日问世的。《民意报》最后一号于1885年10月出版，本文曾载于该报的第2号。——编者注

② 民意党人不懂得封建君主制度同贵族等级之间极为紧密的联系。1861年改革后，大多数贵族依然是沙皇制度的支柱。——编者注

不论是阶级的自我意识也好，世界观也好，还是本阶级的团结也好，都还没有成熟。西方的资产者确实认为，他们这个阶级所依赖的各项准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为了这些准则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我国，无论在哪里都不会遇到象在资产者那里那样恬不知耻地鄙视那些准则的态度。我国的资产者不是一个阶级的成员，而完全是单个的、精明的、不择手段的吸血鬼，他在灵魂深处自己意识到他没有凭良心、按正义行事。毋庸置疑，这个现象是暂时的，是由于我国的资产者刚刚来到世间的缘故。它很快很快就能定形，再有几代人的功夫，我们就能够在我国看到真正的资产者，看到有理论原理、牢固的世界观和阶级道德的一定准则的掠夺行为。当然，这一切必定会发生，但只必须有一个条件即资产阶级没有被我们国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彻底搞掉。我们认为，这种变革是非常有可能的，一旦真正发生，那么，我国的资产阶级定将退出舞台，正如贵族已经退出舞台一样，因为资产阶级实质上也是由国家制造出来的。

资产阶级一方面完全是国家有意识地蓄意制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它的产生是在国家迫使人民生活在中和不可能不使掠夺成性的富农阶级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那些条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整个现存制度的观点来看，目前，我国的农民是微不足道的，比微不足道还要微不足道。他们象头耕畜，象只山羊，它的存在只是为使牧羊人能够吃它的肉，用它的毛和皮做衣服穿。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原则。人民，就个人来说，就单个人来说等于零。对人民经济利益承认的程度要看国家的需要而定。农民必须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有茅舍住，这仅仅是为了不致于活活地饿死，为了能够干活，向地方金库缴纳税款，提供打仗用的新兵，等等。这就是农民的理性世界和道德世界的全部意义；对农夫的要求比对牛

马的要求要多一点，他要充分地起到驾辕和拉套的作用，他必须听话，能领会主人的意图。其余的一切则统统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就是数百年来对庄稼人实行的经济原则和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是由比农夫强有力的、渗透到他们的全部生活的高度文明的联合力量来实行的；根据这些原则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切国家关系、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其后果是十分悲惨的。

农民是逆来顺受的，任凭国家去宰割。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到了—贫如洗的地步。为了糊口度日，为了生理上不饶人的需要，迫不得已为着求生存而进行残酷的斗争。他们的全部打算就是赚取卢布来缴纳税款，就是履行一切义务，养家糊口，为了能干新的活计而休养生息。他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过日子，昨天，今天，明天，一辈子都这样度过。哪里顾得上为着自己，为着做一个人而活着，没功夫去思考，也没有什么可思考的。这就是个人的情况。这也是一个米尔的情况。米尔、村社为什么存在？米尔是干什么的呢？招募新兵，征收赋税，催索欠税，送交实物贡赋，这就是米尔的生活。农民由于迫不得已地追逐卢布而失去他们的特性，村社由于被政府钳制在只履行国库和警察局确定的职责这一活动范围之内，也同样失去它的特性而面目全非。

上述情况好象是为了产生出富农而有意编造出来的。对于一个聪明的、精力充沛的、有着个人生活需求的人来说，呆在那种环境里是没有出路的：或者与米尔同归于尽，或者是自己去当吸血鬼。作为米尔中的一个人，他是个贫穷的、受人鄙视的、任何人都可以支配的人。作为吸血鬼，他就立刻上升为一个法律虽没有提到、但却被现实所承认的特殊的阶层。富农土豪不仅有可能在物质生活上过得还可以，而且是第一次成为一个人，甚至成为一个公民。尊敬他们的，既有地方官吏，也有神甫；既没有人打他们的耳光，也没有人污辱他们的人格；法律开始为他们而存在。这里是否有什么

选择呢？我们还只是描绘了一般的情景，现在再详细谈一谈。聪明、精力充沛而又不违背米尔传统的农民又怎样呢？他们就是扰乱分子、破坏分子、暴动者的后备力量，是各种迫害、鞭笞、逮捕、流放以至更加严重的压迫的对象。在这种残酷的斗争中，俯首贴耳、逆来顺受、失去特性的米尔往往不能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富农对米尔的无能为力表示极度蔑视，而且通过米尔的一些成员和整个村社来表示蔑视。

富农在生长。庄稼人由于没有出路而遭受奴役。这是谁的过错呢？是国家压迫和经济压迫的过错，因为这种压迫要导致群众处于赤贫状态，使他们丧失为反对剥削而斗争的一切可能性，是精神压迫的过错，因为它导致群众处于毫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地位，它腐蚀人民的意志，耗尽他们的精力。你们若能把这种压迫消灭掉，那么你们也就会把资产阶级形成的可能性一下子打掉十分之九。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上面提到的问题。现代国家单就其存在这一事实来说，就可以使资产阶级得以产生，它在各种场合下都完全是有意识地把资产阶级拖到世间来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国的工业发展史。我们甚至建立了一些迄今为止一直只能依靠保护税率维持的轻工业生产部门（例如挤垮了民间手工织布业的纺织业）。整片整片的公爵领地归矿山主所有，乌拉尔人民已经被资本家奴役了上百年，可是资本家甚至还不如工人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布加乔夫时期）经营管理得好。我国铁道事业的情况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全部铁路都是用农民的钱、国家的钱修筑起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国家要把几亿巨款交给各个企业家。农民的金钱就是这样为了支持交易所的投机买卖而从政府的空荡荡的钱袋中流走了。政府对待资产阶级有着慈父般的温存，这是个完全无需证明而只需要指出的事实，我们指出这一事实，是为了更清楚地

说明一个情况，在我国不象在欧洲那样国家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恰恰相反，资产阶级是国家创造的。

我们国家有着独特的作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活动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全特殊的性质。其实，俄国就类似属于一家挂着“俄罗斯国家”招牌的公司的辽阔领地。这里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大概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法人即这一家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的改革也完全分不开，而融合成全国范围的变革。人民遭受苦难、奴役和贫困的直接根源就是国家。^①因此，只要我们抱定的目标是解放人民、分给人民土地、使人民受到教育、把新的准则贯彻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或者在他们的原始的纯洁之中重新恢复古老的、传统的人民生活的准则，总之，不论我们抱定的目标是什么，只要这个目标是为群众谋利益，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必然要同把人民视为自己的经济奴隶和政治奴隶的政府发生冲突。要给人民办点儿事，首先必须把人民从这个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推翻这个政府，剥夺它对农夫的统治权力。由此可见，我们的活动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在我国，一切革命的派别，不管其理论观点如何，如果不在口头上，那就在事实上的确存在着这种情况，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即现代国家确实在各个方面成了人民的最凶恶的、头号的敌人和毁灭者。我们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政治斗争是很自然的，就象一个人对散文和抒情诗即使毫无所知，谈起话来也会象散文那样自然。尽管如此，懂得或者不懂得这一事实——现代国家的作用，当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我们的行动是自觉的，那我们就会把一切打击集中在这个政府上面，这样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到富有成效的、有益的工作上去。如果我们对政府的打击是无意识的，不取决于自己的意愿，那么，首

^① 请注意，我们对于国家一词通常理解为现代的俄罗斯国家。——作者注

先,就有可能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耗费在不切实际的、无成果的工作上去,其次,我们对于政府的无意识的打击,只能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给它准备了更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的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会提到。

现在,我们需要首先作个声明。大家都明白,当我们召唤党同政府进行政治斗争,实现政治变革的时候,我们丝毫不放弃社会的、经济的变革。我们只是说,在我国的国家制度条件下,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二者缺一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只不过为这种政治和社会变革确定了一条新的道路,而且这也不完全是一条新的道路。只不过是迄今为止未被党充分认识到而已。我们不知道,这个声明对于在《民意报》创刊号上维护土地权利的“土地和自由”社的人们是否必要,但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们还是作了声明。

现在我们把话转回到正题上来。反对现在的政府当局的斗争,是能够削弱它并因此将为政治变革铺平道路的斗争,在当前我们每走一步都碰上政府这个活跃而又独立的人民敌人的条件下,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说这个斗争不可避免还是不够的。如果它具有自觉的、既定的目标——为了人民的利益完成政治变革的话,它还可能为人民立下极其重要的历史性功劳。目前,使国家政权转归到人民的手中,就有可能使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具有完全崭新的方向,而按照人民的村社联邦这一世界观的精神向前发展。假定说,我国政府不论由于何种缘故(或由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或由于政府本身财政拮据,或迫于全国各阶层人民道义上的压力,等等)而被迫取消自己的事业,拥有选民决定书(类似cahiers d'Assemblée constituante^①)的立宪会议自作主张地或应政府

① 法文:给立宪会议代表的委托书。——编者注

的要求开会，在这个会议中农民代表和党的代表（假定我们党的活动十分灵活）占百分之九十，那么立宪会议会通过什么决议呢？它很有可能使我们的全部经济关系和国家关系发生彻底变革；我们知道，我国人民一旦从国家的压制下得到解放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知道在顿河流域、亚伊克河流域、库班一带、捷列克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分裂派教徒居住地、在凡是人民能够自由地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生活的地方，人民在自己生活中发展的是些什么原则；我们知道，人民运动中提出的是些什么不朽的口号。人民的土地权利、地方自治、联邦制，这些都是人民的世界观的一贯准则。因此，在俄国，除了国家之外，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碍这些准则的实现。要是废除了国家，人民的安排也许比我们所期望的还要好。

有人可能向我们提出异议说，敌视人民的各个不同的阶层，会欺骗大多数人，把选举的成果断送，这样我们所获得的可能完全不是人民理想中的社会制度。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这还是个问题，甚至是一个假如没有我们，没有革命社会主义者存在的情况下的问题。譬如说，大家知道，1849年奥地利国会里那些和我们这里一样的加里细亚“老粗”推举了自己的候选人，这些没有文化的议员没有上国会的任何圈套，一步也没有离开他们自己人的决定，而且坚定不移地捍卫庄稼人的土地。在我国，在一百年前叶卡特林娜时代的国民代表会议^①上，人民就选举出了许多能够很好地代表他们的代表。如果我们党懂得政治变革的全部巨大意义，现在就培养人民准备从事政治变革，继而齐心协力地开展竞选宣传，那就极有

^① 本文作者把叶卡特林娜二世于1767年召集的法律审查委员会称为“叶卡特林娜的国民代表会议”。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贵族、商界、国家农民），但不允许农奴的代表参加。因此，未必可以把这个委员会称为“国民代表会议”。

——编者注

可能取得良好的结果。不论我们的党是多么弱小，它终究能够在选举中战胜不受人民欢迎的贵族或尚未发展成熟为一个阶级的、分散的、各行其是的、缺乏总的计划和通盘考虑的资产阶级。

由此可见，现在如果发生政治变革即国家政权转到人民手中，就可能引起巨大的、对于各方面的人民生活极为有益的结果。目前，这种时机尚未过去。如果我们对政治活动掉以轻心，允许现代国家继续存在若干世代，那么，我们很可能要把人民的事业推迟整整几个世纪。现代国家无论怎么说都是过于原始而又陈腐的剥削者联合的形式。现代生活已经分化到如此程度，以致这个陈腐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控制它。人民的要求日益严格，不满情绪在加剧，在人民当中正在出现一些不仅有知识、而且比国家组织得更好的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花费越来越多的经费用于自卫，现在从人民身上榨取来的血汗勉强刚够弥补这项开支。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赤字，这样我们的国家甚至无需特殊的震动就会被困死。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它早就在人民当中寻求某种支持了，当然也在吸血鬼中间寻求这类支持。例如它一度把贵族抬了出来，然而贵族却毫无作为。现在，国家又竭力指靠资产阶级，就象一个热心的助产婆忙于使人民的畸形儿顺产一样。当然，它这次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资产阶级就会很快成长起来；然而同样不容怀疑的是，资产阶级一旦站稳脚跟，就不会容忍这个腐败的国家对自己的统治，就会使国家服从于它。政治变革一定会实现，但它的实现就是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的存在本身，我们的全部活动都会有意无意地使国家瓦解、动摇和削弱，其实，上述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以后使资产阶级可以更易于制胜国家，并且取而代之！而资产阶级一旦夺取到国家政权，当然就能够比现在更加充分地奴役人民了，就比现在的国家更能找到

有效的手段使我们的活动陷于瘫痪。现在国家的眼光仅仅盯在监狱和绞架上面。我们已经提请读者注意这一危险，现在我们重复说一遍，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合适的行动方法：或者同国家结成同盟，同它一道使资产阶级夭折，或者是同国家进行斗争（既然同国家有这种同盟关系，显然，这种斗争是荒唐至极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斗争就会是自觉的、激烈的，就会具有一定的目标，取得一定的成果，使国家政权可能更加迅速地转入到人民手中，现在这还为时不晚，还有希望使政权真正转入到人民手中。要么现在就干，要么永远不干，我们必须二者择一。

由此可见，民意党提出的党的任务是出于形势的迫切要求，我们不准备对实行政治变革的进一步的意图全盘加以发挥，因为我们还要专门撰文论述这个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关于我们怎样看待党的局部任务问题只好放到下次来谈了。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76—383页。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纲领^①

一

按我们的基本信念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我们相信，人类只有遵循社会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保证普遍享受物质福利，保证个性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从而保证不断进步。我们相信，只有民意才能够确定社会形态，只有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种思想事先通过人民的意识和意志的时候，人民的发展才是可靠的。人民的福利和人民的意志，这是我们的两个最神圣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则。

二

(一) 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人民生活和行动的处境，我们就会发现，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作为劳动者，人民完全是为了供养寄生虫阶级而劳动；作为公民，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不仅俄国的全部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意志，而且他们也不敢说出和表达出自己的意志，他们甚至连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可能性都没有，关于人民意志的任何思想都被认为是一种反对现存制度的犯罪行为。受到各方面束缚的人民被弄得体质衰退、愚昧无知、逆来顺受、一贫如洗，——在各个方面都任人奴役。

^① 这个纲领曾刊载在《民意报》第3号上。——编者注

(二)我们发现,居于带着枷锁的人民之上的,是使人民松快些的、由国家培植出来并加以保护的剥削者阶层。我们发现,这个国家是我国最大的资本主义力量,^①也是人民的唯一的政治压制者,小吸血鬼们依靠它才得以存在。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资产阶级的赘瘤,只有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即它的军事、警察、官僚机构,才能寄生下来,情况同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在我国统治时完全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专横的、暴虐的政权根本得不到人民的承认,因为它所凭借强力推行和支持的国家的、经济的原则和形式,同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三)我们认为,人民之中存在着虽然受到各种压制但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古老的传统的原则:人民的土地权利、村社自治和地方自治、联邦制的雏形、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要人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意向去生活和从事工作,那么,上述原则就有可能本着我国历史上的人民精神获得崭新的发展。

三

(一)因此,我们认为,作为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我们必须提出的当前任务是:使人民摆脱现代国家的压迫,实行旨在使政权归于人民的政治变革。我们要通过这种变革达到:第一、人民从此将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去发展;第二、在我们俄国的生活中承认和支持我们和人民共同的许多纯粹社会主义的原则。

(二)我们认为,在选民的监督指导下经过普遍投票方式自由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应当充分地表达和执行人民的意志。当然,这远不是表达人民意志的理想方式,但目前却是实际上唯一可行的方式,因此,我们认为采取这一方式是必要的。

^① 民意党人幻想在消灭沙皇制度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消灭掉。——编者注

(三)由此可见,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国家政权从政府当局那里夺取过来,交给业已组成的立宪会议,正如刚才所说的,立宪会议应按自己选民的指示重新审查并改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

四

我们虽然完全服从人民的意志,但是作为一个政党,我们认为有义务向人民公布自己的纲领。对纲领的宣传要一直进行到实行变革为止,在竞选宣传期间,我们要介绍它,在立宪会议上我们要捍卫它。该纲领的条文如下:

(一)成立常设的人民代表机构,如上所述,这个机构在一切全国性的问题上都享有充分的权力;

(二)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由一切职务的选举制、米尔的自主权和人民的经济独立权加以保障;

(三)米尔作为一个经济和行政单位享有自主权;

(四)土地属于人民;

(五)采取各种措施,把一切工厂交归工人掌管;

(六)实行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竞选宣传的充分自由;

(七)普遍享有选举权,不受等级和财产的限制;

(八)由民兵代替常备军。

我们将要实行这个纲领,我们认为,它的各项条文都是缺一不可的,只有全部实行,才能保障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及其正常的发展。

五

鉴于上述目标,党将开展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一)宣传、鼓动活动。

宣传的目的是在各阶层人民中传播民主政治变革是社会改革手段的思想，以及使党的纲领深入人心。抨击现存制度，阐明变革和社会改革的各种办法，就是宣传的本质所在。

鼓动应当促使人民和社会尽可能广泛地反抗现存制度按照党的精神提出改革要求，特别是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抗议的方式可以有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散发讥讽性的致敬书、拒绝缴纳赋税等等。

(二)破坏和恐怖活动。

恐怖活动就是要铲除政府中危害最大的分子，保护党免受奸细的侵害，惩罚政府和行政当局最突出的暴力和专横行为，等等；恐怖活动的目的是破坏政府的感召力，不断地证明反对政府是可能的，从而激发人民的革命精神，增强他们对于事业成功的信心，最后形成一股适合和习惯于战斗的力量。

(三)组织各种秘密团体并将它们团结在一个中心的周围。

组织完成各种革命任务的秘密小团体，这既是执行党的多方面的职能所必需的，又是提高其成员的政治素养所必需的。但这些小组织为了更加步调一致，必须按照完全合并或者联合的原则团结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的周围，在组织变革时期，尤其须这样。

(四)在行政机关、军队、社会上和人民中取得有影响的地位并同上述各方面建立联系。

为了顺利地执行党的一切职能，在人民各阶层中取得坚实可靠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变革特别重要的是行政机关和军队。党应当同样非常重视人民。党在人民中的主要任务是教育人民促进变革，为在变革后的竞选中取得胜利准备条件。斗争的目的是要选出真正的人民代表。党应当在最优秀的农民中间寻求有觉悟的拥护者，应当使自己在最紧要的地方、在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

居民中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持。因此，每个党员都应当尽力争取在中间占居这样的位置，以便有可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赢得一个为人正直、同情农民的声誉，维护党在人民中的威望，捍卫党的思想和目标。

(五)组织和实现变革。

鉴于人民所受的压迫，鉴于政府有可能通过局部的镇压而将整个革命运动大大推迟，党必须把发动变革的责任承担起来，而不要等到人民没有党也能干起来的时候。至于实现变革的方法……①

(六)在立宪会议召开期间的竞选宣传。

通过任何途径实现的变革，都是独立革命的成果或者借助于密谋取得的成果，党的责任是促使立宪会议迅速召开，把通过革命或密谋而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权力交给立宪会议。在竞选宣传中，党应当千方百计地为反对各种类型的富农候选人而斗争，并竭尽全力使真正米尔的人当选。②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84—388页。

① 第五条的这一部分没有发表。——编者注

② 执行委员会的这一纲领后来出版单行本时补进了第六部分，条文如下：

“执行委员会行动的指导原则，是由人们和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决定的，即：

(一)对待政府就象对待敌人一样，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任何手段，我们认为都是可以允许的。

(二)一切反对派分子，即使不同我们结成联盟，也可以得到我们的帮助和保护。

(三)站在我们同政府斗争之外的一切个人和社会团体，被认为是中立者；他们的人身和财产一概不受侵犯。

(四)在我们同政府的斗争中自觉地、积极地给政府以协助的个人和社会团体，不再是中立者，一律按敌人对待。签字，执行委员会。纲领第三版，民意党印刷所印，1881年8月15日。”——编者注

致卡尔·马克思^①

尊敬的公民！

对于西欧思想和生活的进程始终感觉敏锐的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曾经怀着兴奋的心情欢迎您的科学著作的出版。在这些著作中科学对俄国生活中的优秀思潮表示赞许，而《资本论》则成了知识分子的案头必备之书。

但是，在拜占廷的黑暗和亚细亚的专横的王国里，社会思想的任何一种运动都是革命运动的同义语。很清楚，正因为如此，您的名字很快就同俄国的国内斗争牢不可破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在引起一些人的深深的尊敬和好感的同时却受到了另一些人的毁辱，您的著作被禁止流传，而对这些著作进行研究这一事实本身则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标志。

我们知道，您，尊敬的同志，曾经怀着多么巨大的兴趣注视着俄国革命运动的一切阶段，我们高兴地指出，俄国革命已经度过了艰苦的时期。革命的经验锻炼了战士，既从理论上明确了问题的提法，也确定了实现它的具体道路。在新的和如此困难的事业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革命派别，正在逐渐地团结一致，并且一起寻求同我们这里象奴隶制本身一样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民的反抗融合在一起的道路。

^① 这是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1880 年 10 月 25 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最初发表于《往事》杂志 1917 年第 1 期。——编者注

在这种情况下胜利已为期不远。如果自由国家的舆论真正同情我们的话，我们的任务就会大大减轻，为此需要的只是了解俄国的真实情况。出于这些考虑，我们委托我们的列甫·哈特曼同志为向英美两国舆论界正确介绍我国社会生活中当前发生的事件而筹措资金。尊敬的同志，我们请求您在这方面给他以协助。我们已经下定决心粉碎奴隶制的桎梏，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将在欧洲占有自由人民应有的一席之地。

尊敬的同志，谨向您表示俄国社会革命党全党对您的深深的敬意。

执行委员会

1880年10月25日(11月6日)

译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文集》196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2卷第229—230页。

政治革命和经济问题^①

阿·多罗申柯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革命政党象俄国的社会革命政党那样，肩负着历史赋予的如此繁重而复杂的任务。除了自己的基本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任务以外，我们还必须肩负起摧毁政治专制制度的工作，即完成象欧洲各国老早已经做过的，不过不是社会主义

^① 本文刊载于1881年2月《民意报》第5号，目的是为了回答执行委员会纲领公布后党内出现的不同意见。——编者注

者而是资产阶级已经做过的事业。因此，任何一个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没有象我们这样经受那么严峻的斗争，作出那么大的牺牲。如果说，为了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工作和高举人民解放的旗帜而需要英勇奋斗的话，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在我们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下，对于实现我们未来的任务，也有有利的一面。现在使得任何社会阶级都不满意、已经引起全体知识分子的公愤的政治制度，必然要在不久的将来崩溃，而且这种制度已把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正在为它所支持的经济制度挖掘坟墓。当前经济制度瓦解的过程，必然是同一年更比一年严重的人民的经济贫困化过程相一致的。现时政治制度在人民运动胜利下而遭到的崩溃，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同现存国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制度接踵而至的瓦解。

因此，我们认为，同国家进行政治斗争，对于我们党来说，并非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活动不相关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是加速经济变革（或者至少是土地改革）到来、使变革有可能成为更加深刻的强有力的手段，即实现我们的部分纲领的手段。

根据这种观点，在俄国的现实条件下会产生哪些实际的任务，我们将在下面作概括的说明，而现在，我们必须对从理论上反对我们纲领中政治部分的不同意见作出回答。所有这些反对意见都离不开关于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的问题。

可以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全部意见分为三类。属于第一类的人过分夸大了政治制度的作用，他们认为政治制度是使国家产生任何经济变化的力量，它所通过的途径只有一条，即政权从上面发号施令和臣民们或公民们在下面俯首服从；从他们的实际任务来看，这些人大部分是雅各宾派、“国家的拥护者”，他们企图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来颁布实行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

的命令，自上而下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推行社会主义原则，而不是在这方面唤起人民积极参加实际的改造，甚至“任意”压制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我国，特卡乔夫出版的《警钟》就是雅各宾派的机关报。属于第二类的社会主义者，却同第一类的相反，他们认为政治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否认政治制度对经济关系具有任何重大的影响，不管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所以，他们认为在执行自己的实际任务时，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无论拿出多少力量来搞政治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在我国，后一种意见的代表就是拥有自己的机关报《土地平分》的派别（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这个派别的一部分）。最后，还有一种观点是这两种意见的综合，它承认政治、经济因素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它认为，没有一定的政治变化就不可能实现任何经济变革，反过来说，在经济领域中不经过一定的历史酝酿，就不可能建立任何自由的政治制度。对这种观点，我们这一派和我们的机关报都是赞同的，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阐述，现在，我们先把话题转到我们对手的论据方面来。

不赞成我们的纲领中政治部分的人们时常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个论断：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都是其他一切社会形式，即政治形式、法律形式等等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关系的变化只能是经济领域中的斗争的结果，所以，任何政治革命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引起经济变革。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学生比导师本人走的远。他们根据他的实质上正确的原理，却得出了实际上荒谬的结论。为了证明马克思同他们的看法有区别，我们现在引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肯定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的一段话：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

具”。^①这段话在公社失败后不久所出版的国际总委员会宣言中也可以看到，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的许多代表都表示赞成两者表述的思想。另一个权威彼·拉甫罗夫先生（他的话也时常被纯粹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错误地加以引证）在不久前出版的论述巴黎公社的一书中，对未来革命的活动家们提出忠告说：“当历史形势允许某一个国家的工人哪怕是暂时地制胜敌人并掌握事变进程的时候，工人就应当尽可能利用一切适合的手段，完成经济变革，并保证它稳妥可靠。”解决经济问题的政治途径没有被拉甫罗夫从“适合的手段”中排除掉，这在他的那本书里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我们可以以他说明国际在公社期间起的作用比较微弱的话作个例子，“国际的鼓动都集中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上，不是按照自己的经济要求来确定提出某一种政治纲领，所以，当形势促使无产阶级在欧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胜利爆发起义的时刻，这种鼓动也就没有用处了。”

还可以指出路易·勃朗、拉萨尔、蒲鲁东及其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他们都认为通过这种或那种国家措施实行或多或少的经济变革是可行的；还可以再列举出资产阶级的折衷派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看法，他在他的遗著《关于社会主义的札记》中提出，当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而把政治权利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的时候，普遍投票的政治权利，便是一颗孕育未来经济变革的种子。我们只是列举了纯经济变革的崇拜者们喜欢引用的上述两位作家的话；现在，我们要讲讲欧洲生活中的实际情况。

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没收了僧侣和逃往国外的贵族的土地，起初这些土地都收归国有，后来又卖给了资产阶级。事实上，这种措施只不过改变了土地的所有者，并未改变土地私人占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编者注

制的原则；国民公会为什么不实行经济变革呢？也就是说，它为什么不把全部土地和工厂予以没收而交给人民集体使用呢？当然，这并不是因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政治方法一概都不行，而是因为当时社会问题尚未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①我们还可以举法国1848年的革命为例。如果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拥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制定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拥有正直的、坚定的领导者，那么以推翻路易-菲力浦为开端的革命，就能够导致法国经济制度的深刻变化。1871年的巴黎公社已经在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经济问题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当我们看到政治革命完全可能被国家组织利用来作为完成经济变革的手段的事实之后，还用得着争论吗？当然，经济变革必须首先经过历史的酝酿，也就是说，要在各种经济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方面，以及在人民群众的思想 and 习惯方面，都必须首先产生一定的变化，以便使已经完成了的政治革命在夺取到国家组织之后能在经济方面实行为人民所理解和乐意接受的措施。

我们就是认为，俄国国家制度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它是一种极其完备的官僚专制的制度，也表现在它很落后，它甚至于同经济设施、司法设施，同人民群众的习惯和观点是对立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巨大消极作用的典型，而这种消极作用只能是落后于人民的经济要求的政治制度所固有的。在欧洲，政治进步是先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进步，而政治制度，尤其是在革命时期，是提出经济问题和使经济变革迫近的一种手段；而在我国，政治制度的连续不断的压迫，阻碍了经济上、法律上、政治上的改组，随着这一政治制度的崩溃，随着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能够自由地发挥出来，上述改组必然会到来。实际上，无数的历史的和当前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人

^① 这里的“社会问题”是指“社会主义问题”。——编者注

民生活的准则是同现存国家所依赖的准则根本对立的。我们不算谈论国家的观念和人民的观念的不一致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得到许多人，甚至非社会主义者的承认，当然，也得到我们的“乡巴佬”^①们的赞同。我们只是请他们注意到国家对我国经济生活有影响的两件重大事实：一是政治制度对人民的一切村社设施起着瓦解和涣散的影响；二是国家对有钱阶级进行庇护，政府每年从人民的腰包中搜刮到数亿巨款，转交给正在我国兴起的资产阶级。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为了支持整个庞大的警察—富农的制度，国家就需要侵吞大量的人民劳动的果实，而留给人民的却只有饥饿、贫穷和死亡。

除此以外，应当注意的是，在我国没有象西欧那样的独立的、组织严密的等级。那里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某个等级实际统治的政治表现；而我国的情况则相反，国家能随意建立或者摧垮整个的等级，随便对特权阶级进行试验，同时镇压来自这些人的任何微弱的（大部分是单个人的）反抗。国家为了使自己成为绝对专制的国家，甚至压制特权阶级的任何政治独立性，为此，它支持它们中间的分离倾向和无组织状态；当然，这一政策强化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力量，但是，同时它也会在将来把现存制度彻底断送掉。既然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将被人民运动的浪潮所冲毁，那么，哪些社会因素是真正驾驭事件进程的力量呢？当然，不论是特权阶级（由于其分离倾向），不论是合法政党（由于其无组织状态），都抵挡不了人民的运动，都维持不住对人民进行经济奴役的旧制度；只有人民和社会革命党才是决定变革后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主要力量。因此，我们又一次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对于我们党来说，在最近和将来都必须始终如一地把最大的破坏工作对准国家，即对

① 这里的“乡巴佬”大概是指“土地平分”社的拥护者。——编者注

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反对实现美好制度的实际力量。

在估计国家在俄国生活中的作用方面还要谈一点看法。请大家注意一下引起大大小小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种种导火线吧！这些导火线都具有政治性质和法律性质，都是来自上面，来自国家方面或行政方面的，就是说，导火线或者是冒牌的沙皇、自立为王者，或者是神话般的〈黄金诏书〉^①，或者是从司法上破坏法律（照人民的看法），最后，或者是为农民树立榜样的城市暴动。某一处农村或者地方单是由于闹饥荒，而没有外部的导火线和榜样的影响就发生了骚乱，这恐怕是少有的，另外还需要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并且对起义的成功抱有信心。当然，民不聊生几乎是一切人民动乱的主要条件，但是，导火线则始终或者是官方破坏法律的行为（真实的或者虚假的），或者在利益上接近于人民的某个有组织的核心发起的暴动。

最后一个条件，正如历史所表明的，是一切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必不可少的。例如，在布加乔夫暴动期间，对唤起蕴藏着的起义力量起了推动作用的，一方面是准备和组织了运动的分裂派村社，另一方面是作出了武装起义榜样的一部分哥萨克人。

但在目前，不论已经丧失了原先大部分战斗力的分裂派，还是代表特权阶层的哥萨克人，同农民相比，显然就不能为人民起义提出口号。唯独社会革命政党由于在城市居民和工厂工人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由于在农民中间处于有利的多数的地位，因而能够成为唤起城市运动和农村运动所必需的酵素。但要彻底推翻现存的制度，必须同时举行城市起义和农村起义。的确，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果不在国家的中心城市即两个京都和各大城市对敌人的

^① 指假借叶卡特林第二世的名义支持1768年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农民起义的诏书。——编者注

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给予沉重的打击，就是有党的全力支持和组织，也对付不了高度集中调动、武器精良的敌人；同样，如果农民不响应起义来支持城市的事业，从而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城市起义即便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也不可能以胜利告终。此外，为了取得成功，还必须在起义的关头，至少有一部分军队和哥萨克人转到人民方面来，但是，起义从哪里首先发动呢？是城市还是农村？应当认为，为起义提出第一个口号的，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其根据是：城市人民更成熟，更机警，最后，党的活动在城市中较之在农村中能在数量上取得更大的成果。然而，城市的初次成功，却可能发出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农民举行暴动的信号。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89—395页。

民意党工人党员纲领^①

（《民意报》编辑部出版）

—

人类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各族人民生活研究和观察，令人信服而又清楚地证明，各族人民只有按照社会主义学说即以下的方式来建设自己的生活，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和发挥自己的力量，才

^① 这个纲领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没有在杂志上发表过。纲领的出现表明民意党承认制定工人特别纲领的必要性，同时表明在民粹派中有城市工人。

这个纲领同执行委员会纲领的区别在于，它同意进行逐步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甚至认为有可能建立立宪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和执行委员会纲领是一致的。——编者注

能亲如兄弟，自由平等；

(一) 土地和劳动工具应属于全体人民，每个劳动者都有权使用它们。

(二) 劳动不应单独而应共同进行(以村社、劳动组合和团体为单位)。

(三) 共同劳动的产品应根据决议在全体劳动者中间按需分配。

(四) 国家制度应建立在所有村社的联盟条约的基础之上。

(五) 每个村社在处理内部事务方面享有充分的独立和自由。

(六) 村社的每个成员在信仰和个人生活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变成暴力侵犯本村社的其他成员或其他村社的成员时才会受到限制。

如果各族人民都象我们劳动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重建自己的生活，那么他们将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因为那时将不再有主人，也不再有奴隶。那时每个人都可以工作，不再受地主、厂主和财主的奴役，因为这些寄生虫已经没有了。土地将归愿意种地的人使用。工厂将归愿意从事工厂劳动的公社所有。每个人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将应有尽有，因而无须出卖自身、出卖自己的劳动和信念，况且那时也没有人会来收买这些东西了。

以村社和劳动组合为单位进行劳动，能够广泛利用机器和一切能够减轻劳动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因此劳动者和村社成员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化费的劳动将大大减少，他们将有大量的空余时间和精力用来发展自己的才智和从事科学。这样的生活将给劳动者以许多他在目前连想也想不到的快乐；将给他以科学知识和使他本人成为进一步发展科学、减轻劳动和改善生活的能手。各种改进措施数量之大，将远非现在可比，劳动者将能高度控制大自然。人的个性自由，也就是思想、研究和各种活动的自由，将使人

的智慧摆脱各种桎梏的束缚而进入一个广阔的天地。

村社的自由，也就是村社同其他所有村社和联盟共同干预国家事务并使之符合所有村社的意愿的权利，将杜绝国家压迫的发生，也绝不容许象现在这样，让品德恶劣的人控制国家、作为大大小小的官吏来破坏国家经济、压制人民的自由。

二

我们深信，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是会保障人民的幸福的，但是我们也从其他国家人民的经验中知道，不论在目前或在最近的将来，都不可能使人民得到充分的自由和长久的幸福。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同统治者和挥霍人民财富的人进行的持久而又顽强的斗争——一场逐步争得公民权的斗争。长期以来，多少世纪以来，政府和它所有那些养尊处优的走狗们竭尽全力要把俄国人民控制得俯首贴耳，使他们不敢反抗。他们差不多总是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确实，愚昧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意识不到和感觉不到他们自己是祖国的公民，意识不到和感觉不到他们不应容忍那些头戴王冠的骗子和形形色色掠夺他人劳动、搜刮他人腰包的人们来操纵国家；贫困饥饿的人总是经常不得不在有权势的人和富人面前战栗不安和低三下四，甚至弄虚作假和卖身投靠，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一小块迫切需要的面包……

因此，现在的人在那种不分贫富、没有寄生虫当老爷、劳动者当仆人和人人都有生活保障、人人劳动、人人自由的美好而又公正的制度下，也许会很不适应，难以和睦相处。不过，灰心丧气也大可不必。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能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那么应该逐步接近它，即使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和幸福，那么无论如何也要争取更大的自由和大大改善我们的生活。在优越的制度和美好的生活下，人们会变得更聪明、更有道德修养，最终会明白他们是公民，

也就是自己国家的享有充分权利的主人,并将继续前进,也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美好、更合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劳动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就应当成为人们的指路明灯,使他们不致迷失方向、不致被套上新的桎梏和陷入更坏的被奴役的地位。

我们把帮助全体俄国人民走上自由和美好生活的道路作为自己毕生的任务。人民的境遇是如此困难,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痛苦,因此一切有识之士和正直的人都要义不容辞地支持我们和结束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事情不能也不应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请看:在农村,农民的土地逐渐落到富农和投机商的手中;在城市,工厂里的工人受到厂主越来越沉重的奴役;资本家的势力越来越大,分散的工人很难同他们作斗争;国家和政府依仗一大群完全脱离人民顺从政府意旨的官僚,横征暴敛,搜刮民膏;全国人民都被置于贪婪而又愚蠢的警察(巡官和其他警官)的监视之下。

最近政府认为乡法庭和乡大会使人民的精神享有太多的自由,于是决定把它们控制起来。人人都清楚,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彻底削弱俄国人民的力量,窒息他们向往自由生活的一切愿望。我们劳动社会主义者和所有了解情况的工人能够允许他们把俄国人民引到这条危险的道路上吗?不能!我们大家都应当争取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不是政府官吏而是人民自己决定通过什么道路去获得幸福和自由。必须迈出这第一步!

三

但是这一步我们必须深思熟虑。首先要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应当对现行的制度作出哪些改变。我们应当知道,

(一)现在凡是靠剥削人民为生的政府、地主、厂主和富农，是永远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把全部工作压在工人肩上比自己动手劳动要愉快得多。这些老爷们非常明白，只要劳动人民愚昧无知，贫困潦倒，一贫如洗，只要他们不懂得自己的力量在于全体劳动者的联合，他们就会一直为老爷们服务。因此期待这些老爷们来改善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徒劳无益的。不错，这些老爷们有时也组织一些改善工厂工人生活的委员会；但是他们的所有这种关怀就象主人关心饲养耕畜一样。他们从不考虑提高人民的文化，从不允许劳动者不依附于他们而生活。所以，劳动人民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敌人是不会帮助他们的。

但是人民永远可以指望忠实的同盟者——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来自沙皇俄国的各个阶层，但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的事业，他们认为，只有劳动阶层即农民和城市工人掌管国家大事，才能人人平等自由，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制度，因为其他阶层即使争取平等自由，也只不过是为了本阶层，而不是为了全体人民。所以，社会革命党才是最好的同盟者，劳动人民随时能够对它伸出兄弟的手。

除了社会革命党外人民没有忠实的同盟者；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它能够得到其他阶层个别人士的支持，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这些人也希望在俄国生活得更自由、更美好。俄国农民身受地主、富农奴役的境况并没有使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没有领略过这种压迫，然而他们切身体验过警察和官吏的专横暴虐，所以是会乐意帮助人民消灭这种现象的。当然，如果减弱政府的压迫，对于人民是有好处的，因为大家都会感到自由舒畅些，每个人的思想可以更活跃些，人人都更有机会学习知识，同情人民的人会更多些，但更主要的是，人民会因此相互谅解，团结起来。所以劳动人民不应当拒绝这些人的帮助，和他们携手并肩去争取扩大自由是**有好**

处的。只不过工人们不要忘记，他们的事业不能就此止步，他们应当很快就和这些暂时的朋友分手，而只同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继续前进。

(二)我们希望实现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应当为人民所理解并符合他们的要求，否则人民就不会实现和支持这种变革，而对其他阶层，我们已经说过，是不能指望的，因为他们要做的不是对人民有利的事，而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

(三)制度的变革应当使生活更接近社会主义制度。

四

在注意到这一切的同时，我们认为，最近的将来，我们可以在国家制度和人民生活方面争取进行如下变革：

(一)用人民政权来取代俄国的沙皇政权，即政府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自己可以任命和撤换代表；选举时人民详细地指示代表们应当做到什么，并要求他们汇报自己的活动。

(二)按照居民的生活特点和生活条件，俄罗斯国家划分成一些在内部事务方面各自独立的州，这些州联合成一个全俄罗斯联盟。州内事务由州执行委员会管理，全国事务由联盟政府管理。

(三)用暴力强行并入沙皇俄国的各个民族，有脱离或留在全俄罗斯联盟内的自由。

(四)村社(村庄、农村、城郊、工厂劳动组合等)在全体大会上决定自己的事务，并通过选举出来的负责人员——村长、村警、录事、管理员、工匠、办事员等等付诸执行。

(五)全部土地归劳动人民所有，并视为全体人民的财产。

各州可以把土地交给村社或个人使用，但必须限于自己耕种。任何人无权得到超出其耕种能力的土地。根据村社提出的要求，土地可以重新分配。

(六)各种工厂都视为人民的财产,交给工厂公社使用,收入归这些公社所有。

(七)人民代表颁布法令和规章制度,指示工厂应当如何作出安排,才能保证不损害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并规定男子、妇女的工作时间等等。

(八)凡成年人都有选举联盟政府和州执行委员会代表的权利;同样,凡成年人也都可以被选入联盟政府和州执行委员会。

(九)所有的俄国人都有权保持或者改变对某种教义的信仰(宗教自由);有权用口头或书面传播某种思想或学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有权集会讨论自己的事务(集会自由);有权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组织社会团体(村社、劳动组合、协会、团体);有权在选举代表时和在一切公共事务方面向人民提出自己的建议(竞选宣传自由)。

(十)人人享有免费受初等和高等国民教育的权利。

(十一)现在的军队和一切部队都由地方民兵代替。人人都有义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但不脱离工作和家庭,只有在法律规定的必要情况下才集合起来。

(十二)建立俄罗斯国家银行并在俄国各地设立分行,以便支持和帮助工厂的、农业的和一切工业的、文教的公社、劳动组合和团体。

我们认为,这就是在最近时间里在人民生活中能够实行的一些变革;我们想,全体人民——城市工人和农民——会了解这些变革的全部好处,并决心捍卫它们。城市工人更应牢记,如果脱离农民,他们将总是受到政府、厂主和富农的镇压,因为人民的主力不在他们而在农民之中。^①如果他们能永远和农民站在一起,把农民

^① 这里强调革命的主力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编者注

吸引到自己一边并向他们证明，只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那么全体劳动人民一定会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

五

对此必须十分辛勤地做大量的工作，我们认为应当这样来进行工作：

(一) 凡是坚定地认为必须改变现行社会制度和整个人民生活的工人，都组成规模不大，但同心同德的工人协会(小组)，确定奋斗目标，准备时机成熟共同努力实现变革。小组必须处于秘密状态，以免遭受政府的打击。

(二) 小组成员应向人民说明，摆脱现行的有害制度的唯一出路就是暴力变革，变革是必须而又可能的。为了这个目的，小组成员要分散到工厂和农村，以各种完全合法的理由组织新的工人小组和农民小组，例如小组可以设立储金会、图书馆、读书会、公共宿舍等等。小组成员要利用在工人中享有的尊敬和爱戴，去支持工人的造反精神，在需要的地方组织反对厂主的罢工，并准备同总是站在厂主一边的警察和政府当局进行斗争。在工人事业中表现出才干和坚定的小组成员，可以参加主要的工人小组，从而逐步加强秘密的工人协会。

六

很难预先设想工人协会(工人组织)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条件来进行活动。但是无论条件如何，它们都必须始终注意一些一般的规则。

(一) 无论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工人们都应当形成一股能够对付政府和必要时准备拿起武器坚持自己的要求的力量。事情是否发展到流血斗争的地步，还是人民的敌人不战而退，全都一

样，都必须准备力量，这股力量越是强大到准备进入战斗，敌人就越有可能不战而退。

(二)只有工人组织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整个社会革命党才能向敌人发动有希望取得胜利的进攻。为了实现变革，它在人民中和在社会上积聚力量，在农民、城市工人、军队和其他社会阶层中组织协会。党指派自己的战斗组织向政府发动进攻，使之陷于混乱、惊慌失措，从而使所有不满的人——人民、工人和一切同情他们的人士便于发动起来实行普遍的变革。

一旦在城市或在农村开始了有把握的骚动以后，党就应当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它，并对它提出自己的要求，在其他可能的地方发动同样的骚动，把这些骚动汇成一次总起义并把总起义扩大到全俄国。同时必须破坏政府，消灭政府大员(越大越好)；要把军队争取到人民方面来，解散军队，代之以由农民、工人、过去的士兵和一切诚实的公民组成的民兵。

为了取得胜利，夺取大城市并把它们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是至关重要的。为此目的，起义的人民在清除了城市中的敌人以后，应立即选举工人或者以忠于人民事业著称的人组成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应依靠民兵守卫城市，抵御敌人的侵犯，并千方百计援助其他地方的起义，把起义者联合起来和予以指导。工人们应警惕地注视临时政府，使它进行有利于人民的的活动。当起义取得全国胜利，土地和工厂转到人民手中，在农村、城市和各州都建立起选举产生的人民执行委员会，国家除了民兵以外再没有其他军队时，人民将立即派遣代表去参加(联盟政府)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在废除临时政府以后，依法确认人民的胜利成果，建立全联盟的秩序。代表们要严格按照他们的选民的指令行事。

这就是革命时期的一般的行动计划。

但是也可能出现其他的情况。

万一政府由于害怕普遍骚动而决定对社会作出某些让步，就是说制定宪法时，工人的行动也不要因此而改变。他们应当显示自己的力量，要求政府对自己作出巨大的让步，应当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议会（即立法会议），必要时可以用群众的声明和骚动来支持这些要求。民意党用这种方式对政府施加压力，在同政府的斗争中积聚力量，等待适当时机，一旦无用的旧制度落到无力抗拒人民要求的地步时，便稳操胜券地实现变革。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396—403页。

给《土地平分》杂志编辑部的信^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

社会主义从劳动群众的利益的角度来看乃是现存社会的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

由此而来的革命活动的实际任务，就在于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给他们指明求解放的道路和办法。

开展活动不单单为了人民，而且要在人民中间，否则，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不组织力量，不唤起人民的觉醒和自主精神，最英勇的革命斗

^① 这封信刊登在《土地平分》杂志1881年3月第3期，阐明了两个民粹派组织之间的分歧性质。——编者注

争也只会给上层阶级，也就是说，只会给我们应当把劳苦大众武装起来与之斗争的那个现时社会中的阶级带来好处。

人民的解放应当是人民自身的事业。

我们完全了解祖国正在经历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意义，我们决不会去维护腐朽的专制制度。但是，我们不赞成《民意报》的意见，^①我们认为，不仅仅是“现代国家制度是人民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主要障碍”，推翻专制制度还消除不了人民受奴役的最重要的原因。

人民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应当成为能够向处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的剥削者进行反击的一支自觉组织起来的力量。否则，专制君主制的代表便将由立宪制的代表、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取而代之。对于人民来说，同他们的斗争，正如反对专制制度压迫的斗争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民的力量越分散，他们在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各种社会关系方面的思想准备就越少，他们反对他们新的老爷的斗争也就越困难，他们的胜利也就越遥远。

俄国的现状已经愈来愈不能适应上述情况了。

行将崩溃、腐朽不堪的专制制度，如同它的加冕代表一样，知道它的地位不稳，因而张惶四顾，寻求支援。

用不着成为预言家就可以预言专制制度要花多大代价才能从什么地方寻求到这种支持。在它的庇护下并经它精心豢养而成长起来的我国资产阶级，已经展翅飞翔了。资产阶级感觉到它自身的力量，了解到它自身的作用，所以，它这个昨天的奴隶，今天悄悄

^① 《民意报》刊载的一系列文章指出，现代国家制度是人民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主要障碍。这一观点在该杂志第4期的社论中阐述得最为明确。格·瓦·普列汉诺夫也注意到了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对人民的危害。不过，“民意”派也未忽略这种危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是不存在特别的分歧的。——编者注

地提出了“和平发展”的纲领，明天便准备把管理国家的全部权力夺取到自己的手中。

要想即使不能阻止资产阶级的统治，也要削弱其统治，这在所谓的“上流社会”里，不是依靠政治鼓动所能做得到的。上流社会，它不是人民。它的大多数代表，是剥削人民的人，是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资产阶级的已经欧化了的最上层。只有在人民中间进行的社会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取得了成功，才能促使资产阶级的末日来临。

因此，只有当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全党都一致认为，自己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在人民中间建立社会革命组织，是把政治自由的要求列为该组织向政府和上层阶级提出的当前要求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土地平分〉杂志的任务才能宣告结束。这些要求的另一部分，则是迫切进行经济改革，诸如改变税收制度，政府对工厂实行检查，缩短工作日，限制女工劳动、童工劳动等等。

这两类要求，同样都来自人民，彼此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保证行将到来的政治变革不仅仅有利于上层阶级。

如果都承认应该这样提出问题的话，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现存的分歧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土地平分〉杂志作为一个派别的机关刊物，便应当让位给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机关刊物了。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412—413页。

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①

陛下！尽管我们完全理解您目前的痛苦心情，然而，执行委员会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屈服于这种自然的脆弱的感情，这种感情或许需要抑制片刻，以便我们作出如下的解释。有一种东西要比一个人的正当感情还高尚，这就是对祖国的义务，这就是每个公民必须为之献出自己、自己的感情以至别人的感情的义务。正是听命于这种至高无上的义务，我们决心立即给您写信，不再作任何等待，因为将以血流成河和强力震荡威胁我们的那个历史进程是不会等待的。

在叶卡特林娜沿河街上演出的流血悲剧，既不是偶然的，对任何人来说也不是突然的。经过近十年来发生的一切之后，这场悲剧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它的深刻含义也就在此，一个被命运安排来主持政府权力的人是应该懂得这一点的。只有那些完全无能分析人民生活的人，才会把这类事实解释为个别人物或者甚至是“一帮匪徒”的罪恶预谋。整整十年来，我们看到，尽管在我们这里有着最严厉的迫害，尽管已故皇帝的政府不惜牺牲一切——自由、各阶级的利益、工业的利益以至个人的尊严——，无条件地牺牲一切来镇压革命运动，但革命运动仍然顽强地发展起来，吸引了国内最

^① 这是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1881年3月1日)后写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信。原信印在富有光泽的羊皮纸上，投在涅瓦大街的邮筒里。该信还重印了三次，共印一万三千份在各地散发。——编者注

优秀的分子，吸引了俄罗斯最刚毅的、奋不顾身的人们，而现在革命运动与政府进行殊死的游击战争已经有三年了。

陛下，您知道，不能责怪已故皇帝的政府缺乏精力。在我们这里，无罪的人和有罪的人统统被绞死，监狱和边远的省份充斥了流放犯。几十个所谓的“领导者”被逮捕和被绞死。他们怀着殉难者的英勇精神和从容神情而死去，但是运动并没有停止，它不断地成长壮大。是的，陛下，革命运动不是取决于个别人物的事业。这是人民机体运动的一个过程，给这个过程的最坚强的体现者设置的那些绞刑架也无力挽救已经衰颓的制度，正象把救世主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能把已经腐败的古罗马社会从革新的基督教胜利中拯救出来一样。

当然，政府还可以大肆捕捉和绞死无数的个人。它可以破坏许多个别的革命团体。它甚至还可以破坏现有的一些最重要的革命组织。但是这一切都完全无济于事。环境、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对俄国出现新的社会形式的渴望正在造就革命者。要想消灭全体人民是不可能的，要想采取镇压手段来消除人民的不满也是不可能的，相反，这样会使不满更加增长。因此经常会从人民中涌现出更加大量的新人物，更加充满愤恨和更加坚强的人物，来接替那些被杀害者。为了斗争，这些人自然会组织起来，并且拥有前辈的现成经验，因此，革命组织在数量和质量上势必与日俱增。这是我们在最近十年的现实中亲眼目睹的。杀害多尔古申派、柴可夫斯基派和1874年活动家给政府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接替他们的是更加坚定的民粹派。政府的严厉镇压后来导致了1878—1879年的恐怖主义者的出现。政府徒劳地消灭了科瓦爾斯基小组、杜勃洛文小组、奥新斯基小组、里佐古勃小组，徒劳地破坏了几十个革命小组。从这些不完善的组织中，经过自然的淘汰，只能产生出更加坚固的组织。最后出现了政府至今无法对付的执行委员会。

只要公正地回顾一下我们所经历的这痛苦的十年，那么，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改变的话，就可以正确无误地预示运动今后的进程。运动肯定会发展壮大，恐怖性质的事件将愈益频繁，革命组织将以更完善和更巩固的形式来取代那些被消灭的团体。同时，国内不满分子的总人数将会增加，人民将愈来愈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有关革命的思想，有关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思想将在俄国日益巩固地发展起来。这个破坏旧制度的过程将以骇人的爆炸、血腥的更迭、使人发抖的整个俄罗斯的革命震荡而告终。

这种可怕的前景是由什么引起，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的，陛下，这是可怕的和悲惨的前景。请不要以为这是一句空话。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在这场破坏性的事业和浴血的奋战中，有多少人才，多少精力遭到了悲惨的毁灭和消耗，而在其他条件下，这些力量本来可以直接用于创造性的工作，用于人民的发展，发展他们的智慧、福利、和平的社会生活。这场流血斗争的悲惨的必然性是从何产生的呢？

陛下，这是由于现在我们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真正的政府。政府按其本身的原则来说只应当表达人民的愿望，只应当实现人民的意志。然而，在我们这里——请原谅我们用词不拘——政府已堕落为清一色的奸党，并且比起执行委员会来更加适合于称之为**一帮篡位的匪徒**。不管皇上的意愿如何，政府的行动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皇帝的政府使人民屈服于农奴制，使群众处于贵族的控制之下，现在它又在公开制造一个危害最大的投机商阶级。它所进行的一切改革只能导致人民遭受更多的奴役和更大的剥削。它已使俄国陷于这样的境地，人民群众正处于赤贫和破产的状况，甚至在自己的家园旁边也不能逃脱最令人难忍的监视，甚至连自己日常的社会事务也无权处理。只有掠夺者和剥削者才受到法律和政府的庇护，最令人愤慨的强盗行为可

以逍遥法外。多么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那些真正考虑公共利益的人们。您清楚地知道，陛下，并不只是一些社会主义者被流放和被通缉。一个保卫着如此“秩序”的政府究竟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一帮匪徒吗？难道这不是完全篡位的表现吗？

这就是为什么俄国政府在人民中没有任何精神影响、没有任何依靠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产生了这么多革命者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甚至杀害沙皇这样的事件会在很大一部分人民中产生欢乐和同情的原因！是的，陛下，不要被那些阿谀奉承者的甜言蜜语所欺骗了。杀害沙皇在俄国是深受欢迎的。

要摆脱这种状况只有两条出路：或是革命，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任何死刑也不能防止的；或是最高当局志愿转向人民。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为了避免革命所经常伴随而来的可怕的灾难，执行委员会奉劝陛下走第二条道路。请相信，一旦最高当局不再独断专行，一旦它决心实现出自人民意识和良心的要求，您就能勇敢地驱逐那些玷污政府的暗探，把护送队送回营房，把残害人民的绞刑架付之一炬。执行委员会将停止自己的活动，在它周围组织起来的力量也将分散到各地，以便将自己贡献给为祖国人民谋福利的文化工作。和平的、思想的斗争将取代暴力，暴力对于我们，比起您的那些奴仆们来说，是更加令人憎恶的，只是出于可悲的必要我们才不得不采取暴力。

我们抛开一切成见，抑制由于政府多年来的行动造成的不信任，向您写了这封信。我们姑且忘掉，您是一贯欺骗人民、作恶多端的那个政权的代表。我们把您当作一个公民和一个诚实的人而给您写这封信。我们希望，您的狂怒不致压制您对自己责任的意识和想要认识真理的愿望。我们也是会狂怒的。您失去了父亲。我们则不仅失去了父亲，还失去了兄弟、妻子、儿女和好友。但是只要俄罗斯的幸福需要，我们就准备抑制个人的感情。我们所

期望于您的也是这样。

我们不是向您提出条件。希望我们的建议不致对您有所冒犯。使革命运动为和平工作所取代的必要条件，不是由我们，而是由历史造成的。我们不是提出，而只是提醒这些条件而已。

按照我们的意见，这些条件有二：

1. 对过去所有的政治犯罪行为实行大赦，因为这不是犯罪行为，而是履行公民的职责。

2. 召集全体俄国人民的代表重新审查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现行方式，并按照人民的愿望对它进行改造。

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您提醒，只有在选举完全自由进行的情况下，人民代表才有可能确认最高当局的合法性。因此选举应该在下列情况下进行：

1. 代表应从所有阶级和阶层一视同仁地按居民人数比例选派；

2. 无论对于选民或者代表都不应有任何限制；

3. 竞选活动和选举本身应充分自由地进行，因此，政府在人民会议作出决议之前，应该以临时措施的方式，准许：（1）出版的充分自由，（2）言论的充分自由，（3）集会的充分自由，（4）竞选纲领的充分自由。

这就是使俄罗斯回到正确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唯一办法。我们向祖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党从自己方面说将绝对服从遵照上述条件选举产生的人民会议的决议，今后也不允许自己对由人民会议批准的政府采取任何暴力的反抗行为。

总之，陛下，请您抉择吧。在您面前摆着两条道路。选择哪条道路取决于您。我们对此只能祈求命运，希望您的理智和良心将会提示您采取唯一符合俄罗斯的幸福、符合您个人的尊严和您对祖国所担负的职责的抉择。

执行委员会

1881年3月10日

译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文集》1965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2卷第191—195页。

人民党纲领^①

一 党的目的和直接任务

人民党赞成社会联邦主义者的纲领，以实现符合该纲领提出的理想的秩序作为自己的目的。人民党以根据人民生活提供的条件和世界观进行活动并因而成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的一切人民党派所共同遵循的原则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

据此，注意到：

第一、在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实际上能够实现的只有那些由社会阶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的并符合该阶级已认识到的理想的变革；

第二、在俄国只有农民具有完全明确的理想即“土地和自由”，而这一理想同当前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原则是大相径庭的；

第三、只有通过人民自己的积极的斗争和自觉的努力才能完全实现人民的理想。

① 这个纲领首次发表于1881年3月。由“土地和自由”社流动印刷所在圣彼得堡印刷。——编者注

人民党提出的最近任务是通过人民起义实现人民的理想，认为这是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的第一步。

按照党的信念，在经济关系方面，这一变革应导致承认土地、工厂、大型劳动工具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同时其使用权仍属于城乡劳工集体。

鉴于在人民中沙皇制度思想的破产尚未导致人民产生新的、明确的政治理想，——人民党提出社会制度的如下基本原则，这种社会制度是从俄罗斯人民的文化、性格和未来的经济关系中合乎逻辑地产生的，党认为必须加紧宣传这些原则：

- (一)目前机械地联合成为统一的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独立；
- (二)村社自治；
- (三)村社自由联合。

在人民起义的时刻，党应主动组织能够领导革命斗争的临时政府，当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以后，临时政府应准备让位给人民批准的政治组织。

二 完成党的直接任务的实际途径

(一)一方面，人民的经济状况很困难，另一方面，人民的要求很明确，——这就是变革的基础。

(二)人民缺乏普遍团结的觉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以及与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沙皇的传统的信赖(把沙皇当作人民利益的代表和保卫者)，此外，人民中没有广泛和坚强的组织——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起义的障碍。

因此人民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排除这些障碍：

(1)党在农民中加紧进行的活动，应致力于在人民中建立革命的组织，没有革命的组织，旨在实现人民理想的人民起义要取得

胜利就没有任何保证。

党所理解的人民中的组织，是指在每个地方形成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在人民起义时其他的农民群众能够围绕这个核心组织起来，并从而成为能够进行斗争的一支力量。

至于城市工人，则大部分都是流动不定的，他们还没有在城市里最后定居下来，他们的利益同农民没有区分。这一部分工人在一定时间里从农村迁入城市又从城市迁回农村。他们的全部打算和要求倾注于农民群众的基本理想即“土地和自由”。党应当利用这些工人，把他们作为影响农民群众思想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在农民中建立组织的工具。

另一部分城市工人就其利益和理想而言，已经脱离了农民。这一社会阶层就其数量和在各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的战略意义而言，是全俄罗斯人民中一支很重大的力量。在进行鼓动和组织工作时应对这一部分人灌输广泛的集体主义理想，以代替目前在他们之中表现出来的狭隘的要求。

(2)沙皇制度的思想在人民中破灭的自然过程（目前这个通过在群众的意识中积累动摇这一信念的事实的过程正在进行），将随着人民中的积极性和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增长，同时通过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而加速发展。

(8)一个人只有在实践中体验到了自己的力量才会开始相信自己的力量，同样，群众中的这种信心是通过同自己的直接敌人的积极斗争建立起来的。

因此，人民党应当利用人民同行政当局、地主等冲突的每一个机会，用革命的思想去阐明这些冲突，促使这些冲突取得即使是暂时的胜利，根据情况在农村和工厂实行恐怖。

注意到：

第一、通过人民革命实现人民的理想这一点不直接取决于党

的愿望，

第二、对人民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应当在人民的迫切需要和要求的基础上进行，

人民党提出如下的要求作为鼓动群众的理由：

(1)在经济方面：停止分配村社的土地，增加村社农民的地产，减少赋税，改进征收赋税的办法，停止因农民欠款和欠税而出卖他们的财物的做法，缩短劳动日，禁止使用不到一定年龄的童工劳动，通过工厂立法调整女工劳动，等等。

(2)在政治方面：保护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信仰自由，通过报刊宣传进行教育，集会、结社自由，人民参加管理，等等。

三 党的辅助活动

农民和城市工人就其地位而言应当构成人民党的大部分，除了农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人民党有必要吸收属于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来加强自己：

(1)军队：目前服兵役的期限相当短，士兵没有完全脱离农民的利益；由于士兵仍继续关心农民的利益，所以党认为必须利用这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第一、作为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第二、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战斗力量，这支力量在人民起义时能归附人民，从而大大加强人民的力量。

(2)社会：青年、报刊、地方自治机关、官吏、军官等等。

党在致力于吸引社会的优秀力量参加人民的事业、使他们与人民党同化的时候，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在他们中间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向他们指出在我们俄国实际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途径，并把青年的利他主义感情引导去为实现人民的理想而斗争。

四 党在人民中的地位

人民党不应当成为人民寄以希望的外部力量，而应当同人民结合在一起，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党员队伍的壮大主要应靠人民中涌现出来的、同人民保持最密切联系的优秀力量。只有当人民和人民党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时，人民才能获得解放。

译自《革命史文集》1926年莫斯科
列宁格勒版第3卷第184—187页。

民粹派基本提纲^①

甲、基本提纲

一、民粹派学说的出发点是人类平等，即承认全人类（最低限度是人类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的最大多数人）无条件地具有直接掌握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基础的最高的逻辑真理和道德真理的能力。

二、民粹派道德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同历史条件的恶化作斗争，这些历史条件已经并正在模糊个人所固有的社会生活的最高道德准则的意识，妨碍这种准则正确地体现在以人类平等为基础

① 这是八十年代民粹派的一个纲领性文献，作者不详。——编者注

的形式之中。

民粹派从上述基本提纲出发，承认由本提纲所产生的并由当前的历史时期所规定的下述原理。

乙、哲学—道德提纲

一、在当前的历史生活条件下，正在从社会公众和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这样一些人，他们仅仅由于各种条件的偶然凑合而在思想和道德方面高于自己周围的人们，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超脱了个人私利或阶级利益，完全忠于劳动群众中潜在的真理思想，把自己的全部道德力量和智慧力量用于研究真理表现的条件，使真理以适当的形式在生活中体现出来。

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当知识分子代表被奴役群众的利益并为反抗对被奴役群众的压迫而进行斗争时，他们的思想和道德水准最高。知识分子的这种崇高的作用在历史上表现在两个意义最为重大的伟大时刻：这就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宣布人们绝对平等的基督教和人道主义，不过前者采取了继承性的道德(精神)平等的形式，后者主要采取了“个人”(政治)平等的形式。

三、有鉴于此，民粹派应当确信，现在知识分子注定要起同样崇高的作用，因此，凡是具有知识分子称号而不起这种作用的都是徒有其名，都无权自称为知识分子。

四、但是鉴于前两个时期争取被压迫劳动群众胜利的历史性斗争进程只取得了有限的收获，即有限的精神自由(从道德平等的意义上来说)和有限的个人自由(从消灭政治奴役，承认“个人”平等的意义上来说)，民粹派认为，在当前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的

作用只有在民粹主义面前才可能是真正道德崇高的，这种民粹主义综合前两个阶段的斗争而提出第三个阶段——为“人类平等”而斗争，即反对企图以思想强迫和经济强迫的形式压迫群众的斗争。

五、民粹派一旦屈服于诡辩或周围环境同他们确定不移的理想之间的矛盾的压力，而对上述基本原理在实质上持某种妥协态度时，就等于背叛进步的事业，背叛争取最高真理和自己的原则性胜利的事业。

六、民粹派应当坚信自己的原则是正确的，应当坚信这些原则一定会实现，如同早期的基督徒和近代的人道主义者坚信自己的原则一样，尽管当时的诡辩家们曾不断举出现实生活中的反常现象来证明贯彻人类平等的理想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违反常态的，并且嘲笑这种理想是“空想”和“幻想”。

七、民粹派必须记住，早期的基督徒和后来的人道主义者都从未灰心丧气地认为他们的理想的光辉一开始只能为世上的强者所接受和掌握，而不可能同时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如同当时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虚伪地断言的那样。

八、民粹派必须象基督教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那样绝对坚信，最高的道德真理是最简单的真理，因此也是每一个人所固有的，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低下。这些真理是“人类的良心”，它多少世纪以来被蹂躏，一旦在广大群众的意识中突然激发出来，就会寻找适应现实的方式。

九、如同基督教的“无论希腊人还是犹太人，无论奴隶还是自由人”在上帝面前都人人平等，以及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在国家面前享有“个人自由”权利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能为群众理解，能为群众立刻接受一样，民粹派所主张的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基础的最高道德真理的简单原则也同样能够立即同时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十、从这些原则出发，民粹派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权利认为哪个人有掌握这些真理的特权，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权利认为群众（似乎）应当通过这些特权人物学会掌握这些真理的能力，因为这些真理（似乎）不是群众的思想中所固有的，而是有智慧和文化的脑力劳动的结果。

十一、民粹派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权利认为，培养群众从（似乎是低级的）群众类型的人缓慢地演化为（似乎）唯一能够掌握社会生活最高道德准则的高等类型的人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和天然必需的。

十二、因此，没有权利认为，为此必须存在一个作为奴役群众的残余的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实行专制的强有力的国家，（似乎）只有在它的开明监督下群众类型的人本身的缓慢演化才能完成。所有这一切都是诡辩，这种诡辩在历史上一再反复出现，并被这种专制国家本身所利用，无论在基督教平等原则胜利以前，还是在人道主义原则胜利以前都是如此。“为了使群众能够合理地享受自由，首先让我们有时间来使他们学会理解和接受自由，然后我们就会给他们以自由。”——这就是多少世纪以来专制国家宣扬的诡辩。专制国家一向用千篇一律的恐惧，即群众会毁掉和降低基督教时代在奴隶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恐惧和农奴解放时代这种文化能否存在的恐惧，来吓唬抱平等的空想和幻想的人，而不愿承认，这种高度的文化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恰恰因为它是依靠奴隶制、依靠不承认群众有平等权利而存在的。

民粹派的最高范畴就应当是这样的，这些范畴的绝对正确性正在得到群众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感情、逻辑推理和维护人道主义思想的斗争史的资料证明。

十三、此外，民粹派必须懂得，民粹派的范畴是建立在进步的政治经济理论的坚固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证明，既然要使基督

教的“精神平等”的原则取得胜利和得到巩固只靠布道和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不够的，既然要使个人自由取得胜利只靠政治革命是不够的，那么要使涉及保障上述两种人道主义范畴的人类平等取得胜利，这些手段无论单独或综合使用就更不够了。因此：

十四、鉴于民粹主义理论所涉及的历史罪恶和欺骗极端深刻复杂，民粹派应当记住，为了争取自己理想的胜利，必须要求知识分子付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度集中的全部智力和道德力量。

民粹派既然承担起为被压迫劳动人民群众的理想和利益而斗争的崇高使命，因而无条件地承认：

(一)在民间最广泛地宣传人民正义将会胜利和作为最高正义的人民正义必然实现，不倦地唤醒人民心中深藏的博爱平等的感情和使人民的精神经常保持在极其光辉的浪漫主义的高度，这些应当是民粹派活动的基础。民粹派不应单纯从狭隘的形式主义观点出发，把宣传看成仅仅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而且还应把它看成是目的。当前不论人民以何种形式(以宗教形式或其他形式)表现他们由宣传激发出来的感情，其本身都是为达到无所不包的总目标的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政治宣传的失败无论如何不能证明在民间进行宣传是根本无效的。相反，民粹派应当始终记住，对他们来说政治斗争只是暂时的手段，这种手段有时适用，有时不适用，而宣传则可以顽强地、不倦地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下去，虽然宣传的形式可能不完全符合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对达到总目标来说无疑是重要的。

(二)使群众有机会尽可能广泛地享有自行管理公共事务的工具(如作为一种技能的识字)和方法(如经济和政治上有保障的自由)，应是民粹派在近期内追求的首要目标，这不是指将某种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强加于群众，而是指必须把那些人类文化的基本工具还给群众，群众缺少这些工具是不平等和奴役的第一根源。

正如自由本身只有当它被赋予某个人或被某个人夺取到手，因而必须以法令加以固定和保障才能体现在生活之中一样，自由的不可侵犯性和在生活中得到巩固的条件的保障也必须以法令加以固定和以法令为基础。

(三)民粹派应当利用一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手段，但必须根据当时的各种历史条件和民众的情绪严格认真地斟酌斗争的形式。民粹派应当不倦地深入研究本国人民的历史、他们的生活特点、心理、当时的情绪和当时人民正用来努力体现他们心中的人民真理的原则的那些形式。

(四)民粹派应当参加一切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斗争，因为参加这种斗争会对民粹派的理想和人民的当前利益有好处，民粹派无论如何没有权利将空论习气带到政治斗争中去，不管这种空论有怎样的逻辑根据，因为民粹派懂得他们是肩负着群众的切身利益的。

(五)民粹派无论如何没有权利由于受到不断变化的政治条件和政治形势的压力或由于准备同某一社会党派或阶级党派缔结政治同盟，而接受不包括民粹派使命的基本对象即无权的劳动人民群众的术语或政治口号，如“自由主义”、“斯拉夫主义”等术语。这些术语虽然是暂时性的术语，但也会给民粹派的世界观带来概念上的极大混乱，无论在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是极为有害的。

丙、政治经济提纲

一、鉴于对群众的奴役无论表现为什么样的形式，是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形式还是所谓的“开明专制”（精神贵族）的形式（这种专制在当前只能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暴力才能实行），通过这种奴役群众的方法来达到社会生活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安定是

不可能的；

二、因而通过这种方法来达到满足个人的最高道德要求也是不可能的，

民粹派将下列措施和实质上无可争议的原则置于纲领的首位：

(1)不受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束缚的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

(2)经济权利平等。

(3)社会一切成年成员的政治权利平等。

三、鉴于实现这些原则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的历史时刻取决于下述两个显然重要的因素：人民和社会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人民和社会的情绪(这种情绪代表业已成熟的要求)，——民粹派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派别提出下列折中的办法。

四、由于认定在当前的历史时刻俄国无疑只有两个公认为杰出的阶级，即农民和平民知识分子(最广义上的)，因此民粹派认为尽管这两个阶级的要求有本质的不同，它们当前的情绪是这样的：鉴于存在某些共同的利益，满足这两个阶级要求的问题可以多少比较和谐地写入共同纲领，这既不妨害人民当前要求的范围内的利益，又使将来人民利益的完全胜利得到越来越大的保证。

五、这两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可以归纳如下：(1)信仰自由，(2)人身不可侵犯，(3)自治自由，(4)言论自由，(5)利用国家一切自然资源的自由，(6)人人享有自由受到公费教育的权利。

六、追求和取得这些权利，只有在权利能保证并满足每个阶级的特殊的迫切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对两个阶级都有意义，每个阶级的特殊的迫切要求是：

七、农民阶级要求：(1)足够数量的土地，在农民当前的耕种习惯条件下这个数量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其生理要求，以保证经

济独立；(2)读书识字；(3)管理村社和占有土地。

八、平民知识分子阶级（这个阶级主要由具有个人主义倾向、靠个人的智力才干为生的人组成）要求：(1)受职业教育和一般高等教育的自由；(2)支配私人财产；(3)组织同人团体、职业公会或结社和集会的自由。

九、两个阶级的上述要求在当前条件下只有通过谋求采取下述全国性的措施才能得到满足：

(1)一切土地……^①国有化；

(2)公费初等义务教育；

(3)承认村社对农民阶级来说是国家的土地占有形式；

(4)公众代表审判制；

(5)两个阶级都(自由)享受公费高等教育，并用公费建立高等教育性质的一切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在科学上和文学上有成就的公职人员的养老基金；

(6)两个阶级的代表参加地方和全国会议形式的全国性机关。

(7)大赦政治犯。

十、上述一切大体上可以下列形式得到实现：

颁布土地国有化法令后许可：(1)移民完全自由，空地村社可以优先自由使用国有土地，私人使用土地不得超过二、三份。只有通过这种办法使居民密度自由均匀之后，国家才可以着手通过赎买方式将私人占有的土地划归村社，直至最大限度地满足同私有土地毗邻的村社的土地要求为止。(2)改划土地不应以给村社“份地”的形式进行，而应以米尔(村社)租赁的形式进行，不承认任何人的土地所有权。(3)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劳动阶级的土地

^① 原文脱漏。——编者注

要求以后(这一最大限度取决于用以抵偿满足必要的生理需要、教育需要、国家、米尔和社会需要方面的一切开支的地租的多少),其余全部空闲的土地……^①,私有的……^②,将同短期或长期出租的土地一样看待。民粹派所追求的最低理想就是如此,而不管这一最低理想在当前的历史时刻是否有谁给予保障。

译自《革命史文集》1926年莫斯科
列宁格勒版第3卷第202—207页。

略论俄国社会主义的过去和 知识分子的任务^③

阿列克谢也夫

两年前,当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作了多次尝试后终于在叶卡特林娜运河边刺死了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无论在我们社会的心目中还是在西欧,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兴趣大大加强了。一切对“虚无主义者”表示同情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和追究,甚至在政治上最自由的国家如英国,都发生了由于在《自由》(«Freiheit»)上发表了鼓动行刺沙皇的文章而判处莫斯特十六个月苦役这一类事情。甚至提出了对社会主义者进行国际性追究的问题。各国政府的态度是这样。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即使不是都赞成俄国革命者的行动方式,却表示完全理解这种方式,并且同情恐怖分子的英雄气概和

①② 原文脱漏。——编者注

③ 本文是哈尔科夫的民粹派尤利·阿列克谢也维奇·布宁写的一本小册子,以阿列克谢也夫的笔名载于1884年民粹派的出版物。——编者注

毅力。

如果说最近一个时期俄国恐怖主义者的活动没有象二、三年以前那样吸引普遍的注意，如果说现在看不到以前那种紧张的恐怖行动，最后，如果说甚至连民意党人也都公开声明党的力量遭到了破坏，党正经历着危机，对许多事情的实际安排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见《俄国革命者致俄国社会书》这一小册子），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也毕竟不能否认，社会上无论是把恐怖活动看成俄罗斯国家逐步走向正常进步的阻碍的那一部分人，还是那些把恐怖行动看成是为了澄清政治气氛、建立“法制”而同君主专制进行斗争的唯一手段的人，都对恐怖活动的社会作用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进程感到很大的兴趣。

按照某种客观标准来判断人们对革命运动感兴趣的程度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唯一的社会思想宣传工具——报刊处于众所周知的条件之下，无权触及甚至无权简短地触及一向吸引社会注意的政治过程、人民反抗等问题。但是如果稍微注意地看看我们的报纸，那么就能间接地看到，我们的报纸是在力图满足公众了解革命活动事实的需要。例如，几乎所有的国外消息都充满了这一类事实的报导，甚至不太重要的事件也常常在各报占据整栏整栏的版面。为什么呢？因为谈论外国的革命运动是容许的，而谈论家里的革命运动是不能容许的。然而，不需要援引间接的证据，也不需要扮演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敏锐的读者的角色，这一切都不需要，——只要用耳朵去听，用眼睛去看，只要倾听一下你周围所有人的谈话，除非你蓄意无视事实，否则就很难否认社会对革命行动的注意。

然而，社会的这一完全正常的要求是否得到了满足呢？可惜没有。秘密报刊最近一年至一年半以来完全没有发表原则性的文章，如果说在国外《自由言论》和其他出版物都能按期准时出版，然

而它们在俄国却几乎得不到传播。上述一切都促使我们去哪怕只是简单地触及许多业已成熟的问题，不过我们预先说明，在到处都一团混乱的情况下，很可能在我们的议论中混入不少主观的因素，如果谁向我们指出这些缺点，并予以符合客观情况的合理的纠正，我们将真诚地表示感谢。

我们打算在某种程度上简要地说明革命政党在其逐步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观点的基本实质，指出哪些因素在革命政党中交替地起着主导作用，并且主要的是要确定这一派别的各种作用和色彩有什么关系和联系。

“民意党”不止一次地自以为它给社会思想带来了十分明确的、严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许多点上迥然不同于以前的带有联邦制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各革命派别。民意党人过去坚决地强调，现在也坚决地强调，把恐怖手段当作他们这一派特有的特征是极其错误的，恐怖手段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手段，纲领的基础有更深刻的依据，这就是作为社会学因素的国家的作用和意义。还在1880年秋天，在十六人审判案中党的一位最有才华的代表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就曾指出过这一点。接着《民意报》第7号社论驳斥了库拉代表大会上一位土地平分派所说的“民意党”是一个靠经验发展起来的派别的意见，社论肯定地说，构成纲领基础的不是经验主义，而是严格制定的体系和明确的世界观。在这以后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雅·斯捷法诺维奇在法庭上的声明，他说，无论是在利佩茨克代表大会上制定的执行委员会的纲领还是《民意报》，都不能成为评价个别党员的观点的充分标准，甚至用作某一段时间里的评价标准也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说用作大段时间里的标准了。如果这个意见可以被当作全体党员都能加以同意的自白，那就必须承认这种状况是客观的条件，除了等候那个十分准确地确定方向的时刻以外，别无他法，而现在还没有理由指出这个社会集

团观点中的所有可以看得见的矛盾。我们自己本来也是会这样行动的；但是，上面提到的意见，以及最后当事人没有声明这一点，使我们没有理由采取这样的行动。的确，我们在上面已经发现，在《俄国革命者致俄国社会书》这份呼吁书中谈到了党内正在发生的某些变化；但是据所能了解的来说，这些变化与其说是表现在问题的原则提法方面，不如说是表现在组织问题方面。在着手实现预定的目标之前，我们认为作这样的保留是有必要的。

凡是同七十年代的革命家有了一点接触的人，应该记得社会主义者对政治斗争所持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就其极端性来说是我国革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特点，特别是不同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后者提出人民国家，力图使自己的议员进入国会，提出所谓“当前要求”，等等。不管一个革命的政治家的信念如何极端，他们仍然被认为是同“新生活的曙光”毫无共同之处的、倒退的旧派别的代表。“不要旧皮袋里装新酒”——就是当时那个派别的基本戒律之一。在一本《前进》杂志上刊载了一篇短文，把上一世纪的美国革命同普加乔夫运动作了一个比较。这篇短文证明，美国的运动尽管表面上很吸引人，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而普加乔夫起义却包含着美好未来的种子。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是没落世界的人物，普加乔夫则是新世界的代表。甚至在稍晚一些时候，即1878年在俄国已开始同政府进行游击战的时候，有一期《村社报》还发表过这样的思想：任何一个正直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向打着“立宪”大旗的社会活动家伸出手来。无怪乎特卡乔夫及其倒霉的《警钟》遭到了完全的确无疑的失败；他的报纸的读者就是他自己；整个革命界都以最大的藐视和鄙视的态度来对待这张机关报，刊载在那张《村社报》上反对《警钟》编辑部的信可以作为证明，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当时出名的革命家查苏利奇、斯捷法诺维奇、捷依奇、克拉夫钦斯基等人。“立宪”一词已经完全

从那时的社会主义者的词汇中排除出去了。诚然，即使在那时也曾有过一些在立宪斗争的基础上组织革命小组的微弱的尝试。这些尝试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且只在极有限的地区（主要是俄国南方如基辅）有一些发展。“无政府状态”这一名词无疑是一个政治原则，是社会革命纲领的基本中心点。

然而，恐怖行为愈演愈烈，社会斗争更加尖锐了，象查苏利奇行动、搜查时的武装抵抗、示威游行、暗杀密探一类的事件开始出现了。美津策夫被刺后克鲁泡特金倒下了，德连捷尔恩遭到枪击，最后，几乎谁也没有想到，1879年4月2日突然到来了。我们说“突然”，是因为甚至在革命者之间，当然不是在中心小组的革命者之间，都流传着这样的看法：索洛维约夫的举动是宫廷阴谋或诸如此类的表现。刺死沙皇的思想在这以前是无法理解的，而且在这以前是不符合传统的倾向的。从枪杀特烈波夫到4月2日的枪杀事件这一段时间，可以被看作是此后二、三年的辉煌的恐怖主义时代的准备时期。在这个准备时期里，我们无法完全弄清楚，恐怖行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即使我们在当时的秘密报刊上竭力为这些现象找到某些理论根据，那我们也是根本不会满意的，因为一切都混乱不堪。《土地和自由》的社论从道德辩护的角度探讨过恐怖主义的斗争，把它同犹滴和威廉·退尔^①的行为一类的事件进行类比。我们不想说，刺死美津策夫等事件是考虑不周和理由不充分的。不，我们肯定的是对这些事实的作用没有根据斗争的一般原则给予充分的估计。理由是很充分的，考虑也是很周到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刊载在《土地和自由》第一期上的一首卓越的艺术性很高的诗《在棺材旁》。一行行一字字都是那样动人心弦，感人肺

^① 十四世纪瑞士历史上反抗奥地利残暴统治的一个农民射手、民族英雄。席勒根据历史和民间传说写了同名诗剧。——编者注

腑。你读着它会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里所描写的悲剧，专制的野蛮专横和痛苦的活生生的可怕情景，在你面前闪过，你于是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处决的公正和必要，读完这首诗以后，你的头脑中将久久地留下优秀诗人在这里巧妙地再现的忧郁的悲歌。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这些作为纲领性斗争手段的事实的基本意义，读一读专门为此而写的小册子《以死还死》，那么你就会发现材料的杂乱、观点的混乱和自相矛盾比其他任何出版物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你们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见，说政治形式完全是无所谓的，同时又说“只要还存在着美津策夫和克鲁泡特金之流的人，革命者就不能匕首入鞘”，等等。难道小册子的作者不明白，美津策夫、克鲁泡特金之流是现行制度的表达者，他们之所以能够粗暴无耻地践踏人权，并不完全在于他们的个性特点吗？“不能匕首入鞘”等等就等于向政府组织宣告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简单地或者说毫无道理地热中于无政府主义倾向迷住了作者的眼睛，使他看不见一目了然的事情。问题不在于这位佚名作者持什么观点，而在于这本小册子代表了整整一个思潮的信念。

最后，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队伍终于改组了，分出了一个“民意党”，在利佩茨克举行了代表大会，开始出版该党的机关报，刊载从原则上阐明问题的文章。然而，应当提到，还在利佩茨克代表大会以前，许多人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后来成了运动的基础，例如，已故的瓦列里安·奥新斯基，就其精力和毅力来说在自己的同志中是一位很卓越的人，临终时留下了遗嘱，他在遗嘱中号召进行自觉的目标明确的斗争，但不是同政府中的人而是同俄国的国家机器进行斗争。还应当提到，在搜查被绞死的军官杜勃洛文时发现了一篇札记（不知道这篇札记是否为了付印而写的），他在札记中坚决主张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作为一个职业

军人，他甚至陈述了策略手段的全部细节。

现在要问，什么原因使俄国的革命团体总是遵循无政府主义理论之类的极端的理论？有些人，例如拉维勒就以一般俄罗斯人气质中的野蛮和放任来解释这种事实，他把巴枯宁比作但丁的《地狱篇》里的恶魔，说什么象巴枯宁这种人只能产生在俄罗斯人中间。对于任何一个了解俄罗斯人的温和而又爱好和平的性格的人来说，这种解释是不值一驳的。其他的一些解释则相当合乎情理。人们首先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青年中间发展起来的，而青年就其本性而论总是倾向于极端的运动的。毫无疑问，这里有部分道理，但是不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一切。要知道我们的青年不象其他国家的青年，特别倾向极端的意见。欧洲青年的大多数政治要求都局限在民族主义利益的极其狭隘的框子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例如布拉格经常发生的风潮），常常狭隘到这种地步，例如德国人，特别是他们的青年，为了统一自己的祖国而为俾斯麦鼓掌。还能说什么呢！就拿这个事实来说吧。今年冬天法国巴黎的大学生张贴通告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可是如果我们这里发生无政府主义运动这一类事情，我们无疑会看到，我们的青年不是站在温和的反对者的行列中，而是站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骨干队伍中。这就是说，用俄国社会主义的领导人的年轻来解释整个问题至少是片面的。

用社会在政治上的普遍不开展来解释俄国社会革命运动的极端化要合理得多。更不用说千百万农民了，他们直到最近还处在不仅被剥夺政治权利而且被剥夺最起码的公民权的地位，也不用说僧侣了，我们这里的僧侣从来不是一股社会理性的力量，而是一伙把自己的地位看作不致饿死的职业的不学无术之徒，最后，不用说，我们这里差不多分出了一个第三等级，在西欧第三等级尽管有许多缺点，但却产生了一大批学者、艺术家、政治家等等，并且尽管

是出于纯粹物质的利益,但却促进了自由原则的广泛传播,这一切都不说,我们看到,甚至最高的等级——贵族虽然向来是官宦阶层,但从未起过独立的政治作用,而是处在从属于越来越中央集权化的政府的地位,这个政府是通过自己的官僚机器来调节社会生活的一切职能和作用的。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是俄罗斯国家的两个基本原则。因此很明显,社会思想不是由生活经验产生的,根本不是由生活经验使之合乎条理的,也不适应现实的环境,因此它不能在现实环境中确定方向,不能提出正面的要求,而是停留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反题同正题对立,没有折衷的合题的地位。一个极端引起另一个极端。社会气氛在这种情况下是如此令人窒息,以致在刚刚产生的思想运动中引起了无比强烈的抗议,引起了如此紧张的局势,以致运动把空想和幻想当作时代的要求而赖以存在。情况通常就是这样。那些反抗的人发现俄国社会生活或更确切地说国家生活的某种现象是基本现象(当然,由于上述政治和思想不开展的原因不免发生错误),于是就对这种现象采取不调和的绝对否定的态度,提出一套同它针锋相对的东西,把这一套当作自己的基本信念的行动基础,忽视其他一切,并且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竭力加以贯彻。结果当然完全出乎预料。其后果就是完全失望。感到不满的思想抓住了另一个社会现象,于是同样的历史又重演一遍。我们的革命运动的极端化、从一点跳到另一点这种特点,据我们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解释。青年过去和现在都是进步的反抗思想的代表者,因此整个运动带有更加极端的性质,但这一事实是次要的、派生的现象,因为由生活本身确定一定类型的社会运动的地方,这种运动必然会在本质上最适合这种形式的人们中间开展起来。我们的运动之所以带有极端的色彩,并不是因为它是在青年中表现出来的,而是相反,它之所以在青年中间表现出来,是因为历史状况和当前的全部社会条件使运动必然带有

这种极端的色彩。现在让我们更加细致地观察一下运动的详细情形，并且用一些事实来说明我们的思想。

七十年代的头五年通常都被认为是社会革命运动的开始。但是把六十年代看作这种运动的发展的起点也许更为确切。这时已有一些组织的萌芽，例如，1862年创立了“土地和自由”社，接着，六十年代中期有卡拉科佐夫的“地狱”组织，最后，六十年代末组成“涅恰也夫派”运动的一切因素都在酝酿成熟。如果连目前的状况都应当叫做萌芽状态，那么对那个时代就更应当这样说，因此，要确定写在那个运动的旗帜上的原则就特别困难了。然而，即使在那里也能发现某些特点。首先，完全可以说，六十年代社会中有一部分激进派，他们不属于上述的一些运动，这部分人充满了“虚无主义”精神，许多人，特别是外国人，直到目前仍认为虚无主义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他们这样认为部分地是故意，部分地是出于无知，然而实际上我们当代的思潮早已同虚无主义的特殊原则划清了界限。虚无主义在个人问题上就是否定行为的指导原则，把指导原则同“个人爱好”对立起来，而个人爱好也就决定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切准则。巴扎罗夫说：“我不去偷别人口袋里的手帕，同我不能吃发臭的牛肉，遵循的是同一个原则。”在社会问题上，虚无主义达到了完全绝对否定一切现存形式的地步。虚无主义者说：否定、破坏——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

这种简单的办法成了上述某些小组的要领，例如《涅恰也夫派信条》的某些条就列举了哪些社会阶层应当无条件地全部予以人身消灭，哪些应当有限制地予以消灭，等等。总之，破坏已经到了不能逾越的极限，否定已经到了顶点。然而，社会思想是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的，否定没有定形和缺乏具体内容，必然很快就失去威信，只有性格非常不沉着的人才能对虚无主义感到满意。确实，虚无主义这种理论不久就失去了立足点。它在最盛行的时候就已经

开始逐渐解体，不再主张普遍的破坏，开始承认某些因素的优点，承认智力发展是舆论的唯一强有力的因素。如果说巴扎罗夫曾经说过，他搞化学仅仅是因为他喜欢化学，那么不理解巴扎罗夫的皮萨列夫以及在他之后的扎伊策夫等人，却已把化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看作世间一切事物的基石了。请注意这时出现的情况。原来以为全面否定的主张既然毫无用处，一定会使它的崇拜者们清醒过来，使他们学会慎重对待事物。而事实上结果却正好相反，俄国进步运动经常具有的特征——极端性和片面性这时表现更加强了。

除了自然科学之外，其他一切一概都不被理睬。费尔巴哈、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毕希纳之辈是绝对崇拜的偶像。“只有能现实地独立思考的个人不断增加，才能保证社会的顺利发展。”这就是那个时期的基本信条。

后来，自然科学之外又增加了其他科学，并且断言只有普及知识才能促进变革：“要积累知识，要宣传你们的观点，这样你们就能尽到你们的社会职责。”出现了许多极端的宣传家，而且常常闹出大笑话。他们曾计算过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对所有的人进行普遍的说服宣传，看来这个期限需要六年。

然而不久许许多多人对这件事也感到失望了。但是他们非但不肯重新学习，反而再次陷入更大的极端和片面性。巴枯宁说：“思想不能支配世界，它只不过象指路的里程碑一样指出社会发展的方向。”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全面否定政治因素的作用的问题。这个极端引出了另一个极端：过去出现过并且直到目前也还在出现一些小组，它们把一切都归结为政治，而且是形式最简单的政治；例如，他们认为通过军事密谋可以引起激进的政治变革，然后通过法令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这些小组人数不多，但是只要了解革命事业一般状况的人都知道这些小组。

总之，一切办法都试过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都触及过了，虽然非常肤浅、狭隘和片面。如果有人提出同民众结合的要求，那么任何一个不穿粗呢外衣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坏蛋。如果一些人说一切都在于宣传，那么另一些人就会说宣传没有任何意义，一切都在于鼓动。最后，又有一些人两者都不承认，认定只有恐怖行动（政治的或农业的恐怖行动，视情况而定）才是万应灵药。

极端性也涉及如何确定最近将来的制度的理想，有人断言，不应当把集体主义，而应当把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将按需分配）提出来作为社会进步的下一个阶段。这里没有估计到，象共产主义或者例如无政府状态（至少是指把国家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意思）这样的社会形式，只有在预先对人进行利他主义感情的再教育以后，在自由、人道、正义的原则广泛深入地普及的情况下才能实行。培根完全正确地指出，如果有可能找到最好、最理想的国家形式的话，那么这种理想也只不过是一颗指路星而已，而且这颗星非常遥远，它的光线几乎达不到我们这里。共产主义也是如此。

我们再看看构成党的组织基础的那些原则。最初，在采取恐怖行动以前的时期，在无政府主义盛行的时代，宣扬的是各小组的完全自治和完全独立，这种自治和独立几乎达到了完全否认组织的程度。与此相反，作为一种极端，人们有时又企图建立严格集中的组织，这些组织把纪律和下级小组对中央的服从搞到十分过火的程度。

我们有意化这么多时间来证明这样一个思想，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思想极其重要。我国革命派别的上述的一般性质说明，还不能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完全定型的派别，一种严整的世界观，就象有些人力图证明的那样。如果按照西方的理解，“党”这个字眼，还不能按其完整、广泛的含义应用于俄国的社会派别，

这些派别在目前形势下还没有自由的、有机的发展的可能。

在把一个派别确定为一个党的时候，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结合许多极重要的内容。例如，当运动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的时候，它就不能起到真正的人民代表的作用，不能以人民的名义行动，等等。此外，既然对一个派别有了明确的看法，给它确定了相应的位置，我们就应当吸取过去的教训，应当对解决理论问题和采取各种实际的行动方式持审慎的态度。

“党”这个字眼通常是同下述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说某个运动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派别或政党，意思是说不仅运动提出的各项原则，而且连实现这些原则的基本方式和手段，都是得到这一派别为捍卫其利益的那些社会阶层的同意的，或者至少是理解的和无论如何不被认为是有害的。我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实现了这一要求没有呢？

不用说，我国人民不仅谈不到同意，甚至几乎不知道有社会主义者的存在，而且人民中的许多人认为3月1日这一类事件是对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害的。只有抱极端偏见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人民。我们来看一看我国革命者同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诚然，我国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先进分子都对当前的政治制度抱极端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障碍；但在这里必须考虑到下述事实：知识分子虽然同革命者是很团结的，但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我国的知识分子总的来说远不是革命的，“暴力的行动方式”根本没有赢得他们的同情。时常可以听到自由派说，《莫斯科新闻》这一类报纸的保守主义和革命者对他们都同样是格格不入的。谁如果想核实一下，不妨读一读例如洛里斯-梅利柯夫时代的自由派报纸《往事》和《俄罗斯新闻》等等。总之，无论社会，更无论人民，同革命运动都不处在那种可以

把这运动称之为社会的成熟政党的相互关系之中。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这种改变的基础是有的。但是许多人奇怪地错把可能当作现实，这大多是由于某种程度的狂热性所造成的。

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作一点小小的说明，以免不同的敏感的读者误解我的意思。我并没有那么极端地否认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同情革命者，尤其是同情他们活动中的某些行动的人，我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地否认几乎整个进步知识界对革命者的道德品质有着正确的评价，而且对于他们的某些行为是出于不得已，大概也是理解的；但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冲淡我们的下述想法：在我们的社会中还远非多数人都抱有革命的世界观并完全同意革命者的纲领，而且令人感到可惜和遗憾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抛弃有可能和平地向前发展的确实天真的信念。

一个运动成熟的程度和力量的大小，还可以用它对国家生活的进程、对内政的发展、对行政警察措施、对改变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影响程度来衡量。如果用这一尺度来衡量我们的革命运动，我们就应当承认，我们的革命者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在某些时候我国政府全力以赴地去消除革命，可见敌人是认为必须认真对付运动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里必须作出某些说明：首先，政府紧张地大力对付的是恐怖行动，这是出于它的狭隘的保命的本能，另一方面，政府加紧迫害革命者并不仅仅因为认定他们是一股实际的力量，而且还因为他们是一股精神力量而对他们感到害怕，力图消灭他们在社会心目中的吸引力，以便不让革命运动有可能因此得到加强。自我牺牲精神和忠诚不仅在大批人身上同时表现出来的时候，而且在个别人物有这种表现的时候都总是感动人的。他们的形象万古留芳，最优秀的天才诗人为之赋诗歌颂。

我们讲了上面的一切之后，我们敢说我们有权认为俄国革命运动还只处于萌芽的、胚胎的状态。

然而我们的革命者常常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在他们的心目中有时觉得简直是万事具备，甚至认为党没有必要为革命再做什么准备工作，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他们认为人民已经准备好了，时机一到就会同革命者携手前进。例如《民意报》第 819 号写道：“客观事实完全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同社会革命政党打击政府权力的同时，人民越来越仇恨特权统治阶级，并坚决要求彻底改变经济关系。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这种有利的相互关系，使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相信，革命组织一旦有能力实行政变，人民就能完成经济领域的革命，夺取政权的临时革命政府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批准人民从他们的世代压迫者、剥削者手中夺得的经济平等……如果形势不那么有利，那么临时革命政府除了在政治上解放人民，建立政治设施以外，还要实行经济变革(?)：消灭土地私有权和大型生产工具私有权。”

认为革命党已经具备这种力量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因为在上述同一号报纸的同一篇文章中有如下的话：“是的，3月1日的事件非常明显地证明了文明阶级的极端软弱无力。当政权在齐心协力的冲击下惊慌失措、陷于混乱、准备作出一切让步的时候，只要再加一把力就能推翻万人唾弃的制度的时候，文明阶级却一动不动地袖手旁观。”

民意党人既然如此绝对地认为文明阶级是软弱无力的，本来应当指望他们会努力设法依靠人民。但是隔几行又说：“……我们不打算组织农民……”。把上述一切放在一起作一个比较，你们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极为吃惊的现象：一个认为文明阶级极其软弱无力，又不打算组织农民群众的党，却指望靠自己的力量来实行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可是它从哪里吸取力量呢？说实在的，一个由个

别的反抗分子组成的党，无论它如何严整团结，要作出这种确实神奇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对现有的力量估计过高才会落到如此地步。

不能认为这篇文章是个人意见的产物，因为在执行委员会的纲领和其他各号《民意报》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论点。例如在执行委员会的纲领中说：“党的直接任务是夺取政权，其目的是以立宪会议的形式把它交到人民的手里，立宪会议虽然远非理想的完美形式，但在目前却是唯一可能的形式，立宪会议将根据选民给代表发出的指示来审议和改造全部社会经济制度。”党承担这一任务时仍然不直接依在民众中进行活动为转移，因为虽然在同一个纲领中谈到同人民的联系，但是显然这种联系被看成具有次要的甚至更次要的意义，这一点从《民意报》上把在民众中进行活动比作“往无底桶里灌水”和“鱼撞冰”等等就看得十分清楚了。对自己力量的这种估计，对革命分子作用的这种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现象，这正是民粹派同其他革命派别不同和界限分明的地方。民粹派虽然有许多缺点，虽然常常表现出狭隘、极端和片面，但是作为它的基础的原理却是十分合理的：“社会经济条件根本性的大变革，只有在人民对自己的处境采取自觉的、积极的态度时才有可能，党只有在成为人民的有机的代表时才能成为一支力量。”首先，这一原理完全不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排除现有各革命组织的主动性，其次，唯有这一原理才是民粹派的特殊标志，而根本不是否定政治斗争，因为自从分派以来民粹派的纲领从来没有否定过政治斗争。

民粹派曾在一系列指导性的文章和特别纲领中多次向公众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其中《人民党纲领》流传最广，它首次发表于1881年8月，两年后又印了第二版。我们不妨拿这个纲领来看一看，根据我们的意见可以做些什么重大的修改和补充。

这个纲领说，“在俄国只有农民具有完全明确的理想即‘土地

和自由’，而这一理想同当前的国家和社会的原则是大相径庭的。”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即农民的世界观是否完全成熟和明确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土地和自由”的原则是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的一个简括的公式。至于说到这个公式的前半部分，即经济方面，那么的确，我国全体农民都是相当热衷于必须把土地交给劳动居民的思想的。劳动原则是我国农民的基本特点之一，这差不多是已由学术研究客观证明了的。但就是在这里也不能认为俄国全体劳动阶级是一模一样的：这一原则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在大俄罗斯是同村社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而在乌克兰等地的人们中则是同个人主义的倾向结合在一起的。村社的传统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表现，采取不同的形式。当然，根据这些情况，建立在集体原则上的制度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地各不相同。同时不能忽略这样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即认为我们的村社原则是应当予以摧毁的旧时代的残余；然而即使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也仍然认为国家和知识界的不同态度可以决定上述原则的不同命运，因此，虽然存在着大批持类似观点的人，能对纲领中提出的“土地”原则的评价加以很大的限制，但却不排除这个原则，而且可以把这个原则规定为一个社会派别的口号。“土地和自由”的公式的后半部分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自由”的原则根本不是什么明确的政治要求，明确的政治制度。我国农民在独立处理家务并在一个村和乡的范围内进行自治多少还有点在行，可是对超出这种比较狭小的地区之外的事务就完全无能为力了。不错，有人说，现在就已存在着一些拥有数十万社员的农民村社，特别是在北方。但是，第一、这些村社是极少数的例外，而且正在逐渐瓦解，第二、虽然存在着这种村社自治单位，但仍然不能保证人民将来会有理解全国性问题的能力，当然，如果这一现象相当普遍，那会是一种相当可观的基础，能使我国农民群众的政治思想

迅速得到正确的发展。

“自由”原则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一原则表现了对政府的压迫和官吏们的官僚压制的否定态度。由于我国的农民认为全体官吏和行政机构只不过是国库的代表，认为他们的存在对自己没有什么实际好处，因此自然就造成了对他们完全否定的态度。老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认为人们的各种关系的最近的形式应当是无政府状态这个否定一切国家因素的形式，消灭行政、立法、法院等等的形式，因此认为“自由”的原则所包含的内容完全符合他们的倾向。假如“自由”的原则包含有否定一切现存的国家形式和法律形式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只要让这个原则充分自由地实现，你就会看到无政府王国的出现。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对待这类观点的态度，正因如此我们觉得，“土地和自由”这个公式的后半部分缺乏建设性的内容，这使我们同《人民党纲领》对问题的看法不可能一致。我们认为，只有知识分子对群众和我国政治发展的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才能在农民中树立完全适合生活条件和能够成为行动纲领基础的政治理想。

不错，纲领的下文谈到，人民的政治观念尚未充分形成，因此党必须加紧宣传由经济制度的理想形式中合乎逻辑地产生的某些政治原则，即各民族独立的原则、村社自治和村社自由联合的原则。纲领的这一部分似乎是对那种断言农民具有明确的世界观的说法的一个修正；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上述意见并非多余，因为甚至在思想激进的公众心目中，许多论点也会由于抽象而往往失去生命力。例如，村社自治、自由联合等等这些经常使用的术语就是这样。这里有一些几乎从来得不到答案的问题。自治是什么意思，自治的范围如何，“村社”是指什么样的单位，是不是同目前的经济单位即村社单位还是同居民的某种行政划分大体上一致，由什么或由谁来调整这种划分，如何实行村社联合，如何实际体现这种协

商的原则？如果谁想了解纲领规定的那些需要加紧予以宣传的政治要求，那么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认为，首先，已经提出的这些政治原则完全不足以使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广泛普及的政党；其次，用其他术语来代替村社自治、自由联合等术语将更为合理，因为这些术语已被无政府主义者用滥了，成了同国家法和政治领域的现代概念可以说毫无共同之处的、脱离现实的东西。

让我们援引一本小册子里几段很有意思的话，这本小册子是十年前出版的，题为《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协会致俄国革命者。第一号》。“从否定观点或从破坏观点出发，我们要：消灭破产，完全消灭国家和使国家得以存在的一切条件；消灭对偿还集体或私人债务、对遗产继承的任何干涉；取消一切赋税；废除上下各级行政机关，废除等级、官僚、军队、审判官、警察、大学和僧侣，取消私有制的各种特权……我们要完全废除行政、司法、立法权而代之以普遍的革命事实……从建设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无论是对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来说，还是对形成起义群众同反动派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所必需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来说，为了实现人民要求的同一个原则而举行起义的各革命团体都必须自动组织成为革命村社，而不顾国家的行政区划和国界……”（第6—7页）。这些原则是作为无条件的要求提出来的。这本小册子还说：“俄国革命者们！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敢于伸手援助其他革命的人，将被认为是人民革命的叛徒。我们将耐心地等待俄国人民把老爷和奴隶的王国一举打得粉碎的时刻。我们将每日每时诚实地、奋力地工作，以便使朝思暮想的时刻早日到来……”。（第12页）

从上面引述的段落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者把问题看得简单到了极点。很明显，一旦完全废除了行政、司法、立法权，消灭了国家生活的一切表征，上面提出的关于村社自治和村社联合等问题就毫无意义了。各个团体在我们想象中是非常具体的，它们相互

之间没有任何外在的联系，因为所有这样的联系都应当被消灭，因此，各个团体也就只有自由协商了。

然而，描绘千篇一律的图画要比处理国家机器的千头万绪的复杂的各个方面容易得多。如果不是把村社自治理解为无条件地否定当前的社会生活的一切外部形式，而只是理解为村社、区和其他行政单位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自治和在国家管理方面的尽可能大的分权，而把村社的自由联合理解为村社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关系的形式，即在这种形式下凡涉及几个村社的事务都应由村社的代表机关予以解决，总之，如果把国家结构的类型理解为近似瑞士的或美国的那样一种类型的制度，那么《人民党纲领》提出的政治原则确实应当成为根本性的纲要，而且由于这些原则有其相对的性质，所以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也就不要求马上作出答复。

上面所提到的自治和分权的原则不能囊括纲领的全部内容，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代表制原则的意义、国家的社会生活领域同由其他调节器起作用的领域的相互区分、财政制度、军事力量的组织、国际关系的形式、贸易条约、国民教育的调整、教会同国家的关系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近期得到解决。

这里当然不是涉及这些问题的地方，因为这需要专门加以研究，而且即使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也只能大体上得到解决，带有一定程度的或然性。在这里一般地谈谈国家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倒是比较恰当些。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地下出版物中已经多次提出过，而且同其他几个问题一起成为合并各个革命团体为一个组织的绊脚石。例如，几个过去曾是“土地平分社”的成员，现在在国外组成了“劳动解放社”，他们声明说所谓的“夺取政权”的问题妨碍了他们同民意党合并。发表这个声明时还准备发表格·普列汉诺夫的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文章。我们完全可以期望，可敬的作者会详细地、正确地分析预定要谈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只是

顺便涉及一下这个问题。《民意报》是首先认真谈论国家意义的一份报纸，但它在对国家因素的解释问题上未能始终一贯。“执行委员会”的纲领和“民意党”工人党员的纲领在各自提出的关于革命运动进程的设想中对立宪会议的作用持完全不同的看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前者认为立宪会议的任务是审议并改造一切社会经济制度；工人纲领却认为只能承认立宪会议有批准作用，而且还是在通过革命爆发消灭了一切经济关系之后，在土地、工厂和其他生产手段转入劳动人民手中之后。然而，第一种意见被认为是在民意党人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有不少文章这样论证说，因为出席俄国立宪会议的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代表将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所以可以对一切社会关系实行真正的改造（见《民意报》第2号）。

在以后出版的几号《民意报》上，照我们看来，政治问题的提法要合理得多，至少从那些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则意义的文章中看起来是这样的。直接夺取政权并通过这一点完全改变现有的社会准则的可能性的问题退居次要地位，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过去的土地平分派同民意党人由于这一问题而发生分歧的事实似乎是令人感到奇怪的，而且这件事发生在不久之前——今年9月才宣布成立“劳动解放社”。然而在正式的出版物中，政治问题较之过去有所不同，例如《民意小报》第2号中说，尽管在得到立宪保证以后自由派同革命派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的道路在当前却是完全一致的，总之，这里已经不再谈论国家，说掌握在人民代表手中的国家将是一个能完全规定社会关系的因素了，这里只谈俄罗斯国家——这个国家的社会就其发达程度和政治思想来说早已越过了目前的无限专制君主制的形式——所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权利了。众所周知，这也就是自由派的要求。

我们已经指出，这一观点之所以更为合理，与其说从一般的理论探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不如说就其适合于当前的情况，适合于

现有的革命斗争手段这一点来看是这样，〈民意小报〉第2号中说：“不妨让地方自治机关的人们记住，我们只有一个手段，那就是恐怖。”关于社会各因素的依赖关系问题的理论意义，并不总是得到革命者的一致理解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总是倾向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学派，因此我们认为无须在这里多说。同样，下述思想差不多已经得到客观的证明：既然居民积极自觉地对待自己的需要，既然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谋求一定的国家形式，那么国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保护者了。阿克雪里罗得发表在〈自由言论〉上的一篇文章对这些论点作了虽然十分简括但却相当精采的阐释。我们完全同意这些观点，因此我们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要在法庭上宣读捷拉洛夫的辩护词，因为他说，如果提供某些法律保障，革命者早就会放弃人民暴动的组织工作，走上合法主义的道路，请注意，这是在我们俄国，而人们早已知道，甚至象美国这样有着充分自由的国家，工人还认为社会问题只能在街垒上解决。

而在俄国，政治气氛是如此沉闷，政权压迫是如此巨大，社会思想是如此被窒息，唾弃一切并被人唾弃的托尔斯泰先生之流是如此厚颜无耻，以至于连极为有限的、最起码的政治自由的要求都没有。的确，正如〈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出版广告中所说的，即使不是革命者，也会对俄国的君主制感到内心的无比仇恨。必须争得这种起码的人权的问题不可能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一个某一党某一派的问题，这是俄国所有进步派别的任务之一。对俄国社会来说，政治自由不象在西方那样是第三等级发展的必要因素，是更充分地实行行动自由原则的必要因素。国家的监督和干涉在欧洲曾经是对日益发展的工业化主义的障碍，工业化主义最恨政府的压迫束缚。承认“人权”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全身心贯注于全人类的要求，认为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将会带来幸福，带来“利益的普遍和谐”。

总之，政治自由的问题在西方是一个阶级问题，一个有物质基础的问题，一个依靠由文化发展过程自然形成的、由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紧密团结和联合起来的人们的问题。我们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政治权利和自由不是某个社会阶层的要求，而是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就是说，是一群并不是由共同的物质利益而是由共同的精神利益联合在一起的人们们的要求。我们的这种特性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我们的资产阶级分子很可能不会象在西方那样壮大和那样发展起来，不会使劳动者同生产工具彻底分离并从而消灭正在显示出来的村社原则和劳动组合原则的意义。另一方面，正因如此，激进的政治革命不会成为我们这里的社会运动的中心，因为不存在物质利益一致并认为破坏政治制度是关系到自己“存在与否”的那样一个社会阶级。我们这里唯一可能的阶级斗争——人民同剥削者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形成和发展到具有政治性质的程度；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上还很不开展，还不能把国家看成是实行根本变革的强有力的工具。当然，人民应当走上这个发展阶段；但不应闭眼不看事实，应当承认，这是未来的事。现在，政治斗争只能限于争取某些起码的法律保障，因为孤立的或甚至得到人民中间某些最敏感分子支持的知识分子，尽管怀有严肃的政治愿望，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只能使政治制度作某种限度的改变，争得一定的思想自由，迫使政府同意社会参与国事，消除目前行政当局专横跋扈，总之，得到自由派渴望得到的东西，但这远远不等于作为阶级对立的表現的那种政治斗争。然而，即使这一点也只有在我们的自由派（个别少数为祖国认真工作的人除外）不再抱消极萎靡和懈怠情绪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当然不能指望自由派的这种慢性消极病自然而然地消失。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那就只好极其长久地等待下去，等到社会里大多数人的精力自然而然地充沛起来。可是很难设想有比这种无所事事、把一切希望寄托于

历史的自然发展的状况更不道德的事了。

如果要依靠知识分子，那就必须由较有反抗精神的人把自己的毅力灌输给他们，必须鼓起他们的反抗精神，和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帮助他们认清迫切的社会问题。通过这种办法，而且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在我们的自由派社会中取得某些积极的成果。

在进一步发挥我们的见解以前，我们想先谈一谈我们如何看待政治恐怖的作用。我们过去已经说过，民意党人根本没有想把恐怖手段当作表明他们全部特点的手段。然而，如果细心观察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从“民意社”出现的第一天起，在他们的实际活动中恐怖手段就占有中心的地位；虽然他们并没有忽略其他的活动方式，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他们的其他活动方式是起次要作用的。再者，我们已经注意到，最近几号《民意小报》说：假如自由派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人员不帮忙，革命者就只有恐怖这一个手段了。总之，对这一手段作出一定的评价也就是表示对“民意党”的一定的看法，至少是表示对在它存在期间的实际活动的一种看法。我们认为，恐怖手段曾经是现行政治制度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因为在此以前反动派一直压制一切求生的愿望，无耻地践踏最起码的人权，所以用暴力来回答暴力（虽然用这个词来说明恐怖手段不很恰当）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不致使自己名誉扫地，才能保持派别的道德尊严。暴君的野蛮暴虐有增无已，专横霸道到了极端无耻和丧尽天良的地步。这里我们引《民意小报》第2号的如下一段描写：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警察局长在流放犯羁押监狱接收继续解往伊尔库茨克的人犯时，对柳巴托维奇说她在这里必须换上囚衣。这位妇女断然拒绝履行这个要求，她的理由是她从彼得堡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直穿的是自己的衣服，并没有人过问。由于她坚

决反对，警察局长便决定使用暴力。在他的命令下几名狱卒和十个女刑事犯(她们是警察局长特地叫来的)向她扑了过去。于是出现了一副极端野蛮的令人愤慨的情景。这伙人打她，撕她的衣服。她在能站立的时候还勉强自卫，可是一名狱卒穿着大靴子一脚把她踢倒，于是她遭到了更加无情的拳打脚踢。她自己对这场暴行是这样描述的：‘我陷入了一种麻痹的状态。我若断若续地记得，狱卒穿着沉重的大靴子抡起脚踢我赤裸的胸脯。一个人揪我的头发，打我的脸，最后，当着男人们的面我被剥得精光，平放在地板上，我就象被强奸的女人一样感到无比恐惧和羞耻。那群逞凶的下流东西由于害怕自己干下的勾当而跑掉了。我苏醒过来以后，看到周围只有面色苍白、无比愤怒的同志们和全身歇斯底里般抽搐的凡尼娅。’”

只要还发生上述一类的事，不管理论上和原则上怎样议论，恐怖活动就还会存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恐怖活动方面颇负盛名的人物，如维拉·查苏利奇、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等，认为恐怖手段是一种合乎道德的惩罚行为。然而，“民意党”的代表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一观点，他们力图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述，阐释它的原则基础和理论根据。

他们首先将恐怖活动看成是一种能够瓦解政权、使我国的行政警察机构发生混乱的手段。的确，同其他严肃的斗争手段相配合的恐怖活动在这方面可以起到颇为显著的作用，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手段，它的意义就大大降低了，疯狂的反动派是不择手段的，于是最优秀、最生气勃勃的反抗力量常常被反动派的狂风暴雨席卷而去。此外，他们把恐怖活动看成是社会反抗的动力，看成是一种表示不满的手段，能够团结和联合分散的不满分子的手段。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有部分道理，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里有些夸大。而且民意党人自己就承认了这一点，〈民意报〉第8—9

号就说过，他们原来对8月1日事件的期望要比实际发生的效果大得多，说文明阶级非常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无能，他们的奴才行为和顺民习气暴露无遗，因此甚至连刺死沙皇这样一件大事都没有能促使我们的自由派行动起来，说他们“当专制政权惊慌失措时一动不动……等等，等等”。《民意报》自己就是这样来评论恐怖活动在这方面的效果的。

最后，还讲到恐怖活动对人民的影响，说革命者的活动这样有力地表现出来会启发人民的思想，促使他们以批判的态度来观察周围的现实，促使他们认真考虑目前的制度，从而为锻炼民众中的反抗力量奠定基础。如果在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不存在目前这种鸿沟、这种互不了解的话，这一切就是正当的。人民把全体知识分子都看成是敌人，把他们的革命活动常常看成是老爷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那里胡闹，如果知识分子同人民之间的这种相互隔绝状态继续下去，其结果就很可能会在人民中间掀起甚至是反对革命的运动，而运动将招致政府更加反动，人民的觉悟更加不能提高。有些人认为，尽管如此，在彼得堡和其他中心城市发生一定的政治风潮的情况下，可以用号召书、宣言等等把人民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我们认为，只有幼稚的思想才会认为用这种手段可以改变人民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观。我们认为，只有知识分子长期切实地去影响人民，再加上人民在政治上的普遍开展，才能结束人民同知识分子互不了解的状况，并从而保证恐怖活动之类的手段产生效果。

即使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的活动在建立有机联系方面、在对他们的切身影响方面、在占据社会中一定的巩固阵地方面有所成就，即使能够建立起自由派的真正反抗的团体，即使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城市机关、学术机关和其他机关对政府提出一定的政治要求，即使这一切都能做到，革命者仍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的纲领限制

得如此狭窄，因为第一、这种活动的成果将是有限的，第二、同自由派交往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根本不排除革命者同时去影响农村居民和城市工人（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谈到），通过这一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未来的政治设施的作用，因为那时这些设施就会不仅是实现知识分子任务的手段，而且是保卫纯粹的人民利益的人们的一种工具和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学校。

在自由派中间进行活动同在农村居民中间进行活动之所以并不互相排斥，是因为不能仅只注意首都和一些大中心城市的知识分子，因为尽管这些城市的知识分子的智力发展水平比地方上的知识分子要高，但是没有后者未必能指望有什么成就；正因如此，革命分子不仅要在大城市进行活动，而且必须分散到地方上去。必须结束革命者目前的这种保守秘密的狭隘小集团的闭塞状态，当然这完全不排除这些革命力量的一定的组织性和一定的团结精神。相反，一个组织不仅应当吸收一个地区的人，而且甚至应当吸收相隔数百以至数千俄里的人。这样一来，一方面既可以使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可以合理地把他们布置在中心城市和地方上，同时当然不会再有象以前有过的那种事先制定的死板公式，而是既规定他们的活动类型，又规定每一个人应当根据客观需要以及个人爱好和习惯去什么地方占领阵地。从壮工到文化高的人都会是有用和有益的，这使许多人有可能接触农村居民和城市群众。

有些人不同意这一点，说这都很好，只是缺少一点，即缺少人民同知识分子交往的可能性，说正是由于认识到没有可能去影响人民，所以才提出政治斗争的问题，等等，等等。这种反对意见非常普遍，而且骤然看来似乎是对的；但是只要进一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意见是出于误解。首先我们确立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根本不能把我们的革命运动看成是已经形成的运动，因此不能过

分重视这个党在 1873 年至 1874 年间到民间去的这一类经验。然而，主要的还不是这些，主要的是，上述两年到民间去的运动同目前民粹派心目中的在民间进行活动的做法只是名词类似，内容却大不相同。以往把在民间进行活动理解为是流动的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或者理解为是组织暴动以便建立能够在最近时间里从事消灭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直接的战斗组织和干部队伍。后来的也就是目前刚刚兴起的民粹派（我认为这个名称仍应保留）对自己的作用和任务的看法要谦虚得多。他们力图在发展的初期只和人民交往，使知识分子深入人民，尽可能了解人民的需要，通过各种办法帮助他们，取得他们的好感，而在狭义上的革命影响只施加于较为优秀的力量。当这一目的达到以后，才谈得到进一步施加影响的方式——组织暴动、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在工厂和农村采取恐怖活动等等。上面所说的绝不排除目前参加这种反抗方式的可能性，但要具备：第一、革命基础，第二、革命者和群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取得某些成功的保证，这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成功，而且也是指人民的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提高。然而，根据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况和理论上的估计，同时具备这一切条件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不会达到可以把民粹派的直接的战斗活动看成是典型活动的地步。

在上述这种情况下，争取政治保障的斗争将只是民粹派全部活动中的一个环节，这一斗争将更扩大民粹派的活动，并逐渐弥补由于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长期隔阂造成的缺口，那时人民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可靠的、强大的力量，这一力量将可以同现行的社会制度较量一番，把这种制度消灭并代之以新的制度，即建立在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制度。

应当再补充一点：我们认为无论如何不应对知识分子的纯文化活动，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对文学和政论等等持否定的态度。有人会提出异议，说我们提出的活动面太宽了，在力量相对地

说还不大的情况下最好集中在一种活动上。然而这样的集中是不会有的，因为在一个革命派别发展不够的情况下规定一件客观上得到大家赞成的事是办不到的。应当为个人和小组发挥主动精神提供广阔的天地，这样可以避免人为地集中力量于一点而遭到完全失败。此外，这样集中力量在运动缺乏纪律性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新的极端和片面性，我们已经指出，这是俄国激进派别的特点。

最后，我们想回答一种非常可笑的，但可惜相当普遍的反对民粹派的意见，他们说民粹派提出的道路费时很多而又很漫长。对此，我们只有说：请你们指出并证明有更为迅速的道路，我们就赞同你们。

译自《革命史文集》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第3卷第187—202页。

试论民粹派纲领^①

我们的出发点是如下的原则：只有使群众的社会经济革命同中心城市的政治变革结合起来，才能根本改变现存制度，而且后者应当从属于前者，应当是对于人民运动的响应，而不应当是独立的行动。

社会主义者民粹派对俄国生活现有各种成分和各种纲领的态

① 这篇文章是1884年下半年由某个民粹派小组在圣彼得堡刊印的。作者不详。
——编者注

度，就是据此确定的。

我国居民主要是农民。在农民中进行工作的总目标应当是使之明白了解人民的社会运动，并尽可能使人民准备组织起来——建立独立的人民宣传活动，加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联系。只有在个别的场合，组织以农村恐怖或地方暴动为最近战斗目标的个别小组才是可能和合适的；这里应该由居民本身发挥主动精神；我们的事情只是指出最好的方式和可能的结果。

目前城市工人的数量太小，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单靠工人的力量、没有农民的协助就能进行可靠的变革。因此我们目前只是把城市工人看作在农民中间传播革命思想的人，我们在城市工人中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心城市展开宣传工作，然后把全部新增加的力量派往农村。只有以后，当完全保证农民群众能同情变革的时候，工人才能发挥政治作用。关于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组织罢工、请愿、工厂恐怖等等活动，可以说与在农民中间进行的工作一样。我们既不激发他们，也不制止他们，只是努力以最好的方式来因势利导。

在军队的士兵中间进行宣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派经过训练的工人渗入士兵中去，通过军官去影响士兵中某些知己的人。但是最大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军官身上，指望他们以自己对群众的道义影响，不用事先的宣传就能在某一选定的方面产生压力。

在特权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我们的注意力应当放在宣传我们的思想和吸收新的力量上；我们无论如何不要把它们集中起来，相反，我们要努力把它们组织成为地方小组。

至于各种社会纲领，那么作为它们的出发点的基本任务有三个：（1）准备人民土地革命，（2）宪法，（3）夺取中央政权。

我们对第一个任务的态度已经说过了。考察其他两个任务也就能决定我们对现有一切派别和党派的态度。

我们承认自由主义者关于限制一切形式的政府专横行为的要求是适当的，有益的，但我们对宪法的弱点——保护有产阶级而损害人民——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我们对于宪法只能持消极和观望的态度；我们只限于思想斗争和评价宪法的优缺点。

既然宪法已经存在，我们将努力适应新的条件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或者完全用军事方式，或者通过中心城市的工人革命，才能夺取中央政权。我们认为这种行动只有在它是农民群众运动的终结时才是适宜的，因此我们拒绝参加完全靠预先的阴谋来夺取中央政权的行动。但是假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不参与的情况下发生，我们将适应形势，在国民代表会议的选举中宣传社会主义精神。

最后，关于作为迫使政府让步的办法的政治恐怖，我们必须说，我们不认为它在这方面会有成效，因此我们只容许在下列条件下的政治恐怖行为：（1）农民居民自己在地方行政当局中选定了对象；（2）社会在最高行政当局中选定了对象，而他们的死不会引起人民的不满；（3）在对密探进行自卫的场合。

社会主义学说致力于谋求劳动群众的利益，宣传为保卫劳动群众的利益、反对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而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坚强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社会主义为之而高举自己的旗帜的人民群众才能提供。在西方，大多数工人居民是工厂工人，而且他们是最成熟和最积极的成分，因此西方社会主义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面。在我们俄国，绝大多数居民则是农民，因此俄国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对农民群众的影响问题。

为了阐明我们对当代人民的状况的看法，对于在人民中进行活动的任务和方法的看法，首先必须谈谈人民的历史命运。

俄罗斯斯拉夫人的古老村社和德国人的村社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差异如下：(1)在斯拉夫人的村社中不严格地祭祀祖先，(2)斯拉夫人的村社与一定的地区没有密切的宗教联系，(3)斯拉夫人的村社中没有悬殊的阶级差异，其成员单一得多。我们不准备分析这些特点的来源，下述事实始终是无可怀疑的：俄国村社具有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性质，它保留的原始平等关系，比德国村社所保留的要纯正得多。后来，由于征服的因素很少，贸易不发达以及居民有迁移的充分自由，它也还是长期保持了这种平等和自由的特点。

瓦兰人^①的到来没有使我国产生封建制度，而只是带来了大公和武士这一政治因素，这种政治因素在很长的时期内与人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很少触及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贸易不发达，经济的不平等也表现得很少。最后，自然条件完全相同和居民迁徙没有内部和外部的障碍便产生了移民和自由交往的特性，这种特性成为俄国人民旧生活制度的显著特点。这一特点体现为自由的土地村社和自由的劳动组合这种形式。个人是自由的，他交往的人也是平等的人，由此产生了最广泛的公正和平等的关系，任何人在了解了这些生活方式后都会感到惊讶。

但是这种道德是由外部条件即居民成分相同和没有压迫因素产生的，它不是依据内在自觉批判的原则。因此当外部暴力表现为国家政权的形式，后来又表现为资本的形式，更确切地说，表现为富农的形式时，这种道德是非常消极的，在与外部暴力作斗争中是没有抵挡能力的。

当莫斯科国建立了强大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压迫人民时，人民的反抗便高涨起来，居民普遍逃走，在外地，则按照惯常的原则自由地组织起来。留在本地的那一部分居民起初成为土

^① 瓦兰人是俄罗斯古代对北欧诺尔曼人的称呼。——编者注

地的奴隶，后来成为地主的私有财产，受地主的摆布。个人因素在人民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旧的支柱被弄断了，但并没有消失。

如果说对于地主来说农民只不过是无权的奴隶，那么农民在自己人中间却是享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一员。土地村社保留下来了，劳动组合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诚然，现在广泛理解的公正往往只运用于平均分摊国家的负担或老爷的要求方面；村社已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性质，但是还保持着对公正的理解和劳动组合的习惯，虽然是消极的公正；古老的生活方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保留了它的核心。农民解放后生活条件立即急剧地改变了；农奴制的桎梏去掉了，但从前的自由生活条件没有恢复——土地已不充裕，而是很少很少；必须开辟新的生活道路，出现了对个人主动性的要求——旧的习惯的生活方式显得不够了。这时我们看到，旧的村社基础正在逐渐破坏和崩溃，个人的自私自利的因素占了首要地位。村社在逐渐衰落，正在失去自己的生气勃勃的本质，往往变成一种枯燥的、几乎是办事的机构；富农阶层兴盛起来，渗透到人民中间去，破坏人民的道德和经济基础。这个过程正在进行，有些地方快些，有些地方慢些，还不知道这一过程将发展到什么程度，但不能否认两种现象：表现为村社生活方式的习以为常的旧道德在逐渐消亡，表现为富农形式的粗暴的利己主义兴盛起来。第一种现象在与第二种现象的斗争中是无力的。只要深入地了解劳动组合行业的历史，就可以确信，劳动组合方式轻易地对资本的压力让步并屈从于它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村社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村社中由于某些条件而产生了经济上强有力的人，他们把大多数弱小的人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们。不能从这一方面，不能从旧的村社期待积极的反抗和向好的方面的转变，因为这种社会形式本身太消极了。我们来看看人民反抗的积极形式是什么样的。第一次人民反抗的形式是旧教派的分裂。分裂派在产生的时候

对于国家政权完全持否定态度，并宣传与之进行斗争；我们看到，分裂派教派与积极反抗的人们——哥萨克和自称为王者结成了联盟。但是由于分裂派是根据宗教，而不是根据实际提出问题，他们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要求，逐渐流为形式主义，失去了自己的积极性质，在很大程度上顺从了国家，部分分裂派成了以商人和旧教徒富农为代表的国家一边的人。

与分裂运动并行的是人民群众的运动。从十七世纪开始，农民骚动连绵不断，但只有两次人民运动的浪潮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威胁到了国家制度。人民运动的发起者经常是哥萨克——自由的、流动的分子。人民运动在农民中是有基础的，因为农民普遍仇恨农奴制，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民运动总是在沙皇制度的模式下进行的。人民仇恨地主，相信沙皇，并不是因为他们坚信沙皇是善良的，只不过是需用他来体现自己的理想和宿愿；关于沙皇制度的思想具有纯粹浪漫主义的性质，完全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一经获得明显的体现，就立刻以一种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群众，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去；但这种幻想只要在现实中一碰到钉子，就象迅速产生一样迅速消散。我们看到，在自称为王者最初几次遭到严重挫折时，人民群众的运动立刻就土崩瓦解了，因为它没有坚实的基础——自觉的、坚强的理想。我国的大规模暴动只不过是在对沙皇制度的幻想的引诱下人民复仇的浪潮；这种幻想一破灭，便组织溃散，运动衰落，很容易被镇压下去。

现在人民生活的条件大大改变了，在人民中间正进行着巨大的、虽然暂时还是不明确的工作。这里可以看到两股力量：唯理教派运动和土地运动。最近二十年道德的混乱达到了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致必然要寻找出路，要求把新的概念变成一定的体系，如果说一部分居民可以满足于粗野的利己主义和填饱肚子的理想，那么对群众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理想是达不到的。于

是出现了某种道德方面的要求，产生了史敦达教派、鞭身派教派之类的人民唯理主义。人民的唯理主义是从主观方面来看问题的，它从宗教观点出发，把问题放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由于社会生活和实际公正的旧习惯根深蒂固，新的教派变成为十分具体的、实际的同时又是公正和自觉的社会形式。在这方面把我们的教派和西方的战栗教徒、格尔古特教徒、震教徒、圣经兄弟、马蒙教徒等各种教派加以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这种比较对后者是不利的——在那里社会形式具有更加人为的、不自然的、特殊的性质。在我国，村社保持的时间比西方长得多，形式也更纯，我国没有罗马法的影响，在西方，罗马法在私有制和个人主义方面起了压抑的作用；此外，宗教的因素在我国不象西方各国那样带有恐惧死后生活、关心拯救自己的灵魂那种压抑的性质。因为我们现在的教派具有比西方健康得多的形式。但是它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忽视了与现存制度积极地进行斗争；它只依靠自我教育，宣传在现存的国家生活制度下来实行公正的生活制度。如果这时教派运动没有遇到有利的土壤，就必然会碰到巨大的障碍，而很容易倒退。这种情况在史敦达教派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一教派最初的兴盛已大大地衰退；诚然，没有材料说明史敦达教派在增长，但是内容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却是无疑的——以前对生活的生动理解按德国史敦达教派的方式让位给了洗礼教派的形式主义。那些只想依靠人的内心世界的运动常常是这样；在几百年间退化成为纯粹形式主义宗教的佛教和基督教这样一些重大现象也是如此。在缺乏有利的外部条件的情况下，要使一种思想长期保持在应有的高度上，需要极大的努力，极有力的鼓舞，而这对群众来说是不可能的。具有目前形式的宗教教派在我国可以起巨大的作用，可以恢复从前对公正的生动理解，把道德要求变成为严格的自觉的体系，建立人民未来世界观的积极因素，但是单有一个道德运动是不

够的；还必须在外部条件方面为它扫清道路，把人民生活置于牢固和公正的经济基础上。

如果说已完全形成的教派类型不大适合于宣传，甚至趋向于采取保守的色彩，那么对于年青一代，对于那些尚未定型的人就不能这样说，这些人在宗教唯理主义者中间习惯于生动的思想探索，习惯于批判，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形式——在这里宣传积极的社会主义有可能遇到有利的土壤。人民的精神和思想最容易在宗教的基础上振奋起来。但是这种基础并不妨碍对事物有更生动的理解，积极性可以得到发挥。的确，在此之前我们看到，人民的思想经常忽视积极的因素；人民的暴动与骚动是复仇感情的直接结果，而不是批判思维的结果，相反，人民的思想经常具有主观的倾向，把内心的完善作为自己的任务，表现为禁欲主义，即禁绝肉欲、超脱生活等各种形式；但新的教派已向前迈了一大步——它已承认生活的要求，并尽力按照自己的精神来改造生活。还需要再迈一步——承认必须有为实现理想而斗争的进攻性（运动）；现在我们生活的一切条件都在把人民的思想引向这一结论。俄国的土地通过和平移民逐渐有了居民；由于这一情况，由于迁移很容易，俄国人民没有养成与敌对势力不断进行斗争的习惯：如果在一个地方过得不好，就到另一个地方去，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所以人民的思维也具有我们刚才谈过的那种主观性；如果生活不好，人民就逃避它，弃绝它；如果不能逃避它，就在自身内部，在神秘的形式中寻找满足。现在条件变坏了：迁徙自由完全受到了限制，但农奴制的束缚已被打破，停滞已被破坏，风潮迭起，需求在增长，思想在活动，思想已不能容忍原先的禁欲主义理想，对生活及其条件在加以批判。

现在农民群众逐渐分裂为三个阶层：富裕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富农阶层，平庸的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阶层和无地的无产阶级。第

一个阶层的利益使得一个特别的集团产生出来，而与其他两个阶层的利益越来越明显地对立起来。许多事实已证明，农民资产阶级正在越来越固定地形成起来，并正在发展自己的力量。它已渗透到地方自治局中去，近年来有些地方农民资产阶级甚至成为地方自治局议员的多数。如果这一过程继续发展下去（这是很可能的），那么从农民小资产阶级中将形成一个强大的阶层，这个阶层将会在地方的经济上掌握经济实力，控制自治局中的政治势力，无栖身之所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也可能受它的控制，最后，由于我国大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困难而很大一部分在工业中心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民无产阶级也将受它的控制。但富农阶层的力量和成长主要是依靠人民在现有条件即无地和苛捐杂税的压迫下遭到的破产；因此在农村小资产阶级这一坚实的阶层尚未牢固地形成时，最好尽快地将土地转入人民手中。

毫无疑问，平分土地的土地理想到处都存在；以前这种理想只具有幻想的性质，现在已逐渐变为具体的要求。土地运动还没有特别尖锐的表现，但个别的爆发时而在在这里时而在在那里经常发生。只有中心城市最平静，但郊区，或在东部，或在西部，经常发生骚动。乌法的贵族不久前请求政府特别注意居民的骚动，请求政府保护他们；在西部各省，托卡烈夫事件决不是唯一的事件；在罗斯托夫近郊刚刚派去了配备大炮的整整一个团去镇压农民。郊区与城区相比有其优越性，因为在它们对待莫斯科的态度中，也就是对待国家的态度中掺和着根深蒂固的民族因素，在南方和伏尔加河流域则有着以前的自由和暴动的传统。现在很难期望发生象从前的暴动那种形式的大规模运动；一个地方掀起巨大的浪潮，很快就席卷一大片地方。在此以前就开始的交通的改进妨碍了大规模运动的发生；现在有了电报和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别的暴动都会很容易地被政府立即派去的军队镇压下去。将来的人民运动必将具

有另一种性质；土地的理想具有越来越具体的形式，对土地的要求也变得更坚决，最后大部分农民，甚至全体农民将提出土地的要求；运动主要将不是依靠严格的组织，而是依靠各地人民群众的相同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完全是确定的，具体的，即夺取土地。推动这类运动的最后动力很可能是某种特殊的情况，如战争、严重的饥荒或其他事件。但是为了使这种人民运动获得真正的成功，导致良好的结果，必须使得对运动有更多的了解，必须使经济的因素和村社的理想，而不是单纯地消灭地主，成为要求的基础：即使将来土地转到人民手中，人民在消灭了地主以后还不会对自己人中间的富农给予应有的评价，不会提出村社土地所有制作为理想，这样，问题就会复杂化了；土地大部分将转到农村资产阶级手里，以后又不得不同它进行艰巨的斗争。还得有一个保证成功的条件——在起义的时刻使国家的政治力量失去活动能力。

在欧洲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十分自觉、要求具体的大规模农民群众运动，这就是十六世纪德国的农民战争和 1789 年的农民革命。在前一次农民运动中，国家的全部政治力量都起来反对这一运动，结果运动被镇压了下去。在第二次运动中，政权即国民会议虽然并不同情农民革命，但也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反对这一革命，所以运动获得了成功，封建制度一去不复返地垮台了，虽然就是这个国民会议曾企图尽可能保住这个制度（见卡烈也夫的著作）。

总之，有三个条件能够保证人民革命的巩固：（1）土地理想应当十分明确，并应具有经济要求的性质，而不是某一阶层的要求（不应当把农民与老爷对立起来，而应把雇工与包括一切富农在内的土地的主人对立起来）。（2）在运动中应当体现真正的村社理想，而不应体现把土地分到私人手中的要求。（3）应尽可能使国家的力量失去活动能力。

如果说根据新的自觉原则在人民中培养真正村社理想的任务

对我们来说太困难，这一任务最好由人民独立思考活动来完成，哪怕是宗教形式的思考，那么阐明人民理想和把运动引导到所希望的方向去的任务以及政治斗争，首先要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承担。

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即通过城市工人进行，他们较成熟，更容易接受系统的宣传，他们在人民运动的准备工作中能起巨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研究知识分子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进行工作的三项任务及其政治任务。

当民粹派的思想第一次深入生活，并吸引年青的力量去从事人民事业时，这种思想表现为所谓“到民间去”和组织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知识分子团体。人们热衷于这种思想，纷纷到民间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少、甚至完全没有准备，对于他们要在那里进行活动的新环境缺乏了解。从那时起留下了许多关于他们不善于工作的故事和回忆。有两个女宣传员一开始宣传就说反对上帝，并把十字架踩在脚下，为此被狠狠地揍了一顿。还有一个青年宣传员在酒馆里骂了一下沙皇，立即被送交官长。他们不会工作和没有准备，这且先不去管，应该说，冒充庄稼汉到民间去的思想本身作为普遍的宣传方法是经不起批评的。假装成另外一种人是很困难的，更不用说警察的阻碍了，农民们自己也不明白这些人的意图，对他们不能不抱怀疑的态度，只有个别例外的人很善于进行这种方式的宣传。还需要补充一点，对于大多数思想比较不坚定的、比较重视外边生活舒适的人来说，在这种艰难的、恶劣的环境中进行活动的前途是太没有吸引力了。最后，先是外部的障碍和警察的警觉就能使他们遭到牺牲，使他们丧失巨大的力量，而且这些障碍在逐年增大，在这种活动形式下对人力的需要本来又很大。在以前的革命者所提出的任务中还有其他一些错误。以前的宣传者到

民间去的时候相信在那里一定能找到现成的起义的基础，所以他们自己只宣传事情的否定方面，即破坏国家制度；他们说，所有积极的方面将由人民自己来创造。但他们痛苦地失望了，人民并没有准备立即起义，对人民进一步了解便知道，人民中间隐藏着多少缺点，在社会改造的事业中不能光指望人民的天赋力量。

这一切都迫使人们承认以前的拉甫罗夫主义和暴动的方式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而且我们看到，革命力量早已从这方面退到另一个方面去了。对于那些怀着宣传的目的作为普通工人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知识分子小组，应该说也是如此。我们刚才所列举的那些反对意见以及由这些小组内部协调和团结方面的困难所新产生的反对意见也都是这样。这些小组没有获得成绩，农民对他们持疑虑态度，与警察发生第一次冲突后农民便和他们完全疏远了，在这些小组内部产生了不和，于是小组便瓦解了。这类小组过去和现在都只能起消极的作用，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不过是建立在公正的原则上面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人民中间也曾有过另一种尝试——完全的秘密活动、组织战斗小组。奇吉林事件就是这类尝试中最大的一次。在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秘密活动中，在哥萨克的自由逃民分裂者之间的关系中，俄国人民经常表现出很大的机智和顽强，但是他们的特点是没有任何确定的纪律形式，秘密活动依靠的是内部道德的团结；他们联络的办法和途径具有非常实际的性质，但从未有过严格的行动规则，有联络的组织，但没有斗争的组织。人民的思想还不习惯于系统地思考问题，因此不可能提出有远见的、抽象的想法；人民只是由于受了影响或为了实现迫切的、非常具体的要求才行动起来。奇吉林事件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是因为农民们原先对沙皇制度所抱的幻想总是落空。但是这种因素不能成为秘密活动的普遍原则，因为它是不牢固的，是有利也有弊的，是容易遭到破坏并

引起误解的。要使人民中的秘密活动依靠牢固的基础，必须与人民保持真诚的团结，必须有十分明确的、具体的实际任务。由此可见，临时个别地组织战斗小组去进行个别的积极的反抗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由于内部的原因——人民不善于提出远期的理想——以革命的目标来普遍和系统地组织人民群众是颇为困难的；如果这里再加上为此而需要的大批力量，此外再加上警察所制造的困难，那么任务甚至是根本无法执行的。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排除在人民中间进行革命工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果不能系统地组织人民，那么可以同人民建立道义上的团结，其办法是影响人民中最合适的分子，造就农民知识分子，即较明白事理的那批人。如果同人民的这种道义上的联系能相当牢固地建立起来，那么在运动开展的时刻就很容易转变为一定的战斗组织。整个运动团结一致的保证在于人民的主要要求——夺取土地——完全相同和十分明确。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使运动具有内聚力，加深对运动的理解。如果这一任务不能完全实现，那么在加深对人民运动的理解的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具有巨大的意义，都能使公正的原则容易占优势。

在阐明基本任务时，不能避而不谈那些能有实际意义的最直接的治标办法。“越坏越好”的原则是经不起批评的，它只能造成对事情有害的一面，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东西；相反的，特别是在人民表现出个人主动精神的条件下，实行各种有益于人民的措施可能对于实现根本的社会变革是完全必需的；社会变革是完全必然的，是有其深刻根源的，治标办法不可能使这种必然性不起作用，而且这些治标办法能给予农民更大的力量，更多的独立性，最后，还能提高农民要求的水平。

统计研究表明，赎金、现在的小额信贷和储蓄贷款合作社对村社产生十分有害和严重破坏的作用，因为它们只会加强农村小资产阶级，而使农民群众破产。因此废除赎金，按照新的合理的原则组

织长期小额贷款对于农民村社将会有不少好处，会加强原来的农民与资本进行斗争的力量。属于这种治标办法的还有其他一些解决少地问题的办法，如正确组织迁移，把国家土地优惠租给农民村社，调整混乱的地界，调整地主与农民的交错的耕地，目前由于耕地交错而产生了一系列通过割地来剥削农民的办法。最后，属于这种治标办法的还有赋税改革和以所得税代替一切捐税。所有这一切措施虽然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但只能加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加强土地必须最后转到农民手中的意识。而且这些措施是向农民宣传、使他们了解实际情况的最合适的基础。这个根本问题是与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紧密相联的。

假定社会革命实现了，那就必须承认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实际上使用土地的可能只是本地的村社；因此这些村社的规模、各村社的相互关系以及村社隶属于更大的社会单位——国家部门等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总而言之，是联邦组织问题。但现在所有这些实际问题和困难都不应当起重大作用，因为现在对人民来说只有认识集体占有和使用土地的必要性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一般俄罗斯人的头脑，尤其是人民的未开化的头脑，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太愿意作理论分析和研究各种学说的，而是更容易接受和迷恋具体的思想和方式。要使自己的论断具有明白易懂的形式，就要靠宣传者个人的本领和才能。对革命任务的论证越广泛，宣传获得成功的希望就越大。不应该把土地变革作为人民的纯粹利己主义的要求提出来，虽然这种要求是正当的；要把土地变革描绘成为精神上的任务，描绘成为探求真理。如果农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掺杂了宗教的色彩，那也完全不必耽心，不必压制，因为这只能表明，宗教的形式比纯粹逻辑的、科学的形式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如果只是保留事情的具体方面——夺取土地归村社所有，那么事情本身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至于人民的反抗如拒绝缴纳税款或土地恐怖事

件以及爆发个别的人民起义，那么对之应当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当然，这一类个别的暴动和反抗不可能获得成功，总是以反抗者的失败告终；随着这一类事件的发生，总是损失很大的力量，损失最优秀、最坚决的分子。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努力引起人民的反抗事件；但是，另一方面，生活条件往往使居民忍无可忍，要求立即使紧张状态有一个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压制任何反抗行为都将是有害的，因为不断受到压制的精力会衰退并趋于消极。在最终目的还很遥远的时候，还必须顺便施加一些影响来激励群众，并在他们面前提出鲜明的反抗理想。如果这种尝试也以失败告终，那也不会使群众士气沮丧，因为群众的要求非常迫切，他们不会被吓倒，人民的思想与其说由于怀疑论和对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而受到压制，不如说人民起义即使是失败的起义的情景和回忆将明显地使人民的思想受到激励。人们现在也还没有忘记普加乔夫，可是他们的暴动是毫无结果的。因此不能否定局部的、地方的人民运动和示威；如果说不应该坚持宣传这种运动，那也不应该使它们丧失活动能力。应该由居民自己表现主动精神；我们的事情只是指出最好的方式方法和可能的结果，促使已存在的反抗因素能最合适地表现出来，最后，应该利用情绪激昂的情况和反抗的事实，作为说明真实情况的例证。对土地恐怖事件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在一定情况下，土地恐怖可以成为一种常规办法，但暂时还没有成为常规办法，在公正的复仇和威胁的情况下，土地恐怖的个别行为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社会主义者的态度……^①也促进已成熟的要求的实现。总之，首先应该努力在人民中间造就有觉悟的分子，他们站住了脚跟以后，就能主动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活动，他们活动起来比我们容易得多，收效比我们大得多。为了保存力量和把握时机，

① 原文脱漏。——编者注

最重要的也就是要挑选这样的人。为了这个目的，知识分子彼此组成地方小组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种小组能够掌握有关整个地区情况的情报，能够最经济、最合理地利用力量和经费。应当指出，有些地方是特别有利的基地，那里人民的思想更活跃，人民的习惯更富有独立性，还保留着从前的自由传统，掺杂着民族的感情。最好把那些乡土关系不密切的人(?)派到这里来。俄国的南部、伏尔加河流域和哥萨克地区就是这样的地区。西部各省和东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里土地的情况非常恶劣，以致经常引起骚动。最不合适的地区是大俄罗斯的中部和北部。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总的目的应当是提高人民社会运动的理解，并尽可能把人民组织起来，但是提出组织人民的任务不是要建立现成的人民战斗小组，这未必可能，而是要开展独立的向人民宣传的工作，并加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联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组织个别的以局部战斗为目的的小组，才是可能的，合适的。当然，这种任务要花许多力量和时间，但绝不是幻想，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最后，如果这一任务不能坚持到底，那么在这条道路上所迈的每一步都是十分有益的、宝贵的收获。

现在来谈一谈政治任务问题，我们应当研究，第一，政治任务是什么，第二，政治任务能依靠什么力量。人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也不理解，更谈不到教育他们去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了。在工人中间接受政治理想当然要容易得多，但我们已经说过，我国城市工人的数量太少，而且不可能增加到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可靠的政治变革的程度；为此必须有农民群众的协助和支持，而农民群众自己是没有政治理想的，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社会理想。因此根本改变^①政治制度的问题比起土地变革任务来自自然就退到

^① 原文为废除。——编者注

次要的地位了。政治变革只能在土地变革之后发生，只能伴随着土地变革进行，它是土地变革的必然终结，但是如果没有土地革命，政治变革就不可能获得成功。所以政治变革的准备和社会变革的准备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者与工人和农民的牢固团结是准备工作的主要任务，这种团结也能够成为可靠的政治变革的保证；政治变革在中心城市完成，就会受到地方的支持；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国民代表会议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这里必须指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军队。军队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支柱和力量，因此在政治变革的时候使它转到革命方面来，至少使它瘫痪，是极端重要的。在士兵中间进行宣传是很困难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受到严密的监督，他们完全不可能稍微广泛地进行活动。但是这些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绕过的：第一，军官可以只影响某些接近自己的个别士兵，这些士兵自己继续活动要方便得多，第二，加入士兵行列的有觉悟的工人也能进行宣传。现在在服役时间还不长的情况下，士兵还没有完全丧失其农民的面貌。还没有脱离农村；同时一般士兵都是饱经世故的人，在农村中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他们都是受过充分训练的，能发挥极其重要的影响，把某些观点和消息传播到俄国各个角落去。但除了影响士兵外，把军官争取到革命方面来也是极为重要的。士兵们不信任、不喜欢将军们，斯科别列夫之类的将军是罕见的例外；但是小军官们只要人道地对待士兵就很容易对士兵发生巨大的精神影响。一个军官一旦受到士兵的欢迎和爱戴，他就可以相信，他叫士兵到哪里去，即使是去反对最高长官，他们都会跟着去。在农民起义的时候，士兵们是不愿意去反对自己的兄弟的，运动规模越大，他们就越不愿意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下级军官转到运动方面来，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全体士兵都会跟着他走，一部分军队就会瘫痪，甚至援助政变。所以在训练军队时甚至最低限度的任务也有积极的意

义——一部分军官的同情能起重大的作用^①。

但是如果根本改变政治制度的问题还要推迟到很远的时候，那么宪法问题是近得多的问题。假定宪法已经完成，试问，宪法将依靠谁，它具有什么性质？我国从来没有过，现在也没有各阶层的政治团结。在俄罗斯，当初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只有大公的卫队；后来卫队变成了官吏阶层；稍后这一官吏阶层又分成两个集团：世袭贵族和官僚；僧侣也早已具有了官吏的性质；同时人民本身分出了手工业——商业阶层；小市民和商人。直到最近，到农奴制度除时为止，俄国社会的阶层状况都是如此。但从这时起，由于社会关系的大变动，产生了新的社会集团，即大财阀，农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者和无地的工厂工人。现在贵族大大地没落了，但还支持着，在某些地区土地逐渐从他们手中流失，在另一些地区贵族仍然有可能保持大宗地产。贵族在地方自治局的成员中是最有学问的，在政治上往往是自由主义的，就其特权地位的本质而言，就其必然性而言，它在社会问题上保守的。财阀和大富农在我国并不是本来就有的阶层，只是由于国家无限的庇护和社会的混乱他们才得以发展。我国的铁路事业也是如此。我们的财阀不可能发展成为巩固的、团结的资本家集团——他们经不起西方的竞争。他们很难找到市场，而光靠剥削是不会有很大发展的。财阀们只是靠国家的庇护来维持，他们使社会所有阶层从农民起到大地主为止都破产，从而激起了普遍的仇恨。在这方面，在抑制财阀的野心方面，任何政治让步，任何扩大社会权利的措施都只能带来好处。

关于那些盗窃国家财富、使所有人都受到损失的大官僚们，也可以这么说；宪法当然不能制止盗窃，但还是能对遏制盗窃行为给予一定的保证。小资产阶级的情况则不同：它比财阀们的地位

^① 原文如此。大概部分句子属翻。——编者注

牢固得多，根深蒂固得多。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是来源于人民在现有条件压力下遭到破产，但这里光是消除舞弊行为是无济于事的；这一过程的根子更深，在于土地的买卖。现代的村社还根本不能使土地不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也不能使群众不丧失土地。统计工作表明，只在那些支出太多的地方才时常彻底重分土地，相反，在那些土地的收入超过支出的地方就很少彻底重分土地。地主竭尽全力抗拒新一代重分土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经济上更强大的单位来代替主人的份地；只要村社还存在，只要还能彻底重分土地，就还能阻止土地极端集中的过程；但是只要给割让土地以更大的自由，那么这一过程就会很快地向前发展。宪法不仅不会保证制止这一过程，而且很可能促进村社的破坏和土地的自由买卖，因为这有利于完全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自治机关之核心的贵族和农村资产阶级。不错，在我国大部分是民主主义派的知识分子也可能参加自治机关，特权阶级和担任国家职务的人员是很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占用知识分子的全部劳动；满足特权阶级和公职人员的需要之后，会有很大一部分多余的知识分子无产者，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和知识应用于人民中间。这些民主知识分子在人民事业中将起巨大作用。如果说他们以前还很少表现出积极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可以依靠的牢固基础。他们在理论上同情人民，多少能正确了解人民的需要，但他们与人民一直没有充分的实际联系和团结。试问，宪法对他们会有多少好处呢？毫无疑问，限制政府的专横，实行充分的言论自由，保障人身自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很难设想，在目前的条件下宪法会容许这个民主因素在将来自治的范围内发挥很大的影响。除了对纯粹的工人居民外，这对所有的阶层都是极为不利的，而知识分子在目前还没有可能在斗争中依靠工人。

所以宪法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能有利于人民事业，改

善民主知识分子的地位，便于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它能带来害处，加强表现为私有地产形式的资本的作用，使土地便于自由买卖，调整有利于工厂主的雇佣劳动等等。所以有关宪法的概念本身是很不确定的，全部问题在于，是一部什么样的宪法？

在自由派的纲领中无疑有一些无论如何应当得到和实现的有益要求；属于这类要求的有：部长负责，社会对行政当局实行监督，废除对财阀的庇护，实行出版和集会自由，保障人身不受侵犯，政治案件归有陪审的一般法庭审理。但宪法的实质在于决定自治机关构成成分的组织形式本身，这里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人占优势。宪法的意义和社会主义者对宪法的态度就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现在的地方自治机关是依靠完全不民主的原则；财产资格是选举的基础；结果，地方自治局议员主要是地主，只有为数不多的名额是农民村社的代表。不错，在地主的名额中也出现并不断增加农民，但是，自然他们都是富农；一方面，被选为村社代表的仍是乡长，酒馆老板等这一类人；农民对待地方自治局的态度也是冷淡的，他们从自己人中间选举的是那些本来就已经是长官，或者为了荣誉和个人目的而等待选举的人。同时，民主知识分子完全不可能进入地方自治局。这样一来，人民和人民需要的真正代表在地方自治局中完全没有或者很少（我们在市政管理局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如果所说的宪法是建立在那些基础上，那么还是根本没有这种宪法好。不能否认，我们的地方自治局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例如在国民教育、地方医院和统计方面就是这样；但是中立的公共福利也就到此为止了；然后就产生了经济问题——利益冲突的领域，如果说地方自治局还没有来得及做坏事，那只是由于其权力不够大。建立在那些虚伪基础上的宪法则走得远得多。在两方面可以对它进行重要的修正；(1) 废除财产资格，承认所有成年人

都有选举权；(2)对自治机关的执行当局和国会选举规定教育程度上的资格。这样，在这些条件下，自治制度的民主化虽然不能认为是有保证的，但是可能的。否则宪法将只能有利于个别地主而损害人民。另一方面，甚至这么一个只是稍微靠得住的宪法也能给予个人一定的保证，使思想和宣传的准备工作易于进行。

宪法的这种双重意义使我们在原则上对它采取消极和观望的态度。为迫使政府作出让步并获得宪法，曾指出过两种手段：地方自治局和贵族团体的宣传和政治恐怖。

我们的地方自治局工作者一般说来都是一些温和的人，但是有时他们也表明自己是不容忽视的；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类似克里木战争的大骚动必将引起他们的某种更大的变化；最后，就是为了保持体面，政府也早晚得制订宪法。但是我们干预这个过程可以表现在：在我们对待自由派的态度中，我们将捍卫自治制度的一定民主形式。进行自由主义的宣传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要做的只是尽力通过文艺、个人联系和交往以民主精神来影响这种宣传。我们应当严厉地批评一切宪法上的规定，仔细地指出其中不利的方面，保卫那些能有利于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措施。宪法一旦制订出来，它的性质将向我们表明，积极干预宪法的结构是多么重要。

至于政治恐怖，那么，自然，我们不准备采取这种代价高昂的手段来获得可疑的宪法。何况这种手段并不能达到目的。只有当恐怖手段是扎根于社会的、已经成熟的力量表现，当这种力量只要作一定的坚决努力就能排除道路上的障碍，获得广泛发展的可能性时，恐怖手段才有意义；但是如果采用恐怖手段是图侥幸，指望有效的行动能唤起不成熟的、没有组织的力量，那么恐怖手段只能导致巨大的损失，不会有好结果。个别恐怖事件，作为一种正义的报复、威胁的表现，只有在三种情况下可以允许：第一，农民自己在地方行政机关中选定了恐怖手段的直接对象；第二，恐怖手段的对象

由社会在最高行政当局中选定，他们的死亡不会引起人民的不满；第三，对密探进行自卫还击。当革命的趋向在我们这里第一次进入生活，并采取实际的形式时，便产生了到民间去的运动。人们醉心于共同的思想，到民间去，但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要去的那个环境的现实生活和条件。新鲜事物，神圣的事业吸引了大批青年人。第一批宣传员在青年中间遇到了良好的条件，那时人们感情丰富，热情奔放，令人激奋的演说使听众心情激动，使人们放声痛哭，吸引那些完全相信自己和自己事业的青年人忘我地到民间去……但是他们了解得很少，生活使他们付出了代价。生活使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毁灭了許多人。热情碰到了巨大的障碍，于是产生了批评和阐明纲领的要求。失败的总的原因有两个：本身不善于工作，不了解人民，外部的警察的迫害毁灭了許多人，激怒了人们，激起了渴望复仇的心情；而且人们一般都是把失败归咎于不是来自自己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从那时起运动几乎完全转到与这些障碍作斗争方面去了，政治任务提到了首位，根本任务却被推到了一边。促成这种情况的是社会的不满和社会对查苏利奇等人的案件表现的同情。运动曾指望在新的道路上得到支持，它正在改变自己的性质；它失去了广泛性，而集中在一定的思想范围内，因此在组织形式和紧张程度上有了改善。运动以惊人的毅力追求自己的目的，最后也达到了目的，但完成任务却是力所不及的；表面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这只不过是一场幻梦，没有得到实际的结果，对社会所抱的希望落了空。同时，主力即那些毕生都在培养自己去进行这一形式的活动的人没有了，他们被击溃了，分散了。精神颓丧和怀疑主义盛行起来。运动是不可能停止的，但暂时削弱了；它需要新的批评，需要重新研究问题和需要新的实际理想。我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无产者，他们实际上是民主知识分子，形势把他们推上了与人民团结一致的道路。但目前缺乏积极性，缺乏对事业的

信心和热爱。现在谁也不会被一般的言辞、感情的理想所吸引了，因为人们思考得太多了，感受太多了——痛苦的经验发生了作用，为了赋予运动以新的力量、为了吸引所有有用的人来参加运动，必须重新严格地批判地制订革命的基本原则，必须提出在人民中间进行活动的新的、具体的、生动的理想；只有通过实践，以实例阐明有效地影响人民的方法，只有现实生活中生动的方式表明这种活动是可能的，是有意义有结果的，才能给予运动以新的鼓舞，使运动获得人们一直在寻找、但至今尚未找到的新的信念，因为这种信念——在人民中间进行的活动——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实质，人类美好理想的始末。

译自《革命史文集》1926年莫斯科
列宁格勒版第3卷第207—219页。

俄国农业生产的形式^①（摘录）

谢·尼·尤沙柯夫

国家土地制度一般是指在提高和发展农业方面至少也起到象自然条件如土壤、气候、植物群和动物群等所起的那种作用的农业生产社会条件的总和。因此可以说，研究土地制度对于任何国家，特别是对于以农为主的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很久很

① 《俄国农业生产的形式》一文曾刊载在《祖国纪事》杂志1882年第7期上。——编者注

久以来，科学忽略了为人民福利和国家利益而研究土地制度的工作，各地的农业统计资料都是凭在世的一辈人的记忆编写出来的。而到现在为止，这种统计根本不包括农业各方面的社会条件的总和，没有记载农业生产的一切因素，因此搜集的资料都没有提供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土地制度情况。例如，统计提供了（而且是不久以前才提供，也不普遍）土地占有和土地用途（森林、草地、播种）面积的资料，但是各种作物的土地各占多少面积（如耕地），统计却没有给予回答。同样地，统计个别地搜集了土地占有、农业资本和农业工人的资料，但没有考虑到比较确切地确定这三种主要的农业生产因素结合的情况。不难相信，只有确定农业生产因素彼此不同结合的数量关系，才能弄清一个国家的土地制度。

农业生产和任何其他生产一样，是由下列三个在经济上简单的原始的生产要素或生产因素构成的：自然力（这里主要是土地），附加在自然力上面的人的劳动，维持劳动和给劳动以装备的资本。这些原始经济因素的不同结合，它们的分配以及社会使之在相互关系和生产方面所处的法律条件就构成为土地制度。社会可以把这三种生产因素分配给土地所有者、佃户和农业工人这三个阶层，但也可以使这些因素集中在自己经营自己土地的农民这样一个阶层手中。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之间，可能有各种介乎两者之间的土地制度类型。例如，可能有农民自己经营租用土地的情况，这样，佃户农民就是劳动和资本的代表，而土地完全是另一阶层的财产，也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地主自己经营，而土地和资本则都集中在一个阶层手中，劳动由既无土地又无产业（资本）的无产阶级承担。所有这些类型的土地制度实际上存在于世界各国，其中包括欧洲。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经济在法国、俄国、塞尔维亚、挪威很普遍，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也多多少少地存在着；经营租用土地的人民经济在意大利、法国、爱尔兰、俄国和德国普遍存在。地主

经济在德国占优势,在英国和法国很普遍。最后,租地资本家的经济在整个欧洲为数不多,常见于英国和苏格兰。尽管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和类似的关于农业生产各种形式在欧洲各国分布情况的资料,但都没有正确地加以记载,因此很难(只有靠复杂的间接计算才行)看出其准确的数量关系。然而,只要哪怕草草地看一下这一类型或那一类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就可以知道和看清这种准确的数量关系对国家经济的全部作用。

在评价土地制度这种分类的经济意义时,就不能不承认,解决农业工人阶层为谁而劳动,是为自己的经济还是为别人的经济这样一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标志之所以具有经济意义,是由于为自己的经济劳动总比为别人的经济劳动更热心、更仔细、更有效率,爱护自己的经济总比爱护别人的经济更明显、更经心。产生这两种情况甚至完全与工人的诚挚程度无关。人民经济形式除了有纯经济方面的优越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它可以保证国家避免无产阶级的产生,保障农村居民在经济上的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上的独立性。这样,从文化经济的角度,特别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人民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如人愿,换句话说,比产业(农业资本)归一个阶层所有,而劳动由另一个没有土地和家产的阶层承担这样一种经济更如人愿。人民生产更有利于国家,因为它保证生产更有效率(当然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者之间产品分配更为合理。

上面我们看到,这些主要类型的土地制度中的每一类型还可再细分:人民经济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也可以在租用的(根据某些条件租来的)土地上经营;资本主义经济同样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也可以在租用的土地上建立。一眼就可以看清,在自己土地上经营的形式在各方面都比较受欢迎,比较有利。土地是生产的决定因素,但绝不是性质固定不变的经济力量;土地可以

由于滥用、荒芜(特别是牧场)、过分潮湿或缺水等而贫瘠,它也可以大大地肥沃起来,它对农业的经济意义也由于其生产能力的这种不稳定而发生变化。改良土壤一向要求相当多的劳动和资本,同样地,保护土地,防止滥用和任何其他破坏,也要花费劳动和资本,这两件事在经营租用土地时(而且完全是在长期租用的情况下)所占的位置,是极其有限的。

可以从上述这些看法得出一个完全无疑的结论,农业生产最完善的形式是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经济,其最不完善的形式是经营租用土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农场)。界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之间的是经营租用土地的人民经济(小农场)和地主经济(经营自己土地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两种类型的土地制度正象任何过渡形式一样,可以形成为各式各样的种类,它们有时近似这一方面,有时近似另一方面。例如我们看到,地主经济的主要不利之处(这使它有别于人民经济),就在于劳动阶层毫不关心自己劳动的效率,这个阶层也分不到产品。显然,地主经济愈是能使自己的工人关心生产效率,就愈近似优越的人民经济。从另一方面来看,小农场或一般的人民租佃与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经济形式相比,其显著的不利之处也在于,租户不关心改良或保护土地,造成土地的滥用和破坏。因此很明显,租户使用土地越有保障,人民租佃的意义越近似人民土地占有形式。这样,有保障制度的人民租佃和无保障制度的人民租佃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经济差别,所以经济学家把它们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类型的土地制度……

—

在农村农业居民中间生产面积(土地)和生产手段(资本)的分配情况会告诉我们,我们在辽阔的俄国土地上可能和一定会遇到何种生产形式。为了说明第一个问题(土地分配情况),我们的统计

已经整理了某些值得注意的资料和数量关系，但对于第二个问题还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我们必须进行相当复杂的计算，甚至通过间接的途径，得出某些结论。

按土地占有形式来看，俄国可以分为四个面积不等的地区。最大的地区是纯俄国式(甚至可以说是斯拉夫式)土地制度占优势的地方，它包括俄国欧洲部分的三十九个省和区以及整个西伯利亚。按人头分拨土地给农夫的原则和村社土地占有的原则是这一地区 and 这个制度的主要特点。但是，除了这种古代斯拉夫式土地制度之外，另外一种类型和具有另一种经济作用的新式居民由于西欧传入的影响也在这里产生了。这一地区(当然不包括西伯利亚)的全部土地面积在三种主要土地占有方式之间的分配情况如下：^①

(单位：千俄亩)

国家土地	152 132
人民土地	122 918
私人土地	69 872

计344 922

人民土地面积和私人土地面积的比例是：

人民土地	63.8%
私人土地	36.2%
	100%

俄国欧洲地区的其余二十五个省属于这样的地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斯拉夫和德国两种土地制度混合为原则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十分典型的代表在我国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这个地

^① 这里引用的土地占有数字是根据扬松先生著《比较统计学》第2卷的材料，又依据各方面关于乌拉尔、捷列克、库班、顿河地区的资料做了补充。哥萨克市镇的土地列在人民占有土地项目之下，军官土地算在私人土地总数中，备用土地列为国家土地。——尤沙柯夫注

区,不仅村社所有制,而且分拨土地给农夫的原则,都一律被完全抛弃。大部分土地归骑士阶层,小部分土地按占有小块地产分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的原则归农民阶层。这方面的土地占有情况如下:

国家土地	779 000俄亩
人民土地	643 000俄亩
私人土地	6 080 000俄亩
	<u>7 502 000俄亩</u>

人民土地和私人土地两者的比例是:

人民土地	9.5%
私人土地	90.5%
	<u>100%</u>

应当把(1)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地区,包括比萨拉比亚和(2)以前波兰王国统治的土地看作是介乎这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之间的地方。在这两种地区,村社土地占有原则在波兰-德国文化的影响下衰落了,但是,按人头分拨土地给农夫的原则依然实行,尽管两个地区实行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在过去波兰王国统治的土地上,这个原则由于土地分拨不均而被破坏。在这些地区,数量关系如下:

	小俄罗斯和比萨拉比亚	波兰和九个西部省份
国家土地	310 000 俄亩	3 831 000 俄亩
人民土地	5 172 000 俄亩	21 199 000 俄亩
私人土地	7 037 000 俄亩	25 021 000 俄亩
	<u>12 519 000 俄亩</u>	<u>50 051 000 俄亩</u>
人民土地	42.4 %	46 %
私人土地	57.6 %	54 %

全俄土地占有情况的总数字是:

(单位:千俄亩)

国家土地	157 042
人民土地	149 732
私人土地	98 010
	<hr/>
	404 784
人民土地	60.4%
私人土地	39.6%

我们在初步概述土地占有形式(它部分地制约着生产形式)时只限于用这些数字材料。人民生产本身到处都往往占用人民占有的土地面积,因此,它在整个地区生产中占居的位置不可能亚于整个人民占有土地在土地占有总数中所占居的位置……在俄国欧洲地区五十五个省份中,种植面积在两种主要土地占有形式之间的分配如下:

人民土地的面积	75 765 000俄亩	70.6%
地主土地的种植面积	30 768 000俄亩	28.6%
24个省份中的其他面积	908 000俄亩	0.8%
	<hr/>	
	计 107 441 000俄亩	100%

由于我们为获得这些数字而引用的材料种类不同,时间不同,我们只应当把这些数字看作是大概的,近似的。

不过,我们确定了各种占有土地的种植面积,也只是划分出和比较精确地算出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生产所占用的面积,而领主土地种植面积项目中则包括几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经营自己土地和租用土地的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按有保障制度和无保障制度租用土地的人民生产。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种植面积在这两种生产之间的分配情况,研究一下这两种主要类型的生产(人民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

二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大俄罗斯非黑土地带三圃制地区的十二个省中人民土地和私人土地种植面积的比例，确定前者的种植面积为二千一百六十三万四千俄亩，后者的种植面积为二百三十二万一千俄亩。现在需要确定一下，后者之中有多少是地主经济用资本主义方式耕种的，有多少是租用地主土地的人民经济耕种的。这种个别农户的小农租佃制度也象整个农民村社土地制度一样，在这一地区相当普遍。我们有许多来自各方面的有关材料。维别尔先生在谈到普斯科夫省时说：“富裕农民或者是租用附近的土地，或者是以每俄亩土地一个夏天五十至九十卢布的价钱租用土地来种植亚麻。全家经营的不富裕农民通常在附近的一片地产中按对分制租用土地，就是说，耕种一两俄亩的亚麻和耕种一两俄亩的春播和秋播粮食作物，在耕作和收获之后，除去撒的种子，得到增产的粮食的一半和收获的亚麻的一半。”^①恩格尔哈特先生在谈到斯摩棱斯克省的情况时说，各地刈草场都是按对分制，有时以现金租给农民。他证明说，各地农民都租用所谓“割地”，即1861年改革前为他们所有，后来根据法令规定划归地主的土地。^②在诺夫哥罗德省自己经营土地和深入研究整个地区的农业条件、农业性质和发展的瓦西里契柯夫公爵评论说，“地主的耕地在这里就是早先也是例外，农民实际上耕种所有的地主土地，他们大部分纯靠代役制生活。地主经济由于废除农奴制劳动而受的损害在这个地区比任何其他地区都大，其中那些现在还支撑着的，也

① 《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1879年第2期，维别尔著《普斯科夫省的农业》。
——尤沙柯夫注

② 参见《祖国纪事》杂志1876年第1期。——尤沙柯夫注

缩小了一半和三分之二。另一方面，这个地区过去和现在都在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对于土地占有者非常有利。既然在农奴制度下，在旧时官方管制薄弱的情况下，农民已习惯于无拘无束，他们不受限制地或者至少不受惩治地使用地主土地和官方土地，那么，按照法令规定和土地所有证书来划分地段就使他们感到受拘束。土地租价因此开始猛涨，土地占有者因此从农民认为不方便、地主则认为没有收益的荒地、林木砍伐地、空地上得到了新的财源。”这位已故的研究者在专门谈到普斯科夫省和斯摩棱斯克与特维尔两省交界地区时说：“据估计，如果农民把自己的份地都种上了亚麻，那么，播种其他春播作物的土地就不会多于三万八千俄亩了。因此，他们播种亚麻占用了尽可能多的自己的土地之后，还大量耕种了地主的土地。这种需求增加的情况使得租地的价格与年俱增，这样，在这个土地一般贫瘠、每俄亩耕地和草地售价不超过二十卢布的地区，最近租价每俄亩耕地涨到五至十卢布，每俄亩亚麻地涨到二十卢布，在一些地方，最近价格达到六十，甚至八十卢布。”^①

这些材料说明，农民租用领主土地来种植亚麻和粮食以及来刈晒干草，在上述地区是很普遍的。从上面我们看到，领主土地播种面积本来几乎只占全部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十六，而在这百分之十六中还得除去人民经济占用的那一部分。所有这一切使地主本来耕种的土地所占的比例降到最小限度，大约不足百分之八。读者如果认为，至少这些面积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耕种的，那就错了。要给某种生产形式冠以这个称号，投入生产的资本就必须与劳动相脱离，它必须不属于在生产中花费自己劳动的工人。一些人劳动，另外一些人支出资本，这样就使生产因素相脱离，划分成为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必须有属于

^① 《土地占有和农业》I。——尤沙柯夫注

主人的、生产赖以进行的资本，必须有“家产”，即由耕畜、许多长工和临时工、生产工具、饲料储备、工人用粮等等所构成的资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其他省份，特别是西部省份的确可以看得到，但在这里，在大俄罗斯这个非黑土地带，则是根本没有的。地主的耕地在这个地区到处都为数不多，但地主根本没有家产；他们既没有耕畜，也没有工人、生产工具。我们来看一下，维别尔先生对于普斯科夫省这种没有家产的经济是如何描述的：“家中人口少的贫穷农民由于没有可能按对分制租用土地，便出钱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一整俄亩（也就是一俄亩秋播地，一俄亩春播地，一俄亩休闲地，共三俄亩）土地出的价钱在二十至三十卢布之间。”瓦西里契柯夫公爵是这样描述这个特殊的耕作制度的：“雇佣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地区很难经营，这特别是因为大部分收代役租的地主土地还没有具备合理经营的条件；另外，有许多地方，在解放农民之后就实行了一种对土地占有者非常方便而有利的土地耕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整块地或者说整片地出租土地。农民被雇用来从事一整俄亩土地上的各项田间劳动，即在三块农田上耕种其中的一俄亩，在另外一俄亩上割草；有的地方，脱粒工作除外，有的地方，运肥工作除外，其他工作由租户用自己的耕畜和农具进行，每一整俄亩的价钱在诺夫哥罗德省是二十三至二十六卢布，在普斯科夫省是二十八卢布，在特维尔省是二十九卢布。”恩格尔哈特先生详细地描述了斯摩棱斯克省的这种制度，这一制度一般地通行于大俄罗斯非黑土地带。从上面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制度就是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地租收入不是货币，而是产品。他对于这样经营其土地，耕种其土地的“家产”，按约定的数目付以现钱。土地占有者没有，也不置备自己的家产。可见，经营土地不是用资本主义方式，而是依靠那些耕种该地区其余十分之九以上耕地面积的小

农户。投入生产的资本没有脱离劳动，它是居于工人之上的劳动者的私产。只是这里收入分配的方法十分特殊。通常，土地如果不是所有者耕种，租户得付给土地占有者租金，而从除去生产费用外的其余收入中，获得投资的利润和劳动报酬；相反地，这里租户自己的收入是现金，而让土地占有者得到以其所得的产品实物支付的地租。不管土地占有者和耕种其土地的主人之间分配收入的条件如何，有一个事实是不会因此而有丝毫变化的，这就是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经营的，而是由人民经济力量经营的。这种经营方式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而只不过是一种被伪装起来的租地方式，是一种经营租地的人民经济。恩格尔哈特先生在说明斯摩棱斯克省的这种经营方式时指出：“其实，这类土地的经营只是为了从那些不可能直接得到货币地租，但可以让别人耕种的土地上获得地租”。作者指出，有一类为数相当多的领主土地，地主让农民耕种，所付的报酬不是货币，而是直接给以土地，而租地经营的方式尤其被这一事实掩盖起来。这位可尊敬的教授在评论这一制度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农民按照旧时的方法，旧时的方式，用自己的马、自己的工具耕种地主土地，把产品堆入粮仓。”

这样，我们在说明大俄罗斯非黑土地带的土地制度时可以说，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根本不存在。全部耕种面积完全靠人民经济的力量和手段来耕作。为数不多的作物（最多约占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是以特殊方式耕种的，而这种特殊方式保存了领主经济的捉摸不定的特征。把“其余的”作物生产列在经营租用土地的人民经济范围，这样，农业生产在其各种形式之间的分布情况为：

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经济 82%

纯粹形式的 10—12%

经营租用土地的人民经济

伪装形式的 8—10%

我们在谈到俄国非黑土地带之前，先要提醒一下，在其他五个俄国北部非黑土地带省份中，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存在的。数量甚微、没有计算的那部分农业生产可以列为经营租用土地的人民生产。全部生产都属于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农业生产。这个看法也完全适用于阿斯特拉罕省。

在三圃制黑土地带的十二个省份中，私人耕地面积，我们已经知道，是一千四百万俄亩，但是，在这一面积中，土地主耕种的占多大比例，农民按货币地租和分成的人民租佃制耕种的占多大比例，是颇难确定的。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小规模租佃制是十分普遍的，似乎甚至超过土地占有者耕种制。可以引用一下多少比较准确的有关博尔兹纳县的材料，这个县对于大部分小俄罗斯黑土地带和大俄罗斯黑土地带南部地区来说，可以认为是个典型。因此，我们利用农业统计学家搜集的详细材料，尽量全面地来说明该地的土地关系。在博尔兹纳县，所有的地产都超过一百俄亩，共一百三十户，土地总面积约四万六千俄亩。引用的精确资料是一百二十二户地产（有八户缺乏资料）；其中有十一户是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有六十七户保存着小规模农民租佃制度，有四十四户是两种制度并存。换句话说，百分之五十四点二是按小规模租佃制经营的，百分之九点八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百分之三十六是兼用两种方式经营的。我们有关于二十四户地产的更详细的资料，可以说明最后这一类地产的两种生产方式的比例关系；这二十四户地产总共拥有土地一万二千六百俄亩，自己耕种的共八百九十四俄亩（即占全部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七），其余的耕地以获取货币或分成办法租给农民。如果耕地算是共占私有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这是最低数字（在波尔塔瓦省，耕种面积所占的比例大致如此），那么，小规模租佃农业生产要占一万一千七百零六俄亩，就是说，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占混合制地产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五，人

民经济耕种土地占百分之八十五。这样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

1. 资本主义	(甲)	9.8%
农业生产	(乙)	$(36\% \text{ 的 } 15\%) 5.4\% = 15.2\%$
2. 经营土地		
占有者土	(甲)	54.2%
地的人民	(乙)	$(36\% \text{ 的 } 85\%) 30.6\% = 84.8\%$
农业生产		

100 %

可见,有六分之一以下的领主耕地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耕种的,其余六分之五以上的领主耕地是按人民租佃制耕种的。如果再考虑到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生产的话,那就会看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占不到该县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农业统计家们指出,所谓小经济(Petite culture)完全确定无疑地居于优势。它不仅经营哥萨克和农民的土地,而且经营大部分地主土地,即农民零星地一亩一亩地不是直接从所有主那里就是从其租户那里租来的土地。

在梁赞省丹科夫县穆拉也文村,^①地产(一百俄亩以上的)共十三户。其中,全部耕地都自己耕种的是五户,它们的可耕地面积有九百零九俄亩;全部土地零星租给农民耕种的是三户,它们的可耕地面积有一千零二十四俄亩;最后,两种方式混合耕种的是五户,它们的可耕地面积有三千二百三十五俄亩,这里租给农民耕种的共九百五十俄亩。这些材料涉及到所有可耕地,即包括耕地和休闲地,但是休闲地在地主支配的耕地中所占的数量非常之多,因为农民很少租用轮休的休闲地,没有为租用土地施肥的惯例。上述耕种方式的比例关系如下:占有者耕种的土地(在所有二十二户地产,就是说也包括一百俄亩以下的九户地产中)共两千三百俄

^① 见《土地村社资料汇编》中谢苗诺夫先生的报告。——尤沙柯夫注

亩,在这些地产中,农民耕种的土地为一千八百俄亩。换句话说,土地占有者的耕地占百分之五十六,人民租佃的占百分之四十四。但是,这种比例关系丝毫反映不出资本主义生产和人民租佃的相对作用,因为这里普遍流行着伪装的租佃制度,关于这种制度,我们在上面描述非黑土地带土地制度时已介绍过。谢苗诺夫先生说:“雇用农民到土地占有者农场工作有四种不同形式:充当为期一年的雇农(一年工钱是三十五至四十卢布),或者是组成农民马队来耕种一俄亩农田,完成从耕田到运粮入仓为止的各项工作(工钱是六至七卢布),或者是由农民租用土地,最后,或者是按日……土地租金一般是秋播地每俄亩十至十二卢布,春播地每俄亩八至十卢布。农民往往只用货币付一半地租,另一半靠做工偿付,即在地主这一俄亩土地上耕种、收割、运送粮食。”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大部分土地占有者的农田是靠人民经济用这种非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因此,如果把全部土地占有者的耕地的一半算作资本主义生产,那就超出这种生产可能占的数量,而我们所得出的数字就是:

资本主义生产	28%
人民租佃:(一)纯粹的	44%
(二)伪装的	<u>28% = 72%</u>
	100%

有一个材料介绍了辛比尔斯克省的情况:①那里在总数两千八百九十五户私人地产中只有十六户有经营工具和自由雇工,即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地产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五是按人民租佃制经营的。在喀山省,九百一十一户地产中有七百六十四户,即百分之八十四出租给农民。其余百分之十

① 关于辛比尔斯克省和喀山省的资料引自瓦西里契柯夫公爵的著作。——尤沙柯夫注

六是土地占有者经营的耕地，但这些耕地是按伪装起来的租佃制由农民耕种的。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上述地带东部伏尔加河流域，资本主义生产根本不存在，而私人占有的耕地大都按纯粹的人民租佃制由人民经济经营（百分之八十四至百分之九十九），少量的是按伪装起来的人民租佃制（即地主的耕地，靠农民的资本，由农民的双手耕作）经营。

查斯拉夫斯基引用了下述一个关于库尔斯克省的例子^①：在格赖沃朗县罗基特尼扬村，农民租用的秋播地达三千俄亩，春播地达两千五百俄亩，地租“一部分以货币支付（每俄亩七卢布五十戈比），一部分是一俄亩以完成一俄亩的工作来支付”。土地占有者自己经营的耕地共约一千俄亩，全部由农民一亩一亩地耕种。总之，在这个村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私人耕地是按纯粹的人民租佃制（五千五百俄亩，占百分之八十四点六）和伪装起来的人民租佃制（一千俄亩，占百分之十五点四）分别经营的。

把所有这些片断的、显然不完备的资料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如果地主的耕地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那么要确定资本主义生产所占的份额，就必需大大加以压缩。所有资料都一致表明，大部分土地占有者耕地都租给农民耕种，另外，主人自己经营的土地到处都比较少，而且都不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往往只是以收取地租的特殊方式，而靠人民经济的力量和工具耕作。除此而外，也有为数不多的土地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耕种的，而在大俄罗斯非黑土地带以及俄国三圃制黑土地带东部地区是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这就是在分析一切有关上述地区经济情况的报道和资料之后所得出的十分令人信服的结论。现在还没有十分确切的材料可以从数量关系上说明这些结论，或者确切地说，这

① 摘自瓦西里契柯夫公爵的著作。——尤沙柯夫注

种材料有是有,但都是有关十分小的地区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三个省是个例外,我们已经知道,其中的两个省(喀山省和辛比尔斯克省)有关于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资料,至于另外一个省(萨拉托夫省),由于情况类似,应当认为它也和那两个省一样,其余九个省总共只有三个据点。土地相当辽阔、有一百三十户地产的博尔兹纳县是最能令人信服的,那里资本主义生产占私人耕地的百分之十五,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另有两个地方,其令人信服的程度较小,这是两个村子,一个在梁赞省,一个在库尔斯克省,两者有私人耕地面积近一千二百五十万俄亩,尽管这两个村子的材料是可靠的,但其令人信服的程度较小是由于它们占的面积甚微,这就使得偶然情况有可能对各种耕地比例发生很大影响。实际上,在一个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约占百分之二十八,在另一个村则根本没有。因此,平均占百分之十四,就是说,其比例和在博尔兹纳县所看到的相似。我们只有把这百分之十五当作整个地区的平均数,虽然必须记住,这个数字是很成问题的。

资本主义生产	5.1%
人民生产:(一)经营自己土地的	67.6%
(二)经营租用土地的	<u>30.3%</u> = 94.9%
	100% ^①

对于外伏尔加黑土地带的省份(萨马拉省、乌法省、奥伦堡省),我们没有材料来说明人民耕地面积和私人耕地面积的分配情况,在这里,私人占有土地占相当大的面积,但都是按人民租佃制经营的。瓦西里契柯夫公爵在谈到这个地区时说:“地主耕地没有了,私人土地占有者很少自己耕种土地。自由雇佣、代役制、对分制

① 这里计算的是十二个黑土地带省份的数字,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估计显然是高了。——尤沙柯夫注

这些耕作制只是例外，一般的至少是主要的经营制度是租地给农民租户，以获得货币地租。”在这段话稍后，作者又说：“在这一东部地区有一种大租户大片租地然后再转租给小租户的爱尔兰式制度。”新乌津斯克地方自治局（萨马拉省）也埋怨这种制度使居民破产，使土地贫瘠。这样，外伏尔加省份看来具有生产单一的性质，但是由于缺乏比较详细的材料，不可能确定这种生产在其各类之间的分布情况。这些省的播种面积共有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俄亩。

在赫尔松省，资本主义生产和人民租佃的土地面积如下：

资本主义耕地	560 000俄亩	59%
人民租佃耕地	375 000俄亩	41%
计	935 000俄亩	100%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的数字大致也是这样。比萨拉比亚的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所有三个省的数字如下：

资本主义生产	1 214 000俄亩	20.2%
人民生产		
(一)经营自己土地的	3 932 000俄亩	65.1%
(二)经营租用土地的	865 000俄亩	14.7% = 79.8%
计	6 011 000俄亩	100%

现在来看看西部省份，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扎下的根子比在俄国其他地方要深。但是，就是在这里也远非所有的领主耕地都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很多土地按人民租佃制交给土地占有者经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形式的人民租佃：一是爱尔兰式的无保证制度，这种制度在俄国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二是形式完善的有保证制度，这就是所谓的封建地租制。我们掌握的人民租佃方面的资料，关于波多利亚的最多。^①关于利京县、布拉茨拉夫县、加德

^① 见《卡茨涅茨—波多尔斯克省统计说明资料》，地方统计委员会版。——尤沙河夫注

斯洛夫县、巴尔特县、文尼察县和卡美涅茨县，有直接的材料说明，人民租佃很普遍，尽管各地情况不完全相同。在普罗斯库洛夫县、乌希茨县和杨波里县，这种制度不甚普遍。关于莫吉廖夫县和列季切夫县，我们没有资料。我们只有关于卡美涅茨县和布拉茨拉夫县的比较详细的资料。前者所有地产中有一部分土地是由人民租佃按封建地租制经营的，在十二户地产中，还有一部分土地按无保证制度（一般的制度）给农民经营，而有四户地产，全部土地都是用这种办法经营的。这种情况只是证明人民租佃在这个地区很普遍，但丝毫不能作为计算的根据。布拉茨拉夫县的资料比较适于作计算用，这里于1871年在私人占有的耕地中，有六千三百一十二俄亩零星地租给农民（每俄亩租金是三点三七至三六卢布）。该县领主土地的总面积是六万七千二百九十五俄亩，其中林木占四万三千九百零一俄亩。如果把其余的土地面积（二万三千三百九十四俄亩）都算作耕地，那就可以看出，按人民租佃制经营的地主耕地有四分之一以上。即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九。

关于基辅省利波韦茨县和乌曼县也有资料^①表明，这里人民租佃制的土地超过建立在封建地租制上面的有保证制租佃所经常经营的面积。瓦西里契柯夫公爵引用沃伦省的材料，谈到西南部地区的一般情况时说：“大片土地的租户所租用的地产有一部分以很高的租价转给农民耕种。犹太租户把土地转租给农民，通常收取他们一部分收成。在沃伦省，农民向他们缴的收成有时是一半，往往是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缴的割草达全部草料的四分之三。农民为每俄亩牧草场支付八至十二卢布和十二至二十卢布。”

^① 1878年在敖德萨举行的全俄农业主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资料。——尤沙柯夫注

瓦西里契柯夫公爵在谈到西北部地区时指出：“除了整片租用全部田庄和花园之外，这里还往往按地段（二十至三十俄亩为一个地段）租地；小贵族阶级、犹太人、以前的管家、主事、富裕农民中的许多人愿意这样按地段租地。”库尔文柯夫先生在谈到莫吉廖夫省的农民时顺便说道：“他们比较愿意自己经营土地，其中许多比较富裕的人因此租用当地便宜的土地。”^①这样，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租佃在整个这一地区相当普遍，资本主义生产占的土地大大少于私人占有耕地面积。它应当减去所有封建地租制土地、所有以分成或者货币形式租给农民和其他农业手工业者的土地以及西北地区按地段少量租佃的所有土地。要扣除多少这种耕地，只是布拉茨拉夫县有数字资料，这个县处于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黑土地带的中心位置，因此可以作为这一地带的典型。在西北部地区，条件就有些不同，领主经济远远不象在土壤肥沃和得天独厚的波多利亚那样繁荣昌盛。因此应当预料到，在西北部地区，资本主义的地位是比较不利的，由于没有其他可供探讨这种情况用的有力资料，我们且用一般的情况来说明整个西部地区，我们得出的数字是：

资本主义生产 4 965 000俄亩 23.1%

人民生产，

(一)经营自己土地的 14 695 000俄亩

(二)经营租用

土地的 1 827 000俄亩 = 16 522 000俄亩 76.9%

计 21 487 000俄亩 100%

人民租佃几乎占该地区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其中有一部分是按以封建地租制为基础的有保证的租佃制经营的。考虑到关于

^① 《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1879年第2期和第4期，《白俄罗斯经济》一文。
——尤沙柯夫注

封建地租交纳者的人数和份地的资料很少^①，可以认为，他们的租地面积几乎达到一百万俄亩，不过其中也算上了庄园占地，这种土地由于份地少，勉强只能占全部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另外，交纳封建地租的耕地面积应当稍多于九十万俄亩，即占人民租佃全部耕地的一半，占全部当地耕地的百分之四。

至于波兰王国，我们几乎没有关于那里存在人民租佃的资料。1877年，外国移民租用了六万八千俄亩地，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里人民租佃土地数量的全部情况。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土地是移民零星地分散租用，还是整个地产由移民农业团体租用，而后才在业主之间分配？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不单是移民采用这种租佃方式；相反，如果是第二种情况，这种租佃方式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可能是例外情况。另外，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这样的租用土地面积完全是耕地面积；如果是第二种情况，还包括树林、不适用的土地、庄园占地等等。由于对必要的条件不了解，由于这种租用土地的绝对数字微不足道，我们只好认为，资本主义耕地和人民耕地的比例与人民耕地和私人耕地的比例相等，也就是说：

人民生产	64.1%
资本主义生产	35.9%
	<hr/>
	100%

虽然在这里我们无疑地有些夸大了农业中资本主义方式的份额，但是未必夸大很多，因为根据各种资料看来，在波兰，资本主义在农业生产中是十分稳固的。

我们渐渐地谈到了俄国欧洲部分的所有地方，只是还没有触

^① 只有波多尔斯克省卡美涅茨县的地产资料十分详细。关于封建地租交纳者人数的资料比较准确，关于地产的资料是片断的，我们的数字大概少于实际数字。——尤沙柯夫注

及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上面我们引用了关于该地区领主占有土地和农民占有土地的资料，农民占有土地很少，但是农民使用土地比占有土地多得多。这个地区的每块骑士领地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土地占有者无权使之成为主人的耕地，而必须小块小块地租给农民。在里夫兰，这种有限制的领地有一百三十六万九千俄亩，在库尔兰地区有五十万俄亩，在爱斯兰有六十一万三千俄亩，共计有二百七十八万二千俄亩，不过这种土地中也包括不适用的土地和庄园占地。^① 领地面积不包括林地共为四百八十一万七千俄亩，除去领主经济直接支配的人民租佃土地，还有二百零三万五千俄亩。如果认为不适用的土地和完全没有耕种过的土地在两类领地中占的比例相同，那么耕地分配情况是：

资本主义耕地	1 183 000俄亩	42.3%
人民租佃耕地	1 618 000俄亩	57.7%
计	2 801 000俄亩	100%

如果再加上人民耕种的自己的土地三十六万四千俄亩，人民耕地将共达一百九十八万二千俄亩，这样，所有三种形式的生产的分布如下：

资本主义生产	37.3%
人民生产	
(一)经营自己土地的	11.8%
(二)经营租用土地的	50.9 = 62.7%
	100%

除了我们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塔夫利达省和顿河州之外，我们尽量算出了俄国普遍存在的三种主要农业生产形式，即经营自

^① 这里引用的数字是根据《军事统计汇编》第4卷中的资料。——尤沙柯夫注

己土地的人民农业生产形式、无保证的(爱尔兰式的) 人民租佃形式和资本主义形式的比例关系。我们专门把西部地区九个省中按有保证制度租用的土地列了出来, 因为这种租佃在那里是一种独立的形式。在俄国其他地区, 这种租佃也很普遍, 被称为临时义务农民租佃, 我们把这种土地列在农民自己土地的项目下, 因为根据最近的法令, 这种人民耕作形式应在 1883 年 1 月 1 日前予以禁止。

我们把所有各种资料综合在一起, 总结所有的计算, 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

(一) 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农业生产在俄国到处都很普遍, 它在各种地带所占的面积是:

三圃制黑土地带 12 个省	26 024 000 俄亩
西部地区 9 个省	14 595 000 俄亩
北部地区 5 个省	13 050 000 俄亩
12 个三圃制非黑土地带	11 634 000 俄亩
波兰(10 个省)	4 935 000 俄亩
新俄罗斯和比萨拉比亚(3 个省)	3 952 000 俄亩
非黑土草原(阿斯特拉罕省)	1 211 000 俄亩
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3 个省)	364 000 俄亩
	<u>计 75 765 000 俄亩</u>

占全国耕地的 71%

(二) 爱尔兰制的人民租佃:

三圃制黑土地带 12 个省	12 541 000 俄亩
三圃制非黑土地带 12 个省	2 628 000 俄亩
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	1 618 000 俄亩
西部地区	907 000 俄亩
新俄罗斯和比萨拉比亚.....	<u>865 000 俄亩</u>
	<u>计 18 559 000 俄亩</u>

总共占耕地面积 17.2%。

(三)有保证制度的人民租佃：

西部地区是 920 000 俄亩，0.8%

(四)上面计算的各省的人民农业生产，

总共	95 244 000俄亩
----	--------------

此外，在外伏尔加(3个省)	<u>5 429 000俄亩</u>
---------------	--------------------

计	100 673 000俄亩
---	---------------

人民生产在全部耕地面积中占的比例是：

不包括外伏尔加	89%
---------	-----

加上外伏尔加	89.3%
--------	-------

(五)资本主义生产占的面积：

西部地区	4 965 000俄亩
------	-------------

波兰	2 753 000俄亩
----	-------------

三圃制黑土地带	2 072 000俄亩
---------	-------------

新俄罗斯和比萨拉比亚	1 214 000俄亩
------------	-------------

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	<u>1 183 000俄亩</u>
-----------	--------------------

计	12 187 000俄亩
---	--------------

资本主义生产在全部国内生产中占的比例是：

在全部生产中	10.7%
--------	-------

不包括外伏尔加	11%
---------	-----

(六)俄国欧洲部分全部农业生产占

土地面积	112 289 000俄亩
------	---------------

不包括外伏尔加	107 431 000俄亩
---------	---------------

可见，在俄国欧洲部分全部耕地面积中只有十分之一是资本主义经营的，而十分之九是人民经营的，其中十分之七以上是人民经营的自己的土地，十分之二以下是按人民租佃制经营的耕地。整个俄国的总结性数字就是这样。

不管对这些数字的准确性看法如何,有一点是不能怀疑的,这就是人民生产是俄国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而资本主义生产则处于边远地区,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占居主要地位,只不过占全部生产的十二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这个结论可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南,它清楚地说明,俄国农业的主要利益何在,就是说,社会和国家应当主要往哪个方向努力,我们应当从什么地方取得最有成效的和最重要的进步。但是,这些总结性的数字材料还没有说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需求、手段和弊病。为了弄清这种制度的问题,必需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每种生产形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从这个观点来看,探讨关于生产形式的转变和每种形式内部的运动等问题,也同样是有益的;这种转变和运动是我国土地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特点。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三

所有上述结论可以归纳如下:人民经营的土地占全国耕地的十分之九,而人民占有的土地占全国耕地(国家耕地除外)面积的十分之六;另一方面,领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四,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仅占全部农业生产的十分之一左右。人民生产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它不得不占用大量的私人土地(一千九百五十万俄亩)来自己耕种,而资本主义生产却感到地多之患,它靠自己的力量只能耕种比较少的土地,其余的则让给人民生产或者根本闲置不用。全部领地面积是九千三百万俄亩,其中有一千二百万俄亩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一千九百五十万俄亩是人民租佃的,六千万俄亩以上是没有耕种的土地,其中有林地两千六百万俄亩,完全没有耕种过的土地三千六百万俄亩。这些材料本身已经十分清晰地说明了两种农业生产的方式和可靠性,不过,它们虽然描

述了每一种方式的现状、内在生命力,但很少提供用来描绘外部条件和环境的材料。现在来谈一谈这些条件和我们现有的每种农业生产形式应有的未来方式。

俄国欧洲部分的土地总面积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是耕种过的,其余的三分之二是森林、小灌木丛、沼泽、未开垦的草原荒地等等辽阔地带。因此,俄国农业的任务之一(而且简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这片白白闲置的、等待开发的、从未垦殖过的辽阔肥沃的地带。扩大种植面积是俄国农业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必须首先关心的事情。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耕作形式中,哪一种形式能够利用这种关心来扩大自己在农业生产,从而在全国经济中的作用呢?

我们上面所谈的五十四个省农民支配的总面积一亿零四百万俄亩土地中,已经耕种的有七千六百万俄亩,另外,有十五个省的刈草场、各种庄园土地(单是这种土地就约有五百万俄亩)没有开发,还有约二百五十万俄亩土地是林地。考虑到所有这些修正,我们就可以看出,真正没有耕种的土地很少。庄园、林地(北方五个省份除外)和耕种的土地(十五个省的草地除外),面积达八千四百万俄亩,余下的约两千万俄亩是十五个省的刈草场,五个省的树林以及没有耕种的土地,而在五分之一的北方省份中,两千五百万俄亩人民土地有一千四百万已经耕种(包括庄园),剩下的有一千一百万俄亩,其中有其他用途的占九百万俄亩。后者要包括十五个省的草地,这样,未耕种的土地就为数不多了,而且都是些确实不适于耕种的土地(沼泽、沙地、斜坡、水面等等)。可以设想在北方省份一千一百万未耕种的土地中能够找到一部分适于耕种的土地,但是凡是了解这个地区不适于耕种的土地占很大比重的人,都会对此抱有怀疑。在这个北方地区,除了这种不适用的农民土地以外,还存在着完全适用而没有耕种的土地,有私人的,也有国家的;实际情

况自然会使人们把扩大耕作的劳动投到这里来。对于我们东南部地区哥萨克省份哥萨克市镇的土地，我们就更有理由预料会发生这种情况；这里，哥萨克市镇村社土地中还有相当多的没有耕种的土地；居民的增加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当然会逐渐扩大哥萨克市镇耕种面积。这就是我们有理由在自己土地上经营的人民经济取得量的进步方面所能期待的一切。如果人民经济占用所能占用的一切来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单靠扩大人民占有土地就能得到发展。

有保障制度的人民租佃在现有条件下也没有任何扩大其占用面积的可能。可见，农业在数量上的发展在现有的农业生活条件下将完全发生在两种农业形式即资本主义和无保障(爱尔兰式)制度的人民租佃之间。其中哪一种形式有可能在扩大全国耕地面积中占主要地位？先看一看事实，看一看正在完成的过程，然后再来阐明使得农业沿着这条道路，而不是沿着另一条道路前进的条件和形势。

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比俄国其他任何地方都繁荣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种生产也在从事开发不适用的土地、治理沼泽等活动。但是，统计资料所表明的情況却与此有些相反。根据国家产业部关于六十年代初情况的旧资料，这个地区的种植面积是三百一十六万五千俄亩，如果扬松先生的新计算可以作为根据的话，那么经过十五至二十年之后，种植面积已减到二百七十八万俄亩，而且在我们的计算中，认为休闲地与秋播地相等，如象三圃制地带一样，而扬松先生则提出在这里休闲地应只等于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在这种情况下，种植面积就又减到二百五十九万三千俄亩。在二十年(不到一点)当中减少了五十七万二千俄亩，就是说减少了百分之十八以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地在于没有草地经营的新资料，部分地在于播种数字中漏掉了牧草播种。两者(即靠沼泽地排水、清除林木等扩大自然草地和在可耕地播种

牧草)大概可以使粮食播种的减少保持平衡,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承认扬松先生的计算可能有某些错误,也未必有理由认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耕地数量有较大的增加。无疑地,饲料种植面积(提供牲畜饲料)的扩大影响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提供居民食品),这是各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而产生的现象。

我们已经看到,在波兰,耕地面积有一些扩大,尽管我们在这方面听到无休无止的怨言,说什么地役权在阻碍经济发展。地役权使得领地旧耕地的经营制度无法改变,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却丝毫妨碍不了对未耕种土地的利用,而且地役权还没遍及这些新耕地。这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因为在十五至二十年期间,封建领地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九十五万俄亩,就是说,扩大到一倍半以上。可是,波兰总面积一千一百五十万俄亩土地中除此以外还有未耕种的土地四百万俄亩以上,甚至除去占土地面积百分之二十的森林,仍有一百八十万俄亩土地等待耕种,等待人们投放劳动。因此很明显,地役权对于全国的人民经济是迫切需要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根本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不可否认,地役权阻碍在旧耕地上实行更完善的制度,但是旧耕地最多不过占领地的三分之一。当然,经营新耕地需要较多的资本,从这一方面来说,由于1863—1864年事件领主阶级遭到破产时,地役权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障碍。但是,第一,二十年的安定已经医治好了领主阶级的创伤,恢复了它的富裕境况(耕地的发展就是个证明);第二,取消地役权虽然使占总生产百分之三十六的资本主义生产容易发展一些,但会使占总生产百分之六十四的人民生产受到致命打击。

在邻近的立陶宛和俄罗斯西部地区,我们看到,耕地在两个省趋于扩大(基辅省和波多尔斯科省),在四个省勉强维持在原有水平上(沃伦省,格罗德诺省,维尔纳省,科夫诺省),在三个省趋于水平下降,耕地减少,几乎减少百分之五十(明斯克省、莫吉廖夫省、维

切布斯克省)。而在西北部各省,未耕种的土地却非常之多,占全部土地的一半以上。正是在这里有可能靠同心协力而又巧妙地致力于扩大耕地而获得最大成果。支配着全部闲置的未耕种土地的资本主义生产没有觉得自己有力量敢于从事这一事业,相反却使得大量已经耕种的土地又荒芜起来……

从上面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在新俄罗斯还占居十分显著的地位(占生产的五分之一);可以了解一下,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在这个土地广阔的黑土地带的发展情况如何。1878年12月在敖德萨召开的第五次全俄农业主代表大会的第一组(经济组),委任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所作的结论得到了代表大会的小组和全体会议的赞同,这个委员会搜集和研究了俄国南部各种地区农业主提供的大量答案,在报告中向代表大会提出了答案大纲。我从这个大纲中引用一些与我们关心的问题有关的资料。委员会在土地占有者耕地数量和畜牧业规模方面是这样归纳它所得到的答案的实质的:“在比萨拉比亚,在赫尔松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在哈尔科夫省伊久姆县发现,地主经济的种植面积普遍减少。在基辅、波尔塔瓦省,在哈尔科夫省一部分地区,土地占有者种植面积在增加,土地在施肥,林木在被砍伐作耕地”。“在比萨拉比亚、赫尔松省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在哈尔科夫省伊久姆县,可以看到,领主经济中的畜牧业在普遍衰落;在其他地方,没有改变或增长。”俄国南部地区土地占有者提供的这些证据说明,在整个新俄罗斯,资本主义经济在减少耕地面积,同时缩减种植面积和畜牧业规模。拿旧资料同扬松先生的计算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在比萨拉比亚种植面积稍有增加,而在赫尔松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则有所减少。对于比萨拉比亚来说,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或者是在于人民生产(其中包括人民租佃)得到了发展,或者是在于比萨拉比亚后来出现了衰落,与旧资料相比,甚至还有

余。

关于三圃制黑土地带的资本主义生产，上面我们引用了对取得某些成就的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部分地区的一些看法。谢苗诺夫先生在谈到梁赞省穆拉也文乡时也指出，领主经济没有衰落，而是发展了畜牧业，改善了土地施肥情况，建设得更好了。但是另外有资料说，该省领主经济在衰落。瓦西里契柯夫公爵大致是这样看问题的。有一点可以说是可靠的：在这个地区扩大耕地，是不会有很大作为的，因为现在已经耕种了几乎一切可能耕种的土地，往往还超过了合理的程度（如砍伐林木等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目前总共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五左右，它要扩大只能依靠其他形式的生产，而不能依靠未耕种的土地，其实，未耕地已经没有了，因为未耕地都是森林，而且森林也已经砍伐到不合理的程度。可见，在这里扩大资本主义农业生产首先要依靠人民租佃，但是迄今还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因为二十年前农民解放时，人民租佃根本就不存在；它是后来产生的，在二十年期间发展到占该地区全部耕地面积百分之三十的地步，超过资本主义经济所占土地的五倍。

我们考察了三十四个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可能性；其余的二十八个省在土地面积上超过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省，它们拥有的未耕地数量最多，在这些省份中目前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形式。根据对三十四个省的观察可以得出结论说，这种形式的某些发展在波兰、在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两个省都有所表现，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大概也是这样；在三圃制黑土地带的情况很糟，人民租佃迅速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在新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和西北部边疆地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有明显的衰退。总之，除了西部边疆地区以外，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与人民租佃竞争时到处都站不住脚。

这些事实和看法可以用其他许多间接说明这种问题的事实来加以补充。我们谈到贵族农业普遍缩减，土地转到商人手中。我毫不怀疑，在商人中间可能有人受过农业教育，愿意在这方面从事活动，但是总的说来，甚至不能不武断地认为，商业阶级中所出现的农业主必定很蹩脚。商业和农业的经济原理大不相同，其经营原则往往甚至相反。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没有事实，也应当认为，领主土地转到商人手中，决不标志着进步和巨大成就的到来。而事实也并不缺乏……来自俄国各地的大量证据都说明占有领地的商人的恣意行为，这些证据是众所周知的，人们每天可以在报纸专栏上读到，在地方自治会议、专门农业会议和科学团体中听到，最后，只要出城一看，从车厢的窗户往外一看就能看到，如此等等。林木被砍伐，而后却不清理出来耕种，又不重新造林，于是荒废为没有什么价值的牧场，公园、果园的树木被砍伐，用来烧火，房屋和经济建筑被拆毁，以提取材料；经济设施，如草地上的水渠等等得不到维修，田地荒芜，变为沼泽，毫无用途，耕地缩减，耕畜出售，牛羊被屠宰，等等。这就是对商人在他们获得的贵族领地上的经营的一致看法。不能说，在贵族领地上不存在这种作法。在这里也是林木被砍伐，建筑和设施维护很差，陈旧不堪，逐渐毁坏，耕地缩减，畜牧业衰退，但是，第一，不是到处如此；第二，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是出自贫困，有时是由于轻率，但是始终令人遗憾的是，在商人地产上这却是经常的，有打算的（打算得当然很糟糕，但事先总还是有算计的）；在贵族领地上，事情的发展是缓慢的，逐渐的，摇摇摆摆，犹犹豫豫的，是想恢复经济的；而在商人经济中，则是迅速的，匆促的，不顾前后的。商人取得地产后（大部分代价很小），首先尽力收回从流通中抽取来买地的那笔钱。他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但完全糟蹋了地产，尔后附近农民所需要的土地便无代价地落到新主人手里。商业界每个购买地产的人都很了解这一点，他们糟

踏和弄垮经济之后,已经不是在经营土地了,而是依靠土地剥削居民,慢慢地准备也搞垮周围的人民经济。总之可以说,如果说领地经济普遍情况不妙,严重衰败,那么贵族土地转到商人手中的过程就是这种经济迅速垮台的过程。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过程,看看它是否确实象所说的那样严重而普遍?它是否确实那么广泛而明显?

如果我们以改革前编辑委员会搜集的贵族地产数字为根据,把其中农民份地和剩余土地去掉,再拿来与税务委员会在改革后十年中间搜集的资料加以比较,那么,贵族地产迅速减少就不会令人怀疑了。从两个来源得到的有关三十个省的贵族地产总数是五千万俄亩,经过十年只剩下了四千四百万俄亩,减少了百分之十二。不过,这些数字材料与按省份和地带研究的资料比较起来通常很少有说服力,很少值得注意。并不是各省都有减少,相反地,某些省甚至有显著增加。外伏尔加黑土地带各省(萨马拉省、乌法省、奥伦堡省)的情况特别显眼,那里贵族地产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上述地区贵族地产如此增加,原因在于皇帝的大量恩赐。其次,我们看到,在波尔塔瓦省、库尔斯克省、奔萨省,贵族地产稍有增加,在哈尔科夫省、辛比尔斯克省、坦波夫省、基辅省、波多尔斯克省则稍有减少,这样,这八个省贵族地产面积总共减少百分之二点七,除去政治事件促使贵族地产减少(没收)的基辅省和波多尔斯克省以外,其余的六个省只有地区性的变化,而没有贵族地产减少(增加零点二)的现象。可见,在十一个省中有一个从奥地利国界到乌拉尔的狭长地带,这里贵族地产没有消失,黑土肥沃,气候温和,地理条件有利,这一切在这里结合在一起,使得领地得以维持下来,而在情况较差的东部一部分地区,还要加上恩赐这个有利条件。在南边和北边直接与这一地区接壤的省份,也是黑土地带,但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比较差(如人口稀少)。在九个这种省份(南边的赫尔松省、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塔夫利达省、沃罗涅什省和萨拉托夫省,北

边的奥廖尔省、图拉省、梁赞省和喀山省)中,贵族地产减少得相当多,达百分之十五以上。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六个省(缺明斯克的材料),减少得更多,达百分之二十六,而在大俄罗斯的非黑土地带,这个过程最值得注意,这里贵族地产以前总面积是一千七百七十八万一千俄亩,在改革后的前十年竟失去了五百七十五万九千俄亩,即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三!在这个地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贵族地产于1871年就转到非贵族手里!在后十年,这个过程是否停止了呢?丝毫没有。我们没有关于全俄国的资料,只有关于十四个省的资料,但这就足以说明变动的情况了。根据土地统计第一卷的资料,七个黑土地带三圃制省份的贵族土地是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俄亩,与1871年相比,减少了百分之七。在七个非黑土地带省份,减少了百分之八。这些资料证明,贵族阶级丧失土地的过程各地仍在继续,可见,随着地产转到商业和工业阶级手中,领主经济仍在继续迅速垮台。

事实就是这样。它向我们描绘的情景使我们不可能指望(当然指最近的将来)资本主义生产成为能够有助于我国农业进步、耕地面积扩大等等的因素。我国土地有三分之二没有耕种;在这大量未耕种的土地中,好的土地掌握在私人手中,尽管如此,也不能指望资本主义经济会把这些肥沃的一望无际的荒地变成耕地,它是无能为力的。能够指望在这方面有变化吗?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需要三个条件:脱离劳动的资本,没有自己产业的工人,有经验和有知识的领导者——业主。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呢?有知识和有经验的专家、农业主在俄国并不存在。

贵族主要是官僚阶层;商人是商业阶层,而农民,当然在他们生来就从事的行业方面很有经验,在农业上是内行,他们喜爱农业,但是现在,第一,他们贫穷而愚昧;第二,目前许多人都非常反对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如果我们一定要对我们所处的这种经济混乱局

面宁愿不采取对策，而耐心地等待在我们这里产生资本主义经济领导阶层，那么我们当然只能期望在农民中出现这类救星，不言而喻，这不会在今天，也不会明天。新的有产农民阶层必须有时间从占多数的无产农民中突出地分离和独立出来；这个新的农村资产阶级必须有时间受教育，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再也想不出其他产生有知识的资本主义经济业主的可能了。农学教授在我们这里为数不多，其中只出了一个恩格尔哈特先生，即使他，也是不得已而到农村运用其资料和搞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应当忘记，这样的业主需要千千万万，农学教授的知识对我国是很宝贵的，而且目前很少人愿意干这种事业。在城市里生活更舒服些。

第二个条件是资本。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在俄国的作用多么微不足道，因而它所筹集的资本也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在半个俄国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在另一半俄国，大部分地产中也没有，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少的一部分地产中，其数量和力量非常有限。因此必须建立大量家业，即购置必要的建筑物和设施，购买耕畜和有经济价值的牲畜，添置齐全的农具、车辆、种子，雇用和供养一系列工人，等等，等等。已经有家业的地产，还必须扩大。为此需要亿万资金。大约有八百万小型人民经济耕种着一亿俄亩人民耕地；对其中的每一个经济要是投放五百银卢布^①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人民经济的全部资本就达四十亿卢布，即平均每俄亩耕地是四十卢布。私人占有土地的总面积是九千八百万俄亩，如果我们只耕种其三分之二即六千三百万俄亩，那么目前资本主义耕地在数量已达一千二百万俄亩的情况下，还必须至少

^① 梁赞省穆拉也文乡农民经济的平均资本数目（不包括土地）是六百七十五卢布，种子储备和工人（即本身）生活费用不算在内。——尤沙柯夫注

占用五千一百万俄亩，或者说还必须至少筹集二十亿卢布的资本，这还没有把土地本身的价值计算在内。为建立和经营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须支出的这些资本从哪里来呢？我们的资本很少，很宝贵；而且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把大量资本交给了领主经济。为了不重复旧日社会救济厅和整个改革前时期的历史，我们首先要谈一下赎买农民土地问题。领主经济获得了六亿多卢布的赎买贷款，这笔钱在哪儿呢？但是，这个行动使得人民地产缴纳了高额款项，它阻碍了人民经济的发展，而领主经济至少没有受到损害。这种经济由于第二次给予它资本来扩大和改良耕地，花了相当大的代价，我指的是土地银行。通过这个办法又分给了领主阶层上亿卢布。两种行动（赎买的和银行的）使这个阶层得到十亿卢布以上，但是，可以用来安排、甚至奠定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笔巨额资本白白地消耗掉了，而且使这种经济的个别进步也受到束缚。即使这种经济发展得不错，它也不能把剩余资本用在改良和扩大经济上；它得要把剩余资本交到银行去。为创立资本主义生产大量发放必需的资本的尝试，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资本被浪费了，为经营地产而弄得债台高筑，而资本主义经济却依然没有。显然，不具备其他必要条件，资本是无能为力的。现在，资本也没有来源；地产被抵押和转押出去。如果我们依然希望在我国坚持培植“完善的”西欧资本主义农业生产，那就还必须等待（而且不是短期等待）资本家农民的出现和新的占有阶层的产生，因为目前所有的或者可能有的的一切资本都已用尽，都呆滞在自己土地上成为无法偿还的债款。在这些恩人，这些未来俄国资本主义的代表完全成长壮大、羽毛丰满之前，一代人当然还完不成自己的周期，但是一个民族不会只生存几代；只有我们后代才会享受“完善的农业生产”的好处。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基本条件——业主和资

本——并不具备，看来在最近的将来也不会具备。至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第三个基本条件，即没有自己产业的工人、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非有不可的雇农阶层这个问题，我应当提供的回答亦如上述。难怪一位直率的土地所有者在第五次全俄农业主代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无产阶级的产生是必需的，合乎心愿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工人，雇农阶层其实完全是由无产者形成并补充的。农业业主由于贫困有时被雇作雇农，但这始终是勉强的，时间可能也不会太长。农业无产阶级在我国是存在的，但暂时数目不多，甚至还满足不了目前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经济对雇农的需求。因此经常可以听到关于工人不足即所谓“工人问题”的怨言，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农业无产阶级形成的问题。这样，为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关心农业无产者数目的增加。那就等待上述的农民分化为有产者和无产者的过程吧。无产业者将沦为雇农，有产业者将成为有知识的资本家业主阶层。总之，条条道路通罗马。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人民经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其途径就是从人民中分离出比较富裕的阶层，多数人走向贫困，产生无产阶级，大多数农民经济垮台。尽管所有这些过程在现有条件下是可能的，可以设想的，但是它们都只是缓慢地、逐渐地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我们没有理由希望很快看到在农业生产方面会势不可挡地出现资本主义。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资本主义生产都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倒是应当料到它会进一步衰落。要经营和繁荣资本主义生产，既没有资本，也没有业主和工人，要在劳动和资金分离出来之前就培植资本主义，这未免为时尚早，因而是不会有成果的，只能以农业阶层遭到破产和亿万资本被糟蹋而告终！这种情况必定会发生，而且也已经发生了。

既然在目前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是软弱无力的，站不住脚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希望我们三分之二的闲置土地得到耕种呢？经

营自己的土地的人民经济耕种了它所能耕种的土地，由于缺少土地，不可能得到扩大，资本主义经济耕种着它所能掌握的为数甚微的土地，就连这些土地，它也是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由于缺少业主、资本、工人（总之，除了土地，一切都缺少），它不能得到扩大；有保障制度的人民租佃的土地面积也不会得到扩大。那就只剩下没有保障的爱尔兰式人民租佃了。只有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还有理由期待数量上较大的发展。如果说可以把经营自己土地的、占全部耕地百分之七十一的人民农业生产看作现在的主要因素，那么也可以有理由把爱尔兰制看作将来的主要活动者和准备者，这当然是在假定现有农业生活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目前它已在生产中占第二位（百分之十七），仅次于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农业生产，而大大胜过其他两种生产形式的总和（百分之十二）。它每年都使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只有它能如此；它每年都使它在国家经济中的绝对作用和相对作用有所提高，只有它能如此。在现有的农业条件下，也只有它能够发展和繁荣。

在这样概括说明土地关系之后，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经济已经耕种了所能耕种的土地，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再扩大，那么能不能靠增加人民占有土地面积来扩大呢？在这里不谈由于国家采取的措施而得到这种发展的问题，因为这样就改变了现有的土地条件，我们来谈一下这样一些情况，看看它们是否能够使人民地产靠自己本身，即添置土地而得到扩大。既然贵族地产在非常迅速地出售，人民经济为什么不利用这种情况来增加自己的耕地面积，而根据人民租佃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不正是它所需要的吗？土地统计资料所提供的材料，可以使我们作出判断：人民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这种贵族垮台的情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在总共二十年中，有十四个省增加了自己的地产，其办法是买下了三千六百零九个村社，这些村社拥有土地三十七万—

千俄亩，使份地的总面积增加百分之一一点二。在贵族出售土地的总数(十四个省共五百三十八万七千俄亩)中，农民村社只掌握百分之六点七。

其余百分之九十三点三，即五百零一万六千俄亩贵族出售的土地中没有人民村社的份儿。这些土地大部分为城市阶层所有，小部分落到从群众中分化出来、准备接受上面所说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个别富裕农户手中。但是，为什么人民经济不如此积极利用贵族地产大量丧失的情况呢？注定它在这二十年中勉强维持的条件很容易说明这个问题。

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生产从理论上说是农业生产的最好形式，它既能保证农业的成就，又能保证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是，进行有成效的经营管理，特别是进行改良工作，需要经常对土地投资；只有靠增加投资数量和增加投入的劳动数量，土地才能得到改良而不致贫瘠，农业才能改进，生产才能增加。改良工具，改良耕畜和有经济价值的牲畜，增加土地肥力，人工培植牧场，引进新作物，或改良种子，且不谈改变经营制度，——这一切都需要闲置资金，有时一下子需要很多，大部分数额不大，但得年复一年地不断投到农业中去。因此，首要问题是，经济和农业生活的条件是留给农业生产以闲置资金，供发展和改良之用呢，还是消耗掉生产的一切剩余，从而必定引起保守和停滞，结果招致衰落和危机呢？可惜，毫无疑问，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经济在上述方面是处于最不利的经济条件之下。农民土地的支出和收入不平衡现在最能证明这一点。有些至今仍在怀疑农民份地是否真正太少的人也在高喊支出过多。甚至守旧的人也丝毫不反对这一点。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于是召集内行人员仔细进行计算，最后决定每块份地向过去的农村地主减付一个卢布。下面我们谈一谈关于这种减付办法使人民经济的状况改善了多少这个问题，而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人民经济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维持下来的？它能不能改善呢？能不能靠收买贵族出售的土地来扩大呢？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有两个政府委员会即税务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进行工作，它们搜集了相当丰富的事实材料，这些材料是瓦西里契柯夫公爵和扬松教授整理的……

所有这些材料都清楚地说明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经济的处境很糟糕。它支出很多，负担沉重，不得不尽量从土地上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甚至超过合理的限度），把经营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样的条件下，当然就不可能设想农业会有发展，经济会有改善。靠自己出钱购买的办法来扩大农业，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不管怎样农民村社在十四个省中添置了几乎五十万俄亩土地来扩大自己的地产，那么很明显，经营农业之外赚得的每个戈比都得投入到农业中来。只是这种戈比不多；支出使得业主剩不下用来发展和扩大经济的资金……我国人民经济根本没有这种纯利息，大部分只有纯亏空。这就决定了现在大多数农业生产形式赖以发展的条件，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部分地说明了人民租佃的作用是弥补亏空。

这样，我们在研究了我国人民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赖以发展的条件之后，就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在农业现状下，农民和土地所有者都同样关心人民租佃的发展。对农民来说，这是弥补自己经济亏空的主要源泉，对土地所有者来说，这是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它可以保证他们能够付清热心的贷方使领地负担沉重的支出。这一点完全决定了人民租佃在国家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就在于它是维持两个阶层的经济现状、使之避免遭到在相反的情况下必然很快和完全破产的主要因素。它对于双方在经济上都是必需的，它是由于万分窘困而引起的，自然它必须承担由于极端经济措施而产生的一切必然后果，因为它一方面以最小限度的投资从土地上获得最大限额的收入（换言之，就是滥事生产），另一方面滥加经营。在

这方面比较缺少本事的贵族在迅速让出舞台，而让富农、商人、犹太人去干这种不白白操心的事。贵族不仅通过出售土地，而且通过更多地出租地产来让出位置。大租户则把土地转租给农民……

因此，我们单独研究的人民租佃不管有多少亏损，对于维持人民经济的平衡则是必需的。

现在可以根据对已经十分清楚地描绘的这种人民制度的主要特点所作的简要论述得出结论。

俄国农业（这是我国富强、文明、能起历史作用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源泉）现在完全掌握在人民经济手中；资本主义经济目前很可怜和微不足道，今后（至少根据大致的推测）看来也不过如此。俄国经济发展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千百万小经济单位即农民经济的命运。八百万左右这种最平常的我国经济组织基本单位总共耕种了一亿俄亩以上的个人土地和租用土地。农村业主经营的自己的土地约占上述大量耕地的四分之三，但是这种耕地的收入不能满足经济、家庭、偿还国家债务和赎买债务等需求，这种经济的劳动力超过了自己地产规模的需要。促使人民经济把自己的经营扩充到私人土地上的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情况除了使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经济建立起来之外，使无保障制度即爱尔兰式的人民租佃也建立起来。由于农民自己的土地已经全部耕种，而资本主义生产又没有任何生机，在现有土地条件下也只有指望这种爱尔兰式人民租佃才有希望扩大利用全国三分之二未耕种的可耕地。无保障的人民租佃制在当前农业生产中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它的使命就是在农业发展中起首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作用。农业在数量上的发展将完全有利于和有赖于这种形式。至于质量上的发展，看来俄国农业的一切条件仿佛是彼此串通一气地来对它进行逼

制。经营自己土地的人民经济支出负担过重，超过土地支付力量，它至少必然是因循守旧，以至必然常常衰落。亏空只有靠别的来源，主要靠租地才能弥补。这种情况就给人民租佃这个本来就极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制度加上多余的压抑。经济的压抑迫使人们从自己土地上和租用的土地上尽力获得最大的收入，而把支出尽可能地，甚至难以想象地减到最少限度。另一方面，经济压抑和地产债台高筑使土地所有者不得不把地产租给大租户这些居民和领地的职业破坏家。可见，使农民和土地所有者感到沉重的双重压抑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促使国家走上极为粗放的经营道路，使得土地由于滥事耕种而贫瘠，使两者都落到和居民及地区毫无联系、根本不关心保护农田和可耕土地的中间剥削者即大租户的手中。

俄国农业现在所处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最好的理论原理和原则成为过去沙皇统治时期伟大农业经济改革的基础：这些改革使得经营自己土地或者按最有保障的制度租用土地（临时义务状况）的人民经济形式占了绝对优势。但在实行伟大改革时期出现了巨大的弊病，不相称的支出落到了人民经济的头上。即使在实行改革时没有发生其他的弊病，那么单是这一点也完全足以使我们的农业必定保守和衰落，足以引起上述可悲现象，足以在我国培植令人悲叹的爱尔兰土地制度，这个制度的产生只不过是十五年前的事，而今却在生产中占居第二位，并在为自己争得更广阔的前景。

我国土地制度的现有条件如不改变，俄国农业的这种前途不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这些条件要往什么方向改变，可以部分地从上面的阐述中看得出来，但是这种阐述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农业的任务和需要。无疑地，我国农业政策首先应关心的是改善占俄国全部农业生产（不算波兰在内）十二分之十一的人民经济的条件，无疑地，这种经济需要扩大自己的地产或者保证自己的租用土地，因为它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容纳不下了，无疑地，它

需要消除它担负的开支的不平衡性，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三种途径：扩大土地占有（通过这种办法来增加收入），减少支出和减少没有亏损的租佃。总之，扩大人民占有的土地，调整租佃权，平衡收支，这是我们土地政策的毫无疑义的任务。但是，为了估计这种需求的规模实际有多大，从而为了确定采取哪一类措施，为了制定纲领，就需要许多其他的资料，需要更仔细地研究需求和亏空。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573—609页。

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①（摘录）

瓦·巴·沃龙佐夫

第一章 资本主义生产和国际贸易

俄国的工业组织较之西欧要复杂得多。例如，我们在观察象英国这样的国家时，可以将它的大部分现象，甚至所有现象纳入所谓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范围；在生产领域，那里是清一色的资本主义大企业，这些企业全体或部分地服从于同样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不可能超出这些规律的作用范围；产品分配是在通常彼此截然不同的三种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工人）之间进行的。如果说这

^① 这部书于1882年在彼得堡出版，它是由作者以前在《祖国纪事》和《北方通报》等民粹主义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汇集而成的。——编者注

里我们有时还看到手工业，那么我们完全明白，这或者是以往的生活临终前的一丝回光，或者是与真正的艺术十分接近，从而不致于被刻板的机器生产所代替的卓绝的手工艺。甚至象周期性危机、贫困化、移民等这些显然与生产繁荣、国家富足等相矛盾的经济生活现象也不难用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来加以解释，因此可以与其他正面的生活现象一起被列入为数不多的基本原则。总之，欧洲的经济生活是建立在不难断定的基础上的；它那看来五花八门的现象都可归纳为某些基本原理；我们在研究它的时候，完全可以确定它所由构成的一幅平面图。

俄国的情形则不同。甚至很难说我们这里已经牢固地确立了某种结构，而要阐明经济生活的原则恐怕只能是幻想。的确，例如在加工工业方面，一系列事实说明大生产多少比较迅速地在我国国土上生根，而另一些事实则表明，它的对立面——手工业却在繁荣。在农业方面，小规模经营方式同大规模经营方式在进行斗争，即使假定前者取胜，那么也还不知道农民的土地经营将会采取何种形式：是法国式的小的独立单位（某些地区表现出来的分掉村社土地的意愿看来显示了这种趋向），还是德国的农民—贵族制度（从村社社员分化为“善于经营”的农民和“力量单薄”的农民，或者说，从村社中分化出享受农民劳役的富农、土豪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到它的萌芽），抑或是最终在我国产生一种村社特点或多或少占优势的新形式。其次，如果认为在这场土地经营方式的斗争中，小农经济很可能会取胜，那么，究竟为什么胜利者的经济同时又在衰落，甚至在它们的对立面——大土地占有者衰落得更甚的那些省份，还会出现农民离乡背井、弃地出逃的现象呢？而在人们被迫出外谋生的情况下，工厂主却抱怨人手缺乏、工资高昂，又作何解释呢？如此等等。

这许许多多不胜枚举的互相矛盾的现象说明，我国经济生活

中有几种因素在进行斗争，破坏过程与建设过程同时并存，说明未来发展的方向还不清楚。然而搞清这个方向无论对于评价政府为稳定农民生活和发展我国工业所采取的措施的成就和意义，或者对于确定今后经济措施的依据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对于当前俄国生活这种饶有理论兴味的研究并不以这些实际考虑为转移，因为这种研究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西方社会科学所确定的工业发展的规律……

众所周知，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意义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一些人顽固地认为，我国今后的发展应该按照西欧的模式进行，并把这种见解用一些多少有点分量的、但多半是理论的考虑装饰起来；另一些人则竭力抵制这种结论，但他们用来与之对抗的主要是说明我国没有必要步西方后尘的否定性理由，或者关于东西方势不两立的斯拉夫主义倾向等等。现在让我们根据上述原理独立地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的确有不少迹象不仅可以说明我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甚至可以使粗心的观察者上当，以为我国已经相当迅速地在既定的道路上前进。例如，近二十年来我国建成了二万俄里铁路，而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首要条件，并且在其崇拜者看来，这可能是资本主义在我国已经牢固生根的明证，因为建筑并经营这样的铁路网必须有资本、有经营才干和活跃的商品周转。我国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使小资本积聚为大资本，通过各种股份公司和银行发展为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信贷业务。还有为数众多的、以促进我国生产、主要是大生产为宗旨的机关。这些机关设立许多专门委员会研究国内外这种或那种商品的贸易情况，它们遵循“哪儿马蹄得得响，那儿蟹螯源源来”的民谚，在认真地进行探讨，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以便采取措施制止美国同我国在欧洲粮食贸易上的竞争，或将英国排挤出亚洲市场等等。我国报刊最爱谈论的

问题之一就是击败英美、发展本国某一机器工业部门的问题。机器工业很久以来也是我国政府心爱的产儿，过去已为它做出了不少牺牲，将来还可能做出更多的牺牲。我们看到人民中间有某种骚动，这通常说明衰亡着的小生产同发展中的大生产之间在进行斗争，无地农民无时无刻不在增加这一事实似乎说明了这场斗争的结局。最彻底的新“西欧派”直言不讳地声称，这场斗争的结局必然是大生产（自然是资本主义大生产）获胜，他们预言手工业必然灭亡，并坚持认为必须用消灭村社的办法帮助新秩序的确立。人民中间正在出现对人民横加劫掠的各种各样的吸血鬼和剥削者，而这些吸血鬼也被认为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出现的第三等级的一分子，是大生产发展的一个征兆。吸收妇女和儿童参加生产这一事实也被用来证明大生产的发展，因为资本“随着数量的增长和机器的不断改进，男劳力的使用范围在不断减少，这就要求使用不成熟的女工和童工来代替它”。^①还可举出我国正在发展的主要表现为组织罢工的所谓工人运动，作为我国工业制度与西欧工业制度相类似的补充。最后，我们这里也不是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反面特征：破产与盗窃银行。

这些迹象似乎颇为明显地证明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在劳动社会化方面，不管愿意与否，我们只有安于西方制定的办法，走德国人和英国人走过的老路。

尽管存在这些可观的表面现象，然而我们仍认为这一切大都是资本主义的儿戏，并非真正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现。诚然，我们这里筑成并经营着二万俄里铁路，但这丝毫不能证明我国的交通，特别是货物运输十分发达，铁路虽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是养护它的

^① 《关于社会经济和权利相互关系的意见》，载《言论》杂志1879年第2期。——沃龙佐夫注

不是工业，而是政府，国库拨给铁路的十亿贷款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存在着积聚资本的银行和股份公司，但是我们仍然不断向政府呼吁支持工业，资助工业和银行，实行禁制关税。拿土地银行来说，它们简直是要毁灭我国的私人土地占有制，毁灭我国的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尽管这些人是负有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使命的。例如可以举出下列事实来证明这种发展的结果：赫尔松省几乎所有庄园都被典押，萨马拉、乌发和奥伦堡三省典押的庄园在半数以上，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奥廖尔、坦波夫、奔萨、辛比尔斯克等省都典押近半数，等等。哪里土地好、收入多，那里债务也就多——业主们就是这样富有成效地花费借来的钱的。据某些银行的统计，数以十万计的债款延期交付。截至1878年1月1日止，十二家银行有六千三百六十五份产业宣布出售，而售出的仅五百二十三份，有四百一十四份只好归银行。比萨拉比亚—塔夫利达银行付出的股息1874年是百分之二十二，1875年是百分之十二，1876年是百分之十，1877年是百分之三，1878年是百分之零，1879年很可能要倒取于股东了（《呼声报》1879年第81号），等等。如果必要的话，这类事实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我们从西方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形式和手段，而生产本身却引进得极少。那些对工资高昂的抱怨、解散村社的要求以及据说是因受古老工业的落后方式束缚而拚命挣扎的年轻资本主义的其他表现，照我们看来，只不过说明俄国资本主义是一具死胎，说明它需要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破产辩护，需要嫁祸于人。我国劳动比哪里都价廉；而昂贵的劳动完全不妨碍大工业的确立。农民到处奔波寻找工作，为了糊口不惜远走天涯，因此缺乏人手从何谈起，与村社有何相干！只有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只有那些认为资本主义是每个国家发展工业的必然阶段的理论家们（资本主义这种劳动社会化形式由于不可排除的原因在我国实行得非常糟糕，因而他们没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宣传这

种劳动社会化形式的材料)，才能以委过于工资高昂和村社而自慰，才能异常认真地将西方工业历史性发展的一切命运用于我国生活（目前自然只是幻想）。他们不懂得，在西方这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在我国则是移植，是模仿。

然而，这一切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间接迹象；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它在我国农业及轻工业方面的直接表现吧。

如果将我们上面谈到的对于那些走上历史舞台较晚的国家作出的结论运用于俄国，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的大生产扩大的限度是由早已固定的（国内）市场确定了的，从而为我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翱翔划定了相当狭窄的范围；其次，我国大生产将不是向广的方面，而是向深的方面发展，亦即不是包容越来越多的工人，而是提高就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使用新机器）。^①这两个限制俄国资本主义扩展范围的条件使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在我国已完全不同。在西方，历史赋予资本的任务是将劳动的个体方式改造为社会方式；为此，它必须尽可能地囊括一切可以实行协作的工业部门，完全排挤小生产。即使资本在我们俄国做到这一点，那么，由于社会化劳动的生产率只是一个劳动者（譬如一个工人）能满足五至十人的需求，并且只有本地居民消费他的产品，不难看出，那就只有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的人口能为资本所雇佣并从而取得购买其产品的资金，其余的人则被迫离乡背井。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再消费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了；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将无人消费。换句话说，俄国资本不仅不可能囊括一切生产部门，而且不可能囊括其大部分；它只能使一小部分工人劳动社会化，因而在

^① 实际上，目前许多国家的情况正是这样，技术的进步加上邻国的竞争使得吸收新工人参加生产已无必要；例如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人数几乎等于人口每年增长数。同时，那里资本联合工人的过程已几乎结束，而我国则刚刚开始。——沃龙佐夫注

我国它不可能完成自己的特殊使命。既然如此，千方百计培植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将我们的结论及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简述如下：

(一)我国大工业的发展是在对外销售极端有限，并有可能广泛利用较发达国家的一切完善技术的情况下进行的。

(二)因此，它的发展方向不是粗放经营而是集约经营，即极少改变工人的绝对数目(或工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数)，而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三)因此，它的繁荣不需要俄国人民进一步失去土地，自然也不需要消灭村社，使失地农民在工厂找不到工作。

(四)相反，由于我国大工业必须主要指靠国内销售，因此它的繁荣程度与人民群众的富足程度有直接关系；每一无地农民离乡外逃都会减少对它的产品的需求。

第二章 机器制造业的成就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俄国的大生产近十年来原封未动，考虑到同期人口的自然增长，应当认为这说明它在衰落。现在我们可以指出这种现象的十分可能的原因：失去了对外销售的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完全以国内消费者为转移，而作为国内消费者的俄国农民虽然需求有所增长，近来却急剧贫困化，这种贫困化使工业品的流转额缩减，自然也就影响到他们的供应者——大工厂主。

大生产的机器部门是这种总规律的一个突出的例外。在过去的十年中，整个工业总的说来是寸步不前，然而各机器工厂的流转额在这一时期却从二千七百三十三万卢布增加到四千五百六十六万卢布，工人数目从二万七千人增加到四万五千人，整个这一部门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这就是说，最近的十年特别有利于上述大生

产部门的发展,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机器部门找到了掩蔽所,在这里它可以灵活自如地躲避它在工业领域其他阵地上受到的袭击,并且毫无阻碍地发扬它固有的趋势。机器部门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取得了最大成就的部门;因此,了解这一部门,我们就既可判断俄国资本主义内在的长处,又可推想它将来高度发展的一切机会。

上面我们谈到,大机器工业七年内大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那么,它的内部状况目前怎样呢?为什么它与工业现实生活的总趋势相反,能够这样突飞猛进呢?

初看起来甚至可能显得荒谬:机器工业是为各个劳动部门制造生产工具的,既然各个劳动部门都处于衰落状态,那么怎么会出现机器工业增长的情况呢?它是从哪里为自己的活跃得到刺激的呢?

如果我们不是只注意枯燥的统计数字,而是去研究一下具体的事实,我们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根据俄国技术协会 1875 年搜集的资料,我国有机械厂三百六十二家,然而其中有较详细材料的只是一百八十家专门的机器制造厂,其中四分之三从事铁路机械的制造和修理,四分之一制造农具……

上面谈到的这些工厂并不是随着我国工业的自然发展而出现的;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对机器的需要量增加的结果,而是由于外国产品过分昂贵而难以满足这种需要造成的。它们的产生是遵照政府的意志,并不考虑直接的经济利益,只是为了满足临时的需求——当时需要重新武装军队,添置新式船只,于是就给私人提供资金,保证订货,使他们在数年之间获得大量利润。订货一结束,工厂也就完蛋,因为官方市场一撤销,它们就找不到别的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工厂为特定目的安装的专门设备,工人在这一部门取得的经验统统白费,工业界几乎没有从以往的经验中取得任何教训。工

厂主赚了相当一大笔钱以后，就急着把财产脱手，转让给别人，而这个人购买这份产业也不是为了继续有益的事业，而是因为看到会有官方的某种新订货，即使不再做大炮，也会做火车头或车厢。工厂买来之后，为了进行新的生产经过改建，就为新主人装满腰包而重新开工。由此可见，我国的机器制造业纯粹是投机性的事业；工厂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市场的临时需要，工厂的任务并不是使事业根深叶茂，而是让老板大发横财。因此，工厂主们认为不必关心产品的精细加工，而精细加工的首要条件是生产专业化；他们不但不努力使生产专业化，我们发现，他们是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愿意干。例如，俄国机械和矿山工厂公司的涅瓦工厂从政府手里得到了一批生产火车头的订货，同时它又制造装甲舰、铁桥及其他产品；科洛姆纳公司的机械制造厂除了生产火车头和车厢以外，还制造铁桥和钢梁；谢苗诺夫的哥卢别夫工厂一方面加工炮弹和炮架，另一方面又生产车厢；佛朗施坦工厂既修理蒸汽机，又制作日常用具，又完成炮兵当局的订货，还制造蒸汽抽水机；老厂之一的旧贝尔德厂也是一面接受炮兵当局的订货，一面建造轮船，一面轧制钢轨，一面又炼钢；波罗的海公司的一个工厂（旧卡尔及马克费尔松工厂）也从事机车及车厢制造，等等……

……显然，在这种条件下，工厂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我国的工厂是靠外力移植到俄国土地上的，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没有自然而然出现的可靠的销路，因此可以说已陷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工厂一再转手，新主人总是指望政府的资助，最终落得象铁路一样，成为政府的无力偿债的债务人。

……俄国的气候条件本身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工业体制在我国生根。的确，为了发展这种体制，必须使其产品在市场上售价低廉，能够与外国货竞争。因此任何左右生产成本的自然的或人为的条件都是重要的，而我国的气候条件属于使生产成本高的一类。

由于气候严寒，我们必须建造较厚实的，因而造价较高的厂房，而漫长的冬季又必须为取暖和照明增加开支；由于同样的原因，养活工人的费用也比较昂贵（他们除了需要夏装，还需要价钱较贵的冬衣，冬季吃得要好一些，住房要取暖等等），这些费用也必然会影响产品的价格。我国的气候加上我们祖国的幅员辽阔，这样影响就非同小可了。

交通方便是大工业，尤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存在的主要条件，因为它需要产品畅销，而只有产品价格低廉才能达到畅销的目的。如果没有方便的交通使工厂能够畅通无阻地运输原料和其他物品，并把它自己生产的产品运往各地边远的市场，又有什么价格低廉可言呢？……

十分清楚，俄国不存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必不可少的要求是能够经常地将大量的产品和工人从国内的这一端运往另一端，既快速又价廉。而我们甚至沿传统路线顺利地运输我国财政的主要支柱——粮食——都做不到；若使粮食不致在车站滞留，我国铁路的机车车辆必须增加到相当大的数目，那时每俄里的费用将不是现在的五万卢布，而是十四万卢布。假如认真地要求我们的铁路完成它的使命，那怕只完成我国商业的主要货物——粮食的运输任务，那时我们的铁路会唱出什么调子来，铁路现时的主人——股份公司，目前已经在不断要求国家根据保证书支付补偿费，它究竟还能维持多久，这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只要想一想，在俄国建筑能使我国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维持同西欧竞争的能力所需的足够数量的公路和铁路（对照其他国家，这个数量将是几十万俄里铁路和几百万俄里公路），需要多少资金，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会承认，这种生产方式在俄国是彻底失败了……

总之，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去，我们就不可能在我国建立高

度发达的机器工业。我们没有销售我们产品的国外市场，国内销路又如此有限，以致不能为竞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下工业进步的杠杆提供食粮。发展生产专业化（要想制造价廉物美的产品，这是必不可少的），以及建立熟练工人常备军也同样毫无希望。我们的生产与我国广大的幅员相比十分有限，因此无力建造并经营为维持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铁路和公路，而没有这个条件，产品的国内需求的意义就更窄小了；全国分为几个区域，每个区域都要建立自己的工业（至少在笨重产品方面会是这样），因此，每一套工厂的市场就会更狭窄，竞争、生产专业化及其他条件就会更差（当前农具工厂什么都干，又什么都干不好，这一特点之所以存在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等等。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到使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提高到欧洲的水平……

……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永远依赖外国人或满足于国内制造的质劣而价高的产品而根本不可能找到别的出路呢？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另一问题：资本的领导是不是工业进步的唯一明灯？

工业的发展，落后的生产方法为西方完善的生产方法所代替，这是某些工厂主私人利益斗争的结果。在我国，在机器工业部门，这种斗争并不存在，根据销路规模来判断，在最近的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因此，工业进步的通常的动力对我国是不适用的；我国的资本主义缺少曾使西方资本主义根本改造欧洲经济组织并将工业提高到目前程度的那种杠杆。而没有这种竞争杠杆，资本主义就会丧失一切进步意义：资本主义在我国已由推动工业进步的历史必然方式（正如西方资本主义所表现的那样），变成了为一小撮不但不起任何进步的历史作用，相反却阻碍工业正常发展的人的私利而剥削人民劳动的方式。

然而，工业进步的另外一条道路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工业进步

的杠杆可以是在劳动者同时又是企业主的条件下出现的力求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工人劳动的意愿(因为这是技术发展必然产生的结果),或者是意识到提出改进意见有利于事业,即有利于社会的觉悟。第一种方法目前适用于容易实行劳动组合的生产部门,机器制造业不属于这一类,因而这里应实行第二种方法。为此,生产必须掌握在一种不是关心一时的物质成果,而是关心使事业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并从社会利益角度对待问题的机关手中。政府就是这种机关,当前与一切人的利益有关的工业企业就应当掌握在政府手中。不久前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我国大工业是按政府的意志产生的,一些工业部门半数由政府直接掌管,另一些部门由政府的津贴及订货加以支持。然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赞成官办工厂,直到最近还在鼓吹把这些工厂转让给私人,机器制造者代表大会就表达了这种意见。对官办工厂的这种态度是社会上以资本主义观点看待事物的自然结果,这种态度的合理程度取决于资本主义观点的合理程度。从这种资本主义观点出发,私人工业确实比政府工业有利,因为私人工业由企业的绝对所有者直接支配,可以更快地采用技术上的新成就,更快地进步;它的第二个优点是,私人工业由于受竞争规律的支配,比官办工业更节约,产品的价格更低廉。所有这些确实都是不错的,然而这些优点只是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固有的特性得到充分发挥的私人工业(或者叫做资本主义工业)才有意义,而对于象俄国工业这样在萌芽状态中就停滞不前的工业则不然。我国资本主义生产的突出特点恰恰是停滞与昂贵。由于这两个特点都与销路不足有关,而销路不足又是先期走上进步道路的邻国占领了国际市场,使我国工业挤不进去的结果,由于我国的生产与国外市场之间现存的障碍很可能在很长时期内发生作用,所以等待我国资本主义复苏,并在复苏之前忍受它的剧痛,那就对它过分温柔了,那就会在历史面前犯极大的错误。

总之，在合作组织普及到机器工业部门之前，机器工业部门很可能要转归国家管理。形势一直在促使它自然而然地走上这条道路，而我们由于目光短浅却在强使它走向相反的方向：国家竭力挽救并百般支持某些私人企业；这些企业毫无发展，几经转手之后，要求投入国家怀抱，而国家不去听从命运的呼声，却总是重复老一套，去给工厂寻找新主人。然而这是拖延不了很久的，唱老调的人迟早会厌恶自己的调子。政府可能继续蛮干一个时期：试用各种办法支持资本主义，花费不少卢布来巩固这种工业组织形式，然后发现使俄国经济独立而不依赖外国人的希望如同泡影，大生产仍然非靠外国支持不可，仍然耗费着大量的国民资财——或直接取自政府，或间接以出售产品的形式搜刮消费者（在保护关税制度下出售产品的一部分收入实际上是对国内生产者的纳税），我们认为，政府最终会觉悟到向我国移植西欧制度的希望是落空了，必须要么让大企业听其自然走向灭亡，要么收归政府管理。这样一来，生产成本也许不会降低很多，但可以达到以下几个十分重要的结果：第一，生产实行专业化并开始注意技术新成就，虽然要比欧洲慢一些；第二，工人的命运将得到保障，因为国家不追求利润，能够付给工人足以维持象样生活的报酬，逐渐训练他们管理企业，以便将来把一切管理工作交给他们，通过这种方法还可以达到私人生产所达不到的另一个目的：造就一批与本厂密切联系的熟练工人常备军；第三，如果随之将铁路收归政府所有，那么资本积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亦将枯竭；这种积累如果说在西方有一定意义，那么在俄国却毫无意义，因为这样一来，集中起来的资本在我国将不是用来促进工业向进步方向发展，不是用来组织高级的生产形式，而是用来单纯为一小撮幸运者剥削广大居民服务。这个目的并不是那么高尚的，不值得为了它去支持和促进资本形成的过程。

读者会问，这一切是不是空想呢？转归国有之后情况是否会有

好转；有才干的、善于严格按照技术规程组织生产的人是否能成为企业的领导者；工厂的行政部门是否会关心工人的福利而不是相反地去克扣他们来肥自己的腰包；这样一来，资本积累过程是不是只会改变一下外壳，而资本家—盗窃国库者是否会取代现代生意人？

读者们，是的！假如明天就实现了我们设想的一切，那么就会出现你们所估计的情形。在现代社会里，盗窃本能是非常强烈的，虽然形式可能变换，但在最近的将来还会存在。正是社会上的这种盗窃趋势使我们的方案不可能迅速实现，因为上面谈到的工业改组只会消灭盗窃者迄今为止所采用的通常手段，尔后还会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出现新的盗窃手段，这种新手段能否被发现很难预料！我们再重复说一遍，盗窃者的现代领导人一定会阻碍改革，这种改革的最新结果很可能就是改变盗窃形式。

上述工业改造要产生良好结果，只有在我国社会生活的整个方向改变之后，只有当公众一致认为资本的领导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权是俄国生活中的祸害，一致认为国家走向进步的必要条件是人民的活动不受任何限制，公共机关严格遵守工人群众利益的原则，并且不允许这个原则被其他任何冠冕堂皇的提法弄得模糊不清的时候才有可能。那时就会出现目前还不存在的、能将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向国营及合作社营方向改造的事业承担起来的公正而有才干的活动家。

第三章 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化

……手工业中社会化劳动方式的组织过程进行得极端缓慢。少数手工工场主发财的结果只是单纯扩大了他们的生产规模，没有使工场手工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这种生产的积聚不能消

除小作坊同时存在的可能性。近数十年来，手工业的非资本主义化在手工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而生产积聚在少数较大作坊中则非常罕见；在一个地区先是开设大型作坊，尔后又分散为较小的作坊，这类事实比比皆是。我国手工业的这种趋势有它的基础，那就是第一，总的国际条件不利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工业人口没有完全割断与土地的联系。相反，我们一边巩固着这种联系，一边剥夺俄国当地资本主义现有的基础，造成按劳动组合原则发展社会劳动形式的条件。很可能通过劳动组合实行劳动社会化比过去在本国资本主义领导下进展得更快，过去进展慢的原因是我国资本主义对于利用完善的生产方法及劳动分工的优越性不甚积极，俄国资本主义的这种消极态度又是因为我国销售条件不利和手工劳动便宜的缘故。劳动组合则不然，除去力求致富以外，它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还有一个动机，就是它们十分自然地愿意缩短自己的工作时间，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因此，在产品销售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们仍然能够关心采用各种完善的技术。

这个道理虽与社会科学早已形成的关于资本的特性和使命的概念相矛盾，然而不应忘记，社会科学所研究的资本是在英国这样一个资本得到了自然发展并达到了极端繁荣的国度里进行的，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资本远非到处都能开出如此绚丽的鲜花……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无须特别害怕资本主义，也无须指望它。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大规模地创造工业的新形式，既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能保证生产者的独立自主原则，并适应这一原则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资本主义的工厂体制未必是符合上述要求的最好形式。资本组织劳动的唯一目的是用最少的费用获得最高的产量。如果为了人民的利益组织社会化的劳动，那么除去经济上合算的原则之外，还会有其他顾

则,诸如:给工人尽可能多的休息时间,避免单调操作产生的使人愚钝的作用以及人员和生产过分集中对身体的有害影响,排除儿童以至妇女参加生产,等等。为了满足以上这些要求,很可能必须创造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的工业单位以及类似瑞士钟表业实行的那种体制。这样一来,西方的工人问题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只是由一些工人小组代替资本家,而不改变资本为工人准备停当的组织就已经不够了。诚然,资本组织劳动,但其组织形式不适合于工人,那么工人自然必须改造这种形式。

我们相信,正是俄国将成为工人在完成改造组织的工作中作出榜样的国家。俄国既然未能担负为自由而斗争的使命,那就让它担负起实现平等和博爱的使命吧!

但是我们明白,要想根据人民的原则组织大工业,并以此排除资本,我国必须从整顿土地关系着手。否则,平等的太阳刚刚升起,富农就会挖掉它的眼珠。

第四章 地主经济当前的地位 及其对劳动力的态度

俄国大生产和小生产之间最大的搏斗将发生在农业领域;由于这一生产领域在我国还会长期占统治地位,所以它采取何种形式对国家整个经济组织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资本一旦占领农业,就差不多全盘胜利了。现在我们来查看资本在这一领域的进展情况。

我们说,俄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是我们的专长,我国的一部分领土不久前甚至被认为(可能现在仍然有人认为)是欧洲的粮仓,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我国农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具有最有利的条件。我国农业在国际上的声誉,俄国粮食有

一定的销售市场，农民土地不足和工人工资低廉——显然这就是一些有利的条件，即使还不能说是使我国私人占有制经济繁荣昌盛的条件，至少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私人占有制经济在农业劳动社会化中的作用；这个农业劳动社会化的任务在西方是由资本担负起来的，据说在俄国也必须由资本来承担。那么，资本是如何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呢？在农民解放十五至二十年后的今天，农业生产是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呢？诚然，农民改革曾经不能不引起私人占有制经济的危机，因为私人占有制经济目前必须建立在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新的原则之上。但是，自由劳动在我国并非解放后首次出现，这是第一；其次，自由劳动在我国并不缺乏；第三，赎买手续为地主提供了建立新经济所需的资本。最后，农业的方向与贵族阶层的昌盛并无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贵族如不能适应新形势，就会有别人来代替他；目前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旧庄园的命运，而是新经济的性质。这种新经济有机会显示自己的存在和表现自己的特性，事实上它确实出现了并且显示了力量——难怪贵族到处都在抱怨失去了祖传的土地，抱怨土地转到了农民及其他阶层手中。“二月十九日改革，正如任何大动荡一样，初期曾引起了颇大的波动。随后这种波动渐趋和缓，并随之为农业开辟新的基础和新的道路，而且就农业未来的发展而言，这个道路尤为笔直，这个基础尤为牢固。一切生产部门在此动荡时期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实难认为完全正常，因此，论及这些现象时，必须考虑到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任何受到震动的大规模生产所必然要经历的”。^① 我们可以同意这个时期确实是过渡时期的说法，然而，既然一方面非黑土地地区地主的耕地缩减，相当大部分农民的份地荒弃，一方面譬如粮食出口同时在不断增加，由六十年代初期每年八百五十万俄石达到七十年代

^① 《钦设俄国农业及农业生产率现状调查委员会报告汇编》，报告第4页。——沃龙佐夫注

中期三千万俄石这样的事实，就使我们可以设想私人土地占有制已相当成功地打开了新局面，已能够向我们显示它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它将在农业中确立的美妙前景。委员会的报告也承认这一点：它也谈到改革后经济的新道路和新基础。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尤为笔直的道路和尤为牢固的基础”是怎么回事。

关于我国农业状况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官方各委员会的文件中，虽然我们手头有俄国农业及其他方面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各种报告，我们仍然愿意引证瓦西里契柯夫的著作，这位作者除利用上述材料之外还利用了其他材料，他的著作作为他赢得了我国农村生活专家的声誉。不过，我们还是根据需要既引用报告的材料，也引用其他方面的材料。

那么，资本是否已着手实行农业劳动的社会化，是否已将简单协作和复杂协作运用于农业，是否已实行由粗放耕作向集约耕作的过渡，还是只声明坚决准备这样做，是否已使用机器耕地，一句话，它是否完成了体现劳动社会化特点的一切改革，如果业已完成，那么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那些结果是否已成为现实，即小农场是否由于无力与大农场竞争而减少，独立的农民经济是否被消灭，农民是否由于自己的小庄园被大农场所排挤而不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影响造成土地减少而变为雇农？现在我们就草原地带及黑土地带的农业状况作一概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黑土地带的几个大俄罗斯省份。这些省份的特点是人口稠密、异常肥沃的黑土层深厚，也就是说，具备“能够保证农业繁荣”的条件，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有利条件。而这些有利条件却产生了如下结果：“这一地带全部可耕地目前已呈现出牧草贫瘠、一片荒芜的景象，原因是自然草场已全部翻耕又无人播种牧草，”“饲料短缺，畜牧衰落，肥料减少，而正当耕地需要肥料的时候，用于土地施肥的资金却减少。”这里农业收入急剧增长，但“令

人担心的是，这种暂时的突飞猛进会引起更为强烈的反作用。”总之，这里我们目前还看不到任何有可靠前景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只是使用土地极不合理，不管这种不合理的使用土地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还是在其他基础上进行的，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我们还是看一看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的发展规模和打击小农生产的程度吧。在瓦西里契柯夫公爵的著作中我们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材料，他只是谈到，这里有多少私人占有的土地是出租的，承租者都是农民或农民团体，据土地占有者说，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善于经营的承租者。据此已经可以肯定，农民经济并不次于地主经济；但是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们再来看一看委员会的报告，不过我们力求简略，并着重注意自由雇工的庄园发展的程度，因为只有这里才有可能采用大生产的方法；对分制或劳役制与其说是经营制度，毋宁说是收租制度，这可能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问题了。

据马林斯克教学农场经理说，在萨拉托夫省自由雇工的庄园很少见到，这里的土地占有者租给农民土地大多是收现金或要劳役；萨拉托夫县的一个承租者也证实了这一点。从不同县份来的人中有十个说自由雇工的庄园占大多数，其他人说自由雇工的和对分制出租的数量相当。但无论怎样，即使地主土地靠自由雇工耕种压倒对分制出租，大庄园也是和农民一样采用三圃制（很少有材料提到采用改良耕作法和先进农具），农民经营的农业不仅没有缩小，他们的播种面积反而明显增加，而地主的播种面积，据某些材料说，“1861年以后逐渐减少，并且用自由雇工耕种土地因工资高昂、工人怠惰无利可图而继续减少”。在奔萨省，据委员会询问过的大多数人说，种田都实行对分制，很少雇工耕种。在坦波夫省，大多数人说，主要是雇工种田，另一部分人说，主要采用劳役制。耕地面积总是扩大了，虽然某些县股只是农民的耕地扩大了，而地主的耕地却缩小了。在奥廖尔省实行各种制度的都有，奥廖尔县则

自由雇工制占统治地位，牧草播种已逐渐推广。库尔斯克省也是这样：一些县自由雇工制发达，另一些县对分制发达，还有一些县则多用劳役制，农民经济状况良好，虽然农民的土地是从土地占有者那里租来的。^① 总之，可能除某些地区零星小块地上有一些高级经营方法的萌芽以外，没有什么事实明显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有什么象样的发展，更不用说对农民经济有什么破坏了。

在新俄罗斯边疆区自由雇工耕种土地占统治地位，但小农并未因此趋于消灭，相反，雇工耕种土地本身却日益缩小，而不是扩大，如：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一些县的土地占有者说，这种制度逐渐为租地给农民和其他人的方法所取代；在比萨拉比亚承租者是犹太人，歇荒耕作制占统治地位，这种制度使土地迅速变得贫瘠，收成随之逐年减少。^② 草原地带东半部“农业几乎全部掌握在农民手中。农村居民不可遏止地追求扩大耕种面积，攫取大量的农田，使这一地区自由雇工和劳役制经营的农业被排挤；地主的耕地很少，出租制占主要地位，农民不愿当长工或日工，同时由于土地占有者漫不经心，在投机者和承租商的推动下越来越广泛采用所谓歇荒制这种残酷无情的耕作制度，这种制度对承租者有利，对土地占有者有损，无疑对国民经济是极有害的。^③ 在萨马拉省，大承租者一个人就租佃数万俄亩土地，然后分成小块转租给农民，租金自然高出原来的很多。投机生意并不就此为止，虽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虽可雇佣廉价的劳力，然而老板们不愿实行集约耕作制。相反，他们关心的只是尽可能大量播种，不等收割就预售青苗。投机活动发展到如此程度：种下的庄稼在各个生长阶段，甚至刚刚翻耕尚未播种的土地就不断地被收购、转售、典押、转押；庄稼成熟之前就转换

① 《钦设委员会的报告》附件一。——沃龙佐夫注

② 同上书。——沃龙佐夫注

③ 《土地占有制与农业……》第1卷第514页。——沃龙佐夫注

两三个主人。”^① 总而言之，简直象是交易所！对“欧洲粮仓”的土地的这种无情盘剥使得平均收获量从过去的六至八倍于下种量下降到七十年代的三至五倍于下种量。^②

“在新俄罗斯各省份虽然工资很高，自由雇工庄园仍能维持，而且收入不错，而在小俄罗斯已在普遍抱怨经营农业不划算，当然这种抱怨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是假意的”；于是“地主的耕地减少，土地占有者自己只留下小块土地种植菸草、亚麻这类最消耗土地肥力的作物，大片土地则出租。”这里的承租人与大俄罗斯不同，是大承租者，大多是犹太人，他们长期承租，但不是为了按资本主义原则实行正确的耕作制度，而是为了转租给农民或用其他办法投机取利。^③ 那里独立的大农庄失去基础的程度可从下列材料中看出：1877年切尔尼哥夫县没有一个用自己农具耕种的庄园，博尔兹纳县这种庄园有四个，其他庄园实行共耕制。这两个县三分之一左右的庄园出租，出租的土地有百分之四十落入犹太人之手，参加这一行业的犹太人逐年增加。犹太人交付极高的地租，但彻底耗光土地的肥力；他们不养牲畜，不给土地施肥，不修葺庄园，不顾协议滥伐森林，等等^④。在西南边疆区占统治地位的也是这种由大承租者一揽子承租的办法，这里的大承租者也是犹太人和波兰商人。土地租到手之后，他们把一部分土地分成小块转租给农民，另一部分土地则用来种植开销最少收入最多的作物，如瓜类、大麻、亚麻和黍子，以榨取最大利润。^⑤ 现在我们举农业调查委员会收集的材料加

① 吉利亚兰斯基《俄国东南部社会经济关系》，载《言论》杂志 1873 年第 3 期。——沃龙佐夫注

② 扎斯拉夫斯基《俄国农业体制问题》，载《祖国纪事》杂志 1879 年第 1 期。——沃龙佐夫注

③ 《土地占有制与农业……》第 2 卷第 638—640 页。——沃龙佐夫注

④ 瓦泽尔《切尔尼哥夫省的犹太承租者》，载《祖国纪事》1878 年第 10 期。——沃龙佐夫注

⑤ 《土地占有制与农业……》第 2 卷第 640—642 页。——沃龙佐夫注

以补充,我们只列举与改善土地经营和使用机器直接有关材料,并且仅限于黑土地带大俄罗斯各省份及新俄罗斯边疆区,这些地区土地占有者自己经营的农业还占主要地位或者至少还维持着。

在这方面,各种材料反映多少比较一致的省份,我们只找到一个,即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改革后,这里“经营着较大规模的农业,并且开始使用机器”(钦设第六委员会报告第3145号答询)，“只在最近几年地主才开始使用改良农具,而且也只有少数地主(同上书,第3090号)”;土地耕种方法照旧,只是耕作较前精细(第2978号);粮食收获方法有所改变,使用许多蒸汽脱粒机(第2980号)。在巴赫姆特县地主大多用拉姆森式犁耕田(第2732号)，“目前由于雇工费用昂贵不得不使用收割机”,但也只是刚刚开始使用(第2740号),由于雇工费用昂贵,地主越来越情愿将土地出租(第559—561号)。总之,所有人都多少明确地指出那里正在使用机器。

关于其他省份的反映就不是那么一致了。例如,关于赫尔松省,阿巴扎先生说:“土地滥耕,方法野蛮,没有任何改进,没有运用现代知识,”他还表示担心,这样土地会完全失去肥力(第3226号)。艾尔德利先生则相反,他说:“私人占有者的庄园有改善,原因可以认为是使用了机器”,然而,他又补充说:“一般说来,地主的耕地减少了。”(第3250—3253号)我们从另一位专家的材料中知道:由于不会修理造成使用机器的困难(第1746号),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在新俄罗斯边疆区全区使用着将近一千台锅驼机。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不甚明确。例如,关于萨拉托夫省,库普费尔先生说:“除少数例外,庄园都没有掌握优良耕作方法(第2543号);少数庄园有机器(第1812号),地主的土地常常转入商人手中(第1808号)”。克里夫斯基先生虽然说“近十年来萨拉托夫省地主的庄园确有改善”,但对优良种植方法及机器问

题只字未提。另外,关于伏尔加河流域总的反映是,那里广泛使用脱粒机和风谷机,其他机器则没有得到利用(第786号)。在辛比尔斯克省“仍在使用的约是柳里克时代^①的农具”,购置的机器堆在库房里不用,其原因是粗放经营占统治地位(第1078号),然而在科尔松县经营有所改善,使用了改良农具(第1278—1286号),在塞兹兰县正在采用蒸汽脱粒机和其他机器(第2108号)。在哈尔科夫省大土地占有者的庄园有显著进展,但这种进展不是表现在更加精耕细作和更多施肥方面,只是更好地进行收打,所以他们购进收割机、蒸汽脱粒机,并不购置新式犁之类的农具(第2273号),在苏梅县几乎所有的地主庄园都租给了农民(第314号)。在库尔斯克省“有些庄园有所改进,但为数不多”,“农业经营的普遍结果是土地的产量降低,大庄园和农民小庄园都是这样”(第3197—4000号),许多庄园被商人买去经营各种养畜场(第2487号)。“大多数土地占有者都是以破坏性的掠夺方式经营农业,因此根本就谈不上改善”(第2751号),根据一份材料说明:农业处于原始的状态(第2041号),“农具方面呈现出某种过渡状态”,经营毫无起色(第2235—2239号),在利哥夫县“仍用以前的方法种田,一般说有所改善,采用一些改良农具,如脱粒机、风谷机”。沃罗涅什省有一些地区实行了牧草播种,歇荒耕作制趋向于改为轮作制”(第2662号),“沃罗涅什县所有的土地占有者都有脱粒机和风谷机”,改良耕具由于缺乏懂行的工人已不再使用(第308号),在瓦鲁伊县“耕作方面明显有所改善”,正在购进脱粒机、风谷机(第359号)。在梁赞省“大庄园和小庄园都不使用改良农具”(第2608号),农业衰退,耕种方法毫无变化。奥廖尔省各庄园不愿采用改良耕作方法(第2543号),在利夫内县只有一个庄园有一架蒸汽机,地主的耕地在减少

^① 柳里克是公元九世纪时罗斯的一个公爵,862年率领民兵到达诺夫哥罗德。柳里克世家后来成为统治俄国的王朝(912—1598)。——编者注

(第400号)。在坦波夫省只是那些爱好者有改良农具，许多庄园被富农收买(第683—741号)；土地分散出租很普遍，自耕土地所剩无几；个别庄园有点机器(第812—823号，亦请参看第892号)；庄园状况恶化(第1687号)。奔萨省的大土地占有者的庄园有某种程度的改善，“许多庄园花费了大量资金购买改良农具，有些庄园实行了轮作制”。中等农场则不是这样(第1172号)。

我们匆匆巡视了整个粮仓，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我们到处看到土地价格上涨，以及土地为占有者提供越来越多的收入，^①然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农业已牢固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第五章 大农业、资本和农产品外销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想首先对通常用来解释大生产为什么处于萌芽状态的第三个理由——资本不足和贷款利息过高的意义作一评价。资本不足这种怨言只是出于误解，庄园主们自己就能解决这种误解。例如，谢瓦斯奇扬诺夫先生谈到西南边疆区农业不景气的原因之一是“资本不足甚至完全没有资本”，隔三、四行他又接着写道：解放农民之后“出现了势头强烈的农贷，出现了获得大量贷款的可能，土地占有者迷恋于这种可能，开始典押土地”，可是他们不但不去节衣缩食地细心用新原则经营农业，相反却极端无能，大手大脚，“仍然过着和从前一样的豪华生活”^②。叶尔莫洛夫列举了俄国农业不景气的原因之后说：资本问题“大概是最令人头痛、最妨碍我国农业正常发展的一个方面了。在俄国贷款利息高，

① 参见瓦西里契柯夫公爵的著作。——沃龙佐夫注

② 《农业与林业》1878年第3期。——沃龙佐夫注

资本短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可是隔一行他又接着写道:“近十年来大量开设的土地银行积极地向提出要求的庄园主提供资金”,然而,且不说贷款利息高这一点,单说“从各银行借到的资本,其中未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真正用来改善农业的”。我们还记得那些赎买证书,据上面这位作者说,这些赎买证书“大部分都已过早地从我们的土地占有者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①,我们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缺乏资本的抱怨至少是莫名其妙的,它只不过是庄园主为了替自己不合理地经营农业辩护而编造的托词。说实在的,截至1877年止,除归还国库债务扣除三亿之外,地主从政府手里得到四亿赎金贷款,又从私人银行得到将近三亿,这样,分到拥有六千五百万俄亩土地的七万一千大、中土地占有者手中,平均每个土地占有者得到将近一万卢布,也可以说,每俄亩分得十二卢布;这样,缺乏资本又从何谈起呢?到目前为止,信贷从未间断;例如,去年沃伦省的地主就以土地做押得到二百五十万卢布。所以我们认为《斯摩棱斯克消息报》说得更为正确:“赎金贷款、广泛的银行信贷以及变卖原始森林所得的大量款项为地主提供了足够的流动资本”,如果他们仍然不断唉声叹气、唠唠叨叨,那只能说明他们的使命业已完结,“无论是规定地主和工人关系的特别法令,或者是各种农业代表大会和农业展览会,或者是阿里高斯种或其他任何种的耕牛,对他们来说都无济于事。

如果说“缺乏”资本只是大庄园内某些不便直说的事情的表达方式,那么贷款利息高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工业越不发达,利率就越高,而俄国恰恰是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正常条件下,如果生活按部就班发展的话,贷款利息高本来不应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多大妨碍,正如在美国劳动价格高并没

^① 《农业组织》第1卷第15—16、43页。——沃龙佐夫注

有对它的农业和工业的繁荣有多大妨碍一样。利率高并不是原发性现象，而是我国生产和交换各种条件相互结合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劳动价格低廉。高利率的出现是我国经济组织产生的结果，因此它不可能与我国经济组织处于无法解决的对抗状态，不可能成为它所由产生的过程灭亡的原因。任何工业部门，如果它很快适合当时当地条件，应该能够补偿资本的消耗，提供当地的平均利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某一生产形式难于达到国内通常的资本补偿，这就等于说，这一生产形式已经过时，已经变成温室的花草，自然环境对它来说过于严酷，使它经受不住这个考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无力达到其他工业企业克服或大或小的困难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说，我国地主庄园抱怨贷款利息过高，可以认为是它们逐渐衰亡的许多迹象之一……

……近来不仅许多政论家，甚至我国农艺家中最有头脑的人，也开始提出俄国大量出口粮食是否有利和是否可靠的疑问。他们看到作物单一对土壤的有害影响，也看到俄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之间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增长的竞争。

确实，我国粮食出口在不断增加，1872年是一千六百万俄石，1878年差不多达到四千二百万俄石。美国粮食贸易也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发展得更快。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我们出口的极限，或是仍有可能增加出口，尚难肯定；而美国仍能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吸收更多的人员参加农业生产来长期不断提高它的粮食生产能力，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知道，在美国当一个工厂工人或作一名雇员是向独立农业生产者的过渡，一个人从欧洲来到美国，当几年雇佣人员，积累一笔钱之后，买一块土地，就成了农民，这样又为新来的人空出了雇佣劳动的位子。正是这个原因，北美合众国的工资总是能够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平上。）既然如此，人们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不断增加的大量粮食，谁去

消费，会不会在近期内迟早要发生粮食过剩，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恐怕总会有一个要倒霉的。

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无中生有，危机时刻已经迫近，甚至可能已经到来，这有以下事实为证。大家知道，去年(1879年)对欧洲是困难的一年，由于歉收，单粮食一项，欧洲就缺少四千二百多万俄石，欧洲遭受的这场灾害使它的粮食供应者赚了一大笔钱，例如，单是美国就卖给了它三千一百万俄石。今年(1880年)情况不同了，据我们了解，那里的收成只略低于中等年景(英国和法国低百分之十，但据官方最近统计数字，粮食收获量即使在法国也比中等年景还要高一点)，结果，需要进口的粮食比去年将减少一半以上。美国今年不仅种植粮食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一，而且收成可能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七，预计大约有三千五百万俄石粮食可以出口。如果说这种形势还不致于使某一农业国发生农业危机，那么其原因是农业国之一的俄国已经在更早的时候发生了危机：我国1880年的歉收，不仅使美国在业已缩小的国际粮食市场上避免了竞争，而且还可能为它开辟新的、即使是暂时的销售市场。然而，很明显，这种情况(至少在国际贸易方面)纯系偶然：假如我国今年是正常年景，粮食就会充斥欧洲市场。这次虽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然而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两三年之后，当我们度过了这次内部危机，开始恢复元气，从而特别需要畅通无阻的对外贸易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新的怪物——缺乏销路，它会重新破坏我们的农业生产。是不是欧洲会再发生一次去年那样的歉收，或者我们的幸运的竞争者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最终也交上恶运，我们就谢天谢地呢？但是把自己的正常生活建立在别人倒霉的基础上是很遗憾的，让自己的命运受欧洲的丰歉这样的偶然机会所左右，也是很不明智的。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和贸易正常发展的含义是产品的供应量力求比需求量增长更快。直到目前为止，这主要表现在加

工工业方面,因此对俄国这样以农为主的国家关系不大;看来,现在农业领域也开始受这个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支配了。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最甚的将是我国,因为我们对于竞争最缺乏准备。

粮食生产已经达到这样大的规模:尽管俄国最近几年歉收,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供应量即使在1880年仍高于需求量……

……结果是,争夺市场的斗争越残酷,各国就越努力更好地装备起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扩大销路,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某一国家取得成功的原因。有趣的是,各国都在为同一问题操心,都认为别国是比自己更幸运的竞争者;却没有一国想认真改变一下体制,从为别人生产改为关心本国需要。难道我们这个武装最差的国家明知只有挨一顿四面八方打来的耳光,也一定要参加这场混战吗?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尽可能不依赖别人,尽力满足本身需求,不是更明智一些吗?我国人民的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啊!但是为了走上这条真正的民族发展的道路,首先必须给人民以满足自己一切需求的资金,也就是说,必须给他们创造可能为自己劳动的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大力支持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农民经济。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俄国以及处于类似状况的国家,必须改变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从前,这些国家的政府关心的是用关税保护本国生产以及为本国生产寻找国外市场。在贸易工业国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寻找国外市场的办法一般是成功的(虽然不是没有斗争)。现在不同了,现在刚刚开始发展的民族必须忘记那些国外的市场,因为这些市场早就被发达的邻国所占领;只靠保护政策发展工业,显然是不够的。不仅需要保护国内市场不受外国竞争,而且还要努力扩大这个市场,否则生产就会承受不住本身成就的压力而灭亡,亦即停止发展。我们有普鲁士政府的例子可作借鉴:普鲁士政府为了扶助牛奶业,曾建议将牛奶产品卖给军队和孤儿院作

食品；但是，工业显然不是依靠这种扩大销路的办法能够得到发展的，问题不在于用一种产品代替另一种产品，而在于增加总需求量，亦即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国大工业近十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下述原理：尽管保护制占统治地位，尽管我国铁路系统、银行业务及其他促使资本主义生产顺利扩大的条件相当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却在缩减，而且可能是在绝对地缩减，这种缩减不仅表现在吸收工人数量方面，而且表现在资金周转方面。百般的努力，万般的操心，也未能拯救我国的大生产，大生产恰恰是在它认为最可靠的支柱上碰了壁，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人民失去土地，人民独立经营受到束缚，加之税务负担迅速增加，人民日益贫困，并且因其贫困而对各种产品的需求随之减少，这就影响了大生产，缩减了它的周转额。

由此可见，我国工业结构的重心应该放在人民的小生产上。大生产在我国生活中会长期地起着从属的作用，它实际上一直是起着这种作用；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努力使它居于主导地位，为此我们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物质利益；那时，即使在社会自觉采取一些措施的情况下，大生产也只能起到与其实际意义相适应的作用。

人民生产不仅在俄国一国正在抬头，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的自由翱翔都在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可以说，只有英国配称为纯粹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美国，工业掌握在大资本手中，而土地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由土地占有者自己耕种的。

在法国，小农业不但安然无恙地存在着（这里农业雇佣工人只占农业阶级的百分之十四），甚至还在排挤大农庄，虽然工人从比利时、西班牙、皮蒙特不断涌来，虽然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农场主仍在抱怨缺乏工人。工人知道农场主少不了他，便态度骄矜，受不得老板一点批评，经常以辞职相威胁。这使资本家不愿意把力量

和资金用来搞农业，因而许多农场废弃，租金下跌。法国的研究人员把这一切归咎于农业工人数量逐渐减少，而减少的原因部分由于农业工人变为小私有者，部分由于农业工人转向工厂。至于后一原因，我们有根据怀疑它的真实性。如果确实是这样，如果确实部分农民转向工厂，那么这个阶级的增长速度应比法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要慢，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情况使我们有充分根据认为，农业的独立经营方式较之雇佣劳动方式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在法国看来已经达到了它的地域条件和时间条件所允许的最高水平，今后它的发展大概只能靠集约化，即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靠吸收新工人进工厂。认为那里劳动力已经在由工厂雇佣劳动向独立的农业经营及其他非农业经营倒流，则是**有根据的**。第一个理由是：1872—1876年期间，法国三千六百万人口每年增长率是百分之零点五四，^①同期农业阶级从18 573 325人增加到18 968 605人，^②即增加了455 480人，即每年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农业阶级的增长比整个人口的增长快百分之十一，这只能靠其他阶级的减少来达到。从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农业雇佣工人的数目也在减少，由此我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与资本主义理论相反，在法国，人民的独立经营在扩大，小农业越来越普遍。第二个理由是：工业阶级增长本身还不能说明大生产的普遍化，因为近年来在巴黎（大概在欧洲其他大城市也是一样）建立在工人高度技艺基础上的高级小手工业（钢刻、瓷绘、龟壳、象牙、山羊革、玻璃、麦秆、毛皮制品等）日益发达。“精巧的手工艺品在巴黎占有显著地位；专门技艺越来越显得突出，许多生产部门的工业企业规模越来越小。”^③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死机器

① 扬松《比较统计学》第1卷第343页。——沃龙佐夫注

② 《农业与林业》1880年第7号。——沃龙佐夫注

③ 《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辑第3部分第58页。——沃龙佐夫注

制造的产品充斥市场，以致新增加的人口在工厂找不到位子，不得不在工厂以外，在手工劳动领域找出路，为此，他们就只好努力以制品的巧妙取悦于买主。很自然，在这种普通物品都已用机器生产的国度里，自由手工劳动必须去注意生产那种需要高度技艺和精致加工的物品。因此，我们有根据说，当前法国的情况不是农民失去土地，也不是农民变为工业无产者，而很可能是相反的过程，即独立的小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第三十二章里，我们还要对西方小生产的状况提供更加详细的材料，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学者们非常惊奇地发现，统计材料表明，在普鲁士并不象他们通常根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理所得到的观念一样，大工业完全不是那么发达，小工业也不是那么衰落。现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明白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明白了在将来工业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一定会遇到更大困难。

至于说到我国的地主农业，我们应该说，对于从我们上面阐明的原理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结论，农业政论家们只同意一半。他们虽然不可能看不到威胁着我国粮食贸易的危险，可是他们并不放弃发展指望外销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想法，他们还在努力为资本主义农业想出新的路子、新的活动领域。例如《农业报》，它本来对我国粮食贸易已失去信心，当它了解到1880年夏天彼得堡杜马为了降低肉价而运输鲜肉的成功经验之后，差不多完全放了心，甚至欢欣鼓舞起来。这家报纸写道：“本市市政当局所属降低肉价委员会，以其积极认真的态度，对两个京都和各大城市以及俄国的畜牧业，作出了目前甚至难以估价的重要贡献”，^①“肉类运输方法问题之所以意义巨大，不仅因为它是有关两个京都和各大城市的供应

① 《农业报》1880年第37号。——沃龙佐夫注

问题,而且因为它是有关我国畜产品的出口贸易,从而也是有关畜牧业以及整个农业的发展问题。”“组织鲜肉运输是使我国经济摆脱由于害虫大量繁殖和美国在粮食贸易方面有力竞争给我们造成的困难的手段之一。”^①接着,这家报纸举出数字说明根据《农业报》的方案应该发生的变化:1878年从南方各港口曾运出价值六千九百万美元的小麦,而美国人运往欧洲的肉类的价值也是这个数目;“因此,假如我们能够将美国肉类排挤出世界市场,那么南俄各庄园就可以完全不再生产供出口的小麦。”^②

“真能排挤出去那就好了!”全部问题也正在这里,而那位不顾美国不久前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给我们的教训的政论家却极其迅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瞧,据《农业报》估计,因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牲畜可能比我们草原的牲畜略微便宜一些,而我国草原的牲畜运往欧洲的运费却比他们要低得多,所以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们拥有同澳大利亚进行竞争的广泛的有利条件,只要(又是这个不可靠的“只要”!)我们能够利用运输鲜肉的新技术成就就行了。”请看,全部问题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困难,只要制造出保证鲜肉夏天不致腐臭的车厢或者轮船,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国农业进步的道路也就扫清了。

我们本来也许会对《农业报》的论点加以考虑,本来也许会跟着它去漫游无边无际的“幻想”世界,如果这些论点不是处处紧跟着“假如”二字的话,如果最后这几个“假如”不是为某些“现实”事例,譬如在那篇文章中叙述的彼得堡的肉类供应情况所证实的话。这件事很具有表征意义,它非常鲜明地描绘出我国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的面貌。而有些人的意见恰恰是要这个资本主义来克服这

① 《农业报》1880年第30号。——沃龙佐夫注

② 同上书,1880年第26号。——沃龙佐夫注

么多“假如”、“只要”之类的东西。

我们涅瓦河上的首都每年消费四百万普特左右的肉类，其中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是运进来的（冬天是运进成品肉），其余三分之二是靠外地赶来活牛，由本地屠宰。用不同方法运到彼得堡的肉，成本是不同的，因为活牲畜的运费，如果由萨拉托夫运来，每普特是一卢布二十二戈比，由塔甘罗格运来是一卢布七十八戈比，成品肉的运费是五十七戈比和七十戈比，差价视远近不同为六十五戈比至一卢布八戈比。虽然如此，两种肉却能在同一市场上和平共存，而且以相同的价格出售，当然这个价格是足以低偿运输活牲畜的运费的。所以，用来运输成品肉供应彼得堡的资本比之用来做其他生意，譬如运输活牲畜的资本，能赚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经济学教导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应该流向收入高于一般水平的贸易部门；但是这门科学的指示只是对于真正的资本主义才是有效的，我国的资本主义无所谓规律，因此就发生了与科学所教导的正好相反的事情：资本家不但没有被吸引去搞赚钱生意，他们却被垄断势力从那里排挤了出去。例如，1877年彼得堡百分之五十的牲畜贸易掌握在六个牲畜企业家手中，^① 现在百分之五十六的切尔卡瑟牲畜屠宰业只属于两个商人^②。既然如此，还能说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拙劣可笑的模仿吗？

而现在人们居然要求具有这种特点的中国资本，这种无力把一块肥肉从几个垄断者手中夺取过来的资本，去和美国竞争；居然要求这种资本去大规模地组织整个欧洲肉类供应的工作，而它现在连供应一个彼得堡都无能为力。不久前，杜马从奥伦堡运来的肉每普特成本三卢布七十五戈比，而彼得堡的肉价是五卢布五十

① 参见《自由经济学会学报》1878年第5期。——沃龙佐夫注

② 参见《农业报》1880年第33号。——沃龙佐夫注

戈比至六卢布五十戈比，用来做这项生意的资本在几个月时间内就能生利百分之五十以上，可是我们这里却找不到为了这么大笔钱财而去降低价格的企业主，还得由那种不从资本主义生意经出发的社会团体去搞城市肉类供应工作。虽然这项生意非常简单，只要把外国早已实行的一套办法拿来实行就是了，可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却搞成了一件大事：运肉的火车到站时间在报上公布，到车站去欢迎的不仅有普通老百姓和肉商，甚至还有大臣。《农业报》真是喜出望外：新大陆是我们发现的！据这家报纸说，这项措施“许多人觉得是不实际的、脱离现实的、幻想的，在美国和英国那里行得通，我们这里行不通；可是现在谁也不会同意这个意见了。这件事就是证明那种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新证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认为那种在欧洲本来是平平常常的事是幻想，但是从《农业报》的赞美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点，那就是：我们离美国还差得很远，因为我们刚刚才试图学习西方的榜样，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就当作伟大的发现，当作“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证明而大肆吹嘘，而这种试图可以说并没有达到目的，也未能降低肉价，因为当我们还在准备的时候，天气就冷了，于是我们的锦囊妙计也就成了枉费心机；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才用不着担心这样的学生去和它竞争呢！

如果全部问题只是技术和财政方面的可能性问题，那么为什么1877年我们出口了四万七千头牛，而美国出口了五万七千头，我们又怎么让美国在第二年将出口增加到了八万头，尔后又增加到了十三万六千头呢？问题很简单：我们1871年到1876年牲畜数量差不多没有改变，而美国1870到1878年期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最近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俄国每一百居民约合七十五头牲畜（小牲畜折合为大牲畜），^①而澳大利亚二百五十万人口就

^① 参见《俄罗斯言论》1880年第5期上扬松的文章。——沃龙佐夫注

有七百万头牛和五千八百万只羊，^①也就是说比我们多六七倍！俄国牲畜价格在上涨，而美国最近三年来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五。^②甚至正当《农业报》幻想把大西洋彼岸各国从国际畜产品市场上排挤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已经着手在把俄国从它自己本国市场上排挤出去了。我国出口贸易最重要物品之一的羊毛不但正在降为次要出口货物，而且不久将不得不在本国市场上也采取防御立场。的确如此，六十年代外国原毛输入我国每年仅数万普特，而且还都是上等产品，到1876年和1877年输入我国二十万到二十八万普特，而1878年达到四十五万普特，1879年总值达五十多万卢布，而且与过去完全相反，我们得到的原毛多于毛条。最近几年发生了更为糟糕的事，《敖德萨市政公报》公布，1880年10月1日从南非驶来一艘轮船，装的是脏羊毛，这批羊毛是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也夫贸易商行运来的。《哈尔科夫省通报》就这件事解释说：这已不是俄国提出的第一次指责了，一般说来，从1879年起外国买主不但对价廉的（按《农业报》的方案应该是价廉的）俄国羊毛不感兴趣（他们不参加羊毛交易会就表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建议把未加工的、昂贵的（按上述方案应是如此）羊毛卖给我们；我们的人感到这项建议对自己非常有利，以致不但以普里维斯良斯克的工厂主为代表的“波兰阴谋集团”，而且我们亲爱的莫斯科绝对爱国的市民都走上了背叛国内市场的道路：莫斯科去年消费了五万普特外国羊毛，而且今年（1880年），我们看到，还在继续订货。^③我们同西方其他畜产品的贸易情况也并不十分令人欣慰。譬如，动物脂肪是我国最早的、而且在一个时期内是最大宗

① 参见《农业报》1880年第25号。——沃龙佐夫注

② 参见《农业与林业》1880年第7期。——沃龙佐夫注

③ 参见《新时代》1874年第1665号。——沃龙佐夫注

的出口项目,上个世纪末,动物脂肪对欧洲出口已超过了几百万普特。这项出口在继续增加,至三十年代已达到每年四百五十万普特以上。此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保持在三百万普特左右,六十年代下降到了二百五十万普特。出口减少的原因是,在生产中用其他物质代替动物脂肪,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在这项贸易中进行竞争。这两个国家“排挤我国产品,并对我国脂肪因其排挤已在所有市场上不断下降的价格施加压力”;如果我们找不到降低价格的办法,那么“我们将被挤出市场”。^①八年前的预言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实现:六十年代运出的是二百五十万普特,1874年输出了六十万普特,1876年六十六万五千,1877年由于行情低各项出口都有增加,所以脂肪出口有一百一十万普特;可是1878年出口下降到六十一万九千普特,1879年又下降到三十五万七千普特。但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闻所未闻的现象:外国脂肪进入俄国市场,并且威胁着这一商品的国内贸易。最初输入不多,几万普特,可是现在进口开始超过出口:截至今年(1880年)8月1日为止,我国进口脂肪五十四万五千普特,比去年同期多一倍,比这七个月的出口多三倍。此后的两个月差不多也是这种比例。这种转变使我国的油脂商人异常惊恐,不久前莫斯科商人通过俄国工商促进会向财政大臣提出请求对进口油脂征税,因为俄国本国油脂价格上涨得再也无力和外国货竞争了。大臣答应在重新审查进口商品总关税制度时考虑这项请求。脂肪和肉本是亲兄弟,它们的贵贱取决于相同的因素;要求我们的农村庄园主们一方面消灭这两种畜产品中的一种产品的贸易,一方面又要在另一种产品上击败对手,这是不可能的事。

总起来说,俄国畜产品对外贸易的变化情况是这样的:1852—

^① 《军事统计汇编——俄国》第1章第728页。——沃龙佐夫注

1874年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进口增加了百分之一千，1852年进口相当于出口的百分之十三，1874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七。^①现在请大家自己判断一下，指望我们的地主庄园把我们的竞争对手外国畜牧业生产的肉类及其他产品从国际市场上排挤出去，究竟有多少根据。

要使工商业取得成功，仅仅能排除某种障碍的可能性是不够的，仅仅在某一方面比自己的对手优越是不够的。在当前世界各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工业阶级的资本主义才能）的条件下，技术的、财政的、社会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条件综合起来在一个国家造成一定的资本主义气氛、调子和节奏，所有这些使得进行一切工商交易和举办各种工商事业非常容易，而且可以花费最少的财力，遭受最少的损失，使企业家得到最大的利益。工业生活的各种因素，如信贷、交通等等，都为达到这种目的服务。我们在俄国看到的是这种情形吗？譬如，货物的运费可能占货物成本的很大份额，而要竞争取胜，运输事业组织得如何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对于俄国或者美国这样纵横数千俄里的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这里（如俄国）运往国外的商品到达目的地之前往往有一半以上的路程在国内。这样的国家，如果交通既糟糕又昂贵，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工业进步的程度完全可能取决于运输方法上取得的成就，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天才首先注意的就是组织运输。在第二章中我们曾列举过表明俄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差别的事实；现在我们再举二三例加以补充。车尔尼亚也夫先生向自由经济学会所作的报告以及这个报告引起的争论表明，俄国商品运输条件之差是我国农机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我国铁路运费，按中等距离计算，占机器成本

① 参见《自由经济学会学报》1878年第5期。——沃龙佐夫注

的百分之十至十二，有时甚至占到百分之三十八。这一情况使各个工厂的产品不能在国内广泛销售，于是必须把机器制造业分散到各地，使之靠近消费者，也就是说必须缩小每个工厂的产品的销售市场。这就等于说，这一行业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没有发展前途，命中注定勉强生存，因为技术高度发达的首要条件是产品有广泛的销路。在各种情况之中，这一情况就是我们的农机制造业完全没有利用 1876—1877 年的战争时机（那时由于行情下跌，进口机器减少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原因。农机制造业并没有前进，只是原地踏步。从价目表上看，这段时间的情况最低限度是没有开设一家能够生产耙、条播机、收割机、刈草机、蒸汽脱粒机和其他机器的作坊，于是我们现在仍和从前一样不得不向外国订购这些机器。^①

人们原以为，俄国国内运费昂贵对国内制造的农具运往各地起了阻碍作用，那么更应对外国向我国进口机器起限制作用。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反：外国资本家做到了强迫俄国铁路廉价运输他们的货物，而这无异于给我们自己的机器加上了某种赋税。例如，把一种运输工具从哈尔运往莫斯科花费了二百七十二卢布，而从莫斯科运往下新城索取了二百七十五卢布；另一种商品从哈尔到莫斯科的运费是三百二十卢布，而从莫斯科到萨马拉却花费了一千零三十五卢布。照此办理，结果是：俄国货栈代售国内生产的机器不划算，因为工厂给货栈打的全部折扣都花费在运输上了，于是货栈在我国就主要推销外国机器。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说农机制造业在我国是一项新事业，制造商还没有来得及在一切方面为这项事业创造有利的环境，那么我们就让这些看一看我们的粮食贸易情况吧。我们相信，任何人也不会说粮食贸易是一项新事业，何

^① 参见《自由经济学会学报》1880 年第 1 期。——沃龙佐夫注

况这项事业关系到俄国资本的十分重要的利益；现在它正受到西半球竞争的威胁，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产品价格对俄国的粮食生产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来应该指望俄国资本家不辜负自己的名声，至少在这一领域里能够安排妥贴，用最省钱的方法把粮食运到港口。然而实际情况怎样呢？结果是那些各国都认为最费钱的运输方法往往在我国竟比铁路运输还要便宜而迅速。例如，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承运者肯定地说，将货物运往哈尔科夫，用马车比用铁路更便宜；从沃罗涅什省运往塔甘罗格每俄石粮食，用大车运费是二十戈比，而用火车是二十五戈比，因此运往该城四百万俄石的粮食，其中二百万俄石是用这种原始方法运输的，等等。^①

我国工业在另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同样在垄断资产阶级面前表现得毫无办法。那些关于滥伐林木和必须尽量限制使用木质燃料的议论，那些为了避免全国森林被砍光而希望给后代留下制作木器的材料发出的议论，在我们的出版物上连篇累牍，大概早已使读者十分厌烦了。它们提出的保护森林免遭毁灭的那些措施，即使还没有使读者厌烦，也一定使读者觉得是可笑的：有人提出禁止人们过三一节时用白桦树装饰房屋，就是一例。另外一些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发布的命令，可能使一些人伤心：例如，命令停止允许农民免费使用木材来满足那些用量极少但非常必需的消费；禁止北方农民伐林开垦，要知道，北方农民不伐林开垦就无法维持生产，因为他们通常的耕地面积很小，而且为了给这些耕地施肥必须有大量牲畜（北方农民每俄亩施粪肥达八千普特^②），而象莫斯科省这样的贫瘠地区施用三千四百普特，即相当

① 参见《俄罗斯信使报》1880年第242号。——沃龙佐夫注

② 参见《农业与林业》1878年第6期戈米列夫斯基《来自欧俄北方的报道》。
——沃龙佐夫注

于六头牲畜的粪肥，^①才算土足了肥，而农民要做到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做如下补充说明也许是多余的：这些都是针对着小农和小量破坏森林的措施，而大量的破坏森林不但不受限制，有时反而受到鼓励。例如，地主可以烧掉自己的林木来装点节日，如果没有这样做，那也是因为他宁愿卖掉林木来大吃大喝；地主的林地被毁掉之后，为了加强他们的富源，就赠送（以卖给的形式或干脆就是赠送的形式）给他们新的林地，这些新林地甚至长有造船用材（报刊不止一次地提到这种情况，例如关于乌法省就有过这种报道），大家知道，这种木材可以换来大量的佳肴美酒；大林业主每年可以将价值数千万卢布的木材运往国外，大工厂主可以烧毁更多的林木来扩大自己的经营，然而经营仍然很难扩大。^②尽管如此，那种认为用煤炭做日常生活燃料对我国民族经济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见解，在我们这里仍然甚嚣尘上。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俄国有大量丰富的煤矿，拿去用就是了！我国资本主义的无能正是在这里暴露无遗，企业家们竟然容忍从国外向俄国输入八千万普特的煤炭。对这种取之不尽的宝藏，我国企业家掌握着两千万到三千万卢布的可靠销路（1873年在塔甘罗格举行的矿山企业代表大会还在那时就估计出俄国煤炭需求量是一亿七千五百万普特，其中一半是外国人供应的，价值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卢布），可是他们自己却无力经营，这项生意差不多完全拱手交给了外国人。其原因之一就是运输组织得很糟糕。原来，两条南方铁路，库尔斯

① 参见《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1卷第97页。——沃龙佐夫注

② 禁止农民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利用森林，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不很体面的手段。例如，乌斯其察索耳斯克（沃洛格达州）的改良人整个村社集体秘密伐林，整地下种，集体收割，然后分配。如果不幸管林的官员发现了他们的伐林田，劳动就算白费了，就当做无主的庄稼被收割卖掉归公。大家还知道，因为农民没有木材，他们许多必不可少的手工业只能依靠偷来的材料维持。既然我们情愿剥夺俄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木材而交给英国工厂主，看来是英国工厂主比俄国农民和手工业者更需要木材了！——沃龙佐夫注

克—哈尔科夫—亚速铁路和科兹洛夫—沃罗涅什—罗斯托夫铁路掌握在波里亚科夫手中,这个人同时经营着南方一部分煤矿。于是这两条铁路除了把波里亚科夫的煤从开采地运往北方之外几乎完全不运别人的煤,其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铁路的老板,部分原因则是来不及运送所有托运的货物。若在美国,问题会很简单地得到解决:与现有铁路平行再修一条复线就是了,然而俄国不是美国!“当地土地占有者懂得,要想把他们自己地界内的煤开采出来赚些钱,就必须修筑与波里亚科夫的铁路相平行的独立的铁路,而且一条还不够,必须修两条。”他们既然懂得,为什么又不修呢?“修筑一条专用铁路,土地占有者自己现在是既无金钱(也就是说从前有过,可是大吃大喝花光了),又无经验(他们用地方自治局的钱修筑谁都不需要的铁路时经验并不缺乏),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①企业刚刚稍微摆脱可怜的状态,开始有些起色,我们的资本家就恭顺地向国家垂下他们在别的场合总是高傲的头,向国家投去哀求的目光,因为他们无力使自己的企业起死回生,没有国家的施舍他们等于零,他们会灭亡。

就在这样的国内外条件下,有人竟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那种在铁路垄断者面前,在波里亚科夫、一小撮肉商等人面前只能认输的资本,不多不少去从美国手中夺回欧洲市场!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议论只不过是空洞的幻想游戏,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从世界肉类市场及其他一切市场上把美国排挤出去,我们是办不到的,而把粮食贸易阵地让给美国,却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我国大庄园最好是收摊不再干农业,那时农业就会完全转由农民来干。这种结局任何人都不应感到突然,因为改革后的二十年间一直进行着小规模农业和大规模农业之间的斗争,并且这场斗争对

^① 《自由经济学会学报》1880年第7期。——沃龙佐夫注

哪一方有利，细心的观察家看得是很清楚的，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

然而，这件事最终的结局还在前头。现在我们根据当前发生的事件可以补充说：在将来的某时某刻俄国也许能够与大西洋彼岸的国家成功地竞争，不过那是在消灭了大农业经营以后，如果你们愿意换一种说法，那么可以这样说：国外市场上的粮价，由于美国竞争的结果，不断下降，使得我们的土地占有者经营农业所得到的利润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就会把经营农业的事让给农民去作，所谓参加农业则只限于收租。这种演变将通过下述一系列经济现象：美国农业的生产率因为机耕迅速发展而不断提高，而机耕的迅速发展又是劳动价格太高的结果。美国劳动报酬极高，一半以上的欧洲国家都负担不起这样高的劳动报酬，也许只有英国雇员的报酬接近这个高度。据美国领事们收集的材料统计，下列各国各种工人每周报酬如下(单位马克，一马克合三十一戈比)：

	德 国	意大利	法 国	英 国	纽 约
肉类加工工人	15.4	16.8	21.6	29	32—48
箍桶匠	13.2	13.3	28	29.1	48—64
零工、搬运工等	11.7	10.4	—	20	24—36

从上可以看到，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收入多一至两倍，农业工人工资是每月十至三十美元(伙食由老板供应)，按汇率合二十至六十卢布。很自然，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才能补偿这样大的开支，这一情况本身又能推动采用机器方面的不断进步。例如，据奥耳登堡的农场主说，一个一百六十英亩(约合五十俄亩)的美国普通农场，如果在德国，需要三至四个男工和二至三个女工方可经营，在美国只要农场主一个人就可以经营，只是到夏季才需要别人帮忙，即使夏季，所有必要的农活也是他一个人另加一个工人就可

以完成，用机器脱粒需要邻居参加，机器在美国农业中是如此常见的东西，而购买机器又如此方便，使人们有时甚至买得超过了需要。^①

美国农业有了这种发展趋向，很自然，美国佬生产的粮食就比我们的便宜，而且他们完全有可能为了排挤我国粮食不断降低他们的粮食在外国市场上的价格。俄国庄园主生产的粮食几乎是越来越贵，因为我国农业采用机器进展非常缓慢，而且单是由于手工劳动便宜这一原因，采用机器不可能进展很快。

俄国农业技术几乎完全停滞不前，同时由于土地日益贫瘠，收获量也在不断下降。一度曾是欧洲粮仓的土地肥沃的俄国粮仓平均收获量却比贫瘠的北方还少，这确实是件怪事。据扬松先生推算，北方各省每公顷收获七百六十公升，而草原地区是四百四十到五百三十公升。就是这些草原地区竟然想供养欧洲！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美国生产粮食花费的人力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的庄园主生产粮食的花费却越来越多，换句话说：粮食在其出产地越来越贵，同时在国外销售市场上粮价却在降低。粮食价格高出生产费用、构成企业主利润的那一部分变得越来越微小，过不了多久会下降到不再吸引资本家从事农业的地步，那时粮食生产就会转入满足于最低利润，甚至在必要时转到完全不要利润的人手中，这种人只能是劳动生产者。劳动生产者现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获得全部或部分生活资料，即使作为独立农业劳动者（使用自己的和租来的土地），他也只有当粮食价格降低到不能保证他国内中等工资水平时，才能为外国人进行生产。

总之，如果我国的国外粮食贸易衰落，地主农业也就随之垮台，农业就会完全转入农民手中；如果说俄国粮食还能维持出口，

^① 《农业与林业》1880年第7期。——沃龙佐夫著

那么也只能是在消灭地主农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无论我国的国际贸易采取什么方针，任何情况下大规模农业经营都必然会消灭。

这或许会对我国农民的经济状况有很好的影响，因为这很可能促使政府采取有利于农民的经济政策。直到目前为止，国家面临的是两种农业经营制度（小规模的和大规模的），以及代表这两种经营制度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农民利益要求扩大他们经营的独立性，地主利益则坚决要求农民份地不足以保证农民生活，不然就没有人受雇去给地主种地。国家在处理这种互相矛盾的要求时，在经济政策上举棋不定：它当前的国库利益要求鼓励人民的劳动，因为狭义上的人民几乎承担了全部赋税负担；然而西方的榜样却表明，在人民失去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国家也可以富足，甚至更加富足，那里使国家富足的高度发达的工业正是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一个富足的民族，按西欧的理解，可以充当国家财政充裕的相当可靠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国家有足够理由积极支持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即使资本主义生产使人民大众失去经济独立也在所不惜，因为仅此一种方法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可以提高民族工业，造成一个不只在幅员方面强大的国家。

大体上出于上述考虑，我们直到最近没有采取过任何认真的措施来增加农民的土地占有，组织移民，人民信贷等等。

如果将来历史证明俄国不可能仿效西方榜样，如果国家发现大农业不经任何强制就自动放弃它在欧洲起过的文化历史作用，如果将来也和现在一样国家的财政利益仍然完全依靠劳动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国家的收入仍然直接受劳动人民经济状况所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很容易作出抉择的。站在地主阶级一边，无视独立农民的经济需求，就意味着为了一小撮没有任何社会经济

意义、自动放弃一切文化经济作用的人(因为收取地租并不起积极的经济作用)不仅牺牲人民的福利,而且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如果没有经济影响也可以起政治作用,如果我们的土地占有者同时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他们过去曾经哪怕表现出某种政治才干,并且认真努力在将来起政治作用的话,本来是可以试图让这个处于经济生活之外的阶级起政治作用的。然而无论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无论国家赋予作为法律实体的某一阶级以怎样的意义,国家不可能放弃这样的信念: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很低,这个国家在邻国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很高的;因此,政治前景不会阻碍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不会妨碍它对提高民族工业的关心。使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因为民族工业由于历史使然在我国与人民工业成了同义语,至少在农业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正在被农民生产所代替,所以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就只好建立在保护小农业的原则之上。

我们再说一遍:力求在农民独立生产(小生产也好,大生产也好都一样)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水平有极大的提高,这就是俄国社会应该为之奋斗的任务……

总之,改善俄国农业的问题是一个次要问题,它从属于更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建立在独立的农民经济不断巩固的基础上,此外,还因为资本主义原则已逐渐不合时宜,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失去土壤,迟早将来不及绽苞开花而枯死,所以俄国农业问题是农民经济总问题中的一个个别问题。对提高农业经营的关心,或者说对提高人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心,应当与提高人民生产的整个措施协调一致。

从这个观点来看,人们可能发现,俄国官方知识分子虽然提出这些问题,但没有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没有阐明它们的相互关

系,所以争论不休,毫无进展。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俄国人民的需要,因为这可以采取社会措施加以解决,但是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也就不能不提一下:这个问题的重心目前完全不在于普遍改变农业经营制度的集约程度。这是因为第一,甚至在有利的形势下,农业经营制度的改革也不能靠政府的干预,第二,还有比农业更需要扶植的人民劳动部门。在我国那些即使土地最贫瘠的农业省份,农民虽然被迫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农业收入也能满足人民全部需求的一半左右,而且还是在人民把不足一半的劳动时间用在农业的情况下。^①这就是说,无论农民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多么低,农业劳动仍然比非农业劳动使农民得到的东西更多;因此,既然谈到提高人民劳动的效率问题,那么主要注意力不应放在破坏农业生产上,而应放在排除束缚人民活动的总的障碍上。

我们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我国的农业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只是希望严格区分人民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政府所无力改变的技术条件和当局应直接负责调整的社会经济条件。技术进步是由国家总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来推动的,而国家总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极其缓慢,政府只能对它发生间接影响。但是无论人民生产的技术状况如何,都不应当影响人民生产的社会经济状况,即使我国人民处于工业发展水平很低的状态,这能不能作为一种根据,譬如,让人民担负无力负担的税务,强迫人民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许他们开垦无主土地,让富农和奸商任意侵夺他们的财产呢!生产的技术方面当然是一个独立因素,而生产的社会经济环境也是一个独立因素,工业高度发达,人民自己劳动的大部分产品就会落入非生

^① 虽然农活不只半年,但农民并不是全家都干农活,农家的一些成员一般都在家里或到别处从事副业。——沃龙佐夫注

产阶级手中,而工业不发达,人民就能保留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个事实不是很明显吗!政府的直接任务是调整劳动与土地和资本的关系,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分配财政负担,组织信贷(如果这一点私人办不到的话)等等,而不是为农业制度,为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等等去操心,这不是也很明显的吗!在人民劳动的社会经济环境还没有组织好的时候,去鼓动政府采取措施提高技术是多余的,因为技术主要是通过私人以及小的社会单位的独立活动而得到发展的。这种办法不会产生显著的结果,相反却能把政府的注意力从更为重要的任务上引向那些由其他社会设施采取措施完全能办到的小事上去。出版物应当尽自己所能不断提醒政府注意组织人民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必要性,坚持技术问题是次要问题的观点。只有当政府排除了束缚人民劳动的第一类主要障碍,勇敢地走上它负有直接使命的道路时,再来谈论技术问题才是没有危险的。当前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俄国经济生活不协调主要是受统治阶级的经济政策的矛盾和生活的总潮流所制约。生活潮流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把人民生产放在第一位。两方面同时繁荣是不可想象的,帮助其中一方,就会给另一方的发展造成障碍。只要排除主观态度去评价这种或那种生产制度的优越性,任何人都会同意,这一不可避免的转变越顺利、越早发生,对社会就越有利,反之,阻碍事物的自然发展进程,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能促使新机体病态地发展。因此,即使对垂死的资本主义生产加以保护,也不可能使它明显地巩固起来,然而这却能成为民间手工业病态发展的原因,民间手工业不会消灭,甚至会不断扩展,不过会具有畸形的形态。一切为了保证大土地占有者获得廉价劳动和资本为目的的措施都未能促使资本主义农业繁荣起来,未能制止由生活总趋势引起的小规模农业经营的自然扩展,但是却使小农业降低了水平、发展成畸

形。例如划出农民份地，限制农民移居到无人耕种的国有土地等措施，虽然迫使农民以低一半的报酬出卖自己的劳动，失去必要的牲畜，给富农当牛做马，然而并未造成发达的地主农业，甚至并未使地主农业得到足够的人手。生产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在我国达到一定阶段后就停滞不前了；小工业不是为劳动者生产，而是为富农生产，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种具有将小手工业者组织到大工业企业的经济能力的社会成份；但是这个社会成份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想去完成第三等级的使命，他们不想这样做，因为这是与生活的总趋势相矛盾的，因为已经错过了良好的历史时机。因此，富农奴役人民这件事，过去（在西方）虽曾起过自己的历史作用，并且被证明是走向高级劳动形式的初阶，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则是工业进步的障碍。

让我们还是诚心诚意地争取进步吧，哪怕就只一次也好，让我们还是正视一下现实，而不要再偷偷地左顾右盼了吧！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资本主义农业正在寿终正寝，而应该代之而起的人民技术还在遭受虐待。我们对待这两者的态度应该根据这一点来确定；我们还是让死者去埋葬死者，还是关心一下生者的可能发展吧！如果大庄园命中注定要灭亡，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竭力不要让小农经济在这堆死灰中动摇了根基。对小生产的威胁就在于各种各样的奸商拥有充分的可能去强迫小生产者向他们纳贡，这些奸商一方面利用着大所有制的各种特权（大所有制的特权被人为地维护着，为的是让它来执行它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当前形势又使他们摆脱了资本理应担负的任务（组织社会化劳动形式的任务）。由于一个资本家对一大批小生产者的这种奴役在我国没有任何意义，不会造成高级劳动形式，而只是一种装满一些最不值得社会支持的人的腰包的方法，所以，这种现象不论从什么观点来看，都是不合理的，可能只有富农观点是例外；这种过程也不可能

得到任何政党的支持，无论是自由派的、保守派的还是极右派的。因此，未必有人会真心实意地反对在全部出版物几乎一致同意的经济改革方案(扩大农民份地，减少租税，组织移民及其他)中补充下面一点，停止维护大庄园的各种努力；采取措施保证使土地从那些不愿再拥有土地的占有者手中，越过富农转入渴望土地的农民手中。我们再说一句，依我们的看法，用组织小规模长期贷款的方法，是不可能相当大的规模上完成这项任务的，这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来完成，而且最好是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交给农民长期使用，而不归农民完全所有。

第六章 经济衰落

……西欧作为万应灵药而制定的工业进步公式，需要作某些限制和修正。这个公式是：在资本领导下，通过组织社会化劳动形式，发展劳动生产率。这个原理的本质部分，即它的内容，是发展劳动生产率，为此目的，可以通过劳动社会化，然而，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或对许多生产部门来说，不通过小作坊联合为大企业的方式也是可以达到的；最后，劳动的社会化形式本身，在必须采用这种形式的场合，既可通过劳动组合或政府，也可借助于资本组织起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实现工业进步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们却把它几乎当作最本质的东西，至少我们是把资本的参与看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看来，我们是过分迷恋西方的榜样了，我们曾试图将西欧的组织模式运用于俄国，我们尝到了失望的苦头，但我们不应对我国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前景感到暗淡无光；俄国资本主义遭到的失败并不等于对我们祖国文化历史的死刑判决；这一现象不能证明俄国人因循守旧、不求进步，这应当认为是对我们有利的征兆，证明我们有能力参与全人类的文明事业，利用人类

文明的一切纯洁财富，避免沾染其弊端，超越欧洲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据一些学者和政论家的意见，这一阶段是构成文明的阴暗面的罪恶之源。

为了避免发生任何误解，我们想补充说明一点：我们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俄国之所以偏离西方的历史形式，并非由于俄国人民有任何种族特性。这是彼此不同的各国目前所处的环境自然而然造成的结果：国际贸易上的互相排挤，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趋向进步而日益发展，这为年轻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繁荣昌盛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我们的特点是，我们晚于其他民族走上进步道路，具有这一特点并感受其一切后果的还有许多斯拉夫民族及非斯拉夫民族。我们直到目前为止仍保留着诸如集体劳动精神、村社等这类全人类普遍的性格特点及组织形式，这也是我们的幸运：这些性格特点及组织形式，其他民族早已丧失，他们必须重新争取。

我们看到，近十年来，俄国工业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小工业的相对衰落和大工业的绝对衰落。这两种现象，作为两种工业形式未来命运的先声，其含义虽完全不同，然而其发生原因是相同的，即人民贫困化。大生产外销受挫，而国内有广阔市场，本可相当体面地继续生存。我国出口总额是四亿至五亿卢布，工厂工业周转额大体也是这个数目，而工厂工业产品出口只有一、二千万卢布，由此可见，离开需要资本主义产品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俄国工厂工业不可能得到蓬勃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市场不能随产品数量的增加按比例地扩大——假如所有小手工业者为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所迫，不能独立存在而成为雇佣工人的话，这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每年前进一步，有工可做的人数将随之减少，居民的一部分将随之失去挣钱的机会。

于是,资本主义组织形式试图在俄国立足,却陷入了一种循环圈:它要繁荣必须居民富足,然而它每前进一步,居民却更加贫困,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导致人民贫困,而人民的贫困又危害这种工业形式的生存。假如大生产当它尚未建立在劳动组合原则上的时候,给自己划定一个范围,不企图超出这个范围,那么这种循环圈是可以打破的。假如这样,大生产不仅能够安然无恙,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心焦虑,忐忑不安,而且还可以大有益于国家。有许多劳动部门,当前技术上要求采取生产者的大规模组织形式,如铁路、航运、矿山、机器制造等,不能采取手工业形式,那么这些部门可以仍由大规模组织进行管理。但即使如此,这里的大规模组织也不是一定要靠资本来建立,这些生产部门恐怕不可避免地要转入政府手中。

总之,尽管我们对当前经济生活只作了上述简略的回顾,但也足以断定:近十年来决定我国工业发展方向的突出现象是人民的贫困化。人民贫困化造成了如下后果:农业及大生产周转额缩减,手工业从业人员过多,以致市场商品充斥,寻找劳动机会的人破例地急剧增加,上述现象加在一起产生的结果就是人民收入的减少,以及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危机。人民贫困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不是改革前的旧制度对我国生活的影响留下的必然后果,即历史留下的遗产呢?还是近来的各种措施对这种过程也起了不少作用,也就是说,这些措施的创造者,即所谓社会应对这些结果负责呢?如果是后者,那么导致一切其他后果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呢?最后,人民自己对这种情况应负多大责任呢?要知道,人们由于因循守旧而成为一盘散沙,未能以自己的村社团结精神抗住灾难,未能支持村社组织中的个别成员,不但未能使他们更加团结一致,相反却使他们各奔东西,外出谋生。这是不是说明,人民在上千年历史过程中取得的、曾经在农奴制下拯救了农民人身免遭

彻底奴役的人民自治能力及人民村社组织，这一切保存着体现普通人民优于无原则的上流社会的独特优点的东西，都已过时，在改革后的国家步入新生活之后，都已无用，因而在真正文明的阳光下化为乌有了呢？

据说，现代各种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劳动生产率低，例如，手工业目前仍使用原始方法和原始工具，农业虽然早已应当采用高级耕作技术，然而目前土地仍在继续贫瘠化。只要每一个别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数量不增加，现实生活所要求的改造就不会发生，人民就不会摆脱贫困，因为国家的需求不断增长，要求人民为它作出的牺牲就越来越多。

的确，我国劳动生产率与欧洲相比是极低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应当是进步的一个必要因素。我们姑且说，对于过去如此低的生产率不能由俄国社会任何一个阶层负责，是历史使我国文明处于落后的地位，是那些束缚人民使其不能脱离地主土地的羁绊阻碍了人民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总应当承认，当我们着手改革、预计国家支出会大幅度增加的时候，是应该考虑到所有这一切的。劳动生产率低是任何想以某种方式影响当前生活进程的人必须考虑的俄国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政府当时进行社会改造，同样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统治阶级那时就应当懂得，人民生活中的这种转变不会童话般地发生，这个过程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完成，同时这也是国家所致力的主要任务之一，总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靠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努力。因此，国家承担新开支本应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的成就平行发展；需要开支大量款项的改造应当摆在那些促使国家生产力提高的改革之后，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比较容易担负这些改造所需的费用，改造所需的资金才能从收入中，而不是从流动资本中开支，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一系列改革本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实行：首先采取那些能够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促进措施和限制措施，然后才可以着手实行那些以加重支付者的财政负担为主的改造。

过去，支付这些财政负担的是人民。随着改造时代的到来，应当将我国经济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政府准备庇护哪一发展方向的问题确定下来：是政府准备支持人民独立经济，帮助发展以劳动组合为基础的劳动的社会化形式，还是打算建立由资本组织的大工业。选择什么道路，这在当时取决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状况，特权阶级自私自利念头的强烈程度，这些阶级以及报章杂志对政府的影响，改良派政党的头头们的才干和洞察力。但是，道路既经选定，我国未来进步的基础将是人民生产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既经决定，那么进行改造的一切重荷应由这个选定的宠儿来负担。这个要求不但公平合理，而且单从利害关系出发也应当如此，因为既然今后国家将全力以赴譬如说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既然小规模经营的利益被忽略，从而必然使它衰落，那时如果由它去充当国家收入的主要的或唯一的来源，那么它的衰落也必然影响国家的收入。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希望我们的财政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取得某种协调，希望这两种改革携手并进，希望经济改造能创造并发展国民财富的源泉，希望这源泉成为新的财政大厦的基础。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这是怎样形成的，不干我们的事，但是改造运动从第一次大规模改革开始就是脚踏两只船的。众所周知，起草委员会用以作为农民制度改革基础的那些原则和二月十九日法令使农民所处的实际关系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这项法令本身带有保护小规模农业经营和保护大规模农业经营两种方向斗争的痕迹，而且理论部分，即法令的主旨，是对小规模农业经营有利的，而法令条文的措辞则有利于大规模农业经营。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原则上，划给农民保障其生活及履行对政府和地主义务的份

地是农民土地制度的基础，这好象是说，改革将有利于小生产。在发挥这一原则的具体条文中，由于不顾进一步改造必然造成赋税剧增，因而人民完税手段必然增加，不顾人口繁衍而分得土地的数量将不足以达到改革的目的，写上了份地保持不变的条文，这一原则部分地遭到了破坏。新法令的条款越往后，立法人的基本思想就越模糊，大农业得到的特权就越多。譬如，起草委员会一方面将保持现有份地不变作为原则，另一方面又规定可以给农民或地主割让地段，即规定所谓最高份地和最低份地，这当然是为了限制土地本来不足的农民的利益和安慰那些差不多将自己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的地主。保持人民经济独立的原则并未因此遭到破坏，而割让制度本来也是为了促使恢复被地主的自私自利所破坏的农民的独立性；因此本来可以期望规定的限额会有助于改革宗旨的实现，即使难免发生错误，也会有利于农民，因为农民阶级是大多数，而且土地数量的多少对于他们至关重要，而地主交出大量份地给农民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他们交出的多余土地对他们的财政计划起不到显著作用，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无影响。然而，在起草委员会规定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的时候，初步估算就表明，需要将土地割让给农民的地主庄园只占庄园总数的百分之五，而农民要割让土地给土地占有者的情况（如黑土地带）通常是它的五倍。此外，地主在任何情况下（虽有限制，但微不足道）有权保留自己地产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可见，结果不是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而是维护地主土地所有权。

份地赎买问题上也存在这种立法者所遵循的原则和实现这些原则的实际条文之间的矛盾。原则规定：农民人身是自由的，因此不需要赎买；农民只对从土地占有者手中得到的土地支付赎金。在当时的《同时代人》杂志上曾刊登一篇文章（好象是卡维林先生写的），拟议不仅对土地，而且对失去的劳动力给地主以补偿，文章作

者提出的赎金数额比《法令》规定的单单土地赎金一项还要低。农民法令的起草人自己最后也承认，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希望不仅对地主占有土地数量的减少，而且对无偿劳动力的损失给以补偿。

所有这些妥协的结果是：人民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份地被削减，但仍然要象过去一样交付地租，也就是说，农民在获得独立自由的同时，即在失去遇到困难可以得到地主帮助的权利和在必须适应新环境的最初时刻，就在经济上陷入了比农奴制时代还要困难的境地，并且由于各种赋税随之增加，农民的抵抗能力减弱了，而他们面临的敌人的力量却增强了。总之，出现了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这次改革实行的结果证明，它不是保护小规模农业，它的目的是保证土地占有者有资本和廉价人手耕种他们的土地，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有利于大规模农业的改革。农民小土地占有制受到损害，这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归农民使用的土地数量减少了，就整体来说，是由于失去了随人口增加而扩大独立经营的可能性。而赋税负担仍旧落在农民，即小生产头上。

上述这次改革，在经济意义上具有强烈的民主性；不久我国对内政策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保护大采掘工业和大加工工业的原则；而财政制度仍旧沿用改革前的，换句话说，一切改造，包括以消灭人民小生产为内容的改造所需的开支，都加在因改革而失去独立的阶级头上，加在注定灭亡的生产形式的头上（而受到培植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幼苗越茁壮生长，上述生产形式灭亡得就越迅速）。我们还要补充一点：由于交纳赋税普遍实行连保制，小生产甚至按其衰落程度按比例减免都不可能。是的，小生产对于自己境况日衰尚可忍受，但却不敢丧失纳税能力。

通过上面的分析十分清楚，谁应负起关心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责任，谁能承担采用高级农业经营方式的任务，是受到统治阶级

保护的大土地占有制，还是受到百般压迫的农民小土地占有制；十分清楚，谁应对我们现在经受的困难时刻负责，是无力完成当代历史提出的任务的农民，还是狭义上的社会和社会所庇护的地主阶级。

农民正好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那就是为支持俄国资本主义提供资金。应该说，农民对完成这项任务认真到了愚蠢的程度：直接地（以赎金及地租形式）或通过政府（资助商业企业）从农民口袋里榨取金钱支持大生产，这种重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而国家还在不断给他们增加负担。虽然当时为了促进赎买手续的履行设有特别基金，虽然赎金（即使没有基金的补贴）使政府，除满足实际开支之外，增加了数千万卢布的收入，然而，国家对面临的经济任务过分恐惧，又对实际情况过分无知，不但没有将这些剩余资金通过各种方式用于在赋税重荷下呻吟的人民身上，而仍然用来支持大工业。据科留潘诺夫先生估计，农民在1876年以前交纳的赎金中有一亿五千万卢布以上用于各种商人身上。^①

就这样，小农继续担负着支持企图消灭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任务。人民为了搞到完成此项任务所需的资金，已将中部黑土省份的可耕地全部开垦，在南部和东南部各省则努力利用官方出租土地的机会，而在故乡找不到使用力气的机会也找不到获得独立经营的办法的人，就到东部去碰运气，开垦、耕种无主土地。看来，政府不理解这种移民运动的必要性，不了解中部各省人口已相对过剩的情况，担心人民涌向无主土地会将资本主义农业所必需的人手也带到那里去，于是就竭力限制这种运动；而当运动仍在“非法”继续，并且在东部很有可能建立起小农业的时候，就采取措施使新垦地上也组织起资本主义经营来；开始允许将无主的国有

① 《俄罗斯信使报》1880年第320号。——沃龙佐夫注

土地卖给私人。虽然这项指令对东部各省有某些限制（卖出地块不得超过二千俄亩；定居边疆能对边疆作出特殊贡献的有功人员有权买地），然而地方行政当局却自行其是。被出卖的不仅是国有土地，而且还有准备分给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和留作补充人口增加而引起土地不足之用的土地。卖出的地块有的多达六千俄亩，有时包括长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出卖的造船木材的林地。土地是按每俄亩二至四卢布分三十七年分期卖出的，而那里的地租是一个半到七卢布之间。幸运的购卖者的名单自然是不公布的，这些名单一部分存放在奥伦堡总督的办公室里，一部分存放在国家产业部里。出卖土地进行得非常匆忙，一两年内能出卖的土地全部都卖光了，从国家产业部大臣、奥伦堡总督到体操教师和流放的波兰人都成了有特殊功劳并且定居边疆能对边疆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唯独不包括那些边疆确实不可或缺而且确实需要土地的人。用别列别伊地方自治局的话说就是：“哪一个农民没有为分期付款卖给官吏的土地不是分期付款地偿付了一至三又四分之三卢布啊！”富农得知出卖土地的消息，预料农民迁居会比较容易，但对那些多数大约从未离开过彼得堡而且也不会离开彼得堡的新土地占有者的实际农业才干不甚了解，于是决心承担法律对新地主提出的为边疆作出特殊贡献的任务。他们扑向这些不幸的省份，把那里的土地全部买来，就这样，愿意去开垦无主土地的俄国农民，在那里遇到了他们原想逃避而离开家乡的那些富农。

在农民租种官地的历史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改革前时期，政府还是关心巩固人民的经济独立的，为此目的，政府曾减轻了农民租种官方土地的地租，譬如，在五十年代曾规定，村庄附近为村庄所需的土地不准买卖，而只能租给团体使用，租金只比份地租金高百分之一，这就使农民不经过投机家直接租到大部分所需土地。改革时期对这个问题也发生了影响，六十年代所有官方土

地开始拍卖，在国家和人民之间有富农插手的情况逐渐发展起来，同时土地投机活动也发展了起来。据一些已发表的材料可以判断上述现象发展到了多大规模：萨马拉省布祖卢克县农民直接租种的土地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而付出的租金增加了一倍；尼古拉也夫斯克县直接租种的土地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而租金比过去多了四倍，^①等等。土地成了冒险家投机的对象，农民不再把土地看作后代生活的保障，因而无情地耗费地力。1869年，由于农民早先得到的以公众决议代替押金的权利受到限制，农民团体参加官方土地拍卖活动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小了。美利托波尔地方自治局决定请求恢复旧制度，然而人民的这一呼声被搁置在省长的办公室里，根本没有传达到政府去。赫尔松地方自治局不久前的请求也未收到更好的效果，只是遭到拒绝的方式不大一样，这次遭到拒绝的理由是国家为减轻农民租税似乎已经尽了一切努力。

可见，近二十年来，政府一直在贯彻用搜刮濒临灭亡的小生产的资金来维护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意图。政府想用这种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家财富（如果不是增加人民福利那也是作为巩固国家财政的必然后果）。然而实际结果从各方面说都完全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在倒退，农业产品数量在减少，在某种程度上由受排挤的小手工业支持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缩减，人民日益贫困，结果国家财政也越来越混乱。政府二十年努力所得到的这些明显的消极后果无可辩驳地证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错误的，结果事与愿违，统治阶级在事物的自然进程和时代倾向面前提出的各项任务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不是屈从于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障碍，而是想冲破这些障碍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目的的决心，结果只能搞乱实际生活的正常进程，破坏现有形式，而又组织不起

^① 参见《俄罗斯信使报》第80号第243页。——沃龙佐夫注

新形式来代替它，总之，只能瓦解而不是发展我国的工业结构。

俄国确实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企图在我国培植资本主义的一切努力都将是枉费心机。不仅如此，如果这些努力建立在破坏目前的经济组织的基础上，那么不只会带来失败，还将造成实际的损害，而我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种错误主张在实际执行中必然引起一系列荒谬的后果。这些后果如果只涉及国家资金的浪费，那倒也只会造成人民如此费力地积累起来的资本的毁灭，它们的影响也就到此为止。但是，如果实行政府这个心爱的主张需要采取直接涉及小农业根本利益的措施的话，情况就不同了，这些措施由于不符合实际，所以根本行不通，并且在生活进程不受限制地自然发展的条件下，将按一定方向得到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如果是一种倚仗实力不能作任何让步的要求，那就会摧毁现存秩序，而且不可能树立新秩序来代替它。生活有什么办法可以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意孤行而又拥有实力的敌人顺利地进行斗争呢？小农业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直接暴力的破坏呢？村社必须拥有什么样的神奇力量才能保全它的组织啊！要知道，村社组织只不过希望得到顺乎历史现实规律的、自然的、虽然有时可能是病态的发展，希望不要被盲目的理论倚仗庞大的实力疯狂地胡乱践踏。中世纪的理性主义者，除了死亡以外，从那些不会也不愿倾听理性的申诉，只知运用酷刑强迫对方接受他的思想信仰的狂热的宗教裁判者那里能够得到什么呢？但是在这里好歹还可以使点脱身之计，而破产的村社在只知要钱、只知拍卖的国库面前，有什么脱身之计可使呢？

前面我们谈到国家一贯追求不可能达到的要求致使韦特卢日斯基芦席手工业者几乎完全破产的例子，农民没有钱交付税款，但是他们并不害怕，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向他们征收超出他们交付能力的税款。全部问题在于，他们对最新的国库还没有充分了解，

所以对自己“顽固”态度的后果也就不甚明白。不久问题就逐渐清楚了：警察扬言要采取坚决手段，于是米尔相信政府是极端需要钱的，因此米尔只好用连保方法借贷所需款项，只好在自己的各种负担之外，再加一项负担。交税日期又到了，已被原先的税务弄得虚弱不堪的农民更加无力满足国家的要求，然而国家的要求并不因此稍有放松；村社这次还可能勉强对付过去，可是不得不采用有损于未来的办法。农民既无现金又无贷款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此时他们完全不由自主地担负起来的支持资本主义的使命只能以动用所谓的资本，也就是说，采取自我破产的办法。米尔认为要求他们走这条路是不可能的，因为失去生产手段就意味着永远失去支付能力，那时国家将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国家财政制度正是建立在人民支付能力的基础上的。可是，照村社的合理看法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警察是极易执行的，警察不管将来如何，它只知道立即执行眼前上级的命令。为了立即执行眼前的任务，警察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简直是名副其实地敲骨吸髓，有时甚至将纳税人打残或打死。下面举几个实例：维亚特卡省斯洛博茨科伊县的特鲁什尼科夫乡，根据地方自治大会决议，一半居民受到鞭笞，卡伊戈罗德乡差不多全体男性居民受到鞭笞，结果税款还是没有收齐。梁赞省有一个乡警察所所长执行县警察局局长关于鞭笞欠税者的命令特别热心，他亲自执行刑罚，亲自把荆条浸上盐水，这件事他干得十分出色，几下子就把欠税者打得灵魂出壳，至于税款，那就不用说了。彼得堡省杨堡县有一个乡警察所所长亲自执行肉刑特别卖力，由于为主子效劳心切，抓着被抽打的农民时，把农民的胳膊扭得脱了臼。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有一个乡长在喀山省学会了一套办法，他在自己家乡实行了这样一种收税方法：他把欠税者的胡子拴在帐篷的横梁上，让他的脚指尖刚刚碰着地板，这样吊上一段时间，然后就关在地下室里，那里边十分“暖和”，包脚布

都能冻结在脚上。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由于经受不住这种对在俄国培植资本主义热心的考验而死去了。热心的村长为此被区法院（没有陪审员参加）判处在警察局监禁七天。我们不知道被迫害者们作何感想，这位乡长却对法院的判决十分满意。

当局这种对待人民日常生活如同对待军队一样的态度，大概只能同想把家里最后一只母鸡杀掉，以便立即取出它肚里的鸡蛋的那个主人相比。在这种主人家里，无论母鸡多么清楚用这种办法来满足自己食欲的想法是多么愚蠢，无论它求生的本能如何强烈，无论它多么不愿作这种无谓的牺牲，也只好俯首待毙。竭尽自己全部通常的和特殊的挣钱办法来满足国库需求的米尔与国库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要求他们进一步作出牺牲，就不可能不破坏村社的生产力，也就不可能不动摇国家财政大厦的基础。然而国库并不就此止步，而大家也会同意：国库这样做的时候，村社组织也就不再是人们为争取更顺利地达到生存目的而建立的自由联盟了。当米尔还认为事态不会超出可能的范围，还希望哪怕承担巨大牺牲能够满足眼前的要求时，他们还愿意结成连环保庇力量单薄的社员。可是当人们发现，自然生活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种不受生活现实影响的非现实的东西，是一种藐视时间、地点、条件，而且有足够力量坚持这样干到底的幻想的化身时，村社作为一种受日常生活自然规律所限制、无力与超自然现象相抗衡的现象，只好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村社作为自愿的联盟正在瓦解，剩下的是一种行政意义上的“团体”，这一群人是被连环保强迫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对所有纳税人的财力不足负责，而国库又不肯理解人们这种财力不足。以往村社带来的一切好处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身处“团体”之中造成的不便。自我保全的要求使每个人都想摆脱这种可怕的虚假怪物的势力范围，离开村社和家乡，而任何高尚的道德观念也无力使最

善良的人放弃这种做法，因为村社不能抗拒灾难，这倒不是因为它不够巩固或不够合理，而是因为客观条件超出了这种结合的能力：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地方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政治问题。

这就是村社瓦解和人民中间个人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因。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上述共同生活形式的落后性，也不是文明的本性，至少人类共同文明是与此无关的。

既然农民未能依靠村社组织保持所有社员的经济独立，那么责备人民没有改变旧耕作制度，继续无情地消耗地力，同样是不公正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现在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外界环境对这种过程之可能发生的有利程度；我们看到，对人民生活起作用的大部分影响，不仅不能使农民越来越热爱农业（没有这种感情，改造工作也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却千方百计促使他们放弃这一活动领域，放弃成为宝贵财产所有者的光荣，因为这种宝贵财产反正是要拿去交付村社所欠的赋税的。然而，尽管如此，农民不但没有彻底抛弃农业，相反仍抱定目标使特权阶级培植大生产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下定决心从地主手中夺回这一生产部门。结果证明，人民较之知识分子更有远见卓识，或者更为幸运，人民追求的任务符合事物的自然进程，因此人民在这场耕作方式的斗争中终于胜利了，虽然赢得的胜利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破产。不要以为人民只不过得到了时间赐予他们的东西，而他们自己只不过是这场大规模经营方式反对生活逆流的斗争的消极的参加者。不是的，人民自己进行斗争，人民为争取经济独立所作的牺牲证明斗争是很激烈的。诚然，事实证明，贵族阶层不很适于担负在经济生活的新条件下在农业领域组织社会化劳动方式的任務；但是，我们在其他阶级中适合于这个目标并能够以大土地占有者或小农场主资本家身份承担这个任务的不乏其人。但是农民已经消灭了采取这种过程的可能

性，因为农民的地位虽被过去沉重的赋税负担搞得毫无保障，使他们竭力企图摆脱独立经营的重担，但他们仍决心付出更大的代价来保存独立经营的地位。农民不愿去当生活有保障的雇农，却宁愿在一个靠独立经营收入为生的名义下过同样的雇农生活，也就是说，宁愿在一种随时可能落得两手空空的危险境遇下生活。这样农民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得以从自己的国土上铲除资本主义农业，从而为自己的祖国作出伟大的贡献。

地主普遍抱怨缺乏诚实的好工人，这就证明农民确实在有意识地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滋长。土地占有者清楚地了解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他们自己对这种现象解释说：稍微有点办法的独立农民都千方百计地避免成为雇农，当雇农的通常是道德堕落的破产的农民。但是为什么地主不去对抗人民这种保存自己独立性的努力呢？要知道，他们清楚地了解，农民无论如何努力逃避雇佣劳动，没有地主的土地他们是毫无办法的。土地占有者为什么要把自己一部分耕地租给他们来帮助他们实现显然有损于地主本身利益的意图呢？问题在于，农民在强迫土地占有者这样做，不是用棍棒，而是用卢布来打消他们成为粮食生产的领导者的任何意图，农民用租金来引诱他们，他们出的租金不但包括地租，而且包括资本的利息，还可能包括一部分或全部企业家应得的利润。农民的这种宁愿牺牲全部农业收入，只要能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而满足于微薄工资的态度，使得几乎不可能在一般商业基础上通过雇工经营农业企业，因为庄园主通过出租土地可以毫不担心地取得很好的收入，而资本家则不可能按农民所出的不仅包括地租而且包括纯收入的租金来租地。地主保持着一部分独立性，他们可以要求农民用劳动抵偿租金，以后用货币偿付劳动，等等，但是第一，他们用这种办法只能保持他们土地数量所允许的一部分经济独立性，第二，用这种办法换来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奴役。这也就是土

地占有者抛弃自己庄园的原因之一；即使土地占有者将自己的庄园租给大承租人，那么农民也可用上述手段迫使后者放弃充当新耕作制度的组织者的光荣，并将这件事让给传统的种田人。

我们看到，人民取得这个胜利所花的代价是不小的，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农民当一个独立承租人比当雇农有时收入还要少。此外，农民为了享受作为生产主人的快乐，承担了歉收带来的一切后果，负担了新的开支，这些开支他们时常是庄稼尚未成熟、还一文不名的时候就必须按时交付。假如读者对于农民借贷必不可少的十几个卢布的条件稍有所了解，他们就会明白，担负额外的现款债务意味着什么：要摆脱这项债务，必须作出新的牺牲，而且不只是物质上的，还要作出精神上的牺牲——要屈从于富农。这样，农民越是顽强地向地主夺取管理农业的权力，他就要越多地花掉自己的收入，越减少自己的生活费用，也就是说，越加剧自己的贫困和破产。人民为了赢得独立生产者的地位，却丧失了消费者的能力。

因此不能说，人民沉睡了二十年，人民关心的只是消耗地力，制造农业危机。人民在此期间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其方向关系着我国未来的发展。人民为之斗争的是一种社会经济进步的高级类型，如果人民是通过降低发展程度而取得胜利的，这也不是他们的过错，责备人民在同社会进行殊死斗争时，在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方面不够坚决有力，也是不应该的，因为大自然是不会跑掉的，而放过有利的社会历史时机却十分容易。

但是，除去上述社会历史障碍之外，妨碍高级农业经营方式的还有家庭财政困难。发展高级农业经营方式除需要知识之外，还需要资本：要深耕，必须花钱买犁；要实行牧草播种，不购买种子也不行；改三圃制为多区轮作制在没有完成改造的最初几年中必然会减产，这自然必须有养家糊口的积蓄。不是停留在对农民经济的需要进行书本议论，而是努力在实际上满足他们需要的人们，非

常理解为这些农民所无法克服的财政困难有多大力量，譬如，愿意以自己的知识在这方面帮助农民的卡维林先生说过：这里第一步应当是给农民提供为期十年的足够数量的贷款。^①而我们好象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给人民进行这种长期贷款，我们只知道对农民搜刮，搜刮，一直搜刮到使农业技术倒退为止。农民弃地出逃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人民为了交纳赋税和满足其他紧急需要卖掉牲畜造成的粮食减产。如果农业停滞不前还可以归咎于农民的愚昧和无能，那么即使最不能理喻的人民的仇敌也不可能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农民卖掉自己牲畜的原因，因此必须承认，农民之所以卖掉牲畜是违背主人们防止这种悲惨局面的努力的。如果压在农民身上的支出是如此庞大，以致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必然会降低农业技术、减少农业收入的变卖财产的做法，那么他们又如何能同时增加自己的农具和其他农业进步所必须的支出呢？例如，环境强迫你卖掉维持一定水平收入所必须的马匹或奶牛，同时却责备你不去买一挂犁，诚然，犁在顺利的条件下是可以帮助你提高收入的，然而没有马匹，犁却是完全多余的东西。

俄国农业水平低下的原因不是人民知识、精力或一般所谓的能力有限，也不是村社土地占有制，而是文明阶层造成的、村社无力排除的社会和财政条件。这些条件使人民甚至无法将他们通过多年的经验和对大自然的观察总结出来的通常的耕作制度运用于实践，因此在人民种田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如果你希望合理地（自然不是按外国方式）经营农业，那么最初你在这项事业中最好的老师将是农民；农民没有资金把农业经营好，然而他却可以教会别人经营好。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中部经营得最好的庄园是属于那些不是为了从事投机生意而购买庄园，而是继续

^① 参见《农业报》1879年第37、38号和1880年第39号。——沃龙佐夫注

经营农业的商人，他们不忽视人民的智慧和经验，他们拥有资本，可以根据农民理论的指导来组织自己的经营。

第七章 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

我在上面花了一些篇幅，试图阐明现代俄国经济制度具有代表性的特点，检验以西欧生活事实为基础得出的工业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意义的假设。我的结论是：西方工业进步所体现的最新具体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在俄国土地上缺乏牢固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举出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整整三、四十年来，大型加工工业中雇佣工人数目没有变化，农业方面，以前的大生产者——地主正在逐渐放弃管理农业的权柄，而没有另外一个阶级承担起在这一领域组织大规模生产的任务。这些事实可以认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最近二十年正是我国工业史上的危机时期：农奴制度业已崩溃，劳动获得了自由，在生活的自然过程中已有可能产生出最适合时代要求、能更好地保证社会和国家顺利发展的经济组织。而社会和国家的意志曾相当有意识地参与了有利于大生产的这一过程，当时为了保证大生产获得资本、人手和市场，曾采取过以下措施：缩减农民的土地占有，限制移民，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组织大规模贷款和津贴、用从人民那里搜刮来的资金修建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在小生产同大生产的斗争中，支持小生产的事则完全或几乎没有做。如果大生产至今未能利用有利时机站住脚跟，深深地扎下根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预料，它在最近的将来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统治阶级违背自然的政策未能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预期目的，却造成了一种能够窒息一切过程的社会经济气氛，因此这种气氛迟早会改变方向，背弃大生产而面向小生产。

上述各种保护大生产的措施确实使经济上的强者增加了同经济上的弱者进行斗争的武器。前者可以从两方面利用这种优越地位：一心一意地组织大生产（政府保护资本家的目的正在于此），或者用他的全部武器加剧对小生产的剥削。发财的愿望顺应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使我们的资本家们走上了后一条道路。农民由于负有支持最新社会改革的义务，自由资金本已缩减，现在又被迫进一步削减自己的生活开支和生产开支，好让越来越增加的大小资本家发财致富，这就使农民无法为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做任何事情，相反，却有许多情况迫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趋于下降。经济生活各种因素互相配合产生的结果是：农民收入停滞，甚至下降，同时其支出却不断增加。这种状况的自然后果就是人民急剧贫困化，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最终造成经济和财政危机。

这就是我根据有关我国大生产和小生产的各种资料——近十年来大型加工工业周转发展的数字，手工业和地主农业、工资变化等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得出的简单结论。

但是社会的工业状况不仅仅表现在某些生产形式中；资本主义组织的特点还通过商品周转的一套完整体系体现出来，因此对后者的研究反过来可以有助于阐明现存的经济制度。尼古拉-逊^①先生就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言论》杂志1880年第10期）。对于检验我的结论以及对于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命运问题，尼古拉-逊先生所得出的结论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他的结论同我的结论相一致，如果他的研究结果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在我国布下的罗网的广泛性和巩固性表示怀疑，那么这就十分有力地证明，所谓一切民族的工业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错误的。考虑到尼古拉-逊先生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时

① 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笔名。——编者注

是抱有成见的,虔信公认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那么这个结论就尤其值得注意;马克思本人假如着手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进行研究的话,也不可能选择更好的研究方法,并且也未必会比本文作者研究得更加透彻。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417—481页。

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①(摘录)

尼·弗·丹尼尔逊

前 言

这部概论分为两篇。第一篇主要论述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其他因素有关的谷物生产和谷物流通,目的在于说明农业收入资本化的结构。

早在1880年,这部概论的一系列文章就首次发表了。现在几乎未加修改就重新予以发表。只是当同一个问题在第二篇中有较详尽的论述的情况下才作了一些删节;某些实际数据由更精确的数据取代了,因为这些更精确的数据在文章发表时还没有公布;有几处对问题的现状作了说明,其余则一概未作修改。

^① 本书于1893年在彼得堡出版。全书共分两部分(两篇),第一部分于1880年发表在《言论》杂志上,第二部分写于九十年代初。——编者注

为什么概论的整个第一部分不根据更新的资料进行修订呢？为什么七十年代的经济生活的事实不用八十年代的那些事实来代替呢？其实这仅仅是因为流通的三个因素，即铁路网、信用机构的发展和信用券的发行对于居民经济制度的影响，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象在七十年代那样清晰地显示出来。任何一个研究这些因素的理论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回避七十年代，他必须注意这些因素，以便观察它们 *in statu nascendi*^① 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②

在七十年代，要使一座新的社会经济大厦赖以建立的新的基础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就应当取代那座公认为已经毫无用处的旧大厦。这个时期就是资本积累的准备阶段。

的确，八十年代的社会经济活动所采取的那种形式，只有在七十年代的活动所准备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然而，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间有什么质的区别。没有，这种区别倒不如说是一种量的区别，它是由为我们所培植的那些新的经济形式的基础的准备程度决定的。

工业生活旧形式的灭亡和新形式即手工业资本化的取代对人民经济的影响，是概论第二部分的对象。

我们曾经遇到的一些较复杂的关系，也要求一方面通过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援引欧洲的、主要是美国的经济生活的类似现象来更好地加以阐明。

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现象彼此之间都处在这样一种紧密的联系之中：当一些职能的变化、加强或削弱在某种意义上立即影响到

① 拉丁文，在起源状态。——编者注

② 顺便指出，概论的第二篇也引用了八十年代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在第二篇里是用另一种观点来进行分析的。——丹尼尔逊注

另一些职能的时候，每一个研究这些现象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必须把它们看作是某种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事物。换句话说，我们认为离开了统一的理论思想就不能理解社会经济现象，正如离开了它就不能理解自然科学中的自然现象一样。

威廉·汤姆森爵士认为：“在以数来表达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实际方法还没有确立以前，物理科学的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这个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适用于研究经济生活的现象。因此，什么地方出现这种可能性时，我们就竭力把经济现象用合理的数字表达出来，当然是用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其中某些现象本身的性质，使得难于采用这种方法。现象本身越复杂，这种方法的采用就越困难。但不管怎样，我们努力从社会经济结构最主要部分的活动的整个进程来研究这种活动。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有些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对于以联系的观点来看待经济生活现象的理论学说来说，事实搜集得还太少，一个经济学家的最主要的任务不是理论，而是搜集事实。这是某些德国学者的观点。我们则与此相反，确信实际材料在许多场合不仅非常充足，而且如果现在不去利用它，它就会变得陈旧和丧失它的大部分意义。此外，那些从事搜集和整理这种材料的人，如果他们看到谁也不去利用他们的劳动成果，就会失去进一步工作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离开把所搜集的材料统一为一个整体的理论观点，他们就会陷入片面性，搜集价值比较小的材料而忽略极为重要的东西。事实和事实是不同的。

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打算用所搜集的大量实际材料来改建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大厦。不，这个任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力量。而且，除此以外，照我们看来，至少在我们所研究的领域里，整个这一套材料会得到现有的各种理论学说的充分阐明，因为它能完全证实这些理论学说的正确。

因此，我们的概论从事实方面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利用的主要是官方的材料，我们引证的全部事实多少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在我们的理论探讨方面，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一个经济理论家所不了解的。

我们这部概论的目的是要描绘我国新的经济生活的某些主要潮流，把它们同根据西欧的经济生活的事实作出的理论结论，即同与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有关的结论加以对比，然后把它们统一起来。因此，即使在我们的理论探讨中，我们也绝不离开事实，而只是力求通过分析那些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无形的关系来说明事实。

此外，我们希望我们的概论能再一次引起社会思想家对那些不可避免的严重后果的注意，如果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将继续朝着它在近三十年间发展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实际上应当正视现实，而且越早越好。撇开不喜欢的现象、故意不看这些现象的旧方法将不能再使用了，因为事实将现身说法。1891年的饥馑就是一个证明。^①

“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②

就是在目前，在1891年和1892年的事件给了我们以令人信服的严重教训以后，还有许多人仍然不愿意看到众目睽睽的事实，

① 丹尼尔逊把1891年俄国遭受的饥馑看成是近三十年来（即从1861年2月19日改革以来）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页。——编者注

回避对它们作出说明的尝试，他们完全象伽俐略周围的那些不仅不想亲眼证实他的发现(木星的卫星)，而且也不愿意看一看他用以作出这项发现的仪器的学者一样。

但是闭眼不看即将临头的灾祸——1891年的灾祸不是从昨天开始临头的——会是不明智的，并且可能使国家付出很高很高的代价。例如，我们刚刚遭受的灾祸就使国库花费了几亿卢布，更不用说受害的数万个农户、居民的生计和死于霍乱(霍乱在衰弱不堪的居民中找到了流行的现成条件)的人了。

如果社会思想界能对周围的事物采取更自觉和更深思熟虑的态度，那将会消除多少灾祸和痛苦。

我们从周围的经济生活现象中得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但也可能是正确的。如果这部概论对于在总的方面分析这些现象的尝试和为了同其灾难性的后果进行斗争而认清它们多少有所帮助的话，那么我们这部概论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第一篇 农业收入的资本化^①

“为了保障他们(农民)的生活和履行他们对政府的义务，兹以条例规定的一定数量的农田和其他可经营的土地提供给他们永久使用……让他们(农民)精耕细作，收获土地的成果，然后将种子播在永久使用的土地或归为已有的土地上……祝福吧，信奉东正教的人民，和我们一起祝福你们的自由的劳动，祝福你们的家庭幸福和社会福利的保证。”

这里指的是1861年2月19日的宣言，它把土地分给农民并

^① 丹尼尔逊把农业收入的资本化理解为利用农业收入来发展资本主义的活动。
——编者注

使多少世纪以来按习惯法存在于俄国的土地关系（村社）合法化了。十年过去了。1871年“税务委员会”搜集了一份材料，它使人们有可能判断农民的经济状况。这些状况是极其令人悲观的。所有的地方自治机关几乎一致地证明了这一点。委员会本身并没有在自己出版的《报告》中作出任何结论，但是它所搜集的数字却比任何词句都更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农民经济的危机状况，因而也说明了国家经济的危机状况，因为国家经济是建立在农民经济富裕的基础上的。为了说明农民经济原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展的，我们且来引用一些数字。根据《税务委员会报告》第22卷和部分地根据农业委员会《蓝皮书》所搜集的数据，就可以对一切直接缴纳与前地主农民的土地收益以及国家和皇室领地农民的土地收益之间的比例形成一个概念。原来，俄国欧洲部分三十七个省（不算其余的西部省份）的国家农民和皇室领地农民缴纳了土地提供的纯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七五，也就是说从土地收入中只给他们留下了百分之七点二五以满足其全部需要。前地主农民的缴纳，同他们土地的纯收入的比例则为—百比—百九十八点二五，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交出了自己的全部土地收入，而且还要补交那么多从其他方面挣得的钱。^①从那时起到现在又过了十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以致进一步的恶化只会引起退化。然而，赋税如果说也增加的话，那么增加额是比较少的，仅仅赋税一项还不能说明农民经济所处的那种状况。寻找影响国民经济恶化的其他原因（除了赋税以外）就是这部概论探讨的对象。

宣言的原则——把土地分给农民，或者更广泛地说，把劳动工

^① 我们采取如下办法以得出这些数字。我们把1873年圣彼得堡版的《税务委员会报告：关于现行直接税的资料》第22卷第3册第一部分的统计数字分为两大类：一、前地主农民的缴纳；二、国家农民和皇室领地农民的缴纳。赋税即按征税对象——人头或俄亩的比例计算。——丹尼尔逊注

具交给生产者本人，以便最大限制地发展生产效率，因而也发展最能保证全体人民经济增长的条件，我们说，这个原则是同西欧国家的经济制度所依据的原则绝对矛盾的。克里木战争迫使俄国同西欧接近，因而也同它的经济条件接近；结果在我们这里出现了两种经济形式的斗争。在这部概论中我们想概括地谈谈这一斗争的一些波折，指出斗争的各方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和斗争的结果趋向哪一个方面。首先要记住的是，我们这里指的完全是经济关系，至于从经济关系产生的其他关系——政治的、法的关系等等，——我们现在根本不谈。

这样，我们看到的一方面是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本人，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在公共的、村社的基础上属于生产者的生产形式；另一方面是不仅建立在使生产者同生产工具的占有无条件分离，而且也建立在个人使用由社会关系产生的劳动力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形式。

一种形式的发展越来越使生产者同所生产的产品接近；另一种形式的发展则恰恰相反，越来越使产品同生产者脱离。一句话，一种形式完全排除另一种形式。我们看到，2月19日的宣言所依恃的是第一种形式，因为从中可以看到发展的保证。似乎资本主义形式在我们这里是连位置都没有的。但这只是似乎如此。实际上它在立法者一宣布第一种形式诞生以后，就立即同它进行斗争了。看来，象信贷和铁路这样一些无辜的东西被选为斗争的手段了。斗争的方式本身我们将在后面加以描写，现在让我们来叙述为扩大铁路网而做的事情吧。

结 论

上面所说的一切使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根据1861年2月19日宣言中所表达的立法者的思想，劳动依附于永久使用的土地应当成为“家庭幸福和社会福利”的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即劳动提供的产品超过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数量，不是全部劳动单纯用于获得生活资料，而是劳动的一部分可以用于获得生产资料。为维持劳动者生活所需的消耗之外的剩余劳动产品、社会的生产储备和由这一剩余产品构成的后备储备的建立和增加，过去和现在始终都是一切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进步的基础。”^①

二、这一剩余产品在劳动者阶级手中的积累以及劳动者阶级的发展，受到了反面促进这些剩余产品在非生产者手中积累和集中的某些因素的阻碍。国债就是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因此，用不着对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理论感到惊讶……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同时产生

^① 这一使人们有可能把部分劳动用于生产资料的剩余产品，至今并不积累在劳动者手中。只有在手中积累有这一剩余产品的人的阶级，才有可能利用它来发展生产资料。在具备发达的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劳动当然变得更有效率。所谓的资本的“生产率”的职能就是从这里来的。——丹尼尔曼注

的，有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整个制度的一个原则……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的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①

三、多少世纪以来由俄国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并在不久以前在农民〈法令〉中得到法律认可的生产过程的形式（生产工具属于生产者本人），同生产过程的新形式（任何劳动工具都不属于生产者）发生了矛盾。在容许有所谓免费的赤贫者份地的2月19日的〈法令〉中，特别是在其涉及采矿工人的条文中，可以看出这一新形式的影响。^② 这些条文是同〈法令〉的基本方针背道而驰的，因为它们规定只分给采矿工人十分之一俄亩的土地，而且规定赎买生产工具——工厂本身是不合法的。〈法令〉本身就是旧生产过程的一曲垂死的哀歌，此后就再没有颁布任何旨在发展作为生产者的农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3—825页。——编者注

^② 我们更不用提这一“为社会发展之用而征收的贡赋”的赎买原则本身了。不依这一原则为转移，赎买迫使生产者把自己的劳动产品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变为商品，因而也就越来越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得到巩固。——丹尼尔逊注

民的任何法令了，因为后来的国家经济活动转到截然相反的方面去了。^①没有颁布任何引人注目的经济法令，总之，在1861年以后所有这一类活动很少引起什么议论，但是从结果来看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制度产生的影响要比《法令》来得更重大（再说一遍，我们谈的只是经济生活）。为了赎买已经获得自由的数百万农民的土地，由国家发行并在1879年1月1日以前处于流通中的纸币为三亿九千二百万卢布，而为了朝相反的方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国家承担了比这个数目几乎多两倍——十亿多卢布的债务，它占了全部国债的百分之二十八，而为了抵补这笔债务，要求大大增加税收，因为铁路所欠国家的债务超过了它的偿付能力。我们已经看到，到1879年，据国家监察总署的报告，铁路欠缴政府的税款总额已占拖欠国库债务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而从财政大臣的讲话（1879年12月14日）中我们知道，铁路所欠国家的债务总额已达十三亿二千万卢布（六亿二千九百九十万金属卢布和三亿一千三百万信用卢布），因此当所有的纳税阶层负担的欠缴税款或债务为四千七百七十万卢布（各种赋税三千零二十万卢布和前地主农民的赎款一千七百五十万卢布）时，它超过了国家预算的一倍多（整个赎款七亿四千万卢布），而当1869年至1879年期间各纳税阶层的欠缴税款占各种人和机构拖欠国库的全部债务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点五时，铁路的欠缴税款是以下列的级数增长的：按金属货币面值计算，到1869年时铁路欠缴税款占全部债务和欠缴税款的百分之三十五，到1871年时占百分之三十九，到1875年时占百分之五十八，到1877年时占百分之六十四，到1878年时占百分之六十七，

^① 承蒙伊万纽科夫教授在其《政治经济学》（1885年莫斯科版第497页）一书中为我们叙述了在我们的《概论》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他是这样地叙述这一思想的：“……从《法令》颁布以后到为了赎买农民的土地而建立国家农民银行为止，没有颁布过任何有关的法令”，等等。——丹尼尔逊注

到 1879 年时占百分之七十七。^① 但是国家在为铁路承担了如此巨额的债务以后,只能在增加预算的条件下来偿还,而预算的全部重担则落在纳税阶级的肩上。“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② 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为了出世,就利用国家手段这个集中的、有组织的暴力。

四、随同这个旧经济关系的改造者一起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信用。“信用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有力的武器;它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资本家手中。它变成一个专门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随着资本主义积累和生产的发展,竞争和信用——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因素,也越来越发展起来。同样,积累的发展又使集中的对象本身即单个资本增加……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强度及其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构的完善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并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集中要求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要求在量的方面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分配。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工业部门中,只有当投入的全部资本变成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才达到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全国的资本合并到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到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达到极限。很明显,积累,即通过螺旋形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首先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例如,如果等待单个资

① 到 1892 年 1 月 1 日时铁路拖欠国库的债务占全部债务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在为数十九亿三千六百五十万卢布的全部债务中,铁路欠了十八亿六千五百万卢布(参见财政大臣 1892 年 12 月 21 日在国家信贷机关委员会的讲话)。——丹尼尔逊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19 页。——编者注

本通过积累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社会上就不会有铁路。资本的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①

五、“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等等。我把它叫做‘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巨大的股份公司的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集中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只是社会的少数局部现象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铁路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这不仅是由于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借的新债务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还由于铁路的修建使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主义的黄金；许多以前因为没有销路而很便宜的东西，如酒、水果等等（在我们这里是高级品种的谷物），都变得昂贵起来，从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而在另一方面，生产本身（也就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②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688页。——编者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7—348页。——编者注

六、信用和铁路正在加速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货币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信用和铁路都在加速生产者是生产工具所有者的那种生产的经济条件向生产者成为雇佣工人的那种条件转变。

在我们这里，把劳动工具分给生产者的〈法令〉妨碍资本依附于土地和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改革后的整个国家经济活动正在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两种相互毁灭的趋势也就成为我们不得不遇到的一切矛盾的根源。但是，资本主义的趋势看来正在占上风。所有资料都表明这一点，即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正在被剥夺；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产品中生产者份额的减少和资本家份额的增加，迫使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抛弃土地，不去“装扮”土地。同时村社内部也正在出现很有趣的现象：村社把最坏的土地拨给不善经营的主人（反正他们不会去耕种它），农户土地重分的期限越来越长，因此我们是村社使用土地转变为个人使用土地的目击者。^①“使独立的农民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为资本建立了国内市场。从前，农民家庭生产至少是绝大部分作为其劳动果实的、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生活资料和原料都变成了商品，由农场主批发出售。另一方面，象麻纱、麻布等产品（它们的原料过去都是由每一个农民家庭支配的，迄今一直是农村的产品），现在变成了手工工场的产品，农村是手工工场的销售地点……随着农民的被剥夺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顺便

^① 参见《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统计汇编》第4卷，《农民经济》。我们找不到充分的言辞来向每一个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人推荐这部内容如此丰富、叙述形式如此卓越的《汇编》。——丹尼尔逊注

指出,工场手工业是很缓慢地控制国民生产的,而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副业一直是它的基础……它需要它们加工原料。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个阶级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①

七、从实质来说,新的经济条件(信用等)无论同人民生产或生产者都毫不相干。

八、因此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在时间上分开了。(我们回想一下,当生产者刚退出舞台以后,资本就在9月份开始行动了。)由于公社的基础阻碍资本去掠夺农业生产,因此资本在生产中不起任何作用,只是在生产过程结束后以产品同生产者分离者的身份作为商人资本登场。(我们再回想一下,生产者在春天购买他们不得不在秋天卖出去的自己的谷物。)

九、正当夏末农事结束之后,在活期存款减少和借贷业务增加的同时货币流到民间的时候,国家通过国家银行增发纸币而加强了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分离过程。到了冬天,纸币在完成自己的天然使命、去了一趟民间并从民间取得人们的夏天劳动的产品以后,回到了信用机构,所以这时出现了纸币停止流通的可能性。

十、用于军事目的而大量发行的纸币,在相当程度上加紧了上述的分离过程。尽管农业生产停滞,农产品的交换量却大大增加了。在我们探讨的这个时期里,纸币每增长一成,就要使交换增长两成。但这还不够,由于 *L'appetit vient et mangeant*^②,因此投入流通中的纸币越多,对纸币的需要也越大:私人银行从来也没有象在1879年那样欠了国家银行那么多债,虽然这一年不得不对发行纸币规定最高的限额。(参看根据国家银行和股份银行从1879年1月1日至1880年1月1日的资产负债表作出的统计结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6—817页。——编者注

② 法文:得寸进尺。——编者注

论。国家银行与股份银行关系栏。)

十一、经济活动越来越趋向于通过城市商业掠夺性地剥削农业居民。城市中居于首位的是彼得堡。

十二、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停滞和流通的迅猛增长；(一)财富的积累和与积累一起的迅速集中，是靠减少人民消费来完成的(人民消费既在量的方面减少，同时也在质的方面恶化)；或者资本的集中是同人民消费成反比的；(二)人民消费的减少或产品中劳动份额的减少，主要不是由于增加国家预算造成的，而是由于资本的代表通过商业和广义上的流通而占有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的份额造成的；人民消费量同流通量或甚至同新的经济生活的一切要素的量成反比……

十三、当农业生产还在使用石器时代的工具时，为了使产品同生产者分离，应用了科学的最新成果。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铁路同输送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的运河相比的话，那么信用和以信用为基础的机构就力图把负有使产品同生产者分离这一特殊使命的力量集中起来。

十四、这首先取决于这样一点，即我国经济生活的新趋势主要是分离的趋势，并且只有在不受到自然界限的限制，只有在有了可以分离的东西时才能发展。资本主义活动处于紧紧地直接依赖农业活动的地位；农业劳动的效率越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交换量就越小。但是由于“铁路和各种股份企业特别是股份银行一起，给资本的集中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相互借贷的罗网里”，因此交换对象本身即农产品量的减少(这种减少导致交换过程的相应缩短)，便使那个全部活动因相互借贷而完全靠这个过程的动力的阶级，陷于某种程度的危机的境地。但与此同时，交换过程本身进行得越有生气，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越

迅速地使农业劳动的效率降低。如果在交换的动力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的效率就会降到最低限度，而这将引起危机。^①

十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靠减少人民消费而实现并扩大偿付能力的资本集中，正在破坏农业劳动的生产力，不断增加“破产的”、“无产的”农户的数目。因此，〈法令〉是唯一旨在巩固那个建立在生产者占有劳动工具的基础上的生产过程的一项立法，但它不仅得不到有助于这一生产过程发展的许多措施的支持，相反，却接连不断地遇到了促使这一生产过程消灭的许多条件。我们可以说，〈法令〉没有按照立法者的意图成为开端的基础，而是成了终结的基础。

十六、信用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即不是为了自己消费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它和“专门用于资本集中的结构”一起，同

① 现在(1880年)有一切迹象表明情况极为严重。首先要提到的是歉收这个基本因素，它给整个国家经济活动定了调子。但是我们对歉收还感到不习惯。不是歉收造成困难，而是出现歉收的那些非常条件使歉收的意义变得严重了。最近几年的经济活动丝毫没有增加谷物的产量，同时却力图减少生产者占有他的劳动产品的份额，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竟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例如在扎顿斯克地区甚至要求科学协会提供粮食代用品……生产者自己这一次仍然一无所有。交换量大大下降了，这一点可以从通过铁路运输的货物量的减少看出来。总之，所有的资料都表明整个流通结构正在迅速放慢步子。但同时国家的需求应当得到满足。手头已经没有可资利用的财富，因此政府除了发行纸币这样一个困难的出路以外没有别的出路，这当然会降低本来已经很低的纸币行市。但这还不够。由于歉收，赋税收入将会减少，而同时国家的开支将会增加，第一、是由于各种商品的涨价(军需机关的开支等等)，第二、是由于纸币的行市下跌(用黄金偿付金属货币债务。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原因都是一个，我们不过是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待罢了。)其次，铁路收入的减少将会引起政府提高保障收入的追加额，等等，等等。还可以找到很多表明危机正在临近的现象。危机将如何发生，我们不算预言。但是不管危机的结局是什么，将来会发生危机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造成了如此困难的状况，破坏了人民的一切经济、法律和道德的古老“基础”，尽管如此，它却享有“基础”创造者和保卫者的声誉，至于说到力图防止毁灭、使2月19日的宣言的基本思想有可能得到发展的那种趋势，则至少到目前为止仍属于破坏性的趋势之列。可以期望，目前的危机将会提醒社会并使所有的人认清真相……——丹尼尔逊注

资本主义生产发生了直接的矛盾，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如果它能为谁服务的话，那也只是为各式各样的富农的发展服务，而绝不可能为生产者服务，不管这个生产者是单个人或村社都一样。因此，企图在信用的基础上改善生产者的物质状况的一切计划，不但不能改善这种状况，而且适得其反，改善了少数人而恶化了多数人的物质状况。两种生产方式在信用领域里的斗争因此成了极其符合资本主义的愿望的斗争，因为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领域里被武装到了牙齿；这种斗争只会扩大已经十分广阔的资本主义的舞台，同时消灭和它对立的生产方式的最后一点残余。如果象农民粮食银行在芬兰和红村所做的那样，用发放粮食贷款来代替货币贷款，那么情况就丝毫也不会得到改善（参看《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1880年5月号第115—127页）。

十七、信用在其发展中实质上变成了两个方面（资本家和获得剩余价值的那些人给银行贷款，把自己的暂时退出流通过程的货币资本存入银行；银行则给资本的代表贷款，把这些钱借给他们），并力图使资本集中，也由于这一点，信用不可能象把它看成医治一切经济祸害的万应灵丹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普遍的信用。资本的代表——商人、银行家、铁路活动家等等——都力图精心地发展信用；所谓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家——亚·伊·瓦西里契柯夫公爵等人——则希望粗放地发展信用。两者之间纯粹是量的差别，根本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因为前者和后者都力图发展和巩固资本主义关系。

十八、由于应当从资本主义关系并主要是流通过程的资本主义条件的极度发展中寻找目前正在酝酿成熟的危机的原因，因此把改变赋税制度看成医治一切经济祸害的某种万应灵丹至少是不正确的。不管当前的预算数字由什么样的纳税人来分担，由于预算数字同劳动平均效率完全不成比例，因此不管怎样它仍然要把

自己的全部重担转嫁在劳动上,因为我们知道,发展中的流通条件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会从生产者那里攫取尽可能多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上面提到的农民粮食银行在其极度发展中只能缓和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我们当然不想以此说明赋税改革是不好的,完全相反……我们只是想说明,单是赋税改革本身绝不会使经济得到任何根本的改善。

十九、同样也不能期待通过大家都喜欢的移民的办法来使经济得到任何改善。在其他业已具备的经济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移民可能只在最初对移民的人和留在当地的人的困难有所减轻,但是如果说真会有所减轻的话,那也是短时间的,然后一切都恢复老样子,于是我们就又会嚷嚷移民,仿佛我们这里人口真很稠密似的。(爱尔兰发生的情况是,它在最近四十年里失去了将近一半的人口。但是留下来的居民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此得到丝毫改善,由于靠牺牲耕地而发展牧场,状况反而恶化了。)

二十、由于剩余劳动产品在生产者手中的积累和这些产品向发展生产资料方面的转化,在近十五至二十年里受到了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阻碍,这种活动引起了即将来临的危机(危机潜伏着,并且正在迫近,它没有显露出来已经有好几年了,在1880年冬天有引起极端尖锐化的危险),因此,为了避免危机的重复出现,而且主要是为了促进生产者和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离开那条力图发展交换、贸易等的道路,并在生产者自由占有劳动工具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者的劳动效率,《法令》完全正确地把这一点看作是“家庭幸福和社会福利的保证”。《法令》的法律枷锁被打破了,把地主和农民系在一起的经济枷锁虽然也打破了,但是近几年来社会经济活动越来越使农民束缚于新产生的力量即资本。在《法令》颁布二十年以后,我们仍然面临着同一个问题——但形式上更为迫切的农民问题,即脱下了模糊它的本质的法律外衣

的、完全赤裸裸的农民问题……

第二篇 手工业的资本化

我们在第一篇研究的几乎完全是关于谷物生产及其出让的问题，并企图说明“资本主义力图把农民的生产变为商品生产，尽可能把更大量的劳动产品吸引到自己的流通过程中去，而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生产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我们看到这种转变对人民的福利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篇概论中我们要看一看，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中工业资本的掠夺怎样促使人民生产的产品的这种转变和由此发生的情况。我们将谈到加工工业，并且主要是那个旨在满足除食品以外最基本的需求——对衣服需求的加工工业部门。我们所利用的那些资料的性质是作出这种限制的基本原因。在这些资料中没有关于应纳消费税的生产和采矿工业生产的财政方面的情况。

由于在第一篇概论中我们只限于谈论俄国欧洲部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涉及的也还是这一地区。多少完整一些的资料是从1885—1886年开始的，所以我们也就限于这几年。

—

八十年代下半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纤维品
和棉花加工工业的发展。——工厂的地区分布。——
工业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作用

从概论后面所附的第十一表中可以看到，包括波兰在内的俄国欧洲部分的所有工厂（非股份的、应纳消费税的工厂和采矿工业的工厂除外）生产的商品的总产值为：

	1886年	1887年	1888年	1889年
百万卢布	1004.5	1074.9	1161.4	1193.3
1886年 = 100%	100	107	115.6	118.8
全俄国的纤维 品加工	428	485	523.9	522
1886年 = 100%	100	113.2	122.4	121.9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我们提到的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很可观的，仅仅在四年时间里资本主义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十八点八。但是首先引起注意的事实在于，在总生产中纤维品加工的生产的增长特别迅猛。例如1887年纤维品的生产同上年比较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二；1888年就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四；1889年增长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二；换句话说，这一生产部门在四年中增长了五分之一。其他生产部门的增长虽然也很显著，但远远比不上纺织工业的增长。在这几年里其他生产部门的增长以百分比表示为百分之百、百分之一百零二、百分之一百一十和百分之一百一十一。从这里可以看到，纤维品加工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影响到整个工业的发展，它在这几年分别占该工业整个生产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六、百分之四十五点一、百分之四十五点一和百分之四十三点八。

但是纤维品加工包括一系列不同的生产部门；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些满足最大多数消费者需要的产品的生产的增长，也就是看一看棉纺织工厂在这个时期是怎样发展的；

棉纺织工厂起初占了不到一半，后来甚至占了整个纤维品生产的一半以上，而且它们的增长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工厂的生产的增长；1888年它们的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三，即将近三分之

一。同时它在这一年占有所有工厂生产的五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即不到四分之一。

	1886年	1887年	1888年	1889年
棉纺织工厂的生产 (百万卢布)	201.2	229.4	264.2	255.3
占整个生产的 百分比	20%	20.3%	22.7%	21.4%
占纤维加工工业生 产的百分比	47%	47.3%	50.4%	48.9%
这些工厂的 增长, 1886年 = 100%	100	114	131.3	126.9

可以假定,生产的这种增长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不过是产品的价格提高了,是由于对输入的棉花课税而提高了,因为我们谈的是产品的价格,而不是产品的数量。看看《俄国对外贸易评论》并算算从国外输入了多少棉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正好在1887年课税以前增加了棉花的输入,于是就掩盖了问题的实际情况。因此,从1887年和1888年的输入总数得出每年的平均数,再加上中亚细亚的棉花生产,就可以得出:1886年加工了八百三十八万八千普特棉花;1887年加工了九百万普特棉花;1888年加工了一千零六十一万九千普特棉花;1889年加工了一千零七十万普特棉花,也就是说棉花供应量的增长大体是百分之百,百分之一百零七,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百分之一百二十七。这些数字表明,棉花的供应及其加工的确增长了。

为了回答棉花课税对产品价格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让我们把课税前后的利物浦的棉花价格同莫斯科的棉花价格比较一下。从脚注^①所引的数字可以看到,由于提高对棉花的课税额而造成

的表面的生产增长，可以用金额表示如下：1888年约六至七百万卢布，而1889年将近八百万卢布。

为了说明得到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而不是别的什么形式，我们利用一下发表在《财政通报》上的一些企业本身的原始报告。为此我们从棉纺织股份工厂中选取一些工厂，它们提供的报告的详尽程度可以使我们的问题得到解答。这样的工厂我们选取了十四个，但是它们是如此庞大，以致它们的生产占了整个生产的很可观的份量。到1886年年底，全部消耗在这些工厂的资本达六千四百四十七万五千卢布。在这个数目里消耗在建筑物和机器上的是四千六百四十六万三千卢布。过了四年以后，也就是

①

年 份	利物浦的平均价格 (每普特金卢布)	平均行市	莫斯科的棉花价格		利物浦和莫斯科价格差额	
			(纸卢布)	(金卢布)		
1884	5.81	1.58	10.80	6.83	1.02	
1885	5.50	1.61	10.24	6.36	0.86	
1886	4.84	1.65	9.72	5.89	1.05	= 0.9875
1887	5.16	1.81	11.70	6.18	1.02	
1888	5.29	1.72	11.58	6.96	1.67	
1889	5.65	1.50	11.57	7.51	1.86	
1890	5.96	1.40	12.78	7.70	1.74	= 1.757
1884—						
1887	5.32			6.315		
1880—						
1890	5.63			7.39		

利物浦和莫斯科价格的差额在提高棉花的关税以前是0.9875金卢布，而在提高以后是1.757金卢布；这种增加显然是关税的结果。这两者之间的差额(1.757—0.9875)是0.7695金卢布，因此在莫斯科没有课以关税的棉花平均价格在1888—1890年应是6.6205卢布，关税提高了棉花价格的百分之十一点七。换句话说，根据1887年11月7日的法令，关税从每普特四十五戈比提高到一个金卢布，使棉花价格提高了百分之十一点七，按1888年和1889年消费的全部棉花计算，这将提高约一千五百万纸卢布。据以作出这个结论的上表的数字，引自《财政通报》1892年第8期。——丹尼尔逊注

到 1891 年年初,这些工厂的资本增加到了七千六百二十九万四千卢布,而消耗在建筑物和机器上的资本已达五千五百七十六万五千卢布。资本增加了百分之十八,消耗在建筑物和机器上的资本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消耗在建筑物和机器上的资本增加了五分之一。^①

最后,我们以彼得堡工厂区的一个大棉纺织工厂作为例子,来看一看它在最近时期逐年发展的情况。它在 1856 年建立时资本不大,到 1886 年开始在《财政通报》上公布它的报告时,它的资本已经增长到六百一十万五千卢布。其中四十三万卢布消耗在土地上,五百三十二万卢布则消耗在建筑物和机器上。1887 年地产的价格定为四十三万卢布;购买新机器花了七十八万卢布,因此消耗

地 产 估 价	建筑物和机器	资 本
到 1889 年时为 420 000 卢布	6 220 000 卢布	8 150 000 卢布
到 1890 年时为 420 000 卢布	6 660 000 卢布	8 859 000 卢布
到 1892 年时为 403 000 卢布	6 851 000 卢布	9 252 000 卢布

① 1889 年下半年,地方自治机关的一位曾在八十年代上半期在莫斯科省的一些工厂进行过卫生调查的统计学家波果热夫先生,有机会再次到他进行过调查的那些地方去。请看他是怎样描述他所看到的变化的:“自从博哥罗茨克县进行工业卫生调查(包括就地拍摄平面图)以来,在五年之间几乎所有的工厂作坊的规模都扩大得叫人认不出来了,无论是大的(博哥罗茨克—格卢霍沃工厂)或小的(巴甫洛夫镇的瓦·舍尔巴科夫的红色颜料作坊、博恰罗夫的小化学作坊等)都是如此。”(《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卫生统计部分,第 4 卷第 1 部第 17 页脚注。)波果热夫先生所提到的博哥罗茨克—格卢霍沃工厂发展的可观程度,从以下的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到 1885 年复活节时消耗于这个工厂的建筑物和机器的资本约五百万卢布,过了四年以后,到 1889 年复活节时(波果热夫先生第二次去的那一年),消耗于这个工厂的建筑物和机器的资本增加到了六百三十五万二千卢布,也就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文中提到的资本消耗增长的十四个工厂是:博哥罗茨克—格卢霍沃、维索利沃、叶卡特林戈夫、伊兹马伊洛沃、日拉尔多夫、克康哥尔姆、维库尔·莫罗佐夫、涅瓦、尼科尔斯克、奥赫涅斯克、彼得罗夫斯克、斯帕斯、特维尔和谢布列尔。——丹尼尔逊注

在建筑物和机器上的资本是六百一十万卢布。资本增加到了七百二十二万六千卢布。

如果以 1886 年的资本作为一百，则 1887 年资本增长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到 1889 年时增长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三，到 1890 年时增长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五，最后，到 1892 年时增长到百分之一百五十一。它在五年里增长了一半多，而从所有主方面来说则没有任何新的消耗，因为企业本身提供的利润的一部分变成了资本。这个工厂的生产是以这样的规模进行的：1886 年生产了九百六十九万三千卢布，1887 年生产了一千零二十七万八千卢布，1888 年生产了一千三百六十万二千卢布，1889 年生产了一千二百四十六万八千卢布，1890 年生产了一千零八十三万九千卢布。如果以 1886 年的生产作为一百，则这几年生产增长的变化是：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一百零六，百分之一百四十，百分之一百三十八。

因此，毫无疑问，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部门的发展都很显著。至于说到纤维品加工工业特别是棉花加工工业，则可以说它们是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的。

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一生产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发展的，它的所在地在哪里？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我们的表。我们先来看一看，它是怎样在欧俄本部和波兰之间分布的。1886 年俄国本部的生产占包括波兰在内的整个生产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三，1887 年占百分之八十四点七，1888 年占百分之八十六点一，1889 年占百分之八十六点一。原来，整个生产是相当平衡的：波兰的比重经常占百分之十四左右。现在再来看一看棉花的加工生产。如果把 1886 年的生产作为一百，那么生产在全俄（包括波兰在内）的变化情况是这样的：1887 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四，1888 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三，1889 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点九，而在俄国本部是：1886 年为百分之百，1887 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五，1888

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点六，1889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一点七。由此可见，棉花加工工业在俄国增长要比在波兰增长得快，正是1886年棉花加工工业在俄国占整个棉纺织生产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七，1887年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九，1888年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七，1889年占百分之八十二点六。波兰所占的这一生产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点三减少到了百分之十六点三。税率的差额——由海上输入的棉花每普特课税一个金卢布和由陆路输入的棉花每普特课税一卢布十五戈比——马上就表现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整个生产在欧俄本部分布的情况，以便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在家里找不到事做的不断增长的过剩农业人口，是否能指望在附近的工厂里找到工作。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指定了莫斯科、彼得堡^①、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梁赞、特维尔和雅罗斯拉夫里七个省。这七个省的生产1886年占整个欧俄生产的百分之六十，1887年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五，1888年占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三，1889年占百分之五十八点八。可见七个省的生产占欧俄本部整个生产的五分之三。

至于说到棉花加工，那么在上述七个省里，1886年这一生产占全俄棉花加工生产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六，1887年占百分之九十五点五，1888年占百分之九十七点六，1889年占百分之九十七，也就是说实际上几乎整个这一生产都没有超出七个省的范围。同时，如果以1886年的生产作为一百，则这一生产的增长可用数字表示如下：1887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三点八，1888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点八，1889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一点五，也就是说它的

^① 克康哥尔姆工厂也归并到彼得堡省，因为它仅仅被纳尔瓦把它同彼得堡省的许多工厂分隔开了，而这些工厂同克康哥尔姆工厂一样，都在利用纳尔瓦瀑布作为动力。——丹尼尔逊注

增长大大超过了全俄和每个区的整个棉花加工工业生产的增长。

如果把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从这七个省中分出来，那么就会发现，最大的、相对的和绝对的增长恰恰都在这两个省出现。例如，这两个省的棉花加工工业生产，如果以1886年作为一百，那么它的发展情况如下：1887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七，1888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九，1889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九。然而全俄的棉花加工工业的发展却是这样：百分之百，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百分之一百二十六。除了棉花加工工业以外的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的发展，在这两个省要慢得多，就是这样：百分之百，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五，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二，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六。在这两个省集中了除波兰以外的全俄欧洲部分棉花加工生产的三分之二左右（这几年从百分之六十三点七至百分之六十五）。彼得堡省在这方面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这个省加工的棉花约占百分之十六——十七，虽然这一生产的相对增长在这里也很可观。莫斯科主要经营织布业，彼得堡主要经营棉纺业；彼得堡的织布业正在衰落。关于它的原因，在以后涉及资本主义纺纱加工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问题时，我们还要谈到，现在我们只是确认一些事实。^①

至于说到彼得堡地区的别的生产部门，那么我们不但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发展，反而发现它在衰落。例如我们从表上可以看到，在我们谈到的这几年里，彼得堡的生产总量（棉花加工工业除外）的变化表现为：一百，九十四点九，一百零一点二，九十八点八。除了第三年（1888年）的生产总量稍微提高了一百二十万卢布以外，

^① 圣彼得堡省有一百零八万五千八百八十四枚纱锭，而莫斯科省有九十六万三千枚纱锭，但是圣彼得堡省总共只有一万一千零四十七台织布机，而莫斯科省却有二万九千二百五十台（我们把克廉哥尔姆工厂也列入圣彼得堡省，这个工厂有三十万八千八百一十八枚纱锭，目前它的纱锭数目已超过四十万枚）。——丹尼尔逊注

其余几年都有所降低，虽然这几年在整个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在其他地区和生产部门空前猛烈地高涨了。

可能会对我们制表的这些资料的准确性产生怀疑，虽然我们利用的也就是修订关税税率委员会所掌握的那些材料。但是为了消除对它的怀疑，我们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在概论的第一篇第五节中已经指出了莫斯科和彼得堡在俄国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不同的作用。但在那里我们只是象谈到买主那样地谈到它们，而且只是顺便提到，莫斯科比起买主来是一个更积极的卖主。现在我们来更直接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在各城市之间的相互贸易关系中发生的那些变化……

彼得堡在莫斯科失去了自产商品销路的百分之五十八，并且全省也向它少买了将近百分之四，而这是发生在工商业最兴旺繁荣时期的事。总的来说彼得堡失去了销路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但这是在过去十年的最后三年。让我们再看一看 1886—1890 年（即我们正在加以研究的那个工厂活动的时期）发生了什么情况。只要看一看下表，我们就会发现，彼得堡在这个时间里越来越失去自产商品的销路，如果以它在 1886 年的出售数字作为一百，那么以后几年的数字表现如下：1887 年为百分之八十九，1888 年为百分之九十八，1889 年为百分之八十六点四，1890 年为百分之七十三点六，也就是说五年中它的销售量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只是饥馑的 1891 年才使它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它的销售额增加到了百分之九十二。

正当彼得堡失去它的自产商品市场的时候，莫斯科便取而代之了。在对十年中的最后三年加以比较时可以看出，莫斯科对本省的自产商品销售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对彼得堡增加了整整百分之四十二。总之它的出售额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1886—1890 年莫斯科出售额的增长额为：1886 年为百分之百，1887 年为百分之

一百零二，1888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八，1889年为百分之一百零七，1890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四，1891年对莫斯科的影响是不利的，因为它的出售额降低到了百分之九十七。

但是彼得堡虽然失去了作为自产商品的卖主的作用，它却力图作为外埠产品的商人来加以补救。它在省里最近三年的采购比头三年多百分之二十六。而在1886—1890年时期，当它作为自产产品的卖主的活动那样急剧减少的时候，它的收购额的变化是：1886年为百分之百，1887年为百分之一百零六，1888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点六，1889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二，1889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九，最后，在饥馑的1891年，它的收购额提高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四。

关于它向莫斯科的收购我们已经谈过了。但是莫斯科也渐渐地开始作为一个买主来排挤它了。例如，莫斯科在本省的收购额在十年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八点六，虽然从绝对量来说彼得堡的收购要超过莫斯科一倍。最近几年莫斯科的收购额为：1886年为百分之百，1887年为百分之一百零八点八，1888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三，1889年为百分之一百零六和1890年为百分之九十四点六。因此，在1888年得到可观的增长以后，后来就开始下降了。从表上可以看到，莫斯科与外埠的贸易总额，同彼得堡相比增加得更多。

如果现在来看一看各城市之间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相对的变化，那么可以发现，彼得堡在十年时间里失去了外埠相对出售额的将近百分之十。它在头三年的出售占全部出售额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而在后三年降到了百分之十二点八。莫斯科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将近百分之一（即百分之零点八）的好处。其余的出售摊给本省（占百分之八点八）。与此相反，彼得堡的收购额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二，本省的收购额增加了百分之二点八，这种增长是由于莫斯

科的收购减少百分之五所造成的。

1886—1890年彼得堡商品的相对销售额逐年下降；1886年它还占整个出售额的百分之十七，第二年就减少到百分之十四，后来，1888年减少到百分之十三点九，1889年减少到百分之十三，最后，1890年只有百分之十一点四。它的相对收购额虽然缓慢地、但却在不断地增长：从1886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增加到1890年的百分之三十一.三，虽然彼得堡在这方面远没有象战争年代那么顺利，那时它的相对收购额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在收购方面1891年对彼得堡来说是幸运的一年，当时由于国民遭受灾害，“粮食商品涨价和行市下跌，1891年夏秋季曾经卖出了最大数量的谷物”，^①并且输入粮食的价值增加了一千三百四十五万卢布。这一点也许有充分权利被用来同贸易部门在1877—1878年的活动进行对照。

的确，如果看看俄国在1891年的贸易活动，它在汇款方面的表现，那么可以发现，为饥馑地区大规模采购粮食首先反映在整个汇款业务的增长上，这一汇款业务超过以往从一个城市汇往另一个城市的汇款额一亿卢布之多，其次，反映在各省汇款的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上。从一些省城汇往另一些省城的汇款绝对额比以往多一亿五千万，而这种汇款的相对额则占整个汇款的百分之四十。平时它们占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九。

这一年莫斯科作为一个买主的衰落表现得特别明显；它向外

^① 《财政通报》1892年6月号。尽管从8月份开始禁止输出粮食和十八个黑土地带省份颗粒无收，粮食仍有输出，只是略少于上一年而已。1890年小麦输出了一亿八千一百九十万二千普特，1891年则输出了一亿七千六百零九万七千普特，1890年黑麦输出了七千六百九十万六千普特，1891年则输出了六千八百万零五千普特。1891年8月上半月在禁止输出黑麦前的优待期间，黑麦输出了二千三百三十三万二千普特，而在1890年整个8月份黑麦的输出没有超过六百零五万九千普特。——丹尼尔逊注

省的收购额减少了三分之二；它的整个收购的相对额降低了一半。与此同时，它向彼得堡和其他省份的出售额也减少了。

彼得堡则是另一种情况。1891年对它来说是幸运的一年。尽管一些省城向另一些省城的收购大规模地增长了（从百分之二十五——二十九到百分之四十），彼得堡仍然保住了自己的阵地：它的相对收购量和以前一样。从绝对量来说，尽管发生了饥荒，它的收购额甚至超过了获得特大丰收的1888年。^①

至于说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收购和出售总额，那么……莫斯科的总额增长远比彼得堡多，彼得堡的总额仅仅在1888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二，以后几年总共提高了百分之二，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可以这样来看待。

我们特别长久地停留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工商业活动的相对增长问题上，不是单纯为了好奇，不是仅仅为了看看两者如何“相互消长”。不，我们认为，在这一斗争中正在显示出这两个地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无论工业统计或银行报告都表明，这两个地区中的每一个地区的作用越来越特殊，越来越专业化了。彼得堡正在变成一个买卖人，主要是买主，它把俄国越来越大的地区包罗在自己的商业资本网里；它的贸易业务主要是收购原料。例如，石油业也没有逃过它的掌心（在巴库和巴统大量采购）。但是这种采购额同在粮食码头和粮食市场上的采购额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彼得堡的四分之三的采购都分摊到一些较大的粮食贸易中心（敖德萨、塔甘罗格、顿河岸罗斯托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别尔疆斯克、尼古拉也夫、利巴瓦、萨拉托夫、里加等）。

^① “歉收和由此引起的使居民如此不堪负担的粮价飞涨，在许多情况下对恰恰靠歉收及其后果赚钱的那一带人非常有利，并且甚至对许多丰收地区也非常有利。在那里粮食按上涨了的价格售卖一空。”（《财政通报》1893年第1期第23页）——丹尼尔逊注

与此相反，莫斯科作为原料的买主远远落后于彼得堡，虽然也想努力赶上它。它的主要活动是工业活动：它是自己的工厂产品的卖主。它主要是为争取自己的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而进行斗争，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斗争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暂且不谈这一斗争所采用的手段和它在这一斗争中从对手那里取得的胜利有什么影响。目前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指出工业活动集中于一个中心，而商业活动（并且正是原料贸易）集中于另一个中心的情况。^①

我们所引用的总生产量应当大大加以压缩，因为总生产的某些因素在计算时出现了好几次。试举棉纺织生产为例；它同其他生产一样，分为一系列掌握在完全独立的企业主手中的、完全独立的生产部门。棉纺厂主把棉纱卖给棉织厂，在那里棉纱的价值完全不依它曾在棉纺厂的账目上出现为转移而表现出来。平纹细布布坯的价值在转到整修印染厂时是完全独立地表现出来的，而不依它的一部分已在棉纺厂和棉织厂表现为转移。所有这些中间收购和出售纯粹虚假地增加了社会总生产量，因为每个企业主在自己的账目上一方面载明售出商品的总额，另一方面载明买进的原料的总额。但是由于任何商品（例如棉花）在到达买主——不论个人或生产者都一样——之手以前，首先应当通过许多中间阶段，通过许多独立的生产者，因此一个国家的总生产量将显得比实际总

^① 很有可能，往往由于气候的原因，一部分棉纺织业在彼得堡比在莫斯科将会得到更蓬勃的发展。正是高支纱需要湿润的空气。英国的这种棉纺厂集中在空气平均湿度不会降低于饱和点百分之十以上的地区，现在这些棉纺厂不是集中在曼彻斯特而是集中在奥德姆（舒尔采—格弗尼茨；《经济进步，社会改革的前提》，《布劳恩文库》1882年德文版第5卷第9页）。索罗尔德·罗杰斯认为这种情况部分地是由于英国精毛纺织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参看他的《六个世纪以来的劳动和工资》一书，纽约英文版）。直到不久以前俄国根本不出高支纱，最近它才开始生产，而且不能认为唯独在彼得堡开始了高支纱的生产；克康哥尔姆工厂也在作生产高支纱的准备。——丹尼尔逊注

生产量多出那些中间阶段的总量，即处于不同加工阶段的同一个产品的中间收购和出售的总量。^①

二

社会中的生产组织。——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这种发展是由什么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商品价值量变为由社会对商品的需要所决定的、消耗在生产上的劳动时间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下社会需要是如何决定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工业各部门的商品价值量的影响

在谈到表上的另一些数字之前，我们还得就社会分工的作用和意义再稍微谈一谈，因为这个因素在社会经济关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任何生产组织，不管它属于哪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其目的都是为了制造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

因此，在公社或家庭的范围里，在社会生活发展的萌芽阶段，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在制造各种不同产品方面的分配，是按照对其

^① 下面是这种工厂专业化，因而也就是由于被加工商品的各部分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而表面上增加生产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近来北美合众国各木材加工工厂日趋专业化，“出现了很多工厂，例如有专门制造斧头柄的、扫帚柄的或活叶桌的……机器业不停地向前发展，新机器不断地被发明出来，使生产的某一方面的手续简化，费用减低……每一部门，例如家具业的每一部门都变成了专业，需要专门的机器和专门的工人……在马车业方面，车辆由专门工厂（密苏里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生产，车辆在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生产，车轂则由肯塔基州和伊利诺斯州的专门工厂生产。这一切零件都由一些以制造整个车轮为专业的专门工厂买去。这样就有十来个工厂参与了某一辆廉价马车的制造。”（特韦尔斯科伊：《美国十年》，载《欧洲通报》1893年1月号第74—75页）当然，文中所引的关于棉花加工方面的意见是没有意义的。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内，在这方面没有发生过任何急剧的生产单独化。不但在前几年为了得出一年时间里新增加的价值，应当把全部中间收购和出售扣除出去，而且在后几年也应当把它们扣除出去。——丹尼尔逊注

中每一种产品的需要进行的。

在这种公社或家庭的范围里所出现的分工，是由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们的需要来决定的，然而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看到的那种分工，却已经不是由那种有限的人的需要来决定，而是由全社会的需要来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的情况，同每一个公社或家庭按照对每一种产品的需要来分配自己现有的劳动力制造产品的情况完全一样——社会力求使消耗在每一种产品上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量，同制造该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量一致。商品生产越发展，在每一项单独的生产上或在整个社会里的分工就进行得越深入。和这种社会分工以及以商品形式制造产品的发展的同时，生产本身由单独的、有限的生产逐渐变成社会的生产。

那么，在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生产组织中，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在生产所需数量的极其多种多样的产品方面的分配是怎样进行的呢，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是这样阐明的，他说：“既然经济学家喜欢鲁滨逊的故事，那么就来看看他在孤岛上做些什么吧。

不管他的需要如何简单，但他要满足某些需要，因而他不得不从事各种有用的劳动，做工具，制家具，打猎，捕鱼，养羊。关于祈祷和其他精神上的需要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他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工作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不管他的劳动的形式怎样，都是同一个鲁滨逊的活动，都不过是由另一种人类劳动构成的罢了。需要本身迫使他尽可能精确地分配自己从事各种工作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某种工作所占时间的多少，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不久就告诉鲁滨逊这一点，由于他从破船上抢救出了表、账簿、笔和墨水，因为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就马上开始记起账来。

他的资产簿记载着他所有的必需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一定量的物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品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以致任何一个人都能毫不困难地了解,然而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些关系中。现在让我们转到沉浸在昏暗中的中世纪的欧洲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独立的人,而都是互相依赖的人;农奴和地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在这里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建立在这种生产上的生活的其他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构成社会的基础,劳动及其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个人服役和实物缴纳而进入社会交易之中。在这里劳动的特殊直接形式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象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里那样,这种社会劳动采取一般的抽象形式。强制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地主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他的祝福更加清楚的现实。因此,不管我们怎样判断这个社会里的人民的各个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各个个人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们本身相互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没有披上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要找寻共同劳动或直接社会化的劳动的例子,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自然发展的形式。我们手头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从事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和衣服的那种家长制的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些种种不同的物品都是它的劳动产品,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不是商品关系。表现在各种产品上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完全象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

上的社会一样，有着自然形成的分工体系。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之间的劳动时间的调整，取决于年龄性别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自然条件。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就是劳动本身的社会性的直接结果，因为个人劳动力在这里只是作为整个家庭的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①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目前还部分地继续存在的古代规模不大的印度公社。它们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和固定分工之上的，这种分工在新的公社产生时成为现成的样板和基础。这种占有一百至一千英亩面积土地的公社，都是一个完全独立自给自足的整体。大部分产品不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而是为了满足公社本身的需要，因此，生产本身不取决于整个印度公社中以商品交换为条件的分工。变成商品的只是剩余产品，有一部分到了国家手中才变成商品，因为从远古以来就有一定量的产品作为实物地租交到国家手中。”^②分工在这种印度公社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所有这些人都是为整个公社劳动并为此得到一块耕地或一份收获作为报酬。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公社的这种发达的分工中发现劳动的共性和产品的分配。马克思把这种生产组织看成是“一把理解亚洲社会尽管经常改朝换代但却稳定和不变的秘密的钥匙。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没有触动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③

马克思接着说：“为了换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来描绘一个自由人的公社，他们用生产资料共同进行劳动，在劳动中各个人的劳动力自觉地被当作全公社的联合的劳动力来使用。在这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特点又重演了，所不同的只是这里谈的是社会劳动，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3—95页。——编者注

② 参见同上书，第395—396页。——编者注

③ 参见同上书，第397页。——编者注

而不是个人劳动。鲁滨逊制造的每一件物品，完全是他个人劳动的成果，因而是他个人使用的物品。这个公社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用作新的生产资料，并且依旧是社会的。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公社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公社的生产组织和生产者所达到的历史发展水平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符合一定的社会计划的劳动时间的分配，维持着各种有目的的劳动和各种社会需要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每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完成的份额的尺度，也是计量用于个人消费的总产品部分中他所占份额的尺度。在这种情况下，单个生产者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极其简单明了的……在古亚细亚的和古代其他生产方式下，我们可以发现，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变为商品生产者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原始公社越是走向解体，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本主义社会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的公社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服从和统治为基础。它们只有在劳动生产力还处于自己的早期阶段、因此人们在物质生活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还很狭隘的时候，才能产生和存在。”^①

其次，当谈到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和公社中的分工之间的关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96页。——编者注

系时，作者说道：“如果我们单就劳动本身来说，我们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加工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和每个人被由此而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或随后在民族内部——我们看到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的自然分工；随着共同生活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由于各部族之间的冲突，一个部族奴役另一个部族，这种分工的基础就更加扩大了。另一方面，社会分工还可以下述方式产生：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开始的，因为在文化的初期，只有家庭、氏族、公社等等是以独立的资格互相接触的，而不是个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他们制造的产品，也就各不相同。就是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各个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它们所拥有的产品的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中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交换以前就已存在了；交换只是使这些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相互关系，并从而把它们变成一个大的社会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总之，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相独立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开始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原来复杂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解体，——这个解体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换产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种类的劳动之间的任何进一步的联系，只有在后来通过把它们的产品作为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起来。这样，我们就看到，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个体丧失了自己很大一部分独立性，而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个体逐渐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一切发达的和依靠商品交换而存在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

为这种对立的运动……把一定生产部门限制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从力图经常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那里,获得了新的推动力。”^①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分工,不管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如何,它为了生产需要的产品都要拨给制造这个产品所必需的劳动力。生产越小、越孤立,这种分工受到狭小范围的限制就越大。公社、家庭、氏族就是实行这种分工的范围。但是随着生产变成社会的行为,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这种范围不断扩大,最后遍及整个地球。在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外的所有经济形态中,每一种经济组织单位(家庭、公社)为了生产每一件产品都要拨给制造这个产品所必需的劳动力,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清楚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一切产品采取商品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时,这些普通关系的本质就模糊不清了,虽然实际上这些关系仍然和以前一样的普通。马克思问道:“为什么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看起来好象是一种简单的、大家都清楚的东西,可是只要我们一谈到交换价值,商品就马上带有一种神秘性质。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客观地表现在:所有这些产品都具有等同的价值;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确定劳动力的耗费量,采取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劳动的社会性质借以显示的生产者的相互关系,采取了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在人们的宗教信仰方面,也可以找到这种关系的例子,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②就象偶像崇拜者赋予偶像以它所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390、392页。——编者注

② 参见同上书,第87—89页。——编者注

根本没有的本质一样，庸俗经济学家把商品看成是一种赋有超感觉本质的感觉物。“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这种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一般地说，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完全独立进行生产的一些个人或集团的劳动。这种独立的个人劳动的总和形成整个社会的总劳动。但是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每个生产者的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只有在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个人劳动只有通过交换使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直接发生关系，才能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的性质。因此对于生产者来说，把个人劳动同其他人的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不是从事制造产品的个人的直接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劳动产品只是在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只是当交换已经广泛时才具有实际意义，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时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个人劳动取得了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劳动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构成整个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有用的个人劳动可以同另一种有用的个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劳动才能满足个人生产者本身的多种需要。多种劳动只有在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时才能够相等。个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个人劳动的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通过产品交换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他的个人劳动作为社会有用劳动所具有的特性，通过

这种途径成为产品不仅必须有用，而且必须对其他人有用的条件，他的特殊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在和不同种的特殊劳动相等的同时，采取了一切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品在其中都是劳动产品的形式，都有它们共同的特性——它们全都具有价值。需要完全发达的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在依靠仅有的一点积累的经验以前，将会出现这样的科学信念，即所有不同种的特殊劳动，尽管它们是彼此互不依赖地进行的，却仍然经常作为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工部门而归结为社会所需要的那种量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产品交换的所有偶然的、不稳定的关系中，用于生产每一件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象房子倒塌到一个人头上时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以一种自然支配规律的力量迸发出来。”^①

从这段长长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的相互关系，掩盖了生产这些产品的人们的社会关系，这种用于制造该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在劳动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间接确定。但我们既然要摆脱这种制度，那么问题就象在奴隶的、农奴的、公社的生产制度和任何其他生产制度下那样清楚。

既然每一件产品要成为商品，必须适合社会对它的某种需要，必须是一件消费品，那么在体现于产品上的劳动中，也必须区分两种特性，第一、使在自然界取得的物质的自然属性适合人类需要的特性，一句话，创造使用价值的特性，这就是它的完全不依生产形式为转移的必要条件。第二、由于在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但为个人占有和目的在于交换的产品上消耗了一定量的劳动，劳动便使产品具有了成为交换价值的特性，而消耗在制造产品上的劳动本身就是这一价值的创造者。因此，尽管劳动必须依附在消费品（个人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90页。——编者注

消费品或生产消费品都一样)的制造上,尽管在产品在市场上以商品的形式出让的交换关系中,劳动的这种特性也作为它所固有的必要的特性参加了,但在交换中出场的是它的另一面——不是质的一面,而是量的一面。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制造商品消耗了多少劳动,这种劳动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它对包括黄金在内的所有其他商品的比例。可以在单位时间里生产出来的社会所必需的产品越多,在每一件单独产品上消耗的劳动就越少。而由于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用于制造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的,因此,消耗在商品上的劳动时间越少,它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小,它也就越便宜。

就是这一量的方面——由生产不以生产者彼此为转移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决定交换价值,——间接地决定了社会对商品的需要和指出了存在于单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指出了生产已成为社会的行为,并且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它的各个部门的划分越细、劳动生产率和各个企业中的工作的配合越是发展,它的社会性质就越是突出地显示出来。一方面,产品是在生产活动中彼此结合在一起的许多人的劳动的成果,另一方面——这种产品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要。

“对于资本家说来,社会需要是一个未知数……尽管如此,需要毕竟是这样那样地好坏得到了满足,而总的说生产的毕竟也是需要的产品。但是生产者是怎样来摆脱这种困难的呢?通过竞争来摆脱的。竞争又是怎样来解决这个困难的呢?很简单,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降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的商品是根本没有用的,或者虽然是有用的,但生产的数量是多余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

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和用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表现出来。第二，竞争使价值规律有可能在进行商品交换的社会里表现出来，它使得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社会生产组织和制度得以实现。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会得知社会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和是否需要多了。”^①除了单个企业主（他们的企业不但在社会总生产中所占部分越来越少，而且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更大从而生产更加隔绝的情况下，提供给成品的部分越来越少）的个人眼光以外便无法调节的社会分工越是发展，竞争的调节力量的作用就越降低，“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提供了那么多使过程发展不正常的理由”。

因此，产品的交换价值，或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商品形式的情况，只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同直接生产者分离或为了出卖而生产产品的必要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只要产品一采取商品、交换价值的形式，和通过“凝固”在其中的人类劳动同其他商品发生对比的关系，它就具有了一种在此以前还不曾有过的新的特性。

农民家庭生产的自用的布匹，就是单纯用来缝衣服、做内衣的东西，可是拿到市场上去的那种布匹，不管它原有的使用价值怎样，却又具有了一种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所决定的交换价值。如果社会对这种布匹的需要，即使没有增加这种布匹的数量也能得到满足，那么谁都不会去购买它。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它的交换价值就由在接近于最有利的条件即在劳动时间消耗最少的条件下生产它的那种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如果劳动时间使用得太多了，生产者就会立即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人们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14—215页。——编者注

付给他的商品的钱不会比其他生产者得到的钱多，而他花在生产布匹上的时间却比所需要的多得多，因此他不得不把它“赔本”出售，而在以后或者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或者改而从事其他某种手工业，或者最后彻底抛弃独立的工作，去当雇佣工人。^①在加工工业中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在最有利的生产条件下用于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有利条件较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必须低于自己的个别价值出售，因为生产这种商品的竞争对手可以更大量地和廉价地进行生产和出售，以致把他从市场上排挤出去。

尽管生产者在他们的劳动效率高得多的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生产商品，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仍然不能满足整个社会对该商品的需要，社会对它的需要要靠效率不那么高的劳动的产品来满足，那么由效率较高的生产所生产的产品出售时将高于自己的个别价值。除了使用效率较高的劳动以外，这样的企业主在销售市场方面可以比他们的竞争对手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更靠近销售市场或通往这种市场的交通要道，所有这些条件又都有利于把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以高于它们的个别价值出售。

所有这些情况特别适合农业和采矿工业。较肥沃的土地的所有者或较富庶的矿场主，以高于自己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即高于从最不肥沃的地段收获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之间的差额来出售自己的产品，只要从所有地段收获的产品总量对于满足社会对该产品的需要来说都是必需的话。

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交换价值不是产品所固有的某种性质，

^① “由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如缎子、毛织品、富丽雅绸、塔夫绸等，现在开始由德国人用自动织机生产，而且主要由妇女生产。他们在材料上花钱很少：他们成批地直接收购它作为原料，并在自己的机械染坊里进行生产”（《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1892年年鉴》，博哥罗茨克县通讯员的报道）。——丹尼尔逊注

而是—定的生产方式的结果，产品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才采取商品的形式，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但是既然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那么，进行生产的有利条件，无论是社会条件还是自然条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较肥沃的土壤，等等），并不是整个社会都可以加以利用的，而是只有那些处在这种有利的劳动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才能加以利用，虽然整个社会拨出的劳动力同生产全部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一样多。因此，在生产时消耗的劳动时间低于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的交换中，得到更多价值的可能性本身，就是由生产方式本身、生产资料同直接生产者相分离的情况所决定的社会结果。

顺便指出，生产方式对于社会的作用也就表现在这里。整个社会拨给商品生产以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但是在各种各样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下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在各别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农业和采矿业中，所消耗的劳动时间量是不一样的。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它作为交换价值也是一样的，可是用于生产它的劳动时间在一种情况下消耗得多一些，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消耗得少一些。因此，消耗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者，出售自己的产品也就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可以利用现成的对他有利的生产和流通的社会条件的不是整个社会，而是他个人。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以致在少消耗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更多的农产品，那么在此以前处在比较有利情况下的和有可能个人利用对自己更有利的社会条件的生产者，现在就丧失了这种可能性。当然，这只有在社会对产品的需要仍和以前一样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满足社会对产品需要的可能性越大，这种生产者的优越地位就丧失得越快。

如果因某种条件出现这种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出让自己劳动产品的生产者，那么他们将被迫把自己的产品低于它们的个别价值出售，因为他们消耗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

三

1861年以前俄国生产力的分布。——资本主义的发展 和劳动力的再分配

1861年以前俄国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的总量，可以粗略地分成如下几个部分：一部分劳动时间用于从事农业劳动，另一部分劳动时间用于从事生产衣料和缝制衣服、生产生产资料等等，等等。至于这些产品是如何分配的，下面再说，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劳动时间本身按工种分配的问题。这两部分劳动时间占了村社大部分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这两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一部分多一些，一部分少一些，取决于许多原因，其中气候和土壤的原因所起的作用不能说是不重要的。但是，劳动时间除了这两个主要部分以外，它的一部分用于从事当地的某些手工业或用于满足村社的某些专门的需要（鞋匠、铁匠、帽匠、裁缝），并且它们的产品和劳动，还用于满足村社范围以外的需要（手工业、运载业等等）。两种劳动在社会中的分配是相当平均的，从事纺纱、织布等等的人同时也是庄稼人，某个劳动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在消耗劳动力较少的条件下制造该产品的情况，都能使得从制造该产品的劳动中腾出来的劳动力用来制造感到不足的商品，或者满足新产生的需要。但是按照自己的性质来说，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不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因此极端的墨守成规和极低的生产率也就是它的特点。甚至在那些根据当地的有利条件转为手工业、开始为出售而制造产品和产品取得了商品形式的家庭生产部门，

劳动生产率也由于生产的分散而不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虽然从技术工艺来说这些产品远远超过了家庭生产的产品。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其发展的这个阶段上，比如说织布机摆在什么地方——是在家庭手工业者的小木屋里，或者是在工匠的小工房里，还是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总之，每个人都完全独立地进行劳动，此外，大部分工人在夏天都离开工厂去从事农活。

随着时光的流逝，家庭和村社劳动力的相对分配，由于不取决于农民的原因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谈到过的那种社会分工，不断地越来越深化了。我们看到，“不同的村社在它们周围的自然界里可以得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和莫斯科毗邻的一个区的纺纱业和织布业的发展，可以用来作为由环境条件造成的这种地区分工的一个例子。“作为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个人消费的家庭副业的那种织布业，对俄国中部地区的居民来说，早从远古时代起就是熟悉的。缝衣服用的布，就象其他家庭日用品一样，都是由消费者本人生产的，而高等阶层则利用自己的家庭工人的劳动。古代罗斯生活的宗法制度不带有能使居民的家庭副业变成工业的因素。”后来象莫斯科这样的居民中心的影响，不能不在生产它的居民最需要的产品的那些部门的发展上反映出来。因此，除了农业、蔬菜业等等而外，这里的手工织布业无论从布机数目的增加和织出布匹的多样化的意义上来说，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发展起来了。这当然对发展工人的技艺产生了影响。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学家们就是这样地确定莫斯科省的手工织布业的发展过程的。“从古代起织布业是农民的一项家庭副业，而且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消费，稍后出现了供应市场的亚麻布和粗呢织物的生产，从十八世纪初叶起丝织业开始普及起来，它逐渐得到发展并在最后遍及到大多数县份。本世纪以来制呢业开始从农民的小木屋里消失了，而丝织业则逐渐集中在博哥罗茨克县和科

洛姆纳县的有限的几个地点，在这同时细毛织品的生产开始发展起来了，最后，从1822年（实行高额保护关税的那一年）起出现了棉织业，它开始排挤其他各种织布业并在某些地点是农民在全部农闲时间里占优势的副业。手工业组织本身从1822年起完全改变了：农民不再是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而成为仅仅是大工厂生产的某些工序的加工者，他们仅仅限于领取计件工资。”^①

莫斯科地区织布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农民一年劳动时间分配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用于为自己工作的那部分劳动时间不断地缩短，并且逐渐同为市场生产产品的那部分劳动时间融合在一起。因此最后全部劳动时间不是分为三部分，而是分为两部分：从事农业的劳动和为市场的劳动；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除了粮食以外的物品的劳动都消失了。

1861年在加工工业组织方面，包括纤维加工工业在内，就象在俄国整个社会生活制度方面一样，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革。

随着无偿的农奴劳动的终止，“对于工厂产品的需求大大地增加了，而随着销售的增加生产本身也发展起来了”（亚·瓦·波果热夫：《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卫生统计部分，第4卷第1部第50页）。西欧如此艰难地达到的一切巨大的技术发展，我国的工厂主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能干的工人也有了。因此需要的只是利用现成的有利条件来发展最新的资本主义的工厂企业即机器织布业的组织。资本主义就利用了这些条件：“在有自动织布机工厂的地点，手工业生产者正在逐渐消失，在科洛姆纳县、谢尔普霍夫县、德米特罗夫县和莫斯科县，以及在直接紧靠这些工厂所在地的地区，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同时某些织物的生产成了机器生产的特殊财富，例如细平布、厚棉布、珠皮呢等等。”还没有被蒸汽机

^①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3册第32页。——丹尼尔逊注

掌握的那些生产部门,终究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因此“手工织布业分布在大织布厂的周围;一个地方的工厂织布业的大发展总是引起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论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都根本不再出产成为机器织布业对象的织物品种。”^①

总之,机器织布业首先掌握了最普通的织物品种——细平布、厚棉布等,也就是那些最行销的品种和供农民消费的品种(如印花布等)。因此织布机从农民的小木屋和工匠的小工房转移到工厂和在工厂里变为机器织布机的情况,对于农民经济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被资本主义直接掌握的那个地区的范围……

十 四

两种生产形式对国民经济生活的区别。——自产产品的消费和支付的消费

任何生产,不管它的形式怎样,它的最终目的都是满足某种需要。随着生产形式的改变,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也改变了。在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的条件下,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扩展到各个生产部门,产品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就作为商品来生产了,由于直接生产者必须把他所生产的产品总量中越来越多的产品出让出去,因此留给自己消费的也就越来越少了。

这绝不意味着,直接生产者本人对生活资料需要的量少了,当然不是。这只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力图使一切生产都

^①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经济统计部分,第8卷第3部第31、32、33页;以及《博哥罗茨克县的手工业》,载《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年鉴》1890年第36页。——丹尼尔逊注

变成商品生产，使制造出来的一切产品都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而把一切消费都变成支付的消费。在多少发达的形式下，资本主义生产除了支付的消费以外没有别的消费。

但是我国农民还占有生产资料。他们的手里还有土地。虽然随着加工工业的资本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必须变成商品，必须越来越大量地出让，以致留在直接生产者手中的那一份产品的数量，只够勉强维持生活的程度，但是也会有这样的年头，那时农民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满足自己的需要，那时农产品的出让相对地缓慢一些。这往往是在丰收的年头，特别是在紧接着丰收的第二年，那时债务和欠税都已偿清，对于衣服等等最基本的需要的满足也有了保障。在这样的年头就没有推动他非出让谷物不可的理由，因此可以把谷物留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进入市场的谷物相对地少一些。尽管连年丰收，农民需要的主要产品黑麦的价格却上涨了。现有的产品结果更符合对它的实际的需要。使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的生产者的消费需要额，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消费需要额不同。资本主义是把消费品作为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的，它力图从社会劳动力和社会劳动时间总量中多少适当地拨出用于生产每一件消费品的劳动时间量，以符合社会对该产品的需要，但不是符合对该产品的实际需要，而是能够满足购买该产品的那种需要。

大量的人对食品、衣服等等的需要可能是极为迫切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没有购买手段。他们有的全部东西就是他们的无处使用的劳动力。

如果直接生产者也占有生产资料，那就是另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满足不取决于占有购买手段，而取决于自己的劳动的使用。这种劳动的效率越高和强度越大，单个劳动者的劳动越是合理地包含到联合的生产过程中去，所有的人和每个人的需要

就越能充分地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到生产过剩，也谈不到就业不足的问题。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产品不是作为商品，不是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的。这种情况是在连续丰收的年头出现的。那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出让和流通条件的作用，便受到了不是由支付手段而是由真正的需求所制约的人民生产的大大限制。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非农业手工业资本日益扩展的时候，农民被迫年复一年地出让数量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产品。他们能够留给自己的产品数量，远远不符合他们的实际需要。但由于这是在全国发生的情况，因此由居民的购买力和资本主义造成的因素决定和制约的对于产品的需要减少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用于生产它们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太多了，它们的价值降低了。但是这种降低完全是由居民的降低了的支付能力造成的，完全是由于对产品的需要得由居民的支付能力来决定这一情况造成的。由此产生了歉收年头当地粮食价格和港口粮食价格之间的较大的悬殊。

再说一遍，这些年头对产品的实际需要显然一点也没有减少，减少的只是由于被迫出让产品而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

能使丰收连续出现两年的有利条件凑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是非常偶然的。但是如果连农业劳动的最高生产率也都会成为比较经常的现象，同时也保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条件，那么资本主义就能够把产品中的农民的那一份变为农民在目前平均享有的量，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看到。

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得到发展，它越是把那些迄今还掌握在独立生产者手里的手工业更多地夺取到自己的手里，农民就越少有可能（虽然间或如此）完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整个生产就将越完全受到除了支付的消费以外便不知道有其他消费的资本主义的确定不移的规律的支配。

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要求国外市场。——商品的低廉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实例。——棉花加工工业的发展。——这些商品的对外贸易。——其他工业部门的例子。——结论

我们在这部概论中力求证明，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劳动时间和社会劳动力再分配中所引起的变革，表现在满足社会对加工工业产品的需要方面，花费的社会劳动力和社会劳动时间要比从前少得多，因此其余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就都空闲起来了。其次，由于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现在人们已经不能象从前那样直接利用这些产品，而是不得不购买它们了。为了得到购买手段，人们不得不把自己农产品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出让出去，因此开始吃得更坏了，其他需要的满足也更差了，尽管他们还有大量备用的完全空闲的劳动时间和要找而找不到活干的空闲的劳动力。总之，我们这里正在发生加工工业同农业的分离，这种分离正在带来每一个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国家都经受过的那些后果。

对此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虽然我们现在的情况的确不好，农民的确越来越渴望得到土地，开辟牧场和草料地，砍伐从前在他份地上的林木；说除了那些有工厂的地方以外，几乎所有地方的农民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无事可做，而这些工厂或者迫使人们劳动到筋疲力尽，或者给的工作多到“使人们无法干完”。但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时间问题，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美好的日子就会到来，如果我们的国内市场显得不够的话，我们就争取国外市场，那时工业和商业将会得到顺利发展，所有的人都会有活干，我们有那么多的自然资源，我们可以使这些资源把全世界埋没。但是北美不也在证明这一点吗？……最后，农民抛弃了织布机以后，难道不想从事亚麻加工并把它送到工厂去？

让我们来试试把这一切都弄清楚。

对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形式来说，首先要求有市场，——这是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市场就会发生危机。因此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竭力确保自己拥有尽可能广阔的市场来销售本国的商品，当然首先是面向本国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已经不能满足于单一的国内市场了，这是有它的原因的。

整个新生产的年产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生产者——工人以工资形式所获得的部分，另一个是资本家获得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只能从流通中得到按价值来说同工资总额相等的那部分生活资料，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力图用最低的价格来限制他们”，因此“不管他们对市场是如何重要”，但他们在国内市场上作为商品购买者的作用却越来越受到限制。我们已经看到过资本主义借以减少工人阶级所获得的份额的那些方法。这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和提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实行能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来代替男子劳动的技术改进，以及通过解除和剥夺成年工人的工作的方法达到的。虽然留下来的人的工资也可能得到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同资本家由于第一、以较低廉的儿童和妇女劳动代替男子劳动和第二、相对地减少就业工人的总数因而减少耗费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最后，与手工业的资本化和农业人口劳动时间的闲置的同时，农业人口的购买力也降低了，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国内市场也狭小了。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而遇到了影响自己发展的障碍，因为国内市场是依工人的购买力为转移的。但是，资本家阶级从新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所得到的那个份额，也不可能消耗掉新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不过这是由于相反的原因。不管这个阶级的需要多么广泛，但在一年时间里生产出来的全部剩

余产品,也不可能都被它消费掉,原因部分地是由于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必须用于扩大企业和改进技术,否则每个资本家就要冒丧失自己的商品销路和被抛弃的危险,部分地是由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它的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个部门——采矿业,机器制造业,等等——也在扩大,这个部门的产品不能用于个人消费,而只能用于生产消费,换句话说,从自己出世的第一天起就只能和必须作为资本来发挥作用,而不能作为收入来消费掉;部分地是由于,社会劳动时间和社会劳动力的再分配是由这样的情况决定的,即由于劳动生产率较高而在单位时间里生产较多的,因而也较便宜的、为广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因此这种生产在技术方面也发展得最快,但是正因为由于它的产品是针对广大市场的,这些产品也就不可能由一小部分生产者自己来消费了。

虽然一个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不能在其他许多资本家的剩余产品中得到实现,而且反过来,虽然其他工厂主的剩余价值也不能在这个资本家的剩余产品中和剩余产品的相互交换中实现,因此也就不能实现每个工厂的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正如这在实际上发生的那样,但是应当记住,这种实现只有通过一系列生产部门,也就是从事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的产品才能完成,不管消费品的生产怎样广泛,也只能给很有限数量的工人以活干。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的却是那些从事采掘和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如机器制造、金属开采等等,也就是起资本作用的那些产品。正是生产资料生产的这种日益扩大的作用,引起了另一个从事生产消费资料,而且是生产针对广大消费者的那些消费资料的部门的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针对广大消费者的侈奢品,多半都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工生产。在每个工业部门由于竞争的力量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迫使这个部门的每一个工厂主在工业死亡的威胁下推广改进机器和技术手段。

顺便指出，这就是为什么说再没有比认为个人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动因的这种意见更错误的了。

由此可见，正如每个工厂的产品远远超过全厂工人和工厂主对该产品的需要那样，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也远远超过所有在业工业人口对该产品的需要，之所以超过是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劳动力的分配不是用于满足居民的真正需要，而是用于满足支付者的消费。因此，单个的工厂主也好，或者单个的资本家也好，如果他的市场仅仅局限在他的工人和他本人需要的范围里，他就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就象业已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仅仅满足于本国的国内市场一样。

摆脱困难的出路——由于每一个为了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市场而力图提高自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单个资本家的竞争而造成的扩大生产的需要，使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这种困难，而生产率的这种提高带来的是减少工人的就业，因而也缩小国内的市场，——摆脱这种困难的出路就在于国外扩大市场，就在于取得国外市场。

但是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处在同样的状况之下，它们都力图为自己的产品扩大国外市场。国外市场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加入工业的搏斗。在这一竞争中唯一的武器就是廉价的商品。低廉的价格主要靠较高的生产率和工人的较大的劳动强度才能达到。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技术改进的情况下，用于生产某一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是怎样减少的。我们也看到，在某一工厂中已经提高了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企业主能把本工厂的产品以高于个别价值出售的时候，在这种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还没有扩大到这个生产部门的所有的工厂以前，可以一直被利用来获得更高的剩余价值。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状况也可以这样说。某个

国家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强度越大，它所制造的产品就越便宜：它就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以高于自己产品的个别价值来出售产品。

这个问题具有如此巨大的经济意义，因此最好尽可能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由效率较高的、强度较大的劳动所生产的每一件商品，比起由效率较低的劳动生产的一件同样的商品来，它本身包含的价值——构成能量——要少一些，它所包含的人的劳动也要少一些。在劳动效率较高的情况下每个单位时间里经过工人双手的原料和制造出来的商品，比在劳动效率较低的情况下要多一些。因此在劳动效率较高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商品所消耗的劳动能量较少，因而价值的增加也较少。英国工人的劳动效率比我国工人高到什么程度，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样高的生产率如何反映在价格上。如果一百件原料，比如说价格为一百卢布的一百磅棉花，要把它变成棉纱然后又变成细平布，需要两个星期的劳动时间的话，那么布匹的价值表现为，比如说二百卢布，因而在两个星期的劳动时间里为原料增加了一百卢布的价值，即每个星期增加五十卢布。但是如果根据技术条件和其他条件，纺纱和织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为了生产布匹需要的已不是两个星期，而只是一个星期的劳动时间的话，那么在这一个星期里为一百卢布的一百磅棉花的价值，增加了由纺纱工和织布工的劳动所创造的五十卢布新价值，而细平布的价值已不再是二百卢布，而是一百五十卢布。总之，劳动效率越高，生产出来的每个单位商品的价值就越接近原料的价值。

为了生产出供全世界消费的三分之二的棉织品，总共需要的人不超过六十万。为了得到英国所开采的那样数量的煤，总共需要将近五十万人。所有的生产部门都是如此。

由此可见，即使在我们能得到很大一部分世界的情况

下——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按照市场的条件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资本主义也毕竟不能剥削现在正被它不断剥夺工作的所有的劳动力。的确，这就是六十万名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同整整几个月闲着无事可做的数百万农民比较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此，如果我们从资本主义的新信徒们那里听到下矿井的邀请，那里在煤层的穹窿底下许诺给工人的是人间天堂，但是工人们却那样地竭力躲避这种人间天堂，以致煤矿主多次向政府申请似乎要实行强制劳动，^① 那么我们知道，第一，这样的工人相对地说需要得很少很少；第二，矿山只能按照对产品需要的多少来进行开采，而这种需要在我们这里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方面也都还不足以获得国外市场；第三，在这需要不大的范围里，工人的相对数字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减少，例如在采矿业中不久以前发明了一种钻井机，这种机器在一分半钟内所钻的眼，在手工操作下要花一个半小时，^② 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减少就完全落在工人阶级的头上，并且表现为失业人数的增加。这种相对过剩的人口的数目之大，我们常常象引证资本主义的黄金国那样地引证的那个国家，可以作出最好的证明。英国近十年来已有一百五十多万人迁居国外，英国的统计学家们解释这种迁居

^① 这个人间天堂究竟怎样，可以从《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巴赫姆特县和斯拉维扬诺谢尔布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所报道的事实中得到一点概念。从1892年秋天一家报纸的记者所描写的采矿工人的住房情况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他们的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善。顺便指出，在煤矿工业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煤矿工业家申请从内地省份迁移农民，并且根据他们的申请书的第9点，“移民头五年须在其新居住点按条件规定的价格为迁移他们的主人服务，如他们之中有人想离开新居住点，则须在五年内按最高工资加倍偿还……或找另一人来代替自己，此人将承担其权利和义务”（《俄国财富》1892年第1期第12页）。——丹尼尔逊注

^② 亨·赫克纳《关于改善劳动状况的研究》，《布劳恩文库》第4卷第571页注。——丹尼尔逊注

国外的现象是英国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①当然，尽管这个因素也有影响，但是人口增长的缓慢主要是由于没有工作的人数增加造成的，是由于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造成的。然而，在这同时，组成为工会的工人贵族、政客、机械师等人在物质方面要比自己的大陆同事高得多。人们也经常把他们作为英国工人状况改善的论据。^②但是英国工人主要是英国工业垄断时期养成了一些习惯和有了一些企业主不得不予以考虑的需要。除了这些比大陆工人特别是俄国工人更高的需要之外，在使用同样的劳动工具等等情况下、在单位时间里制造出更多的产品时，他们培养了从事更紧张的劳动的能力。

① 从1881年至1890年，从英国迁往美国一个国家的就有一百四十六万二千八百三十九人。在这同一时期里由德国迁往美国的有一百四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人。这些过剩的人在本国找不到谋生的职位。而这仅仅是前往美国这一个国家的人口。迁居国外的洪流还涌向其他地方，涌向南美、澳大利亚、非洲等地。——丹尼尔逊注

② 根据下议院决定作出的“劳动局”报告指出，这种状况极其值得注意。例如，从《关于工会的统计表和报告》(1887年版第5104页)中可以看出，在组织得最好的工会之中，失业者的数字经常很高，特别是在危机期间不断增加。例如，在机器制造者工会中，1866—1886年时期失业会员的数字在百分之一至十三点三之间波动；在蒸汽机制造者工会中——在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之间波动；在铸铁工人工会中——在百分之一点五至百分之二十二之间波动；并且二十年中连续八年失业者的百分比不低于十，而是达到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和乃至二十二点三；在铁壳船制造者工会中，十四年中连续四年失业者的百分比不低于二十，更不用说排字工人工会了，在排字工人工会中，几乎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一整个时期里，失业者的数字高于百分之十。同时应当看到，由于维持失业者生活的重担落在其他会员的肩上(每人每年负担几先令至三、四英镑甚至更多)，因此全体会员就全力以赴地力图为自己的失业伙伴找到工作。而这是在上层工人中间。至于在各个劳动领域里的失业者的数字(不管工人们是否已经组成工会)，那么在伦敦四个典型地区进行的初步调查表明，在调查前的半年(1887年3月)中，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马车夫、装卸工、煤气工、机械工，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面包工人、肉铺工人、铁匠、箍桶匠、制皮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细木工、粗木工、烟草厂工人、水手、船舶工人、小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裁缝、皮靴匠、短工，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泥水匠、油漆匠、玻璃厂工人以及船坞工人，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没有工作(M·T·贝恩赖特《英国失业者统计》，《布劳恩文库》1888年德国版第1卷第43—68页)。——丹尼尔逊注

因此，为了从比我们先夺取到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手里夺取哪怕只是它的一部分，我们还缺少很多东西：我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发达的技术。我们想从它们的阵地上把它们挤走的那些竞争对手，目前已经为现有劳动力的过剩感到苦恼了，这些劳动力由于缺少工作而离开祖国，迁居到遥远的天涯海角，他们还指望在那些地方为自己找到工作。但是这样的地方一天比一天少了，劳动市场的相对饱和状态却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而这是在科学和实用知识史无前例地飞跃发展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劳动市场继续扩大、继续解雇目前还在业的劳动力的前景下发生的事。

所有这些都看到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然而我们却在某种迷惑状态中追求和指望夺取一部分世界市场。就假定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除了少数资本家发财致富以外，我们决计什么好处也得不到：国内市场由于出现了手工业继续资本化的可能性而必然会缩小下去，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会缩减那个也许能夺取一小部分世界市场的工业部门的在业工人的人数。归根到底，我们仍将陷于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地和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那种状况：被不断解雇的大批工人没有工作也无法找到工作，用于生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在减少……

……让我们作一个总结。

目的在于满足社会成员生活需要的社会的经济组织，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历史经济阶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把那些根据当时的条件能够花费最少力量而获致最大效果的力量推动起来。该社会的整个制度就是由它的这种经济组织决定的。

当社会的生产力开始发展得高于它的经济组织时，那么社会的经济组织也应当改变，如果在这种变化过程中遇到了某些障碍，那么这些障碍就会同社会的经济组织发生冲突，并且迟早会把它

克服,把它改变和改造成适合新出现的形式。

我们用不着老远地去寻找例子。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地记得1861年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

社会生产力在那时是极其有限的。整个社会在经济方面分为无数独立的经济单位,这些独立的经济单位的需要,靠直接生产者的劳动产品来满足,如果一部分产品生产出来是为了出售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在年产品中所占的份额是比较小的。同时,生产工具根据需要都是小型的、分散的,适合单个人使用,但是它们通常都属于生产者本人所有。

“资本的历史作用恰恰就在于把这些分散的、有限的小生产资料集中和扩大,并把它们变为现代生产的强大杠杆。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在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别人的生产资料变为只能在许多人共同劳动的场合使用的那种生产资料,把它们变为社会生产资料的同时,才能把它们变为强大的生产力。代替纺车和手工织布机的是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出现;代替单个的作坊的是数千人在一起劳动的工厂的出现。在生产资料发生这种转变的同时,生产本身从一系列单个的活动变为一系列社会的活动,而产品也从单个人的产品变为社会的产品。现在从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纱和布,已经成了许多工人共同劳动的产品,在这些产品变为成品以前,它们现在首先必须经过许多工人的手。现在谁也不能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成品。”

资本的历史作用也就表现在劳动的这种社会化上,或者用谢德林的更中肯的话来说,表现在劳动的这种村社化上。

但是首先,在小生产的情况下,连产品也是属于单个生产者的。而现在,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生产之变成社会的行为,产品本身却并不成为社会的产品,它不属于真正生产它的人;不,它成了那个手里集中了生产资料的个人的私有财产,并且还是由这个

私有者把它拿到市场上去。村社化生产这种社会行为的生产和社会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发展得越来越厉害，社会本身也就越来越变成资本主义的了；这种矛盾还表现在社会各阶级的越来越明显的划分和独立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一个阶级的需要的满足，由于大量生产者不断被排挤和由于技术发展、其他人的生产率的提高而失去工作，因此就每况愈下了；同时，数量越来越多的产品、需要拥有越来越广阔市场的产品落到了另一个阶级的手里。

生产资料越集中和与此同时生产本身越社会化和越成为社会的行为，从而分工和工厂中的劳动配合越发展，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就越提高，用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缩短，要求用于生产满足全社会需要的产品的劳动力就越少，多余的劳动力和空闲的劳动时间就越多。

对于这种技术发达的生产的产品的需要越大，这种生产越普及，它所消耗的社会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越多，从小的、分散的个人生产向大的、集中的社会生产过渡的势头越猛，劳动力就闲置得越快，劳动力得到使用的机会就越少；他们就越是被迫指望暂时还没有从他们的手里溜掉的那种生产，使它的产品不单纯满足它所直接针对的那些需要，而且通过越来越多地出让它的产品的办法来满足在此以前由本人的劳动产品满足的其他需要。

我们的社会经济就恰恰处于这种状况，因为它的目的是满足两种极端重要的生活需要，也就是对食品和衣服的需要。

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大纺纱工业，对俄国人民的整个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它所扎根的那个小地区的范围。看来只要工厂的工业品渗透到哪个地方，连纺锤和织布机也都势必被人从全俄国的小木屋里抛出去，而在这同时空闲的劳动时间仍然得不到利用。

资本主义的纺织业是在它找到了现成的可供利用的人力的地区开始发展起来的。莫斯科近郊的农民从事纺织技艺已不止一百年了，只好利用现成的材料。资本主义也利用了它。资本主义开始先把能指望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产品的生产抓到自己的手里。它的代表人物用不着费尽心机去从事发明创造。发明是现成的，并且在当前的情况下它不得不去利用这些发明。它也就加以利用了，同时兢兢业业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殊地位。^①

莫斯科地区的资本主义状况的确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利用了数世纪以来工人所获得的技艺和无代价得来的科技力量，迫使工人们把自己的织布机从小木屋搬进资本主义的工厂，然后又采用自动织布机来代替手工织布机，就这样一下子控制了全俄国。在全俄国没有一个地方能象在莫斯科地区那样为发展织布业集中了如此有利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需要大量有知识的工人。彼得堡在这方面根本不可能同莫斯科进行

^① 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俄国资本主义比西欧的老大哥幸运得多。例如，当纺纱机和克朗普顿机发明出来时，发现使它们发生作用的最合适的办法就是靠旋转运动，经过几次用马匹带动的试验以后又回过头来利用水力。1815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叫《棉纺织业的出现》的小册子，很有趣地谈到了这个情节。它的作者，一个叫约翰·肯尼迪的人，在小册子中指出过去只能在那些可以找到水力的地方建立工厂，因此离熟练工人集中的地方远了。“但是，他补充说，1790年左右人们开始理解瓦特先生的蒸汽机的意义了，于是水力便失去了价值。人们找到了在工人中安装动力的更好的办法，而不必把工人迁移到动力地点去。”（引自英国协会机械部主任C·昂温于1892年8月在爱丁堡举行的英国协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自然界》1892年8月11日第358页。）我国除了莫斯科地区以外采用机器织布的尝试由于这个地区的劳动力便宜而行不通，这个地区的劳动力便宜是因为大量织工同时又是可从土地获得部分生活资料的庄稼人。例如，在彼得堡地区织布业由于劳动力昂贵而很少得到发展，因为不能不付给工人以保证他们生存的工资。因此彼得堡地区用机器织布机生产一俄尺细平布要贵一个戈比多一点，而在兹韦尼哥罗德县一段八十俄尺布要付六十戈比，或者在科洛姆纳县“厚棉毛布织工乐于挣四十戈比织一匹布”（《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年鉴》，1892年第15—17页）。——丹尼尔备注

竞争。

莫斯科夺取了整个国内市场以后，迫使全俄国都向它购买衣料，也迫使农民把纺车和织布机作为废物从小木屋里抛出去，剥夺了他们的冬天的活计，迫使他们购买那些从前在自己家里生产的東西。但是买东西要有钱。农民不但早已被迫不生产缝衣用的衣料，而且现在还得比以前出卖更多的自己的农业劳动的产品，以便得到必需的钱来买东西。

我们再看看农业和加工工业产品的运动情况。秋天，农业劳动结束了：庄稼已经收割脱粒。它的一部分留给农民自己消费，但是这一部分一年比一年减少了。为了满足穿衣的需要，为了缴纳赋税等等，农民被迫出售一年比一年更多的农业劳动产品。于是就在这个关头彼得堡成了一个买主：它表示愿意拿出钱来。汇款、电报送到俄国的各个角落。农产品的出让在“加速”进行。

彼得堡购买的谷物由它销售到国外或大的消费中心。如果谷物的买主是当地的商人，那么它在一定时间里仍然放在他们的仓库里，以便过几个月以后可以由他们拿出来借贷给原来的那些农民，从而再得到谷物出借量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利息。

谷物运输给铁路带来极为重要的收入。彼得堡售卖谷物得来的货币以及剩余价值的下落，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售卖谷物得来的这些货币作为活期存款存起来，而且用于第二年的基本费用又完成同样的循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加入资本，另一部分则抽出来变成储蓄股票、证券等等，所以后者可以存放在国家银行里以获得股息和利息，而完全不依所消耗的资本价值所带来的商业利润为转移。货币本身仍然作为游资存在银行里。

我们在简略地考察了卖出去的谷物（这方面的问题在概论的第一篇中已经详细地叙述过了）以及粮商的基本费用的下落以后，现在来看看农民售卖谷物所得来的货币的情况。这些货币一部分

用于偿付租地的租金。尽管(或者不如说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这一部分却在年复一年地增加,另一部分货币则用于纳税,并且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同样的谷物用这些货币又从粮商那里购买来作为军需粮,粮商则在此时获得基本费用以外的利润,或者这些货币作为公债的利息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或者花费在国家的其他需要上,货币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回到把它们在流通中花掉的人的手里。

出售粮食得来的一部分货币,被用于购买那些从前在家里生产的和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消费品。

莫斯科发出自己的产品。农民就是买主。出售商品得来的货币回到自己的真正的主人——工厂主的手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商品朝着两个方向运动。农产品运动是向心运动——向着谷物贸易中心的运动;工业产品的运动是离心运动——分散到各消费地的运动。前一个方向的代表是彼得堡,后一个方向的代表是莫斯科。在两个中心之间产生了“地区分工”。

彼得堡把货币花在流通上。货币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购买谷物。但是生产者出卖谷物不是因为他不需要它,不是的,过几个月以后将迫切需要它,而是为了得到货币来纳税和购买工业品。他出售谷物是因为他没有生产衣料等等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已经同他分离了,变成资本集中在莫斯科了。但是没有工业品他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加紧出售农产品是由生产的资本化、生产工具同直接生产者分离决定的,这就为资本创造了国内市场。

莫斯科是资本化过程的原动力。彼得堡作为谷物的买主利用莫斯科所创造的那些条件:把生产工具变为资本,使生产工具同直接生产者分离,解放劳动力,以及因此而必须出售越来越多的农产品。

彼得堡成了谷物采购商,而农民用它给的货币来购买莫斯科

的工业品。这种地区分工看来无论对于彼得堡或莫斯科都绝不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从农业和工业得来的和它们应得的一份相对剩余价值量在年复一年地增加，虽然莫斯科的份额的增加比彼得堡的快得多。现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利润已占整个俄国欧洲部分利润的百分之四十四，同时莫斯科的份额正在迅速地接近彼得堡所得到的份额。

后一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手工业的迅速资本化，因而剩余价值更迅速的增长所造成的，这种增长是由加工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决定的，它只能由资本来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农业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相对降低造成的，农业工业产品的价值在世界市场上是不依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为转移的，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造成的，即农民还占有土地，因而还占有从耕种土地得来的产品，因此在农业工业范围内居民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依他们的支付能力为转移的。

在概论第一篇中我们已经看到，信贷和铁路在谷物出让过程中、在生活资料向商品的转化中起了什么样的决定作用。现在我们看到，农业同加工工业的分离是这种出让的原动力，并且促使工业品进入在此以前使用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地区的一切手段，同时也是使加工工业同农业分离的手段，从而也就是使手工业资本化的手段，在这些手段中铁路占着第一位。^①

① 亚·伊·丘普罗夫教授在他的《政治经济学》(1892年莫斯科版)中说：“可以完全有把握地断言，在这个因素(铁路)的影响下，笨重产品的生产比工厂加工的产品得益更多”。(第34页)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根据这部概论所引用的数字和资料，可以完全有把握地断言，在铁路网发展的影响下，正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厂生产的发展比农业得益要多得多，之所以得益恰恰是因为它是靠牺牲家庭生产发展起来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是靠由此引起的为了购买那些以前在家里生产的自用消费品而必须出让比前更多的农产品份额发展起来的。英国人企图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建筑铁路，与其说是为了把大米和其他农产品运出来，不如说是为了替本国工厂的产品占领市场。从这一方面来说，对铁路的国民经济意义不能评价太高。——丹尼尔逊注

另一方面，没有什么东西能象铁路那样促使地方生产和地方消费的产品变为商品，因而促使地方的消费和手工业资本化的停止。

跟在铁路后面的是信用机构，信用机构在商品处于流通过程时把货币供给工厂主和商人。

家庭手工业资本化的范围不仅仅限于生产纺织品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力图把各种各样的产品生产变为商品生产。但是，资本主义抓在手里的手工业的数量越大，农民的空闲的人手和空闲的劳动时间就越多，农民为了满足其他迫切需要而不得不出让的自己的农业劳动产品就越多，他所剩下的用于提高他本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材料就越少。

就这样他带着自己的这些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劳动产品（在这种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每逢收割季节从土地上取走的越来越多，而收回的却越来越少），到市场上来了。在这里，除了同村人、其他县和其他省的农民以外，他遇到的是这样一些生产者，他们在更有利得多的条件下工作，他们消耗于生产一定量产品的劳动要少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因而能够把它卖得便宜些。这个农民要么把自己的谷物带回家去，要么把它以低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好卖了。他尝到了铁面无情的盲目规律的影响的滋味，这个规律用他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限制他所生产的商品即谷物的价值量。他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同平均的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比起来是太微不足道了。但是他不能把它提高。他现在不得不出售更多的谷物，以便得到钱来购买其他迫切需要的东西，花钱购买农具变得更困难了。而他的生产谷物的竞争者也没有打瞌睡，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一年一年地提高。与此同时，其他各种手工业的资本化进程越来越快了，他从前曾经靠这些手工业产品来满足自己的其他需要。因此他的一个劳动年

所包含的劳动日的数量越来越少了。而由于价值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创造出来，所以他所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少了。随着他所生产的产品品种的减少，他还在继续生产的那些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减少了，他从这已经减少了的价值中不得不拿出去的则越来越多，因为他作为一个劳动者的份额缩减得越来越少了。生产地区的谷物价格同消费地区的谷物价格之间的差距在增大——这是被迫出卖的迹象。

人口在继续增长。在从事非农业性手工业的可能性减少的情况下，在一切手工业普遍同农业分离的情况下，在手工业仅仅为了存在下去而资本化的情况下，不得不靠牺牲牧场、草地来扩大耕地，不得不砍伐森林，而这些做法又更加使自然条件恶化，并越来越受自然条件的摆布。^①但是靠牺牲牧场和草地来扩大耕地的办法只能造成牲畜的减少，因为即使不这样牲畜也由于冬季饲养困难而变成一种负担了。牲畜卖掉了。随着牲畜数量的减少，肥料也减少了；没有施过厩肥的土壤很容易受到干旱的影响。我们看

^① “在黑土地带农民的耕地占全部可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三，在萨拉托夫省农民的耕地占百分之七十三，在辛比尔斯克省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三，同时播种的耕地占百分之六十六至七十四。播种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和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点二是很经常的事（比萨拉比亚省奥尔格耶夫县），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每年都播种谷物，没有间断……草地在中部各省占全部可耕地的百分之十至十一左右，甚至经常可以遇到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这些数字不超过百分之五，甚至不超过百分之三，也就是说，在许多村子里既完全没有牧场，也没有草地。”（《自由雇佣劳动》第6页）一位孜孜不倦地研究地方经济生活的人员——费·安·舍尔比纳在1893年的沃罗涅什省《省志》中指出，“近来由于过分地滥事开垦，广大的可耕地变成了不宜耕种的土地……在省里到处可以看到谷地塌陷、河流盐碱化、水洼增加、坑沟和塌方形成等情况。土壤的植被破坏得很快、很广泛，而在从前生产谷物的地方长起了野草和森林，几乎任何植被……都快没有了”。在四个县里，例如，“日前在一百三十八万一千俄亩中有十一万九千俄亩是不宜耕种的土地，而在这不宜耕种的土地中有四万九千六百三十六俄亩，即百分之七十一（原文如此——编者）是在二十五年间增加的；换句话说，每年平均有两千俄亩左右的可耕地变为在经济上毫无用处的土地了”（引自《俄罗斯新闻》1893年第41期）。——丹尼尔逊注

到,牲畜不足甚至对于人口多的农民和饲料足的农民,也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我们看到过萨拉托夫省的例子,他们在牲畜不足的情况下无事可做,只好出租自己的土地,而且五分之三的土地就是这样地从他们的手里失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成了普遍的现象。作出“三圖制黑土地带农民经济总结”^①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用了一些数字,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农户靠自己的牲畜耕地,百分之十二的农户靠雇牲畜耕地,百分之九点三的农户根本不耕地,百分之二的农户没有播种自己的土地,百分之六点三的农户没有什么可以耕作,这是一些没有份地或没有土地的农户。因此“在俄国中央黑土地带可以独立经营农业的不到三分之二的农户”。^②

但是需要不等人。没有耕畜,没有经营农业的可能,便只好把地出租。这种出租是在极其麻烦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据《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文的作者证实,“有的地方在土地出租给农民时,

① 《司法通报》1891年第8卷第157—186页。——丹尼尔逊注

② “这个过程(剥夺的过程)从萨马拉省的不到百分之十四点五的无马匹农户开始,在拥有五俄亩份地的农户中造成了严重的荒废,在瓦西里县造成了这种状况,即拥有五俄亩份地的将近一半的农户没有耕畜……因此变成了雇工。”(斯克沃尔佐夫《总结》,《司法通报》1892年11月第445页)另外可参看《农村通报》。它刊登了维亚特卡省亚兰县维利科列奇乡农民库兹涅佐夫的一封信。由于歉收和失去牲畜的结果,“在许多村庄”,——他写道,——“人们没有马匹就自己耕地,五六七个人拉着一张犁耕地。男人和妇女一起耕……五个人耕很吃力,七个人耕很容易,六个人耕看起来正合适……不过比起马来要求休息的次数多一些,因此耕的地总起来说要比用马耕的少一些。”《农村通报》在这封描写这种耕作方式的信后面注道:“当没有马的时候,农民就不把自己当作主人了,报纸说,同时当农民变成无马的时候,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就更没有必要完全抛弃农业……在缺少土地的内地各省,连份地也是不大的……甚至没有必要一年到头养一匹马……几个贫农如果同意在一起劳动,也许每个人可以对付耕种一俄亩或两俄亩地,这样也就有了够整整一年或将近一年吃的粮食了”(《俄罗斯新闻》第329期转载,1892年11月28日)。——丹尼尔逊注

一俄亩秋播地的租金为十五至二十个卢布，一俄亩春播地的租金为十二至十五个卢布，而在周围则为九至十二个卢布，在向农民征税时”（这是被迫出租的形式之一），“无力纳税者的份地由于欠缴税款而以二十三个卢布出租十二年，在全部时间里的租金为二十四卢布，也就是每年一俄亩的租金为两个卢布”。

出租份地仅仅是转让的方式之一。除了出租以外，土地还被抵押出去。例如，根据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数字，萨马拉省全部抵押出去的土地在1889年占百分之六点五，在有些县份，如在尼古拉也夫斯克县达到百分之十二点六。“有这样一些村庄，那里的农民把最后一俄亩土地都抵押出去了。”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农活的和无地的农民的数目在这个省几乎达到百分之十四。^①

但是这一回自然条件变得对农业有利了。这是一个丰收年。农民忙于清偿自己的债务，他们向市场大量抛售自己的谷物，产地的谷物价格和消费地的谷物价格之间的差距更大了。资本化以“加快的速度”发展。工厂的工作增加了，工场手工业商品和其他商品的销售量增加了，企业主的利润就增加得更快了（工人人数每增长百分之一，生产出来的价值量就增长百分之二或更多，而利润额则增长百分之十一以上）。

生产和利润的这种增长使资本家和企业主有可能扩大自己的企业，增加购置机器的费用，但是由于在以后每一次花的钱买的机器更加完善，更能节省花在劳动力上的费用，因此随着生产的扩大，就业工人的相对数字就减少了。

使其他工业部门资本化的可能性出现了。

^① 参见伊·克拉斯诺彼罗夫《萨马拉省的农民信贷形式》，载于《司法通报》1891年第9卷第405—429页，以及《萨马拉省统计资料汇编》1892年萨马拉版第117—118页。——丹尼尔逊注

如果对农业如此有利的年景继续出现的话，那么农民就可以稍微自由自在地喘一口气了。这个农民去年偿还了部分债务，而且还贮存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如衣服等。现在他不用忙于不顾一切地去出售谷物，他为了自己和家庭的需要而把谷物贮藏一个时期。满足迫切需要的可能性增加了，尽管第二年连续丰收，尽管有“过剩”，当地的价格还是提高了。生产地价格和消费地价格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从谷物得到的商业利润减少了。真正的需要得到了满足，而不是象在生产者不占有土地的资本主义的流通条件下那样仅仅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工厂全力开工。利润达到异常巨大的规模。工商业蒸蒸日上。但是这种繁荣从社会经济意义上来说不过是表面的现象。实际上一年中劳动日的减少也使农民为了靠出售来满足他从前以自己的劳动产品来满足的那些需要而创造足够的交换价值的可能性减少了。加工工业同农业的分离使他失去了这种可能性。虽然现在出让的谷物比以前更多了，但是价格却比十年前更低了。除了加工手工业以外，农民不得不放弃亚麻、大麻纤维、羊毛的生产，这些生产以前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劳动时间。总之，他的购买力降低了，因为例如纺织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是靠纺织品的家庭生产的减少取得的，尽管这个工业部门的资本主义方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纺织品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总额归根到底一年一年地减少了，甚至在这几年遇到丰收的时候也是如此。

正如在概论第一篇中谷物生产、谷物输出国外这一类数字使我们得出商业的发展和资本化是靠日益减少谷物的人民消费而取得的结论一样，^① 第二篇概论中的数字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① 谷物消费在八十年代还在继续减少。例如，尽管由于增加耕地小麦和黑麦的收获量在扣除输出国外的以外，1874—1877年间每年为八百三十六亿一百万俄石，1888

即纺织品工业的资本主义方式的迅速发展不但完全是靠减少原料的人民生产,而且也是靠减少用这些原料制成产品的生产,因而增加了空闲的劳动时间以及减少了产品的人民消费而取得的。加工工业同农业、生产资料同工人的分离,手工业的资本化,社会劳动时间的空闲——这些就是降低人民福利、出让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产品的份额、减少国民消费的原动力。

土地由于在两年时间里提供了太多的东西,提供了太高的收成,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因此贫瘠得只能提供很微薄的收成了。如果再加上不利的气候条件,那么它将什么也提供不了,就象在从前例如在1873年、1880年和有几年在局部地区出现过的情形一样。但是由于手工业同农业逐步分离的过程越来越扩大了,因此最后使国家遭到了遍及十八个黑土省份的饥荒。

收成稍有减少就马上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反映出来,生产开始缩小,开始让工人离开工厂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经济生活的“步子”开始放慢了。歉收越是严重,歉收的面积越大,生产就减少得越严重,“危机”、“生产过剩”、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的缺乏现象就显得越尖锐。这种危机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我们这里那么清楚地暴露出自己的起因。现在我们来认真地看一看事实。在最好的情况下,工厂从事纤维品生产的工人人数在整个欧俄只不过达到三十七万。由于在全俄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而空闲起来的工人人数应当以数千万来计算。这些工人在整个冬季无事可做,夏

—1890年每年为九百零三亿四百万俄石,也就是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六,但是人口在这个时期增长了百分之十四左右,因此谷物生产率落后于人口增长的百分之六。我们已经指出,在美国也完全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不过程度要小得多。1893年2月24日尔·恩·马雷斯在莫斯科法律学会统计部会议上指出,1870—1878年期间在俄国每年留给每个人消费的粮食是十二普特二十二俄磅,而在1833—1890年是十一普特三十五俄磅(《俄罗斯新闻》1893年3月3日)。根据他的计算,这个时期谷物的消费减少了百分之五。

——丹尼尔逊注

季则漂泊到南方、中亚细亚、西伯利亚等地寻找工作。他们在近处找到的工作越少，就会有更多的人到处去寻找工作。与此同时，工人在加工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机会就越少。他们找寻工作而得不到工作。可是有人却一本正经地要我们相信，工资同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不相适应，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我们的工资的确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低。但是工资的提高不会消除“危机”。即使这三十七万名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一两倍，即使工资耗费了一年里全部新生产的产品，也就是企业主的利润和商业利润，但是只要产品保持商品的形式，情况也极少会有什么改变。^①找不到工作、没有钱买生活资料、既无食又无衣的数百万农民，从工人工资的这种增加中既不能使他们所需要而又无钱购买的面包和衣服得到一颗粮食、一根纱线的增加，而且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纺织品的生产将会减少，工人也将丧失工作。

很清楚，这种“危机”和这种“生产过剩”的原因完全在于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本身，而不在别的什么方面。这种危机除了资本主义劳动条件以外，无论在奴隶劳动、农奴劳动或在任何其他劳动条件下都是不可能的。

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越增加，用于生产满足社会所需要的产品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减少。由于商品的价值是由用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情况下，全部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总量也减少了。

这里就产生了不断要求缩短用于生产满足一定需要的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意图同生产这些产品所采取的形式之间的冲突。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而社会却

^① 例如 1891 年在英国的纺织业中就是这样，当时九十个大企业平均提供了百分之零点三三左右的利润，而在 1892 年底证明只有亏损。——丹尼尔曼注

由于生产形式的原因不仅不能利用这种缩短的好处，而且与此相反，使大批劳动力和劳动时间闲置起来，而这些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之所以不能得到利用，仅仅是因为直接生产者没有生产资料和产品采取了商品的形式。

这不是说，闲置的劳动力不能找到工作是因为社会对于一切产品的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不是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除了支付的消费以外，不知道有别的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本身力求限制居民的支付能力，从而非解除大批劳动力的工作不可。但是由于居民的其他手工业的资本化也在发展（在此以前这些手工业是掌握在直接生产者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直接消费者手中的），因此随着居民支付能力的降低，人民消费也减少了。整个人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满足人民生存需要的产品。随着生产从直接生产者手里向单个企业主手里过渡，为满足同样的需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变得少多了，并且有可能用这已经减少了许多劳动时间来生产出满足原先人民所需要的产品量。国内市场上充满了比较便宜的产品，因为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较少，但是这些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也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在这一形式中该产品不依其满足某种需要的目的为转移而又获得了新的属性——成了交换价值。

既然产品具有了交换价值的形式，那么为了使用它就不得不去购买它。它现在已不再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了。为了购买它需要有购买手段，可是只有靠出让作为商品的自己的劳动力或自己生产的产品才能得到购买手段。绝大部分直接生产者手头用来出让的只有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因为他的劳动力谁也不要，他不能出卖劳动力。他的产品的价值在市场上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撇开生产者本人的直接参与而在他的背后、在世界市场上估计出来的。在出让时生产

者本人加入产品的份额，由于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转化为平均工资。由于工作是在一个劳动年的一部分时间里进行的，因此这一部分也得到报酬。如果一个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那么对他来说就更糟，因为他得到的只是假定他的劳动具有平均生产率的水平时所得到的那个份额。

农民在最好的情况下由于出售自己的农业劳动产品而得到的与他在生产农业劳动产品的整个劳动时间里所消耗的劳动力相一致的份额以后，不得不用得到的钱来购买那些他曾经亲自生产的生活资料。因此在购买生活资料上将使他花去最大数目的钱。但是由于他无论如何要把一定数量的这些产品留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他将不花费这笔最大数目的钱。由此可见，满足他的需要的可能性取决于他出售的总量，取决于他所出让的交换价值的总量。他花在生产上的年劳动时间越少，能够供他支配的购买手段的总量也就越少。

他的年劳动时间随着手工业的资本化、随着他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转为资本主义生产而减少了。

资本主义则主要占领了那些产品可以针对广阔的市场、针对广大的消费者集团的生产部门，^①因为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具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特殊的刺激因素。在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替资本家—企业主工作的人数少得多的工人，在消耗较少的劳动时间的同时可以生产出较大数量的产品。他们新生产出来的这种产品的数量主要仍然受到农民消费的限制，因为农民在购买力由于这种资本化而降低了。因此，资本主义按照它出现的自身条件而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总量，就不能超过在它出现以前所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总量，正如我们在从事纺织品生产的工业

① 跟在纺织品生产资本化后面的是榨油业、面粉业和制钉业。——丹尼尔逊注

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没有一个被资本主义占领的工业部门，能象那个从事纺织品加工的工业部门那样得到如此广泛的发展，与此同时纤维品的加工总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逐渐减少了，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靠牺牲家庭生产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尽管所生产的布匹的价格是低廉的，对于衣服等等的需要却更少得到满足了，因为所生产的纺织品的总量，比用资本主义方法生产的量减少得快得多。

这种情况从下面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看到，随着廉价纺织品加工工业的扩大，农民自己制作纺织品的原料的种植和加工（更不用说生产）也减少了。我们还看到，在某个十年时间里，亚麻的种植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三以上，用于织造内衣用布的大麻纤维的加工减少得更多，养羊业就更不用说了。^①面粉业和榨油业的资本化导致向国外输出油饼和麸子，而在这同时畜牧业却由于饲料不足而衰落了。

资本主义不断地这样占领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其中每一个部门的发展都是由社会的消费需要的限度决定的，社会的消费需要在资本主义占领每一个生产部门以前就已存在了，由于这种占领的结果，由于用在这个生产部门的产品生产上的社会必要劳动

^① 《修订俄国铁路运价资料，财政部铁道事务司公布。制订（一）亚麻和大麻纤维及（二）糖的运率的暂行条例》，1892年圣彼得堡版第72页。“近几年的歉收不仅是造成大规模需要谷物和草料的原因，而且也使农村居民收获不到大麻，这样就使他们不能在家里生产内衣，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本来就很富裕的农村服装更感缺乏了，同时使妇女们在漫长的秋冬的黄昏无事可做。”（奥廖尔通讯，载于《俄罗斯新闻》1892年11月8日）因此，除了织布业的资本化以外，1891年和1892年家庭手工业的减少也是受到歉收的影响。1889年在所有的洗毛作坊洗出了四十四万六千普特国产净羊毛，同时从国外输入了洗净、整梳的羊毛和毛条八十二万四千普特，也就是说工厂的毛织物生产消费的国产羊毛只占三分之一，而输入的羊毛却占三分之二。要不少于于一千万头绵羊身上才能收集到这样数量的羊毛……但是由于羊毛在从前是不输入的，因此这就意味着养羊业减少了一千万头细毛绵羊。——丹尼尔逊注

时间的减少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闲置，——社会的消费需要甚至减少了。这种减少完全取决于生产所采取的形式本身，取决于生产失去人民性质而带有个体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社会经济不仅不能利用知识的进步和能减少生产的劳动消费的应用技术的进步，总之，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处于停滞的状态。

资本主义在向前发展，而且发展得非常迅速。它完全靠减少人民生产和人民消费来利用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但是，它的发展步伐越快，它占领的工业部门就越广泛（而我们的关税政策则大大地加快了这种占领的速度），人民工业原料和土地就耗竭得越快，人民生产和受人民生产制约的人民消费就减少得越快。

社会经济关系的这种状况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随着手工业的各个不同部门被资本主义的占领，随着得不到使用的劳动力的闲置，随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生产资料，农民除了从土地上取得一切生活资料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但是土地由于年复一年地提供东西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变得越来越贫瘠了，某些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凑合又引起了逐渐产生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的东西：土地什么也不生产了。因此，饥荒是近三十年来我国工业所采取的形式不适应的直接后果。我们不是坚持我们的古老的传统，不是发展我们所继承的生产资料同直接生产者密切结合的原则，不是利用业已取得的西欧的科学成就并把它用于发展建立在农民占有生产工具的基础上的工业形式，不是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农民手中的办法来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是利用象西欧的那种具有异常发达的劳动合作、分工和配合、机器等等的生产组织本身，而是利用生产的形式，不是发展作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基础的那种原则和把它应用到农民的土地使用方面，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为农民掌握科学知识及其应用广开方便之门，总之我们走上了

完全相反的道路。我们不仅不阻止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不仅不顾它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之上，而且相反地千方百计力图促使根本摧毁我们的整个经济生活，其结果导致1891年的饥荒。

资本主义生产繁荣辉煌的最初征兆，使我们头晕目眩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我们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成了整个人民生产的发展，我们把实质上处于互相对立的事物混为一谈；我们没有注意到，一种发展——我们所鼓励的那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可能完全靠牺牲另一种发展而引起。我们不愿意看到，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规律，生产向资本主义形式的过渡必然会使资本主义刚刚保住的国内市场缩小，而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度是由它本身决定的。我们不愿意吸取西欧经济发展进程所给予我们的教训。过去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辉煌成就和现在美国资本主义无比迅速的发展使我们感到如此惊讶，以致我们既不考虑它产生的条件，也不考虑它对大多数居民造成的影响，不但为了培植它而使用了我们所支配的一切手段，而且也的确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这些成果的消极方面立即就表现出来了。当我们跟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后登上了资本主义舞台时，很大一部分市场已在我们之前被占领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的劳动生产率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发展中的劳动生产率年复一年地远远超过了国外市场的发展，那时我们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的国内市场。而那个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发展中的劳动生产率和销售市场相对缩小之间不相适应的发展过程，也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个片面“孤立”的国家进行着。

世界市场仍具有多种多样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生活方式、生活需要的发展程度等等，因此这种不相适应在世界市场上就每隔十至十一年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尖锐

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危机采取了慢性的、持久的形式。

我们的国内市场（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完全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完全取决于大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加工工业同农业的分离，随着劳动工具的被剥夺而得不到使用的劳动力的闲置，随着土地的贫瘠，随着农业劳动条件的恶化，这种支付能力由于使用劳动的机会减少而降低了。

同时我们的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减少用于生产的社会必要时间的同时，导致农产品价格的降低，正如我们在美国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且也导致劳动力的闲置，这些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下得不到使用，恰恰是因为生产资料不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里。

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扩大不可能成为摆脱我们所处的贫困状态的出路，因为农民被迫越来越限制自己的劳动的使用范围，最后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农业劳动。

然而正是由于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受到这样的限制，他们在同时不得不把自己的农业劳动产品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变为商品，把它拿到市场上出售。而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农业中劳动时间根据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只占整个劳动年的一部分，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流通）的条件，生产者所得到的那个份额变成了劳动力在劳动时间里维持生活的价值。而由于劳动时间在农业中只占五、六个月，因此由于在其余时间里不能从事劳动，农民就不得不靠他们得到的用于维持五、六个月生活的价值，来维持整整一年的生活。^① 这个结论也是根据我们

^① 我们处处为了避免受到夸张的指责，就说农业劳动及其准备工作要占五、六个月。但是这里有国家产业部的一份可靠的调查材料，其中我们可以得到：“农活在一年中不超过三个月，而且一个完全从事农活的人，不管他是主人本人还是雇佣工人都一样，必须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获得在其余九个月的时间里维持生活的资料……无论在

在以前所引证的事实作出的。顺便指出，它还得到了美国经济生活资料的证实，这些资料表明，一个农场主虽然占有的一些很好的土地，并且有着很大的规模，但仍不能单靠农业劳动过活，而不得不找寻其他的工作，如果在毗邻的地方找不到工作，那就干脆抛弃自己的家业，“哪里好”就到哪里去找寻工作，就象我国的农民一样。

在我国，这种状况完全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这就是我们没有努力坚持多少世纪以来为我国过去的经济生活所奉为神圣的原则——直接生产者掌握生产资料，而是采纳和发展了同我国过去的工业生活格格不入的因素——资本主义，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同生产者分离以及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而雇佣劳动拥有的产品份额，则限制在勉强够维持生活、维持资本主义工业需要它生存的那个量上。而对于资本主义工业来说，由于需要，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所消耗的劳动力的相对数字就不断减少，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也同时减少了，而现有的被直接使用的劳动力却工作到了精疲力尽、到了不能再使用的程度，正如我们在莫斯科省这个俄国资本主义工业中心的工人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

无论多么需要改变我们的赋税政策和把赋税的重担转嫁给那些手里掌握着整个生产的人，但就是在这里善良的意图也遇到了障碍，虽然不在于原则方面——剩余价值可以而且必须予以课税，而在于，随着手工业的资本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的量虽然和以前一样（实际上在从事纺织品加工的工业部门甚至减少了），但是在一年时间里生产的交换价值，却由于用来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而必然减少了。因

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工资有多高，但还是不能保证一个工人整整一年的生活”（《自由雇佣劳动》等等，第 132—133 页）。——丹尼尔逊注

此虽然资本拥有的新生产出来的产品增加了，但是由于在积极生产者人数中有大量的劳动力离开了，所以新生产的交换价值的总量减少了，而与此同时课税对象的数量也减少了。

的确，上百万工人中相当少的一部分工人能够生产的交换价值恰好少到使从前就业的工人人数闲置起来的程度。使用价值的总量仍和以前一样，上百万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工人现在能够满足全部人口对于产品的那种需要，过去要有数百万工人才能予以满足。但与此同时，他们所生产的交换价值的总量，却同以前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减少按比例地减少了，虽然在这个时间里出现了一些满足新的需要的新的工业部门（煤油、铁，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煤等等）。

让我们来看一看加工工业部门（除了缴纳消费税的、非股份的和采矿工业以外的所有企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总量。这个量在整个俄国不到十二亿卢布。但是如果注意到这样一点，即同一个量在许多情况下由于通过一些工厂主之手（商品到他们那里继续进行加工）而几次出现；并且它应当不以这一点为转移而减少所消费的那些主要从农业得到的加工工业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量，那么就会发现，加工工业中新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即使同农业工业相比也是极其微不足道的。

例如，我们拿面粉业来说。1889年它在全俄的生产总量是一亿七千五百万卢布。但这绝不是说，这全部价值是在磨坊中生产出来的。通过对我们所说的那种商品价格的分析，我们发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价值应属于再加工的材料和百分之一点七左右的价值是由机器的磨损转给产品的，因此属于磨坊工人的劳动所新生产的价值只有百分之十三至十四左右，也就是说新生产的价值不是一亿七千五百万卢布，而是总共只有二千五百万卢布左右。

关于其他生产部门也可以这样说。从棉纺织生产总量的二亿五千万卢布中，应扣除原料棉花一亿多卢布的价值和辅助材料的价值，而不以扣除由于大量收购而几次出现的量和在生产中由机器转到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为转移。

因此，如果从整个一年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扣除工厂主为了继续生产而大量购买的商人的价值，不是在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量以及在生产时由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的量，那么就会发现，全部新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的量是受到分别由企业主、商人等以各种各样的剩余价值的形式获得的和工人以工资的形式获得的那个份额的限制的；任何一个化学家在作了最认真的分析以后也不会找到超过这种价值以外的任何价值的原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新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的总量实际上是多么微不足道。

的确，例如生产各种纺织品的工业总共提供了三千七百万卢布左右的剩余价值。如果甚至假定，剩余价值率即工人阶级在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中所拥有的相对份额等于百分之百，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拥有的份额也在三千七百万卢布左右（而这是一种夸大，根据对价格的分析，工人阶级拥有的份额要少得多），那么这个大工业部门从整个总生产为五亿卢布的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中在最好的情况下总共也只得到七千五百万卢布左右。

俄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全部利润额为三亿卢布（采矿工业和铁路除外）。但是这个总额还包括商人们从谷物贸易、亚麻、烟草等农产品贸易以及从出售手工业产品中得到的利润。如果假定工人阶级的份额等于工商业阶级的份额，那么可以发现，加工工业部门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在最好的情况下所生产的新价值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四至五亿卢布，即比从最主要的谷物生产得到的微薄

收入要少一半，^①其实也不可能不这样，因为工厂生产的规模主要是由农业人口的支付能力的大小决定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年时间里新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如果要从其中拿出足够的量来满足国家的需要，在我们这里是太微不足道了。而只有新生产出来的价值才能成为课税的对象。可是新生产出来的价值太少，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使很大数量的人空闲起来，这些人的劳动力对社会来说是白白地失去了。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加工工业中生产的新价值（扣除原料等等的价值），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至多不过四至五亿卢布，因为每一个工人生产的新价值将近五百五十卢布。这个数目的一半以上属于各种形式的剩余价值。

我们再看看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情况是怎样的。根据 1880 年的统计调查，在加工工业（也不包括采矿工业）中就业的有二百七十三万八千九百名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总价值为五十三亿六千九百六十万美元；扣除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三十三亿九千六百八十万美元，上述工人的劳动所生产的新价值为十九亿七千二百八十万美元。在这个数目中以工资形式归工人的是九亿四千七百九十万美元，归企业主的利润（因为剩余价值的其余部分、商业利润等不包括在这里）是十亿二千四百九十万美元。

因此，每一个工人生产的新价值（不算商业利润等）是七百二十美元或一千四百四十卢布，其中三百四十九美元（六百九十卢布）是归他的，而三百七十五美元（七百五十卢布）则归企业主的利润。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美国工人的劳动不管它的效率怎样，要

^① 但是工人阶级所得的份额在分析关于转嫁赋税重担问题时不应予以重视，莫斯科省欠缴税款的例子极其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丹尼尔逊注

比俄国工厂工人的劳动紧张两倍多。顺便指出，这是因为劳动日的持续时间少的缘故，同时工人的体力消耗得不那么厉害，他能生产得更多些。产量大就可以使他得到更高的工资。在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他在身体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可以得到更充分的满足，他的劳动力的消耗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补偿，他的生命活动力，也就是更提高这种消耗的能力，可以得到加强，可以生产得更多，等等。这一切总合起来就提高了纳税能力。情况直到最近都是这样。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里也开始感到劳动力过剩了。

虽然我们这里在手工业进一步资本化的情况下剩余价值也会提高，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就业工人的人数将会减少，虽然加工的原料的数量在这同时可能增加，因此整个社会的支付需要可能得到满足。但是随着工人人数的减少，新生产的交换价值(剩余价值和必要价值)即课税对象的量也会减少，虽然利润率即企业主所得的剩余价值部分的相对量在这同时可能增加。

而这一切我们应当完全归功于我国生产所采取的那种形式，完全归功于生产资料同直接生产者分离这种情况。

还应当补充一点，即凡是促进这种分离的一切，与此同时都导致大量居民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没有任何东西能象保护关税制度那样促使手工业更迅速地资本化，促使大多数居民更迅速地被剥夺，因而促使居民的物质状况更迅速地恶化。但是这种制度只不过异常有力地加速了剥夺的过程而已，因为即使没有保护关税制度，只要在生产采取资本主义形式的情况下，这种剥夺也是要发生的。^①对资本主义的关税保护只能使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本身固有

^① 例如在关税较低的时代，棉纺织业的规模发展得很大，也就是从1856年的三千四百万卢布增加到1876年的一亿零二百七十万卢布，即增加了两倍。——丹尼尔逊注

的对抗关系更趋尖锐化。保护越是扩大，手工业从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手里向资本手里的过渡就进行得越快，大多数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就降低得越快，因而整个国家的福利就降低得越快。

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了不变成较文明国家的纳贡者，同时又提高全体人民的经济福利，我们应当怎样来把我们本国的工业发展到西欧工业所具有的那种高水平？可是我们却把现代大工业的概念同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概念混为一谈，并且这样地来看待我们面临的任务：我们的人民工业是使谁遭受牺牲，是使我们本国的还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遭受牺牲？既然问题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而它也正是这样地提出来的，——人民工业就注定要遭到毁灭，于是我们就从事于培植本国的大资本主义工业。

现代大生产所极为关心的是扩大销售市场，这只有通过减少价值、降低商品价格、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消耗、减少用于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的必要劳动力的办法才能达到。

在我们目睹的技术巨大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于产品的需要，如果生产采取资本主义形式和象我们这里那样靠牺牲人民形式而发展，那就只需要极少量的工人，而那些曾经从事生产自己消费的产品的工人便完全丧失了工作、现成的产品和购买手段。因此，用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和该商品价值的减少，一起导致社会劳动力的无谓的浪费：商品便宜了，但是购买它的人减少了。

如果我们坚持多少世纪以来被视为神圣的、在1861年2月19日的法令中得到法律批准的原则，那么就会出现完全另一种情景，因为根据这个原则，生产资料同直接生产者的紧密结合被承认为“家庭幸福和社会福利的保证”，并且不用从根本上去摧毁整个工

业制度，就象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而是力图发展人民社会形式的大生产，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化的生产就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因为当全社会利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每节约一分社会劳动的消耗都会增加进一步改善全社会经济状况的可能性，而空闲出来的劳动时间则可以被用于满足新产生的需要，用于发展科学、技术，等等。

保护关税制度现在几乎已被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当然是对那些在生产时要求比竞争国家生产同一产品花更多的劳动时间的产品，^①但是，由直接生产者使用目前仍由他们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所生产和加工的那些产品则不在此列。

关于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的问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问题，它不可能触及在我们这里还没有落到资本手里的那个工业部门，主要是农业部门的本质。

如果现在农业逐渐过渡到资本手里，并且将过渡得更快一些，那么起初将会为了在雇农的微不足道的生活需要方面获得剩余价值而得到足够的保护，这种微不足道是由于争取生存的极端激烈的斗争造成的。

私有经济虽然在它必须付给自己的工人的微不足道的工资中得到某种保护，但仍然要受到压制，农民就是不得已在这种压迫下劳动的。

至于私有土地大部分靠农民的农具来耕作^②、农民的谷物价

^① 我们说，保护关税制度几乎已被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最近甚至在英国这个自由贸易的国家里，在1892年12月7日在伦敦召开的关于发展农业措施问题的代表大会上，这个工业部门的代表根据前农业大臣查普林先生的提议，几乎一致通过了赞成对外国农产品规定保护关税的决议，因为所有的农产品都一样地跌价，他们认为这完全是由于外国的竞争造成的（《财政通报》1892年第49期第633页）。——丹尼尔曼注

格不可能不反映在售价上的情况,就不用说了,但是使私有经济受到压制的主要是俄国工人的落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微不足道的生活需要。我们的竞争对手的生产率年复一年地迅速提高,而我们这里的生产率的发展速度实在太慢,因而相对地落后了。

这种由加工工业及其资本化所造成的我国农民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落后状况反映在私有经济中,并且造成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农民负债和私有主负债。

私有主债务迅速增加的程度,可以从以下看到。1885年1月1日这一天,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所有农业银行中抵押了二千二百八十四万九千俄亩土地,所抵债务为五亿二千零七十六卢布。由于属于私人所有的是九千一百一十九万七千俄亩,因此全部私有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五被抵押了。过了七年以后,在1892年1月1日这一天,全部抵押的土地已经达到三千五百二十三万五千俄亩,所抵债务为九亿一千三百八十一万六千卢布。由此可见,被抵押的土地亩数在七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而债务总额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因此被抵押的私有土地现在已不是占百分之二十五而是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了。

② 例如在工商业司出版的《1888年工厂工业资料汇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俄国总共生产了五百六十九万卢布和输入了二百四十万卢布的农业机器等等,因此一年总共使用了七百六十万卢布。同时,根据农业本身的资料,关于耕作土地等等的价值表明,对整个俄国欧洲部分的私有经济来说,每年需要增加一倍多的农具。造成这个差额的原因是,这些数目字是由使用自己的工具耕地的较大的所有主提供的。大多数主人使用农民的工具耕种,不然就干脆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给农民。为了解每年消耗在农具上的七百六十万卢布是怎样的微不足道,我们再提醒一下,根据美国还在1880年所作的统计调查,农具的生产达到六千八百万美元(一亿四千万卢布左右;我们这里总共生产了一亿一千四百万卢布的各种机器),但从那时以来农具的生产大大地增长了,因为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广泛使用改进的农具。对此还应补充一点,即俄国欧洲部分五十个省份的全部播种面积约占六千万俄亩。美国约占四千万俄亩(美国的数字引自《农业特派员的报告》,华盛顿英文版,时间是1885年和1889年)。——丹尼尔逊注

这些数字表明，我们土地收入的资本化的进展已经达到多么迅速的程度。它们说明，不仅是农民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交给资本；连土地私有者也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命运，在剥夺农民的同时也在剥夺私有土地；私有土地也不得不年年把它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越来越大的份额交给资本；一年一年地下去，土地私有者越来越陷于实际所有者——资本家的地产管理人的地位，这个管理人的职责是转交地产收入。日益增长的债务、被银行不断提高的地价，逐年增加着资本在农产品中的份额。仅仅1891年这一年，土地所有者为了支付利息和偿还债务付出了六千四百多万卢布，占全体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大约那些把地产抵押出去的土地所有者的来自最主要谷物的全部收入都用于偿还债务了。^①因此，减轻债务增加负担的每一项措施都促进对目前的土地所有者的剥夺，促使他们的收入也就是他们的财产转到资本的手里。

工业的资本化，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正在社会经济组织活动的各方面引起有害的后果。手工业的这种资本化使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从而使他们失去了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满足自己需要的可能性，把他们变为支付的消费者，使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资本的需要。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在我国是完全建立在国内市场需要的基础上的，因此它完全取决于日益贫穷的居民的支付能力，而居民则是由于资本使他们失去农业劳动以外的工作和农业劳动的资本化而变得日益贫穷的，并且由于劳动

^① 1885年的债务数字引自《俄国农贷资料统计汇编》，1887年圣彼得堡版第250页。1892年的数字选自所有农业银行的报告。在许多报告中每年偿还的数字没有按土地项和城市不动产项的借款分别列出，因此要进行计算。不过要进行这样的计算也不是经常能找到确切的数字的，因此不能保证这个数字的绝对正确性，但是不管怎样它离实际差不太远。清理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银行的报告中没有抵押的土地的数字。——丹尼尔逊注

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为了生产满足全社会需要的产品而必需的工人人数也正在非常迅速地减少下去。

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不是由全社会而是只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来享受的。全体居民却只是在他们拥有多少购买手段时才能享受多少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购买手段的量则又完全取决于他们消耗在生产上的劳动时间。而劳动年、劳动时间的量则由于手工业的资本化而正在不断减少下去。

农业——唯一留下的生活来源——越来越受自然条件的支配，由于滥事耕种土地和采伐森林等等的结果，人对大自然在这方面的控制一年年地削弱了。因此，农业劳动产品也一年年地越来越难以得到保证。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的整个市场完全取决于农业，因此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变成了某种赌博，在这场赌博中企业主也许连续两三年都获得巨额的利润，而在其他年头他们的生产却遭到了危机。

“土壤日益贫瘠而且又得不到人造的、植物性的和动物性的肥料等等来补充它所必需的成分，但它仍然会依天气的变化莫测的影响，即依不取决于人的种种情况，继续提供数量非常不一的收成，但从整个时期，比如说从1870年到1880年来观察，农业生产停滞的性质就表现得极其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气候条件迅速地消耗土壤中还保有的矿物质肥料，从而就为荒年铺平道路；反之，一个荒年，尤其是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歉收年，使土壤中含有的矿物质重新积聚起来，并在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再出现的时候，有成效地发挥作用。这种过程当然到处都在发生，但是，在其他地方，它由于农业经营者的限制性的干预而受到调节。在人由于缺乏财力而不再成为一种力量的地方，这种过程便成为唯一起调节作用的因素。例如，1870年俄国获得了一次极好的收成，但是那

一年是一个顶点,紧接着便是一个很坏的年头。大歉收的 1871 年可以看做一个新的小周期的起点,这个周期在 1874 年达到了新的顶点,随后紧接着便是 1875 年的荒年。然后又开始高涨,这次高涨以 1880 年这个更坏的荒年告终。如果把整个时期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平均年产量总是一样的,而变化仅仅是由一些自然因素造成的。”(卡·马克思,1881 年 2 月。)^①上面所说的周期在八十年代也重复了。但是由于经济条件迫使人们更加滥事利用土壤(增加耕地等等),因此紧接着的每一个周期的经济方面结束得越来越不那么有利了,最后造成了 1891 年的饥馑。这一点是怎样由事实证实的,可以看下面拉也夫斯基先生的计算(参看《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 28 卷第 16 页,《1891 年的歉收》)。七十年代的收成的数字同八十年代的收成相比不那么有利:

	收成摆动幅度	
	最高	最低
1883—1890 年	+ 26.2	- 35.2
1870—1877 年	+ 34	- 25.2

农业司证实了这个结论。^②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49—150 页。——编者注

② 《农业方面的 1891 年》第 3 卷第 1 册第 22 页。因此只有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才会梦见“来自东方的敌人”。这种条件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到什么程度,可以从货币资本的时而异常大量地存放在银库、时而又重新用于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波动中看出来。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这种游资在一年之内的波动不超过三千至四千万卢布,而从 1891 年 6 月至 1892 年 6 月,这种波动超过了一亿一千万卢布;1891 年秋天私人银行欠了国家银行约一亿一千万卢布,而在 1892 年 6 月国家银行反而欠了私人银行一亿卢布。因此,毫不奇怪,在私人银行的资金用尽以后,国家银行除了采取“临时发行”钞票的措施以外,就没有别的资金来满足对于货币的要求了。从生产和流通中闲置起来的一亿货币资本,当然不能不影响到贴现利率的降低,1892 年夏贴现利率降低到了百分之

但是在我们所说的这场赌博中，由于手工业的资本化而丧失了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那些人，以及在工业繁荣时期还有工作做的那些直接生产者，被迫失去的东西最多，但远不止这些，不过在“危机”时期“为了不至于忘掉技艺”而从这整个工业后备大军中挑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这同为了不至于忘掉后备役而每年征召一部分非常后备军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工业非常后备军的士兵的生存和生活本身完全取决于这种“征召”，可是给他们的工作仅仅能使他们不至于把它忘掉而已。

如果再想一想每逢事业繁荣的时候就业工人的人数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下去的情况，那么我们对这样一个乍看起来很难理解的现象，即俄国资本主义最中心的莫斯科省的居民经济状况恶化的现象，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种恶化竟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这些居民成了全国欠缴税款最多的居民。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使全俄拥有最高效率的劳动的居民，陷于遭受饥馑地区的居民的境地。

如果对此再补充一点，即我们在莫斯科省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工厂中的劳动条件，对这个省的全体居民的体质发展正在产生有害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对建立在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生产形式的破坏，以及在居民欠税的增加和体力衰退的情况下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带给国家的除了害处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由于上述种种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遇到它自己制造的

之二点二五。这一事实可以警告那些把利率的降低看成直接生产者拥有更多产品份额的人不要过于匆忙地作出结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资本是由于全国生产率的降低、由于用来分配的物品本身——产品的减少和短缺而闲置起来的。——丹尼尔逊注

障碍,这些障碍就在于,由于生产资料同生产者的分离,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只能由单个的企业主而不能由全社会来加以利用,同时由于在资本主义的支付消费的条件下生产率的这种提高而空闲起来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却不能得到利用,对社会来说不仅白白浪费,而且还成为社会的负担。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建立在人民实际需要基础上的消费而是支付的消费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民的实际需要只有在人民生产占优势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工商业繁荣”的时期。可是资本主义恰恰力图把这种人民生产纳入自己的活动范围,也就是力图消灭自身“繁荣”的最主要的动力。这不仅在我国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引起周期性危机的因素之一,就是在消费工厂工业品的国家发生的周期性饥馑。例如在印度每隔十至十一年发生的饥馑,就是英国工业危机的原因之一。

因此,只有当建立在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生产和消费条件占优势的时候,绝大多数居民才会感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条件的压力的某些减轻。只有连年丰收以后,消费才略微符合对食物的实际需要,而在其他年头,由于被迫出让农产品,甚至造成谷物消费的减少,至于工业品就更不用说了。消费自产产品的可能性会提高农民的经济富裕程度;消费资本主义产品的必要性使他的经济独立性恶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资本主义除了支付的消费以外没有其他的消费。但是为了获得支付手段,就必须加紧出让自产产品。必须把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作为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量拿来出让,而根据生产条件农民消耗的劳动比较起来就太多了,因此他换得的价值少于他本人花费在出让的交换价值上的量。然而减少这种出让的必要性却使更多的生活资料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留在他的手

里。

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越发展，增加自产产品的出让量就越迫切，本人对于产品的需要满足得就越少，而由于出让的产品是农业劳动的产品，即一个劳动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的劳动产品，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限度以后就会压缩自己的国内市场。

因此，使资本主义至此开始压缩国内市场的那个限度，是由下列几点决定的：第一，资本占领的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程度，以及用于生产满足整个国内市场的社会支付需要所必需的产品量的劳动时间量。第二，资本主义占领的手工业的数量，同时随着这个数量的增加，农民的因而也是全社会的完全空闲的和白白浪费的劳动时间也增加了，从而社会的支付能力也降低了。第三，用还没有为资本掌握的工业部门，主要是农业工业部门的产品来满足一切需要的必要性，因此所出让的产品也包括应当留给自己消费的那个部分，但这正好使农民购买的产品的消费受到限制。第四，农业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减少，这种减少不是由于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由于农民的竞争者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因此农民不得已不仅把自己的劳动年限制为单纯的夏季劳动，而且夏季劳动的产品是以低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的，因此在这同量劳动时间里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较少。第五，课税的相对和绝对的增长，虽然这种增长加速了资本化，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增长不仅在课税总额方面剥夺了满足居民消费需要的可能性，而且由于他们所生产的交换价值的减少，也消除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多样性的可能性，因而消除不仅增加消费品而且也增加交换价值的可能性。第六，无法获得能使哪怕一小部分空闲的工业人口就业的相当规模的国外市场，之所以无法获得是因为进行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度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为了保护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而建立了一堵关税高墙，这堵高

墙的存在本身说明了我国生产的较低的生产率，从而也说明了我国生产的产品的昂贵和不但无法在世界市场上，而且也无法在国内市场上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竞争。

也许可以把这些原因无边无际地罗列下去，但是这一切原因归根到底归结为一点，即在每一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里，不是全体居民，而是只有个别的、人数较少的阶级才能利用效率较高的统一的社会化的劳动；而绝大多数居民在同时却不得不天天处于不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劳动力，而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劳动力根据市场的条件得到实际使用时才能生活的境地。但是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单位时间里用同样的劳动力来生产大量产品时，就业工人的相对人数还是在减少下去，而随着就业工人的减少，商品的消费也在减少下去。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所固有的。一个国家登上资本主义舞台的时间越晚，这种矛盾就表现得越尖锐，因为它使国内市场充满了找不到销路的商品，而又不能求助于国外市场，——它们早已全被占领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度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引起的贫困的不断增长造成的，是由完全没有工作、不能被资本雇用的工人，因而也就是那些不能满足自己最迫切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增长造成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取决于社会支付能力的社会的需要就异常迅速地饱和了。但在这种饱和的同时，一方面在得不到使用的劳动力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在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从而找不到销路的产品数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对于生活资料的真正的需要却越来越得不到满足。

同时，没有工作的工人人数的增长达到了危险的程度。根据国家产业部的计算，完全多余的工人在俄国欧洲部分现在就已有五百多万，但是如果想一想，农业在最好的情况下提供一年中三分之一时间的工作，那么闲置的劳动力就不下于一千万了。甚至在工

业方面远远超过我们的那些国家里，资本主义需要的工人人数也是相当有限的。例如，1880年美国除了农业、商业和运输业以外在所有工业部门中就业的人数总共有三百八十万人。而在我国有一百万人左右。同时，美国从事各种农业的人数总共占百分之四十，而在我国则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手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资本化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无事可做，他们不能找到任何工作，这种无所事事有造成这样的灾难的危险，^①即不管是否愿意都会被迫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之外去找生路，而近三十年来我们却曾力图使我们的经济机体具有这种形式。

如果我们想等待“每一个庄稼汉在工厂的锅炉里受煎熬”以后俄国黄金时代的来临——尼·伊·季别尔的这个观点有许多人赞成，——那就只有完全放弃任何可靠的经济改善的希望。但要知道整个社会制度是建立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所采取的那些形式的基础上的。“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

^① 我们曾经看到，例如死亡率在那些不得不靠少量土地为生的农民中高出半倍。很可能出现一些把这看成是人口数字适合现有生活资料量的经济学家……在1891—1892年间表现得特别严重的、作为由于社会经济混乱而造成的生活资料缺乏的后果的高死亡率，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根据米留可夫先生的研究，俄国农户和农民居住点从1678年的七十九万一千零一十八个减少到1710年的六十三万七千零五个（《十八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间俄国的国家经济》1892年圣彼得堡版）。男工人数减少了三十万二千七百零二人。但那是在建立国家的时期，虽然它的建立是付出了很高很高的代价的。现在的灾祸带来的则不是建立什么巩固的东西，而是进一步破坏人民的福利，要么就是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继续走西歌开辟的那条道路。——丹尼尔逊注

经济条件中去寻找。”^①因此，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应当存在于生产条件本身的变化之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思想从生产的现存物质条件中发现出来。”^②

俄国社会面临的**任务变得日益复杂起来**。资本主义的占领正在日益广泛地进行，与此同时，就业工人的人数和他们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正在日益减少。人民生产让位于资本主义生产，后者表现为个人利用社会的生产力，因而改变了产品的流通方式和产品的享用。资本主义除了支付的消费以外不知道其他的消费，已经不能靠本人的劳动产品来生活了。这样一来，几百万空闲的、失去工作的群众的生活需要的水平必然会降低。而这种降低反过来又不能不影响到有工作的直接生产者的份额的降低和国内市场的缩小。但是处在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家庭中的我们，既不能满足于三四十年前曾经满足过我们的和许多人梦想加以支持的那种家庭小生产的形式，也不能满足于取代它的和我们人为地加以扶植和损害全体居民的福利而加以保护的那种形式。俄国社会面临着解决一个极其困难的但又不是不能解决的伟大任务，——在不是极少数人而是全体人民能够利用生产力的形式下来发展居民的生产力。三十年在人民的生活中只是一瞬间，但是在这一瞬间的时间里，曾经这样或那样地满足过人民需要的一切工业形式已经和正在继续从根本上遭到摧毁，同时不再适应人民迫切需要的、造成整个人民经济破产和饥馑的那种工业形式却正

^① 拜伦就已懂得，“……人类的全部历史证明，自从夏娃吃了苹果以后，人这个饥饿的罪人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吃东西”。——丹尼尔逊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425页。——编者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编者注

在代替它们而发展起来，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摆脱这种状况的迫切程度，就象克里木战争以后迫切需要改变生产条件一样。

我国过去的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村社，在资本主义及其造成的生产条件和流通条件以及工业和农业分离的压力下，村社不能保证自己成员的生活资料。因此在现存条件下它受到了必然灭亡的威胁。但是与此同时，村社的农业是未来的经济大厦赖以建立的那种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之一。为了在原来的位置上发展象西方一样建立在应用农业科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业，我们用不着等待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①这种大规模的丧失土地也许意味着我们的经济面临死亡。我们不得不使科学的农业和现代的大工业“同村社衔接起来，同时把村社改变到能够成为组织大工业和把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改造为社会形式的合适的工具的程度”。对于社会经济组织来说，要就是发展，要就是退化和死亡，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形式已不再适应最迫切的国民经济的要求了。资本主义破坏了我们建立在直接满足生产者需要的基础上的宗法式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破坏了它以后却把它变成了满足全社会的产品需要的社会生产了。与此同时，它剥夺了大量的过去的生产者，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并且在得到科学和技术支持以后

^① 《根据地方自治机关统计资料作出的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第1卷（瓦·沃·先生在书中描写了农民村社的农业）的批评者彼·冯·司徒卢威先生，在提到农民分化为富人和穷人的事实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向小块土地继承所有制过渡的情况的同时指出，后一个现象目前表现得还很不明显，但是“它在我们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也是符合社会政治观点的”（《布劳恩文库》第5卷第501页）。所有赞成农民丧失土地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人（这些人最近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很多）忽略了一个情况，丧失土地的人出路何在和资本主义将靠什么存在下去？——丹尼尔逊注

把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这样的规模，以至一小部分工人就可以满足全国的产品需要。另一方面，生产虽然成了社会的行为，但却没有象在过去宗法式生产条件下生产者自己享用自己的劳动产品那样，带来社会享用它的产品的结果。对社会生产力的利用不是转到了全社会的手里，而是转到了个别人的手里。因此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找不到工作的和完全无法满足最迫切需要的人数无比迅速地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力远远超出了社会的需要，——不是越来越得不到满足的真正的需要，而是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形式本身限制的那些需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形式同我们全国居民现有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这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得日益严重了，因为在这种形式下居民的生产力受到越来越少的人的限制。这种不相适应表现为居民的经济地位的降低，表现为一些地方的纳税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降低，那些地方由于手工业的资本化，在一个劳动年里有半年以上得不到使用的劳动被闲置起来（黑土地带），在资本主义比国内其他任何地方得到更大发展的地方也是这样（莫斯科省），而且在这些地方极明显地表现出居民体力退化的迹象。生产形式同大多数人的需要的这种不相适应，对于居民和整个国家有可能造成有害的后果，以致除了以下的办法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依靠从过去的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生产的物质条件来停止摧毁我国数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直接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工具的基础上的生产形式，“以便消除正在威胁准备走上放弃”自身福利的“古老”根基的“道路的那些人民的危险”，集中全副力量把农业和加工工业统一在直接生产者手里，但不是在分散的小生产单位的基础上的统一，如果这样做那就等于是“永远实行普遍的中庸”，而是在公共的、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基础上的统一，这种大生产将建立在自由发展社会生产力、应用科学和技术并旨在满足真正的需要和为全体

居民谋福利的基础之上。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482—572页。

英雄和群氓^①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

1771年9月，在鼠疫流行的莫斯科，有个工厂工人站在瓦尔瓦尔门前对所有愿意听的人说，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见了圣母，圣母抱怨说，三十年来竟没有一个人向她那挂在瓦尔瓦尔门前的圣像供烛祈祷。作为惩罚，基督要让莫斯科下一场石雨。但是她，圣母求情说，只要罚三个月的流行病就够了。说到这里，那位工人高声喊道：“善男信女们！为圣母献上万民烛吧！”他的话音未落，受苦受难的人们便蜂拥向前，又是施舍，又是供烛，一面祈祷，一面哭泣。其中有男人，有女人，有儿童，有病人，也有健康的人，整整一天都聚集在瓦尔瓦尔门前。神甫们搭起了讲经台，作起祈祷来……按照大主教阿姆伏罗西的意思，最好是把圣像移到别处去，免得人群堵塞道路。至于那些不一会儿功夫就积了满满一大柜的钱币，可以用于慈善事业。长官们却决定要把钱币运往一个秘密的地点。但是当一队人连同一名书吏为此来到瓦尔瓦尔门前的时候，人们便把他们驱散了，一面高声喊道：“圣母被抢了！”接着便

① 本文写于1882年，最初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编者注

拿着信手抄来的武器，在一片警报声中到处搜寻阿姆伏罗西。楚多沃修道院、顿斯科伊区都找遍了，终于在教堂里找到了他，并把他从教堂里拖出来，不过在临离开那里之前让他吻了吻圣像。这倒是个吉兆。后来，人们接二连三地向阿姆伏罗西提了许多有关防护工作和警察措施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对瓦尔瓦尔门的防护工作和警察措施的问题，在他简短而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之后，人群便显然安静下来了。可是拉耶夫斯基的仆人，一个叫瓦西里·安德烈也夫的，突然从一家小酒馆里跑出来，手里提着一根棍子，冲向大主教。安德烈也夫高声喊道：“怎么能听信他呢？难道你们还不知道他是个江湖骗子吗？他这是转移视线！”说着说着，对准阿姆伏罗西，劈头就是一棍。霎时间，人群情绪骤变，几十双拳头朝大主教没头没脸地打过去，阿姆伏罗西被当场击毙……

1253年，巴黎圣母院的神甫会对自己的农民实行新的纳税法，有个村子的农民拒绝照办。为此，全村的男人都被解往巴黎，关进牢房。王后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①知道此事后，便请巴黎圣母院的神甫们调查这一案件，而且希望能将被捕者释放，同时她答应自己将替这些人纳款。神职人员出于权势上的妒意，不仅拒绝王后的请求，反而把造反的村子里的妇女和儿童也都抓起来，和男人关在同一间阴暗的臭气薰天的牢房里。于是，布兰卡在少数侍从的陪同下来到了监牢外，下令打破牢门。侍从们迟疑不决，因为在他们眼里，神职人员的特权是至高无上的。这时布兰卡便从一个侍从的手里夺过长柄斧，亲手朝牢门砍了一斧，在她的榜样的带动下，侍从们立刻捣毁了牢门……

^① 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Blanche de Castille 1182—1252)，法国王后，路易八世之妻，路易九世之母。1226—1236年路易九世未成年时任摄政后，1248—1252年路易九世参加第七次十字军远征时再次治理法国。——编者注

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事件都能作为本文的例证，而且为此本文也将在下面引用其中的一部分。我之所以首先选择了阿姆伏罗西被愤怒的人群打死的情节是有自己特定的目的的。因为这个情节或与之类似的情节能够通过生动的形象立刻将本文的主题，本文的目的，以及本文使用的术语展示在读者面前。以自己的榜样带动群众从善或行恶，去干最崇高的事或最卑鄙的事、合乎理性的事或毫无理性的事的人，我们将把他称作英雄。能够被最崇高的或最卑鄙的，或者既不高尚也不卑鄙的榜样带动的人，我们将把他称作群氓。我们选择“英雄”和“群氓”这两个术语，并没有什么褒贬的意思。既然我们把醉鬼瓦西里·安德烈也夫称作英雄而同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的崇高形象相并列，读者当然也就不会从这里看到所谓对英雄的崇拜，但也不会看到对英雄，即伟人持否定态度。毫无疑问，伟人并不是从天上掉到地下来的，而是从地下长到天上去的。创造伟人的环境就是产生群氓的环境，只不过是在伟人身上集中体现了分散在群氓中的力量、感情、本能、思想和愿望。毫无疑问，甚至可以按照逻辑推理大大前进一步，象卡莱尔夸大伟人的作用那样，去贬低伟人的作用。但是，如果持这种观点，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却很容易忽视许许多多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极端重要的现象，即忽视伟人同追随他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种关系，它们却都是事实。它们能产生、存在、中止或以某种结果而告终，也就是说，对它们至少也要同对其他事实一样，应当进行研究。尽管根据某种非常高明而且完全合乎逻辑的观点来看，伟人甚至可以说简直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或者顶多是实现至高无上的普遍历史规律的一个不自觉的工具；尽管应当根据这些普遍规律来研究伟人的活动，但是，除了这些普遍规律之外，在伟人和追随他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上还存在着某些局部性的规律。当然这类事实本身是以第一手材料的形

式被如实地大量载入史册的。但是，单纯地记载事实，不仅远远谈不上理解现象，甚至谈不上理解现象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可能从研究当代文化和文明的历史学家，从政治家、社会学家以及所有研究人类活动和人与人关系的人那里找到对现象的理解。这方面可以说还是个空白点。而我们建议读者注意的则正是这方面的问题。然而我们不准备专门论述伟人的问题。如果我们想专门谈这个问题，那么刚一迈步，就会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碰到困难。什么是伟人？伟人在有些人眼里是神化了的英雄人物，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你、第五个人、第十个人对英雄可能提出五花八门、各不相同的要求。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些人心目中的伟人在另外一些人的心目中却渺小得很。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在评价伟人对人类贡献的大小时都会有而且也一定有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我们衡量伟大的尺度是完全适应某种目的的，因此，在研究我们提出的问题，就不能以这一尺度为准。例如，尽管佛教徒对佛一片虔诚，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佛并不是伟人，而是一个最平庸的人。如果科学家根据自己看问题的尺度，不准备研究佛的作用，那么，显然就会使自己失掉有关佛对当代人具有感召力的宝贵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就应当采取佛教徒的观点。当然，基于各式各样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目的和考虑，他可以不接受并且驳斥这种观点。然而，在我们目前这一具体情况下，无论这些目的和考虑本身是多么重要，也会变得毫不相干。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研究群氓和他们心目中的伟人之间关系的奥秘，而不是寻找衡量伟大的尺度。因此，在我们提出的任务范围内，对我们来说，十足的坏蛋、蠢材、无耻之徒、疯子和天才或天使的化身都同样重要，只要群氓跟随他走，只要群氓不是由于外因，而是出自内心地愿意服从他，只要群氓模仿他，崇拜他。

不仅如此，伟大往往可以照亮遥远的历史前程。有的伟人，他的不朽的形象和思想永世长存，世世代代地影响群氓，带动群氓。但是也有的伟人却象流星一样瞬息即逝，只是在一刹那间成为群氓的偶像和理想的化身，而待一时冲动过后，自身便淹没在愚昧无知的群众行列之中。有位不知名的连长在一时冲动下冲向敌人的炮垒并以自己的榜样带动了胆怯的士兵，而后来却又成了一个一钱不值的人。虽然你可能承认在他的行为中有某些伟大的成分，但是你却很难把他称作伟人。然而，从我们提出的任务来看，毕生中只有一次鼓舞并带动了士兵的这位连长同每次莅临前线都能在士兵身上激起热情，使他们视死如归的、难能可贵的“伟大”统帅之间究竟又有什么差别呢？回答是：他们之间毫无差别，或者相差无几。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后一种情况，比之前一种情况，心理上的因素要复杂些。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士兵在领袖人物出现时内心发生的某种习惯反应；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则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事先未曾预料到，并且可能根本无法预料。但是这种差别并不起重要作用。当然，如果我们在研究群众受某个人意志影响的奥秘时忽视分析那个不知名连长的故事之类的事实，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其次，从屈服于某个人压力的内心奥秘来看，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的侍从们的一时冲动和士兵们的一时冲动，可以说是毫无差别的。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群氓都是在领袖人物刚刚迈出第一步的一瞬间，一举越过了某种神秘而可怕的门槛，而在这之前他们却一直在踌躇、犹豫、退缩。

显然，这两件事有同样的起因，因此，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当然，不仅是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和瓦西里·安德烈也夫，也不仅是那位连长，倘若带头羊同跟在它后面的羊群之间的关系对于弄清我们感兴趣的心理过程及其所处的社会条件或其他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所裨益，那么考察这个问题的人就不能把这种关系排

除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外。

—

总之，我们将从这种特定的意义上来理解英雄。英雄既不是第一个情人，也不是建立伟大功勋的人。我们的英雄，看来既可能是前者，也可能是后者，但是我们目前所感兴趣的并不是他表现在这方面的特点。我们的英雄，不过是法国人所谓的第一个“破冰”的人，他们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而群氓则胆颤心惊地等待着这一步，尔后便象潮水一样朝着某个方向冲去。我们认为英雄本身并不重要，英雄仅仅对他所掀起的运动才是重要的。正如上面所说的，英雄本身可以是疯子、坏蛋，可以是蠢材、微不足道的人。为了避免引起各种可能产生的误解，对我说来，非常需要使读者牢牢地掌握“英雄”这个词的这一含义，并且不要期望下文将要谈到的一些英雄会建立某种“英雄”（双关话）业绩。正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我在本文一开头便引了阿姆伏罗西被打死的故事。基于同样的目的，我想提醒读者回忆一下《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具有高度意境的场面，即韦列夏金遇难的场面。我认为下面一段对群氓在榜样的影响下冲动时的过程记述和艺术描绘，在深刻和细腻上是无与伦比的：

“弟兄们！”拉斯托普钦用铜铃般的声音说道：“这个人是韦列夏金，莫斯科就是断送在这个坏蛋手里的。”

那个身穿狐狸皮袄的青年人，略略躬着腰，双手垂在前面，顺从地站在那里。由于剃光了头，显得很难看。年轻而消瘦的脸上带着惶恐的神情，低垂着头。伯爵的语音一起，他便慢慢地抬起头来，仰望着伯爵，似乎是有话要对他说，至少是想和他接触一下目光。但是拉斯托普钦并不看他。

青年人耳后细长的脖子上绷起了一条青筋，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他向人群望了一眼，似乎从人们的脸色上看到

了希望，便苦笑了一下，然后又低下头来，两只脚在台阶上稍微正了正。

“他背叛了沙皇和祖国，他投靠了波拿巴。俄国人当中唯独他一个人玷污了俄国人的名字，莫斯科断送在他手里了，”拉斯托普钦用慢吞吞的语调，但斩钉截铁地说。突然间，他向下面那个依然顺从地站在那里的韦列夏金扫了一眼，他似乎是被自己看到的景象触怒了，便扬起一只手来，几乎是喊着对人们说道：“我把他交给你们了，任凭你们处理吧！”

人们默不作声，只是彼此靠得更紧了。挤在那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呼吸，身体连移动一下都不可能，等待着出现某种谁也不知道的、不可理解的可怕的事，——这一切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站在前排的人见到和听到眼前的一切，一个个都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用尽全身的力气，挡住身后向前挤的人群。

“揍他！……要这个叛徒的命，别让他玷污俄国人的名字！”拉斯托普钦喊道。

“我命令，砍死他！”

人群与其说是听到了拉斯托普钦的话，不如说是听到了他愤怒的声音，便发出一片叹息，向前涌去，但是又停了下来。

“伯爵！”在这再次出现的片刻寂静中传来了韦列夏金那胆怯的、不自然的声音，“伯爵！我们上头是同一个上帝……”他抬起头说。于是他那细长脖子上又绷起了一条粗筋，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没有说完想说的话。

“我命令，砍死他！……”拉斯托普钦喊道，突然脸色变得象韦列夏金一样苍白了。

“刀出鞘！”一个龙骑军官一面喊，一面拔出自己的刀来。

人流更有力地向前涌去，把前几排的人挤得东倒西歪，一直推到门廊的台阶前。

一个高个儿的小伙子，带着冷酷的神情，一直扬手站在韦列夏金身旁。

“砍他！”那个龙骑军官几乎是耳语地说道。于是一个士兵便突然凶狠地用他的钝刀朝韦列夏金的头上砍去。

“啊！”韦列夏金惊叫了一声，惶恐地向四周张望着，好象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人群中发出了同样的惊恐声。

“呵，上帝！”不知是谁悲叹了一口气。但是韦列夏金在惊叫了一声之后，接着又由于疼痛而发出了一声哀叹。这一声哀叹却断送了他的命。早已岌岌可危，但尚控制着群众的人类感情的闸门突然崩溃了。罪行既已开了头，就必须干到底了。哀叹声被人群雷鸣般的愤怒的吼声淹没了。正如打碎了一条船的九级浪，即最后一级浪一样，那最后一股无法阻挡的人流，从后排涌向前排，压倒了一切，吞没了一切。那个龙骑兵正想再砍一刀，韦列夏金恐怖地叫着，用双手抱着头，向人群跑去。

他一头撞在那个高个儿小伙子的身上。小伙子用双手掐住他那细长的脖子，疯狂地喊叫着，同他一起跌倒在挤成一团、喊叫着的人群脚下。有人撕打韦列夏金，有人撕打高个儿小伙子。被践踏的那些人的喊叫声和努力解救高个儿小伙子的那些人的喊叫声，只能使人群变得更加狂暴……

“用斧子砍他，呃！……揍扁了？……叛徒，他出卖了基督……还活着……真能活……恶人受罪，活该！掐死他……怎么，还活着？”

直到那个受难者停止了挣扎，他的叫声变成了拉长的匀称的呜咽时，人群才赶快离开他那倒在地上的血迹斑斑的尸体。但每个人都走过来看看事情的结局，然后带着恐怖、责难和吃惊的神情又挤回人群中去。

这段摘录很长，但读者显然不会由于从中得到艺术享受而抱怨我。

这一肮脏事件中的英雄是谁呢？从小说的角度来看，英雄可能是韦列夏金，也可能是拉斯托普钦，也可能是任何一个打人的人或被打的人。这涉及到小说的主题思想。从作出英雄行为的角度来看，这里没有任何英雄。——只要有起码的道德感，任何人都这么说。就我们特定的意义来说，决不能把拉斯托普钦称做英雄，因为他本人对群众没有起任何作用，龙骑兵听从了他的话，但并不是马上就听从的，人群并不是必须服从他的，因此丝毫也不为他的喊叫和挑拨所动。龙骑军官的情况也是一样。这起事件中的真正英雄是第一个突然“竖眉瞪眼地”挥刀朝韦列夏金砍去的士兵。他

可能是(甚至肯定是)全队士兵中最笨拙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他的那一刀却完成了拉斯托普钦的爱国口号(大家都看到了,事件是发生在法国人进入莫斯科的前夕,当时爱国口号当然会特别起作用),伯爵的官腔及其直接命令所无法完成的事。

笨拙的士兵用钝刀砍了一下,并且仅仅砍了一下,显然,这一刀却战胜了群众不愿杀害一个他们并不知其罪的人的强烈感情。托尔斯泰伯爵为自己所提供的动人画面加了一段注解,至少是不够慎重的。他不仅以罕见的艺术魔力再现了事实,而且通过语言作了恰当的解释:“早已岌岌可危,但尚能控制着群众的人类感情的闸门突然崩溃了。”但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伯爵却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声哀叹却断送了韦列夏金的命。”除此之外,还暗示动因是群众的情绪:“罪行既已开了头,就必须干到底。”但是韦列夏金的喊叫在这场悲剧中是一个无法避免、必不可少的细节,以致说“喊叫断送了他”,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至于谈到必须把已经开了头的罪行一鼓作气地干到底,那么只要群众开始犯罪,这无疑也会是个动因。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是由一股与群众毫不相干的力量开始犯罪的,因而群众不可能认为自己应对此负责。开始犯罪的人自然会下意识地想尽快结束受害者的性命。但是一个旁观者,特别是如果他事先已经表示过不赞成,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向凶手扑过去,设法拯救受害者。

韦列夏金死于群众的一种无可遏止的想模仿英雄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英雄是那个是否有足够勇气砍第一刀的龙骑兵。如果读者因我在这里使用“英雄”一词而感到不快,那么我就要请读者原谅,因为我没有找到其他更恰当的字眼。当然,这丝毫不妨碍真正的伟人同样能使群氓倾倒。对我们说来,推动英雄去完成英雄业绩的动机本身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愚蠢的服从(例如,我们的那位龙骑兵想必就是这样),还是对真、善的渴望,无论是个人

的深仇大恨，还是炽烈的爱情都是一样。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仅仅是作为一种推动力的英雄同群氓的关系。毫无疑问，由于英雄的个人动机使全世界发生意外事件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不去研究这些动机。但是我们的任务毕竟限于研究英雄和群氓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我们要努力弄清这种关系，明确其产生的条件，包括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机，当时的社会制度，英雄的个性，群众的心理状态，或其他因素的特点。我再重复一遍，这方面可以说还是一个空白点，科学界甚至还没有想过要全面地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这首先是由于各门科学划分过细，结果，每个学者都付出崇高的劳动，努力钻研自己的专业，却不愿或不能了解相邻专业在做什么。法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对物理学的成果、性质和方法全然无知的现象，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但是，有的知识领域，就连最宽厚的人也认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或法学家必须多少有所了解，这个领域就是各种心理现象。即使心理学直到今天还未形成一门完整的科学，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相互补充的公认的立论。但是无论在这一领域中有争议的、假定的、有条件的东西多么多，根据对心理现象的了解仍然能够正确地评价政治和经济理论中的心理因素。

一个经济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对人的心理是如何理解的，但是他在自己的学术范围内则认为，人的唯一的精神动力是想尽可能贱买贵卖。而对于法学家说来，人的活动的动机只不过是犯犯罪和因犯罪而受惩处等等。因为人的内心实际上是无限复杂的，所以很明显在分析时会漏掉一些从这种特定的专门的角度看来不显眼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来，并且可能表现得很经常、很突出。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现象。请考虑一下现有的全部的所谓社会科学，你就会发现，不能让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承担起研究真正的群众运动，即在本质上具有独自特点的群众运

动的任务。诚然，例如刑法讲共同犯罪、造反、暴动；政治经济学讲罢工、迁徙；国际法讲战争、交战。但是刑法是从犯罪和惩罚的角度看问题，政治经济学是从经济后果的角度看问题，国际法是从众所周知的经常变动的礼节规范的角度看问题。而群众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自己内在的独自的特点，有自己发生、继续和终止的规律，它至今仍然是一个空白点。看来，历史学应当讲我们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但是历史学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本身的任务是什么；是不偏不倚地记录已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是绘声绘色地再现过去的形象和情景以满足纯客观的求知欲？是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实际教训，还是发现使历史现象服从于某种规则、秩序的普遍规律或局部规律？总之，对于了解群众运动的本质来说，迄今为止，历史学提供的只不过是一大堆材料。除此之外，还有历史学的贵族老爷作风。尽管谈论并且反对这种作风的人很多而且由来已久，但是它依然相当顽固，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对群众运动的鄙视。

然而在人类思想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实践比科学先看到了某些真理，并且为了某种实际目的利用了这些真理，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这些真理。例如只是到了今天才能了解催眠术的内幕，然而古代埃及的祭司却早已知道它了，至于后来的许多骗子和魔术师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他们所了解的仅限于亲身经验过的事实，而对事实赖以产生的原因则不是未曾考虑过，就是到某种神秘的领域中去寻找。在思想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正如在对杠杆进行科学研究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在实践中运用它了一样，我们的远祖根据自身的经验早就知道了群众运动的奥妙并在实践中加以利用。军人可能最早注意到了群氓具有一种不可遏止的要想模仿某种突出榜样的趋向。在战争史上有许多关于在榜样的积极影响下人们惊恐万状或表现出集体大勇的轶事。可能写军事题材

的作家们(我无缘与之相识)已经以某种方式对这类事实进行了加工整理;特别是写军事题材的老作家们,他们出自需要除了注意改进了的杀人工具之外,本应比目前的作家们更多地考虑人的有生力量,人的心理。但是同群氓打交道的其他各类实际活动家,包括宣传鼓动员、演说家、传教士、教育家,他们从来都是多少有点下意识地又有点自觉地掌握并运用了影响群氓的秘密,尽管这种秘密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个谜。但是一切都只不过是实践、艺术、机敏、本人的本领和手腕,而不是科学。

二

科学之宫虽然雄伟,但其中有过多的独立门庭,每个门庭都有自己特殊的、专门的一套教仪,而对别的门庭的所作所为则不闻不问。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科学获得了广泛的综合性的发展,因而大大削弱了各个门庭的独立性。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各个知识领域进行真正合作的理想地步。如果需要证据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

生活实践证明,往往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人们去模仿他人。例如,每个人都知道:有时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禁不住要打哈欠,见到别人笑,自己也禁不住要笑,见到别人落泪,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几乎是不可抑制的愿望,想要模仿处于某种状态的人,例如,模仿走钢丝绳的技巧演员的姿势。最后,每个人哪怕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也知道,单独一个人和置身于群众中的一个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其差别之大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虽然你对一个人了如指掌,但是如果仅仅根据你的了解,无论如何也无法预言,这个人在突出的榜样的积极影响下将如何行动。帕纳也夫在关于1831年军屯士兵暴动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争夺索柯洛夫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戴着几道荣誉袖章的军士，他伏在台阶上放声大哭，我问他哭什么？他指着索柯洛夫回答说：‘这是怎么搞的啊！人们要打死的不是指挥官，而是我的父亲啊！’我对他说，与其躲在一旁哭，不如走过去努力劝说军屯士兵把索柯洛夫留给我。于是他便跑过去了。但是没过一两分钟，当我同几个军屯士兵冲过去援救索柯洛夫时，我看到，正是那位军士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正在打他。‘你这是在干什么！不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吗？他不是指挥官，而是你的父亲！’他回答说：‘眼下和刚才不一样了，阁下，您瞧，大伙都在打，我干么要一边站着呢？’”（《1831年的军屯户暴动。目击者的记述和回忆》，1870年圣彼得堡版第82页）

无论这件事乍看上去是多么惊人，但是我想，每个人在自己的回忆中都能找到某种类似的情况。当然，不一定是流血事件。这里所说的类似情况仅仅是指单独一个人和置身于群众中的一个人是何等的不同，是指榜样具有压倒一切的作用。不久前发生的反犹暴行中当然也有许多类似的场面。最后，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模仿别人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且不说孩子，孩子喜欢“盲目模仿”，是人所共知的；也不说时髦，时髦可以风靡一时，就连毫不相干的人也被卷入，也不说不甘人后的虚荣心等等。但是只须注意这样一个每每出现的事实：人们如果同一个具有独特讲话才能的人交往，便会不自觉地学他讲话的姿态，甚至他惯用的手势。榜样所起的这种缓慢的、逐步的、经常性的而不是一瞬间的作用，可用以解释下面这个极其常见的生活悲剧：你心爱的一个人接受了某人的下流影响，而你却一直蒙在鼓里，有一天，你终于可怕地发现，下流已经浸透了他的全身。当然，这时劝说、开导、教育也能起到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作用往往极为有限；而直接、经常起主要作用的，却是下流的榜样。当然，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所以

明智的父母都懂得,对孩子们说来,最好的教育就是让他们随时随地都接触好的榜样。

如果说这类事实非常普遍,那么显然,至少某些科学领域已经不可能不对某些特殊情况加以注意。

米特迈尔(从科研、立法和实验的结果看死刑)反对死刑的论据之一是:“经验表明,死刑往往对观众起极坏影响,它鼓励观众亲自去杀人。”看来,这方面还包括米特迈尔所列举的下列一些事实,“在英国,一次处决了一名制造伪钞的犯人,并由他的亲属领走他的尸体,但是后来警察发现,他的亲属竟然往死人的嘴里藏伪钞……波士顿在长时期没有执行死刑之后,一次处决了一名纵火犯,在那之后,波士顿及其郊区的纵火案件便增加了。调查结果表明,后来的一些纵火犯都是上述死刑的目击者……布里斯托尔的一位神甫罗伯特证实,在为之作过刑前祈祷的一百六十七名犯人当中,有一百六十一人曾是死刑的目击者。”

这位俄国罪行调查学家还说:“人是喜爱模仿的。执行死刑能使人产生这方面的能力,使人通过活生生的实例而习惯于流血。于是人们便逐步摆脱由于流血而引起的自发的恐怖感而代之以对人,对人的生命的冷漠无情,见到残酷的场面也变得残酷无情而不为所动。在法国革命时期,断头台成了普通的室内装饰品。沃尔尼说,他在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年在法国旅行时见到孩子们作游戏,模仿当时的法庭,把猫插在木橛子上和把小鸟斩首。荷兰在采用断头台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样一来,死刑就成了教人野蛮和残忍的学校。什拉捷尔指出,在断送罪犯肉体生命的同时,也断送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死刑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人们普遍变得残忍上,而且也是引起新的凶杀的直接原因。以死刑形式出现的流血可以促进杀人狂。为了证实这一点,精神病学家们收集了无数确凿的事实。一个男人看到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看处决

杀人犯，便产生了一种也想充当类似场面中英雄的愿望，从而去杀人……在处决马尼诺夫的次日，一名少女把刀子刺进了另外一名少女的心房，说是她希望见到另外那名少女心脏流出的鲜血，哪怕是遭到和马尼诺夫同样的命运。1863年在查塔姆绞死了一名杀人犯布尔贡（许多人都说，他精神失常）。几周后在同一城市，有一名无辜的孩子被杀害；罪犯一再说，他想尝尝被绞死的滋味。死刑在利物浦所起的败坏人们心灵的作用则更为明显。1863年有两个人因凶杀而被处死刑。尔后的一次开庭审判中有十一人被指控犯有同样罪行，其中有四人被处死刑，执行时有十万观众，之后，几个月当中接二连三发生的凶杀案，竟达三倍之多。在伦敦及其郊区，在处决米勒（对他的审讯曾轰动整个欧洲）前后发生了数起凶杀及杀人未遂案。有些凶手还直接提到米勒的名字。”（基斯嘉科夫斯基《死刑的研究》，1867年基辅版）

在过去的刑事犯罪的记录中有许多这样的事例。但是罪行调查学家研究更多的是如何判刑，而不是产生罪行的根源，他们引用上述事例仅仅是把它作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论据。他们并不研究现象本身，而仅仅指出这种现象，对这种现象的意义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可以说，这种现象被科学遗忘了，因为它未经专家们研究过，所以其他方面的专家对于在其他领域碰到的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同一个问题，即模仿和榜样问题几乎仍然是一无所知。

但是有一种现象，部分属于刑法学的范畴，部分又远远超出了刑法学的范畴，可能正是由于它介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科学之间，可能是由于它本身的性质既严重又可悲，因而在我们感兴趣的方面受到了较多的研究。我指的是自杀。在这方面，榜样和模仿无疑是起作用的。古代人便已知道了这一点。例如，普卢塔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故事：米利都的少女们得了一种奇怪的自杀流行病。不幸的少女一个接着一个地自杀了，看不出有任何原因。在自杀

行为上进行模仿,有时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同第一次的自杀行为发生在同一环境,同一地点,并且使用同一工具。1772年在巴黎残废收容所的大门口,有一名士兵吊死。结果出现了十五名模仿者,他们都是在同一地点,甚至是使用同一吊钩吊死的。在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有一名士兵在放哨时持枪自杀,从那之后,那个哨所便成了自杀的理想地点,直到最后被一把火烧光为止。大家都知道,歌德笔下的维特引起了自杀流行,所以史达尔女士指出,任何一个最漂亮的女人也未能象维特那样使那么多的人自杀,她的这些话或许不无道理。连歌德本人也对此感到吃惊,于是便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种版本的封面上印了如下一段题词:“请看,他离开躯壳的灵魂在向你示意: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一位患忧郁症的英国人跳进维苏威火山口。而在这位寂寞的勋爵的同胞中模仿他并同样用这种奇特方式结束生命的也不乏其人。

然而,我们不准备一一列举这样的事例,免得占用过多的篇幅。精神病学家很久以前就认为自杀有传染性。埃斯基罗尔(《各类精神病》,1838年巴黎版)就曾写道:“人类的朋友应当要求禁止报纸报道各类自杀事件的动机和细节。频繁地接触这类消息会使人们对死的念头习以为常,并对自愿的死处之泰然。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事例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报纸的某个读者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朋友或熟人自杀的事,也许本人也不致于自杀。”显然,我引用了这位知名的精神病学家讲的这些话,并不是用以回顾当时的时评,而是为了表明,科学的某个领域在很久以前就非常懂得榜样的重要意义。另外一位法国精神病学家写道:“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自杀很容易变为流行病,自杀的念头会通过精神感染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这种精神上的感染力,正如某些疾病的传染性一样,无疑是存在的……某种神秘的欲望,如同万能的本能一样正在出现,它促使我们几乎是下意识地重复我们目击的,对我

们的思想感情起了强烈影响的行为。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每个人都会有亲身的感受。巴汝奇的故事^①的寓意是永恒的。”（利尔《论自杀》，1856年巴黎版，以及布里哀·德·布瓦蒙《自杀与自杀狂》，1865年巴黎版，重点见232页以后。）

为了进一步叙述的方便，我们想提前谈一下制止某些自杀流行病的一些有趣的因素。用普卢塔克的话来说，无论是双亲的眼泪，也无论是朋友的安慰，都未能制止米利都少女们的自杀。但是关于把自杀者赤身裸体示众的法律一经公布，自杀事件便立刻停止了。1772年，当把具有神秘吸引力的吊钩摘掉并且在钉吊钩的墙对面开了一个窗口之后，巴黎残废收容院里的自杀事件也停止了。1802年，当时的第一执政拿破仑给军队下了一道明白无误的命令之后，便制止住了自杀在士兵中的流行。那道命令的内容是：“士兵必须善于战胜痛苦和忧郁，谁能够忍耐内心的痛苦，谁就显示出，他具有同在敌人的大炮轰击下岿然不动的人一样的那种勇敢。毫无抵抗地沉湎于忧愁，就等于在未取胜的情况下离开战场。”

生命对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旦有人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理由大概是很充足的。同自杀者用以结束自己无法继续的生命的毒药相比，无论是把赤裸的少女尸体示众也好，或是说一些过分赞扬军人勇敢精神的话也好，以及那个最适于上吊的铁钩是否存在，这一切似乎都算不了什么，然而实际上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其中的奥秘何在，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事却表明，在

^① 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第4卷的一个情节，巴汝奇同一个与他搭乘同一只船的卖羊人吵了一架，然后向这个卖羊人买了一头名叫罗班的羊，并把它推到水里，于是整个羊群都跟着跳下了水。——编者注

上面的两起事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正是模仿，而不是米利都少女和拿破仑士兵对生活极端不满这个共同原因。毫无疑问，共同的原因应当是有的，既然人们上吊，可见，他们生活得不愉快。但这种不满仍然没有超过残废收容所大门上是否有吊钩的诱惑力。吊钩，正是这个吊钩以神秘的力量吸引了心情沉重而忧伤的人们。而一旦吊钩被摘掉，沉痛和忧伤也就变为可以忍受的了。拿破仑士兵和米利都少女的生活条件却丝毫没有变化。诚然，读者能够发现，在这些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面前，模仿的力量也已相形见绌。但对此我却只能表示异议，因为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些小事却压倒了巨大的内心痛苦。然而，这样一些小事能够煞住了自杀流行的答案是可以找到的，这一点读者将会在下文中看到。

总之，人们早已发现并且深信，在死刑和自杀的问题上，模仿起了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对现象的解释，而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实际上，就是拉伯雷在三百多年前讲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带头羊无论走到哪里，羊群总是跟在它的后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力量，推动人们去模仿。这种力量乍看上去变化多端，因为受这种力量支配的人，有时会模仿刽子手，也就是说，去杀人，也有时会模仿死刑犯（这方面的例子，除了上述的几个之外，在政治犯当中尤其常见），其次，这种神秘力量的作用，有时却由于遇到一些微不足道的障碍而突然消失。这就是全部情况。而英雄和群氓之间的关系，“带头羊”和它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的神秘却仍然完全是个谜。我们对内心感染的过程本身以及对其发展的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依然一无所知。我们看到的是某种明显的，同时又是神秘的现象，而大部分人暂时还把这类现象当作怪事：这玩意儿虽然有趣，但毕竟是“玩意儿”，没有多大意义。一种现象如果普遍存在，人们就会对它持这种态度。没有一个人在他自己生长的地方，即在人们每天见到他的地方，在日

常情况下能够成为先知。模仿的力量也是一样。正因为它无处不在,表现在无数日常的小事上,所以也就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而当这种力量表现得很尖锐突出时,就会成为怪事,成为种种有趣的偶然现象的某种巧合。当然,学者们则持另外一种态度。他们至少是为了实际需要或为了装成好学而积累事实,有时还试图加以解释。

关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各种不同的科学领域都积累了大量事实,以致使我感到为难:这篇文章应朝着哪个方向继续写下去。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转向动物学和精神病学,也可以转向文化史,也可以转向心理学和生理学。然而,不管是转向哪一门科学,结果都是一样,只会得到一座“结构松散的”建筑物——把具有鲜明特色的事实分成几类,对其中一部分作些综合论述,有些则不做任何说明,但无论如何不能来个一揽子的综合论述。而分头叙述又会给行文带来困难。我们姑且试试看吧!

米特迈尔和基斯嘉科夫斯基先生在探索死刑对观众产生极坏影响的理由和证据时本可以再列举下面一些有趣的情况。马勒伯朗士谈到,一位孕妇在观看了一次车裂的死刑并对这一血腥场面感到极度震惊之后生了一个病婴。其四肢骨折的部位刚好就是车轮通过受刑人身体的部位。拉法特也讲过类似的情况,其区别是,处刑时先砍掉犯人的臂膀,而后挖掉犯人的眼睛:在场的一个人孕妇未能坚持看完这一场面,当刽子手的斧头朝犯人的臂膀砍下去的时候,她便立刻张惶失措地逃跑了,几天后她生下了一个无臂的婴儿。

假如上述罪行调查学家在自己的探索过程中碰到这些事实,那么也很有可能根本不予以注意,甚至可能他们知道这些情况或类似的情况,却置之不理。实际上,在充满不可思议的奇事和超自然现象的远古时代,生一个畸形儿就可以构成犯罪。因为它可能

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或者是犯罪的后果和暴怒的上帝所给予的惩罚。在文明的当代，铭记自扫门前雪的罪行调查学家绝不会过问生了一名无臂婴儿的事——这种事不归他管。当由于观看了死刑而引起罪行，罪行又引起惩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罪行调查学家份内的事了。其实，这也不是他份内的事。因为关于自扫门前雪的谚语已经在他的头脑里生根。我们的罪行调查学家如果重视马勒伯朗士和拉法特提到的情况或其他类似的情况，就会为自己关于观看死刑会产生极有害影响的想法找到新的有力的依据。实际上，他们可以不必笼统地谈论腐蚀作用（他们通过同样笼统地谈论感化作用而成功地加以对比），不必羞羞答答地暗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去模仿刽子手或罪犯，而是谈论模仿的力量之大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看过死刑的惨状后留下的印象，作为一种精神因素通过未知的途径可以深入娘胎并使婴儿变为畸形，似乎是使婴儿模仿受刑人。这种现象显然同米特迈尔和基斯嘉科夫斯基先生提供的材料具有同样性质，但其中模仿的力量表现得更具有强制性，因为它简直变成了一种物理过程。对于罪行调查学家来说，这会是一种明确的迹象，说明只要稍微涉足于相邻的，而表面看来可能相距甚远的知识领域，他们便可以在那里找到确实宝贵的指示和证实自己思想的确凿证据。

另一方面，我虽然从马丁（《关于从唐·吉河德时代起至今的恶魔的故事》，1880年巴黎版）那里借用了马勒伯朗士和拉法特讲的故事，但马丁却对之深表怀疑。他以一种很高的但已不是很新的权威的说法为依据，认为孕妇的神经系统受到震动可以机械地反映在婴儿身上，但使母亲思想受到震动的事物同婴儿外表上的一致则是不可思议的。

视觉印象对妊娠的影响早在古代就已为人们所知。至少圣经中关于雅各和拉班定约的故事便是一个明证。雅各请求岳父把将

来生下的全部带斑点的绵羊和山羊仔赏给他作为放牧羊群的酬劳。圣经接着写道：“雅各将杨、杏、枫之柔条，剥皮成文，使条之白间露，置于水槽，群羊来饮之处，与群相对，俾其饮时，牝牡相诱，群羊附条相诱，遂产有纹，有点，有斑之羔。……遇羊之健者相诱，雅各置条水槽，而当其前，使附条相诱，其弱者不置条，于是弱者归拉班，健者归雅各，雅各遂大兴盛。”后来雅各把这说成是上帝对他的特殊恩典，生了带斑点的羊来奖励他雅各的德行。然而，从圣经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这里同上帝的恩典毫无关系，而是雅各巧妙地利用了带白条的树枝对怀胎或交配的母羊视觉的影响，并通过视觉影响带斑点的羊羔的生成：羊羔模仿了树枝的颜色。

至于妇女生下了淡黄色头发的孩子，而孩子的父亲是黑头发，或与此相反。正如俗语所说的：“不象爹，不象娘；倒象过路的少年郎。”这样的趣事不胜枚举。这种现象被说成是由于孕妇在特殊的条件下看到陌生人，看到一幅画或黑人的画像等而产生的印象导致的。持怀疑态度的人则对这类趣事一概嗤之以鼻，认为其原因显然要简单得多。当然，在某个具体情况下，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孩子长得象过路的少年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而且有时这种情况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也有时和过路的少年毫无瓜葛。例如，一个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女婴，在她的胸部有一个革命象征的图像——弗利基亚帽，为此当时的法国政府指令发给母亲赡养费。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过路的少年，而在于母亲的精神生活，在于她内心中经常闪现的弗利基亚帽。

马丁也同他所依据的老权威一样，并不否认有这样的事，但是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偶然的巧合，是命运在捉弄人。例如，他对马勒伯朗士和拉法特列举的事实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假如他能注意到米特迈尔和基斯嘉科夫斯基先生提供的一些事实，或许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另外的看法。这些事实表明，死刑的场面同

群众的心情之间存在着一致关系。但为什么这种一致的关系却仅限于此呢？谁能知道精神从哪里结束，而肉体又从哪里开始呢？

然而，马丁作为一名医生，除此之外，本可以找到有分量的依据，表明想象力和注意力这样一些精神因素在生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能使躯体去从事模仿，所以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论及。现在我们先来谈一谈，看来同以上所述毫无共同之处的一类现象。

三

贝茨（《亚马孙河上的博物学家》）第一个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名之为“拟态”。后来华莱士在其名著《自然选择》一书中，对这类事实作了全面的研究和解释。

北极熊是唯一的白色的熊，并且永远生活在长年的冰天雪地之中。北极狐、白鼬和兔子一到冬季便披上一层白毛。美洲的北极兔，常年生活在雪地里，常年是白色的。雪鸮、北极隼和白枭也都居住在北极地区而且也是白色的。雪鸟在冬天是白色的，到了夏天则变成了同它经常出没的地方的长满地衣的石头一样的颜色。动物的颜色同它的隐匿处或其日常生活的环境的颜色相一致的现象极为普遍。这里举几个例子：“南美的夜鹰一般生活在内格罗河上游的小岩岛上，它的颜色非常浅并且和沙石的颜色很难区别，只有踩到它的时候才能发现。”“雷斯特发现……林鸽停在它喜爱的杉树枝上时几乎是看不见的，然而，如果它落在叶子颜色较浅的树上，就可以通过它那蓝色和雪青色的羽毛而很快地发现它。同样红鹳习惯于落在稍带红色的枯叶上，它那红色的胸脯和枯叶的颜色很相近，而它那褐色的背部则与树枝的颜色无多大差别。”在北美有一种蛙往往伏在布满青苔的岩壁上，蛙的颜色同它们非常相似，以至只有当蛙移动的时候才能发现它。某些扁平的鱼，例

如，比目鱼和虹鱼，它们的颜色同它们平时栖息处的泥沙一样。然而，我们研究的这种现象中最惊人的例子是在昆虫方面，例如，华莱士一次在谈到马来亚有一种和枯叶非常相象的蝴蝶时指出：“这种蝴蝶一般都生活在枯木丛中，飞得很快。它们从不落到花朵或绿叶上，却时常隐没在枯树上。在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寻找而一无所获之后，它却突然从枯树上飞起。有时它从我们经过仔细观察也未能发现它的地方飞起，然后又在离我们二三十步的地方失踪。我曾经有两三次，在这种昆虫悠然停落在那里的时候发现了它，因此可以证实，这种昆虫酷似枯叶。这种蝴蝶一般落在垂直生长的树枝上，两翼紧紧地并在一起，把头和触须隐藏在其间。后翅尾突拖到树枝上，象是叶柄一样，用中间一对小爪附在树枝上。这对小爪非常纤细，几乎看不见。翅膀的不规则外形很象起皱的树叶。由此可见，为了实现最全面的模仿，这里的一切，——大小、颜色、形状和习惯结合在一起了。”“安德鲁·默里先生发现，天蚕蛾的幼虫和它吃食的带石南的幼芽很相象，天蚕蛾遍身的粉红色斑点很象带石南的花蕾和花。”“许多直翅昆虫、飞蝗、螽斯、蟋蟀的颜色，一般都同其栖身的土壤和植物相适应。它们在这方面是最有趣的类群。生长在热带地区的螳螂科和螽斯科昆虫，大部分都带有同它们栖身的树叶一样的色斑，其中有些昆虫的翅脉甚至同叶脉一样。叶蝗尤其具有这种特殊的适应本领。这种昆虫所以被称作‘能行走的树叶’，是因为它们的翅、肢形状很特殊，呈扁平状展开，即使仔细观察，也难以把这种昆虫同它当作食物的树叶区别开来。这种昆虫属于竹节虫科，即所谓‘乱真虫’科，这一科的昆虫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模仿能力。其中有许多种昆虫被称做‘活动树枝’，并且确实与之非常相似。有些长约一英尺，粗一指。从颜色、形状、粗糙的表面，头、足、触角的结构来看，它们和干树枝一模一样。它们平时挂在林中的灌木上，并且有一种奇怪的习惯：足肢向四方伸

展,尤其能够以假乱真。”

以上种种模仿的现象,固属奇怪,但有些与之近似的事实则尤为惊人。这就是,有时一种动物模仿另外一种动物,重现它的颜色、形状和四肢的大小。

南美有一种蝴蝶——长翅蝶,数量很多,很美丽,也很醒目。但飞翔的本领不太好,尽管如此,无论食虫的鸟类,蜥蜴,还是食虫蝇都不敢触动它们。它们靠一种奇臭和相应的味道来保卫自己,使昆虫的许多敌人打消向长翅蝶袭击的念头。于是这种幸运儿就成了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科的蝴蝶模仿的对象。例如,巴西异粉蝶所属的那一科同长翅蝶科相差甚远,“昆虫学家根据附节的构造就能很容易地把它们区别开来,正如根据颅骨或牙齿的形状把熊和水牛区别开来一样”。然而,巴西异粉蝶的外表模仿长翅蝶真是到了维妙维肖的地步(“不仅再现它的每条斑纹、每个斑点、每种色彩,而且再现它的透明度”),以致昆虫学家有时都要特别小心才能区别它们。巴西异粉蝶在外表上模仿散发奇臭的长翅蝶,便可以逃避危险。“似乎是为了从这种模仿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巴西异粉蝶甚至改变了自身的习性。它们经常到自己模仿对象的去处,作同样的飞行。”模仿长翅蝶的并不仅仅是巴西异粉蝶。有趣的是,长翅蝶科的某些类群模仿同科的另外一些类群。而且在蝴蝶当中长翅蝶也并不是唯一被模仿的对象。最后,还有一些蝴蝶,模仿的却是根本不同类的昆虫,主要是模仿蜜蜂和黄蜂。其他的昆虫也有自己模仿的对象。例如,有一种直翅昆虫逼真地模仿一种斑蝥科的甲虫,“就连韦斯特伍德教授这样老练的昆虫学家也把这两种昆虫长期和蝥斯类放在一起,作为标本,而未察觉自己的错误。”脊椎动物模仿其他动物的现象要少得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例如,某些无毒蛇就模仿毒蛇等等。

华莱士在总括上述现象时说:“可以说,它们是一些演员,是一

些为了玩弄某种鬼把戏而乔装打扮起来的灵活机智的滑稽演员，或者是一些尽量装作社会上达官显贵的骗子。这种奇怪的乔装改扮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说大自然竟然从事欺骗和伪装吗？不是的。大自然的原则是非常严格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其效益。一种动物同另外一种动物相似，以及这种动物同树叶、树皮、沙土相似，这两种现象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敌人是不会袭击树叶或树皮的，因此在这里伪装是一种防护措施。第一种情况也是一样：敌人既然由于种种原因不捕捉作为模仿对象的动物，当然也就不会触动其模仿者，显然，后者正是为了自身安全而利用了这一点。”

最后一段话已经部分地解释了奇怪的模仿或拟态现象。这一解释同华莱士、达尔文理论的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任何一种拟态现象都不过是一种特殊的通过代代相传而稳定下来的适应能力，而产生这种适应能力的过程也正如在其他情况下产生物种特征一样：先是偶然在外貌上发生某种有益的轻微的变化，然后，由于有益而经过自然选择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例如：一种动物的颜色发生了轻微的变化，使它接近于周围土壤的颜色，于是具有这种特征的动物，由于比自己的同类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不受袭击而有更多的机会保全下来并繁衍后代。如果在一种动物的身上出现了某种特点，使它在形状和大小方面有些近乎另外一类截然不同的动物，例如具有一股臭味或其他某种特性，能保卫自己免遭袭击的动物，那么这种防卫的本领也将会传给第一种动物。

我们将不准备谈那些反对上述解释的意见，因为华莱士已经作了比较中肯的批驳。我们也不准备谈那些数不清的有关拟态的一个个具体的情况，因为对此人们已经作过比较透彻的研究。很可能上述事实中的大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按贝特斯、华莱士和达尔文提出的见解来加以解释的。但是他们的解释也未必能说

就是非常全面、尽善尽美、完全无可非议的。

反对这种解释的首先就是反对所谓达尔文理论基础的那种意见，这种意见由来已久，而且老实说，至今尚无人能彻底驳倒。根据达尔文的理论，物种特征是世代代发生微小的、缓慢的变化的结果。如果说，巴西异粉蝶能如此维妙维肖地，并且主要是能如此全面地模仿长翅蝶，再现后者的每条斑纹、每个斑点、每种色彩和透明度、一切习性等等，那么就很难设想，这种相似是逐步形成的。如果说开始时是偶然出现了一些相似的斑点，那么这种微小的相似之处，是不能骗过敌人的，因之对巴西异粉蝶说来也起不了防卫作用；有了这样一些斑点比之其他的巴西异粉蝶并没有增加繁衍后代的机会。如果说有了这种微小的相似之处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还要让它进一步发展。最后，如果说，拟态型及其一切细微特征方面的模仿都是突然出现的，那么，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这几乎是无法解释的奇迹。当然，既然有了模仿型，要对它的生存、发展进行解释是很简单的。但是，人们会问，它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假定，在某时某地，除了其他种种偶然性之外，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独特的偶然性：蝴蝶同枯叶，甲虫的颜色同它所处环境的颜色，一种动物的颜色、形状和大小同另一种动物的颜色、形状和大小一模一样，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是我们看到，这类现象极为常见，极为普遍，以至出现的奇怪的独特的偶然性之多已经大大超过了奇怪、独特和偶然性这三个概念本身所能容许的范围。有各种各样的畸形人，他们的出现各有其原因，是无数个别的、独特的条件结合在一起的产物。然而，如果说某些反常现象几乎比比皆是，那么，这就已经不是什么反常现象，而是受某种共同规律支配的一些现象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共同规律在支配着拟态现象呢？显然，这并不是适应者生存的规律，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只有当模仿已经完成时，这一规律才能起作用。

在我们谈到的华莱士的那本书的俄文版（译者是瓦格涅尔先生）附录中，读者可以看到华莱士本人的一些想法，暗示对模仿现象可以做完全不同的解释。例如，他在《雌雄异色理论》一文中指出能够影响动物颜色的原因之一是生命活力的大小，神经紧张的程度。华莱士说：“雄体在交配时处于兴奋状态，精力充沛。甚至毛色单一的鸟类也抖动并展开双翼，扬起冠子或凤头，用以表露自己的冲动。很可能冠子、凤头等丛生羽毛首先是用来吓唬敌人，因为它们一般都是在发怒或斗殴的时候才扬起来。最好斗、最勇敢的个体动辄扬冠振翅，力求通过运用而使它们发育并把发育的冠和翅传给后代……这就是说，如果经常扬起并展示出来的那部分羽毛得到了发育，生出了美丽的颜色，那么由于嫉妒或性冲动而振羽亮翅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雄体在彼此竞争时看到了什么样的羽毛最为有效，于是每个雄体都想努力超过自己的对手，正如它们在鸣叫时都拚命想压过对方，有时不惜断送自己的生命。”

当然，有这些内在的心理因素，丝毫也不妨碍外部因素，如地区的特性，自然选择等等所起的作用。如果说雄禽由于嫉妒或性冲动而有意识地(?)发育自己的冠子和凤头，使它们生出美丽的颜色，那么，为什么却不能对拟态现象作类似的解释呢？为什么不能设想，除了外部条件影响模仿之外，自身不自觉地模仿某个对象也起某种作用呢？要是叔本华，就会直接了当地说，北极熊所以是白色的，是因为它想变成白色的，想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不被发觉，巴西异粉蝶想变得和长翅蝶一样，是鉴于后者对敌人有特别的优势。华莱士也可能会作出同样的解释。因为他确信，任何力量都代表意志，这种解释的依据虽然极不可靠，但是却比华莱士现在的理论具有无容置疑的优越性，因为它对上述一类现象作了远为全面的阐述。显然，为了求得全面，付出的代价会很大，但是也不能就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彻底否定内在的心理因素的作用。无

论如何,即使根据最普通的科学原理也可以肯定地说,缓慢的逐渐选择的理论是片面的,还不足以解释拟态现象。只要探讨一下被华莱士搁置一旁的许许多多不自觉模仿的现象就可以确信这一点。但是必须指出,华莱士在《鸟巢的哲学》中自己谈到了“模仿性”,说这是一切动物生来就具有的一种独特的能力。但是华莱士在指出鸟类的鸣叫、鸟巢的建筑以及人类住所的建筑都是这种能力的产物时,甚至不打算提及神秘的拟态现象。

普舍的观察和实验结果表明,至少,某些鱼类和甲壳类动物能够突然改变自己的颜色,使之大体上接近于它们栖息的土壤和水底的颜色。如栖息在沙底的鱼类颜色变浅,而移居暗色水底的鱼类颜色变暗。华莱士也指出了鱼类的颜色与水底颜色相适应的这种现象。他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比目鱼和平滑的虹鱼的颜色和它们平时栖留其上的泥沙完全一样。他还说,生活在五彩缤纷的珊瑚礁之间的鱼类往往也是五光十色,而河鱼即使是在赤道地区的河鱼也很少具有耀眼、醒目的颜色等等。然而普舍的实验证明环境能直接给予极大的影响,以致谈不上要经过世世代代的逐渐的缓慢的选择。土壤的颜色是怎样影响鱼类的颜色的,——这一点普舍通过实验也已弄清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如果说,哲学上有句著名的双关语“人就是他本身”这句话说得有些过于大胆,那么谈到普舍所研究的鱼类,我们就完全可以把上述那句话改为,我们所看到的动物就是动物本身所看到的环境。当普舍剜掉他的鱼的眼睛时,同时也就使它们失去了使自己的颜色适应于土壤颜色的能力。虽然这种变化的奥妙在细节上还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出,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模仿取决于视觉印象的力量。既然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就不是呢?只要不否认自然选择的作用,承认它是使动物一旦变得与隐匿处或日常生活环境的颜色相同的现象能以维持下去的次要因素,那么就

可以设想,这一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即产生雷同因素的作用直接来自视觉印象的力量。

一位崭露头角的作者在解释拟态现象时正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

格莱斯顿早就提醒人们,为了表示某些色彩,荷马的语言殊感贫乏。六十年代末德国语言学家海格尔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他证明,有一些颜色,我们虽然可以非常确切地辨别,但是不仅古希腊语,而且连印度的吠陀经以及圣经使用的语言都无法表示。于是便由此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至少辨别某些颜色的能力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海格尔得出的这个结论,后来,特别是由于马格努斯的努力,竟在达尔文的理论中找到了依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初在科学中占有极显著地位的格莱斯顿和海格尔的观点却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并且应当承认它们在今天已经是过时的了。反对海格尔理论的意见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可以证明动物界很早就具备了辨别颜色的能力。如果说昆虫就已经能很好地辨别浅蓝色和绿色,那么就很难设想人却不能辨认,即使是在产生吠陀经和圣经的时代也一样。其二是可以证明:目前存在的一些野蛮民族确实没有可以用来表示某些颜色的单词,但是却能辨别它们。吠陀经、荷马和圣经语言的贫乏并不能为格莱斯顿和海格尔的理论提供任何根据。由此可见,归根到底,辨别颜色的能力尽管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但是不应到现在的人那里,而应到人类的远祖那里去寻找那些发展阶段。

读者可以在格兰特·阿伦的著作《颜色意识。它的起源和发展。关于比较心理学的论文》,1880年德文版)中看到对上述证据作了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只需提出阿伦那本书的直接目的,以便使读者可以看到,那本书只是间接地谈到了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对象。阿伦非常重视拟态现象,把它看作是证实其主题的论据之

一。阿伦正确地把拟态现象看作是说明低级动物确实具有辨别颜色的能力的证据。阿伦坚持认为靠摄取色彩鲜艳的花果和动物为生的昆虫、鸟类和爬虫类,其颜色也是鲜艳的,并且一般说来,动物的颜色同它平时的食物的颜色是一致的。但是他认为,这种一致现象的范围要更广,也就是说,不仅食物的颜色,而且整个环境的颜色都对动物的外表有影响。至于这种一致现象的原因,阿伦则根据达尔文理论的基本论点去探索。他认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原理就足以解释这一全过程。但是他在解释这一过程时又增加了一条。他认为,只有初步具备观察鲜艳色彩的爱好,并且在视觉印象的影响下不断培养这种爱好的动物,才能依靠性选择来发育自己身上鲜艳美丽的色彩。尽管辨别颜色的能力和对鲜艳色彩的爱好由来已久,但是这种能力和爱好至少在昆虫身上就非常发达。而后昆虫同植物之间发生了复杂的相互作用。首先,色彩鲜艳的花,由于吸引了昆虫,而比之色彩不鲜艳的花有更多的机会在大地上传播。而色彩鲜艳的花,在维持和发展昆虫对艳色的爱好的同时,也就使色彩鲜艳的品种在生存的斗争中获得更多取胜的机会。结果就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动物的颜色同它的食物的颜色一致,因为大量事实证明,哪里花果鲜艳,那里以摄取花果为生的动物的颜色也鲜艳,相反,哪里环境暗淡,那里动物的颜色也暗淡。这一过程首先是由动物对艳色内在的爱好,其次是由性选择所决定的,与此同时进行的则是人们早已描述过的保护色的形成过程,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讲过了。

阿伦的总的思想扼要地说就是这些。但我们略去了许多有趣的细节。最有趣的,是关于动物同环境颜色一致的一些错综复杂的细节。但是却有许许多多牵强附会的地方。我们现在只举一个例子。阿伦作为一个热心的达尔文主义者,不可能设想组织或外表颜色之类的外部特征的变化能不带来好处,如果发生了变化,那

么就一定对物种有益，并且由于它有实用性而能够确立下来。“如果它是无益的，因此也就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无法解释的。”——这就是阿伦经常采用的论据。例如，他碰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在一只印第安蜥蜴的身上长有三种壁虱，其中每一种壁虱的颜色都与它所附着的蜥蜴身上相应部分的颜色相仿：蜥蜴的腹部是黄色，它上面附着的壁虱也是黄色；头部是褐色，它上面的壁虱也是褐色；第三种壁虱的颜色则是杂色的，与壁虱附着的蜥蜴身上鳞的颜色完全一样。壁虱从这种模仿中得到什么益处呢？一个无需发誓为有益性原则辩护的普通人会说：没有任何益处，——并且努力寻找某种别的答案，但达尔文主义者则无论如何也要从中找到益处，于是阿伦在略经思索之后便断定，可能这种模仿能保护壁虱不受蜥蜴本身或其亲缘的伤害……显然，这是过于牵强附会了，因而不屑一驳。

变色龙本色灰白，但是它视环境颜色的不同，可以变为黄色、褐色、绿色或浅绿色。这种变化的奥妙在于：变色龙的皮下有两层色素细胞，其着色物质为天蓝色和黄色。当皮下肌压迫其中的一层时，变色龙便变为相应的颜色，也就是说，变成天蓝色或黄色，如果同时压迫两层，变色龙则变成绿色。格兰特·阿伦说：“由此可见，变色龙可以使自己与它栖息的枝叶的颜色相适应，这样既是为了免遭敌人的袭击，也是为了迷惑它本身的猎取对象。”毫无疑问，变色龙是从它的组织中得到上述好处的，并且很可能变色龙组织上的特点是通过自然选择而保持下来并得到发展的。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组织上的特点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假定有某种内在的因素，促使变色龙在获得某种视觉印象后便以相应的方式刺激皮下肌。阿伦也承认有这种内在的因素，并把它称作一种对观察鲜艳色彩的爱好，一种满足，一种类似萌芽状态的美的享受。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出飞蛾投火的例

子：螟蛾不断缩小自己围火飞旋的圈子，最后当双眼直接逼近火焰时，便坠入火中。在这里视觉印象直接影响到翅部的活动。螟蛾在绕火飞旋时有什么感受，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但是我们看到毕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由视觉印象激发的。我们看到，这种视觉印象大概反映在机体的一些离得很远的部分上，最后，我们还看到，这已经不是有益性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了。所有这一切也都适用于拟态现象。实际上我们只要想一下，决定与视觉器官有关的反射活动的，并不是昆虫翅部的运动，而是能改变色素细胞排列的皮下肌的运动，那么我们便可以为许多拟态现象找到答案。当然，在这方面也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仍然搞不清，为什么依附在蜥蜴黄色腹部上的壁虱及其视觉神经会因黄色而兴奋，——为什么壁虱本身偏偏是黄色，而不是其他某种颜色，而它的邻居，依附在蜥蜴褐色头部上的壁虱，外表却偏偏是褐色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不能从，至少是不能仅从选择和逐渐适应等外部作用上去找原因，而还应考虑到某种内部的动因。如果考虑到（阿伦几乎不注意这一点），模仿绝不限于改变外表的颜色，因为我们看到，它往往还反映到机体各部分的配置、习惯和生活方式上，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内部动因是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格兰特·阿伦虽然承认内部因素的存在，却把它的重要性淹没在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原理中了。

我担心展现给读者的图画，已使你们眼花缭乱：瓦西卡·安德烈也夫、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米列都少女、拿破仑士兵、雅各的绵羊和山羊、无臂婴儿、长翅蝶和巴西异粉蝶、变色龙……而我们就各式各样的实际材料所作的走马观花式的介绍也还未结束，正如对涉及各门科学的这些材料所作的种种解释的评价还未结束一样。我希望，当我们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时，读者能认识到这五花八门的事实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五花八门中我们才能找到整体，在多

种多样中找到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开“英雄”和“群氓”这两个词所表达的难解之谜。

四

读者想必已经发现，在我们上面引用过的著作，甚至是专门论述自杀的著作（利尔〈布里哀·德·布尔蒙〉）中，在谈论集体自杀时，都把这些事实仅仅看作是精神感染或不自觉模仿的个别现象。自然，读者本来就已听到过一些关于有时可以感染大批群众的精神流行病。

见到过患歇斯底里病女人的每个人都清楚，某些精神病带有流行性，即感染性。在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地歇斯底里发作之后，另外几个女人也随之而发作，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任何痉挛和惊厥现象都能强烈地影响观众并往往引起一连串人的模仿。“痉挛病患者”一词的起源就是一例。事情的由来是：在一位虔诚的冉森教徒的墓前，他的崇拜者中有一个人发生痉挛，这一榜样也感染了别人，两年之后这种痉挛病患者竟达八百人之多。而且作出可怕的抽搐动作的不仅仅是冉森教徒，除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只是偶然见过抽搐的毫不相干的人。同样有趣的是，某些痉挛病患者的姿势先是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后来则处于强直性惊厥状态，他们在四肢的某些部位，即基督有“钉伤的溃疡”的部位出现红肿。也就是说，这些人开始是半自觉地模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后来则受到这种模仿的强烈影响，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创伤。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要详加论述。至于痉挛的感染性（患歇斯底里病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在当代也是不乏其例的。1857年萨瓦（法国）的一个农村里有两名少女突然发病，被当地居民看作是鬼附体。鬼附体也有感染性。到1860年末患这种病的已达一百一十人。被派往当地调查并制止其蔓延

的医生孔斯坦说,有一次当一名少女在一座教堂里发病时,那座教堂在一瞬间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地狱”(孔斯坦《论一场歇斯底里感染病》,1862年巴黎版)。1848年在巴黎的一家国营工厂里也发生过一次事件,当时那里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女工得了痉挛病。布舒把这种现象仅仅归结为模仿。在女修道院和女子寄宿学校中就经常发生类似的事件。过去的贵族女子中学学生都知道,有时只要一个少女大叫一声,整个宿舍不明不白地也跟着叫喊起来。在十五世纪,德国几乎所有的女修道院,以及其他国家的部分修道院都发生了一种有趣的流行病,修女们咬人。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修女们学猫叫。有时这种流行病使大批人被感染,结果在历史上都出了名。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如要详细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去查看一下卡尔美尔(《从病理学、哲学、历史学和法学角度看疯狂》,1844年巴黎版)、海克尔(《中世纪的大规模流行病》,1865年柏林版)等人的经典著作。(俄文书见格泽尔《流行病史》,马纳松译,1867年圣彼得堡版;康金斯基《心理学浅说》,1881年莫斯科版。)在这里我只摘引海克尔的如下一段话:“1374年患有同一种病症的一群男女从德国来到亚瑟,人们在街上和教堂里看到他们手挽着手在跳环舞,并且看上去已经不能控制自己,旁若无人地象发了疯一样一连跳了几个小时,直到疲惫不堪地跌倒在地上,便开始诉说苦闷,呻吟……一个月之后,科伦也出现了这种病,患者达五百人之多,与此同时,据说在梅斯的大街上聚集了一千多人在跳舞。农民撇下了耕犁,工人离开了作坊,主妇抛下了家务,都去参加跳舞,一座富饶的工业城市变成了乱哄哄的舞台。”

总之,在整个中世纪,精神流行病特别多,当时苦行、狂舞、迷信、跳神以及后来的屠杀犹太人、解救圣墓等等,可以说,都曾广为流行并驱使大批大批的人群在欧洲和亚洲到处流浪。参加这种奇怪流动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例如,著

名的少年十字军远征，在德国和法国，有成千上万的人集聚在这帮少年领袖的周围，并且牺牲在前往巴勒斯坦的征途上，自然，读者对这样一些广为流行的现象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准备展开来谈了。但是由于精神感染有时被描绘成一种非比寻常的、近乎怪诞的胡闹行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可以从十六世纪的历史中举出下面一个有趣的事例。米什勒（在《法国史》中）说道：据葡萄牙编年史记载，唐·佩德罗国王因妻子逝世陷于无限悲伤之中，而对音乐和舞蹈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嗜好。在失眠之夜里，有时他走出王宫来到街头，在火炬的照耀下，和着号声跳起舞来。为号声和火光所惊醒的居民也走上街头，并且慢慢地被国王的舞蹈所吸引而入了迷，便也学着他的样子，疯狂地跳起舞来，有时竟通宵达旦。

不久前出版了一本有趣的书《芭蕾舞、芭蕾舞的历史及其在美术中的地位》（巴列托曼著），书中对这种场面做了如下描述：“在那个时代，舞蹈成了一种狂热病，因此，同里斯本街头在公正的唐·佩德罗国王率领下，在火炬的照耀下，和着号声跳起的芭蕾舞相比，关于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舞会上跳芭蕾舞的描述也黯然失色了。”从上面所引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芭蕾舞，有的不过是一种不可克制的要想模仿那位显然有些病态的国王（就象米什勒所说的那样，或者是疯狂，或者是南方的一种娱乐）的愿望。但是，如果说这个时代是指整个中世纪，包括宗教改革初期在内，那么的确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舞蹈成了一种狂热病”。当时除了一般的舞蹈之外，从事特殊形式娱乐活动的人也不比其他历史时期为少。除了各种宗教节日或其他庆祝活动时跳环舞和民间舞外，还有一种真正的舞蹈病，几乎流行全欧洲，折磨人们达数世纪之久。关于舞蹈病即维特舞的消息最早见于十一世纪，最晚见于十六世纪，这种现象主要流行于德国的莱茵河流域。十五世纪意

大利出现了塔伦特病，这也是一种舞蹈病。除此之外，在十三——十六世纪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作“神奇的舞蹈”的病，只有孩子们才会得。在一部古老的编年史中就有如下的一段记载：卡麦伦城有许多老鼠。有位能人答应用笛声把全部老鼠引出城外，并且真的做到了。但事后卡麦伦城的居民竟然食言，拒不给他酬劳，结果捕鼠人狠狠地进行了报复。一天，当城里的居民在教堂进行祈祷时，捕鼠人吹起了魔笛，有一百三十个孩子闻声走出家门。他走在前面，笛声不断，孩子们尾随在后，边行边舞，慢慢地全城的人都跟了上来，结果不知去向，全城只剩下了一个人，后来向人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沃斯《舞蹈和舞蹈的故事》）跳舞在妖妇狂欢夜会上同样也起着重要作用。最后，在十五世纪的法国出现了一种著名的死神舞或马卡布尔舞，以墓地为舞台，加上这种舞所具有的那种阴郁的幽默都证明，舞蹈人决无乐趣可言。

毫无疑问，各式各样的集体痉挛、惊厥以及诸如中世纪的狂舞或战栗教徒、震教徒、我国的教派信徒的狂热跳神等等荒诞的舞蹈，都具有模仿的性质。但是读者可能怀疑象十字军远征或周期性地屠杀犹太人这样一些群众运动产生的原因中会有模仿的因素。看来这些运动是受一定的思想指挥的，并且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动力，它毫无例外地以同样的力量强烈地影响了运动的每个参加者，而与模仿毫不相干。

这种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思想史上最常见的疏忽之一就是当学者在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事物的某一个方面时，便不想或者是不能抓住事物的其他一些方面，至少是不想或者是不能设想事物还存在其他一些方面。研究科学和抽象思维的人几世纪来一直在争论不休，就是因为一部分人只是从上面看事物，而另一部分人只是从下面看事物，或者一部分人只是从右边看事物，而另一部分人只是从左边看事物。看来，承认模仿是群众运动的唯一

动力,对此是不可能毫无保留的。因此,自然任何人也不会直接讲出这样的荒唐话。然而这种荒唐话却很容易悄悄地出现在学术著作中,但不是采取公开表述的形式。例如,伊拉姆说(《思想谬误的传染性》,载《知识》杂志1871年第11期)“在马考莱的《英国史》第4卷中对抢劫和溜门撬锁的流行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马考莱提到了全国性的歉收和缺粮现象”等等,接下去便引用了马考莱的一段话,证明1692年出现了大量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但是,很明显,“全国性的歉收和缺粮现象”本身就足以构成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增加的理由。如果说,在这里榜样的影响起了某些作用,那也是很次要,很次要的。还是那个伊拉姆,在谈到七世纪伊斯兰教取得的成功时,把它说成是思想传播速度快的一个范例,同时列举了取得成功的原因是:穆罕默德节节胜利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心理,新宗教的教规易于执行,新宗教的教义简单易懂,穆罕默德许诺在未来生活中给予的奖励合乎东方民族的口味,基督教徒内部纠纷。这一切当然都是对的。但这里同流行病或“思想谬误的传染性”又有何相干呢?既然如此,那么恐怕也可以把科学真理的传播称为一种流行病了,理由是,这一真理是过去研究工作的成果,并为明显的逻辑证据和直观实验所证实。

然而,如果从伊斯兰教的迅速发展或十字军远征这样一些运动中把模仿的作用排除在外,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中世纪,人们背井离乡,抛下家庭和工作,到处流浪的理由是很多的。从中世纪生活的经济条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中还可以找到中世纪其他各式各样的运动,如邪教徒运动、农民运动、排犹运动等的共同原因。但是还有一些我们目前尚不知道的原因,把人们变成了自动机械,重复某个我们称之为“英雄”的人在他們面前所做的一切。然而读者知道,这种英雄有时可能是真正的英雄,人类的精华和骄傲,有时也可能是疯子或骗子。米什勒援

引一位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同时代人说的一段话：“所罗门说，一群贪得无厌的人，他们当中没有领袖，但是行动起来却井然有序。他的话果然应验了……当时在这群贪得无厌的人当中并没有领袖，作为所有忠实信徒的唯一的领袖、引路人和战斗伙伴是上帝。其中有些人最初根本没有参加远征的愿望，他们嘲笑那些忙着要把自己的财产卖光的人，并且预言这些人此行将会很惨，回来的时候会更惨。一天之后，这些嘲笑人的人突然心血来潮，以很低的价钱卖掉了自己的财产，参加了他们曾嘲笑过的那些人的行列。”这段话非常典型地表达了模仿的力量，它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参加了十字军远征。不过同时代人对于那一伙没有领袖的贪得无厌的人的活动的见解则是完全不妥当的。相反地，“英雄”对于“群氓”来说，可能任何时候都不象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特别是在十字军远征时期那样来得需要。诚然，在某些国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急不可待地盼望“救星”或某个活上帝来领导群氓的时期。但是群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那么至少也十分肯定地表明了他们反对什么，并且暗示给他们殷切期待的英雄。在中世纪经常可以看到群氓处于某种莫名其妙的紧张状态，准备模仿一切，直到跳狂舞，准备服从一切，直到服从于持木棍的军士。

诞生在这里的一百三十名儿童，
跟随着吹笛人不知去向。

同时代人通过这样一些悲痛的语言证实了在卡麦伦所发生的上述事件，毫无疑问，在细节上是有所夸大的。但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任何一位吹笛人都不仅能率领孩子们跟着自己走，当时大批的群众一直在等待着领袖。显然，领袖们，“英雄们”曾不断涌现出来，而群氓则聚集在他们的周围，把他们奉为神明。彼得·普斯特

尼克在他的追随者眼里的的确确就曾是个半人半神，只要他愿意象在他之前和之后许多人那样做，他就能宣布自己是救世主，是新锡安^①的国王等等，并且总是能赢得最值得骄傲的幻想中的尊号，象十二世纪弗兰德的先知唐赫林一样带上王冠，穿上绛色的皇袍，象艾奥·德·斯泰拉一样宣布自己和上帝平起平坐等等。第一次少年十字军远征的首领是牧童斯蒂凡。蜂涌在他华丽的大型马车周围，想哪怕是看上自己的领袖一眼，从他的衣服上取下一根线以便留念的孩子们是如此之多，以致有许多人由于拥挤而丧生。

因此往日一些天真的历史学家也并不全然是不正确的，他们根据自己的艺术力量和才能讲述了具有感召力的贞德怎样拯救了法国，教皇乌尔班和彼得·普斯蒂尼克如何以自己热情激昂的讲话激发了十字军远征，茨维考的狂热的先知们怎样鼓动了农民群众，拿破仑的权欲熏心如何使欧洲浸在血泊之中，等等，等等。当然，这些天真的历史学家对问题的理解是非常狭窄和浅薄的。他们描述了事件的表面经过，而没有研究这些事件的起因，并且满足于在领袖们的名字上加上一些褒贬的修饰语：什么某个肆无忌惮的权欲熏心之徒使人入迷，某个具有感召力的少女鼓舞了人们，某个暴戾的宗教狂信徒鼓动了人们，等等。当然，新型的历史学家的做法要合理得多，他们从某个时期或某个国家一般的文化条件中去寻找各种历史现象的起因。然而，肆无忌惮的权欲熏心之徒确实也曾使人入迷，暴戾的宗教狂信徒也确实鼓动了人们，这是必须予以考虑的事实。因此，我们应当把任何群众运动中一般的条件加以区别，一种是直接影响运动每个参加者的一般条件，另一种是促使他们不自觉地去进行模仿的一般条件。第一种条件，显然会

^① 锡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古代犹太人曾以它作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编者注

是各式各样的。例如，在所谓民族大迁徙时期推动一大群野蛮人从亚洲向欧洲移动的一般条件就同在十字军远征时期一大群欧洲人向亚洲移动的一般条件截然不同。同样，促使聚集在无数伪救世主周围的每个欧洲人行动的经济、政治、道德和思想上的原因，一句话，即各种文化条件的总和，无疑地，并不是吸引了追随穆罕默德的每个阿拉伯人的那些条件，也不是决定了对拿破仑个人着迷的那些条件。但是，显然在这些一般条件中有一股相同的潮流，决定了一切群众运动，不问其起因为何，毫无例外地都具有模仿的性质。这股潮流，在历史上时起（如在中世纪）时伏，的确可以用往日天真的历史学家的话概括为：贪得无厌的权欲熏心之徒吸引了人们，具有感召力的少女鼓舞了人们。只不过这些提法错误地规定现象的重心，因为贪得无厌的权欲熏心之徒和具有感召力的少女往往是一些很渺小的人物，有时就是吹笛人之类的人，因此，问题首先不决定于他们，而决定于追随吹笛人，听其指使的有时简直就是随着他的笛声跳舞的群众。

有时在一般的生活条件中无法抑制的不自觉模仿的力量表现得很突出，以致对这种力量的存在不容有任何怀疑。当然，在病态现象中模仿的力量应当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现在再从卡米扎尔和塞文先知的故事中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次人民运动是由于十七世纪末发生的著名事件——龙骑士镇压新教徒，强使他们改信天主教，并且总的说来是由于加尔文教徒受迫害而引起的。塞文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少都得了一种可怕的兴奋过度症，变得神魂颠倒并且剧烈地抽搐。然后，他们便做神示、布道。然而有趣的是，受到感染的不仅仅是加尔文教徒，连他们的敌人天主教徒，也由于偶然看到他们发病而受到了感染。于是在他们作神示和布道时，便也贯穿了加尔文教义。这也就是说，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了加尔文教徒。榜样的力量粉碎

了他们坚定的信仰，并迫使他们去模仿他们的死敌，直到公开为敌对的原则效劳。显然，促使卡米扎尔起义的原因，由于它具有一种与运动的起因无关的集体狂热的特殊标志而变得更为复杂了。

我要再重复一句：在处于病态的情况下，模仿的力量表现得尤为强烈，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有些现象，在我们不能承认或不打算承认它们分明是处于病态的情况下，模仿的力量就无所表现。恰恰相反，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仔细观察这样一些事实，由于它们本身具备的突出特点而使我们容易通过逻辑推理，把研究对象从它在实际生活中所处的复杂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具休环境中划分出来。根据这种观点，有一种形式的神经病特别有趣，它专门表现为趋向于模仿，而与任何共同的思想或别的目的都毫不相干。这种病被称作舞蹈模仿病。卡申博士在雅库茨克地区对这种病进行了观察。病症是作模仿运动，其中夹杂着抽搐以及病人完全下意识地模仿别人的行为和动作。卡申博士有一次曾目击这种场面。外贝加尔的哥萨克部队第三营某连的一个班，是由当地人组成的，他们在操练的时候不断重复口令。指挥官当然暴跳如雷，又是骂，又是叫喊，做出种种威胁，然而却吃惊地听到，士兵们都在认真地重复他骂人和威胁时讲的话。如果不是由于卡申提出理由，说明士兵的过错与其说是捣蛋，不如说是处于病态，并说服了指挥官的话，这幕奇怪的情景真不知会怎样收场。一般说来，得了这种被当地称作“奥尔金贾症”或“呆痴病”的人总是重复某人在他面前讲的话或做的事。雅库茨克人得的这种病有时又稍有不同：可怜的女人可以执行任何人发出的任何命令。当地青年中的一些坏蛋往往利用了病妇的这种甘愿服从的心理（《法医档案》1868年第2期）。

请读者记住这种形式的变态心理，因为下文还要论及。仅从它表现为纯粹的模仿这一点（以及近乎模仿和服从、恭顺）来说，就

足以引起人们对它的兴趣。

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描述了五花八门的现象,并且稍微提到这种五花八门可以归结为某种人们所未知的唯一的原因。不错,我们看到了达尔文主义者对保护色以及其他拟态现象的某些方面所作的解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或者说,至少是极不完整的,甚至对贝茨、达尔文、华莱士、阿伦专门感兴趣的那一类事实的解释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对于人类历史上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无数五花八门的不自觉地进行模仿的事实,适者生存的理论则根本没有涉及。如果说,一种动物由于模仿另外一种动物的颜色、肢体各部分的配置和生活方式,便可以避开它所受到的灾难的威胁,那么,与此相反,一个人由于模仿刽子手、死刑犯、疯狂跳舞的人、伟人、手执棍棒的军士等等,却往往会走向灾难,甚至直接走向死亡。习惯于达尔文主义的一般方法和论题的读者,可能甚至会不承认能把看上去如此矛盾的各种现象归为一类。但是我们看到了,达尔文主义者自己就承认在模仿中有某些内部因素在起作用,并且有时把它们称作独自的“模仿”能力(华莱士),有时把它们称作审美感的萌芽,对观察鲜艳色彩的爱好(阿伦)。如果阿伦在他的解释中提到这种心理因素时不是那样模棱两可和吞吞吐吐,那么他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讲:对于引起动物特别注意的某个或某些对象的视觉印象可以引起这样一些反射作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使动物变得与观察的对象类似。当然,这并不妨碍适应和遗传的功能,适应和遗传作为次要的因素,在模仿型已经形成之后才起作用。

同意这样的解释,我们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消除达尔文主义者所感兴趣的特殊的拟态现象同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和日常生

活中所看到的模仿的事实之间的(似乎存在的)鸿沟。我们已经看到了视觉印象影响了妇女以及一切雌性怀孕的情况。如果这些情况是绝对可靠的,不容置疑的,那么,它就正好可以用来接上断了的锁链。它们也许甚至能提供超出需要的东西。如果说巴西异粉蝶模仿长翅蝶时再现了后者身上的斑点和外表的特征,那么雅各的绵羊和山羊繁殖的后代则再现了花树枝的颜色。而观看酷刑的孕妇生下的畸形儿却再现了酷刑的细节。遗憾的是,这些情况不完全可靠,而且对它们的看法也不一致。尽管如此,在这类事实中有一些则是绝对可靠的。

六十年代末比利时的一个农村里发生了一个奇迹:有个名叫路易丝·拉托的少女,身上带有圣斑。有一种奇怪的病每逢星期五都要在她身上发作,同时她身上出血,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上的创伤(圣斑),就象圣经里写的和画中画的一样;双脚上和双手上“钉伤的溃瘍”,左胸部带伤。这种事并非首次出现。相反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对它有过详细的记载,但并未做过研究。前面已经提到过,模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姿势的某些痉挛病患者,他们的双脚和双手上出现了红肿。然而,带圣斑的人却在很久以前就听说过,他们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全部从中世纪开始)。第一个带圣斑的人是圣芳济。他不仅与世隔绝,而且最后也摆脱了修士的职责,隐居深山,潜心于祈祷和苦行,因而往往变得神魂颠倒。有一次,当他处于神魂颠倒的状态时,听到了命令他翻开圣经的声音。他翻了三次,三次都是关于基督受难的情况。从这时起,圣芳济的全部思想便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一天又一天地体验着圣经中提到的悲剧。终于一天他产生了幻觉:一位六翼天使从天而降,来到他的面前,手中拿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像。幻觉很快就消失了,但是在这之后,这位圣徒便感到手心和脚掌疼痛,接着就出现了圣斑。这件事发生在1224年。

这样的怪事当然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于是从那时起有过不止一个兴奋过度的人，总想着基督被钉死的地方——各各他^①。再加上教会之间的竞争，结果出现了许许多多身上带圣斑的人，首先是在圣芳济派修士中，后来也在多米尼克派僧团中出现，多米尼克派僧团有他们自己的带圣斑的人——锡安的叶卡特林娜和她的许多模仿者。圣斑的数量也增加了；某些人除了圣芳济的五处伤痕之外又增加了荆冠的创伤，有的人则是模仿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姿势，并且感到剧痛。

当然，在这方面有许多是招摇撞骗。但是也有许多情况是不容怀疑的，因为都是由一些绝对可靠的见证人记述下来的。一些明理的人甚至在很久以前就认为圣斑形成的原因是一种特殊的神经系统失常现象，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最后只有路易丝·拉托受到了认真的，甚至是吹毛求疵的调查。但是学者们从一开始就感到束手无策。微耳和就公开宣布，如果说，这不是欺骗，那么也是一种用科学方法无法解释的怪事。然而所有的调查结果都证明，在这里，至少是在关于因再现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创伤而出血一事上并非欺骗。最后为了进行一次调查曾由科学家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通过调查，委员会认为圣斑无疑是存在的，并把它解释为不自觉模仿的结果。路易丝·拉托是个极其神秘的少女，她过着禁欲主义的生活，经常想着基督受难时的情景。她每逢星期五发病时便觉得自己到了各各他。一想到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在有圣斑的地方先是感到疼痛，接着便出现微肿、发烧、起小泡，最后出血。路易丝·拉托几乎是维妙维肖地模仿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正如巴西异粉蝶模仿长翅蝶等一样。

^① 《圣经》中的地名，原意为骷髅地，是古犹太耶路撒冷的一个刑场，耶稣在该地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编者注

虽然路易丝·拉托身上的圣斑最初曾使科学家们感到有些困惑莫解,但是他们最后提出的解释也不是新的,例如,读者从莫里的《古代和中世纪的巫术和占星术》一书中就可以找到这种解释。该书是在路易丝的奇迹出现以前出版的,其中讲到了在这位奇迹般的比利时少女之前,有些人也有类似的情况,并且直接指出奇迹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无意识的模仿和想象力的深化。这绝不是牵强附会和想入非非。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有临床经验的医生积累了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心理因素可以影响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俄国读者从卡本特尔那里,从达尔文的《论感觉的表现》一书中,以及马纳斯谢英先生的讲稿《论心理影响的作用》中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大量事实。在这里,我只举在某方面与圣斑的形成最近似的几个例子。

由于期望、恐怖和想象,人会在一定的部位感到疼痛。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无需再举例证实。一些大权威肯定,把注意力集中于身体的任何部分,都能引起该部分的疼痛。所谓神经过敏通常仅仅表现于此。至于发肿的现象,我们只举一个不容任何怀疑的情况:母亲看到一个很沉重的框架压伤了儿子一只手的三个手指,她相应的三个手指也立刻发烫、发肿。这个情况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在这里就象翻印一样一丝不差。至于仅仅由于惊惧等而出现肿大,而肿大的部位与引起惊惧的物体之间并没有上面那种固定的关系——这类情况则多得很。心理因素影响血管运动神经系统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就是人具有因害羞、愤怒或自尊心受辱等而发烧的能力。应当指出的是,这种能力仅仅在极有限的范围内。主要是,并且几乎只有脸部,即人体中最能引人注意的部分,才能发烧。从发烧很容易并且往往是在内心受到强烈震动下变为血汗。一般血汗都出现在一定的部位上。例如,“有一位二十五岁的妇女曾由于强烈的内心激动而开始咯血和抽搐,后来只要心

理上一受到震动就重犯。两年之后，又是由于内心受到强烈震动而开始呕吐、肝痛和尿血，机体对任何内心的激动作出上述反映的习惯一直延续了两年。在那之后又出现新的症状：在呕吐发作时面部、颈部、腋窝、前胸和前腹都出现血汗。”另外一位病人是个不到十一岁的小女孩，“由于巨大的悲痛，她流下了血泪，此后在股部、胸部、下眼皮和脸部都开始出现血汗。这种现象总是发生在内心受到某种强烈的震动之后，同时完全丧失了运动的能力和感觉。”

当然，还难以把上面这些例子直接和路易丝·拉托的圣斑联系起来，因为有趣的是出血的部位正好是基督受伤的部位。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母亲发肿的手指正是孩子被压伤的手指。其次，还应当指出下列许多情况，例如一个人只有当他想到某种非常酸的东西时才能分泌出较大量的唾液，在想到某种难吃的食物或药品时感到恶心，或者在想到寒冷时身上会起鸡皮疙瘩，等等。这样一些现象可以作如下的解释：“当我们要把一个酸水果放到嘴里的时候，印象通过味觉神经被送到大脑的某个部分，后者再把神经能传到血管运动神经中枢，然后血管运动神经中枢迫使穿过涎液腺的小动脉的肌膜变软。于是便有更多的血液流向涎液腺，涎液腺则分泌出大量的涎液。完全可以设想，当我们想到某种感觉的时候，感觉神经中枢的这一部分，或与之密切相关的部分便会积极活动起来，正如获得实际印象时的情况一样。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部分脑细胞就应当处于兴奋状态，尽管可能不如我们具体地想象和实际感觉到酸味时那样兴奋。但是无论在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情况下这些脑细胞都将会把神经能传到血管运动神经中枢，产生同样的结果”（达尔文《论感觉的表现》）。现实的雷同能够在机体内引起多么深刻的变化，从列伊科克所讲的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四十八岁的妇女，已经有八年未来月经了。她目击自己女儿难产，由于极度的焦急不安，腹部感到剧痛，接着阴道便

出现带血的分泌物，三天之后，她的乳房出现奶汁（引自马纳斯谢英的著作）。我个人也知道这样一件事：有位妇女生性十分好激动，却很喜爱动物，她负责照管奶牛，一天她心爱的一头母牛行将产犊，为此她彻夜不安，到了第二天早上，她的乳房出现了奶汁。

这里讲的一些情况已经和圣斑的形成非常相近，并且其惊人的程度也不亚于后者。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了不自觉的模仿具有的非比寻常的力量。路易丝·拉托，由于全神贯注于基督蒙难的情景，经常神游各各他，结果使基督的形象在自己的身上生根，在某种程度上自身重演基督经受的苦难，再现钉伤的溃疡和被矛穿透的肋部；母亲由于万分担心自己女儿分娩的结局而对分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分娩时的情景；饲牛的女人由于为奶牛产犊担心，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由于某种原因而引起人的注意的表象，使其感觉运动机制的相应部分不由自主地开始活动，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再现了引起人注意的物体或内心状态。

如果读者将上述种种事实（我有意压缩了它们的数量）加以综合，无疑地便会承认，这些事实互为补充，指出了拟态现象的真正原因。显然，没有必要，甚至也不可能孤立地看待达尔文主义者收集的种种事实并一概用带“保护色”个体的缓慢选择和生存活动来加以解释。只要我们调查一下其他领域的实验和观察所提供的事实，便可得到新的启示，从我们原来料想不到的方面去阐述拟态现象。舍普的实验就已证明，至少在某种情况下，是视觉印象的特性，而不是缓慢选择，决定了动物的颜色同它的环境和隐蔽处相适应。其次，我们还可以碰到一些无论如何不能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的不自觉模仿的例子。最后，我们便会明白，巴西异粉蝶再现长翅蝶的形状、颜色、花斑等一切细节时所遵循的规律，就是使路易丝·拉托的手、脚、左肋上再现创伤的规律。毫无疑问，一种模仿型一经确

立,它就可以作为“被保护的类型”通过自然选择而得到增强,但是它的起源则只能用视觉印象来解释,这种视觉印象则反映在模仿体的颜色和形状上。根据这种观点,兔子、北极狐、白鼬、雪鸟到冬季改变颜色,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祖先在某个时候获得了这一特性。这一特性,确实是它们的祖先获得的,但并不是偶然获得的,而是由于一望无际的雪原对视觉影响的结果,而且这种换装的本领,除了代代遗传下来之外,每经一个冬季都有所增强。

根据这个观点,显然,集体狂想症和精神流行病的种种现象也应当有自己的答案。

顺便指出,优美的艺术的任务是影响观众、读者和听众的想象力,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亲身体验所描绘的情景或心理因素。这一点,大画家是可以做到的。而大演说家和传教士,因为他们主要是影响人们的感情,而不是理智,所以在这方面能收到更大的效果。他们能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听众受到自己个人情绪的感染,甚至把自己提供的形象和画面当作此时此地存在着的某种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实物。在这里仅从成千的例子中举一个为证。著名的美以美教派传教士维特菲尔德往往在演讲时声泪俱下,而成千的,有时是成万的听众望着他,也跟着落泪。哈里克证实,维特菲尔德在说“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词的时候,他的表情能使全场泣不成声。一次在美国,维特菲尔德在向水手们传道时便运用了他的演说术:“孩子们!”——他象往常那样,兴致勃勃地用力作着手势:“孩子们!我们乘和风出海,现在海岸已经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可是为什么天空突然变暗?为什么那边,在西方出现乌云?等一等!你们听到远方雷鸣了吗?看到耀眼的闪电了吗?暴风雨来了!各就各位!起浪了,浪涛拍打着船舷!周围一片漆黑!暴风雨来了!我们的船桅断了,船向一边倒了!怎么办?”——“救生艇,救生艇!放救生艇!”——焦急万分的听众们喊着回答(见勒基

《美以美教派发展史及其特征》，1880年莱比锡版）。正如读者看到的那样，维特菲尔德描绘的暴风雨的画面相当贫乏。但是既然连多次见识过真正暴风雨的水手们都这样象身临其境地来到船舶遇难的现场，而充满了危险感，那就是说，维特菲尔德把这场悲剧的主观方面——处境的危险烘托得尤为有力。水手们不由自主地模仿了传教士，而传教士也为自己描绘的情景所激动而模仿了一个人对翻船的恐怖。从想象力异常紧张的活动来看，这两种不由自主的模仿过程同圣斑的形成以及人的生理对想象力的反应过程很相似。正如当我们想到某种酸东西的时候，有时就会增加唾液分泌一样，水手们为维特菲尔德的话所打动，一想到翻船就感到焦急万分，当然在生理上也就出现了相应的症候，如心搏过速等等。从另一方面来说，上述整个情况不过是精神感染的一个实例：一旦最敏感的，或者说，感情上一拍即合的水手感到焦急万分并且在神态上表露出来，其余的水手便产生了两三倍、甚至十倍的冲动去进行模仿。

埃斯皮纳斯（《生物社会。比较心理学的研究》，1880年巴黎第2版）对这种感染过程作了非常具体的论述。他在谈到黄蜂的时候，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担任警卫的黄蜂以什么方式向自己的伙伴们报警。而这个问题又促使他考虑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例如，愤怒是以什么方式从某个个体传给另外某个个体的？埃斯皮纳斯回答说，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视觉印象，通过对愤怒个体的观察。激动的黄蜂会以特殊的方式发出嗡嗡声，并且一般都是非常积极地表达自己意识状况。其他的黄蜂可以听出这种特定的声音，而且只要它们一想象到这种声音，其神经系统中的相应部分便开始兴奋，这时它们自己也发出同样的嗡嗡声。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想象到某个动作就可以引起做这个动作。例如，一只狗，如果在它面前放一块肉，它就会不断地舔自己的双唇，分泌唾

液,就象是肉已经进了口一样。又例如,孩子或野人在讲到某件事的时候必然是连比带划,或者是不由自主地模仿自己所讲的故事中的人物。一定的形象必然在我们身上引起相应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只有中枢器官的命令才能加以抑制。思想集中的程度越差,就越容易做这样的动作。我们的黄蜂在看到它们的伙伴围着蜂房飞进飞出,嗡嗡叫——一句话,表示愤怒和不安的时候,自己也开始飞出蜂房,表示不安。但这并不是假装的,而是真正的愤怒。某种感情的积极表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激发别人同样的感情。例如,当演员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台词和动作时,思想就能入境。例如,把击剑作为消遣的人却能体验到某种类似真正决斗的感情。例如,猴子、猫、狗开始是斗着玩,模仿打架,结果却真地干了起来。黄蜂的情况也是一样。可见,整个过程的秘密就在于:一只以特殊的方式发出嗡嗡的声音,并且不安地运动着的黄蜂激起看到这一现象的黄蜂们神经中枢的活动,于是它们自己也同样开始不安起来,而愤怒的表露最后一下子引起整个蜂群的真正愤怒。

此外,这种愤怒的激烈程度还将与黄蜂的数量成正比。假定有位演说家,面对着三百人的集会发表演说,又假定他的激动心情可以用数字10来表示,而当他辩才初露的时候,至少把自己激动心情的一半传达给三百个听众中的每个人,而每个听众则通过鼓掌或注意聆听来表示这一点,这时在每个人的姿态和面部表情上将呈现出某些紧张。于是在场的每个听众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心情激动的演说家一人,而且还有许许多多聚精会神或心情激动的听众。这种场面又会加强所谓的议会中的“轰动”(sensation)。假定每个听众能获得激动的群情之半,那时他的激动心情就不能用5,而是要用 $750(2\frac{1}{2} \times 300)$ 来表示。至于引起群情激动的这位演说家本人,则甚至完全被激动的洪流弄得不知所措,正如一些初出茅庐的演说家所常常遇到的情况一样。当然,实际上激动

心情的发展不可能这样快，因为并不是三百个听众中的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座位上看到二百九十九个激动的听众。但整个过程的一般规律毕竟就是这样。

这样一来，我们在圣斑的形成以及想象力影响动植物生命的其他惊人现象中就找到了拟态现象和模仿现象（表现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和历史上以及精神病学上记载的精神流行病中）之间的过渡阶段。使听众达到如痴如醉地步的演说家的例子代表了从单独地模仿基督、死刑犯、刽子手、产妇等等向群众运动的过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感染现象本身。如果说读者埋怨我的论述有些杂乱无章，那么我就要以本文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资料五花八门为理由而请读者原谅。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万花筒，无论你怎样旋转，它都能提供出一幅五花八门、但又永远是规则的、同心的星状图像。上述事实，有的引自日常生活，有的引自不同的科学领域，尽管它们五花八门，但它们每一类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不自觉的或不由自主的模仿。如果读者能象我所希望的那样，确信这种心理上的动力具有非凡的力量并且可以传播，那么我们剩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条件问题了：在什么条件下才有或者才没有模仿的意向，在什么条件下这种意向才能出现或消失，在什么条件下这种意向表现得强烈或淡薄，因而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会形成我们所谓的“群氓”——顺从的人群，他们准备追随“英雄”到任何地方去并且正在痛苦、紧张、茫然地期待着英雄的出现。

六

“群氓”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他们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模仿愿望的秘密何在？决定这种愿望的是他们的道德品质，还是思想或其他特点？

如果说我们向专门评论这个问题的人提出上述问题，得到的答案必然是众说纷纭，并且充满矛盾。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么是亚当·斯密第一个给予模仿现象以足够的注意并且在自己的《道义感理论》中着重加以论述的。他从最基本的事实开始，并且以最基本的事实结束。他说：“我们对别人痛苦的敏感性来自我们设身处地的想象他们的遭遇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想象到他们的感觉并体验到他们的感受。当我们看到一刀刺向某人的手脚时，我们也自然而然地缩回自己的手脚，如果一刀刺中了，我们也会在受刺人真正受刺的同时似有同感。当人们观看走钢丝演员的表演时，自己的身体也随着他左右摇摆，仿佛感觉到如果自己走在钢丝上也一定会这样做。体格孱弱、神经脆弱的人看到街头某些乞丐袒露伤口时便会说，自己身体的相应部位也感到疼痛。最健壮的人说，当他们看到充满痛苦的眼睛时，自己的眼睛也感到疼痛……能在我们的内心激起同情心的，不仅仅是使人感到痛苦或沉重感的环境。一个处于某种状态的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感受，另外一个细心的目击者只要一看到他就会立刻同他一样激动……有时只要对别人的感受看上一眼就直接产生共鸣。看来，狂热也往往可以在一瞬间由一个人传给另外一个人，而根本无需事先知道，为什么激动的人产生狂热。例如，一个人的目光或表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忧伤或喜悦就足以使我们产生沉重或欢乐的感觉。满面笑容可以使我们心情愉快，反过来，愁眉苦脸可以使我们感到忧郁悲伤。”（《道义感理论》，1868年圣彼得堡版第17页及以下各页）

斯密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的基本思想是认为共鸣或同情是我们道德的源泉，他根据这些而作出的结论是有道理的。显然，照这种观点来看，最喜欢模仿、最“富于感情”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有道德的人。但是，这种论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例如斯密努力设

法证明，报复(如果它不是出自一个确实受委屈的人)不可能引起同情，报复的表现形式必然使我们感到厌恶。他说：“天性似乎可以教会我们怎样躲避这种可怕的狂热，并激励我们去反对它。”哎哟！天性在这方面什么也教不会我们。我们已经看到，极其惨无人道的行为有时具有高度的感染力。例如，观看死刑能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要模仿刽子手，正如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要追随走钢丝的演员作危险动作一样。此外，几乎任何一个罪行，只要细节骇人听闻或其本身性质引起社会注意，往往都能引起一连串人的模仿。例如，依拉姆援引马克在谈到著名的布朗维耶案件时说：“布朗维耶成了每个人的话题。她的罪行的全部细节发表后，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样一来，暗中下毒的念头便第一次铭刻在成百上千人的脑海里，他们后来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从这时起直到 1682 年，法国的监牢中充满了被指控放毒的犯人。犯罪被彻底揭露后，其中很多人都是在 1679 年被活活烧死或绞死的。但是在那以后，这种罪行继续流行了两年，待到停止时，已经有一百余人死在火堆中或绞架上。”就连在现代，特洛伊曼也有几个模仿者，而且他们的罪行的细节证明，确实都是模仿别人的。法国的精神病学家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凡引起轰动的罪行都有这种感染性，并且坚决要求制止每日出版的报刊无耻地利用这类事件，刺激兽性的本能。

可见，斯密想仅仅用善良的愿望来解释模仿意向和精神感染而犯了错误。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有意不顾大量众所周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则可以说明感染能使人们或者作出从道义上说无关紧要的行为，或者作出从任何道德体系来看都应受到谴责的行为。如果把共鸣或同情理解为一种同利己主义相对立的独立的道德原则，那么按斯密的观点，这些无关紧要的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实际上，在整个女修道院都开始咬人或学猫叫的

情况下,这同共鸣、同情、体验别人生活的能力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一个人或几个人被一种盲目的吸引力所征服,仅仅在榜样的影响下去从事残忍的或可耻的行为,这同道德因素又有什么关系呢?甚至人们可能会觉得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模仿和共鸣毫无共同之点,或者是共鸣不能成为道义感的理论根据。其实这里同道德体系毫不相干。因此,我们只能简单地指出,共鸣和模仿之间并无很大的差别。贝恩说得对:“共鸣和模仿按其意向和结果来说都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原理却有很多相同之处。”(《心理学》,1881年圣彼得堡版第277页。)亚当·斯密的错误主要在于,他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足够地强调模仿和共鸣之间的本质差别,在道德体系的基础中必须有意志和意识的因素,但在模仿现象和精神感染现象中它们却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调查模仿现象的全部任务可能就在于确定促进或对抗以一种特殊形式使意识和意志受到抑制的条件。

顺便指出,亚当·斯密所犯的轻率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赫伯特·斯宾塞在《心理学原理》第4卷(《舆论和共鸣》一章)中又重犯了,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斯宾塞在谈了一只集群动物如何由于有同类动物在场而产生快感之后,转而谈到它因同类动物的动作而造成的精神状态。因远方移动的物体或某种声音而感到惊慌的兽群会在吃惊的同时也动作起来并发出声音。每只动物在看到并听到它的伙伴动作起来并发出声音的时候,也这样做,这时它产生了一种感觉,促使它动作起来并发出声音。每只动物这样做的时候,必然会在恐怖感和认识伙伴们的这种恐怖的外部标志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想。吃惊的动物的表现被伙伴们看到并听到后,伙伴们便产生了它们亲自看到的那种感觉,于是通过交感作用而在伙伴身上产生的那种感觉促使它们也同样动作起来并发出同样的声音。后来这习性便代

代相传下去并通过适者生存的作用而保持下来，因为最牢固地具备这种习性的个体往往最能逃避各式各样的危险。

最后，某种兽类特有的警报一响就会引起整个兽群的恐怖感。这就是集群动物往往突然惊慌万状的起因。例如，羊群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痴呆地望着越来越逼近的身影，但是一旦有一只羊开始逃跑，其他的羊便马上开始狂奔。在这种情况下，每只羊都象前一只羊一样，在同一地点做同样的动作，哪怕是根本无此必要。例如，跟在后面的每一只羊都模仿第一只羊在某个地方跳一下，尽管那里根本没有需要跳越的东西。

斯宾塞继续写道，除了交感恐怖之外，通过类似的方式还可以形成其他种的交感。愉快的激感在马群、猎狗群等之中也能迅速地从一个个体传给另一个个体。狗由于同人有着旧交并且经常接触他，能够显示出和人的感情发生共鸣。例如，狗听到歌声有时也随声吠叫，有时甚至和着节拍。有一些狗甚至能默默地同自己主人的痛苦或愉快发生共鸣。主人欢笑，它们快活，主人忧伤，它们也忧伤。“这一事实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种论点：同情和共鸣的程度和广度取决于思想表达得是否明确和深刻。交感这种感情并不是由于它的自然原因而直接触发的，而是由于感情的某些标志表露于外或出现了一些一般能由这种感情引起联想的现象而间接触发的。因此，交感要求具有认识和综合这些标志的能力，也要求具备在头脑里再现这些标志所代表的东西的能力，再现外部或内部，或外部和内部以及其他感染的能力。这就是说，同情或共鸣的程度只能是同头脑的再现能力成正比……发展智力是扩大同情范围的条件之一，但又远不是唯一的条件。”

斯宾塞非常重视自己的这个结论，并且不止一次回到这一结论上来，但换了说法，增加了例子。他认为残忍是智力不足的结果。由于智力不足，一个残忍的人便不能充分清楚地认识他所造

成的痛苦。相反，斯宾塞认为打呵欠的感染性是表现智力强的一个显著的例子，特别是，不仅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打呵欠，而且当我们一想到打呵欠时，就会打起呵欠来。这个例子就更能说明问题。

总之，如果说，亚当·斯密认为容易接受精神感染的人是最“富于感情”和最有道德的人，而斯宾塞则认为，容易接受精神感染的人是智力较高的人。然而现在再列举一下专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点意见，这几点意见选得是比较成功的：

“观察的结果表明，当大脑的皮质不太发达时，或者说，在一个人已经被教育得逐步习惯于把虚构的现象和实在的现象等量齐观的情况下，模仿的力量表现得比较强烈。显然，这种智力作用只有在缺乏全面评价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而全面评价如果没有大脑皮质的积极参预则是不可能的。如果大脑皮质惯于不特别注意来自外部的刺激，那么显然，这种刺激应当引起感觉中枢的反射，而不是认识中枢的反射。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都说明了这一点。例如，时髦，各种奇怪的观点、行为，宗教狂热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奇怪的动作、狂欢暴饮、狂暴行为、行乞、苦行、自残、甚至自戕的广为流行等等。”（佩利坎《从法医学观点研究死亡》，第82页）

佩利坎在这里援引巴林斯基教授的话说：“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使我们确信，在医院里痴呆病患者很容易接受其他病人东拉西扯讲的一些荒谬想法，并且很容易不由自主地机械地重复别人的动作，却根本不了解这些动作的目的和意义。”

康金斯基先生写道：

“下意识地模仿是某些动物，例如猴子的一个特点；我们有时在孩子以及白痴和某些痴呆病患者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特点，而且很突出……总之，可以说，下意识模仿的意向随着智力的发展而减少……高级大脑中枢接受感觉印象时可以产生观念，思想活动。由此可见，对感觉印象的反应不仅

可以是运动，也可以是思想。一个成年人在看到别人的某种姿势时，除了不自觉地重复这一姿势外，在大脑中还会产生某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又引起另外一种观念，等等，也就是说，结果是不仅重复所看到的姿势，而且产生思想或感情（例如，感到可笑）。而猴子则不是因思想反应而是直接由视觉印象而产生动作，自动地重复所看到的姿势。智力情况和猴子相近的人，也就是说，天生的白痴或痴呆病患者，他们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帕尔尚报道了对临床的两个痴呆病患者所作的一次极有趣的观察：其中的一个人象是另外一个人的镜子，他毫不爽地重复了另外一个人的每个姿势、每个动作和行为。”（《心理学浅说》，第 179 页）

看来，我们的这些摘录已足以说明其内容与斯宾塞的上述结论是针锋相对的。其实，我们还可以引用这位斯宾塞在另一个地方讲的话（完全符合他的世界观的基本观念）：“智力和感觉的表现同最初反应的动作之间的差距可以作为衡量智力和感觉发育的尺度。”在这里顺便补充指出一点，即这还意味着，对外部印象的反应灵敏绝不能证明智力的高度发达。如果说一只断了头的青蛙还在仔细地用右爪擦掉你涂在它左爪上的酸类，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断了头的青蛙拥有智力。一般说来，对外部印象做出的任何动作反应本身丝毫也不能说明智力的情况。动作反应可以表明高级精神生活、意识和意志活动的加强，但也可能是简单的反射，也就是感觉直接变为外部动作，而越过高级心理器官。在第一种情况下，动作的适度表达了智力的水平；在第二种情况下，动作无论表现得多么清楚，也说明不了智力的广度和深度。在对外部印象的这两种类型的动作反应中，模仿动作究竟应属于哪一种呢？我们在上面谈到的和斯宾塞在谈到交感打哈欠，谈到“同情”（由于同情，某些歇斯底里的人看到别人精神病发作，自己的精神病也发作）时所指出的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动作又应属于哪种类型的动作反应呢？

显然，如果斯宾塞在提到同情或共鸣的种类时只提到交感打哈欠等等，而没有提出深入体会别人从事残暴行为时的痛苦等等，要解答上述问题并不困难。几乎根据任何一个群众性的狂热活动和单个人的模仿行为的事例都可以确信，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或相提并论是何等轻率。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谈到亚当·斯密的理论时已经看到了。假如打死韦列夏金的群众深入体会到了别人的痛苦，他们便会拯救这位受难者，但实际上他们却结束了他的性命。因为当时他们为一股不可抑制的模仿巨浪所俘虏，正如看到别人打哈欠，也不可抑制地打起哈欠来一样。诚然，我们知道，深入体会基督遭受的苦难曾不止一次地引起模仿，以致再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创伤。我们知道，同情产妇的痛苦能使旁观的妇女的乳房出现奶汁以及诸如此类的模仿症候。但是，我们还知道无数的事例，说明同情作为一种独立的道德因素，是同模仿的意向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就不难看出，斯宾塞不过是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没有充分强调意志和意识的作用，却认为在精神感染的情况下意志和意识都不见了，至少是大大受到了抑制。

然而，意识和意志受抑制绝不是一定要通过精神感染和模仿的意向来表现。在各式各样的精神错乱的情况下，这种抑制则完全表现为另外的形式。精神病患者可以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并且可能很不象话。而模仿，即使采取最病态的形式，也仅仅是意识变模糊和意识被削弱的一种特殊表现，它受到某种特殊环境的制约。显然，打开上面概述的各种五花八门的现象之谜的钥匙就应当存在于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中。找到了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为深入研究历史和实际生活开辟广阔的远景，因为那时我们就会知道群氓在什么时候、怎样以及为什么追随英雄的。

然而，究竟怎样才能找到这把宝贵的钥匙呢？通过直接分析产生某种具有纯属模仿性质的群众运动或明显属于单个人模仿的

事件的条件来寻找这把钥匙的希望是很小的。当然，通过这种办法可以找到某些极可贵的指示，其中有一部分是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提出的。但是这类指示都是片断不全的，仅仅适用于某一类事实，而不能提供一个比较概括性的结论，因而也就不能概括大量不自觉模仿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一起单个人模仿的事件，尤其是群众性的狂热活动都有其纷繁复杂的条件，要想从这些条件中找出模仿的特殊原因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它们同其他各种生活现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而且鲜明的例子——卡申博士在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看到的模仿性舞蹈病。毫无疑问，生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会通过各自的学科的语言来谈论这种现象，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描述视觉印象或听觉印象，而不触及意识和意志的中枢，把它解释为一种反射运动，比较准确地再现了提供印象的物体。但是当问题涉及到现象产生的原因时，他的话就变得远不是那么肯定和有信心了，而且自然而然便会产生一个问题：现代的雅库茨克女人或后贝加尔的哥萨克同十六世纪疯狂而顺从地跳塔兰台拉舞的意大利人或几乎是自动地参加远征的十字军骑士，他们的生活条件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为什么在上述情况下反射都是模仿性的，而不是别种性质的呢？我们得到的答案，要么就是简单的归结为：“模仿，想同周围的人们合拍的愿望是人的重要特性，是人的生理本性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是由大脑神经机制本身所赋予的。”（康金斯基《心理学浅说》）要么就是向我们提供一些个别的支离破碎的解释，说明大的社会灾难如地震、饥荒或异族入侵如何使当代人的意识和意志变得麻木不仁；在某种情况下，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注意力完全贯注在某个物体或念头上，以致当时对他们说来，除了该物体或念头之外一切都不存在了。凡此种种当然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能为现实生活中某种突出的现象提供图像，

即明确的特征。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还留下许多争执的问题。例如,我们看到康金斯基先生和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针锋相对,他直截了当地说:“下意识模仿的意向随着智力的发展而减弱。”然而,康金斯基先生在谈到招魂术的迅速传播时则不得不承认,“人尽管在智力和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有时也不能完全避免精神—心理接触感染”。即使康金斯基先生强调了完全这两个字,从而使自己得出的可悲的结论有所削弱,但是仍然有某些不明确之处。接下去他的一段论证则使这些不明确之处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他说:“精神流行病的最主要的根源——宗教感情、神秘主义的意向、对神秘和异常事物的追求——无论如何都不会很快消失。”因为我们在上面已经知道,“模仿,想与周围的人们合拍的愿望是人的重要特性,是人的生理本性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是由大脑神经机制本身所赋予的。”

.....

七

顺便讲一下,不时提及的康金斯基先生的小册子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明科学家们往往自相矛盾(在充分尊重作者的前提下,如果我可以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话)。这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精神—心理接触感染和精神流行病》,正如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讲的完全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探讨。然而,有趣的是,康金斯基先生对拟态现象和保护—模仿型生物的起源却只字不提。对他来说,这些不过是“别的衙门的官吏”。关于圣斑的现象只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但是最有趣的则是,作者对催眠术的态度。看来,康金斯基先生特别重视催眠实验,并把它作为论战武器,去反对“招魂奇迹”。康金斯基先生完全有理由因为“大众”和学者们的顺从和轻信,因为他们竟

然对广为流行的招魂术入了迷而感到愤怒，他力图主要是通过通过对催眠实验的解释来批驳招魂奇迹。当然，他的用意是值得称赞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关于模仿的专题论文中却略微提了一下模仿在催眠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然而，解开“英雄和群氓”全部秘密之谜的钥匙可能就在这里。

提起催眠现象大家都很熟悉，由于汉生的表演曾引起轰动。对我们说来，最有趣的催眠现象是那些被催眠的人从事模仿的意向；他们准确无误地重复着在他们面前所做的各种动作。被催眠的人顺从地追随着“催眠术家”，当催眠术家在他的面前握紧拳头的时候，他也握紧拳头，他学着催眠术家的榜样张口、闭口等等。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同样自动地重复他所听到的声音，而不管是音义的声音，还是人所发出的清晰的言语。汉生的最惊人的魔术之一叫做“保姆和婴儿”，它的具体内容是：汉生让被催眠的人学双手搂着婴儿的保姆的姿态，并在他的手上放一个洋娃娃，然后催眠术家本人站到这个活动机器人面前，模仿保姆摇晃婴儿的动作，左右摇摆，被催眠的人也准确无误地重复这些动作，摇晃着洋娃娃。总之，可以让被催眠的人作出各种最荒诞的姿态，然后象面镜子一样准确地重复着他面前所做的一切。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去请教海登海因，因为他专门研究过汉生的魔术，他自己做过并且作了补充，因此对他是可以信赖的。（《所谓动物催眠》，1880年圣彼得堡版）

面部皮神经或听神经或视神经不断受到单调的微弱刺激便可以达到催眠状态。只要全神贯注地细听钟表单调的滴答声，或单调的催眠曲，凝视固定不动的闪光物体，如玻璃球或催眠术家的眼睛，只要面部直接或在一定距离内受到缓慢的单调的抚摩，——总之，只要受到任何一种单调的、微弱的、均匀重复的刺激，人便会失去知觉，处于催眠状态。海登海因说，在这种状态下动作是不自觉

地接受的,但并没有发展成为自觉的观念,没有超出感觉阈限,这种动作就叫做模仿。于是被催眠的人便成了一架自动模仿的机器,不断重复着使他不自觉地产生视觉印象和听觉印象的那些动作。感觉刺激在中枢器官引起的物质变化可以决定随意的动作,但这些动作却是无意的。海登海因指出,“这种模仿动作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到”,并且援引了—个人看到有人打哈欠便也自动地打哈欠和婴儿有模仿“欲”的例子。问题在于,被催眠的人,除了意识变得模糊之外,反射的感应性却大大提高,这正是因为大脑的某些部位——大脑半球的皮层的活动受到抑制的缘故。详细阐述这一情况不是我们的任务,因此,我们可以仅限于谈—下海登海因关于催眠形成的原因,特别是被催眠的人自动模仿的原因所作的最后结论。他认为原因就在于“面部皮神经或听神经或视神经受到微弱的一成不变的刺激,因而使皮质神经节受到抑制”。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在于缺乏刺激,相反的实验也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只要被催眠的人的感觉器官受到强大的或变化不定的影响,催眠术的一切魔力便立刻消失。催眠状态是由微弱和单调的影响造成的;反过来,如果在被催眠的人手上猛击—下,附在他耳边大喊—声,或往他身上泼冷水,他便会醒过来。如果那个以自己顽强的“催眠”目光使人进入催眠状态的实验者由别人来代替,往往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被催眠的人直到“自己的头脑清醒过来”之前,完全听从催眠术家的支配,催眠术家可以任意摆弄被催眠的人,直到使之丧失人的起码尊严。其实这一点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催眠状态的典型标志是感觉缺失和痛觉缺失,也就是失去了感觉和痛觉;被催眠的人可以用针刺,用刀割,用火烧;他并不感到痛。然而,有趣的是对马进行的催眠实验。远在1828年,匈牙利人巴拉萨提出了“不使用强力而给马钉掌的方法”;“通过目不转睛地注视使马后退、翘首、引颈、甚至可以使马服

贴到这种程度：附近有人向马群开枪，它们也一动不动。交叉地抚摩额部和双眼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辅助手段，通过这种办法可以驯服最胆小的和性情最暴躁的烈马，使它们低下头来，如同已经睡着了一样……这种对马催眠的办法在奥地利的军事操典中甚至有明文规定。而在更早的时候，有一位美国驯马人则提出了对马从头到全身进行抚摩的一整套办法。”（贝奈狄克特《僵住状态和催眠状态》，1880年圣彼得堡版第33页）

总之，被催眠的人完全听从实验者的支配。但是充当别人掌上一个没有意志、没有思想的玩物的程度还各有不同。例如被催眠的人，有的能回答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的就不能。显然，前者大脑的某些部分还在工作，而后者则完全停止了活动。其次，有的人能不自觉地模仿在他面前所作的一切动作，但却不执行向他发出的命令，如果这些命令不伴随着示意性动作的话。你如果对这样的被催眠的人下命令，他可能会跟随你。但是他仅仅是要跟随你，模仿你，而决不是因为你的命令是下给他的。相反地，也有的人则是服服贴贴地执行最荒唐的命令，例如喝墨水，把手伸进火里等等，而并不需要在他面前做这样的动作。显然，服从命令的人比进行模仿的人入梦（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能使用这个词的话）的程度要浅，因为他们毕竟能接受命令。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感觉器官受到单调的、均匀的和微弱的影响所造成的。这是生理学的解释。至于心理学的解释，读者可以参看施奈德的文章《谈谈催眠现象的心理学原因》一文（《新观察》，1881年第2期）。在这里我只引用一下施奈德的最终结论。“催眠现象不外是一种人为的反常的意识片面性，即意识反常地片面集中……由于长时间注视一个发光体，由于倾听某个均匀的声音，知觉过程逐渐反常地集中于某一种现象，以致其他的现象很难以或不可能被感觉到。”

读者可以看到海登海因和施奈德的解释所指的其实是同一回事，只不过使用了不同的语言。用粗俗的话来说，就是实验者把被催眠的人置于只有极端贫乏而单调的印象的条件下，开始过着单调的生活并且由于很快就耗尽了自己而变成了一个空壳，本身没有内容，而靠偶然从一旁注入的东西来补充。

试问，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这个结论呢？在多大程度上在从事模仿的情况下，个体的独立生活会受到贫乏而单调的印象的支配呢？

首先它自然包括许多经过深入研究并且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例如兴奋过度和神魂颠倒，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两种状态都往往伴随着某些特殊的模仿形式。神魂颠倒的人全身倾注于由于某种原因而成为他注意集中点的某个物体、形象、思想。而所有其他的东​​西，无论他看到与否，听到与否，也就是说，即使他可能从其他的物体得到了印象，但也不能因而产生感觉。因此，在神魂颠倒的高级阶段，可以看到和处于催眠状态一样的情况：丧失了感觉，也丧失了痛感。神魂颠倒的人，当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将他投入火堆烧他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他对拷打和创伤也没有感觉，因为他的全部心理生活毫无保留地都集中在他为之受刑的思想上。他确实能够嘲笑对他施刑的那般人，因为他们想使他产生痛感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决不应把这种状态同一种表面上与此俨然相似，但在内部心理上却截然不同的状态混为一谈。历史上有许多例子，说明一些人表面上默默地忍受了巨大的折磨，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痛感，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看出自己有痛感，并且使思想和意志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用以对抗通过喊叫、呻吟和姿势表示痛感的自然需要。这些人能够充分地控制自己，能够有力地控制住对外部印象的似乎是最不可避免的动作反应，显然，他们不可能有模仿的意向。与此相反，神魂颠倒的人和近乎神魂颠倒的

人则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因此他们注意力的片面集中点可以绝对左右他们。有圣斑的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最鲜明的例子。例如，圣芳济通过隐居、斋戒和经受各式各样的苦难把个人的生活开支缩减到最低限度，进行所谓的面壁修性，杜绝一切外部影响，只留下一线光亮，照射着基督受难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则迫使圣芳济模仿它，于是血液被驱赶到这个神魂颠倒的人的手掌、脚掌和左肋。诚然，圣芳济可能也希望变得和基督一样。但是这时他变得和基督如此一样却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意愿。当瞬间出现的一种强烈印象，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把一个人完全控制住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并未生育的妇女的乳房出现奶汁等现象的模仿性是由当时思想情况异常片面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为了激发或显露模仿的意向，因而同时也是为了形成我们所说的群氓，看来需要具备下述两个条件之中的一个：或者是有一种足以暂时抑制住其他一切印象的非常强烈的印象，或者是印象长时间一成不变地保持贫乏和单调。当然，如果把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势必更会加强模仿的效果。现在我们就来检验一下这条原理并且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

八

请读者回忆一下我们上次所谈到过的模仿性舞蹈病。

无须特别再进行一番总结，就可以看出催眠状态同卡申博士观察到的“痴呆病人”的状态非常相似。连汉生本人恐怕也不可能提供有比士兵们齐声重复指挥官的口令和骂人的话更出奇的情况了。其次，痴呆状态同催眠状态完全一样，也表现为两种形式：本人或是模仿、重复他通过视觉印象或听觉印象所接受的一切，或是服从任何命令，无论它是如何荒诞或岂有此理。有人会问道：对催眠现象所作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痴呆现象呢？更确切地

说，在痴呆病患者的生活条件同为被催眠的人所处的人为设置的条件之间是否有某些相似之处呢？

雅库茨克地区的生活条件极为单调，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缺少动植物，一片单调的白雪覆盖，在半年以上的时间里只能看到白色，缺少声音、颜色和形状，缺少谋生的行业、职业和需要，一句话，缺少生活。显然，这一切加在一起其单调程度很可能会略微超过不停地观察一个玻璃球，不断地倾听钟表的滴答声等等。必须指出，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部和西伯利亚流行几种神经病，它们都特别能通过模仿而传染给别人。许多旅行家和被命运抛到北方偏僻角落的医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德尔热韦茨基先生在他的《*乌斯其塞索耳斯克县的医学地理*》（1872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列表说明从1853年到1869年十七年间各类病人的数字。这个表分二十栏。其中神经病占第五位（按患者人数）。更确切地说，神经病和脑病占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一，其中大脑和脊髓病（溢血和发炎）占百分之二点一，精神错乱占百分之二点二，歇斯底里、神经痛和痉挛占百分之三点八。德尔热韦茨基先生说道：“以上各项百分比都大大超过俄国全部医院中同类病总和的百分比。而实际上各类神经病在乌斯其塞索耳斯克县流行之广比数字表明的情況还要严重得多，因为进医院的大部分是士兵和俄国其他地方出生的人，而很少有妇女，但在妇女中这种病。却最为流行我个人在行医当中多次碰到了各式各样的神经病，以致神经病成了找上门来求医的最常见的病，当地在各类神经病当中最常见的则是歇斯底里（民间称做“中邪”）和 chorea magna（民间称作“疯魔”）。”马克西莫夫先生在谈到俄国欧洲部分最北部的一种神经病时指出：“北德维纳河右岸全部妇女的整整四分之一都患有这种病。从德维纳河往西这类病越来越少，到了北方沿海地区克姆一带这种病便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稍弱），并且有了另外的名称（揪心）。”（《北方一年》）

有趣的是施特恩贝尔格博士所提出的下面一段归纳性意见。他在列举导致歇斯底里症广为流行的原因时说：“社会上的单独一个人，甚至一群人所处的孤独状态也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说明为什么导致发病的某些观念、世界观无论多么荒诞，却能一成不变地、牢固地保持下来并且被虔诚地、不加任何批判地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由祖先传给后代。如果一个人或是全体居民生活在荒野山区，那里自然环境单调或气象变化无常都可以对人的神经系统和心理状态产生不良影响，这时孤独状态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大些。这种发病原因我们在极北地区看得尤其明显。”（《疯魔症及其法医学意义》，载《法医学文库》1870年第2期）

施特恩贝尔格先生在谈到“导致发病的观念、世界观”时，用词非常不确切。“观念、世界观”能够并且只能提供这种病的某些特色。显然，很难设想一个人不信鬼，同时却又被鬼所迷住（更确切地说，是他本人认为的被鬼所迷住）。但绝不应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一个人由于不信鬼，就保证不会发生被无知的人或迷信的人称作鬼附体的那种形式的神经错乱。但是不能否认，在说明愚昧无知和迷信时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排除生活“孤独”和“单调”的影响，而我们则认为生活“孤独”和“单调”仍是某些神经病流行的根本条件。例如，甚至信鬼的程度本身也会由于个人生活日益丰富多采的直接影响而减弱。随着人通过实验和观察不断扩大认识和知识领域，迷信的程度也不断减弱，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的基本认识正确的话）总的说来模仿的意向，特别是最突出的病态模仿势必会减弱。

然而我在上面强调个人生活单调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读者如果费心注意一下我过去的叙述，自然就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正如我曾屡次证明的那样，整个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是和个人生活的丰富多采截然相反的，甚至会造成个人生活的单调、贫乏、片面，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模仿的意向可能特别强烈。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关的突出例子，我们暂时先把它象施特恩贝尔格先生指出的“气象变幻无常”的影响一样搁置一旁。但无论如何，雅库茨克地区的生活单调和孤独则是毫无疑问的。在那里，有的地方很少有邮政往来，因此它们与外界的联系仅仅是一周一次，一月一次，甚至是一年一次。在那里冬季长达六个月之久。在那里走上五百俄里也碰不到一个人影。在那里吃的除了鱼之外还是鱼，有的地方萝卜、白菜简直成了美味。在那里，一个人可以一整天，除了风的怒号以外，几乎什么声音都听不到，除了白色以外，任何别的颜色都看不到。只要再把贫乏和单调的色调稍稍加重一些，那里就会成为一个真正适于做催眠实验的硕大无朋的大厅。

关于这一点，似乎不值得展开来谈了，但是卡申博士札记中谈到的士兵和妇女成了痴呆症的牺牲品的这一情况却非常值得注意。当然这并不是士兵和妇女独有的现象。无疑地，任何其他男人也能染上痴呆症。但是毕竟有趣的是，这位观察者无意中首先提出的最典型事例却正是妇女和士兵，譬如说，一连的士兵自动重复指挥官的口令和骂人的话以及一个雅库茨克女人自动地执行当地流氓歹徒发出的下流命令。

我听说过利霍宁博士的观察结果。他在彼得堡成功地重复了汉生的实验，结果是近卫军的士兵们非常倾向于催眠。似乎，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很快便进入催眠状态。其结果，初看上去是很反常的，至少同一般流行的关于催眠现象的概念截然不同。实际上，近卫军士兵在体力方面可以说是俄国人民的精华，在身高和健康方面是经过选了又选的，他们都具有强健的肌肉和坚强的神经。然而我们却习惯于认为，最倾向于催眠状态的人，主要是指能够很容易迅速进入催眠状态的人，一般都是体弱的，特别是神经不健全的人。这种流行的意见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符合实际情况，并得到了一些科学权威的证实。例如，海登海因说道，被催眠的人主

要是一些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的人。其次，他由于以下原因而同汉生有争议：汉生指出，根据他本人观察的结果，做强烈肌肉运动的人们最适于做催眠实验：“因此他喜欢找爱好划船、游泳和骑马的英国大学生，而不是从事紧张的室内脑力劳动的德国大学生。”海登海因指出，汉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可能主要是指催眠现象的一个方面，即肌肉麻痹的强度，“在对他喜欢的人进行催眠时，他们肌肉麻痹的程度无疑地要比体弱的人表现得强烈。但是如果说他们那里能进入催眠状态的人的百分比就一定比我们这里多，对此我深表怀疑”。有可能俄国近卫军士兵进入催眠状态的能力会使海登海因的怀疑发生动摇，尽管很可能他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说，能进入催眠状态的英国大学生和德国大学生的人数百分比几乎相同，或甚至后者比前者还多，但是英国大学生由于肌肉组织特别发达，所以其肌肉强直收缩、僵直或麻痹往往表现得更强烈。大家都知道，汉生的许多惊人实验到最后都出现了僵直现象。例如，他把被催眠的人放平，用一把椅子支住这个人的后脑勺，而用另外一把椅子支住这个人的双脚，然后站在这个人的胸部或腹部上，而被催眠的人却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显然，非常发达的肌肉组织势必对这类实验的成功大有帮助。但是这类实验所产生的效果却丝毫也不能说明体强和体弱的人能进入催眠状态的百分比数字。因此，无论是流行的意见，也无论是海登海因的意见，即关于主要是一些“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的人”趋向于催眠状态的说法，并不因汉生关于英国大学生和德国大学生发表的意见而有丝毫动摇。

然而，俄国的近卫军却是一些年华正茂、体格健壮的人，是从帝国亿万居民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竟成了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的人的竞争对手。这一事实是极为有趣的，当然最好能得到这方面的最确切的资料。这一事实尽管初看起来很惊人，尽管它和传统的

概念相矛盾，但是甚至仅仅根据本文截至目前为止引用的实际资料和看法，也是可以预见得到的。

必须指出，问题并不在于利霍宁博士只能在彼得堡就近看到的近卫军士兵才倾向于催眠状态，而在于他们是士兵。在任何军队里，在卡申博士看到的被调往边远地区的处于痴呆状态的连队中，能够很容易迅速进入催眠状态，也就是说，能够很容易迅速把自己的意志交付别人之手的人所占的百分比，显然应当接近于近卫军中同类人的百分比，甚至可能更多，而不是更少。问题在于士兵的生活条件。当一个士兵站在队列中的时候，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人都和自己有同样的身量，同样的姿势，同样双手下垂，同样双脚立定，带着同样的“边饰、肩章、领章”。他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看到的都是红色的或蓝色的帽边或衣领，都是金色或银色的纽扣。整个队伍都象一个人一样持枪操练，做同样的动作，随着旋律单调的进行曲“齐步”走，没完没了地暗自重复着：“一、二，一、二，左、右，左、右”。总之，站在队列中的士兵就象蹬轮的松鼠一样，不停地旋转，接受的都是一些极为单调而简单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印象，只要注意力稍有不集中，便会被强制性地纳入这个魔力圈，有时则直接受到体罚。就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操练之外的士兵生活，虽然不象出操时那样明显的枯燥单调，但也不过就是做操练生活的准备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件很适当的准备工作：营房是与外界隔绝的有限一块地方，当然不可能提供多种多样的印象，而出了营房，士兵的生活同样也不可能丰富到哪里去。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同海登海因提到的催眠状态的生理条件（由于某些神经受到微弱的一成不变的、单调的、反复的刺激而使大脑皮质细胞活动受到抑制）以及施奈德提到的心理条件（意识反常地片面集中）非常相似的情况。因此，难怪士兵们，即便是身强体壮的近卫军士兵由于受到本身生活的催眠，可以迅速进入真正的催眠状态

并且模仿和服从“催眠术家”。既然如此，卡申博士所讲的士兵变痴呆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何况，在那里除了士兵生活特有的贫乏之外又加上雅库茨克地区特有的贫乏。当然，在这个故事中有许多东西，不仅由于我们的思想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深入研究此类现象，因而仍然对之感到陌生，而且还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例如，为什么一向一丝不苟地执行口令“枪上肩”的士兵，偏偏在某一天的某个时刻，而不是在另一天的另一个时刻不执行这一口令，而自己也大喊“枪上肩”？为什么平时全神贯注听从指挥官发号施令，“如此这般”的士兵，这次却自己回答“如此这般”？在这些处于痴呆状态的群氓中谁是“英雄”？进而，模仿过程是怎样开始的？是所有的士兵都在一瞬间卷入模仿的浪潮，还是在他们之间有一个特别容易受感染的小兵，以自己的榜样带动了其余的人？要想回答上述问题，就要了解事情的全部细枝末节，例如，士兵们在出事那天和前几天是怎样消磨光阴的。而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卡申先生不仅没有提供，而且显然也不可能提供。然而我们对士兵变痴呆的故事的大致面貌还是可以弄清楚的，这就要靠把它同一些虽然尚未研究透彻，但毕竟还是众所周知，既能观察、又能实验的现象加以对比。

或许应当就此结束关于一部分模仿现象的探讨了，因为这部分现象虽然一再出现，但很可能，我们对其细节永远也弄不清楚。我指的是狭义的保护色和拟态现象。我希望，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北极狐、白鼬、白沙鸡一到冬天就全身披上一层白色的现象，也同动物的颜色与它所处的环境的颜色相适应的其他现象一样都是视觉印象单调不变的结果（显然与适应能力最强的个体的遗传性和生存能力有关）。然而，当巴西异粉蝶模仿长翅蝶，或蝴蝶模仿蜜蜂或黄蜂时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应当说，其复杂程度对我们说来将永远是个不解之谜。实际上怎么能弄清，为什么偏偏是这种

蝴蝶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种蜜蜂的外形上，把它选为自己的“英雄”，模仿的对象呢？

我顺便指出这一点，是为了以后就不再回过头来谈保护色和拟态现象，而我们之所以把这类现象提出进行研究，仅仅是为了使实际材料完整，为了证明模仿范围的广泛。

现在我们再回到士兵的问题上来。

我们看到，无论是催眠状态，还是痴呆状态都表现为两种形式：自动模仿和自动服从，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意识受抑制的程度不同。自动服从的人能够接受自动模仿的人无法意识到的命令。由于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程度，所以只要有有利条件，一种形式就可以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例如，一个雅库茨克女人今天无条件地服从凌辱性命令，明天如果病势加重，就可能对命令毫无反应，而仅仅机械地重复到达她的听觉和视觉神经，但已经不能越过她的感觉阈限的话语和动作。卡申看到的士兵，很可能在出事那天的前夕就得了痴呆症。到了那天病情发展为更高级的形式，即模仿形式：人们不是作“枪上肩”这个动作，也就是说不执行口令，而是高喊“枪上肩”。但是即使是在过去，当他们无条件服从口令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处于痴呆状态了，它正表现为机械地服从。当然，这一点是难以判断的，因为既是一个士兵就应当服从，应当“听口令”。但是读者如果认为，士兵的服从，特别是队列中的士兵的服从是完全自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不仅在雅库茨克雪原，就是在某个文明的中心，例如在五月阅兵时，士兵的动作、呼喊等等，大部分是不通过意识而发出的。一切从事习以为常因而无需高级心理活动经常控制的工作的人，他们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除此之外，上面提到过的士兵们日复一日接受的印象单调等因素，无疑地，也会对整齐划一、完全自动地执行口令有影响。而这类因素也同样是两种催眠状态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方面，我听到的一个

故事很有教益，这个故事是一个在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服兵役的青年人讲的。他说，长官向士兵打招呼之后，作为回礼，士兵必须高声呼喊，尽管他根本不愿这样做，但是却几乎每次都不能自制。一到了必要的时刻，青年人便不禁出自内心地高呼“祝大人健康！”“为大人效劳！”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体会：如果走在街上，看到在音乐伴奏下行进的一队士兵，自己的脚步要想同这成百人平稳、整齐的步伐不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也会感到十分不舒服，并且为此还得使意志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由此可见，军队中的纪律和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同直接的申斥、赞许、惩罚无关，它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士兵生活的单调，使意识和意志受到抑制所造成的，从而倾向于模仿和服从。这种结果当然符合建立军队的宗旨本身。但是，决不应忘记，模仿和服从的意向既有其利，也有其弊。它不仅是建立军队中秩序的基础，而且也是出现勇敢奇迹的基础，这种勇敢奇迹有时甚至是由很少的几名士兵在果断的命令或积极榜样的影响下完成的。然而这种模仿和服从的意向也可以造成溃不成军的惊人场面，这时只要有个别几个怕死鬼作榜样，就足以引起整个部队溃逃。这种意向还可以造成士兵的暴动和哗变，正如我们从1831年军屯户哗变一事中所看到的那样，甚至士兵个人对某位长官忠心耿耿也无法使他抗拒伙伴们的榜样的吸引力，无法使他不屑去打自己最爱戴的这位长官。此外这种意向还可以造成在敌国，有时在本国奸淫烧杀，四处抢劫，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威胁和惩罚也无法制止溃兵们的胡作非为。

为了避免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声明，在类似的情况下，影响人的心理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但是其中也包括模仿和服从的意向，它有时可以压倒其他一切因素。而这种意向是通过决定被催眠的人自动模仿和服从的那些条件，即印象的贫乏、一成不变和单

调而培养出来的。这也就是形成我们所谓的“群氓”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进一步发挥上述论点之前，我们应当再回到雅库茨克地区的问题上来，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位妇女，她自动执行雅库茨克的一个色鬼向她发出的无耻的命令，把上述关于雅库茨克生活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单调得令人难以忍受的见解应用到这里，我们就会想起十五世纪的英国，更确切地说，想起莎士比亚在一出历史剧中对英国的艺术描绘。请读者劳神回忆一下历史剧《理查三世》中理查（当时还是格洛斯特公爵）同安娜夫人在国王亨利六世棺材旁的一段对话。安娜的公公亨利，同安娜的丈夫爱德华一样，也是被理查杀死的。安娜为亨利送殡时，身穿深色的丧服，痛骂杀人凶手。突然间凶手本人出现了，他就是道德低下、面貌丑陋的理查。安娜劈头盖脸地骂他、诅咒他、唾他，象是发疯了一样，而他却总是一个劲地说：“啊，可爱的圣女，为什么骂得这样凶狠？”“对不起，我的天仙般的美人”……“美人，你的姿色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那孤零零的王宫，只要没有你，它就使我厌恶。”“原是你的天姿美色招致了一切。你的姿色在我睡梦中萦绕，使我敢于杀死天下生灵，但求能在你的怀抱里偎依片刻。”“毒液不会出自动人的朱唇。”“你的秋波早已夺去了我的心灵。”“你的姿色令我如饥似渴”，“我杀死了亨利王，却是受你的美色所驱使……我刺死了爱德华，却是受你的天姿所鼓动”等等。最后出现了使理查本人也感到吃惊的情况。理查充分认识到自己卑鄙透顶、面貌丑陋，看来，还认识到向一个父亲和丈夫都死在自己手下的女人求婚是一种发狂的鲁莽行为，而安娜却在理查言语“诱导”的压力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慢慢地安静下来，允许他“怀着希望”，接受他的礼品，甚至同意委托他去安葬亨利，而自己却离开了棺材，虽然刚才她还抚棺痛哭，咒骂，象是发了疯一样。

安娜不是因单调的风声、单调的一望无际的雪原景色，一句

话，为自己生活的极端贫乏而变痴呆了的雅库茨克女人。绝不能简单地命令安娜去执行理查的要求。对待她，必须把命令变成请求、哀求，而这种请求、哀求则通过某些动作或言语来表达，并且最后征服意志，正如在其他一些不太复杂的条件下意志服从简短的命令一样。例如，我们知道，在奥地利，人们是这样来“制服”烈马的：驯马人顽强地目不转睛地使视线同马的视线相交，或者单调地抚摩马的额部和眼部——于是马被驯服了。（每位读者都可以用河虾作一种更简单、更安全的实验：顺着虾的身段用手轻轻地、单调地抚摩，几秒钟内最胆怯、最不服贴的虾也会安静下来。）如果说，雅库茨克女人是患了痴呆症，那么安娜夫人则是被英国的理查顽强的单调的回答制服的，而雅库茨克的理查却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辅助手段，因为他驾驭的对象是已经由她过去的的生活和环境作了很好的准备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安娜夫人的行为可以很容易用女人的虚荣心，女人爱听阿谀奉承和恭维话来解释。我决不反对有这种因素，但是我认为，这还远不足以说明安娜被驯服的理由。诗人们很早就多次研究过“美满姻缘”多折磨的问题，因此可以毫不费力地收集一大堆关于诱惑、征服女人的艺术画面。但是我却满足于莎士比亚，因为他是莎士比亚，也满足于安娜夫人的故事，因为在这个故事中纯粹女人的弱点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色彩有些粗犷，对过程的描述似乎有些简单，但是任何一个比较注意观察生活的人都会感到在亨利六世棺材旁的这一场戏的艺术真实性。不过靠一些庸俗的、过于简单的观察是不可能达到这种艺术真实性的，而平庸的艺术家们却以此为满足。并不是理查的英俊，也不是他的什么华丽的外表（理查长得很丑陋）使安娜夫人为之倾倒。不是阿谀奉承——安娜在一生中已经听够了，不是某种柔肠——理查直截了当地提到“共枕”，不是感激或怜悯的因素，这种因素在女人的心中往往会变为爱情，——理查杀死了她的公公和

丈夫，她仇恨理查。但安娜夫人完全被制服了。虚荣心在这里不过留下了一点点的空隙，使得理查的顽强意志得以闯入并征服了安娜的意志。最后，这种虚荣心本身就是女人特有的职能——“讨人喜欢”起作用的结果和标志，这一职能决定了女人生活的“单调和复杂”、“明天和昨天一样”。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女人具有的观念和概念比“讨人喜欢”这一特有的职能所包括的范围更广泛，那么她就不会如此容易被制服。在这种情况下，言语的“诱导”，无论其内容如何，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使意识反常地片面集中和使意志相应地变得模糊，——所碰到的障碍要多得多。显然，如果出现某些与我们研究的直接对象无任何关系的情况，就会比较容易或相反更加难以收到这样的效果。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就不准备谈了。但关于爱情关系，我们想再提出一种见解。

理查战胜了安娜，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美德，而仅仅是由于他的意志顽强。而这种意志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它表现在理查就象是一个均匀单调的钟摆一样，对于安娜的全部愤恨和痛苦的答复，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大同小异。倘若他的话语中表现出某种怀疑、动摇，倾向于别的，即便是更崇高的思想和感情，倘若他触动了安娜别的情感，——他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决定性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有时会出现这种初看上去非常奇怪的事情：孱弱的蒙斯战胜了自己的情敌彼得，微不足道的腊科维茨战胜了拉萨尔，普希金死于决斗，等等。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彼得已经年迈而且冷酷无情，而蒙斯长得象玉人一样，而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彼得不适于充当“英雄”。他的眼界过于宽广，他的意志表现在多方面，不可能始终如一地集中在一个女人身上。他专横残忍，实际上这比温柔顺从的蒙斯更能压倒女人的意志，蒙斯却能象永远闪光的玻璃纽扣一样，靠自己的永恒不变，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看到这个玻璃纽扣，就会使人的个人意志丧失殆尽。

九

我们已经看到，中世纪的精神流行病特别多，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不仅次数多，而且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无论过去和现在，总有个别一些人，他们头脑中产生奇怪的念头和作出一些奇怪的行为。无论过去和现在，总有一些冒险家，他们有病态心理，总想通过某种方式抛头露面，等等。这种人有时也能引起人们的模仿和崇拜，有时则不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但是在中世纪，任何一桩古怪行为，不管它是多么荒唐，任何一件创举，不管它是多么想入非非，都或多或少地有相当一部分人来模仿。因此，历史只好把这类事件载入自己的篇章。冒险家、怪人、病人、爱出风头的人一下子就成了英雄。群氓很快就聚集在他的周围，望着他跳舞或祈祷，杀人或自我鞭笞，醉心于斋戒和各种忌禁，或反之，放纵情欲。我们看到了这些奇怪行为的事例，有的显然表现为一种病态，也有的则被历史学家们解释为正常现象。其中某些事例可以很容易地用我们试图给予一般自动模仿现象的解释来加以说明。例如，咬人和学猫叫的修女所患的流行病自然是由于修道院生活贫乏和单调所引起的。当这种贫乏，一成不变和单调的生活使修女们接近于雅库茨克痴呆病的状况时，她们便不自觉地模仿偶然学猫叫或咬人的女病友。然而在这种现象中丝毫也没有中世纪所特有的东西，因为类似现象我们现在也可以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修道院或女子寄宿学校中看到。因此始终存在着一个问题，也是每个人的头脑中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中世纪精神病流行之广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可以说，历史学家们根本没有注意过中世纪群氓的这种动摇不定和顺从的性格。然而某些历史学家却对中世纪生活的另外一

个特点发表了不少议论，而这一特点，骤然看来，又似乎是同我们所谈的动摇不定的性格相矛盾的。

中世纪的某些群众运动，例如十字军远征，由于符合当时整个生活制度的性质而受到掌握整个结构大厦钥匙的当权者的百般庇护。而另外一些群众运动，例如，异教徒运动或信仰魔鬼的盛行，则受到残酷的迫害，受到火与剑的镇压。尽管火与剑到处都创造了殉教的圣徒和英雄，结果却出现了源源不断的模仿者。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中世纪制度还拥有某种比火和剑更有效的东西，它使许多历史学家感到惊奇，并且也确实完全值得惊奇。它是在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读者可以回忆一下下述情景。十三世纪初，法国国王菲力浦二世坚决要按自己，按国王的心愿，而不是按教皇的意志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此事激怒了教皇英诺森三世，他宣布把整个法国革出教门。在这之后，英国国王因教会事务激怒了教皇，他又把同样的命令用于整个英国。看来英诺森只会说革出教门的话。但说这样的话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空话而已。而国王们却拥有士兵和武器，火和剑，于是他们把这一切用于同那个在罗马大发雷霆的无能莽汉作斗争。但这种大发雷霆，最后竟胜过了士兵和武器。两国的社会舆论，信奉唯一能拯救灵魂的天主教的全体教徒都响应发自罗马的雷霆。于是强大的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面对愤怒的社会尽管暴跳如雷却终于屈服了。英国的约翰王举行了庄严的忏悔仪式，并宣布自己向教皇称臣纳贡。法国的菲力浦王则重新安排了自己的家事，使之服从教皇的意志。就在这前后，阿腊贡国王自动地亲自来到罗马，把自己的王国献给教皇，然后把它收回甘当属国。

在此类情况下都表现出精神战胜剑的伟大之处。因此，难怪此类情况不仅吸引了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也吸引了以孔德本人为首的实证主义者。他们欣赏这种从当代来说几乎是不可理解的

权威的力量，真正权威的力量，它的存在不是靠刺刀和大炮来维持，而是靠成千成万的人心来维持。这种权威左右着整个欧洲而且支配着每个人。有了它才出现了骑士阶层这种驯服的军事力量，它使人建立无数功勋，表现出献身精神和对某种理想原则的忠诚。对中世纪持赞赏态度的历史学家们就是这样说的，而且显然，他们说得完全正确。然而对中世纪持否定态度的历史学家们也是正确的，他们用阴暗的色调描绘中世纪的暴力，压迫，残酷和连绵不断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确实存在过，任何关于封建天主教组织的严密性和人道主义影响的见解，任何献身精神和忠于某种理想原则的范例都不能把无辜的鲜血，宗教裁判所的火堆，弱者的无权和横遭凌辱，强者的野蛮和恣意妄为等等从中世纪的历史上一笔勾销。而且这一切都并非历史上偶然出现的细枝末节，可以淹没在外表和实质都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紧密的实体中。不是的！所有这一切同对中世纪持赞赏态度的历史学家所欣赏的现象一样，都是来自中世纪制度核心深处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正如经常看到的那样，完全的真理并不掌握这一方或是那一方，而是掌握在达到某种更高度一致的双方手中。

读者不妨浏览一下历史上有关中世纪的一种有趣的制度那一段。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里，很早就存在过一种由商人、小私有者、企业主、城市中的不动产占有者、农民组成的叫作同业公会的自由同盟，其成员在遇到疾病、不幸或受外人凌辱等情况时要互相帮助。参加公会的人，除了必须有固定住址外，还必须有好名声和一个会员的介绍。会员之间亲如兄弟，而对非会员也仁义相待。至少是在公会的章程中提到了由公会出钱帮助穷人，朝圣者等等。公会由选出来的会长和他的几个助手领导。根据公会同与之平行的和上面的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配合情况，公会受到一部分人的庇护，

而受到另一部分人的迫害。例如，在英国，同业公会几乎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查理大帝及其后的几个继承人在诏书中却威胁说，要用鞭刑、鼻刑和放逐等等来对付同业公会会员。但到后来，敌视公会的国王为了取得他们对反封建主斗争的支持而改变了自己的政策，而封建主则自然经常同公会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平和的会员们在同骄傲的老爷们较量中却不止一次地取得了胜利。公会会员们非常崇敬自己的同盟（这一同盟往往受到某位圣者的庇护），并且也往往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例如，在某些地方，有一半甚至不到一半的陪审员到场就可开庭，只要他们是同业公会会员的话。公会对市政当局的态度各不相同。在许多地方，市政机构是从同业公会产生的。但是一般说来，公会同市政当局之间并没有固定的联系。虽然最初同业公会同市政当局往往是同一套人马，但是参加公会还是要有专门的规定。有时在同一个城市里有几个同业公会，它们后来合并成一个或继续保持独立。如果继续保持独立，那么最早成立的那个公会便享有某些特权，人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些特权。正是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构成了同业公会同盟内部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同业公会成了关门主义的组织，外人很难参加，并逐渐变成了世袭的祖传的同盟。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发展，公会内部出现了严格的界限。最初商人同时也是手工业者，他们贩卖的就是他们加工过的原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两种职能分开了。例如，做呢子生意的人不再是裁缝了。皮货商丢掉了制革、鞣革和制靴的手艺等等。一旦这种社会分工达到了相当完备和明显的时候，同业公会的大门便对手工业者紧闭了，而只有商人和不动产的占有者才受到同盟的庇护。在近代德国、丹麦、比利时的同业公会章程中往往规定禁止吸收“双手肮脏”、“指甲乌黑”、“沿街叫卖”的人参加同业公会。在绅士阶层的眼里，手工业者逐渐成了“不光彩的、卖苦力的、无家可归的人”。

而城市的绅士阶层最后也开始以地道的封建主的态度对待手工业者，并拥有自己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之前原封建领主所拥有的许多非常重要的权利。

在城市生活的这个时期，手工业者的同盟，即行会获得了巩固和发展。它们的使命与同业公会足并行不悖的，在许多方面甚至就是直接照抄同业公会的。但是这时的需要已经不同于同业公会成立时的需要了。生命财产的共济保险已不再是迫切需要的了，这方面的事由原来的同业公会推举出来的市政首脑来掌管。需要互助的人也改变了。同业公会的成员是不动产占有者和商人；而行会的成员则是手工业者。与此相适应，行会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小资本所有者和手工劳动者的利益。此外，行会的内部历史和对外历史都和同业公会惊人地相似。首先，行会得同与之平行的和上面的各个团体打交道，进行种种配合。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同城市绅士阶层作斗争。这种斗争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最后行会取得了胜利。其次，行会内部亲如兄弟，都为同盟的荣誉感到自豪，有模范法庭和自治制度。

行会不是关门主义的，它接受每个符合一定要求的人，它只要求从事某一行业的人们服从根据共同的需要所制定的规章。至于接受新会员的条件本身也并不很繁琐，可以说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行会维护某种手工业的利益，并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办法达到这一目的，直接是指关心生产者的福利，间接是指保证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是关心产品物美价廉。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会通过警察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声誉。如果再加上行会的政治条件，即行会同绅士阶层作斗争这一点的话，我们便可以看到，对新会员的要求几乎都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来谈一下这些要求。从事某一行业 and 出卖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是同取得市民权联系在一起的。新会员必须在道德上有好名声。他必须当过一段时间（两年到七年）的学

徒，以保证活计的质量。收学徒的仪式非常隆重，或者举行行会的全体大会，或者（因为学徒是未来的市民）由市自治局开会，在市政当局的参加下进行。学艺期满出师时也同样要隆重庆祝。当学徒和当行会师傅时，都要向行会交少量的钱。除做工者个人的手艺之外，行会还要求在生产中有一定的保证。这就是任何人未经行会同意都不得动用原料和工具。在章程中对这方面有很详细的规定。掺假和把翻新的旧货冒充新货出售的事要严加追究。章程规定会员们在工作中必须互相帮助。后来又公布了产品价目表。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章程规定禁止夜间在烛光下干活。为了避免竞争带来的不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规定了一定的假期，假期中任何人都一律禁止干活。行会的每个会员在购买原材料时都知道，应当在价钱上向他的同行作一定的让步。禁止给尚未同行会另一个会员清账的定货人干活，等等，等等。

行会不仅帮助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自立，而且保证手工业者在政治上同绅士阶层平等。更具有活力、更加渗透着互惠原则的行会同衰老、分散的同业公会的激烈斗争，终于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初以手工业者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是在取得胜利之前，行会内部便开始了解体过程，这个过程和同业公会走向灭亡的途径非常相似。行会并不是今天所谓的工会。行会是靠少量资本独立从事某种行业的人组成的团体。它们从刚刚问世的时候起就是这样的团体，它们在为自身的独立（指在拥有不动产、土地和资本方面平等的原则）而斗争的时候也表明自己是这样的团体，但是行会的这种性质是后来才突出和明确起来的。最初，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做工的人。虽然为了独自营业也需要一定的资本，但是，从当时的生产条件来看，资本的数量不可能很大。固然，手工业者也有雇工，但是雇工只要学艺期满并符合行会章程的其他要求，也可以参加行会。总之，直到十四世纪中叶在行会的章程中几乎就没有提

到过雇工。看来，到那时为止雇工的人数是极少极少的，因此也就谈不上在行会中还单独有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纯粹工人阶层。但只有弗兰德和勃拉班特的织布匠是例外。其实那里每个织布匠都只有为数极少的雇工，但是织布匠本身却为数甚多，因此，加到一起雇工的人数就相当多了，以致需要为他们成立专门的组织。但在这里，两部分手工业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敌对情绪。暂时一切都很平静。十三世纪时雇工曾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行会大会，他们拥有表决权，至于谈到工资，雇工的工资在织布匠的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分成，在某些地方，如布鲁日，雇工形式上也参与收入的分配。

从十四世纪中叶起这种和平的关系便开始逐步消失。某种手工业越繁荣，它的销路越广，就可以越清楚地看出，行会会员已经不是做工的人，而是成了资本家。行会以怀疑的眼光望着那些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涌入城市的大量奴隶，过去的奴隶和现时的奴隶。从一方面来说，劳力源源不断地涌来对他们是有利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人毕竟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至少是未来的竞争对手。于是便出现了真正的行会垄断。提高了入会费，出现了一条新规矩，要求拿出活样，能证明应试者的手艺合格，方可参加行会。某些行业的学徒期延长到了毫无道理的程度。与此同时老会员的亲属却获得参加行会的种种方便。最后，继承性的原则在行会系统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或者是在行会章程中有明文规定，至少也是实际上在实行。行会系统逐步扩大到那些过去只能秘密参加的成员，最后许多地方竟把动产甚至不动产列为入会的条件。所谓道德条件也发生了极其特殊的变化。过去是要求入会人必须有好名声，以保证不同坏人合谋干坏事。到了十四世纪，行会则限制多种人如私生子、农民子弟、金匠子弟、剥皮屠户和艺人入会。德国的行会不吸收斯拉夫人，等等。原有的兄弟友爱精神丧失殆尽，行

会本身出现了各种分化。行会分解成穷人的行会和富人的行会。例如，从同一行会中分出来皮革商行会、皮靴匠行会和修鞋匠行会。出现了前所未闻的争论和有关各行会职权范围的诉讼案。这类官司有时一打就是几百年。皮靴匠同修鞋匠，修鞋匠同皮革商，估衣商同裁缝，而裁缝又同呢货商，等等，他们之间有打不完的官司。妇女离开了最适合于她们的职业。然而，只要妇女能拥有从事某种生产的权利，他们也不准男子参加。她们的全部生活只限于极小的范围内，她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小块地盘并且对身外的一切都疾恶如仇。与此同时，工业本身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再有任何改进和发展；行会师傅的责任大部分都是每年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生产的只是这种，而不是别种产品，数量不增加也不减少，质量不下降也不提高。

此外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更为重要的现象，这就是单一的或几乎是单一的行会分解为行会师傅、学徒（有权并且可以在学艺期满后参加行会）和所谓的常年帮工，即严格意义上的雇工这三部分人。在英国，行会师傅和帮工利益上的冲突在1349年的鼠疫之后便彻底暴露出来了。那是可怕的年代。整个整个城镇的人都死光了，全国一片荒凉。什么都涨价。神甫提高了做祈祷和弥撒的收费等等。商人利用货源不足抬高物价。劳动力的价格也猛涨。庄稼无人收割，烂在地里，成群的牲畜失散了，因为收割庄稼和放牧的人索价太高。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雇工、帮工不同意按过去的工资为行会的手工业者干活。于是政府出来干预，颁布了一系列命令，目的是为行将崩溃的各种关系确定某种准则，而这一准则，不言而喻，就是保持发生鼠疫前的那种关系。政府还规定，雇工干活的工资只能同发生鼠疫前一样多，规定行会、手工业者支付的工钱不得超过从前的数额。但是，从这时起行会师傅同雇工之间的斗争就已公开化了。在这一斗争中帮

工惯用的办法就是大家一齐拒绝上工。但这种办法本身要求雇工之间有某种团结。而在十四世纪也确实出现了帮工的“帮会”，这是一种同手工业者行会以及早期的同业公会非常相似的组织。帮会的章程中提到了集体做礼拜，共同起伙，合伙出钱安葬，互助等等。任何一种工业的每个帮工都必须参加帮会。任何人，如果同别的会员有了纠纷，在起诉之前都必须首先在帮会会长面前，而后在行会会长面前谋求和解。从这方面来看，“帮会”似乎是行会的补充，是行会的原则在帮工中的继续。因此帮会一般都得到行会师傅的承认，并且是经他们同意才建立起来的，但又并不完全如此。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帮会同与之并行的和上面的社会团体发生种种冲突。我们不准备进一步谈这些帮会和工会的历史了，因为它们的历史最后已经超出了中世纪的范围。在这里，我们只指出下列情况：工人协会同行会师傅的同盟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尽管有时获胜，有时失败。然而就生产分散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彼此隔绝和敌对的意义来说，工人协会仍然属于行会体系，因此工人协会也离不开彼此之间的争斗。帮工必须拿出一定时间去走江湖，以便熟习自己的行业，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会有一些共同的栖身之处，并且在新的地方建立起新的联系。所有这些联系和关系都渗透着深情厚谊。但是，只要帮工一遇到其他的敌对行业的代表，立刻就发生争执、打架，有时形成大规模的斗殴，双方打得头破血流。

这就是关于中世纪各种工业同盟的产生、发展和没落的情况，当然，是非常简略的情况。它是很有教益的。首先可以看到一幅五光十色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不谈封建贵族老爷和他的农奴，也不谈教会关系，谈的是远离任何劳动、鄙视劳动的商人，是制靴行会的手工业师傅，他只会生产新靴子，是和他相近的另一个行会的师傅，他只会修鞋，其次是其他一些极其分散和孤立的行业的

行会师傅；再其次是帮工，他们不仅本身同行会师傅不一样，而且被分配在许多分散的行业中。上述几类人之间有严格的政治、法律和道德界限。他们都紧紧地抓住由上述界限所规定的那一小块生活天地。每个人都起一小部分独特的作用。但是显然在由此产生的整个社会生活很复杂的同时，一个中世纪的人的个人生活却势必很贫乏，并且变得越来越单调、片面。我们的周围是截然不同的分工形式，我们有良好的交通、邮电、报纸，因此对四周为关卡和城墙包围的中世纪人的那种极其单调的印象，我们甚至难以想象。他们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在没有一线希望的情况下生活，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处境能有所改变。

决不能认为，这种狭隘、片面、精神上的贫乏仅仅是行会体系带来的。毫无疑问，由于对生产的规模和方法有严格的规定，各生产部门又非常分散，所以在这里印象的贫乏和单调势必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精神上的贫乏虽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却同样很具体，并且是中世纪各个阶级所共有的。基佐说得对：“‘人民’这个词是同某个整体，同社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用这样的词来表示这个时代的农村居民，就要犯错误。这种居民并没有构成社会，他们的活动仅仅限于当地。隶农不同在他们居住的土地之外的任何人打交道，不同任何人，也没有必要同任何人进行联系。”（《欧洲文明史》）

米什勒在其著名的著作《巫婆》一书的《为什么中世纪陷于绝望》一章中所表明见解更接近于真理，他说：“在整整一千年的过程中，过去时代所未曾有过的苦闷使中世纪处于不知是醒还是梦的状态。人们一阵又一阵地感到无聊，即所谓的困倦，尽管教堂在惯常的时间里不停地打钟，人们却感到困倦；尽管用鼻音唱着古老的拉丁语的歌，人们也感到困倦。一切都预料到了，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一切都将照旧。明天的苦闷是肯定无疑的，它使得人们今天

就已经感到困倦，而未来的远景是长年的无聊，它象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人们的身上，使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命中注定的无聊感自动地一阵又一阵地发作，永远没有尽头，使人感到毫无办法，丧失一切希望。在笃信宗教的布里塔尼把这种病说成是魔鬼作祟：布里塔尼的农民说，这个魔鬼躲在森林中为过往行人作弥撒和祈祷，直到最后死于困倦。”当然，中世纪的人并没有患就字面意义来说的困倦病，那时人们生活中有爱情，有感觉，有思想，但这一切都被驱赶到一个极狭窄的范围内。那里都是一些令人厌倦的，并且确实是几乎使人昏昏欲睡的、几乎是能够催眠的单调的印象。而高傲的贵族老爷们由于龟缩在高墙深沟环绕的城堡里，他们有时出来只是为了进行掠夺和同骑士们比武，事后便又躲进城堡，因而也注定要饱尝单调之苦，他们的妻子就更不用说了。总之每个人的个人生活都表现为单调、狭窄、静止不动。

然而米什勒还找到了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中世纪陷于绝望”，是因为个人生活无保障。尽管中世纪个人生活的表现形式是静止的，但是任何一个自由的人都能变为附庸，附庸能变为仆役，仆役变为奴隶、农奴。实际上固然是这样，但是却不能用中世纪的风尚来衡量今天欧洲对个人自由的渴望。毫无疑问，当时就已经有人认为个人自由是一种幸福并且厌恶一切形式的依附关系。但是这绝不是普遍的现象。总的说来，中世纪的人不仅不因依附关系感到苦恼，反而去谋求这种依附。典型的中世纪人的最突出的心理特征之一是有一种奇怪的需要：甘愿服从别人，使自己的意志听从别人支配。而中世纪的依附关系的等级则完全符合这种需要。封建领主、附庸、奴隶、隶农、农奴成为这种等级中必不可少的阶梯。每个封建主有自己的附庸，而他本人就是或者会变为另一个封建领主的附庸。这种等级是没有尽头的，因为它一直延伸到至高无上的神，直接在神之下的是上帝在世上的全权代理人——一

一部分人认为是教皇，另一部分人认为是皇帝。一般把这种等级解释为暴力或赤裸裸的惩罚的产物，他们说，弱者不是被强行置于强者的附庸或奴隶的地位，就是自愿委身于强者的保护和庇护之下，以免遭受更厉害的压迫。这两种原因都不能否认，但是必须指出，中世纪有许多自愿的，同时也是绝对无私的自愿服从的范例。上面举的阿腊贡国王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自愿宣布向教皇称臣一事并不是罕见的或唯一的例子。恰恰相反，有许多具备各种身分的人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上帝的或某位圣者的奴隶，实际上也就是成为教皇或某个神职人员或宗教团体的奴隶。其次，骑士“为夫人效劳”的做法的本身性质，甚至外表的某些形式都和附庸关系极为相似，这是中世纪自愿服从的另一个有趣的例子。骑士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那位夫人，为了取悦于她，或是为了对她表示尊敬，遵照她的命令建立了光辉的业迹，或干下了令人愤慨的坏事和不可想象的蠢事。这里必须指出，骑士在承受这种有时是决不轻松的担子的同时，仍然受到自己的封建领主和自己的团体的束缚。最后，中世纪的人还准备为魔鬼效劳，于是成批的人，为了这位想象中的崇拜偶像，接受苦难和死亡。由此可见，如果说中世纪的人是自愿地、无私地为教皇和女人，为魔鬼和上帝效劳，服从他们，顺从他们，那么就可以认为，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有不少真实的无私的忠诚和顺从的成分。当然，从某种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似乎可以认为，一个人即使是在崇拜教皇和女人、上帝和魔鬼时也是出自这样一种简单的考虑：死后得到好报，在尘世上得到神鬼的帮助，获得女人的爱情，等等。但是，无论这些普遍的看法中包含着多少正确的成分，也不能否认世上有这样一种顺从，它远离个人的考虑而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世上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真诚地、甚至热情地吻着那只打他们的手和压迫他们的桎梏。这也就是中世纪出现的独立存在的顺从，它的表

现形式极为丰富，从崇高的自我牺牲到消极的、几乎是象牲畜一样的忍耐，从兴高采烈地、庄严地把自己的意志交给别人支配，到默认别人有权殴打、掠夺、处决和赦免自己。当然，我并不认为，可以肯定中世纪人生活的动机仅限于此而不是出于是否有利的考虑。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更何况哪里有挨打的人，那里就一定有打手，哪里有顺从的人，那里就有征服者。我只认为，人们情愿顺从、效劳和服从的情况，在中世纪要比其他任何历史时代多得多。对中世纪持赞许态度的历史学家也对这种情愿的崇高形式表示赞赏，认为它是纯道德规范的特点。但是，且不谈与这些崇高形式并存的还有一些奴性的，甚至几乎不是人所具有的而是狗所具有的形式，——这就是想把自己的意志交由别人支配的病态需要，它是从中世纪的社会生活制度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并且在中世纪的制度下不可能平平安安地、舒舒服服地得到满足。因为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服从谁？服从什么？乍看起来，中世纪的社会关系是某种秩序井然的东西，很象由一个个套在一起的盒子构成的玩具，每个盒子中有另外一个盒子，而它本身又放在第三个盒子当中。例如，帮工或工人参加帮会，帮会参加行会，行会又参加市自治局。又例如，农奴属于封地，封地拟人化为封建主，封建主又有自己的封建领主，封建领主又是另外一个封建领主的附庸，等等，如果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而且有规则，那么社会等级的各个不同的阶梯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实际上的关系要复杂得多，琐碎得多。工人仅仅能够以所谓的一半身子参加行会。作为一个织布匠，一个皮靴匠，他可以参加行会，但是做为一个工人则不准他参加行会。城市由于划分为郊区、区段、街道而受几个领主的管辖，其中有世俗领主，也有教会领主，两者属于经常发生冲突的两个不同的等级：世俗等级和教会等级。实际上不可能同时服从所有的人，否则就真得把一个人分成几份。而中世纪的人，正是

由于异乎寻常的顺从，势必经常表现为不顺从。我们看到，十三世纪初，法国人和英国人确实显得相当消极，不顺从自己的国王，但这正是因为他们衷心地服从神权。我们看到，十三世纪五十年代，法国人拒绝服从王后布兰卡关于把大主教监禁自己农民的监牢大门打破的命令，因为他们不敢。然而一旦布兰卡作出了榜样，亲手向牢门砍了一斧之后，囚徒们就在一瞬间获得了解放。

研究法国农民的俄国历史学家指出：“封建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碰到人民群众的反抗……当时下层阶级在人数上处于优势，而且正赶上暴风雨般的战争年代，当时人们总是和刀剑打交道，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下层阶级为什么不起来反对君主占有已故僧侣的动产呢？问题就在于在那时的人当中软弱的榜样多于勇敢的榜样……自尊心很差，弱者在强者面前一再低首下心、卑躬屈节、操着奴隶的腔调讲话，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他们是奴隶般驯顺的灵魂，是不幸命运的产物’。”（卡烈也夫《从远古到1789年的法国农民简史》，1881年华沙版。）

十

然而“下层阶级”在中世纪却如急风暴雨那样不止一次地起来暴动，那时人的心灵上的弹性限度终于被超过了，那时的压迫和暴力已经使人忍无可忍。随着岁月的流逝，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巴比伦塔的根本遭到破坏，终于轰隆一声倒塌了。但是，这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而斗争的形式和结果则带有中世纪最典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服从和模仿。我们现在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由于中世纪人的印象单调、贫乏和一成不变，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仔细观察一下上述行会体系发展和解体的历史，我们便可看到长期不断的斗争，先是同业公会同封建主的斗争，再是行会师傅同城市绅士阶层的斗争，最后是工人同行会师傅的斗争。商人、企

业主、手工业者和工人依次地登上斗争的舞台。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部分人只要一登上舞台，便重复前一部分人的手法，并导致同样的结果。而且每个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不单是模仿自己的前人，还规定出模仿的细则，在本组织里、在生产中、在生活方式上都不得有违。无论是手工业者，也无论是工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得有任何特色和创造：他们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必须以确立的样板为准。他们无穷尽地互相重复，自我重复，代代相传，并通过越来越牢固地确立行业、权利和义务的继承性原则来达到这一点。他们作为自愿同盟的会员盲目地服从这些同盟发出的和没有发出的命令，他们不仅仇视真正的敌人，而且也仇视自己的弟兄，手艺人或工人，只要他从事的是另一行手艺。对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的严格规定，也同行业必须继承一样，都是各种社会职能和各个社会集团分散、孤立和与外界隔绝的产物。如果说在极北地区令人难以容忍的单调生活使精神病通过感染和模仿而大为流行的话，如果象瓦茨所断言的那样：在与外界隔绝生活单调的部落和社会中通过本能的模仿，甚至连人们的面部特征都一样（《未开化民族人类学》第1卷第77—78页），那么就可以认为，中世纪的种种规定决不是什么沉重的、难以忍受的强制性的东西。它们只不过是所谓把生活本身的命令加以编纂，因为除了极少数例外，有没有这些规定都一样：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又模仿第三个人。

但是，这时出现了真正的人民起义，看来有把整个社会翻转过来的危险。例如，十四世纪，在法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举行起义。备受凌辱的妻子、女儿、姊妹，饥寒交迫、遍体鳞伤的丈夫、父亲、兄弟，终于认识到了，他们同贵族老爷一样，都是同样的人：“我们同他们一样，也有四肢，也有躯体，也一样能感到痛苦。”这些“雅克”洗劫并且破坏了封建主的城堡，杀害了封建主本人及其家属。打

击是毁灭性的。但是正如一位编年史作者(弗鲁瓦萨尔)所说的那样,“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不知道,而只是照别人的样子做,并且认为,必须通过这种办法消灭世上的一切贵族”。声势浩大的扎克雷起义在坚持几个星期后被扑灭了,雅克们被淹没在血泊中。但后来又有极少数农民,在几个得以幸免的雅克的率领下请求长官们允许他们甘冒风险,去同入侵法国的英国人作战,而战胜了雅克的那些奢华的贵族老爷们竟对英国人一筹莫展……但是,后来这样一类的起义却使胜利者付出了多得多的代价。然而这已是中世纪末期的事了,当时整个封建—天主教制度已经摇摇欲坠。但是中世纪群众运动本身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坚毅精神、缺乏计划、缺乏目标和方向,以及主要是靠服从和模仿,这一点在十四世纪的扎克雷起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中世纪的群众,可以说是最理想的群氓。由于丧失了一切独创精神和坚定性,由于印象的单调和个人生活的贫乏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因此他们似乎经常在期待着英雄的出现。只要在他们那种永远单调乏味、使人难以忍受的静止的生活中闪现出任何一个特别突出的形象,这就是英雄,于是群氓便跟随着他走去,但是又准备在走到一半的路程时转而去跟随映入眼帘的另外一个形象。然而正是由于群氓的这种异乎寻常的顺从,中世纪的英雄们一般说来意义都不大。在那个时候,要想成为一个英雄,不需要具备什么领头人的特点。例如,不需要是某种集中了群氓本能或愿望的思想的传播者,不需要有行动计划,不需要有统治者的骄横或捕捉心灵的能手的柔情。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在街上跳起舞来,——他就是英雄;去解救圣墓——是英雄;当众抽打起自己赤裸的身体来——是英雄;去打犹太人——是英雄,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群氓与英雄之间的关系是最起码的,因此也很少有教益。在这里有教益的仅仅是,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英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虽然使群众服从的奥秘非常简单,但它极不可靠,有利也有弊。我们在前面引用过的士兵的例子中就看到了这一点,那些士兵可以说是被自己的生活所催眠,因而提供了无条件服从的样板,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自动的力量却指向同掌权者的愿望截然不同的方向,谁要想统治人们,迫使他们模仿或服从,他就得象做催眠实验的催眠学家那样行事。他必须在一瞬间给人们以强烈的印象,使之完全为这种印象所控制,从而暂时抑制住其他一切感觉和印象(意识的片面集中也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或者是把这些人置于一成不变的单调印象的条件下。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能几乎是创造出奇迹来,使一大群人听从他的指使而无需借助于强力。但有时这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靠英雄的个人努力取得的,有时则根本不需要这种努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品质或身体素质。在后一种情况下,任何人都能成为英雄,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回到中世纪自由手工业同盟的历史上来的时候,我建议读者把这段历史看成是我们在前面的某一章中对亚当·斯密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理论所作的评价的实证。我们看到,这两位思想家把共鸣、同情和自动模仿等同起来了,至少是混淆在一起了。我们还看到,他们的意见是同模仿可耻行为或残忍行为的事实截然对立的,尽管不能否认,在共鸣和模仿之间有某些共同之点。这种共同之点,可以用康金斯基先生或他引证的路易斯的话来表达:“想同周围的人一致的愿望”。但是援助挨打的人和参与打人——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前者是想同受难者一致,后者是想同迫害者一致。行会体系发展的历史对问题的全面答案作了提示。

起初,同业公会以及行会对人,甚至对同盟之外的人都极为仁慈。它们的会员能够同情弱者、穷人并“同他们一致”,体验他们的生活。但是随着分工使社会产生了日益深刻的界线,想一致的愿

望虽说还有，却已大大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和方向：同情正被模仿所取代。同情的因素日益减少，模仿的因素日益增多，以致体现社会分工的各个部门的代表之间可能会打得头破血流，势不两立，能够彼此隔绝、疏远，以致商人把手工业者、行会师傅把工人、皮靴匠把铁匠视为异物，可以对之施加任何残暴行为和进行欺骗。由此可见，尽管共鸣和模仿的基础有某些共同之点，但是它们的方向却截然不同。同时，因为模仿是印象单调所造成的，所以它最能从有严格分工的社会制度中吸取营养。在中世纪这种效果尤为强烈，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根本没有通过某种方式调整分工中不合理部分的因素。

译自《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1896年
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95—190页。

再论英雄^①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

—

巴甫连科夫先生出版了一些科学价值和哲学价值极不相同、倾向和性质也极不相同、但内容十分相近的书籍——龙布罗佐的《天才和疯狂》、雷尼亚尔的《思想流行病》、若利的《伟人的心理》、卡莱尔的《历史上的英雄和英雄业绩》、塔尔德的《模仿的规律》。这

① 这篇文章发表于1891年。——编者注

些书都谈到两个非常重要而又互相联系的问题：伟人的作用和群众的心理。这类著作中还包括巴甫连科夫先生出版的另外一些书，都是论述在探讨伟人的作用和群众的心理时必然产生的一些有关人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内心活动中某些尚未弄清的问题（赫尔岑的《普通心理生理学》，里博的《注意力的心理作用》，西蒙的《幻想的世界》，居莱尔的《当代狂人》，曼特加札的《人的神魂颠倒》），此外还包括一套称为《名人传》的传记丛书，该丛书分若干专题论述，目前已出版了近八十种。显然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出版计划。但我对此并不准备详谈。我只想重复一点，即上述书籍各有特色。

至于伟人的作用和群众的心理这两个问题相互有联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人在谈到伟人时，都会谈到他对群众，包括他对当代人和后代的影响。反之，任何人无论议论什么样的群众运动，都一定会指出运动的领袖。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对社会生活中的这两个因素所起作用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一部分人认为，历史是由无名群众集体创造的，所谓伟人不过是这些无名群众表现出来或未表现出来的全权代表，他们和奴仆差不多，尽管有时也以统治者的面貌出现。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人类的一切都只能归功于伟人，而历史本身不过是“伟人传”。这两种意见代表了两个极端，介乎两者之间的还有种种意见，在不同程度上，有的更接近于前者，有的更接近于后者。

“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传”这句话是《对英雄的崇拜》一书的作者卡莱尔说的，可以说在他之前或之后还没有一个人把伟人抬高到如此的地步。顺便说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总的说来出色地完成了自己艰巨工作的该书俄译者却避免使用我国在翻译卡莱尔作品时早已肯定下来的一个正确译法——“对英雄的崇拜”。雅科温科先生（译者）在该书第 276 页，继法译者之后，在翻译 worship（崇拜）一词时也遇到了困难，他无法表达卡莱尔在此处使用该词

的原意。但是法译者在译 hero-worship(英雄崇拜)一词时,至少是在翻译书名的这个词时并没有感到困难。卡莱尔这本书的法译本,其书名同英文原文完全一样:Les héros, le culte des héros et L'héroïque dans l'histoire («英雄,对英雄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而雅科温科先生却把这本书的名称译为«英雄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而干脆省略了使他感到棘手的词。然而,雅科温科先生在自己的序言中列举卡莱尔的著作时却给这本书用了另外一个名称,但这次的名称又太长了:«论英雄,对英雄的景仰和历史上的英雄时期»。且不说使用“英雄时期”一语是不恰当的,就是用“对英雄的景仰”来表达卡莱尔的思想也嫌太弱。我认为,“对英雄的崇拜”这几个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最恰当不过的。

卡莱尔的书是五十年前写的。但是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要想理解他的那种以独特的叙述方式表达的独特思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雄》这本书并不是知识性的书籍,因为书中顺便提及的某些实际材料,远不如其他一些书籍提供得那样完整,虽然那些书籍比起这本书来写得远为逊色。然而这本书也不属于说理性的书籍,因为它极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习惯,无论是坏的习惯,还是好的习惯都一样。尽管如此,这本书却具有巨大意义。“想象丰富”这个词用在卡莱尔身上,可能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卡莱尔的思想贯穿着最崇高的理想主义,可以说洋溢着对人性美德的信念,它在空中翱翔,通过出色的比喻和突变的笔法而大放异彩,如果说它有时也降落到地上,那么也仅仅是为了用它那冷嘲热讽的爪子抓一下土地,便再度冲向云霄。你只能欣赏他,但是却不能对他表示赞同或同他争辩。尤其有趣的是,当他试图以某人的名义反对他自己的时候。该书的第一章谈的是“作为神的英雄”,是以斯堪的那维亚的暴风雨之神奥丁为样板的。但是卡莱尔却认为奥丁并不是神,奥丁曾经或者应当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存在。卡莱尔知

道，“历史对奥丁毫无记载”。他无意以斯堪的那维亚的编年史作者记下的传说为依据，却把这些传说斥之为“仅仅建立在不足为凭的基础之上”。接着他又援引格林对词源的见解，格林甚至“否认曾经有过奥丁这样一个人”。卡莱尔“崇拜格林的权威，崇拜格林的词源学知识”，却又试图用自己对词源的见解加以补充，但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则是倾向于为奥丁恢复名誉的。接着他又笔锋一转突然提出：“然而我们并不能由于这样一些词源学的推论就忘记了人。当然，过去确实有过导师和领袖，当然，在某个时代应当有过奥丁，他是可以为人所觉察和感觉得到的，他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位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英雄！”如果有人认为，这种突变的笔法是一个人由于不能证明他想证明的东西而采用的一种怯懦的支吾搪塞的手法，那便大错特错了。大家可以看到，卡莱尔抛弃了编年史作者的记载，却原原本本地引用了格林的见解，而对于他的论题来说，前者是非常有利的，后者则是不利的。然而这些“推论”，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无关紧要，但只要涉及它们，立刻就可以提到对人类美德的信念的高度，于是问题便迎刃而解：“难道我们不能设想奥丁是确实存在过的吗？诚然，过去对事物有过错误的认识，有过很错误的认识，但我们决不相信，我们的祖辈会把地地道道的欺骗、无稽之谈、蓄意的胡言乱语信以为真。”传说经过世代流传无疑地夸大了奥丁的形象，但确实有过奥丁这样一个人，他粗暴、野蛮，但他是个伟人，是个“英雄”，由于他的伟大引起人们普遍惊讶，普遍赞赏，因而人们便把他神化了。

当然所有这一切对任何人来说都很少有说服力，但卡莱尔却是个例外，这一切在卡莱尔的观念体系（如果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中是根深蒂固的。

卡莱尔认为，在应当接受实验、观察、测定、逻辑推理的各种现象世界之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世界，无论科学如何发展，

这个世界对我们说来永远是个秘密和“奇迹”。卡莱尔一向蔑视那些认为自己认识了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否认事物有内在本质的科学家和理论家。在这方面他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遥远的祖先和当代的野蛮人思想幼稚：他们既不否认存在着一个伟大的秘密，但也不想去洞察它。卡莱尔说：“例如，火的威力（我们用某个沿用已久的化学术语来表示它，而术语则偏偏向我们掩盖了这一现象以及一切现象所表现出的奇迹的真正性质）在古代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看来乃是约同家族中最敏捷、最具有诱惑力的魔鬼洛克。马利亚纳群岛上的野人（据西班牙旅行家们说）认为，他们迄今从未见过的火也是一种鬼或神，生活在枯树上，只要碰它一下，它就狠狠地咬人。但是任何化学，只要得不到愚蠢的支持，都不能向我们隐瞒，火焰是一种奇迹。确实，什么是火焰呢？”可见卡莱尔所谓的“奇迹”和一般对奇迹的理解全然不同，它并不是自然规律中的例外，恰恰相反，它是我们所不理解的这些自然规律的内在本质。我们一般所谓的奇迹在卡莱尔的观念中甚至根本不存在。卡莱尔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然而，按卡莱尔的说法，“自然界是神奇的”，整个自然界，包括火和水，也包括水里的，包括大地，也包括地上的和天空的，还有人本身，所有这一切毫无例外都是地道的“奇迹”，对我们说来，这一切永远都是秘密，尽管我们也可以测量、观察、确定世界的非凡的一面或现象世界。卡莱尔说：“穆罕默德未能创造出任何奇迹。他往往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不能创造任何奇迹。他高声喊叫：‘你们需要奇迹吗？你们究竟想看到什么样的奇迹呢？看看你们自己吧！难道你们本身不就是奇迹吗？’”

我们命中注定生活在现象世界里，研究这一世界，并尽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一世界，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或者说是世界的另一面，这另外的一面，对我们说来是不可理解的、

神秘的、神圣的。我们不可能洞悉它，试图权衡它，测量它，解释它是愚蠢的；我们只能毕恭毕敬地拜倒在它的面前，而不期望由此得到任何奖赏。“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在从事学术活动和查看百科全书时准备忘掉神圣。然而神圣是不应该忘记的！一旦它真的被忘记了，我不知道那时还会有什么需要我们去记住。我认为这样一来，大部分知识都会变得死气沉沉，成了无人问津的旷野荒郊，成了充满无谓争吵的空间，成了晚秋的枯草，毫无生气。没有神圣，最完备的知识也不过是被伐倒的建筑用木材，它已经不是生长在森林中的活树，不是可以不断提供建筑材料和其他产品的森林。人如果不崇拜以某种形式出现的某个东西，他便不能了解任何东西。否则，他的知识就成了无谓的迂腐之谈，干巴巴的没有生气的枯草。”

我们把有限才智用于探索事物的力学解释，赋予事物以数量和度量，当问题涉及现象世界时，这样做是完全应当的。但是企图把整个自然界的本质，包括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都归结为可以计算的力学，却使卡莱尔感到愤怒。因此，他对边沁的“赤裸裸的机械功利主义”及其把道德建立在用数学计算痛苦和快活的基础上极为不满。然而卡莱尔反对的功利主义（不仅仅是他心目中边沁的功利主义）还有其他的理由，有一种意见认为，穆罕默德故意在他的宗教中加上了各种感情的诱饵。卡莱尔反对这种意见，他说：“谁要是说轻松和期望在世上或阴间得到快乐或奖励，得到某种甜蜜的果实可以推动人们作出英雄行为，那他就是对人们的诬蔑！在最差的人身上也可以找到比这类动机高尚的东西。被雇佣来从事杀人并且宣誓忠于现存制度的可怜的士兵，有自己‘士兵的荣誉’，而不是受服役条例或每日一先令官饷的驱使，不是为了品尝什么嗜好，而是要完成崇高的事业，向苍天证实自己无愧于做一个按上帝的模式创造的人，——这才是亚当的子孙中最差的人

的真正愿望。只要为他指明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最受压制而不敢反抗的奴隶的内心也能燃起英雄的火焰。谁要是说，人的行动准则是轻松，那他就是对人的极大侮辱。困难、忘我、殉难、牺牲——这才是吸引人心的诱饵……不是幸福，而是某种更崇高的东西在吸引着人，这一点甚至在庸庸碌碌的群氓身上也可以看到：他们也有自己的荣誉之类的东西。宗教能够赢得信徒，仅仅是靠唤醒我们每个人内心沉睡着的英雄主义，而不是放纵我们的欲望。”

我们且把如何处理对功利主义的这种反驳的问题放在一边，看看卡莱尔所谓的英雄、英雄主义、英雄业绩这些概念指的是什么。

非常奇怪的是，我们在《英雄，对英雄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一书中竟找不到为“英雄”一词所下的固定的定义。卡莱尔有时使用这个词指的是它的普遍的、略微模糊不清的含义，也就是指精神饱满、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有时他给英雄或伟人下了比较确切的，但局限性比较大的定义。伟人“具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准确地判断时代的要求，并且具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引导时代直达目的地”。在其他一些个别的定义中卡莱尔特别坚持这一点：英雄是一个“诚挚的”人，而可能最独特的一点则是：英雄是一个“顺从的”人。但这并不妨碍英雄可以成为统治者，成为人们崇拜、服从、迷信的对象。然而，实际上在该书中英雄本身“顺从”的特点并不起任何作用。这种奇谈又同另外一种怪论有关：英雄是在愚昧的群众中偶尔出现的杰出人物，是孤零零的火花，他们的言论“与众不同”，他们的行为非常突出，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是英雄。对英雄的崇拜一向就有并且今后也将永远存在，——崇拜比我们高明的人是出自内心最深处的需要，同时也是人性的最崇高的特征。这就是卡莱尔贯穿全书的基本信念。但与此同时，根据他的叙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英雄湮没在群氓之中并形成所谓的英雄群

氓。卡莱尔预言，将来“并不消灭对英雄的崇拜，更确切地说，会出现整整一个英雄世界。如果英雄意味着诚挚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成为英雄呢？是的，整个世界都是由诚挚的宗教信徒组成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不可能不是这样！它将是英雄的真正崇拜者的世界：真正的卓越人物在任何地方也不会象在这个世界里受到如此的尊敬；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诚挚的好人！”卡莱尔在另外一处提到“整个的英雄民族，在这个民族当中不仅是伟人，而且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天赋的使命，因为做到了这一点，他也就成为一个伟人了。我们知道，人类已经以长老会教派的形式经历了这样的处境，人类还将以另外的更高的形式经历这样的处境”。最后，卡莱尔还在一处指出：“伟人对于比自己高明的人永远是忠顺的、恭敬的；只有卑鄙的小人才不是这样……诚挚的人就其本性来说也是一个顺从的人，只是在英雄的世界里才认为服从英雄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切都讲得相当含糊，但是要想把它弄清楚毕竟还是可以的。除了给英雄下了种种个别的定义，如说英雄是诚挚的人、勇敢的人等等之外，从卡莱尔的整个世界观来看，英雄“可以透过事物的表面认识事物的本质”；英雄“对我们来说”是“来自无穷的未知世界内部的信使”。总之，英雄或伟人是我们在其中的现象世界和构成事物本质的我们永远不理解的神秘的神圣的世界之间的中介人。伟人也并不能为我们揭示这个世界的奥秘，但是他们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存在有一个巨大的秘密，使我们超出过眼烟云的尘世的水平。而我们对某种伟大的确实存在的、但又不为我们所理解的东西自然而然产生的崇拜，也转移到伟人的身上。于是就产生了对作为领袖、领导群氓的特殊人物的英雄的崇拜。英雄同无限的未知世界的亲密关系反映在他们具有崇高的性格特点和远

见卓识上,但是在这之后,倘若由于环境的缘故,追随英雄的所有群众,也象英雄一样,深信存在着一个无限的、未知的、无法解释的世界并且把它时刻记在心里,那么作为特殊人物的英雄便会消失并且每个人都会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无限未知世界的形象而对它加以崇拜。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卡莱尔说的对英雄的崇拜毫无卑躬屈节的成分。卡莱尔蔑视怀疑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也蔑视它的对立面——认为数量和度量也可用于衡量人的精神。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一点表现在他对边沁的功利主义的态度上,还表现在他对以选票为依据的政治理论的态度上。他希望“一个人(即大家都崇拜的英雄)的少数”获胜。但是,并不是地位能使人增光,而是人能使地位增光。伟人和高官显爵可能是一致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照卡莱尔的意见,拿破仑、克伦威尔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也可能不一致,例如,太阳国王路易十四就是这样:“只要把我们的路易十四身上的衣着剥光,他的伟大便会荡然无存,而只剩下一个丑八怪。”卡莱尔认为任何社会都是一种有组织的崇拜和服从,都是一种“等级制度”,因为这一原则中含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因而他准备把任何怀疑主义都看作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甚至把最苍白的自由派纲领的胜利也看作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英雄》一书对批评界来说也是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批评界甚至不敢对它加以解释,更谈不上指出其美中不足之处,《英雄》一书对任何政治理论来说,也同样是如此。对于卡莱尔来说,十八世纪末和法国革命是某种尽管伟大、但很可怕的东西。然而,决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他是旧制度和王朝正统主义的崇拜者。我们刚刚在前面看到了他对王朝正统主义的最卓越的代表路易十四的态度,在这方面他说过如下一段话:“世界上有上帝存在,上帝的认可应当包含在一切支配和服从中,它是人类一切道德的基础。再没有比支配和服

从同道德的关系更为密切的事情了。不应当要求别人服从而要求别人服从的人是可悲的，应当服从而不服从的人是可悲的！我说，这就是上帝的法，而不管在羊皮纸上写下的是什么法；人对人提出任何要求的基础都是上帝的法，或者是“魔鬼的无法”。正如对“奇迹”一词一样，卡莱尔对“上帝的法”的理解同一般人的理解是截然相反的。在他看来，路易十四及其继承人代表的不是“上帝的法”，而是“魔鬼的无法”。对这种无法的必然回答就是出现革命的恶魔，而制服恶魔的拿破仑才是上帝的法的真正代表，因为拿破仑是“英雄”，是伟人。

我不准备继续谈卡莱尔的结论了。读者只要努力熟悉卡莱尔独特的思路和同样独特的语言，便可自己得出这些结论。在这里，我们只须指出一点，即依照卡莱尔的基本思想，对英雄的崇拜，第一、仅仅是对英雄的崇拜；第二，它毫无卑躬屈节和强制的成分。我所以强调“依照卡莱尔的基本思想”这句话，是因为实际上这两条都是卡莱尔无法克服的困难。

《英雄》一书的俄译者还为巴甫连科夫先生的名人传丛书写了一篇卡莱尔传。这篇传记写得很有感情。雅科温科先生对卡莱尔的精神领会得很透彻，他不仅掌握了卡莱尔特有的某些典型用语，而且完全象卡莱尔本人建议崇拜所有英雄那样来崇拜卡莱尔。雅科温科先生不想用某些传记和自传的材料（卡莱尔妻子的日记、卡莱尔对妻子的回忆和对她的书信的注释），他认为，引用这些材料会“有损于伟人”。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模棱两可的暗示对卡莱尔夫妇间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阐述。例如，他在一处顺便提到：“是的，和卡莱尔这样的天才在一起共同生活并不轻松。”在另一个地方也有这类暗示：“从贵族老爷的观点来说，上流社会的少女杰妮·威尔士嫁给一个石匠的儿子托马斯·卡莱尔，她的生活当然是真正的不幸……但贵族老爷的观点公正吗？”这种暗示并不恰当。问题

根本不在于卡莱尔的天才和他的平民出身，而在于他有许多令人不愉快、使人不能容忍的性格特点，但是“上流社会的少女杰妮·威尔士”却以独一无二的自我牺牲精神忍受下来了。卡莱尔本人也没有料到她会有种种的痛苦，只是在她死后才从她的日记中了解到的。如果说为了纪念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伟大，连椅子也不应弄坏的话，那么就更不应对待一个人，特别是对一位最忠实的妻子有丝毫责备。而雅科温科先生本人也认为卡莱尔的妻子正是一位最忠实的妻子。

然而，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卡莱尔的传记。

雅科温科先生说：“在我们俄国，卡莱尔不仅没有声望，而且几乎不为人们所知。我们这里几乎翻译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全部文集，而对于卡莱尔则只不过是有所耳闻……我们俄国人由于自己的思想贫乏，对卡莱尔不感兴趣，由于我们的文化落后，我们还理解不了卡莱尔内心感情的深度和他的思想的高度。”我们文化落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我们的思想贫乏”，看来却使人难以同意。至于为什么雅科温科先生要把穆勒文集的翻译同卡莱尔文集的翻译加以对比，这就完全不能使人理解了。我们这里翻译过并且正在翻译许多没有价值的书籍，但决不能把穆勒的文集列为这类书籍。此外，我看不出会有什么理由不翻译穆勒和卡莱尔的著作，但是如果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当然是应当首先考虑穆勒的。在卡莱尔的身上思想家和诗人交织在一起，而且他并不是一个诗人—思想家，而是一个思想家—诗人。我想说，他并不是用思想指导幻想的著作，而是用幻想补充事实和逻辑思维缺少的环节。因此，他的许多论点是武断的，结论缺乏根据，自相矛盾。因此，无论他丰富的思想如何独特，如何卓越，也是一个坏的思想学校，对于“文化落后”和“思想贫乏”的人们来说，尤其是这样。至于道德学校则当别论，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谈。现在

我以雅科温科先生为依据，援引卡莱尔的一篇《近日时评》的内容：

《谈黑人的解放》：“自由派关心黑人的解放，但是请问，自由的白人工人的处境又如何呢？难道向黑人许诺的也是这样的自由吗？奴隶地位至少能保证人不致饿死，黑人不需要解放，他们需要的是明智的领导和管理”，等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近日时评》是在1850年出现在报刊上的。人们会问，我们俄国至今仍不忙于把它翻译过来真的只是表现了“思想贫乏”吗？既然我们一向都有自己土生土长的政治家，而他们提出解放农奴的理由就是卡莱尔关于解放黑人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说来，《近日时评》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卡莱尔的动机同我们土生土长的政治家的动机大不相同，然而《英雄》一书的作者的见地毕竟能够给他们提供不少乐趣，可能还会带来不少益处。关于这一点似乎用不着急忙来谈。

我们现在再回到《英雄》这本书上来。

在古代，英雄就是神。奥丁就是这样。卡莱尔在第一讲（《英雄》一书共分六讲）中以鲜明而充满诗意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完全是幻想的图景，“我们欧洲的第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一切都还沉睡在曙光初照、蔚为壮观的晨曦之中，我们的欧洲第一次开始思想、存在。在这些勇敢的人们的内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惊奇、期待，正如一个孩童的思想一样。他们是大自然的勇敢的孩子，这时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一个人——他不单纯是个孤僻的领袖和战士”，等等。一句话，奥丁出现了，并被人们当作神看待。第二讲向我们描绘了英雄作为一个先知者的形象，为此挑选了穆罕默德。对英雄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已经不是神，而仅仅是受上帝鼓舞的一个人。“在世界的历史上决不会再有人被其余的人当作神来看待，无论他是多么伟大。不仅如此，我们甚至有充分理由提出疑问，过去

是否真正有一些人认为，在他们身边有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人是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大概不会。这通常都是指一个他们经常想起的、过去曾经见到过的人”。这段话比描绘奥丁时的鲜明色彩略有逊色。但是，然后又以其特有的同样鲜明而充满诗意的笔调描绘了穆罕默德这个人物。卡莱尔特别坚持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最诚挚、正直的人。并且把这一特点说成是所有英雄的最典型的特点。在第三讲中谈道，英雄是诗人，其实则是但丁和莎士比亚这两个人物。“英雄是神，英雄是先知，这是古代的产物。后来这种形式的英雄气质便不可能再有了。它们的存在是由于人类的认识处于某种原始阶段的缘故，但是真正科学的进步则使得它们不可能继续存在。需要有一个所谓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科学形式的世界，以便人们能够在惊叹中想象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他可以表现为神，也可以表现为代表上帝讲话的人。神和先知是过去时代的产物。”现在，英雄气质是诗人的一种不太自负的形式。这并不意味着英雄气质的本质有所降低，同时也不意味着对英雄的崇拜的意义有所削弱。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关于神的概念在不断澄清，不断提高。英雄的本质是始终不变的。时间条件只能决定英雄气质的形式。有趣的是，这样一来莎士比亚（还有但丁）却显得“比穆罕默德更威严，更高大”。卡莱尔说：“实际上，穆罕默德关于他的天职是预言的想法是荒谬的，引来了一大堆无稽之谈、淫秽和残酷行为，以致使我对过去肯定的东西在此时此刻也产生了疑问。我过去曾肯定穆罕默德是一个真正的传教士，而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骗子手，空虚的幽灵和变态反常的家伙，他是个传教士，而不是饶舌的人。”

思想家—诗人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观察伟大的历史人物时变得神魂颠倒并且找不到足以斥责对伟人的分析批判的强有力的语言，但后来在转而观察新的英雄时，自己却又冲淡了对伟大历史人

物的着色。尽管如此，我们在第三讲中至少可以看到一定的年代前后顺序：继英雄—神之后的英雄—先知，而英雄—先知又让位于英雄—诗人。用卡莱尔的话来说，在历史过程中英雄气质的形式就是依照这样的顺序交替的。但是反对杂乱无章和无政府状态、鼓吹服从和纪律的卡莱尔最缺乏的却是顺序、系统、纪律。在第四讲中他完全抛开了年代先后的线索，提出“英雄是牧师”（路德、诺克斯），毫无系统。卡莱尔在论述“英雄是作家”（约翰逊、卢梭、彭斯）的第五讲中似乎又回到了时代的先后顺序上来。他说：“英雄是神，是先知，是牧师，——这一切都属于古代英雄气质的形式，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其中某些形式早已不可能存在了，并且永远也不会在我们的世界上重现。相反地，英雄是作家则地地道道是新时代的产物。”然后在第六讲即最后一讲中谈到“英雄是领袖”（克伦威尔、拿破仑）。卡莱尔说道，在这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古代，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人的历史彻底弄清，过去国王是怎样出现的和王国是怎样产生的。”

但是不仅仅是在《英雄》一书中未保持时代的先后顺序。显然卡莱尔本人最初曾想保持这一顺序。然而英雄气质的各种形式，作为逻辑范畴，彼此之间的界限不够清楚，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不知道《英雄》一书的英文原文是什么样，但是在它的法译本（显然，俄译者也参照了它）中，第五讲的开头是：“英雄是神，是先知，是诗人，是牧师——这一切都是古代英雄气质的形式”，而说英雄是作家——这是一种新现象。在俄译本中把我强调的诗人这个词漏掉了。与其说我怀疑这个词是法译者自己硬加上去的，不如说我倾向于认为是俄译者由于不便把诗人和作家对立起来而勾掉了这个词。如果我的推测不正确，那么，为什么把诗人彭斯列入英雄—作家一栏，而不是英雄—诗人一栏终究是个谜。

这类混乱现象和矛盾在《英雄》一书中屡见不鲜。正因为如此，

我才说，作为纯粹的思想学校来说，卡莱尔的书并不完全合适。我们可以欣赏这一灿烂夺目的焰火，可以从而引起某种激情，但不能向卡莱尔学到怎样思想。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职业政治思想家的卡莱尔。雅科温科先生把卡莱尔未参加任何政党说成是卡莱尔“太伟大了，因此这样的框框对他来说是过于狭窄的牢笼”。这样说并不完全正确，尽管卡莱尔无疑地是个大人物。问题在于，甚至很难说他有什么政治纲领。在他的政治纲领中只有否定的东西才表现得十分明显。卡莱尔认为形形色色的王朝正统主义是“魔鬼的无法”，认为通过宪法和议会并辅以自由竞争和不干涉的经济理论而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是无政府状态。如果我说，卡莱尔政治学说中否定的这些东西很明显，这决不意味着他对这些东西都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或者说它们的提法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他与其说是在证明，不如说是在愤怒、激动和暴跳如雷。他所缺少的正是思想的明确性，因而不能判断他所批判的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在“魔鬼的无法”这个息拉和自由幌子下群众所受的经济压迫这个哈利勃达之间^①顺利地找到出路。至于他的纲领所肯定的东西，则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发现英雄，就是发现英雄、领袖或“最有能力的人”、“了解事物或能够了解事物的人”。这个药方看上去很简单。但是，首先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见解，而是让英雄提出政治见解。其次，这个药方绝不象初看上去那样简单。卡莱尔本人也清楚这一点。他说：“请给我指出谁是真正能了解事物的人或能人，那时他对我来说就会有神一样的权力。我们这个病态的时代如饥似渴地求医治病，它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较好地懂得，如何才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以及一旦找到这样的人时是否所有的人都

^① 息拉和哈利勃达是希腊神话中的两个怪物，住在狭窄的海峡的两岸，危害航海的人。——编者注

愿意承认他具有神一样的权力……当然，一方面感到必须找到自己的能人，但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种处境确实是很痛苦的！”显然，在这里可能犯了极为有害的双重错误。我们可以用任何一种类型的英雄，譬如英雄—诗人为例。例如可能会出现一位新的莎士比亚，而人们并不承认他，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承认当代剧作家或诗人笔下的“丑八怪”为英雄。但是，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自然不会持续很久，因而也不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而其他生活领域的情况则当别论。卡莱尔断言，“在英国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象克伦威尔那样的国务活动家，——在国务活动家中只有他一个人认为世上有天堂，十五个世纪以来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想。”十五个世纪！在十五个世纪当中人们究竟是怎样期待英雄的出现呢？但是由于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英国毕竟承认了某些活动家是伟人，所以，这就意味着英国犯了错误并且滥用了自己的崇拜。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比起人们由于暂时误解而把莎士比亚当成“丑八怪”要严重。

奇怪的是，卡莱尔提到的英雄中没有尤利乌斯·恺撒。我所以使用“奇怪的是”这几个字，是因为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任何意义上来说，看来都可以符合卡莱尔对英雄所提出的要求。除此之外，在过去实行的和在理论上提出的各种政治原则中，恺撒主义最接近卡莱尔的见解，当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需作一些修改和补充。正当卡莱尔在发表其《英雄》一书的时候，因斯特拉斯堡杀人未遂而被驱逐出法国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后来的国王拿破仑第三出版了《拿破仑主义》一书。卡莱尔在1840年举办了讲座，而拿破仑那本书的序言则发表于1839年。如果不是这一情况，可能就会认为，拿破仑是卡莱尔的门生，当然是个平庸的（作为文学作品，卡莱尔的书和拿破仑的书根本无法对比）和自私自利的门生。1849年在巴黎有个名叫罗米厄的人出了一本小册子《专制

帝王时代》。在这本小册子中虽然没有提到卡莱尔，但是却以卡莱尔式的热情和杰出的才能提出了和《英雄》一书中论述的原则极为相近的思想。罗米厄断言，法国在思想上、道德上和政治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神圣的东西”被遗忘了，立宪和议会的形式，不过是空谈而已，但是不可能再回到王朝正统主义上去，“专制帝王时代”即将到来。看来发生的种种事件证实了罗米厄的判断，至少是预断。他的小册子于1850年出了第二版，而1851年拿破仑就发动了流血政变。我不清楚卡莱尔对这件事的态度，虽然他对当时法国发生的事件很感兴趣。（雅科温科先生在卡莱尔传中对此同样只字未提。）毫无疑问，除了某些细节，其中包括把数量和度量用于支配和服从的神圣事业上的人民公决的某些细节外，在卡莱尔看来，拿破仑第三上台是某种合乎心愿的事。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位冒险家个人却完全没有卡莱尔要求英雄所具备的那些崇高品质。因此，我要再一次重复说，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怎样摆脱困境的。

在卡莱尔看来，对英雄的服从、景仰和崇拜，是道义上的责任，同时也是一种需要，它是社会的基石。看来，是这种双重支柱保证了大厦的稳固。实际上，如果英雄是我们只能看到其表面的“奇妙的”、“神圣的”现实世界派出的使者，如果我们不仅应当，而且也感到需要崇拜和服从他们，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别的愿望。只要英雄一出现，我们就崇拜他并且顺从地跟随他。然而，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卡莱尔本人建立自己的大厦是完全牢靠的。他相信，英雄就其本性来说，只能引导我们走向善、真、光明，因此他只需满怀真诚的喜悦和感激，闭着眼睛跟随英雄走。但是即使所有的人都情愿无私地诚心诚意地崇拜，而这种崇拜又是建立在人性的一种根本要求之上的，那么接下去就要看谁是英雄了。假如我们同意卡莱尔的意见，认为克伦威尔是英国在十五个世纪里的唯一的英

雄—领袖。然而在克伦威尔之前和之后人们怎么办呢？关于这一点卡莱尔也许会这样来回答：应当准备接受新的英雄，培养自己由于看到比自己高明的人，看到其他方面的英雄，如英雄—诗人、英雄—牧师、英雄—作家等，看到死去的英雄而产生喜悦的感情，因为他们的事业不仅仅是他们短暂一生的事业，而是留芳千古，尽管他们的尸体已经腐朽。论述英雄的言行留芳千古的篇章是卡莱尔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然而英雄—诗人和英雄—作家自然会比英雄—领袖流传得更久。卡莱尔说：“有一位英国国王，无论是时间、事件、议会、议会联盟都不能使他离开王位宝座。这位国王就是莎士比亚。难道他的胜利加冕不是真的作为一个号召我们联合的最崇高、最豪迈，同时又是最强有力的口号，作为一个不朽的口号，并且照这种观点看来，是作为一个比其他各式各样的财产和资源确实更为重要的口号在每个人的头顶上大放光芒吗？”或者说：“亚加米农，一大批亚加米农，伯利克里斯和他们的希腊现在已经通通成了遗迹！成了默默的、忧伤的历史陈迹和废墟！而希腊的书籍呢？在这些书籍中希腊直到现在对每个思想家来说依然存在着。凭借书籍，希腊可以重现。”除此之外，卡莱尔非常重视的崇拜的自由和真挚的特点完全可以用在英雄—诗人和英雄—作家的身上。实际上，对荷马或莎士比亚天才的崇拜，有时可能并不完全是自觉的，而是受了多数人意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崇拜并不完全是真挚的和自由的。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荷马，他们对我们施加的影响，则完全是由于他们天才的力量。英雄—领袖的情形是否也是这样呢？卡莱尔在一个地方甚至打算承认某个帖木儿或拔都有一定的伟大之处，他说：“毫无疑问，他由于拥有无数的军队而强大有力，他使大批民众保持了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因此，他甚至可能创立伟大的业绩。”卡莱尔过于夸大了“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的含义，他由于本身对“无政府状态”的仇视，一有机

会甚至走得更远。帖木儿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无疑地应当具有某些能使他凌驾于野蛮的鞑靼人之上的个人品质。但是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黑人解放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卡莱尔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在这里已经根本没有人想到什么英雄了，黑人应当被置于奴隶主的支配和领导之下，但是关于奴隶主的英雄气质，我们却一无所知，相反地关于他们的惨无人道和丧尽天良的行为，我们却知道得很多很多。卡莱尔因为看到白人工人的处境而忘记了自己关于“魔鬼的无法”的论断，不知为什么竟然期待奴隶主在管理上的“明智”。然而根据白人工人的处境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白人工人的处境必须改变，而决不是黑人理应处于奴隶地位。

我不想让读者停留在我对卡莱尔这本书的最后几点意见上。无论如何这本书非同凡响，它不仅能给善于重视真挚和独特的即使是错误的思想的人们带来许多乐趣，而且还能使他们受益不浅。随作者兴之所至，全书充满了精彩的旁注，其中有的很有教益。作者提供这些旁注，在某种程度上都同自己的基本论点有密切关系，而为了弄懂他的基本论点则需要作一定的努力，考虑他的思路发展和使用术语方面的独到之处。但是也可以把它们单独拿出来进行研究。为了举例，而且仅仅是为了举例，我引用卡莱尔的旁注中一个很值得我们许多诗人考虑的思想。卡莱尔非常重视诗歌作品，但是他认为大多数诗作只不过是“塞进铿锵诗句里的一些散文片断，严重地违反语法并给读者带来极大的苦恼”。他甚至怀疑大多数诗作者有一定的思想要表达。如果有一定的思想，他们就应当“干干脆脆、毫不矫揉造作地向我们讲清楚问题”。诗的形式，只有当它和思想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当人无法用散文来表达它的时候，才应当采用。这一切都同卡莱尔的下述论点有关：“诗歌是语言中的英雄”，但是，即使孤立地从援引的这段话来看，

他的思想也很值得重视。确实，既然用散文可以表达同样的东西，那又何必要用韵律呢？

但是，卡莱尔这本书的威力和作用当然并不表现在这类旁注上。

认为伟人、英雄是历史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的理论，当然是同无名的群众性集体活动的理论相对立的。关于后一理论的某些不同形式的说法，读者可以在卡烈也夫《历史过程的实质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中找到相当充分的论述。但是一般都是只谈这一理论，并且作了比较中肯的表述，而在这之后却用另外一种远为一般性的理论把它偷换了。因为，论述一般都是从论战开始，一上来就反驳伟人理论，认为它是一种比较陈旧的、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理论。然而，主要并不是指卡莱尔，因为卡莱尔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中完全是孤军奋战，并且按他自己的观点来说，卡莱尔在五十年以前就有理由抱怨对英雄尊敬的程度下降了。卡莱尔的影响可能仅仅表现在传记书籍的增加上，而不是表现在人们掌握了他的理论观点上。最流行的一种历史著述虽然同卡莱尔毫不相干，而且在细节上往往同卡莱尔关于英雄的概念截然不同，但它同“伟人传”非常相似。只是必须对“伟人”或“英雄”这一术语做一点小小的补充说明，卡莱尔所说的“伟人”或“英雄”仅仅是指为人类造福的人，而全然不考虑那些要人们服从或尊敬自己的人。有的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观点想把这后一类人称之为伟大的恶棍。他认为把许多人的智慧和意志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极大的好事，甚至是“神圣的事”，以致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打算承认在阿梯拉和帖木儿身上也有某些伟大之处。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英雄所提的要求，却是路易十四等所不符合的，尽管有时路易十四被称作“伟大的”太阳国王。完全有可能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卡莱尔喜爱的英雄，如穆罕默德、拿

破仑或卢梭等人是不配伟人的称号的。在这方面，每位历史学家不仅对伟大，而且一般说来，对善和恶都有自己的标准，主观的理解。因此，与卡莱尔的“伟人传”不同，最流行的一种历史著述可以被称作名人传，名人传是指从无名的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带头人，他们有时能带来善，有时能带来恶，而善与恶是根据历史学家的观点来划分的。这种办法往往做起来很简单，无需作任何抽象议论。反对这种办法，尤其反对相应的理论的则是支持无名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因素的理论的人。他们认为，人们过于推崇英雄了，说他们能左右事件向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发展。大量的水通过水管压迫水龙头，可以挤出几滴水来。因为水龙头的口小也只能挤出几滴水来，但是，这几滴水并不能带动其余的、大量的水随之流出，相反地，这几滴水恰恰是被其余大量的水挤出来的。我认为，这种比喻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支持我们现在所谈的那种理论的人的思想，势必会合乎他们的口味。

当然，这种观点尽管有时表现得并不那样突出，却对研究历史大有帮助，吸引研究者既重视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经济等状况，同样也重视社会学规律，而这些规律也适用于伟人。但是认为历史的因素是无名群众的理论，同高贵的英雄理论截然相反，它本身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其实，需要弄清的只有一点，这就是群众从自己当中挤出英雄的过程，但是我们平时听到的议论却不是这一点，而是说英雄是时间、地点、环境、遗传等一定条件的产物。这样一来，问题的出发点就变了，这已经不是人的思想、感情、愿望、行为的因果依赖关系的理论了。这正如某人引用列维托夫的话来说是“文不对题”，它并不涉及到问题解决得是否正确，而是干脆避开问题，粗暴地对待逻辑。然而经常受到粗暴对待的不仅是逻辑，而且还有现实存在的道义感。把人视为伟大的世界因果链条上一个环节的理论，有助于消除关于人在自然界中地位的傲慢成见，但

是，片面地提出这一理论却有可能并且有时也确实会带来许多可悲的后果。把人变成一架消极的机器的这种片面性，会助长为一切卑鄙、庸俗的行为进行辩解，助长历史宿命论、削弱责任感、削弱积极性和个人主动性等。对于这类有害的毒素来说，卡莱尔的书也可以作为一种消毒剂。卡莱尔的书也有其片面性，但是，它除了有这种片面性，甚至有许多思想混乱和含糊不清的地方之外，还包括对有关人的行为产生的原因的学说作了宝贵的更正，——指出了活动的目的。泰恩就曾正确地指出，可以把卡莱尔断言的那种存在于可见的、可感知的、可测量的世界彼岸的“奥秘”称之为理想境界。这种理想境界是人永远绝对无法达到的，但是它却始终在召唤人挣脱出日常琐事的泥潭，并粉饰我们的生活。卡莱尔坚信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向往着理想境界，向往着一种比渺小狭隘的现实无比崇高的境界。但是由于我们已经深深陷在这种现实当中，只是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才想到理想并且跟随在特殊人物，即英雄或理想境界的“使者”之后，或多或少地接近理想境界。因此我们不仅应当感激他们，而且应当真正地“崇拜”他们。卡莱尔对英雄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产物”的思想极为愤懑。其实，他对此根本无法反驳。当然，英雄的出现是要有一定的原因的（我们把这种原因笼统地用“时代”这两个字来表示）。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卡莱尔问道，难道说我们这些“渺小的批评家”所做不到的事，英雄本人也做不到吗？关于这一点同样是无可反驳的。确实，我们只要通读一遍巴甫连科夫先生的那套名人传丛书便可以看到，英雄、伟人或者随你怎么称呼他都行，他都给自己提出某种有时照同时代人或同胞看来是远远超出了可能范围的目标并为之而斗争。尽管他不过是历史的工具，但是历史却从千千万万的人当中偏偏把他选作自己的工具。尽管他是工具，但是他这种工具是有感觉、有思想的，并且主要是，工作有一定的、自觉遵循的方向。尽管他具

有种种非凡的力量或者甚至一帆风顺,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但是他在致力于自己的目标时,他本人却成为事件继续发展的积极的和自觉的原因。各种现象之间,无疑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在原因或社会生活的其他现象中也包括个人的精力和个人的毅力,也包括思想的说服力和英雄所显示的榜样的力量。各种现象之间无疑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我们由于智力有限和性格软弱、胆小等等,在具体判断某种原因的可能后果时可能会犯错误;我们的期望很小而可能性却很大。我们的英雄则号召并引导我们去争取这种大多数人所未曾料到的更大的可能。最后,卡莱尔这本书贯穿了对我们日复一日为之奔波的小事的鄙视。因此,它也是热情的号召,号召人们去干一番大事业。因此,我认为,《英雄》一书的俄译者,尽管显然对卡莱尔有所偏爱,却正确地说,卡莱尔会使你们“摆脱漠不关心,放弃苟且偷安”,“如果他不能使你确信自己观点的正确,那么至少也能在你的内心激发神火的火星”。当然,这本书在这方面能做到什么程度……

二

有幸或者不幸的是,这本书远非一本万能的书,——有幸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好书,不幸的是,这本书是一本好书。同一本书,同一套书,在今天和几年之后,在这方面和那方面能够产生完全不同的、有时是截然相反的效果。这取决于该书问世时的各种日常生活条件的总和。

为了说明这一点,请允许我摘录斯塔纽科维奇先生发表在《俄罗斯新闻》上的短篇小说《家园》中的一段。某个名叫奥尔登采夫的为自己的同事戈罗霍夫说情,因为他俩的共同上司戈布津平白无故地想把戈罗霍夫撤职,以便给别人腾位置。而这种说情对奥尔登采夫说来是要冒一定的、其实是很小很小的风险的,所以他的妻

子，那个凶狠而又愚蠢的娘儿们当着孩子们的面和他闹了起来。奥尔登采夫问自己的大儿子怎样看这件事。

“我跟你的看法可不一致！”——年轻人支吾地说。

“这我当然懂得！咱们俩非常不一致。我是个六十多岁的人啦，而你呢，属于新生的一代……咱们俩怎么可能一致呢？不过，我还是非常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就谈谈吧！”

“如果你非要这样做的话，那么就请让我说。”

于是这位大学生微微抬起了他那姿态优美的头，却不望着父亲，而是用他那对严肃的蓝色眼睛看着桌布，用略带几分教训人的口吻，不慌不忙地低声开始讲了，这时母亲则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宝贝宠儿。

“我认为，戈布津这个人连同他的全部观点和习惯，无论是继承下来的，还是他自己形成的，你都没法把它改造过来，不管你和他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你认为他是头牲口，那么他就永远是头牲口，而不会改变。改不改是他的权利。而且我认为，一般说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任何人，都是唐·吉珂德的行为，是白白浪费时间……气质和性格是由生理等原因决定的，是不能通过劝说加以改变的，这是第一……”

“第二呢？”——父亲讥讽地问了一句。

“第二，”——年轻人带着同样不慌不忙的语调，并且以同样的自信和严肃的口吻继续说，“第二，你由于庇护一个依你看是受了冤屈的人以使利他主义感情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那一点点愉快，会在你今后可能遭到的种种不愉快和痛苦面前统统化为乌有。也就是说，你会显然吃亏了……”

“显然吃亏了？……是这样，是这样……那么，第三呢？”——奥尔登采夫使劲捋着自己的胡须，不耐烦地追问着。

“第三，如果戈布津出自某种考虑有意赶走某个职员，那么显然，他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看来，你能保住戈罗霍夫。但是戈布津会赶走彼得罗夫或伊万诺夫。可见，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但是不公正的事实却依然如故。看来，这不是很清楚了吗？”——阿列克塞最后说。

这一幕在许多方面都是很有教益的。但是我想请读者注意这一点：我们智力发展的历史是各种片面性不断交替的过程。我们似

乎是在穿过某个密林，有时用右肩，有时用左肩为自己开路，至于向后急转，返回早已经过的地点就不用说了。可能，事物发展要受人性的某种根本特性的制约，因为在比较文明的国家里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在那里，人们比较尊重一旦赢得的地位，在那里思想的继承经久不断。但是在欧洲，批判的思想很久以前就在发展，并且丝毫不受约束，以致在那里无处不在的片面性，可以说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都能互相抵销。为了对抗卢梭的片面性，生活在同时又提出了伏尔泰的片面性，冷静而庄严的歌德的影响同热情而仁慈的席勒的影响互相抵销。两种对立的哲学派系或政党的声音能够同时出现。但是如果说，就连在欧洲，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某种片面性往往仍能受到重视和引起普遍注意的话，那么在我们这里，这种现象就更多而且表现得更突出了。例如，当我们津津有味地阅读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的书，解剖了大量青蛙的时候，以及当有可能出现象叶芙多克西娅·库克希娜之类的笑话（她说什么乔治·桑是个落伍的女人，她想必不懂得胚胎学，“而在当代你不懂这个，还能懂得什么？”）的时候，我们普遍对博物学入迷（这一点许多人还记得）又有什么用呢？当然，这是个笑话，并且是相当有趣的笑话，而叶芙多克西娅·库克希娜不过是一个蠢人，这样的人始终可能存在。但是，老实说，当聪明而有才能的皮萨列夫建议谢德林抛弃讽刺，改做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时，难道他离这个笑话还远吗？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馋猫碰壁》中一段对话很类似的事。伊波利特说：“假如我很快就来了……就是说，假如我来了，那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而阿霍夫却打断他说：“假如你很快就来了，那么你就该很快离开。”这段插话中表现的突然而来的机智当然不能与我们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的入迷相比。显然，即使这样也并不能使我们脸上增光。但毕竟应当将两者加以区别。

正如光线在不同的介质中产生不同的折射一样，思想的光芒也会产生极不同的效果，这就要看它通过的是什么样的条件。老奥尔登采夫如果说当年没有亲自解剖过青蛙和津津有味地读过自然科学书籍，那么，他无论如何是卷入了这种潮流的，并且直到今天仍不能使自己同它分开。当然他很熟悉儿子的这一段议论：“气质和性格是由生理等原因决定的，是不能通过劝说加以改变的”，等等。他自己也这样讲过，而且在讲的时候大概比他儿子讲得更热烈、更激动。就是现在他也能讲出同样的话来。各种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历史的有因果依赖关系的思想不过是把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推广到人的身上，并且显然这种思想必定在老奥尔登采夫的青年时代非常流行。它在当时从某一点上来说曾经是个新事物，并且吸引了人们，这不仅因为它具有一般的哲学意义，而且是一种同数不清的成见和虚伪现象作斗争的工具。小奥尔登采夫，可能根本没有接触过自然科学，因为目前这一点对于确信“生理等原因”的力量来说已无必要。但是，无论如何，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讲得很坚决、明确，而且是深信不疑的。那么父子之间的争吵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声音可以创造音乐，而在这种情况下父与子两种类型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使我们听到了刺耳的家庭噪音。斯塔纽科维奇先生并没有大肆渲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普通的家庭纠纷，奥尔登采夫老头早已被接二连三的失意弄得抬不起头来，并不幻想作出任何英雄业绩。他替自己的同事说情是为了维护真理，伸张正义，并且他认为这样做并不会冒失掉职务的危险——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但是在他同上司进行的不愉快的谈话中听到一句这方面的暗示，就足以使妻子凶狠起来而严厉地议论唐·吉珂德的行为，以及对家庭应负的责任等等。实际上这是多么普通的家庭纠纷啊！难道这样的所谓一家之长还少吗？他们辛辛苦苦地干着伤脑筋的、对任何人都没用的事，以

便挣得钱来为妻子买件漂亮的衣服，请人为无才的女儿上音乐课等等，而且动不动就会引起一场难以忍受的争吵，不敢抬起头来看看天空。按现时来说，小奥尔登采夫也并不是为奇。谢天谢地！近来文学中的“儿童热”看来是消失了。终于在生活也出现了一种困难而可怕的现象，恐怕没有人能想起要唱“儿童”歌曲，赞美“为现实恢复名誉”和“光明的现象”。但是，我们在不久之前却听到了这类歌曲，所以奥尔登采夫老头绝不是唯一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同儿子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父亲。奥尔登采夫老头处境的特点是：他能从儿子那里听到很可能是他自己说过的话，但是已经是经过折射了的话，以致终于使他勃然大怒，而这种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奥尔登采夫老头当年曾经卷入并且现在也公开支持的思潮（在他那种低三下四的处境下，这已经是尽最大可能了）是多么片面，这种片面性却在我们当时普遍高涨的精神生活中得到了修正。甚至对皮萨列夫来说，当他对谢德林提出滑稽可笑的要求时，“生理等原因”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对他说来，自然科学不仅是独立地研究各种现象之间的永恒联系，而且也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他打算利用这种工具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当然，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这一点，从小奥尔登采夫运用“生理等原因”的情况中就已经可以得出来。但是，无论如何，同“生理等原因”的客观现实的消极世界相对立的，是个人为了实现主观的理想，为了实现某种自觉确定的目标而进行的积极干预。关于人是一定原因的消极结果，在口头上也许已经讲了许多，有时甚至已经讲得过多，但是实际上，人们却一直争取做事物发展的积极原因。讲过的话留下来了，振奋人的精神却不见了。奥尔登采夫老头这一辈人尽可能不憎恨，也不偏袒地望着现实的生活的杯底，然后斟满理想之酒。小奥尔登采夫则宁愿戒酒。我认为，这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环境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因此我倾向于怀着怜悯的心情来看待小奥尔登采夫那

类不幸的、思想幼稚的人，甚至他那令人气愤的过于自信。

然而，如果说书籍、印出来的言论以及整个说来思想，由于它们的影响取决于折射介质的性质，所以它们都不是万能的。但是也不应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是无能为力的。恰恰相反，它们也能影响社会环境，净化它或感染它。于是就产生了某种相互作用，并且往往带有斗争的性质，而斗争的结局却远非总能预言。这样一来，就使言论和思想的代表者负有重大责任，但遗憾的是，这种责任经常被忘记了，有时是由于教育人的人不可饶恕的轻率，有时是由于尤其不可饶恕的原因：个人品质卑鄙。这一次我无需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忘记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可悲后果。我们可以再回到上面提到的巴甫连科夫先生出版的某些书上来，但是我想首先来一段小小的插话。

最近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流派，它努力要判断的不是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或其他价值，而是它与同一主题或主题相近的其他一些早期作品的联系。这种联系原来往往就是直接借用或模仿。3月份的《欧洲通报》上载有一篇韦谢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死魂灵》，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韦谢洛夫斯基先生说：“果戈理从俄国和外国作家那里借用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一般的预料。”接着他说：“《死魂灵》第一部第七章开头那段抒情插话（“作家是幸福的”等等）中可以找到《欧根·奥涅金》第一章^①第十一节的余音（“常常采用严肃的文体”等等）。乞乞科夫对列尼津解释必须“对这一点保密，因为为害的与其说是犯罪本身，不如说是犯罪的诱因”时用的是伪君子达尔杜弗的话：“只有张扬出去的坏事才叫坏事，世人的议论是获罪于天的根源。”这种意外的巧合可以同剽窃贺拉斯的语言（似乎尚未被人发现）相

^① 这系笔误或印刷错误，显然这里谈的不是第一章，而是第三章。——米哈伊洛夫斯基注

媲美：贺拉斯的讽刺诗第一篇第 69—70 行诗是“笑什么？换个名字，故事说的就是你！”而《钦差大臣》中的市长则说：“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

韦谢洛夫斯基先生文章的这一部分典型地说明了文学史批评走极端的情况。可尊敬的作者丝毫也不关心为自己的论断提出哪怕是起码的证据。用词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就足以肯定果戈理剽窃了贺拉斯的语言，把它用到了市长斯克沃兹尼科·德穆汉诺夫斯基的身上。“意外的巧合”对他说来就等于“剽窃”。批评家们通过这类手法可以在读者面前卖弄自己的博学，但是，显然不能认为这类手法是站得住脚的。实际上，韦谢洛夫斯基先生为什么不设想，果戈理和普希金作为同时代人和朋友，因为受到了大致相同的条件的影响，两个人各自形成了某些相同的思想和用语（必须指出，韦谢洛夫斯基先生指出的几处其实并不十分相似）呢？他为什么不设想，在果戈理本身观察到虚伪特点之前，可能甚至不只是莫里哀一个人，而是还有其他许多人都都观察到了呢？最后，他为什么不设想，果戈理在写他那句“你们笑什么？”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贺拉斯呢？至少，我很容易就能设想，这种巧合纯属偶然以及果戈理的独树一帜和别具一格，我也可以同意韦谢洛夫斯基的观点，只要他能拿出什么证据来，哪怕是能从果戈理的记事本之类的东西中摘出几段来作证。这样的批评丝毫也不能推动我们在任何方面前进。但是它也可能有某些甚至是不小的价值，只要它不是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他不去追求纯粹偶然的巧合，而是努力把对比的作品因其产生的条件相同而雷同与真正的借用或模仿区别开来。某些学者完全有理由抱怨，在对比语言学 and 民族志学（文化史、神话、传说和民间创作史、各民族心理学）中有时引用一大堆偶合的例子，却缺乏应有的批判性探讨，不研究这些偶合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于一个民族借用了另外一个民族的神话、习俗等等呢，

还是由于两个民族处于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各自形成了彼此相同的思想和生活？如果说不知名的群众创作活动中的这两类雷同现象应当加以区别，那么在涉及个人创作活动的文学批评中就不应当把“意外的巧合”和“剽窃”等同起来。

更何况，模仿在文学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能比采用文学史批评中夸张手法的人想的要大得多。

声音寥寥无几，回声却接二连三而来。歌德早就向我们提醒了这一点，但是这还不够，在某种声学条件下回声确实会接二连三而来，但是，无论回声是一次还是多次，它所重复的并不是人喊出的全部声音，而仅仅是最后一个词，甚至是最后一个音节。在生活中也会发生某种类似的事情。真正的创作过程的最后几个音节，最终结果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对这种过程本身却没有体验，甚至不大感兴趣。我们在种牛痘、阅读或者观看演出《哈姆莱特》和《伪君子》，去美洲旅行，议论《乌托邦》等等的时候并不会想到，我们是在享用琴纳、莎士比亚、莫里哀、哥伦布、托马斯·莫尔等人身上体现的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过程的最终结果。我们如同是在重复整个词组的最后音节，有时带着极大的兴致和热情，而有时还夹着原来声音所表达的剧痛。一位法国批评家在谈到莫里哀的家庭不幸时指出，如果没有这些不幸，用莫里哀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莫里哀的这些眼泪，我们在莫里哀的喜剧中能够欣赏的东西就会大大减少。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莫里哀的眼泪，哥伦布的镣铐，托马斯·莫尔的血，其他人的血海泪河，其他人的镣铐声的交响以及无数的疾病、忧愁和叹息正在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要知道，这至少能够少许使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感到自己不应当作为单纯的回声，而应当在重复最后音节的时候，也知道以这些最后音节结尾的整个词组。从这里便可以看出巴甫连

科夫先生计划出的名人传丛书的意义所在。但是名人传还可以有其他的意义。

塔尔德(《模仿的规律》)认为,全部历史和全部社会生活,在任何一瞬间都可以归之为两个因素:一个是发明或发现,另一个是模仿。根据某些相当模糊不清的理由,塔尔德把“发明的规律或伪规律”列入“社会哲学”,并且准备在另外一本书中去加以研究。而在《模仿的规律》一书中研究构成“社会学”内容的模仿的规律。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该书对“发明”的论述相当含糊不清,并且往往把它归之为原有各种模仿的简单组合。其次,塔尔德认为,模仿的规律分为两部分:逻辑规律和超逻辑影响的规律。模仿的逻辑规律中最主要的是“逻辑决斗”和“逻辑同盟”,而超逻辑影响的规律中最主要的是习俗和时尚。塔尔德在发挥这些论点时提出许多正确的或者至少是机敏的思想,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非常奇怪的思想。而行文则非常晦涩难懂。冗长而混乱的句子有时使你一下子理解不了它所包含的思想,而大量的实例,有的取自语言学,有的取自考古学、统计学和历史,取得并不都很恰当,有时反而把问题搞得更加糊涂。许多地方本可以讲得更为简单,那样一来某些夸张之处也许就可以看得更为明显了。而过甚其词的地方是不少的。对于塔尔德来说,不仅人的一切行为(甚至包括“发明”)是模仿出来的,而且就连记忆力和习惯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模仿。最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整个自然界都在模仿。但是,只要研究一下模仿的“逻辑”规律,便可以产生怀疑。实际上,如果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已经为某种发明或发现所扫清了的道路,如果我们自觉地,也就是说根据自己对个人利益或真理或道义感的理解,从中选择一条的话,那么,照塔尔德看来,这就是模仿的逻辑规律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违反逻辑,或者至少不是出自对利益、真理等等的考虑去模仿某种时尚或习俗、某个榜样,那么这就是超逻辑影响的结果。

显然，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情况会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有通过仔细的分析才能把它们弄清楚。但是通过抽象，可以把它们很容易区别开来，甚至我认为不可能把它们用一个公式来加以概括，即使有这样一个公式，那它也是过于一般，变得毫无内容了。然而，塔尔德却把它们概括到一起了。对他来说，“社会状态也同催眠状态一样，不过是个梦，是遵照命令所做的梦和处于积极状态时所做的梦。除了授意的之外，没有任何思想，并且认为思想是自发的，——这就是梦行症患者以及社会的人所特有的幻想”。他在另一处又说，“社会就是模仿，而模仿则是一种催眠状态。”说催眠性暗示或催眠术在社会生活中会起巨大作用，这一点我当然不准备反驳，因为是过去塔尔德已经肯定了的。但是塔尔德的一句话却排除了自觉的生活。这当然是不能同意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过程，在模仿的领域内，也同在其他任何领域内一样，始终是有区别的，就连塔尔德本人在谈到逻辑影响和超逻辑影响时，也把这两者加以区别。

塔尔德颇为正确地谈道，为我们开路的发明或发现往往不过是原有各种模仿的组合。在琴纳发明种牛痘很久以前，英国老百姓就已发现，人们在偶然传染上牛痘之后就会对真正的恶性天花免疫。这种民间的体验本身也推动了琴纳的发明。莎士比亚某些悲剧的情节是从古老的编年史中借用来的，而古老的编年史剧又是从民间传说里汲取了营养。莫里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哪里能得到好处，他就要到那里去找。在达尔文之前，园艺家和畜牧家就进行过人工选择，而生存竞争的思想是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那里借用来的。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不过是改进了纽可门的那个粗笨的蒸汽机，而纽可门又有他的先驱者等等，上述种种情况都表明伟人是从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们经过多少世纪积累起来的现成的观察和应用成果的汪洋大海中汲取营养的。伟人们收集了散

在各处的未经核实的零星材料，反复加以考虑研究，去伪存真，进行科学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加工，使之造福全世界。在这方面也正如人类全部大大小小的活动一样，并非一切都是自觉的。但是，任何人都不会说，上面谈到的那些伟人在深入研究民间的体验和传说或别人提供的情节、别人的思想时是不自觉的。恰恰相反，他们非常熟悉并且准确地指明自己的资料来源，加以对比，明确它们的优缺点。

现在人们会问：我们对这一切发现和发明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塔尔德会说，我们种牛痘就是模仿琴纳；我们利用蒸汽机就是模仿瓦特；我们前往美洲就是模仿哥伦布，等等。他会把我们的这些活动通通纳入模仿的逻辑规律范畴。即便是这样，但这些行动同催眠状态毫无共同之处，既没有处于催眠状态下直接印象所具有的那种力量，也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地方。处于催眠状态的人不自觉地执行命令或同样不自觉地模仿榜样。在个人生活或社会生活中可以同催眠状态相类比的事实只有以下两种：第一，当意识比较片面地集中时；第二，命令或榜样起直接作用时。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在现实中自觉的过程和不自觉的过程会突然交织在一起，有时相辅相成，有时彼此对抗。现在，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米拉波在自己的演说中广泛使用别人的思想和用语，他能极其迅速地将它们掌握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加以组合。有一次，米拉波已经准备登台演说，他在代表中看见了沃尔涅，手中拿着一份手稿，——沃尔涅准备好的发言稿。于是在他们之间进行了这样一场对话：“您也要发言吗？”——米拉波问道。“是的，我是在您之后发言。”“请给我看看，您想讲些什么。”沃尔涅把手稿递给了这位著名的雄辩家，米拉波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之后说：“写得好极了，非常精彩，不过，您要知道，念这类东西的时候，声音不能低，并且表情也不能沉静，——请把它让给我讲吧！”沃尔

涅同意了，于是米拉波就把沃尔涅的思想和说法揉合在自己的演说里，把整个会场的听众都吸引住了，使全场都进入了催眠状态。正是使全场都进入催眠状态这一点是沃尔涅所无法做到的。米拉波深知一个演说家获得成功的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逻辑的说服力和事实的完整性都可以影响全场听众的清醒的神态，应当承认，在沃尔涅身上，这两方面都感不足，因为沃尔涅是个杰出的思想家，卓越的、尽管不太受人赏识的作家，但他却是个不高明的演说家。米拉波增加的印象有：自己魁梧的身材，“美杜莎^①头”，宏亮的嗓音，所向无敌的雄辩家的不可动摇的声誉。他通过这一切使听众的意识片面地集中于合乎自己心愿的方向。他讲的是同样的话，但讲的方式不同。可能沃尔涅也能影响会场，使之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但是第一、也可能他不能影响会场；第二、他的活动方式同米拉波截然不同，以致我认为不能用塔尔德的术语“模仿的逻辑规律”和“超逻辑规律”来把两者加以区别。在沃尔涅的演说效果（假如他发表了演说并且收到了效果）中，没有塔尔德所常说的那种模仿或感染。在琴纳、瓦特、哥伦布等人的发现或发明在我们生活里引起的反映中也没有感染。但是，如果指的是个人，而不是他们的发明的话，那么所有这些伟人和其他一切伟人都能成为真正的精神感染的来源。伟大的劳动，同艰难险阻作斗争的无穷毅力，崇高的道德品质等榜样（以及与此相反：不劳而食、伤风败俗、凶恶残暴的榜样）确实都有感染力。它不仅表现在生活中，而且也表现在文学中，也可能它在传记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

我很难在谈到“模仿的规律”时，不涉及到我的文章《英雄和群

^① 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为石头。转意为可怕的怪物。——编者注

氓》。我想，这一点是无需解释的。这篇文章的遭遇十分令人伤心。它于1882年发表在《祖国纪事》上，虽然文章的篇幅相当长，但它还是没有写完。文章的主题非常广泛，正如卡烈也夫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中所同意的那样，它甚至到目前为止在许多方面仍然是空白点。而我本来已为日常的每月评论工作和编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更不用说又碰到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使自己无法安心写作。或许最好是暂时把它放一放，但是这时发生了野蛮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它实际上对我的生活是一个推动，促使我立刻着手整理在有关《英雄和群氓》问题方面早已积累的素材。1884年我又开始在《学术信札》中重新就这一问题发表文章。然而《学术信札》的命运同样不济，由于《祖国纪事》的停刊，它一开始就夭折了。然而，《英雄和群氓》一文中所涉及的问题却使我无法平静下来。于是在1887年我再度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文章《病态的魔力》，发表在《北方通报》上。我可以这样说，这最后一篇文章是写完了的。但是，显然由于从开始到结束，中间经历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因此，结尾部分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缺点。确实，《英雄和群氓》一文的令人伤心的遭遇使我不想再否定该文的种种毛病，但是我却不能同意就该文对我提出的某些意见。

卡烈也夫教授在《历史过程的实质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中对我相当重视，他写道：“我们相当详细地研究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的几篇文章，它们是在论述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方面作的唯一尝试。这些文章由于叙述上的杂乱无章和基本思想未得到充分发挥而大为减色，可以认为，作者只不过是自己进行有意义的工作收集了素材，并且按积累时的原样发表了。作者在叙述自己的思想时，只是预感到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而不是已经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后方案。另一方面，从我们在这里研究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所抱定的特殊目的来说，几篇文章中充斥了大量从

其他科学领域里借用来的不相干的材料，可以说，作者到最后大大偏离了‘英雄和群氓’的主题，而去谈‘病态的魔力’，后者显然仅仅是顺便引起他的兴趣的，但却使他放弃了文章的直接任务。”

卡烈也夫先生首先注意到了《英雄和群氓》，其次是《学术信札》，而对《病态的魔力》只是提了一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使卡烈也夫先生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中的一个局部问题，即关于个人作为历史因素的意义。在这方面，《病态的魔力》只是包含了对《英雄和群氓》的某些补充。但是倘若卡烈也夫先生能注意到《病态的魔力》的后四章以及对《学术信札》中第一封信的注释，他就会发现，我的目的不仅是要弄清英雄和群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要把这个问题同《什么是进步》、《为个性而斗争》等文中阐述的社会学原理联系起来。而那时卡烈也夫先生可能就不会说，我“只是预感到了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而不是有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后方案”，他可能就不会再责备我大大偏离了“英雄和群氓”的主题，却去谈“病态的魔力”。

塔尔德在讲到自己对催眠原则的社会意义和把它应用于社会学这两点的意见时在注释中写道：“当这两方面的意见最初见于《哲学评论》(1884年11月)时，人们不过是刚刚开始谈论催眠性暗示的问题，当时人们指责我的那个后来受到伯恩海姆等人大力支持的想法：认为它具有普遍的社会影响。人们把我的这种想法称之为奇谈怪论，这是万万不能同意的。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如果说，塔尔德在法国竟有这种遭遇，那么，我的那些更早的关于所谓社会催眠的见解，在我们这里引起困惑和受到嘲笑，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路·斯洛尼姆斯基先生在《欧洲通报》上撰文说，他认为在一篇社会学的论文中议论催眠术是完全不适当的，他把这种议论以及其他许多他认为既无用又荒诞的东西都列为“伪社会学”。我当然对这种最后判决深感痛心，但是后来又稍感

慰藉的是，去年，在塔尔德《模仿的规律》一书的法文原文问世的时候，我在前面谈过的那个《欧洲通报》上读到了尔·谢·先生对塔尔德的生平简介。这位尔·谢·先生已经不象路·斯洛尼姆斯基先生那样严厉了；他说塔尔德的书值得重视，并且在本书中只发现有几处夸大……那是当然的！而在今年十月份的《欧洲通报》上我读到了斯帕索维奇先生的一篇文章《刑法科学的新流派》。这位可敬的作者在谈到新的刑法理论，其中包括塔尔德（他本人是一位罪行调查学家）的刑法理论时顺便也提到了《模仿的规律》。斯帕索维奇先生认为：“塔尔德的特点在于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社会学家，而且是实际上的社会学家”（重点是斯帕索维奇先生加的）。谢天谢地！理智应当而且实际上也永远是以正确而告结束。

我不能同意路·斯洛尼姆斯基先生所说的：在社会学中议论催眠术是不适当的。但是我却应当同意尔·谢·先生所说的：塔尔德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有某些过分夸大之处。我认为，这是由于思想还不够明确，而部分地可能是由于塔尔德把英雄同群氓隔离、把模仿的规律同“发明和发现的规律或伪规律(?)”隔离的缘故”。塔尔德由于无限扩大模仿的范围，便用这一原则解释一些不属于模仿范围的现象并放弃了这样一项任务：确定使真正的模仿能以不同程度表现出来的条件。对塔尔德说来，模仿是某种超验的原则，它适用于整个自然界，而不仅仅适用于社会生活和人类活动。塔尔德说，世界上的一切都致力于自我重复并且一切都确实在重复着。这种自我重复可以归为三类。在物理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无穷重复和千篇一律的原子、分子和波的振动。在生物世界是繁殖同类或遗传。在社会生活中是各式各样的精神感染或模仿本身。由此看来，似乎整个世界都受到同一原则的支配。然而，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许多现象，它们并不属于塔尔德指出的这三类中的任何一类。在《英雄和群氓》及其续篇中就列举了许多这类的事

实。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在这里我想最好是只举曼特加札在《人的神魂颠倒》一书（这本书信口开河，并且除了少数几章之外，内容极为贫乏）中提到的一次观察结果。

谈的是贝卡里进行的某些观察的结果，用曼特加札的话来说，这些观察结果“被埋葬在一个科学杂志的仓库中了”。贝卡里发现鸟类羽毛的颜色同周围环境的颜色一致的几种情况：有时是同鸟类依赖其种子为生的植物颜色一致，有时是同当地平时的环境颜色一致。这类事实，其中包括远较贝卡里的记载更为惊人、更为明显的事实，已经知道的有很多很多，它们甚至有自己专门的名称——“拟态”，这一名称已经突出表明了这类事实的模仿性。有人会问：塔尔德是怎样解释这些现象的？他把这些现象列入他那三类中的哪一类呢？这属于生物现象，而在这一领域中塔尔德只知道一种重复的形式，即遗传。那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遗传来解释拟态现象呢？必须指出，拟态不仅限于颜色一个方面。动物不仅模仿其周围环境的颜色，而且也模仿其他动物、植物等的形状。最初这些现象都是根据达尔文主义的精神加以解释的，即认为模仿特性是通过几代的缓慢适应而获得的。动物如果偶然获得浅绿色的外表，于是就比其他颜色的亲族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躲藏在绿叶中免受敌人的侵害，因而，也就留下了更多的后代，经过几代之后浅绿色就会更加巩固地保存下来。然而这种看法的价值是有条件的，还不足以说明某些情况。非常重视拟态现象的华莱士就曾提到过这类现象的产生，还有另外一种更迅速并且更直接的过程。尽管这类现象属于生物学领域，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它们列入塔尔德的第二类。这里同遗传性毫不相干。就算遗传是后代模仿祖先，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绿色甲虫同亲族的遗传关系，而是它同绿叶的关系。它们之间并不是遗传关系，而是另外某种关系。用曼特加札的话来说，“贝卡里把这类现象解释

为：出色的感觉变为滋养羽毛的行为，变为拟态，而拟态是动物本身所希望获得的本领。通过暗示在催眠、出血、淤血方面获得的最新发现，使这一大胆的理论具有一定的或然性”。

在《英雄和群氓》、《学术信札》和《病态的魔力》中列举了从科学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借用来的许多有关事实，以致对了解这三篇文章的人说来，贝卡里的理论并不是过于大胆，虽然它显得有些奇怪。“出色的感觉变为滋养羽毛的行为”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却是符合实际的。无论如何，在一定的条件下，视觉印象可以直接影响动物的颜色和形状，也就是使它去进行模仿。曼特加札说得很对，对拟态的这种看法在对催眠领域所作的调查结果中得到有力的证实。确实，在大量的、日益充实的、有关催眠的文献中可以找到许多事实，证明意识处于某种状态时可以影响机体去从事模仿，因为处于催眠状态的人首先是一部自动模仿和自动服从的机器。但是利用这类资料的不仅仅是专门论述催眠问题的论文和书籍。整个现代心理生理学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和这类资料打交道，社会学也必须参考它们。

在介绍读者参看上面提到的我的三篇文章的同时，我请你们注意一点：拟态作为一项原理同遗传性毫无共同之处。诚然，遗传性在力求通过代代相传保持并加强机体的一切特征的同时，也保持并加强通过直接模仿或拟态而产生的特征。但是拟态特征一旦形成就会突然迅速地中断遗传的线索。在塔尔德的生物学一类中是没有这种突然迅速的变化的。塔尔德一直都在研究遗传性，而遗传性只是作为比喻才可以被称作模仿。塔尔德的书中对社会生活中模仿的起因讲得也不够清楚。关于“模仿的逻辑规律”就用不着说了。如果说，我们种牛痘是模仿琴纳或我周围的那些在我之前种过牛痘的人，那也仅仅是就某种特定的意义来说的。这种行为非常复杂，无论如何，出自利益的考虑在其中是起主要作用

的，但是就连被塔尔德视为超逻辑影响的东西也不能完全不作模仿。在某种时尚或某种习俗流行的时候，模仿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夹杂着对利益、舒适、体面、安逸、自尊的考虑。在谈到服从时，这一点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塔尔德寻找服从同模仿的相似之处，是完全正确的；出自恐惧或个人考虑的服从是一回事；卡莱尔宣扬的不带任何杂念的纯粹的、无私的、无条件的崇拜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趣的是，塔尔德在一处就是这样反问自己的，而针对这一反问他的回答是：“如果说我们模仿要经过分析，经过深思熟虑，如果说我们做的只是我们认为特别有益的事，如果说我们相信的是我们认为最真实的东西，那么人们在选择模仿的思想和行为时一向也都是这样做的。毫无疑问，这些行为曾经最能满足并发展这样一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最初萌芽乃是我们模仿过去其他发明的基础……由此可见，模仿是链条上一连串的一环，它们一环扣一环，甚至是自身扣自身。如果我们顺着链条追根溯源，根据逻辑推理，最后必然追到所谓的出自本身（重点是塔尔德加的）的模仿，追到原始野人的思想状况。而原始野人则如同孩子一样，乐于为模仿而模仿，这就是大多数行为的动因，并且也是所有参与社会生活的人的大多数行为的动因。”

显然，这并不是对反问的回答。显然，模仿是同其他一些因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其他的因素从逻辑上来说在研究模仿的规律时是能够并且应当加以区别的。因此，如果说模仿曾经是“出自本身”，那么这种自生现象我们至少在现在有时也能观察到。为了能把所有的情况，即不仅是模仿，而且还有与之相似的情况都包括在内，我认为最好是使用“魅力”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本身就已经把利益和好处的因素排除在外了。最后，为了前后一致，毫无疑问，伟大的历史人物，即卡莱尔所指的英雄，但往往也是英雄—恶棍，正是用“魅力”来影响当代人的。他们既然以自己全部伟大光

辉的形象在事件发展的进程中或思想史上深深地留下痕迹，也就如同打破已形成的传统一样，冲破了考虑利益和好处的牢笼，并引起普遍的注意，引导人们朝着他们向往的方向前进。他们不仅在生前能这样，而且在死后也能这样。精神病学专家，特别是法国的精神病学专家，关于精神感染已经谈论了许多，甚至还专门规定了一个术语“精神感染”(contagion morale)。他们不止一次地起来反对刑事犯罪小说和淫秽小说，不仅从理论上，而且通过事实证明，这类小说引起一部分人去模仿淫荡行为和犯罪。然而崇高业绩的榜样，其中包括英雄的文学写照——英雄的传记也能引起同样的模仿。当然，传记应当符合一定的要求。遗憾的是，巴甫连科夫先生的名人传丛书是远远不能符合这些要求的。

译自《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1898年
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366—404页。

再论群氓^①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

在《波里斯·戈都诺夫》的剧本中，当莫沙尔斯基宣布戈都诺夫一家人都死了，并且要大家一起高呼“沙皇季米特里·依凡诺维奇万岁！”的时候，“众百姓”的回答是“沉默无言”。而在这之前，还是这些百姓却“蜂拥向前”，高呼：“把波里斯的狗崽子绑起来，扔到

① 本文写于1893年。——编者注

水里淹死他！季米特里万岁！”再往前说，在选举戈都诺夫当沙皇的时候，也是这些百姓高喊：“皇冠是属于他的！他是沙皇！他答应了！波里斯是我们的沙皇！波里斯万岁！”在选举波里斯那一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百姓”发出各式各样的欢呼声，但是当它们个别交谈时却是这样：“甲：那里在吵什么？乙：听……那里在吵什么？是百姓在号啕痛哭，那里有人伏倒在地，象浪潮似的，一排又一排地……又是一排！又是……喂，老兄，轮到我们的了，快跪下……百姓（跪着，号啕痛哭）。哎呀，我们的父亲开恩吧！主宰我们吧！做我们的父亲，做我们的沙皇吧！甲：那里在哭什么？乙：咱们怎么会知道呢？那都是贵族老爷们的事，咱们高攀不上……甲：大伙都在哭，老弟，咱们也哭吧！”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利乌斯·恺撒》、《科利奥兰纳斯》、《亨利六世》中的百姓也是这样。在《尤利乌斯·恺撒》中，在布鲁图斯讲过话之后，百姓想隆重地护送他回家，替他立了雕像。他们高呼：“让他做恺撒！”而在安东尼讲过话之后却威胁着要烧布鲁图斯的房子并且叫喊：“我们要报仇！走，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不让他一个活命！”等等。在《亨利六世》中叛民在杰克·凯德那个好吹牛的坏蛋的率领下野蛮残暴到了极点，但是后来又迅速地响应了回复法律秩序的号召，所以杰克·凯德感叹地说：“这伙群氓真象鸡毛一样，风吹两边倒”。在《科利奥兰纳斯》中，百姓在米尼涅斯·阿格立巴，科利奥兰纳斯本人和护民官讲话的影响下，几乎每天都在改变自己的情绪。这个悲剧中的人物之一想解释科利奥兰纳斯鄙视百姓的原因时说：“有许多强有力的人物口头上拚命讨好百姓，——结果是白费力气。百姓喜欢的是另一些人。至于为什么，这些人自己也不清楚。可见，大老粗既然会无缘无故地爱，也就会无缘无故地恨。科利奥兰纳斯懂得这一点。”

在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戏剧中（我不是说在普希金和莎士比

亚的所有作品中)百姓都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看来,这些百姓本来应当是有很大差别的,——有纪元前一世纪和五世纪的罗马人,有十五世纪的英国人,还有十六世纪的莫斯科人。作者也是一样,一个是十六世纪的英国人,另一个则是十九世纪的俄国人,——他们彼此在时间、空间以及历史条件和人种条件等方面的差别极大,似乎他们即使各自对同时代的本民族进行观察也势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总结。然而,我们却看到了惊人的雷同:无论什么地方,百姓都是容易受鼓动的,能够迅速改变情绪的群众,任何个性都淹没在群众中而荡然无存,群众可以“无缘无故地爱,无缘无故地恨”,盲目地沿着某种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推动力所指示的方向前进。显然,他们是某种特定的、抽象化的百姓,更确切地说,是百姓的某一特点或某些特点的艺术再现。大家都知道,普希金高度评价民间诗歌创作,因此,他认为民众中间蕴藏着某种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波里斯·戈都诺夫》中却没有得到反映。其次,科利奥兰纳斯时代的罗马平民运动,也如杰克·凯德的叛乱一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只有微小的暗示,艺术家把它们连同人民生活 and 处境的细节一道放到次要地位,以便突出一个心理因素。在上面谈到的几个场面中甚至“百姓”属于哪些阶层或阶级,有时也不清楚。在《波里斯·戈都诺夫》中只知道他们不是贵族,但他们可能是商人或市民,也可能是手工业者或农民。在《亨利六世》中杰克·凯德的追随者当中分别提到的有呢绒商人、屠户、织工等,而就整体来说,他们被笼统地称作“一群衣衫褴褛、残忍、粗野、无情的流浪汉”。由此可见,我们看到的百姓是某种非常笼统的、非常一般的概念,它在某种条件下能够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

一般说来,悲剧的主题,无论其情节如何,都是英雄——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同致命的自发力量,包括命运、磨难等作斗争。在莎

士比亚的笔下,民众也属于这种盲目的、自发的、没有理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笔下的民众不带任何进一步的说明语或者仅仅是稍微提一下这类说明语。对于艺术家说来,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并不是为民众所接受的某种潮流的起因,而是英雄单独一个人所碰到的这种潮流的没有理性的自发性。因此,可以认为,这类作品的任务本身事先就决定了有人民出现的场面缺乏生命力和真实性。确实,其中许多场面着色极浓,甚至有时会使人认为,莎士比亚在蔑视人民方面同科利奥兰纳斯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在我们面前并不是一个正直的艺术家,而是人民痛恨的敌人。但是,这些场面尽管采用了夸张的手法,你却可以感到其中含有某种深刻的真理,感到莎士比亚感兴趣的现象是一个特殊的,可以把它看作并且描写成一种存在于人种、民族、经济、阶层、政治等条件之外的现象。

在戏剧的范围内,我们还可以举出洛贝·德·维加的作品《羊泉》(参看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就此写的一篇有趣的论文《洛贝·德·维加剧本中的人民》,该文已收入《纪念谢·安·尤里也夫》文集,1891年莫斯科版),或不久前出版的普罗斯佩·梅里美《封建时代的戏剧》——《扎克雷》的俄译本,其中的人民与普希金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民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概念十分明确的“人民”。《羊泉》中的人民是十五世纪卡斯蒂利亚的农民,《扎克雷》中的人民是十四世纪法国的农民,在梅里美笔下,除了法国农民之外还出现了强盗和自由射手,虽然农民有时同他们达成协议,有时协议又遭到破坏,但这三种人都保持了自己特殊的生活特点。与此同时,无论是在洛贝·德·维加,还是在梅里美的剧本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经过许多年,可能是几百年形成的一整套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则引起了这两部作品中描绘的事件。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也能看到莎士比亚刻划的那些特点,极易受鼓动和使“百姓”变

得极端残忍；情绪能够迅速改变；个人消失在不可阻挡的总的洪流中。莎士比亚刻划的这些特点是经过抽象概括而提炼出来的，因此也适用于任何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与此相反，在洛贝·德·维加和梅里美的笔下，这些特点却是同一定的地点、时间和人物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它们在这里也有所表现，只不过表现得不那么明显。《羊泉》中劳伦夏的热情演说同《尤利乌斯·恺撒》中安东尼的阿谀奉迎、能言善辩有同样的鼓动作用。而狂怒的群氓也干出了同杰克·凯德的同谋者一样的暴行。梅里美的《扎克雷》中在总潮流的影响下每个农民也象普希金剧本中的“甲”、“乙”一样迅速地改变自己的情绪。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莎士比亚在《尤利乌斯·恺撒》、《科利奥兰纳斯》和《亨利六世》中刻划人民时似乎带有科利奥兰纳斯的蔑视心理，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受了傲慢的马歇斯的情绪的支配，而只不过是使用了某种艺术手法。从技术条件来说，他需要的是悲剧，是盲目的、没有理智的、自发的力量，在同这种力量的冲突中烘托出英雄的悲剧性格。而他在人民中找到了这种力量。为此他摈弃了人民的一切复杂的特点，而仅仅突出了这种自发性。但是他并没有诋毁人民，而是描绘了一种真正的、肯定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得到了其他一些并没有采用抽象手法的诗人的证实。在这方面列·托尔斯泰伯爵的艺术实践具有特殊的教益。

要想分析弄清我们这位天才艺术家目前的观点是困难的，而且此刻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做。但无论如何他曾经在自己关于平民教育的论文中把人民提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位作家都没有提到过的高度。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个细节为例。托尔斯泰伯爵在谈到雅斯诺-波利亚纳学校学生的写作练习时断定，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孩子费季卡表现了“艺术家的认识能力”，使托尔斯泰伯爵本人、歌德都望尘莫及。托尔斯泰伯爵认为《万卡-克留什尼奇卡之歌》

和《沿着我的母亲伏尔加河而下》的曲调比普希金的任何一首诗和贝多芬的交响曲都要高明。现在我们且不研究这样一些观点的实质。我们只须知道，当然，托尔斯泰伯爵不是科利奥兰纳斯，对于托尔斯泰说来，人民并不象马歇斯随口谩骂的那样，是“一群下贱的狗”，是“多头的畜牲”。请回忆一下《战争与和平》中韦列夏金被害的精彩场面。过去我在《英雄和群氓》一文中曾全文引用了这一段，把它作为写作技巧高超的一个典范，它刻画了群氓自发的狂热，紧接着又对他们面前的事实表示出后悔和莫解，就连那些用双手犯下了野蛮暴行的人现在对此也感到不解。现在我请大家再回忆一下《战争与和平》中的另外一个场面，虽然不象上述场面那样惊心动魄，甚至不乏幽默色彩，却也具有同样的表现能力和艺术水平。

老公爵包尔康斯基死了。公爵小姐玛丽亚一个人留在包古查洛夫村，这时法国人已经逼近那里。公爵小姐决定离开并且也建议农民们在敌人到来之前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村子去。但是在农民中间有一些谣传和猜疑。农民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谣传和猜疑甚嚣尘上，于是农民们拒绝迁离包古查洛夫村，也拒绝接受公爵小姐送给他们的粮食，最后竟决定也不放她本人离村。他们作出这个决定完全不是出自私心，但又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农民们知道法军正在逼近，因此，他们留在原地必然会碰到敌人进犯所带来的种种麻烦和灾难，并且他们也完全不需要公爵小姐和他们在一起。然而，他们的这一决定却越来越坚决，公爵小姐提出种种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是枉然，最后农民竟宣布：他们干脆采用强力，不放公爵小姐离村——要卸她的马。刚好这时村里偶然跑来了两名俄国军官，还带着一名勤务兵。其中一名军官尼古拉·罗斯托夫在同公爵小姐交谈之后就忿忿地果断地离开了那里，去镇压“造反的人”。阿尔巴提契管家劝他多加小心。他说，农民是执拗的，眼下没有军队，去对付他们是不够慎重的，他说首先

派人去叫军队是否更好。

“我要给他们派来军队……我去对付他们！”——尼古拉毫无意义地说道，他象一只没有理性的牲畜似的，为无法抑制的怒火弄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并没有考虑自己要做什么，就迈着迅速而坚定的步子不自觉地朝人群走去。他离这群人越近，阿尔巴提契就越觉得，他这种不够慎重的行为可能会产生好的效果。庄稼汉们见到罗斯托夫那种迅速而坚定的步子和蹙起眉头的果断的面孔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

确实，罗斯托夫只是大声吆喝了几声，坚决下令让把村长捆起来并且确也有人照做了之后，便足以使人群安静下来了。两小时之后，几辆大车停在包尔康斯基的院子里。就是刚才还威胁要卸马的那些庄稼汉现在却帮助搬运东西和装车。

“别这么乱放”，一个庄稼人，高个子，圆脸蛋，面带微笑地从一个使女手里接过来一个小箱子，“这玩意儿也是花钱买的。怎么能这样乱扔乱放。用绳子绑住，要不然会磨坏的。我不喜欢这种干活法。要干就正经干，按规矩办。外边包上蒲席，再盖上一层干草。这才行！”

“瞧，这把子书”，另一个庄稼人正在往外搬安德烈公爵的书橱，“小心别绊倒！伙计们，沉得很，着着实实的书啊！”

“是呀，他们整天看书写字，也不玩玩逛逛！”那个高个子圆脸蛋的庄稼人，指着放在上面的词典，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很荒唐。所有的后果，看来，都与其前因相违。无论是敌军接近的显而易见的危险，还是包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出自一番好意提出的种种合理的理由通通不起作用，而一位勇敢的军官几声怒吼却达到了目的，虽然群氓只要想干，原是可以把这位军官好好收拾一顿的。他能够使人不仅是形式上执行他的命令。人们既不是在棍棒威胁下，也不是事先已有预谋，而是卖力地、善意地帮助干两小时前还想坚决“对抗”的事。

再举《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小段情节：韦列夏金遇害前的场面。

“凶手！”高个儿的小伙子突然对酒馆老板喊道，“把他捆起来，伙计们！”

“怎么？要捆我这样一个人！”酒馆老板一面喊，一面推开向他扑过来的人，然后从自己头上抓起帽子，抛在地上。好象这举动有一种神秘的恐吓作用，把他团团围住的工人迟疑不决地止步不前了。

在这里向我们讲话的并不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而是列·托尔斯泰伯爵，他断定，他——托尔斯泰伯爵的出色作品无法同一个识字不多的农家孩子的作文相比；民歌比普希金和贝多芬的作品高明，他并且在许多地方提到人民辨认真、善的水平是我们所不及的。有人会问，毫无意义并且不自觉地断送了韦列夏金的性命的民众，不接受包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的合理劝说，而在听到罗斯托夫的吆喝后立刻就改变了主意和情绪的民众，最后看到酒馆老板从自己头上抓起帽子、抛在地上，就不再采取行动的民众，难道就是他们创造了美妙的歌曲吗？难道就是他们为了糊口而汗流浹背地干活吗？难道就是他们在自己日常的习俗中制定了法规的吗？难道我们在谈到要热爱民众，谈到自己对民众的义务等等时指的就是他们吗？实际上就是他们。但是托尔斯泰伯爵一方面把民众捧得很高，另一方面又为我们描绘了上述一类的场面，这并不是说他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民众确是为了糊口而汗流浹背地干活，创造美妙的歌曲等等。他们也确实是能干出包古查洛夫人和莫斯科人的荒唐事情和残忍行为的。实际上他们都是同样的民众，但是在逻辑上却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而这两个范畴又很容易发生千变万化。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部分地看到，而且在下面还会更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不仅仅俄国农民，而且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能形成情绪多变的群氓，而突然干出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观点不一贯，虽然不符合逻辑上的美，有时还不符合道德上的美，但是往往仍然比一贯坚持某种观点要好。托尔斯泰伯爵郑重

宣布放弃自己过去的文学生涯,承认自己的全部艺术作品都是伪、恶,然而,尽管他作了这种公开的忏悔,他却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他所发表的伪和恶在社会上流传。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仍在一版再版。这是一种地道的不一贯,但是谢天谢地,幸亏如此。他的伟大创作仍然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成为关于素食、独身或吸烟的论文,也不会成为这类论文的集大成者,《战争与和平》固然是一部巨著,即使他的小部头作品也象金刚石宝藏一样闪闪发光。就是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他的作品也是一个宝库,并且是至今还远远没有取尽的宝库。

我不准备展开来谈《战争与和平》中许许多多这类的战争场面,其中由于某种偶然的,有时是微不足道的原因,象把帽子抛在地上之类的行为,便使大批人去建立勇敢非凡的功绩或惊慌失措。我之所以不准备展开来谈,是因为这种现象大家都相当熟悉,而关于这种现象中我特别感兴趣的特点则留待下面再谈。现在且谈一下亚历山大一世皇帝来到莫斯科发布关于战争的诏书时的情况。

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被称作民众,而在谈话中分别被称作下级神职人员、市民、马车夫、商人、官吏、退伍士兵、仆役。十五岁的罗斯托夫伯爵来到了这样一大群等待皇帝到来的平民当中。开始他被人无情推过来,挤过去,并且受到粗鲁的谩骂,最后,有个人使劲地给了他肋部一下子,使得他失去了知觉。一个下级神职人员把他救了出来带到炮王^①旁边,当时他面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有几个人很可怜别佳,于是突然整个人群都转向了他,在他的周围团团围住。那些站得离他最近的人照护他,解开他的外衣,把他放在那尊炮王的高台上,责骂那些挤坏了他的人。”“突然从河岸上传来了几声炮响(这是为了庆祝同土耳其人签

① 1488年铸的一尊很大的炮,作为一种古董保存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编者注

订和约),于是,人群便飞快地跑到河岸去看放炮了。”显然,这几段情节都发生在民众已经不指望能看到皇帝的时候,他们只是等待皇帝驾临大教堂,然后回宫。皇帝在宫里用罢膳,嘴里嚼着饼干走到外边的阳台上。民众向他发出喜悦的欢呼,一面流出感动的眼泪。这时皇帝拿在手里的一块饼干碎了,从阳台落了下来,被一个马车夫一把接住了。人群便冲向马车夫。这时皇帝命令端来满满一盘饼干,他开始从阳台上往下抛。民众你挤我,我挤你,一起涌过去抢饼干。

三天之后,莫斯科的贵族在宫中集会欢迎皇帝并表示自己的爱国热情。所有的人都很庄严肃穆,但对今后行动的意见,却并非所有人都一致。即将同拿破仑进行的这场战争要求作出牺牲,还会给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大家都已知道,斯摩棱斯克的贵族提议从每一千个农奴中抽出十人组成民军,并由他们负责供给服装。有人提出应由莫斯科的贵族们作出这样的捐献。但是有人反对。一位退役的海军军官热烈地争辩说,民军会使贵族破产,但作用不大。皮埃尔·别祖霍夫醉心于立宪的幻想,他根据诏书中的一句话:皇帝来莫斯科是“为了协商和领导”。他就这一点发了言。老伯爵罗斯托夫虽然来了,却仍对他那十五岁的儿子要参军的爱国热情感到快快不乐。尽管各有各的心理状态,但是一点一点地为一种共同的情绪所淹没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贵族偶然地表达了这种共同的情绪。“皮埃尔先前在吉卜赛女人那里见过他,并且知道他是一个蹩脚的赌徒。”但是现在这个人却完全变了。他热情地谈到必须无条件地牺牲全部财产和生命。“皮埃尔不仅说不成话,而且一再被粗暴地打断话头,他被推到一边,象是人们共同的敌人一样没有人理睬。这不仅是因为人们不满意他发言的内容,其实在他之后还有许多人发表了演说,人们已经把他讲过的东西忘了。不过民众为要增添生气,需要有一个具体的爱的对象和具体的恨的

对象。皮埃尔成了后一种。”最后，皮埃尔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激动，并且“与其说表现在演说的内容上，不如说表现在演说的声调和人们表情上的那种表示我们准备什么都干的共同愿望，也感染了他”。最后，爱国热忱控制了所有的人。他们决定为民军出人。皮埃尔·别祖霍夫答应出一千人。说过要破产的那位海军军官沉默了，并且附和了大家的意见，老伯爵罗斯托夫当场同意儿子的请求并且亲自去替他报名参加军队。“第二天，皇帝离开了莫斯科。开过会的贵族们却脱下了他们的制服，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和俱乐部，然后，唉声叹气地命令管家为民军出人，并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惊奇。”

虽然，在我的干巴巴的转述中，托尔斯泰伯爵提供的画面失去了原有的艺术上的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能看出我们的艺术家刻画任何群众、任何群氓的心理状态时的细致入微之处。我强调“任何”这两个字，并且使我感到高兴的是，由于偶然，我不得不两次写下并且强调这两个字，因为被托尔斯泰伯爵掌握了共同特点的那些社会生活现象是极不相同的，甚至可能从表面上看，似乎它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从某个角度来看，确实，在1812年俄国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表现在上述莫斯科的几个场面上）同1812年包古查洛夫农民的荒唐行为毫无共同之处。前者表现了高昂的士气和自我牺牲的决心，后者表现了愚蠢的多疑和同样愚蠢的顺从。这两者的迅速交替，从道义上来说，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而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包古查洛夫农民反对包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离开村子已经到了直接采用暴力的地步，而仅仅是到了这个时候，或在此之后才被一位青年军官的果敢行为所制止住的情景，我们对两者截然相反这一点，就会看得更为清楚。但是，同样也不难想象，这群包古查洛夫农民幸而由于某种原因而激发了我们在上述莫斯科的几个场面上看到的那种爱国热忱。然而，

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莫斯科的场面，就可以看到，聚集在王宫前面的一大群平民一会儿狠狠地挤和打那位夹在他们当中的小伯爵罗斯托夫，一会儿又热心地照料他。虽然，群氓在第一种情况下干的是坏事，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干的是好事。但是，群氓决不是象他们最初对待这个孩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残忍、凶狠。只要有一个下级神职人员热情地同情那个孩子，群氓便会流露出善良的本能。组成群氓的人们不过是情绪处于一种特殊状态，它可以不问个人的思想和意志而把他们引向某个方向。然而我们在贵族会议上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退役的海军军官参加会议时，决心不捐献任何东西，他反对为民军出人，害怕破产。皮埃尔·别祖霍夫是带着立宪幻想来到那里，希望利用困难的历史时刻实现“协商”的主张。老公爵罗斯托夫仅仅在几天前还坚决而愤怒地反对儿子参军，别祖霍夫在吉卜赛女人那里见到过并且知道他是一个蹩脚的赌徒的那个能说会道的贵族在这些奇遇（可能发生在昨天）中当然不会燃起爱国热忱。然而所有这些人的感情和见解都淹没在总的气氛中而荡然无存。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是毫无理由就失去了理智的。不是的。“一种表示我们准备什么都干的共同愿望，与其说表现在演说的内容上，不如说表现在演说的声调和人们的表情上。”此时此刻，不是演说的内容，而是某种比理智、个人利益和任何其他通常的动力远为强大有力的东西造成了一股爱国的热潮。其证据就是第二天贵族们自己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惊奇”。但是在这方面有一个情节更为明显。我在转述中所以没有提到它，正是为了在下面突出它。还是在发生了上述一切的那个宫殿里，只不过是在另外一个大厅里聚集着商人。皇帝在两名商人的陪同下走出了商人集会的大厅。“其中一个皮埃尔认识的：大腹便便的酒精专卖商，另一个是市长，一个面容黄瘦、留着一小撮胡子的人。两个人都在哭。瘦子的眼里满含泪水，而那个大腹便

便的酒精专卖商却象个孩子似地号啕大哭，并且翻来覆去地说：“陛下，请接受我的生命和财产！”“后来大家才知道，皇帝刚开始对商人们讲话，眼泪就从他眼里淌了出来，他用颤抖的声音结束了他的话”。很可能，那个大腹便便的酒精专卖商参加会议时的情绪和他离开会场时的情绪完全不同，很可能，他唉声叹气地想到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但是，这一切都溶化在共同的情绪中了，但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并不是皇帝那声泪俱下的演说内容，而直接就是他的眼泪和那淹没一切的总的浪潮。

因此，尽管某一大群人所作的决定和行为从道义上来说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在某个心理过程的细节上却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差别，即构成群氓的人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也消失了。因此，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不久前霍乱骚动时说俄国民众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回答说：不，这不是俄国民众专有的特点。它在其他任何的民众，欧洲的或亚洲的民众身上也都能表现出来。这是第一点。其次，就是这些民众，而且受到同样的心理状态的支配，只不过是引向另外的方向，也会去建立崇高的功绩。第三，也是最后一点，这种崇高的功绩和这种心理状态、心理过程并不仅仅是一般被称为“民众”的社会下层所特有的。总之，群氓不是民众，而是一种应当专门加以研究的独立的社会心理现象。

对于民众思想领域的涉猎，我们暂且到此为止，现在再来专门研究一下群氓。为此自然需要去请教科学家，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仅限于同艺术家、诗人——同普希金、莎士比亚、洛贝·德·维加、梅里美、托尔斯泰伯爵打交道。但是问题在于凡是牵涉到个人和群众的心理问题方面，诗人大大超过了科学家。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伟大的艺术家。因为一般的艺术界小人物总是随心所欲、牵强附会地描述心理状态，结果不仅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反而使无数

读者莫名其妙。其实一些片面发展的天才人物有时也是这样。至于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往往不能准确地分析和准确地概括自己的艺术启示(为了避免使用“发现”这个词)，但这些启示无疑是存在的。

绝不能说，科学家根本没有注意过我们现在研究的现象。在相当久以前就有人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但是断断续续，是从某个极特殊的角度来谈的，并且不象所有的科学真理那样被一直继承下来。可以指出，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医师、罪行调查学家都做过很有价值的调查，但是这些调查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对相邻的专业没有任何影响，并且也远不象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伯爵等艺术家那样全面地掌握现象。但无论如何，前不久，可以说是前几天，科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稍有进展。这是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范围内在我国和在国外同时取得的。在我们这里，科学家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霍乱骚动上去了。结果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在彼得堡法律协会刑法分会作了报告，奥布宁斯基先生在《民法和刑法》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精神感染和霍乱骚动》的文章等等。也正是在这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国际刑事犯罪—人类学会议，会上塔尔德关于“民众的犯罪行为”的报告占有显著地位。由于问题牵涉的范围很广，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对之进行详尽的研究。我们只限于提出两点初步的意见。

无论是在布鲁塞尔国际刑事犯罪—人类学会议上，还是在我们这里的法律协会里，罪行调查学家们都研究了这个问题。因此很自然，他们都谈到了民众的犯罪行为，因为这是他们的专业。但是许多专家都倾向于认为，不应当扩大自己科学的专业范围，其中许多人(塔尔德十分粗暴地这样做)断言，任何民众都必然有罪。我们部分地已经看到了，而且在下面还会更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结论是多么错误和片面，它将导致多么奇怪的后果。

我们在上面完全是抽象地研究群氓，尽量使这一概念摆脱相近的概念和一切日常的复杂情况，而群氓一与这些情况相结合就变为具体的了。尽管群氓的思想有其全部逻辑上的独立性，但构成群氓本质的那个心理过程却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除了这一过程之外还有某种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在起作用。某些研究家们忽视了这一点，结果也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和总结。

二

在布鲁塞尔国际刑事犯罪—人类学会议上讨论犯罪的民众时焦点是法国犯罪学家塔尔德的论文，其俄译本不久前在喀山出版，标题是《民众的犯罪行为》。塔尔德在我国早已因其《模仿的规律》一书而知名。该书的主题同上述论文的主题有最密切的联系。

刊载在今年一月份《民法和刑法》杂志上的扎克列夫斯基先生的文章《论刑事犯罪—人类学》对该书作者塔尔德作了很正确的评论：“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相当博学并且能把各式各样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学因素有趣地、出人意料地加以对比。有的地方他写得非常出色，使用一些巧妙的修饰语，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但是总的说来，他写得含糊、隐晦、玄奥而冗长。他的哲理带有折衷主义的痕迹，界限不够肯定，不够明确。他往往滥用对比方法，把从自然科学中取来的事实同社会学方面的事实加以对比，其实这种对比并没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我要重复一句，这一切讲得都是十分正确的。自从人们开始采用把自然界的现象和过程，主要是生物学的现象和过程同社会学的现象和过程加以对比的方法以来，已经出现了大量以这种类比为基础的文献。但是在这大量的文献中只有很少很少的著作非常明确而有充分证据地指明了这种对比的意义和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对此根本不予考虑，而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对比，

把它看成是受同样一些规律支配的真正同类事实的最合乎逻辑的总结,或者不过是一种比较漂亮的、比较巧妙的、直观的、恰当的比喻。就连塔尔德也没有提出把自然科学的资料和结论同社会学的资料和结论进行对比的意义和范围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因此,他在这两方面的总结除了有一些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之外,也有一些纯属武断、没有任何重要意义,甚至因为说服力似是而非而把人弄糊涂。不仅如此,就是当他对于自然科学的因素和社会学的因素的总结在逻辑上完全合理,但他在细节上在最终结果上往往超出了合理的限度。而且就是在纯社会学的范围内,他的对比和总结有时也轻率得惊人。他爱作总结,具有某种奔放的特点,因为他没有固定的指导原则,借以识别思想和事物的异同。

塔尔德在《模仿的规律》中把心理生理因素——催眠用于解释社会生活的某些现象,这是完全正确的。人类历史上充满了这样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不是某种同被催眠的人的那种无意识状态相类似的东西,而是这种无意识状态本身,在程度上有的比较强,有的比较弱。然而,人类的历史自然也不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一连串催眠的梦境。否则,也就根本无所谓清醒的非催眠状态,从而也就无所谓催眠状态本身,而催眠状态这一类特殊现象是有其突出的特征,有其一定的前因后果的。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甚至谈起来都会使人感到可笑或是难为情。然而,塔尔德却偏偏断言:“社会状态也如催眠状态一样,不过是一场梦,一场根据命令而做的、处于能动状态的梦”,“社会是模仿,而模仿则是一种催眠”。这一总结尤其奇怪的是塔尔德把模仿规律分为“逻辑规律”和“超逻辑影响的规律”。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模仿某个人或物,是出自个人利益的考虑,对道义责任的理解等等;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没有这样一些考虑,而模仿不过是某种印象直接变为相应行动的事实。这

两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以各种方式复杂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从根本上、抽象地来看，两者有明显的差别。然而，塔尔德虽然明确了这种差别，却经常把它忘掉了。这一点从他决定把任何社会状态都称为“梦”，而又把一切模仿无保留地统统称为“一种催眠”的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显然，只有受“超逻辑影响的规律”行为支配的模仿才应当同催眠相对比。处于催眠状态的人是自动地“没有斗争、没有思想地”服从命令并模仿榜样的。而如果我服从命令不是无意识地，而是出自害怕惩罚，如果我遵从医嘱是由于相信他的医道；如果我模仿榜样是出自虚荣或是确信这样做有利，能带来好处和出自道义感，显然，在上述情况下，我并不是一个处于催眠状态的人。上述种种动因，无论其道德价值如何，都是处于清醒状态的意识活动。由于有了这些动因，甚至被塔尔德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地列入超逻辑影响的规律的那些现象也变得复杂起来。塔尔德所谓的这种现象主要是指时尚和习俗，并且在这方面发表了许多机智的正确的意见。在习俗和时尚的流行中纯粹的模仿本身当然起巨大作用，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绝不都是完全无意识地活动，而是仿效某种时尚或某种习俗，自觉地认为这种时尚或习俗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自觉地不希望由于自己的举止特殊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已故的康金斯基在其《心理学浅说》中正确地指出：“只有当一个人根据正确或错误的判断，考虑了他照另外一个人那样做为什么会更好或更为有利而自觉地以那个人为榜样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模仿。而上面谈到的模仿则是不由自主的并且纯粹是不自觉的，因此，这类现象可以称之为自动的、有机的、下意识的模仿，或者最好称之为传染。”确实，瓦·雅科温科先生（《感应精神病》）发现，康金斯基和大多数作者相反，他宁愿使用“精神感染”而不用“缺乏足够根据的模仿”的说法。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说法，说法可能恰当，也可能不恰当；问题在于区分这两类现象。确

实，雅科温科先生否认有必要把它们加以区别。他说：“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基本规律只有一个，因此把有意识和意志参预的模仿行动排除在整个这类现象之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雅科温科先生或许是对的，但是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学却不能停留在这种观点上。无论如何，塔尔德是把各种极不相同的事物都一揽子称之为“模仿”，因而不能确定最纯粹的模仿产生的特殊条件。这样一来，他关于催眠在社会学现象范围内的作用的有益见解便失去了一切实际意义。

可以期待，塔尔德在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上关于民众的犯罪行为的专题报告能再谈谈这一作用并且把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无论催眠学的前途如何，无论它是否能不负某些实用科学工作者——医生、教育家、罪行调查学家寄予的厚望，催眠的功绩从现在来看就已经是十分巨大了。首先，它帮助弄清了一个普遍的真理：任何智力活动过程，无论是自觉的还是未进入明确意识领域的，都力求通过相应的行为、肌肉运动而表示出来。区别仅仅在于管理意识和意志的最高脑神经中枢把观念和印象变为行为的过程是慢还是快。当然，这个真理早在催眠实验之前就已为人们所知了，但是，催眠实验尤其明显地表明并强调了这一真理。其次，催眠学许可把实验的方法用于研究一系列迄今为止，几乎能通过观察来进行研究的现象。关于不自觉和不由自主的模仿和服从的问题，不仅早在当代关于催眠的学说问世之前，而且在真正对催眠进行科学研究的创始人布雷德之前就已经不止一次地在文献中出现过。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回忆一下亚当·斯密的“道义感理论”就可以了。他的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不由自主的模仿。但是亚当·斯密，也如创立了“精神流行病”、“心理感染”等术语的老一辈精神病学家一样，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实验工具。他们能够观察一般日常生活中的，也能观察纯属病理学方面的不自觉模仿和服

从的现象，他们能够并且其中某些人已经从历史上的魔鬼附体、少年十字军远征、苦行流行病等中发现了相应的特点。但是他们不能做任何象样的实验，也就是说，不能人为地创造无意识状态赖以出现所必需的条件。所谓的催眠术或动物催眠，固然是一种实验，但它却是摸索自己所需要的条件并且部分地用幻想，部分地用招摇撞骗来弥补条件的不足。而现在，我们不仅能观察偶然碰到的意识和意志受抑制的现象，而且还能人为地得到这类现象，为它创造必要的环境。我们有了观察和实验这两根支柱，就可以不限于象沃尔涅在将近一百年以前所作的那样（当然他讲的是关于“动物催眠”），浮光掠影地提一下催眠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是明白无误地肯定它的作用。如果说，塔尔德在《模仿的规律》中既夸大了，同时又掩盖了这种作用，那么自然可以期待，塔尔德在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上关于民众的犯罪行为的专题报告中作出必要的修正。而这类犯罪行为早已为许多研究家概括为精神流行病、心理感染、模仿狂等等，而精神感染的特点也是自动地模仿和服从，具有催眠状态的主要特征。

令人奇怪的是，在塔尔德的专题报告中似乎只有两次提到了催眠学，而且讲的远不是主要的几点。在其俄译文的第 21 页上写道：“为什么某个人能享有威信或权威的问题依然得不到解释，正如为什么某个人比其他人更具有催眠的能力一样，尚未为人们所知。最出色的催眠术家是智力平庸的人，而最出色的医生在试图施用催眠时却往往遭到失败。”在第 40 页上写道：“有组织的集团的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是少数情况下）可以使一个人的个性完全改变。人们把这种吸引力同催眠性暗示的力量相比，发现前者超过后者。我不能同意西盖勒的意见，他认为既然连催眠性暗示也不能把一个正直的人变为杀人凶手，那么象我们一般在民众骚动中所看到的那样，当人处于清醒状态下通过暗示要想达到

上述目的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事实证明，造反或密谋所起的腐蚀作用大大超过了任何催眠术家的影响。”

由此可见，塔尔德在《模仿的规律》一书中谈到一般的模仿，也包括完全自觉的模仿时，他想把一切社会状态都比作催眠。而当他着手研究真正类似催眠状态的社会生活现象时，却很少而且完全是顺便才提到催眠。在第一种情况下，他沉缅于过分广泛的总结，却把心理生理因素完全湮没了，虽然他提出这一因素是完全正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只是在谈到“吸引力”、“普遍狂热”、“模仿关系”等时写得平淡而一般的一些地方才提到心理生理因素，这样一来就进一步缩小了自己本来就已经相当狭窄的任务。

当然，不能首先因为任务提得狭窄就去责备塔尔德：他是作为一个罪行调查学家在刑事犯罪—人类学大会上作关于民众犯罪行为的专题报告的。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任务并不狭窄，而仅仅是专业性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希望专家确定一下自己的专业范围并且在不超越这一范围的情况下，注意相邻专业的合理要求。然而，为此专家们就必须十分警惕自己，而许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对于罪行调查学家来说，他们的专业的实质本身就决定了，凡是从本专业的角度去探讨一下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可能有极大的诱惑力。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证据，那就是以龙布罗佐·费里和加罗法洛为首的所谓刑事犯罪人类学实证学派。顺便指出，这个学派在去年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上遭到早就应得的彻底失败。塔尔德自己的例子也是一个证据。

犯罪是以刑事自卫手段作为武器的正式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这个定义足以满足狭窄的国际目的的需要，并在它显然不能满足需要的领域内也在悄悄地、近乎不自觉地许多罪行调查学家奉为准则。任何一种社会形式，不论其成员的数量、本身的目的、产

生的原因及其组织的性质如何，都力求保护自己的制度、自己的面貌不受任何破坏，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都是一样。如果某个社会形式确实具有足够的力量，那么这种自卫就带有惩罚性。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国家，而且也适用于一国之内正式体现奖惩权力的各种社会形式和别种社会实体。罪行调查学家当然从国家的角度看问题并且在其业务活动范围内是正确的，他们的任务正是在于支持受到正式法律保护的某种社会形式。但是他们如果想把自己的观点用到其他领域去，那就要大错特错了。现在我们就举一个粗略的例子，它在细节上虽不完全合适，但是却很明显地能说明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他在《死屋》中描绘的其他住户一样，也是苦役监牢中的一名犯罪分子。国家固然是通过自己的特殊机关——战地法庭判定他是一个罪犯，同一切被判处在一定时期内从事苦役的其他罪犯一样。但是无论是从伦理学、心理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同那些罪犯都不一样。其次，任何社会形式都不仅应受静力学规律，即各种现象共存的规律的支配，而且也应受动力学规律，即各种现象循序交替的规律的支配。社会形式在发展，在变化，与此同时关于犯罪的概念也在变化。

自然，塔尔德是懂得这一点的，然而他却不能很好地解决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困难。他说道：“正直(?)的唯一最明确的(我不说可能是最好的)定义就是，正直的人是适应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习俗和观点的人，与此相反，卑劣的人是不适应这种习俗和观点的人。诚然，一个人因为在目前不同意一般人的意见而被当成坏蛋，可能不久之后又由于同样的原因被当成一个圣徒或英雄而出名，但这是将来的事。至于目前，只要他污辱了社会的良心，立刻就要遭到社会良心的谴责。”

实际上正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过去也是这样，因此这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罪行调查学家可以完全肯定这一点，

而无需再自作聪明。当有人引历史上的例子，例如伽利略的遭遇时，这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罪行调查学家可以用下面的道理来加以反驳。伽利略是个正直的人，他当时所宣传的是现在公认的真理，小学生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就要得零分。但是在十七世纪的罗马，伽利略却成了罪人并且理所当然地受到惩罚，因为他没有去适应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使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伽利略，后代人可能承认他是个伟人和真理宣扬者，而对我来说，他仍然是个罪人，应当受到某种惩罚。

塔尔德不敢讲这类肯定的话，相反地他是这样继续自己的上述意见的：“如果说环境改变或社会集团改变时，同一行为便不再是犯罪，而成了功绩，或者与此相反，那么应当怎样看似乎是民众命中注定要进行的抢劫、纵火、杀人等行为呢？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中每个人都受到共同的榜样的激励，都服从并且遵循共同的意见，由于受到这一小小的残暴集团的共同变化的吸引而入迷，似乎立刻可以脱离社会其他部分的一切影响，并对这种影响已经感到完全陌生。是否可以说，每个人的行为由于有了大家的参加就会变为无辜？是否能说，任何一个与外界隔绝的集团都力求制定自己的法律，自己的道德？是否能说，因此关于这一整个集团集体有罪的见解中包含着矛盾？实际上所谓的民族犯罪，即整个民族一起犯罪究竟是什么呢？这或者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或者是仅仅意味着，一个民族由于为某些新的狂热所征服，抛掉祖先的习俗，而在祖先的心目中成为罪人，但却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受到称赞。大民族认为是正义的东西，小民族、阶层或部落却不这样看，正如民众或秘密团体也不这样看一样，这是为什么？看来，民众的犯罪行为，也象民族犯罪行为一样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这些疑问是非常典型的。塔尔德并不是那种狭隘的罪行调查学家—法学家，他们在议论问题时丝毫不因对伽利略的审判而感

到难以为情。他产生种种疑问,但这些疑问并不是一个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道德家的疑问,而仍然是一个罪行调查学家的疑问,他对任何一种社会形式,只要它在历史上已经形成,就准备予以支持。但是后来他再一次努力想使自己的思想摆脱存在的事实的压力,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其中谈的已经不是犯罪问题,即违法的问题,而是善和恶的问题。他谈道:“建立在某一个小小的社会集团的意见或意志,某一政党或阶级,甚至一个民族的利益之上的有关善和恶的概念是极不完备的”。应当站在这一切之上,考虑到全人类,人类的整个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从这一伟大的整体中寻求善和恶的标准。这一点说得非常好,但是,只是在原则上表示有上升到这一高度的愿望。塔尔德在实际上却不这样做,至少读者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他不向我们说明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不说明理由和论据,就提出了下述论点:“我们认为,任何行为准则,如果既不考虑过去的道德概念,也不考虑我们的行为在将来的长远后果,就让我们摆脱对当代的、但是异己的社会集团以及对后代应尽的一切责任,那么这种行为准则就是不道德的。我们认为,任何行为,如果是为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的私利,哪怕是千百万人的私利而在全人类的大家庭中散布不安和恐怖,例如使整个欧洲惶惶不安,同时却有意识地对这种情况置之不理,那么,这样的行为也是犯罪。”

应当承认,作为对全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探讨的成果,上面讲的那些仅仅是点滴。点滴这两个字讲得相当模棱两可。作为善和恶的标准,这种提法显然是太不明确了。它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和相互矛盾的解释。其次,至于谈到犯罪,那么第一,并没有专门指明是民众的犯罪行为(因此塔尔德在确定犯罪之后,便认为必须将带头人的犯罪行为和责任同民众本身的犯罪行为和责任加以区别);其次,它丝毫也不能帮助解决这位罪行调

查学家的特殊的疑问。“我们认为，任何行为，如果是为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的私利，哪怕是千百万人的私利而在全人类的大家庭中散布不安和恐怖，例如使整个欧洲惶惶不安，将都是犯罪。”这里同民众本身又有何相干呢？这一定义是否也适用于俾斯麦、拿破仑第一、拿破仑第三呢？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当这些人掌握着权力的时候，当他们有权进行惩罚和赦免的时候，对他们权力的任何侵犯就已经构成了犯罪。

从罪行调查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难题，是塔尔德所不能回避的难题。然而他却拚命扩大自己的地盘，把罪行调查学家的观点运用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中。

虽然塔尔德的专题论文份量并不大，但是其中却把许许多多各类现象都搅在一起，以致很难说究竟什么是他研究的对象。他自己说，他感兴趣的是“罪犯们在普遍狂热的影响下成群地采取共同行动，并能发挥出个别人单独行动时潜在的力量和禀赋”。他补充说：“固然，我们也将涉及到有组织的秘密犯罪团体，但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犯罪集团，对于它们来说，前者往往是潜在的原因”。

在这段开场白中就已经含有某种概念上的混乱，至少是概念不清，我们看到，在《模仿的规律》中也反映了这种概念的混乱和不清。“在普遍狂热的影响下”犯有某种罪行的民众同“犯罪集团”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是根据一定的周密的计划行动，有意识地在同犯之间分配角色，根据对每个成员能力的粗略了解，划分一定的等级。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仅仅是：无论是民众犯罪，还是有组织的一帮人犯罪都是集体犯罪。但是在这一广阔的范围内在自觉的行为和不自觉的行为之间有一条界限，这条界限对于罪行调查学家来说也有重大意义，至少是在研究刑事责任能力和责任时是这样。这一区别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尤为重要。而塔尔德在进一步叙述时仍然不加区别地并且是一揽子地谈论民众的犯罪和犯罪

集团,认为它们有同样的心理,用果戈理的话来说是顺路把“别的衙门的官吏”也弄来了,即甚至把罪行调查学家也看不出何罪之有的集体行动的一些现象也包括在内。最后这些总结可能是塔尔德那篇专题报告中最令人吃惊的部分。但是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出另外一位作者——西盖勒,他在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之前,因此也就是在塔尔德作专题报告之前,但是在塔尔德的《模仿的规律》的强烈影响下论述了民众的犯罪。塔尔德也尊敬地引用了西盖勒的书《犯罪的民众》(根据意大利文第一版;第二版是法文版,作了相当多的补充,书名为《La foule criminelle》)。

我在《英雄和群氓》一文中列举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事实,在这里请读者回忆一下1831年军屯士兵暴动中的一个场面,根据帕纳也夫的回忆录:

“在争夺索柯洛夫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戴着几道荣誉袖章的军士,他伏在台阶上放声大哭,我问他哭什么?他指着索柯洛夫回答说:‘这是怎么搞的啊!人们要打死的是不是指挥官,而是我的父亲啊!’我对他说,与其躲在一旁哭,不如走过去努力劝说军屯士兵把索柯洛夫留给我。于是他便跑过去了。但是没过一两分钟,当我同几个军屯士兵冲过去援救索柯洛夫时,我看到,正是那位军士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正在打他,‘你这是在干什么!不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吗?他不是指挥官,而是你的父亲!’他回答说:‘眼下和刚才不一样了,阁下,您瞧,大伙都在打,我干么要一边站着呢?’”

这个场面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群氓对构成群氓的个人的影响:一个立过战功、受到长官赏识的老军士确信他眼前发生的事虽说不是犯罪,但也是残忍的不义行为,却由于受到“大伙都在打”的普遍激动的影响,自己也参加到其中去了。但是,这个例子无论多么生动,无论多么具有说服力,我们却绝不能根据这个例子就把军屯士兵暴动的整个经过归之为心理感染,归之为榜样和群氓的

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单独拿出来加以研究，但这仅仅是进行抽象的逻辑推理，却不应使我们因而就看不到在军屯组织内部有产生这种现象的其他原因。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西盖勒和塔尔德是如何看待这方面的问题的。而现在我们仅仅谈一下这一肯定无疑的事实：卷入群氓浪潮中的人的内心活动能够大大偏离他在独处时的品行。

意大利刑法“实证”学派的头子之一费里在观察这类现象时，提议建立一门新的学科——集体心理学，它既不同于个人心理学，也有别于社会学。它应当只研究各种政治机构、委员会、剧团中的个体集合体等等。我没有读过费里谈这个问题的那本著作，但是根据西盖勒的引文，可以认为，费里除了政治、司法、文艺机构（因为它们却是个体集合体）之外，还提出了民众犯罪和强盗集团。无论如何，西盖勒和塔尔德是敢于作出这样的总结的。他们立论的出发点是：单独个体的性质并不能决定他们的集合体的性质。他们的论断的归宿是：个体集合体永远低于构成这一集合体的单个成员。在这里起点与终点之间的距离微乎其微。西盖勒毕竟学识稍渊博些。他一开始就指出了有陪审员的审判的某些过失（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实证主义者”一般是不大欣赏有陪审员的审判的，在这方面塔尔德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他说，有的过失是由于陪审员个人的无能或他们应解决的问题困难；但也有时完全是由于有文化修养的陪审员们对明摆着的案件公然作出荒谬的判决。如果个别征求意见，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大概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他们在一起则毫不中用。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结论，西盖勒只不过举了三个具体的例子，并且没有谈到任何细节。接着他又引用麦克斯·诺尔多在《奇谈怪论种种》（俄译本的书名好象是《探索真理》）中表述的下列思想。他说，你把二三十个歌德、赫尔姆霍兹、莎士比亚、牛顿等等召集在一起，让他们解决某些日常的实际问

题，那时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办法同最平庸的人的集合体作出的判决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因为，他们除了有自己个人的独创性外，还有种种继承性，而这种继承性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的。而每个集合体中重复多次的这种特点又会胜过只有一次的独创性的特点。这样一来，在每一个集合体中，所有伟大的独创的东西都消失了，而一切平庸的、不出色的东西都突出到了首位。接着，西盖勒引用了一句古老的名言：“元老都是大丈夫，元老院却是蠢猪。”

塔尔德也引用了这句话，但是补充说：“尽管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谚语：‘谁也不如伏尔泰的智慧广，如果大家加到一起伏尔泰也比不上。’我认为谚话的后一句毫无意义，是民众至高无上的狂热崇拜者编造出来的。”

西盖勒在这之后想对自己的论述范围作些限制，为此他把一切集合体分为同类集体和不同类集体两种。除此之外，他根据塔尔德本人的某些原则，在自己那本书的附录中记述了一个最有趣的、独创的有利于集体思想的理论。但是塔尔德是个不屈不挠的人，他正如数学上的直线一样，是起点同终点之间真正的最短距离。他说道：“我们的社会机构都是一些非常粗糙的机器，不能同我们自己的机体相比，因此，议会和国际会议表现的集体智慧任何时候也不能同这些机构中的一个最平庸的成员的智慧相比，无论是在判断的速度和准确性上，无论是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无论是创议和决议的英明程度上都如此。……可以指出一些大的集团，甚至整个民族被说成是奸诈的，但它们却是由一些诚实、正直的个人组成的。例如，英国人毫无疑问比英国本身要诚实、正直、高尚得多。”显然，“群氓”既然无非是某种统一的集体，因此更应当是犯罪性的。然而塔尔德现在讲的已经不仅仅是犯罪，不仅是违法的行为，——他从专门的刑法领域转到了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领域，虽然他做总结时不受拘束，但是却保留了自己的专业观点。由于

这种内在的矛盾，结果就出现了令人惊叹的东西。塔尔德在《模仿的规律》中得出结论说，任何“社会状态”都是“梦”。现在发现，原来任何集体的思想或活动都低于个人的思想或活动，一个人无论进入什么样的社会，都必然会在智力或道德方面有所下降。

人们可以对塔尔德的前后不一致感到惊奇。塔尔德却想在国际会议上申述并捍卫这一思想。但是在他的专题报告中有而且也不可能没有很多这样的矛盾，因为严格地说，一个人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才置身于“社会状态”之外。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单独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但是却在考虑读者，塔尔德和塔尔德谈的社会现象，因而我离不开社会关系。而且不仅是所谓的社会活动家才是这样。例如，一个除了自己的服装和发型之外什么都不考虑的女人，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仍然是为了某种把她同其他的女人和男伴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甚至鲁滨逊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时也没有置身于社会状态之外，因为他是靠回忆过去和希望将来能返回社会度日并且随身把在社会中培养的思想感情也带到了无人的荒岛上来。从塔尔德在《模仿的规律》中所持的观点来看，这一点就尤其明显。因为该书认为，人承受祖先们的巨大遗产，祖先们强烈地影响他前进的每一步，“暗示”他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从塔尔德的这个观点来看，人的智慧永远是集体的。当塔尔德在自己寂静的书房里，似乎是孤独地思考或动笔写自己的专题报告时，他的智慧的集体性并不比布鲁塞尔国际会议的集体智慧差。在国际会议上塔尔德同考虑和他所研究的课题相同的人交换思想，在自己寂静的书房中他部分是自觉地同其他作家所写的书进行商讨，部分是不自觉地向自己的老师和社会生活学习。而参加国际会议的其他成员也做这项工作。于是有人便提出问题，为什么他们自觉地交换思想的成果势必低于塔尔德或参加会议的另一个单独的成员的部分自觉的、部分不自觉的工作成果？

这些见解显然是荒谬的,是由于不仅根据过于狭窄、而且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作出的过于大胆的总结。塔尔德的思想发展过程是十分明显的。使他感兴趣的是真正的民众犯罪,真正的群氓是指偶然地、无组织地集聚在一起,被不自觉的相互模仿的潮流吸引入迷的一大群人。与此同时,使他感到惊讶的是,群氓有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极端狂暴和残忍远远超过了群氓中的每个分子单独敢于做出的一切,他却不反问一下自己:犯罪的群氓是否仅仅是个别情况,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完全不犯罪的群氓(例如,由于听口才好的传教士的动人演说而入迷的群氓或剧场里的群氓)。塔尔德一方面宣布任何群氓都犯罪,并且把强盗集团也算在内,另一方面又得出结论说,任何一大群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比组成它的个体要低。在做出这些总结的过程中,他碰到一些显然与之矛盾的事实,但是由于他被自己的出发点弄得头晕目眩,不是看不到这些事实,就是对它们作出极其错误的解释。

这种过错不仅是由于塔尔德头脑的特点:既缺乏任何灵活性,又不受任何固定不变的一般原则的约束,而且也是由于对群氓心理的种种问题研究得不够。从下文中可以看出,尽管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许多专门调查,但在欧洲的文献中对它们却研究得很不够。

我们看到西盖勒的意见同塔尔德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至少是某个集合体的水平比其成员的每一个人的水平要低,同时西盖勒特别强调有陪审员的审判的无能。上面关于国际会议的意见也完全可以用在这一点上。但是无论西盖勒在这方面的论断是多么奇怪,但是他在自己的总结中却远不象塔尔德那样直爽。他维护的其实是更为一般的原则,即集合体的成员有时并不能预先决定或决定集合体本身的特性。他进而得出结论说,个体的特性只能在同类的有组织的集合体中得到充分反映,而在无组织的不同类集合体即群氓中,作为其成员的个体的个人特性并不能决定

集合体的决定或行动。然而同时西盖勒并不否认，集合体的水平可能高于个体的水平，但是他也没有肯定，甚至没有提出这一点，而他举的例子却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本来可以预期，他对待舆论，对待多数人的决定会象塔尔德一样高傲，然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西盖勒在书的本文中，特别是在该书的附录《多数人的专制和集体心理学》一文中捍卫了多数，因而也就捍卫了多数人的声音起决定作用的一切机构。而极其有趣的是，这时他的依据是塔尔德在《模仿的规律》中所表述的基本思想。

西盖勒说道，乍看起来，使任何一个扫院子的人，例如赫伯特·斯宾塞这样的人都享有平等投票权的全民投票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看问题应当稍微深入些。是否多数人的决定永远反映的是智力水平低下而仅仅数量众多的人的思想呢？会不会是相反的情况，即正确的、有益的、崇高的思想把最大多数的拥护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呢？塔尔德在《模仿的规律》中斷言，卓越的人物能够带领群氓跟随自己走，绝不总是凭借外力或欺骗。凡是伟人，从拉美西斯到亚历山大，从亚历山大到穆罕默德，从穆罕默德到拿破仑，他们都不仅仅有力量和机智，而且还有“威信”，也就是催眠术家在被催眠的人心目中的那种威信；“多次持续地观察这一光荣和天才大放异彩的光点使得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进入强直性惊厥状态。”塔尔德证明，一个“社会的人”也同一个处于催眠状态的人一样，除开授意的思想之外，再没有别的思想，尽管他觉得授意的思想似乎是他自己独立形成的。西盖勒由此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当人们说，在某个问题上大多数人持有某种意见的时候，这就标志着一种现象，如果用准确的方式加以表达的话，那就应当是：某个人的意见通过暗示掌握了多数。就是说：某个人，可能是演说家，也可能是记者，他的意见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能够更快、更有力地转达给多数人……如果认为，多数人的专制意味着平庸的胜利，那就错了。

认为世界是由最没有才能的、仅仅在数量上众多的人来管理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最有才能的人可以把大多数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把自己的意志下达给他们。肤浅的观察者认为多数人的最高权力是数量的胜利，其实它是对上等人的不自觉的尊敬。”西盖勒那本书的结尾部分又回到了下面的论题上：“从集体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多数人的专制并不象某些肤浅的观察者所说的那样是平庸的统治；但是也不能象另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用‘数量决定一切’的原则来为之辩解，因为这一原则的算术味道太浓了，不适用于社会学。多数人的意见实质上是慢慢深入人心的最卓越人物的意见，因此，多数人的专制可以归结为已经成熟到可以运用的程度的天才思想的专制。”

在这种对多数人的意见进行辩护的细节中，读者不难发现，西盖勒又忘记了自觉和不自觉之间的界线。但是他在这里仍然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并且是同西盖勒自己的某些思想，特别是同塔尔德的思想非常矛盾的理论，虽然这一理论是从塔尔德的原理中引伸出来的。因此说，集体心理学的大厦盖得还很差。在这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证据。

上面在谈到各种文艺作品中被称作“民众”的群氓时，我们曾竭力把群氓的思想同一切相接近的概念和在现实中群氓所遇到的各种日常的复杂情况分开。但是那时我们便已发现，群氓特有的精神感染过程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群氓的某种活动中，不管它是犯罪的或完全不是犯罪的活动，除了精神感染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在起作用，它们可以溯源到组成群氓的人的理解力、利益、生活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西盖勒只是在他的书的第二版中才想起这一情况，甚至不是他本人想起的。他在第二章的注释中写道：“我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没有想到，甚至是完全忘了根据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来看问题。勒松教授向我指出了这

个漏洞。”西盖勒现在在填补这个漏洞的时候，指出了群众经济处境的困难，群众的无知，群众对有产阶级产生羡慕、嫉妒，各个阶级因不断进步而产生但又不能予以满足的需要。西盖勒重视现实的利益和感情，与此同时，他对有破坏性的思想和理论，如果说不是全盘否认，那么也是把它们的作用缩小到最低限度。塔尔德则持不同的看法。他说：“慢慢扩散的心理感染，静悄悄的模仿，它们在不知不觉中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它们永远先于民众暴动所特有的那种暴风雨般的、不可遏止的突发性模仿。正是由于十六世纪初广泛宣传了路德的思想 and 十八世纪下半叶广泛宣传了卢梭的思想才有可能发生下述事件：1525年闵采尔在图林吉亚领导了农民骚动；在百年战争期间梯利和华伦斯坦组织了大批群众以及在法国革命期间茹尔当在阿维尼翁和维内森组织了军队。”

由此可见，塔尔德认为使精神感染表现尖锐的因素正是精神感染，只不过它是慢慢地静悄悄地进行的，表现为宣传和掌握某些思想。因路德和闵采尔的名字而出名的事件所以在历史上占有自己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封建天主教制度的压迫已经使人不能容忍，而是因为路德思想的传播。显然，这样提出问题是过于狭隘和片面的，以致无需再加以批驳。但是为了说明问题，而且不仅是塔尔德一个人有这种狭隘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完全忽视群众中精神感染的因素，因此，有必要较仔细地研究某个具体的例子，通过它来弄清各种因素的意义。我们且以俄国生活中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为例，它是一位专家西科尔斯基教授记述下来的，被称作“精神变态流行病”。

1891年底和1892年初在基辅省的瓦西里科夫县的几个村子里，在农民当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宗教运动，被称作“马列旺尼教派”。它是因一个小市民康德拉提·马列旺尼而得名的。这个马列旺尼已经得了几年的幻听症和幻嗅症。特别是在作祈祷的时候，

他感到有某种异香，——他把它称作圣灵香，接着他的全部感觉都产生了幻觉：他觉得身体特别轻盈，飘飘欲飞，同时心情感到莫名的舒畅。马列旺尼的极度兴奋状态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意，很快他把幻觉也传染给了他们。马列旺尼的信徒们往往快活地嗅遍自己的双手，衣服和散发着“圣灵香”的其他各种物品，觉得身体特别轻盈，飘飘欲飞。他们还非常容易抽搐，特别是在集体作祈祷时，一面还使用各种莫名其妙的语言讲话：例如“老天啊，老天，利托，利托，米托，奇托。努，克连多、努，甫利·克列斯托、特林多，阿尔切，阿朗其，阿兰其·乌斯其，特灵吉阿兹，翁吉”等等。讲话的人和在场的人都相信，这些无法理解的话都是在圣灵的启示下讲的。圣灵把运用语言的才能传给了最优秀的人们。马列旺尼的信徒们平时或者冷漠无情，或是兴致勃勃；他们常常流泪哭泣，但流的永远是感动和幸福的眼泪。他们变卖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为自己添制了各种服装，他们不干活，而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快活地等待着世界末日很快地到来。他们喜欢集会，这时在场的人便逐渐地都产生幻觉，开始抽搐和歇斯底里发作。这种现象的中心人物是上面谈到的康德拉提·马列旺尼，信徒们都把他奉为救世主。

曾经有个委员会被指派到现场调查这一现象，西科尔斯基先生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他把这一现象的起因分为两类：精神上的原因和肉体上的原因。精神上的原因包括：第一，史敦达教派在南方各省的发展；第二，识字的片面性，把民众的注意和兴趣全部集中于难解的宗教问题上；第三，缺乏民众文学和社会上文化水平高的阶级影响民众的其它形式；第四，存在着精神错乱的人；肉体上的原因有两点：克里木战争的影响和日益严重的酗酒。最后一点不言自明。关于克里木战争的影响，西科尔斯基先生指出，目前的一代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出世的，据说在战争中出世的一代人

在肉体和神经方面从来都是比较软弱的。西科尔斯基说：“在结束上面这一段论述时，我们不能不指出民众情绪中的一个心理特点，这一特点可以概括为对精神上的邪恶有痛切的认识并且渴望摆脱这种邪恶。民众在等待并且渴望宗教革新。他们寻找救星，结果……在康德拉提·马列旺尼这个疯子的身上找到了！应当说，马列旺尼教派是病态居民的号叫，是对戒酒和改善教育和卫生条件的哀求！”

马列旺尼教派是一个说明心理或精神感染表现为明显的病态形式的鲜明的例子。对这些病态形式，西科尔斯基先生作了详细的研究，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谈了，而仅仅谈一下感染或流行病的这一总的事实。马列旺尼感觉到有一种异香，于是这种幻嗅便传给了他的全体信徒；他感到自己的体重减轻了，而在场的人便看到，他在离地上升（我忘记了谈这样一个细节：马列旺尼教徒证明，他们的老师离地五俄寸），于是他们也感到自己身体特别轻盈，在集体作祈祷时一个人开始抽搐，逐渐地所有的人都感染上了抽搐，这是感染的一个最普遍、最明显的例子，说明意识和意志处于麻痹状态，以致对抽搐的视觉印象，不触及高级脑神经中枢就慢慢变成了抽搐动作；一想到异香就已经感觉到了它。我们在被催眠的人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我们对精神感染和催眠状态的观察越深入，它们外部特征的相似之处和心理生理过程的共同点也就看得更清楚；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明显的病态感染，如马列旺尼教派，而且也适用于一切程度不同的不自觉的和不由自主的模仿。记得当时《欧洲通报》和《彼得堡小报》都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但是现在它却是公认的事实。然而，如果象塔尔德、西盖勒和其他许多人那样，仅仅承认这一事实，不对它作进一步的分析就把它作为进行社会学的总结的基础，那是不够的。这样做既不正确，也不合适。催眠术之所以受到科学的重视，特别是因为它允许广泛地运用实验

的方法，通过一系列直接的和检查性的实验，查明现象本身以及那些促进或妨碍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典型发展的条件。目前催眠实验和有关催眠的种种议论几乎已经成了时髦。但是远在这之前，我们对大规模的精神流行病就有过极为详细的描述，甚至是调查。例如，非常确切地描述了军事生活中突发的集体勇敢和惊慌失措；描述了中世纪的魔鬼附体、变狼狂、舞蹈狂、苦行等等的流行病。但是研究者们只能满足于一些含糊的说法，如普遍狂热，为榜样吸引入迷，最后还有精神感染。最后的一个术语虽然已经进入科学，但是却不如说更具有比喻的性质。现在我们不仅知道了什么是精神感染过程，而且有可能相当肯定地谈论中世纪和军事生活中对感染现象有利的社会条件。

催眠状态特有的那种意识的片面集中和意识的缩小最易于通过瞬间的强烈印象或一系列单调的、微弱的、千篇一律的印象(手的诱导动作，注视一个发光点，倾听钟表的滴答声)来达到。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人为地使个人生活变得贫乏，就象是把心灵的全部门窗统统关闭，而只留下一个小通风口，从那里只能看到和听到催眠术家和他在做什么或他命令做什么。这时意识和意志的活动减弱了，而任何印象或仅仅是关于任何印象的心象(印象和心象都是通过催眠术家的唯一小通风口获得的)都可以把被催眠的人完全控制住：印象和心象立即引起了相应的肌肉运动——模仿或执行命令，把注意力集中在占据整个身心的一个点上的这种情况，布雷德称之为“思想单一状态”。

我们把这些原则应用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现象上，便得出《英雄和群氓》一文中的某些一般性结论，现在我把其中的一个结论一字不差地引用一下：“谁要想统治人们，迫使他们模仿或服从，他就得象做催眠实验的催眠术家那样行事。他必须在一瞬间给人们以强烈的印象，使之完全为这种印象所控制，从而暂时抑制住其

他一切感觉和印象(意识的片面集中也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或者是把这些人置于一成不变的单调印象的条件下。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几乎都能创造出奇迹来,使一大群人听从他的指使而无需借助于强力。但有时这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靠英雄个人的努力取得的,有时则根本不需要这种努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品质或身体素质。在后一种情况下,任何人都能成为英雄,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

马列旺尼教派的情况也是这样。有一种理论认为天才和疯狂有相似之处。还有另外一种理论,部分地以第一种理论为依据,断言任何运动的领袖都是“半疯子”,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这个理论一般说来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从下面这一点来说则是正确的,即在某种条件下,任何一个相当明显的精神病患者都能把周围的“处于思想单一状态的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并成为某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康德拉提·马列旺尼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崇高的品质,而是因为他的独特、异常和古怪吸引了追随者,正象飞蛾不禁要飞向黑暗中突出的灯光、烛光一样。显然,这种发光点不一定都是半疯子,也可能是具有崇高的思想和道德品质的真正的巨人,最后,也可能是优缺点都不突出,但偶然在某个时刻采取坚决步骤的人。

康德拉提·马列旺尼的行动(当然不是有意的)象催眠术家那样,通过某些方法把被催眠的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但催眠术家是同一个人打交道,而马列旺尼则是同许多人打交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在剧场里如果有人惨叫一声“失火了!”就会出现一片混乱,往往同危险的程度极不相适应的混乱。这是由于徒然一声喊叫同任何突然事件一样,在短期间内使人们感到惊震,减弱了意识的活动,结果又是把全部门窗统统关闭,而只留下一个小通风口开着,人们则通过恐怖的眼光从这个小通风

口看到危险。然而下述情况更加强了效果：每个处于思想单一状态的人都在自己的周围看到惊慌的面孔、绝望的手势，结果每个人的惶恐程度即使不是象准确的算术演算一样按惊慌的人数而增加若干倍，至少也是大大地增加了。于是就出现了类似相互催眠的现象（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埃斯皮纳斯在《动物的社会生活》中作了很好的说明）。由此可见，任何群氓、任何大群人本身就包含有某种有利于出现不自觉模仿的因素。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即意识的活动必须受到某种东西的抑制。因此，国际会议、陪审团、委员会、议会等集合体都不在此例，因为那是人们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交换思想。当然，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个有口才的演说家并不是用理性的论据和实证说服自己的听众，而是用自己激动的心情吸引了他们，影响了他们，正如“失火了！”的一声喊叫影响了剧场中的观众一样。但是从这类集合体的整个活动来看，上述情况并不明显，而且最后仍然是自觉制定的真理占上风。

在马列旺尼信徒们的心目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康德拉提·马列旺尼是一个“英雄”、中心人物和发光点，结果形成了一种教派。但是也可以没有这种所谓的长期英雄。在剧场中第一个高喊“失火了！”的人往往是不为人所知的，也丝毫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人们的注意力并不是集中在他的身上，而是集中在面临的危险上。雅科温科先生在《诱发性精神病是一种病态模仿》一文（最初刊载于《临床和法律精神病学和神经病理学通报》上，后出单行本）中举了下面一个有关集体幻觉的有趣例子。1874—1875年在谢德耳策省实现了教会合并（有二十多万信奉天主教的农民并入东正教）。此举引起了宗教狂热病的迸发。许多不愿并入东正教的人坚决进行了抵制。在谢德耳策省的合并派信徒中对列斯纳修道院中的圣母像崇敬备至。根据长官的命令，这尊圣母像被从列斯纳移到了一个东正教教堂里。不久以后在被宗教合并激怒了的人们当中便

流传说，圣母像自己离开了东正教教堂正乘云返回列斯纳。人群都赶来向圣母像顶礼膜拜，脚步和目光都紧跟着在云端时隐时现的圣母像。信徒们都看到了圣母像。

对这一案件进行侦查的结果，可能也发现了“罪魁祸首”，其中包括第一个看见了在云端出现圣母像的人。但是受到他的幻觉感染的成千的群众很可能并不知道他，至少是没有注意到他，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圣母像上。这种并没有以一定的个人为运动中心的心理感染，虽然其中的感染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导致集体幻觉，但是却清楚地证明，问题并不能仅仅归之于感染，仅仅归之于模仿。塔尔德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要对模仿的范围作相应的限制。西盖勒只是在他那本书的第二版中才想起这种限制的必要性，但是从他追随费里，想把“集体心理学”不仅同个人心理学，而且也同社会学分开的这一事实中已经可以看出他承认这种必要性的某些迹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而且还将会看到的那样，塔尔德对群众性狂热的心理学方面理解得不够细致而且片面，而对它的社会学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没有触及。

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列旺尼教派的问题上来，看一看引起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西科尔斯基先生把它的原因分为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两类。但是可以有另外一种分类法，即把它们分为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原因。例如，在某一部分居民中有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这就是心理学的的原因。但是要想使这一原因的作用能充分表现出来，就需要有某种社会条件，即社会学的原因。社会学的原因又可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两种。一般的社会学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凡是当地的条件造成了贫乏的、单调的、缺乏多种印象的生活的地方，那里就可以指望历史在这一贫乏单调的背景下进行大规模的催眠实验。西科尔斯基先生指出了这种情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民众教育的贫乏和单调。但是除此之外还可

以从经济等条件中去找原因。马列旺尼教派的典型现象——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罗斯的土地上，这证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其次，我们不知道在瓦西里科夫县促使流行病蔓延的特殊社会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在谢德耳策省发生的事情上却表现得相当明显。运动的全体参加者和每一个人都受到这种原因的影响，而不问其是否进行了模仿，而模仿则只不过是一个多余的、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必须区别一切群众运动的这两种起因，显然，在运动带有犯罪性质的情况下，这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刑事犯罪的实践上来看都有重要意义。解决有关刑事上的责任能力问题，这不是我的事，——这方面的工作会有专门的罪行调查学专家来处理。但是，鉴于塔尔德所持的立场，人们不由得会产生一个问题：群氓的行动如果是在模仿的影响下进行的，而模仿是“一种催眠状态”，那么群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否有责任能力？有一些犯罪行为是在催眠状态下，甚至是在清醒状态下，但是根据上次处于催眠状态时所接受的暗示进行的。这样的犯罪行为，显然是无责任能力的（参看塔甘策夫先生的《俄国刑法讲座》第2卷中有关部分）。然而塔尔德在专题报告的结尾部分谈到犯罪的群氓的责任时却全然回避了从他自己的论点中产生的问题。

塔尔德有时甚至忘记他在前几行讲的内容。例如，他在描述群氓心理的一个特点时就是这样。

他顺便谈道：“一群发狂的群氓，他们在1791年在巴黎郊区折磨一个富有的农场主，怀疑他靠损害社会的利益大发横财，但有一个人热心地袒护他，突然间坏蛋们从对这位老爷的极端愤恨变成了对他的极端好感，他们让他同自己一道饮酒并围绕着自由之树跳舞，而在一分钟以前却准备把他吊死在这棵树上。群氓对敢于在某方面不同意其意见的个别人的反对意见和对抗行为都是不能

容忍的。”

由此可见，塔尔德在刚刚讲了群氓由于某个人的袒护而改变了残忍的意图之后，马上又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论点：群氓对别人的反对意见是不能容忍的。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会有，但是决不能并列地提出两个互相矛盾的一般性的论点，不加任何说明，也不想使它们在某方面一致起来。

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群氓运动的善恶问题。

三

在4月份和5月份的《每周书刊评论》中载有弗·康·斯卢切夫斯基的一篇文章《群氓与群氓心理学》，是作者在彼得堡法律协会刑法分会作的一个报告，经整理后发表的。在1月份的《民法和刑法杂志》上载有彼·纳·奥布宁斯基的一篇文章《精神感染和霍乱骚动》，同一作者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在善行方面模仿的规律是一个被忽视的行善因素》。

这几篇文章不仅题目非常有趣，而且写得也非常有趣。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和奥布宁斯基先生的著作，虽然观点不同，在有几点上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但却同样充满着生活的气息和生活的兴趣。它们不是学院式的论述人的痛苦和欢乐都不可及的冷冰冰的抽象科学的顶峰，而是力所能及地对生活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生动的、然而可能不完全正确的回答。

斯卢切夫斯基先生一开始就宣布，“现代心理学”已经走上新的发展道路，不再去解决有关心理现象的本质之谜，既抛弃了唯灵论的观点，也抛弃了唯物论的观点，而使自己的任务仅限于研究内心生活现象本身。在细节上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并不完全正确。例如，他说，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心理学家们倾向于唯物论，而只是“在目前”心理学方面的唯物论者同唯灵论者之间的争论才沉寂下

来，“于是学术力量便转向另外一个更有成效的基础”。这就是研究内心生活现象的基础。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提出具有这种新思潮的科学家中有“冯特和拉扎鲁斯、斯宾塞和雷诺维埃、泰恩和叔本华”。我不准备谈把所有这些人放在一起是否恰当的问题，而只想提醒斯卢切夫斯基先生一点：叔本华早在1860年就已经逝世，而斯宾塞的《心理学基础》最初是在1855年问世的，泰恩同心理学有关的一些著作都是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发表的，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提到的拉扎鲁斯文集《内心的活动》第一版是在1856—1858年问世的，等等。其次，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把莫雷尔和布里埃·德·布瓦蒙称作“现代精神病学家”，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显然不能说，这些可敬的学者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之后进行活动的。斯卢切夫斯基先生从他们的著作中只引用了（未注明出版年月）布里埃·德·布瓦蒙的《幻觉》一书，而这部专著在1862年已经出了第三版。由此可见，斯卢切夫斯基先生使自己的读者造成了时间先后顺序上的小小的混乱，是由于他想抓住心理学的转折点并把它同某个固定时刻联系起来。实际上，这种固定时刻并不存在，不但现在还有一些人徒劳无益地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而且在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指出的那个时刻以前，很早就有人研究过内心生活现象的规律。这两派同时并存，有时甚至融合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有时一个人在思想上并不同意精神和物质都是本质的提法，与此同时在研究现象时却采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但是，显然这类工作的成果已经进入了科学的宝库，而形而上学的水分则在不断蒸发，消失在空间，变得无影无踪。斯卢切夫斯基先生说道：“出现了一种新的流派，它不去解决概念(?)的实质，而是根据已经取得的成果，提出了一个比较谦虚、比较切合实际的计划——从内部，也从外部研究心理生活现象的数不清的各个方面。”真正称得上科学的科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流派。如果

说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正确地指出了现代心理学的成就，那仅仅是因为科学的宝库经常不断地在发展，同时继承了它所取得的全部成果。而科学的性质则是永远不变的。

但是必须指出，科学的性质本身并不能保证学者的工作就会“切合实际”和“谦虚”。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在论证想把小说也作为研究群众心理的材料时，自己也暗示了这一点。他说：“当代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现了一些标志，可以证明过去学者进行的大多数调查所具有的那种闭关自守状态即将消失，与此同时对本专业学问以外的一切都轻视的那种心理状态也同不久前在表述科学思想时所特有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形式一样正在消失。把优美的文学资料用于纯科学目的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并且可能会收到丰硕的成果。”甚至现在也能指出不少科学家，他们的计划既不谦虚，也不切合实际。看来甚至可以断定使科学家能够非常骄傲地置身于生活之外的社会条件……

无论如何，这方面并不是斯卢切夫斯基和奥布宁斯基两位先生的过错。令人遗憾的只不过是他们两位对待自己素材的态度有点粗枝大叶。上面指出的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在时间前后顺序上造成的混乱，我把它说成是他想把心理学的科学性质同一定的历史时刻联系起来，但是，显然可尊敬的作者的某种粗枝大叶作风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种粗枝大叶作风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自己有过亲身的体验。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指出：“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引用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传教士维特菲尔德乘轮船前往美国，他谈到了存在的徒然性，在他的热情演说的影响下听众们都兴奋过度，以致当他谈了轮船有可能由于暴风雨而沉没之后，尽管当时太阳当头，万里无云，他却使人相信轮船遇险，于是人们开始高喊求救，尽管当时非常安全。”

这里谈到的情况（证明维特菲尔德的演说才能具有非凡的鼓

动性的许多场面中的一个)确实非常有趣,甚至比斯卢切夫斯基先生传达的还要有趣。我并不知道维特菲尔德演说的内容,我也不知道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是从什么地方引来的“关于存在的徒然性的话”(?)。无论他传道的内容是什么,但传道是在陆地上,在纽约,而不是在轮船上进行的,而且在维特菲尔德的时代(他死于1770年)轮船还不能通到美国。显然,斯卢切夫斯基先生被维特菲尔德向水手们传道一事弄得莫名其妙,并且在随随便便地把我的故事谈过之后便发挥起自己的想象力来。维特菲尔德确实是向水手们传道,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是在陆地上进行的,因此演说的效果就更为惊人:不仅太阳当头,万里无云(而且我也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也不能保证就是这样),但是在听众的前面并没有水。然而维特菲尔德为了说明自己的某个思想非常鲜明地描绘了暴风雨和翻船时的情景,以致见过世面的老练水手们也焦急万分地高声喊起来:“救生艇,救生艇!放救生艇!”

至于奥布宁斯基先生,他在《在善行方面模仿的规律》这本小册子中根据卡莱尔和塔尔德的某些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仅仅根据我发表在《俄罗斯思想》上的一篇文章引用了这两位作者的话。他在《精神感染和霍乱骚动》一文中也用了同样的引文(但已不注明出处)。对于这种信任,我当然感到荣幸,但是我认为,如果奥布宁斯基先生能看一下卡莱尔和塔尔德的原著,那么就会发现某种我未能发现的东西,因而读者也会受益……

尽管如此,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和奥布宁斯基先生的文章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并且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很有教益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文章时,并不忽视我们上次谈到的塔尔德和西盖勒的话。

从文章的标题来看,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并不是象西盖勒和塔尔德那样,研究群氓的犯罪,而是研究群氓的心理,也就是说,他

取的题目要广泛得多。当然，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从群氓的一般心理特性中总是能找出犯罪群氓的特征，但是反过来从犯罪群氓的特征中却不能找出群氓的一般心理特性。遗憾的是，“心理学”只是停留在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文章的标题上，而实际上他也同塔尔德、西盖勒一样，研究的仍然仅仅是犯罪的群氓。

斯卢切夫斯基先生规定群氓的心理特征是：第一，容易因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而激动；第二，思想单一，全神贯注于某一种思想或某一种感情；第三，轻信；第四，残忍。我们只要看一下维特菲尔德传教的场面本身（它实际上要比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所作的的不确切的转述更明显、更具有代表性），便可以从中找到激动、思想单一和轻信，但是毫无第四种特征——残忍的痕迹。这就是说，第四点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特征，而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或许也有所保留，但是第一，他讲得十分含糊；第二，他在自己的全部议论中和选择事物时一方面受到群氓在霍乱骚动中已经表现出的残忍行为的单调印象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西盖勒和塔尔德论点的单调印象的影响。他说：“塔尔德认为，群氓是一种倒行逆施的现象，因为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越是集中在一个点上，这种联系的意义就越小，而群氓作为一个机体是独立于其身外的一切事物的。下述情况可以证实塔尔德的这一结论：群氓一般都是（虽然不全是）干坏事进行破坏，制造苦难和死亡，而从事建设，创造幸福和欢乐，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却很少成为群氓活动的中心内容。”

无论这类情况是否常见，但是既然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感兴趣的并不专门是群氓的犯罪，而是群氓的整个心理状态，这种情况本应在他的著作中有所反映，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至于塔尔德，他为了替自己总的论题辩解，倒确实是提出了如下的看法：群氓为相互团结的感情弄得过度兴奋，结果他们把其他所有的人都视为异己。但是不难看出，因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所以它绝不仅是适用于

“群氓”。塔尔德本人说道：“所谓正规军其实就有这种倾向，把自己之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同胞在内统统视为异己。正规军由于深受团结情谊的鼓舞（这种情谊与正规军组织的完善程度成正比），特别是在作战时感到自己同别的民族格格不入，因此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以防止士兵企图行劫。”

这一附带说明从一方面来看是完全多余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非常不够的，并且可以再一次证明塔尔德对自己对象的研究是多么欠深入。说这种附带说明是多余的，是因为在大家都很熟习的情况下，无论作战时丧魂落魄，也无论集体勇敢，都是通过某支队伍表现出来的，而这支队伍则具有群氓的一切特征。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附带说明又是不够的。塔尔德认为的那种仅仅是“犯罪群氓”或犯罪集团以及“所谓正规军”所特有的、同其他一切人格格格不入的心理，许多既不是犯罪性即违法性的，也不是军事性的集体也同样有。只需回忆一下印度的种姓和中世纪的行会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又如，具有独一无二组织的古罗马，——一个证明高度团结的令人自豪的座右铭：我是一个罗马公民，这难道不同时就是同其他整个“野蛮的”奴隶世界格格不入的座右铭吗？然而除了过去这些突出的例子之外，我们还知道许多当代文学中和生活中的悲剧，其中等级的或职业的偏见成了一道万里长城；顺便指出，我们知道就连这个世界闻名的中国这个词也成了普通名词；我们知道，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里爱国热忱具有极端仇视外国人或异族人的性质。总之，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塔尔德随心所欲地做总结的特点，但是其基础却极为狭窄。如果说这就是塔尔德头脑的引人注目的特性，那么，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在追随他的时候就应当特别小心。

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在是否有群氓的心理并不带有残忍色彩的“罕见情况”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塔尔德也同样如此，并且似乎走得

更远。例如，他问道：“群氓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得就在不久之前还是散漫的、互不关心的一群人突然结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一种一环扣一环的磁性链条，发出同样的喊叫，朝同一方向跑去，按同一计划行动？”接着他回答说：“仅仅是靠共鸣这一模仿的根源，靠社会体这一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塔尔德在另外一个地方谈到欧洲的某些运动时指出：“这些运动在实质上是同一种狂热和同一种精神流行病的种种类似的表现。这种狂热和精神流行病有时是有益的，有时是破坏性的，它可以使整个民族，甚至整个大陆去信奉一种新的宗教或新的政治教条，使南北半球的广大地区，无论是克勒特人、斯拉夫人或日耳曼人国家里的一切教派和政党，不问其各自形形色色的特点如何，都具有共同的重要特点。”

然而“研究大群人”却使塔尔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感染方面，恨一般都胜过爱，诽谤胜过赞扬，嘘声胜过掌声，消极的信念胜过积极的信念。”偏见应当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作用，以致一个人在决心提出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时，竟然完全不引用任何证据。特别有趣的是，他指出嘘声胜过掌声。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以及一切舞台工作人员和与舞台有关的职业的人员，如剧本作者、剧院业主、导演等出自最起码的考虑，如利益和自尊心，在自己的生活中力求消灭嘘声和博得掌声。被嘘的演员或是改到另外的剧场去演出，也许能获得成功，或是扮演别的角色，要不然就干脆改行。与此相反，一个有声望的演员有时甚至博得不应得的荣誉和掌声，仅仅是由于名气大。由此可见，谈到剧场和舞台，那么掌声的数量必须大大超过嘘声，并且甚至要想较准确地计算掌声和嘘声的感染性，也无从做起。当然，演说家和传教士的情况要更复杂些，但是，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他们。而主要的是，假如已经证明嘘声比掌声有更大的感染性，那么这也还是根本没有

谈到鼓掌的群氓和发出嘘声的群氓在道义上的性质。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都知道，最赋有感染性的行为，是纯生理的行为，如打哈欠、呕吐、打嗝儿、抽搐，它们根本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意义，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意义。但是，当我们谈到掌声和嘘声的时候，道义的因素便突出了，而且还比较复杂，因为从道义上来说，绝不可能无条件地把掌声置于嘘声之上，不可能认为掌声就一定表现为善意的崇高的感情，而嘘声就一定表现为恶意的卑鄙的感情。如果在一场技巧表演中出场的是一个手脚都被扭脱了关节、神色惊慌的可怜的孩子，那么对这种表演鼓掌的群氓当然就要比对这种拙劣的事发出嘘声的群氓要低得多。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西盖勒和塔尔德，也无论是斯卢切夫斯基先生都只字未提亚当·斯密，而亚当·斯密则第一个系统地谈到了不自觉模仿并建立了“道义感理论”，其论据与上面几位作者在谈到犯罪以及不道德和残忍行为赖以产生的论据是相同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者，有人简略地，有人则比较展开地谈到了赫伯特·斯宾塞的有机理论，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人涉及他的《心理学基础》，而该书的《舆论与共鸣》一章谈论的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但是却接近于亚当·斯密的思想。亚当·斯密的思想大致说来就是：不自觉模仿是我们体会别人生活，即因别人的痛苦而痛苦，因别人的欢乐而欢乐的能力的标志。毫无疑问，这种看法同塔尔德、西盖勒和斯卢切夫斯基先生的议论一样，同样是片面的，只不过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如果上述这些作者能少许注意一下别人的片面性，或许他们就会对自己的片面性作某些修正。至少别人的片面性值得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予以反驳，但是他们却连这一点也忽视了，并且认为残忍是群氓必不可少的属性，而去寻找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理由。

他们除了认为残忍有感染性之外，还从社会条件和人类学条

件中去找理由。但是只有西盖勒一个人研究了社会条件，并且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他也并不很重视。塔尔德则完全没有提到社会条件，而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只是顺便提出这样的意见：“由于斯切潘·拉辛和普加乔夫时代生活条件艰苦，正如当时的历史记载所证明的那样，他们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把民众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形成了由他们的支持者组成的群氓。在俄国的某些地区犹太人的剥削使居民非常敌视他们，这就往往为政权的代表提供了根据，预言可能会导致群氓采取暴力行动。”我们的那几位作者更为重视的是人类学条件。而人类学条件则被归结为人的身上存在着兽性本能，它们暂时处于沉睡状态，并为善良的本性所淹没，而这种善良的本性一部分是天生的，一部分则是培养的，但是一旦出现了有利的环境，兽性的本能就会暴露出来，而群氓则正是这种有利的环境。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极为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见解。他认为：“我们应当感谢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死屋》中通过主管在苦役中执行体罚的中尉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和斯梅卡洛夫这两个典型表明了人的心理的这个方面。”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在列举这两位中尉对被折磨的人进行种种无耻的残酷的嘲弄侮辱时指出，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和斯梅卡洛夫的因素，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而“群氓则是使这些本能表现出来并能充分掌握整个人的环境”。

我认为，在这些见解中正确的成分不多，但也存在着一些因素，可据以得出某些完全正确的局部性结论，首先，我虽然完全赞同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关于吸收小说文学参加研究内心生活现象是有益的这一总的思想，但是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没有必要去惊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科学，包括历史和精神病学都谈到一些无耻而残酷的人，他们的形象远比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和斯梅卡洛夫更为鲜明，这至少是因为他们活动的范围更广。这两

位中尉根本不能同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卡利古拉和尼禄之类的人相比。其次还留下了一个大问题。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断言：“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和斯梅卡洛夫的因素”“每个人”身上都有，是人生来就有的。真的是这样吗？目前有一种很时髦的看法，就是把一切不幸都归之于人的邪恶的本性，并认为邪恶的本性又是从远祖那里继承下来的。同时对某种兽性究竟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够经过漫长的时间而保留下来并且在某种情况下显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有的很巧妙，有的却一点也不巧妙。这可真是一个时髦的问题，它吸引着科学家、艺术家和实际活动家。它也同任何时尚一样，很快就会成为过去，但是看来，无须等到即将到来的那一天，就可以把导致兽行的两种原因：遗传（这一点任何人也不想否认）和表现出兽性的人的个人生活条件更细致地划分开。我并不认为，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和斯梅卡洛夫本来具有的是天使般的天性，但是很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精湛地描绘的这两个人那种不受监督的小统治者的地位远比某些天生的品质更能促使他们在自己的身上形成这种无所顾虑的残忍性格。这样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的人物，确实可以说明在个别情况下群氓凶残地杀人、放火、进行破坏时的心理上的某些东西。虽然我要重复说，对于科学和艺术来说，有一些远比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和斯梅卡洛夫更为鲜明的人物。

恐怕举不出有比凶残和贪淫好色相结合的所谓施虐淫更骇人听闻，更令人气愤的兽行了。当然，这类兽行在群氓中也可能存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主要是单独的个人所特有的，是在偏僻的地方悄悄干的。塔尔德和西盖勒指出群氓强奸妇女的情况，无论多么骇人听闻，却远不及施虐淫。断言群氓能干出单个的人不敢染指的残暴行为的人不妨记住这一点。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斯捷法诺夫斯基先生在哈尔科夫的《精神病学、神经学和法律变态

心理学档案》上刊载的一篇有趣的文章《消极论》中指出：“施虐淫者以对受害者拥有无限权力，可以任意使他的牺牲者流血为乐。”这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也是这样。但是他可能还决定于天生的变态心理特性，决定于广义的教育条件，即受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所处地位的影响。

西盖勒也同大多数意大利罪行调查学家一样，倾向于追随龙布罗佐，夸大返祖性和“天生犯罪性”的意义，然而毕竟要指出，欧洲群众当代的社会生活条件促使他们有时采用暴力，但接着又提出了一个心理学因素。他说，群氓的人数众多不仅能通过相互感染提高其激动的程度，而且还可以促使自身产生无限的信心，认识自身的力量在此时此刻是任何东西也不能与之相对抗的。群氓通过无数双眼睛看到，在他们面前，人、门、窗、房子等等一切都得让开，于是这一无限的，尽管是短暂的权力实践竟使群氓感到需要流血作为权力的最高证据。这一情况对单独的个人来说孕育着可悲的道义后果。西盖勒援引了雅科比博士的著作《关于选择的研究》，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以疯狂的残忍和淫乱闻名的罗马皇帝们。虽然雅科比主要是研究这些皇帝的变本加厉的继承性，但是却指出了无比残忍的根子在于某个叫尼禄的或是叫卡利古拉的什么人和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曾是全世界的统治者，他们象上帝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不受任何限制，因此他们习惯于在一瞬间实现任何似乎是最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实现每一个在一瞬间出现并且马上又忘却的愿望，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我”，削弱了抑制中枢的活动，结果造成了明显的精神错乱。这种现象很有代表性，因而过去德国的一些精神病学家甚至使用专门的术语“专制狂”来表示这种特殊的精神病。其症状之一就是无比残忍，某种出自讥讽同时又出自淫欲的凶残。但是除了精神病学术语之外，历史学家们还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这一情况：例如卡利古

拉尽管经常癫痫发作并且还患有严重失眠等病，但是却逐渐成了一只凶猛的野兽，留在后人的记忆中。与此相反，在他登基的初期，诚然，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却有意制造了一幅光明的景象。只是他那独特的地位本身逐渐使他头脑发昏。这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和力量本身也使群氓头脑发昏而达到凶残的地步。

斯卢切夫斯基先生在自己第一篇（4月份发表的）文章的结尾写了如下一段话，看来，指的也就是上述思想：

“群氓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下层居民，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条件很艰苦，他们引为自豪的幻想超不过涅克拉索夫诗中表达的愿望：

但愿有人称我为
‘伊万·莫先伊奇’
哪怕只是一次
我也心满意足！

突然间，这个甘愿满足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条件的普通人听到、自己被尊称为‘伊万·莫先伊奇’，看到人们对他阿谀奉承，并且感到人们对他只有关怀，人们对他只有效劳；警察们不知怎样才能讨他欢喜；军队为他击鼓、操练；哥萨克为他乘马疾驰；宪兵为他驰骋献技。他这样一个无声无息的人使所有人都感到恐怖。在他的面前人们跪倒在地，洗净饱经苦难的双手，请他饶恕或保护。他完全可以左右局势，并且由于兴奋过度而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拯救某个人，理所当然地惩罚某个人。这难道不是使人入迷、使人丧失一切自制力的环境吗？”

我说：“看来”这里表达了关于群氓对他们在一瞬间取得的无限权力在心理上产生的作用这一思想本身。仅仅是因为“看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看到了这种思想采取半幽默的形式。有些内容本身过于悲惨，以致不可能在谈笑之中提到它们。斯卢切夫斯基

先生在另外一个地方重复了塔尔德的意见：“社会在自卫时，总是竭尽全力，并且往往不能适当掌握自己的打击力量，而是打击过分。子弹可以命中群氓的带头人，也可以命中群氓中站在最后的人，可以命中罪过最大的人，也可以命中罪行最小的人，甚至命中显然是偶然置身于群氓之中的普通人”。这样的事确实经常有。这是一场可怕的流血悲剧，难道能容许通过似乎“警察们不知怎样才能讨好伊万·莫先伊奇”等的形式来谈论这场悲剧吗？

关于维特菲尔德向水手们传道的故事，可能不仅是斯卢切夫斯基一个人感兴趣，因此，我想再讲一下这位著名的美以美教传教士生活中的另一件事。

必须指出，维特菲尔德既没有丰富的思想，也没有象样的逻辑力量。但是他的演说才能却是罕见的，在世界史上找不出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天才：形象而有力的演说，非常善于掌握分寸，能使自己很快适应任何听众的水平并且无可指责地运用一些在别的情况下可能被视为可笑的词句来描绘各种景象，潇洒大方的手势，最后还有温和、柔顺、悦耳的声调，同时又很坚强有力，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他的声音在有三万人的广场上，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从富兰克林讲的如下一段故事中可以看出，他的演说才能是很难与之抗衡的。维特菲尔德想在乔治亚办一所孤儿院，富兰克林拒绝给予支持，并根据种种理由，认为办这样一个慈善机关的最合适地点是费城。在这之后不久，富兰克林亲自听了一次维特菲尔德的布道演说，发现维特菲尔德把话题转向了为乔治亚的孤儿院募捐，他决定一个钱也不给。富兰克林说：“当时我的口袋里有少量铜币、三四个银元和五个皮斯托尔金币。在传道的过程中我的心软了，决定捐献铜币。维特菲尔德又一次施展了演说才能，使我感到了羞愧，而到演说结束时我竟被他完全迷住了，便倾囊捐献。当时我们俱乐部的另一个成员也在场，他的观点同我一样，因

为他预见到将会募捐，为了预防这一手，他在离开家时身上没带一分钱。但是到演说结束时他也希望能参加捐献，于是便请自己身旁的一个熟人借一些钱给他，但是那个人，可能是整个这群人当中唯一坚定不移的信徒却回答说：“亲爱的霍金逊先生，要是在别的任何时候，你想借多少我都可以给你多少，现在可不行，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神经不正常。”

由此可见，富兰克林虽然具有极其坚定的信念，并且看法也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却成了被维特菲尔德吸引入迷的，看来可以大胆地说是被维特菲尔德催眠的群氓中的一分子。然而，无论维特菲尔德本人在这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毫无疑问，群氓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就是相互感染，使印象和激动的力量增加了许多倍。如果在家中，一对一地或是在不多的人当中富兰克林就不会赞成维特菲尔德的计划，也不会同意他的理由。但是，在这里，在为演说家的辩才所激动的群氓中，他本人以及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却都把自己的见解忘得干干净净，而为总的潮流所吸引入迷。从心理学上来说，这同1831年军屯士兵暴动的过程完全一样，当时一位老军士最初痛打的“不是指挥官，而是父亲”，后来也积极地参加了这场毒打。正如这位军士曾反对过打人一样，富兰克林也曾反对过捐献，但是群氓却采取了另外的解决办法。富兰克林的情况同军士的情况一样可以作为一个显明的例子，说明置身于群氓中的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如果说，在后一种情况下变得象野兽一样的残忍，那么对于富兰克林的转变却绝不能这样说。因此，断定残忍是群氓行动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没有道理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早已谈过了。诚然，西盖勒和塔尔德可能会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群氓，乃至人的任何集合体，不仅残忍，而且感情、思想水平总的说来都低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说，富兰克林最初的决定比他后来附和群氓的作法要正确，要明智。但

是遗憾的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规定一个所有的人都同样必须遵循对所有的人都具有说服力的尺度。西盖勒本人在援引塔尔德的话时，作为一个例外，提到著名的1789年8月4日夜里法国的特权阶层在国民议会中迸发的一种集体的慷慨豁达的热潮，这是属于这个阶层的人物所不可能单独作出的决定。它确实是慷慨豁达的热潮，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拒绝阶层的特权是不明智的决定。如果说在这类事情上可以进行争论的话，那么在把孤儿院设在乔治亚还是费城的问题上就更容许犹豫不决了，因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违反理性。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8月4日夜法国国民议会里出现的那股越来越引人入胜的慷慨豁达和大公无私的浪潮，还是富兰克林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附和的群氓都受到了善良的感情的鼓舞，对善事作出了响应。

但是一般认为群氓仅仅是或者在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某种残忍的集合体的看法，是由偏见所造成的，这种偏见使研究者忘掉了三类现象。

第一，大量的个别人的残忍行为，这类行为由于居心险恶和时间久长而大大超过了群氓在这方面的一切所作所为。关于愤怒的群氓的行为无论听起来多么可怕，但是我们永远能从个别人的生活中找到与之完全相同的例子，其区别仅在于，个别人的残忍一般都是长期的终身不变的，而群氓的情绪则是变化不定的。愤怒的群氓由于一桩小小的意外事件而在一瞬间平息下来的事例很多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下著名的米拉波的兄弟被巴黎居民视为革命死敌的米拉波·博奇卡子爵的一件事。一天他在街上被一群雅各宾党人和平民追上了，受到百般辱骂，已经听到了不祥的喊叫声：“把他吊到路灯柱子上去！”然而米拉波·博其卡是个快活、机智而勇敢的人，同时他可能象往常一样微带醉意。他停下脚步，客气地向群氓连连鞠躬致意，接着就唱起歌剧《伊菲姬妮亚》中的一段来：

我多么喜欢看到人们
出自至诚地对我表示恭维，
让大家快来恭维我吧！

传来了掌声，喝采声“好呀！”，笑声，于是米拉波不仅没有被吊到路灯柱子上去（这在当时的恐怖时期是很容易发生的事），反而被有礼貌地送回了家。使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在《俄国财富》第4期上刊载的一些过于草率而零散的随笔中一开始就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群氓情绪的变化，有的是由于听到一声怒吼，有的甚至不过是由于一顶不知为什么被突然扔到地上的帽子。单个的残忍的人却不是这样。斯卢切夫斯基先生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和斯梅卡洛夫身上体现的兽性，管它是天生的、继承的也好，或是由于掌权的实践养成的也好，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在年复一年，并且可能是日复一日地，几乎是经常不断地残暴地侮辱自己的受害者。在孤寂僻静的地方发生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悲剧，——例如，斯库布林斯卡娅“制造天使”和其他残酷折磨儿童的行为都是群氓所绝对不能干的，但是这些悲剧一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被偶然发现为止。西盖勒和塔尔德举了几个有关群氓进行野蛮残害的骇人听闻的事例，说明群氓甚至侮辱受害者的尸体。然而例如，列热把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强奸后把她掐死，接着又把她的尸体大卸八块，还吃掉了她的心；又如，著名的元帅热莱·德雷斯在经过多年的探索之后发现把淫欲和凶杀相结合的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一种享受，这两个人又比群氓好在那里呢？在最近的霍乱骚动中纵火烧了病院和传染病房，同“基督教的火炬”和尼禄制造的罗马大火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就以达尼列夫斯基的《阴暗的一年》和科斯托马罗夫的《库杰雅尔》这两部历史小说为例。第一部小说中的登场人物是群氓，第二部小说中则是单独一个人。究竟在哪一部小说中描写了

更多的兽行、流血和惊心动魄的场面呢？显然，在确实出现了群氓残忍行为的情况下，上述这一切并不能减轻群氓的残忍程度。但是如果研究犯罪群氓的人注意到反映人的残忍的血迹斑斑的整个大幅画面，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断然肯定，群氓暴露出来的残忍程度是个别人所干不出来的。

其次，研究者们，主要是那些站在较新的观点上，把模仿的规律运用于历史素材的人，完全忽视了，至少是尽力掩饰集体残忍发作之前的全部复杂的社会现象。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所谓农民战争中，德国农民的残忍行为对于塔尔德说来，首先具有独特的模仿性，其次，这种行为是宣传路德思想造成的后果，而这种宣传同样也归根于模仿，归根于精神感染。这实质上是回到了古代的历史书的写法上去了，它也曾见于中小学的教科书。固然，这些古书中并没有使用“精神感染”、“接触传染”、“模仿的规律”等等之类的术语，但是事情的实质并不因术语而有所改变。过去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路德如何“以对罗马教廷的仇恨激动了人心”，闵采尔如何“举起了义旗”，肯普滕的农民的榜样如何吸引了邻村的农民，同封建主进行流血斗争的巨浪如何席卷整个德国，等等。当然，应当给予古代的历史学家以公正的评价。他们也谈到了自觉地掌握宗教改革的思想，也谈到了整个运动的社会原因，这些原因不仅仅是通过“感染”的推动力、榜样的吸引力起作用，而且还直接影响运动的大多数参加者。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特别注意到这类原因。我们对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各阶层居民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况、经济、法律、政治地位作过很好的调查，我们从这些调查中了解到，封建天主教制度如何骇人地压迫民众，民众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抗。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被禁锢在愚昧和贫困的黑暗深渊中而陷于绝望的民众干出了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来。但是也应当考虑到民众在这之前长久忍受了世俗的和宗教的贵族老爷们每日

每时对他们、对他们的妻子、儿女施加的残暴行为、凌辱和嘲弄。但是这在实际上也仍然丝毫不能改变十六世纪农民群氓的残忍画面，但是如果注意到事情的这个方面，那么残忍作为群氓必不可少的特性就会有所减色。

最后第三，研究群氓心理的人不知为什么都倾向于忘记有时在群氓当中明显地使人感到有一种善、真、无私、浑厚的精神。奥布宁斯基先生做得完全正确，他在《在善行方面模仿的规律是一个被忽视的行善因素》这本小册子中一开始便讲了如下一段话：“对于传染病、感染，一般都仅仅是从这些词的消极意义上来理解的，然而，在积极的、最合乎愿望的现象中也可以看到接触传染的特性本身。”的确，完全看不出为什么只有不道德的行为才能感染。塔尔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在精神感染的机器中根本没有一个因素能证明这类断言。正如照相机并不懂得美和丑而是同样清晰地照下美和丑一样，不自觉模仿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就不问我们关于善和恶的概念，于是任何观念都变为相应的行动。一个处于注意力片面集中情况下的人，无论参加什么行动（甚至只是在心里想），他都会不由自主地重复这一行动，纯粹的模仿过程就是这样。但是后来这一过程就变得复杂了，部分是由于自觉因素的干预，部分地是由于引起注意力集中的观念的各个成分之间的斗争。某些罪行调查学家很早以前就发现，观看死刑有时能引起模仿行刑人的愿望（参看米特迈尔、基斯嘉科夫斯基等人有关的论述），有时则与此相反，能引起模仿受刑人的愿望。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有人到现场观看了死刑之后，便寻找刚刚被处死刑的人犯罪的机会或理由，甚至甘愿受和他们目睹的相同的刑法。毫无疑问，观看死刑这件事本身，特别是象往日那样公开地在阴森严肃的气氛中执行的时候，能够使易受感动的观众思想单一。但是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活动，因此，模仿的途径也一分为二：在行刑人

的观念和受刑人的观念之间出现了某种斗争，结果有时是这一方占上风，有时是那一方占上风。左右模仿朝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原因，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能够象这样一分为二却表明，模仿过程并不限于西盖勒、塔尔德和斯卢切夫斯基提出的范围。

鉴于霍乱骚动和布鲁塞尔国际刑事犯罪—人类学会议上的讨论造成的影响，应当把下述情况当作奥布宁斯基先生的特殊功绩：他避免了上述学者们的片面性。由于他那两篇几乎相同的论文都贯穿了一种深厚的仁慈的语调，他的功绩就愈加大了。

奥布宁斯基先生感兴趣的不仅是群氓残忍而荒唐地对待医生、医士、医院、药房，而且还包括群氓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所遇到的道义上相对立的潮流，这种潮流向闹饥荒，后来又流行伤寒、坏血病和霍乱的地方提供各种援助并组织“慈善”事业。必须指出，奥布宁斯基先生对这种慈善事业的理解和平时对这个词的庸俗化的解释大不相同。他认为慈善事业除了援助救济、大发慈悲之外，还包括“保护被压迫者、拯救被压迫者的舍己精神和公民的英勇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存在于做了好事的人的身上，而且也存在于不做坏事并因此而牺牲了自己的前途，或者不让别人干坏事的人的身上，等等。”奥布宁斯基先生甚至提出了一个非常微妙而准确的慈善家名单。因此我不能放弃在这里全文引用这一名单的机会：

“形体和灵魂都已枯萎、靠做慈善游戏消磨无所事事的晚年的贵族社会的老荡妇，迂腐而傲慢的伪善人；其次是她的必不可少的同伴‘秘书’，善于钻营、靠‘占卜老太婆’帮助开始升迁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有个谚语说‘要过上好生活，全靠占卜老太婆’）；下面是胸前挂满了奖牌，渴望获得十字勋章、贵族身分或将军衔的老牌‘基特·基特奇’；再下面是想通过这一途径跻身‘上流社会’，终日争风吃醋、耍弄阴谋的数不清的具有各种身分的女人；接下去是想以‘替穷人谋利’取乐的少女和她们的情人；靠修建慈善机关发财的

包工头，榨尽被收养孤儿血汗的管家；为自己广开门路的有名无实的医生；渴望能找到‘关系’以推销自己圣像画的无才画家；找机会巴结自己年迈的靠山的后生小辈（这些人只是‘在慈善事业的活动范围内’才能和老靠山接近）；不堪两性生活的苦闷而走向死亡的人，希望用任何东西填补自己那种对任何人都无用的生活的人等等，等等。”

这些人玷污“慈善事业”这几个字的崇高意义，看来使慈善事业无可挽回地具有滑稽可笑的因素。但是在不久前我们的社会由于饥饿和霍乱而发生的骚动中，除了上述人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正直的人。而模仿的规律，用奥布宁斯基先生的话来说，这种“残酷而仁慈、可怕而美好的规律，这种恶习的因子和一切灾难深重的人的法宝”，在这里，也如在纵火、破坏、杀人的活动中一样，起了自己的作用。而这些纵火和杀人的行为，至少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针对那些援助贫病交加的人的。这两股本应进入同一轨道的潮流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自然使奥布宁斯基先生产生悲观的想法，与此同时也产生一些有关模仿在社会生活现象中作用的理论见解。

遗憾的是，奥布宁斯基先生的这些理论性结论，显然做得很仓促，因而有些前后矛盾并且含糊不清，因此我最好是根本不必去提它们，但只有一点例外。

奥布宁斯基先生以塔尔德把模仿的规律分为逻辑规律和超逻辑影响的规律为根据，指出：“这两个因素可以是同时，也可以是分别地反映在人的感受能力上，这要看模仿的对象属于什么范畴。如果模仿的对象是道义功绩，那么逻辑的即自觉的动因和超逻辑的即自动的动因这两方面就必须同时起作用，才能产生与被模仿对象本性相符的模仿，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使模仿者不仅看到，而且知道和理解被模仿者。参与这一过程的自觉成分越多，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大，范围就越广，速度就越快，也越逼真。如果模仿对象不

是道义功绩，而是另外性质的事实，情况就会完全不同。那时第一种动因即自觉的动因可以完全没有。”

如果奥布宁斯基先生想通过这段话说明，只有自觉的模仿崇高的榜样（现实的或心里想的——理想的化身）才值得对道义行为进行品评，那么他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不相信，他想说的就是这个。无论如何这种解释并不与下述总的命题相抵触：精神流行病、精神感染不仅可以有消极性，而且也可以有积极性。说明群氓必须残忍或一般说来群氓水平低的唯一稍能站得住的理由，就是在类似情况下意识和意志受到抑制，据说，结果不受任何约束的粗暴的自私本能便浮到表面上了。这条理由仅仅是初看上去似乎能站得住。在我们不自觉的深处不仅仅有粗暴的自私的本能，我们的意识和意志也绝非总是趋向善良和光明。我不准备谈文艺创作和科学创作的过程，在那里不自觉的活动有时起最重要的作用。如果谈这方面的问题就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们现在只限于谈一下实践活动的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行动遵循的准则是盘算有利还是不利，是快活还是苦难，并且我认为，绝不总是把意识和意志都集中到建立道义功绩上。我为能够不这样说自己的读者而感到高兴，但是我希望，他能同意，这样的人并不是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有的。但是，遍及大街小巷、家家户户的其他一切人也会有生活中的节日喜事，这时人们除了意识和意志因无谓的斗争和操劳而受到抑制之外，只要受到震动，便会忘记一切盘算，而去完成某种不寻常的，可能是英雄的业绩；而在这之后，自己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奇。我引用过《战争与和平》中关于1812年莫斯科贵族迸发爱国狂热的场面：这些人来开会时怀着各种动机并考虑着自己的事情，——他们完全掌握着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在会议上他们为共同狂热的浪潮所淹没，确实忘掉了一切个人打算，为祖国作了各式各样的捐献；而到了第二天，当意识和意志又占了上风的

时候，他们回忆起自己昨天的爱国热忱，唉声叹气，搔首不已。著名的1879年8月4日夜里参加法国国民会议的许多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显然，我谈这种现象并不是责备意识和意志。从根本上说，这种现象是人类生活的一些最高点，它们使人凌驾于整个自然界之上，只有建筑在它们之上的东西才是牢固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慷慨无私的不自觉的行为。问题仅仅在于，以它们为基础是什么也建立不起来的。可以而且应当从它们那里取走它们能提供的一切，但是却不能指望群众性的和其他一切不自觉的狂热，即便是最高尚的狂热能够持久。明天市侩的庸俗意识和意志就能占上风，或出现相反方向的不自觉的狂热。俄国历史上有过许多这类的转变。令人吃惊的是，奥布宁斯基先生甚至把自己的巨大希望建立在我国历史的这一特点上。他说：“在模仿的规律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我国人民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比其他一切民族更容易受感染；例如，在上流社会中容易吸收外国的习俗和文化，民众中分裂运动的发展扩大，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的‘合群’能力等等，我国人民文化上和生活上的特性预示对善的模仿必将在多方面起着广泛的影响。”我认为合群的感情丝毫也不能保证善和恶。羊群会由于极小的一点原因就东奔西撞，而当牧人从羊群中找出一只羊准备杀掉的时候，羊群却在安详地啃草。亚当·斯密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竟想根据不自觉的模仿建立“道义感理论”。

但是不自觉模仿的坏的一面也正在于此。不能指望群氓会突然迸发出慷慨无私的感情（只能利用这种感情），但是也不应因群氓残忍就悲观失望；这些今天残忍的人，明天就会变得同昨天一样温顺。有人会问，既然这里谈不上任何意志，那么作为一种刑事惩罚，应当如何对待“邪恶意志”的这种表现呢？我已经说过，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我的使命。至于曾经担任过检查官的奥布宁斯

基先生(他本人谈到过自己“担任过多年的公诉人和侦查官”),他对于我们的霍乱骚动作了极有趣的回答。其实关于被自发的模仿力量吸引入迷的人,他讲得非常简短:“根本谈不上责任能力(从原则上说是这样,而不是根据现行法典)。”他对骚动的自觉因素讨论得比较详细。他的论点的实质可以归结为:这些骚动并不是“反抗”或“暴动”,而是“自卫”,是真正的自卫,以回击“向人民散布霍乱的医生”,“往活人身上洒石灰的”护士,“往望远镜里放霍乱菌的老爷”,等等。此外还为这种荒诞的奇谈加上了一定的环境,为“老爷”和医生的杀人意图找到了理由,例如,说沙皇想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为此老爷则想害死农民,等等。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不仅表现在纵火和毒打医生上,而且也表现在这样一些和平行动上,例如,喝铁路上大桶里的水,而不喝带白标签的容器里的过滤水,因为这种带记号的水是“有霍乱菌”的水,有毒的水。根据上面所讲的这一切,奥布宁斯基先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刑事处罚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合法的。应有责任能力的仅仅是“利用机会混水摸鱼的真正罪犯——职业小偷和暴徒”。对于其他的人则不需要采用刑事处罚,而需要教育。但是难道被残杀的人的鲜血不就是呼唤着惩罚吗?是的,奥布宁斯基回答说:“我们看到有两种自卫,各有各的理由:一种是社会的自卫,社会不得已采用苦役以代替并不存在的学校,另一种是人民的自卫,人民破坏了社会的安宁并且也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救星当成坏蛋。”接着又说:“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要对愚昧的群众进行教育,靠学校和预防性反自发措施,但是目前还没有这种教育、这种学校和这种措施,社会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保卫自己。但是社会应当知道,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不能安于这种状况,为了保卫自己就得付出过高的代价,并且就连社会现在所采用的那个法典也仅仅是在面临‘其他手段无法挽救的危险’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自卫。如果说这类手段目前暂时还

没有，那么它们应当有，也一定会有，马上就会有，因为生活不待人。”

当然，办学校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我们有一些政论家甚至由于发生了霍乱骚动就继续说教育对人民来说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的盲目无知使人惊讶不已。但是，我觉得奥布宁斯基先生又把学校同霍乱骚动一事过分地联系在一起了。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看的，然而我应当坦白承认，我虽然自命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我仅仅是到了最近这次闹霍乱才知道因霍乱而死的人的尸体在短时间内还会不时微微地抽搐。我不知道，如果我亲临其境，看到一个在棺材中的人显示出这种生命的标志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当然，这是个别现象，是可以预先防止的，只要：第一，医务人员小心从事和不要仓促安葬；第二，象去年那样专门做一些解释工作；显然这些解释工作，识字的人比不识字的人更容易接受。更有趣的是，奥布宁斯基先生努力把霍乱骚动说成是一种自卫，没有任何真正想造反的动因，他指出，在这之前正是这些人俯首贴耳地忍受了饥饿。确实，人民在荒年表现出的坚忍性真正值得吃惊。然而，仍然发生了某些误解。有的地方竟然以直接的暴力行动来对付救济农村的人；有的地方对他们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他们是“基督的敌人”，搞慈善事业是别有用心。对有关的事实报道得太少了，因而不能消灭这类令人痛心的悲剧，否则是足以能够防止霍乱骚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只能够通报一般的发展情况，当然是人们期望的发展情况，但是这还不够，还应当再加上一些别的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可以从奥布宁斯基先生本人那里找到这方面的论述。

遗憾的是，我们并不仅仅是在“有关霍乱菌的惊人的故事”中，而且也不是象奥布宁斯基先生所断言的那样“第一次看到了存在于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的底，而这一鸿沟则是宇宙史上通

过不断崩塌和成层逐渐演变形成的”……

译自《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1896年
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403—406页。

民意党恐怖派纲领^①

亚·伊·乌里杨诺夫

就我们的基本信念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确信，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即当社会劳动组织为每个工人提供享受他们自己的全部产品的可能性、个人的经济独立能够保证他在一切方面享有自由的时候，个人的物质福利和个性的充分全面的发展才是可能的。只有到那时，国家才能完成它的任务——为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发展手段，而且也只有在那样的社会里，在没有利益上的竞争和斗争的条件下，个性才有可能得到精神上的无限广阔的发展。

每个国家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必然结果，正如一旦国家走上货币经济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可避免一样。当然，这一规律并不是唯一可能的道路，它并不排除更加直接地过渡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可能性，如果在人民的习惯方面，在知识分子和政府的性质上，对于直接过渡具有特别

① 这个纲领是在1887年3月1日亚·伊·乌里杨诺夫和其他参与谋刺亚历山大三世的人被捕后才闻名的。纲领是亚·伊·乌里杨诺夫被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时根据追忆写的。——编者注

有利条件的話。这一规律所反映的只是那样一种历史必然性，即如果国家的发展是自发的，没有某个社会集团来有意识地干预这种发展，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当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并且发展到足够成熟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个理想的完全实现，以及每向它迈进一步，都只能是国内社会力量关系变化的结果，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觉悟在数量或质量上增强和提高的结果。任何原则只有通过人民本身的意识和意志才能在人民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而且只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才能为人民从意识上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作好可靠的准备。

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同经济发展平行地向前推进的。社会理想的发展本身要求生活方式的相应改变。当政府不能同社会齐头并进时，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便依其成熟的程度对政府施加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行政管理。由此可见，政治斗争是为达到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但是政治斗争只有在代表一定的社会集团时才可能这样，它的要求在社会上得到的支持越广泛，获得的成功也就越大。

为了搞清楚这些原则怎样适用于俄国生活的条件，并对俄国生活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变化的大致进程作出判断，让我们来看一下现时俄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

在俄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民不但由于人数众多，而且由于它的社会理想比较明确而强大有力。在农民中间还保存着古老的传统原则：人民享有土地的权利、村社自治和地方自治、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尽管小资产阶级在农民中有了显著发展，农民还是牢固地保持着村社占有土地的制度，而农民的不容怀疑的集体劳动习惯，为可望农民经济直接过渡到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农民的主要作用在于未来的社会斗

争；由于无组织性和对自己的政治要求缺乏明确的意识，农民对于现代政治斗争只能以自己笼统的不满情绪给予不自觉的支持。

按社会作用来说仅次于农民的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占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对于社会主义政党具有巨大的意义。工人阶级就其经济地位来说，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天然体现者，由于同农民通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可以成为农民中社会主义思想的很好的传播者；最后，作为城市居民中最活跃、最团结一致的部分，工人将对各种革命运动的结局发生强大的影响。工人阶级在为自己的经济需要而斗争时，不但对社会制度的变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当前的政治斗争给予至关重要的支持，它是最富有政治自觉性的社会集团。因此，工人阶级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核心，是它的最积极的部分，党的主要力量就应当放在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和组织上。

其他的社会集团有贵族、牧师、官僚，他们由于俄国生活的内在条件而已融为一体，他们只是应政府的需要而产生，由于政府的支持而强大，这些阶级几乎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它们的作用也是消极的。

我国的资产阶级尚处在形成的初期。由于受俄国社会轻微分化的制约，这个阶级目前还不可能具备阶级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具有完整的理想。资产阶级这种缺乏牢固基础的现象，使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在我国社会分化不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独立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没有阶级性，自然不可能在社会革命斗争中起独立的作用，但是它可以成为政治斗争中、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先进部队。

俄国政府也被公认为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它确实是这样一支力量，因为它不代表现存社会力量中的任何一种力量，支持它

的是军国主义和我国社会的消极因素：无组织性、消极性和缺乏政治素养。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政府在军队中的力量，但我们不认为军队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应同对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对它施加影响。政府所处的这种地位不可能是牢靠的、稳固的，它被迫要考虑到人民生活的运动，并跟随运动，迟早要对社会的各种要求作出让步。鉴于当今的俄国划分为这样一些社会力量，照我们看来，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应当归纳为以下几点：

党必须把主要力量放在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教育上，使工人阶级作好准备去发挥它所应起的社会作用。一个知识渊博的、觉悟高的政党，应竭力提高整个社会的智力水平，最后，尽一切可能努力去直接改善国民经济，以便将它引上符合自己理想的道路。

但是，在俄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从事任何这类活动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富有成效的宣传，同样，没有人民代表参与国家的管理，就不可能改善国民经济。因此，争取自由设施的斗争是俄国社会主义者为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不可缺少的手段。知识分子只有既依靠工人阶级按其组织程度和政治素养程度给予的支持，同时又依靠居民中开始觉醒而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要求摆脱行政专横的各个阶层，才能把发起这场斗争的使命担负起来。我们认为在没有事先建立的阶级组织、而只有和斗争同时产生的阶级组织的情况下进行这一斗争的可能性在于：俄国政府并不是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真实关系的代表，它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中都得不到积极的支持，因而它是不稳固的，一旦出现国内外的巨大动荡，它必定要向社会伸手求援，并对当时业已成熟的社会要求作出让步。

由此可见，党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只有暂时把自己的部分力量放到政治斗争上去，因为这是为实现最终的经济理想而使自己的活动更正确和更富有成效所必须采取的一种手段。

我们的最终要求，即我们认为为保证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及其自由发展所必需的一切，可以表述为如下纲领：

一、成立常设的人民代表机构。人民代表不分性别、信仰和民族，按照直接和普遍投票方式自由选举产生，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拥有充分的权力。

二、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保证一切职务均由选举产生。

三、米尔作为经济和行政的单位享有自主权。

四、实行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的充分自由。

五、实行土地国有化。

六、实行工厂以及一切生产工具的国有化。

七、由地方民兵代替常备军。

八、实行免费的初等教育。

关于我们同俄国其他政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说几句话。在政治斗争中，也就是说在争取宣传、教育活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希望和自由派协同行动，因为在要求限制专制统治和保障个人权利的时候，我们不会同他们发生分歧。只有在以后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民主主义信念才会使我们同他们分道扬镳。

至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我们同他们的分歧全是无关紧要的，仅仅是理论上的。这些分歧归纳起来就是，我们更期望国民经济直接向高级的形式过渡，我们肯定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独立作用，我们认为立即同政府进行政治斗争是必要的、有益的。

事实上，我们正是为着一些共同的理想，以同样的手段从事活动，我们相信，我们将永远是他们最亲密的同志。

附注：我们并不企求在这个纲领中提出的原则完美无缺，也不企求纲领在文字上表述得华丽无瑕，但是我们相信，在广泛的、党外的批评下，这个纲领将成为一切革命力量相互联系的环节，在友好的、兄弟般的工作中引导这

些力量去争取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

我们是党的恐怖派，也就是说，我们承担着同政府进行恐怖斗争的事业，我们认为有必要更加详尽地来论证我们对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和效果的信念。

俄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导致社会的先进部分同政府之间发生日益剧烈的纷争。产生这种纷争的原因是俄国的国家政治制度不符合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进步的民粹主义的愿望。这部分先进人物正在成长、完善，正在使自己的标准的社会制度的理想发展成熟，但与此同时，政府的反措施也在加强，表现在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恐怖手段来扑灭进步运动。

但是，生机勃勃的运动是扑不灭的。当知识分子被剥夺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进行和平斗争的可能性，又被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政府活动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采取政府所指出的斗争形式，即恐怖手段。

可见，恐怖手段就是政府同被剥夺了对社会生活施加和平的、文明的影响可能性的知识分子的冲突。政府忽视社会思想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而知识分子是在人民的全部历史中站稳了脚跟的一支现实的社会力量，任何一个政府的镇压都不可能迫使他们就范。反动派的势力可能越来越大，对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压迫也可能随之加强，但是，政府同社会上那部分优秀而刚毅的先进人物的纷争就会越来越剧烈，恐怖行动也就会越来越不可避免，政府在这场斗争中也将会越来越孤立。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政府将被迫向社会寻求支持，并对社会的最明确的要求作出让步。我们认为，这些要求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人民代表参与国家的管理。我们相信，恐怖行动完全是由于缺乏上述最起码的自由造成的，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肯定，假如政府保

证履行下列条件，恐怖行动一定会停止下来：

一、实行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的完全自由。

二、召集代表全体人民的、以直接和普遍投票方式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审查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的一切方式。

三、对以前的全部国事犯一律实行大赦，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履行公民的义务。

我们认为，恐怖行动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经常造成政府组织上的混乱迫使政府作出让步，但我们也丝毫不贬低它的其他好处。恐怖手段能够唤起人民的革命精神，不断地证明进行斗争的可能性，从而破坏政府力量的感召力，有力地对群众起到宣传作用。所以我们认为，不但对中央政府采取恐怖斗争是可取的，而且对地方的行政压迫采取恐怖反抗也是有益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恐怖事业的严格集中是多此一举，也是难以实现的。生活本身将驾驭恐怖事业的进程，并按照需要加速或延缓这个进程。政府在同人民的自发力量冲突时，愈是更迅速地意识到自身的软弱无力和作出让步的必要性，就愈易于了解这一现象的整个必然性和规律性。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631—636页。

“民意党人”传单1895年第3号^①

就任何一个社会政党来说，要做到使它的党员的世界观达到完全的一致，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未必有这种必要，因为，每个个人和小组的同一种革命思想带有不同的色彩，这是革命思想的鲜明性和灵活性的表示，是它的生命力的保证。但是，每一种社会流派，尤其是象社会政党这样的严密组织，是不允许在基本原则上有不同观点的。

社会革命政党认为，集体主义思想是自己的基本的、主要的思想。集体主义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原则，是同古老分散的村社生活和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在经济方面，它要把破产的或依附于资本的生产者组织成为统一的劳动大军，用共同掌握的生产工具，创造共同幸福的条件，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成十倍地增加人民的生产力。在政治上，集体主义就是民主，即人民的政权和——也许这一点更为重要，绝不是权宜之计，——人民的自由；在人民政权的保护下，人民的自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自由的胜利，作为不对别人造成损害的个性的胜利而得到发展。只有集体主义才能解决个人之间、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深刻对抗；只有集体主义才能取代野蛮的斗争和暴力，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带来基于利益一致的兄弟友谊。

广泛的、包罗万象的思想，面向未来的崇高理想，——是它，

^① 《传单》是彼得堡的青年民粹派在1892—1896年间出版的，总共出了四号。——编者注

也只有它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在鼓舞着优秀的人们。它随着人类意识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是它，而且只有它时而以理想的形式，时而以社会计划的形式，在昏暗的现实中照亮了饱尝苦难的人类。十九世纪的使命是把它形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经济制度和政治原则。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政治纲领之所以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是因为它的理论原理是完善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同时这也是近五十年来俄国最进步的人士始终在它的旗帜下进行活动的原因。革命政党的活动和世界观，从彼得拉舍夫派到赫尔岑、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到七十一——八十年代的运动，一直到目前时代，其理想是深刻社会主义化的。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揭示出赫尔岑、巴枯宁反对沙皇帝国政府的斗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维护农民经济自主的斗争和3月1日宣告结束的那次政党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过去的五十年间，我们从在理论上对傅立叶主义和圣西门主义的迷恋转入到从行动上保护人民的利益，同时对专制制度进行了斗争。外部活动条件的差别和由知识进步决定的我们的社会世界观上的次要差别，也使我们不同于我们的先辈。但是，尽管发生了这样的演变，我们仍然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的政党，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是为社会制度带来深刻的根本变革的集体主义原则的代表，仍然是革命者，一直到和平进步条件出现时为止。我们的光荣，我们同为我们的事业承受苦难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以及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对集体主义理想的忠诚，因为否则劳动阶级——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者就不会把我们当作自己人看待。

然而，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何必还要阐明呢？显然，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在八十年代上半期，就流传着一些议论，说是在俄国，社会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不符合俄国农民的实际需要，在革命政党的社会世界观中始终是一个僵死的、消极的、只会把社会上其

他反对阶层从我们身边吓跑的累赘。其实，这一观点的文学表述来自于侨居国外的伊·多勃罗沃尔斯基的一封著名书信。他尖刻地批评了怀有急躁情绪和特殊感的革命政党的策略，最后在信中表示真诚地期望同其他反对派融合在一起，把社会主义和其他极端的提法从纲领中删掉，按照对政治自由的共同要求和渴望，同自由主义反对派联合组成为统一的反对派政党。

这些观点的传播在俄国政治生活条件中找到了良好的土壤。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是极端反动的，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在非社会主义的人士中也建立起广泛的反对派，从而引起广大社会阶层对争取政治自由事业的注意。近年来，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同盟”^①作过的几次尝试，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尝试都对社会问题及其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采取沉默态度，它们以争取基本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名义力图把城乡反对派，把八十年代文化界和政界的反动派在享有特权、有教养的阶层中造就出的一部分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汇集到自己的旗帜下；另外，这些尝试指望取得巨大的实际成果，而且为了取得这种成果，实行了非个性化。据说，这是为了政治分寸的需要。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所有这一切。社会主义——外来的思想是毫无用处的累赘吗？！社会主义不能满足当代农民的实际需要，不是从俄国的现实条件得出的结论，而且是不可能实现的，果真是这样吗？！然而，事实却坚定有力地作了相反的回答。大家知道，我们所处的俄国正是自然经济崩溃的时期；资本主义象大海中的波涛汹涌地发展起来；我们是在踏着西欧的足迹前进。至于

^① 包括 1893 年组织的民权党，该党的基本任务是联合民粹派和自由民粹派的力量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但闭口不谈社会主义问题。弗·伊·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小册子中对民权党的立场作了评价。参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110—111 页。——编者注

我们在这方面走得多远，这都无关紧要，总之我们是在朝着社会主义前进。社会进化的全部过程都在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作准备。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宣传以其意识的光辉照亮着机械的进化论，促进并且加快了它的发展。社会主义不是不中用的累赘，社会问题得靠它来解决。难道我们能为了暂时的、眼前的利益而背叛这面旗帜吗？难道这是“政治分寸”所要求的吗？不，这不是政治分寸，这是机会主义，而且是毫无出息的机会主义。这是一种自我牺牲。可是有人对我们说，没有任何人拒绝社会主义，只是人们认为现在不便于提它，人们认为社会主义要求还遥远得很，最好不要把它作为成功的政治斗争方式提出来。

我们十分明了政治自由的全部伟大意义。政治自由对于我们 是 可贵的，因为它部分地反映了集体主义的原则，它是我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斗争必不可少的前提，最后，因为我们不是学理主义者，我们是活人，我们是在压迫下过着困苦的生活。所以，很早以前，我们就把政治斗争提出来，并把它宣布为最近的任务，但是，我们并不把我们珍贵的原则放到次要的地位。不要忘记，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我们的行动，而且还在于我们的思想，在于我们的信仰。它使我们深得人心，使我们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只有崇高的共同的理想，只有高度文明的思想，只有能够为人类打开通向美好未来的门户的思想，才能使人们跳出只着眼于平庸的琐事和个人利益的圈子，把他们引导到艰苦的英勇斗争的道路上去。只有伟大的思想才能起到唤醒人们头脑的作用，燃起人们心中的烈火，把个人的分散活动联合到社会政党的统一的有计划的斗争中去。所以说需要有革命的政党，首先是工人的政党。它的成员最初主要是特权阶级中的叛逆者，它的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和将来都有赖于工人群众。我们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人们的广泛同情。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在与我们亲如手足的工人群众当中传播社会

思想，应当在与我们亲如手足的工人群众当中树立起人民的事业不能没有自由的政治形式这样一种信念。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分寸。我们必须引导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投身于政治斗争的事业，因为，只有当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起来的时候，才能赋予政治自由本身以真正的民主形式。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的岗位就在工人中间。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斯莫利版第637—640页。

“民意党人”传单1895年第4号^①

在我们的四月号传单引起的种种不同的议论中，除了一些对我们表示同情的评论以外，我们同时听到了来自政治革命家和“同盟派”的不少反对意见。

这些反对意见并无新奇之处，我们也没有什么新道理好讲。我们只能把我们先前讲过的重复一遍，更详尽地加以发挥，以便于读者有可能更全面地领会我们的世界观的本质的东西。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把工人阶级看作未来革命的主要力量，把社会主义看作不可或缺的斗争口号，是错误的。他们说什么，我们是从阶级利益着眼来宣传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空想过的那套社会革命。在暴君专制的国家里，阶级利益的矛盾，比起同

^① 《传单》第3号是1895年4月1日出版的，而第4号是1895年12月6日出版的。两者在论题上是互相联系的，回答了同样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矛盾来，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俄国，只应把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当作革命的酵素来看待。“社会主义”革命正处在临界状态，它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它又是一场尚未达到的政治性的革命，如果我们一心想着这样的革命，那我们就不仅要把历史的前途毁掉，而且也会把精力分散掉。最后他们还说，我们在真正敌视社会主义的特权阶级中比在工人阶级中能找到更多的反对派分子，所以，你们就不要成为“红色分子”了，暂时还是请你们把你们的社会主义收藏起来吧。

可见，这些反对意见可以归纳为两个论题：（1）社会解放必须以政治解放为前提；（2）政治解放应当是社会上各个阶级的事情，而要较为容易地完成它，就得依靠最有教养的阶级。

这些道理我们很早以前就主要在自由主义派那里听到过。如果说他们向我们指出了这些道理同特权阶级的政治不满和社会满足有联系，那我们也未必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不过，我们现在要提起人们注意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如果规定出这样一套实现历史任务的顺序，设想人类在某一时期只完成政治任务，而在下一个时期只完成社会任务，那就会把该社会的法律形式、这些形式所表现的现实关系、以及说明这些形式的思想之间与逻辑上必然存在的、实际能看到的联系破坏掉。实际上，一切政治革命都是以正在实现或者已经实现了的社会革命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已被意识到的改变了的事物的关系为前提的。因此，只能在得不到满足和得不到承认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用宣传、鼓动的办法来引导人们进行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所要采取的形式，完全取决于已经突破了旧的外壳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这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原理。

由此就得出一个实际的结论：未来的革命要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它就得更充分地适应劳动阶级的利益，使劳动

阶级在思想上更明确和更关注自己的阶级利益及其实现的手段，更要为这些要求而大声疾呼。

抽象笼统的政治解放是没有的。在现实中只存在具体形式的政治解放。法治国家、代议制政体、个人权利，这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历史赋予这些概念以十分确定的内容。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可能很窄，也可能很宽。社会各阶级可能不同程度地享有已经争得的权利和自由带来的好处。其实，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占绝对统治的现代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具有自由的政治形式和代议制政权的法治国家。我们社会主义者不能不努力争取符合于劳动阶级利益的政治自由。我们必须尽量使建立在君主专制废墟上的法治国家的实际内容尽可能充分地符合全体人民群众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要求。

我们不认为指出七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者的社会革命宣传“缺乏成果”，会对我们有什么害处。

在许多世纪以来人类复兴的艰难事业中，对于今后更为伟大和长远的斗争的先驱者们的活动，怎能说是缺乏成果呢？成果是一定会有的，只不过是长期准备工作的成果。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西方的一切革命都有一个前奏，即在工人中不仅进行了民主主义的宣传，而且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宣传。在法国，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预言家有：圣西门、傅立叶、路易·勃朗、布朗基。1848年，马克思发表了他的《共产党宣言》。

通过以自觉的阶级对抗的激化为标志的革命，通过现在处于萌芽状态的有组织的工人政党，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优异成果。但是在取得所有这些成果之前，都有过这样一段时间，社会主义思想只是作为一种深刻的信念在工人群众中广为传播，这就为这些成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我们在七十年代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期，即使现在我们也仍

然处在这样的时期，所不同的只是我们要比革命民粹派能够更顺利地发挥我们的力量。空想社会主义曾力图使人们相信，公民社会里的一切人、一切阶级都能为它的事业服务，全体“人民”能很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理想，因为在社会主义理想与人民生活的现实基础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尚未被充分意识到的和谐一致。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七十——八十年代的革命者在组织“人民”的这一徒劳的企图上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老早就不再相信“人民”蕴藏着社会主义本质，更不相信“社会”这个根本不确定的阶层蕴藏着社会主义本质。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更加明确的任务：根据公民社会里由于事物的客观进程而将进入社会主义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将这个阶级组织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而这只有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名义才能办到。

有人为了要证实我们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指出了西方的例子，说在那里在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到来之前，已经有了由资产阶级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革命。这种代替和以政治自由的国家取代暴君专制的国家是一致的。他们说，政治上的自由形式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特权阶级的崇高斗争的成果，所以我们的宣传鼓动决然不应忽视强有力的反对派阶层，哪怕它们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同盟派”的说教便是由此而来的。我们不想断定，要使专制君主对地方自治局和城市等方面的请愿恩许以宪政，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绝不把我们的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政治自由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获得，而要从斗争中产生出崭新的社会形态，永远都不可能是不流血的。不要以为我们还会有别的什么办法。

在1789年、1848年2月—3月、七十年代，经过流血斗争诞生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是谁为之铺平道路而付出了

鲜血呢？是资产阶级，但是主要还是刚刚诞生的第四等级付出了鲜血；为了推翻专制制度，群众的肉体参加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很想知道，人民对于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革命，只是肉体参加，而在精神上不参加，这是否可能呢？第四等级只有理解到政治自由对于它的意义，即对于它的争取阶级利益的斗争的意义时，才有可能也在精神上参加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人民、工人阶级、城市无产阶级总是在对一切革命提出自己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理想。除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以外，人民还向伟大的革命提出了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而正因为如此，革命才变得伟大。人民决不肯为某种纯粹的“自由”作出牺牲，尽管这种“自由”在当时对于人民已经是消灭封建权力的同义语。1848年，社会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乌托邦的）推动了无产阶级的发展。假如无产阶级不相信拉马丁派取代路易-菲力浦能够使他们的物质状况和公民地位得到改善的话，那他们是不会奋起斗争的。

1789年，革命造成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①之分；1848年给法国带来了六月起义，给德国带来了阶级的法，在革命的第二天人民便发现受了骗，他们同资产阶级的流血冲突，就是第四等级同第三等级在利益上有着深刻内部矛盾的反映。我们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造成工人的革命意识，以便一旦爆发革命，人民不是去当炮灰，而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阶级出现，这个阶级明确地意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胜利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劳动利益的满足。工人越是能够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派别，他们赢得的成果就会越大，各种革命的措施也就越能充分地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工人的这种意识只有通过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才能形成。

^① 消极公民是指不具有财产资格、没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政治权利的公民。——编者注

其实，在原则上承认社会主义的活动，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只是在于社会主义者在不放弃自己的纲领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可能的同盟者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当然，在各种不同的矛盾着的利益同正在衰亡的陈腐事物之间相抗争的复杂过程中，社会革命者是占有一定地位的。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社会进化，并不单是由我们来实现的。陷入了重重矛盾的专制制度，在同贵族竞争中占优势并掠夺着人民财富的资产阶级，都在和我们一起埋葬旧制度，奠定新制度的基础。但是否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把他们的工作承担下来呢？那谁来干我们的事业呢？且不说他们的工作同我们的信仰和目标，同我们的道德观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我们一定路程上的同盟者，它可能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制度比起专制制度对我们较为有利。但是我们不相信，我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掩饰起来，以雄辩的口才、巧妙的道理就能够促使资产阶级通过地方自治会议、城市杜马或其他什么机关去做那些按其内部需要尚不成熟的事情。资产阶级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阶级，这样一个有觉悟、有野心的政党，往往是能够正确地确定自己的行动规范的。如果占据革命的地位对于资产阶级更有利，那它一定去占据它；如果站在合法的反对派一方更有利，那它一定会走这条路；如果同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更有利，那它决不会拒绝同它联合。

资产阶级之所以组织成为反对派，有的是由现今政府无法满足的阶级利益的驱使，有的是受它所敌视的政府措施的影响。

应当从公民生活的客观条件当中去寻求促使资产阶级起来革命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我们不可能创造出来，因而我们也不可能组织起一个资产阶级反对派。不过，一旦事物的客观过程使资产阶级意识到在陈旧的政治条件下已经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对这个因素予以利用，但是，资产阶级即使没有我们也同

样能够推举出一批有能力、有才干和有本领的领袖来；资产阶级将会缔造出一个组织，并在我国表现出它在西方所表现过的力量。到那时它也许会同我们结成联盟，或者会把君主制从“谋叛者”手中拯救出来并使它驯服。但是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资产阶级都是试图踏着我们的尸体迈入自由的宫殿。当然，它将只是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也正如我们只应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一样。

可是，有人说，我们不要同资产阶级谈论联盟。那我们又该同谁谈呢？是同持反对立场的自由派谈吗？是同那个建立在广阔的良心、发达的智慧、人道的情感的基础上的反对派别谈吗？但是，关于自由派，关于那批处在时间、空间和物质利益之外的知识分子的谈论，现在该结束了。同样，关于地方自治局等自治机关的自由主义的谈论现在也该结束了。

在二、三十年以前，的确有过那样一段时期，当束缚俄国生活的枷锁刚刚砸断的时候，各种新的政党、新的思潮，同各个社会阶级一样，一时间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是好。

俄国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革，即农奴制的废除，激发了人民的全部力量，改变了生活条件和人民的发展方向。有个时候，享有特权的半贵族的地方自治局曾经热切地希望为人民服务。有个时候，知识分子这群变化不定的开明人士，曾经成了光明、人道、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某种开端的代表者。这些变化不定的社会关系，这些新近组合起来的说不清的利益，也部分地说明了七十年代初期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者在官僚、地主、自由职业者当中取得的成就。

虽说那段时间没有多长，但经历的事情却不少。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思想确立了。资产阶级得到了成长和发展，专制制度认清了自己必须坚持的方向。

在工业生活具有明确的资本主义方向的国家，各种社会力量、

目标、利益、政党及其口号都很简单明了。在我国有反动透顶的专制制度，有专制制度重新扶植起来的贵族，有正在兴旺发达的资产阶级，有正在分化为小资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并最后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农民。专制制度和贵族是属于过去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属于未来的。一个反对派既然要立足于实际利益（它只有这样才会有力量），那它就不能不把根子扎在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之中。

在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有差别的社会里，思想也是有差别的，它不可能不成为这些阶级利益和矛盾的表达者。知识分子作为思想的代表，要么是社会主义的（例如他们站在劳动阶级一边），要么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我们并不相信贵族的地方自治局、资产阶级的城市自治、“开明的”报纸和杂志能为我们的事业服务。

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具有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历史作用的。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641—647页。

作者简介

舍尔古诺夫,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Шелгунов,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4—1891)——俄国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1858—1859年侨居国外时,与赫尔岑建立了联系。回国后,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1861年与米哈伊洛夫合写的《致青年一代》的传单流传很广,后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62—1864年被监禁在阿列克赛也夫半月堡,后被判处流放数年。舍尔古诺夫写过许多政论作品以及文艺批评文章,继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

米哈伊洛夫,米哈伊尔·拉里昂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 Михаил Ларионович 1829—1865)——俄国诗人和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61年因与舍尔古诺夫合写《致青年一代》传单而被流放服苦役,在流放中去世。

扎伊奇涅夫斯基,彼得·格里戈里也维奇(Зайчневский, Пет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42—1896)——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六十年代大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61年7月因从事革命宣传工作而被捕。1862年4月在监禁中起草了《青年俄罗斯》的传单。后在伊尔库茨克省服苦役。1874年后,在奥寥尔组织了雅各宾派的革命小组,并与莫斯科、彼得堡、库尔斯克等地的革命小组建立联系,还同特卡乔夫在国外建立的小组保持联系。1877年被放逐到俄国欧洲北部,直到1885年。1895年后在伊尔库茨克主持

《东方评论报》的国外部工作。

夏波夫,阿法纳西·普罗科菲也维奇(Шапов, Афанасий Прокофьевич 1830—1876)——俄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1860—1861年任喀山大学俄国史教授。1861年因发表纪念别兹德纳村农民起义牺牲者的革命演说而遭受迫害。1864年被作为“图谋不良的人”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创立了“地方自治论”,认为必须在发动地方民主自治的基础上改造俄国的国家制度,要求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教育。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他的世界观起了很大的影响。赞同革命民粹派的观点。

卡拉科佐夫,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Каракозов, 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40—1866)——俄国革命者,秘密革命团体伊舒京小组的参加者。赞成个人恐怖的策略,认为杀死沙皇可以推动人民走向社会革命。1866年8月抵达彼得堡,散发传单《致劳工朋友们》,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并在杀死沙皇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866年4月4日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判处死刑。

叶利谢也夫,格里哥里·扎哈罗维奇(Елисеев, Григо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1821—1891)——俄国民粹派政论家。曾为讽刺杂志《火星》和《同时代人》撰稿。1866年起与涅克拉索夫、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一起编辑《祖国纪事》杂志。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转到自由主义立场。1881年起因病几乎完全停止著述活动。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早期民粹主义思想家。1849年5月在德国参加领导德累斯顿起义,10月被捕。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在囚禁期间向沙皇写《忤

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到伦敦。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进行阴谋破坏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

茹柯夫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33—1895)——俄国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六十年代同巴枯宁接近,并成为他的最亲密的战友。1868年同巴枯宁一起是国际社会主义同盟的组织者之一,加入了第一国际,是国际中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最有影响的活动家之一。1872年同其他巴枯宁分子一起为抗议开除巴枯宁而退出国际。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社会学中主观学派的代表人物,《历史信札》(1868—1869年)一书的作者,该书对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有很大影响。是“英雄”和“群众”的民粹主义理论的创始人。1862年加入土地和自由社。1870年从流放地到巴黎,加入第一国际,积极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1871年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1873—1876年出版《前进!》杂志。1882年加入民意党。1883—1886年编辑《民意导报》。1893—1896年参加编辑民意党文集《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料》。

弗列罗夫斯基,恩(Флеровский, Н.) (真名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Берви,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9—1918)——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接近民粹派。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遭到行政流放,1862—1895年受警察局监视。他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1869年)一书曾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被马克思称为“第一部说出俄国经济状况真相的著作”。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

科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理论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实证论哲学家,社会学中主观学派的代表人物。1868年起为《祖国纪事》撰稿,后任编辑。1892年任《俄国财富》杂志主编,攻击马克思主义。

多尔古申,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Долгуш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48—1885)——俄国民粹派革命家。1872年组织多尔古申派小组并领导小组的活动。1873年在莫斯科建立秘密印刷所,印刷他所起草的传单。1874年被判处十年苦役,1881年因参加囚犯骚动改判十五年苦役。1883年起被先后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和什吕谢尔堡监狱,死于该处。著有《致俄罗斯人民》、《致知识分子》等传单和小册子《活埋》。

克鲁泡特金,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地理学家。1872年在瑞士加入巴枯宁派。回国后,因参加民粹派运动于1874年被捕。1876年逃往国外,宣传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沙文主义者。1920年在给欧洲工人的信中承认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并呼吁各国工人阻止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著有一些地理学和地质学著作。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提奇(Ткаче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5)——俄国革命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1873年起流亡国外,有一个时期为拉甫罗夫编辑的《前进!》杂志撰稿,1875—1881年同一些波兰流亡者出版《警钟》杂志,1880年为布朗基办的报纸撰稿。领导革命民粹派中接近布朗基主义的一派。认为政治斗争是革命的前提,但低估人民群众的作用。主张由革命的少数人组织密谋团体和采用恐怖手段夺取政权。错误地认为专制国家在俄国没有社会基础和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批判了他的

资产阶级观点。

斯捷法诺维奇，雅柯夫·瓦西里也维奇(Стефанович Яков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3—1915)——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参加了“到民间去”的运动。1877年利用农民对沙皇的幻想而起草了假的沙皇诏书，企图发动奇吉林县的农民起义(即所谓“奇吉林阴谋”)。1877年9月被捕，1878年8月逃往国外。1879年回到俄国后加入土地和自由社，该社分裂后是土地平分社的组织者之一。1880年流亡国外。1881年回国后成为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82年2月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八年苦役。1905年起脱离政治活动。

克拉夫钦斯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Кравчинский,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51—1895)——俄国作家和政论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代表。1872年加入柴柯夫斯基派民粹主义小组，曾参加“到民间去”的运动。1873年流亡国外。1878年回到俄国，积极参加民粹主义组织土地和自由社的活动，编辑《土地和自由》杂志第一期。1878年8月刺死宪兵司令美津佐夫，不久逃往国外。1884年起住在伦敦，是俄国“自由之友”社的组织者之一。著有《地下的俄罗斯》(1882年)、一些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安德烈·科茹霍夫》(1889年)。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参加民粹派运动，是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成员及土地平分社领导人之一。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写过不少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批判

了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马赫主义。二十世纪初与列宁一起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反对列宁的民主革命的策略。后来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摇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反对取消主义，领导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

多罗申柯，阿(Дорошенко, А.) (真名基巴尔契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Кибальчич,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54—1881) ——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活动家。1875年因保存民粹派文献而被捕，囚禁狱中三年。1878年转入秘密状态并加入了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后来加入了民意党，是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因组织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于1881年8月17日被捕，同年4月8日被处绞刑。

阿列克谢也夫(Алексеев) (真名布宁，尤里·阿列克谢也维奇 - Бунин, Ю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俄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民粹派革命家。哈尔科夫地方民粹派的理论家和首领。

尤沙柯夫，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Южаков,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9—1910) ——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社会学中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为《祖国纪事》、《欧洲通报》等杂志撰稿。1894—1898年任《俄国财富》杂志编委，1900—1909年主编《大百科全书》。

沃龙佐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Воронцо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1847—1918) ——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著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我们的方针》、《理论经济学概论》等书。断言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维护小商品生产，把农民村社理想化，

鼓吹同沙皇政府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1844—1918)——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曾和革命平民青年小组有联系。1870年初被捕。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多年，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译的)。1893年出版了《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列宁尖锐地批判了他的反动观点。

乌里扬诺夫，亚历山大·伊里奇(Улья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1866—1887)——列宁的哥哥，在大学时代就开始进行革命活动。曾加入民意党，因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87年3月1日被判处死刑，同年5月8日被绞死。